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志丛书

---

# 陕西省志

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编

---



第七十八卷

# 外事志

陕西人民出版社

# 陕西省志

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编

第七十八卷

# 外事志

陕西人民出版社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志丛书

---

# 陕西省志

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

第七十八卷

# 外事志

陕西人民出版社

(陕)新登字 001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陕西省志·外事志/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1

ISBN7 - 224 - 05804 - 1

I. 陕… II. 陕… III. ①陕西省—地方志②外交事务—概况—陕西省 IV. K294.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28723 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志丛书

陕西省志·外事志

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编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陕西省印刷厂印刷

787 × 1092 毫米 16 开本 54.375 印张 26 插页 906 千字

2001 年 8 月第 1 版 200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7—224—05804—1/K·962

定价: 150 元

## 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 |      |     |                     |
|------|-----|---------------------|
| 主任：  | 程安东 | 省长                  |
| 副主任： | 贾治邦 | 常务副省长               |
|      | 贾 湘 | 省政府副秘书长             |
|      | 周伯光 | 省地方志办公室主任           |
| 委员：  | 董健桥 | 省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          |
|      | 张芳斌 | 省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          |
|      | 邓 理 | 中共陕西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省人事厅厅长 |
|      | 白智民 | 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        |
|      | 宋海源 | 省人大常委会秘书长           |
|      | 姚 毅 | 省政协秘书长              |
|      | 刘运通 | 省军区副参谋长             |
|      | 丁全德 | 省财政厅厅长              |
|      | 冀东山 | 省新闻出版局局长            |
|      | 胡守贤 | 省统计局局长              |
|      | 田晓光 | 省档案局局长              |
|      | 武复兴 | 省图书馆名誉馆长            |
|      | 霍松林 | 陕西师范大学教授            |

## 《陕西省志·外事志》编纂委员会

主任：郝延政

副主任：韩国劲 饶笃钧 裴长莉 曹先觉  
朱大安 左 锋 柏 明 王克致  
杨庚泉

委员：（按姓氏笔划排列）

王治孝 王 琦 马长安 白安平  
朱景琪 何 平 张少军 张志道  
陈为雄 陈仁周 秦 川 雷 霆

## 《陕西省志·外事志》编纂办公室

主 编：韩国劲 饶笃钧

副主编：柏 明 王克致 杨庚泉 韩晓安 李颖科

编 纂：柏 明 王克致 杨庚泉 李颖科 韩晓安  
王治孝 张志道 张世民 王 琦 张 枫

初审：陕西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省侨务办公室）

终审：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

## 序

---

《陕西省志·外事志》从 1991 年正式起步，十易春秋，终于公开出版了，这是我省外事系统可喜、可贺的一件大事。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独有编纂方志的优良传统，前人的诸多传世之作，在“资治、存史、教化”等方面都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但却没有一部专门的外事志。中华人民共和国盛世修志，增设外事志，填补了传统方志的缺项。江泽民总书记说：“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是两个文明建设的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系统工程，是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服务当代、有益后世的千秋大业。”钱其琛副总理为了使人们重视这项工作，特为本志题签，这是对我们的支持和鼓舞。

增设外事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编纂方志上的一项创举，因此，记述内容就需上溯中华民族对外交往之源，下及现代中国改革开放之新时代。中国古代自西周至唐，先后有十余个王朝在陕西建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又是中共中央的常驻地，中国共产党在这里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1949 年新中国的建立，则彻底摆脱了近代以来屈辱外交的历史。以上各时代陕西的对外交往频繁，遍及亚洲、非洲、欧洲以至美洲的众多国家。集上述特色之背景，是全国其他省份所无法比拟的，这就决定了编纂《陕西省志·外事志》，既要明古，也要详今，否则，就不能反映陕西对外交往的历史和现实。因此，我们在上述原则的指导下，贯通古今，而将重点放在古代的汉唐盛世、近代的延安 13 年和新中国建立至 1991 年间的改革开放之际，以期在“服务当代，有益后世”方面起到应有的作用。

《陕西省志·外事志》作为一部新志书，可谓资料丰富，记述翔实，文笔流畅，图表兼及，可供雅俗共赏。不过，见仁见智，还有赖于广大读者依据各自的慧眼鉴识。

当前，外事工作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我们要在邓小平理论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指引下，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坚定不移地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执行对外开放政策，将陕西的外事工作推上更高的阶段。

值此志书出版之际，谨对为此书付出辛勤劳动的编纂人员和有关人士，特别是韩国劲同志，致以衷心的感谢。

郝延政

2000.12.7



---

## 凡 例

---

一、本志为《陕西省志》之一卷，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力求实事求是地全面系统记述陕西省与国（境）外交往的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贯通古今，明古详今，上溯五千年前外事发端的黄帝时代，下限止于1991年12月底，涉及侨务等少量内容适当下延至90年代中叶。

三、本志所述“外事”，概指现今中国版图之内与版图之外的国家、地区的交往活动。

四、本志“侨务篇”（1949—1996）记述范围涉及港澳，是因侨务工作的任务性质所致，应与凡例第三条界定的所述范围有所区别。

五、本志采用史志结合体。首设概述，其后分设古代、近代、现代、侨务、大事记五篇，最后为附录和后记。

“古代”指1840年鸦片战争前，“近代”指1840年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现代”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

六、关于人物的编写。鉴于古代、近代篇已记述有关人物的生平事迹，为了避免内容上的大量重复，不再另行立传。现代人物，按生不立传、绩籍并重和以陕西籍为主的原则入传，编为第三篇第九章。对于在世的有关人士，则列表略述。

七、大事记篇以时为序，以事为纬，力求大事不漏、小事不记。

八、本志体裁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以志为主体。图、表置于篇首或随文插入，以补文字之缺陷，增文字之形象。

九、本志文体除引文外采用语体文。标点、数字按统一规范书写，机构、职务、地名按不同时期的称谓书写，必要时括注今名。

十、关于纪年。按照陕西省地方志编委会的规定，新编方志的编写均采用中国历史纪年。但考虑到外事广泛涉及中外事迹，因而在以中国历史纪年

为主的情况下，个别志文必要时采用公历纪年，括注两者相应的年代。

十一、陕西外事涉及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领域，为避免与其他专业志重复，在设章立目或详略取舍上，有交叉者一律从略。

十二、本志资料来源于史籍、档案、报刊、方志、文献汇编和口碑资料等，经考证后入志，必要时注明出处，或予以注解。

# 目 录

概述.....	(1)
---------	-----

## 第一篇 古代外事（远古至鸦片战争前）

第一章 远古至战国 .....	(11)
第一节 对外交往溯源 .....	(11)
第二节 丝绸之路由来 .....	(13)
第三节 涉外机构初建 .....	(15)
第二章 秦汉魏晋南北朝 .....	(16)
第一节 概况 .....	(16)
第二节 涉外机构 .....	(17)
第三节 张骞通西域 .....	(19)
第四节 班超复通西域和甘英使大秦 .....	(23)
第五节 丝绸之路的开拓 .....	(26)
第六节 使节往来 .....	(28)
一、东亚 .....	(28)
二、东南亚 .....	(31)
三、南亚 .....	(33)
四、中亚、西亚 .....	(35)
五、欧洲 .....	(38)
第七节 经济、科技、文化交流 .....	(40)
一、东亚 .....	(40)
二、东南亚 .....	(42)
三、南亚 .....	(44)
四、中亚、西亚 .....	(52)

五、欧洲 .....	(57)
<b>第三章 隋唐五代</b> .....	(59)
第一节 概况 .....	(59)
第二节 涉外机构 .....	(61)
第三节 丝绸之路的兴盛 .....	(62)
第四节 唐长安城的国际地位 .....	(67)
第五节 使节往来 .....	(72)
一、东亚 .....	(72)
二、东南亚 .....	(103)
三、南亚 .....	(106)
四、中亚、西亚、非洲、欧洲 .....	(111)
第六节 经济贸易 .....	(120)
一、东亚 .....	(120)
二、东南亚、南亚 .....	(125)
三、中亚、西亚、非洲、欧洲 .....	(126)
第七节 科技、文化交流 .....	(130)
一、东亚 .....	(130)
二、东南亚 .....	(175)
三、南亚 .....	(178)
四、中亚、西亚、非洲、欧洲 .....	(197)
<b>第四章 宋元明清 (1840 年前)</b> .....	(210)
第一节 概况 .....	(210)
第二节 涉外机构与使节往来 .....	(211)
第三节 丝绸之路的延续 .....	(212)
第四节 经济、科技、文化交流 .....	(215)
一、亚洲、非洲 .....	(215)
二、欧洲 .....	(219)

## 第二篇 近代外事 (1840—1949)

<b>第一章 鸦片战争至清末</b> .....	(231)
第一节 概况 .....	(231)
第二节 涉外机构 .....	(234)

---

第三节 外患与抗争	(235)
一、鸦片祸陕	(235)
二、仁记、太古洋行事件	(237)
三、西潼铁路事件	(238)
四、延长油矿事件	(240)
五、南郑八角山教案	(242)
六、宁羌燕子砭教案	(243)
七、三边教案	(247)
八、平利洛河教案	(248)
九、西安南关教案	(250)
第四节 对外派遣留学生	(251)
一、20世纪初陕西最早的几批留学生	(251)
二、陕西留日学生在日本的革命活动	(254)
第二章 中华民国	(257)
第一节 概况	(257)
第二节 涉外机构	(260)
第三节 外患与抗争	(261)
一、陇秦豫海、同成铁路借款合同	(261)
二、延长石油矿权	(262)
三、盗卖“昭陵六骏”	(262)
四、抗议瓜分中国的太平洋会议	(263)
五、声援五卅反帝爱国斗争	(264)
六、对九一八事变的反应	(265)
第四节 友好交往	(266)
一、芬兹尔与陕西林业	(266)
二、路易·艾黎与宝鸡“工合”	(268)
三、乔治·何克在宝鸡	(269)
四、西安事变中的端纳	(270)
五、牙科医生海伯特在西安	(272)
六、外商石油公司在陕西	(273)
第五节 杨虎城欧美之行	(273)
第三章 陕甘宁边区	(280)

第一节 概况	(280)
一、坚持抗日	(280)
二、对外开放	(284)
三、独立自主	(288)
第二节 涉外机构	(290)
第三节 延安与共产国际	(291)
一、交通路线和联系方式	(291)
二、共产国际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292)
三、人员交流	(294)
第四节 外国记者、作家访延安	(300)
一、斯诺	(300)
二、史沫特莱	(306)
三、王安娜	(308)
四、海伦·斯诺	(309)
五、比森	(311)
六、贝特兰	(312)
七、希伯	(312)
八、艾金森	(313)
九、西奥多·怀特(白修德)	(313)
十、斯特朗	(314)
十一、斯蒂尔	(315)
十二、中外记者参观团	(315)
第五节 外国医生及医疗团体在延安	(320)
一、马海德	(320)
二、白求恩与加美医疗队	(322)
三、印度援华医疗队	(325)
四、国际公谊救护队	(327)
五、方禹镛	(327)
六、米勒	(328)
七、阿洛夫	(329)
八、傅莱	(330)
九、罗别愁	(331)

第六节 美国官员和军事观察组在延安	(332)
一、卡尔逊	(332)
二、赫尔利	(333)
三、美国军事观察组	(334)
第七节 外国其他团体、人士访延安	(337)
一、洪水、胡志明	(337)
二、世界学联代表团	(338)
三、陈嘉庚与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	(342)
四、南洋华侨司机回国服务团	(345)
五、英国援华总会	(346)
六、路易·艾黎与“工合”延安事务所	(347)
七、郑律成	(348)
八、威廉·班德	(349)
九、林迈可	(350)
十、李敦白	(350)
十一、阳早、寒春	(351)
第八节 日本人在延安的反战活动	(352)
一、延安的“日本反战同盟”	(352)
二、日本工农学校在延安	(355)
第九节 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会在延安召开	(356)
第十节 正式成立联合国的旧金山会议	(358)

### 第三篇 现代外事

第一章 外事管理	(363)
第一节 机构设置	(363)
一、省级外事机构	(364)
二、省级对口单位外事机构	(373)
三、地(市)、县外事机构	(375)
第二节 对外友好组织	(376)
一、中苏友好协会西安分会	(376)
二、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西安分会	(378)
三、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陕西省分会(省友协)	(380)

四、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西安分会·····	(381)
五、中国人民外交学会陕西省分会·····	(382)
六、中国国际交流协会陕西省分会·····	(383)
第三节 涉外团体·····	(383)
一、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陕西省分会·····	(383)
二、陕西省海外联谊会·····	(385)
三、陕西省归国华侨联合会·····	(387)
第四节 外事会议述要·····	(389)
第五节 外事队伍建设·····	(398)
一、干部结构·····	(398)
二、培训教育·····	(399)
三、评定翻译职称·····	(401)
第二章 接待来访·····	(403)
第一节 国家元首、政府首脑·····	(405)
一、总统、总理、首相·····	(405)
二、副总统、副总理、副首相·····	(458)
第二节 议会团组·····	(460)
一、议长、副议长·····	(460)
二、议员团组·····	(470)
第三节 党派组织·····	(472)
第四节 部长级团组·····	(479)
第五节 国际组织·····	(487)
第六节 使(领)馆·····	(490)
第七节 新闻团组·····	(502)
第八节 前总统、前总理、前首相·····	(533)
第九节 前部长级外宾·····	(535)
第十节 民间团体·····	(536)
第十一节 文化团体·····	(539)
第十二节 军事、司法团组·····	(541)
第十三节 外国地区团组·····	(543)
第十四节 其他团组·····	(543)
第三章 出国(境)访问·····	(548)



---

第一节 出国(境)审批	(548)
第二节 出国(境)团组	(549)
<b>第四章 友好城市关系</b>	<b>(559)</b>
第一节 友好省州(省府)	(559)
一、美国明尼苏达州	(559)
二、日本国京都府	(563)
三、比利时王国安特卫普省	(567)
四、意大利共和国特拉维索省	(570)
第二节 地(市)级友好城市	(572)
第三节 友好交流合作关系	(573)
<b>第五章 民间友好关系</b>	<b>(574)</b>
第一节 建国初期	(574)
一、中苏友好协会西安分会	(574)
二、陕西省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省友协)	(575)
第二节 “文化大革命”中	(585)
第三节 1977年至改革开放后	(587)
<b>第六章 对外开放</b>	<b>(601)</b>
第一节 开放口岸	(601)
一、机场	(601)
二、西安海关	(603)
第二节 开放地区	(604)
一、地市	(605)
二、历史文化名城	(606)
三、风景名胜	(606)
第三节 开放单位	(606)
一、开放单位的建立	(606)
二、开放单位的管理	(613)
第四节 对外经济开发区域	(622)
<b>第七章 领事</b>	<b>(624)</b>
第一节 护照、签证	(624)
一、护照颁发与管理	(624)
二、申办外国签证	(629)

第二节 专家与留学生、实习生工作·····	(630)
一、外国专家·····	(630)
二、外国留学生、实习生·····	(640)
第三节 涉外事件·····	(641)
一、日本学生垦美穗子坠楼死亡·····	(641)
二、澳籍专家苏珊·戴伊遇刺·····	(643)
三、日本东海旅行社团组遭遇车祸·····	(643)
四、“马尾巴事故”·····	(644)
五、美国纽约时报驻京记者进入非开放地区·····	(644)
六、比利时籍杜山·弗朗索瓦违反签证规定·····	(645)
七、美国技工凯普海末在住地悬挂美国国旗违反中国规定·····	(646)
八、日本 SCT—0314 “三国之旅” 团组车祸·····	(646)
九、日本本田昭四教授死亡·····	(647)
第八章 经济、社会领域的对外交往·····	(649)
第一节 经济交往·····	(649)
一、工业·····	(649)
二、农牧、林业·····	(661)
三、经贸·····	(672)
第二节 科技交往·····	(676)
一、官方·····	(676)
二、民间·····	(680)
第三节 教育交往·····	(682)
一、接待来访·····	(682)
二、出国访问·····	(683)
三、聘请外国文教专家·····	(683)
四、接受外国留学生·····	(686)
五、留学回国人员·····	(687)
六、校际关系·····	(688)
七、引进外资·····	(689)
第四节 文化交往·····	(690)
一、文化艺术·····	(690)
二、文物展览·····	(697)

---

第五节 体育交往	(698)
一、来访	(698)
二、出访	(699)
三、援外与外援	(700)
第六节 医药、卫生交往	(700)
一、医药	(700)
二、卫生	(702)
第七节 新闻交往	(706)
一、省新闻工作者协会	(706)
二、陕西日报社	(707)
三、陕西广播、电视	(708)
第八节 宗教交往	(710)
第九节 旅游交往	(715)
第九章 现代人物	(721)
第一节 涉外人物传略	(721)
第二节 陕西籍外交官名录	(725)

#### 第四篇 陕西侨务 (1949—1996)

第一章 组织机构	(729)
第一节 省外办华侨组	(729)
第二节 省侨务办公室	(730)
一、侨务处	(730)
二、省侨务办公室	(730)
三、地(市)侨务机构	(732)
第三节 协会组织	(734)
第二章 工作概况	(735)
第一节 解放初期至“文化大革命”前夕	(735)
第二节 “文化大革命”时期	(737)
第三节 对外开放时期	(738)
第三章 华侨、华人、归侨、侨眷分布情况	(748)

## 第五篇 大事记

古、近代	(753)
现 代	(762)
附 录	(789)
一、毛泽东接见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的致辞、问题与答复	(789)
二、朱德和外国记者斯坦因的会谈	(792)
三、叶剑英与中外记者参观团的谈话	(798)
四、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战友们——1944年8月15日《解放日报》社论	(817)
五、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与谢伟思的六次谈话——谢伟思的报告	(819)
六、毛泽东同包瑞德的会谈——包瑞德的报告	(847)
后 记	(853)

---

## 概 述

---

《陕西省志·外事志》主要记述自古以来陕西地区与现今中国版图以外的国家、地区间的交往活动。陕西地区的外事活动在中国对外交往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陕西地处黄河中游，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古长安更是“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它北临滔滔渭河，南倚巍巍秦岭，沔、涝逶迤西境，灞、浐环绕其东，成为中国历史上众多王朝的京畿之地，即所谓“秦中自古帝王州”。西周起，陕西地区先后有秦、西汉、西晋（愍帝）、前赵、前秦、后秦、大夏、西魏、北周、隋、唐等十余个王朝在这里建都，时间长达一千余年。古长安更被历代王朝视为安邦治国之本，长期成为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的中心。许多雄伟悲壮的历史在这里一幕幕展现，众多名噪一时、来去匆匆的风云人物在这里留下了可供后人凭吊的遗迹。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唐以前发生在这一地区的对外交往活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中国外交的主体。尽管唐代以后中国的经济重心南移和海上丝绸之路兴起，长安不再作为国都而日渐失去昔日的光辉，但作为西北地区的首府，在军事、交通和商贸上仍然发挥重要的作用，与周边国家的交往依然绵延不绝。因而，仍是中国对外交往的重要组成部分。

1935—1948年，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在陕北的十三年，是陕西对外交往史上继汉唐之后的又一重要时期。为打破国民党的封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让世界了解红色根据地，延安展开了频繁的对国外的交往。同时也为新中国的外交积累了经验，培养了干部。

自1956年特别是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陕西对外交往进入了蓬勃发展

的新时期。仅1979年至1991年，省外事部门接待来访的各类邀请外宾累计达21.6万人次。其中有来自世界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68位外国元首、政府首脑、议长，以及千余位部长级外宾。

陕西对外交往给世界文明发展作出的贡献惠播于世，永载史册。特别是陆上丝绸之路，为有史以来东西方持续时间最长、交往距离最远、辐射面积最大、交流领域最广的大动脉。丝绸及其制造技术、造纸技术、指南针、火药、印刷术、漆器、铁器等运往中东，传入欧洲。中亚、南亚、西亚和欧、非的文化、宗教、科技和石榴、葡萄、芝麻、苜蓿、胡桃、大蒜、香料、宝石、骏马等也先后传到中国，大大推进了亚欧非各国与中国的友好往来和东西方的繁荣与进步，以至于影响到几个世纪后的欧洲商人、航海家为获取东方财富所从事的环球航行和地理大发现。

## 二

作为中华民族文明发祥地之一的陕西，对外交往大体可分为六个时期。

远古至战国——陕西对外交往的萌芽时期。陕西是华夏民族祖先世代生息、繁衍的主要发祥地之一。早在五千年前的黄帝时代，这里已进入了世界远古文明的行列，不断地向周边地区扩散并传播文明。如周成王平定管叔、蔡叔和武庚叛周时期，四邻民族前来朝贺，其中就有中亚细亚渠搜国（今费尔干纳）遣使送鬻犬以贺。周穆王西巡时，亦曾到达今中亚锡尔河中游地区。种种史实表明，这个时期陕西地区的对外交往正在日渐兴起。

秦汉魏晋南北朝——陕西对外交往的发展时期。这一时期，陕西与亚洲各国的政治往来及经济文化的交流日益频繁。突出的标志一是秦朝方士徐福为秦始皇求长生不死药，率三千童男童女东渡日本，传播中国先进的文化科学知识。二是西汉武帝年间，著名的中国外交家、陕西人张骞先后两次出使西域，历时十余年，曾到达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安息等中亚、西亚各国，并由此打通了由长安联结中亚、西亚乃至贯通欧洲及北非的交通干线——丝绸之路，拉开了陕西对外交往新时代的序幕。从此，陕西和葱岭以西各国之间的使节、商旅往来络绎不绝。东汉陕西人班超、班勇父子又先后长期在西域任职，多次平定匈奴和当地贵族的攻扰和叛乱，为保护西域各国的安全，保持丝绸之路的畅通立下了不朽功勋。与此同时，陕西与东亚、东南亚、南亚各国之间的交往也日趋活跃。西汉武帝时，日本各地多遣使者与汉

朝通好。

隋唐——陕西对外交往的兴盛时期。隋唐两代，尤其是唐代，作为中国历史上强盛的中央王朝，经济繁荣，国力鼎盛，在当时欧亚各国享有很高声誉，国都长安成为名符其实的国际大都市。如果说，在此以前，陕西的对外关系还局限于与亚洲各国的往来，联系范围还比较狭窄。那么盛唐时期，陕西的对外交往已由亚洲扩展到欧洲，许多使节、显贵、富商、文人学者、乐工画师和宗教界人士前来长安，或访问通好，或经商贸易，或切磋技艺，或传经布道，东西方政治制度、社会心态、风情习俗等在这里相交融会，不时地演奏出一曲又一曲雄浑壮阔的中外民族大合唱。与此相适应，由长安派往世界各国的使臣、僧侣、商人，也不绝于途。隋唐时期，和陕西通商的国家多达一百多个，其中往来密切者七十余国。

宋元明清——陕西对外交往的保守时期。五代十国时期，北方地区战火连年，动荡不安，社会经济日趋凋敝。而长江以南政治相对稳定，经济日益繁荣。加之大量北方移民南迁，给南方带去了人才和先进的科技，使江南经济得到迅速发展，以至在整个宋元明清时期，北方经济落后于南方。经济重心的南移，直接诱发了政治中心的改变。唐以后，京都东移，长安失去了国际大都市的中心地位。以长安为起点的丝绸之路因吐蕃和突厥等少数民族的武装侵扰而冷落，陕西对外交往时断时续。相反，海上丝绸之路随着航海事业的进步和江南经济的发展而日益拓展兴盛。明州（宁波）、泉州、广州、扬州等港口城市的崛起又逐渐取代长安成为中国与亚、欧、非各国交往的重要门户。

鸦片战争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陕西对外交往的屈辱时期。1840年鸦片战争的隆隆炮声掀起了中国近代史的扉页，把文明古国推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外来侵略为始端的辛酸凄楚的近代史也给陕西的对外交往打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不论是鸦片战争时期的清政府，还是后继的北洋军阀和国民政府，都采取了妥协忍让的外交政策。陕西地方当局秉承中央政府的旨意，一味屈辱投降，以图苟安。与此相反，饮血茹苦的陕西人民，则高举反抗大旗，与外国侵略势力展开着不屈不挠的斗争。特别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共产党人在陕北领导中国革命时期，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处理对外关系，实行了对外开放的政策，接待了一批又一批国际友人和持有各种不同政治观点的外国考察组，制定了一系列抗日救国的外交方针政策。毛泽东等中央领导还就当时的国际形势发表了许多著名论断，使陕西这块黄土地

又引起了世界的注目。

新中国建立后陕西对外交往蓬勃发展的新时期在以下记述。

### 三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结束了旧中国100多年受欺、挨打的历史，揭开了中国外交的新篇章。作为新中国外交组成部分的陕西省对外交往工作也开创了新局面。从1949年5月20日西安解放到1991年底的42年间，陕西地方外事工作大体可分为三个时期。

#### 1949年5月至1966年4月

20世纪50年代，鉴于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封锁，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另起炉灶”，“打扫干净房子再请客”和“一边倒”的决策，陕西地方外事工作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展开。这一时期的主要特点是：

（一）接待社会主义国家的党宾国宾和经济技术考察团组是50年代外事工作的主要任务。1950年至1957年，陕西省共接待来访外宾347批。其中大部分来自以苏联为主的社会主义国家。50年代末至“文化大革命”前，由于中苏关系破裂，社会主义国家来访的代表团锐减，而亚非拉等第三世界国家的来访团组增多，1958年至1967年2月来陕外宾达732批。

（二）安排好外国经济专家是外事部门的重要工作。1953至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援建中国的156个重点建设项目在陕西有26个，所以1951年至1960年10月，来自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专家、工程技术人员有1100多人次。

（三）文化交流是与国外交流的主要内容。据不完全统计，从1951年至1961年，在陕西举行的以社会主义国家为主的各国电影周、电影展43次，图片展、画展15次，接待文艺团体演出14个。

（四）举行声势浩大的集会和游行是60年代初支持亚非拉各国人民正义斗争的主要形式。在这个时期，陕西省先后多次举行支持古巴、土耳其、越南南方、巴拿马等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正义斗争的集会和游行，总人数超过了110万人次。

#### 1966年5月至1977年

“文化大革命”初期，受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干扰，外事工作



遭到严重破坏。外事机构一度瘫痪，外事干部有的挨批挨斗，有的下放农村劳动，有的进“五·七”干校，来陕西外宾急剧减少。1967年至1969年全省只接待来访外宾59人次。对外交往中极左路线盛行，以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划线，强迫人们表态，这些做法使外事工作陷入困境。

1968年以后，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关注下，由于周恩来总理亲自督促检查，地方外事工作逐步恢复。70年代初，随着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的恢复、中美联合公报的签署和中日邦交的正常化，中国外交取得了重大突破。到70年代末，与中国建交的国家由60年代末的50个猛增到124个。陕西省对外交往也出现了新的局面：

（一）来访团组增加。1970年至1977年，全省共接待包括第三世界和发达国家的代表团共6091批，其中有不少是赴延安参观学习中国革命经验的党宾和进步人士。

（二）开始与国外缔结友好城市。1974年，西安市先后与日本奈良市、京都市建立了友好城市关系。

（三）外事机构得到恢复。1968年9月成立了陕西省革命委员会办事组外事组，1974年1月改名省革委会外事办公室。

#### 1978年至1991年改革开放时期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加之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的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的对外开放，西安·咸阳国际机场的投入运营、西安与日本、新加坡、香港、澳门的定期航班或包机的开通，陕西外事进入了蓬勃发展的新时期。13年中，陕西省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格局，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的整体外交，提高了陕西在国外的知名度，突出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明确了地方外事工作的指导思想。

1. 为外交路线服务的同时，紧紧围绕经济建设中心，积极开展经贸、科技、文化、体育、卫生、宗教等各个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2. 在努力完成外交部、中联部、全国友协等中央部门的党宾、国宾和国外友好人士接待工作的同时，积极主动地开展地方外事工作。

3. 把外事办公室的职能从单纯的外事接待转变为管理接待型，既是政府外事工作的职能部门和中共各级党委及其外事工作领导小组的办事机构，又是本地区执行外交政策和处理重要外事工作的归口部门。

## （二）加强和扩大了对外开放。

1. 开放地区扩大，开放点增多。1978年以前，全省只有西安、延安两市和15个县（市）的部分地区对外开放。然而至今全省10个地市的107个县（区）对外开放，占全省县（区）总数的97%。

2. 来访外宾增幅大。1966年至1977年的11年中，来访的国外团组2万人次，而1978年就达1.1万人次，1991年增加到1.8万人次。

3. 因公出国人数增长快。1978年至1991年，陕西派遣出国进行经贸洽谈、科技文化体育交流、留学进修和友好访问等人数达3万多人次，而1966年至1978年间，仅100多人次。

4. 友好城市不断增多。全省与国外建立友好城市已由1982年时的3对增加到如今的33对，其中省与外国省、府、州建立友好关系9对，市（地）、县23对。省、市（地）、县（市）与国外建立友好交流合作关系53对，其中省级9对。

省对外友协积极拓展对外联系渠道，加强民间友好活动，为增进与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促进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起了很好的作用。特别是1989年春夏之交发生的政治风波平息之后，官方外交遇到困难，省对外友协充分发挥民间外交优势，为打破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制裁做出了积极贡献。

## （三）对外交流合作成果显著。

截至1991年底，全省累计利用外资项目243起，协议外资16亿美元；批准“三资”企业223家，协议外资10.2亿美元；先后引进外国文教专家3582名、外国经济专家8000余名，接收各类外国留学生、实习生4400多人。

# 四

纵观陕西上下几千年的对外交往，最主要的启迪是：

（一）国家的统一、政权的巩固、经济实力的增强，是发展对外关系的重要基础。

（二）对外开放，博采众长，为我所用，才能加快社会的发展和进步；闭关锁国，故步自封，必然要落后挨打。

（三）地理位置和交通条件会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科技条件的进步不断改变，并对本地区的发展和国外的交往产生重大而又深刻的影响。

---

波澜壮阔、起伏曲折的陕西对外交往史卷，有前赴后继、艰苦创业、可歌可泣的壮丽诗篇，也有丧权辱国、割地赔款、令人痛心疾首的屈辱历史。陕西既不要因先哲为人类做出过赫赫贡献而陶醉其中，也不能因近代落后屈辱的历史而妄自菲薄。要用对外交往荣辱兴衰与国家的前途命运休戚相关的史实，激发人们爱乡爱国热忱，为陕西的振兴，为中华的崛起，为开创 21 世纪陕西对外交往新局面，做出新贡献！

# 第一篇 古代外事

(远古至鸦片战争前)

## 第一章 远古至战国

### 第一节 对外交往溯源

古往今来，没有一个国家或民族，能够在不与外界交往闭塞的环境氛围中来维系自己的生存与发展。然而在远古时期，由于社会条件和人类能力的制约，相互交往的史实今所知者不多。现据古史传说、文献记载、考古发现和人们研究的成果略予勾勒。

中国在据今五千年的黄帝时代，已开始登上文明社会的历史舞台，作为中华文明发祥地之一的陕西地区，对外交往亦随之逐步展开。然而，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多民族国家，所以陕西的对外交往更多地带有民族交往的深深印痕。

黄帝，姓公孙，名轩辕，生于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的时代。《国语·晋语》载，黄帝和炎帝是少典氏族的成员，母亲是有娇氏族的成员，成长于今陕西渭水支流的姬水、姜水一带。在那不寻常的岁月里，黄帝以他非凡的胆略卓识率领先民，开拓进取，战败蚩尤、炎帝，“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史记·五帝本纪》还记载了黄帝的足迹“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其文治武功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这就扩大了声威与影响，使人们深受感化，纷纷前来朝贡。在那些朝贡者中，所见较多的是当今中华人民共和国版图以内的民族，但并不能排除其中也有今版图以外的部落方国。《庄子·天地篇》载：“黄帝游乎赤水之北，登乎昆仑之丘。”贾谊《新书·修正篇》载：黄帝“西济积石，涉流沙，登于昆仑。于是，还归中国，以平天下。”就可说明对外交往的萌生。《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崩，葬桥山。”黄帝陵就在今陕西省黄陵县桥山

之巔，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寻根、慰祖的民族圣地<sup>①</sup>。

1991年美国华盛顿《国家地理》第180卷第4期，刊载布鲁洽·约瑟（Joseph Bpuchac）的论文《奥次顿哥》，介绍了莫哈克河（Mohawr）奥次顿哥村（Ostungo village）易洛魁人保存的鹿皮画《轩辕酋长礼天祈年图》和《蚩尤风后归墟扶桑值夜图》。认为这两幅彩图画的是今美国纽约州的易洛魁人，是6000至5000年前移民美洲的中国轩辕黄帝族的裔胄。假若这一文章的论据确凿，无疑对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研究是一重大贡献。

继黄帝之后的帝颛顼、帝喾、帝尧、虞舜以及夏、商、周王朝，都尊奉黄帝是自己的祖先<sup>②</sup>，对外交往有所发展。特别是西周，则将以前陕西为中心的对外交往推进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陕西作为周的发祥地，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周人正是以关中平原为基地，挥师东进灭商，进而统一中国的。相应，以丰镐为代表的今陕西地区，迅速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这就为陕西的对外交往提供了颇为有利的条件。

周武王伐纣时，居住在今四川、湖北一带的庸、蜀、羌、微、卢、彭、濮等部落方国，纷纷出兵助战，从中可见周民族与他们的友好往来。更为重要的是西周时，与葱岭以西中亚各民族的交往较前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周初居住在华夏族以西的共有九国，史称九侯，亦作鬼侯，在华夏族北方主要有狫允，或作狫狫，亦即荤粥或狄族。周王朝首先与他们取得联系，然后以此为桥梁，同葱岭以西中亚各民族相交往。周成王平定管、蔡和殷纣王之子武庚叛乱后，前来朝贺的四邻民族之中，即有中亚细亚的渠搜国（今费尔干纳）和康居（今撒马尔罕）。不过，西周和西北地区的交往常被戎狄部落所牵制，特别是周穆王时，犬戎势力向外扩张，直接阻碍着周和西北方部落的交往。为此，穆王西征犬戎，打开了通往西北的通道。周穆王曾向西巡，由镐京（今西安西南）出发入河南，北渡黄河，出关隘（雁门关）到达河套以北，然后西行，经乐都、积石直至西王母居住的地方，在那里受到隆重接待，甚至“乐而忘归”。顾实曾考证过周穆王抵达波斯（今伊朗）和欧洲的道路<sup>③</sup>。岑仲勉亦认为，周穆王的行迹远达乌兹别克及中亚一带<sup>④</sup>。《竹书纪

① 参阅陕西省地方志资料丛书《黄帝与黄帝陵》，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中共黄陵县委、黄陵县人民政府主编，柏明、李颖科著，西北大学出版社1990年初版、1995年再版。

② 见《史记》的《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

③ 郭璞注，顾实讲疏：《穆天子传西征讲疏》，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

④ 岑仲勉：《中外史地考证》，香港太平书局1966年版。

年》周穆王条云：“十七年西征昆仑丘，见西王母。”《史记》的《秦本纪》和《赵世家》记穆王命造父驾车，西巡狩，见西王母。在中国古代文献中，西王母代表西方极远之邦，和觚竹、北户、日下并为四荒<sup>①</sup>。周穆王西巡反映了公元前10世纪以后和中亚锡尔河上游地区的交往。《穆天子传》载，周穆王每到一处就以丝绢、铜器等物馈赠各部落酋长，而各地酋长亦向他回赠大量的马、牛、羊及玉石等方物。西周的丝绢、铜器西传和葱岭东、西的牲畜、玉石东运，构成这一时期中西交流的重要内容。春秋战国时期，列强纷争，周天子名存实亡，但地处关中的秦国日益强大并且不断地向西北开疆拓土，对外交往在持续发展。例如，秦穆公时采用由余的计策，打败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sup>②</sup>。这时，东起黄河，西到陇东，均为秦国所控制，从而打开了大西北的通道。

在春秋战国的风云变幻中，地处今陕西西部的秦国，逐步以其政治与军事力量跃居各诸侯国相互争雄的中心舞台，特别是战国时期，几乎所有惊心动魄的历史场面都与秦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说，春秋战国时期，今陕西地区的对外交往是中国对外交往的集中反映。春秋以来，随着周王室的衰落，各个诸侯国日渐强大，在各地形成大大小小的割据政权，其中有广袤数千里的大国，也有截长补短不足五十里的小国。各国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或缔结联盟，或背信毁约，或割地求和，或发兵逞威，或合众弱以攻一强，或事一强以攻众弱。总之，从春秋五霸到战国七雄，相互间既有战争，也有往来，外交手段层出不穷，便是这个时期的一大特征。这种复杂的关系虽然全属国内关系，但却为尔后的对外关系提供了历史经验，就是在当今风云变幻的世界上，也还具有可供借鉴的意义。

## 第二节 丝绸之路由来

丝绸是中国人民的发明创造，这既有黄帝的正妃嫫祖教民养蚕织丝的故事传说，又不断有考古发现可证。如1926年，山西夏县西阴村仰韶文化遗址中，曾发现大半个萤壳化石、石制纺轮、纺锤等。1958年，浙江湖州钱山漾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绢片、丝线和丝带。1959年，江苏吴兴县梅堰

① 《尔雅·释名》。

② 《史记·秦本纪》。

遗址出土的黑陶文饰有“蚕纹”。1989年，河南荥阳县青台村仰韶文化遗址中出土的丝织品。总之，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黄河、长江流域的一些地区的人们，已经能够种桑、养蚕、缫丝和生产丝织品。

夏、商、周时期，中国的丝绸技术继续发展。《管子·轻重》载：“殷人之王立帛牢、服牛马以为民利，而天下化之。”《尚书·酒诰》亦云：“肇牵车牛，远服贾。”西周时，丝绸生产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诗经·豳风·七月》中就生动地描述了当时陕西地方民间蚕桑丝绸的生产情景。1975年，陕西宝鸡茹家庄发掘了两座西周墓葬，出土有绢、经锦和刺绣以及玉蚕项链，反映了丝绸织花技术的重要进步。此外，官府还设置了管理丝绸生产的机构和官员，如“典妇功”管理丝麻；“典丝”负责丝绸品验收、储存和发放。同时，还制定了促进生产的政策，规定庶民“不蚕者不帛”，就是说平民百姓不养蚕者不准穿丝绸服装。<sup>①</sup>春秋战国时期各国都采取奖励农桑生产的政策，丝绸已成为列国朝贡和互相赐赠的重要礼品。秦孝公时，商鞅变法的诸项政策中就有百姓生产丝绸多者可免除徭役的规定，从而鼓励了秦国农业的发展（包括丝绸），为秦始皇统一六国打下了重要的物质基础。

在春秋战国时，内地许多精通丝织技术的工匠成批地迁入西北少数民族地区，而丝织技术又由此传到更远的西方。在阿尔泰地区卡童河、伯莱利河、乌尔苏耳河和乌拉干河流域发现的一批约相当于春秋战国之际的贵族墓葬中，出土了一批中国制造的丝织物。另外，1977年在新疆阿拉沟东口也发现了春秋战国时期的丝织物和漆器。其中菱纹链式罗是战国时内地刚刚出现的丝织珍品。由此可见，春秋战国时期，已出现了将中国内地生产的丝织物运至葱岭以东乃至葱岭以西中亚、西亚各部落方国的通道，其西端可能一直伸展到希腊，由于希腊公元前5世纪的一些雕刻家雕刻的人像所穿衣服轻薄透明，质料柔软，为丝织衣料。<sup>②</sup>希腊绘画中也有类似的丝织衣料。古代西方，最早就是从丝绸知道中国的，他们称中国为赛里斯国，“赛里斯”为Serice的音译，意即蚕丝产地或贩卖丝绸者。最早提出赛里斯国的是公元前416年到公元前398年（周威烈王元年到周安王四年）担任波斯宫廷医生的希腊人泰西阿斯。由此可见中国的丝绸西运，不仅是中外交往的媒介，而且是中国对人类文明发展作出的重要贡献。

<sup>①</sup> 参见《周礼》的《天官》、《地官》、《冬官》。

<sup>②</sup> 里希特：《希腊的丝绸》，载《美国考古学报》1929年第27—33页。



丝绸之路是因中国的丝绸西运而得名，其所指是古代以来，中国经中亚通往南亚、西亚及欧洲、北非的陆上贸易通道。最早提出这一名称的是德国著名的地理学家李希霍芬。他在1877年出版的《中国》一书中，将两汉时期中国与中亚河中地区以及印度之间以丝绸贸易为主的交通路线称为丝绸之路（德文原作 Seidenstrassen，英文作 Silk Road）。1910年，德国史学家赫尔曼在《中国和叙利亚间的古丝路》一书中，将李希霍芬所说的丝绸之路扩展到地中海西岸和小亚细亚，这就明确了丝绸之路的基本内涵。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在丝绸之路沿线发现了大量的中外贸易和文化交流的遗迹、遗物，丝绸之路的研究进一步受到中外人士的关注，并陆续著书立说，使丝绸之路的含义包括了更广泛的内容。尽管丝绸之路这一名称出现较晚，但这条中外贸易和文化交流的通道在公元前5—6世纪时早已草创。

### 第三节 涉外机构初建

远古到战国时期，随着对外交往的萌生，涉外机构亦逐步建立。然而，由于中国古代对外交事务与民族事务没有严格的区分，所以管理机构也是一体的，而且管理这些活动的长官官名，往往就是机构名称。随着社会的发展，外交、民族事务频繁，管理这些活动的职官不断增加，机构也逐步扩建。

据《尚书》、《史记》载，早在尧、舜时代，就初设管理周边部族的“四岳”。夏代按地区进行管辖的“方国”、“要服”、“荒服”，也都涉及到周边部族。商代官制中的“宾”，就是主管诸侯朝覲的民族、外事政务官。

周代官制中的“大行人”<sup>①</sup>，负责接待诸侯和少数民族的宾客，掌管迎宾时的礼仪以及王朝的祭祀。大行人下设中大夫二人，协助工作。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各诸侯国独立性的增强，分别建立了自己的官制。大致而言，其“主客”是外交、民族事务总管，“行人”是外出的使者，“舌人”是翻译，“候人”负责迎送宾客。在上述中央的外交、民族事务机构之外，商周以来，还设有边境镇抚机构与边关外贸管理机构。就前者而言，商周时被分封到边地的诸侯王，即为镇抚边境臣服部落的长官。在边境外贸管理机构方面，西周时由关尹或司关职掌商人出入边关。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管理边关的有封人，或称边人、疆吏、境吏等。

<sup>①</sup> 《周礼·秋官》。

## 第二章 秦汉魏晋南北朝

### 第一节 概况

秦始皇二十六年（前 221）统一六国，在中国历史上建立起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定都咸阳。秦始皇为了加强统治，在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强硬措施，对推动中国历史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其疆域“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sup>①</sup>亦即今东至海、辽东，北抵内蒙，西及甘肃，南达广东、广西。在如此广袤的国土上居住着具有不同习尚的各族人民，在统一的国家政权之下，经济、文化诸方面都有着广泛的交流。但是，由于秦王朝对广大人民进行了极其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激起了一场农民大起义的风暴，二世而亡。

由于秦王朝的残暴统治和楚汉战争的破坏，当刘邦称帝建立汉王朝的时候，国内是一片残破的景象，《史记·平准书》载：“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即使到文帝和景帝时期，社会经济依然没有得到很好的恢复。在政治方面，与这种经济残破的情况相一致，汉初国家政权尚未巩固。特别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地诸侯王的势力日渐壮大，以致对中央集权造成严重威胁。在军事方面经过多年楚汉战争，虽则刘邦取胜，但毕竟是强弩之末，军事实力几乎消耗殆尽。西汉王朝初建时，其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上都比较衰弱，亟待休养生息。也正是在这种社会历史条件下，汉高祖实行黄老无为而治，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到了文帝、景帝时期，倡导以农为本，进一步推行“轻徭薄赋”、“约法省禁”的政策，使生产逐渐得到恢复和发展。到汉武帝时，“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廩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

<sup>①</sup> 《史记·秦始皇本纪》。

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摈而不得聚会。”<sup>①</sup> 司马迁所描述的这种情况，充分反映了汉武帝时期社会经济的繁荣。与此同时，汉武帝在政治上采取削弱诸侯王势力、限制臣相权力和整编军队等措施，也掀起了中外关系史上的新高潮。特别是张骞两次出使西域，沟通了被中断的丝绸之路，加强了东西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使汉民族和西北边疆各族人民的友好关系，中国人民和亚洲、欧洲人民的友好关系，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此外，汉武帝从出使西域的汉使那里得知，位于今乌兹别克费尔干纳一带的大宛，盛产一种良马——“汗血马”。为了得到这种马以加强骑兵，汉武帝特地派人持千金到大宛购买，遭到拒绝。于是汉武帝在太初元年（前 104）令贰师将军李广利发兵伐大宛，经四年艰苦战斗，终于降服大宛。元鼎五年（前 112），南越吕嘉举兵叛乱，汉武帝派兵出击。次年冬天平定南越，设置南海、苍梧、郁林、合浦等九郡，直属西汉王朝。两年后，即元狩四年（前 109），武帝又出兵分两路进攻朝鲜，次年灭卫氏朝鲜，并在其地设乐浪、玄菟、真番、临屯四郡。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处于分裂割据状态。在政治上，统治集团间的矛盾、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纵横交错，政局动荡不安；在经济上，士族地主田宅扩张，多蓄奴婢，广大人民啼饥号寒。这一时期，大小军阀和少数部族为了入主中原，在北方能够站稳脚跟，便加强了对陕西，特别是关中的争夺和控制。于是，陕西大地不仅发生过激烈的争夺战争，而且被长期分割。但是，这并没有妨碍各政权和民间对于东西方各国的交往，甚至较汉代，在中外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方面有进一步的发展。然而，陕西在对外交往中的地位和作用，远非昔日。

## 第二节 涉外机构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设三公、九卿，组成中央政府。九卿之一的典客即职掌民族和外交事务。另设典属国专掌秦朝附庸国事务<sup>②</sup>。汉承秦制，典客亦然，惟景帝中元六年（前 144）典客更名为大行令，武帝太初元年（前 104）改称大鸿胪，同时将鸿胪的属官行人改称为大行令。王莽时将大鸿胪

<sup>①</sup> 《史记·平准书》。

<sup>②</sup> 《汉书·百官公卿表》：“典属国，秦官，掌蛮夷降者。”

改称典乐，东汉复名大鸿胪。大鸿胪设正副长官，正职为卿，副职为丞。大鸿胪的属官见下表：

表 1-2-1

大鸿胪属官表

属官名称	职 掌	材料来源
大鸿胪丞	总署曹事	《汉书·文三王传》
行人令	主诸郎	《汉书·百官公卿表》
译官令	掌翻译	《汉书·儒林传》
别火令	掌来宾饮食	《汉书·百官公卿表》
郡邸长	掌来宾住宿	《汉书·百官公卿表》
使主客	主胡客	《汉书·金日磾传》
大鸿胪文学		《汉书·平当传》
大行治礼丞		《汉书·平当传》
大行卒史		《汉书·儒林传》

至于典属国，汉初沿置，景帝时公孙昆邪即担任典属国（《汉书·李广传》），昭帝时苏武亦任此官（《汉书·苏武传》）。至成帝时典属国并入大鸿胪。典属国作为诸卿之一，与大鸿胪有着密切联系，其职责是掌蛮夷降者、掌管周边之属国和负责四方夷狄朝贡。

在大鸿胪和典属国之外，尚书主客曹亦掌管外交、民族事务。主客曹为列曹尚书之一。两汉时期尚书的主客曹始终存在，而且到东汉时还一分为二，设置了南主客曹和北主客曹。尚书主客曹是掌管外交与民族事务的专职机构，如应劭《汉官仪》谓“主客尚书，主外国四夷事。”《汉书·成帝纪》亦云“主客尚书，主外国事。”主客曹下设郎官以协助办理具体事务。西汉时设尚书郎四人，东汉时郎官的数量有了较大的增加。

魏晋南北朝时期设尚书主客曹和大鸿胪负责外交事务，其中尚书主客曹是重要的专职外交管理机构。曹魏和西晋前期继承东汉制度，在尚书台设置客曹尚书，负责外交工作。西晋太康年间客曹尚书被裁撤。此后尚书台中不再设置客曹尚书，外交工作由尚书主客曹郎负责。

### 第三节 张骞通西域

西汉王朝初建时，中国北方的一个游牧民族匈奴，正在强大起来。秦汉之际，匈奴在冒顿单于的领导下，迅速发展着自己的力量。后向东并吞东胡，向西赶走了月氏，向北征服浑瘦、屈射、丁零（今贝加尔湖一带）、鬲昆（今叶尼塞河和鄂毕河上游），向南兼并黄河河套以南的楼烦、白羊，并不断掠扰今甘肃、山西、陕西，甚至将战火蔓延到长安一带<sup>①</sup>。其掠夺不仅给内地和西域各族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痛苦，而且中断了西域与内地的联系。

汉初，虽然对匈奴的侵扰作出过反击，但未能如愿，甚至在汉高祖七年（前200），刘邦亲自率军击匈奴，至平城（今山西大同东北），被冒顿单于围困在白登山七天，才以计谋脱险。因而此后汉王朝对匈奴采取防御战略，乃至执行和亲通好之策。

建元元年（前140），汉武帝即位，基于经济、政治、军事力量的增强，开始着手强力反击，取得一步步的胜利。武帝从审问匈奴降人的口供中获悉：原居于祁连山与敦煌之间的大月氏因多次遭受匈奴的攻击而被迫西迁，故仇恨匈奴，希望报仇雪恨，但终因势单力薄，未能如愿。



图一 张骞墓

武帝得知这一消息后，决定联络大月氏袭击匈奴右侧。但大月氏西迁后的下落不清楚，尤其是当时要前往西域，须经过匈奴所占据的河西走廊。这就要求出使西域联络大月氏的使者既大胆勇敢，又机智过人。为此，汉武帝敕令全国招募使者，陕西张骞“以郎应募”，毅然而勇敢地承担起出使西域、联络大月氏以夹击匈奴的使命。

<sup>①</sup> 《史记·匈奴列传》。

建元二年（前139），张骞率领堂邑父和百余名精通骑射的士卒、向导从长安出发，取道陇西前行，开始了举世闻名的通西域之行（亦称“凿空”），这是丝绸之路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当张骞一行进入甘肃陇西一带，便被匈奴骑兵追杀截留，经过一场激战，多人战死，终因寡不敌众，张骞和余部被俘。匈奴单于先以威吓之势诱使张骞投降，遭到拒绝。继而强令张骞娶匈奴之女为妻，后生一子。张骞和余众在匈奴羁留十多年之后，终得一机会偕同部下逃离匈奴继续西行。经过数十日的艰辛跋涉，越过葱岭，到达大宛（今费尔干纳一带）。大宛国王早已闻知大汉帝国兴隆富庶，很想遣使通好。故此，他看到张骞一行抵达大宛，颇感欣慰，遂盛情以待。张骞说明出使目的之后，大宛王留张骞等在国中观光数日，即派遣向导和翻译陪同张骞一行前往康居（今撒马尔罕一带），再经由康居到达大月氏（今阿姆河上游）。

此时的大月氏已占有大夏（今阿姆河南一带）故地，安居乐业于阿姆河和锡尔河流域，一则生活安逸，二来很少遭受外敌侵扰，久而久之，报仇雪恨之心日渐淡漠，无意东返。并认为汉王朝距大月氏路途遥远，没有必要缔结联盟。为了说服大月氏与汉朝结成军事同盟，张骞滞留大月氏尽力斡旋长达一年之久，但未能达到联盟的目的，只好率领使团启程回国。鉴于来时旅途的艰难与困扰，他们回程时未走原路而是取道葱岭以南的阿尔金山，沿塔里木盆地和柴达木盆地，进入羌族地区。由于该地区亦在匈奴的控制之下，结果张骞再一次被匈奴捕获。一年后，即汉武帝元朔三年（前126），乘匈奴王廷内乱之机，与堂邑父两人返回长安。张骞回国后，向汉武帝详细报告了西域的情况，被授以太中大夫。

张骞在大夏时，得知由蜀（今四川盆地）西南取道身毒（今印度）可通大夏，因以劝汉武帝开西南夷道，但因为昆明人所阻，未能通。元朔六年（前123），张骞以校尉随大将军卫青征匈奴，有功，被封为博望侯。元狩二年（前121），张骞以卫尉与李广出右北平（今河北东北部）击匈奴。

青年军事将领霍去病率领大军由陇西出击匈奴，转战六月，深入匈奴腹地千余里，在皋兰山（今兰州黄河西）和匈奴短兵相接，大获全胜，河西之地全归汉朝所有。从而打通了西汉时期自河西走廊至罗布泊一带的交通，保卫了丝绸之路的畅通。霍去病是大将军卫青的外甥，汉武帝的皇后卫子夫为其母之妹，他18岁任侍中时，就带兵作战，曾先后六次率兵抗击匈奴的侵扰，他和卫青一样，努力推行汉武帝的政策，为保卫汉朝疆土，打通河西走廊，保证丝绸之路的畅通，促进中国与中亚国家的经济、文化交流建立了辉煌业绩。汉武帝以其功德封为大司马、骠骑将军，赐予他高贵的官邸，霍去病立下“匈奴不灭，无以为家

也”的豪壮誓言。霍去病病逝时年仅 24 岁，汉武帝为了表彰他抗击匈奴的战功，特在茂陵之侧为他修建墓冢，封土堆积象征祁连山，并雕刻各种巨型石人、石兽，其中最有名的是“马踏匈奴像”，生动地体现了霍去病一生的光辉业绩。这批石刻，是中国目前保存时间最早的古代成组大型石刻，早已驰誉中外，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地处今陕西省兴平县汉武帝刘彻墓东北一公里处。

在元狩二年霍去病率军打败匈奴之后，汉军多次乘胜追击，迫使匈奴退至漠北地区。为了彻底击败匈奴，汉武帝召回张骞，数问有关事宜，张骞根据留居匈奴期间的见闻说，匈奴西部有一大国名叫乌孙，乌孙王号昆莫。最初乌孙和大月氏同住敦煌附近。因大月氏侵袭乌孙，杀昆莫之父难兜靡，并夺其地，乌孙不得已依附匈奴。及匈奴破大月氏，大月氏西迁，乌孙日益强大，不肯再依附匈奴。匈奴多次发兵攻打乌孙，皆为乌孙击败。并提出：

蛮夷恋故地，又贪汉物，诚得以此时厚赂乌孙，招以东居故地（河西西部之地），汉遣公主为夫人，结昆弟，其势宜听，则是断匈奴右臂也。既连乌孙，自其西大夏之属，皆可招来而为外臣。<sup>①</sup>

武帝深以为然。于是命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以联合乌孙和加强与西域其他国家的友好往来。

元狩四年（前 119），张骞任中郎将，率领 300 人组成的使团，并携带大量的牛羊、钱币、丝织品，浩浩荡荡向西域进发。这时，汉朝已控制了河西走廊，张骞一行经过数十天跋涉，较为顺利地到达乌孙国。乌孙国王昆莫久仰张骞大名，盛礼接待。张骞献上礼物，并说明来意，劝说他返回敦煌地区的祖居地，与汉结盟，共抗匈奴。但由于一方面当时乌孙国内政治冲突激烈（乌孙王昆莫想把王位传给长孙岑陬，但其次子坚决反对，并为此发兵攻击），无暇顾及东迁故地与汉朝合击匈奴之事；另一方面，乌孙王觉得汉地遥远，而王公大臣又素来畏服匈奴，于是不敢断然与匈奴为敌。正因此，尽管张骞申明旨意，但昆莫还是未能应允。乌孙王为了答谢汉使，特意派遣数十名侍臣携带礼物随同张骞返回汉朝，进行回访。张骞这次出使虽则没有与乌孙建立联盟，但却揭开了汉与乌孙外交关系史上的第一页。此后，两国友好往来不断，关系日益密切。

张骞在乌孙时，大力推行友好的外交政策。他派随从副使分道前往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等国进行外交活动。所到之处，汉使均受

<sup>①</sup> 《汉书·张骞传》。

到热烈的欢迎。每逢汉使离开时，许多国家都遣使随他们来到长安进行回访，并献上西域的物产。有时，西域的商队也携物跟随汉使来中土进行贸易。元鼎二年（前 115），张骞回到长安，被汉武帝封为大行令（大鸿胪属官），第二年与世长辞。张骞的坟墓坐落在今陕西省城固县城西三公里处的博望乡饶家营村，是陕西省政府 1956 年首批公布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图二 张骞塑像

在张骞出使西域以前，陕西及其他地区的丝绸等物已远销西域各国，但中间却经过许多国家和民族的辗转贩运。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时，从乌孙分遣副使往大宛、康居、安息、身毒等国，后来，这些国家纷纷遣使至长安报聘，建立直接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同时西汉王朝不断派遣使者到西域各国进行政治和贸易活动，“一岁中使者多者十余”<sup>①</sup>。与此同时，各国使者和商人也不断前来长安。



图三 张骞出使西域路线图

① 《史记·大宛列传》。



## 第四节 班超复通西域和甘英使大秦

自张骞打开中西交往的新局面以后，昭帝时（前86—前74）继续有所发展，延至宣帝（前73—前49），西汉王朝与中亚、西亚及欧洲罗马等国的交往达到全盛时期。从王莽篡汉到东汉明帝永平十六年的，60余年间，长安与西域各国的交往中断。

东汉初年，匈奴贵族势力又强盛起来，它一方面勾结河北、山西的割据势力，经常深入长城以南进行骚扰掠夺；另一方面利用汉王朝秩序混乱之机，征服了曾是西汉统属的西域大部地区，著名的丝绸之路被遮断，陕西与中亚、西亚各国的交往受到阻隔。当时西域各国因不堪匈奴的暴虐统治，曾多次遣使要求东汉政府派都护前往保护。诸如莎车、鄯善、焉耆等，不仅遣使朝贡，而且还派送侍子，请东汉王朝在西域设置都护。但光武帝刘秀因内地初定，忙于整顿，无力经营西域，遂送还侍子。此后，西域一片混乱，各种势力相互兼并攻杀，大部分国家皆役属于北匈奴。

永平十六年（73），汉明帝命窦固率军击败北匈奴，占领伊吾卢城（今哈密），<sup>①</sup>置西域都护，进行屯田戍守。同时，赶走北匈奴在车师前、后王国一带的势力，以着手恢复与西域诸国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班超奉命出使西域。

班超，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父亲班彪、长兄班固均为著名的历史学家。永平五年（62），班固被召为校书郎，班超与其母亦随至洛阳。因班固官职低微，所得薪俸不足以养家糊口，班超乃常为官府抄书来奉养母亲。当时，正值北匈奴屡犯汉境，他非常气愤，曾叹息说：“大丈夫无他志略，犹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视笔砚间乎？”<sup>②</sup>于是投笔从戎。永平十六年，窦固出击匈奴，以班超为假司马。班超勇猛善



班超画像

图四 班超画像

<sup>①</sup> 东汉政府之所以要选择伊吾卢作为据点，就在于该地是西域的门户。正如《后汉书·西域传》所说：“自敦煌西出玉门，阳关，涉鄯善，北通伊吾千余里，自伊吾北通车师前部高昌壁千二百里，自高昌壁北通后部金满城五百里，此其西域之门户也。……故汉常与匈奴争车师，伊吾以制西域焉。”

<sup>②</sup> 《后汉书·班超传》。

战，在蒲类海之战中多有战功，窦固见其很有才能，遂任命他出使西域。当时，北匈奴势力在西域北道受挫，而南道诸国仍为北匈奴所役属。班超出使西域的目的，就是要打通南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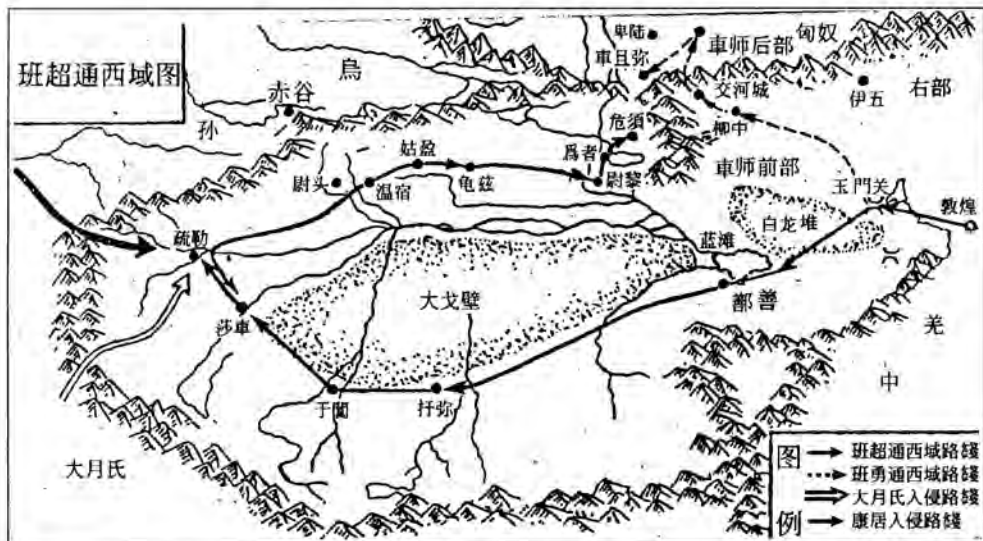
班超率吏士 36 人，首先到达鄯善。鄯善王盛情以待，“礼敬甚备”。但三天以后，鄯善王对汉使突然有所怠慢。班超了解到这是因为北匈奴使者此时亦到达鄯善的缘故，遂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决心，袭杀北匈奴使者一百多人，并持其头以示鄯善王，鄯善为之震服。接着，班超一行沿昆仑山北麓由南道抵达于阗。于阗是当时新疆南部亲近匈奴的强国，匈奴使节经常驻足该国。由于受匈奴使节的监护，于阗王对班超不予礼待。于阗王还轻信巫言，强索班超之马以祀神。班超诱杀巫师，将其首级送于阗王。于阗王震慑于班超在鄯善的威名，杀北匈奴使者归附于汉。永平十七年（74）春，班超继续西行到达疏勒。此时，疏勒方役属于龟兹，而龟兹又役属于匈奴，它依仗匈奴的势力雄踞北道，杀疏勒王而立龟兹人兜题为王以统治其国。班超派部众攻杀兜题，重新扶立原疏勒王兄子忠为疏勒王，解除了龟兹对疏勒的奴役。于是疏勒亦归附汉王朝。

经过班超的坚决斗争，北匈奴在南道诸国的势力被逐一肃清，汉政府随即置西域都护及戊己校尉，中断了 60 余年的汉王朝与西域诸国的交通，至此又得到恢复。不过，匈奴失去西域，势所必争。永平十八年（75），汉明帝死，匈奴乘机发动两万多骑兵与焉耆等国攻杀西域都护，并联合龟兹、姑墨进攻疏勒。班超孤立无援，处境十分艰难。次年（章帝建初元年），东汉政府下令班超从西域撤退。班超一行拟议离开疏勒回国。汉朝的势力从西域撤退，这对南道诸国来说极为不利，因为他们曾在汉政府的策动下，或斩杀匈奴使者，或推翻匈奴傀儡政权。班超一旦撤退，匈奴必将卷土重来，对他们实行残酷的报复。鉴于此，南道诸国均不愿汉朝势力撤退。当班超离开疏勒时，疏勒都尉黎弇，竟至引刀自刭。班超行至于阗，“王侯以下皆号泣曰：‘依汉使如父母，诚不可去。’”<sup>①</sup> 有些人甚至互抱班超之马足，不肯放行。于是班超中途返回疏勒，凭借自己优秀的外交和军事才能，团结主张与汉和好的于阗、疏勒各国，以打击为匈奴效力的龟兹等国。建初三年（78），班超利用于阗、扞弥、疏勒及康居诸国一万兵力，攻破匈奴和龟兹的军事要塞姑墨。此后班超又建议汉政府联络乌孙，以进击龟兹、莎车而最终牵制匈

<sup>①</sup> 《后汉书·班超传》。

奴。

元和元年（84），汉廷派司马和恭统兵八百西赴疏勒以接应班超。不久班超即率领增援的汉军等征服莎车等国。永元元年（89），汉和帝为最后平定北匈奴，命窦宪西征。窦宪大破北匈奴，登燕然山（今杭爱山），刻石记功而还。次年，大月氏派兵七万越过葱岭，企图与北道诸国联兵消灭班超的势力，以建立大月氏人在西域的统治。但结果为班超所败。班超又乘胜经营北道。永元三年（91），龟兹率姑墨、温宿被班超降服。汉廷以班超为西域都护，驻守龟兹。永元六年（94），班超又率军降服焉耆、尉犁、危须三国。至此，西域北道打通。自从征服了天山南北以后，汉王朝的势力继续向西渗透，不久就远达葱岭以西，使通往中亚、西亚及欧洲诸国的丝绸之路重新畅通。



图五 班超通西域图

班超出使西域时，为了进一步开拓丝绸之路，重扬汉威，于永元九年（97），派遣属吏甘英出使大秦（古罗马），希望与之建立直接关系。甘英一行经中亚、西亚，历尽艰苦到达“西海”（今波斯湾），安息人为了控制丝绸之路的中转贸易，故弄玄虚，夸大渡海的困难，阻挠甘英西行与罗马建立直接关系，但中国外交使节到达波斯湾沿岸，这还是首次。

班超在西域 30 余年，于永元十四年（102）八月回到洛阳，九月病逝，享年 71 岁。

班超返回以后，北匈奴又侵入西域，并进而骚扰河西地区。延光二年

(123), 东汉政府以班超之子班勇为西域长史, 出屯柳中, 重新经营西域, 以抵御北匈奴的侵扰。班勇至西域后, 在鄯善、龟兹等国的支持下, 击败北匈奴伊蠡王。不久又连续击败北匈奴单于及呼延王所部, 取得节节胜利。

## 第五节 丝绸之路的开拓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 葱岭东西两侧的交通路线虽然已基本上接通, 不过, 需要指出的是, 在张骞通西域之前, 由于匈奴的骚扰, 这条沟通东西的交通路线处于时隐时现、断而相续的状态。

自张骞通西域, 直到霍去病占领河西, 浑邪王降汉, 单于遁走漠北, 汉王朝才和西域各国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随之, 西域商路开始畅通, 中西贸易日渐频繁, 中国内地的丝绸经由西域运往中亚细亚及欧洲的罗马等国。当时埃及亚历山大城成为丝绸的集散地。丝绸贸易的繁荣, 使人们对丝绸的了解日益增多。不断的使节往来和庞大的商队, 将中国的丝绸、漆器、铁器运往西方, 中国四大发明之一的纸和造纸术, 也在汉代传入亚洲西部地区。<sup>①</sup> 与此同时, 西方的宝石、犀象、香料、火浣布(石棉)也相继运抵中国。由于丝绸是在中西贸易中运销最远、规模最大、历时最长的商品, 所以, 这条商路被称之为“丝绸之路”。《汉书·西域传》载, 丝绸之路分为南北两道。

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两道。从鄯善傍南山北, 波河西行至莎车, 为南道; 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月氏、安息。自车师前王庭随北山, 波河西行至疏勒, 为北道; 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宛、康居、奄蔡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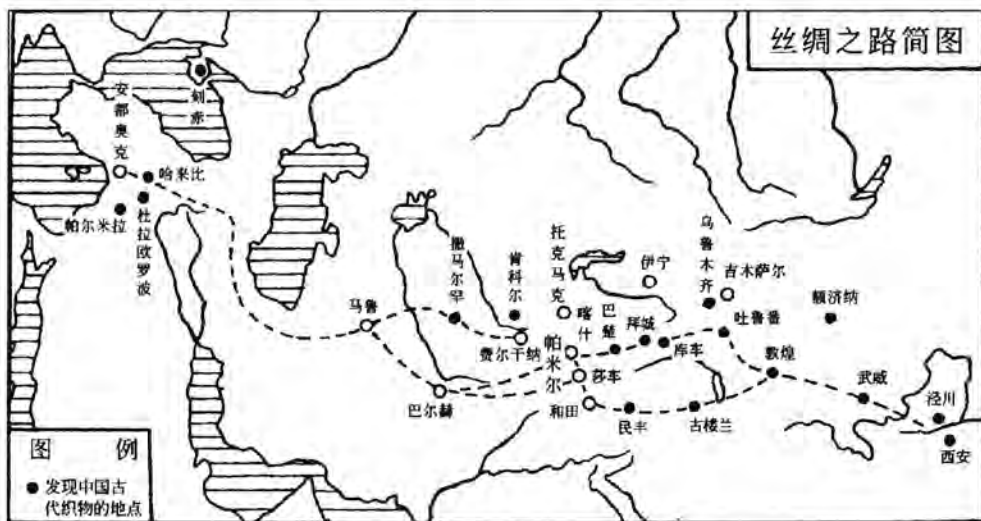
这就是说, 西汉时, 通过新疆的中西陆路交通有南北两条大道: 南路由长安出发, 经敦煌出阳关(今南湖)西南沿阿尔金山北麓经鄯善(今新疆罗布淖尔南面的石城镇)、且末(今且末)、精绝(今民丰)、扞弥(今策勒)、于阗(今和阗)、莎车(今莎车)等地, 越葱岭至大月氏、安息等国。北路出玉门关(今小方盘城), 西过白龙堆(罗布砭滩), 至楼兰后向北绕道车师前王国(吐鲁番西雅尔湖), 再西南取道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的危须(波斯

<sup>①</sup> 1957年在西安灞桥西汉墓出土的灞桥纸是迄今所知世界上最早的植物纤维纸。后经东汉蔡伦改革, 不仅能生产大量的麻纸, 而且还发明了皮纸。纸发明以后不久, 就经由“丝绸之路”传入亚洲西部。

腾湖北乌沙克塔尔)，经焉耆（今焉耆）、龟兹（今库车）、温宿（今乌什）、尉头（今阿合奇）至疏勒（今喀什），越葱岭到大宛、康居、奄蔡等国，由奄蔡南下可达安息，再由安息向西即可到达大秦（罗马帝国）。

随着中外交往的频繁，汉代以后，丝绸之路在上述南、北两道的基础上，有进一步的延伸和扩展，《三国志·魏志》注引鱼豢《魏略·西戎传》载，“从玉门关西出，经婼羌转西越葱岭，经悬度入大月氏为南道。从玉门关西出，发都护井，回三陇沙北头，经居卢仓，从沙西井转西北过龙堆，到故楼兰，转西诣龟兹，至葱岭，为中道。从玉门关西北出，经横坑，辟三陇沙及龙堆，出五船北到车师界戊己校尉所治高昌，转西与中道合龟兹，为新道。”

丝绸之路的开辟，对增进陕西和整个中国与外域的接触和友谊以及促进双方经济、文化的交流，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和深远的影响。这主要在于，丝绸之路作为亚欧大陆上的大动脉，沟通了中国与蒙古高原、塔里木盆地、准噶尔盆地、帕米尔高原的交流和融合，加强了中国与阿富汗、伊朗、叙利亚、小亚细亚地区的友好交往，使之互相影响和互相渗透。尤其是，丝绸之路作为东西方文化的桥梁，促进了古罗马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埃及文明、花刺子模文明、印度河文明和中国文明的交流与融合，在人类文明发展



图六 丝绸之路示意图

的历史上写下了光彩夺目的篇章，至今仍具有现实意义。

秦汉时期，随着经济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在陆上丝绸之路开拓时，沟通中西交通的海上丝绸之路也在逐步形成。《汉书·地理志》载：

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湛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厓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所至国皆稟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杀人。又苦逢风波溺死，不者数年来还。大珠至围二寸以下。平帝元始中，王莽辅政，欲耀威德，原遣黄支王，令遣使献生犀牛，自黄支船行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

从这一记载中可见汉武帝时曾派遣黄门的官员译长，率领招募的人员，携带大批的黄金和丝织品，去交换明珠、璧流离等奇石异物以及汉王朝与一些国家交相往来的航线。但是，这条航线沿途经过的国家、地点，学术界争论不已，未能取得共识，好在上述皮宗国在今马六甲海峡，已程不国在今斯里兰卡，黄支国在今印度南端，则为多数学者所肯定。因此，可以说这条航线从广东徐闻、合浦出发，沿着东南亚一些国家的海岸线西行，穿过马来半岛，进入孟加拉湾，到达印度半岛南端。这一航线的开辟，是远洋航行史上的一次重大事件，是中国人的一大贡献，对沟通中西方国家的政治交往和经济、文化交流发挥了重要作用。

因为印度半岛以西的各国家、民族，早已开辟了通往印度的航线。在此过程中，随着航海技术的提高，到汉桓帝延熹九年（166），大秦国遣使直航中国，这既是罗马首次与中国直接通航成功，也标志着横贯中西海上丝绸之路的正式形成。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海上丝绸之路日益繁荣。

## 第六节 使节往来

### 一、东亚

#### (一)

朝鲜位于亚洲东部，与中国山水相连，在古代时与中国关系复杂。据《史记》、《汉书》和《三国遗事》等中朝文献记载，周武王灭商，箕子率众移居朝鲜北部，建立箕氏朝鲜。战国末期，燕国势力曾达鸭绿江之南，燕、齐一带有不少人移居朝鲜。秦统一后，在燕国故地东部置辽东、辽西郡。汉

初，燕人卫满杀箕氏朝鲜王箕准，自立为王，定都王险（今平壤），这时朝鲜半岛的土著真番、临屯部族服属卫满。<sup>①</sup> 卫满建立卫氏朝鲜后，辽东太守“约卫为外臣”<sup>②</sup> 并相约，一要为汉朝保卫边界，二不得阻止朝鲜半岛其他小国入汉朝贡。当王位传到卫满之孙卫右渠时，违背前约，阻碍真番、辰国通使。为此，汉武帝元封二年（前 109）派使臣涉何到朝鲜责问卫右渠，但卫右渠置之不理。涉何在返回途中杀死护送他的卫氏朝鲜官员裨王长，从而引起汉与朝鲜的武装冲突，于是汉武帝派遣杨仆和荀彘领兵夹攻王险城，卫右渠战败，汉在其地设真番、临屯、乐浪、玄菟四郡，统治了朝鲜半岛的绝大部分。当汉王朝统治力量削弱时，朝鲜半岛逐步形成“三国”时期，即新罗、高句丽、百济相继于前 57 年、前 37 年、前 18 年出现，并相互对峙，但都与中国互有交往。如前秦建元十三年（377），高句丽、新罗均遣使长安。

## （二）

中国古代泛称日本列岛上的国家和民族为“倭”。《山海经·海内北经》有这样的记载：“盖国在钜燕南倭北，倭属燕。”一般认为，“盖国”是指朝鲜半岛上的盖马。“燕”指的是今河北北部、辽宁西部一带。《山海经》不仅指明了日本列岛“倭”的地理方位，而且记载了“燕”与“倭”的隶属关系。这说明，至少在两千年前中国大陆与日本列岛开始有一定的往来。

在古代，中国与日本的关系，还有徐福东渡一事，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二十八年载：

齐人徐市（通福）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于是遣徐市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

另外，《史记》的《封禅书》、《淮南衡山列传》等对此事也有记载。按《史记·秦始皇本纪》三十七年所记，徐福返回，后拜见秦始皇，并提出新的要求：

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始皇出游。……还过吴，从江乘渡。并海上，北至琅琊。方士徐市等入海求神药，数岁不得，费多，恐讎，乃诈曰：“蓬莱药可得，然常为大蛟鱼所苦，故不得至，愿请善射与俱，见则以

<sup>①</sup> 《文献通考·四裔考》。

<sup>②</sup> 《史记·朝鲜列传》。

连弩射之。”始皇梦与海神战，如人状。问占梦，博士曰：“水神不可见，以大鱼蛟龙为候。今上祷祠备谨，而有此恶神，当除去，而善神可致。”乃令入海者赍捕巨鱼具，而自以连弩候大鱼出射之。自琅琊北至荣成山，弗见。至之罟，见巨鱼，射杀一鱼。遂并海西。

从上可知，秦始皇不仅给徐福及入海者以捕巨鱼之工具，而且还派遣善射者持连弩出海。按《史记·淮南衡山列传》，徐福此次入海所属之地为平原广泽。《汉书·五被传》亦记载此事说：

又使徐福入海求仙药，多赍珍宝、童男女三千人、五谷种、百工而行。徐福得平原广泽，止王不来。

无论是《史记》，还是《汉书》，都尚未明确指出徐福所止之地平原广泽即为日本列岛。到五代时后周的义楚撰《六帖》第一次指出平原广泽就是今天的日本列岛。该书卷二一《国城州市部》载：

日本国亦名倭国，在海中。秦时，徐福将五百童男、五百童女，止此国也，今人物一如长安。……又东北千余里有山，名富士，亦名蓬莱；其山峻，三面是海。一朵上耸，顶有火烟；日中，上有诸宝流下，夜则却上，常闻音乐。徐福止此，谓蓬莱。至今，子孙皆曰秦氏。

此说一出，在人们心目中，日本列岛就成为徐福所到之地。尤其是诸多文人墨客在其诗词文章中往往将徐福和日本结合在一起。如欧阳修在《日本刀歌》中即明言道：

传闻其国居大岛，土壤肥沃风俗好。  
其先徐福诈秦民，采药淹留草童老。  
百工五谷与之居，至今玩器皆精巧。  
前朝贡献屡往来，士人往往工词藻。  
徐福行时书未焚，逸书百篇今尚存。  
令严不许传中国，举世无人识古文。

从上可见，徐福东渡日本的传说，在中国古代有较大的变化。如今日本熊野山尚有徐福的墓、碑存在<sup>①</sup>。但是，学术界也有人认为以上说法属于民间传说，予以否定。总之，徐福东渡是否抵达日本，尚待进一步探索。

由秦而汉，尤其是汉武帝元封三年（前108），灭卫氏朝鲜，设置四郡，中国与倭人之间的交往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后汉书·东夷传》中曾明确记

<sup>①</sup> 见〔日〕夺尾善雄著《徐福来日本》。



载，汉武帝时“东夷始通上京（长安）”。又据《汉书·地理志》记载：

“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这是中日两国使节往来最早的记录。东汉时中日双方的关系更为密切，建武中元二年（57），倭奴国派使者奉贡朝贺，光武帝刘秀赐以印绶<sup>①</sup>。这颗刻有“汉倭奴国王”的金印，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在日本九州福



图七 汉茂陵马踏匈奴石雕

冈市志贺岛崎村出土，成为中日友好的历史见证。安帝永初元年（107），倭国王帅升遣使“献生口百六十人”。魏晋南北朝时期，在日本列岛占统治地位的邪马台国、大和国，亦遣使中国的曹魏、东晋、宋、齐、梁等王朝。

## 二、东南亚

陕西与东南亚各国的交往，关系复杂者有越南。在中国古代文献典籍中，有不少关于传说时代的神农、颛顼、尧、舜等南抚交趾或南至交趾的记载。《史记·五帝本纪》云：“帝颛顼高阳者，……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帝尧者，……申命羲叔，居南交。”《淮南子·主术训》亦云：“昔者神农之治天下也，……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部。”通过这些记载，可以说至少在春秋战国或西周时期已和交趾有了一定的联系，而交趾即为越南先民最早的居住地。战国末期，越南北部已有瓯骆国。秦统一六国后，于秦始皇三十三年（前 214）平定南越<sup>②</sup>时，曾侵及瓯骆国。南越平定后置桂林、南海、象郡三郡<sup>③</sup>。象郡即包括今越南北部和中部，这是越南即象郡隶属于秦

① 《后汉书·东夷传》。

② 中国秦代把五岭直至今越南中部的地区统称之为“南越”，这里的居民当时还处于比较原始、落后的状态。

③ 《史记·秦始皇本纪》。

王朝最早的文献记载。

秦汉之际，南海郡尉赵佗（真定，今河北正定人）乘天下大乱之机吞并桂林、象郡，自立为南越武王，并灭瓯骆国，通过原骆侯、骆将和蒲政对这些新占之地进行统治。汉高祖刘邦登基之后，鉴于天下初定，经济破败，政权未稳，故“释佗弗诛”，并于汉高祖十一年（前196），派遣陆贾出使南越，持玺绶封赵佗为南越王，使其为汉朝藩属。由于赵佗在南越依靠汉越地主贵族，并采用秦汉政治制度进行统治，颇有成效。故史称赵佗治理南越“甚有文理，中县人以故不耗减，粤（越）人相攻击之俗益止”<sup>①</sup>，在一定程度上起了保境安民的积极作用。吕后时，有司奏请禁止把铁器卖给南越，赵佗遂乘机断绝与汉朝的臣属关系，自封“南越武帝”。吕后为此发兵讨伐，但因南方气候炎热潮湿，士兵多染疾病，未至南越而还。汉文帝即位后，对南越采取抚慰怀柔政策，首先是派人在真定守护赵佗的祖坟和按时祭祀，并封其近族兄弟为官，以表示对赵佗的亲善之意。其次，以陆贾为太中大夫，命其再次出使南越，劝告赵佗取消帝号，恢复与汉朝的藩属关系。陆贾至南越后，责备赵佗自立为帝而不上报汉廷，赵佗稽首拜谢，并取消帝号。后到景帝时，赵佗对汉称臣，且遣使朝请<sup>②</sup>。

汉武帝元鼎四年（前113），汉武帝欲加强对南越的直接统治，派霸陵（今西安灞桥）人安国少季前往南越宣示此意，同时令南越王赵兴（赵佗五世孙）及王太后（汉人）到长安入朝。赵兴和王太后均表示同意。然此时南越丞相吕嘉在位日久，权势甚大。王太后拟杀吕嘉。遂通过汉使上书汉武帝，欲凭借汉朝威势达此目的。汉武帝派遣千秋及王太后弟繆乐带领2000人前往南越。然吕嘉先发制人，将赵兴和王太后及汉朝使者全部杀死，反叛汉朝。汉武帝闻讯后命伏波将军路博德等率军平定南越，随即设置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崖、儋耳九郡<sup>③</sup>，直属于汉中央政府，其中交趾、九真、日南三郡在今越南北部和中部。此后汉王朝又开辟了从湖南越五岭，经广西进入越南三郡商江流域的驿道，遂使陕西和越南使节商旅往来络绎不绝。

① 《汉书·高帝纪》。

② 《史记·南越尉佗列传》。

③ 《汉书·武帝纪》。

### 三、南亚

陕西与南亚各国交往密切者，首推印度。印度，《史记》最早译为身毒（原梵语为 *sindhu*），后又译贤豆、辛头、天竺等，原为南亚次大陆的一个地理名称。印度地域辽阔，不同地区的自然条件往往差异很大。它基本上分为南北两部分，中间以林莽密布的高山为隔。南部是一个半岛，半岛中央是山脉环绕的干旱高原。北部西有印度河流域，东为恒河流域，是古代印度文明成长的主要地区。公元前6世纪初，印度北部兴起十六大国，其中多数建立在恒河流域。彼此之间不断发生争夺领土和霸权的斗争。公元前364—前324年间，恒河流域的摩揭陀国的难陀王朝征服各国，逐渐统一了恒河流域。而也就在公元前324年，旃陀罗笈多推翻了摩揭陀的难陀王朝建立起孔雀王朝，并着手统一全印度的事业。后到其孙阿育王（前273—前232）时，建立了全印度统一的奴隶制中央集权国家。就中印两国的交往而言，公元前5世纪时，中国新疆地区已和印度有了商业交往，至公元前3世纪阿育王时，中印之间已有交往。先秦时代，从克什米尔经塔什库尔干至于阆的雪山道，已成为两国的交通要道。而陕西与印度的交往则可能始于秦始皇二十九年（前218）。详见本章第四节《佛教初传陕西》。

西汉时张骞出使西域，在大夏（今阿富汗北部）曾看到邛竹杖和蜀布，经询问得知乃由身毒贩运而来，张骞遂派副使前往身毒和罽宾（今克什米尔及巴基斯坦北部）<sup>①</sup>。这是中国同时也是长安第一次遣使印度。张骞回长安后又向汉武帝倡议经西南夷着手开辟中印交通的新途径，即中印缅道，它经过缅甸北部的伊洛瓦底江和弥诺江通往阿萨密，衔接恒河流域。汉武帝“乃令骞因蜀犍为发间使，四道并出，出驂，出丹，出徙，出邛、僰，皆各行一二千里。其北方闭氐、笮南方闭嶲、昆明。昆明之属无君长，善寇盗，辄杀略汉使，终莫得通。然闻其西可千余里有乘象国，名曰滇越，而蜀贾奸出物者或至焉。于是汉以求大夏道始通滇国。……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国。因益发使，抵安息、奄蔡、黎轩、条支、身毒国。……是时汉既灭越，而蜀西南夷皆震，请吏入朝。于是置益州、越嶲、牂柯、沈黎、汶山郡，欲地接以前通大夏，乃遣使柏始昌、吕越人等岁十余辈，出此初郡，抵大夏，皆复闭昆明，为所杀，夺币财，终莫能通至大夏焉。”<sup>②</sup>虽则中印缅道早有蜀地商人

<sup>①②</sup> 《史记·大宛列传》。

通过，但武帝的武力征服未能奏效，汉使先后受阻，缅甸终未畅通。然而，张骞所派副使毕竟已先此到达印度，所以并未因这次遣使受阻而影响两国的相互往来。此外，汉武帝时又有印度使者前来长安奉献方物，据《西京杂记》卷二记载：

武帝时，身毒国献连环羈。皆以白玉作之。玛瑙石为勒，白光琉璃为鞍，鞍在暗室中，常照十余丈如昼日。

此后，长安开始盛行饰鞍马，人们竞相加以雕镂，致使一马之饰值百金。又据《拾遗记》卷六记载，汉宣帝地节二年（前68），印度千涂国<sup>①</sup>遣使长安奉献珍异鸟兽。另外，印度罽宾国<sup>②</sup>在汉武帝时也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罽宾在喀布尔河下游和克什米尔，国都循鲜城（今查萨达），人口众多，军队强大。汉武帝时始与中国互通使节。汉宣帝五凤三年（前55）前后，罽宾王乌头劳贪图使者财物，多次剽杀汉使。西汉政府因此对罽宾的通使逐渐冷淡。后乌头劳死，其子代立，又遣使奉献。汉以关都尉文忠为使节送罽宾使者回还。罽宾王又欲加害文忠，文忠与容屈王子阴末赴合谋杀罽宾王，以阴末赴代立，并授印绶。后军侯赵德出使罽宾，又被阴末赴囚禁，杀赵德副使以下七十余人，旋即遣使上书谢罪。成帝时（前32—前7），罽宾再次遣使要求言好。汉政府欲派遣使者报送其使。杜钦对大将军王凤发表议论说：“前罽宾王阴末赴本汉所立，后卒畔（叛）逆。夫德莫大于有国子民，罪莫大于执杀使者。所以不报恩，不惧诛者，自知绝远，兵不至也。有求则卑辞，无欲则娇嫚，终不可怀服。”<sup>③</sup>他进而认为，以奉献为名的使者，都是一些“行贾贱人，欲通货市买，以献为名，故烦使者送至县度，恐失实见欺。”前往罽宾的道途，起自皮山以南，须经都护管辖范围以外的四五个小国，又要翻越大头痛、小头痛之山和历经赤土、身热之坂，又有三池、盘石坂道，“行者骑步相持，绳索相引”，两千余里才到悬度陡谷。鉴于此，杜钦要求“使者业已受节，可至皮山而还。”<sup>④</sup>汉政府采纳了杜钦的建议，所遣使节常常仅至皮山而还。而罽宾贪图汉的馈赠和商货，总是数年遣使一次，保

<sup>①</sup> 法显《佛国记》作健旁卫国，《洛阳伽蓝记》作乾陀罗城，玄奘《西域记》作健驮逻，《魏书·西域传》仅作乾旁。千涂与乾旁音近，今其地隶阿富汗及巴基斯坦。

<sup>②</sup> 罽宾国即玄奘《西域记》所云迦湿弥罗，今之克什米尔。在中国文献典籍中，罽宾之名通常专指迦湿弥罗，然乌仗那、健驮罗、迦毕试、那揭罗诸地，有时亦隶属迦湿弥罗，故亦称罽宾。西汉时，罽宾国包有迦湿弥罗、健驮罗和迦毕试三地。

<sup>③④</sup> 《汉书·西域传》。

持不断。

继两汉之后，魏晋南北朝时期，陕西与印度的往来未曾间断。比如，据《拾遗记》卷九《晋时事》记载，晋太康之世因罽国遣使献五足兽，状如狮子。因罽国即印度（India）之别译。再如，据《晋书·苻坚载记》记载，中天竺笈多王朝超日王于晋孝武帝太元六年（381）遣使访问长安，并向苻坚奉献火浣布。

#### 四、中亚、西亚

古代中亚、西亚地区大多是草原地带，有些地方是半沙漠地带，公元前3至2世纪，这里已有贯通中西的交通大道。蒙古草原上的匈奴人、锡尔河流域草原上的塞种人和甘肃西部居住的大月氏人及其邻近的乌孙人即经由这条大道向西迁徙或在此驻足。他们在这里留下了东方民族文化的影响与国家政治组织的痕迹。与此同时，从希腊人和罗马人开始，为了控制通过这里的从西方到东方的商路和为了抵御经由这里的东方游牧民族的侵袭，不断地进行军事上的远征和侵略，从而又长久地在他们占领的土地上留下了希腊奴隶制的影响。

战国末年到西汉初叶，中亚和西亚地区正处于一个极不稳定的时期。此时，一方面，希腊帝国已经瓦解，而罗马帝国的势力尚未达及东方；另一方面，中国的势力也没有进入此地。因此，这个地区便成为各游牧民族驰驱逐鹿的场所，并先后出现了许多独立的王国：在伊犁河流域有西迁的月氏人建立的大月氏国；在里海东南地区今伊朗地方有属于伊兰种人建立的安息国；在安息以东，印度库什山西北，有希腊人建立的大夏国；在费尔干纳盆地锡尔河上游有大夏人建立的大宛国；在锡尔河中下游和里海以北有伊兰种人建立的康居国和奄蔡国；在达遏水与幼发拉底河两河流域下游，有阿拉伯人建立的条支国；在喀布尔河下游和克什米尔有塞西安人建立的罽宾国；……其中大多为游牧国，如大月氏、康居、奄蔡等。也有一些农业国，如大宛等。

中亚地区的大月氏、大宛和康居，是最早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并沟通中西文化交流的国家。大月氏是月氏的一支。月氏本是中国甘肃西北部一个强大的游牧民族，有“控弦之士”十余万，与其邻近的匈奴族曾一度屈服于它。后来，匈奴逐渐强大，多次打败月氏，并杀死月氏王，匈奴老上单于把月氏王的头骨作为酒器。月支部众的大部分被迫西迁逃至天山北麓的伊犁河流域，并赶走原在当地驻牧的塞种人，留居该地，重建家园，史称大月氏。

而未能西迁的一小部分月氏人，后与祁连山区羌族杂居，号称小月氏。公元前139年（汉建元二年）至前129年（汉元光六年）之间，大月氏又受到匈奴别部乌孙人的侵袭，于是再次西徙，越过帕米尔高原，至妫水（今阿姆河）流域，并臣服当地的大夏人，开始由游牧生活向农业定居转变。

大宛是一个比较发达的农业国，盛产稻、麦、葡萄、苜蓿，而且多良马，其中以“汗血马”尤为名贵，素有“天马”之称。大宛人善以葡萄酿酒，“富人藏酒至万余石，久者至数十岁不败。”<sup>①</sup>汉初，大宛国约有户6万，人口30万。都城在贵山城（今塔什干东南的卡散）。其他大小城邑有70余座。

康居在大宛西北约2000里，是一个游牧国家。约有户12万，人口60万，胜兵12万。其牧场有冬夏两处。汉初，康居“东羁匈奴”，一直是匈奴的附庸国。

汉武帝建元三年（前138），张骞出使西域时，越过葱岭到达大宛，是为西汉王朝第一次正式遣使中亚各国，也揭开了长安与中亚各国相互交往的序幕。元狩四年（前119），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抵达乌孙后，旋即派随从副使前往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阿富汗）、安息（伊朗）等中亚、西亚各国<sup>②</sup>。以后，汉武帝的使者还到达奄蔡、条支、犁轩等国。到达各国的汉使均受到热烈欢迎。例如：汉使前往安息时，安息王密司立但特二世特派大军两万骑到东部出迎，经数千里导引，才抵达安息国都<sup>③</sup>。同样，到达长安的各国使节也受到汉政府的隆重招待：“设酒池肉林，以飨四夷之客。”<sup>④</sup>

在张骞出使西域之前，中亚、西亚各国即已闻知大汉帝国兴隆富庶，很想遣使通好。所以，汉使回归以后不久，各国纷纷派遣使节东来长安访问通好。例如，元封五、六年间（前106—前105），安息遣使长安观察中国国情，向汉献大鸟（鸵鸟）卵和黎轩善眩人（魔术师）。<sup>⑤</sup>又如，太初二年（前103）、征和三年（前90）大月氏先后两次遣使长安献双头鸟、猛兽、香等物。<sup>⑥</sup>

总之，自张骞出使西域，西汉王朝和中亚、西亚各国建立外交关系以后，彼此之间的使节往来络绎不绝，正如《史记·大宛列传》所说：“使者相

①④ 《汉书·西域传》。

②③⑤ 《史记·大宛列传》。

⑥ 见《拾遗记》卷五和《海内十州记》。

望于道。诸使外国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汉率一岁中使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辈，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反。”

当时匈奴贵族控制着葱岭以东的楼兰、车师等国，他们经常出兵截断汉和中亚、西亚各国的交通，攻杀汉使和其他各国使节，掠取财物。为了适应中西交往日益频繁的需要，汉武帝于元封三年（前108）命赵破奴率军进攻楼兰、车师，并在酒泉至玉门关一带设置亭障，作为供应粮草的驿站和防守的哨所，以便利各国使节和商旅交通往来。据《史记·大宛列传》记载：“西至盐水，往往有亭。而仑头有田卒数百人，因置使者护田积粟，以结使外国者。”

从此以后，直到北朝时期，中国与中亚、西亚各国始终保持着密切联系，波斯（伊朗）<sup>①</sup>、康居、大宛、大月氏、呾哒<sup>②</sup>等国的使者不断来到长安。比如，前秦苻坚时，大宛国遣使至长安献汗血马以通友好<sup>③</sup>；西魏大统十二年（546）、西魏废帝二年（553）、北周明帝二年（558），呾哒国遣使朝贡方物<sup>④</sup>；北周武帝天和二年（567），波斯王库思老阿奴细尔汪曾遣使长安奉献方物<sup>⑤</sup>。与此同时，长安也向中亚、西亚各国遣使通好。例如，据马尔柯姆《波斯史》和麻素提《黄金牧地》记载，北周武帝曾派遣使者向波斯国奉献假豹一只（全以珍珠络成，两眼以红宝石嵌之）、天青色绣锦袍一件（上有金丝绣群臣朝见波斯王国，袍以金箱盛之）、美人图一幅。

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与中亚、西亚各国互通使节，大多是出于政治上的友好往来，但有时却完全是基于军事上的需要。例如，张骞出使西域各国，目的在于和大月氏建立军事联盟以夹击匈奴。再如北周武帝天和二年（567），波斯王库思老阿奴细尔汪遣使长安，意欲东连中国以抗击突厥。波斯与突厥为邻，边防甚严。周武帝时，突厥遣使联好东罗马以攻波斯。为此，波斯遣使长安以与中国联盟抗击突厥。考费杜西《帝纪》，波斯王库思老阿奴细尔汪在位时，中国可汗侵阿姆河北，于那黑沙不（名见《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附近击败海脱勒汗。张星烺认为：“《帝纪》之中国可

① 两汉、三国至南朝时期，中国称伊朗为安息。安息之称最早见于《史记·大宛列传》。自北朝起，中国人始称伊朗为波斯。

② 呾哒国是中国南北朝时在中亚地区强大起来的国家，它东至塔里木盆地，西抵波斯，地域广袤，故其国名多有不同，或称厌带、悒恒，或称滑国，欧洲人称其为白匈奴。

③ 《晋书·大宛传》。

④ 《北史·呾哒传》。

⑤ 《周书·异域传》。

汗，必即宇文周，周之出兵，必为援波斯也。《周书》惜无记载。”<sup>①</sup> 据此，通过波斯遣使长安，双方建立起一定的军事联盟。

## 五、欧洲

中国经丝绸之路最先了解的西欧国家，是以意大利为中心，统治整个地中海区域的罗马帝国。自东汉起，中国史书称罗马帝国为大秦。大秦之名始见于东汉郭宪所著《别国洞冥记》。后南朝宋范晔撰《后汉书》踵继其说，并描述大秦的得名是因：“其人民皆长大平正，有类中国，故谓之大秦。”<sup>②</sup> 这一解释实属牵强附会，因罗马人与中国人相去甚远。所以，后人对范晔的说法多所訾议。近来，有人从另一角度解释大秦的得名说：“大秦在汉语中是‘泰西’的意思，秦是西方之国，西海亦称秦海，‘大’与‘泰’本相通转，大秦或海西都代表了极西的国家。”<sup>③</sup> 这一解释似不无道理。东汉时中国人已知道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并称之为犁鞞。奥古斯都（前30—前14）时代以后，罗马以亚历山大为基地，积极开展东方贸易，于是中国人又称大秦为犁鞞：“大秦国一名犁鞞，以在海西，亦云海西国。”<sup>④</sup> 中国史书列传专以详言西方诸国，始于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西汉时代，对新兴的罗马帝国尚没有正式的称谓，《史记》作“黎轩”，《汉书》称“犁鞞”。

公元395年（东晋太元二十年）罗马帝国分裂成为西罗马帝国和东罗马帝国，西罗马帝国于公元476年（南朝宋元徽四年）灭亡。东罗马帝国未分裂之前，亦即罗马皇帝君士坦丁（306—337）执政期间，曾将国都由罗马迁至拜占廷，以为新都，号新罗马，定名君士坦丁堡。西罗马帝国灭亡以后，中国史书称东罗马帝国为拂菻。拂菻是拜占廷人对罗马新都君士坦丁堡通称的音译。以正史而论，拂菻之名始见于《隋书》，后《两唐书》、《宋史》、《元史》、《明史》均称东罗马帝国为拂菻。

据《后汉书·西域传》记载：

（大秦）王常欲通使于汉，而安息欲以汉缯綵与之交市，故遮阹不得自达。至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瑇瑁，始乃一通焉。

<sup>①</sup> 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三册，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101页。

<sup>②③</sup> 《后汉书·西域传》。

<sup>④</sup> 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1页。



延熹九年即公元 166 年，大秦王安敦即罗马皇帝马可·奥里略·安敦尼（Marcus Aurselius Anonius，前 82—前 30）。日南指今越南。世之论者多以此为中国与大秦直接交往的开始。然而，事实上，中国与大秦的直接交往，当始于 270 多年前的西汉武帝时期。按东汉郭宪《汉武帝别国洞冥记》云：

元封三年，大秦国贡花蹄牛。其色驳，高六尺，尾环绕其身，角端有肉，蹄如莲花，善走多力。帝使鞏铜石，以起望仙宫。迹在石上，皆如花形。故阳关之外，花牛津时得异石，长十丈，高三丈，立于望仙宫，因名龙钟石。武帝末，此石自陷入地，唯尾出土上，今人谓龙尾敦也。

就整部《汉武帝别国洞冥记》来看，其中确有一些记载语似不经，然此节所记，未必不为信史。元封三年，乃公元前 108 年，时西域已通。据《史记·大宛列传》记载：“骞（张骞）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阗、扞鞬及诸旁国。……后岁余，骞所遣使通大夏之属者，皆颇与其人俱来，于是西北国始通于汉矣。”又说：“汉益发使抵安息、奄蔡、黎轩、条枝、身毒国。一岁中，使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辈。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返。”由此不难看出，《汉武帝别国洞冥记》所记元封三年大秦遣使至长安献牛一事当属可靠记载，正如张星烺所说：“宪（郭宪）此节记事，仅为旧史所弃，至其真确，可无疑。”<sup>①</sup>

综上所述，汉武帝元封三年大秦遣使长安，是见于文献记载的长安与罗马的最早交往。此后，汉朝不断遣使前往罗马帝国。公元 2 世纪罗马史家佛罗鲁斯在其所撰《史记》一书中记载了奥古斯都皇帝在位时，中国和印度遣使至罗马奉献珠宝以和罗马订结盟约的情景：

其余世界，不属罗马帝政所治者，亦皆知罗马国之光荣盛强，见罗马人而生敬心，以其征服众邦，故西提亚人及撒尔马梯人皆遣使结好。不独此也，远如赛里斯人及居太阳直垂之下之印度人，亦皆遣使奉献珍珠宝石及象，求与吾人订交好之约。据其人自云，居地远离罗马，须行四年之久，方能达也。视其人之貌，亦知为另一世界之人。<sup>②</sup>

这里所说的“赛里斯人”即为中国人<sup>③</sup>。奥古斯都在位时间为公元前 30—14

<sup>①</sup> 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册，《古代中国与欧洲之交通》，中华书局 1977 年版，第 16 页。

<sup>②</sup> 见亨利玉尔《古代中国闻见录》第一卷第 18 页。

<sup>③</sup> 我们在前文已经指出，由于中国盛产丝绸，当时罗马、希腊人便称中国为丝国——“赛里斯”（Series），从而称中国人为“赛里斯人”。

年，当中国西汉成帝至王莽时期。

西汉时，陕西与罗马之间还有过军事方面的接触。元帝建昭三年（前36），汉政府派甘延寿为西域都护，陈汤为西域副校尉。陈汤假借汉元帝名义向西域各国征兵以攻打郅支。陈汤在出征郅支单于时，曾经和郅支统率下的罗马军团有过军事上的接触。这既是陕西也是中国与罗马帝国之间在军事技术和武器装备方面首次发生的接触。据《汉书·陈汤传》记载，当汤军临郅支单于城时，只见“步兵百余人夹门鱼鳞陈，讲习用兵。”德效騫在其所撰《中国和罗马的军事接触》中认为这是按照罗马军团操练叠锁盾的龟甲形阵。

就中国与罗马帝国的交往而言，西汉以降，可谓是继续不断。东汉永元九年（97），西域都护班超派遣甘英出使大秦，但因安息商人从中作梗，未能成行。延熹九年（公元166年），罗马皇帝马可·奥里略·安敦尼遣使至洛阳进谒。吴黄武五年（226），罗马商人秦论来到交趾郡。西晋末年，罗马帝国和北方的前凉及南方的东晋时有交往。比如，东晋穆帝时（345—361），东罗马使者经由陆路抵达建康。晋哀帝兴宁元年（363），晋哀帝遣使报聘，这是中国与东罗马的第一次使节往还。尔后，彼此间的交往日益频繁。

## 第七节 经济、科技、文化交流

### 一、东亚

#### （一）

汉武帝元封元年（108）灭卫氏朝鲜，设置乐浪等四郡，把朝鲜改为直属政区。今平壤乐浪区土城，乃乐浪郡治遗址。据考古发现，西汉或西汉以前，陕西与朝鲜的文化交流业已开始。近几十年来，在原乐浪郡地区，发现了不少重要的遗迹和遗物。如乐浪郡各县的墓葬，多呈方台形封土的坟丘墓。而这正是中国周、汉时期最为盛行的墓葬形制。无论是墓葬的结构（主要有木槨墓和砖室墓两种），还是具体作法（砖砌和木工），或是木槨的样式，均与汉代墓葬相差无几。在丰富多彩的随葬品中有许多代表汉代铸造工艺的物品，例如，博山炉，在盘中安置一平伏的昂首龟，龟背上站立着展翅飞翔的鸟，鸟头上有玲珑透空的山形炉，这完全是汉代铸铜工艺的再现。这些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汉王朝与卫氏朝鲜的文化交流。

东汉到三国时期，朝鲜半岛上的马韩、辰韩、弁韩等国均与陕西地区保持着不断的文化交流。三韩之中，辰韩当权者自称是秦亡人，因避秦苦役而逃至朝鲜。他们的语言、风俗甚至政治制度均有似秦朝，如称“国为邦，弓为弧，贼为寇，行酒为行觞，相呼为徒”<sup>①</sup>。当时，朝鲜半岛上的国家已开始使用汉字。据朝鲜史书记载，公元1世纪初，即有不少朝鲜人会背诵《诗经》、《书经》和《春秋》等中国典籍。

两晋以来，与朝鲜半岛上的高句丽、百济和新罗三国的文化交流更为频繁。高句丽自建国之初起，就利用汉文撰修本国史籍。在两晋期间，诸如《论语》、《史记》、《汉书》等儒家经典和史学著作，已在高句丽广为流传。公元372年（东晋简文帝咸安二年），高句丽建立作为国家教育机关的太学，以汉学为主要内容。高句丽的壁画墓集中分布在集安、平壤、安岳三地，壁画题材可分为社会生活风俗画、图案画和神灵画三类。其中的神灵题材即取材于中原的神话故事。如出现于高句丽墓葬中的代表四方和宇宙的四神——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是在中国，尤其是在以长安为中心的陕西之地的汉代墓葬里早就出现的四神图像。到南北朝时，四神已成为墓室壁画、墓志和石棺上不可缺少的形象。

与高句丽一样，百济和新罗也广泛吸收先进的汉文化。例如，公元346至375年，百济近肖古王在位期间，博士高兴用汉文撰修国史《史记》，表明此前百济已输入汉字、汉文化已有较为长久的时期。据《周书》记载，百济的青年学子“俗重骑射，兼爱坟史。其秀异者颇解属文，又解阴阳五行……亦解医药卜筮占相之术。”这说明以中国经史为主要内容的百济教育事业已有很大的发展。

关于音乐歌舞。中国的乐器如琴、瑟、笙、箏、竽、箫以及从中亚、西亚传入的乐器箏箏（又称箏箏）、箏篥、琵琶等，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传入高句丽、百济和新罗。

文化交流是一个重叠交叉互为反馈的过程。在先进的汉文化不断传入朝鲜的同时，朝鲜文化亦随之传入中国，并对陕西传统文化的发展有所影响。朝鲜的民族歌舞具有悠久的历史。早在中国三国时代，朝鲜的音乐舞蹈已达到很高水平。《三国志·魏书·东夷传》云：高句丽“其民喜歌舞，国中邑落，暮夜男女群聚，相就歌戏。”同书又载，三韩“常以五月下种讫，祭鬼神，

<sup>①</sup> 《后汉书·东夷传》。

群聚歌舞，饮酒昼夜无休。其舞，数十人俱起相随，踏地低昂，手足相应，节奏有似铎舞。”除这些民间歌舞外，王室里有宫廷乐，军队里有鼓吹乐。这些富于民族特色的音乐舞蹈，随着经济文化交流而传入陕西等地。南北朝初期，高句丽、百济两国的歌舞已开始流行于中原地区。北周曾把高句丽、百济乐列入乐部，称为“国伎”。其中极富朝鲜特色的高丽乐深受中国人民喜爱，后来成为隋九部乐和唐十部乐之一。

## (二)

高句丽、百济、新罗诸国一方面吸收先进的中国文化，另一方面又将中国文化东传日本，为中日文化交流起着桥梁作用。从交通路线上看，隋以前，由于日本的航海技术较低，沿海岸、短距离航行较为稳妥。因而在大部分情况下，日本人前往中国，都经对马、壹岐到朝鲜半岛，沿海岸北上，转道辽东，然后南下到达内地<sup>①</sup>。这样，朝鲜便成为中日文化交流的桥梁。

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时期，日本正处于分裂状态，百余小国林立，“国皆称王，世世传统”<sup>②</sup>。此时，统一东方，威震四邻的汉帝国，对于鲸面纹身、好歌喜舞、风俗习惯与东南沿海百越族大抵相同的倭人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为了吸收先进的汉文化，日本 30 多个小国派遣使者，横渡万顷波涛，经朝鲜乐浪与西汉王朝建立联系。在日本弥生文化遗存中，有汉代的铜镜、璧、玉及王莽的货币，就是西汉时与日本文化交流的有力证明。汉光武中兴，中日文化交流得到进一步发展。建武中元二年（57），倭奴国遣使洛阳奉贡朝贺，光武帝赐以印绶。安帝永初元年（107），倭奴国王师升又率领其他小国国王，带着 160 个奴隶来拜见汉安帝。当时中日文化交流规模之大于此可见一斑。

三国以后，陕西与日本的文化交流并未中断，中国的文物、典章、制度，或由双方使节的往还直接传入日本，或经百济、高句丽间接输入日本。降至隋唐，陕西与日本的文化交流进入空前的繁荣时期。

## 二、东南亚

陕西与东南亚的交通路线有水陆两路。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武帝时，曾派遣使者携带黄金、丝绸等物由今广东徐闻县入海，乘船前往今

<sup>①</sup> 《文献通考·四裔考一》：“初通中国也，实自辽东而来。”

<sup>②</sup> 《后汉书·东夷传》。

马来西亚、缅甸等地进行访问。就每个人来说，他们是西汉王朝的外交使节，但就一个团体来说，他们又是西汉政府的贸易使团。他们向沿途各国赠送了大量的黄金、丝绸。他们回到长安以后，这些国家又相继派遣使者“入贡”、“来献”。就这样，官方经济贸易在赠送与入贡、来献之间不断地进行、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尽管中国内地战乱频繁，但陕西与东南亚各国的经济贸易，并未中断。前秦苻坚时，印度中天竺笈多王朝还曾遣使长安奉献火浣布<sup>①</sup>。

陕西与东南亚各国进行经济贸易时，进口的货物有：香药、珍珠、琉璃、象牙、犀角、玳瑁、珊瑚、银、铜、果布（盛产于苏门答腊、马来半岛和婆罗洲的龙脑香）。出口货物主要是黄金和杂缯<sup>②</sup>（各种丝织品的总称）。

在今东南亚的许多地方，都有中国汉代的遗物或同中国汉代文化有关的文物出土。例如，在马来半岛南端柔佛河沿岸哥达等地发现汉代的陶片<sup>③</sup>；在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沙捞河口的山猪墓山麓出土有汉代的五铢钱；在苏门答腊、爪哇等地发现大批汉代陶器<sup>④</sup>。这些遗物正是汉王朝同东南亚各国进行经济贸易的实物证据。

陕西与东南亚各国的经济、科技、文化交流，关系更为密切者则是越南。在汉武帝平定南越设置交趾、九真、日南三郡时，这些地区的农业还比较原始，有的地方还处于游猎和刀耕火种阶段。西汉平帝元始元年（1），汉中人锡光任交趾太守，教当地人民种植庄稼，建立学校，以礼义教育人民。东汉光武帝建武五年（29），南阳人任延任九真太守，始教民以牛耕，并铸造铁制农具，开荒种植，同时还制定婚姻礼法及衣服式样。通过锡光和任延在越南大力推广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技术与文化，当地的经济文化有长足的进步，正如《后汉书·循吏列传》所说：“岭南华风，始于二守。”亦正像越南史籍《大越史记全书外纪·属西汉纪》所云：“岭南文风始二守焉”。

文化交流尽管是历史发展交响乐中一节欢快的音符，但它的产生往往伴随着血与火的搏斗。建武十三年（37），苏定任交趾太守，越史谓其贪苛。建武十六年（40），二征（征侧、征貳）姊妹举兵起事。建武十八年（42），

① 《晋书·苻坚载记》。

② 见《史记·货殖列传》、《汉书·地理志》。

③ 苏继顾：《岛夷志略校释叙论》，中华书局1981年版。

④ 周连宽、张荣芳：《汉代我国与东南亚国家的海上交通和贸易关系》，载《文史》第9辑。

光武帝派伏波将军马援（陕西扶风茂陵人）发兵进讨。次年四月，马援攻破交趾，斩杀二征，平定南越。马援继军事行动之后，在当地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据《后汉书·马援传》记载：

援所过辄为郡县治城廓，穿渠灌溉，以利其民。条奏越律与汉律驳（同驳，乖舛意）者十余事，与越人申明旧制以约束之，自后骆越奉行马将军故事。

可见马援在郡县建置、城市管理、水利灌溉和制订法律等方面多所建树，从而为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卓有成效的努力，并因此而深受越南人民的崇敬。二征起义虽然失败，但其反抗强暴的英勇形象却永远为越南人民所铭记。1956年周恩来总理访越时曾亲自到二征庙献花，以表达中国政府和人民对二征的崇敬之情。

秦汉以降，随着军事、政治势力的南下，汉文化也不断向越南传播。“秦余徙民，染同夷化；日南旧风，变易俱尽”<sup>①</sup>，正是最好的注脚。尤其是汉末至南北朝时期，一些知识分子为逃避战乱而前往交趾地区，他们在当地兴校讲学，著书立说，使该地区的文化水平大大提高。

陕西与越南的文化交流已为考古发现所证实。在越南东山出土的青铜器中，有剑、盾、刀、矛、戈、箭镞等大量兵器，“这些青铜兵器都具有秦汉时代兵器的风格”。同时出土的一些装饰品如耳环、手镯等，也与“中国汉代的样式极其相似”。“此外，还发现一些铁器，有铁矛、铁剑、铜柄铁剑等。还出土一批汉五铢钱和王莽钱。这些铁器和货币都是由中国内地输入的。”<sup>②</sup>

在陕西与越南进行文化交流的同时，还同今柬埔寨境内的究不事国、印尼的叶调国、马来半岛上的都元国、今缅甸的夫甘都卢国、邑没国、湛离国等其他东南亚国家有着频繁的文化上的往来。

### 三、南亚

#### （一）

陕西与南亚的经济、科技、文化交流，首推印度佛教的传入，以下分为：1. 佛教初传陕西，2. 初期的佛经传译，3. 陕西僧人西行求法。

##### 1. 佛教初传陕西

<sup>①</sup> 《交州外域记》。

<sup>②</sup> 王民同：《东南亚史前文化述略》，载《昆明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1期。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创始于印度。创始人悉达多·乔答摩，释迦牟尼是佛教徒对他的尊称，意为释迦族的圣人，约生于公元前 565 年，逝世于公元前 486 年，略早于中国的孔子（前 551—前 479）。

佛教何时传入陕西，难以确定准确的时间，一因最早传入之时，影响较小，未引起人们的重视，没有留下记载；二因人们重视之时留下了记载，事实上并非初传的岁月。何况还有传入的标准，因而历来说法不一。今就有关资料罗列如下：1. 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卷一载：秦始皇时，“有诸沙门释利房等十八贤者赍经来化。始皇弗从，遂禁释利房”，后将他们驱逐回国。公元前 249 年（秦庄襄王元年），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举行了佛教经典的第三次结集，会后令众僧到国内外弘扬佛教，在秦始皇时到达秦都咸阳虽有可能，但释利房等传播佛教没有被接受，难以据此就确认佛教传入陕西。2. 中国正史中第一次为佛教立志的魏收，在《魏书·释老志》中说：“及开西域，遣张骞使大夏还，传其旁有身毒国，一名天竺，始闻有浮屠之教。”这是汉武帝时，张骞出使西域，对印度和佛教的所知，也难以据此就肯定佛教已传入陕西。3. 《三国志·魏书》卷十三裴松之注引鱼豢撰《魏略·西戎传》：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前 2），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这一记载历受人们的重视，学术界多主张应是佛教初传陕西长安，也是佛教初传中国之时，可予肯定。

东汉时又有楚王英（光武帝第六子）“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斋戒祭祠，奉献黄缣白纨，以助伊蒲塞（即优婆塞，男居士）桑门（即沙门）之盛饌。”<sup>①</sup> 这不仅说明佛教受到王室和上层人士的信仰和关注，而且社会上已有居士、沙门的存在。

这时佛教已经传入，但是，中国封建社会还有传统的上层建筑。汉武帝时，儒学已定于一尊，政府中设有学官，今古文经学的派别之争，只是对儒家经典的不同看法。黄老之学和神仙方术也受到统治阶级的推崇。因而佛教的传播，必然要受到传统思想的排斥。儒家把佛教视为“夷狄之术”，认为佛教之说“廓落难用，虚无难信”，好谈生死之事，鬼神之事，特别指责佛教徒抛弃妻子，剃光头发，无跪拜之礼，不合孝子之道，“违服貌之利，乖缙绅之饰”<sup>②</sup> 但由于黄老之学、神仙方术和佛教在表面上都讲“清虚”，致使人们把佛教理解为黄老之学。而佛教徒对此也加以利用，牟子《理惑论》

<sup>①</sup> 《后汉书·楚王英传》。

<sup>②</sup> 牟子：《理惑论》，载《弘明集》。

说：“道者九十六种，至子尊士，莫上佛也。”在汉代人的心目中认为：

浮图者，佛也。西域天竺，有佛道焉。佛者，汉言觉，其教以修慈心为主，不杀生，专务清净。其精者号为沙门。沙门者，汉言息心，盖息意去欲，而欲归于无为也。又以人死精神不灭，随复受形，生时所行善恶，皆有报应，故所贵行善修道，以炼精神而不已，以至无为而得为佛也。佛身长一丈六尺，黄金色，项中佩有日月光，变化无方，无所不入，故能通百物而大济众生。<sup>①</sup>

由此可见，人们所理解的佛教，还涂着黄老之学和神仙方术色彩。尽管这种认识并不准确，但佛教毕竟依附于中国的道术在社会上传播。

魏晋时，佛教经典被大量译成中文，人们加深了对佛教的认识，佛教也逐步从神仙方术中摆脱出来，但仍受到玄学的影响。南北朝时，在门阀士族统治者的提倡和扶植下，佛教的传播走上独立、兴盛之路。

## 2. 初期的佛经传译

佛教初传陕西后，西域诸国不断有僧人来汉地弘扬佛教和翻译经典，对佛教的传播起了重要作用。如果说佛教的流传并为人们所接受，是从佛教经典的翻译开始的，那么，中外的僧众翻译师，则是印度佛教传播于世界各国的带头人。

西域僧来长安者有竺法护。他原是月氏人，8岁依竺高座出家，故名竺法护，后随师游历西域诸国，通晓多国语言文字，在搜集到大量佛经原本后，回到长安。这时曾一度隐居山中，后在长安青门外立寺修行，因原居敦煌，时称敦煌菩萨。从西晋武帝太始二年到怀帝永嘉二年（266—308），先后翻译出《光赞般若经》、《贤劫经》、《正法华经》等一百多部、三百余卷。其内容广泛，译文也较为准确。释道安在《渐备经叙》中指出：“护公，菩萨人也。寻其余音遗址，使人仰之弥远。夫诸方等无生诸三昧经类，多此公所出。”僧祐亦云：“经法所以广流中华者，护之功也。”<sup>②</sup>

竺法护除身居长安之外，还去各地传教，并随处译经。他的晚年行踪不详，学术界说法不一，尚有争论<sup>③</sup>。

① 袁宏：《后汉纪》。

② 《出三藏记集》。

③ 参见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上册，中华书局1983年3月版。





图八 1992年4月鸠摩罗什纪念馆落成典礼

鸠摩罗什(343—413年),又称罗什,意译童寿,生于龟兹(今新疆库车)。其父是天竺人,名鸠摩罗炎,母为龟兹王之妹。罗什7岁随母出家,师事高僧,研习佛经,穷究其奥秘,经久不怠,因而“道流西域,名被东国”。

前秦苻坚建元十五年(379),汉地僧人僧纯、昙充等游学龟兹返长安,讲述当地佛教盛况说:

拘夷国寺甚多,修饰至丽。王宫雕镂,立寺形像,与寺无异。有寺名达慕蓝(百七十僧),北山寺名致隶蓝(六十僧),剑慕王新蓝(五十僧),温宿石蓝(七十僧)。右四寺俘图舌弥所统。寺僧皆三月一易屋床座,或易蓝者。未五腊,一宿不得无依止。王新僧伽蓝(九十僧),有年少沙门字鸠摩罗什,才大高,明大乘学,与舌弥是师徒,而舌弥《阿含》学者也。<sup>①</sup>

是时正传道安法师在长安大力奖励译经事业,他听到罗什在西域有这样高的声誉,当即劝苻坚迎他入华。建元十八年(382),苻坚遣骠骑将军吕光和陵江将军姜飞等人出兵西域,攻打龟兹及乌耆诸国,临行之际,他要求吕光“若克龟兹,即驰驿送什”<sup>②</sup>。建元二十年(384),吕光攻陷龟兹,得到罗

① 《出三藏记集》十一《比丘尼戒本所出本末序》。

② 《高僧传》。

什，但因吕光原不奉佛，不识罗什智量，又因罗什此时年事未高，所以不予见重。次年，苻坚被杀，吕光割据凉州，僭号为主，改元太安。罗什亦随光至凉州。同年姚萇继苻坚即皇帝位于长安。姚萇慕罗什高名，虚心邀请，但吕光父子不肯放他东行。其后九年姚兴即位，改元皇初。后七年（弘始三年，401），姚兴遣硕德西伐凉州，凉主吕隆兵败投降，罗什被迎入关，时年58岁。

姚兴既得罗什，甚相敬重，待以国师之礼，两人晤言相对，每每淹留终日。《晋书·姚兴载记》云：

兴如逍遥园，引诸沙门于澄玄堂，听鸠摩罗什演说佛经。罗什通辩夏言，寻览旧经，多有乖谬，不与胡本相应。兴与罗什及沙门僧略、僧迁、道树（标字之误）、僧睿、道坦（恒之误）、僧肇、昙顺等八百余人更出《大品》。罗什持胡本，兴执旧经，以相考校。其新文异旧者，皆会于理义。续出诸经并诸论三百余卷。今之新经，皆罗什所译。兴即托意于佛道，公卿已下，莫不钦附沙门，自远而至者五千余人。起浮图于永贵里，立波若台于中宫。沙门坐禅者恒有千数，州郡化之，事佛者十室而九矣。

罗什来到长安，住逍遥园。弘始四年（402）开始译经。二月八日译《阿弥陀经》一卷。三月五日译《贤劫经》七卷。同年夏在逍遥园西门阁始译出《大智度论》。十二月一日在逍遥园译《思益梵天所问经》四卷。是年还译出《百论》。弘始五年，姚兴以旧译诸经驳杂不纯，乖失经旨，遂请罗什重译《大品般若》。后直到弘始十五年（413），他一直在孜孜不倦地从事佛典翻译。据《出三藏记集》卷三记载，罗什在长安所译佛经共35部，294卷。

罗什在翻译诸经时并大弘其义。长安逍遥园澄玄堂和草堂寺即其译经之暇讲说众经之地。据宋敏求《长安志》记载，姚兴常于逍遥园引诸沙门听罗什演讲佛经。

罗什在译事上的成就，首先是第一次系统地介绍了根据般若经类而创立的大乘性空缘起之学，其次是在翻译文体上一反过去朴拙之风而采用言词达意的译法，这样既使中国人易于理解接受，又为义学方面开辟了广阔的园地。罗什在翻译事业上精益求精，具有高度的责任感。总之，中土佛教发展到罗什之时，一方面译经繁多，而各经又诠释不一，取舍会通，难知所据。另一方面，魏晋以来，佛教与玄学合流，中土学人仅就其所闻所见的臆疏解

佛义，自然难免出现差错。正因此，罗什在开始翻译大乘经典《法华》、《大智度》等经论时，即深有感触地体会到兼顾信与达的困难。正如他自己所说：“改梵为秦，失其藻蔚。虽得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哕也。”不过，罗什毕竟早年博览印度古典，精通梵文，而同时又于苻秦末年入华曾长时间留住凉州，对中土语言文字有相当的素养。这些都为罗什的译经事业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他在译经过程中，力求既不失原意，又要保持原本的语趣，从而开创出一种读起来使人觉得具有外来语与华语调和之美的文体。其传译准则是“曲从方言”、“趣不乘本”<sup>①</sup>。与此同时，或增或删完全以适应中土诵习者实际需要和力求达意而定。比如，他译《大智度论》时，因秦人好简便裁而略之；译《法华经》时，为了表达文外的含义而有所增文；译《中论》时则将其中繁重乖缺之处加以删补。

罗什在翻译上取得的成就，和长安先期的译业基础及当时参加译场的得力助手密不可分。长安译经，始于竺法护，盛于释道安。道安在长安创立译场规模，极力奖励译经之业。道安死后，其弟子法和、僧慧、僧睿等于姚兴皇初之末、弘始之初开始在长安共闾宾沙门僧伽跋澄译《出曜经》。此后三年罗什来到长安，而此时姚秦崇佛更盛于前，译经事业基本上继承了道安所创的旧规，而由朝廷全力支持，加以扩充。在帮助罗什译经的助手中，既有前期从事译事的法和、僧慧、僧睿等，又有原在长安的慧精、法领、道标等，同时还有来自庐山的慧睿、慧观和来自北方的道融、慧严、僧然以及来自其他各地的名僧。

佛驮跋陀罗（359—429），意译觉贤，本姓释氏，古印度迦毗罗卫国人，是释迦牟尼的同族，17岁出家。他受具足戒之后，更是勤奋好学，通达群经，以精于禅定和戒律驰名。后游学闾宾，受业于大禅师佛陀斯那。在那里适逢随法显西行的中国僧人智严，智严请觉贤到中国弘法。于是贤舍众辞师，与智严裹粮东行，一路历尽艰难险阻，时经三年，路过六国，最后到达中国青州东莱郡（今山东掖县）<sup>②</sup>。晋义熙四年（408），他听说鸠摩罗什在长安，即又和智严一同来长安拜见罗什，住长安宫市<sup>③</sup>，整天教授禅法，门徒数百，名僧智严、宝云、慧睿皆从之受业。开始觉贤和罗什相处甚好，由

① 慧观《法华宗要序》。

② 此依《高僧传·佛驮跋陀罗传》。《高僧传·智严传》云逾越沙险至关中，未走水路。

③ 《高僧传·智严传》谓住大寺，《玄高传》作石羊寺。《出三藏记集·师资传》作齐公寺。

最初见面时“共论法相，振发玄微，多所悟益”，发展到后来“什每有疑义，必共谘决”<sup>①</sup>，两人一直是在学问上不断切磋，发挥奥义。但是，由于两人的学风和师承渊源不同，又受罗什门下道恒等排挤，被迫离开长安到庐山与慧远相会，后又到建康与法显共同译经。先后共译《达摩多罗禅经》、《摩诃僧祇律》、《大般泥洹经》、《大方广佛华严经》等。其中以《华严经》最为重要，影响最大。

此外，西域僧人到长安，传译经典，弘扬佛教者还有佛陀耶舍、弗若多罗、僧伽跋澄、僧伽提婆、昙摩耶舍、卑摩罗叉等。

### 3. 陕西僧人西行求法

由于早期佛经传译中的失真现象，或译本残缺不全等原因，在流传过程中产生了一些矛盾和无法解决的问题，影响到佛教的传播，于是在中国佛教徒中产生了西行求法的要求。中国最早的一名正式出家的和尚朱士行，也是中国最早的西行求法者，就是从长安出发的。

朱士行，三国时曹魏僧人，原籍颍川（今河南禹县），少年出家，依法受戒，成为比丘。他出家以后，在研读《道行般若经》时，感到文句艰涩，难于理解，慨叹其翻译未善，乃发愿西行寻找原本。于是在甘露五年（260），从长安出发，“西渡流沙，既至于阆（今新疆和田）”<sup>②</sup>《出三藏记集》卷七对朱士行到达于阆后的活动记载颇详：

写得正品梵书胡本九十章，六十万余言。以太康三年，遣弟子弗如檀，晋字法饶，送经胡本至洛阳。住三年，复至许昌。二年后至陈留界仓垣水南寺。以元康元年五月十五日，众贤者共集议晋书正写。时执胡本者于阆沙门无叉罗，优婆塞竺叔兰口传，祝大玄、周玄明共笔受。正书九十章，凡二十万七千六百二十一言。时仓垣诸贤者等，大小皆劝助供养。至其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写都讫。经义深奥，又前后写者参校不能善悉。至太安二年十一月十五日，沙门竺发寂来至仓垣水北寺，求经本写。时检取现品五部并胡本，与竺叔兰更共考校书写，永安元年四月二日讫。于前后所写校最为差定。其前所写可更取校。晋胡音训畅义难通，诸开士大学文生书写供养讽诵读者，愿留三思，怒其不逮也。

总之，朱士行西行求法，其所得经典虽只限于《放光般若经》一种，但对当

<sup>①</sup> 慧皎《高僧传·佛驮跋陀罗传》。

<sup>②</sup> 《出三藏记集》卷十三。

时的影响很大，受到佛教界的欢迎。朱士行终生未回汉地，80岁病故于阆。

继朱士行之后，由长安出发西行求法的僧人有法显（约337—422）。他俗姓裘，平阳郡武阳（今山西襄丘）人，3岁时父母送到寺院出家，20岁受具足戒。慨叹佛经传译失真，律藏残缺，发誓寻求。终于在东晋隆安三年（399）和慧景、道整、慧应、慧暹等一道从长安出发，到张掖后又会同智严、慧简、僧绍等11人，经河西走廊，出玉门关，渡流沙，越葱岭，历尽艰险，徒行六年才到达印度。他遍访各地，学习梵语，抄写经律，计得《摩诃僧祇律》、《萨婆多律抄》、《杂阿毗昙心论》等梵本。后又到师子国（今斯里兰卡）。这时同行的11人或已死亡，或中途而废，到达师子国只有法显1人。在师子国停留两年，求得《弥沙塞律》、《杂阿含经》和《杂藏经》等梵本。后乘商船初步计划经广州返长安，中途遇大风，漂流到青州牢山（今山东青岛崂山）。义熙九年到建康（今江苏南京），和印僧佛驮跋陀罗共同译出《摩诃僧祇律》、《大般涅槃经》等。86岁时在荆州辛寺入寂。

法显西行求法，往返14年，又写了著名的《佛国记》<sup>①</sup>记述他西行求法的所见所闻，事实简明准确，是研究古代中亚、南亚各国史地、宗教和民俗的重要资料，已被译成英、法等文字，与后来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义净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齐名，颇受中外学者的重视。

## （二）

随着佛教的传入，印度的文学、音韵、音乐、舞蹈、绘画、雕塑以及医学、天文等，亦相继传入中国，为汉魏六朝文化提供了丰沛的水源。此后，演说佛经故事的俗文、变文（有长行和偈语，可以咏唱），在中古文学领域推演出弹词评话；而佛经中的神怪故事又与社会上流行的神仙传说互相融合、互相渗透，孕育出六朝志怪小说；梵文的发音和拼法的传入，对中国学者创出汉语“切音”具有启迪作用，汉语中“浮屠”（佛）、“伊蒲塞”（居士）、“桑门”（和尚）等词汇，即为梵文中的音译字；佛典翻译形成譬喻文学，给后世留下许多优美动人的寓言和故事；犍陀罗佛教雕塑和佛像绘画艺术的神情奕奕、飘逸自得、衣褶繁复的丰满形象，在河西走廊和山、陕广为流传。

古代印度医学发达，有八科之分，总称“八分医学”或“八分”。随着印度佛教的传播，医学也成僧人必须兼通的科目。与佛教传入的同时，印度

<sup>①</sup> 又称《法显传》、《高僧法显传》或《历游天竺记》。

医学亦进入中土。《隋书·经籍志》记载了许多已翻译的印度医方，其中著名的有《龙树菩萨药方》四卷、《婆罗门诸仙方》二十卷、《婆罗门药方》五卷等。在天文、建筑等科技领域中，古代印度的发明创造也相继输入中国，得到广泛的应用。

#### 四、中亚、西亚

##### (一)

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陕西与中亚、西亚各国的经济交流，亦表现为官方和民间两种形式。就官方而言，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及中亚、西亚各国纷纷遣使长安，其中的赏赐、来献就具有经济交流的性质。

随着官方经济交流的兴盛而引起的中亚、西亚货物的输入，民间贸易亦开始兴盛起来。《史记·货殖列传》载：西汉时关中富商大贾甚多，“大抵尽诸田，田畜、田兰。韦家栗氏，安陵、杜杜氏，<sup>①</sup>亦巨万……若至力农畜，工虞商贾，为权利以成富，大者倾郡，中者倾县，下者倾乡里者，不可胜数。”那些地方豪绅和追逐厚利的商人竞相上书，备陈西域奇珍异宝以及与西域贸易的利益，争取得到使者的身份，作为护身符，避免沿途遭到抢劫或伤害。《史记·大宛列传》载：

“自博望侯（张骞）开外国道以尊贵，其后从吏卒皆争上书言外国奇怪利害，求使，天子为其绝远，非人所乐往，听其言，与节，募吏民毋问所从来，为具备人众遣之，以广其道。来还，不能毋侵盗币物，及使失指，天子为其习之，辄覆案致重罪，以激怒令赎。复求使，使端无穷，而轻犯法，其吏卒亦辄复盛推外国所有，言大者予节，言小者为副，故妄言无行之徒，皆争效之，其使皆贫人子，私县官费物，欲贱市以私其利外国。”

汉武帝考虑到西域诸国十分遥远，而且旅途艰辛，对前去的吏卒和商人不问其来历，均给予使节称号，使他们前往中亚、西亚各国进行广泛的民间贸易。这些身为使者的吏士和商人携带精美绝伦的丝绸、漆器等中原特产，由长安或洛阳出发，经由河西走廊，西出玉门、阳关，或走南道，或走北道以翻越葱岭远至中亚、西亚各国。在这些商人之中，有人获取巨大利润欣然而归，但也有人不幸在途中遭到匈奴抢劫，甚至丧失了性命。

<sup>①</sup> 徐广《集解》曰：“安陵及杜，二县名，各有杜姓也。宣帝以杜为杜陵。”

当中国内地的商人由长安出发西行贸易的时候，中亚、西亚各国的商人也络绎不绝地东至长安。《后汉书·西域传》所说：“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西域各国的商业都很发达，“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国，……善市贾，争分铢”<sup>①</sup>；安息“以银为钱……商贾车船行旁国”<sup>②</sup>；大月氏“土地风气，物类所有，民俗钱货，与安息国同”<sup>③</sup>。便为西域商人来长安等地贸易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与汉使一样，抵达长安的西域使节，也包括了冒充使者的商人。他们来到长安或洛阳，大都是以贡献之名，通过汉天子的赏赐以获取利润。比如，罽宾国“奉献者皆行贾贱人，欲通货市买，以献为名”<sup>④</sup>。

到达长安的中亚、西亚各国使节和商人，受到汉政府的优厚礼遇，即使皇帝巡狩，也往往偕同外国客人，并给予很多赏赐<sup>⑤</sup>。汉政府设立有专门管理外交和商务的大鸿胪，并在长安建“蛮夷邸”，供外国使者和商人居住。朝廷还指派专人用黄金和丝绸等物与中亚、西亚各国交换马匹、宝石、琉璃、药剂、香料等。经政府批准的私商，亦可与外国进行贸易。据古罗马学者普林尼估计，在汉代贸易的鼎盛时期，每年通过丝绸之路的中外贸易总额约相当100万英镑。

中亚、西亚各国的商人在长安等地，为经商方便起见，每每和一些达官显贵过从甚密，而王公贵族为了从他们手中获取珍异之物，也乐于同他们交往。东汉时外戚梁冀“交通外国，广求异物”便是一个显著的例证。

随着使节、商人的穿梭往来，双方的贸易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鼎盛时期。内地那些薄如蝉翼的丝绸、色彩缤纷的印花织物、精美绝伦的漆器及闪烁耀眼的黄金源源不断地经长安运抵中亚、西亚各国。与此同时，中亚、西亚各国的“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于后宫；蒲梢、龙文、鱼目、汗血之马，充于黄门；巨象、狮子、猛犬、大雀之群，食于外囿。”真是“殊方异物，四面而至”<sup>⑥</sup>。此外，还有毛皮、毛织物及葡萄、石榴、苜蓿、红蓝花、酒杯藤花、胡麻、胡桃、胡瓜、胡豆、胡蒜、胡荽等植物品种的输入。京师长安藁街蛮夷邸，门庭若市，“蹙眉峭鼻，乱发卷须”<sup>⑦</sup>的异国客人，来来往往，熙熙攘攘，热闹非凡。

① ⑤ 《史记·大宛列传》。

②③④⑥ 《汉书·西域传》。

⑦ 《通典·边防九》。

秦汉以降，直到隋朝建立以前，陕西与中亚、西亚各国不断地进行着广泛、密切的经济贸易，特别是在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五朝建都长安期间，大宛、康居、大月氏、安息等中亚、西亚各国的使节、商人络绎不绝地东来长安进行商品交换。尽管张骞、霍去病、班超等人已相继作古，但是在由他们开辟和疏通的丝绸之路上，仍然是驼铃叮当，马声萧萧，使者不绝于途，商贾比肩于道。

## (二)

随着外交使节和商人的东来西往，中国先进的科学技术也传入中亚、西亚。

西汉时期，为了巩固西部边防，政府采取屯田西域的措施。屯田地点，或处于西域中央，如轮台、渠犂；或正当西域门户，如伊循、伊吾卢；或居于匈奴入侵的要冲。总之，要么是军事和政治上的要道，要么为土壤肥沃、水源充足之地。如果说汉政府最初屯田西域仅仅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那么后来这一举动却在陕西等地与西域各国的科技、文化方面发生了重大的影响。

随着时间的推移，汉在西域的屯田地区不断扩展，踵之而来的便是中国的先进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传入西域，比如冶铁技术即在此时传于西域。《汉书·西域传》引桑弘羊语说：“渠犂其旁国少锥刀，贵黄金采繒，可以易谷食。”按照颜师古的解释，这是汉以锥刀及黄金采繒与其旁国交换谷食，以供屯田士卒之食用。是则说明中国锥刀之类的铁器经由屯田部门传入西域。在铁器西运的同时，冶铁技术也随之西传。《汉书·西域传》说：“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国……不知铸铁器，及汉使亡卒降，教铸作它兵器。”公元前36年，陈汤在西域见到“胡兵”武器“矢刃朴钝，弓弩不利”，远不及汉军的长柄矛戟、利剑坚盾和远射弓弩。根据考古发现，黄河流域在战国时已开始普遍使用铁器，锻钢和可锻铸铁亦已在全国流行。汉代，中国的冶铁技术得到进一步发展，已掌握了低硅灰口铁、球墨铸铁和块炼铁渗碳铜这样先进的工艺。随着张骞通西域和丝绸之路经济贸易的发展及汉政府在西域的屯田，陕西等地的冶铁技术渐渐开始西传。塔吉克语中的铸铁叫 чуян，相当于鞑靼语中的 чуен，二者皆出自汉语“铸”。公元前2世纪，今乌兹别克境内的费尔干纳人从西汉中国人那里学会铸铁技术，然后再西传俄国。西汉时，安息王朝也竭力通过各种途径和手段从长安等地输入各种钢铁兵器。后来中国的钢铁与武器又通过安息流入罗马帝国。



陕西穿井开渠技术也在西汉时传入西域。中国穿井技术历史悠久，近年来在安阳殷墟出土的工具中，即有凿地用的铜锥。战国时代，各诸侯国的军队已利用地道作战。另据《华阳国志》记载，秦国人李冰曾在蜀“穿广都盐井诸陂池”。西汉时，中国在穿井工具和技术方面均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尤其是在高架滑车和汲水工具等方面已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

汉武帝时，陕西大荔出现一种新式井渠，叫龙首渠，井深达四十余丈，用来控制地下水源和防止沿岸崩塌。《汉书·沟洫志》云：

自征引洛水至商颜下，岸善崩，乃凿井，深者四十余丈，往往为井，井下相通行水，水渍以绝商颜，东至山领十余里间，井渠之生自此始。

就西域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来看，该地气候干旱，沙漠纵横，终年雨量稀少，而高山上储蓄的大量的溶雪水一流至沙漠不是大量蒸发就是渗入地下，无法利用。而汉时在西域屯田的中国士兵，为了有利地控制地下水源，便将陕西大荔最早发明的穿井技术引进到西域。据《史记·大宛列传》记载，汉武帝令李广利率军攻打大宛时，“宛王城中无井，皆汲城外流水，于是乃遣水工徙其城下水空，以空其城。”于是，大宛城里的权贵惶恐不已，并相与谋，认为“汉所为攻宛，以王毋寡匿善马而杀汉使。”于是杀死大宛王毋寡，遣使与汉求和。李广利又闻“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而其内食尚多”，遂决定接受议和。大宛城中新得的秦人当来自中国内地，他们将穿井技术传给大宛，随后这种井渠开凿技术便逐渐在西域各国推广。汉宣帝元康二年（前64）遣大将军辛武贤率领15000名士兵至敦煌戍边屯田，并在该地白龙堆之间穿卑鞞侯井以通渠灌溉。这种井便是后来在新疆和中亚地区流行的坎儿井。孟康注《汉书》曰：“大井六通渠也，下泉流涌出，在白龙堆东土山下。”汉代新疆建有许多穿井开渠灌溉工程。据考古发现，新疆有许多汉代灌溉工程的遗址。沙堆至今还存有二百里长的汉代古渠，被当地人称为“汉人渠”。今哈萨克斯坦伊塞克湖东岸乌孙赤各遗址郊外，也发现了规模较大的汉代灌溉渠道。此外，这种穿井开渠的技术还传至波斯。陕西穿井技术的西传，有力地促进了这些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

在以冶铁和穿井技术为代表的先进科技文化西传中亚、西亚各国的前后，以杂技为代表的西亚、中亚文化亦进入长安宫廷。

中国的杂技艺术有着悠久的历史。比如，古代农民在农暇之际每每表演竞技和角力等游戏，以为娱乐，秦时称此为角抵戏。角抵戏的文献记录，最

早见于《史记·李斯列传》：“二世在甘泉，方作角抵优俳之观。”

张骞通西域，归国时带来黎轩善眩人，黎轩即大秦（罗马）。颜师古《汉书·张骞传注》云：“眩读于幻同，即今吞刀、吐火、殖瓜、种树，屠人、剥马之术皆是也。本从西域来。”显然，颜师古是以唐时所见幻术解释前人记载，但其术人因张骞通西域始入长安当属无疑。是为西域杂技艺术正式传入陕西之始。

就在安息国遣使给汉帝国送来大鸟卵（鸵鸟蛋）和罗马幻术家的时候，汉武帝心花怒放，给予隆重接待。这年（即元封三年，前108）春天，汉武帝在气势雄伟的长安平乐观（馆）召集许多外国来客，举行空前盛大的宴会和赏赐典礼，并邀长安三百里以内的百姓前来观赏。在宴会上，中国杂技艺人表演了“戏车”、“扛鼎”、“摔跤”等精彩绝妙的百戏；中亚、西亚各国艺术家演出了“鱼龙曼衍”、“海中碣极”、“吞刀吐火”等雄浑壮观的幻术；缅甸、印度的艺术家也趁此表演了惊险的“都卢寻橦”、“水人弄蛇”。中外杂技艺术交相辉映，蔚为异彩。

这次盛大的东西方杂技会演，既向不同肤色的外国观众展示出汉王朝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的强大国力，又在亚洲文化交流史上浓笔重彩地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从此以后，中亚、西亚各国的文化，诸如箜篌、琵琶、鼙、胡笛等乐器，《鼓吹》、《铙歌》、《摩诃兜勒》等乐曲，“吞刀吐火”、“屠人截马”、“易貌分形”等幻术，纷纷进入汉廷乐坛、艺苑。就杂技艺术来说，西汉成帝时，中亚、西亚各国许多杂技艺人先后来到内地，在京城长安表演人兽搏斗，称作“大校猎”，表演者还因此得以封官获爵。关于西汉时由中亚、西亚传入陕西的杂技艺术，张衡《西京赋》所论甚详。两汉以后直至北朝时期，中亚、西亚杂技艺术不断传入。比如，北朝时长安等地的杂技艺术即多来自中亚、西亚各国。再就乐器和乐曲的传入而言，一般来说，在汉武帝遣张骞通西域以前，陕西流行着楚歌。至于当时以配歌舞所用的乐器亦仍然是先秦以来所遗留的钟、鼓、磬、铎之类的打击乐器。这种乐器不能独立奏出一种曲调，而只能敲出音乐的节奏。张骞出使西域以后，中亚、西亚各国的乐器和乐曲相继传入陕西等地，比如，西域的箜篌、琵琶、鼙、胡笛、胡笳、胡角、胡笳、胡篪之类的乐器都先后东传，使当时以长安为代表的中国传统的歌舞曲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与此同时，中亚、西亚各国的鼓吹、铙歌等乐曲亦传入长安。班超在西域时即曾欣赏过这些乐曲，内容变幻，声调雄壮。后一直到唐宋时代，依然采用这些旧曲，正如《通志·乐略》所说：

“用以为出入警严之节，而取其声之震厉，多仍其旧曲。”

中亚、西亚各国杂技、乐舞的传入，给中国的古典乐舞百戏注入了新的内容。汉文化艺术通过吸收外域不同民族文化的精华，最终成为一个包容各种文化的复合体。需要指出的是，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吸收外来文化的基础上，能够大胆地进行创造与革新。例如，西汉武帝时，中亚、西亚的音乐传入以后，大音乐家李延年“因胡曲更造声二十八解”<sup>①</sup>，“每为新声变曲，闻者莫不感动”<sup>②</sup>，博得汉武帝和长安豪门显贵的喝彩。这里所谓的新声，自然是中外乐曲熔于一炉的新作。又如，由西亚、中亚传入的幻术，经过长安艺术家的加工与改造，更是大炫异彩，风靡一时。杂技艺术遂成为达官显贵、富商大贾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娱乐项目：“夫家人有客，尚有倡优奇变之乐，而况县官乎？”<sup>③</sup> 这些社会名流不仅生前爱好乐舞百戏，而且死后还要在墓葬里刻画一幅幅欣赏乐舞百戏的场面，以继生时之乐。特别是在一些民间工艺美术品中，每每“戏弄蒲人杂妇，百兽、马戏、斗虎，唐梯追人、奇出胡妲”<sup>④</sup>，甚至连办理丧事也是“歌舞俳优，连笑伎戏”<sup>⑤</sup>。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陕西与中亚、西亚各国文化交流的昌盛。

## 五、欧洲

两汉时，中国与罗马帝国的经济交流以丝绸和珍奇异物为主，即中国输出大宗的丝绸，以获得罗马的珍奇异物。

在罗马帝国时期，丝绸竟和黄金等价。人们把华丝看做是“光辉夺目，人巧几竭”的罕世珍品，并以身着这一珍品而深感荣耀。罗马恺撒大帝有一次穿着中国丝袍去剧院看戏，引起巨大的轰动，惊羨之声不绝于耳。由此可见当时罗马各界人士对中国丝绸的广泛注意。罗马博物学家白里奇《博物志》一书中曾对丝绸的经济价值与社会影响作过充分论述：

赛里斯国（中国）林中产丝，驰名宇内。丝生于树上，取出，湿之于水，理之成丝。后织成锦绣文绮，贩运至罗马。富豪贵族之妇女，裁成衣服，光辉夺目。……（罗马）奢侈之风，由来渐矣。至于今代，乃见凿山以求碧玉，远赴赛里斯国以取衣料。……据最低之计算，吾国之

① 崔豹：《古今注》。

② 《汉书·外戚传》。

③ 《盐铁论·崇礼》。

④⑤ 《盐铁论·散不足》。

金钱，每年流入印度、赛里斯及阿拉伯半岛三地者，不下一万万赛斯透司，此即吾国男子及妇女奢侈之酬价也。<sup>①</sup>

因此说，尽管当时的丝绸价格相当惊人，但人们还是争相抢购，以能穿上一件用中国丝绸制成的衣服为荣。因而，罗马帝国经常要支付进口丝绸的大量费用，造成国家的财政赤字。因而，元老院曾通过一项关于严禁国内男子穿着丝绸服装的通令，但却未能奏效，可见中国丝绸在当时已成为难以缺少之物。有西方史学家认为，古罗马的贸易逆差，货币外流，是进口中国的丝绸所造成。实际上，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既在于中罗两国相距万里，又因商人居间垄断，还因沿途各国关卡重课，提高了丝绸的价格。拉施克在《罗马与东方贸易新探》中说，“没有足够的理由可以相信中国丝绸的进口耗尽了罗马的财富”<sup>②</sup>。

除丝绸外，内地的铁器、铜器、漆器等亦由长安经新疆西运至罗马一些国家，而罗马帝国的各种珍奇异物又东运抵长安。三国时曹魏鱼豢《魏略·西戎传》中详细记载了罗马的物产：

大秦多金、银、铜、铁、铅、锡，神龟、白马、朱鬣、骇鸡犀、瑇瑁、玄熊、赤螭、辟毒鼠，大贝、车渠、玛瑙、南金、翠爵、羽翮、象牙、符采玉、明月珠、夜光珠、真白珠、琥珀、珊瑚，赤、白、黑、绿、黄、青、紺、缥、红、紫十种流离，璆琳、琅轩、水精、玫瑰、雄黄、雌黄、碧五色玉，黄、白、黑、绿、紫、红绛、紺、金黄、缥、留黄十种毼毼，五色毼毼，五色、九色首下毼毼，金缕绣、杂色绫、金涂布、緋持布、发陆布、緋持渠布、火浣布、阿罗得布、巴则布、度代布、温宿布、五色桃布、绛地金织帐、五色斗帐，一微木、二苏合、狄提、迷迭、兜纳、白附子、薰陆、郁金、芸胶、薰草木十二种香。

表面看来这只是罗马的物产，实际上是罗马帝国向中国出口的货单，可谓是琳琅满目，这充分反映了两国商业往来的频繁和经济交流的活跃。

<sup>①</sup> 转引自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册，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0—22页。

<sup>②</sup> 转引自《剑桥中国秦汉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2月版。

## 第三章 隋唐五代

### 第一节 概况

隋唐王朝是经历了魏晋南北朝的分裂割据后再次统一的王朝，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在古代中外关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隋文帝开皇元年（581），隋王朝建立，定都大兴城（今西安）。然后挥师南下，先后灭后梁和陈国，于开皇十年（590）统一中国。这时隋文帝的注意力主要放在内政上，力求国内稳定，不事远略，因而对外交往较少。隋炀帝即位后，则下诏召募出使外国的使者，在大业年间（605—617），就与亚洲各国多建立了外交关系，促进了中国文化在亚洲各国广为传播。

唐高祖武德元年（618），唐王朝建立，定都长安。唐朝前期，农业生产蒸蒸日上，手工艺品日益精巧，商品经济空前繁荣。唐朝后期，南方的经济进一步发展，逐步走向超越北方之路。在政治上先后有“贞观之治”和“开元之治”。著名诗人杜甫在《忆昔》中对当时国内社会情况有深刻而形象的写照曰：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廩俱丰实。  
九州道路无豺狼，远行不劳吉日出。  
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

随着国家统一，经济发达，社会安定，整个社会氤氲着恢宏豪迈，开朗奔放，积极进取的景象，在对外关系上，派往亚、非、欧国家的使节不绝于途，先后有 70 多个国家和唐朝建立了关系。

同时，唐王朝还对迁居中国的外国侨民采取优惠政策，到唐德宗贞元三年（787），迁居长安的中亚、西亚各国的侨民已达四千户。据统计，当时长

安城约有一百五六十万居民<sup>①</sup>，而各国侨民约占总数的2%左右。长安成为各族人民聚居、各国侨民往来的一座国际性大都市。外国侨民可以长期居住长安，“久者，或四十余年，皆有妻子，买田宅。”<sup>②</sup>有的甚至客死长安。比如，波斯国萨珊王朝国王卑路斯及其子泥涅斯即先后于长安逝世。

由于长安的外国侨民来自四面八方，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方面多有不同，而唐王朝尊重各国侨民的崇尚与爱好，对于外域文化多能兼容并蓄。当时世界各国形形色色的服饰、饮食、音乐、舞蹈、游戏等，均能以本国原有的风貌登上长安这座国际文化交流的历史舞台。不惟如此，外国侨民还可以在长安等地自由传教、自由经商。尤其是对那些经商的侨民，唐王朝还给予优惠的商业政策，“任其来往，自为交易，不得重加率税”。唐代长安的商业贸易，主要集中在东、西两市。许多外商在西市经营店铺、并因此而成为巨商富贾。

外国侨民还可在中国通过参加科举考试从政为官，例如，日本的阿倍仲麻吕考中进士，先后任司经局校书、安南节度使等职，后逝世于长安，唐代宗追赠其为“潞州大都督”。

由于隋唐王朝实行对外开放政策，遂使长安成为亚洲各国政治往来、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的中心，各国使节、学者、商人、僧侣带来了一些本国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知识，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宝藏。例如，唐代“司天台”即曾有擅长天文和历算的印度学者任职，其中，瞿昙悉达著《开元占经》一书，还介绍了印度先进的《九执历》，对中国天文历算之学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另一方面，当他们归国时，又将中国的典章制度、文学和科学技术带回本国，从中汲取营养。这种文化的互补性，大大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发展。

唐王朝继承了古代中国对待外族、外邦关系上以“协合万邦”<sup>③</sup>“天下为公”<sup>④</sup>“四海之内皆兄弟”<sup>⑤</sup>的优良传统，这也是唐王朝对外政策的主流。不可否认，隋唐统治者对外族、外国也有过侵略扩张和掠夺行为，但却没有像古罗马帝国或近代西方殖民者那样将对外征服掠夺奉为实现国家富强的基

① 王仲荦：《隋唐五代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772页。

② 《资治通鉴》唐德宗贞元三年。

③ 《尚书·尧典》。

④ 《礼记·礼运》。

⑤ 《论语·颜渊》。

本国策。

隋唐时期，以长安为中心的北方地区的社会经济得到长足发展的同时，江南一带的社会经济亦在突飞猛进。到中唐，全国经济中心第一次从黄河流域转向长江流域，江南粮食产量跃居全国首位，长安城中居民所需粮食，需要依靠漕运江南粮食来补充。唐代中叶以后，扬州、益州（今四川省成都市）已发展为全国最大的手工业作坊中心，时有“扬一益二”之称。唐末崔致远给僖宗上表请巡江淮时说：“江淮为富庶之乡，吴楚乃繁华之地”（《桂苑笔耕集》）。这时江南已成为全国的经济命脉。唐代末年，藩镇割据，哀帝天祐四年（907），割据中原的朱全忠废哀帝，建立梁朝，迁都开封，中国历史进入五代十国时期。这一时期的陕西地区，兵祸连接，社会不安，长安失去了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在国际上的地位也日益下滑。

## 第二节 涉外机构

隋唐王朝根据对外交往的需要，在都城长安设置鸿胪寺以接待各国使节和宾客。唐时鸿胪寺署在皇城含光门内以东。寺置卿一人，从三品；少卿二人，从四品上。“凡四方夷狄君长朝见者”，皆由鸿胪卿“辨其等位，以宾待之”；而“夷狄君长之子袭官爵者”，亦由鸿胪卿“辨其嫡庶”；若有封命，“则受册而往其国”<sup>①</sup>。是则鸿胪卿及少卿主要负责外国使节和各少数民族朝贡之仪、高下之等、往来之命等事宜。

鸿胪寺下领典客、司仪二署。其中典客署置令一人，从七品下；丞二人，从八品下。另置掌客、典客、府、史、宾仆等多人。据《旧唐书·职官志》记载，典客署专掌招待外国宾客事务，“凡酋渠首领朝见者，皆馆供之；如疾病死丧，量事给之；还蕃，则佐其辞谢之节。”隋炀帝时曾将典客署改称典蕃署，然不久又复旧。

在典客、司仪二署之外，位于长兴坊北部的礼宾院亦隶属于鸿胪寺。该院“掌四夷之客”<sup>②</sup>，也是接待少数民族使者和外国宾客的专门机构。在鸿胪寺内西部有“四夷慕化朝献者居焉”<sup>③</sup>的客馆。唐穆宗长庆元年（公元

<sup>①</sup> 《旧唐书·职官志》。

<sup>②</sup> 《资治通鉴》卷二三二。

<sup>③</sup> 《玉海·鸿胪寺》。

821年),将太和公主嫁给回纥(中国少数民族)的可汗,鸿胪客馆一次安置回纥迎亲使团即达573人,可见馆舍规模之大。唐政府每年要拨出一万三千斛粮食充作招待外国宾客的费用<sup>①</sup>。鸿胪寺内还配备有精通各国语言文字的翻译人员。

除鸿胪寺外,隋唐政府又于六部之一的礼部(属尚书省)设主客司,位置在城内尚书省都堂以东。主客司设主客郎中等职,主要负责外国及各少数民族使节来京朝见时沿途驿传、给赐等事宜。同时,凡有请求留京宿卫(唐时外国使节多有留京宿卫者)的使节,则向朝廷奏报其状貌、年龄,并主管各民族首领死后其子孙袭爵授官等事项。

此外,隋时又始置四方馆,以为四方各国使节之招待所。唐时沿置,隶中书省,位置在皇城内承天街西中书省以西。馆内分东西南北四方,各设使者一人,“以待四方使者”<sup>②</sup>。

需要指出的是,接待外宾活动并非仅仅局限于上述专门的涉外机构,中央其他机关有时亦用来临时接待宾客。例如,位于长安皇城内承天街东第五、六横街之间的太仆寺(职掌厩牧车辇之政),曾于唐太宗贞观四年(630)用来接待突厥颉利可汗及其家属<sup>③</sup>。

隋唐时期,除都城长安所置涉外机构外,尚有边疆镇抚机构。隋炀帝置西戎校尉,唐太宗至武则天时置安西、北庭、单于、安北、安东、安南大都护府,每个都护府置大都护、副都护、长史、司马、录事、功曹等属官,具体负责边防行政和少数民族事务。隋唐时在边关和通商口岸还设有外贸管理机构。例如隋唐分别设交市监和互市监掌管对外贸易,尤其是唐还在不少地方设置商馆以招待外商。同时,唐又于广州等地设市舶司,由中央政府派官员专门负责征税事宜。

### 第三节 丝绸之路的兴盛

西汉时,沟通中西交往的丝绸之路在中国新疆境内一段分为南、北两道。隋唐五代时期,随着中西交往的繁盛,又开辟了从玉门关西行,经伊

① 《唐会要》卷六六。

② 《通典·职官》。

③ 《旧唐书·突厥传》。



吾、巴里坤、吉木萨尔、乌苏以达碎叶（吉尔吉斯境内楚河南岸的托克马克城）的一条大道，时称北道（即现在习称的北道），而将汉代的北道叫做中道。此两道和汉代的南道合称新疆北、中、南三道。正如《隋书·裴矩传》所说：

发自敦煌，至于西海，凡为三道，各有襟带。北道从伊吾经蒲类海、铁勒部、突厥可汗庭，度北流水，至拂菻国，达于西海。其中道，从高昌、焉耆、龟兹、疏勒，度葱岭，又经钹汗、苏对沙那国、康国、曹国、何国、大小安国、穆国至波斯，达于西海。其南道从鄯善、于阗、朱俱波、喝槃陀度葱岭，又经护密、吐火罗、挹怛、帆延、曹国至北婆罗门（印度北部），达于西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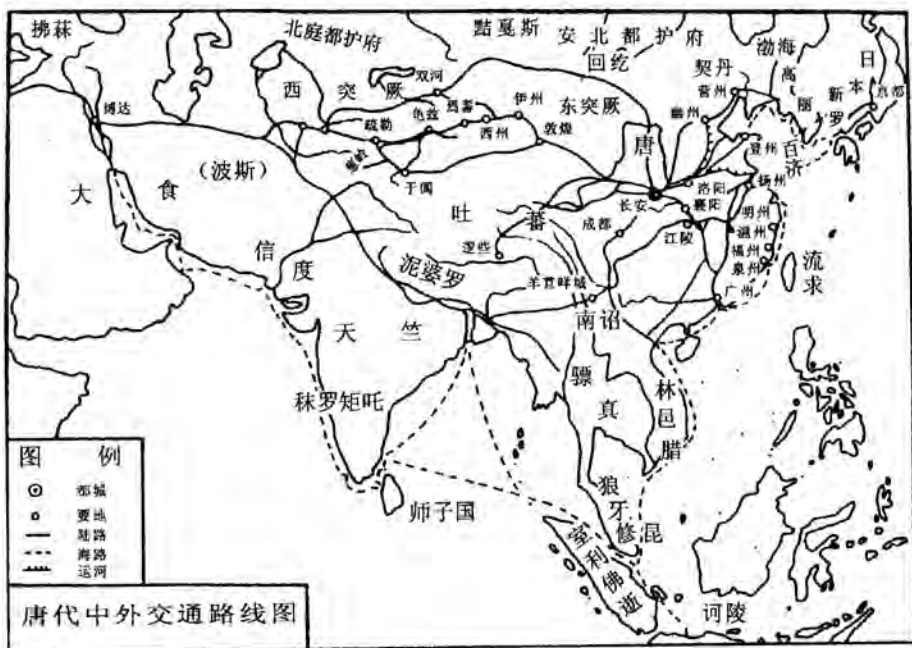
由此可见，在隋朝，中西交往不仅达到亚洲西部，而且远及欧洲东部。

据《释迦方志》卷十四记载，唐初中印交通主要有三条路线。北道，由敦煌沿塔里木盆地北缘出葱岭，经撒马尔罕南越铁门入吐火罗，然后顺喀布尔河进入北印度；中道，由敦煌出发，沿塔里木盆地南缘出葱岭，经昆都士南入北印度；东道，由长安出发，经青海入吐蕃、尼泊尔到中印度。北道被称为吐蕃泥婆罗道，它是唐代新开辟的中印交通捷径，在三道中距离最近，通称中印藏道。该道在唐初一度成为长安与印度之间往来的主要通路。

唐太宗贞观十三年（639），尼泊尔赤贞公主嫁赞普。这时，尼泊尔与西藏之间的交通有了新的改善，从加德满都谷地通向西藏南部的班尼巴到固蒂山口的商路已经筑成。后到贞观十五年，唐太宗派江夏王李道宗送文成公主到吐蕃。吐蕃动员大批人力赶在夏季将通往黄河曼头岭的道路修好，此后由长安至拉萨的大道畅通无阻，而拉萨到加德满都和中印度也变成了通道。从贞观十五年文成公主出河源到拉萨起，直到高宗咸亨元年（670）唐和吐蕃在大非川大战，双方关系恶化，30年中，长安至中印度的中印藏道成为中印双方使节往还的主要通道。永隆元年，文成公主卒，唐政府征调剑南兵堵塞了青海境内的白兰道，中印藏道曾一度封闭。到玄宗开元十八年（730）唐与吐蕃和好，中印藏道又重新开放。穆宗长庆二年（822）以后，吐蕃统治集团内部不断分裂，到玄宗大中元年（847）张义潮在沙州起义，吐蕃在河西走廊的统治彻底动摇，中印藏道便开始一蹶不振。

为了保证丝绸之路的交通安全，隋唐时期从河西走廊的凉州（今甘肃武威）直到天山南北各条大道上，均驻扎有军队。各地驻军都是战时作战，平时种田，既保护了往来行旅的安全，又开垦土地，发展了农业生产。由于这

些驻军及其家属、后勤人员、地方官吏和当地居民的辛勤劳作，遂在丝绸之路上形成许多繁华的城市，并出现了许多富庶的地区。唐代著名诗人岑参有诗句云：“梁（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sup>①</sup> 每户以5口计，当时凉州应是一个拥有50万人口的大城市。另外，北庭都护府所在地庭州城（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吉木萨尔）和安西都护府所在地高昌（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附近。后都护府所在地迁至龟兹）等，在当时也是人口众多的城市。《资治通鉴》在玄宗天宝十二年（753）中曾经指出：“是时中国强盛，自安远门<sup>②</sup> 西尽唐境万二千里，阡陌相望，桑麻翳野，天下富庶者无如陇右。”这就是说，从长安直到安西都护府，多种植桑麻等农作物，一派富庶繁荣的景象。



图九 唐代中外交交通路线图

在隋唐时期，丝绸之路呈现出空前的繁荣景象，中外使节、商人、学者往来穿梭、络绎不绝。唐人张籍《凉州词》云：“边城暮雨雁飞低，芦笋初生渐欲齐。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白练，即煮白的丝绸。这首诗记叙的正是当年中国丝绸经由河西、新疆运往波斯、印度、罗马等地的盛况。它告诉人们，被淡忘的古丝绸之路，当年是驼铃声声，骏马奔驰的国

① 岑参：《梁（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

② 安远门为唐时长安城西北第一门，是丝绸之路的起点，后改称开远门。

际交通大道。

五代时期，尽管由于国内处于分裂割据之时，沟通中西交往的丝绸之路受到严重的阻滞，但并没有断绝，政治上势在必行的通好、联盟等原因和经济上的巨大诱惑力，驱使着中西各国的使臣、商人、艺术家们东来西往，继续不辍。

五代时，葱岭东、西即由欧洲、西亚、中亚到今新疆的交通道路，基本上还是沿汉唐以来的丝绸之路。但由新疆、甘肃河西到内地长安的丝路因国内分裂割据而有所变化。唐末以来，今甘肃天水以西至凉州一带，为吐蕃、党项等部落占据，这些部落不相统一，每每阻断交通，劫掠往来使臣及商旅。遂使原来经陇西至河西的一段丝路不能通行，内地与河西的交通不得不改由灵州<sup>①</sup>渡黄河，穿过今阿拉善左旗所在的腾格里沙漠以达凉州。北道以灵州为中心可分为灵州以东和以西两段路程，其具体走向是：由洛阳或开封西行，经长安、邠州（治今陕西彬县）、庆州（治今甘肃庆阳）、方渠（今环县南杨旗镇）至土桥子或者冈川，再由旱海至灵州，过黄河西北行，穿今腾格里沙漠以达今民勤，过白亭河至凉州<sup>②</sup>。此即所谓“灵州道”。由凉州沿汉唐以来的河西路越葱岭至中亚、西亚直抵欧洲。

隋唐五代时期，中国的海外交通在前代发展的基础上，出现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新局面，相应，海上丝绸之路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兴盛景象。中国在经历了分裂割据之后，又重新出现了空前统一的局面，社会经济和文化空前繁荣。作为主要出口物资的丝绸，生产规模及其产品质量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例如，唐时设“织染署”，专门负责组织各种纺织品的生产，绢、毳、纱、綾等丝织品，工艺精细，如“亳州出轻纱，举之若无，裁以为衣，真若烟雾”<sup>③</sup>。作为另一重要出口物资的陶瓷器，这时期的制造技术也有很大进步。唐三彩的制作，在盛唐时期达到技术上的顶峰。白、青瓷器造型雅致，制作精良。如此精美的物品可以大量出口，必然会吸引更多的海外国家和商人来华贸易。这是海上丝绸之路兴盛的原因之一。海上丝绸之路兴盛的另一原因，便是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的进步。隋代的造船技术有相当的发展。杨素在永安（今四川奉节）造“五牙”大舰，上有五层楼，高百余尺。隋炀帝

<sup>①</sup> 灵州是鄂尔多斯以西，黄河中游最重要的交通要冲。远在秦汉时代，该地作为北地郡，以中原王朝进击匈奴的基地而著称于世。唐时，灵州为朔方节度使所在地。

<sup>②</sup> 见周伟洲：《五代时期的丝绸之路》，载《文博》1991年第1期。

<sup>③</sup> 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六。

游幸江都所乘龙舟“高四十五尺，长二百尺，阔五十尺，四重”，各类船只近千艘，前后绵延近二百里。可见造船技术已相当高超。在航海技术上，隋代已经掌握了利用多面风力行船的技巧。

在上述两个方面的促使下，自汉代以来一直持续发展的南海航路，在隋唐时期更加蓬勃发展。首先，汉代开辟的沟通中国与东南亚、南亚各国交往的南海航路，到这一时期更为繁荣昌盛，许多国家有使臣“或时候风潮朝贡，蛮胡贾人舶暗交海中”<sup>①</sup>。波斯商人“亦泛海汉地，直放广州，取绫绢丝帛之类”<sup>②</sup>。许多阿拉伯商人也远渡重洋来到中国。据唐代著名地理学家贾耽《广州通海夷道》记载，当时中国海船由广州出发，经环王国（今越南中南部）可至室利佛逝（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南部）和诃陵国（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从诃陵国西航经师子国（今斯里兰卡）等地可至天竺（古印度别称）和提颺国（今巴基斯坦印度河口以西）<sup>③</sup>。据阿拉伯作家记载，公元8、9世纪之间，在巴格达有专门销售丝绸、瓷器等中国商品的市场，中国商船曾达到红海的吉达港，然后驶向埃及<sup>④</sup>。第三，中日、中朝之间海上交通在这一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谱写出海上丝绸之路史上大炫异彩的新篇章。

隋唐时期，中外使节、海商通过南海航路，把中国的丝绸、陶瓷器、铁器、漆器等工艺品运销至东南亚、南亚及阿拉伯各地；同时又把这些地方的香料、象牙、犀牛、珠宝及各种奇珍异物运到中国。作为南海航路吞吐港的广州，“珍货辐凑”<sup>⑤</sup>，“环宝山积”<sup>⑥</sup>。中外贸易的繁荣景象于此可见一斑。在中国通往东南亚、南亚和阿拉伯半岛的南海航路上，许多地方都先后出土了当时中外交通的遗物。例如，在菲律宾的许多地方曾出土了大量唐代的古钱和陶瓷器，还发现过唐代的中国古墓<sup>⑦</sup>。在伊朗和阿拉伯地区也发现有唐代的瓷器。这些历史遗迹正是当时南海航路中外交通兴盛的历史见证。

① 韩愈：《昌黎集》卷二一《送郑尚书序》。

② 慧深：《往五天竺传》。

③ 见《新唐书·地理志》。

④ 见纳忠：《中世纪中国与阿拉伯的友好关系》，载《历史教学》1979年第1期。

⑤ 《旧唐书·卢钧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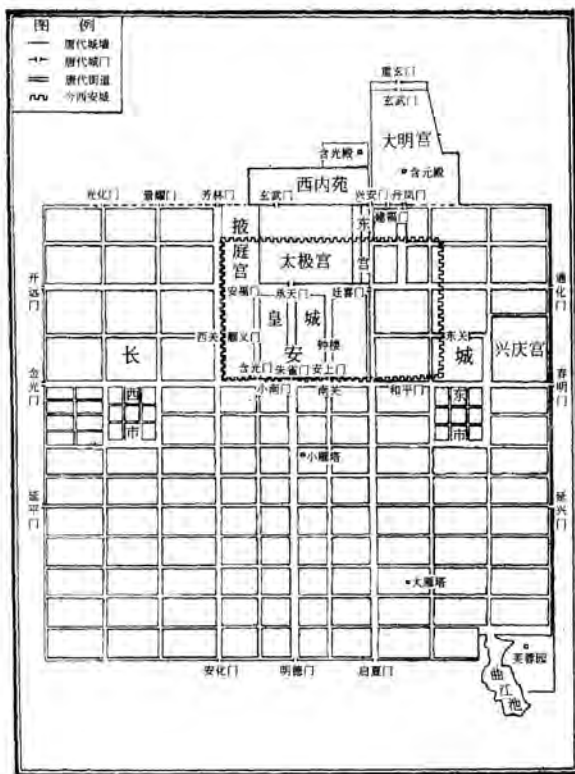
⑥ 《旧唐书·卢怀慎传》。

⑦ 见周南京：《中国与菲律宾的历史关系》，载《历史教学》1979年第4期。

#### 第四节 唐长安城的国际地位

空前统一的唐王朝以其高度发展的生产力和先进的农业、手工业及欣欣向荣的科技文化，在当时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京城长安则在国际舞台上闪烁着璀璨的光芒。

一个国家的都城是该国经济文化发展的标志，同时也是国家实力的集中体现。唐长安城规模宏大，气势磅礴，全城面积达 84 平方公里，东西宽 9721 米，南北宽 8651 米，周长 36.7 公里，较今西安城（明清时城）的面积 8.7 平方公里大 9.5 倍，是中国古代，也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一座都城。全城分为宫城、皇城和外郭城三大部分。宫城位于全城北部正中，内分为太极宫、东宫和掖庭宫三部分。太极宫位于宫城中央，是皇帝起居、听政和朝见群臣的主要宫廷。东宫位于宫城东部，是皇太子所居之地。掖庭宫位于宫城西部，是宫嫔居住之地。宫城周长 8.6 公里，总面积 4.2 平方公里。皇城在宫城之南，是唐朝中央军政机构和宗庙所在地，周长 9.2 公里，面积 5.2 平方公里。东、西、南三面筑有城墙，北面以横街与宫城相隔。皇城南墙中部为朱雀门，它北对宫城承天门，南对外郭城明德门。三门同处一条直线。这条南北中央大街，称为朱雀门大街。外廓城以宫城、皇城为中心，向东、西、南三面展开，是坊里居民住宅及商业、寺观的分布区。



图十 唐长安城图

以朱雀大街为中轴线，将全城分为东、西对称的两部分，东为万年县，

西为长安县。街东地区有五十四坊<sup>①</sup>和一市（东市），街西地区有五十五坊及一市（西市）。长安城内共有南北向十一条大街，东西向十四条大街。其中主干线朱雀大街宽 150—155 米，是今天北京天安门前东、西长安街宽度的两倍，这充分显示出唐人宽阔的胸怀和雄伟的气魄。这二十五条大街相互交错，将外郭城地区划分为网格格式地段，每个网格即为一坊。皇城中亦有南北向五条大街，东西向七条大街。这十二条大街又将皇城地区划分为网格格式地段。总之，长安城街衢、坊里排列整齐，呈棋盘式格局，正如诗人白居易在《登观音台望城》诗中所描绘：“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



图十一 唐大明宫麟德殿复原示意图

在长安城外东北隅龙首原上，建有富丽堂皇的大明宫。该宫城周长 7.6 公里，面积约 3.2 平方公里。据《唐两京城坊考》记载，大明宫中有二十六门、四十殿、七阁、四省、十院及楼台堂观池亭等。位于大明宫西北部太液池西侧隆起的高地上的麟德殿，由前殿、中殿、后殿组成。由于三殿前后毗连，故称三殿。因该殿建于高宗麟德年间（664—665），所以又称麟德殿。麟德殿是大明宫的便殿之一，是皇帝举行盛大宴会和接待外国使节及少数民

<sup>①</sup> 坊是长安外郭城内居住地段的单位。唐时长安城共有一百零九坊，各有名称，其平面形状大体上可分为正方形和长方形两种，面积大小不一。每坊的四周都筑有近三米厚的坊墙。

族代表人物的地方，“凡蕃臣外夷来朝，率多设宴于此，至臣下亦多召对于此也。”<sup>①</sup>武周长安元年、三年（701—703），武则天曾在此殿两次宴请召见日本使节田朝臣真人。



图十二 章怀太子墓东壁礼宾图

长安作为唐王朝的国都，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然就整个世界而言，长安又是一个国际性的大都市，是中外政治往来、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的重要基地。

首先，在政治往来方面，繁荣昌盛的陆上丝绸之路、方兴未艾的海上丝绸之路<sup>②</sup>以及遣唐使航线，将长安和亚、非、欧各国紧密地联结起来，为彼此之间的政治往来提供了极为重要的交通条件。有唐一代，亚、非、欧各国的外交使节或长途跋涉，或远渡海洋，纷纷前来长安，与唐政府进行友好的政治交往。据《唐六典》卷四记载，唐王朝曾与300多个国家和地区互相交往，后因攻伐和兼并成为70多个国家和地区。当时长安城中有许多服装各异的外国使者和来宾。1971至1972年在陕西乾县章怀太子李贤墓中出土的《礼宾图》壁画即生动地反映了这一点。墓道东、西壁各绘有一幅礼宾

<sup>①</sup> 《雍录·唐翰苑位置》。

<sup>②</sup> 通往国外的海路尽管距离长安甚远，但凡是海外各国扬帆来华或唐政府泛海出使，其起点或终点都是京城长安。

图，描写的是8世纪时唐政府迎接外国使节的场面。东壁礼宾图有东罗马帝国、日本等国的使节，其中画面上从右至左第二人所戴帽子和所穿服装，与《旧唐书·东夷倭国传》中描述的朝臣真人的服饰极为相似<sup>①</sup>。西壁礼宾图有大食等国的使节。

其次，在经济贸易方面，长安城中那街衢纵横交错、店铺鳞次栉比、商品琳琅满目的东、西两市，吸引着许多国家的商人前来进行经济贸易。长安的商业贸易，主要集中在东市和西市。东市位于皇城外东南，在朱雀大街东第四至第五、六排坊处，遗址约在今西安城外东南乐居场与交通大学之间。西市位于皇城外西南，在朱雀大街西第四到第五、六排坊处，遗址约在今西安城外西南糜家桥与东桃园村之间。东西两市各占两坊之地。两市的形制相同，平面呈正方形，面积约1平方公里。两市周围均筑有四米厚的夯土墙，每面各开两门，内设16米宽的南北街和东西街各两条，四街交叉成井字形，将市内划分为九区，每区四面临街。市内生产和出售同类货物的店铺分别集中排列在同一区域，叫做行；堆放货物的货栈叫做邸。东、西两市各行各业的店铺临街毗连而设。据《长安志·东市》记载，东市“货财二百二十行，四面立邸，四方珍奇皆所积集。”东市的工商业不仅分门别类，多达二百二十行，而且各行业的经营，亦有相当大的规模。据《唐国史补》记载，当时东、西两市经营饮食业的店铺，三五百人的大筵席可立办而成，可见其经营规模之大。西市较东市更为繁荣，是长安主要工商业区和经济活动中心，故有“金市”之称。其行业和店铺远较东市为多，其中有衣肆、坟典（书籍）肆、药材肆、酒肆、帛肆、鞞警行、绢行、秤行、麸行、肉行、鱼行、金银行、铁行、油靛店、法烛店、煎饼团子店、窦家店、张家楼、波斯邸、寄附铺等，另外还有许多在市内随处叫卖或摆摊设点的小商贩。西市的商业贸易极其兴隆繁盛。例如，有一家小小的药店，尽管店主“日夜剝斫煎煮”，但还是“给之不暇”，“人无远近，皆来取之，门市骈罗，喧阗京国”，以致有人“赀金守门，五七日间，未获给付者”<sup>②</sup>。

规模宏大、生意兴隆的东、西两市不仅吸引着全国各地的富商大贾前来开设店铺<sup>③</sup>，而且在其巨大的经济利益的召唤下，亚、非、欧许多国家和地

<sup>①</sup> 《唐章怀太子墓发掘简报》，载《文物》1972年第7期。

<sup>②</sup> 《太平广记》卷二一九。

<sup>③</sup> 唐著名诗人元稹曾在《佑客乐》中这样描写东、西两市商人招徕顾客的情景：“经游天下遍，却到长安城。城中东西市，闻客次第迎。迎客兼说客，多财为势倾。”



区的商人纷至沓来，尤其是西市，已成为一个国际性的贸易市场，这里有来自中亚、西亚、东南亚、南亚和东亚高句丽、百济、新罗、日本等各国各地区的商人，其中尤以中亚和西亚波斯及大食等国的“胡商”最多，他们大多侨居于西市或西市附近一些坊里，用自己带来的香料、药材等与中国的丝织品、珠宝、瓷器等进行贸易。关于此，将在下文“经济贸易”一节进行论述，这里从略。

再之，在文化交流方面，以长安为代表的唐王朝完备的统治机构、先进的政治经济制度及繁荣的民族文化，像一块巨大的磁铁强而有力地吸引着许多国家的人们前来学习、模仿，长安顿然成为地道的世界文化交流中心。不同国家、不同肤色、不同服饰的文化使节或留学生、僧，以长安为活动舞台，采用不同的方式进行广泛的文化交流。据《唐语林》记载，唐时长安国学六馆有国子馆、太学馆、四门馆、书学馆、律馆、算学馆，国子监领之。外国留学生、僧大多在此学习深造。按《旧唐书》，仅唐文宗开成五年（840）一次回国的新罗留学生即达 105 人之多。当时以长安为中心的国际文化交流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和展开：第一，来到长安的外国文化使节、留学生和学问僧，广泛地学习吸收优秀的唐文化，并力图通过这种途径以达到全面移植中国封建文化的目的。新罗与日本在这方面表现得最为突出。日本的大化革新即以“法式备定”的唐帝国为榜样，其改新政治的主要设计人之一——高向玄理，即是由唐归国的留学生。第二，唐政府在以长安为窗口不断地输出本国优秀的民族文化的同时，又像“长鲸吸百川”似的吸收一切外来文化，这正是唐王朝对外开放政策的具体表现。对于外域文化，无论是物质方面的，还是精神方面的，唐政府多能汲取其精华，兼容并蓄，并加以酿造，以丰富中国文化的内容。唐代长安流行的不同国别的形形色色的服饰、饮食、音乐、舞蹈、游戏等，即从一个侧面证实了这一点。第三，来到长安的外国文化使节、留学生和学问僧在吸收唐文化的过程中，又以长安为基地，同寓居长安的其他国家的人们进行广泛的文化交流。例如，日本人曾在长安向印度人请教梵文，中亚昭武九姓的胡人亦在长安多方了解日本、新罗、林邑、真腊等国的语言文字及生活习惯。

总之，长安已经远远地超出唐朝国都这一特定的时代与历史意义，而以其特有的风姿与宏大的气势跃入世界历史舞台，在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的交往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亚、非、欧各国带有不同特色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在这里交相碰撞，并不时地演奏出一曲曲动人心弦的文化交响

乐。这一切都充分显示出长安这个千年古都举足轻重的国际地位。

## 第五节 使节往来

### 一、东亚

#### (一)

隋初，朝鲜半岛上仍然是高句丽、百济和新罗三国鼎立的局面。隋文帝开皇元年（581年），高句丽、百济即派遣使节来长安赠送地方特产。开皇九年（589年），隋文帝平陈之时，有一战舰遇风漂至百济附庸国耽牟罗（今济州岛），返航经过百济，百济资送甚厚。后每隔数年，百济便遣使至长安聘问通好，隋亦按时遣使报聘。开皇十四年（594年），新罗国王派遣使节来隋赠送地方特产。隋炀帝即位以后，新罗使节来隋更为频繁。

唐王朝建立之初，对朝鲜半岛三国高句丽、百济和新罗均持友好态度。唐高祖武德七年（624年），高祖遣使携天尊像及道士至高句丽，为讲《老子》，王及道俗听者数千人。次年，高句丽王遣使于唐，以求佛、老教法。太宗贞观十七年（643年），高句丽王再次遣使抵达长安探求道教之法，唐太宗遣道士叔达等八人携老子《道德经》往高句丽。

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七月，新罗遣使入唐，“唐高祖亲劳问之”<sup>①</sup>。同年，高祖遣使赴新罗答赉。武德七年，高祖遣使册封新罗王为“柱国乐浪郡公新罗王”<sup>②</sup>，从此以后，唐与新罗建立了密切的外交关系。唐王朝不仅在政治上对新罗给予支持，并在军事上予以援助。而新罗则在政治上依附于唐，每每向唐贡献地方特产，受唐册封。

上已述及，自公元5世纪起，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彼此兼并，互相争夺，其结果是新罗处于西面百济和北面高句丽两面夹攻的险境。武德七年（624），百济又攻占新罗樱岑等六座城池。第二年，新罗遣使至长安向唐政府寻求政治支持与军事援助。武德九年（626），唐遣朱子奢为使，劝说新罗与高句丽联合结好。新罗非但不从，反于贞观三年（629）发兵攻占高句丽之娘臂城，结果遭到高句丽的猛烈还击，连连失守。贞观十五年（641）又遭到百济猛攻，失陷40余城。尤其是从此开始，百济与高句丽合谋攻打新

<sup>①②</sup>《三国史记》新罗本纪。

罗通唐要地党项城，以切断罗、唐通道。在此危急情况下，新罗先遣使高句丽，以图结好，然遭拒绝。贞观十七年（643）。新罗遂派金春秋赴唐告急求援。次年，唐太宗遣使至高句丽，劝其停止攻打新罗，否则，“明年当出师击尔国”<sup>①</sup>，但未征得高句丽同意。随后，唐再次遣使高句丽进行劝说，反遭威胁。贞观十九年（645），唐太宗遂率 10 万大军攻打高句丽，新罗出兵 3 万助攻。此次进攻以失败告终。后太宗又于贞观二十一、二十二年（647、648）两次组织进攻，亦均告失败。

然而，尽管如此，新罗依然把取胜的希望寄托在唐政府的援助上。为了表示对唐忠贞不渝的友好，贞观二十二年新罗使节金春秋将其子文汪留唐宿卫<sup>②</sup>，是为新罗王族弟子入唐宿卫之始。名曰宿卫，实则是人质，亦即质子。高宗永徽二年（651），新罗又遣使节金仁问前来唐都长安宿卫<sup>③</sup>。唐政府回赐新罗以礼物，作为答贲，并向从事宿卫的新罗王族子弟和使节授以官职。后不久，百济又与高句丽联军攻打新罗，先后占据新罗 30 余城。显庆五年（660），唐高宗命苏定方率领 13 万大军在新罗的配合下攻打百济，百济大败。百济灭亡以后，唐在其故土设置五都督府。乾封二年（667），唐又与新罗联合进攻高句丽，未果。同年，唐又派李世勣率军攻打高句丽，唐、罗两军合围高句丽首都平壤，高句丽亡。李世勣俘获高句丽国王和贵族及 20 万民众回唐。唐政府在平壤置安东都护府，任薛仁贵为都护，下辖 9 个都督府、42 个州、100 个县，都督、刺史、县令之职皆由高句丽贵族担任。

从武德四年（621）到乾封三年（668），新罗遣使长安朝贡二十一次，朝见二次，表谢二次，请援五次。唐向新罗册封四次，答贲四次，诏谕一次。在此期间，新罗得力于唐政府的援助，奠定了统一全国的基础。如前所述，唐与新罗联军先后消灭百济、高句丽之后，在两国故地建立唐王朝的统治。而新罗此时旨在扩大自己的统治区域，以最终完成统一大业，遂使唐、罗之间发生冲突，军事联盟日趋瓦解。首先是新罗拒绝与唐朝扶植的百济王子扶余隆结盟和唐为征讨倭国（日本）而要新罗修造战船的要求。同样，唐也不接受新罗提出的归还原高句丽所夺新罗领土的要求。双方关系日益恶化。新罗为达到自己的目的，极力支持百济和高句丽故地人民的反唐斗争。咸亨三年（672），唐军攻打白冰山的高句丽反唐部队，新罗迅即出兵进攻唐军。在此之前不久，新罗已多次进击百济故地的唐军，一连攻克 92 城。

①②③《三国史记》新罗本纪。



图十三 唐乾陵 61 宾王石雕群

此时，唐王朝命薛仁贵致书新罗王，以求和解，重修旧好，但未奏效。终使 15 万唐军被逐出百济故地。接着，唐出动 50 万大军，取海路攻打新罗，然遭失败。无奈，唐军又改由高句丽故地由北路向新罗发动攻势。经过数年激战，唐军败北。仪凤元年（676），唐又派薛仁贵率军由海路进击新罗，又为新罗水军所败。唐政府被迫于是年将安东都护府迁至辽东城。此后两国关系日趋缓和。

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733），渤海王令张文修率军从水路攻打唐之山东登州。唐遣使新罗请其出兵夹攻渤海国。虽则因积雪路险，新罗出兵未能奏效，但却因此极大地改变了唐与新罗的关系。同年冬天，新罗遣使长安奉献金、银、人参等物，唐回赠新罗王一对白鹦鹉及其他宝物。翌年，新罗又遣使贺正，唐玄宗赐宴并授以官职。开元二十三年（735），新罗复遣使金义忠入唐贺正，唐廷将涇江（大同江）以南划归新罗所有<sup>①</sup>。新罗在满足领土要求之后又于次年遣使入唐贺正，表谢唐帝。从此，唐与新罗的外交关系进一步好转。新罗一如既往地唐朝贡，而唐廷也不断地遣使答赉、册封。即就是唐王朝灭亡的前九年，新罗依然遣使向唐帝呈进奏章。而唐也在灭亡的当年，犹遣使前往新罗册封。

<sup>①</sup> 《三国史记》新罗本纪。

总体来说，唐与新罗的政治或军事关系是友好的，尽管有时兵戎相见，但即使在此时，朝贡关系仍断断续续，使节往来也很频繁。兹就公元 621—906 年间唐、罗所遣使分别列表如下<sup>①</sup>：

表 1-3-1

新罗使节赴唐表

公元	朝贡	朝见	贺正	表谢	献物	献女	请援	告捷	谢罪	请文	告哀	贺平乱	使节
621	1												
623	1												
625	1												
626	1												金忠信
627	1												
627	1												
629	1												
631						1							
632	1												
633	1												
639	1												
642	1												
642							1						
643	1						1						
643							1						
644	1												
645	1												
647				1									
648	1												

<sup>①</sup> 杨昭全：《中朝关系史论文集》，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8 年版。











续表五

公元	朝贡	朝见	贺正	表谢	献物	献女	请援	告捷	谢罪	请文	告哀	贺平乱	使节
836				1									金义琮
839		1											
862					1								
869				1									金胤
876					1								
878		1											
885												1	
893			1										金处海
897			(奏章)										
共计	53	8	22	6	24	3	5	1	1	1	1	1	

表 1-3-2

唐使节赴新罗表

公元	册封	答贡	吊祭	诏谕	求物	求制武器	求援	使节
621		1						庾文素
624	1							
626				1				
635	1							
647			1					
654			1					张文收
654	1							
661			1					
662	1							
665			1					

续表一

公元	册封	答贲	吊祭	诏谕	求物	求制 武器	求援	使 节
669					1			信惠
669						1		
681	1							
692				1				
702			1					
702			1					
712				1				
713	1							
738			1					邢琚
740	1							
742			1					魏曜
768	1							归崇敬
785	1							盖坝
800			1					韦丹
805	1							
809	1							
819							1	
827			1					
841	1							
865	1							
874				1				
878	1							
885				1				
906	1							
共计	15	1	10	5	1	1	1	

## (二)

隋唐时期与日本交往频繁，兹分为：日本四次遣隋使、日本十八次遣唐使、日本使节在长安、唐王朝遣使日本四个方面如下。

### 1

日本4次遣隋使。公元592年（隋文帝开皇十二年），日本（倭国）推古女皇即位，圣德太子摄政，改变了前几代倭王不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做法，开始向隋派遣使节，建立两国间的友好关系。从公元600年至614年，圣德太子四次派遣使节到长安。

开皇二十年（600），圣德太子首次向隋帝国派遣使节，进行外交联系：

开皇二十年，倭王姓阿每，字多利思比孤，号阿鞞鸡弥，遣使诣阙。<sup>①</sup>

隋文帝对大约一百年未曾到中国朝贡的倭国颇感兴趣，特令隋吏前去倭国使节所住之处了解倭国情况。隋吏回来后禀告说：“倭王以天为兄，以日为弟，天未明时听政，踟蹰坐，日出便停止理务，云：倭（委）我弟。”<sup>②</sup>文帝听后认为这种做法毫无道理，竟然“训令改之”。

与此同时，倭国使节在长安了解到隋王朝正在着力提倡佛教，这与倭国的崇佛政策相吻合。倭使回国后立即向圣德太子汇报了这一情况。圣德太子决定再次遣使入隋，以寻求佛法发展两国关系。遂于隋炀帝大业三年（607），派遣大礼小野妹子 and 通事鞍作福利携带倭王国书前往隋都长安，向隋炀帝呈交倭王国书并献上地方特产。《隋书·倭国传》记载说，小野妹子一行对隋官吏说：“闻海西菩萨天子重兴佛法，故遣朝拜，兼沙门数千人（是为数十人之误，《北史》即作数十人）来学佛法。”据此，则寻求佛法是小野妹子一行抵达长安的目的，实际上还在于更广泛地学习和吸收中国文化。日《经籍后传记》对小野妹子一行的目的有过说明：

以小治田（即推古帝）朝十二年，岁次甲子正月朔，始用历日。是

时国家书籍未多，爰遣小野臣因高于隋国，买求书籍，兼聘天子。<sup>③</sup>

《驭戎慨言》中所记的一段话有助于人们理解这一点：

及至圣德太子听政时，所遣多为求佛法之使节。而自昔韩国之人，

<sup>①②</sup> 《隋书·倭国传》。

<sup>③</sup> 见瑞溪周凤：《善邻国宝记》。

来者甚多，得亲侍太子。太子既闻其经常赞扬大唐为可钦美之国，并阅读汉文精湛典籍，便思设法与之通好，万事悉欲仿效之心，与日俱增。<sup>①</sup>

隋炀帝对这次倭使人朝深感满意。因为这正符合他通过外国朝贡以张扬国威、显示自我业绩的好大喜功的心理。然而，当炀帝看到倭王国书上写道：“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sup>②</sup>的字样时，内心表示不满，他认为倭王不持臣礼而持同等国君之礼，是为不敬。为此，他生气地说，蛮夷的国书极其无礼，以后不再理睬。但另一方面，他又不愿意失去这一显示自己业绩的机会，所以尽管内心不悦，但还是命鸿胪卿热情接待倭国使者，并且决定派遣文林郎裴世清作为回复使节，随小野妹子出使倭国，回访倭王。

隋大业四年（608）初，小野妹子一行完成使命回国，裴世清一同赴倭回访。他们于同年四月到达九州。倭王得知隋使和小野妹子同时抵达的消息时，立即派负责航海及对外事务的大礼吉士雄成前去九州迎接。倭王为了隆重接待隋使，特意在难波（今大阪）城高丽馆舍之上修筑新馆。《日本书纪》对此记载说：

即大唐使人裴世清，下客十二人，从妹子臣至于筑紫；遣难波吉士雄成召大唐客裴世清等。为唐客更造新馆于难波高丽馆之上。

裴世清一行在筑紫（北九州）等到六月，新馆落成。六月十五日倭王派中臣宫地连乌麻吕、大河内直糠手、船史王平等入陪伴隋使，用三十艘彩船迎裴世清等至难波新馆。据《隋书·倭国传》记载，抵达难波时，“倭王遣小德阿辈台，从数百人，设仪仗，鸣角鼓来迎。”在难波新馆休息后，启程赴倭都，“既至彼都，其王与清相见，大悦，曰：‘我闻海西有大隋，礼义之国，故遣朝贡。我夷人僻在海隅，不闻礼义，是以稽留境内，不即相见。今故清道、饰馆以待大使，冀闻大国维新之化。’”裴世清回答说：“皇帝德并二仪，泽流四海，以王慕化，故遣行人来此宣谕。”随即呈上炀帝的国书。据《日本书纪》记载，炀帝国书的内容如下：

皇帝问倭王。使人长吏大礼苏因高（小野妹子的音译）等至具怀。朕亲承宝命，临御区宇，思弘德化，覃被含灵，爱育之情，无隔遐迹。知王介居海表，抚宁民庶，境内安乐，风俗融和，深气至诚，远修朝

<sup>①</sup> 见〔日〕木宫泰彦著、胡锡年译：《日中文化交流史》，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53页。

<sup>②</sup> 《隋书·倭国传》。

贡，丹款之美，朕有嘉焉。稍暄比如常也，故遣鸿胪寺掌客裴世清等，指宣往意，并送物如别。<sup>①</sup>

与炀帝看到倭王国书一样，圣德太子看到这份国书很不愉快，他“恶其黜天子之号为倭王”，对炀帝不以君王之礼平等相待表示不满，于是“不赏其使”<sup>②</sup>。然而，即使这样，圣德太子并不因为国书中的礼节问题而使两国间业已存在的友好关系受到影响。当裴世清完成使命时，倭王于九月五日举行欢送裴世清宴会，十一日裴世清启程回国，由小野妹子等人组成的护送使节团同行，于年底抵达长安。小野妹子向隋政权呈交倭王国书。圣德太子鉴于炀帝对上次国书中“日出”、“日没”字样不满，遂改称东皇帝敬曰西皇帝。

经过更改后的国书的内容如下：

东皇帝敬白西皇帝，使人鸿胪寺掌客裴世清等至，久忆方解。秋季薄冷，尊候如何？想清念，此即如常。今遣大礼苏因高（小野妹子的音译）、大礼乎那利等往，谨白不具。<sup>③</sup>

国书不卑不亢，对隋坚持对等态度。不过，鸿胪卿鉴于炀帝“蛮夷书如有无礼者，勿复以闻”<sup>④</sup>的旨意，没有送给炀帝阅读。

小野妹子在长安安置好留学生和学问僧之后，作了长达半年的考察，于大业五年（609）九月回国。是为日本第三次遣隋使。

隋大业十年（614），倭王又遣犬上御因楸、矢田部造使隋，同行的还有学问僧慧光、灵云等人。他们于第二年七月返回倭国。这是第四次遣隋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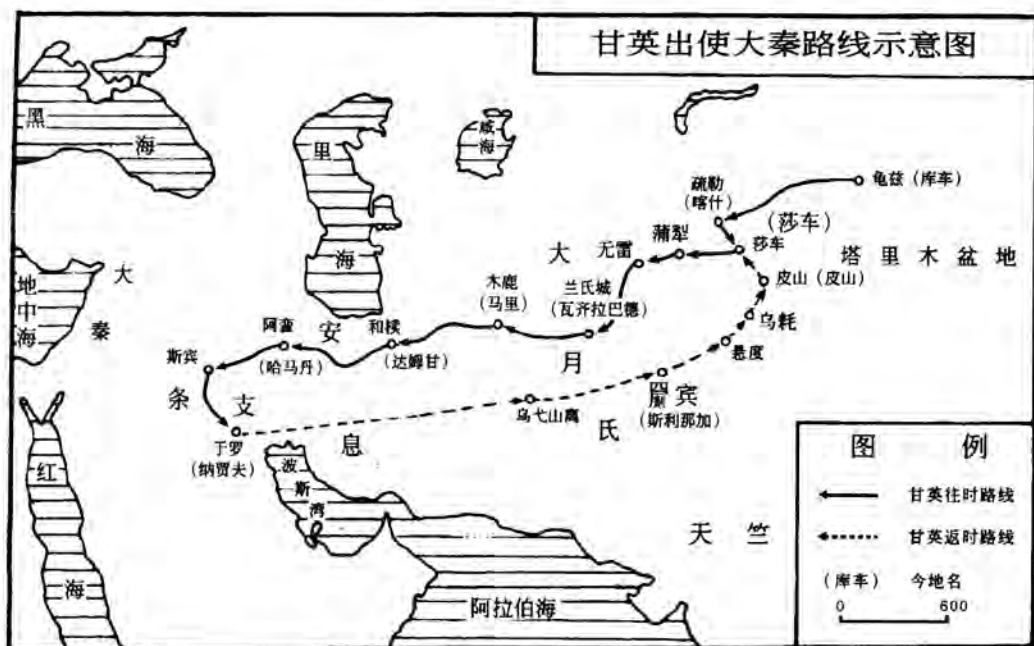
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倭使四至隋都长安，广泛地考察和了解隋的政治、经济及文化状况。尤其是那些随倭使前来长安的留学生和学问僧，他们在长安留学时间很长，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技术、医药、艺术及政府机构的设置、法制律令的颁布诸方面多所学习，从而为倭国广泛地输入中国文化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更为重要的是，圣德太子通过多次向隋遣使，加强与隋王朝的联系，有力地推进了日本的政治改革。比如，他通过使节和留学生及学问僧吸取中国儒、法、墨诸家及佛教思想，然后根据日本当时的实际需要，制定了《十七条宪法》。其中很大程度上贯穿着中国儒家君、臣、父、子等级观念和法家“名分使群”的思想。比如该宪法明确提出“君则天

① 《日本书纪》推古十六年八月条。

② 《经籍后传记》，转引自饭田武卿：《日本书纪通释》，日文本，卷五十三，第2975页。

③ 《日本书纪》推古十六年九月条。

④ 《隋书·倭国传》。



图十四 甘英出使大秦路线示意图

之，臣则地之”。总之，圣德太子从日本政治改革的需要出发加强与隋的联系，促使中日关系进入了新的阶段。

日隋间的航海路线，大体上是从难波津（今大阪附近）出发，至九州博多津，再经壹岐、对马岛北上航行至百济、高句丽沿岸，然后横渡黄海抵达山东半岛的登州，由此登陆，经莱州、青州、兖州、曹州至汴梁，再沿黄河南岸经洛阳到达长安。

## 2

日本 18 次遣唐使。公元 7 世纪初，唐王朝建立以后，太宗李世民鉴于隋炀帝丧国辱身的历史事实，记取“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教训，在实行一些顺应人心的政策的同时，对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诸方面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使社会生产得以较快地恢复与发展，并出现了“贞观之治”。可以说，从唐高祖到唐玄宗天宝年间，大约一百三四十一年，唐帝国社会安定，经济繁荣，呈现出一派兴旺发达的景象。而长安作为唐帝国的首都，成为当时东亚文明的中心，如同一个强大的光源，不断地向四周放射着巨大的能量，吸引着更多邻近国家和民族遣使朝贡，从而使唐朝的对外交往达到全盛时期。

也就在这个时候，日本由飞鸟时代经过大化革新而进入奈良时代，社会的变更与发展，要求日本当时统治者能够进一步直接地从中国吸取先进的政治制度、生产技能及文化知识，以适应时代进步的需要。

遣唐使在《日本书纪》中叫“遣大唐大使”<sup>①</sup>或“西海使”<sup>②</sup>，而在《万叶集》中又称“入唐使”<sup>③</sup>，直到《续日本纪》才正式称做“遣唐使”<sup>④</sup>。唐帝国方面则称遣唐使为“朝贡使”。

据《日本书纪》推古天皇三十一年（唐武德六年，公元623年）七月条下记载，自唐回国的留学生福因，学问僧慧济、惠光，药师惠日等人上奏朝廷说：“大唐国者，法式备定，珍国也，常须达。”<sup>⑤</sup>并建议把已经学成的留学生和学问僧召回，使他们在国内政治和经济生活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实现以“大唐国为蓝本来建立‘法式备定’的天皇制国家”的理想<sup>⑥</sup>。朝廷接受这一建议，经过一系列准备，终于在七年之后的舒明天皇二年（唐贞观四年，公元630年）正式向唐朝派出遣唐使。据《册府元龟》卷九七〇《外臣部·朝贡三》记载，这一次遣唐使抵达长安是贞观五年。此后，到唐乾宁元年（894）最后一次任命遣唐使，前后长达264年之久。在此期间，日本共任命遣唐使十八次<sup>⑦</sup>，其中有三次未能成行（第十二、十三、十八次），又有一次是“迎入唐使”（第十次）和一次“送唐客使”（第十五次）。所以真正到达唐都长安的只有十三次。中日学者对遣唐使论考甚详，兹参考王立达<sup>⑧</sup>、宋锡民、宋百川<sup>⑨</sup>、武安隆<sup>⑩</sup>、姚嶂剑<sup>⑪</sup>和日本学者木宫泰彦<sup>⑫</sup>等人的研究成果，整理编制简表如下：

① 《日本书纪》白雉四年五月条。

② 《日本书纪》白雉五年七月条。

③ 《万叶集》八、九、十九卷。

④ 《续日本纪》养老元年二月壬申条。

⑤ 《日本书纪》推古天皇三十一年条。

⑥ 井上清：《日本历史》上，第61页。

⑦ 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作十九次，则是把公元667年日本派伊吉博德等送回唐驻百济镇将刘仁愿的使者法聪算做一次。其实这次为送客派遣的使者并未入唐，只到百济。所以不应列入遣唐使之中。

⑧ 王立达：《七至九世纪日本“遣隋使”、“遣唐使”的派遣经过及其影响》，载《新史学》1956年11月。

⑨ 宋锡民、宋百川：《日本遣唐使小考》，载《文史哲》1980年第3期。

⑩ 武安隆：《遣唐使》，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3月版。

⑪ 姚嶂剑：《遣唐使》，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3月版。

⑫ 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商务印书馆1980年4月版。



表 1-3-3

日本遣唐使表

次数	主要使者	人数	船数	赴唐		回日		备考
				时间	航路	时间	航路	
1	犬上三田耜 药师惠日	不详	不详	公元 630 年 8 月 (日舒明二年、唐贞观四年)	北路 ?	公元 632 年 8 月 (日舒明四年、唐贞观六年)	北路	唐使高表仁同航赴日
2	甲组 大使： 吉田长丹 副使： 吉士驹	121	1	公元 653 年 5 月 (日白雉四年，唐永徽四年)	北路 ?	公元 654 年 7 月 (日白雉五年，唐永徽五年)	北路	有留学生和学问僧十四人随行
	乙组 大使： 高田根磨 副使： 扫守小磨							
3	押使： 高向玄理 大使： 河边麻吕 副使 药师惠日	不详	2	公元 654 年 2 月 (日白雉五年，唐永徽五年)	北路	公元 655 年 8 月 (日齐明元年，唐永徽六年)	北路 ?	押使高向玄理卒于唐。
4	大使： 坂合部石布 副使： 津守吉祥	不详	2	公元 659 年 7 月 (日齐明五年，唐显庆四年)	北路	公元 661 年 5 月 (日齐明七年，唐元朔元年)	北路	入唐途中第一船(大使船)漂至海南岛时，船上的使节多为岛人所杀，仅剩东汉阿利麻等五人到唐。第二船(副使船)因谗言被唐囚禁于长安达十个月。

续表一

次数	主要使者	人数	船数	赴唐		回日		备考
				时间	航路	时间	航路	
5	大使： 守大石 副使： 坂合部石积	不详	不详	公元 665 年（日天智四年，唐麟德二年）	北路	公元 667 年（日天智六年，唐乾封二年）	北路	为送唐使刘德高而派遣。唐百济镇将刘仁愿派司马法聪等人送日使节归日。
6	大使： 河内鲸	不详	不详	公元 669 年（日天智八年，唐总章二年）	北路	不详	北路？	《册府元龟·朝贡三》记载：“总章二年十一月，倭国并遣使献方物。”
7	执节使： 粟田真人 大使： 坂合部大分 副使： 巨势邑治	不详	不详	公元 702 年 6 月（日大宝二年，唐长安二年）	南岛路	公元 704 年 7 月（日庆云元年，唐长安四年）	南岛路？	副使巨势邑治于公元 707 年回国。
8	押使： 多治比县守 大使： 大半山守 副使： 藤原马养	557	4	公元 717 年（日养老元年，唐开元五年）	南岛路？	公元 718 年（日养老二年，唐开元六年）	南岛路？	阿倍仲麻吕、吉备真备、玄昉、大和长冈等随行赴唐。第七次遣唐使坂合部大分随行回国。
9	大使： 多治比广成 副使： 中臣名代	594	4	公元 733 年（日天平五年，唐开元二十一年）	南岛路？	公元 734、736 年（日天平六、八年，唐开元二十二、二十四年）	南岛路	第一船漂至越州上岸，不久回国。第二船漂至南海，仅副使中臣名代回至长安。第三船漂至林邑国。第四船中途遇难。唐人皇甫东朝、唐僧袁晋卿等随行赴日。吉备真备、玄昉、大和长冈等回日。

续表二

次数	主要使者	人数	船数	赴唐		回日		备考
				时间	航路	时间	航路	
10	大使： 藤原清河 副使： 大伴古麻吕 吉备真备	一、四船人数不详，二、三船为200余人	4	公元752年3月 (日天平胜宝四年，唐天宝十一年)	南岛路	公元753年12月至754年1月 (日天平胜宝五、六年，唐天宝十二、十三年)	南岛路	回国时第一船漂流至安南，大使藤原清河回唐入仕。 第二船于公元754年归日，鉴真及其弟子普照随船赴日。 第三、四船753年归日。
11	迎入唐大使： 高元度	99	1	公元759年2月 (日天平宝字三年，唐乾元二年)	渤海路	公元761年8月 (日天平宝字五年，唐上元二年)	渤海路？	为迎接前遣唐使藤原清河而派遣，未达到目的。唐派遣沈惟岳等送日使高元度等十一人回国。
12	大使： 仲石伴 副使： 石上宅嗣 藤原田麻吕	不详	4	公元761年10月 (日天平宝字五年，唐上元二年)				为向唐运送制弓材料牛角和送唐使沈惟岳等而派遣。启程至难波遇大风，毁一船，故未成行。
13	送唐客大使： 中臣鹰主 副使： 高丽广山	不详	2	公元762年7月 (日天平宝字六年，唐宝应元年)				为送唐使沈惟岳等而派遣。任命后，因不得便风而未成行。

续表三

次数	主要使者	人数	船数	赴唐		回日		备考
				时间	航路	时间	航路	
14	大使： （佐伯今毛人） 副使： 小野石根 大神未足	不详	4	公元 777 年 6 月 （日宝龟八年，唐大历十二年）	南路	公元 778 年（日宝龟九年，唐大历十三年）	南路	临近启航，大使佐伯今毛人称病未行，天皇命副使小野石根行大使事。《册府元龟·朝贡五》记载，日本使节于大历十三年正月抵达长安。唐使孙兴进回访日本。归途中第一船遇难，小野石根及唐使赵宝英溺水而死。
15	送唐客大使： 布势清直	不详	2	公元 779 年 5 月 （日宝龟十年，唐大历十四年）	南路？	公元 781 年 6 月 （日宝应元年，唐建中二年）	南路	为送唐使孙兴进等派遣。《册府元龟·朝贡五》和《旧唐书·代宗上》俱云建中元年二月抵长安。
16	大使： 藤原葛野麻吕 副使： 石川道益	不详	4	公元 804 年 7 月 （日延历二十三年，唐贞元二十年）	南路	公元 805 年 6 月 （日延历二十四年，唐贞元二十一年）	南路	第三船出发途中于松浦郡庇良岛海面遇难。橘逸势、空海、最澄等随行人唐。石川道益卒于唐。

续表四

次数	主要使者	人数	船数	赴唐		回日		备考
				时间	航路	时间	航路	
17	大使： 藤原常嗣 副使： 小野篁	651 (第三船 载140 人未发)	4	公元838年7月 (日承和五年，唐 开成三年)	南路	公元839、840年 (日承和六、七年， 唐开成四、五年)	北路	第三船出发时遇难未入唐。第一船返回日本途中沿新罗南于839年陆续归国。第二船漂至南海，于840年归国。
18	大使： 菅原道真 副使： 纪长谷雄			公元894年8月 (日宽平六年，唐 乾宁元年)				这次遣唐使任命后，留唐日僧中瓊报告唐国内丧乱，菅原道真奏请中止。遣唐使活动至此终结。

按中国文献典籍，除上述十八次遣唐使外，尚有龙朔三年（663）<sup>①</sup>、咸亨元年（670）<sup>②</sup>、神龙二年（706）<sup>③</sup>、景云二年（711）<sup>④</sup>、天宝十四年（755）<sup>⑤</sup>、大中二年（848）<sup>⑥</sup>、大中七年（853）<sup>⑦</sup>等七次。这七次日本友人入唐朝贡，之所以没有被列入公认的遣唐使之中，主要是因为他们不是日本官方正式派出的遣唐使。不过，他们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日友好的发展，正是因为这一点，均被载入史册。

从上表可见，第一至第四次遣唐使的特点首先是规模小，最多也只有两船，人数未超过250人。其次组织并无定规，不像后来各次那样组织严密。

① 《新唐书·日本传》：“天智立。明年，使者与虾蟭人偕朝。”日本天智天皇立于公元662年，“明年”当为公元663年，即唐龙朔三年。

② 《新唐书·日本传》：“咸亨元年，遣使贺平高丽。”

③ 《册府元龟·外臣部·朝贡三》：“（中宗神龙二年二月）日本国遣使来朝。”

④ 《册府元龟·外臣部·褒异一》：“（景云二年）十月丁卯，日本国遣使朝贡。”

⑤ 《册府元龟·外臣部·朝贡四》：“天宝十四载六月，日本国遣使朝贡。”

⑥ 《旧唐书·宣宗纪》：“（大中二年三月）日本国王子入朝献方物。”

⑦ 《册府元龟·外臣部·朝贡五》：“（大中七年四月）日本国遣王子来朝，献宝器、音乐。”

再次，航路大致和遣隋使相同，即多走北路，一般是由朝鲜半岛西岸北上，再沿辽东半岛东岸横渡渤海湾口，然后在山东半岛登陆。第五、六两次的规模与航线和前四次相比没有多大差别，但其不同于一般的遣唐使，具有十分重要的政治意义。唐龙朔三年（663）八月，唐日在朝鲜半岛进行战争（即白江口唐倭军海战），日本战败，迅即撤军。正当日本积极整顿防务，严防新罗与唐朝进犯的时候，唐方使者郭务惊和刘德高相继赴日访问。第五次遣唐使即为送刘德高而遣。第六次遣唐使是为祝贺唐军灭高句丽<sup>①</sup>。由此可见，五、六两次遣唐使的目的在于从事外交活动，旨在缝合因白江口之战而造成的唐日关系上的裂痕。

第七至第十三次遣唐使显然具有两个方面的特点：一是较前组织确定，规模扩大，阵容整齐，可以说是遣唐使的最盛时期。二是航路也和以前不同，多取道南路。第十四至第十八次遣唐使的组织 and 规模略同于第七至第十三次，或者有所超过，航线仍走南路。表面看来盛大壮观，但实际上已是强弩之末，进入衰落时期。就唐帝国来说，正是“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宦官专权，人民颠沛流离，加之回纥、吐蕃、南诏相继入侵，大唐国势江河日下，文风逐渐衰颓，丧失了往昔在国际上对邻国或异族所具有的那种强大的吸引力。就日本而言，凡可汲取的唐朝文化已大致汲取，这也就是说，大化革新后急需的一整套封建文化制度已大体输入完毕，此时正是咀嚼、消化的时刻。因而，像以前遣唐使那样意气风发地出没波涛之中以追求大唐文化的热情和锐气已不复存在，而只是作为祖传成规完成任务而已。与此相应，“遣唐使”的头衔每每使贵族们望而生畏，惟恐避之不远。所以遣唐使任命以后，一再中止、改变，留学生和学问僧的留学时间也很短，一般为一、二年，很少有超过五年的，他们来去匆匆，“慕华不肯去者”甚少。

“遣唐使”是“遣隋使”的延续和升级，不惟次数频繁，而且组织日趋严密，编制日臻完备。就遣唐使团每个人的具体职责来说，可区分为三种情况：

第一，高级使节，其中又可分为“大使”、“副使”、“判官”、“录事”四等。使团长官在一般情况下是大使，但有时还在大使之上设“押使”或“执节使”为最高长官。通常是大使、副使各任命一人（有时副使为二人），判官四人，录事四人。这些人作为遣唐使团中的正式使臣，日本朝廷对他们的

<sup>①</sup> 见《新唐书·日本传》。

选派是十分重视的。他们要么是日本著名的政治家，要么是精通中国经史、娴熟唐代典制的汉学家。尤其是大使、副使的选任更为严格，每次任命的正使都是朝廷四位品以上的官员；副使为五位品以上的官员。他们不仅要具有一定的外交才能，而且还须有堂皇的仪表和优雅的风度以及有关中国的知识、礼仪方面的较深修养。正因此，抵达长安的“遣唐使”一般都受到唐朝的褒扬。比如《旧唐书·东夷传》在评价第七次遣唐使“执节使”粟田真人时说：“朝臣真人者，犹中国户部尚书。冠进德冠，其顶为花，分而四散。身服紫袍，以帛为腰带。真人好读经史，解属文，容止温雅。”特别是第十次遣唐大使藤原清河更受到唐玄宗的赞誉：“闻日本国有贤君，今见使者趋揖自异，礼义国之称，洵不诬也。”<sup>①</sup>正是这位藤原清河，后来长期仕唐，地位显赫。

第二，一般成员，其中有留学生、学问僧和那些“乐师”、“画师”、“玉生”、“铸生”、“细工生”、“史生”等。留学生大多由贵族子弟中挑选，学问僧多来自僧侣中的知名者。至于“乐师”、“画师”等则来自于日本各行各业，他们基本上都有一技之长。这些作为遣唐使团中的一般成员，是遣唐使中文化交流的中坚力量。

第三，随行人员，包括“船师”、“水手”（负责航海）、“射手”（负责旅途安全）、“知乘船事”、“造船都匠”（负责维修船只）、“医师”（负责保健）、“主神”、“阴阳师”（祈祷保佑）等。他们是遣唐使团中必不可少的基本成员。

日本朝廷不仅极为认真、慎重地任命大使、副使等各级官员和随员，而且对使节出航的仪礼也是十分隆重的，天皇往往设宴相送，并授节刀（意味着给予大使指挥全团的职权，对于判官以下的全团成员有生杀予夺之权），多加勉励。据《续日本书纪》宝龟七年四月壬申条记载，光仁天皇宝龟七年勉励第十四次遣唐使说：“卿等奉使，言语必和，礼义心笃，毋生嫌隙，毋为诡激。”有时还赋歌相送。如第十次遣唐使藤原清河出发时，孝谦天皇赋和歌相送。歌词曰：“唯我大和国兮，渡海如平地，乘船如坐床。大神镇国兮，四船紧相连，不日平安而归航。归航共庆贺兮，举杯同相饮，丰美之酒浆。”相应，遣唐使完成使命回国后，立即驰驿上奏，随即上京，举行隆重的还节刀仪式，由大使奉还节刀。为表示对他们的慰劳，赐予布匹、绢帛等

<sup>①</sup> 《延历僧录》，转引自《日本高生传要文抄》卷三。

物，还要给出使人员加官晋级。对那些在海上遇难和不幸病逝唐土的遣唐使及其随员，朝廷追赐其职位，照管其家属。

被任命的遣唐使在举行完告别仪式之后，便离开京城前往难波三津浦（今大阪市南区三津寺町，是遣唐使船的启航港口），由此乘船经濑户内海、关门海峡到筑紫的大津浦靠岸。大津浦亦名娜大津，又称博多大津，即现在的博多。此港口是当时日本对外往来的门户，太宰府的外交机构筑紫馆即设于这里。凡是开往外国的船舶，包括遣唐使船在内，都须在这里停泊。

自日本人唐究竟有几条航路，迄今尚无定论，综括起来，主要有两条说<sup>①</sup>、三条说<sup>②</sup>、四条说<sup>③</sup>、五条说<sup>④</sup>四种说法，不过，一般认为应是如下四条路线：

**北路：**由难波经濑户内海向西，从大津浦绕过朝鲜半岛，再经由辽东半岛或山东半岛登陆，转道长安。初期遣唐使所走的道路，实际上就是遣隋使所走的航路，亦即这条北路。《隋书·倭国传》记载说：

上遣文林郎裴世清使于倭国（乘日使小野妹子回国船）。度百济、行至竹岛，南望聘罗国（济州岛），经都斯麻国（对马），迥在大海中。又东至一支国（壹岐），又至竹斯国（筑紫），又东至秦王国，达于海岸。自竹斯国以东，皆附于倭。

显然，这是遣隋使返航路线中百济至难波的一段。将这段航线逆转过来，便是难波——筑紫——壹岐——对马——济州岛——竹岛——朝鲜半岛。然后一条路线是沿朝鲜半岛西岸航行横渡黄海在渤海湾口的登州或直接进入渤海湾在莱州（今山东掖县）登陆。另一条路线是沿朝鲜半岛西岸北上，经鸭绿江口至辽东半岛西南端，再折而南行横渡渤海湾口穿过庙岛群岛，到达登州。由登州或莱州进入长安的具体路线是：登州或莱州——青州——兖州——曹州——汴州——洛阳——长安。据《日本书纪》白雉五年二月条记载，当时日本称此线为“新罗道”。第三次遣唐使（654）即循此道抵达长安。这条北路是自汉和三国以来中日交通的早期航线。航期长，但较为安全。早期遣唐使的航海技术较低，所以多走这条航路。

**南岛路：**从大津浦出发，经九州岛西岸南下，从萨摩国沿岸南下，循多

① 王辑五：《中国日本交通史》、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辻善之助《日中文化交流》。

② 藤家礼之助《日中交流两千年》、中村新太郎《日中两千年》。

③ 江上波夫《遣唐使时代的日本与中国》等。

④ 森克己《遣唐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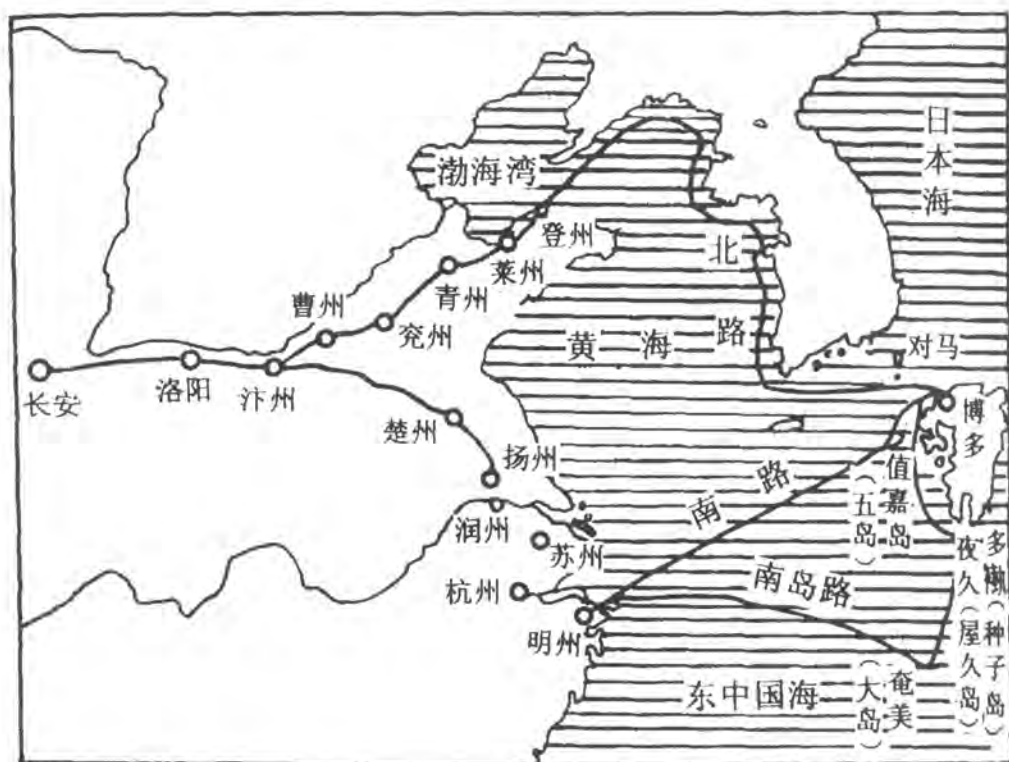
祢（今种子岛）、益救岛（今屋久岛）、奄美大岛、阿尔奈波岛（今冲绳）等岛南行，横渡东海，至长江下游的浙江明州（宁波）或江苏扬州登陆，然后再通过邗沟、通济渠到汴州，进而西达长安。唐天宝十二载（753），鉴真及其弟子即随第十次遣唐使经由南岛路抵达日本。《唐大和上东征传》记述路途经过说：

十五日壬子，四舟同发。有一雉飞第一舟前，仍下砫留。十六日发，廿一日戊午，第一、二两舟同到阿儿奈波岛（今冲绳岛），在多祢岛（今种子岛）西南；第三舟昨夜已泊同处。十二月六日，南风起，第一舟着石不动，第二舟发向多祢去。七日，至益救岛（屋久岛）。十八日，自益救发。十九日，风雨大发，不知四方。午时，浪上见山顶。廿日乙酉午时，第二舟著萨摩国阿多郡秋妻屋浦（今鹿儿岛川边郡秋目）。廿六日辛卯，延庆师引和上入（太）宰府。<sup>①</sup>

南岛路逐岛遥遥南下，极费时日，而且所经海面变幻莫测，极不安全，遣唐使的船队几乎每次都有遭遇鲸波而沉没海底的危险。循南岛路安全往返的遣唐使只有唐开元五年（717）的一次。中期以后的遣唐使之所以舍弃较为安全的北路不走而取道南岛路，主要是由于公元7世纪中叶以后，朝鲜半岛的局势发生变化，循旧有的北路往唐已不可能。早在新罗统一朝鲜半岛之时，就因日本派兵干涉而使双方发生战争。尔后两国关系恶化。同时，新罗对日本与唐的往来非但不像以前那样提供方便，反而故意设置障碍。《新唐书·日本传》对此作过很好的说明：“新罗梗海道，更繇（由）明、越州（今浙江宁波、绍兴）朝贡。”可见遣唐使改道是因为新罗阻塞原来的通道所致。

**南路：**此路亦称大洋路，从天津浦出发，抵达平户或九州西北的值嘉岛（今五岛列岛）停泊，以等待顺风，然后向西横渡东中国海，到达长江口或杭州湾附近，在楚州（即淮安府）、扬州、明州等地登陆。此航线的最大优点是距离近、费时短。如第十四次遣唐使从日本出发，只用了10天时间就到达扬州海陵县。这条航线不仅在海上里程较短，而且登陆后赴长安的里程也远比北路短。据统计，自长江口一带到长安的距离约为二千七八百里，而北路的登陆地点登州距长安约三千一百多里。尤其是由长江口岸前往长安，还可利用运河水行至汴州，交通比北路陆行方便得多。正因此，南路航线长期为后代日本人所沿用。

<sup>①</sup> 真人元开：《唐大和上东征传》，中华书局汪向荣校注本，第91页。



图十五 遣唐使航路图

**渤海路：**穿过日本海，到达渤海国，然后转道长安。渤海国是唐代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政权。当时渤海是唐帝国的一个州。渤海路主要是渤海国与日本进行贸易而开辟的。由渤海进入长安有两条路线：一是从东京龙原府到中京显德府，再经燕、营、汴诸州和洛阳到达长安。一是自东京龙原府至中京显德府后，经西京鸭绿府，由水路抵达登州，再经莱、青、曹、兖、汴诸州到洛阳，然后西至长安。日本多次利用渤海路与唐交通。例如，公元759年为迎回滞唐未归的遣唐大使藤原清河，日本政府派遣迎入唐大使高元度等99人，乘坐回归的渤海使团船到达渤海，然后渤海国王派人护送他们至长安。

遣唐使在往返途中多次遭遇风涛而颠覆漂流，而唐政府对此甚为关注。例如，第九次遣唐使于唐开元二十一年（733）入唐，在回国途中遭遇风暴，第一船漂至越州上岸，不久回国。第二船漂至南海，仅副使中臣名代回至长安。第四船中途遇难。第三船漂至林邑国，船上150人或死或被当地人所杀，仅判官平群广成等四人幸免于难。

唐玄宗闻知，立即下诏林邑国王，不得伤害日本使者，并令丞相张九龄

作《敕日本国王书》，将上述情况告诉日本天皇。国书云：

敕日本国王：王明乐美御德，彼礼义之国，神灵所扶，沧溟往来，未尝为患，不知去岁，何负幽明？丹墀真人、广成等入朝东归，初出江口，云雾斗暗，所向迷方，俄遭恶风，诸船飘荡，其后一船在越州界，即真人广成，寻已发归，计当至国。一船漂入南海，即朝臣名代，艰虞备至，性命仅存，名代未发之间，又得广州表奏，朝臣广成等漂至林邑国，既在异国，言语不通，并被劫掠，或杀或卖，言念灾患，所不忍闻。然则林邑诸国，比常朝贡，朕已敕安南都护，令宣教告示，见在者令其送来。待至之日，当存抚发遣。又一船不知所在，永用疚怀，或已达彼蕃，有来人可具奏。此等灾变，良不可测，卿等忠信，则尔何负神明而使彼行人罹其凶害。想卿闻此，当用惊嗟。然天壤悠悠，各有命也。中冬甚寒，卿及百姓，并平安好？令朝臣名代还，一一口具，遣书指不多及。<sup>①</sup>

唐代陕西与日本交往频繁，惟有这次国书保存下来。开元二十四年(736)，中臣名代回国，将玄宗国书呈交天皇。

### 3

日本使节在长安。遣唐使不仅凭“始至之州”所发“边牒”享受在华期间住宿和交通诸方面的免费待遇，而且还受到鸿胪寺典客署的优惠接待。诸如“司仪加等”，必然是“位在王侯之先”，而“掌次改观”，又“不居蛮夷之邸”。诚如《性灵集》卷五《为大使与福州观察使书》所云：“待以上客，对龙颜而承纶音，频邀佳问荣宠。”也正像《伊吉博德书》所说：“所朝诸蕃之中，倭最胜。”公元8至9世纪，凡是来到长安的遣唐使，均受到唐政府的每人每年赠绢五匹的特别优待。

遣唐使到达长安后，首先在长安郊外的长乐驿下榻，然后由朝廷内使率马迎接，并携带酒脯宣慰。接着遣唐使一行骑上牵来之马进入长安城，安置于外宅<sup>②</sup>，每日由朝廷特设的监使负责接待。随后，遣唐使向朝廷进献礼物和其他贡品。唐天子随即诏令嘉奖朝贡。遣唐使先在宣政殿或宣化殿举行遥

<sup>①</sup> 见《文苑英华》卷四七一、《唐丞相曲江张先生文集》卷七。

<sup>②</sup> 外宅之名散见于《续日本纪》和《后日本纪》但语焉不详。据《唐六典》卷十八记载：隋炀帝时，在建国门外设四方馆，以接待四方使节。唐代亦设四方馆，隶中书省。故此，外宅盖当时四方馆。

拜天子仪式，后在延英殿或麟德殿谒见天子。此时，使节可提出希望和要求，一般都是“所请并允”。并在宫内设宴，授赏授爵。比如，武则天曾授遣唐大使粟田真人以“司膳卿”之职<sup>①</sup>，唐德宗亦曾对遣唐判官高阶远成授以“中大夫试天子中允”<sup>②</sup>。至于唐玄宗对遣唐使更是优礼有加。开元五年（717）三月，第八次遣唐押使多治比县守及日本著名留学生阿倍仲麻吕、吉备真备等乘船入唐，十日到达长安，玄宗即“命通事舍人就鸿胪宣慰”<sup>③</sup>。天宝十年（752）三月，第十次遣唐大使藤原清河、副使吉备真备率使团赴华，抵达长安后，玄宗在大明宫含元殿接见，并特令宫廷画师给他们画像，收入库藏。还令秘书监兼卫尉少卿朝衡（即阿倍仲麻吕）为向导，陪伴藤原清河等人参观大明宫府库、三教殿和长安市容及名胜古迹。当藤原清河一行回国时，玄宗又制御诗相赐：

日下非殊俗，天中嘉会朝。念余怀义远，矜尔畏途遥。涨海宽秋月，归帆使夕飙。因惊被君子，王化远昭昭。<sup>④</sup>

与此同时，玄宗还特地指派鸿胪寺卿蒋挑挽陪送他们至扬州，并指定魏方进负责供给<sup>⑤</sup>。真可谓关怀备至。尤其是玄宗为满足遣唐使的要求，不惜改变“礼闻来学，不闻往教”的惯例，选著名儒生就寓邸授经。遣唐使在长安停留期间，如遇年节或丧仪等事也参与活动。比如，藤原清河在长安期间恰值元旦，即与百官诸蕃一同参加朝贺仪式。第十六次遣唐大使藤原葛野麻吕也参加了贞元十一年（805）唐德宗的丧仪，大使一行“于亟天门立杖，始着素衣冠”<sup>⑥</sup>。使团在完成使命回国时，唐朝廷举行相辞仪式，对此次朝贡进行答赐，由监使宣读诏令，赠与答谢礼物，并设宴送别，最后遣内使送大使等到达登船地点，有时则受天子之命，随遣唐使同行赴日回访。

上已述及，遣唐使团成员都是经过严格选拔的饱学之士，或者是有一技之长的人。他们在从事外交活动的同时，还担负着进行文化活动的任务。

作为外交使节，遣唐使尽管留唐时间只有一二年，但在移植和汲取唐代灿烂文化方面却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而这主要得力于他们在长安停留期间积

① 《新唐书·日本传》。

② 《朝野群载》。

③ 《册府元龟·朝贡四》。

④ 《全唐诗逸诗》，见《知不足斋丛书》。

⑤ 《延历僧录·圣武黄帝菩萨传》：“特差鸿胪卿蒋挑挽送至扬州看取，发别牒淮南，敕处至魏方进，如法供给送遣。”

⑥ 《日本后纪》延历二十四年六月乙巳条。

极的文化活动。唐都长安在当时是亚洲文化的中心地，自然也就成为外国学人汲取大唐文明的理想的就学之地。基于此，遣唐使在长安期间，多方对中国文化进行认真的考察、学习和引进，并接送留学生和留学僧。而唐朝廷对遣唐使的这些活动总是热情地提供方便，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

作为传播文化的重要媒介之一的书籍，受到遣唐使的特别关注。《唐会要》载，开元十九年（731），经、史、子、集四库书总数为八万九千卷（其中经部一万三千七百五十二卷、史部二万六千八百二十卷、子部二万一千五百四十八卷、集部一万七千九百六十卷）。到达长安的遣唐使经常参观这些图书。比如，第十次遣唐使在长安期间，曾参观了府库所藏图书。在参观之余，遣唐使还随时采购图书。据《日本书纪》白雉五年七月条所记，第十二次遣唐使吉士长丹等从长安等地带回很多书籍，并因此得到天皇赏赐。又据《旧唐书·东夷倭国传》记载，第八次遣唐押使多治比县守用唐朝廷赏赐之物“尽市文籍返海而还”。唐人莫休所说“新罗、日本前后遣使入贡，多求文成（即张旅鸞）文集归国”<sup>①</sup>正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实际情况。

遣唐使不惟积极参观和采购图书，而且学习热情很高，虽则身为大使、副使，但人人无不发奋读书，苦心钻研。如多治比县守在出使长安期间，要求京城名儒讲授儒家经典，玄宗特意为此下诏，令四门助教赵玄默去鸿胪寺为他授经。多治比县守为了答谢老师，以来时携带的阔幅布作为束脩之礼赠送给赵玄默<sup>②</sup>。除过使团中的大使和副使以外，其他技术和艺术方面的人才也在长安努力学习。如第三次遣唐使准判官藤原贞敏善弹琵琶，入唐后从琵琶名手刘二郎继续深造，数月内即尽传妙曲。刘二郎因极为赏识他的才能，便把自己女儿嫁给他。在藤原贞敏回国时，刘二郎还以紫檀、紫藤琵琶各一面相赠。贞敏后来成为日皇宫廷音乐的负责人，这与刘二郎的辛勤指教是密不可分的<sup>③</sup>。第十七次遣唐阴阳师兼请益阴阳师春苑玉成，入唐后获《难义》这一阴阳学经典，潜心钻研，归国后即用以教授阴阳寮的学生。

在遣唐使团的官员中，有不少人回国后位列公卿。例如吉备真备位至右大臣，粟田真人、多治比县守、多治比广成、藤原葛野麻吕任纳言，藤原马养、朝野鹿取、藤原常嗣任参议，菅原清公任式部少辅、文章博士等职。有

① 莫休：《桂林风土记》。

② 《旧唐书·倭国日本传》。

③ 《三代实录》贞观九年十月四日己巳条。

些尽管未至公卿之位，但历任中央或地方各级文武官员。由于这些人有机会程度不等地接近朝廷政治中枢，便能把在唐见闻推广于日本，亦即将入唐学到的知识变通融会于日本的各项制度和政治措施中去。例如，作过遣唐副使的吉备真备在太宰府任大貳时，为东海、南海、西海各道的节度使用，造棉质袄、冑各 20250 具，仿效唐朝的新样式，按五行配色把甲板染成碧、赤、黄、白、黑五色，并将每 4050 套作为一组，共为五组<sup>①</sup>。又如唐玄宗开元七年（719）回国的遣唐押使多治比县守等朝见天皇时，穿着唐朝赠给的朝服入朝<sup>②</sup>。此后不久，日朝廷便模仿唐服，“初令天下百姓右襟”，并令大臣上朝时“把笏”<sup>③</sup>。再如唐宪宗元和十年（818），作过遣唐使判官的菅原清公任式部少辅时，奏请朝廷规定礼仪，并依唐制改革男女礼服，把五位以上的位记改成唐式。此后，朝拜天皇的仪式，也采用了唐朝武后时开始使用的拜舞仪式<sup>④</sup>。据《朝野群载》卷九记载，文章道的教育机关文章院，也是菅原清公自唐回来后向朝廷申请建立的。总之，在长达近 300 年的遣唐使活动中，遣唐使在学习和输入先进的唐文化方面起着十分积极的作用。

## 4

唐王朝遣使日本。在日本多次派出遣唐使、送唐客使和迎入唐大使的同时，作为外交上的回访和友好往来，唐中央政府、驻百济镇将及东北地方政权（渤海国）也不断遣使赴日。兹列表如下：

表 1-3-4 唐使节赴日本表

序次	使者姓名	派遣者	赴日时间	备注
1	高表仁 新州刺史	唐朝廷	公元 632 年（唐贞观六年，日舒明四年）	乘第一次遣唐使返日船只抵达日本。后因与日王子争礼，不宣朝命而归。

① 《续日本书纪》天平宝字六年正月丁未条。

② 《续日本书纪》养老三年正月己亥条。

③ 《续日本书纪》养老三年二月壬戌条。

④ 《续日本后纪》承和九年十月丁丑条。

续表

序次	使者姓名	派遣者	赴日时间	备注
2	郭务棕 朝散大夫	唐百济镇 将刘仁轨	公元 664 年(唐麟德 元年,日天智三年)	自百济乘船至筑紫。当时唐日关系紧张,日方既不愿其进京,又不敢驱其出境。郭务棕留宿北九州至十二月十二日方回国。
3	刘德高 朝散大夫, 沂州司马上 柱国	唐朝廷	公元 667 年(唐乾封 二年,日天智六年)	刘德高等二百五十四人于七月二十八日至对马,九月二十日至筑紫。回国时日派守大石、坂合部石积组成护送唐使代表团护送回国。
4	司马法聪 熊津都督府 上柱国	唐百济镇 将刘仁愿	公元 667 年(唐乾封 二年,日天智六年)	送日使坂合部石积等回国,返唐时日又派伊吉博德组成护送团送至百济。
5	李守真	唐百济镇 将刘仁愿	公元 671 年(唐咸亨 二年,日天智十年)	正月自百济乘船至日,七月回国。
6	郭务棕	唐百济镇 将刘仁愿	公元 673 年(唐咸亨 四年,日天武元年)	日告以天智天皇之丧,郭务棕等衣丧服致哀。
7	沈惟岳 越州浦阳府 折冲赏紫金 鱼袋			为送迎入唐大使高元度而遣。一行三十九人自杭州湾出发。沈惟岳后留日不归。
8	赵宝英 掖庭令	唐朝廷	公元 778 年(唐大历 十三年,日宝龟九年)	乘第十四次遣唐使回国船只。赵宝英与日副使小野石根(行大使事)同乘一船,因暴风遇难身亡。判官孙兴进代使进谒天皇。

其中第一次赴日唐使派遣于日本第一次遣唐使到达长安的第二年。第一次遣唐使于贞观四年（630）八月启程，次年抵达长安。唐太宗李世民对遣唐使的到来，甚为欣悦，认为这是“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的对外政策的必然结果。他鉴于遣唐使往来路途遥远，多所不便，敕令所司告日可以不必一年朝贡一次，并遣新州刺史高表仁随遣唐使赴日，“持节往赴”<sup>①</sup>。贞观六年（632）八月，高表仁与日使出发，同年十月四日到达难波（今大阪）。日方得知唐使回访的消息后，迅即以大伴连马养组成欢迎团，率船32只，悬挂彩旗，鸣鼓奏乐，在江口盛情迎接。在难波宾馆，高表仁与前来迎接的日本王子发生争礼事件<sup>②</sup>。但《日本书纪》对此削而不书，而中国典籍也是语焉不详。遂使后人无法得知这次争礼事件的根由及其经过。有人认为这次争礼是由于高表仁不尊重日本当时的外交政策所致。因为当时日本执政者苏我马不采取亲百济政策，而唐则采取亲新罗政策，由此要求日本也作相应的转变，这就是失“礼”，遂引起争端<sup>③</sup>。有人则据中国史书对高表仁所作的“无绥远才”的评价，认为一定是因为他以大国使者自居，倨傲不恭，视日为属国，不肯履行双方平等的国家接待礼节，从而引起坚持以平等之礼相待的日本王子的不满，因而发生争执<sup>④</sup>。实际上，当以后说为是。理由在于：一方面，就中国而言，“华夷之辩”或“夷不乱华”是历代帝王的传统政治理念，尤其是并首先用以指导外交政策。基于此，大凡中国帝王总是认为，外国应对中国执藩臣之礼，并应恭顺、敬重中国。大唐帝国国势强盛，当然更不能也不可能摆脱这种传统观点的羁绊。相应，作为唐帝国重臣的高表仁要求日方以藩臣之礼接待唐使也就很自然，同时亦在情理之中。另一方面，就日本来说，在圣德太子以前，历代统治者凡与中国来往，大都甘愿自称臣属。随着大和国家的发展和中央王权的加强，圣德太子开始要求与中国进行对等外交。大业三年（607），圣德太子在致隋炀帝的国书中使用了“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的词句，已经显露出不持臣礼而持以同等国君之礼的端倪，以致招致炀帝不悦<sup>⑤</sup>。此后，日本不仅要求与唐对等，并且要求朝鲜半岛上的国家和唐帝国东北地区的渤海国在交往中对它称臣。准此而言，日本王子完全有可能以对等之礼接待唐使高表仁。这两方面的原因相结

①② 《旧唐书·东夷倭国传》。

③ 见金铉球：《有关初期日唐关系考察》，载《日本历史》1983年8月号。

④ 见张振声：《中日关系史》卷一，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75—76页。

⑤ 《隋书·倭国传》。



合，必然发生争“礼”事件。结果是高表仁愤然拒绝去日本首都宣读唐太宗给日王的诏书，要求立即回国。但据《日本书纪》记载，高表仁于公元633年（日舒明五年）一月二十六日回国，可见争议时间之长。尽管高表仁因争礼而不宣朝命，但日本政府并未因此断绝与唐的往来，就在高表仁回国时仍派护送使团送至对马岛。

与第一次赴日唐使一样，第二次赴日唐使也与日方发生过不愉快的事件。除这两次以外，其余各次都受到日本朝廷的礼遇。比如第六次赴日唐使郭务惊一行于咸亨四年（673）到达筑紫时，适逢天智天皇之丧，日本政府派使臣至筑紫送讣告于唐使，接到讣告后，唐使“咸着丧服，三遍举哀，向东稽首”，极为注重礼仪。而日本政府也盛意相待，向唐使节赠送缣1673匹、布2852端、绵666斤，还有甲冑弓矢等物<sup>①</sup>。

## 二、东南亚

隋唐王朝与东南亚各国交往频繁。大业三年（607），隋炀帝又以屯田主事常骏、虞部主事王君政等人为使节，出使赤土国（今马来西亚加里曼丹岛南部）。赤土王令国人“吹蠡击鼓”，以最隆重的仪式迎接隋王朝的使节。常骏等人回国时，赤土王回赠大量物品，并派王子那邪伽伴送入隋。大业十二年（616），婆利（今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丹丹（今马来西亚马来半岛吉兰丹）、盘盘（今马来西亚加里曼丹岛北部）等国，先后遣使长安通好。次年，真腊国<sup>②</sup>也遣使来隋。

隋唐时期，今越南北部（安南）是隋唐王朝统治的一部分，相继通过设置总管府、都护府、经略使、州县等地方机构，直接实行对安南地区的统治<sup>③</sup>。虽然隋唐王朝在安南地区建立了统治机构并频繁任命军政长官，但仍出现了多次激烈的矛盾斗争，或为当地人反抗奴役和剥削，或为地方军官叛乱，或为南诏侵扰，无论发生哪种情况，唐王朝总是调兵遣将加以平定，以维护对安南的统治。即使在唐朝末年，南诏多次侵扰安南，并两次攻陷交

<sup>①</sup> 《日本书纪》天武天皇元年条。

<sup>②</sup> 柬埔寨在公元后建立了东南亚地区第一个国家——“究不事”。中国史籍普遍地称之为“扶南”。公元6世纪后期，扶南藩属真腊以武力推翻扶南王朝，建立以吉蔑族为核心的高棉王国。中国古籍上所称的“吉蔑”、“真腊”、“文单”、“婆楼”，即指古代柬埔寨这个新兴王朝。公元8世纪初，真腊分裂为水、陆真腊两部分，9世纪初又重新统一并遣使长安。柬埔寨之名始见于明张燮《东西洋考》：“柬埔寨即古真腊国也。”《大清一统志》等书认为明万历以后改称柬埔寨。

<sup>③</sup> 见《元和郡县图志》卷三八《安南》、《资治通鉴》卷一七八。

州，处于风雨飘摇中的唐王室任命高骈为安南都护，带兵收复失地。出征前，懿宗皇帝将高骈召回京师长安，会见于灵台殿。足见唐王朝对安南的重视。在高骈收复安南后，又“进骈检校刑部尚书，仍镇安南，以都护府为静军，授骈节度，兼诸道行营招讨使。始筑安南城。”<sup>①</sup>继续建设安南。《资治通鉴》卷二五〇云：“骈筑安南城，周三千步，造屋四十余万间。”高骈曾写有《安南送曹别敕归朝》一诗：“云水苍茫日欲收，野烟深处鹧鸪愁。知君万里朝天去，为说征南已五秋。”安南与唐都长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有很多人来往于两者之间。

隋唐时，在今越南中南部立国的仍是林邑<sup>②</sup>。据《隋书·林邑传》记载，林邑国“延袤数千里，土多香木金宝”。隋文帝杨坚平陈以后，林邑国遣使长安入贡。大业元年（605），隋炀帝杨广派兵平林邑，分其地为三郡。不久又复国。唐王朝建立以后，林邑国不断遣使长安。唐武德六年（623）和武德八年（625），林邑王梵志两次遣使来唐通好。武德八年，唐高祖李渊举行盛宴、设九部乐欢迎林邑使节，并赠送使者以锦、彩等丝织品。唐太宗贞观年间（627—650），林邑国先后四次遣使长安，送来驯象、镳锁、五色带、朝霞布、火珠等物。另外还有五色鸚鵡，唐太宗曾命李百药为之作《五色鸚鵡赋》。高宗至玄宗时，林邑先后23次遣使长安访问。天宝八年（749）林邑曾送来真珠100串、沉香30斤、驯象20头。肃宗至德（756—758）以后，林邑改称环王国，仍和唐朝通好。五代时，环王改称占城。后周显德五年（958），占城王因德漫曾派遣使臣甫阿散等人来周赠送地方特产。

继隋大业十三年（617）真腊国遣使长安以后，唐时，两国邦交进一步密切。据《隋书·真腊传》记载，真腊国北部山峦林立，南部水泽相连，气候炎热，土宜稻谷，海中多鱼。国人“多奉佛法，尤信道士”。唐武德六年（623）、武德八年（625），真腊两次遣使长安。唐太宗即位后，真腊又于贞观二年（628）和贞观九年（635）两次遣使来唐以贡方物，唐太宗回赐了很多礼品，如《旧唐书·南蛮西南夷·真腊传》记载：“贞观二年，（真腊）又与林邑国俱来朝贡献，太宗嘉其陆海疲劳，赐赉甚厚。”唐高宗以后，真腊不断遣使携带贵重礼物来唐聘问。永徽元年（650）至永徽六年（655），仅是

① 《新唐书·高骈传》。

② 东汉末年初平之乱时，日南郡象林县功曹之子区连杀县令，自立为王，建林邑国。其国“人性凶悍，果于战斗”。自建国后不断向北侵扰交州，战败即称臣纳贡，旋即又进入骚扰。《晋书·林邑传》记载：“自孙权以来，不朝中国。至武帝太康间，始来贡献。”

珍贵的白象就送来 32 头。这些白象均经过特殊训练，能跪拜舞蹈，每逢节日常在宫苑中表演。唐中宗神龙（705—707）以后，真腊国分为水、陆两真腊。北部多山，称陆真腊（今老挝）；南部际海，称水真腊（今柬埔寨）。陆真腊亦号文单，都城在今老挝万象。我国史书称陆真腊为文单，称水真腊仍为真腊。此后两国各自遣使长安。开元五年（717）、天宝十二年（753）、贞元十四年（798），文单王三次遣使来唐赠送方物，唐亦厚礼相报。大历六年（771），文单王婆弥率同随从贵臣 25 人，亲自来唐访问，唐代宗对这次访问极为重视，设宴于三殿，由宰相出席款待，并特赠以汉名“宾汉”（中国的上宾）作为纪念。

隋唐时，陕西与缅甸亦有进一步的交往。中国古代各朝对缅甸的称谓不相一致，汉称掸国，隋称朱江国，唐称骠国，宋称蒲甘，元称缅甸，明代开始称缅甸。由于中缅两国毗邻，世世代代友好交往，所以在缅甸民间流传着许多关于中缅两国友好的神话传说。缅中友协编《华人抵缅各地记》（缅文）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在远古时代，有一龙公主与太阳神相亲相爱，后来生下三个龙蛋。其中一个破裂后变成一块宝石，因此缅甸盛产宝石；一个经孵化变成一个男孩，后来成为缅甸国王骠苴低；另一个孵成女孩，许多神仙把她送至中国，后来成为中国的皇后。也许正是本于这一神话传说，缅甸人自古以来就称中国皇帝为“乌底巴”，意思是“同为蛋生”。直到今天，缅甸人还称中国人为“胞波”，缅语的意思是“一母所生的同胞”。不可否认，这一《三个龙蛋》的故事，显系荒诞之谈，但问题在于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缅两国友好往来的历史事实。中外学者普遍认为，现今定居于缅甸境内的各民族，并非本地的土著民族，他们中的大多数是在远古时期由我国青藏和云贵高原先后移居缅甸的<sup>①</sup>。据考古学家莫里斯的研究，在缅甸亲墩县和瑞波县境内出土的环石，同中国仰韶文化新石器相似<sup>②</sup>。今天，居住在两国边境的兄弟民族，有的同说一种语言，有的同穿一种衣服，有的同饮一条江水。陈毅《赠缅甸友人》一诗对此有过形象的说明：

我住江之头，君住江之尾。

彼此情无限，共饮一江水。<sup>③</sup>

① [缅]波巴信著、陈炎译：《缅甸史》，商务印书馆 1956 年版第 10 页。

② 莫里斯：《缅甸出土的史前石器》，载《缅甸学会学报》1935 年 25 卷第 1 期。

③ 《陈毅诗稿》第 98 页。

骠国是古代缅甸人在今伊洛瓦底江流域地带建立的国家。《旧唐书·骠国传》详细记载了骠国的地理位置及疆域：

骠国在永昌故郡南二千余里，去上都（今陕西长安县）一万四千里。其国境东西三千里，南北三千五百里。东邻真腊国（今柬埔寨），西接东天竺国，南尽溟海（南部滨海），北通南诏（今云南大理县）些乐城界，东北距阳（《新唐书》作“羊”）苴咩城（今云南大理县治）六千八百里。

贞元十八年（802），骠国王雍羌派遣悉利移、舒难陀率乐工 35 人来长安与唐通好，并进献骠国乐 22 曲。唐德宗李适曾写信给骠王，称道两国的友好关系。此后，骠国又多次遣使来唐访问。

隋唐时期，东南亚地区的堕和罗（今泰国）、狼牙修（亦译作狼牙须、郎迦戌，在今泰国西南部马来半岛北大年附近）、罗越（在今马来西亚马来半岛南端柔佛一带）、丹丹（在今马来半岛南部吉兰丹）、盘盘（在今马来西亚加里曼丹岛北部）、诃陵（亦称闍婆，在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中部）、堕婆登（在今印尼苏门答腊）、室利佛逝（在今印尼苏门答腊）、羯荼（在今马来半岛西海岸吉打一带）等国，也和陕西有着广泛的政治往来。唐太宗贞观年间，堕和罗国王三次遣使来长安访问，并馈赠金榼、金锁、宝带、火珠、象牙等礼品，盘盘国王四次遣使来唐赠送方物，唐分别回赠骏马等礼物<sup>①</sup>。唐高宗时，丹丹国王两次遣使来唐赠送方物<sup>②</sup>。咸亨以后，室利佛逝多次派使臣到唐朝通好，唐政府曾在曲江设宴招待，并封其王为右金吾卫大将军宾义王。诃陵自贞观以后不断遣使来唐，仅大历年间就三次遣使长安，奉献玳瑁、生犀等礼品。

### 三、南亚

隋唐时期，南亚各国与中国交往密切者有天竺（古印度别称）。其地在葱岭东南，“分为五天竺，其一曰中天竺，二曰东天竺，三曰南天竺，四曰西天竺，五曰北天竺。地各数千里，城邑数百。”<sup>③</sup>当时的五天竺可包括今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等。

唐时，五天竺不断遣使长安，特将其编年如下：

①② 《册府元龟》卷九七〇。

③ 《旧唐书》卷一九八《天竺传》。

贞观十五年(641),中天竺摩揭陀国(今印度奥里萨邦北部)王尸罗逸多(戒日王)遣使至长安,后数遣使来,并赠火珠、郁金香及菩提树。太宗命云骑尉梁怀敬持节抚慰。尸罗逸多于曲女城举行无遮大会75日(《新唐书》卷二二一上)。

贞观十六年(642),乌荼国(一曰乌仗那,或曰乌菴,在印度奥里萨邦北部)王达摩因诃施遣使至长安奉表献方物。表曰:“大福德至尊,一切王中上乘天宝车,破诸黑暗。譬如帝释,能伏阿修罗王。奴宿种善根,得生释种,拜至尊,因献龙脑香。”(《全唐文》卷九九九)

贞观二十年(646),那揭罗国(在北印度境)遣使贡方物(《旧唐书》卷一九八),章求拔国(现今尼泊尔)遣使至长安(《新唐书》卷二二一上)。

贞观二十一年(647),摩揭陀(一名摩揭它,本天竺属国)遣使自通于天子,献波罗树,树类白杨(《新唐书》卷二二一上)。

咸亨三年(672),南天竺国各献方物(《册府元龟》卷九七〇)。

天授三年(692),东天竺国王摩罗拔摩、中天竺国王尸罗逸多、南天竺国王遮娄其拔罗、北天竺国王那那、西天竺国王地摩西那并来朝献(《册府元龟》卷九七〇)。

景龙四年(710),南天竺遣使来朝(《旧唐书》卷一九八)。

先天二年(713),南天竺遣使朝贡(《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开元二年(714),西天竺遣使献方物(《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开元三年(715),天竺国使翟县、惠感来献方物(《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开元五年(717),中天竺遣使来朝,并献方物(《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开元八年(720)正月,中天竺遣使来朝。五月南天竺遣使献豹及五色鸚鵡、向日鸟。十一月,南天竺遣使来朝(《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开元十三年(725),中天竺遣使来朝(《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开元十八年(730),中天竺遣使朝贡(《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开元十九年(731),中天竺国王伊沙伏磨遣其臣大德僧勃达信来朝,并献方物(《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开元二十九年(741),中天竺王子李承恩来朝(《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乾元元年(758),乾陀罗国王使大首领中郎将踏匐勒特车鼻施远千并授

将军，放还蕃（《册府元龟》卷九七六）。

在天竺官方使节不断抵达长安的同时，唐政府亦多次派遣使者从长安出发前往天竺，王玄策三次出使天竺就是其中之一。

王玄策第一次出使天竺在贞观十七年（643）。先是，玄奘至印度求经，中天竺摩揭陀国国王“尸罗逸多召见曰：‘而国有圣人出，作《秦王破陈乐》，试为我言其人。’玄奘粗言太宗神武，平祸乱，四夷宾服状。王喜曰：‘我当东面朝之。’”<sup>①</sup>基于此，贞观十五年（641），尸罗逸多自称摩伽陀（Magadha，在恒河下游，距河口不远，今孟加拉国西部）王，唐太宗降玺书以示慰问。尸罗逸多大吃一惊，问诸国人曰：“自古曾有摩诃震旦<sup>②</sup>使人至吾国乎？”国人皆回答说：“未之有也。”尸罗逸多遂膜拜接受诏书，并再一次遣使朝贡。唐太宗“以其地远，礼之甚厚。复遣卫尉丞李仪表报使。尸罗逸多遣大臣郊迎，倾城邑以纵观，焚香夹道。尸罗逸多率其臣下东面拜受敕书。复遣使献火珠及郁金香、菩提树。”<sup>③</sup>

鉴于中天竺数次遣使至长安与唐联络，贞观十七年（643）三月，唐太宗以朝散大夫卫尉丞上护军李仪表为正使，融州黄水县令王玄策为副使，组成一个22人的使团，由吐蕃、泥婆罗入印度，同年十二月到达中天竺摩揭陀国，受到尸罗逸多的隆重接待，赴各地游览。

贞观十九年（645）元月二十七日，李仪表、王玄策等人在王舍城东北耆闍崛山（Gridhrakura）刻碑记唐威德，二月十一日立碑于摩诃菩提（Mahabodhi），贞观二十年（646）回到长安。在这次访印过程中，随李仪表、王玄策出使的宋法智等人曾摹写弥勒像带回长安，成为道俗竞相模写的范本。另外，李仪表曾到东天竺迦摩缕波国，“该国宗事天神，不信佛法。故自佛兴以迄于今，尚未建立伽蓝，招集僧侣。其有净信之徒，但窃念而已。天祠数百，异道数万。”<sup>④</sup>童子王打听到中国在佛教传入前也曾有道教经典流传于世，于是向李仪表提出将道教经籍译成梵文的请求。为此，贞观二十一年（647），唐太宗诏令玄奘问道士蔡晃、成英等人将老子《道德经》译成梵文。这部梵文《道德经》在王玄策第二次出使天竺时送到童子王手中。

贞观二十一年（647），王玄策第二次出使天竺。这次，王玄策为正使，

① 《新唐书》卷二二一上。

② 摩诃震旦为 MABACHINAS THANA 之译音，梵语称大为摩诃，谓秦为震旦。

③ 《旧唐书》卷一九八。

④ 《大唐西域记》卷十。

蒋师仁充副使，取道吐蕃进入中天竺。这时，中天竺王尸罗逸多死，国内大乱，其臣那伏帝阿罗那顺篡立，他拒绝王玄策入境，并发动胡兵将王玄策使团所携礼物剽劫一空。王玄策率从骑 30 人力战，但因寡不敌众而被擒。王玄策趁夜深人静逃出，到吐蕃借精兵 1200 人，又往泥婆罗国率领 700 余骑兵，重回中天竺国都城——曲女城，“连战三日，大破之，斩首三千余级，赴水溺死者且万人。阿罗那顺弃城而遁，师仁进擒获之，虏男女一万二千人，牛马三万余头匹。”<sup>①</sup>贞观二十二年，王玄策将阿罗那顺押送长安，又随带中天竺方士那罗延娑婆寐献长生延年之药。太宗甚为喜悦，当即命有司告宗庙，并谓左右群臣说：

夫人耳目玩于声色，口鼻耽于臭味，此乃败德之源。若婆罗门不劫掠我使人，岂为俘虏耶？昔中山以贪宝取弊，蜀侯以金牛致死，莫不由之。<sup>②</sup>

于是拜王玄策为朝散大夫。太宗死葬昭陵，刻石像阿罗那顺之形，列于玄阙之下。这次王玄策战败阿罗那顺，不但依靠吐蕃和泥婆罗骑兵，而且还得到迦摩缕波国的援助。

王玄策第三次出使天竺在显庆二年（657）。这年，王玄策奉命送佛袈裟到天竺。他仍取道吐蕃、泥婆罗。显庆四年（659）至婆栗阇国（Vrjji），受到国王的热情款待。显庆五年（660）九月二十七日送佛袈裟至摩诃菩提寺，十月一日离寺回国。同行的有高僧僧伽跋摩、高昌人彼岸和智岸法师。他们回国时取道迦毕试，第二年春由迦毕试古王寺取佛顶骨一片，携回长安供养于宫内。

王玄策三次出使天竺，联络了中天竺、东天竺及迦毕试等国，并向天竺各国传播了道教的基本理论和礼仪，密切了长安与天竺各国的关系并为沟通中印藏道交通作出了贡献。

师子国，即今斯里兰卡，梵语作 simhaladvipa，意译为师子国，《佛国记》、《宋书》、《梁书》、两《唐书》均称此名。《大唐西域记》称执师子国，《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称师子洲。

在东晋时，中国与斯里兰卡已有僧人往来。唐总章三年（670）：

师子居西南海中，延袤二千余里。有稜伽山，多奇宝，以宝置洲上，商舶尝直辄取去。后邻国人，稍往居之。能驯养师子，因以名国。

<sup>①②</sup>《旧唐书》卷一九八。

总章三年，遣使者来朝。天宝初，王尸罗迷迦再遣使献大珠、钿金、宝璎、象齿、白氍。①

师子国自总章三年和天宝初两次遣使长安之后，天宝五年（746），再次派遣婆罗门僧灌顶三藏、阿日伽跋折罗来朝，献钿金、宝璎珞及贝叶梵写《大般若经》一部，细白震四十张②。天宝九年（750）又献象牙真珠③。

尼泊尔在唐代称尼婆罗。中尼两国以喜马拉雅山为界，自古以来便是友好邻邦，千百年一直保持着友好往来。

到唐代，陕西与尼泊尔的交往更加频繁。这除唐代经济繁荣以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即是“吐蕃尼婆罗道”的开辟。该道在中印交通中属于东道，即由长安经青海入吐蕃、尼泊尔到中印度。而在陕西与尼泊尔的交通中，吐蕃（西藏）在中间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贞观十三年（639）尼泊尔赤贞公主（白利古蒂公主）嫁于赞普，尼藏交通得到改善，从加德满都谷地通往西藏南部的班尼巴到固蒂山口的商路筑成。贞观十五年（641）唐文成公主入藏，吐蕃修好了通往黄河曼头岭的道路，长安到拉萨的大道畅通了，于是长安到尼泊尔的交通变得极为便利，大大缩短了使节往返的时间。

贞观十七年（643），唐太宗派臣李仪表和王玄策赴印度，他们沿吐蕃泥婆罗道，途经尼泊尔访问了加德满都，受到尼泊尔王那陵提婆的隆重接待，并参观阿春婆犁池，池水常年沸腾，而不受旱涝耗益，煮物顷刻可熟。

贞观二十一年（647），王玄策第二次奉命出使天竺，经尼泊尔时，尼泊尔王那陵提婆便派使者到长安，向唐太宗赠送菠稜（菠菜）、酢菜、浑提葱等礼物，开始与唐朝建立友好关系。此后，王玄策又多次出访尼泊尔。

唐时，南亚地区的大勃律国（在今克什米尔西北部巴勒提斯坦）和小勃律国（在今克什米尔吉尔特雅辛河流域）亦多次遣使长安访问。自垂拱元年（685）至天宝七年（748），大勃律国先后八次遣使来唐赠送方物④。天宝四年（745）至乾元元年（758），小勃律国六次遣使长安⑤。对大、小勃律国的来访，唐均报以厚礼。

① 《新唐书·西域列传》。

②③ 《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④ 见《册府元龟》卷九七〇、九七一、九七五。

⑤ 见《册府元龟》卷九七一、九七五、九七六。



#### 四、中亚、西亚、非洲、欧洲

##### (一)

中国南北朝到隋唐时期，在今中亚阿姆河、锡尔河流域，分布着十多个小国，其王均以昭武为姓<sup>①</sup>。《新唐书》以康、安、曹、石、米、何、火寻、戊地、史为昭武九姓，而以东安国、毕国、怛捍、那色波阿于其间，曹国又分为东、西、中三国。《北史》、《隋书》称乌那曷、穆国、漕国也是王姓昭武的国家。隋唐时期与以上中亚各国交往频繁。

隋炀帝初年，曾派遣侍御史韦节、司隶从事杜行满出使中亚各国。大业五年（609）前后，康国、安国、石国、米国、史国、曹国、何国均遣使长安通好，或发展经济交往<sup>②</sup>。唐朝建立后，旋即与各国建立了关系，各国几乎都多次遣使与唐通好，有些国家甚至数十次遣使长安。例如，武德七年（624）到大历七年（772），康国先后 27 次派遣使者到长安<sup>③</sup>；贞观八年（634）到宝应元年（762），石国 21 次遣使长安<sup>④</sup>；贞观十三年（639）到乾元二年（759），安国 13 次遣使长安<sup>⑤</sup>。在以上各国使者到长安之时，唐王朝亦报以厚礼，相互间友好往来不断。

中亚各国在唐平西突厥<sup>⑥</sup>以前，为西突厥统治。隋末唐初，西突厥逐渐向外扩张，“控弦数十万，霸有西域”。西突厥可汗对中亚诸国王都授予颉利发的称号，“并遣吐屯一人监统之，督其征赋”<sup>⑦</sup>。高宗显庆二年（657），唐灭西突厥，控制了西域地区，原来役属于西突厥的中亚诸国均归附唐朝。次年，唐高宗派果毅都尉董寄生前往中亚阿姆河、锡尔河之间的河中地区设置许多都督府、州。这些府州称羁縻府州，隶属于安西都护府，仍以当地原来的首领为都督、刺史，可以世袭。公元 651 年，大食（阿拉伯）灭掉波斯

① 昭武九姓的起源尚无定论。据《隋书》，昭武九姓原为月氏人，旧居祁连山北昭武城（今甘肃临泽），因被匈奴所迫，西越葱岭，以昭武为姓，建国称王。

② 见《隋书·食货志》。

③ 参见《册府元龟》卷一七〇、九六四、九七〇至九七二、九七五。

④ 参见《册府元龟》卷九七〇至九七二、九七五。

⑤ 参见《册府元龟》卷六九七、九六四、九七〇、九七一。

⑥ 突厥是 6 世纪时生活在我国北方阿尔泰山地区的游牧部落。6 世纪 50 年代初灭柔然汗国，开始称霸蒙古高原，建汗国于今鄂尔浑河流域。后分为东、西突厥两汗国。隋末唐初，东突厥势力强大，多次侵犯关中，进逼长安。公元 629 年（贞观三），唐太宗发兵灭东突厥。后又灭西突厥。

⑦ 《通典·边防典》。

萨珊王朝，公元 654 年越过阿姆河，常常侵扰中亚各国。在大食不断向东、北推进的过程中，中亚各国纷纷遣使至长安寻求唐政府的支援与庇护。开元七年（719），康国王乌勒伽上表请唐朝派兵帮助康国反击大食，安国王笃萨波提上表请唐朝命原属西突厥的突骑施国救助，俱蜜国王那罗延上表希望唐朝让大食免征赋税。开元十五年（727），吐火罗叶护上表请唐朝命令突骑施发兵灭大食。其中尤以吐火罗、石国和俱蜜国求援心切。据《册府元龟》卷九九九记载，俱蜜国王那罗延遣使上表说：

臣曾祖父叔兄弟等旧来赤心向大国。今大食来侵，吐火罗及安国、石国、拔汗那国并属大食。臣国内库藏珍宝及部落百姓物，并被大食征税将去。伏望天恩处分大食，令免臣国征税。臣等即得久长守把大国西门。伏乞照临，臣之愿也。

吐火罗叶护遣使上言说：

奴身罪逆，不孝慈父身被大食统押，应彻天聪，颂奉天可汗进旨云<sup>①</sup>，大食欺侵我，即与你气力。奴身今被大食重税欺苦实深。若不得天可汗救治，奴身自活不得，国土必遭破散，求防守天可汗西门不得。伏望天可汗慈悯，与奴身多少气力，使得活路。又承天可汗处分突厥施可汗云，西头事委你，即须发兵除却大食。其事若实，望天可汗却垂处分奴身。缘大食税急，不救得奴物奉进。望天可汗炤之。所欲驱遣奴身，及须已西方物，并请处分，奴身一一头载，不敢怠慢。

透过这些求援心切的奏文，可以看出当时中亚各国遭受大食侵扰的严重程度。事实的确如此。公元 8 世纪初，乌玛亚王朝的一位以残酷无情而知名的总督哈扎只不仅大肆入侵中亚各国，而且曾对自己的部下穆罕默德·本·卡西姆和屈底波·并波悉林说：谁能最先踏上中国领土，谁就出任统治中国的总督<sup>②</sup>。两人虽则都没有进入中国，但后来分别在印度西部边境和中亚地区建立了阿拉伯人的统治区域。然而，尽管中亚各国遣使求援于唐，但由于公元 8 世纪上半期，唐朝、吐蕃<sup>③</sup>、突骑施与大食在中亚地区多次错综复杂的纠

① 天可汗是公元 630 年（贞观四）突厥颉利可汗被擒以后，西北君长上予唐太宗的尊号。唐对西北各国所颁诏令，皆用此号。

② 希提著，马坚译《阿拉伯通史》，商务印书馆 1979 年版，上册第 244 页。

③ 唐朝与吐蕃的关系极其复杂。公元 663 年（高宗龙朔三），吐蕃灭唐属国吐谷浑，占有今青海地区。中亚各国遣使求援前后，强大的吐蕃族正以四五十万兵力屯聚在今青海、甘肃两省边境，威胁着唐王朝的心脏关陇地区。与此同时，又不断与唐展开争夺中亚的斗争。故此，唐朝不能轻易出兵援助中亚各国。

葛与冲突，唐政府始终没有直接出兵攻打大食，只是支持突骑施汗国去帮助中亚各国反抗大食。

开元二十七年（739），突骑施吐火仙举兵反唐，唐军在石国、史国、拔汗那等国援助下平定叛乱。天宝三年（744），唐王朝通过封王形式重申唐对中亚诸国的宗主权，拔汗那、石国、西曹国、康国、米国、安国、怛没等国先后被授予王号。例如，拔汗那王阿悉烂达干受封为奉化王，改国号宁远，玄宗李隆基以外家姓赐王为窈，并以宗室女为和义公主下嫁。天宝十三年（754），宁远王忠节派王子窈薛裕到长安，请留宿卫，次年被授以左武卫员外将军之职。另外，唐朝亦将史国改名来威国。

天宝十年（751），安西节度使高仙芝举措不当，擒斩石国王，引起石国不满，并招致怛逻斯之战（详下），唐军被大食击败，但并未消除唐在中亚的势力及影响。次年唐封石国王男那俱车鼻施为怀化王，恢复友好关系。后中亚各国一直向唐朝贡不绝。安史之乱爆发以后，拔汗那、吐火罗等国发兵助唐平叛。乾元（758—760）之后，因吐蕃攻陷河陇，中亚诸国朝贡渐稀，先后与唐断绝往来。

## （二）

两汉至南朝时期，中国称伊朗为安息。从北朝开始，中国人始称伊朗为波斯。波斯之名在西方史籍上出现甚早，而在中国史书中则始于北魏魏收的《魏书》：

波斯国，都宿利城，在怛密西，古条支国也。去代二万四千二百二十八里。城方十里，户十余万。河经其城中南流，土地平正。

在上古之时，波斯为伊斯兰族中一部落，后成为伊朗国内众多的民族中之一员，主要居住在今伊朗西南部。这里所说的波斯指的是伊朗的萨珊王朝（226—651），该王朝的创建者为萨珊，而萨珊出自波斯族。萨珊王朝自认为与伊朗古代的阿契美尼德王朝（即古波斯帝国）的统治者为同族，因此，在伊朗历史上曾两度以波斯著称——阿契美尼德王朝和萨珊王朝。

隋朝建立，波斯王库思老二世（Chosraull）多次遣使长安贡献方物。作为友好往来，隋炀帝遣云骑尉李昱出使波斯，不久又遣使随李昱奉献方物<sup>①</sup>。

据《旧唐书·西域传》记载，隋朝末年，西突厥叶护可汗率军击败波斯

<sup>①</sup> 《隋书·西域传》。

国，杀波斯王库萨和，役属波斯。库萨和子施利即位，一年病故。国人立库萨和女为王，又为突厥所杀。时施利子单羯方避难拂菻，国人遂迎立为王（即伊恒文），然在位两年卒。兄子伊嗣侯继立。伊嗣侯昏庸无道，为波斯大首领所逐，逃奔吐火罗，途中被大食击杀。大食趁机灭波斯帝国。伊嗣侯子卑路斯逃至吐火罗，遣使至长安求援。唐高宗因波斯距唐土甚远，出兵不便，婉言谢绝。后由吐火罗出兵送卑路斯居波斯边境疾陵城（今伊朗锡斯坦省东北）。龙朔元年（661）唐朝在该城置波斯都督府，以卑路斯为都督。后多次遣使入朝。咸亨五年（674），卑路斯自来长安访问，且求唐援助，以谋复国。高宗甚加恩赐，拜为右武卫将军。不幸病故长安。调露元年（679），高宗使吏部侍郎裴行俭率军册送卑路斯子泥涅斯为波斯王。裴行俭因路途遥远，行军困难，行至安西碎叶城（故城在吉尔吉斯斯坦北部托克马克附近）而还。泥涅斯独返，但因慑于大食的威力，不敢回疾陵城，遂客居吐火罗 20 余年。景龙二年（708），泥涅斯又从吐火罗来唐访问，唐中宗拜其为左威卫将军。不久病故长安。

贞观十三年（639）至大历六年（771），波斯先后 30 余次遣使长安，兹根据《册府元龟》所记列表如下：

表 1-3-5

波斯使节赴唐表

时 间	纪 事	材料来源
639 年(贞观十三)	遣使通好	《册府元龟》卷九七〇
647 年(贞观二十一)1 月	遣使通好	同上
647 年(贞观二十一)3 月	遣使献活羴蛇	同上
648 年(贞观二十二)	遣使通好	同上
654 年(永徽五)	遣使求援	《册府元龟》卷九九五
661 年(龙朔元)	遣使通好	《册府元龟》卷九六六
667 年(乾元二)	遣使献方物	《册府元龟》卷九七〇
671 年(咸亨二)	遣使通好	同上
673 年(咸亨四)	遣使通好	《册府元龟》卷九九九
682 年(永淳元)	遣使献方物	《册府元龟》卷九七〇
706 年(神龙二)3 月	遣使通好	同上
706 年(神龙二)7 月	遣使献方物	同上
708 年(景龙二)	遣使通好	《册府元龟》卷九七〇

续表

时 间	纪 事	材料来源
719年(开元七)1月	遣使献方物	《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719年(开元七)2月	遣使通好	同上
719年(开元七)7月	遣使通好	同上
722年(开元十)3月	遣使献表	《册府元龟》卷九九九
722年(开元十)10月	遣使献狮子	《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725年(开元十三)	遣使通好	《册府元龟》卷九七五
727年(开元十五)	遣使通好	同上
730年(开元十八)1月	遣使通好并献方物	《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730年(开元十八)11月	遣使通好并献方物	《册府元龟》卷九七五
732年(开元二十)	遣使通好	《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737年(开元二十五)	遣使通好	同上
745年(天宝四)	遣使献方物	同上
746年(天宝五)	遣使献犀牛和象各一	同上
747年(天宝六)4月	遣使献玛瑙床	同上
747年(天宝六)5月	遣使献豹四	《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750年(天宝九)	遣使献毛绣舞筵、珍珠	同上
759年(乾元二)	遣使通好	同上
762年(宝应元)6月	遣使通好	《册府元龟》卷九七二
762年(宝应元)9月	遣使通好	同上
771年(大历六)	遣使献珍珠、琥珀等	同上

## (三)

阿拉伯是一个跨越亚、欧、非三洲，包括许多不同民族的伊斯兰国家。西汉时中国称阿拉伯为条支，唐时称大食。阿拉伯人自古以来就居住在幅员辽阔的阿拉伯半岛上。半岛东北临波斯湾，东南濒印度洋，西临红海，北有大沙漠。境内大部分地区是干旱的草原和日渐变成沙漠的高原，因此，大多数阿拉伯人过着游牧生活。

公元6世纪下半叶，阿拉伯半岛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是公元570年，在商业重镇麦加的哈希姆家族诞生了伊斯兰教创立者穆罕默德。公元610年，穆罕默德开始传播伊斯兰教。公元622年，他偕同门徒，避居麦地

那。次年开始组织军队，逐渐统一麦地那周围地区，并于公元 630 年占领麦加，迫使麦加贵族和商人接受伊斯兰教。公元 632 年（唐太宗贞观六年），穆罕默德逝世。此时，阿拉伯半岛已基本统一。穆罕默德的继承人称为哈利发（亦译哈里发）。最初四代哈利发均从穆罕默德近亲密友中选出，通称四大哈利发。哈利发不仅是宗教领袖，而且是政治和军事领袖。

伊斯兰教徒在统一阿拉伯半岛之后，不断向外扩张，遂形成横跨欧、亚、非三洲的阿拉伯帝国。第三代哈利发奥斯曼出身于麦加部落贵族倭马亚家族，是穆罕默德的女婿。他在位（644—656）期间，在叙利亚、埃及和其他地区，竭力扩大倭马亚家族的领地，引起当地居民的强烈不满。他执政掌教 12 年后，为反对派所杀，由阿里当选第四代哈利发。然倭马亚家族不承认阿里政权，遂以奥斯曼堂弟穆阿维叶（时任叙利亚总督）为代表，与阿里展开内战。公元 661 年，阿里遇刺身亡，叙利亚和埃及的阿拉伯贵族拥立穆阿维叶为哈利发，建立倭马亚王朝，定都大马士革。从公元 661 年至公元 750 年（唐高宗龙朔元年至唐玄宗天宝九年），共传 14 代，历时 89 年。因该王朝尚白色，中国史书称白衣大食。到公元 750 年，伊拉克人阿布·阿尔·阿拔斯自称是穆罕默德叔父阿拔斯的后裔，推翻倭马亚王朝，建立阿拔斯王朝，定都巴格达，共传 37 代，至公元 1258 年，蒙古军战领巴格达时覆亡。阿拔斯王朝尚黑色，中国史书称黑衣大食。

穆罕默德在创教初期，即鼓励其弟子前往中国寻求友谊，增长知识。唐高宗永徽二年（651），即阿拉伯第三任哈利发奥斯曼在位的第八年，大食王噶密莫末赋第一次遣使至长安<sup>①</sup>，在会见唐高宗之后，介绍了大食建国及伊斯兰教教义等情况。这是长安与阿拉伯正式通使之始。此后，彼此交往日益频繁。到唐德宗贞元七年（791），在 140 余年中，进入长安的大食使节就达 38 次之多。今列表于下：

表 1-3-6

大食使节赴唐表

时 间	纪 事	材料来源
651 年(永徽二)	遣使通好	《旧唐书·大食传》
655 年(永徽六)	遣使通好	《册府元龟》卷九七〇
681 年(永隆二)	遣使献马及方物	同上

<sup>①</sup> 《旧唐书·大食传》。

续表一

时 间	纪 事	材料来源
682年(永淳元)	遣使献方物	同上
703年(长安三)	遣使献良马	同上
711年(景云二)	遣使献方物	同上
716年(开元四)	遣使献金线织袍等物	《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719年(开元七)	遣使通好	同上
724年(开元十二)	遣使献马及龙脑香	同上
725年(开元十三)1月	遣使献方物	《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725年(开元十三)3月	遣使献方物	同上
726年(开元十四)	遣使献方物	《新唐书·大食传》
728年(开元十六)	遣使通好	《册府元龟》卷九七五
729年(开元十七)	遣使通好并献方物	《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733年(开元二十一)	遣使通好	同上
741年(开元二十九)	遣使通好	《册府元龟》卷九七五
744年(天宝三)	遣使献马及宝物	《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745年(天宝四)	遣使通好	同上
747年(天宝六)	遣使献豹六只	同上
752年(天宝十一)	黑衣大食遣使通好	同上
753年(天宝十二)3月	黑衣大食遣使献方物	同上
753年(天宝十二)4月	黑衣大食遣使通好	同上
753年(天宝十二)7月	黑衣大食遣使通好	《册府元龟》卷九七五
753年(天宝十二)12月	黑衣大食遣使献马三十四	《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754年(天宝十三)	黑衣大食遣使通好	《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755年(天宝十四)	黑衣大食遣使通好	同上
756年(天宝十五)	黑衣大食遣使通好	同上
756年(至德初)	黑衣大食遣使通好	同上
758年(乾元元)	黑衣大食遣使通好	同上

续表二

时 间	纪 事	材料来源
758年(乾元元)	黑衣大食又遣使通好	同上
760年(上元元)	白衣大食遣使通好	同上
762年(宝应元)5月	黑衣大食遣使通好	《册府元龟》卷九七二
762年(宝应元)12月	黑衣大食遣使通好	同上
769年(大历四)	黑衣大食遣使通好	同上
772年(大历七)	黑衣大食遣使通好	同上
774年(大历九)	黑衣大食遣使通好	同上
779年(大历十四)	黑衣大食遣使通好	《新唐书·大食传》
791年(贞元七)	黑衣大食遣使通好	《册府元龟》卷九七二

自永徽二年(651)大食遣使长安与唐政府正式建交以后,有时是连年遣使,有时是一年之中出入长安的竟达二三次。这充分说明唐和阿拉伯关系的密切。特别是开元二十三年(735),当突骑施与唐关系恶化而攻打唐北庭(新疆吉木萨尔)和拔换城(新疆阿克苏)时,唐政府尚命令安西都护府与大食东面将军呼逻散地区的总督制订联合作战方案,以携手进攻突骑施。后来,在唐和大食的打击之下,突骑施日渐衰亡。然而,由于突骑施的败亡使唐与大食之间的缓冲势力已不复存在,遂使双方有了直接交锋的可能。公元750年(天宝九年),大食阿拔斯王朝(黑衣大食)建立,阿卜·穆斯林作了黑衣大食呼逻散总督。也就在这一年,费尔干纳国与石国发生摩擦,费尔干纳国王遣使请唐援助。唐安西节度使高仙芝以石国不执藩臣之礼而出兵攻打石国。石国王请求投降,高仙芝趁势把石国王押往长安处死。石国王子奔走西域各国并与大食相商,联合攻打唐安西四镇。大食的呼逻散总督阿卜·穆斯林派吉雅德·本·萨利赫最先开始进攻唐军,他们开赴怛罗斯城(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城)。高仙芝也率军3万余人抵达怛罗斯城,双方对峙五日。最后,唐军因葛逻禄部的倒戈而被大食军所击败,士兵死伤惨重。在这次战争中被俘的中国士兵约有2万人。其中便有不少陕西人,著名学者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杜佑的族子杜环即在这次战争中被俘。杜环被俘后被送往库法,他在大食留居十余年,先后周游大食各地,并由耶路撒冷启程,横渡沙漠抵达摩邻国。宝应元年(762)由海路回到广州,将沿途见闻写成《经



行记》，已失传，现仅在《通典》一书中保存了一些零星的记载。杜环留居大食之时，正值乌玛亚与阿拔斯两朝交替之际，而其《经行记》所记，又是本于亲眼所见，所以对后人研究当时的大食国历史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据《经行记》记载，当时被俘的陕西人中尚有一些画匠，如京兆人樊淑、刘泚等。

战后第二年（即天宝十一年、公元752），黑衣大食即向唐朝派出使节。次年三月、四月、七月和十二月，黑衣大食一连四次遣使长安与唐通好。以后连续五年，每年都有使者来到长安。与此同时，唐和阿拉伯还在“安史之乱”期间进行一定的军事合作。天宝十四年（755）冬，身兼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以诛杨国忠为名，起兵叛乱，击败唐军，攻下洛阳，次年进入长安称帝。玄宗逃往四川，肃宗在灵武（今属宁夏）即位。至德二年（757），肃宗借回纥、安西、北庭、大食的军队15万人，当年即收复长安、洛阳。第二年八月，肃宗在长安召见回纥和大食两国使臣，回纥使多乙亥阿波80人和大食使酋长闹文等6人一同朝见，双方至阖门时争长，后经通事舍人调解，方分左右两队由东、西两门同时进入宫城。虽然大食派往长安、洛阳的军队为数不多，但唐政府联合大食等国兵力平定“安史之乱”却是历史的真实，在今张掖、酒泉一带，即有当年助唐讨平安史之乱的大食士兵的后裔侨居。

#### （四）

西罗马帝国灭亡后，拂菻就成为东罗马帝国即拜占廷帝国的专称。据《旧唐书·拂菻传》记载：

拂菻国，一名大秦，在西海之上，东南与波斯接。地方万余里，列城四百，邑居连属。其宫宇柱栌，多以水晶、琉璃为之。有贵臣十二人，共治国政。常使一人，将囊随王车，百姓有事者，即以书投囊中。王还宫省发，理其枉直。其王无常人，简贤者而立之。国中灾异及风雨不时，辄废而更立。其王冠……及璎珞，皆缀以珠宝。著锦绣衣，前不开襟，坐金花床。

随着西域交通的繁盛，陕西与罗马的往来日趋频繁。贞观十七年（643），拂菻王波多力遣使献玻璃、石绿、金精等物<sup>①</sup>，唐太宗回信答聘，并“赐以绫绮”。据考证，这次遣使至长安的并非拜占廷皇帝，而是教皇狄奥多罗斯。

<sup>①</sup> 《册府元龟》卷九七〇。

这是因为，自拜占廷一代雄主希拉克略（610—641）死后，国力衰弱，原属拜占廷的叙利亚、巴勒斯坦和美索不达米亚已于7世纪30年代相继沦入阿拉伯人之手。于是，拜占廷皇帝便以教皇的名义遣使至长安向唐政府求援，这样可以越过阿拉伯人的封锁。唐太宗尽管热情款待拜占廷所遣使者，但却没有对拜占廷进行实际的援助。此后，阿拉伯国势日渐强盛，不时侵袭周边诸国，《旧唐书》卷一九八叙述当时拜占廷和阿拉伯的关系说：

自大食（阿拉伯）强盛，渐凌诸国，乃遣大将军摩棧伐其都城。

因约为和好，请每岁输之金帛，遂臣属大食焉。<sup>①</sup>

为了从阿拉伯的隶属中摆脱出来，拂菻遣使长安通好求援。高宗显庆年间（656—660），唐王朝命左屯卫大将丘阿罗喊出使拂菻，前往报聘。乾元二年（667）、大足元年（701）、景云二年（711）、开元七年（718）、天宝元年（742），拂菻又五次遣使来唐，赠送方物<sup>②</sup>，唐均报以厚礼。

拂菻国先后多次遣使至长安，目的在于和唐通好而获得来自中国的支持，以与阿拉伯相抵抗。然而，由于中亚形势的变化和阿拔斯王朝的建立，唐政府并未给予实际的援助。

## 第六节 经济贸易

### 一、东亚

#### （一）

外交上的友好往来，必将促使彼此正常的经济贸易。从西汉时长安与卫氏朝鲜的接触开始，双方就有经济上的往来，尤其是到隋唐时代，更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当时陕西与朝鲜的经济贸易，可分为官方贸易和民间贸易两种。

**官方贸易：**当时双方的官方贸易，主要以使节往来为媒介。从唐武德九年（618）到唐天祐四年（907），新罗遣使长安126次，唐廷派出使节34次。

<sup>①</sup> 《旧唐书》此处所记亦见西方史籍记载，但有出入。按阿拉伯哈利发摩维亚于公元671年开始攻打东罗马帝国，欲占取君士坦丁堡都城，战争持续至公元678年，阿拉伯国力消耗，已无力攻打君士坦丁堡，遂与东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四世议约。阿拉伯答应30年不侵犯东罗马，并每年输给东罗马金三千锭、奴仆五十名、良马五十匹。《旧唐书》所记与西史相反。

<sup>②</sup> 见《旧唐书·拂菻传》和《册府元龟》卷九七〇、九七一。

新罗使节至唐时，多携大量珍贵物品献给唐帝，而唐朝使节亦携带贵重物品回赠新罗国王。这尽管是出于外交上的官方礼节，带有永敦修好的政治色彩，但客观上却是以官方贸易的商品交换形式，促使了双方经济贸易的繁荣与发展。据《三国史记》等文献典籍记载，新罗向唐朝贡的物品种类繁多，有金属工艺品、纺织品、药材和动物、毛皮等。例如，金属工艺品中即有金钗头、鹰金（银）缫簇子、鹞子金（银）缫簇子、镂鹰铃、金花鹰镮铃子、金（银）镂鹰尾筒、金（银）镂鹞子尾筒、瑟瑟细金针筒、金花银针筒、金（银）佛像等。新罗使节有时携带的珍贵物品数量之多相当惊人。如咸通九年（869），新罗使节抵达长安时，携带的珍贵物品达37种之多，其中金、银分别为100和200两，牛黄15两、人参100斤<sup>①</sup>。

唐朝回赠新罗的珍贵物品也是多种多样：有金属工艺品的金银器；纺织品的彩素、锦彩、绫彩和五色罗彩等；服装类的锦袍、紫袍、绿袍、紫罗袍、罗裙衣、金带、银细带等。另外还有茶、动物和书籍等。

毋庸置疑，无论是新罗朝贡的物品，还是唐廷赠送的物品，绝大多数为高级奢侈品，基本上是唐与新罗王公贵族间的物质交换，也就是说只是用以满足那些达官显贵的奢侈与享受。然而，这些即使充作物物交换的物品在客观上促进了陕西与朝鲜人民生产技术与科学知识的交流，并有力地推动了双方经济文化的进一步发展。

**民间贸易：**唐廷对与新罗的民间贸易，最初采取限制政策。据仁井田陞《唐令拾遗》所记，建中元年（780），唐朝关市令规定：不得与新罗等国从事绫锦、縠绌、绵绢、丝、布、鼈牛尾、真珠、金、银、铜、铁等交易。开成元年（836），唐淄青节度使奏请朝廷解除从新罗进口熟铜的禁令：“新罗、渤海将到熟铜，请不禁断。是有京兆府奏准。”<sup>②</sup> 由此可见，在当时朝廷禁止与新罗等国进行民间贸易的情况下，民间贸易仍在进行，而且数量可观，否则不致引起地方官吏的重视，并请求唐政府解除禁令。

当时，新罗通唐的交通路线有陆路和海路。陆路从营州渡辽水，经安东都护府、平壤抵达庆州；海路从登州到大同江口或汉江口，或临津江的长口镇<sup>③</sup>。唐和新罗的商人或取道陆路，或经由海路，频繁地进行经济贸易。尤

① 《三国史记》新罗本纪。

② 《册府元龟》卷九九九，外臣部，互市条。

③ 《新唐书·地理志》。

其是唐政府对来唐居住和从事农业劳动或商业活动的外国人持欢迎态度。仁井田陞《唐令拾遗》引唐《户令》云：“诸没落外蕃得还及化外人归朝者，所在州镇给衣食，具状送省奏闻。化外人于宽乡附贯安置。”另外，外国人还可免除十年赋税，“诸没落外蕃得还者，一年以上复三年，三年以上复四年，四年以上复五年，外蕃人投化者复十年。”<sup>①</sup>这就为陕西等地与新罗的民间贸易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唐、罗商人进行贸易的种类繁多。主要有下面几点：纺织品有绫、锦、丝、布等；金属有金、银、铜等；药材有人参、牛黄等。同时还有一些书籍，如白居易等人的诗文。据《新唐书·白居易传》记载：“居易于文章精切，然最工诗。……当时士人争传。鸡林行贾售其国相，率篇易一金。”

## (二)

陕西与日本的经济贸易，主要是通过遣唐使进行的。遣唐使在长安进行文化活动的同时，还要进行大量的贸易活动，换言之，实现贸易是遣唐使团承担的一项重要任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遣唐使同时也就是贸易代表团。不过，中日两国史书对遣唐使在长安及其他地方的贸易活动没有专门记述，然而从有关的史料中尚可略窥其貌。

遣唐使在赴唐时，必须携带这样几种物品：一是途中必备物品，诸如食粮、油盐、医药及航海用器等。这些不用作商品交换，故不在贸易范围之列。二是大批作为“国信物”的贡品，是日本政府对唐王朝的贡物。唐政府收到这些贡品之后，一般都要“回赐”。因此，大批贡品同时也就是主要的贸易商品。三是遣唐使团成员所携带的物品，这也是主要的贸易商品之一。

关于贡品，《延喜式》卷三十记载有给大唐皇帝的礼品：

大唐皇：银大五百两，水织绝、美浓绝各二百疋、细绝、黄绝各三百疋、黄丝五百疋、细屯锦一千屯；别送彩帛二百疋、叠锦二百帖、屯绵二百屯、绉布卅端、望陞布一百端、木棉一百帖、出火水晶十颗、玛瑙十颗、出火铁十具、海石榴油六斗、甘葛汁六斗、金漆四斗。

这些作为赠送大唐天子的礼品，可能不是贡品的全部。据《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承和五年八月八日条记载，开成三年（838），第十七次遣唐使抵达扬州，第四船搁浅，无法到位卸货。唐朝廷派十来只船到搁浅的地方卸运“国信物”，可见贡品数量之多。遣唐使把贡品进献给唐朝廷，会得到相同或更

<sup>①</sup> 仁井田陞《唐令拾遗》。

多的回赐礼品。有时唐朝廷还派押送使押送这些回赐礼品去日本。例如，大历十三年（778），曾派太监赵宝英作押送使去日本。日本朝廷称唐的回赐礼品为“国土宝货”<sup>①</sup>。开成四年（839）遣唐使带回的回赐礼品竟需要“差检校使，取陆道递运”抵达京城，可见数量相当可观。

遣唐使启程前，日本朝廷对此行全部人员还要赏赐物品。据《延喜式》卷三十中所载统计：

大使：纒六十疋、绵一百五十屯、布一百五十端。

副使：纒四十疋、绵一百屯、布一百端。

判官：纒十疋、绵六十屯、布四十端。

录事：纒六疋、绵四十屯、布二十端。

知乘船事、译语、请益生、主神、医师、阴阳师、画师：纒五疋、绵四十屯、布十六端。

史生、射手、船师、音声长、新罗译语、奄美译语、卜部、留学生和学问僧的谦从：纒四疋、绵二十屯、布十三端。

杂使、音声生、玉生、锻生、铸生、细工生、船匠、桅师：纒三疋、绵十五屯、布八端。

谦人（仆人）、挟抄：纒二疋、绵十二屯、布四端。

留学生、学问僧：纒四十疋、绵一百屯、布八十端。

还学僧：纒二十疋、绵六十屯、布四十端。

水手长：纒一疋、绵四屯、布二端。

水手：绵四屯、布二端。

此外，日本朝廷对大使以下主要成员还有特赐：

大使：彩帛一百十七疋、货布二十端。

副使：彩帛七十八疋、货布十端。

判官：彩帛十五疋、货布六端。

录事：彩帛十疋、货布四端。

知乘船事、译语：彩帛五疋、货布二端。

学问僧、还学僧：彩帛十疋。

有人曾作过这样的统计：“遣唐使代表团如以三百人计，则上述各种人员所携物品合计约为：纒三百七十疋、绵二千五百五十屯、布一千五百一十

<sup>①</sup> 《续日本书记》卷三十五，宝龟九年十月。

二端、彩帛三百二十五疋、帛布七十四端。”<sup>①</sup>这个数字已超过贡品。这些物品是为了使团成员抵唐后充当旅费赐给的，故必然在唐各地市场上出售。不过，由于唐朝廷对遣唐使照顾优厚，使团成员一般是不必出售所携带的物品以解决旅费问题。同时，唐政府对使团成员有时还有馈赠。开成四年（839）赐赴京遣唐使成员 270 人每人绢五疋，计 1350 疋<sup>②</sup>。所以，除留学生、学问僧、还学僧等留唐时间较长，尚需拜师、求法外，一般成员的物品都用于购物或交际。《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开成二年四月条记载第十七次遣唐使一行将要回国时说：

八日，长官谦从白鸟清岑、长岑、留学生等四人，为买香药下船到市，为所由勘追，舍二百余贯钱逃走。二十一日，大使谦从粟田家继先日为买物，下船往市，所由捉缚，州里留著，今日被免来。

使团成员回国时，不惜违犯唐朝法令去购买唐朝香药<sup>③</sup>，当场受到唐官员追究，不得不舍下二百多贯钱逃走。

由于遣唐使团成员积极购买唐物，所以每次回国时总是带回很多货物。唐开成年间第十七次遣唐使入唐时共乘四船，由于遭遇风浪船有损害，回国时雇用新罗船九只，方将货物载回。日本政府对这次遣唐时带回如此众多的珍奇宝物极其欣喜，命令在“建礼门前，张立三幄（帐幕），杂置唐物。内藏寮官人及内侍等交易，名曰宫市。”<sup>④</sup>

遣唐使带回的大量珍贵物品，固然在于满足以天皇为首的贵族阶级的奢侈豪华生活的需要，但对促进日本文化的发展，在客观上直接或间接地起了很大的作用。

与此同时，唐商往日贸易日益增多。9 世纪后半期，唐帝国对外贸易逐步发展，大唐商人开始向日本、新罗活动。大中元年（847），唐商张友信等

① 张振声：《中日关系史》卷一，吉林文史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111 页。

② 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开成四年。

③ 使团成员到市上购买物品，何以被追查捉捕，原因不详。木宫泰彦在《日中文化交流史》（胡锡年译，商务印书馆 1980 年版）中对此作过这样的解释和推测：“据《大宝令》载：日本在官司未曾交易之前，不许和诸蕃私自交易。又据《三代实录》元庆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条载，禁止和渤海使带来的货物私自交易。因为日本的制度概仿唐制，唐朝也许有同样的禁令。遣唐使一行人员所犯或许就是这条禁令。”聊备一说。

④ 《续日本后纪》卷八，承和六年十月条。

47人驾船抵达日本太宰府<sup>①</sup>。此后又连续两次去日经商<sup>②</sup>。另外，还有大唐



图十六 唐乾陵鸟瞰

商人李延孝<sup>③</sup>、张言<sup>④</sup>、崔铎<sup>⑤</sup>等人也经常往返于唐日之间进行贸易。

## 二、东南亚、南亚

隋唐时期，东南亚、南亚国家通过遣使长安，与陕西进行着广泛的经济贸易。例如林邑国（今越南中南部）使节先后向唐王朝馈赠鹦鹉、犀牛、驯象、白象、象牙、琥珀、真珠、沉香、鲜白氍（棉布）、花氍、火珠等方物，仅天宝八年（749）一次就送来真珠100串、沉香30斤、驯象20只。再如，五天竺、师子国（今斯里兰卡）输入唐政府的物品有：珍珠、宝石、白氍布、毛毯、香料、玻璃器皿等。相应，通过回赠由长安输入东南亚、南亚各国的货物品种亦为数甚多。输往五天竺、师子国的物品主要有黄金、金银器、锦綵、绢丝、青铜铸币、瓷器、漆器、铁锅、纸张、藤席等。唐诗中的“货通师子国，乐奏武王台”<sup>⑥</sup>正是陕西与斯里兰卡贸易频繁的真实写照。而行销真腊（今柬埔寨）的中国货物品种更多，有金银、缣帛、漆器、瓷

① 《续日本后纪》卷十七，仁明承和十四年七月条。

② 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胡锡年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12页。

③ 《日本三代实录》清和天皇贞观四年七月条。

④ 《日本三代实录》清和天皇贞观八年九月条。

⑤ 《日本三代实录》阳成天皇元庆元年八月条。

⑥ 韩愈：《送郑尚书权赴南海》，《韩昌黎诗集编年笺注》卷十二。

器、水银、铜盘、铁锅、纸札、硫磺、焰硝、檀香、白芷、麝香、麻布、雨伞、水珠、桐油、簸箕、木梳、针等等。

隋唐时期，今越南北部（安南）受隋唐中央政府统辖，彼此经济贸易频繁。内地商人每每远途贩运茶、药等百货至安南，又从安南贩运犀、象、玳瑁、珠玑等土产到内地。开元年间（713—742），唐王朝为了发展安南与内地的贸易往来，曾专门委派市舶使至安南。在赋役制度方面，唐在安南实行租庸调制和两税法，安南须向唐中央政府上供方物。所贡方物主要有犀角、象牙、玳瑁、珠玑、蕉、槟榔、蛟革、蚺蛇胆、翠羽、藤器、孔雀尾、沉香、班竹、丹砂等。

### 三、中亚、西亚、非洲、欧洲

#### （一）

隋唐五代时期，陕西与中亚、西亚各国的经济贸易在很大程度上还带有“朝贡”色彩。各国使节前来长安通好时所携带的珍宝特产，以“朝献”的名义输入，而陕西的丝绸、黄金等物则以“回赐”的形式输出。例如，唐时中亚康国、吐火罗分别数十次遣使长安，先后向唐廷赠送锁子铠、水晶杯、玛瑙瓶、金桃、银桃、胡药、质汗药、骏马、狮子、豹、鸵鸟等，与此同时唐政府回赐大量的锦缯綵帛<sup>①</sup>。显而易见，这种形式的经济贸易，实际上是一种官方贸易。除康国以外，其他昭武九姓国如安国、曹国、史国、石国、米国及西亚波斯等国，都在隋唐时期与陕西进行着这种官方经济贸易。

在官方贸易之外，中亚、西亚各国还与陕西进行民间贸易。中亚、西亚各国素以善商贾著称西域，利之所在，无所不至。他们很早就和中国通商。西突厥强盛时，他们被西突厥所统治。唐平西突厥以后，他们名义上内附于唐，但实际上唐廷并不过问他们的内政，这就更加便利了他们同唐朝的经济贸易。唐太宗曾对安国使臣说：“西突厥已降，商旅可行矣。”<sup>②</sup>当时在长安的外商，以中亚、西亚各国为最多。所谓长安的商胡，大多指中亚昭武九姓国和西亚波斯国的商人。他们聚集在长安东、西两市尤其是西市，开设店铺进行经商贸易。

据段成式《寺塔记》平康坊菩萨条记载：

<sup>①</sup> 见《册府元龟》卷一七〇、九六四、九七〇、九七一、九七二、九七五。

<sup>②</sup> 《新唐书·康国传》。



寺主元竟多识释门故事，云：李右座每至生日，常转请此寺僧就宅设斋。……斋毕，簾下出綵筐香罗帕籍一物，如朽钉，长数寸。……遂携至西市，示于商胡。商胡见之，惊曰：“上人安得此物？必货此，不违价。”僧试求百千，胡人大笑曰：‘未也。’更极意言之，加至五百千。胡人曰：“此值一千万。”遂与之。僧访其名，曰：“此宝骨也。”

除亲自买卖货物以外，有时，这些商胡还把货物运到长安，批发给专营的商店代销。中亚、西亚各国的商人多通过操纵长安珠宝、香药以经商致富，钱易《南部新书》所说“西市胡贵蚌珠”即是最好的注脚。尤其是一些中亚、西亚各国的商人由于经商还不断地移居长安等地。例如，唐代康国商人最突出的是康谦，以商胡出身，在天宝中（742—756）任安南都护，通过依附杨国忠，官至将军。肃宗时至长安任鸿胪卿，专门接待各国使节，后因女婿参加安史之乱，被告谋反遭杀害。唐后期宰相毕诚，其先世亦出于中亚毕国人，而毕国号称“商都”，商贾往来中国，均成巨富。

## （二）

陕西与阿拉伯的经济贸易，同样表现为官方贸易和民间贸易两个方面。唐时，大食先后 30 多次遣使长安赠送龙脑香、金线袍、宝装玉漉池瓶、骏马、鸵鸟等。这些使节回国时又将唐廷回赠的“绫绢丝绵之类”带回本国。据杜环《经行记》记载，大食马“腹肚小，脚腕长，善者日走千里”，鸵鸟“高四尺以上，脚似驼蹄，颈项胜得人骑，行五六百里，其卵大如三升”。在乾陵的陵前石刻中尚保存有鸵鸟的形象。

与此同时，许多大食商人从陆路经过中亚细亚、天山南路一带来到长安从事经济贸易。唐三彩中有很多随葬用的胡俑，它们深目高鼻，头戴尖顶帽，身穿折领衣，或牵引驼马，或怀抱西域乐器，形象地刻画出当时阿拉伯商人横穿沙漠、翻山越岭，为经济贸易而风尘仆仆、辛劳跋涉的形象。在来华的众多大食商人中，只有屈指可数的人物名留史册。阿卜·乌拜达曾在乾元元年（758）以前的某一时期从事对中国的沉香木贸易<sup>①</sup>。此人便是迄今所知最早留有姓名的大食商人。咸通十一年（870），巴士拉人伊本·瓦哈卜搭乘东来中国的海舶到达广州，随后前往长安，乾符三年（876）拜见唐僖

<sup>①</sup> 达尔吉尼：《教长年表》，转引自列维茨基《来华的最早的阿拉伯商人》（《东方学报》卷 XI，1935，179—180 页）。

宗，向僖宗介绍了阿拉伯的一些情况，并带回有关长安和中国的见闻<sup>①</sup>。

当时，大食商人从长安输入的货物有丝绸、瓷器、纸、墨、剑、香料、麝香、肉桂等。由阿拉伯输入陕西的主要有香药（乳香、苏木、胡椒、沉香等）、犀牙、玳瑁、珍珠、琥珀、棉布等。

8世纪中叶以后，海路的重要性日渐超过陆路，来华的大食商人多经水路抵达广州、泉州及江浙沿海港埠。然长安毕竟是唐之国都，以其繁华昌盛吸引着大批阿拉伯及其他国家的商人前来逐利。许多大食商人由扬州沿运河北上至洛阳，再经陆道，过潼关而西至长安。

### (三)

隋唐时期，陕西与埃及、索马里、埃塞俄比亚、苏丹等非洲国家也有一定程度的贸易往来。

唐代段成式的《酉阳杂俎》卷四称埃及为“孝亿国”；而《酉阳杂俎》续集卷一〇及南宋周去非《岭外代答》皆称之为“勿斯离”；赵汝适《诸蕃志》中又称之为“勿斯里”或“蜜徐篱”。元代对埃及的称呼又有：密昔尔<sup>②</sup>、密昔尔或密乞儿<sup>③</sup>、迷思耳<sup>④</sup>；《明史·西域记》称“米昔儿”或“密思儿”；徐继畲《瀛环志略》中作“麦西国”，等等。

埃及亚历山大里亚位于地中海南岸，既是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商业都会，又是古代世界最大的国际贸易港。中国的丝绸经过丝绸之路运入埃及。从公元前1世纪起，中国的绮缡便在埃及流行起来，据记载，古代埃及托勒密王朝的末代君主、女王克列奥帕特拉曾穿过中国丝织成的袍。此后越来越多的华丝运抵埃及，并销往各地。从5世纪开始，埃及用中国的生丝为原料进行加工制造或将中国丝织品拆后重织，亚历山大里亚由一个重要的丝货贸易中心逐渐发展成一个重要的丝织业中心。

在引进和吸收中国丝织品及其织造技术的同时，埃及的玻璃（琉璃）制品和制作技术也传入陕西和中国。古埃及在公元前12世纪就已经发明了制造琉璃的方法，琉璃制品至迟到汉武帝时代已经输入中国。而且在此之前，埃及的绿宝石、香药也以其他民族为中介传入中国。

公元642年，阿拉伯攻占亚历山大里亚，将尼罗河畔的巴比伦作为首

<sup>①</sup> 见穆根来、汶江、黄倬汉译《中国印度见闻录》，中华书局1983年版。

<sup>②</sup> 《元史·郭侃传》。

<sup>③</sup> 元刘郁《西使记》。

<sup>④</sup> 《元经世大典图》。

府，改称福斯塔特，长安和福斯塔特之间有通畅的大道联系；同时唐代的航海技术有了很大的提高，造船业也很发达，海上交通的改善促进了唐代南海贸易的发展，唐代最重要的对外贸易港都偏于南海，如广州和交州，海上传到中国的精品必然由港口送到唐都长安。

唐代由埃及输入中国的主要是玻璃、宝石、金属器皿及棉、毛织物，埃及的绿宝石仍是输入中国的贵重宝石，公元643年拜占廷使者曾向唐太宗李世民进献的绿金精，便是埃及出产的一种绿色宝石（苏丹亦出产）。

唐代运往埃及的主要是丝织品和瓷器。唐代丝织技术高超，产品名目繁多，锦、绫、绣、毯、绉、绢等等，还发展了蜡缬、夹缬、绞缬拓印等印染工艺。在传出成品的同时，丝织技术也逐渐传出，杜环《经行记》曾记载京兆画工樊淑、刘泚等在当时阿拉伯帝国首都亚俱罗（今译库法）和巴格达传授丝织技术和美术工艺<sup>①</sup>，而中国传入埃及的丝织品有一部分即是通过中国和巴格达之间的经济往来得以实现的。唐代瓷器和唐三彩是举世瞩目的特产，从19世纪起，埃及很多地方都发现有唐代的各种瓷器和唐三彩。此外，中国的麝香、大黄及植物纤维纸、雕版印刷术等也都由长安传到埃及和北非各地。

索马里位于亚丁湾，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埃及第五朝时，其出产的没药、奇木等就运往埃及，在底比斯的德尔·巴赫里神庙的壁画里，绘有邦特人向埃及女王进献香膏、没药、肉桂、黑檀木和大象牙等的图像。古代邦特即今索马里。索马里出产的苏合香、没药等物品经埃及很早就传入中国，公元前2世纪已见于长安宫廷。从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7世纪，运到中国的索马里香约有十种，没药是最早传入中国的索马里香，汉代译作精祇香。

虽然索马里的物品早就传入中国、传入陕西，但到唐代才有对于索马里的记载，唐代段成式《酉阳杂俎》卷：“拔拔力国在西南海中。……土地惟有象牙及阿末香。”拔拔力国即在今索马里。《新唐书·西域传》也提到：“大食西南属海，海中有拔拔力国。……多象牙及阿末香。”与《酉阳杂俎》所记相同。

贞观三年（629），索马里第一次向中国派遣使节，《唐会要》卷九八记载：“殊奈国，昆仑人也。在林邑南，去交趾海外三月余日，习俗文字与婆罗门同。绝远，未尝朝中国。贞观二年十月，使至朝贡。”殊奈即索马里，

<sup>①</sup> 见《通典》卷一九三《边防·大食》。

是为陕西与索马里直接交往的开始。殊奈使者到达长安，促进了双方的经济贸易。

索马里主产龙涎、木香、苏合香油、没药、玳瑁、大象牙、犀角和乳香等。隋唐时代，乳香是进口货物中的大宗，《开元天宝遗事》载杨国忠“以麝香、乳香筛土和为泥，饰壁”。统治阶级骄奢无比，搜求奇珍异宝，来自海外的乳香等物必然大量使用于长安宫廷和高官贵戚之家。同时唐代还从索马里大量输入非洲象牙。隋唐时期传入陕西的索马里物产还有：龙涎香、苏合香、芦荟、血竭（古代索马里一直是血竭的惟一供应地）、没药、木香、乌香等。

在埃及、索马里之外，埃塞俄比亚、苏丹亦与陕西进行经济贸易。据《经行记》记载，天宝十年（751）怛逻斯战役中被阿拉伯军队俘获的陕西长安人杜环，在周游阿拉伯各国时，曾到埃及、埃塞俄比亚、苏丹等非洲国家。隋唐时期，埃塞俄比亚、苏丹等国的香药、象牙、犀角、玳瑁、麒麟等曾传入长安。

#### （四）

地处丝路西端的罗马首都君士坦丁堡在当时也是世界上富庶繁荣的工商业城市，被誉为联络东西方的黄金桥梁。隋唐时代，这东、西两大城市的贸易往来进入一个空前的繁盛时期。据《旧唐书·拂菻传》记载：“拂菻（东罗马）国，……土多金银奇宝，有夜光璧、明月珠、骇鸡犀、大贝、车渠、玛瑙、孔雀、珊瑚、琥珀，凡西域诸珍异，多出其国。”东罗马通过遣使长安，将其各种珍奇异物源源不断地输入陕西，而中国丝绸、陶瓷等工艺品亦经由长安输入东罗马。例如，贞观十七年（643），拂菻王波多力遣使来唐，献赤玻璃、石绿、金精等物，唐回赠绫、绮等丝织品。另外，东罗马商人也常来长安进行经济贸易，在西安、咸阳曾发现东罗马的金币，可能是拂菻商人带来的。

## 第七节 科技、文化交流

### 一、东亚

#### （一）

隋唐时期，长安与朝鲜半岛高句丽、百济、新罗的频繁交往，促进了双方的科技、文化交流。

## 1

7世纪中叶，高句丽派遣贵族子弟赴唐到达长安，进入国学，直接吸收唐文化。正因此，汉文书籍每每是高句丽人学习的主要对象，正如《旧唐书·高丽传》所说：

衡门廝养之家，各于街衢造大屋，谓之局堂，子弟未婚之前，昼夜于此读书习射。其书有《五经》及《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孙盛《晋春秋》（即《晋阳秋》，以避晋简文帝太后阿春之讳）……

与高句丽一样，7世纪中叶，百济也派遣贵族子弟至长安入国学，以达到直接吸收汉文化的目的。

特别是7世纪下半叶，新罗统一朝鲜半岛后，为了积极吸收唐文化，经常派遣使节、留学生和留学僧前来长安求文、求学、求法。

新罗派往唐都长安的使节，在完成使命的同时，多向唐朝廷请求书籍。唐政府对此热情接待，往往使他们如愿以偿。例如贞观二十二年（648），新罗遣使赴唐，唐太宗把新撰《晋书》赠予新罗。永淳二年（683），新罗使节赴唐请求礼记和文章，唐高宗“命所司写吉凶要礼并于文馆词林采其词涉规戒者，勒成五十卷赐之。”<sup>①</sup>

唐朝文化对新罗产生了多方面的而且是巨大的影响。公元675年，新罗开始采取唐朝历法。公元639至749年，又相继设立医学、天文博士，来研究唐朝医学、天文和历法。公元8世纪中叶，新罗仿效唐朝的政治制度改造其行政组织，中央置执事省，地方行政机构设州、郡、县、乡。公元788年，新罗采用隋唐科举制选拔官吏，以《左传》、《礼记》、《孝经》为主要考试科目。新罗古代没有固定文字，公元5、6世纪时，汉文开始在新罗流行，7世纪末，新罗人创造了用汉字的音或义标记新罗语的方法，称“吏读”法。后来这种方法广泛流传，并逐渐规范化，对朝鲜半岛民族文化的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公元737年，新罗王逝世，唐玄宗命经学家邢琇前往吊祭，并对他说：“新罗号为君子之国，颇知书记，有类中华。以卿学术，善与讲论，故选使充比。”<sup>②</sup> 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在唐文化的影响下，新罗文

<sup>①</sup> 转引自杨昭全《中朝关系史论文集》，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

<sup>②</sup> 《旧唐书·新罗传》。

化得到长足的发展。

在长期的友好往来中，朝鲜文化对唐王朝也有一定的影响。唐时，长安居住着许多朝鲜音乐家，他们对丰富中国文化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 2

贞观十四年（640），新罗首次将王族子弟派往长安，入太学（即国学）学习唐文化。上元二年（675），新罗统一朝鲜半岛。此后派往长安的新罗留学生日益增多，9世纪达到高潮。据《唐会要》卷三十六《附学读书》条记载，开成二年（837），新罗在唐朝的留学生有216人，但据杨昭全考证，有姓名者为以下诸人<sup>①</sup>：

表 1-3-7 新罗遣唐学生求学表

姓名	入唐年月	在唐及第年月	回国年月
金云卿		821年	841年
崔利贞			825年
金叙贞			825年
朴季业			825年
金允夫	825年	及第	836年
金立之	825年		
朴亮之	825年		
金简之		及第	847年
金夷鱼		及第	
金可纪		及第	
崔致远	868年	874年	885年
李同	869年	875年	
崔质	872年		
朴仁范		876年	
金渥		876年	
金装		及第	

<sup>①</sup> 见《中朝关系史论文集》，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

续表

姓名	入唐年月	在唐及第年月	回国年月
朴 允		及第	
金绍游			888年
金茂先	885年		897年
杨 颖			
崔 涣	885年		897年
崔承祐	890年	893年	
崔 翼	891年		
金文蔚		及第	906年
崔产抡	897年	906年	
金 鹄	897年		

备考：此外，入唐求学的新罗学生尚有金大问、朴居勿、金峻、朴邕、金仁圭、金颖、金选、金仪、崔元、元杰、王巨仁、金垂训、风训等。

注：表中年代皆为公元纪年。

仅开成五年（840）一次回国的留学生和质子就有 105 人<sup>①</sup>。

这些新罗留学生受到唐政府的热情接待。当时，唐政府对外国留学生同样实行宾贡科制度，新罗留学生亦可参加应试。凡及第者皆被授以官职，在唐为吏，即使以后回国也可因此得到新罗王朝的重用。新罗留学生在唐及第者共有 58 人：“进士取人，本盛于唐。长庆初，有金云卿者始以新罗宾贡，题名杜师礼榜，由此以至天佑终，凡登宾贡科者五十有八人。”<sup>②</sup> 新罗留学生中，有所成就者不乏其人，崔致远、金云卿、金可纪等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崔致远自幼好学，12 岁来唐求学，18 岁考试及第，调授宣州溧水（今江苏镇江地区）县尉。后来承务郎侍御史内供奉赐紫金袋。28 岁时思归故里，唐僖宗命其持诏书往新罗访问，回国后新罗留为侍读。致远西事唐廷，东归新罗，皆逢乱世，自悲遭遇坎坷，生不逢时，遂绝仕进之意，携家眷隐

① 《旧唐书·新罗传》。

② 《东文选》卷八十四，崔灏：《送奉使李中父还朝序》。

居伽耶出海印寺以终老。崔致远能诗善文，在唐写有许多著名诗文。

## 3

在新罗使节、留学生来唐之外，便是僧侣来唐求法。公元 372 年，前秦苻坚遣使及僧侣送佛像、经文至高句丽，是为佛教由长安传入朝鲜半岛之始。后新罗又由高句丽传入佛教。公元 528 年新罗正式承认佛教。此后不断派遣僧侣来唐求法。有的终身留居长安，长期从事佛经的翻译或注疏，对陕西乃至中国佛教的发展作出了很重要的贡献。有的学成归国，在新罗弘扬行化，成为新罗华严宗、禅宗等宗派的开山祖师。据《朝鲜佛教史》记载，新罗从公元 6 世纪前半期正式信奉佛教以来，到 10 世纪初，入唐求法的佛教僧侣共有 64 人（其中包括由唐入印的僧人 10 人）。今可考者有 61 人。兹胪列如下<sup>①</sup>：

表 1-3-8

新罗遣唐僧侣求法表

姓名	入唐年月	回国年月	附注
圆测	627 年		终老于唐
阿离那跋摩			630 年由唐入印，终老于印
明朗	632 年	635 年	
慈藏	636 年	643 年	
慧业			576—648 年由唐去印
胜实	636 年		
大梵			650 年由唐赴印，回国后，再度入唐
玄照	579—648 年间		由唐赴印
玄恪	同上		同上
胜科	同上		同上
元晓	661 年		中途回国
顺璟	667 年		
胜庄	667 年		

<sup>①</sup> 转引自杨昭全《中朝关系史论文集》，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8 年版。



续表一

姓名	入唐年月	回国年月	附 注
智仁	667 年		
神昉	667 年		
道证		692 年	
胜詮		692 年	
审祥			由唐回国后, 去日本
金大悲		722 年	
慧超	723 年		787 年终老于唐
无相	728 年		
道义	784 年		
地藏	653 年		728 年终老于唐
慧昭	804 年		
丘德		827 年	
无染	821 年	845 年	
玄昱	824 年	837 年	
梵日	829 年		
洪陟		826 年	
普照	837 年	840 年	
贞育	837 年		
虚怀	837 年		
体澄	837 年		
元弘	851 年		
大通	856 年	866 年	
顺元	859 年		
行寂	870 年	885 年	
庆猷	888 年	908 年	
璨幽	892 年	921 年	
容日	892 年		
庆甫	892 年		

续表二

姓名	入唐年月	回国年月	附注
兢让	899年	924年	
丽严		908年	
玄晖	907年	924年	

备考：入唐求法的僧侣尚有妙正、无漏、普壤、顺应、神行（信行）、义寂、惠通、智证（智洗）、忠湛、利严、哲鉴、折中、惠折、道义、贞鉴、道宪、法朗、悟真、雅觉、憬兴、弘惠山人、朴山人、玄泰、求本、慧轮等。最后3人并由唐去印求法。

在赴唐求法的新罗僧侣中成就最大的有圆测、义相、元晓、慈藏等人，而其中最著名的是圆测。

圆测，名文雅，字圆测，新罗国王之孙。约生于公元612年（隋炀帝大业八年），唐初来中国，15岁受学于法常（567—645）和僧辩（568—642）。圆测“自幼明敏，慧解纵横”<sup>①</sup>，虽千万言，一历其耳，不忘于心。唐贞观中初度为僧，住长安玄法寺。广览《毗昙》、《成实》、《俱舍》、《婆沙》等，论及古今章疏，无不通晓，声名益著，贞观十九年（645）玄奘西行回到长安，圆测即开始从玄奘受学。显庆三年（658）移居新建西明寺，同时敕选50名大德同住，圆测居其一，参与译场。玄奘去世以后，他在西明寺继承玄奘之学而弘传唯识教义（后世唯识著作中往往称他为“西明”），并因与慈恩寺窥基竞传唯识之学而争兰菊之美。约在总章元年（668），圆测往居终南山云际寺，又在距寺30余里的地方净修8年。后又回西明寺讲《成唯识论》。至“高宗之末，天后之初，应义解之选，入译经馆，众皆推挹。及翻《大乘显识》等经，测充证义，与薄尘、灵辩、嘉尚攸方其驾。”<sup>②</sup>证圣元年（695），实叉难陀在洛阳大内大遍空寺重译《华严经》，圆测应诏前往助译，尚未译讫，便于通天元年（696）去世，在龙门香山寺北谷起塔安葬，其弟子胜庄等得部分遗骨，别葬于终南山丰德寺东岭上圆测曾经游历过的地方。宋政和五年（1115），同州龙兴寺广越又从丰德寺分得一部分遗骨，葬于兴教寺玄奘法师塔左，与窥基塔相对，其塔铭由宋复撰写并亲书。1932年重

①② 《宋高僧传》卷四《本传》。

修三塔时，圆测塔铭原石失掉，觅得原拓一张另行刻石，镶于塔侧。

圆测著述共有 14 种，现存 3 种，其目如下：《唯识论疏》十卷、《解深密经疏》十卷（现存）、《金刚般若疏》（卷数不明）、《仁王经疏》三卷（现存）、《成唯识论别章》三卷、《观所缘缘论疏》二卷、《无量义经疏》三卷、《般若心经赞》一卷（现存）、《二十唯识论疏》二卷、《广百论疏》十卷、《百法论疏》一卷、《因明正理门论疏》二卷、《六十二见章》三卷（或作一卷）、《阿弥陀经疏》一卷。

《解深密经疏》第十卷曾经佚失，幸而在藏文《丹珠尔》中保存有该著完整的译本，近年来中国佛教协会观空法师把它从藏文译成汉文加以补齐。本书是圆测现存著述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就该书所引《大般若经》这一点来看，大概写成于玄奘去世以后。书中引玄奘所译《瑜伽》、《唯识》、《俱舍》、《杂集》诸论及真谛所译《决定藏论》、《摄大乘论释》、《三无性论》、《般若疏》、《解节经记》等很多。尤其是《解节经记》，征引最多。

同为玄奘门人，圆测与窥基多有分歧。只因上述圆测有关唯识和因明的著作都已佚失，后人只有从窥基的弟子惠沼及再传弟子智周的著述中窥见圆测与窥基的不同见解。圆测与窥基的分歧，在圆测生前并不十分显著。因为在现存的圆测著作中没有驳难窥基的痕迹。若依《宋高僧传》卷四《窥基传》所记，玄奘给窥基讲《成唯识论》时，圆测以金谿门侍，潜听得其义，后乃造疏先讲，以致窥基甚为不快，玄奘乃为其授因明以慰之。似乎圆测和窥基早有门户之见。其实这种记载是一种不近情理的附会。汤用彤曾就此作过详细考证，他说：

第一，因明二论，早均译论。在永徽六年，只才作《因明注解立破义图》，张之通衢，论其长短。夫因明早已流行，即非佛之徒亦晓其义，何即得谓圆测不知因明？因明既非新行，又非窥基独得之秘，授此慰之，亦觉毫无意义。如有顺璟者，玄奘弟子，亦最善因明，即可知。第二，赂金潜听事，稚气可笑。况《枢要》所言，玄奘采用基言之后，理遣三贤，独授庸拙，显只谓仅以基为笔受，基亦未尝以此为其独得之秘也。《宋高僧传》又谓玄奘为基讲《瑜伽论》，圆测亦窃听。夫瑜伽、唯识，奘师之所弘通，贞观二十一年玄奘曾为太宗讲瑜伽大意，固无由阴授何人也。……①

① 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中华书局 1982 年版第 151 页。

《宋高僧传》的记载当因窥基和圆测二师立说不同，窥基的弟子为了表示窥基独得玄奘真传而故意附会出来。圆测与窥基之所以有分歧，可能是圆测没有全部接受三乘五性学说。圆测早年的学说渊源于真谛。他最初从学的法常和僧辩都是摄论师道岳的弟子，而道岳之师道尼，曾亲自听过真谛弟子智恺的讲说，并撰集所传真谛的注疏。智恺死后，道尼在真谛面前立誓弘传《摄大乘论》和《俱舍论》。他于隋开皇十年（590）来到长安，道岳亲从受学。道岳后来又从广州显明寺求得智恺亲笔记录真谛口传的《俱舍论疏》和《十八部论记》，深加钻研，最后成为摄论师中一大家。圆测从15岁起从法常、僧辩受学，一直到玄奘回到长安之前，在将近20年的时间中始终钻研的是真谛的学说。正因此，尽管他后来从玄奘受学，但依然重视真谛学说，而真谛见解接近清辩，与护法思想针锋相对。这就最终决定了圆测不能全部接受护法主张的五性之说。因而深为窥基弟子所不满。事实上，圆测与窥基在见解上的分歧，并不像后人传说的那样严重。因为圆测长于窥基20岁，窥基本以圆测为后进，又死于圆测之前14年，故未及对圆测著作进行品评。只是到了窥基的弟子惠诏时，极力取窥基之说驳斥圆测，比如他在《成唯识论了义灯》中指出，窥基所说的一切都可作为标准，而圆测的一切都应抹杀，用他自己的话来说：

亲承三藏执笔缀文糅《唯识》人（指窥基）传定不谬。余（含圆测在内）非执笔，纵时谘问，多意定之。所有判文，论大纲纪非可为定。尤其是还有其他一些对圆测的批判，更是非常苛细，不免吹毛求疵之嫌。这些都是不公正的。

圆测的弟子有道证、胜庄等。道证，新罗国人，长寿元年（692）归国，著有《成唯识论要集》十四卷、《因明正理门论疏》二卷、《辩中边论疏》三卷、《因明入正理论疏》二卷、《般若理趣分疏》一卷、《大般若经笈目》二卷、《圣教略述章》一卷，均佚失。胜庄，新罗国人，著作有《成唯识论决》、《梵网戒本述记》、《杂集论疏》等，又曾担任菩提流志、义净译场的证义。

道证的弟子有太贤，亦新罗国人，自号青丘沙门，著述约40种，现存的有《成唯识论学记》八卷、《起信论内义略探记》一卷、《菩萨戒本宗要》一卷、《梵网经古迹记》二卷。太贤所著大都属于瑜伽学方面，因此有“海东瑜伽之祖”之称。

新罗除派遣大量使节和留学生、僧赴唐求文、求学和求法之外，还派一

些道教信徒和艺人入唐学道和学艺。如金可纪即在唐从申元学道，后在终南山修道，最后老死于唐<sup>①</sup>。

入唐的新罗使节、留学生和留学僧及道徒、艺人，在唐都长安与当时的唐代文人、僧侣等广为交游，彼此切磋诗文、技艺，探寻佛、道教义。例如唐代诗人贾岛曾与新罗使节一同联句：

罗使：沙岛浮还走，山云断复连。

贾岛：棹穿波底月，船压水中天。

这样一方面进一步促进了陕西与朝鲜人民的相互了解，增进了双方的友谊；另一方面促进了双方文化的蓬勃发展。

#### 4

关于唐代与新罗的科技、文化交流，还有1966年在韩国庆州市发现的《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受到世人的关注。

中国的雕版印刷术约始于公元7世纪初期，即隋唐之间。然后向东方的新罗、日本传播，尔后又沿丝绸之路逐步西传。据原先所知，最早的雕版印本书籍是20世纪初，匈牙利籍英国人斯坦因（M.A.Stein）在中国敦煌莫高窟窃走的唐咸通九年（868）刻印的《金刚般若波罗密经》（下简称《金刚经》），现收藏于英国不列颠博物馆。1966年10月13日，韩国学者在朝鲜半岛东南部的新罗古都——庆州的佛国寺释迦塔内，发现了汉字本《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据考证这个经卷约属公元704—751年（唐武则天长安四年至玄宗天宝十载、新罗圣德王三年至景德王十年）的木版印刷品。

这样，现存于世的最早印刷品的刊印年代，比《金刚经》提前了至少120年左右。这个考古新发现引起了世人的瞩目，当然更引起中国学者的关注，大家希望能目睹这一珍贵文物。但是，前些年，中韩之间尚未建交，考古方面的交流也寥寥无几，不要说亲眼目睹，就是要一张照片也不容易。

应韩国国际交流财团的邀请，陕西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副主任韩国劲作为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代表团成员，于1993年6月6日至14日访问了韩国。韩国劲在《千年经卷传友情——记韩国庆州市赠送现存世界上最古老木版印刷〈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复制品》一文，对赠送该经卷复制品的经过

<sup>①</sup> 参见林趾源：《热河日记》卷十七。

和意义作了具体的说明。<sup>①</sup>这一经卷的复制品，现珍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

据介绍，经卷刚发现时，由于长期的渗水腐蚀和酸化，开头部分的经名、汉译者和经文的前几行已消失，韩国为了保护这个国宝，经卷一直存放在汉城的中央博物馆。关于这个经卷的制作年代，中外学者的看法大多一致，但这个经卷是从哪里来的？是由长安传入庆州的，还是新罗当地的印刷品，目前中外学者尚有不同的看法。

## (二)

隋唐时期，长安与日本的科技、文化交流达到空前繁荣。兹条其荦荦大端，胪述如下：

### 1

**文学** 唐代文学是古代世界文坛中独放异彩的东方艺苑，诗歌则是其中最为鲜艳的花朵。而长安在当时云集着许多全国各地的著名诗人，可以说是这鲜艳花朵盛开的中心地。因此，凡是到达中国的日本人，除学习律令制度、佛教经典及其他技术以外，大都热衷于唐代的诗文。他们在长安广泛搜求中国名著，将“所得赐赆，尽市文集，泛海而还。”<sup>②</sup>从而成为唐代文学的主要传播者。唐朝诗人陆龟蒙在送别日本友人圆载上人的诗句中写道：“九流三丈一时顿，万轴光绩渤海声。从此遗编东去后，却应荒外有诸生。”充分说明唐诗远播日本的盛况。公元9世纪中叶，日本僧人圆仁游学长安等地，从他的《入唐新求圣书目录》中可知，仅他一人带回的唐人诗文集就有《大唐新修宣公卿士庶内族吉凶书仪》30卷、《开元诗格》1卷、《判一百条》1卷等21部。

据日本藤原世佐所编《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记载，到公元9世纪末，传入日本的汉文书籍达1579部，16790卷，其中不少是文学作品。

在唐代诗人中，对日本影响最大的是白居易（下邳，今陕西渭南人）。据《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载，传入日本的有《白氏文集》70卷、《白氏长庆集》29卷。平安时代的诗集《和汉朗诗集》收诗589首，其中白居易的诗达137首。这主要在于白居易的诗通俗易懂，容易被日本人所掌握。另外，白诗平易清新的格调和别开生面的形式，对写腻了齐梁旧格调的日本僧人富有吸引力。尤其是白居易所写的那些表现安分知命、恬淡为怀的闲适诗更与日本上流社会的情

<sup>①</sup> 见《宗教研究论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sup>②</sup> 《旧唐书·东夷倭国传》。

趣相吻合。正是由于这些原因,白居易的诗一传入日本,便深受贵族文人和平民百姓的喜爱,特别是《看炉峰雪》、《草堂夜雨》、《长恨歌》、《琵琶行》等流传更为广泛。著名诗人小野篁是白居易的崇拜者,不仅善作唐诗,而且是评诗的名家。嵯峨天皇为了考验小野篁的评诗水平,故意将白居易诗“闭阁唯闻朝暮钟,登楼空望往来船”句中的“空”字改为“遥”字,说是自己的诗作,送给小野篁评论。小野篁看出说道,若将“遥”字改作“空”字则诗意更佳。这件事充分说明了日本人对白诗了解的深度。白居易对日本文学的影响持续了将近一千年之久,直到江户时代,仍被当做“诗仙”,供奉在京都一乘寺的“诗仙堂”里。

总之,以唐诗为主体的汉文学作品的大量输入,使日本文学产生了全面的唐代现象。在奈良、平安两朝的贵族文坛上,掀起了学习唐诗的热潮,上自天皇,下至一般文士,竞相模仿唐诗,作诗唱和,酬酢往来,一时蔚然成风。公元751年,由熟悉汉字的64位作者模仿汉诗而作的《怀风藻》问世,这是日本第一部汉诗集,收入汉诗117首(一说120首)。到平安时期,规模宏大的诗集《文华秀丽集》、《凌云集》、《经国集》等先后编撰而成,仅《经国集》就收入178位诗人所作的汉诗917首,赋51篇。这些作品大部分是贵族文人采用中国五、七言古体诗的形式所写的应景诗,再现了唐初宫廷文学的流风余韵。

唐代文学的发展变化,直接影响着日本的汉文学。中国文坛上出现什么新体裁,不久就会移植于日本文坛。例如,盛唐时期近体诗流行,尽管这种格律诗的平仄韵律难以掌握,但不久便经由留学僧空海传入日本。公元806年,留学僧空海由长安回国,他精通唐诗和中国音韵,著《文镜秘府论》六卷,对唐诗的平仄对偶作了精确的介绍。从此,近体诗风行日本。与唐诗在日本盛行的同时,具有日本民族特色的诗歌《万叶集》也于公元770年问世了,它显示了生动活泼的唐文化与日本传统文化的融洽与和谐。

**书法** 中国书法艺术发展到唐代,达到了高峰。它与唐诗一样,既是这个时期最普及的艺术,又是这个时期最成熟的艺术。唐代书法,上承魏晋,下启宋元,三百年间,名家辈出,竞相争艳。而作为唐代国都的长安,由于经济繁荣,文化发达,吸引着许多著名的书法家前来寓居。比如,柳公权、韩方明、徐珪、崔邈等人即是寓居长安的著名书法家。日本遣唐留学生和学问僧中有不少人就在长安学习中国书法。从这一点来说,长安在中日书法艺术交流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有唐一代,以宗教为契机,以鉴真、空海等人为先导,架设了中日文化交流的桥梁,从而也正式揭开了中日书法艺术交流的序幕。

东晋王羲之、王献之父子是当时著名的书法家。到了唐代，太宗李世民对王羲之的书法“心摹手书”，推崇备至，认为它“尽善尽美”，古今第一，由此确定了王羲之在中国书法史上“书圣”独尊的地位。鉴真既是一名佛门高僧，又是一位著名的书法家。他在天宝十二年（754），随遣唐使船赴日时，把王羲之的《王右军真迹行书》一帖、王献之《小王献之真迹行书》三帖献给日本宫廷。此后，二王书法及他自己的书法，均成为临摹的范本。贞元二十年（804），日本学问僧空海随遣唐使船入唐抵达长安。他除学习和研究佛学外，还以寓居长安的书法名家韩方明等人为师，钻研各种笔体流派，能写篆、隶、楷、行、草等五种笔体，故有“五笔和尚”的美称<sup>①</sup>。他从王羲之书法入手，转益多师，兼采众家之长，熔于一炉。其墨迹不仅被列为中国书法名家杰作之一，而且在日本书法史上独步千载，永留楷模。空海在长安的墨迹有《三十帖策子》、《与本国使请共归启》等，风格多种多样，直追二王，被誉为“远绍羲献”。空海回国时携有《飞白书》一卷、《德宗皇帝真迹》一卷、《欧阳询真迹》一卷、李邕真迹《屏风书》一卷、《王右军兰亭碑》一卷和《梁武帝草书评》等。

由于空海在长安期间于佛事倥偬之余留心翰墨，他一方面如饥似渴地广泛搜求墨迹和碑帖；另一方面勤于实践，勇于创新，从而在书法艺术上打下了深厚的功底，成为日本著名的书法家。空海回国后的传世代表作有：《灌顶记》、《风信帖》、《临孙过庭书谱》、《临急就章》等。其中前两种三十帖至今完好地保存在日本教王护国寺。空海原为嵯峨天皇的老师，两人有深厚的师友之谊。嵯峨天皇富于文采，长于经史，既是日本词学开山，又为日本书法巨擘。他笔力遒劲，沿着锋利，近似欧阳询之体，而又带有空海笔法的痕迹。他曾把空海看做是王羲之、王献之之后的第一人，并作诗盛赞说：“世上草书谁为圣，天纵不谢张伯英”、“绝妙艺能不可测，二王歿后此僧生。”

与空海同时到达长安的，还有留学生桔逸势。他在长安拜著名书法家柳公权为师，精研柳体书法。他长于隶书，笔力刚健，用笔自由奔放，极尽变化之妙。据传他曾为长安宫门写过榜额，可惜传世的墨迹很少，现今尚存的有《伊都内亲王书愿文》和《兴福寺南圆堂铜灯台铭》两种。

<sup>①</sup> 见叶喆民：《中日书法艺术的交流》，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79年，第一期。与此不同，据日人尾代弘贤论证：“空海因受韩方明《授笔要说》中的五种笔法的启发，书艺大进，故号称‘五笔’。”



空海、嵯峨、桔逸势三人以出色的书法技艺被誉为“三笔”，成为日本书法史上的第一块丰碑。晚于“三笔”的小野道风、藤原佐理和藤原行成由仿唐发展到独创，摆脱了对中国书法的模拟，成功地树立了具有日本民族风格的所谓“和样书法”，从而被誉为“三迹”。然而，无论“三迹”如何突破、变化，但终究仍不失晋唐风范、羲之神韵。正如日本人所评论：“道风得羲之骨”，“左理得羲之皮”，“行成得羲之肉”。

**音乐** 早在日本推古天皇时期，圣德太子就开始由中国引进音乐。到公元7世纪初，日本音乐又传入中国，并被列为隋朝宫廷音乐之一，对唐乐的形成有一定影响。据《册府元龟·朝贡五》记载：

（大中七）日本国遣王子来朝，贡献宝器、音乐。

这是日本音乐、乐器传入长安的可靠记载。与此同时，唐朝的音乐、乐器也陆续传入日本，并对日本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日本早期的乐器只有横笛和六弦琴<sup>①</sup>。琴、箏、琵琶、笙、箫、钟、大鼓、铜钹等唐乐器传入日本后，极大地丰富了日本的乐器品种。公元8世纪初，日本仿照唐朝设立专门音乐机构——“雅乐寮”，并大量输入唐朝乐书、乐器和乐曲。留学生吉备真备由长安回国时，就带回《乐书要录》十卷和定音用的铜律管一部。遣唐大使粟田真人回国时带回唐乐“皇帝破乐阵”、“团乱旋”、“春莺啭”等。遣唐使团中常有音乐家前来长安学习音乐。延历年间舞蹈家久礼真藏随遣唐使入唐，学习唐舞蹈乐曲“春庭乐”。承和时期日本乐师藤原贞敏以遣唐使判官身份来长安，拜刘二郎为师学习弹琵琶。由于他刻苦钻研，两个月内学得“极其妙”，刘二郎赞叹不已，赠以紫檀琵琶两面和曲谱几十卷，并把善弹琴箏的心爱的女儿嫁给他。藤原贞敏回国后，历任“雅乐助”、“雅乐头”等职，“定琵琶四调传入世”<sup>②</sup>，成为日本琵琶权威。在接连派人到达长安学习唐乐的同时，日本朝廷还不断地聘请唐音乐名家赴日本传授唐乐。公元736年，唐音乐家皇甫东朝随遣唐使赴日，被任命为雅乐员外助，对日本音乐艺术的发展作出了很重要的贡献。

**建筑** 长安建筑技术东传日本，是陕西与日本文化艺术交流的重要方面。唐长安城在当时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规范化的宏伟都城。其分区明确、街道整齐、布局划一的建筑格局，标志着中国古代建筑艺术已进入它的全盛

<sup>①</sup> 辻善之助：《日本文化史》，日文本，卷一，第247页。

<sup>②</sup> 《大日本史》卷三百四十三。

时期。它不仅是中国城市建筑上的创造，而且也是世界城市建筑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日本在奈良朝之前，没有固定的首府，只是在大和平原上搬来搬去。天皇每即位一次，首都就搬迁一次，因此，历代京城规模不大。公元708年元明天皇即位，开始又一次派遣遣唐使。也就在这时，唐都长安的建筑格局通过遣唐留学生和留学僧传入日本。于是元明天皇下诏，决定以长安为模型在平城建筑新国都。诏书曰：



图十七 乾陵章怀太子墓出土的打马球图

昔殷王五迁，受中兴之号。周后三定，致太平之称。方今平城之地，四禽叶图，三山作镇，龟筮并从，宜建都邑。<sup>①</sup>

新建的平城京和长安城极为相似：两者都呈方形，宫城都位于城中轴线北部，皇宫北面均有御用园林，长安的叫西内苑，平城京的叫松林苑，城的东南角均有池，长安的叫曲江池，平城京的叫五德池，街巷中线都直对一个城门，均设东、西市，宫城南门都叫朱雀门，中轴线大街均称朱雀大街，街道均为棋盘式。只是“面积有长安的四分之一，东西三十二町，南北三十六町”<sup>②</sup>。日本史学家称它为“富有国际性的小长安”，是恰如其分的。公元710年元明天皇迁入平城京，后有六位天皇以该京作为国都未曾迁都，历时70余年。公元794年，桓武天皇迁入新都平安京。平安京的布局更新近于唐都长安，甚至袭用长安城门的名称，如殷富门等。为了使首都的布局更加完备，桓

① 《续日本书纪》和铜元年二月戊寅条。

② 井上清《日本历史》(上)第67页。

武天皇命令五位以上及平民中的富有者，在京城内按长安住宅结构建筑自己的宅邸。

寺庙建筑在日本古代建筑史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自唐建国以后，日本寺庙建筑的布局、风格、雕塑、绘画均受唐而尤其是长安的影响。例如，在长安学习三论、法相的道慈，曾绘制唐高宗建造的巍峨辉煌的长安西明寺平面图，回国后于公元729年仿西明寺建大安寺。

**体育、娱乐** 发源于波斯的波罗球——一种马上打球的游戏，于唐太宗时传至京城长安。由于太宗酷嗜此游戏，遂在社会上盛极一时，上自达官显贵，下至一般士人，莫不相习成风。长安的月登阁在当时有一个大型的马球场，甚至在大明宫和禁苑中也设有球场。1955年在大明宫遗址出土的一块石碑上刻着“含光殿及球场等，大唐大和辛亥己未年建”的字样，可见史籍记载可信。另外1971年在乾陵章怀太子墓又出土了《打马球图》。这项体育活动约在公元8世纪时由长安传入日本，风行日本列岛。

在娱乐方面，围棋即由长安传入日本。围棋最早出现于中国战国时代，唐时已经成为一种比较盛行的民间文化娱乐活动。来到长安的日本留学生和留学僧，有不少人善围棋。留学生吉备真备即在长安学会围棋，并由他把这一娱乐活动带回日本，后很快普及于日本列岛。再如留学僧弁正亦系围棋高手，他长期寓居长安，经常与皇太子时的唐玄宗对弈，颇得玄宗喜爱。后来在长安还俗，与唐女子结婚。在日本正仓院至今还保留着绘有“松下围棋图”和精制的唐式围棋盘。这是长安与日本在围棋这一文化娱乐活动方面进行交流的最好见证。另外，据《旧唐书·宣宗本纪》记载：“大中二年（848）日本国人朝贡方物，王子善棋，帝内侍诏顾师言与之对手。”顾师言当为当时长安的围棋强手，他和日本王子下了三十二子还未决胜负，可见日本的围棋技巧已有相当高的水平。后来到9世纪，遣唐使团中常有围棋名手随行抵达长安进行比赛。至平安时代，围棋已在日本上层社会的妇女中流传开来，后渐渐传至民间。

**茶道** 茶为中国的名产，同时也是中国人民最早发明的饮料。公元前11世纪，中国古籍就已出现有关茶的记载。饮茶之风的普及约在唐代，盛唐是推广期，中唐是极盛期。盛唐时，李白、杜甫已有咏茶的诗句。日本人知道“茶”的知识是从唐朝开始的。以大批遣唐使、遣唐留学生、僧为媒介，中国的饮茶习俗约在公元7世纪末或8世纪初传入日本。不过，遣唐使带回去的茶叶尚属达官显贵的奢侈品，到公元805年，中国茶籽才由学问僧永忠带

回日本，于公元 811 年在滋贺县种植。此后，茶籽传遍日本列岛，到处开花结果。茶叶传入日本，开始用于制药，至平安时期已兴起喝茶之风。当时日本人饮茶采用唐代砖茶煮法，即把茶叶碾碎、筛细，加甘葛、生姜，用水调成糊状饮服。正因此，古籍中称用茶为“吃茶”。后到公元 12 世纪，日僧荣西总结各地群众对茶叶的实际运用，写成《吃茶养生记》，论说茶的功能，并上奏朝廷，使饮茶更为普遍地得到推广。到镰仓时代（1192—1333），种茶、饮茶已风靡日本全岛。上层统治者通过茶会炫耀富贵，僧侣们以茶会布置弘法，民间则以茶会联谊。饮茶已成为日本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种娱乐活动。到室町时代（1338—1573），奈良僧人村田珠光把上层社会品茶论质的内容和民间茶会的简易形式相结合，遂将唐代的单纯饮茶发展为一种娱乐性的社会交际艺术——“茶道”，它“已从单纯的趣味娱乐前进成为表现日本人日常生活文化的规范和理想”<sup>①</sup>。

## 2

长安作为唐帝国的首都，不仅是一个世界性都市，而且是国际贸易和文化交流的中心，在当时云集着四五千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国人。其中有相当数量的留学生。根据日本学者木宫泰彦的研究，名留史册的日本遣唐学生共有 33 名<sup>②</sup>，兹列表如下：

表 1-3-9

日本遣唐学生求学表

姓 名	入唐年代和船只	回归年代和船只	留学年限	备 注
臣势臣药	公元 653 年(日白雉四年,唐永徽四年),遣唐大使吉士长丹船	不详	不详	
冰连老人	同上	公元 654 年(日白雉五年,唐永徽五年),遣唐大使吉士长丹船	2	
坂合部石积(磐积)	同上	不详	不详	奏天武天皇朝敕,撰《新字》一部,四十四卷。

① 姜晚成《日本的茶道》，载《日语学习与研究》1980年第1期。

② 木宫泰彦著，胡锡年译：《日中文化交流史》，商务印书馆 1980年版，第 126—144 页。

续表一

姓名	入唐年代和船只	回归年代和船只	留学年限	备注
高黄金	同上?	公元 654 年(日白雉五年,唐永徽五年)? 遣唐大使吉士长丹船	2?	
向人连御厩	公元 657 年(日齐明三年,唐显庆二年)	公元 657 年	1	遣使到新罗,欲使新罗遣使送至唐朝,因新罗不同意,遂未入唐而回国。
依网连稚子	同上	同上	1	同上
筑紫君萨野马	不详	公元 671 年(日天智十年,唐咸亨元年)	不详	和留学僧道文一同回国
韩岛胜娑婆	不详	同上	不详	与僧道文、筑紫君萨野马、布师首磐等一同回国
布师首磐	不详	同上	不详	与僧道文、筑紫君萨野马、韩岛胜娑婆等一同回国
土师宿祢甥	不详	公元 685 年(日天武十三年,唐垂拱元年)新罗船	不详	
白猪史宝然	不详	同上	不详	
山田史御形(留学新罗?)	不详	持统朝	不详	回国后教授生徒,又任周防守。《怀风藻》、《万叶集》中收有他的诗歌

续表二

姓名	入唐年代和船只	回归年代和船只	留学年限	备注
吉备真备	公元 717 年(日养老元年,唐开元五年)遣唐押使多沼比县守船	公元 734 年(日天平六年,唐开元二十二年)遣唐大使多沼比广成船	18	在长安学习经史。回国时带回《唐礼》一百三十卷、《大衍历经》一卷、《大衍历立成》十二卷、测影铁尺一枚、铜律管一部、铁如、方向、写律管声十二条、《乐书录要》十卷及弓箭等。公元 752 年(日天平胜宝四年)以遣唐副使再度入唐。
大和长冈	同上	同上?	18?	在长安学刑名之学,回国后与吉备真备共同删定律令二十四条。官至右京大夫正四位。
阿倍仲麻吕	同上			在长安入太学,学成后,于公元 753 年(日天平胜宝五年)随遣唐使藤原清河回国,因漂流安南,又折回长安,在唐任官,后终老唐土。
秦大麻吕	公元 733 年(日天平五年,唐开元二十一年)?遣唐大使多沼比广成船	公元 734 年(日天平六年,唐开元二十二年)?遣唐大使多沼比广成船	2?	赴唐请益生,遣唐使以其请益门答六卷献于朝廷。
金文学	不详	不详	不详	原名不详。《文苑英华》有沈颂《送金文学还日本》诗。《异称日本传》以为金文学就是吉备真备。

续表三

姓名	入唐年代和船只	回归年代和船只	留学年限	备注
褚(山人)	不详	不详	不详	原名不详。《文苑英华》有贾岛《送褚山人归日本》诗。
朴(山人)	不详	不详	不详	原名不详。《文苑英华》有释无可《送朴山人归日本》诗。
膳大丘	公元 752 年(日天平胜宝四年,唐天宝十一年)遣唐大使藤原清河船。	不详	不详	在长安入国子监学儒学。回国后任大学助教。公元 768 年(神护景云二年)七月,奏请仿唐例尊孔子为文宣王。
藤原刷雄	同上?	不详	29?	藤原仲麻吕之子,因坐仲麻吕之乱流放隐岐。后遇赦,任大学头。
船连夫子	不详	公元 754 年(日天平胜宝六年,唐天宝十三年)	不详	天平胜宝六年十一月授从五位下,辞不受。
高内弓	不详	公元 763 年(日天平宝字七年,唐宝应二年)日本遣渤海使板振镰束船。	不详	在唐结婚,后携妻女经渤海回国。中途遇风暴,妻女被抛入海。
伊豫部家守	不详	公元 778 年(日宝龟九年,唐大历十三年)遣唐使小野石根船	不详	入唐学五经大义、切韵、说文字体,回国后任大学教授。
栗田饱田麻吕	不详	公元 805 年(日延历二十四年,唐贞元二十一年)。遣唐大使藤原葛野麻吕船。	不详	日延历二十四年十月,叙正六位上。

续表四

姓名	入唐年代和船只	回归年代和船只	留学年限	备注
丹福成 (最澄 谦从)	公元 804 年(日延历二十三年,唐贞元二十年)遣唐副使石川道益船。	同上	2	以最澄的 谦从身份入唐。
桔逸势	公元 804 年(日延历二十三年,唐贞元二十年)遣唐大使藤原葛野麻吕船	公元 806 年(日大同元年,唐元和元年)遣唐使判官高阶远成船	3	在长安历访明哲受业,人称“桔秀才”。善书,与嵯峨天皇、空海被世人并称为“三笔”。
春苑宿 祢玉成	公元 838 年(日承和五年,唐开成三年)遣唐大使藤原常嗣船	公元 839 年(日承和六年,唐开成四年)? 遣唐使船?	2?	以遣唐阴阳师兼阴阳诸益身份入唐,得《难义》一卷而归,教授阴阳寮学生。
菅原梶成	同上	同上	2	因通晓医术,奉命入唐留学。回国后任针博士,后任侍医。
刀岐雄贞				理应随遣唐使入唐留学,但因逃匿被流放到佐渡。
佐伯安道				同上。
志斐永世				同上
长岑宿祢	公元 838 年(日承和五年,唐开成三年)遣唐大使藤原常嗣船	公元 839 年(日承和六年,唐开成四年)? 遣唐使船	2?	留学僧圆载曾托他带回书信四封、黑角如意一柄,送到睿山。



实际上，上表所列三十三人之中，向人连御厩、依网连稚子、山田史御形、丹福成、刀岐雄贞、佐伯安道、志斐永世七人不能算作真正的遣唐留学生。因为向人连御厩和依网连稚子原本托新罗船送他们入唐，但未能成行而回国；山田史御形不是留唐，而是留学新罗；丹福成的身份是谦从；刀岐雄贞、佐伯安道和志斐永世三人虽经指派，但不愿入唐，遂遭到流放，并未出国。

遣唐留学生和学问僧大多搭乘遣唐使船入唐抵达长安，因为在十八次遣唐使中，除个别次数外（如天智朝遣唐使是由于百济和唐朝的政治关系而派遣的），基本上都是为了输入唐帝国的政治、经济制度而派遣的。这也就是说，遣唐使的主要任务之一即是迎送留学生和学问僧。不过，遣唐使的派遣平均只是每二十年一次，因此，入唐心切的留学生和学问僧便有不待派遣而自行搭乘便船入唐的，但为数不会太多。

据木宫泰彦考证，一次遣唐使所带的留学生和学问僧大致在十数人，至多不会超过二三十人<sup>①</sup>。如第十七次遣唐使所带留学生、僧已知者有十五人：春苑宿祢玉成、菅原梶成、长岑宿祢、圆行、常晓、戒明、义澄、圆仁、惟正、惟晓、圆载、仁好、圆觉、顺昌、仁济。日本遣唐使大致有十二次送来留学生和学问僧。据木宫泰彦的研究，留学生不能多派的原因在于，留学生都是从贵族子弟和僧侣平素以有才华而闻名的人物中分别按专业挑选出来的，朝廷一旦命令他们留学之后，就要分别给予相当的待遇，所以无论从人才或从经费上考虑，一次要派遣几百名留学生都是不可能的<sup>②</sup>。而我国学者胡锡年则认为，留学生不能多派主要不是经济方面的原因，而在于长安接受留学生的机构国子监名额限制很严，不能更多接受日本留学生<sup>③</sup>。

留学生在长安学习，若仅就年限来说，可分为长期留学和短期进修两种类型。如果以学习方式和年限为标准，可区分为一般留学生、请益生和还学生。一般留学生学习年限较长，尤其是在文武朝以前和以后的奈良时代，很多人长达十年或二十余年。这一方面是由于他们无限仰慕高度发达的唐文明，力图长期留居长安以彻底汲取和消化。另一方面是因为除了遣唐使船以外，没有其他船可以搭乘，只好等一二十年乘下次遣唐使船回国。到平安时代，留学生的学习年限大大缩短，一般是一二年，很少有超过五年的。这主

①② 木宫泰彦著、胡锡年译：《日中文化交流史》，商务印书馆 1980 年版，第 154 页。

③ 胡锡年：《唐代的日本留学生》，载中国日本史研究会编《日本史论文集》，三联书店 1982 年版。

要是由于日本经过多年苦心学习，已基本上吸收了唐文明的精华，只是需要补充一些不足之处而已，从而使得这一时期留学生的派遣更富有目的性和针对性，再不像从前那样毫无计划地漫然留学。与此相适应，出现了请益生和还学生。所谓“请益生”是指已经受过教育但还要进一步请教的人，也就是说他们在国内已经学有所长，但仍有某些疑难问题需要入唐请教和深造，类似于今天的进修生或访问学者。例如菅原梶成即为请益生，他通晓医术，入唐请教，回国任针博士，并成为天皇的御医（侍医）。再如有名的请益生春苑宿祢玉成，以遣唐阴阳师兼阴阳请益生身份入唐求教，获《难义》一卷，归国后用以教授阴阳寮的学生。所谓“还学生”大体上也是如此，所不同的只是随同遣唐使同去同回罢了。

和遣唐使的选拔一样，留学生的选拔以注重仪表、学术修养诸方面。其中入选的既有出身名门望族的，也有一般官僚的子弟。例如，藤原刷雄即出身于大官僚贵族，其父藤原仲麻吕官至太师（太政大臣）。而桔逸势，其父入居任右中弁，官位不过从四位下。古备真备的父亲下道国胜任右卫士少尉，更属下级武官。一般来说，选拔留学生的标准主要是学业，正如《慈觉大师》中所说：“近者朝廷遴选遣唐留学生，随业择人。”

据《延喜式》卷三十记载，遣唐留学生在启程前，朝廷对他们的赏赐很优厚，仅次于大使，几乎与副使相等。赏赐的物品有：

留学生给绝四十匹、绵一百屯、布八十端。请益生给绝五匹、绵三十屯、布十六端。留学生的僮从给绝四匹、绵二十屯、布十三端。这些物品用以充作留学生入唐后的学费。

遣唐留学生不论留学时间长短，都要按照唐朝的风俗习惯，在衣、食、住、行方面和唐人一样生活，有些人甚至连姓名也改成唐式的，如阿倍仲麻吕改名朝衡（亦称晁衡）。尤其是还有人娶唐妇为妻，生儿育女，如留学生高内弓即娶唐妻高氏。

留学生入唐以后，大都随从遣唐使前往长安，进入国子监（最高学府）所属六学馆（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之一学习专业。例如，阿倍仲麻吕即在大学学习<sup>①</sup>。而像大和长冈那样的留学生，很就可能就学于律学馆专门学习法律，他自动爱好刑名之学，潜心钻研，后与吉备真

<sup>①</sup> 唐储光羲《洛中贻朝校书衡》一诗中说：“伯鸾游太学，中夜一相望。”王维《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国并序》亦云：“名成太学，官至客卿。”

备入唐请益，归日后两人共同删定律令二十四条<sup>①</sup>。当时，国子监学生（包括外国留学生）的食宿由政府供给。<sup>②</sup>

据《文献通考·学校考》，唐时《孝经》和《论语》是学校的公共必修课，每人均须修读。另外，以大经（《礼记》、《春秋》）、中经（《诗经》、《周礼》、《仪礼》）、小经（《易》、《尚书》、《公羊传》、《穀梁传》）作为选修课，要求学生按规定搭配修读。日本留学生在长安国子监，当以此为主要学习内容。不过，留学生还可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爱好在学习和钻研上有所侧重，也就是说在学习上述内容的同时，还可以学习其他方面的知识。如伊豫部家守在长安学完五经大义后，又学习切韵、说文字体等，而桔逸势于书法、阿倍仲麻吕于诗文则多所钻研。尤其是吉备真备，更是无所不学，举凡天文、历法、军事、音乐等都在他的研究范围之内。

国子监每年进行考试，及格者再由吏部考核，如果通过方可做官。外国留学生亦可像中国学生一样参加考试。阿倍仲麻吕可能就是在国子监学习期间通过国家考试而步入仕途的。

留学生在长安学习期间，可以与中国方面的同学、朋友及师长自由来往而不受限制，而且彼此之间有十分深厚的感情。例如，李白和阿倍仲麻吕即过从甚密，感情深挚。

在众多的遣唐留学生中，最为著名者当推阿倍仲麻吕和吉备真备。正如《续日本书纪》所说：“我朝学生播名唐国者，唯大臣及朝衡而已。”<sup>③</sup> 大臣即吉备真备，因为他官至右大臣，朝衡是阿倍仲麻吕的汉名。

阿倍仲麻吕（701-770），大和国（今奈良县）人。其父阿倍船守，任中务大辅，为中级官吏。阿倍仲麻吕少年好学，十六岁时被选为遣唐留学生。次年，亦即开元五年（717）十月一日随第八次遣唐使到达长安。入国子监的太学学习，广泛钻研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及民俗，学习勤奋，并以优秀的成绩考取唐朝进士，开始步入仕途，成为日本留学生中第一位（也是惟一的）通过科举考试而取得官职的人。他初任司经局校书，在左春坊为太子李瑛伴读。深受唐玄宗赏识，赐名“晁衡”（朝衡）。开元十九年（731）担任左拾遗，不久又升任左补阙。与当时云集长安的著名诗人王维、李白、

① 《续日本书纪》延历十年三月丙寅条。

② 《唐会要》卷三十六。

③ 《续日本书纪》宝龟六年十月壬戌条。

储光羲、包佶、赵晔等有莫逆之交。比如王维曾称赞他“结发就圣，负笈辞亲，问礼于老聃，学诗于子夏。”<sup>①</sup>晁衡爱好诗文，擅长歌咏，此时深受这些诗界名流的熏陶，诗歌的造诣亦愈益深厚。

开元二十一年（733），以多治比广成为首的第九次遣唐使抵达长安，次年秋天启程回国。十七年前和晁衡一同来到长安的吉备真备、玄昉、大和长冈即随同此次遣唐使回国。晁衡也想一起回国，遂以亲老为由，上奏玄宗，然未得玄宗许可。事后晁衡写了这样一首诗：

慕义名空在，俞忠孝不全。  
报恩无有日，归国定何年。<sup>②</sup>

抒发了自己忠孝不能两全的苦闷心情。

后来晁衡又升任仪王友职（从五品下）<sup>③</sup>。天宝十一载（752），第十次遣唐大使藤原清河出使长安。是年，晁衡迁升卫尉少卿（从四品上），仕唐已三十六年。他再次上表请归，玄宗不忍强行挽留，特令以护送使身份回国。并为表彰他在仕唐期间的功绩，特进升一级，授以秘书省的秘书监并卫尉寺的卫尉卿（从三品）的高官。

晁衡在临启程回国前，长安的朋友纷纷前来送行。尚书右丞王维在送别宴会上写了《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国并序》，诗云：

积水不可极，安知沧海东。  
九州何处天，万里若乘空。  
向国惟看日，归帆但信风。  
鳌身映天黑，鱼眼射波红。  
乡树扶桑外，主人孤岛中。  
别离方异域，音信若为通。<sup>④</sup>

惜别之情跃然纸上。晁衡更是依依不舍，对他工作、生活了三十六年的第二故乡、君主、友人颇有一番留恋之情。于是随即写了《衔命还国作》一诗作答，并解下多年随身宝剑，赠友人留念。其诗如下：

衔命将辞国，非才忝侍臣。  
天中恋明主，海外忆慈亲。

①④《王右丞集》卷十二。

②《群书类从》卷二八五。

③据《旧唐书》记载，玄宗第十二皇子李璿于开元十三年五月被封为仪王。“仪王友”的职责是陪游侍居，规讽道义。

伏奏违金阙，骝驹去玉津。  
蓬莱乡路远，若木故园邻。  
西望怀恩日，东归感义辰。  
平生一宝剑，留赠结交人。<sup>①</sup>

离开长安之后，晁衡陪同藤原清河大使、大伴古麻吕副使等人至扬州延光寺拜谒鉴真法师，并邀请他一同去日传法。后鉴真在苏州登上大伴古麻吕的乘船<sup>②</sup>。遣唐使团决定于十一月十六日在苏州黄泗浦启程，十五日晚，晁衡与友人在船头话别。皓月当空，思乡之情油然而生，他不禁用日文咏和歌“望月”一首，在日本广为流传。

四艘遣唐使船离开苏州顺江而下，顺利到达阿尔奈波（冲绳）岛。后在从该岛向奄美岛前行途中，突遇风暴，晁衡与藤原清河所乘第一船被狂风吹到南海的驩州（安南）。其余三船经过几天几夜与风暴搏斗后，终于回到日本。当时，人皆以为第一船已在海上遇难，噩耗传至长安，李白深感悲痛，当即写了《哭晁卿衡》一诗以示哀悼：

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  
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sup>③</sup>

然而，“明月”并未“沉碧海”。船漂到安南后，遭到当地人的袭击，全船一百八十余人中惟藤原清河和晁衡等十余人幸免于难<sup>④</sup>。他们辗转回至长安，已是天宝十四载（755）六月。不久，安禄山发动叛乱，晁衡和藤原清河随玄宗往蜀地避难。至德二年（757）底回到长安。与玄宗一样，肃宗也特别赏识晁衡的才能，上元年间（760—761）授他以左散骑常侍（从三品）之职，掌侍奉与规讽，是一种顾问性质的官职。这时，安南生蛮侵得化、龙武境，肃宗命晁衡去解决，并委任为镇南都护。永泰二年（766），升任安南节度使（正三品）。任满回返长安。据《续日本书纪》记载，他还做过光禄大夫兼御史中丞，封北海郡开国公<sup>⑤</sup>。

① 《文苑英华》卷二九六。

② 《大唐和上东征传》，汪向荣校注本，中华书局，第83—90页。

③ 《李太白集》卷二五。

④ 《古今和歌集目录》第十六辑。

⑤ 《续日本书纪》承和三年五月戊申条。



图十八 阿倍仲麻吕纪念碑

大历五年（770）一月，晁衡卒于长安，享年七十岁（一说73岁）。唐朝廷为了表彰其功，追封为路州大都督（从二品）<sup>①</sup>。公元779年，光仁天皇以“前学生阿倍朝臣仲麻吕在唐而亡，家口单乏，葬祭有阙，敕赐东纒一百匹，白绵三百屯”<sup>②</sup>，托唐使孙兴进回国时带回，以祭奠亡灵。公元836年，仁明天皇追赠阿倍仲麻吕为正二位，并赞扬他“身涉鲸波，业成麟角。词峰耸峻，学海扬漪。显位斯升，英声已播”<sup>③</sup>。

阿倍仲麻吕在唐生活长达五十余年，历仕玄宗、肃宗、代宗三朝。可以说，他把一生贡献给了中日两国人民的文化交流事业。正因为这一点，阿倍仲麻吕逝世后，两国政府都给予他崇高的荣耀。尤其是在历时一千二百多年的今天，中日两国人民依然在怀念着这位文化交流的著名使者，分别在西安（今兴庆公园内建有“阿倍仲麻吕纪念碑”）和奈良为他树立纪念碑，以作为中日人民长期友好的象征。

吉备真备（695—775），原姓下道朝臣。公元716年被选拔为遣唐留学生，时年二十二岁。次年和阿倍仲麻吕等人，随同等八次遣唐使抵达长安。

① 《续日本书纪》承和三年五月戊申条。

② 《续日本书纪》宝龟十年五月丙寅条。

③ 《续日本书纪》承上三年五月戊申条。

在长安期间，他博览经、史、天文、算术、历道等方面的书籍，可以说是无所不学。正如《续日本书纪》评价说：“留学受业，研览经史，该涉众艺。”在勤奋学习的同时，吉备真备还努力搜购典籍，并尽力吸收唐的先进科技、军事等知识。公元735年他回国后，献给朝廷的物品有：《唐礼》一百三十卷、《大衍历经》一卷、《大衍历立成》十二卷、测影铁尺一枚、铜律管一部、铁如、方响、写律管声十二条、《乐书要录》十卷、弘缠漆角弓一张、马上饮水漆角弓一张、露面漆四节角弓一张、射甲箭二十只、平射箭十只<sup>①</sup>。另外，还有《东观汉记》一百三十三卷。在众多的遣唐留学生中，吉备真备带回物品、典籍最多。他是先进的唐文化哺育出来的卓越而博学的学者，学成回国以后在教育、文化、军事、建筑等方面都有程度不等的建树，对推动日本文化的发展和中日文化交流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 3

与遣唐留学生不同，遣唐学问僧是指以钻研佛教为主的僧侣。据木宫泰彦的考证，遣唐学问僧共有116名<sup>②</sup>。兹列表如下：

表 1-3-10 日本遣唐僧侣求法表

人名	入唐年代和船只	回国年代和船只	留学年限	备注
道严	公元653年(日白雉四年,唐永徽四年),遣唐大使吉士长丹船	不详	不详	
道通	同上	不详	不详	
道光	同上	公元678年(日天武六年唐仪凤三年)	26	在唐学律宗。著有《四分律抄撰录文》一卷。
惠施	同上	不详	不详	文武天皇二年(公元698年)任僧正。
觉胜	同上			歿于唐。
弁正	同上	不详	不详	
惠昭	同上	不详	不详	

① 《续日本书纪》天平七年四月辛亥条。

② 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胡锡年译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26—149页。

续表一

人名	入唐年代和船只	回国年代和船只	留学年限	备注
僧忍	同上	不详	不详	
知聪	同上			歿于海上
道昭(道照)	同上	公元 661 年(日齐明七年,唐龙朔元年)遣唐副使津守吉祥船?	9?	在长安从玄奘学法相宗,后又学禅宗。为日本法相传第一传。归国时携回许多经论。在元兴寺建禅院居住。后周游全国,从事修桥、掘井等社会公益事业。文武天皇四年圆寂,遗言火葬,是为日本火葬之始。
定惠(贞慧)	同上	公元 665 年(日天智四年,唐麟德二年)唐使刘德高船	13	中臣镰足之子。在长安惠日道场从神泰学习。回国后开多武峰。
安达	同上	不详	不详	中臣渠每连之子
道观	同上	不详	不详	春日粟田臣百济之子
智辨	同上	不详	不详	
义德	同上	公元 692 年(日持统四年,唐天授三年)新罗使节金高训船	28	
惠妙	同上			歿于唐
智国	同上			歿于唐
智宗	同上	公元 692 年(日持统四年,唐天授三年)新罗使节金高训船	28	
觉胜	同上			歿于唐
义通	同上?			歿于海上



续表二

人名	入唐年代和船只	回国年代和船只	留学年限	备注
妙位	同上	公元 654 年(日白雉五年,唐永徽五年)遣唐大使吉士长丹船	2?	
法胜	同上	同上	2?	
道福	公元 653 年(日白雉四年,唐永徽四年)遣唐大使高田根麻吕船	不详	不详	赴唐途中,在萨摩国萨麻郡海上船破溺水而死。
义向	同上			同上
智通	公元 658 年(日齐明四年,唐显庆三年)新罗船	不详	不详	在长安从玄奘学无性正生义,为日本法相宗第二代祖师。在大和开创观音寺,天武天皇元年(公元 673 年)任僧正。
智达	同上	不详	不详	与智通同时入唐,从玄奘学习。为日本法相宗第二代祖师。
行善 (留学高丽)	齐明朝?	公元 718 年(日养老二年,唐开元六年)	不详	《续日本书纪》养老五年条所载诏书曰:“沙门行善,负笈游学,既经七代,备尝难行,解三五术,方归本乡,矜赏良深。如有修行,天下诸寺,慕敬供养,一同僧纲之例。”据此可知他于齐明朝留学,而且是有德的僧人。

续表三

人名	入唐年代和船只	回国年代和船只	留学年限	备注
道文 (道久)	不详	公元 671 年(日天智十年,唐咸亨二年)	不详	唐使郭务棕将率二千人分乘四十七只船前来日本时,先遣道文赴日,传达此意。据《日本书纪》记载,道文不是使僧,而是遣唐留学僧。
智藏	天智朝	持统朝		入唐从高学尼学习,抄回《三藏要义》。为日本三论宗第二代祖师。七十三岁时被任为僧正。
观常 (新罗留学)	不详	公元 686 年(日天武十三年,唐垂拱二年)遣新罗使高向麻吕船	不详	
云观 (留学新罗)	不详	同上	不详	
智隆 (留学新罗)	不详	公元 687 年(日持统元年,唐垂拱三年)新罗使船	不详	
明聪 (留学新罗)	不详	公元 689 年(日持统三年,唐永昌元年)新罗船	不详	
观智 (留学新罗)	不详	同上	不详	和明聪一同由新罗使送回日本,《扶桑略记》庆云四年十月条说:“请新罗留学僧观智讲维摩诘两本经。”可知他留学新罗。

续表四

人名	入唐年代和船只	回国年代和船只	留学年限	备注
净愿	不详	公元 690 年(日持统四年,唐天授元年)新罗使节金高训船	不详	
弁通 (留学新罗)	公元 693 年(日持统七年,唐长寿二年)新罗使船	不详	不详	和神睿一同留学新罗。公元 712 年(和铜五年)任少僧都
神睿 (留学新罗)	同上	不详	不详	元兴寺僧,公元 719 年(养老三年)其赏其学德,赐食封五十户。和大安寺的道慈并称为释门秀者。
弁正	公元 702 年?(日大宝二年,唐长安二年)第七次遣唐使船?		不详	俗姓秦氏,于公元 653 年入唐的弁正不是一人。入唐谒玄宗,因善围棋而得宠。在唐结婚生子,并终老唐土。其子秦朝元回日。
道慈	公元 702 年(日大宝二年,唐长安二年)遣唐执节栗田真人船	公元 718 年(日养老二年,唐开元六年)遣唐押使多治比县守船	17	在长安学习三论法相。回日后成为日本三论宗的第三代祖师,和神睿并称为释门秀者。著有《愚志》一卷,论僧尼事。依唐长安西明寺规模,在平城京建大安寺。

续表五

人名	入唐年代和船只	回国年代和船只	留学年限	备注
智凤	公元 703 年(日大宝三年,唐长安三年)	不详	不详	在唐从濮阳智周学法相宗,为日本法相宗的第三代祖师。后任维摩会讲师。
智鸾	同上	不详	不详	从濮阳智周学法相宗,为日本法相宗第三代祖师。
智雄	同上	不详	不详	同上
胜晓	大宝年间	不详	不详	公元 720 年(养老四年)与唐僧道荣共同订正转经唱礼处。
义法 (留学新罗?)	不详	公元 707 年(日庆云四年,唐景龙元年)新罗船?	不详	
义基 (留学新罗?)	不详	同上?	不详	
总集(总集) (留学新罗?)	不详	同上?	不详	
慈定 (留学新罗)	不详	同上?	不详	
净达 (留学新罗)	不详	同上?	不详	
玄昉	公元 717 年(日养老元年,唐开元五年)遣唐押使多治比县守船	公元 734 年(日天平六年,唐开元二十二年)遣唐大使多治比广成船	18	在唐从濮阳智周学法相宗,带回经论五千余卷及各种佛像,为日本法相宗第四代祖师。

续表六

人名	入唐年代和船只	回国年代和船只	留学年限	备注
理镜	同上?	公元 736 年(日天平八年,唐开元二十四年)?遣唐副使中臣名代船?	20?	在唐邀请南天竺婆罗门僧正菩提仙那来日,相偕回日。
智藏	不详	不详	不详	《文苑英华》有题为“赠日僧智藏”的刘禹锡的诗。与天智朝入唐的智藏不是同一人。
鉴(禅师)	不详	不详	不详	原名不详。《文苑英华》收自英空图“赠日本鉴禅师”诗。
荣睿	公元 733 年(日天平五年,唐开元二十一年)遣唐大使多治比广成船			在洛阳、长安等地学习。后与普照邀请鉴真东渡。前后五次渡海不成,备尝艰苦,积劳成疾,病死于端州龙兴寺。
普照	同上	公元 753 年(日天平胜宝五年,唐天宝十二载)遣唐副使吉备真备船	21	与荣睿一起入唐。在长安、洛阳等地学习。后欲迎鉴真东渡,五次渡海失败,至第六次随遣唐使回国。公元 759 年(天平宝字三年)奏请日本朝廷在城外道路两旁栽植果树。

续表七

人名	入唐年代和船只	回国年代和船只	留学年限	备注
业行	同上?	同上?	21?	据《续日本书纪》天平宝字七年五月戊申条记载,业行曾与荣誉一起邀请鉴真渡日。业行是否即是普照的别字,或为另一人,不详。
玄朗	同上	公元 743 年(日天平十五年,唐天宝二年)?	11?	在唐期间计划与荣誉、普照共邀鉴真渡日,在做渡海准备时,以通海盗嫌疑被逮捕入狱。后被释放,自行回国。
玄法	同上	同上?	11?	同上
行贺	公元 752 年(日天平胜宝四年,唐天宝十一载)遣唐大使藤原清河船	公元 781 年(日天应元年,唐建中二年)送唐客使布势清直船	29?	在唐学唯识、法相两宗。回国时带《圣教要文》五百余卷。删改《法华经疏弘赞略》、《唯识金议》四十余卷。公元 796 年(延历十五年)任大僧都。
戒融	不详	公元 763 年(日天平宝字七年,唐宝应二年)送渤海使板振镰束船	不详	

续表八

人名	入唐年代和船只	回国年代和船只	留学年限	备注
戒明	公元 752 年? (日天平胜宝四年, 唐天宝十一载) 遣唐大使藤原清河船?	公元 778 年(日宝龟九年, 唐大历十三年) 遣唐副使小野石根船	27?	与得清共携圣德太子所著《胜鬘经义疏》及《法华经义疏》入唐, 赠给扬州龙兴寺僧灵祐。游金陵时于志公宅得十一面观音画像, 回国后安置于大安寺。反对《大佛顶经》为经说。
得清	同上?	不详	不详	与戒明共携《圣鬘经义疏》、《法华经义疏》入唐, 赠给扬州龙兴寺僧灵祐。
善议	同上?	公元 778 年(日宝龟九年, 唐大历十三年)? 光仁船遣唐使船	27?	曾从大安寺道慈学习, 入唐深造。回国后仍住大安寺, 被称为三论宗法将。公元 812 年(弘仁三年)以八十四岁圆寂。
永忠	公元 777 年(日宝龟八年, 唐大历十二年)? 遣唐副使小野石根船?	公元 805 年(日延历二十四年, 唐贞元二十一年)? 遣唐大使藤原葛野麻吕船?	29	从唐携回《律吕旋宫图》、《日月图》各二卷, 律管十二枚、埙二枚。住近江梵释寺。遍涉经论, 解音律, 善摄威仪, 斋戒无缺, 任大僧都。

续表九

人名	入唐年代和船只	回国年代和船只	留学年限	备注
最澄	公元 804 年(日延历二十三年,唐贞元二十年),遣唐副使石川道益船	同上	2	入唐从道邃、行满学天台宗,后又学密教。带回大批经疏、佛画、佛具。公元 806 年(延历二十五年)上表请增设天台宗一派,在比睿山设戒坛院,未果即死。死后嵯峨天皇赐延历寺敕额,清和天皇敕许设戒坛院,并追赐“传教大师”谥号,是为日本大师称号的开始。
义真	同上	同上	2	最澄弟子,因精通唐音,作为最澄译语入唐。公元 832 年(天长九年)敕令为天台座主,为此任之始。
空海	公元 804 年(日延历二十三年,唐贞元二十年)遣唐大使藤原葛野麻吕船	公元 806 年(日大同元年,唐元和元年)遣唐判官高阶远成船	3	入唐在长安青龙寺从惠果学密教。回国时带回大批经典、佛像、佛具等物。擅长诗文、书法,受到嵯峨天皇宠遇。公元 816 年(弘仁七年)在纪野高野山建金刚峰寺。公元 823 年(弘仁十四年)在京都东寺建真言弘通道场。死后醍醐天皇追赐谥号“弘法大师”。



续表十

人名	入唐年代和船只	回国年代和船只	留学年限	备注
灵仙	公元 804 年(日延历二十三年,唐贞元二十年)? 桓武朝遣唐使船?			在长安醴泉寺和般若三藏等翻译大乘心地观经梵策。是日本留学僧中惟一参与译经事业的人。后居五台山数年,死于灵境寺。
圆基	同上?	公元 805 年(日延历二十四年,唐贞元二十一年)桓武朝遣唐使船	2?	贞元年间(公元 785—804 年)在唐,诈称患眼病回国。
金刚三昧	同上?			原名不传。曾到天竺求法,后长期留唐。公元 818 年(唐元和十三年)和蜀僧广昇同登峨眉山。
法道	同上			和空海同时入唐。后前往天竺求法,是天台密教的行者。或许和金刚三昧为同一人。
圆行	公元 838 年(日承和五年,唐开成三年)仁明朝遣唐使船	公元 839 年(日承和六年,唐开成四年)仁明朝遣唐使船	2	空海弟子。在长安青龙寺从义真学密教。带回经论章疏六十九部及佛像、佛具、佛舍利等。敕封山城北山灵严寺开山祖。

续表十一

人名	入唐年代和船只	回国年代和船只	留学年限	备注
常晓	公元 838 年(日承和五年,唐开成三年)遣唐判官菅原善主船	同上	2	空海弟子。在唐淮南栖霞寺从文璿学密教。带回经论三十一部及佛像、佛具等。将大元帅像安置于山城宇治的法琳寺,开始行大元帅密法。
戒明	公元 838 年(日承和五年,唐开成三年)仁明朝遣唐使船	同上	2	以真言请益僧入唐。与天平胜宝年间入唐的戒明非为一人。
义澄	同上	同上	2	戒明师弟。以遣唐判官僚从身份入京。
真济				准备作为真言请益僧,乘仁明朝遣唐使第三船准备入唐,但因船破漂流未果。
真然				同上
圆仁	公元 838 年(日承和五年,唐开成三年)遣唐大使藤原常嗣船	公元 847 年(日承和十四年,唐大中元年)新罗人金珍等船	10	最澄弟子。入唐后在扬州从宗睿学梵语。后因上五台山,道出长安,从元政、义真学密教,并从南天竺室月学悉昙。带回经典、佛像、舍利、高僧真影甚多。公元 854 年(仁寿四年)继义真、圆澄之后任第三代天台座主。著作《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史料价值很高。号“慈觉大师”。

续表十二

人名	入唐年代和船只	回国年代和船只	留学年限	备注
惟正 (圆仁从僧)	同上	同上	10	圆仁弟子,作为圆仁的从僧入唐,经常随从圆仁。
惟晓 (圆仁从僧)	同上			圆仁弟子,作为圆仁从僧入唐,客死长安。
丁雄满 (圆仁行者) (圆珍译语)	第一次 同上	公元 847 年(日承和十四年,唐大中元年)新罗人金珍等船	10	以遣唐使船水手身份入唐,即为圆仁的行者,在唐经常随从圆仁。
	第二次 公元 853 年(日仁寿三年,唐大中七年)唐人钦良晖船	公元 858 年(日天安二年,唐大中十二年)?唐商人李延孝船?	6?	作为圆珍的译语入唐。
圆载	公元 838 年(日承和五年,唐开成三年)遣唐大使藤原常嗣船	公元 877 年(日元庆元年,唐乾符四年)唐商人李延孝船?	40?	最澄弟子。为解决疑难问题入唐。留唐四十年。回国途中遇难身亡。
仁好 (圆载的从僧)	第一次 同上	公元 843 年(日承和十年,唐会昌三年)新罗人张公靖船	6	圆载的弟子和从僧。为了回国请求衣粮,作为使者曾一度回日。
	第二次 公元 844 年(日承和十一年,唐会昌四年)唐商船	公元 847 年(日承和十四年,唐大中元年)唐商张支信船	4	携带日本朝廷赐给圆仁、圆载的黄金入唐,回国时带回圆载的表状。
伴始满 (圆载的行者)	公元 838 年(日承和五年,唐开成三年)遣唐大使藤原常嗣船	公元 839 年(日承和六年,唐开成四年)?仁明朝遣唐使船?	不详	作为圆载的行者入唐。

续表十三

人名	入唐年代和船只	回国年代和船只	留学年限	备注	
圆觉	公元 838 年(日承和五年,唐开成三年)仁明朝遣唐使船。	不详	不详	也作田圆觉(见《智证大师请来目录》)或田口圆觉。入唐后,先住五台山,后到长安。曾帮助圆珍抄写圣教绘曼荼罗等。)	
顺昌	同上?	公元 843 年(日承和十年,唐会昌三年)新罗张公靖船	不详	圆载弟子。奉圆载之命,与仁好一起回国请求衣粮。	
仁济	同上?	不详	不详	圆载弟子	
惠 尊	第一次	公元 841 年(日承和八年,唐会昌元年)	公元 842 年(日承和九年,唐会昌二年)唐人李邻德船	2	
	第二次	公元 844 年(日承和十一年,唐会昌四年)	公元 847 年(日承和十四年,唐大中元年)唐人张支信船	4	
	第三次	公元 862 年(日贞观四年,唐咸通三年)唐人张支信船	公元 863 年(日贞观五年,唐咸通四年)唐人张支信船	2	
惠运 (慧运)	公元 842 年(日承和九年,唐会昌二年)唐人李处人船	公元 847 年(日承和十四年,唐大中元年)唐人张支信船	6	在长安青龙寺从义真学密教,回国时带回真言经轨等一百七十卷,还带回孔雀一、鸚鵡三、狗三,献给日本朝廷。奉仁明天皇敕命为山城安祥寺开山祖。	
圆修	公元 842 年(日承和九年,唐会昌二年)?	公元 844 年(日承和十一年,唐会昌四年)	3?	与惠运一同巡礼五台山。	

续表十四

人名	入唐年代和船只	回国年代和船只	留学年限	备注
性海	公元 846 年(日承和十三年,唐大中元年)唐商人李邻德船	公元 847 年(日承和十四年,唐大中二年)新罗人金珍等船	2	圆仁弟子,为把本国的书信、礼品送给入唐留学僧圆仁而入唐。
圆珍	公元 853 年(日仁寿三年,唐大中七年)唐人张良晖船	公元 858 年(日天安二年,唐大中十二年)唐商人李延孝船	6	先在福州开元寺从中天竺僧般怛罗学悉昙。后经洛阳至长安,从法全学密教。带回很多佛典、佛具。回国后在近江开创圆台寺为天台宗寺门派的开山祖师。后任天台座主。醍醐天皇赐号“智证大师”。
闲静 (圆珍的从僧)	同上	同上?	6?	作为圆珍的从僧,不但在唐随从圆珍,而且回国也可能随从圆珍。
的良 (圆珍的行者)	同上	同上?	6?	作为圆珍的行者入唐。
物忠宗 (圆珍的行者)	同上	同上?	6?	同上
大全吉 (圆珍的行者)	同上	同上?	6?	同上
丰智 (智聪)	同上	公元 877 年(日元庆元年,唐乾符四年)	25	作为圆珍的从僧入唐,改名智聪。后随到唐的真如法亲王至长安。和圆载同船回国,途中遇难,又漂流回唐。后于元庆元年回国。

续表十五

人名	入唐年代和船只	回国年代和船只	留学年限	备注
真如法亲王 (高丘亲王)	公元 862 年(日贞观四年,唐咸通三年)唐人张支信船			入唐后由明州经洛阳到长安,自唐政府得到去天竺的官符,遂取道广州前往天竺。据留唐日僧中瓊报告,中途死于罗越国。
贤真 (真如法亲王的从僧)	同上	公元 863 年(日贞观五年,唐咸通四年)唐人张支信船	2	回日后曾管领近江滋贺郡比良山妙法、寂胜两官寺。
宗睿	同上	公元 865 年(日贞观七年,唐咸通六年)唐人李延孝船	4	真如法亲王从僧
忠全	同上	公元 863 年(日贞观五年,唐咸通四年)唐人张支信船	2	同上
安展	同上	不详	不详	同上
禅念	同上	不详	不详	同上
惠池	同上	不详	不详	同上
善寂	同上	不详	不详	同上
源懿	同上	不详	不详	同上
猷继	同上	不详	不详	同上
壹演	公元 862 或 863 年(日贞观四、五年,唐咸通三、四年)	不详	不详	真如法亲王弟子,入唐学真言宗。回国住山崎相应寺,修真言行法。

续表十六

人名	入唐年代和船只	回国年代和船只	留学年限	备注
以船	公元 874 年(日贞观十六年,唐乾符元年)	不详	不详	入唐时朝廷敕大宰府赐管内正税稻千束相助。
济途 (齐途济撰)	公元 877 年(日元庆元年,唐乾符四年)			乘唐船渡海,但在海上为盗所杀。
安然				公元 877 年(元庆元年)欲和济途一同入唐,来到大宰府,但未渡海而中止。
玄照 (玄昭)				同上
观溪				同上
中瓊	元庆初年?	不详	不详	公元 881 年(元庆五年)十月送信报告真如法亲王死讯。公元 894 年(宽平六年)3月,又托唐人王讷报告唐国凋敝之情。
三慧	公元 882 年(日元庆六年,唐中和二年)唐人张蒙船	不详	不详	奉圆珍命,为摹写阙经三百四十卷入唐。
好真	不详	不详	不详	
弘举	不详	不详	不详	在唐时,大政官令大宰府以衣粮供给。

以上表可见，在一百一十六人之中，道福、义向、真济、真然、济诠、安然、玄照、观溪八人由于种种原因而未入唐境；行善、观常、云观、智隆、明聪、观智、弁通、神睿、义法、义基、总集、兹定、净达十三人或留学高丽，或留学新罗；丁雄满、伴始满、的良、物忠宗、大全吉五人是留学僧的行者。如此，则真正的遣唐学问僧应是九十人。

学问僧分为一般学问僧、请益僧和还学僧。学问僧享受的待遇与留学生相同，亦即学问僧给缙四十匹、绵一百屯、布八十端，还学僧给缙二十四、绵六十屯、布四十端<sup>①</sup>。唐政府对学问僧也给予各种方便，并施加恩惠。比如，对日本文武朝学问僧荣睿、普照、玄朗、玄法等人，唐政府“每年赐绢廿五匹，四季给时服；兼予随驾，非是伪滥”<sup>②</sup>。对仁明朝学问僧圆载等特发给五年的粮食<sup>③</sup>。有时，学问僧还得到一些额外的赏赐，如《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开成四年二月六日条记载，该日扬州政府奉命给日本遣唐使团成员每人绢五匹，僧俗都有。尽管唐政府对学问僧的供给标准前后有所不同，但由唐政府提供生活费用却是始终如一的<sup>④</sup>。

唐政府管理学问僧徒的机关前后有所不同，先是祠部，后是左右街功德使，最后是鸿胪寺<sup>⑤</sup>。遣唐留学生可以在长安国子监学习，而学问僧不然，由于没有统一的佛教学院以供他们就读，所以必须分别到各地寺院拜师受业。这样一来，学问僧的学习地点便分布在全国各地，但比较集中的则是长安、扬州、洛阳、五台山等地。尤其是长安，作为有唐一代中国佛教的中心地，早在隋文帝时就修建了兴善寺、观音寺等大寺，唐王朝建立以后，又陆续修建了兴隆寺、慈德寺、善光寺、弘福寺、大慈恩寺、西明寺、荐福寺等大寺院和很多堂塔伽蓝。因而聚集了很多遣唐学问僧。例如，道昭、智通、智达在长安从玄奘学习法相宗；空海在长安青龙寺从惠果学密教，圆行、惠运在长安青龙寺从义真学密教；圆仁在长安从元政、义真学密教；圆珍在长安从法全学密教。当时在长安的外国高僧很多，日本学问僧有时也随他们受业，如空海在长安从闍宾僧般若三藏受业，圆仁在长安从南天竺僧宝月受业。

① 《延喜式》卷二十。

② 《唐大和上东征传》，汪向荣校注本第46页。

③ 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开成四年二月二十四日条。

④ 胡锡年：《唐代的日本留学生》，中国日本史研究会主编《日本史论文集》，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72—73页。

⑤ 同上第71页。



学问僧在长安从师学法有时是有代价的。如圆仁在长安大兴寺翻经院从元政学密教，先后送给元政二十五两黄金。后到青龙寺从义真受业，又送给义真绢三匹、钱十贯。

和留学生一样，学问僧在长安和中国文人也多有来往，如《文苑英华》中就收有唐诗人英空图《赠日本鉴禅师》诗。

学问僧在长安期间，一方面勤于学习钻研，如道慈在长安学三论、法相宗及密教，因学业出众，一度被选入唐宫廷讲经，颇得好评<sup>①</sup>。另一方面积极搜购书籍、经典、佛像、佛画和佛具等物，并予以抄写和复制。一般来说，学问僧带回的文物典籍数量要比留学生多一些。平安时代的遣唐学问僧最著名的有：最澄、空海、常晓、圆行、圆仁、惠运、圆珍、荣睿，被称为“入唐八家”。其中空海、圆行、圆仁、惠运、圆珍、荣睿六人曾于长安从师受业。据《御请来目录》、《入唐新求圣教目录》、《惠运禅师将来教法目录》、《智证大师请来目录》、《书写请来法门等目录》等日本书籍记载，他们归国时，不仅带回去大量的佛教经典，而且还带有不少法门道具，从而促进了日本佛教的发展。从此，佛教就一直成为日本的主要宗教之一。中国佛教的一些主要宗派，如法相宗、律宗、天台宗、密宗、禅宗、净土宗等，都相继传入日本。

## 二、东南亚

隋唐时期，长安与东南亚国家有着广泛的文化交流。

### (一)

隋唐王朝通过向安南（越南北部）任命官吏和贬逐、流配带罪者，并通过在安南地区实行科举、选拔官吏，直接促进了陕西的文化交流。在德宗时官至宰相的姜公辅（安南人）即能诗善文，其《白云照春海赋》和《对直言极谏策》都名噪一时，其赋为应试时写下的名著并历代为人们所传诵。同时唐代诗人沈佺期被流配欢州，写下了几道感怀记事的诗篇，均收入《全唐诗》卷九五，“沈佺期”条下，兹转录二首：

我来交趾郡，南与贯胸连。四气分寒少，三光置日偏。尉佗曾取国，翁仲久游泉。邑屋遗氓在，鱼盐旧产传。越人遥捧翟，汉将下看鸢。北斗崇山挂，南风涨海牵。（《度安南海入龙编》）

大士生天竺，分身化日南。人中出烦恼，山下即伽蓝。小涧香为

<sup>①</sup> 《怀风藻》。

刹，危峰石作龕。候禪青鴿乳，窺講白猿參。藤愛云間壁，花憐石下潭。泉行幽供好，林桂浴衣堪。弟子哀無識，醫王惜未談。機疑聞不二，蒙昧即朝三。俗究因緣理，聊寬放棄慚。超然虎溪夕，雙樹下虛嵐。（《九真淨居寺謁無碍上人》）

詩以言志，沈詩通過記載其行來抒发感想。

另外還有賈島的《送安南惟鑑法師》、《送黃知新歸安南》<sup>①</sup>，這不僅僅是個人的交往和詩歌的交流，更代表了陝西與越南的文化交流。越南南部的林邑國，通過多次遣使長安，也將唐代的典章制度輸入其國。

陝西與越南的文化交流還體現在佛教方面。隋代交州刺史劉方，即奏請在交州建築寺院，獲文帝批准。到唐代，越南僧無碍上人、逢定法師、維監法師在長安與名士王維、賈島、張籍交往密切，以文會友，賦詩唱和。在惟鑑法師回安南時，賈島寫了《送安南惟鑑法師》相送：

講經春殿里，花逸御床飛。  
南海幾回渡，舊山臨老歸。  
潮搖蠻草落，月濕島松微。  
空水既如彼，往來消息稀。

## （二）

在陝西與柬埔寨的文化交流中，柬埔寨通過屢次遣使長安，將陝西的文化藝術和生活習俗帶回本國，同時又將其樂舞輸入陝西。隋唐時期，扶南樂舞多次在長安宮廷表演，史稱“扶南樂舞者二人，以朝霞為衣，赤皮鞋”<sup>②</sup>。柬埔寨人以他們富於民族特色的音樂舞蹈，豐富了我国古典歌舞的內容。另外，在陝西與柬埔寨的交往中，宗教也是一個重要的方面，而僧人在其中起了橋梁作用。首先是真諦三藏，本為天竺人，聰敏博學，深諳佛理，游歷諸國抵達扶南，後作為扶南王的特使于南梁武帝大同十二年（546）到達中國南海，流徙于南方各地，曾授一徒道尼，道尼後來到陝西居住在長安，宣傳攝論之學。其次便是為陝西與柬埔寨友好往來作出重大貢獻的印度高僧那提三藏，漢名福生，唐高宗永徽六年（655），攜帶大小經律論一千五百餘部抵達長安，居住在慈恩寺。第二年前往昆侖採取異藥，又在南海各地立寺傳法，于龍朔三年（663）回到長安。就在這一年，真臘國來使以采藥為借口

① 分別收入《全唐詩》卷五七二和五七三。

② 《新唐書·禮樂志》。

恭请那提三藏前往柬埔寨：“(真腊国)为那提素所化者，奉敬无已，思见其人，合国宗师，假途远请。乃云：国有好药，唯提识之，请自采取。”<sup>①</sup>

在宗教方面的往来中，中国僧人也曾到过柬埔寨或提及它。如：“义朗律师者，……发自长安，弥历江汉。……陵万波，越舸扶南，缀缆郎迦戎。”<sup>②</sup>从长安出发前往西域求法的高僧玄奘在《大唐西域记》卷十三《摩咀吒国》条记载：“……次东南大海隅，有迦摩浪迦国。”迦摩浪迦，即真腊都城名。

### (三)

在陕西与缅甸的文化交流中，特别引人注目的便是骠国献乐。与骠国毗邻的南诏<sup>③</sup>，在阁罗凤执政时期势力强大，遂使骠国成为它的附庸<sup>④</sup>。阁罗凤死后，其孙异牟寻即位。唐德宗贞元十五年(799)末，异牟寻遣使赴唐，次年二月抵达长安。除使节外，随行的还有一个音乐舞蹈团。这个音乐舞蹈团是随同使臣由南诏出发，取道成都而到达长安的，他们在成都进行彩排时，西川节度使韦皋观后不觉新奇，便亲自帮助排演一出“南诏寻圣乐”，带去长安演出<sup>⑤</sup>。异牟寻发现韦皋深谙音乐，故令骠国国王派人前去向韦皋表演他不曾欣赏过的骠国音乐和舞蹈<sup>⑥</sup>。骠国王雍羌欣然允诺，遂派遣王子舒难陀率领一个包括有乐工三十五人的友好使团去唐访问。随同前往的还有那及元佑和摩诃思那两名大臣。该使团从骠国都城室利差咀罗出发，沿骠国至南诏的商道，经沙示、叫栖、九谷、龙陵、保山等地至大理。然后由南诏译官陪同继续向成都进发，于贞元十七年(801)十月(一说十一月)抵达成都，在韦皋的安排下，第二年二月到达长安。使团中的乐工在长安表演了十二个精彩的歌舞节目，受到热烈欢迎。当时著名诗人白居易写了一首《骠国乐》诗，记录了这次盛况空前的演出：

骠国乐，骠国乐，出自大海西南角。

雍羌之子舒难陀，来献南音奉正朔。

德宗立杖御紫庭，黠纡不塞为尔听。

① 《续高僧传》卷四《京大慈恩寺梵僧那提传》。

② 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上《义朗传》。

③ 居住于云南东部滇池周围的一部分彝族至公元七世纪末叶，形成蒙嵩诏、蒙舍诏等六个势力强大的地区，号称六诏。因蒙舍诏居于诸诏最南端，故称南诏。南诏最后统一六诏。

④ 《新唐书·骠国传》：“南诏以兵强地接常羈制之。”

⑤ 《新唐书·骠国传》。

⑥ 《新唐书·骠国传》。

玉螺一吹推髻耸，铜鼓一击文身踊。  
 珠纓炫转星宿摇，花曼斗藪龙蛇动。  
 曲终王子启圣人，臣父愿为唐外臣。  
 左右欢呼何翕习，至尊德广之所及。  
 须臾百辟诣阁门，俯伏拜表贺至尊。  
 伏见骠人献新乐，请书国史传子孙。<sup>①</sup>

另外，诗人元稹、胡直钩也为骠国献乐写了动人的诗篇。这充分说明当时骠国献乐在长安产生的巨大影响，同时也反映了唐代对骠国献乐的重视。

据《新唐书·骠国传》记载，骠国传入长安的乐器有打击乐器：铃、钹、三面鼓、小鼓；弹奏弦乐器：大匏琴、小匏琴、独弦匏琴、鼉首箏、凤首箏篥、龙首琵琶、云头琵琶；吹奏乐器：螺贝、横笛、两头笛、大匏笙、小匏笙、牙笙、三角笙、两角笙。传入的乐曲有：佛印、白鸽、赞娑罗花、白鹤游、斗羊胜、龙首独琴、禅定、孔雀王、甘蔗王、野鹅、宴乐、漆烦。

骠国献乐是以文化交流的形式出现的一次外交活动。上已指出，在当时，骠国受南诏控制。南诏王甚至自称“骠信”（意为“骠国之君”）。所以骠国献乐的目的在于借助唐朝强大的势力去影响南诏，以便摆脱其控制。事实上达到了这一目的。在骠国借献乐之名同唐发生直接联系以后，西川节度使韦皋联合南诏共同对付吐蕃，为了有一个充足的兵力，南诏撤离了入驻骠国的军队，从而解除了南诏对骠国的威胁。

### 三、南亚

#### (一)

隋唐时期，长安与南亚的科技、文化交流，主要是佛教的输入。当时，印度还没有形成统一的大国，释迦牟尼的诞生地迦毗罗卫，就位于今尼泊尔南部与印度毗邻的提罗拉科附近，当时是拘萨罗国的属地。隋唐时，佛教在葱岭以西受压，在印度本土也显出衰败的情景，却在中国受到隋唐王朝的提倡，以具有中国特色的崭新风貌兴旺起来，名扬世界。中国西行求法的僧侣，其中不少人是从长安出发的，印度译经师东来者，也有不少人久居长安。

赴印度求法，讲学十五年，然后载誉而归的玄奘即是声名最卓著者，他

<sup>①</sup> 见《白香山集》卷三。

的名字成为中印文化交流的象征，千古传颂。

玄奘，俗姓陈，名祜。隋文帝开皇二十年（600）生于洛州缑氏（今河南偃师县）<sup>①</sup>，父母早丧，十三岁出家，二十岁在成都受具足戒，法名玄奘，俗称唐僧。曾在国内参访名师，学有所成，详考其理，深感异说纷纭，特别是当时摄论、地论两家关于法相之说各异，遂产生去印度取经的念头。

贞观元年（627），仆射萧瑀奏请玄奘入住长安庄严寺，玄奘辞命不赴。是年秋天八月，关东、河南、陇右等地连遭灾荒<sup>②</sup>，因而朝廷颁布诏令，准许道俗四出就食。玄奘趁此机会欣然西行<sup>③</sup>。他和孝达一同西至秦州（即天水，当时陇南重镇），停留一宿，逢伴去兰州，大约于九月初抵达凉州，应当地人士请求，为道俗开讲《涅槃》、《摄论》、《般若》等经。西域商侣之中有



图十九 西安大雁塔全景

人参加旁听，回去以后，便将玄奘西行求法之事传扬西域各国，是以“西域诸城无不预发欢心，严鄙而待。”<sup>④</sup>不料，此事被新任都督李大亮闻知，逼令玄奘回还长安。幸赖当地慧威法师鼎力相助，潜行到达瓜州。瓜州刺史独孤达崇信佛法，“闻法师至，甚欢喜，供事甚厚。”在瓜州住了一月余，接着

<sup>①</sup> 关于玄奘的生卒年代，历来众说不一。今采取生于隋文帝开皇二十年（公元600年），卒于唐高宗麟德元年（公元664年）说。

<sup>②</sup> 见两《唐书·太宗纪》、《新唐书·天文志》。

<sup>③</sup> 关于玄奘西行的年月，唐人著述大都作贞观三年，后人述作亦多沿袭唐人记载。自清钱大昕起，始据道宣《广弘明集》卷二十二所记，主贞观元年西行说。1915年丁谦又提出贞观二年西行说。兹依杨廷福《玄奘年谱》（中华书局1988年8月版）所考贞观元年之说。

<sup>④</sup>《慈恩传》卷一。

传来凉州追捕的公文，在州吏李昌的保护下，历经艰险，越过玉门关，抵达伊吾。高昌王鞠文泰遣使迎住高昌王城，经六日，夜半时分，玄奘到达高昌国，王及妃嫔走出王宫亲致敬礼，供养甚厚。王曰：

朕与先王游大国，从隋帝历东西二京，及燕、代、汾、晋之间，多见名僧，心无所慕。自承法师名，身心欢喜，手舞足蹈。拟师至上，受弟子供养以终一身，令一国人皆为师弟子。望师讲授，僧徒虽少，亦有数千，并使执经充师听众。优愿察纳微心，不以西游为念。

玄奘未允，留宿十余日，辞别高昌王继而西行，但高昌王执意不许，玄奘便绝食三日，以死自誓不易求法之志。高昌王见不可强留，深感愧悔，稽首礼谢，并“对母张太妃共法师约为兄弟，任师求法，还日请住此国三年受弟子供养”。<sup>①</sup>玄奘答应停留一月讲《仁王般若经》。与此同时，高昌王为他准备西行所需用物，“讲讫，为法师度四沙弥以充给寺，制法服三十具。以西土多寒又造面衣、手衣、靴、鞮等数事，黄金一百两，银钱三万，绫及绢等五百匹，充法师往二十余年所用之资。给马三十匹，手力二十五人，遣殿中侍御史欢信送至叶护可汗衙所。又作二十四封书通屈支等二十四国，每一封书附大绫一匹为信，又以绫绢五百匹、果味两车献叶护可汗，并书称法师者是奴弟，欲求法婆罗门国，愿可汗怜师如临奴，仍请敕以西诸国给邬落马，递送出境。”<sup>②</sup>当时西突厥叶护可汗势力强大，雪山以北六十余国皆其部统，如果要去印度，须经他协助方可顺利通行，所以高昌王遣陪送玄奘去叶护可汗衙所。临行，玄奘作《谢高昌送沙弥及国书绫绢等启》<sup>③</sup>，对高昌王的厚遇表示谢意，并陈述自己西行的愿望。高昌王“与诸僧大臣百姓等倾城送出城西，王抱法师恸哭，道俗皆悲，伤离之声振动郊邑”<sup>④</sup>。玄奘离开高昌，经半无城到阿耆尼国，再过银山抵达屈支国，国王及群臣诸僧设乐相迎。玄奘在该国阿耆理儿寺与诸僧辩论，挫败小乘一切有部的高僧木叉湍多。因凌山雪路未开，不能进发，遂在屈支国留住六十余日，起程时，“王给手力驼马与道俗等倾都送出”<sup>⑤</sup>。玄奘越凌山，经大清池，西北行五百余里到达素叶城，与叶护可汗相见。叶护可汗“令达官答摩支引送安置”，并“陈酒设乐”，款待数日，即遣骑前告所部诸国。凭借叶护可汗写给所经诸国的信件和陪送的使者，玄奘很顺利地经过西域赭时国、窆堵利瑟那国、羯霜那国、

①②④⑤《慈恩传》卷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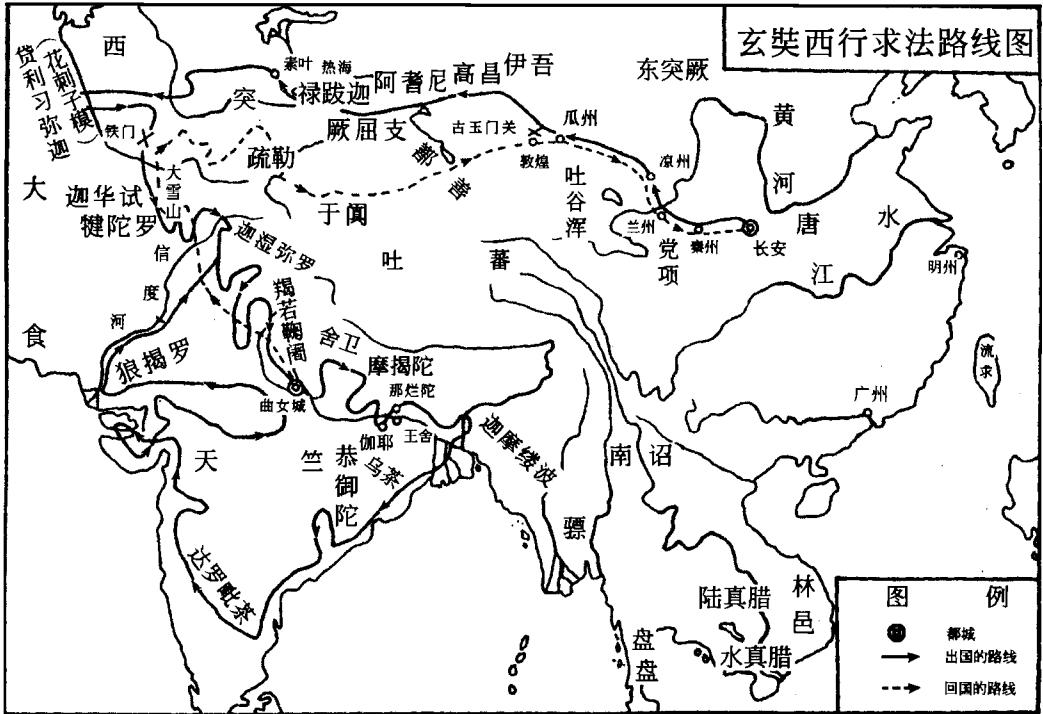
③ 见《全唐文》卷九〇七。

揭职国等十余国，翻越大雪山，抵邻接北印度的迦毕试国。然后越黑岭，进入当时北印度境。

玄奘先到滥波国，停留三日，渡河前往那揭罗喝国都城观礼佛教遗迹（相传城东南二里有阿育王所造的窣堵坡和释迦牟尼“敷鹿皮衣及布法掩泥得受记处”，西南十余里有“佛买花处”等佛教传说遗迹）。随后东南行五百里到达犍陀罗国都城布路沙布罗，在那里参观了佛教史上著名的雀离浮屠。继而东北行百余里至布色羯逻伐底城，在于城东巡视过阿育王所造的所谓“过去四佛说法处”的窣堵波之后，又在城北观礼传说释迦牟尼为菩萨时的千生舍眼窣堵坡，并把高昌王所赠金银绫绢衣服等分留各处供养<sup>①</sup>。事毕，玄奘又东南行，越山渡河至乌仗那国国都瞿揭厘城，参观佛教传闻遗迹。不久翻山越岭到达呾叉始罗国，再渡信度河南行抵大石门，游览了释迦舍身饲虎的佛教传说遗迹。不久翻山越岭到达迦湿弥罗国，国王率群臣及沙门一千余人相迎，并请玄奘骑大象入都城，住闍邪因陀罗寺。第二天，国王请玄奘入宫供养，与名僧数十人讨论教义，还命二十人帮助玄奘抄写经文。玄奘师事该国第一大德僧称（《续高僧传》作僧胜），从他听受《俱舍论》、《顺正理论》等，并与众僧中大乘学僧毗戍陀僧诃、辰那饭茶、婆苏密多罗等人论难。其后，玄奘经半笈嗟、磔迦，至那仆底、闍烂达邪、屈露多国进入中印度境。首先东行五百余里到达古印度十六大国之一的秣菟罗，巡礼“释迦如来诸圣弟子舍利子等遣身窣堵坡”。然后再东行至窣禄勒那国，从闍耶濞多听受《经部毗婆沙》。公元631年（贞观五年）春，听受完毕，渡河至秣底补罗国，从必密多斯那就学《怛埵三第钵论》及《随发智论》。夏末，由此国北行三百余里经婆罗吸摩补罗国、劫比他国至羯若鞠闍国，在跋达罗毗河罗寺留住三个月，从毗离耶犀那三藏就学《毗婆沙》。后东南行渡菟伽河至阿訇陀国，巡礼大乘佛教瑜伽行宗理论的主要建设者无著、世亲的遗迹和释迦行化的遗迹。再循恒河东下，中途遇盗，几乎丧命。脱险后东行经阿耶穆法国等国到吠舍厘国，游览释迦行化的遗迹和耶舍等七百佛教徒重勘律典进行第二次结集的遗迹。后南沿恒河百余里到湿吠多补罗城，得《菩萨藏经》。更南行至摩揭陀国，巡礼华氏城、伽耶等处圣迹，停留七日，折向那烂陀寺，受到寺众的盛情接待。玄奘以隆重的礼节参谒戒贤法师，而那烂陀寺也以极其优厚的待遇礼事玄奘。在那烂陀寺安置停当后，玄奘离寺观礼佛教遗

<sup>①</sup> 《慈恩传》卷二。

迹：他先到王舍城，后至释迦常住说法的娑罗陀罗矩吒山，再抵达释迦逝世后，迦叶和阿难等五百佛教徒、上座部第一次结集佛教经典的大石宝，最后来到大众部结集之处及因陀罗势罗窣诃山。巡礼完毕，即返回那烂陀寺。是时，当是公元 631 年（贞观五年）末。



图二十 玄奘西行路线图

公元 632 年（贞观六年），玄奘在那烂陀寺讲戒贤法师讲《瑜伽论》，历时一年五个月讲毕，后又重听两遍。此外，又听讲《顺正理》、《显扬》、《对法》各一遍，《因明》、《声明》、《集置》等各二遍，《中论》、《百论》各三遍。至于《俱舍》、《婆娑》、《六足》、《阿毗昙》等论已先在诸国听过，此时只是披寻决疑而已。同时兼学婆罗门教经典。玄奘先后在该寺求学五年，为归国后从事译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经过历时五载的诵习钻研，玄奘来印的目的已经达到，但他并不以此为满足，为了更广泛地参学，公元 636 年（贞观十年）春，玄奘辞别戒贤，离开那烂陀寺南游问学。他首先到达伊烂拏钵伐多国，从萨婆多部学者怛他揭多毘多和羼底僧诃学《毗婆沙》、《顺正理》等论，为时一年。第二年春启程，过瞻波等国入东印度境，东南行经羯罗拏苏伐剌那、羯轮伽等国，折西北行至中印南桥萨罗国，参观龙树、提婆的传闻遗迹，并从善解因明的婆罗



门读《集量论》，停留一个多月。尔后南行进入南印度境，经案达罗国到驮那羯磔迦国，与善解大众部的苏部底、苏利耶两位法师相遇，“因就停数月，学大众部《根本阿毗达摩》等论。彼亦依法师（玄奘）学大乘诸论，遂结伴同行，巡礼圣迹。”<sup>①</sup>后经珠利耶国抵达罗毗荼国，然后从南印度绕道西印度，过恭建那补罗国，再西北行出伐腊毗国入西印度境，经瞿折罗、阿点婆翅罗等国至狼揭罗国。由此折回，经臂多势罗国，渡信度河，至北印钵伐多国，访问慎那弗怛罗、贤爱、德光三位论师的出家处，并从其国大德就学《正量部根本阿毗达摩》及《摄正法论》、《成实论》等。从此东南行，近抵那烂陀寺，参谒过戒贤法师之后，又到寺西低罗择迦寺，从般若跋陀罗学萨婆多部三藏及《声明》、《因明》等论，“就停两月，谘决所疑。”<sup>②</sup>后前往杖林山，从胜军论师学《唯识抉择论》、《意义理论》、《成无畏论》、《不住涅槃论》、《十二因缘论》、《庄严经论》，并询问《瑜伽》、《因明》等疑。其后又回到那烂陀寺。应戒贤法师之请，为寺众讲《摄大乘论》、《唯识抉择论》，并沟通了当时大乘学说中“中观”和“瑜伽”二家论争，用梵文著《会宗论》三千颂（已佚），受到戒贤和寺众的称许。不久又应戒日王的请求，准备前去与南印度王灌顶师正量部大师般若湍多“对决是非”，适逢一位顺世论者婆罗门“来求论难，乃书四十条义悬于寺门，曰：‘若有难破一条者，我则斩首相谢。’经数日，无人出应。”<sup>③</sup>玄奘便在戒贤和大众面前与这位顺世论者婆罗门进行辩论，最后以所谓“大乘义法”折服顺世论者婆罗门。随后，东印迦摩缕波国鸠摩罗王多次遣使迎请玄奘前往，玄奘遂与使者奔赴迦摩缕波国。既至，鸠摩罗王请玄奘入宫。玄奘为王讲经说法一个多月，并为酬答鸠摩罗王有关“佛德”之问，用梵文著《三身论》三百颂。

戒日王征讨恭御陀国回来，闻知玄奘在鸠摩罗王处，迅即遣使催促鸠摩罗王急送玄奘法师来，遭到拒绝。戒日王怒，再一次遣使来请，鸠摩罗王便带兵陪送玄奘，前抵羯朱唵祇罗国时，戒日王亲自前来礼谒。戒日王决定在曲女城举行论辩大会，命五印度各国不同宗教及不同学派的僧俗前来参加。到期与会的有五印度十八国国王，各国大小乘佛教徒三千余人，婆罗门及尼乾外道二千余人，那烂陀寺亦有一千余人参加，再加上国王随从及远近前来观礼的人，更是人山人海。当时会场上“或象、或舆、或幢、或幡各自围

①②③《慈恩传》卷四。

绕，峨峨岌岌，若云兴雾涌，充塞数十里间。”<sup>①</sup> 戒日王恭请玄奘为论主，以他所著《会宗》、《制恶见》两论的论点标宗。玄奘讲论完毕，任人难破，并由“那烂陀寺明贤法师读示大众，别令写一本悬会场门外，示一切人，‘若其间有一字无理能难破者，请斩首相谢’。如是至晚，无一人致言。”经过十八天的辩论，玄奘和各教派、各学派的学者相互辩难，最后以玄奘取胜而告终。会后，戒日王和十八国国王纷纷向玄奘赠送礼物，玄奘一一谢绝，只答应按照印度传统的论胜规矩，请玄奘骑上大象，由大臣陪护，巡行宣唱：“支那国法师立大乘义，破诸异见，自十八日来无敢论者，普宜知之！”万众欢腾，竞相给玄奘赠予“摩诃耶那提婆”（大乘天）、“木叉提婆”（解脱天）等荣誉称号。

先此，玄奘在杖林山从胜军论师受学之时，即因思念故国，决意东归。所以在赴曲女城会前已辞别了那烂陀寺诸师友，所携带的经像亦全然准备就绪。于是会后第二天，玄奘向戒日王辞别，决定马上回国。戒日王坚决请求玄奘参加过其第六次的七十五天“无遮大施”后启程。在第三天该大施会完毕后，玄奘又向戒日王辞行，戒日王又请他留住十余日后方答应玄奘启程东归。王及诸众相饯数十里。戒日王“更附乌地王大象一头，金钱三千，银钱一万，供法师行费。别三日，王更与鸠摩罗王、跋吒王等各将轻骑数百复来送别，其殷勤如是。仍遣达官四人，名摩诃怛罗。王以素氎作书红印封印；使达官奉书送法师所经诸国，今发乘递送至汉境。”<sup>②</sup>玄奘启程后行二十余日，至咀叉尸罗国停留七日，又西北行渡信度河，因遇大风浪，失却梵本五十夹及经本花种等，停留乌铎迦汉茶城五十多天，玄奘遣人前往乌仗那国补抄渡河失落的迦叶臂耶部三藏。在经文补抄齐全之后，玄奘既而向西北进发，经蓝波等地，出迦毕试国境，越雪山，经阔悉多、曹健等国，进入帕米尔高原外围，然后经呬摩怛罗国，过波迷罗川，越葱岭到达于阗，住都城小乘婆多寺。因于阗王延留，未能即还。所以一方面为当地僧人讲《瑜伽》、《对法》、《俱舍》、《摄大乘论》；另一方面遣马玄智随商队前往长安，表陈回国。住了七八个月，使人回来，并奉敕迎令东归。玄奘辞别于阗王东进，于贞观十九年（645）正月二十四日到达长安西郊漕上，尽管“官司不知迎接”，但民众闻讯“自然奔凑，观礼盈衢，更相登践，欲进不得”，无奈只好

<sup>①②</sup>《慈恩传》卷五。

留宿于漕上。<sup>①</sup>房玄龄遣右武侯大将军莫陈实、雍州司马李叔脊、长安县令李乾祐前往迎接，玄奘从漕上入舍于都亭驿<sup>②</sup>，二十五日抵达长安。玄奘此次西行求法，共携回如下佛经与佛像：大乘经二百二十四部、大乘论一百九十二部，上座部经、律、论十五部，大众部经论十五部，三弥底部经、律、论十五部，弥沙塞部经、律、论二十二部，迦叶臂耶部经、律、论十七部，法密部（即法藏部）经、律、论四十二部，说一切有部（即萨婆罗部）经、律、论六十七部，因明论三十六部、声明论十三部；如来肉舍利一百五十粒、摩揭陀国前正觉山龙窟留影金佛像一躯，通光座高三尺三寸、拟婆罗痾斯国鹿野苑初转初轮像刻檀佛像一躯，通光座高三尺五寸、拟侨赏弥国出爱王思慕如来刻檀写真像刻檀佛像一躯，通光座高二尺九寸、拟劫比他国如来天宫下降宝阶像银佛像一躯，通光座高四尺、拟摩揭陀国鹞峰山说法华等经像金佛像一躯，通光座高三尺五寸、拟那揭罗曷国伏毒龙所留影像刻檀佛像一躯，通光座高一尺五寸、拟吠舍厘国巡成行化刻檀像等。在玄奘到达京城长安的第二天，将这些佛经、佛像大会于朱雀街，随之送往弘福寺安置，“自朱雀街内，终届弘福寺门数十里间，都人士子内外官僚列道两傍，瞻仰而立”，烧香散花不断<sup>③</sup>。

时唐太宗将征辽，已至洛阳。经、像安置完毕以后，玄奘前往洛阳谒见太宗。太宗向玄奘询问中亚、五印度等地情况，玄奘一一酬答。太宗谓玄奘曰：“佛国遐远，灵迹法教，前史不能委详。师宜修一传以示未闻。”<sup>④</sup>又对侍臣说：“昔苻坚称释道安为神器，举朝尊之，朕今观法师词论典雅，风节贞峻，非唯不愧古人，亦乃出之更远。”并劝玄奘还俗从政，玄奘力辞。太宗又邀玄奘同行伐辽，玄奘以律制不得观看兵戎战斗为由辞谢。最后，玄奘求太宗敕许他在嵩岳少室山少林寺禅院译经，并说：“诸有所须，一共房玄龄平章。”玄奘与唐太宗此次会晤，“从卯至酉，不觉时延，迄于闭鼓。”<sup>⑤</sup>

贞观十九年（645）三月，玄奘自洛阳返回长安，入居弘福寺，开始翻译经论，传播新知。他奏请朝廷选派谙解经义、富有学识的名僧组织译场。四月，玄奘推举的“证义”十二人（弘福寺灵润、文备，罗汉寺慧贵，实际寺明琰，宝昌寺法祥，静法寺普贤，法海寺神昉，廓州法讲寺道琛，汴州演

① 《慈恩传》卷五。

②③④ 《慈恩传》卷六。

⑤ 《续高僧传》。

觉寺玄忠，蒲州普救寺神泰，绵州振音寺敬明，益州多宝寺道因）、“缀文”九人（普光寺栖玄、弘福寺明濬、会昌寺辩机、终南山丰德寺道宣、简州福聚寺静迈、蒲州普救寺行友、棲岷寺道卓、幽州道仁寺慧立、洛州天宫寺玄则）、“证字”一人（京师大总持寺玄应）、“证梵”一人（京题大兴善寺玄暮）大都聚集长安，译场准备就绪。玄奘自任译场译主，主持译场，并担任主译。五月二日创译《大菩萨藏经》二十卷。贞观二十二年（648），皇太子李治为纪念他死去的母亲文德皇后，下令建造了豪华富丽的慈恩寺，玄奘奉命移入慈恩寺译经，并总理寺务。永徽三年（652），玄奘亲自参与担运砖石，在慈恩寺南建造高大的佛塔，即今西安大雁塔。此塔虽屡经重修，但大体上保持了原来的面貌。显庆三年（658），玄奘迁居新建的西明寺，后又改居玉华宫，继续译经事业和弘传佛教，到麟德元年（664），因病圆寂玉华宫。当时京城长安的文武百官及僧俗莫不悲伤哀悼，唐高宗为之罢朝数日。同年四月十四日，遵照玄奘遗嘱，葬于浐水之滨白鹿原。后因大明宫即可望见白鹿原，常引起高宗的怀念，遂于总章二年（669）迁葬于今西安城南约二十公里的风栖原北岗，并修寺造塔，以资纪念。该寺即今“护国兴教寺”。

玄奘的译经成果辉煌，从贞观十九年（645）到麟德元年（664），前后十九年，共译出大小乘经、律、论及胜论学派的典籍共七十四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在整个译经过程中，玄奘一直是专心致志，一丝不苟，有时甚至是夜以继日，正如《慈恩传》卷七所说：

自此之后，专务翻译，无弃寸阴。每日自立程课，若昼日有事不充，必兼夜以续之。遇乙之后，方乃停笔摄经，已复礼佛行道。至三更暂眠，五更复起，读诵梵本，朱点次第，拟明日所翻。每日斋讫，黄昏二时，讲新经论，乃诸州听学僧等恒来决疑请义。日夕已去，寺内弟子百余人，咸请教诫，盈廊溢庑，皆酬答处分无遗漏者。

玄奘在从事译经的过程中，与其弟子窥基创立了中国佛教史上的唯识宗（亦称慈恩宗、法相宗）。玄奘翻译的“一本十支”大体上都是属于唯识思想体系的。他以此为典据，在讲学中阐扬唯识义理，由此创立了唯识宗。

从玄奘翻译的经典和传播的学说来看，充分反映了公元5世纪以后印度佛学的全貌。当时印度佛教的最高学府—那烂陀寺有常住僧人四千多人，加上客居僧、俗，已超过万人，而寺内受封的大德就达三百多人。<sup>①</sup>以那烂陀

<sup>①</sup> 《续高僧传》卷四《玄奘传》。

寺为首的当时印度各地的佛学，已分为因明、对法、戒律、中观和瑜伽等五科。玄奘于因明科译出《理门》和《八正理论》，树立起在论议基础上的佛家逻辑轨范；于对法科，声闻乘方面以《俱舍》为中心，既译出它以前的“一身六足”和《婆娑》等论，又译出它以后的《顺正理》和《显宗》等论；于大乘对法译出《集论》和它的注书《杂集论》；于戒律科译出《瑜伽菩萨戒》，并辑出《受戒羯磨》；于中观科译出护法的《广百论释》；于瑜伽科，译出“一本十支”；于最后发展的“唯识说”，编纂了完备的《成唯识论》。可见，那烂陀寺最盛时期所传承的佛学精华，差不多都被玄奘传于中土。



图二十一 玄奘负笈求经图

贞观二十年（646），玄奘应唐太宗之请，完成他在中亚、印度的见闻录《大唐

西域记》十二卷，由他口授，辩机笔录。该书以行程为经，地理为纬，“推表山川，考采境壤，详国俗之刚柔，系水土之风气”<sup>①</sup>，对玄奘游历中所经历的一百多个国家的历史沿革、地理区划、民族源流、物产风俗、宗教信仰及语言文字等方面一一陈述，内容丰富，条理清晰，对中国及亚洲许多国家在宗教、文化交流等方面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继玄奘西行求法之后，义净亦由长安出发，赴印求法。义净，俗姓张，字文明，唐齐州（今山东济南地区）山庄人（此据《开元释教录》。《宋高僧传》作范阳人）。生于唐太宗贞观八年（634）幼时即“辞亲落发，遍询名匠，广探群经，内外闲习，今古博通。”<sup>②</sup>年十五立志游印度，仰法显辟荒，慕奘之高节，精勤自励。年二十从慧智禅师受具足戒，学习通宝、法励两家律部文疏，并前往洛阳、长安学习《对法》、《摄论》、《俱舍》、《唯识》等。高宗咸亨元年（670），义净在长安和同学处一、弘祜等相约西游，后处一未

① 《大唐西域记·跋》。

② 《宋高僧传》卷一《义净传》。

能成行，弘祜亦至江宁而停止进发。无奈他一人前行，后途经丹阳，玄逵同行。咸亨二年（671）抵达扬州，适逢将赴龚州上任的州官冯孝诠，结伴行至广州。由于得冯氏资助，义净于同年十一月由广州搭乘商船泛海南行。起初，有数十人愿与义净同行，及将登舶，余皆罢退，惟义净弟子善行随师前行。他们海行二十天到达室利佛逝（今苏门答腊），在此停留六个月，学习声明。后继续前行至室罗筏，善行因病归国，义净孤身一人泛海前行，经末罗瑜、羯荼等国，于咸亨四年（673）2月抵达东印度耽摩犁底国，巧遇唐僧大乘灯，留住一年，学习梵语。其后，他们一同前往中印，巡礼佛教圣迹。义净往来各地参学，先后经历三十余国，其中在印度著名佛寺那烂陀寺留学十一年，在那里研究瑜伽、中观、因明及俱舍。最后求得梵本经律论近四百部，合五十万颂，方欲东归。垂拱三年（687），他在回国途中再经室利佛逝，又在那里停留二年多，从事译述。天授二年（691），他派大津归国，送回自己在室利佛逝翻译的经论及撰写的《南海寄归传》。证圣元年（695）夏，义净还至洛阳，住佛授记寺。他初与于阗三藏实叉难陀译《华严经》，久视元年（700）以后，开始组织译场，自主译事。其译场规模甚大，中国、印度高僧并都参与。

义净西行求法，旨在弘传佛教。所以早在那烂陀寺参学之时，他就开始翻译《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颂》、《一百五十赞颂》等，后在室利佛逝依然继续翻译。回国自主译场以来，更是译而不辍。综观义净译事，可分三个时期：第一，从久视元年到长安三年（700—703），于洛阳福先寺和长安西明寺译出《全光明最胜王》、《能断金刚般若》、《弥勒成佛》、《一字咒王》、《庄严王陀罗尼》等论，另外还有《龙树劝诫颂》，共二十部，一百一十五卷。第二，自神龙元年到景龙四年（705—710），在洛阳内道场、福先寺及长安大荐福寺翻经院，译出《孔雀王经》、《胜光天子》、《香王菩萨咒》、《一切庄严王经》等经和《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等律及《唯识宝生》等论二十四部，九十四卷。第三，睿宗景云二年，在长安大荐福寺翻经院译出《称赞如来功德咒》等经和《能断金刚论颂》等论十二部，共二十一卷。当时在译场担任证梵文义的有北印度沙门拔弩、罽宾沙门达磨难陀等；担任笔受的有沙门波仑、复礼、慧表、智积、玄伞等；担任证议的有沙门法宝、法藏、德感、胜庄、神英等；担任正译的有居士东印度瞿昙金刚、迦湿弥罗国王子阿顺等；监护的有成场太学助教许观、秘书监杨慎交等；参加润色文字的有李峤、宋嗣立、赵彦昭等。上所牒述皆一时名流，这样便保证了译籍的质量。

义净最大的功绩在于佛典翻译，一生共译佛典五十六部，二百三十卷。另外，他所著《南海寄归内法传》，记录了东南亚和印度佛教、地理、风俗等，成为唐代了解南海各国的指南。

玄宗先天二年（713）正月，义净卒于长安大荐福寺翻经院，享年七十九岁。其名声之大，可与法显、玄奘并列，合称三大求法僧。

在佛教的传播中，除了中国僧侣西行求法外，印度译经师也有不少人来陕西。

那连提黎耶舍，北天竺乌场国人。年十七出家。北齐天宝七年（556）入华至邺，投靠齐文宣帝，住天平寺中。不久被授予昭玄都之职，后转为昭玄统。隋文帝开皇二年（582）奉文帝命来到长安，住大兴善寺。后移住广济寺为外国僧主。卒于开皇九年（589）九月二十九日。前后所译经论有《菩萨见实》、《月藏》、《日藏》、《法胜》等，共十五部，八十多卷。

闍那崛多，北天竺犍陀罗国人。出家后，孝敬专诚。年二十七，受具足戒。西魏文帝大统十五年（549）和同伴智贤等十人出发东行，经迦毕试国、于阗、吐谷浑、鄯州，于北周明帝武成元年（559）到达长安，住草堂寺。后被明帝请入后园共论佛法。翻译佛经三十七部，一百七十六卷。

善无畏，梵名戍婆揭罗僧诃，义翻为善无畏，中天竺摩揭陀国人，释迦牟尼季文甘露饭王后裔。其先祖出身刹帝利，因国难出逃乌荼，做了国王。无畏十三岁时奉其父佛手王遗命即王位，兄弟不服，起名相争，他平乱之后，让位于兄，决意出家为僧，随之游历南天竺和中天竺诸国。他先至南印海滨，遇着殊胜招提，修习法华三昧。后复寄身商船，到达中天竺，密修禅诵。八十岁左右奉师命携带梵本多种东行弘传佛法，途经北天竺迦湿弥罗、乌菟等国抵达素叶城，然后再通过天山北路进入今新疆境内，沿路大讲《大毗卢遮那成佛变加持经》，声名大振。因为他的声誉早已传到汉地，唐睿宗特派沙门若那和将军史宪前至玉门迎接，于玄宗开元四年（716）到达长安，深受玄宗礼敬，被封为“国师”。先住兴福寺南塔院，不久之后迁居西明寺菩提院。开元四年（717）开始于西明寺译出《虚空藏菩萨能满诸愿最胜心陀罗尼求闻持法》一卷，沙门悉达译语，无著笔受缀文，写定进内之后，即有敕令将其带来的全部梵本送藏内廷。原由不详。由此译事中断。其后他便注意访求未译的密典梵本。在此之前，曾有江陵沙门无行西行求法，游历南海、东印、中印各地，曾住大觉、那烂陀寺闻法，求得梵本经籍多种，归国时，途经北印病卒，由其同行者将访得梵本经卷带回，存于长安华严寺。善

无畏和弟子一行前去选取前未译过的密教经典若干，准备翻译。开元十二年（724），善无畏随同唐玄宗到洛阳，住福先寺，于开元十三、十四年间译出《大毗卢遮那神变加持经》等三种。开元二十年（732），善无畏请求返回印度，优诏慰留。开元二十三年（735）卒于洛阳大圣善寺，年九十九岁。追封“鸿胪卿”。开元二十八年（740）葬于龙门西山广化寺。乾元元年（758），肃宗之弟李华撰“大唐东部大圣善寺故中天竺国善无畏和尚碑铭并序”，立碑于塔院之侧。善无畏是密宗的奠基人和开元三大士之一，所译经典全属于秘密部。自开元五年到二十三年（717—735）先后在长安和洛阳两地译出密宗经典二十八部，五十三卷。

金刚智，梵语释跋日罗菩提，南天竺摩赖耶国人。十岁时在那烂陀寺出家，从寂静智学《声明论》。十五岁往西天竺学《法称论》，四年后又回那烂陀寺。二十岁受具足戒，后专习大、小乘律论。二十八岁赴迦毗罗卫城，依胜贤论师学《瑜伽师地论》、《难识论》、《辨中论》。三十一岁去南天竺就龙智转学密教经典，以七年时间修习《金刚顶瑜伽经》、《大毗卢遮那总持陀罗尼沙门》和《五明论》等。后云游中印度各地及师子国。数年后，返南印度，受国王之命，由海道赴中国传教。开元八年（720），金刚智共其弟子不空，携带《大般若波罗密多经》梵本及法器、香料诸物，经南海、广州抵达洛阳，唐玄宗亲自接见，深受重视。不久又前往长安，被礼为国师。初居慈恩寺，又移居大荐福寺，并随驾往返东西两都，盛弘密教，建曼荼罗灌顶道场。开元十一年（723）开始译经，至开元二十四年（736），先后在长安资圣寺、大荐福寺译出《七俱胝佛母准提大明陀罗尼经》、《金刚顶瑜伽中略出念诵法》等。开元二十九年（741）奉玄宗之命归国，行至洛阳广福寺病故，年七十三，葬于龙门伊川右，并建塔。唐代宗永泰元年（765）追赠“开府仪同三司”官衔。

不空，梵名阿目佉跋折罗，略移不空，北天竺人。幼年出家，十四岁于阗婆国（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师事金刚智，开元八年（720）随金刚智经南海、广州至洛阳。开元十二年（724）二十岁时在洛阳广福寺受具足戒。后随金刚智多次往返于洛阳、长安两地，学习律仪和汉梵经论，并参与金刚智的译事。开元二十九年（741），唐玄宗诏许金刚智回国，行至洛阳病故，不空料理其师丧事之后，欲继续前往天竺。就在此时，又奉玄宗命赍送国书往师子国，寻求密教典籍。故不空至广州，率弟子含光、惠誓等僧俗三十七人，携带国书，乘船经河陵国（今爪哇中部）抵达师子国，住于佛牙寺，受



到师子国王的殊礼接待。不空与其弟子从普贤阿闍梨重受灌顶，并学五部契印、曼陀罗法、瑜伽、护摩等，前后三年。在此期间，广求密藏和各种经论，获得梵本大小乘经论及密教经法仪轨共一百部，一千二百卷。后不空请求还至中国，师子国王尸罗迷伽请附表，并托献方物。于是，不空同其弟子携带梵夹和方物回唐，于天宝五年（746）到达长安，奉诏于净影寺从事翻译和开坛灌顶。天宝九年（750），玄宗准其回国，行至韶州患病未能前行，遂在此养病。天宝十二年（753），经河西节度使、御史大夫、西平郡五哥舒翰奏请，玄宗又下诏将不空追回，住长安保寿寺。月余后又奉诏赴河西，在武威开元寺从事灌顶译经。天宝十五年（756），征召不空入朝，住大兴善寺，开坛灌顶。至德初，安禄山攻陷长安，肃宗逃往灵武、凤翔，不空仍“密奉表起居，肃宗亦密遣使者求秘密法”<sup>①</sup>。故此，至德二年（757）肃宗还都以后，不空备受礼遇。乾元元年（758），不空奏请搜求天下梵文经夹以修补、翻译，诏许将长安慈恩、荐福等寺，洛阳圣善、长寿等寺以及各县寺舍、村坊所藏昔日中土西行求法之人和域外东来传教的僧人所携梵夹集中在京城长安大兴善寺，由不空翻译奏闻。代宗大历九年（774）六月十五日圆寂，世寿七十，僧腊五十年。建中二年（781年），德宗敕准不空弟子慧朗在大兴善寺为不空立碑。不空一生所译显密两教经论、仪轨、陀罗尼及其他著述甚多，据《宋高僧传》卷一《不空传》记载，有七十七部，一百二十余卷。

达摩笈多，南天竺罗罗国人。隋开皇十年（590年）来长安译经。住兴善寺。后直至大业末年，始终致力于佛典翻译。所译经论有《起世缘》、《牛药师》等共七部，合三十二卷。

波罗颇迦罗密多罗，一云波颇，中天竺人。十岁出家，随师受业。受具足戒后，始学律藏，心乐禅师，又随胜德修习定业。唐武德九年（626年）来长安，住兴善寺，释门英达，纷纷前来就学。贞观三年（629）开始译经。当时沙门慧乘等证文，沙门玄誓等译语，沙门慧曠、慧静、慧明、法琳等缀文。又敕上柱国尚书左仆射房玄龄、散骑常侍太子詹事杜正伦参加铨定。光禄大夫太府卿萧瑛总知监护。初译《宝星经》，后译《移胜光》，又译《般若灯大庄严论》，共三部三十五卷。

那提三藏，中天竺人。年少出家，以弘道为怀。唐永徽六年（655年）

<sup>①</sup> 《宋高僧传》卷一《不空传》。

东游至长安，居慈恩寺。显庆元年（656年）奉诏往昆化（今暹罗诸国）诸国采取异药。龙朔三年（663）返回长安，于慈恩寺从事佛典翻译。所译经典有《八曼荼罗礼佛法》、《阿吒那智》等。

阿地瞿多，中天竺人。精通五明、三藏。唐永徽三年（652）年来长安，高宗特下敕安置于大慈恩寺。后应沙门大乘琮、英公徐勣、鄂公尉迟敬德等人之请，往慧日寺浮图院建立“陀罗尼普集会坛”。留住慧日寺期间，他从《金刚大道场经》中撮要抄译，集成《阿罗尼集经》十二卷，由沙门玄楷笔受。阿地瞿多译经以后的踪迹无考。

菩提流志，南天竺人。出身婆罗门，姓迦叶。年十二从外道出家，事波罗奢罗，通晓《声明》、《僧法》等论，并熟悉历数、阴阳、讖纬之学。初依耶舍瞿沙三藏学诸经论，五年间通达三藏教典，声名远扬。唐高宗慕其高风，永淳二年（683）遣使迎接。十年之后，即武周长寿二年（693年）到达东都洛阳，住福先寺译《佛境界》、《宝雨》、《华严》等经，共十一部。不久于阗僧人实叉难陀来华翻译大部《华严经》，菩提流志停止译事，和义净一同帮他翻译。神龙二年（706），随中宗回到长安，住崇福寺，译《广大宝楼阁善住秘密陀罗尼经》、《大宝积经》等，历时七年，到睿宗先天二年（713），全部译毕，从此以后，菩提流志不再翻译，专事修持。玄宗开元十二年（724）随驾居洛京长寿寺。开元十五年去世，据《宋高僧传》卷三《本传》记载，世寿一百五十六。菩提流志所译经本甚多，仅在当时或后来流通的就多达四十三种，一百零一卷。

释智慧，梵名般刺若，北天竺迦毕试国人。唐贞元二年（786）来长安。贞元八年（792）与长安诸寺大德始译《三藏般若》、《华严》、《问佛那罗延力经》、《般若心经》等，同年七月缮写完毕，上奏德宗。智慧后卒于洛阳，葬龙门西冈。

释牟尼室利，天竺人。贞元九年（793）由那烂陀寺出发东游，贞元十六年（800）至长安兴善寺。贞元十九年（803）移居崇福醴泉寺。后于慈恩寺译出《守护国界主陀罗尼经》十卷。又向德宗进献六尘兽图。元和元年（806）卒于慈恩寺。

## (二)

陕西与南亚的科技、文化交流，还有天文、历法、占星学、医学和制糖法的输入。

天文 古代印度的天文历算之学甚为发达，正如《旧唐书》卷一八五

《西戎传》所载：“天竺国有文字，善天文历算之术。”古代印度称天文学为观星明。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印度的天文知识也随着佛典传入中国，其中有些是首先传入陕西的。

《隋书》卷三四《经籍志》著录的印度天文历算书籍译成中文的有：《婆罗门舍仙人所说天文经》二十一卷、《婆罗门竭伽仙人天文学》三十卷、《婆罗门天文》一卷、《摩登伽经说星图》一卷、《婆罗门算法》三卷、《婆罗门阴阳算历》一卷、《婆罗门算经》三卷，共七种六十卷。各本原书已佚，无法知其内容。

随着印度的天文知识被介绍于中国，一些印度天文学家渐次侨居长安，其中最著名的是迦叶、瞿昙和俱摩罗三家。迦叶氏中有在唐中宗景龙年间（707—709）任右骁骑将军太史事的迦叶志忠和在德宗贞元（785—804）时任泾原大将试太常寺卿的迦叶济。至于瞿昙氏，则是瞿昙罗、瞿昙悉达、瞿昙谟数代服务于唐代司天台一百多年。唐高宗时，瞿昙罗参与唐历的修撰工作，先后编制《经纬历》、《光宅历》。麟德二年（665）正月诏令颁行李淳风所撰甲子元历，因在该年颁行，所以又称《麟德历》。当时，“太史瞿昙罗上《经纬历法》九卷，诏令与《麟德历》相参行。”<sup>①</sup>《经纬历》的演算对李淳风制作浑天仪和用三层仪测定黄道经纬、赤道经纬和地平经纬均有一定参考价值。同时对《麟德历》所用定朔法也是一个大的改进。圣历元年（698），瞿昙罗又上《光宅历》十卷，诏令颁行，然三年后废止，仍行《麟德历》。

瞿昙谟之弟瞿昙谦以善算著称<sup>②</sup>，唐玄宗时任宗正丞，作《大唐甲子元辰历》一卷。据《唐会要》卷四四记载，他还于宝应元年（762）拜司天少监。代宗时太史阁掌有三家天竺历，而尤以瞿昙氏历为准，和本国历参照使用。

在瞿昙氏中，瞿昙悉达贡献最大。瞿昙悉达与僧一行齐，曾任太史令、太史监等职，开元、天宝间习称瞿昙监。景云三年（712），他受诏修浑天仪，次仪成。开元六年（718），又受诏翻译印度《九执历》，其运用至为广泛。又撰《开元占经》一百二十卷。九执原称九曜，水火木金土日月和日月交叉处的隐曜龙首及龙尾合称九曜。九曜又为吉凶两类，分执人类的行

<sup>①</sup> 《唐会要》卷四二。

<sup>②</sup> 《玉海》视瞿昙谦与谟为同一人。据1977年长安县北田村发现的瞿昙谟墓志，二人均为瞿昙悉达之一。

为。开元九年（721），《麟德历》推算日蚀无效，玄宗诏一行作《大衍历》。《旧唐书·天文志》云：

玄宗开元九年，太史频奏日蚀不效，诏沙门一行改造新历。一行奏云：今欲创历立元，须知黄道进退，请太史令测候星度。

经过六七年的时间，到开元十五年（727）《大衍历》草成，开元十七年（729）正式颁行。当时精通历法的瞿昙谏因未参与改历之事而心怀不满，遂于开元二十一年（733）和陈玄景合奏《大衍》写《九执历》，其求未尽，于是诏李麟等校灵台候簿，结果《大衍历》十得七八，《麟德历》得三四，《九执历》得一二。《大衍历》终于取胜各家。不过，《大衍历》在草拟过程中曾参照《九执历》，九曜之说亦由此输入。正因此，《大衍历》颁行之后，政府仍参用《九执历》，通行于民间。

由于印度历法的先进性与科学性，在长达几个世纪中一直是中国天文学家参考的蓝本。唐建中（780—783）时曹士芬作《七曜符天历》即取则于印度历法。该历以显庆五年（660）为上元，雨水为岁首，世人称为小历，通行民间。《困学纪闻》卷九《历数系》曰：“唐曹士芬七曜符天历，一元合元万分历，本天竺历法。”另外，曹士芬又撰《七曜符天人元历》三卷、《罗计二隐曜立成历》一卷，亦与印度历法有关。由唐而宋、元，直至明代中叶，始终是半推古法，半推新法，两相交验。清代乾隆时的《钦定协纪辨方书》中的罗喉、计都二曜，便取自于唐代曹士芬的《罗计隐曜立成历》。总之，印度《九执历》中的先进部分为我国历法家多所采用。

印度的占星学亦曾传入陕西。开元二十五年（737），东天竺三藏达摩战奉占星记梵本诸方到长安。贞元中（785—804），都利术士李弥乾从西天竺传来的《都利经》、《聿斯经》共二卷，由璩公译成汉语。据《玉海》卷五记载，原书为梵书，五卷，由李乾弥携至长安，“推十一星行历，知人命贵贱。”《通志》卷六八《艺文略》所记略同。《都利经》和《聿斯经》均为印度天文或占卜之书。

**医药** 古代印度医学相当发达。而在印度，医学是佛教徒的必修科目，来华传教译经的印度佛门高僧，基本上都兼通医术。所以，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印度医术与医药亦由僧侣传入。据陈寅恪的意见，中国古代医书的岐伯，很可能是印度古代神话色很浓的大医家 Jivaka 的音译。另外，陈寅恪还认为，三国时给曹操治过病的名医华佗，也可能与印度有密切关系。古代印度称医学为长寿吠陀，分成八科，总称八分医方或八医。六七世纪以来，印

度医方有很多流传于世。《隋书》卷三四《经籍志三》医方部所收直接或间接与印度医学有关的医术，有下列七种：《龙树菩萨药方》四卷、《西域诸仙所说药方》二十三卷、《西录波罗仙人方》三卷、《西域名医所集药方》四卷、《婆罗门诸仙所集药方》二十卷、《婆罗门药方》五卷、《龙树菩萨养性方》一卷。此外，诸如《耆婆所述仙人命论方》二卷、《乾陀利治鬼方》十卷、《新录乾陀利龟方》四卷，或亦与医学有关，并非全然为迷信之作。只是后世未见流传。只看上面这些书名，便知道这些医书皆与印度有关。在中国，不只是一些正史典籍中有印度医书的记载，就是文人学士的著作也有这方面的反映。

事实上，中国的医药也非常先进，尤其是针刺、艾灸等治疗方法和诊脉技巧，更是世界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另外，长生无老的丹药也为中国所特有。然而，尽管如此，自佛教传入以后，印度医学还是迅速地传入中国。

据现有文献资料记载，印度医药传入陕西的最早时间当为唐代。印度八分医方中，长命药科论排列第七。在中国，唐代人喜谈长生术，帝王亦酷好长生药<sup>①</sup>。他们除向道家的炼丹术士请教以外，还多方向印度寻求灵丹妙药。唐太宗李世民即曾服用印度方士那罗延娑婆寐所制延年药。贞观二十一年（647），王玄策第二次出使印度，打败中天竺叛臣阿罗那顺，献俘长安，一同带来印度术士那罗延娑婆寐。其人自言二百岁，有长生术，并自称婆罗门国有一种叫畔荼祛水的药，出于大山之中的石臼之内，有七种颜色，或热或冷，能消草木金铁。唐太宗对那罗延娑婆寐深加礼敬，请他在金甍门造延年药，并令兵部尚书崔敦礼监督，同时“发使天下，采诸奇药异石，不可称数”<sup>②</sup>，甚至派使者到印度去采访名药。然而，“延历岁月，药成，服竟不效”<sup>③</sup>太宗只好听任那罗延娑婆寐去留，但他因年老体弱，无法返国，后死在长安<sup>④</sup>。高宗即位，又从东天竺把卢迦逸多（一名卢伽溢多）迎至长安，任以怀化大将军之职，显庆元年（656）诏令前往印度寻求长生不老之药。《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上记玄照曰：“（卢迦逸多）行至北印度界，见唐使人引卢伽溢多于路相遇；卢伽溢多复令玄照及使僦数人，向西印度罗荼国取长年药。……蒙王礼敬，安居四载；将历南天，将诸杂药，望归东夏。”

① 见赵翼《廿二史劄记》卷十九《唐诸帝多饵丹药》条。

②③ 《旧唐书》卷一九八。

④ 《唐会要》卷五十二谓太宗：“试服之，遂致暴疾，大渐之际，群臣知之，遂欲戮胡僧，虑为夷所笑而止。”

但终因西域路途阻塞，卒于东印度。

据上不难设想，那罗延娑婆寐和卢迦逸多在长安和那些宫廷名医及炼丹家一定有过往来，他们共同研制返老还童的长生不老之药，但最终未能获得成功。

到了笃信道教、迷信升天成仙思想的玄宗，长生不老之药的寻求更达到一种狂热的程度。开元四年（716），印度人宣称师子国（今斯里兰卡）有灵丹妙药和善医之姬，玄宗便派遣监察御史汤范臣和印度商人出使斯里兰卡。开元八年（720），罽宾（迦毕试）进献秘决要方和蕃药。开元十七年（729），北天竺三藏沙门僧密多来长安献质汗等药（质汗是一种春药）。开元二十五年（737），东天竺三藏大德僧达摩战来长安献胡药卑斯比支等和新咒法及梵本杂经论、持国论、上星记梵本诸方。

印度的眼科自古发达。从印度传到中国来的医学中，眼科似乎特别突出，许多医典里都讲到印度的眼科。唐代曾有印度眼科医生在长安及其周围开业，诗人刘禹锡曾前往就医，其《赠眼医婆罗门僧诗》曰：

三秋伤望眼，终日哭途穷；两目今先暗，中年似老翁。看朱渐成碧，羞日不禁风；师有金篦术，如何为发蒙。<sup>①</sup>

天宝七年（748），鉴真在未赴日本前，于岭南韶州（广东曲江）曾就胡医治疗眼疾，“时和上频经炎热，眼光暗昧，爰有胡人，言能治目，遂加疗治。”<sup>②</sup>此胡医很可能就是印度眼医。贞观六年（632），唐太宗为了给太子治病，曾下诏把印度医生波颇迎入长安，在宫廷之中住了一百多天。

至于印度药物也有很多曾经传入陕西，诸如胡椒、郁金香等唐时在长安市面上随处可见。

**制糖法** 中国南方在5世纪末6世纪初南朝齐、梁时期，已开始用甘蔗汁制造砂糖，当时江东、庐陵、广东等地出产甘蔗。而北方知道制糖法却始于唐太宗时的陕西地区。贞观二十一年（647），印度摩揭陀国使者来到长安，向唐太宗夸耀印度砂糖，于是太宗派人前去取熬糖法。《新唐书》卷二二一上记载：

贞观二十一年，（摩揭陀）始遣使者自通于天子，献婆罗树，树类白杨。太宗遣使取熬糖法，即诏扬州上诸蔗，柝沈如其剂，色味愈西

① 《全唐诗》卷十三。

② 《唐大和上东征传》。

域远甚。

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讲到印度吃饭的情况说：“食用右手，才可半腹，方行饼果，后行乳酪，及以砂糖。”可见砂糖当时在印度已成为日常食品。印度制糖法的巧妙之处在于能制作固体的石蜜（即浓缩糖浆）。显庆四年（659）苏敬《新修本草》介绍石蜜的制作方法说：“石蜜用水、牛乳、米粉和煎成块，作饼坚重。西域来者佳，江左亦有，殆胜于蜀。”与苏敬一同编纂《新修本草》的孔志约亦云：“石蜜出益州、西域，煎砂糖为之，可作饼块，黄白色。”由于从印度引进了石蜜的制作方法，所以所制砂糖“色味愈西域远甚”。

#### 四、中亚、西亚、非洲、欧洲

##### （一）

隋唐时期，中亚有昭武九姓等国，他们多倾心仰慕中国文化，相互间进行着广泛的交流。如安国人安马驹，安未弱、安叱奴（武德九年拜为散骑侍郎）、安万善（善吹觱篥）、安讷新等，先后东至长安传乐<sup>①</sup>。昭武九姓之地的康、石、何等国的乐人也有前至长安的。《乐府杂录》说“贞元初（785），康昆仑翻入琵琶《玉宸宫调》，初进曲在玉宸宫，故有此名。”同书琵琶条又说：

贞元中有康昆仑，琵琶第一手，始遇长安大旱，诏移南市祈雨。乃至天门街，市人广较胜负，斗乐声。即街东有康昆仑琵琶最上，必谓街西无以敌也。

按《旧唐书·音乐志》，康氏自北周武帝聘突厥王女为后时由康国东来长安。此外，康迺、康洽等康国乐人亦先后到达长安。尤为感人肺腑的是李白在《上云乐》一诗中所描绘的那位康国乐人：

金天之西，白日所没。

康老胡雏，生彼月窟。

巉岩容仪，戍削风骨。

碧玉灵灵双目瞳，黄金拳拳两鬓红。

华盖垂下睫，嵩岳临上唇。

不覩诡谲貌，岂知造化神。

<sup>①</sup> 参见《隋书·音乐志》、《新唐书·李纲传》。

……

老胡感至德，东来进仙倡。  
 五色师子，九苞凤凰，  
 是老胡鸡犬，鸣舞飞帝乡。  
 淋漓飒沓，进退成行。  
 能胡歌，献汉酒，  
 跪双膝，立两肘，  
 散花指天举素手。  
 拜龙颜，献圣寿。  
 北斗戾，南山摧，  
 天子九九八十一万岁，  
 长倾万岁杯。<sup>①</sup>

在这里，李白挥洒自如地活画出一位康国乐人东来长安献技的动人场面。

西域何国的乐人也有抵达长安的，何满子就是其中之一。何满子不仅是唐时著名的舞曲名，而是以歌人得名<sup>②</sup>。何满子善歌，在天宝年间（742—756）独步一时。后因得罪朝廷显贵，被囚狱中。因其技艺精湛，得到缓刑。唐元稹《何满子歌》对此有过说明：

何满能歌声宛转，天宝年中世称罕。  
 婴刑系在囹圄间，下调哀音歌愤懑。  
 梨园弟子奏玄宗，一唱承恩羈网缓。  
 便将何满为曲名，御谱亲题乐府纂。  
 鱼家入内本领绝，叶氏有年声气短。  
 自外徒烦记得词，点指才成已夸诞。  
 我来湖南拜君侯，正值灰飞仲青琯。  
 广宴江亭为我开，红妆逼坐花枝暖。  
 此时有熊踏华筵，未吐芳词貌夷坦。  
 翠蛾转盼摇雀钗，碧袖歌座翻鹤卵。  
 定面凝眸一声发，云停尘下何劳算。  
 迢迢击磬远玲玲，一一贯珠云款款。

① 《李太白全集》卷三。

② 冯承钧：《何满子》，见《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辑》。



犯羽含商拟调态，留情度意抛弦管。  
 湘妃宝瑟水上来，秦女玉箫空外满。  
 缠绵叠破最殷勤，整顿衣裳颇闲散。  
 冰含远溜咽不通，莺泥晚花啼渐嫩。  
 敛黛吞声若自冤，郑袖见捐西子浣。  
 阴山鸣雁晓断行，巫峡哀猿夜呼伴。  
 古者诸侯飧外宾，鹿鸣三秦陈圭瓚。  
 何如有熊一曲终，牙筹记念红螺盃。

东至长安的末国乐人有末嘉荣和其子末和。父以歌名，子善琵琶。《太平广记》引《卢氏杂说》云：“歌曲之妙，其来久矣。元和（806—820）中，国乐有末嘉荣，何戡。近有陈不嫌、不嫌之意奴，一二十年来，绝不闻善唱。”《乐府杂录》亦云：“元和长庆以来，有李贞信，末嘉荣，何戡，陈意奴。”末嘉荣以善歌而名噪一时。著名诗人刘禹锡曾为诗以志：

唱得凉州意外声，旧人惟数末嘉荣。  
 近来时世轻先辈，好染髭须事后生。<sup>①</sup>

《太平广记》引《卢氏杂说》亦盛誉说：

三朝供奉末嘉荣，能变新声作旧声。  
 于今后辈轻先辈，好染髭须事后生。

末和亦即末和郎，擅弄琵琶，“申旋尤妙”<sup>②</sup>。另外，唐文宗时（827—835）寓居长安的末国乐人还有末禾稼、末万槌，名见《乐府杂录》和《乐书》。

据《新唐书·礼乐志》记载，唐时长安有高丽、百济、鲜卑、吐谷浑、部落稽、扶南、天竺、南诏、骠国、高昌、龟兹、疏勒、康国、安国等凡十四国之乐。唐代鼎盛时期，凡乐人，音声人，隶太常及鼓吹署，皆番上，总号音声人，达数万人。其中中亚乐人之众，亦可想而知。

在中亚各国音乐东传长安的同时，其舞蹈亦陆续传入陕西等地。上已言及，在两汉时代，西域舞蹈已传入长安。当时把随乐而舞的人称为“伎”。陈旸《乐书》记载“汉世之撞末伎、舞盘伎、长趺伎、跳铃伎、掷倒伎、跳剑伎、吞剑伎、舞轮伎、透峡伎、高绀伎、猕猴幢伎、缘竿伎、椀株伎、丹朱伎，唐世并存。”有些甚至一直流传到今天。西域舞蹈的特点在于以矫健的姿态表现跳跃翻腾的动

① 《全唐诗》卷十三。

② 《乐府杂录》琵琶条。

作,傅毅《舞赋》所说的“浮腾累跪,跼蹐摩跌”显然是受到外来歌舞的影响。

在东晋时前秦苻坚令吕光攻打龟兹而得其乐声以后,曾在长安等中原地区广为流行。北齐时,西国龟兹、齐朝龟兹和土龟兹三部舞乐风行长安。据《通典》卷一四记载:

《安乐》,后周武帝平齐所作也。行列方正象城郭,周代谓之《城舞》。舞者八十人,刻木为面,狗喙兽耳,以金饰之,垂线为发。画袄皮帽舞蹈,姿制犹作羌胡状。

是为初引进的西域舞蹈,未脱犷悍之习。

隋唐时乐舞不分,胡乐、胡舞风行长安、洛阳等地。隋文帝即位,分乐舞为雅俗二部,并整理乐章,集域外诸国之伎,总为七部。大业年间(605—616)又复增为九部,一曰清商、二曰西凉、三曰龟兹、四曰天竺、五曰康国、六曰疏勒、七曰安国、八曰高丽、九曰礼毕。除清商和礼乐两部是南朝传统乐舞,其余多为西域各国的舞乐。在隋以前,尽管西域舞乐已广泛流行于陕西等地,但尚未登堂入室一步入宫廷。隋王朝建立以后,西域乐舞被列入太常乐署,开始正式进入宫廷。隋唐著名音乐家万宝常厘定乐律,对陕西及中国乐舞的发展作出了很重要的贡献。

唐代承袭隋朝旧制,设九部乐。后又增加高昌乐,定为十部。《龟兹伎》有弹箏、琵琶、竖箏篥、五弦、横笛、笙、箫、觱篥、答腊鼓、毛员鼓、侯提鼓、都昙鼓、鸡娄鼓、腰鼓、齐鼓、担鼓、贝皆一,铜钹二,舞者四人。并设五方狮子,高丈余,饰以方色,每狮子有十二人,画衣执红拂。然后按五方狮子舞。《安国伎》竖箏篥、琵琶、五弦、横笛、律笙、觱篥、正鼓、和鼓、铜钹各一,舞者二人。《疏勒伎》、《康国伎》亦略同此。

唐玄宗时,分乐为立部伎和坐部伎。唐十部乐中,天竺、于阗、龟兹、疏勒、康国、安国、西凉、高昌诸国乐皆集于长安宫廷,下至市井,人好胡歌胡舞。关于唐代长安乐府中盛行的乐舞,《乐府杂录》记述甚详。该本舞工云:

舞者乐之容也。有大垂手小垂手:或如鸞鸿,或如飞燕。娑娑舞态也;蔓延舞缀也。古之能者不可胜记。即有健舞、软舞、字舞、花舞、马舞。健舞曲有《棱大》、《阿连》、《柘枝》、《剑器》、《胡旋》、《胡腾》。软舞曲有《凉州》、《绿腰》、《苏合香》、《屈柘》、《团圆旋》、《甘州》等。

健舞曲中来自西域的有《阿连》、《柘枝》、《胡旋》、《胡腾》等。比如,《柘

枝舞》即出自石国，由二童对舞。《乐书》卷一百八十四《柘枝舞》说：

柘枝舞童衣五色绣罗宽袍，胡帽银带。案唐杂记，羽调有《柘枝曲》，商调有《掘柘枝》，角调有《五天柘枝》。用二童舞，衣帽施金铃，抃转有声。始为二莲花，童藏其中，花坼而后见。对舞相占，实舞中是雅妙者也。然与今制不同，岂亦因时损益耶？唐明皇时那胡柘枝，众人莫及也。

《胡腾舞》亦是石国健舞，开元、天宝以后盛行于长安，后遍及全国各地。刘言史《王中丞宅夜观舞胡腾》诗对此舞有所描绘：

石国胡儿人见少，蹲舞樽前急如鸟。织成蕃帽虚顶尖，细氎胡衫双裹小。手中抛下葡萄盏，西顾忽思乡路远。跳身转毂宝带鸣，弄脚缤纷锦靴软。四座天言皆瞪目，横笛琵琶遍头促。乱腾新毯雪朱毛，傍拂轻花下红烛。酒阑舞罢丝管绝，木棉花西贝残月。<sup>①</sup>

王中丞即王武俊，宅在长安。据此可见《胡腾舞》在当时盛行长安之状。

《胡旋舞》是康国舞蹈。开元、天宝年间，康、末、史等西域诸国至长安进献胡旋舞女，深得玄宗宠爱。杨太真、安禄山亦善此舞。《胡旋舞》在一小圆球子上纵横腾踏，旋转如风。正如白居易《新乐府·胡旋女》所说：

胡旋女，胡旋女，心应弦，手应鼓。弦鼓一声双袖举，回雪飘飘转蓬舞，左旋右转不知疲，千匝万周无已时。人间物类无可比，奔车轮缓旋风迟。<sup>②</sup>

软舞曲中有《凉州》、《苏合香》、《团圆旋》、《回波乐》。《苏合香》原出天竺，后传至西域各国，继而东入长安等中原地区。<sup>③</sup> 乐府散曲中有钵头舞，又名拨头或拔头，表现一胡人之父被山中老虎所伤，其子上山复仇的故事。《通典》谓该舞出自西域。钵头舞唐时流行长安，今存日本，舞者衣胡服，戴面具，披发，手持短桴。唐代长安还流行一种泼胡乞寒戏，据《旧唐书·中宗纪》记载，“景龙三年（709）十二月乙酉，令储司长官自礼泉坊看泼胡王乞寒戏。”此戏出于中亚康国。

从中亚各国传入的乐舞往往还伴随着杂技或幻术。《旧唐书·音乐志》说：“大抵散乐杂戏多幻术，幻术皆出西域，天竺尤甚。”隋唐时期，中亚百

① 《全唐诗》第七函第九册。

② 《白氏长庆集》卷三。

③ 田边尚雄：《东洋音乐史》239页。

戏杂技不断传入陕西。据《隋书·柳彧传》记载：

近代以来，都邑百姓，每至正月十五者，作角抵之戏，递相夸兢，至于糜费财力，上奏请禁绝之曰：……窃见京邑，爰及外州，每以正月望夜，充街寒陌，聚戏朋游。鸣鼓聒天，燎原照地。人戴兽面，男为女服，倡优杂伎，诡状异形。以秽慢为欢娱，用鄙褻为笑乐。内外共观，曾不相避。高棚跨路，广幕凌云。袵服靓妆，车马填噎。肴饍肆陈，丝竹繁会，竭资破产，兢此一时。尽室并拏，无问贵贱，男女混杂，缁素不分。

当时长安百戏杂技的盛况于此可见一斑。到唐代，依然如此。据《旧唐书·音乐志》记载，唐代承前代而尚存的杂技很多，如汉代的僮木伎，“又有《盘舞》，晋世加之以杯，谓之《杯盘舞》。乐府诗云：‘研袖陵七盘’。言舞用盘七枚也。梁谓之《舞盘伎》。梁有《长趺伎》、《掷倒伎》、《吞剑伎》，今并存。又有《舞轮伎》，盖今戏车轮者；《透三峡伎》，盖今《透飞梯》之类也。《高绠伎》，盖今之绳戏者是也。梁有《猕猴幢伎》，今有《缘竿》，又有《猕猴缘竿》，未审何者为是。又有《弄椀伎》、《丹珠伎》。”其中有些是中国民间所自创，有些由中亚各国传入。

中亚各国的音乐舞蹈及杂技百戏大规模输入长安，对丰富和改善中国文化艺术有着很大的影响。

## (二)

陕西与波斯的文化交流频繁。在波斯萨珊王朝（226—642）时期，中国的绘画和雕刻艺术传入波斯，波斯的绘画、雕刻和金银器及织锦图案等也相继传入中国。

波斯萨珊工艺美术以金银器和纺织品为最突出。这些金银器和纺织品上都有各式各样的图案。就金银器来说，南北朝已源源不断地输入陕西。1957年在西安附近发现的一座北周墓葬中，出土有波斯萨珊朝的高足金、银杯各一件，足部呈喇叭形，足部和杯身中腰有凸棱，并有卑路斯（457—483）银币一枚。另外，1970年在西安何家村窖藏中又出土了一件波斯萨珊时传入陕西的多瓣银盘，底部有写生动物图样。随着波斯萨珊艺术的东传，唐时长安等地出现了一些精美的金银仿制品。这些仿制品在器形上与波斯萨珊式完全相同，但花纹和图案多为唐式。西安何家村出土的三件八棱缕金银杯，器身呈八棱面，每面有浮雕的乐工或舞伎，只是人像和衣服具有中国风格，各棱面分隔处有一列竖直的联珠，足部边缘亦有联珠，这些都是萨珊式的风

格。

另外，波斯的波罗球戏也在唐时传入长安。波罗球一名击鞠，是一种马上球戏，骑马者以鞠杖击球，以先入网为胜，名“头筹”。该球戏源自波斯，唐时经中亚传入长安，很受帝王、贵族和平民百姓的欢迎。长安大明宫建有马球场。唐玄宗为太子时，还亲自参加了和从吐蕃来的马球队的比赛。到玄宗时诸王骑马竞相构筑球场，文宗时三殿十六王宅都可打球，平康坊且有专门的球场，街里平常即可打球。波斯球戏在当时长安城中是人们普遍爱好的一项体育活动。1971年陕西乾县章怀太子李贤墓中出土的壁画，有一幅大型马球图，生动地表现了马球运动的形象。

在宫室第宅、衣着、服饰、饮食等方面，陕西与中亚、西亚各国亦相互感染、渗透。尤其是在衣着、服饰方面，长安受中亚、西亚影响极深，远自波斯、吐火罗，近至突厥、吐蕃均成汉人模仿的对象。贞观初年长安已常见“汉着胡帽”。波斯萨珊时代妇女流行耳环，长安妇女群起仿效，称为步摇。

唐代与波斯的文化交流，应特别述及的还有景教、袄教、摩尼教的先后传入长安。

### 1. 景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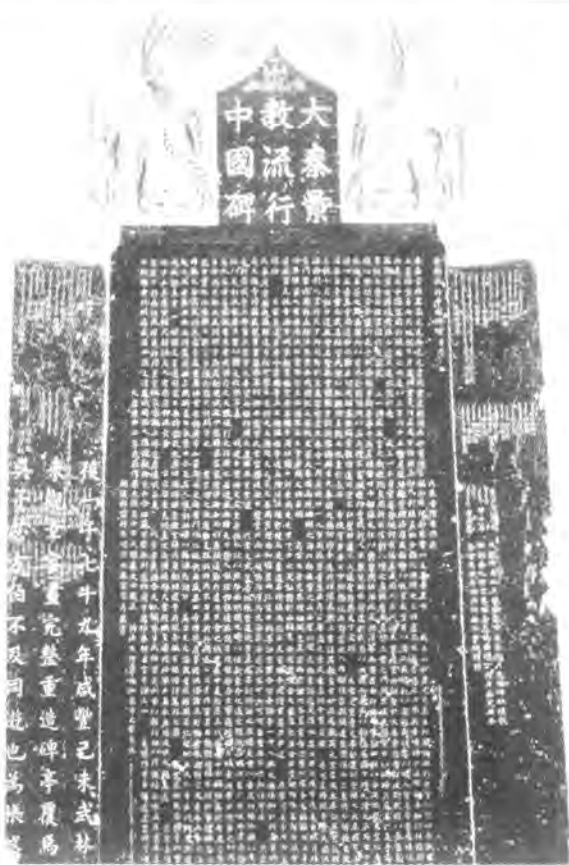
景教是唐代传入中国的基督教聂斯托利派的称谓，但是，在较长的时间内，人们对基督教在中国古代的传播情况几乎一无所知。1294年受罗马教皇差遣来中国的传教士孟特·戈维诺（1247—1328）于1305年从中国寄回的报告还说：“从没有使徒和使徒的门徒前来这些地方传过教。”直到明嘉宗天启三年（1623）在陕西发现《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sup>①</sup>之后，人们才认识到基督教聂斯脱利派至迟在唐贞观九年（653）传到长安的情况。

据《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记载：

太宗文皇帝，光华启运，明圣临人。大秦国有上德曰阿罗本，占青云而载真经，望风律以驰艰险，贞观九祀，至于长安。帝使宰臣房公玄龄总仗西郊，宾迎入内。翻经书殿，问道禁闱。深知正真，特令传授。

此处虽言阿罗本为大秦国大德，但据《唐会要》卷四九所记，阿罗本乃波斯僧人。另外，日本高楠顺次郎自《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发现撰《大秦景

<sup>①</sup> 该碑刻于唐德宗建中二年（781），明天启三年出土，清光绪三年（1907）移入碑林，至今保存完好。



图二十二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该寺在义宁坊十字街东北，当时称波斯胡寺。建成之后，太宗“旋令有司，将帝写真，转模寺壁。天姿泛彩，英朗景门，圣迹腾详，永辉法界。”<sup>①</sup>唐高宗时，在诸州建景寺，并封阿罗本为镇教大法主，一时“法统十道，国富元休；寺满百城，家殷景福。”<sup>②</sup>玄宗、肃宗也很支持景教。玄宗曾亲自为景教题额。天宝四年，玄宗下令把波斯寺改名为大秦寺。《唐会要》卷四九记载说：“天宝四载九月诏曰：波斯景教出自大秦。传习而来，久行中国。爰初建寺，因以为名。将欲示人，必修其本。其两京波斯寺，宜改为大秦寺。天下诸府郡置者亦准此。”

长安义宁坊之外，尚有醴泉坊的景教寺。据宋敏求《长安志》说是波斯王卑路斯在 677 年要求建立的，景龙中（707—709）宗楚客将此寺圈入宅

教流行中国碑》之景净，亦为波斯僧人。据此，景教由波斯传入长安，当无疑义。

在天宝四年（745）以前，波斯被认为是聂思脱里教的根据地，因而其寺院在中国均被称为“波斯寺”，其僧侣则被称为“波斯僧”。阿罗本既至长安，不久便得到唐太宗信任。太宗特敕建寺，并准许度僧。《唐会要》卷四九《大秦寺条》云：

贞观十二年（638）

七月诏曰：道无常名，圣无常体，随方设教，密济群生。波斯僧阿罗本远将经教来献上京，详其教旨，玄妙无为，生成立要，济物利人，宣行天下。所司即于义宁坊建寺一所，度僧廿一人。

①②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地，于是将景教寺改移至布政坊西南，袄寺之西。

唐武宗会昌五年（845）认为佛教的盛行“蠹耗国风”，“坏法害人”，下诏“灭佛”时，亦“勒大秦、穆护、袄三千余人，并令还俗，不杂中华之风”。中国内地的景教亦被禁止，从而衰微，到元代再次传入。

## 2. 袄教

前6世纪，由波斯人琐罗亚斯德所创。波斯萨珊王朝时定为国教，后流行中亚等地。今伊朗部分地区及印度一些地方尚有袄教信徒。袄教认为人世间有善、恶二神，遂宣扬善恶二元论，并认定最终将是善战胜恶。为此，它要求信徒们必须以善思、善言、善行作为自己行为和道德的准则。袄教奉《波斯古经》为经典，认为火是善与光明的代表，是最高神祇马资达的象征，于是以拜火为宗教的主要形式，又称拜火教。

袄教传入中国当在南北朝时。518年，波斯国通使于北魏，中国始知波斯国崇信火神，北魏人称为“胡天神”。北魏灵太后时（516—527）废诸淫祠，独信胡天神：

太后与肃宗幸华林园，宴群臣于都亭曲水。令王公以下各赋诗。太后诗曰：“华光造物含气贞。”帝诗曰：“恭己无为赖慈英。”……后幸嵩高山，夫人、九嫔、公主已下从者数百人，升于顶中。废诸淫祠，而胡天神不在其列。<sup>①</sup>

陈垣在《火袄教入中国考》一书中认为这是袄教在中国北部最早之信奉者。北齐、北周继续崇信此教。《隋书·礼义志》载：

后齐后主末年，祭非其鬼，至于躬自鼓舞以事胡天。邺中遂多淫祀，兹风至今不绝。

后周欲招来西域，又有拜胡天制，皇帝亲焉。其仪遂从夷俗，淫僻不可纪也。

西魏、北周时，波斯曾先后遣使至长安，袄教亦当在此时传入长安等地，由上述齐、周两主躬亲祭拜亦可见其教当时在长安之盛。隋末唐初，改称“胡天”为“袄”。

隋时长安曾置萨保对袄教徒加以管理。萨保出身突厥语中成群移居的首领，是对移居内地的中亚侨民所设官员。萨保即袄教徒移民首领。唐时，凡波斯人在华的集居地多建有袄教寺院。长安城中既有袄寺五处：布政坊、醴

<sup>①</sup> 《魏书·灵太后传》。

泉坊、普宁坊、靖恭坊和崇化坊。据韦述《两京新记》卷三记载，布政坊袄祠始建于武德四年（621），为陕西及中国最早的袄祠。同年并置官管理，“视流内，视正五品萨宝。视从七品，萨宝符袄正……视流外，勋品，萨宝府袄祝，四品。萨宝率府，五品。萨宝府史。”<sup>①</sup>当时长安诸袄祠，都置官管理，每年定时祭奉<sup>②</sup>。有人认为，客死于长安的波斯萨珊王朝末代国王伊嗣侯之子卑路斯在长安西北所建“波斯古寺”，亦为袄祠。

1955年在西安西郊发现的袄教徒苏谅妻马氏墓，墓志的上半部用波斯古文婆罗钵文刻成，下半部用汉文镌就，苏谅就是萨珊王朝灭亡后流寓长安的波斯后裔。

会昌五年（845），武宗罢黜佛教时，袄教亦一同被禁，袄教、景教和摩民教教徒还俗的共三千余人。不过，据张邦基《墨庄漫录》卷四载，宋时镇江尚有袄教祠。宋以后中国典籍中罕见袄祠名称。

### 3. 摩尼教

摩尼教为3世纪波斯人摩尼所创立，中国旧译明教、明尊教、牟尼教等。摩尼教曾不为波斯所容，摩尼本人亦被波斯萨普尔一世放逐，后被波斯王巴拉姆一世处死，但其教外为传布颇为迅速，3至6世纪已遍及中亚及地中海沿岸各国。

摩尼教义之精粹，在于阐述光明与黑暗二元的复杂斗争过程。在此过程中一方面糅合了袄教、基督教和佛教冥世观，另一方面又描绘二元斗争的复杂性，以此来宏扬光明神的法力，使信徒们对至高神的崇拜得到加强。

按《佛祖统纪》卷三十九，摩尼教于唐延载元年（694）传入长安：

延载元年，波斯国人拂多诞持《二宗经》伪教来朝。

拂多诞为摩尼教经师，《二宗经》乃摩尼所著，与《三际经》同为摩尼教祖的基本经典。陈垣认为《二宗经》即《摩尼教经》，今有敦煌石窟发现的残本，现存北京图书馆，称《波斯教残经》。也有学者认为，延载元年为摩尼教传入中国之始。然据《长安志》卷十，怀远坊东南隅，有大云经寺，本名光明寺，乃开皇四年（584）文帝为沙门法经所立。大历三年（768），唐代宗敕赐回鹘摩尼，为之置寺，赐额“大云光明”。蒋斧曾据此认为摩尼教传

<sup>①</sup> 《通典》卷四。《职官典》。

<sup>②</sup> 《新唐书·百官志》。



入中国当在周隋之际<sup>①</sup>。

719年(开元七),吐火罗国支汗那王帝矰上表献一名通解天文的大慕阁,“其人智慧幽深,问无不知,伏乞天恩,唤取慕阁亲问,臣等事意,及诸教法,知其人如此之艺能,望请令其供养,并置一法堂,依本教供养。”<sup>②</sup>虽则“依本教供养”,但未被正式承认。慕阁即摩尼教法师,汉评教师。李肇《国史补》有大摩尼、小摩尼,即大慕阁、小慕阁。慕阁较拂多诞高一级。吐火罗信奉摩尼教,故选派学有专长的高级摩尼僧侣来长安宣教,以宏扬发展摩尼教。

据《唐会要》卷四九记载:

贞元十五年四月,以久旱,令摩尼师祈雨。

元和二年正月庚子,回纥请于河南府、太原府置摩尼寺,许之。

会昌三年敕摩尼寺庄宅钱物,并委功德使及御史台京兆府差官检点。在京外宅修功德回纥,并勒冠带。摩尼寺委中书门下条疏奏闻。摩尼教之所以能在长安等地传布,和唐朝廷发展同国内少数民族回纥的关系密不可分。据蒙古哈拉巴尔加逊出土的九姓回纥可汗碑,爱登里罗汨没蜜施合毗伽保义可汗(登里可汗)在安史之乱爆发后曾助唐击败史朝义,占据洛阳。可汗在洛阳受外籍摩尼法师教化,改信奉佛教为摩尼教。后回国极力倡导摩尼教,遂使该教成为回纥国教。由于唐廷注意发展与回纥的关系,在当时有大量回纥人移居长安。大历三年(768)唐政府“敕回纥奉摩尼者,建大云光明寺”<sup>③</sup>,正式允许信奉摩尼教的回纥可以建寺传教。大历六年(771)又应回纥之请,在荆、扬、洪、越等州置大云光明寺,信徒均白衣白冠<sup>④</sup>。贞元十二年(796)回纥又派摩尼八人到达长安。后回纥使者又在洛阳、太原置摩尼寺三所。

摩尼教师大多是学有专长或见闻广博的波斯人或粟特人。回纥对摩尼教僧侣敬信备至。甚或亲如骨肉。元和元年(806)有摩尼随回纥使者抵达长安,在西市进行投机买卖。此后,每当回纥使者入京,必有摩尼僧侣随同,摩尼僧成为回纥的国策顾问。因为回纥常和摩尼议政,长安便置寺接待,长安的摩尼师亦越来越多。

① 见《敦煌石宝遗书·摩尼经残卷》末尾蒋斧考略。

② 《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③ 《佛祖统纪》卷四一。

④ 《佛祖统纪》卷五四。

除佛教以外，在被称为“外道”的各教中，摩尼教是流行最广的一种宗教。虽则如此，摩尼教在中国亦未及四十年，便因佛教的反对而遭禁止：

开元二十年七月，敕末摩尼本是邪见，妄称佛教，诳惑黎元，宜严加禁断。以其西胡等既是乡法，当身自行，不须科罪者。<sup>①</sup>

显然，当时只许侨民继续信奉。正因此，摩尼教传入长安等地后，并没有招引多少汉族信徒。

上已言及，摩尼教仰仗回纥得以在长安等地传布，相应，随着唐王朝与回纥关系的恶化，摩尼教遂遭禁止。开成五年（840），黠戛斯攻破回纥，唐朝下嫁回纥可汗的太和公主久留不归，唐和回纥关系恶化。会昌三年（843），太和公主回抵长安，唐政府即将长安、洛阳、太原三地摩尼寺庄宅钱物全部点检没收，长安女摩尼七十二人都死，幸存者被发配各地。不过，摩尼教的传教活动并未因此而完全告终。据《闽书》记载，会昌年间，摩尼教师呼禄曾由北方南下抵福州、泉州传教，后死于泉州。尔后，摩尼教继续流传于福建地区，宋代虽遭禁止，但依然在民间秘密流传。

### （三）

唐代陕西与阿拉伯的文化交流由伊斯兰教传入长安。

伊期兰教的创始人穆罕默德，570年出生于阿拉伯半岛的麦加城，610年前后开始传教，后受迫害，于622年与大批伊斯兰教徒从麦加迁移至麦地那，建立起政权合一的公社。他的继承人，进行对外战争，建立了唐代史籍称为“大食”的政教合一的伊斯兰阿拉伯帝国，伊斯兰教随之在亚、非、欧传播，成为世界性宗教。

伊斯兰教又称大食教、天方教、回回教、清真教，该教传入中国的具体年代，中外史籍缺乏详实的记载，不能为人们提供明确的答案，因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概括而言，在唐代传入是没有疑问的。唐代时，陆上和海上交通发达，两国间除了在天宝十年（751）发生过一度战争外，长期友好相处。据《旧唐书》、《新唐书》和《册府元龟》等史书记载，永徽二年（651），大食国王（哈里发奥斯曼）曾首次遣使来华，在长安朝见唐高宗李治，介绍了哈里发国家及伊斯兰教的情况，此后，不断派遣使节到长安，而且民间的交往可能还要早一些。在来长安的使节和民间的商人中有不少伊斯兰教徒，当时长安的“西市”内有“波斯邸”、“胡店”，他们聚居在一起，

<sup>①</sup> 《通典》卷四〇。

保持着自己的宗教信仰和独特的生活方式，在广州、泉州也有同样情况。中唐时，为平定安史之乱，唐肃宗向大食等国借兵，两京收复后，允许大食兵世居中国，可与中国妇女通婚。据传天宝以后留居长安一带的蕃兵胡贾几达四千人，总之，唐代是伊斯兰教初传中国的阶段，人们也往往把永徽二年（651）看成是伊斯兰教传入长安之始。

此外，唐与大食的文化交流，还表现在天宝十年（751）唐朝将领高仙芝对中亚的石国（乌兹别克塔什干一带）用兵，石国乞援于大食，大食派兵东来，发生怛逻斯之役，因葛逻禄部众临阵倒戈，高仙芝战败，大食俘虏了不少唐军，其中有人原是熟练的造纸工匠。大食把他们留在撒马尔罕，并在当地设立造纸作坊，开始造纸。后造纸技术从撒马尔罕传到大马士革、库法、巴格达、开罗等地，对这些地区乃至此后世界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另据杜环《经行记》记载，唐时大食首都亚俱罗（今伊拉克库法）市中，有“绫绢机杼、金银匠、画匠，汉匠起作画者，京兆人樊淑、刘泚；织络者，河东人乐痾、吕礼”<sup>①</sup>。这些长安及中国其他地方的绫绢工人、画匠，也是在怛逻斯战役中被俘而至阿拉伯的，他们将唐代进步的丝织技术、纺织技术和绘画技术传入阿拉伯，促成了唐与阿拉伯之间的技术转移。

与此同时，阿拉伯文化亦传入长安。例如，风行长安的棋弈双陆，即由大食传入。武则天、狄仁杰均好此道。日本正仓院保存有唐代紫檀木画双陆局二件。双陆的棋弈发展到宋代成为北双陆和南双陆。经辽、元至明，一直作为博戏而流行于世。

<sup>①</sup> 《通典》卷一九三《边防·大食》引《经行记》。

## 第四章 宋元明清（1840年前）

### 第一节 概况

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宋王朝建立时虽统一了中原，对外推行友好的开放政策，但却长期处在和北方边境的西夏、辽、金相对峙的状态。因此，两宋王朝主要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与外国交往，北部边境的政权则通过陆上丝绸之路与中亚诸国交往。由于海上交通的发展和海外贸易的繁荣，宋王朝在中外关系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13世纪初，中国蒙古族兴起，成吉思汗（1162—1227）于1206年统一蒙古各部后对外征服扩张，经其子窝阔台，孙拔都、蒙哥、旭烈兀、忽必烈继续东征西讨，到13世纪末建立起横跨亚、欧地区的蒙古大帝国。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八年（1271）定国号元，建立元朝，次年定都大都（今北京），至元十六年（1279）灭南宋，统一了中国。这是中华大地上规模空前的统一，成为当时世界上一个民族众多，疆域辽阔的强国，超过了汉、唐鼎盛时期，而且在对外关系上采取开放政策，不仅使联系南海和印度洋沿岸的海上丝绸之路，在宋代的基础上更加繁荣，也使经过中亚通往波斯、阿拉伯的陆上丝绸之路得到恢复，来往频繁，范围扩大，向西可达欧洲。其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交流，不仅使中外各国受益，而且影响深远。

明太祖洪武元年（1368），明王朝建立。为了防止元末逃亡沿海岛屿和海外余众的卷土重来，消弭海疆各处日渐严重的倭寇之患，对外实行了海禁政策，规定“片板不许入海”、“海滨居民不许与外洋番人贸易”等办法。这里所谓的海禁，仅是对私舶而言，官方的朝贡贸易并没有停止过，而且违禁的私人海外贸易并没有能禁绝。实际上，明王朝从和平稳定出发，在洪武初年就派出使节，主动与海外各国建立关系。明成祖即位后，在继承海禁政策时，放宽了限制，还广招海外国家入贡，将中外关系推向一个新高潮。郑和率领庞大的外交使团七次下西洋，历时二十八年之久，就是明王朝对外政策

的体现。如此主动广泛与海外国家建立关系并进行贸易，在中国历史上也属空前之举。

清世祖顺治元年（1664），清王朝建立，对外关系又发生变化。在清初，为了镇压东南沿海人民的反抗，切断据守台湾的郑成功与大陆联系，从顺治十二年起，先后五次公布禁海令，严禁官民出海贸易。在清政府统一台湾后，康熙帝下令开放海禁，并规定沿海城市为对外贸易港口，扩大开放。但是，到乾隆二十二年，又下令关闭宁波、松江、泉州等港口，仅保留广州一地对外通商。这种海禁闭关，比起汉唐以来的对外开放，实属历史倒退的愚昧行为，自以为关闭了“天朝”大门，使可稳坐“江山”，拒敌于千里之外，结果却遭到鸦片战争，被帝国主义列强敲开了中国的大门。

总之，宋元明清时期，长安在失去了作为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地位之后，同时便失去了对亚、非、欧各国的巨大的吸引力，加之西北陆上丝绸之路的受阻，陕西与世界各国的交往较汉唐时期大为减少。尽管这一时期海上丝绸之路已经取代陆上丝绸之路成为中国对外交通的主要渠道，但陆上丝绸之路并未断绝，而长安地处陆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又是西北的首府，在中外交往上，仍然发挥着应有的作用。

## 第二节 涉外机构与使节往来

宋元明清（鸦片战争前）时期的涉外机构，继承了传统体制，但随着对外往来频繁，管理这方面的职官也在增置。宋代设鸿胪寺，为中央九寺之一，其下属机构有亭西驿、礼宾院、怀远驿、同文馆、客省使、引进司、四方馆使等。元代设会同馆，长官由礼部尚书兼领。明代以礼部主客清吏司负责接待，以鸿胪寺司宾署负责朝贡礼仪。清代以礼部主客司负责从海路来华朝贡的外国使者，理藩院掌管蒙、回、藏事务和接待西、北陆路来华朝贡的使者。

同时，各朝代还在边境设镇抚机构，在边关和通商口岸设外贸管理机构。如北宋初设市马务，熙宁七年（1074）设提举成都府路买茶公事，后改称大提举茶马司。南宋时设秦（陕西）、川（四川）两茶马司，管理用川茶与藏族交易马匹，以及运输等事。明初在陕西辖区的秦、洮、河（今均属甘肃）三州，清代在陕西、甘肃两省均设茶马司，其职掌与前代同。宋代茶马司设提举官，明设大使，清初又在陕、甘两省设御史专理其事，一般称为茶

马御史。

在长安失去了首都的地位后，与外国互通使节已不可能，但也有中亚国家的使节，从陆路进入甘肃，通过西安或陕北，再进入北京的。如《殊域周咨录》记载：明永乐十三年（1415），撒马尔罕使节到达西安府，明成祖“诏宴其使于陕西布政司”；明嘉靖元年（1522），撒马尔罕使节再次抵达西安府，陕西行都司指挥郑恺、张俊等伴送使节前往北京；明嘉靖四年（1525），阿拉伯天方国使节到达西安府，陕西行都司命陈钦、哈荣皮见伴送使者赴京进贡。

此外，还有一些名垂青史的旅行家和不计其数而未留下姓名的商人、技工、士兵、教徒等奔波于丝绸之路上，为中外交往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 第三节 丝绸之路的延续

北宋中叶，宋、夏陕西战场趋于稳定，以玉帛代替干戈成为这一时期的对外交通特征。宋神宗时重开茶马贸易，“蜀茶总入诸蕃市，胡马常从万里来”，陕西境内的茶马交易繁荣一时。

元代的对外贸易有陆上贸易和海上贸易两种情形。由于蒙古帝国的建立，唐宋以后中断多年的中西陆路交通重新开通。中亚、波斯、印度以至欧洲诸国商旅由陆路至蒙古及中国本土者络绎不绝，尤其是成吉思汗西征过程中开辟了官道，设置驿站安置守备人员，这就更加有利于陆行安全畅通。在元朝的统辖下，中西陆路交通基本上有两条通道：一条是老马可·波罗弟兄由君士坦丁堡经中亚钦察汗（今乌兹别克、土库曼共和国等）到中国的道路，进入中国新疆后由哈密到达敦煌（今属甘肃），再到大都（北京）或上都（故址在今内蒙古正蓝旗东滦河北岸），这条道叫钦察道。另一条线路就是1271年马可·波罗随其父亲、叔叔由君士坦丁堡出发，经历两河流域、伊朗高原，越过帕米尔高原来中国的路线，从今新疆的喀什（古疏勒国）入境，越过帕米尔高原，经罗布泊到达今甘肃敦煌，再去大都或上都。这条路叫波斯道。钦察道着重于政治和军事交通，而波斯道则着重于商旅贸易往来。商旅经由路线，或擦今陕西北部长城内沿而过境，或由敦煌一带东南行至今陕西西安地区。当时陕西行省治所西安地区，仍为中西商旅的通道和商品集散地。

元末明初，由于军阀混战和皇朝内讧，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丝绸之路因

之梗塞。新建立起来的明王朝，在进行统一战争中，特别重视肃清北方和西北方的元朝残余势力，为开通丝绸之路创造了条件。洪武初年，明军先后平定秦陇，置陕西行中书省，治西安府。西安府成为西北政治和军事中心。明朝亦以西安府为开通丝绸之路的起点。明朝省甘肃行中书省不置，而于其地置卫所，从而强化了对外交往的控制能力。当时举凡梗阻交通的势力，要从西安府出兵征服；遣往西域的使臣，由西安府派人护送；运去西域的物品，责成西安府征集。西域各邦的使臣和商旅，亦以西安府为中转站，然后转赴明朝京师和商业城市。

明代由陕西肃州出嘉峪关向西，比较通行的有两条大道：一由瓜州向西北，从天山山脉北麓西行。洪武十三年（1415），明朝派都督濮英练兵凉州，清开哈梅里（即哈密力）之路以通商旅，这便是从天山山脉北麓西行的丝绸之路。陈诚《使西域记》称：“哈密”其北有山，与瓦剌相界，其西接火州等城，故哈密为西北诸国往来要路。”明朝建立哈密卫，扶持脱脱为忠顺王，对招徕西域诸邦国，树立了良好的楷模。另一由瓜州向西南，从昆仑山山脉北麓西行。西北行则通过元哈密力，西南行则通过元沙州路所属地区。该地原名撒里畏兀儿，元封宗室卜烟帖木儿为宁王镇宁。“居无城郭，以毡帐为庐舍，产多驼马羊牛。”洪武三年（1370），朱元璋遣使持诏谕撒里畏兀儿以及西域诸邦。使者先至西安府，由西安都司派兵护送河州卫。其时，宁正为河州卫指挥使，又派兵送至撒里畏兀儿，迳直抵达别失八里或于阗，乃至撒马尔罕及迤西诸国。洪武时，专设安定、曲先、阿端三卫，为开拓丝绸之路南道，奠定了基础。而赤斤、罕东、沙州诸卫的设置，又构成陆上丝绸之路南北孔道的前提。

明朝遣使西域或西域使者来朝，皆以丝绸为赐赏物品。而撒马尔罕等中西政权来朝，主要贡献马匹、骆驼之类。永乐年间，朱棣开通丝绸之路西方一段，在元代的驿站基础上，不断增置，遂使自西安至中亚出现平坦无壅的大道。明朝允许西域商旅与内地互市，偶有打击不法商人，禁用丝绸互市之时，都从未彻底中绝外事交往。事实上，朝廷在各地专设丝绸手工工场，制作赏赐之物。例如四川生产的“蜀锦”，便通过成都—茂州—洮州卫或汉中府运到西安府。除丝绸外，其次便是瓷器，故明仁宗朱高炽即位诏书称“往迤西撒马尔罕，失刺思等处买马等项及哈密取马者，悉皆停止，将去给赐缎马、瓷器等件，就于我所在官府入库”。再次为茶。于是，丝绸伴同缣丝制绸的技术，瓷器并制瓷技术，一齐运往西方各邦。

到了明中叶，陕西对外交流道路畅通。嘉靖年间，三原人马理所纂《陕西通志·西域》对陕西陆上丝绸之路作了详尽记述。其所涉及砍的把丹迤西段的路线写道：

……砍的把丹北三百里为黑写歪，又西三百里至阿力砍打思，又西为亦卜刺城，又西为黑楼城，又西为阿伦城，又西为火者阿都阿刺黑蛮城，又西为阿力伯，阿力伯西为杂民城，杂民西五百里为普哈城，又西五百里为撒马儿罕城，又西五百里为失刺思城，又西三百里为高山，又西为把答山城，又西一千五百里为怯迷城，又西为新旦城，又西四百里为孛思旦城，孛思旦西五百里为亦思他刺八城，亦思他刺八西六百里为失刺思城，又西八百里锁力旦城，锁力旦西为阿即民城，又西为帖乱列思城，又西行四个月为苦思旦城，又西为沙密城，又西行一个月至把黑旦城，又西为也的纳城，又西百里至饭店儿，又西行六程至天方国（其城二重，有出家回回在城住，余皆进城礼拜，其南有架子井，北有阿思纳城天方国）。西行十五程为迷乱力城，又西至牙瞒城，又西为文谷鲁城，又西为阿都民城，又西为也勤朵思城，又西为撒黑四塞，又西为哈利迷城，又西为阿的纳城，又西为菲郡城，又西为安各鲁城，又西为可台城，又西为索罗撒城，又西为鲁迷城（其城二重，有自立王子，有缠头回回，及汉儿人，有通事，种旱田，不出物产，东至孛罗撒一千二百里）。

这里对陕西西部出境之后的沿途城市名称、距离写得非常确切，代表了那时朝野上下的人们对中西交通的先进见解。与明世宗时马哥孛罗同乡赖麦锡（Ranmusia）所纂《游记丛书》中叙述的波斯商人哈智·摩哈美德（Hajji mahomed）陆路使华情况，非常相似。

进入16世纪后半叶，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迅速发展，促使西方探险者络绎不绝地来到中国，而中国政府腐败，民心不稳，对外丝绸之路已枯涩不通。随着陆路的阻滞，海上丝绸之路逐步扩大起来，西方传教士以传教播学为宗旨，从另一个角度打开陕西外事交往的大门。尤其是《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发现后，在西方传教士们中间引起轰动，后来便有不少传教士专程赴陕。故明清之际陕西对外丝绸之路有了进一步开拓。清代，陕西对中西乃至欧洲的交往活动日益减少。西安府作为西北内陆城市，其发展状况受到很大制约。只是到了鸦片战争后，陕西外事活动才逐步走出低谷，纳入近代外交活动的范畴。其交往路线，也逐渐海陆并举。



## 第四节 经济、科技、文化交流

### 一、亚洲、非洲

#### (一)

丝、瓷、茶是中国古代传统的三种对外贸易出口商品，陕西是中国丝、瓷、茶最早的发源地之一。

北宋时，陕西耀州窑青瓷堪称一绝。其佳品除供奉朝廷及官府使用外，还对外营销。这个时期，中国瓷器外销较之唐和五代不仅行销市场有所扩大，而且数量急剧增长。仅南宋赵汝括所著《诸蕃志》一书，就具体提及亚洲地区十五个国家同中国进行瓷器贸易，而实际上瓷器输往的地区和国家决不止此。就航程来说，已到达了东非海岸的弼琶罗国（今属索马里），中理国（亦属索马里）和层拔国（桑给巴尔岛，今属坦桑尼亚）。输出的品种以青瓷、青白瓷和白瓷三种为主。近年，在朝鲜出土了宋代耀州窑的刻花青碗。在日本平安京遗址出土了耀州青瓷缠枝菊花纹碗残片，还有一些东南亚国家出土了耀州窑青瓷器。在非洲，宋代耀瓷也有多处出土；在阿曼苏丹国的苏哈尔古城堡遗址出土了耀州窑青瓷残片。在埃及的福斯塔特出土了耀州窑青瓷印纹碗片和刻纹凤鸟大盘残片，在坦桑尼亚的基尔瓦岛也出土了耀州窑印纹碗片。金元以后，陕西耀州陶瓷外销才逐渐衰落。

茶马贸易始于北宋神宗时期。“蜀茶总入诸蕃市，胡马常从万里来”。这就是当时茶马互市的盛况。到了元朝，中断多年的陆上交通重新畅通。成吉思汗西征时开辟了官道，设驿站，置守备，为沿途商旅减少了诸多危险和困难。于是中亚、波斯、印度以至欧洲列国商人皆由陆路至蒙古及中国本土从事经济交往活动。这时，陕西行省首府咸宁，仍为中西商人必经之路和东西方商品的重要交换、集散地之一。明代以来的西北茶马贸易，由于当时陕西布政司恰处西北边陲的特殊地位，抵清初逐渐步入尾声。

清人入关后，建立了清王朝，对外贸易亦得到恢复和发展。清与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往来因而走上国际市场。茶叶成为丝绸、瓷器之后中国又一大宗出口商品。《清史稿·食货五·茶法》云：嘉庆年间以后，“泰西诸国通商，茶务因之一变。其市场大者有三：曰汉口，曰上海，曰福州。汉口之茶，来自湖南、江西、安徽，合本省所产，溯汉水川运于河南、陕西、青

海、新疆，其输至俄罗斯者，皆砖茶也。”汉口茶叶还包括紫阳茶，“紫阳茶向东销售者，几全用水运，经湖北老河口转销于鄂豫两省西部之地。”其时山西、陕北商人贩茶至蒙古边境售卖或交易马匹，其所运茶的相当大一部分也来自鄂西集散的紫阳茶。雍正《陕西通志·茶马志》转引《延绥镇志》：“顺治十年，榆林、神木二道始行茶法，从御史姜图南之请也。”汉口茶叶的其中一部分转入关中，经过泾阳一带茶商加工制成砖茶，沿着古代丝绸之路，出宝鸡，过天水，迤迤西行，到兰州穿河西走廊，出嘉峪关，进青海，经新疆阿克苏、喀什等城进入中亚国家境内，甚至被贩运到西亚的伊朗、土耳其、阿拉伯、伊拉克，北非的埃及、的黎波里、突尼斯、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等国。

另一条历史上有名的西北茶叶之路，是山西商人贩汉口茶叶进入河南以后，西北行入山西、经潞安（今山西长治）、大同越过长城，到张家口（东口）。而陕北商人入河南后，插过山陕交界，经延绥榆等地区，走西口到归化（今呼和浩特）。最后陕晋商人再向西北行，直抵中俄交界城市恰克图，其时中国市区叫买卖城，直到乾隆二十三年后成为中国北部边陲惟一开放的口岸（位于今蒙古国境内）。茶叶进入俄罗斯境内后约有四千里，由中俄商人经西伯利亚贩运至彼得堡，直抵欧洲腹地。这条路实际上是元代丝绸之路北道，明代马市贸易仍有持续和发展。

清初，这条商路仍以布匹、绸缎、生丝等商品为大宗。茶叶在莫斯科还是价格昂贵的奢侈品，每俄磅为15卢布。到了18世纪50年代，俄国茶叶需求量急剧增加。大约到乾隆二十三年（1768），输俄茶叶成为大宗。道光年间，茶叶贸易进入鼎盛时期，道光三十年（1850），比雍正十三年（1735）贸易额增加30倍，销售量达到30万普特。用来交换各种毛皮、皮革、畜产品。当时去东、西口的运输工具，主要是骆驼，若干商人组成庞大的驼队，互相帮助，才能走完艰苦历程，所以这条茶道又叫“驼道”。

陕南茶叶的西销，大部分沿袭历史上的茶马贸易路线，在西乡、汉中、大马里铺三处重要集散地集结后，经西北茶叶商人之手分两路进入大西北。一路，沿褒斜道经留坝、凤县、两地到达天水，到天水后又分为两路：其一经清水到达庄浪等地；其二经甘谷、武山、陇西、临洮到达临夏（古称河州）。另一路，经勉县、略阳、徽县、成县、西和、岷县到达临潭一带（临潭古称洮州），茶叶到达临夏、临潭等地后，除大部分就地销售外，另有一部分又转销至河西走廊、塔里木盆地及至更远的地区。此外，还可经秦岭子

午道，或陈仓道进入关中，运销长安、泾阳一带，或沿丝绸之路西行。茶马贸易走向衰落之时，陕茶及川、湖等地茶叶经陕西商人向西运至新疆，打入中亚国家及俄罗斯市场就势所必然。当时，对陕甘地区的私茶贸易，官方皆要征收一定所得税，这些税收数额不低，也说明陕西茶叶贸易的兴盛与活跃。

## (二)

宋元时期，陕西对中亚、西亚国家的陆路交通比较畅通。伴随着蒙古族领袖成吉思汗西征，中亚国家的许多有识之士，先后加入了蒙古大汗的队伍，同时也将中亚、西亚的科学技术传入中国。

元初入仕中国的爱薛，便是西亚拂菻（今叙利亚一带）人。他的名字，原音似即 Joseph (Jose)，今人译为约瑟，他可能是基督教徒。他精通西域诸部语，专工星历医药，成为元世祖忽必烈的重要大臣。中统四年（1263），他奉命执掌西域星历、医药二司事。后来改建广惠寺，仍命他管理。大德元年（1297），授予平章政事。元仁宗时，封为秦国公。

13世纪中叶，巴格达景教主教有各教区主教驻节表，共列教区二十五处，其中中国境内有四处：包括支尼（驻地应在山西大同），喀什噶尔，汗八里（驻地在今北京），唐古特（驻地在今甘肃张掖，统辖陕西、甘肃、宁夏等地区）。可见涉及陕西的，便有支尼和唐古特两个教区。南宋宝祐元年（1253）到达和林的卢白鲁克，在中国北方游历后，据他记载中国有十五个都市有景教徒。到达京兆府（今陕西西安）的马可·波罗亦提到当地的景教信徒。随着蒙古人和色目人由北方迁往南方，也里可温教徒（包括早先流行的聂斯脱利教派和后来传入的罗马圣方济各教派）散居全国各地，其中陕西地区信徒也很多。

元代称为答失蛮的伊斯兰教徒也在中国相当活跃。其中多为移居中国的波斯人和阿拉伯人。伊本·贝图达在游历中国后说：“中国各城市中，都有伊斯兰教徒居住区，筑有清真寺，作为礼拜之所。”陕西穆斯林侨民也相当集中。有些被编入“探马赤军”的回回人，“上马则备战斗，下马则屯聚牧养”。在所居地开辟垦区，西北地区集中在宁夏、甘肃地区，陕西、新疆等地也有一些垦区。其中受到中国儒家文化熏陶，成为华化西域人的著名人物中，有被封为咸王王的赛典赤·赡思丁（1211—1279），作为元代重要的政治家之一，于至元元年（1264）抵达陕西，担任陕西五路西蜀四川行中书省平章政事，直至至元十一年（1274）离开陕西赴任云南，在陕西增加军民户

口，屯田，理财，兴修学校，整治栈道，建立军功。正如王臣《咸阳王庙记》所说：“王昔奉命化西秦，陶民以义嘘以仁；甘棠余爱千家春，遗黎口碑同琬琰。”其在陕、川时的政绩，深受时人赞扬。

此外，还有一位阿拉伯人学者赡思（1278—1351），曾任陕西行台监察御史，浙西东肃政廉访司事，死后追封为恒山郡侯。著有《西域异人传》、《西国图经》等。

除移居中国的穆斯林侨民传播阿拉伯等民族文化外，波斯语、阿拉伯语的传授都起过非常积极的作用。耶律楚材跟随成吉思汗西征时，于1220年到达中亚国家撒马尔罕，使用当地穆斯林学者所创造的天文观测仪器，实际观测日食等天象变化，十分重视吸收阿拉伯人的天文历法知识。因此，阿拉伯数码字在元朝得到了广泛流传。《元秘书监志》提到1278年扎马刺丁曾为安西王忽必烈（驻西安）推算历法，回回天文台的三名官员同时在安西王府做见习随待。1956年在西安市郊元代安西王府遗址出土了五块铸有古代阿拉伯数字的方形铁块，大小相同，长宽各为12.4cm，厚1.5cm。其中四块出土时夹在凿刻整齐的两块方石中。经研究，原来这是用阿拉伯数码排列的66幻方，其纵横和对角线的数字之和均为111。这是至元十年（1273）开始修建安西王府时，作为“奠基埋藏”而埋在夯土台的房基之中的（参看夏鼐《考古学和科学史》）。它们是目前发现的中国在数字上应用阿拉伯数目字的最早的实物材料，也是元代时阿拉伯数字对中国的科技文化影响的一个实物证据。明代陕西回族著名学者胡登洲，于嘉靖年间朝觐麦加回国后，深感经文匮乏，学人寥落，于是制定了一套经堂教育大纲，先在家中招收弟子，后移至清真寺内办学，培养了大批知名之士，为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起了重要作用。

在建筑方面，由于阿拉伯建筑师来华，各地阿拉伯式样的清真寺建筑的创建，在元代颇为兴盛。与此同时，基督教堂也在内地兴修。《马可·波罗游记》、《鄂多力克游记》及马黎诺里《奉使东方记》及诸教士的记载认为：有甘肃沙州（今敦煌）户口中大半为拜偶像教徒（佛教），半为基督教徒，其数甚众。多为聂思脱列派教徒。教堂数目不详。甘州（今张掖）城内有基督教堂两所，建筑极为华丽。甘肃额里折（凉州）、鄯州（今西宁）、额里合牙（今宁夏），皆有教堂多处，建筑华丽。

与中亚、西亚国家的人民将科技、文化传入中国的同时，中国的造纸术、印刷术、火药制造和罗盘针技术皆由阿拉伯人传入欧洲国家。其中迁居

中亚地区的西辽人和侨居伊利汗国的中国人，都对中国文化的西渐作出了直接的贡献。

### (三)

宋代日本对华贸易有所衰退，往来东海的只有宋船。一些日本僧侣常乘商船来华。992年（宋淳化三年），日僧源信把他所著《因明论疏四相违略注释》托付给宋商杨仁绍传婺州云黄山行迪和尚，赠慈恩寺弘道大师门人，请求决释是非赐教。宋太平兴国三年（978），源信被选为来此睿山法华会广学竖义的竖者，为了准备竖义（就佛教教义难题立意作答案），特地研究因明学，方著成上述所托之书。后因未收到复信，宋咸平四年（1101），又摘录因明大意，著成《因明义断纂要注释》一卷，托杭州钱塘西湖水心寺沙门齐隐再次带给弘道大师门人，以求决疑。

南宋以降，陕西以秦岭分界，北属金人，南属宋室，日本僧人不再渡越潼关。元代，两国一度交恶，虽未影响两国沿海一带经济交往，但陕西却已处于闭塞境地。

明清时期，中国对外贸易已与唐宋迥然不同。唐宋时，多奖励海外互市，以收取市舶之利而充实国用，率先流行于陕西、四川之间的交子、会子等纸币亦流行日本；而到了明代，仅注意安抚四夷，互市只是政治上和军事上的辅助手段，而忽视了市舶赢利。明洪武四年（1372），日本第一次入贡于明。后来，永乐、成化、弘治、正德等朝皆规定对日勘合贸易内容，限定入贡数量，以图减少赐予数额。明代后期，由于日本国内政治混乱，中日交恶，至清初才告一段落。

清廷一度曾取消海禁政策，允许商民自由赴海外贸易，而日本德川幕府对清船贸易数额及入港船数，一律未加限制。输入于日本的货物，多为加工精制品，如图书、文具、丝绸品，茶、瓷器、棉针、药材、字画等，日本输出的为金银铜等。同时，当时中日交往的路线，仍以沿海地区为主，来华船只仍称唐船，其中包括口船、中奥船、奥船等，交通路线遍及东南沿海地区。

## 二、欧洲

### (一)

蒙元时期，由于蒙古统治者不断西征，在中亚、西亚地区建立了包括金帐、伊利、窝阔台和察合台在内的“四大汗国”，形成了以和林（今蒙古国

乌兰巴托西南，鄂尔浑河上游西岸）为中心，跨越欧亚两洲的大蒙古国。元世祖忽必烈在上都（原开平府，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所在地东约四十里的闪电河北岸）即位后，把首都迁到大都（今北京），大都成了当时的政治、经济中心。这时，中国到达欧洲各国的陆路交通（经由中亚波斯等地）已经畅通无阻，其时沿途有完备的快马驿站，只要持有大汗颁发的金牌，就可不受国际关卡的限制，享受各种交通上的便利条件。于是，中国同欧洲各国的科技、文化交流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元朝王礼在他的《麟原集》的《义塚记》中写道：“四海为家”，“无此疆彼界”，就是这一空前繁荣景象的最好见证。

当时，由欧洲到中国大都取道地中海东岸。这主要有两条道路可走：一条是由塞得港向伊斯梅利亚前行，一直进入红海，到亚丁后，渡海经印度进入中国东南部。另一条道路是从地中海东端上岸，经阿勒颇到巴格达。然后向南，出波斯经印度来到中国；或者往东，经中亚土库曼的马里来中国。因此，地中海东部成了前来中国的主要出发地。意大利处于地中海的要冲，在对东方贸易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当时，地中海地区的局势是，“十字军”第四次东征以后，威尼斯城邦控制了地中海东部的贸易和交通。威尼斯城邦的势力范围和蒙古统治者的势力范围相互连接起来了。这种局势有利于威尼斯商人东行来到中国。马可·波罗（1254—1324）出生于威尼斯商人世家，受时代的影响和家庭父辈的熏陶，来到中国远游。

早在1260年，马可·波罗的父亲尼古拉·波罗和叔父马菲波罗，曾到金帐汗国首都撒莱经商，受到别儿哥汗的礼遇。后来，遇到了伊利汗国的旭烈兀派遣出使元朝的使臣，相处多日，很是融洽。使者便邀请他们同行，来到中国。元世祖忽必烈询问了波罗兄弟许多事情，诸如西方各国和罗马教廷的情况，他们是怎样治国和打仗的，以及宗教信仰方面的问题。波罗兄弟一一作答。元世祖十分满意，就决定派遣使臣柯嘉达出使罗马教廷，并聘请波罗兄弟二人为副使，一同前往。元世祖令人用蒙古文给罗马教皇写了国书，要求教皇派一百个精通修辞学、逻辑学、语法学、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和音乐等七种技艺的人来中国，并嘱咐三位使者到耶稣墓前去取长明灯中的圣油。据说，有了圣油可以得福，并可用做药物。

这个使团出发不久，使臣柯嘉达身染重病，不能前行。波罗兄弟让他留下养病，继续前行。1269年教皇逝世。正在阿克城（在亚洲西部，为巴勒斯坦北部的沿海城市）的教皇专使维斯康梯告诉他们，必须等待新教皇选

出，才能履行使命。两年后，波罗兄弟觉得旷日持久，需要回去复命。马可·波罗也十分向往中国，遂一同前往。他们先到维斯康梯处取了证书，又到耶路撒冷索取圣油，行至刺牙思城，得知教皇专使已被选为教皇，改为格里戈利十世。不多时，新教皇派人请他们回去商议，议定由牧师威廉和尼古拉斯两人随同他们去见元世祖。由于沿途战乱不平，两位牧师遂将一切证书、公文、礼品交给波罗父子，原道返回。

经过了长达三年半的艰苦跋涉，波罗家族一行越过伊朗高原，翻过帕米尔，取道新疆、甘肃，于1275年到达上都，受到元世祖的欢迎。马可·波罗很快熟悉了元朝的朝廷礼仪，努力学习蒙古语、波斯语、阿拉伯语、突厥语等。他曾奉命作为钦差大臣，到过山西、陕西、四川、云南、山东、江苏、浙江、福建等地巡视。

现将马可·波罗对西安的记述摘录如下：“我们到京兆府大城（今西安）。这城实在是大而好看，是京兆府国的都城。这国古代是大国，富厚强盛，有许多贤圣的君主治理人民，但现在这地君主名忙哥刺（mangalai），是大可汗之子。他父亲把这国封给他，命他做这国的王，城里工商业皆甚兴旺，出产丝极多，各种金丝布皆在那里制造的。军队用的各种器具也皆在此制造的。各种养生的必需品皆很丰富，并且价钱很廉，城在西面，人民皆拜偶像，但也有少许突厥人奉景教的，和若干回回教徒。城外有忙哥刺王的宫，宫很华丽，我就要告诉你们了。宫在一个大平原上，到处有川河湖沼源泉。宫的前面有一很厚很高的墙，周围五迈耳。建筑极佳，并设的统眼，墙里有许多野兽飞禽。墙围之中央即王宫，宫很大并很华丽，比这再好的是没有了。宫里有许多伟壮的殿，同美丽的房屋，到处皆油漆绘画，用金叶、蔚蓝和无数的大理石来装饰。忙哥刺治国贤明，公平无私，人民很爱戴他。宫的四周有兵驻防，野禽野兽，给他们许多娱乐。”<sup>①</sup>

马可·波罗一行在西安旅游后，又西行并南越秦岭到汉中，在《马可·波罗游记》一书中，对所到各地的风土人情均有所述。

此后，马可·波罗一行由汉中西行，走了二十天左右，经过崇山峻岭，方到达四川省成都府。然后又到达吐蕃省，建都省（建昌），哈喇章大省（云南），哈喇章（马蛮），柴尔丹旦大省（金甯部）、緬城（緬甸）、榜葛刺大省、交趾国大省（今越南）、安宁省、香刺蛮省等地，最后由云南经今日

<sup>①</sup> 《马可·波罗游记》，张星烺译述，1937年7月商务印书馆版。

昭通到四川宜宾（叙州）。

在中国住过十七年之久的马可·波罗一行，久游思乡。恰巧波斯汗阿鲁浑派使臣进谒忽必烈，告以妃子死去，请求赐婚。忽必烈命以阔阔真公主下嫁阿鲁浑汗。马可·波罗奉使陪送公主去波斯，从泉州出发经陆上道路，于1294或1295年左右回到威尼斯故乡。

同为意大利人的鄂多力克（odoric, 1286—1331），为福柳利州（Friuli）颇代依城（Pordenone）人，也于至元年间访华。他由君士坦丁堡出发，先抵脱莱必松德（Trebizond）、爱才罗姆（Erzerum）、塔伯利资（Tabriz）、孙丹尼牙（Soltania）、柯伤（Kashan）、八吉打（Bagdad）、忽里模子（Hormuz），更由此乘船泛洋，到达印度西岸塔纳港（Tana）、至俱蓝（Kulam）、锡兰岛及圣多默墓地。由是而再东，至苏门答腊、爪哇、婆罗州、古婆。终乃于广州登陆，再至泉州。由泉州至福州，由福州经仙霞岭、下钱塘江至杭州，金陵，再渡长江，由扬州沿运河北上而达汗八里（即北京）。在汗八里居住三年之久，这时约翰·孟德高维奴尚生存，时年八十岁左右。鄂多力克离开北京西行，经天德军（河套）、陕西、甘肃而至西藏拉萨。过拉萨以西，鄂多力克可能经阿富汗迦布罗城（Kabul），呼罗珊（Khorossan）、里海南岸，再抵塔伯利资城，由旧路返回威尼斯市。

此外，明世宗时，马可·波罗的同乡地理学家赖麦锡（Ramusio）所撰《游记丛书》也收录了波斯商人哈智·摩哈美德的东行回忆，提及明代陕西肃州、甘州对外口岸情形。

## （二）

明清之际，中西方交通的通道已以海路航行为主，陕西僻处祖国的西北边陲，失去了交通孔道的重要位置，所以对欧洲各国的陆上交往急剧减少。随着16世纪后叶以降耶稣会传教士纷纷来华，特别是一些有文化眼光的陕西人士的大力引进，来自欧洲大陆的传教士们遂与陕西联系日渐紧密起来。

原来明熹宗天启五年（1625），陕西省长安县农民（一说周至县）在耕地中除草，发现一通石碑，这就是唐德宗建中二年所刻立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其时，在华耶稣会传教士及中国籍教徒李之藻等人，皆谓有唐之世，基督教已流行中国。这年应陕西泾阳籍学人王征邀请，来陕主持教会活动的金尼阁成为看见该碑的第一位欧洲人，他所翻译的拉丁文碑记，是欧洲国家最早的译本。

在《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出土前，来华传教士在陕活动的人数既少，



为时且短；出土后，对陕西对外文化交流产生了直接的推动和影响。正如历史学家陈垣所说：“陕西自昔为国都，西域人至者多取道敦煌，以至于陕，其为中西文明之枢纽，宜也。明季西域梗塞，西士至者多由海道至东南，与陕宜风马牛不相及。然以景教碑出土之故，西士至陕访碑者踵相接，秦晋教务，遂与东南俱。”（见陈垣著：《泾阳王征传》）

崇祯元年（1628），传教士鲁德昭受命到西安建立教堂，因得详查《景教碑》的来历。鲁德昭对碑文中汉字尚能懂得，但对外国文字就不能断定。后来，询问驻印度阁兰葛札教士肥南代斯，才知道这就是叙利亚文字。后来，陆续来陕的传教士有：

汤若望（1592—1666），字道未，一作道味，德国人。他于1618年受耶稣会委派来华传教，次年七月抵达澳门。1622年夏进入广东，次年初到达北京，先后两次向户部尚书张问达（陕西泾阳县人）提供月蚀预测报告，受到赏识。天启七年（1627）夏秋之际，被派赴西安管理教务。到崇祯三年（1630）受徐光启推荐赴北京修治历法为止，在西安通过王征和张问达之子张钟芳的关系，建立了包括西安市糖坊街天主教堂在内的两座教堂，奉教人员大为增加。后来赴北京修订历法时，又与徐光启、罗雅谷等合撰《西洋历法新书》三十六卷。同时兼制象限仪、纪限仪、平悬浑仪、交食仪、列宿经纬天球、万国经纬地球仪、平面日晷、转盘星球、候时钟、望远镜等。

杜奥定（1598—1659），字公开，意大利人。明崇祯四年（1631）至华。传教陕西，后往福建。其墓地在福州府海滨。著有《渡海苦迹记》。此书由法国传教土方德望（1598—1659）口译，王征笔录，成为中西交通史上重要的文献之一。其中第一次介绍了地处大西洋与印度洋要冲的非洲国家莫桑比克的风土人情。现藏巴黎国家图书馆。方德望于崇祯三年（1630）来华，在陕西传教，足迹几遍陕南，被称为“方土地”，顺治十六年（1659）于南郑逝世。

南怀仁（1623—1688），字敦伯，一字勋卿，比利时人。顺治十六年（1659）至中国传教，先是传教陕西，次年被召入京，纂修历法，由监副升任监正，加太常寺卿。后又加通政使司通政使，加一级。著有《仪象考》十四卷，《仪象图》二卷、《测验纪略》一卷，《验气说》、《坤輿图说》二卷，《熙朝定案》二卷，《妄推吉凶之辨》一卷，《善恶报略说》、《坤輿全图》、《道学家传》一卷等。

金尼阁（1577—？），字四表，法国人。万历四十八年（1620）初来华，

先居金陵，曾应王征邀请来陕传教，著有《中国传教史》、《宗教祷文》、《西儒耳目资》、《况义》（指伊索寓言）等。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文播欧洲后，有不少人士如雷麦萨、克拉勃罗德、鲍梯等皆承认其为真确。各国翻译碑文的风气纷纷而起。崇祯元年（1628）有法文翻译，四年（1631）有意大利文全译，十一年（1638）鲁德昭将全文译成葡萄牙文、附加了注释。不久，崇拜天主教诸国，也颇多研究。清顺治十二年（1655），鲁德昭有英文翻译，十年（1653）何大化有拉丁文译本，康熙二年（1663）巴拖里汇聚前人研究成果，编成《碑文研究汇编》。直至18世纪末叶（嘉庆初年）英国历史学家吉邦《罗马衰亡史》中，亦有涉及。19世纪时期，重译文字，又复甚多。道光二十五年（1845）有白里枢曼英译本，咸丰四年（1854）伟烈亚力译本，七年（1857）胡克法译本，同治五年（1866）诺曼德译本等等。

明代末年，中西陆路交通路线已荒芜多时，一些传教士皆走海路来华。但也有一位葡萄牙人传教士鄂本笃（Benediet Goës, 1561—1607）走陆路来华。原来，鄂本笃年轻时充当水兵，在印度驻扎过，后受莫卧儿朝皇帝阿克巴（Akbar）赏识宠信。1601年耶稣会任命他为探查契丹的使者。鄂本笃于1602年由印度启程。经过三年艰难困苦的陆行生活，到达当时陕西口岸城市肃州，才知道传说中东方名叫伽也唐的礼义之邦，原来就是指中国。他不幸因病死于肃州。早期来华的著名传教士利玛窦（1552—1610），曾派了一名专使前往迎接，但未抵京便去世，利玛窦便据其遗留日记写成《鄂本笃访契丹记》三章，其后金尼阁收录于所著《耶稣会教徒传教中国记》一书中。游记写道：

长城至支那西北即止。其间有隙地二百迈耳，鞑靼人昔常经此入寇支那，时至今日，因仍抄掠不息，惟为长城所阻，胜利之机大减耳。沿长城有二城。城高垒固，驻兵精守，以防寇盗。二城之中，有钦派总督及他官驻扎。皆直隶北京政府，二城皆在陕西省（Scesi）内。一名甘州（Cancei），有总督及他官驻焉。次曰肃州（Sociea），亦自有长官。肃州城分两部：一部为支那人所居。回教徒称之为契丹人（Cathayans），他部为回教徒所居。其人皆来自西域喀什噶尔等地，专为营商，多有在此娶妻生子者，家室缠绵，因留于此，不复西返，遂籍入土人之列。每夜回人皆退入城中回教徒之居留地，扃门自守，余事待遇，皆同土人，一切诉讼，皆归支那县官判决。其国法律，凡旅客有居住九年者，即不许

重返故乡。(按：明时甘肃省未分出，皆称陕西省。)肃州城为西贡商贾荟聚之地。西方有七八国，与支那帝国素有协议。每六年，西国可遣派使者七十二人入贡。过此数，则不许入境。所贡之物为玉石，小金刚石，绀青及其他各种物品。此类使节，多商人冒充。经北京及归回之费用，皆由公家支出。所谓贡献，不过虚名。付价购玉，出赏之多，无有过于复帝者。皇帝好虚荣，受外国礼物，而不酬以重价，自以为耻莫大焉。皇帝得遇外宾，礼赐隆厚，平均祀之，必需费用之外，每人可余黄金一的由克脱 (Ducat)。以此之故，人皆争欲为使，以重价自商队长购之也。必要之时，此等商人，冒称国王代表，伪造国书，谄媚皇帝。自交趾支那、暹罗、琉球、高丽及鞑靼诸部首长，亦时有相似之使节来朝，耗费国帑，难以数计。支那人亦皆知此为伪，然皆任其皇帝之被欺瞒，从而进以甘言，谓举世界皆臣贡于支那帝国，而不知支那实入贡各国也。

万历三十三年 (1905)，鄂本笃抵达肃州，所携带的有十三匹马、五个仆人并少年两人，还有很多玉石。全部约值黄金 2500 的由克脱。他在肃州连续向利玛窦写了两封书信，在印度起行前总主教亦有书致北京诸神甫，介绍鄂本笃的行程；这年获得鄂本笃手书，不胜欢欣。次年 11 月中旬，利玛窦得信后，决定派一名叫做约翰·肥的南德 (John Ferdinand) 的新收教徒离京赴肃州，时在万历三十四年 (1606) 十二月十二日。第二年三月末，肥的南德经西安城抵达肃州，见到了困守那里的鄂本笃。此时受回教徒干扰，鄂本笃重病缠身，仅过了 11 天，就逝世了。

### (三)

欧洲科技、文化在中国的传播，特别仰赖于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介绍和引进，陕西泾阳人王征，就是这些最早向西方学习的先驱者之一。其言曰：“学原不问精粗，总期有济于世；人亦不问中西，总期不违于天。”这个认识，在明清之际与徐光启、李之藻等人如出一辙。

明熹宗天启三年 (1623)，王征任直隶广平府推官时，开辟水利事业，使用他所制成的鹤饮、龙尾、恒升、话杓诸器，“挹水如流，又不大费人力”，“人人称其便利”，(见《两理略》卷一)，这是他用先进科学技术兴修的第一个水利工程。后来，还兴建濠阳河活闸，“一人可启，一人可闭”，“用之便捷，且可两利。”(同上书)

次年三月回陕守丧，“乃请于耶稣会值会，邀西士一人，来三原 (王征

住今三原县鲁桥镇)为其家人付洗,并在陕西省开教。金尼阁方传教绛州(今山西境内),受命应邀往。”(《上智编译馆馆刊》卷二)。因病在三原逗留达半年之久。金尼阁抵关中之后,王征受读《西儒耳目资》,还共同参看了新出土的《大素景教流行中国碑》。

六春,王征为《西儒耳目资》作序。序称:“金四表先生,乃天下极西国人。慕我明崇文之化,梯航万里,作宾于王。其间阅历不知几百国,而睹识风俗文字之传,国又各数变焉。”“先生学本事天,与吾儒知天畏天,在帝左右之旨无二,同其侨入中国,几二十年矣。名利婚宦事一切无染,独嗜学穷理,不知老之将至。所刻《实义》(即《天主实义》二卷,明泰西利玛窦撰)、《畸人》(即《畸人十篇》,明泰西利玛窦撰)、《天问》(即《天问略》,明泰西阳玛诺撰)、《表度》诸书,莫不各殚奥妙,而此特先生所独创。”稍后,原吏部尚书张问达(陕西省泾阳县人)亦写了序言并捐资刻传,称“其学渊而邃,博大而有要。仅仅以二十五字母,衍而成文。叶韵直截简易,绝无一毫勉强拘碍之弊。立总之全,分经分纬,才一纵横交罗而万字万韵,无不悉备其中也者。”

付刻前,王征特地写了《释疑》一篇,阐明他之所以偏爱此书,必欲授梓的理由。就中阐述了他对中国音韵学的新见解和对西方拼音文字以及翻译西学的重视,“名理如渊,正汇字学之海,学海不澄,名理奚自而流;西儒殚竭心力,急急成此书者,正欲资之。遍阅此中文字,可为后来翻译西学义理之渊海耳。”于是他罗列《西儒耳目资》一书“创立中原前此所未传者”五十条,写在书前供人参考。他甚至还想编一部《字学大全》,作为中国人学习西方文化的一个捷径。《西儒耳目资》刻成问世,“实欧洲音韵学识输入此土最早一书”(引自刘复《西儒耳目资后序》,1933年),而“迄今言中国人习拉丁文最先者,犹为推陕人王征也”(陈垣《泾阳王征传》)。顾炎武创作《音学五书》,恐亦受此影响。

金尼阁还向王征传授西方机械工程学知识。王征在绘制《风碓图》后的文字解说中指出:“此盖西海金四表先生所传,而余想像损益图说之。”此外,他也自制了虹吸、鹤饮、轮壶、代耕、自转磨、自行东诸器,并在司理广平时实地运用过。天启六年(1626)春,将其有关民生日用急需之器,汇编成册,题为《新制诸器图说》。这些器械,受到龙华民(1595—1654)、邓玉函(1576—1630)、汤若望(1592—1666)三位传教士的朝夕教诲。诚如邵力子所说:王征“以三百三十多年前的一位老进士,能认识到各种对于民生

日用和国家兴作关系的重大，肯有计划有系统的亲手选择最适于人民采用的机械，写出我国第一部机械工程学，以供之社会，并且直到老年还继续作深入的研究，也就很值得我们钦佩了。”

天启七年（1627），王征担任扬州推官时，除在政治上反对太监，力主为地方办实事外，还在李之藻处称羨诸种乐器，并请扬州府儒学训导武位中制成编钟、编磬、大鼓、琴瑟、箫笛等。次年七月，又撰成《畏天爱人极论》，约2万字，成为他所著的第一部宗教论著。此书未刻，但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藏有抄本。

崇祯二年（1629），王征返回故乡。次年，适值汤若望寓居西安天主教堂中，该堂题名“崇一堂”，取《天主十诫》“一钦崇一天主在万物之上”意。王征由三原鲁桥来访，论学谈道，留连约十数日不止。后写有《崇一堂日记随笔》一册，作为修行手册。此书抄本藏英国牛津大学波德莱图书馆，刻本一藏梵蒂冈图书馆，一藏北平光启哲学院。

崇祯七年（1634），王征创立仁会，以救饥、给衣、施诊、戒酒、舍旅、葬死、赎虏七事为急务。其实质乃是天主教设在民间的一种慈善团体。为此他写了《仁会约》一卷。刻本现藏巴黎国家图书馆。

此外，王征晚年居家时，还著有题名《额辣济亚牖造诸器图说自记》，仍致力于西方机械工程技术的传播。

## 第二篇 近代外事

(1840—1949)

# 第一章 鸦片战争至清末

## 第一节 概况

从鸦片战争至清末，中国封建社会已进入衰老时期，百病交侵，封建生产关系的桎梏严重地阻碍着生产力的发展，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尖锐复杂。然而，封建末世统治阶级的没落性、腐朽性和疯狂性却日益上涨，具体表现是：经济上传统的封建主义生产方式日益腐朽；政治上高度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更加腐败；思想上封建文化专制主义统治的韧性进一步增强；对外政策上闭关自守，闭目塞听，自视为“天朝大国”，无视世界之进步，表现出极端的顽固和愚昧。特别是闭关自守的对外政策阻止了中外政治、经济、文化上的正常往来与交流，使中华民族处于与世隔绝，孤立于世界潮流之林。

正当中国处于清王朝封建专制统治之下停步不前时，资本主义却在欧美各国迅速兴起。西方资本主义的飞速发展，又直接推动这些国家向外扩张，以寻找工业产品市场和殖民地。1840年（道光二十年），英国在其基本控制了印度次大陆之后，竟丧心病狂地用鸦片走私和武装入侵的两手打开中国锁闭的国门，因此，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尔后，又相继爆发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面对列强的入侵，清政府依然采取闭关自守的对外政策，鸦片战争时期的道光皇帝及其属下的封疆大吏，虚妄自大，闭目塞听，对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了解和认识，即充分说明这一点。然而，闭关自守之策非但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以最终打败侵略者，反而愈益贫穷落后，备受列强奴役宰割。

虚弱的国力决定了清政府在对待外来侵略上采取妥协、退让乃至媚外勾结的外交政策。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与外国侵略者所签订的一个个不平等条约，正是这种对外政策的具体反映。不过，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斗争并未因清政府的妥协退让而终止，三元里抗英、太平天国革命、义

和团运动……遍布全国各地的反帝怒潮风起云涌，给国外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

陕西作为清王朝的一个行省，由于地处内陆的地理环境和几千年恪守沿袭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更忠实地执行清政府闭关自守、妥协退让的对外政策。当1840年英国侵略者用鸦片和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大门之时，天主教早在17世纪初叶，已从沿海传播到陕西。1644年（明崇祯十七年），西安、汉中等地就有外国传教士建立的天主教堂。鸦片战争以后，天主教会在中国也争夺势力范围，划分传教区，兴建教堂。陕西关中地区属英、法天主教传教区，汉中、兴安（今安康）属意大利传教区，陕北各地属比利时传教区。到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外国教会在陕西关中高陵县通远坊、陕南城固县古路坝和陕北靖边县宁条梁分别建立了三个总教堂，传教士和信徒的人数也日益增加。他们当中虽不乏真诚的天主教信徒，在传教中以科教文卫为媒介，向陕西传播西方文明。但也有些人，在仁慈上帝的外衣下，干着违背基督精神的勾当，恃仗不平等条约赋予的特权，在清政府的庇护下，霸占民田民宅，乘危放债进行高利贷盘剥，并包揽词讼庇奸害良，甚至购置枪支，雇用武装教徒，私设公堂，任意捕押杀害无辜群众。然而，对此种种，陕西地方当局则秉承清政府的旨意，一味屈从。与此相反，生活困苦的陕西人民相率奋起反抗。在辛亥革命前的十年间，陕西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如火如荼，燃遍全省各地，主要表现在反抗教堂侵占掠夺、保护路权矿权和反捐税等斗争诸方面。南郑八角山教案、宁强燕子砭教案、三边教案、平利洛河教案、西安南关教案、陕西人民保护延长石油矿权的斗争，保卫西潼路权的斗争等，既反映了陕西地方当局妥协、退让的对外政策，又表现出陕西人民坚决反抗外来侵略的精神和勇气。

鸦片战争后，外国侵略者企图实现不平等条约，奴役陕西人民，他们所遇到的主要阻力，不是来自陕西地方政府，而是来自于陕西的人民群众。官府在侵略者的武力威胁面前一再屈辱投降，以图苟安。但人民群众并不为侵略者的武力所吓倒，他们始终高举反抗的旗帜，坚持同侵略者展开不妥协的斗争。统治阶级和人民群众之间对外所采取的截然不同的态度，自然促使他们之间固有的阶级斗争趋向激化，特别是统治阶级为了取媚于外国侵略者，不断镇压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这种“抑民媚外”的做法，更使官民之间



“相为冰炭”<sup>①</sup>。另外，在官民矛盾随着民“夷”矛盾的发展而日益加剧的情况下，统治阶级与侵略者之间趋向于结合而共同与人民为敌。鸦片战争到清末这一时期，陕西地方当局和外国侵略者相互勾结以镇压人民群众反抗外来侵略的例证屡见不鲜。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在陕西人民与外国侵略者的斗争中，地方当局的立场又随着对自己统治地位的“利”害而有所变化。“在洋人的威胁迫在眉睫之时，即逆民而顺‘夷’，而在看到洋人似乎‘安抚’下来，人民中的反抗情绪日渐高涨时，便又觉得为统治政权的利益打算，仍须多容纳一点民意，对洋人的要求，也就不能不违逆一点。”<sup>②</sup>

在上述陕西地方当局一贯忠诚执行清政府的对外政策和陕西人民奋力反抗外来侵略时，还应当特别指出：1900年，帝国主义为镇压义和团运动，主要由英、美、德、法、俄、日、意、奥八国组成侵华联军，于8月14日攻入北京，15日凌晨慈禧太后挟光绪皇帝及随从官员仓皇出逃，10月26日抵达西安，从而使西安成为清流亡政府的驻地。

同年12月24日，上述八国再加上比利时、西班牙、荷兰共十一国向清政府提出《议和大纲》。慈禧看到侵略者拟定的《议和大纲》时，同月27日即电谕奕劻、李鸿章：“览所奏各条，曷胜感慨！敬念宗庙社稷，关系至重，不得不委曲求全。所有十二条大纲，应即照允。”<sup>③</sup>慈禧一伙为了维护清王朝的统治，不顾民族尊严，出卖国家利益，答应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要求。次年9月7日，奕劻、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侵略者签订《辛丑条约》后，各国从北京撤兵。10月6日，慈禧一伙即返北京。这一条约既是空前的丧权辱国条约，也是慈禧所谓“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对外政策的写照，也是清政府流亡西安期间的所为。

自1840年以来，西方文化伴随着坚船利炮大规模的传入，中国人长期赖以生息的封建经济遭到破坏，引以自豪的传统文化遭到前所未有的挑战，社会充满危机。面对这一现实，19世纪80年代兴起的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中国近代维新改良思潮波及全国各地，无论是在政治、经济，还是思想文化方面均产生巨大影响。就思想文化方面来说，兴学育才便是维新派在“百日维新”期间的一项重要活动内容。正如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文

①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75卷，第13页。

② 胡绳：《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1页。

③ 见《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853页。

章所指出的：“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在维新思潮的促使下，1898年7月（光绪二十四年），陕西当局根据京师大学堂“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办学原则，在西安先后建成中学堂和武备学堂。尔后，陕西才向西方各国及东方日本派遣留学生，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彼此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这也是陕西对外关系的一个方面。

## 第二节 涉外机构

闭关锁国时期的清政府和外国之间向无经常的外交往来，所谓的对外交往，惟有“藩属”对中国的定期“朝贡”才是经常性的事务。正因为如此，在清朝中央政府体制下，一向没有专门职掌外交的机构，只有礼部主客司和理藩院分掌其职。主客司负责接待由东、南海路来华朝贡的外国使者，理藩院掌管蒙、回、藏族事务和负责接待从西、北路来华朝贡的使者。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一方面，清政府与国外的交涉日益频繁；另一方面，这时的对外交涉事务与从前由礼部主客司和理藩院掌管的“朝贡”接待事务有着本质上的区别。特别是1856年（咸丰六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以来，清政府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已无法避免。这更需要新的外交机构的诞生。1861年1月20日（咸丰十年十二月十日），清政府采纳恭亲王奕訢等人的建议，设置第一个专掌外交的机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总署”或“译署”）。至此，清朝与海外各国的外交事务，均划归总理衙门掌管，理藩院和主客司仅掌接待清朝各附属国来华朝贡使者及相关事宜。1901年7月（光绪二十七年）清政府又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为外务部，是为外交部的前身。

鸦片战争以来，陕西与全国其他省一样，由将军、督抚掌理对外交涉事宜。清政府为了加强中央集权，规定各省文武分治，互相监视，并以满人为将军，加以控制。太平天国革命以后，各省督抚尽皆领兵。督抚、将军对外交往的职务，几乎包括本省与外人交涉的全部。督抚在属员中指定若干人襄理交涉，必要时尚可以督抚名义行使其职权。1877年新疆伊犁问题发生，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请以左宗棠统筹西北外交，“所有交收伊犁事宜及现议各案，并以西北各城交涉事件统由该督相机筹办”<sup>①</sup>，清廷准奏。以后，西

<sup>①</sup> 见《清季外交史料》卷一〇。

北陆路外交遂由左宗棠一人主持。1902年，陕西设立“洋务局”，其职责是“平日研究条约，有事则筹商应付。其稍有关系者立即派员会同地方官办理，不能了者又复提省讯究，务使情无不尽，案无不结”<sup>①</sup>。

### 第三节 外患与抗争

#### 一、鸦片祸陕

远在18世纪中叶，英国就跃居西方国家对华贸易的首位，但由于清政府闭关自守政策和中国经济的抵制，在中英正常贸易中，英国一直处于逆差地位，英国商人不得不以大量白银来偿付。19世纪初从英国流入中国广州的白银平均每年约100万至400万两。为了改变这种贸易逆差，英国资产阶级及其政府，一方面进行外交讹诈和武力恫吓，另一方面用鸦片这种特殊商品来打开中国的大门。早在1773年，英属印度政府即确定大量种植鸦片的政策，并由东印度公司独占印度、孟加拉等地的鸦片专卖权，开始向中国贩卖鸦片。最初，英国输入中国的鸦片，每年不过200箱左右，后来逐年增加，到1839年竟多达3.5万箱。鸦片的大量输入，改变了中国对外贸易的长期优势，使白银大量外流，严重破坏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并败坏了社会风尚，摧残了中国人的身心健康。

烟毒泛滥全国，远处内地的陕西亦深受其害。1831年，清朝文书中就有陕西“多有私贩鸦片”和“吸食鸦片”的记载。鸦片输入陕西主要通过两条途径：一是陕西商人去沿海城市经商时“转贩烟土回籍”，二是“外来奸商偷运贩卖”<sup>②</sup>。据《筹办夷务始末》记载，鸦片入陕大致有两条路线：“自河南、山东来者入潼关并同州府属之大庆关；自湖北来者入商州之龙驹寨及兴安府（今安康）属旬阳县之蜀河。”

尽管清政府三令五申，但鸦片流毒却是屡禁不止，这与一些官吏吸食鸦片或从鸦片交易中受贿取利有很大关系。当时，清廷官吏自上而下形成一个保护鸦片走私的受贿集团，从而腐蚀了整个统治机构，大批官僚吸食成瘾，终日醉生梦死，无所事事。陕西亦不例外。陕西监察御史徐法绩（泾阳人）

<sup>①</sup> 《秦中官报》丙午年（1906年）7月份第2期。

<sup>②</sup> 中国史学会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1册。

对此作过这样的描述：

黑烟争说闹排场，到处开灯劝客尝。

不是长官先过瘾，民间敢有许多枪？<sup>①</sup>

鸦片输入造成大量白银外流，其直接恶果便是银价上涨，钱价下跌，陕西亦是如此。按清制银钱比价，库平纹银一两当制钱一千文。然1831年以后，陕西地区一两银涨至一千三、四百文，1837年涨至一千六百数十文，1850年前后则涨至近二千文。银贵钱贱直接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劳动者出卖农副产品或手工业产品所得为制钱，而缴纳赋税时则必折银，负担增加一倍左右。另外，白银外流，使清政府国库空虚，财政陷入危机。有鉴于此，徐法绩曾上书，“奏请严旨饬禁内地种造鸦片及开设烟馆制造烟具以杜浇风折”。折中指出，鸦片的输入使“嘉谷变为毒草，富厚变为贫困，少壮变为老弱”<sup>②</sup>。陕西巡抚富呢扬阿也奏请“严海口之禁，以杜其源；次加兴贩及开馆罪名，以遏其流；再惩吸食之人，以惊其沉迷。”<sup>③</sup>对于鸦片泛滥，一些官员的看法如此，劳动人民就更为深恶痛绝。

自1860年（咸丰十年）起，陕西地方当局竟开始征收鸦片税，这样一来，罌粟的种植取得合法地位，全省普遍种植，并逐年增加。当时以渭南、华州、大荔、泾阳、凤翔、宜川、延川、汉中等地最为突出。据《泾献文存》卷四记载，泾阳“罌粟之种前二三十年尚少，即有种者每村不过二三家、十数亩而已；近年来不必家种户植，而所种之地，（每村）动辄数十亩，且有过数顷者”。而华州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乡民贪其利，不惜肥美之地广种植之（指罌粟）。”<sup>④</sup>到19世纪80年代中期，陕西种植罌粟的情况是：“烟苗广植，无地无之，惟其处处繁滋，遂至人人癖嗜。”<sup>⑤</sup>据统计，1906年，陕西种植罌粟已达五十三万一千九百多亩<sup>⑥</sup>。随着种植面积的不断扩大，吸食者必将日益增多。在宜川“老少奔波，男女争嗜，始而城镇，继及乡村，始而富豪，继而穷窳”<sup>⑦</sup>。三原“城里人吸烟的十占其七，乡里吸烟的十占其三”<sup>⑧</sup>。至于泾阳西关烟市，每至夜晚灯火万点，皆为吸食鸦片者。

①② 《徐太堂公遗集》。

③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三。

④ 《续修陕西省通志稿》卷二一一。

⑤ 樊增祥：《樊山公牍》卷一。

⑥ 《续修陕西省通志稿》卷三五。

⑦ 《续修陕西省通志稿》卷一九六。

⑧ 秦翰才：《左文襄公在西北》。

临潼县虽则“较别县吃鸦片者尚少，然亦不下十之三四”<sup>①</sup>。其结果是社会生产凋敝，人民困苦益甚，“乡间穷困称贷之息，数倍于未植罌粟时，乡民穷困之状，百倍于未植罌粟时。”<sup>②</sup>如果“遭遇荒年，米麦仰之邻省，转运不绝，死亡枕藉”<sup>③</sup>，境况则更为凄惨。

## 二、仁记、太古洋行事件

继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签订以后，清政府又与一些国家订立了《通商行船条约》，为帝国主义在华搜刮掠夺原料大开方便之门。此后，洋行商人在中国经常违反商约税章，偷税漏税，乃至骄横闯卡，而地方当局非但不能按章收税，反而每每备受赔偿之累。

1905年10月（光绪三十一年），英商仁记洋行一谢姓华伙，由甘肃采购山羊皮货4000余斤，在甘肃张家川第一子口（厘局）仅交报单一联，换取运照，匿留二联，企图漏税，再次使用。货物运至陕西凤翔县境，被厘局查出，谢某倚仗洋人势力，欲强行闯卡。凤翔厘局不得已，先将其货扣留，然后上报省厘税总局。总局仅令其将原匿联单二联咨销，验毕放行。然谢某拒不领货，故意拖延。仁记洋行借此捏造理由，向天津海关税务司报告说：“凤翔厘局以单系假冒，扣留不放。”<sup>④</sup>随之又通过英驻津总领事，致函天津海关道查照，并无理提出该行因此项货物延误运脚影响行情而亏损900余两白银，要求凤翔厘局如数赔偿。妥协媚外的北洋大臣，不仅对此无理苛求不加诘驳，反而咨文陕西巡抚，飭令“凤翔厘局将总数九百零一两钱，如数速行赔偿”，且要求陕西督抚切实整顿“厘局擅行扣货一事”，“通飭所属各厘局员，凡有如此擅阻贸易之事，均令伊等承担其责。”<sup>⑤</sup>

同年，又有英商太古洋行华伙，在甘肃采购羊毛489包，仅持一空白联单，委托人将货分数帮运行。既不在海城报纳子口税请换运照，又不在单内分别载明货件，并不准沿途各卡加盖印戳，以图再用。不料被陕西泾阳厘局查出。接着，陕西厘税总局按规定把此事咨明北洋大臣，将货充公，所收津字7657号空白联单一并查销。此项羊毛在泾阳厘局保存半年之后，由太古洋行以贱价买回。事后，洋行又经领事复控，转由英使与清外务部直接交

① 《续修陕西省通志稿》卷一九六。

② 《续修陕西省通志稿》卷二一一。

③ 樊增祥：《樊山公牍》卷一。

④⑤ 《秦中官报》丙午年（1906）4月份第2期。

涉。英使以“华伙于第一子口未换运照之顾，乃仅按历年成规，若该省欲将三联单之办法照约整顿，本署大臣甚为心感”为借口，蛮横无理地指出：“惟整顿之初，偶因英商仍照向例办理，骤将其货入官，殊非公允，决难首肯。”<sup>①</sup> 要求按仁记洋行成例结案，由厘局承担赔偿责任，并威胁外务部说：“若不能咨劝该省将此案与仁记洋行之案妥为了结，则本署大臣即当请本国政府特派专员前往各该处将此等事件详细考查虚实，以便本国酌情定办。”<sup>②</sup> 对此无理要求，陕西厘税总局据理驳斥：

陕西省固无整顿联单办法之权，洋商似亦不应别有向行之例。借口有例，是即该华伙向来违章之确据也。夫以向来违章而照章罚办只一次，则内地子口之宽纵与该华伙平日之应罚未罚不问可知。乃来咨犹以无公允相诘，然则必将举联单章程一概废弃而后为公允乎？<sup>③</sup>

然而，媚外抑民的清政府却不敢据理力争，最后天津海关道竟议结由陕西赔还充公原价九千六百一十五两三钱八分五厘。

从此以后，洋行华伙采购货物，公开执持空白联单，悬挂洋旗，直接闯关越卡，各子口畏势不敢过问。

### 三、西潼铁路事件

中日甲午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疯狂地掠夺海港和争夺势力范围，铁路投资更成为它们用来巩固在华势力范围的工具。这个借外债筑铁路的办法，引起了强烈的竞争，也引起了广大中国人民的反对。1903年，以鄂、湘、粤三省人民开展收回粤汉铁路主权的斗争为先导，全国相继发生了收回路权的爱国运动。陕西人民保卫西潼铁路修筑权的斗争就是其中之一。

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清政府从比利时取得贷款，并与其订立修筑汴洛铁路合同。该合同第二十三款明文规定：由河南至西安铁路应先尽比国公司议办，如中国国家自办，或招华股办，比国公司不得相争<sup>④</sup>。如果比利时夺取西潼铁路修筑权，那么必然通过控制此铁路而直接控制陕西的经济命脉。有鉴于此，当时陕西官绅根据合同规定，开始酝酿自己筹办。1905年，汴洛铁路开始向西延展。陕西官绅认为，“一旦由洛而潼，则秦、陇康庄，

<sup>①②③</sup> 《秦中官报》丙午年（1906年）5月份第3期。

<sup>④</sup> 《秦中官报》丙午年（1906年）2月份第1期。

将落外人之手”<sup>①</sup>，于是纷纷要求西潼铁路由陕西省自办。陕西知识界上层人士迅速联络甘肃省有识之士奋力争取，在京沪的陕甘人士亦呈商部，并函巡抚倡议自修铁路，以保路权。后经奏准，陕西巡抚曹鸿勋即令藩司樊增祥为铁路总办。但西安至潼关的铁路需耗资 300 万两白银，而陕西经济凋敝，人民负担沉重，实难筹此巨款。不得已，官府决定暂先筹划西安至临潼一段路款，因而苛捐杂税，接踵而来，百姓不堪其苦。

1906 年春，陕、甘两省在京、沪的富商、官僚 50 余人又分头奏请官办陕西至甘肃铁路，清政府准奏，命李联芳为筹办陕甘铁路总办，并令升允、曹鸿勋督同各绅详晰妥筹。于是，又开始征收各种名目的路捐，人民纷起反抗。到 1908 年，全省大规模的“抗捐”、“交农”运动屡有发生，迫使清政府停止征收铁路路捐。官办陕西至甘肃铁路一事遂告失败。此后，巡抚曹鸿勋等人转欲乞求于帝国主义，派其亲信赴上海招股，英商瑞记洋行买办徐树德趁机来陕与曹勾结，立刻引起陕西人民的极力反对。一时间，高等学堂、第一师范学堂、法政学堂、陆军中学各学堂全体学生具禀抗争。曹鸿勋见势不妙，矢口否认勾结洋商出卖路权之事。

1908 年春，陕西绅、商、学界人士，在崔志道、赵元中、郑尚贞等人号召下，要求“商办”西潼铁路。他们发表《筹办西潼铁路启》一文。该文起首即云：

欧风美雨，卷地横飞，骇浪惊涛，冲天涌起。今中国志士奔走狂呼，汗流浹背者，一重大问题，非铁路问题乎？盖铁路一被外人占领，则上而祖宗坟墓，下而子孙田庐，与我现有之妻妾身家财产性命，皆将受人践踏，任人掠夺，同归断灭，难与图存。<sup>②</sup>

其言词慷慨激昂，感人肺腑，淋漓尽致地倾吐出一腔爱国保路的炽烈之情。

他们“拟联合京内外绅商，在省设一铁道筹办处，详议招股集款之法，呈请当道改归商办”<sup>③</sup>。接着召开了第一次筹修西潼铁路大会，通过了“筹办西潼铁道处简章”，成立了“西潼铁路办事处”。并发表言论，联名上奏。清政府鉴于历年官办毫无成效，且深为各界人士反对，遂奏准商办，但又以“集股达三十万后”方准成立公司为借口，加以刁难。然庆幸的是，绅、商、

<sup>①</sup> 《陕西藩司樊增祥请奏咨筹拟陕西省接办西潼铁路文》，见《秦报》乙巳年（1905 年）12 月份第 3 期。

<sup>②③</sup> 《辛亥革命在陕西》，陕西党史资料丛书（三），第 90 页。

学界人士很快集股达 20 余万，清政府无奈，只好承认“西潼铁路办事处”这一机构。数月后，集股达 30 余万，清廷遂于 1909 年（宣统元年）5 月 28 日批准设立公司，并任命官僚阎迺林为总理。

由于当时陕西工商业落后，绅、商、学界财力薄弱，自集股商办以后，数年之间，而成效甚微。尽管如此，但各界人民的爱国保路运动却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帝国主义侵占西潼铁路沿线作为他们势力范围的图谋，挫败了出卖路权的行径。

#### 四、延长油矿事件

远在两千年前，中国人民即已知悉延长之地有石油。班固《汉书》载：“高奴县有洧水，肥可燃。”高奴县，秦代所设，今延安市及安塞、志丹、延川、延长等县，均归其管辖。当地人民用石油点灯、制墨，亦有相当长的历史。《延长县志》载：“县城西门外有井，出石油，取者以雉尾囊之，采入缶中，燃之如麻油，多烟熏，收为墨之原料极佳，更疗疮痍。”

1895 年（光绪二十一年），法国人到延长调查，见有利可图，遂谋开采。1903 年 2 月，德人汉纳根（大概为驻天津领事馆武官）以旅行为名到陕北收集经济情报，他发现延长石油可以开采，返回天津之后，即与驻津德国领事及德商世昌洋行密谋掠夺延长石油开采权。随后，大荔绅士于彦彪在德国领事授意下，前往延长与当地绅士刘德馨、郑明德、宋金声和郑肯堂等人私自订立开采合同，并欲向官府立案，将其盗窃行为合法化。此时，正值全国人民护路保矿运动风起云涌之际，于彦彪等人的所作所为立即遭到陕西各阶层人民的坚决反对。在舆论的压力下，陕西官府将于彦彪等从天津解回陕西查办，并经陕西巡抚奏准，将延长石油矿收归官办。

1904 年，陕西继任巡抚曹鸿勋奏请试办延长石油矿。首先派人在延长县城外十五六里的烟雾沟进行勘探，准备筹办开采，又派候补知县洪寅携带油样赴汉口聘请日本化学博士稻并幸吉来陕试办，因稻并无暇，乃令其徒阿部正治郎任矿师。阿部到陕勘察后，又携油样回汉口与稻并幸吉重行化验，结果“光白烟微，足与美孚相敌，日本所产，反出其下。”<sup>①</sup>洪寅始与订立合同十二条，并聘请日人佐藤弥市郎为技师，招日本技工六人。合同规定，所用机器全由日本技师从本国订购。与此同时，又派人测量、筹修西安通往

<sup>①</sup> 《清朝文献通考》卷三八八。



延长的轻便铁路，以便运输石油。后因资金筹措困难，只好先修土路以供急用。为此，征用大批民工，费时一年，土路始告竣工。

当时对延长石油的蕴藏量估计是：“延长附近一带，产油地极多，如肤施<sup>①</sup>、延长、宜君等县周围四五百里皆与延长连山接脉，油质如出一源。”<sup>②</sup> 1907年2月（光绪三十三年），工人和机器均运抵工地，4月开始安装，5月开工掘井，9月9日正式出油，此为“中国大陆第一井”。11月5日建成炼油房并投入生产，先装油14箱运抵省城，是为陕西首次生产的石油。消息一传出，全省各阶层无不为之振动。陕西巡抚恩寿见开采油矿有利可图，便添机增井，并派候补道郑某前往上海招股，力图扩建。

此时，帝国主义各国正在向中国大量输入石油，尤其是随着交通运输日渐发达，进口石油已进入内地，这将直接影响到国家利益。度支部（财政部）主事周蕴华为延长石油事在呈文说：“以（光绪）三十一、二两年海关贸易册考之，每岁进口石油约在七八万万斤之数，所卖价银约在一千五百万两以外，倘将来各省铁路一律告成，则外国石油之销场必且益大，是亦中国一大漏卮也。”<sup>③</sup> 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1908年初，清政府邮传、度支、农商三部看见陕西延长石油矿试办渐有成效，以为大利所在，遂派员来陕考察，谋由部办。美、日、德、俄等国密与清政府接洽，插手其中，企图掠夺延长石油矿权，当即激起陕西各界人民普遍义愤。陕西各校学生纷纷上书教育总会，极力反对官办延长油矿，强烈要求教育总会倡导改归商办。高等学堂全体学生在致教育总会函中说：“日前闻日德联约向政府要求合办延长石油暨政府拟由农工商部拨款六百万两即行开办……得信之余不胜惊骇”。“陕西矿产即全省之生命，……今外人觊觎，必至利源外溢。”“请贵会联合绅商，开特别会，演说招股，详筹办法，庶可免外人之窥伺。”师范学堂学生在函中说：“石油一项全陕利权攸关，而外人染指，一省之安危所系，宜未雨而绸缪，勿亡羊以补牢；与其如沪杭甬路、山西矿产举之于已卖之后，不如自集款项，急谋自办，防之于未失之先。”甚至连师范附属小学堂学生亦云：“近闻两国（德、日）先后要求包办，学生等不胜忧惧。”<sup>④</sup> 与此同时，陕、甘留日学生纷纷联名发表文章，严词痛斥帝国主义列强阴谋掠夺延长石

① 肤施县，1937年9月撤销，辖地分别划归延安市和延安县。

② 《秦中官报》丙午年（1905年）9月份第6期。

③ 《辛亥革命在陕西》，陕西党史资料丛书（三），第120页。

④ 以上引文均见《夏声》杂志第8期。

油矿，备陈他们长驱直入侵犯中国主权造成种种民困国危的恶果。学生们指出，如果延长油矿一旦落入外人之手，不但是“人得其利，我受其弊”，而且“存亡难保”<sup>①</sup>，呼吁陕西人民急谋抵制之法。

当时帝国主义之间为争夺延长石油矿权展开激烈角逐。除德国早已派人从事探测并勾结延长当地二三败类实行攘窃外，继之又有美、日、俄等国在阴谋染指延长石油，形势十分危急。陕西各界人士积极响应学生的呼吁，为保护主权，坚决反对部办延长石油矿。1907年8月18日，筹办西潼铁路办事处及教育总会，邀集陕西绅、商、学界人士600余人在中州会馆召开大会，到会者一致反对邮传部把延长油矿收归部办。会后又联名禀呈巡抚恩寿，力请商办。在全省舆论压力下，一些在京陕籍官吏，以模棱两可的态度提出“由部招股，设立公司，官商合办”<sup>②</sup>的主张。不久，巡抚恩寿奏准转归商办。

延长油矿确定商办以后，即行筹款以开矿修路。但由于当时陕西工商业落后，民力凋敝，集股颇为不易，因而集合资本设立公司开办延长石油矿便不得不迟滞下来。直到1911年（宣统三年），才开始动工开挖第二口井。10月，辛亥革命爆发，矿事遂停。

## 五、南郑八角山教案

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意大利神甫戴礼斐到南郑县八角山（今经堂湾村）传教并筹建教堂。戴礼斐利用当地的地主劣绅、乡约地保和一些地痞流氓，诱惑强迫群众入教，并声称要“村不漏户，户不漏口”。入教的人必须向教堂献地捐钱，以示虔诚。对那些不入教的人则极尽栽诬陷害之能事，甚至驱逐出当地。一年后，戴礼斐用强占的土地和林木，修建了一座富丽高大的教堂。该教堂有房产两院，水田78亩，旱地100多亩，竹林15亩，柴山30亩，佃给农民，收取租金。同时又用盘剥的钱财，放高利贷。八角山一带的农民，几乎无人不受天主教堂的压迫和剥削。人民群众对此愤恨不已。

1897年7月24日（光绪二十三年六月二十五日），适逢天主教堂“礼拜”。经堂湾村靠砍柴和打短工为生的吴年进兄弟三人在教棍威逼之下前来

<sup>①</sup> 《陕西留东同人为延榆矿事致乡人书》，载《夏声》第8期。

<sup>②</sup> 《陕人保护矿权纪事》载《夏声》第8期。

听讲“圣经”。戴礼斐平日山珍海味，养尊处优，此时却道貌岸然地在台上宣讲“圣经”。吴氏兄弟在台下听得实在不耐烦，便小声说了几句话，被戴礼斐发现，随即骂他们是“捣乱经堂”，是“贱民”、“畜生”。吴氏兄弟反唇相讥，戴礼斐恼羞成怒，跳下台来，举起教棍便打。吴氏兄弟夺过教棍，抓住戴礼斐的胳膊揉了几下，群众高兴得哄堂大笑。戴礼斐打人未遂，反被推揉，觉得有伤尊严，便立即写信给城固古路坝天主教堂主教拔士林，诬陷吴氏兄弟“刁民逞凶”，扭断他的胳膊，要求严惩，以儆效尤。拔士林遂勾结城固县衙，将吴氏兄弟锁拿关押。戴礼斐力主杀头，置其于死地，但拔士林惟恐杀掉会引起当地人民的公愤和反抗，所以关押两个月后，由乡绅保释，令吴氏兄弟到古路坝天主教堂叩头认罪悔过，并鸣金放炮以晓众。最后在古路坝勒悔过碑一面，抬至八角山教堂竖立。从城固古路坝到南郑八角山，有70多华里山路，运碑时，吴氏兄弟拼力扛抬，途中不许雇用他人，而且逢人还要跪地“认罪悔过”。

吴年进兄弟因受科罚而倾家荡产，被迫背井离乡逃至城固盐井坝乞食避难。他们白天讨饭，夜宿古庙或桥洞。未几，吴年忠和吴年选相继冻饿而死。心肠狠毒的戴礼斐为了斩草除根，竟暗地唆使其在盐井坝的爪牙将吴年进活埋。

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八角山教堂继任神甫（意大利人）魏德辉企图毁脏灭证，偷偷将悔过碑由教堂东侧山下的路边埋在山坡树林中；不久即被群众发现，抬到山下。1965年将该碑石镶嵌在教堂内墙上，作为帝国主义侵略和迫害中国人民的罪证。

## 六、宁羌燕子砭教案

1900年，设汉中府属宁羌州，1913年，宁羌州撤销，设立宁羌县（今宁强县）。燕子砭为宁强县西乡一山区，位于嘉陵江畔，山清水秀，风景如画。

17世纪30年代，天主教耶稣会神甫法国人方德望到汉中地区传教，初在洋县和城固的农村建立了几个“祈祷所”，作为传教据点。1885年（一说1887年）开始成立汉中代牧主教区，意大利人安相廷任第一位主教。1895年安相廷被召回国，意大利神甫拔士林由城固古路坝天主教主教调为汉中区主教。

为了扩大教会势力，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安相廷派意大利神甫郭

西德到宁强燕子砭传教。郭一到宁强燕子砭，即看中燕子砭街镇对面风景幽静的青岗坪，想在此建立据点。当时青岗坪住户任永林家境富裕，房屋宽敞，郭西德欲购作教堂之用，任姓拒不出售，郭乃放债给任姓子弟中吸食鸦片者，后以此为借口强行占取任姓房屋。与此同时，郭西德勾结当地恶霸李占鳌、地痞流氓李大银，收买土地，高利盘剥，横行乡里，无恶不作，激起当地群众极大愤慨。尤其是郭西德与教民郑某之妻私通并强奸幼女，群众更为切齿。

郭西德借传教之名，首先以入教死后可升天堂来欺骗群众入教。其次是扮作医生或商人深入农村，以诊病施药和出售廉价商品为诱饵，拉拢群众入教。而教会又常用教规约束教民，强迫他（她）们向教会捐粮捐款，并服各种杂役，甚至要求教民的女儿在出嫁前三天须到教堂接受传“领洗”，“领洗”的姑娘常被奸污或侮辱。当地潘长富、郑千仁、杨海等人的眷属，均遭郭西德奸污。

1898年夏，燕子砭一带遭水灾，农田大多被淹；翌年又遇大旱。连年受灾，收获甚微。群众以野菜、草根、树皮充饥。教会趁机勾结官府，操纵当地“义仓”放粮，但只发给教民，同时又以“赈灾”为名，筑灶舍饭，并大肆宣传宗教迷信思想，说什么水旱灾害是天主降罪。凡此所作所为，目的均在诱使群众入教<sup>①</sup>。1900年，年成稍有好转，郭西德及其爪牙李占鳌等又以归还“赈灾”粮为名，向群众摊派粮食600多石，就连非教徒的中小地主李云栋等家，也被摊麦、谷各10石，并令限期交清。群众无力交纳，郭西德竟于夏禾成熟之时，放纵无赖教徒在农民田地里抢收庄稼。本来，教会的所为已经为群众所痛恨，此次抢粮更引起农民群众的义愤。以李云栋为首的当地群众，正在酝酿着一场反教会的斗争。

李云栋，字述棠，宁羌州人，秀才出身。他对郭西德罪恶行径早已不满，加上这次摊派粮食又使他家深受其害。此时正值义和团运动英勇反帝的消息传到这一带。于是，李云栋把教会罪恶及摊派粮食一事写信告知在汉中府衙门任职的哥哥李朝栋。李朝栋回信主张用武力驱逐郭西德。这样，李云栋便和潘长富、潘长贵兄弟及杨海、滕尚贤、杨春华、王登科等人联络，秘密策划发动群众反对洋教、赶走郭西德的斗争。

1900年7月21日（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五日）晚，李云栋、杨海等

<sup>①</sup> 《宁强州志》“纪事”云：“以赈饥为名，诱民入教。”

利用当地民团“点团”（集会）的机会，鸣锣击鼓，事先约定的群众手执刀矛斧头，打着灯笼火把，纷纷赶来，很快聚集了数百人。他们高呼“杀洋人为民除害”等口号向青岗坪天主教堂进发。郭西德闻风一面派人向宁强州衙求援，一面准备逃跑，但四处已被群众封锁，郭西德慌忙逃入燕子砭税务局，群众立即包围此局，大喊“捉拿洋人”。郭西德看到无处可逃，便到后门外，跪在地上祈祷，正好被愤怒的群众发现，大家当即用刀矛向他身上乱砍，一人砍断他的左臂，另一人砍伤他的鼻子和嘴，人们用绳子捆起他的手脚，抬到燕子砭街道中心。第二天凌晨将其枭首，将尸体抛入嘉陵江中。同时杀死教会走狗李大银等<sup>①</sup>，其他在教的不法之徒如李占鳌等乘隙逃脱。

事后，汉中天主教堂主教拔士林得到逃至汉中的李占鳌的报告，立即上报梵蒂冈教皇。梵蒂冈教皇把郭西德之死编成书画，流布世界各地，歪曲事实真相。帝国主义更以此为借口，向清政府提出种种无理要求。1901年5月，竭力讨好侵略者的清政府与帝国主义签订了处理燕子砭教案的可耻条约，条约规定：向教会赔偿白银5万两，作为郭西德及其他被处死教民的“命价”；允许教会在宁强州城、燕子砭及汉中府所属各地修建教堂；免收教堂一切捐税；惩办燕子砭教案的为首者。为了献媚外人，清政府还赏赐汉中主教拔士林一品顶戴，副主教康乐尧三品顶戴的殊荣。同年9月，清政府在和帝国主义签订的《辛丑条约》中又明确规定：宁强州“停止文武考试五年”<sup>②</sup>，因案中李云栋、杨春华为秀才，杨海为武举人故。

燕子砭发生教案以后，宁强知州刘鼎臣亲至燕子砭，劝谕人民散去，并表示同情群众处死作恶多端的郭西德。他打算在不让事态扩大的情况下于将来了结此案。后八国联军进入北京，清政府对外屈辱求和，转而镇压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相应对宁强教案便采取严厉措施。知州刘鼎臣以“办案不力”被撤职，由傅世伟继任。1902年春，傅令汉中镇总兵蔡某带兵到燕子砭搜捕教案领导人，杨海、潘长富、潘长贵、杨春华等人先后被捕。李云栋、李朝栋逃往外地，燕子砭顿成恐怖世界。然而清政府尤以要犯未获，追捕不已，扬言说如果抓不到李云栋，就要大屠燕子砭。李云栋得知消息后出

<sup>①</sup> 据李秋编著《拳祸记》（光绪三十一年上海土山湾印书馆出版）记载：“宁强州燕子砭村郭西德神甫，周雅各伯长随，杨兴隆司事，暨新守规之李占鳌、黄万魁、黄忠义、何文堂、唐贤关、赵全桂父子、胡凤山、沈荣、余天喜均受重伤，卒至致命。”是则死者甚多，然不见其它文献记载。按该书陕南部分供稿人为汉中主教拔士林，如是，其中夸大之处当在所难免。

<sup>②</sup> 《中外条约汇编》，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504页。

而自首，以免群众受株连。兹节录李云栋墓前碑文如下：

李生讳云栋，……向馆汉皋，闻警归籍，乡人士已不宁矣。其母沈孺人顾而言曰：汝为一乡之士，今乡人有急，汝独不能为力耶？先生于是慷慨赴难。于光绪二十七年七月同就义于褒中。时年三十七岁。……后有过其墓者，莫不曰：我辈无恙，皆先生之赐也。先生一死，所保全者甚众，固非自经沟渎者可比也。<sup>①</sup>

尽管李云栋投案自首，然傅世伟认为滕尚贤与此案关系甚大，意欲抓获，而滕在宁强、西乡一带声望颇高，若派兵捕拿，恐激起民愤，遂再三恳求与滕尚贤关系甚密的汉中大绅康秉钧前往燕子砭邀滕前来，滕果至汉中，往康家花园。不久傅世伟调任凤翔知府，由缪钟洛接任。未见，又由杨崇伊代缪署理。杨为人横暴，当他由北京前往汉中就任而路过褒城时，适逢宁强教案被捕之人解往省城处决，即令暂收褒城县狱。等他抵达汉中任所后，立即下令将所有人犯于褒城处决<sup>②</sup>，并将首级运回燕子砭，挂在街中心的柳树上“示众”。

事后，杨崇伊还欲置滕尚贤于法，终因康秉钧力争得免。据《城固县志稿》记载：

新任知府杨崇伊至自京，允杀宁绅之系教案者多人，滕绅不能释，于是宁民大哗，激成怨谤，乃有暗中放火及仇杀媚外者风说，府城戒严，秉钧以变生不测，大违初衷，忧愤成疾。后西教士恐失信于秉钧，卒宥滕绅，案遂结。

另有一说滕尚贤通过贿赂官吏乃免。

教案既结，“惩凶”目的已达，然陕西地方当局又于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在汉中和燕子砭为教会勒石“雪垢”，并向帝国主义保证今后“永不发生此事”。然而，燕子砭群众并没有屈服。1905年，刘长海、薛毓麟、成万富、沈万华等人捣毁教案石碑，并谋起事。教堂遂勾结宁强州府进行镇压，刘长海被捕（民国三年被杀）。并再次在燕子砭街头“立碑示众”。但是当地群众心头的怒火并未熄灭，他们一连数次将教会所立石碑推入嘉陵江中。

宁强燕子砭教案中死难者的鲜血并未白流。1949年全国解放时，汉中天主教主教意大利人孟守道被赶出中国，宗教界人士掀起“自治、自传、自

<sup>①②</sup> 《辛亥革命在陕西》，陕西党史资料丛书（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1页。

养”的三自爱国运动，外国传教士在中国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 七、三边教案

“三边”是指陕西北部的定边、靖边和定边县所属安边堡一带地方。1874年（同治十三年），比利时传教士叶茂枝持清政府的“龙票”（护照）由绥远到靖边县宁条梁传教。起初，他们在当地租赁民房而居。后来，传教士在宁条梁南沙口一带勾结地痞，疯狂掠夺土地，竭力扩大教会势力。1882年（光绪八年），传教士在宁条梁小桥畔建立教堂。1885年（光绪十一年）又在该地修土寨子一座<sup>①</sup>。教会以此为总堂，不断购买土地，扩建教堂，建立教会武装，外国传教士亦接踵而来。到1898年，三边天主教势力已有很大发展，并占有大量农田，对农民进行地租剥削，连官府也不得不惊呼：“设不严重交涉，数十年之后，汉蒙耕地恐尽归入外人势力范围。”<sup>②</sup>

三边天主教堂，在长城以外者属宁夏三盛公教区，位于长城以内者属延安教区。全部计有教堂19所，区主教设于城川。另外，小桥畔、堆子梁、白泥井各设本堂一所，毛团库伦、西白泥井各设分堂一所，沙渠、大阳湾、硬地梁等地各设公所一处，教士多为比利时和荷兰人。

三边天主教会恣意欺压当地人民群众。教会圈占的牧场，群众不得进入放牧，即使偶尔不忿踩进者，也要罚米5斗。无论是教民还是非教民，都受到传教士的种种虐待。例如，教民张某在自己家门口抽烟，正值比利时教士甘士英路过，张因未看见甘士英而没有行礼，便受到教会的处罚。张不服，甘士英竟诬陷其要谋害神甫，交官府惩处，终使张倾家荡产，几乎丧命。另一教民白某因忙于耕种，有一次礼拜未去，即被处以罚款。尤其令人气愤的是，教会甚至规定，教民与非教民不得通婚，并迫使教民把女儿送入教堂充作修女，以供其淫乐。在虐待教民的同时，教会勾结地痞流氓和土豪劣绅，欺压非教民。并凭借其武器弹药，私设法庭，任意逮捕和审讯群众，轻则辱骂、罚款，重则鞭挞、监禁以至处死。每当群众与教会发生冲突，告至官府，官府总是公开袒护教士。当地人民对天主教堂早已恨之入骨。

1900年，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的烈火首先在山东熊熊燃起。是年春，

<sup>①</sup> 《靖边县志》，1935年修，卷四，第19页。

<sup>②</sup> 《续修陕西通志稿》，卷二八，第16页。

山东义和团首领张成德和一名青山道人先后来到了三边，设坛招徒，进行反洋教宣传。群众纷纷加入义和团，拳民很快发展到百余人，大家共同谋划反教堂起事。后张成德和青山道人相继返回山东，当地坛事由宁条梁王某主持。8月7日，三边义和团响应京畿义和团反帝斗争，首先处决教会爪牙——一个外号叫“双头蛇”的宁条梁官府班头。9日夜，王某、刘福兴率领义和团会合鄂套、乌审两旗蒙兵400多人和安边李鞋匠带领的20多人以及自动参加者300余人，沿途烧教堂四处，打死教民数人。接着攻打小桥畔总堂，把教堂团团包围。当时教堂内有外国传教士6人、教民百余人。由于他们早有准备，此时已装备有长短洋枪，而拳民仅有刀、矛和土枪土炮。虽然义和团个个奋勇当先，但终因双方所用武器相去甚远，义和团围攻40多天，终不能攻破寨墙，战斗进入相持状态。后王某、刘福兴阵亡，一时无指挥，伤亡较大，同时得知前来镇压的清兵不久即将到达，于是主动解围。此次战斗，击毙外国传教士一人，教民五六人，而群众伤亡达百余人。

此时，适逢八国联军攻破北京，慈禧太后携光绪皇帝逃至西安。为了讨好帝国主义，西太后下令对义和团“严加剿除”。对三边人民反洋教斗争一事，命令陕西巡抚派兵镇压。陕西当局立即派刘少涵率兵火速开赴三边。而群众在清兵未到之前，早已各自散归。法帝国主义借口三边教案打死外国传教士一名，向清政府要求赔偿命价和损失。清廷畏敌如虎，遂命陕西巡抚处理。1901年5月，陕西巡抚派陕西绿营协统刘少涵，会同绥远将军所派委员及宁夏布郎、安边二府和定、靖两县知县，与教堂代表在宁条梁会谈。因教堂一再提出无理要求，双方反复磋商月余，签订了赔款条约<sup>①</sup>。

然而，清政府和陕西地方当局的对外妥协，并没有制止三边人民不屈不挠地反抗教会侵占掠夺罪恶的斗争。1904年春，三边人民在任天绪、耿作、高士英等人的组织下，联络蒙、汉群众，密谋起事。但因事泄，遭到陕西地方政府的镇压，任、耿、高三人被捕遇害<sup>②</sup>。但“三边”人民反洋教斗争仍然连绵不断，表达了三边人民在反抗外来侵略中英勇不屈的斗争精神。

## 八、平利洛河教案

平利县位于川、陕、鄂三省交界处，境内岗峦起伏，会党活动较为活跃。

<sup>①</sup> 见《东华续录》（光绪朝），卷一七三，第8页。

<sup>②</sup> 《秦中官报》，光绪三十年三月，秦事汇编，第2—3页。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随着陕西外国教会势力的迅速发展，天主教汉中总教堂于1890年（光绪十六年）在平利县洛河地区设一分教堂。教会在当地霸占农民田产，并收租放债，残酷镇压人民群众。尤其是教会每每庇护一些人教的地痞恶霸压迫民众。平利县洛河街有两个劣绅恶霸袁瑞林、刘子模，任地方团保，因浮派烟地钱勒索人民，引起公愤，被当地绅士詹朝珠等控告革职。后投靠洋人，加入天主教，从此倚仗教堂势力鱼肉乡里，被群众称做惹不起的“洋秀才”。1903年夏，袁、刘为了报复，向安康教堂诬告詹朝珠勾结四川江湖会首领何彩凤诽谤教会。安康教堂传教士毕德修要求平利县知县王宗濂查办此事。王宗濂立即派衙役将何彩凤锁押县狱。何彩凤被捕的消息传出后，江湖会另一首领王乱刀子（真名不详）率领江湖会众数百人劫狱，救出何彩凤，并烧毁了袁瑞林的房屋，杀死袁瑞林父子及其他教民4人，并杀死安康教堂派赴当地调查的老教民叶某等。但不幸的是，王乱刀子等6人被兴安、平利县衙役拘捕。何彩凤随即率领江湖会众集会于洛河太白庙，竖起“兴汉灭洋”的旗帜，声称“要攻教堂杀死教民”。当地群众纷纷前来支援，很快就集合了1300多人。教会和清政府得知后，惶恐万状。安康天主教士毕德修将洛河事件上告光绪皇帝，要求清政府派兵剿办，清廷下令陕西地方政府剿办，陕甘总督崧蕃和陕西巡抚升允接到命令后，一方面将情况奏报朝廷，一方面即刻派陕安镇总兵姚文广和驻石泉的续备防军副中旗统领副将周玉堂分别率兵星夜驰赴洛河镇压。起初，江湖会党人多势众，清军屡战不利。在此情况下，崧蕃和升允又派汉中府试用道台郭人璋、补用副将刘琦率领新军马步两旗驰赴剿办，又调砖坪、平利两厅、县团练协助剿洗，江湖会众在何彩凤的带领下英勇抗击，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死伤者达数百人，江湖会众重要首领宋添进、马进纯、柯蓝富等30多人被捕。何彩凤率余众避入深山密林之中，继续坚持斗争。

郭人璋血腥镇压了这场声势浩大的反洋教斗争之后，命令兴安、平利及湖北竹溪县、四川城口厅各地，严缉何彩凤等人，以斩草除根。被捕的马进纯、柯蓝富等30余人，在严刑审讯后全部处斩。同时，教会向清政府提出交涉，几经磋商，双方立约。给教堂赔偿命价和房产费8000两白银，并隆礼安葬被杀教民，还在当地立碑示众。

这次反洋教斗争，明确提出“兴汉灭洋”的口号，把矛头直接指向洋教，并同清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它是继燕子砭和三边教案以后，在陕南发生的又一次较大规模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在陕西近代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 九、西安南关教案

清末外国人来陕传教，在西安南关南稍门外围墙巷西边建造了一所教堂，里面住着以拜牧师为主的几位外国人和几名中国人。当时在南关有两个大旅店，一个是万顺店，一个是鸿盛店，一些从南山来的买卖货物的人常留宿于此，他们大多参加帮会，其中胡重、张乡约二人没有正当职业，长期住在万顺店给南山来的客人介绍生意。时南山人姚成在咸宁县衙门供职，因具体负责管理南关一带民间事务，故与南关教堂多有往来。教堂方面曾经发生过几次被盗事件，遂严厉责斥姚成，并要求负赔偿之责。姚成为此十分憎恨教堂。加之传教士平素孤傲自大，对附近居民多有得罪，这便促使姚成欲发动群众同教堂展开斗争。

1911年农历九月初二夜晚，姚成和住万顺店的胡重、张乡约秘密商议，决定集合南关旅店的帮会客人，并联络南关一带的年轻人毁教堂、杀洋人。当晚二更时分，集中在一起的群众手持刀枪棍棒向教堂前进。但教堂事先已有所准备，当起事群众走到离教堂不远的地方，教堂方面开枪射击，王红娃、梁瑞银二人中弹身亡，人们进攻受阻，加之教堂围墙又高又坚，群众难以攻入。于是采取火攻，点燃附近麦草围烧。这时从教堂里逃出几个外国人（一男一女和两个女孩），当场被群众用刀砍死。随后，人们冒着烈火，涌进教堂，先后打死几个隐藏在庭院角落的外国人。没有多久，教堂成为断垣残壁。天亮时，大家纷纷离去。当群众用火焚烧教堂大门时，教堂里的拜牧师怀抱自己的小女孩逾墙逃出，隐匿在教堂西北的芦苇地里，天亮以后跑入西关教会。

事后两三天，城里传出消息说，外国人要求赔偿生命财产损失，并扬言要洗劫南关居民。接着，城内派出几名军人，在南关一带搜查烧毁教堂的人们，闹得鸡犬不宁，人人担忧。此时适逢姚成从城南回来<sup>①</sup>，人们便把他捉住，连同其妻，均被官府杀掉，并将人头悬挂于南稍门城楼上。南关一带的年轻人凡参加过焚烧教堂的，都被分别送至各营盘充兵<sup>②</sup>。

<sup>①</sup> 原来姚成在焚烧教堂的第二天，携带财物向南山方面走去，行至丈八沟，被当地居民劫夺一空，无法前行，只好中途折回。

<sup>②</sup> 本教案资料来源见王清彦《辛亥西安南关教案回忆》和赵金祥《回忆辛亥西安南关教案》，均载《辛亥革命在陕西》，陕西党史资料丛书（三），第545—551页。

#### 第四节 对外派遣留学生

近代以前，中国人留学海外是零星的，也往往是在外国传教士的帮助下进行的。中国国门打开后，中西间的差距逐渐为人们所领悟，从而导致了留学潮的兴起，引导这一潮流的是1847年赴美，初在马萨诸塞州孟松学校就学，1854年毕业于耶鲁大学的容闳。他于1855年回国后的十多年间，先后在广州、香港、上海当译员，到南京等地考察。1870年得到洋务派丁日昌、曾国藩等人的支持，清政府终于同意派遣幼童赴美留学。这批幼童被送到上海预备学堂，经过一年的中英文训练。容闳先期前往美国，安排住宿并联系学校。

1872年8月11日，首批官派学生由上海乘船经日本赴美国。此后，三年间又增派赴美留学生。1877年开始，又增派赴英、法、德等欧洲国家的留学生。1896年开始，又增派赴日本的留学生。在以上官派留学生的同时，还有些自费留学生随同前往。海外留学生的学习专业较多，回国后多为祖国的建设事业作出贡献。在这种潮流的推动下，陕西亦渐次向海外派遣留学生。

##### 一、20世纪初陕西最早的几批留学生

1904年，陕西武备学堂派遣张凤翔、张益谦赴日本入振武学校学习兵科，这是陕西最早的留学生。翌年，陕西向外大批派遣留学生，当时派遣官费生白常杰等31人、自费生樊宝珩等18人赴日本留学。他们分别由陕西高等学堂、师范学堂及三原宏道学堂选拔。据《高等学堂详请咨送陕省学生赴东洋肄业文》称：

窃惟当文明互换之世，必杜门却轨则新知之输入何从，处工商竞争之场，非问道已经则实业之振兴无。自近来各省人士，前赴东洋游学者三千余人，而吾陕寥寥无几，固由僻远西陲，风气之开通较晚，盖觉导扬先路，官师之倡率难迟。本学堂暨师范学堂、三原宏道学堂，肄业诸生不乏聪明可造之材，现值宪台主持学务，士气奋兴，人怀墙面之忧，士以蓬心为耻，群情鼓舞，未便从而遏之。兹由本堂、师范学堂，挑选学生十八人，函商学院，由宏道学堂挑选十二人，共官费生三十人，又官籍子弟之自费生十人，照会四川华阳县举人徐炯监督赴东留学。查陕

西古称农国，地号上腴，第栽培长养之术不精，故荣滋发长之功不进。此次留学各生，当先派习农学，而森林畜牧之类附焉。至若延绥以北宝山之蕴蓄尤多，汴洛而西铁路之交通已近，厘金将裁而税务不能不讲，刑律已改而法学不可不兴，拟于农学而外，分矿务、路工、税务、法律为四门，各派数人，俾多士各求一得。<sup>①</sup>

从上可见，陕西由于受“僻远西陲”这一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工商业不发达的经济状况的影响。在派遣留学生出国留学方面已落居其他省份之后，但是陕西学界的有识之士并不气馁，正如他们所说：“虽云求艾三年，经营已晚，所冀为山一篲，进取非难。”<sup>②</sup>

这些派往日本的留学生在出发的前一天，陕西当局在湖广会馆（位于西安南四府街）举行公宴，巡抚曹鸿勋及其他官员参加了宴会。布政使樊增祥作了长篇演说，鼓励陕西学生东渡以后努力学习，为国家前途寻找出路。

以此为契机，到1906年，赴日学生逐渐增多，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官私费留学生共78人。到1909年，陕西各界人士力倡商办西潼铁路，集资选派留学生出洋学习铁路专业，蒲城人李仪祉遂膺其选，前往德国留学，在柏林皇家工程大学攻读铁路土木工程专业。1913年（民国二年），陕西又派张奚若、严庄、刘楚材、林济青赴美留学。同年，尚有西北大学一些学生赴日留学。

从1904年起，陕西先后选派数百名留学生出外留学，他们在海外学习政治、经济、法律、农学、医学、军事、铁路工程、水利、地质、物理等各种科目，学成回国后对推动陕西近代科学的传播、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文明的进步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尤其是为西北大学及后来一些高等学府的兴办培养了师资，也培养出像李仪祉这样国内著名的水利学家和一批科技人才。

现录有关记载如下：

#### 〔一〕1904年陕西赴日留学生（官费生）名单<sup>③</sup>

光绪乙巳年（1904年），秦省大吏于本省高等学堂、师范学堂、宏道学堂共选派学生31人，赴东洋留学生为官费生。

白常洁澄城监生      张祥麟紫阳增生

① 《辛亥革命在陕西》，陕西党史资料丛书（三），第356—357页。

② 《辛亥革命在陕西》，陕西党史资料丛书（三），第357页。

③ 录自《续陕西通志稿》卷三六、卷四。

高冠英米脂附生	钱鸿钧咸宁附生
王觐墀户县增生	曹 澍泾阳廪生
崔云松咸宁附生	谢增华咸宁廪生
张宗福三原廪生	张尉森渭南附生
郝朝俊华阴附生	马步云合阳附生
张允耀绥德廪生	李寿熙咸阳附生
茹欲立三原附生	刘景坡兴平增生
刘云祥咸宁附生	党积龄留坝附生
雷崇修周至优廪生	杨铭源宜君廪生
安兆鼎朝邑优廪生	张炽章榆林监生
李述膺耀州廪生	宋元恺耀州廪生
马宗遂南郑附生	李鼎馨同州府廪生
李元鼎蒲城增生	康耀宸汉中府增生
姚鑫振三原廪生	景志傅富平附生
张秉钧三原廪生	

〔二〕 陕籍海外毕业人员名单<sup>①</sup>

张凤翔，长安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

魏国钧，蒲城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

张益谦，华阴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学部考试给炮科举人访册。

张祥麟，紫阳人。日本明治大学毕业，宣统三年学部考试给文科进士。

任秉璋，周至人。日本明治大学毕业，宣统二年学部考试给法政科举人。

钱鸿钧，咸宁人。日本明治大学毕业，宣统二年学部考试给法政科举人。

张 耀，长安人。日本明治大学毕业，宣统二年考试给法政科举人。

党积龄，留坝人。日本明治大学毕业，宣统二年考试给法政科举人。

以上政府官报

谢增华，咸宁人。日本明治大学毕业，得法学士学位，宣统三年学部考试给法政科举人。

崔云松，咸宁人。日本明治大学毕业，宣统三年考试给法政科举人。

<sup>①</sup> 录自《续陕西通志稿》卷四三。

谭焕章，长安人。日本明治大学毕业，宣统三年考试给法政科举人。

郝朝俊，华阴人。日本稻田大学毕业，宣统三年学部考试给法科举人。

马步云，合阳人。日本明治大学毕业，宣统三年学部考试给法科举人。

以上内阁官报

党基璋，华阴人。日本振武学校毕业。

高冠英，米脂人。日本振武学校毕业。

雷崇修，周至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

路孝忱，周至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

路孝先，周至人。日本岩仓铁道学校毕业。

路孝植，周至人。日本东京农科大学毕业。

钱元，周至人。日本东京农科大学毕业。

刘景坡，兴平人。日本法政学堂毕业。

## 二、陕西留日学生在日本的革命活动

1905年8月20日，孙中山、黄兴等在日本东京成立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同盟会，提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纲领，号召青年有志之士从事革命工作。也就在此时，中国留日学生纷纷参加同盟会。井勿幕即为陕西留日学生参加同盟会最早人之一。井勿幕出身于蒲城县一商业资本家家庭，15岁因不堪家庭债务的纠缠拖累前去四川，得其亲戚重庆知府张振之帮助，与四川上层知识青年多有来往，逐渐向往革命。当他获悉孙中山在东京组成同盟会时，便随同四川友人，东渡日本，谒见孙中山、黄克强等。

同盟会成立之后，接着相继设立各省同盟分会。因当时陕西留学生少，未设分会。井勿幕与四川留日学生向有联系，遂参加四川分会。另一陕西学生赵其襄（世钰）参加了山西分会。

随后，井勿幕接受孙中山的命令回到陕西进行宣传组织工作，然后再次东渡日本，决心把陕西留日学生和出国考察人员引上革命道路，借以与内地工作密切配合。随着同盟会陕籍会员日益增多，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秋，由井勿幕、赵其襄发起组织，在日本东京开始成立同盟会陕西分会。到会者30余人，公推长安人白秋陵为会长。分会成立后，继续吸收会员，先后经介绍入会的有南兆丰（兴平）、邹炎（三原）、马师表（绥德）、谢增华（长安）、高又尼（米脂）、徐志鸿（富平）等16人，其中有些是留日学生，

有些为赴日考察的士绅或官员。

分会成立初期确定的主要任务是：第一，组织舆论机构，发行刊物，积极开展宣传鼓动工作。第二，广泛联系陕西境内高等师范各学堂学生，和他们互通声气。第三，倡办各种群众组织，如教育会、商会等，以保障其所属成员的利益<sup>①</sup>。当时，分会会员发表的专论有：《劝陕人急宜自治书》、《修筑西潼铁路书》、《筹办陕西第一牧场说明书及章程》等，均介绍给陕西供有关人士阅读和参考。

1906年是陕西人民反清运动极为高涨的一年，举凡反对盐斤加价斗争、反对西潼铁路加收亩捐事件等都给清王朝的统治以沉重打击。同时又推动了陕西留日学生的革命积极情绪。1907年，陕籍留日学生在日本东京创刊《秦陇》杂志，由党积龄任总经理，郝朝俊、马步云、张尉森等分任事务、会计和印刷等职。他们一面筹措经费，一方面开始征稿，准备付印发行。但因当时留学生中政见不一，出一期后即停刊。1908年春，同盟会陕西分会在日本又创办了《夏声》杂志，除由全体会员参加外，并广泛吸收同情革命的进步人士参加。由杨铭源、李元鼎、赵其襄负责编辑出版工作，并兼管同盟会陕西分会日常事务。

在《夏声》杂志发刊的同时，陕西另有部分学生如谭焕章、崔云松、郝朝俊等不甘于《秦陇》杂志的停刊，便与甘肃学生结合，利用《秦陇》原来的基础，创办一种新的刊物，取名《关陇》。《秦陇》以“介绍新知识及指斥地方自治”为目的，尚未明确倡言革命。改名《关陇》后，其内容“渐有论革命者”，但有关反帝反封建的议论却为数不多。而《夏声》则比较明确地宣传民主主义革命思想，揭露帝国主义列强的侵华罪行。有些文章甚至大胆提出“专制制度之思想，早已一落千丈”，“政府不足恃矣，吾人民若不起而维持，则亡国灭种之祸，瓜分豆剖之惨，不旋踵而至也。”<sup>②</sup>《夏声》共发行9期，每期销行陕西境内者虽无详确记载，但从这样的事实中可以看出它在陕西境内所起的作用。赵其襄在其《回忆录》中说：

当其时日……同盟会总会所发刊之《民报》，不能公然寄回，故均以本省之名目之言……行之。同志们将《民报》改装，皮书《心理学教科书》与《夏声》杂志一并寄回西安公益书局……售出。公益书局……

<sup>①</sup> 赵其襄：《井勿幕辛亥前革命活动的片断》，见《陕西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

<sup>②</sup> 《夏声》杂志第3期。

创办人亦加入同盟会，公益书局因分销《夏声》杂志及……《民报》，故省城学生往者络绎，久之变为省城之通讯机关矣。亦即为盟员士绅之聚会也。<sup>①</sup>

同盟会陕分会以《夏声》杂志作为联系各方面进步力量的枢纽，从而在人与人、机构与机构、地区与地区之间架起一座沟通革命思想的桥梁，推动了革命潮流的迅速发展。

---

<sup>①</sup> 《辛亥革命在陕西》，陕西党史资料丛书（三），第191页。



## 第二章 中华民国

### 第一节 概况

19世纪末20世纪初，清王朝的统治更加腐败，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愈演愈烈。正如兴中会宣言所说：“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于我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已效尤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sup>①</sup>也正是在这国家和民族存亡的历史关头，1911年10月10日爆发了震撼中外的“武昌起义”，揭开了辛亥革命的序幕。武昌起义成功之后，革命党人首先建立了湖北军政府。该政府采取避免同外国人发生冲突的对外政策。其《刑赏令》中明确规定：“伤害外人者斩”、“保护租界者赏”、“守卫教堂者赏”。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正式建立，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1月3日，孙中山在发布的第一张布告中明确宣布临时政府的对外政策是：“尽文明国应尽之义务，以期享文明国应享之权利。满清时代辱国之举措，与排外之心理，务一洗而去之。持和平主义，与我友邦益增睦谊，将使中国见重于国际社会，且将使世界渐趋于大同。”<sup>②</sup>

然而，中华民国正式成立以后，外国列强并不予以承认，依然同清政府保持关系。2月12日，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宣布退位。原为清室重臣的袁世凯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迫使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之职。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之职，次年10月任正式大总统。袁世凯篡权之后，对外不惜出卖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而与列强相勾结，以最终博得外国侵略势力的支持。袁世凯与日本政府签订的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正是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集团在对外政策上妥协退让乃至媚外勾结的具体表现。

<sup>①</sup> 《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9页。

<sup>②</sup> 中国史学会编：《辛亥革命》（八），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0页。

1916年6月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分裂，一些手握军权的地方军阀借“自治”之名，拥兵自重。各帝国主义则在幕后操纵，中国遂出现各派军阀割据与混战的纷乱局面。继袁世凯之后掌握北京政府大权的段祺瑞，对外投靠日本帝国主义，推行卖国媚外政策。他的代表在中日谈判中，竟对日本提出霸占中国山东各项权利的无理要求，表示“欣然同意”。

从上可见，尽管中国在1912年已开始进入民国时期，但由于北洋军阀操纵的北京政府步清王朝之后尘，对内专制独裁，对外妥协退让，从而使外国侵略者依然在中华大地上为所欲为，它们的侵略野心和掠夺行径非但没有削减和收敛，反而更为猖獗。相应，自鸦片战争以来饱尝外来侵略之苦的中华民族仍旧生活在侵略铁蹄的蹂躏与践踏之下。痛苦的现实迫使中国人民奋力举起反抗外来侵略和北洋军阀独裁专制统治的旗帜。

1923年3月，孙中山在广州建立革命政权——陆海军大元帅府，中国又开始进入南北两个政府的对峙时期。两个性质不同的政府，分别实行着两条截然不同的外交路线。北京政府依然是软弱无能、无所作为，在帝国主义的压力下屈辱退让。而广州大元帅府则实行联俄反帝、争取民族独立的革命外交路线。1925年7月1日，广州大元帅府正式改组为中华民国政府，以汪精卫为主席。1926年7月1日，广州国民政府发表北伐宣言，9月正式出师北伐。同年12月，广州国民政府迁至武汉，改称武汉国民政府。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蒋介石于4月18日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武汉国民政府变质。1928年初，宁汉合流，武汉国民政府“统一”南京国民政府，不久即进行“二次北伐”。尽管南京政府仍然使用“国民政府”的名义并以中山信徒自居，但实际上却完全背弃了孙中山的外交主张，而执行了反苏反共、对帝国主义妥协屈服的外交政策。在此期间，虽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客观形势的变化，南京政府的对外政策亦有所变化，但在反共和投靠帝国主义这一点上却没有丝毫的改变。与之相对立，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蒋介石叛变国民革命、抛弃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投靠帝国主义的行径。

辛亥革命以后，陕西分别出现国民党、共和党、进步党的支部。国民党是辛亥革命前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改组而成的。1912年下半年，井勿幕奉孙中山之命，回陕将同盟会陕西支部改为国民党陕西支部。8月，在西安南四府街湖广会馆举行成立大会，选举井勿幕为理事长，陕西都督张凤翔为副理事长。随着北洋军阀势力向陕西的渗透，国民党陕西支部的力量日渐削

弱。

1912—1921年，在张凤翔，尤其是陆建章和陈树藩统治陕西的十年间，不折不扣地执行与北洋军阀一脉相承的妥协、退让、媚外的对外政策，是北洋军阀把持的北京政府的外交政策在陕西地区的投影。他们与帝国主义列强暗中勾结，甚至不惜以出卖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来换取外国侵略者的支持。1914年，陆建章及一些地方官吏与美国毕士博相勾结，盗卖了“昭陵六骏”中之两骏。同年，陈树藩派人在京向日人借外债500万元，以陕西纺纱厂和铜元局作抵押。陕西地方当局每向外人妥协退让一步，都遭到陕西人民的奋力反抗。

1920年7月，北洋直系军阀乘全国人民反对皖系军阀之机，发动直皖战争，结果皖系倒台，直系攫取了北京政府大权。1921年5月4日，把持北京政府的直系军阀为了进一步打击皖系势力，扩大地盘，趁陕西人民驱逐陈树藩的机会，下令撤销陈树藩陕西督军之职，以直系第二十师师长阎相文代之，同时，任命祸陕数年的刘镇华继续担任陕西省省长<sup>①</sup>，还以“顾问”、“参议”、“谘议”等名义，将800多个官僚政客安插于陕西。8月22日夜，阎相文在直系军阀内部矛盾的逼迫之下服毒自杀。北京政府任命冯玉祥代阎督陕。

冯玉祥面对百孔千疮、兵民交困的复杂局面，对内整顿地方军、政、财、文等方面，采取了“与民休戚”、“禁烟”、“禁赌”、“以武力驱逐娼妓”等一系列有效措施，逐渐稳定陕局。在对外方面，以“保土维权”为第一主旨，据理力争，毫不退让，一反以往官吏“慑于外人之势，不敢干涉”<sup>②</sup>的做法。

1930年11月，蒋介石委派杨虎城为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兼陕西省政府主席。1933年5月，又免去杨虎城陕西省政府主席的职务，以邵力子代任，只保留其西安绥靖公署主任的职务，直到1936年西安事变为止。杨虎城在陕任职期间，积极促进教育与农业水利建设，并多方资助陕西学生出国留学，如共产党员王炳南、潘自力、江隆基及进步青年袁若愚、李敷敏、李子侠、刘佛吾等，先后前往日本、德国等亚、欧国家就读。1936年西安事变和平

<sup>①</sup> 刘镇华系河南嵩县人，早年纠合一伙土匪，蹂躏河南人民。1918年2月，刘镇华与陈树藩相勾结，流入陕西，并以助陈攻打靖国军为条件，攫取陕西省长之职。

<sup>②</sup> 冯玉祥：《我的生活》。

解决后，杨虎城被迫赴欧美各国进行考察。

在杨虎城之后，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陕西地方政府在对外政策上与南京政府一致，始终坚持反苏反共，投靠帝国主义的方针。

## 第二节 涉外机构

中华民国成立时，南京临时政府设外交部，有总长、次长各1人。南京临时政府北迁后，1912年3月成立北京政府，外交部设总长、次长各1人，参事4人，秘书长1人，秘书6人，司长4人，科长、科员若干人。外交部下设总务厅（职掌机要、文书、统计、会计、庶务）、外政司（国界、词讼、修约、禁令）、通商司（商约、保惠、实业、榷算、商务）、交际司（国书、礼仪、接待、勋章）、庶政司（教务、护照、出纳、法律）。1914年该部改组，外政司改为政务司，并裁撤庶政司，将其职掌归并其他各司。1922年增置条约司。1928年裁撤交际司，增设情报局，设局长1人，由次长兼任，副局长1人，下设4科。

与北京政府对峙的广州国民政府及武汉国民政府亦设外交部，置部长1人，不设次长，仅有秘书长1人；另置参事会，有常务参事若干人；主管事务分属公法交涉科、私法交涉科、翻译科、调查科、总务科五科；附设宣传局职掌外交政策宣传等事宜。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即有外交部，该部于1928年7月增设秘书处和政务、总务两司，情报事务为政务司办理。又增置次长2人。同年11月重订外交部组织法，设秘书处及第一司（掌政务）、第二司（掌总务）和第三司（掌情报）。参事2人至4人，掌拟订部内法律命令事宜<sup>①</sup>。1929年再行改组，部长、次长以下设秘书处及第一、二、三司，第一司执掌东、西各国通商条约等事宜；第二司职掌亚洲各国及苏联事项；第三司职掌欧美各国事项。后又将第一、二、三司分别改称国际司、亚洲司和欧美司。

民国以来，为了统一外交事权，一切外交事务收归中央专办。与此同时，在全国各地设立交涉署，作为中央外交部直属机关。该机关与地方政府合作但不相统属。当时陕西西安设交涉署，置交涉员1人，科长4人，分掌总务、交际、外政、通商4科。科以下设科员8人，雇员若干人。交涉员直

<sup>①</sup> 参见《外交年鉴》24辑，上编，第15页。

接上承外交总长之命，掌理外交行政事务，并须接受省行政长官的监督。遇有与军事行政或地方行政相关而必须经由省都督或民政长的对外事项，除呈报外交部外，要随时会同都督或民政长协商办理。

1928年8月，国民政府在宣告统一全国之后，开始推行外交统一政策，遂以交涉员助长地方政府外交权为由，于1929年裁撤了陕西等全国各地所设交涉署。从此以后，地方不设交涉机关，凡与外国政府交涉事务均由外交部办理。至于有关与外国人个人交往或外人游历、通商等事宜仍由省、市、县政府办理，关于诉讼案件归地方法院管辖<sup>①</sup>。1930年，外交部为明了各省交涉署裁撤后地方接办情形及协助办理起见，特派视察专员前往各省视察。视察不直接办理外交事务，只是传达外交部旨意和辅助地方政府办理非与外国政府交涉的外人事项。当时设视察专员4人，分全国为4个视察区域，陕西、山东、河南、甘肃为一个视察区域。1936年外交部废止视察员制度，改设特派员。这样一来，地方政府失去了对外交涉的实际权力，甚至连各省市对外协商及与外人合资条款非经中央核准者一律无效。

### 第三节 外患与抗争

#### 一、陇秦豫海、同成铁路借款合同

1912年，北洋军阀政府谋筹修筑陇海铁路。因此路中经汴洛路，故以《汴洛铁路借款合同》中所规定的比利时有接展至西安的筑路权为由，派其财务总长周学熙和交通总长朱启铃与比利时在北京设立的“铁路电车公司”代表陶普施于9月24日签订了《陇秦豫海铁路借款合同》，以年息5分，借款1000万英镑，并以“陇秦豫海全路铁道、车辆、机器、附属品及进款为特别担保品”<sup>②</sup>。1913年开始动工，定开封至海州为东路，洛阳至兰州为西路，各段分设工程局。1915年9月，洛阳至观音堂一段通车。后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路事中断。

《陇秦豫海铁路借款合同》签订以后，1913年7月22日，北洋政府又派其财政总长梁士诒、交通总长朱启铃与比、法两国铁路公司签订《同成铁路

<sup>①</sup> 见1930年1月外交部咨各省“交涉署裁撤后办理外人事件范围”。

<sup>②</sup> 黄月波等编：《中外条约汇编》。

借款合同》，借款 1000 万英镑，期限 40 年，以本铁路全部财产及收入作担保。同成铁路以山西大同与京绥铁路相接处为起点，中经太原、平阳、蒲城、西安、汉中至成都，全长 3000 余公里，在陕西境内约占一半。比法两国企图通过修筑这条铁路以掠夺我国西北和西南的矿藏、物产资源等。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借款未付，终未动工。

## 二、延长石油矿权

1913 年，美国美孚洋行以中国石油产地为担保，向北洋军阀政府提供 2500 万英镑借款。4 月，美孚洋行经理白来克到北京，要求以 600 万美金租借延长油矿。1914 年 2 月 10 日，北京军阀政府派国务总理熊希龄、财政总长周自齐、交通总长朱启钤，与美孚石油公司代表艾文澜签订《中美合资创办石油公司合同》。“合同”规定：中美合资石油公司在美国领照，中国注册；美国方面可任意派员前往陕北勘查开采；1907 年商办油井及一切设施，均归美孚石油公司管理。同时还规定：“公司股东，美孚占百分之五十五，中国占百分之四十五。此百分之四十五内有三十七分半由公司赠予作为取得中国政府所给特权之代价；其余七分半由中国政府于公司成立之日起两年内照原价购买，如期不买，仍作为美孚之股东。”<sup>①</sup> 显而易见，名为中美合资，实则美国独资，北洋军阀政府是在“收归国有”的幌子下，把延长油矿出卖给了美国。

1915 年，美国技师 7 人、工人 70 余人开始在延安、宜君一带进行地质考察。1916 年至 1917 年，美国技师多人，在宜君中部和延安等地试凿油井。

延长油矿被出卖以后，陕西人民自 1908 年以来争得的“商办”权利遂被剥夺殆尽。为此，“商办保陕油矿有限公司”曾多次向北洋军阀政府申请自办，均被拒绝。最后甚至连公司也被迫停办，商办股款统被查收。

## 三、盗卖“昭陵六骏”

“昭陵六骏”是昭陵（唐太宗李世民陵墓）前六匹战马的浮雕。六骏石雕笔法简洁、神采飞扬、健壮雄伟，是驰名中外的艺术珍品。

1914 年，美国文化劫掠分子毕士博，受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派遣，假考察之名来陕勾结陕西督军陆建章和一些地方官吏，以 24 万银

<sup>①</sup> 《中美条约及公文汇编》，1913 年版。

元盗买了六骏中的两骏，即马前有丘行恭的“飒露紫”和“拳毛騧”。他们在盗运时谎言将此两骏运往省城保存，以迷惑群众。就这样，两骏被盗运自美国。现存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

1918年，毕士博又勾结陕西督军陈树藩，企图盗运其余四骏。当他们把四骏打成小块装箱运至渭河边草滩镇时，被礼泉人民发觉。当地群众一面派人监视他们；一面派人报告省议会。陕西靖国军得知此事后，立即张贴布告，谴责陈树藩盗卖文物的罪行。结果四骏被截回，现存陕西历史博物馆。

#### 四、抗议瓜分中国的太平洋会议

1921年11月12日在美国华盛顿召开“太平洋会议”。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为了对战后远东和太平洋的殖民地和势力范围进行“巴黎和会”后的再分割会议。会议根据美国提出的“各国在华机会均等”和“中国门户开放”的主张，缔结了美、英等《九国公约》。这是帝国主义共同瓜分中国的一个强盗协定。而当时北京直系军阀政府竟然在太平洋会议中第一个赞同“门户开放”的卖国原则，乞求帝国主义共管中国。

1921年12月，当太平洋会议瓜分中国的消息传到陕西后，西安各界立即群起反对。12月20日，西安各校学生千余人在文庙（今碑林博物馆）集会，举行抗议帝国主义侵略行径的示威游行。学生们手执白旗，上写“一致对外、急谋统一”、“亡国不如丧家之犬”、“列强瓜分中国誓不承认”等字样，沿途高呼“誓死救国”、“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

21日，在学生们继续结队游行的爱国热情感召下，各界群众也踊跃参加。几条大街上多数商户停止营业，实行罢市，且在各户门首高悬一面黄旗，上书“拚命力争，誓死不承认，宁做中鬼，不做外奴”。游行队伍很快发展到1万余人。最后拥向冯玉祥督署请愿。

22日，斗争规模继续扩大，各公私团体、教育会、实业会、省农会、红十字会、律师会等各行业的大部分成员，都加入了学生的游行行列，形成规模空前的群众爱国运动。

23日，在西安召开各界国民大会，进一步表示陕西人民反帝救国决心，并决定切实展开抵制日货运动。会后继续游行示威，游行群众来到省长刘镇华公署，要求刘致电北京政府及参加太平洋会议的代表团，声明全国人民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九国公约》，不准他们签字，并要刘镇华将发电稿立即印发群众。在群众的巨大压力下，刘镇华被迫答应。在当日游行结

束后，学生们连夜在法政专门学校召集会议，作出三条决定：第一，通电中国代表团，不准他们签字。第二，分途下乡讲演，呼号救国。第三，切实调查日货商标，以便禁止。随后，华县、蒲城、临潼、三原等地学生及人民群众纷纷召开会议，并示威游行，强烈抗议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强盗行为。

28日，蒲城县各界人民召开国民外交大会，通过六项救国办法，其中第三项是通电与会各国代表及驻北京各公使，转达各国政府，声明中国人民不承认四国协议对华之条件；第六项要求北京政府训令其代表，务必无条件收回青岛，取消二十一条。会后举行游行和罢市。

1922年1月，西安周围的农民在西安附近东南西北各大街两旁和乡村中的庙墙碑面上写着“东洋人——洋人把我们的山东抢夺去了，——我们和洋人拚命吧！——杀了洋鬼子再偿命——”等标语。农民们还自动组织了“三秦救鲁义勇军”、“陕西灭洋壮丁团”，浩浩荡荡地示威抗议。1月16日晚，省城附近农村聚集了数千人，准备向西安进发，声言要冲进西安城斩杀洋人、围攻官署。

陕西人民进行的这次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运动，给各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北洋军阀以沉重打击。然而，却遭到与北洋军阀政府在对外政策上同等媚外的陕西省省长刘镇华的反对。刘镇华深怕本省人民群众的抗议斗争得罪其主子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因而对这场反帝爱国运动百般阻挠和镇压。他诬蔑学生的示威游行和宣传讲演“过激”、“害国”，是“奸人从中煽惑，扰乱治安”，并勒令学生停止示威活动。并在西安宣布了无耻媚外的治安警察法及戒严令。每晚9时，各街巷口，武装把守，禁止通行。但这些镇压措施并未扑灭陕西人民反帝爱国斗争的熊熊烈火，相反地使广大人民群众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只有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才能求得中国人民真正的独立、自由和解放。

## 五、声援五卅反帝爱国斗争

1925年6月初，上海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陕西，广大民众异常激愤，随即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对英、日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支援上海工人反帝爱国运动。

首先，西安人民在中共党组织的领导下，成立了反帝爱国反对惨杀同胞运动委员会，发表宣言指出：处驻沪英领事以死刑；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取消领事裁判权；惩办惨杀上海工人、学生、市民的凶手并赔偿



损失；人民集会、结社、出版、言论、罢工之绝对自由。6月18日，木漆行全体工人在东大街端履门十字精业公司举行大会，讨论以实际行动支援上海工人的斗争。20日，数千名学生在西安举行示威游行，游行队伍高举写有“西安学界反对英、日屠杀同胞雪耻会”的大旗，同时，每人各执小白旗一面，上写“打倒帝国主义”、“收回租界”、“对英日经济绝交”、“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等，一面高呼口号，一面散发传单，有人甚至咬破手指，血书“雪耻”二字于白手帕之上。游行队伍到达湘子庙街商会门前时，派出代表要求商会参加定于6月21日召开的市民大会，并要求他们举行罢市并捐款援助上海工人。

6月21日，西安各界群众3万余人，举行盛大的支援五卅运动，反对英、日帝国主义大会。22日，全市洋行工人举行罢工，西安全体工人还发出致上海工人信，广大市民募捐2000多元，寄给上海和广州工人。与此同时，陕西其他县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集会游行。例如，6月14日，三原教职员工会召开紧急会议，并发出通电，表示“誓随同胞，死力奋斗，务期收回租界，完我国权，存亡攸关，愿共同策励。”更令人振奋的是，在大荔县，连儿童也结队讲演，进行募捐，以支援罢工工人。

8月上旬，陕西学生雪耻会分东、南、西、北、陕南和陕北六路前往各地组织、讲演、募捐，以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反帝爱国觉悟。

由于中共党组织的领导和陕西人民群众坚持并不断扩大这一斗争，故使这次反帝爱国怒潮一直持续到1925年底。

## 六、对九一八事变的反应

1931年9月18日晚，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第二天即占领了沈阳、长春等城市。在蒋介石和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下，仅四个多月的时间，东北三省就全部沦陷，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在此紧要关头，9月20日，中国共产党和日本共产党联合发表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宣言。9月22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又作出决议，提出发动群众、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方针。全国人民迅速掀起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

中共陕西省委依据中共中央指示，于9月20日作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决议，于10月10日与30日，接连两次发表了《告陕西民众书》，号召陕西人民“建立广泛的群众反帝组织”，奋起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并大力开展抗日反蒋的宣传活动。

1931年，杨虎城为陕西省政府主席，他在主政期间，延用了许多爱国青年和进步人士，共产党员南汉宸为省政府秘书长，李百龄、李仪祉、申伯纯等都任要职，民主空气比较活跃。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传入西安，即产生强烈反应。9月27日，西安六七万人举行反日救国大会，并游行示威，强烈要求国民政府立即对日宣战。10月3日，西安各校教职员百余人召开会议，要求惩办贻误外交的王正廷及东北的军事首领。各县也先后召开反日救国大会，一致发出对日经济绝交实行宣战的呼吁，并成立了反日救国会和宣传队，组织铁血团、牺牲团、义勇军和敢死队等武装，准备开赴前线抗日。10月七八两天，陕西学生反日救国会派代表赴国民党陕西省政府请愿，要求恢复民众运动和青年运动，对学生配发武器进行军事训练，以便对日作战。10月15日，为了抵制日货，陕西反日救国会派出检查队协同工商界爱国人士，对日货进行检查，并电告津沪阻止输入日货。10月22日，陕西教育界反日救国会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改反日救国会为抗日救国会，每校选教职员学生代表各一人，赴北京参加11月1日全国抗日救国会议。10月27日西安教职员、学生组成两个宣传队，分赴兴平、扶风、武功、宝鸡、乾县、彬县、长武等地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活动。12月10日，西安各校学生为抗议国民政府在12月3日至5日逮捕北京大学南下请愿学生，召开群众大会，游行示威。要求国民政府释放被捕学生，督促蒋介石立即北上抗日，并撤回驻日公使，与日绝交。

陕西各界抗日爱国运动的高涨，给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以严重打击。陕西地区的国民党反动分子，残酷镇压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国民党省党部扣留学生抗日总会寄来的抗日文件。汉中县长温良儒和三原商会会长王鸿运，收买地痞流氓，殴打学生。为了对此进行有力的还击，在组织领导下，12月18日，西安各界举行5000余人的大会，要求对破坏抗日运动的国民党省党部委员田毅安、于国桢、张明经及三原商会会长王鸿运等予以严惩，会后，群众捣毁了国民党省党部。全省抗日救亡运动进一步高涨。

#### 第四节 友好交往

##### 一、芬兹尔与陕西林业

芬兹尔于1896年10月13日出生在德国士燕邦努建堡城的一个贫苦的

农民家庭。他自幼聪敏好学，在读过中学课程后，考入柏林大学，毕业时获林业博士学位。

1927年，芬兹尔应广东政府的邀请来到中国，在广州国立中山大学任教。在他的倡议下，广州白云山建立起中国广东地区第一个实验林场。芬兹尔在繁重的教学工作之外，经常前往粤中的高山和河谷进行实地考察，并先后协助当地开办了东江、西江、北江和南路各个林场，为开发和利用广东省的森林资源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1933年，在于右任倡导下，中国西北第一所农业高等学府——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在武功（今杨陵）正式成立（1939年改名为西北农学院，即今西北农业大学的前身）。应该校之聘，已经回国探亲的芬兹尔再次来到中国，担任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的教授和实验林场主任。为了使陕西尽快恢复由于1928年至1932年连续五年严重旱灾的创伤<sup>①</sup>，芬兹尔提出通过休养生息和植树造林以整治陕西的主张。当时，邵力子任陕西省政府主席，积极支持这一主张。为此，特聘芬兹尔担任陕西省林务局副局长。从此以后，芬兹尔每每登攀太白，翻越秦岭，南下汉中，广泛收集秦岭南北两坡和渭河、汉水流域的大量林业资料，为发展陕西林业奠定了基础。

在芬兹尔的倡导下，先后在眉县、咸阳、西安草滩、周至楼观台、朝邑严家滩等地开办林场，营造了大量杨、柳、核桃、板栗、洋槐、锐齿栎、油松林等。松、栎混交林在进入70年代后已开始采伐利用。1935年，应甘肃省政府主席朱绍良之聘，芬兹尔由陕赴陇，接着又绕道宁夏、青海，对西北的森林状况做了广泛的考察，并草拟了《甘宁青三省林业之大计》。同年冬天，他又从陕西出发，南下四川，沿长江考察直抵南京，向国民政府提出建立陕、甘、宁、青、川五省林务总局的设想，南京政府决定采纳。回陕后，芬兹尔立即拟写了陕西林业扩充计划。

1936年夏，芬兹尔因调查筹办陕西陇县关山林场，冒暑跋涉，返回西安。由于长期积劳，略觉精神不爽，但时值陕西省政府刚刚核准《陕西省林务局民国二十五年扩充计划》，身为林务局副局长的芬兹尔遂抱病筹备，昼夜操劳，以致得了失眠症。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劝他赴青岛作短期休养，但他执拗不从。后经多次催促，方决定于8月14日前往青岛。不料，13日下

<sup>①</sup> 1928年，陕西干旱无雨，夏秋两季歉收。1929年，旱情更为严重，赤地千里，村墟零落。全省受灾地区达80余县，关中地区尤为严重。旱灾一直延续到1932年。

午病情加剧，遂由省林务局德籍视察员罗特伴送，入西安广仁医院治疗。翌日凌晨3时，脑神经错乱，行动不能自控，竟以剃刀自戕，经多方抢救无效，与世长辞，年仅40岁。经陕西省政府与德国驻华大使馆所派代表毕德商妥，芬兹尔的遗体安葬在西安莲湖公园内，并树立长方形铜碑一面，以示纪念。

芬兹尔在陕期间，通过亲自调查先后撰写了《西北造林论》、《陕西林业之计划》、《建设陕西渭河以南道路建议书》、《秦岭天然林之育护及治黄治渭滩地林之培植》、《陕西省各县苗圃设置及其直接造林之方案》、《陕西林务实施方方案》、《西北引渭治黄林业将来之任务》等论著。直到今天，这些著述对发展陕西林业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 二、路易·艾黎与宝鸡“工合”

路易·艾黎是新西兰著名的诗人和作家，1927年3月13日乘船经菲律宾抵达香港，4月21日到达上海。

1938年春，路易·艾黎同美国进步记者埃德加·斯诺等共同发起筹建中国工业合作社（简称“工合”），旨在在中国内地建立和发展工业，以支持抗日战争，并在大后方为难民提供就业和生活必需品，制止国民党官员的走私、贩卖活动。同年8月5日，中国工业合作社在汉口正式成立，宋庆龄担任“工合”促进委员会名誉主席，路易·艾黎担任“工合”国际委员会委员和秘书。随着“工合”运动的迅速开展，迫于国际舆论的压力，国民党不得不表态支持“工合”，并任命路易·艾黎的国民政府行政院咨询“工合”工作的技术专家。

也就在这一年8月，“工合”西北办事处在宝鸡成立。路易·艾黎来到宝鸡，与办事处主任卢广绵等人一起，住在宝鸡西门里北边的两间小屋里，领导着“工合”西北办事处的实际工作。他不辞艰辛，经常到各地视察合作社，鼓舞工作人员和合作社社员。在艾黎等人的努力下，到1938年10月，宝鸡已组织起40多个工业合作社。不久，宝鸡“工合”办事处将组织合作社的工作推广到陕甘两省以至晋豫各地，如兰州、天水、南郑、双石铺、凤翔、西安、洛阳、镇坪、延安等地区，宝鸡成为西北“工合”的中心。到1941年，“工合”在宝鸡组建的合作社达100多个，社员有几千。各种日用工业品诸如纸、肥皂、鞋、皮革、食品、药棉、针织、帆布、铁器等几乎都能生产，并建立了供销门市部、“工合”金库、“工合”小学、“工合”医

院等。这对发展大后方生产、支援抗日战争起到积极的作用。

艾黎在为宝鸡“工合”事业奔波之余，还与乔治·何克等创办了宝鸡双石铺培黎学校。该校实行半工半读，其经费由国际工合协会资助，设备齐全。开设的专业课程有纺织、机械、化工、会计、外语五科。基础课有语文、数学、物理、化学、历史、地理等。艾黎除指导教学和实习外，还亲自为学生理发。

在艾黎的努力下，宝鸡“工合”工作发展迅速，并因此吸引了许多外国朋友。当时有英国两议院访华团、美国《生活·时代》杂志主编亨利·露丝及其夫人、美国“工会”委员会主席卡本德博士、英国“工合”委员会代表、英工党议员吴知先生等曾先后来宝鸡参观访问过工业合作社。

### 三、乔治·何克在宝鸡

乔治·何克，英国人，1937年毕业于牛津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1938年，他作为美国合众社战地记者来到武汉。同年10月，武汉沦陷后，由香港经北京、西安抵达延安。在延安期间，他深受中国革命的影响，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中国人民有了一定程度的认识与了解。1939年初，在美国记者史沫特莱的介绍下来到宝鸡，被新西兰人路易·艾黎留下担任中国工业合作社西北区办事处英文秘书。何克经常前往西北各地采访工业合作社的活动，并写出报告，以供“工合”国际委员会作为对外宣传的材料。

乔治·何克是一位非常同情中国抗战的国际友人。他能用流利的汉语熟练地演唱救亡歌曲，并能自编革命歌曲。1940年，凤县双石铺培黎学校成立，学生多为无家可归的战时难民儿童。1942年，何克担任该校教导主任。他不仅与学生同吃同住，教学生演唱抗战歌曲，还和学生共同参加劳动。1944年，日寇发动河南战役，陕西受到威胁。路易·艾黎和何克决定把双石铺学校迁至甘肃山丹。从凤县到山丹，将近1000公里的路程。在何克的率领下，学校全体师生用胶轮大车拉着行李，徒步走到兰州，然后才找到卡车运往山丹。年底，双石铺培黎学校全部迁至山丹，改名为山丹培黎学校。

1945年7月初，何克脚部被铁钉扎伤，中旬感染为破伤风，经多方抢救无效，7月22日去世，时年仅28岁。何克在弥留之际，仍念念不忘培黎学校，他用颤抖的手在纸上写下几个歪歪斜斜的大字：“把我的一切献给培黎学校”。

#### 四、西安事变中的端纳

西安事变发生以后，蒋介石的外籍顾问端纳曾从中斡旋，起到一定中和解难作用。

端纳是澳大利亚籍的英国人，英国《泰晤士报》记者。1903年来到中国，曾任孙中山的顾问，在孙中山和张作霖之间起过桥梁作用。孙中山授予他一枚金质奖章。此后，端纳相继当过张作霖、张学良的顾问，从1934年起，一直担任蒋介石的顾问。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蒋介石被扣以后，西安顿时成为全国政治斗争的中心。美、英两国对这一事变极为重视，竭力支持宋美龄营救蒋介石。而此时张学良、杨虎城电告南京政府，请派代表到西安谈判。于是，宋美龄央请端纳先赴西安探视情况。端纳接受请求后，便立即致电张学良将军。张学良对此表示欢迎，13日晚即复电端纳：“此间态度一贯，君能来此一视，甚佳。”<sup>①</sup>端纳遂于14日携带宋美龄致蒋介石的亲笔信由洛阳飞抵西安，当晚即见到蒋介石。端纳将信转交并告以南京方面的情况和英、美的态度。据报导，宋美龄写给蒋介石的亲笔信的内容是：

此间的亲日派正想利用营救你的名义，来发动内战；其实，何曾是真的营救你？他们是正想使你速死，好来篡夺政权，出卖整个中国。日前接汉卿电云：他绝对保障你生命的安全，并且说到这次的举动单纯是为了抗战。南京的情形既是这样，而西安的情形又绝非是对你个人，望你要用你的果断，与汉卿合商救国大计，而速返南京给亲日汉奸以镇压。否则，亲日派假口兴师，结果是你与中国俱亡！<sup>②</sup>

蒋介石看完这封信，“感动得至于痛哭流涕。”

之后，端纳又与张学良、杨虎城长谈。张、杨一再表示对蒋毫无加害之意，只要求抗日，请端纳向蒋介石说明，不能让居心叵测的何应钦等主战派借机造成内乱。15日上午，张学良同端纳再次去见蒋介石，张第一次向蒋介石宣读了八项主张<sup>③</sup>。蒋介石同张学良讨论了抗日问题，并进行了争论。

15日下午，端纳飞返洛阳，通过长途电话向宋美龄详尽报告蒋介石在

① 见《大公报》1936年12月15日。

② 见《东北知识》第1卷第4期

③ 塞勒：《端纳在中国》第22章。

西安的实况和张、杨的主张，表示有和平解决的可能，并转达张学良对孔祥熙和她的邀请。宋美龄亦把何应钦决定立即进攻西安的情况告诉端纳，并要他转告蒋介石设法制止。端纳同日在洛阳向美联社发电称：“蒋委员长同张学良及其部下，仅在政策上意见不同，……蒋已于昨日与张学良讨论此问题。”<sup>①</sup> 张学良 19 日对外国通讯社发表的谈话亦云：“端纳先生上星期一（十四日）到达后，总司令（指蒋介石）的气愤和不愿谈话的心情稍减，他心平气和地讨论了我们面前的问题，至星期二（十五日）已原则上同意我们所提各点。”<sup>②</sup>

由于宋美龄的要求，端纳于 16 日下午第二次抵达西安，向蒋介石报告南京方面的情况说：何应钦打起“讨伐叛逆”的旗号，自任“讨逆”总司令，即将进攻西安。接着，他转述了宋美龄要求蒋介石亲下手令，制止“讨伐”的口信。此时，南京空军已对渭南、三原等地进行轰炸，地面部队开进潼关，进逼赤水。张学良将军当场向蒋介石表示：“何应钦逼人太甚，要打我们就打！”<sup>③</sup> 当天，张学良电令东北军各部开赴反“讨逆”军事前线待命。电报命令说：“此间派军队甚急，仰将所部主力迅先轻装星夜急进，务将每到达位置，限宿营后迅速具报。”<sup>④</sup> 杨虎城的十七路军也作出相应的部署。蒋介石欲以军事进攻相要挟，只同意停战三天，希望尽快送他回南京。17 日晨，蒋介石给何应钦写手令。内称：

敬之吾兄：闻昨天空军在渭南轰炸，望即令停止。以近情观察，中正于本星期日，以前可以回京，故星期六日以前万不可冲突，并即停止轰炸为要。<sup>⑤</sup>

张学良和杨虎城要求派蒋鼎文与端纳一同回南京，向南京方面汇报西安真实情况。蒋鼎文回到南京，将蒋介石的手令亲自交给何应钦，并向国民党当局建议停止报纸、广播对西安方面的攻击谩骂，避免加深南京与西安方面的裂痕，以最终有利于事变的顺利解决。与此同时，端纳也向宋美龄、宋子文汇报详情。

宋美龄得到有关蒋介石和西安方面的可靠消息，决意和宋子文前往西安谈判，然以何应钦为首的主战派却以政府代表与“叛变者”谈判有失威信为

<sup>①②</sup> 丁雍年：《西安事变大事记》未刊稿。

<sup>③</sup> 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第 143 页。

<sup>④</sup> 引自《新北平》1936 年 12 月 17 日。

<sup>⑤</sup> 引自《中国抗战画史第 60 页。》

理由，反对宋子文前往。直到停战的最后期限 12 月 19 日，才准许宋子文以私人资格去西安营救蒋介石。12 月 20 日，宋子文飞抵西安，同张学良、杨虎城恳谈，又与周恩来畅谈。宋子文与蒋介石见面后，蒋的情绪已趋稳定。12 月 21 日，宋子文飞回南京，宣扬蒋介石在西安很安全，赞美周恩来是“共产党里最了不起的人，恐怕南京没有这样的人”，并斥责何应钦：“南京还有人要轰炸西安呢！”这样一来，使亲日派何应钦的嚣张气焰顿时收敛。当天，国民政府代理行政院长孔祥熙同意宋美龄、宋子文去西安进行谈判。22 日，宋子文携宋美龄、端纳、蒋鼎文等飞往西安，成为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重要因素之一。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陪送蒋介石回南京，蒋背信弃义，反将张学良扣押。端纳对此愤怒异常，与蒋介石和宋美龄大吵大闹，后竟愤然离去。

## 五、牙科医生海伯特在西安

温奇·海伯特，德国犹太人，毕业于柏林大学，获牙科博士学位。学生时代即参加反法西斯活动，加入德国共产党。30 年代初被希特勒法西斯驱逐，后经美国朋友格兰尼奇介绍来到中国，在上海开设牙科诊所，并参加“美国之友社”的活动。

1936 年初，在张学良将军身边工作的共产党员刘鼎因工作需要，拟定在西安设立一个地下交通联络站，并为此到上海物色人选。经宋庆龄、史沫特莱举荐，海伯特于 4 月来到西安，住七贤庄 1 号，开设牙科诊所掩护中共地下交通联络站。当时张学良将军聘请海伯特为其牙医顾问。

海伯特一面就诊，一面为交通站努力工作。正是在其牙科诊所的掩护下，七贤庄一号交通站在西安事变爆发之前的几个月中，发挥了十分特殊而重要的作用。由上海、香港、武汉等地下党组织购买运来及海伯特等人在西安采购的药品、无线电材料、医疗器械等首先储存在这里，然后由刘鼎通过东北军的汽车运至陕北。海伯特在工作之中，同国内外进步人士多有接触。刚从德国留学归来的王炳南不时来诊所同他用德语交谈。美国记者史沫特莱、斯诺亦先后来到了西安，海伯特视他们为政治的师长，久别重逢，叙旧谈新。

1936 年 12 月 12 日凌晨，西安事变爆发，城内枪声四起。海伯特不知何故，急忙离开诊所前往西京招待所找史沫特莱寻问根由，不幸在途中被戒严



部队误伤致亡，终年 30 多岁。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得知后，十分痛惜，分别委托刘鼎和王炳南料理后事。12 月 19 日至 21 日，《解放日报》连续发表“牙科博士海伯特葬期”的讣告。21 日，海伯特的遗体被安葬在西安小南门外公墓。

## 六、外商石油公司在陕西

民国时期，外国石油公司在陕西设立各种经销机构和代理批发商行，销售各类石油产品。当时进入陕西的外国石油商，主要有美孚石油公司代理商德太光煤油庄、亚细亚火油公司代理商同丰煤油公司、德士古石油公司代理商大德福新记煤油庄和健华煤油公司及俄商光华公司。

辛亥革命以后，美孚石油公司派专人来陕视察，在西安通过回民马玉如等人于东大街马厂子附近开设德太光煤油庄，1915 年与美孚石油公司签订代销石油合同以经销煤油。1920 年，聘请冯瑞生为该油庄经理，并因业务范围扩大、煤油销量增加而将煤油庄改为德太光煤油公司。该公司在潼关、渭南设有分公司。陇海铁路通车西安以后，美孚石油公司在西安火车站租设有石油库房，储存大量煤油、汽油，专供陕西各代销店批发提运。

1927 年，英商亚细亚火油公司在西安大湘子庙街路南成立代理商店，以销售煤油为主，然不久停业。1929 年，同丰煤油公司在西大街桥梓口附近成立。该公司专门代销亚细亚火油公司各种石油产品。

1928 年，有位油商在西安东关柿园坊开设福中公司，专门经销德士古石油公司幸福牌煤油。1929 年，陕西合阳人周竹轩等在西安东大街案板街口开设大德福煤油庄，经销德士古石油公司煤油。1934 年，河南人郭朗斋在西安东木头市，赁房设店，代理经销俄商光华石油公司光华牌煤油，后在美孚、亚细亚、德士古三大公司排挤下停业。

## 第五节 杨虎城欧美之行

杨虎城，陕西省蒲城县孙镇甘北村人。初号虎臣，后为虎城，曾用名忠祥、彪。1893 年 11 月 26 日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蒋介石表面上表示愿意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但实际上却对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恨之入骨，直接的报复手段便是囚禁和放逐。

1937年5月初，杨虎城被迫接受蒋介石的命令，前往欧美考察。5月27日，杨偕夫人谢葆真等由西安启程前往上海。上午10点钟左右，当他们一行到达西安机场时，社会各阶人士竞相前来送行。周恩来和邓宝珊陪送杨乘坐欧亚航空公司的客机，于下午4时到上海。

杨这次出国的名义是军事委员会派往欧美各国考察的军事专员。南京政府外交部发给红皮护照，并提供15万元旅费（由宋子文交项介人换成英镑）。随行人员，除夫人谢葆真、幼子拯中、秘书亢心载和参谋樊雨农外，还有译员王麟阁。

6月中旬，杨赴武汉向蒋介石辞行。29日，杨及随行人员由上海乘美国大来轮船公司“胡佛总统”号客轮赴美。当天午饭后，杨约秘书、参谋谈及十年前他在日本的情形，告诫大家：

到了国外，免不了每日同外国人打交道。我们中国有些人媚外，有的人排外，我看这都不对。我们是个伟大民族，我们应持不亢不卑的态度。对人应有礼貌，也不要卑躬屈节，要有自尊心。要每天挤出时间学习，特别要着重学习新问题和有关现实政治生活中的问题。<sup>①</sup>

7月1日上午7时，船抵神户港。同盟通讯社记者神板鹤太、大阪《每日新闻》记者柴田九万彦和岨信正、大阪每日英文新闻社坂井浅太郎、大阪《朝日新闻》记者上村四郎、《神户新闻》记者下司利一等，要求上船谒见杨虎城并摄影。对此，由亢心载和王麟阁出面，以杨乘船昏晕、身体不适为辞，婉言谢绝。2日，船抵横滨。当地水上警察署勤务外事高等视察失作乙五郎、《日本广告报》记者田中源治、神奈川县广外事课手岛邦三和其他新闻记者十二三人，亦请求谒见，仍由亢心载和王麟阁出面婉言谢绝。

8日，获悉卢沟桥事变爆发，杨立即打电报给上海的宋子文说：“弟以革命军人，何忍此时逍遥国外。拟由旧金山返国抗敌。乞转陈中枢（蒋介石）。”接着又发上海全国经济委员会王炳南一电，电文云：“余拟由旧金山返国抗敌。希转告诸友好。”然遭到蒋介石的拒绝。9日，轮船到达夏威夷群岛首府檀香山，中国领事馆梅景周总领事和黄荫余领事及新闻记者八九人登轮迎接。随后，杨到达领事馆，受到侨胞的热烈欢迎。

14日，船抵美国西岸的旧金山。当地领事馆黄朝琴总领事和主事邝兆

<sup>①</sup> 亢心载：《杨虎城将军欧美之行》，载《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本节以下引文均见该作。

荣及报馆记者十余人前来迎接。杨及随行人员下榻于奥克兰市塔湖旅馆。为了表示返国杀敌的决心，十六日专报南京政府，请求准予中止军事考察，回国抗日。同时还电告宋子文、于右任、徐永昌、邵力子、孙蔚如等人，望从旁促其实现。这时，美国各主要报纸先后报道了杨的行踪，消息很快在侨胞中传开。华侨团体的负责人、侨胞代表、美国进步人士及各报刊的新闻记者等，络绎不绝地前来旅馆表示敬意和谈论问题。

19日晚，《美西工人报》记者威尔逊夫妇远道来访。他们围绕中国对日抗战提出12个问题，杨逐一作答。除此之外，奥克兰市几家报纸记者和旧金山《诊察报》、《生活杂志》的记者也前来拜访。23日，旧金山广播电台还邀请杨作了半小时的讲演。

在此期间，杨还应邀参加欢宴、座谈等，在进行社交活动的同时，并按照和领事馆商定的日程考察了军事和其他设施。从20日至26日，先后参观了旧金山军营和飞机场，旧金山要塞、炮兵部队和军医院等。

22日，宋子文复电请杨暂留美国或先赴欧洲考察军事，等中日宣战以后再由中央电召回国。次日，又接蒋介石来电，嘱杨继续考察。蒋、宋来电，使杨的心情变得较前更为沉郁。7月27日，他忽然召集随行人员说：

近来华北抗日战争逐渐紧张，依我判断，战局还要继续扩大。我们既在旧金山参观、游览了一个时期，对美国社会已有一个概括的认识。其他地区大体上也相差不多，没有多事参观游览的必要。我想带维恪（即亢心裁）先去欧洲，其余暂留居美国西部，等我到达欧洲后，再决定行止。

28日下午6时，亢心裁随杨飞离旧金山，经芝加哥抵达华盛顿，居留一日。杨前往中国大使馆看望王正廷大使外，还游览市容和参观名胜及国会图书馆。30日到达纽约。在短暂的参观访问中，杨亲往“唐人街”和黑人居住区了解情况，并在美继续发表抗日言论。

8月3日下午3时乘法轮“诺曼底”号赴英。8月9日驶进英国南萨木敦港。米暂沉、周梵百两人（当时在伦敦读书）到港迎接杨去伦敦，住“公园巷饭店”。10日，杨在米、周陪同下，游览了市区并访晤了驻英大使郭泰祺。11日上午，杨偕米暂沉、秘书亢心裁往巴黎，受到全欧抗日救国联合法、巴黎中华民国国民抗日救国会、旅法华工总会、旅法参战华工总会、巴黎中国出版社、巴黎中国国联同志会、亚西华工同盟会、浙江旅法侨商协会、旅欧中国妇女救国会和国民党支部等团体的代表和驻法大使馆郭则范参

赞等 100 多人的热烈欢迎。

杨在巴黎留住 40 天。在此期间，除同驻法大使顾维钧有些应酬外，他整天生活在普通人民之中，不懈地从事抗日宣传活动。

杨还应邀参加了法国反战反法西斯团体以及旅法侨胞组织的各爱国团体的座谈会、聚餐会等。24 日，应巴黎世界博览会之请，围绕下面四个方面的内容向法国人民作了广播讲演。第一，中法邦交友好，两国人民都酷爱和平，但两国人民都受到邻邦的侵犯，因而两国人民都坚决反对侵略者。第二，中国抗战关系世界和平，希望法国人民给中国以积极支援。第三，中国抗战已成为全国各方面一致的行动，这次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关系中华民族的存亡，一定要抗战到底。第四，破坏世界和平的战争，十分不得人心，最后必败。

28 日，杨偕亢心裁由法赴德，在柏林同中国驻德大使程天放有过两次礼节上的接触和应酬。孔祥熙当时在南德一温泉胜地休养，杨曾往晤以了解国内抗战近况。杨在德的 10 天时间里，主要是同一些进步留学生接触。29 日至 31 日，一连三个晚上，举行了三次旅德抗日救亡联合会会员座谈会。

9 月 7 日上午 9 时，杨偕连仲玉、张明鼎和秘书亢心裁到捷克布拉格考察。14 日，离捷经南德纽伦堡等地赴瑞士日内瓦。

杨这次中欧之行，尽管在沿途一些地方游览了不少世界闻名的名胜古迹，参观了某些工厂，了解了人民生活的某些方面，但杨由于日夜盼望回国抗日，游兴不浓。

返抵法国后，杨不断从爱国侨胞和法国进步人士那里受到很大的鼓舞。28 日，在王礼锡安排下，一同前往英国。29 日下午 4 时，杨接见伦敦各大报记者，交谈抗日战争问题。半天之内，就有 30 多家报纸的记者前来访问，并先后发表文章和报导。30 日下午 8 时，杨应邀参加了伦敦西区援助中国大会，并在会上作了讲演。

10 月 2 日和 3 日，由左翼读物会荷兰茨陪同，去英格兰北部的达拉姆、桑德兰和新堡三个城市作抗日讲演。

杨在欧洲最向往最感兴趣的城市是西班牙的首都马德里。因为那里正在进行着西班牙人民英勇抵抗德意法西斯武装干涉的反侵略斗争。杨认为这一反侵略战争和中国人民进行的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是性质完全相同的正义战争。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身受日本法西斯侵略的中国与西班牙人民是患难与共同痛相怜的。因此，中国的抗战，有学习西班牙人民抗战

经验的必要。”以杨为首的中国赴西班牙慰问参观团于10月14日上午10时半，杨与随行人员金励兹、樊雨农<sup>①</sup>、张铭鼎和晋增方由法国南部的图卢兹城乘法机飞抵西班牙人民政府临时所在地巴伦西亚市。西班牙国防部三位官员前往机场迎接，然后塔乘国防部专车前往海边航空军官俱乐部下榻。

14日下午5时，受到西班牙学生联合会盛会欢迎，当杨及其随行人员走进会场时，学生代表全体起立，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杨说西班牙人民反侵略战争的胜利，就是中国人民的胜利；反过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也是西班牙人民的胜利。因为中国和西班牙具有共同的敌人，中西两国人民应该携起手来向共同的敌人进攻。最后的胜利必将属于正义，属于人民。

15日和16日，杨及随行人员先后前往军械厂、通讯技术局、战时交通局、军官学校、青年战备训练团、红色救济会等单位参观访问。16日夜，在西班牙人民阵线的保卫人员护送下，由巴伦西亚出发，几经周折，于17日晨到达马德里。会见了西班牙人民阵线前线总指挥米亚哈将军。杨代表中国人民对西班牙人民和西班牙人民阵线所领导的反德意法西斯战争表示坚决的支持，并献上一面锦旗，上题：“同为民族独立、民主、和平而斗争！”18日晨，在米哈亚将军的陪同下，杨及随行人员前往距马德里市中心50里的布隆内阵线第十师防守阵地参观。杨和坚守在战壕里的人民军战士一一亲切握手，并合影留念。这时敌机飞临上空，杨操起一支步枪，站在战壕中瞄准敌机连放三枪，敌机狼狈逃窜。之后，杨在战壕里发表了简短的讲话。大意是：“大将军英武善战，众士兵忠诚勇敢，有此长官，有此战士，打倒法西斯，西班牙人民是有希望的。中国的抗日军民决心向西班牙人民阵线的军民学习。西班牙人民万岁，中国万岁！”杨将军对米哈亚将军和他指挥下的人民军队非常钦佩，他18日在西班牙人民阵线广播电台的演说词中说：

我见到了西班牙人民阵线前线总指挥米哈亚将军，觉得他在军事倥偬的严重时刻，镇定如恒，确不失为大将军风度；我到马德里前线，见到在他率领下的士兵，一个个沉着应战，坚强勇敢。有此统率，有此战士，再加以融洽无间的军民的赤诚团结，我相信不仅马德里之围可解，而且最后胜利终必属于人民阵线。

19日凌晨4点钟，以杨为首的中国参观团全体成员在主人的引导下，乘坐汽车，去国际义勇军总部参观访问。从国际义勇军总部出来，马德里伤

<sup>①</sup> 樊雨农和杨夫人、拯中已于本月5日由美到英。

病医院一位牧师交给参观团一份名单，这是该院人员为表示同情中国抗战而发起的签名运动的部分签名，名单前面的启事上说：“马德里各医院的卫生人员，向中国同志们致以热烈的敬礼。他们到我们这里来，是代表和我们一样的为反对国际帝国主义与法西斯侵略而斗争的伟大的中国人民。西班牙人民和中国人民之间有深厚的战斗友谊。”

20日，参观团结束对马德里的访问，下午4时回到巴伦西亚。

中国赴西班牙参观团从马德里回到巴伦西亚后，发表了一封公开的《告西班牙青年书》，对西班牙广大青年在反法西斯斗争中所做出的努力给予很高的评价，最后要求中国和西班牙青年亲密地携起手来，向着一个目标前进。《告西班牙青年书》发表以后，迅速传遍了巴伦西亚市和整个的西班牙青年团组织及青年战备训练团。使西班牙青年受到很大的鼓舞。

21日晚10时，杨及随行人员从巴伦西亚乘火车前往西班牙西部地中海岸的最大海口城市——巴塞罗那，次日中午到达目的地，受到热烈的欢迎和接待。

23日参观巴塞罗那农业联合会和访问西班牙国际宣传委员会。当天晚上，中国参观团应邀发表无线电广播讲话。全文如下：

亲爱的西班牙战友们：

和平在远东亦如在西方同受威胁，日本帝国主义者飞机在南京上海各地进行轰炸，残酷程度不亚于意德法西斯在马德里之暴行。我们处在同受法西斯侵略的地位，有共同的利害，共同的敌人，并对挽救和平有共同的责任。我们来到西班牙，一则是英勇的西班牙战友们表示敬意，二则是学习宝贵的斗争经验。我们已到过马德里和巴伦西亚，我们看见前方战士英勇的献身精神与后方坚强的组织，以及民众自信力的高涨。我们相信西班牙共和政府一定能在最近的将来战胜法西斯。我们中国现虽在艰苦中奋斗，但以全国国民团结的力量，我们也深信不久便能赶走日本帝国主义，胜利一定属于我们，胜利一定属于为和平民主自由而奋斗的人民。西班牙万岁！卡塔隆万岁！中国万岁！世界和平万岁！

25日下午乘火车离开西班牙前往巴黎。28日，由巴黎取道马赛乘哲利波号轮启程回国。出发前，杨让金闽生、樊雨农两人先期东归，打个“前哨”。又给宋子文拍发一电，着重叙述他出国近五个月来的抗日宣传活动情况，并对宋的关怀和帮助表示深切感谢。同时还给蒋介石、于右任和孙蔚如各发出电报，述明归国行程。

11月2日午夜，船抵波赛港。3日晚8时到达苏伊士码头。7日下午1时到达吉布提。8日，行经亚丁湾，从广播中获悉德、意、日三国签订“反共协定”。杨认为德、意、日签订“反共协定”，将进一步造成对世界的威胁。因此，抗日的任务将更加繁重，抗日战争也将会延长。

14日，船到哥伦波，报载太原失守，西安被炸。21日上午6时，船抵西贡，受到华侨的热烈欢迎。22日，受到西贡华侨团体的联合游行欢迎，杨比较系统地讲了抗日战争问题。一位侨胞老人向杨诉说道：“当年发生九一八事变，我们的政府不抵抗，把军队撤入关内。那时一个印度商人问我，你们中国文化悠久、地大人多，这样好，那样好，为什么这次不打日本人？不把敌人赶走呢？杨将军，你们长年待在国内，哪能体会到我们侨民的处境啊！”听到这里，杨感动地流出眼泪。他用手拍着老人的肩膀，发誓似的说：“老伯，以后再看吧！”

24日晚，金闽生由国内来电说：樊雨农于23日赴陕。他24日飞汉转京。蒋介石派陈质平参议来港迎接杨将军。

26日下午1时，轮船到达香港，上岸后，即被国民党特务跟踪监视、囚禁。1949年9月6日，在重庆“中美合作所”惨遭杀害。

## 第三章 陕甘宁边区

### 第一节 概 况

陕甘宁边区是中共中央到达陕北以后，在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基础上扩大、巩固和发展起来的。从1935年10月到1948年3月的13年中，它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是全国革命的指挥中心，是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总后方，为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伟大贡献。这13年间，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陕甘宁边区根据不同历史阶段，制定的对外政策如下。

#### 一、坚持抗日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政府将对中国的军事进攻和外交攻势紧密结合，妄图吞并全中国。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悍然发动卢沟桥事变，全国性的抗日战争爆发。当时，日本妄想实现其“速战速决”的战略以“取得闪电式的胜利”，竭力玩弄所谓“善邻友好”、“共存共荣”的欺骗外交手腕。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德国和意大利支持并配合日本侵华，从而形成柏林—罗马—东京的法西斯侵略轴心；苏联等各国爱好和平的人民坚决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英、美等国基于自身的在华利益，既有赞助中国抗战的一面，又有向日本妥协的一面。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和纷纭复杂的国际形势，中共中央本着抗战到底的原则，在卢沟桥变变的第二天，向全国发表了号召抗战的宣言。7月23日，毛泽东就指出：“抗日的外交，不能给日本帝国主义者以任何利益和便利，相反，没收其财产，废除其债权，肃清其走狗，驱除其侦探。立刻和苏联订立军事政治同盟，紧密地联合这个最可靠最有力最能够帮助中国抗日的国家。争取英、美、法同情我们抗日，在不丧失领土主权的条件下争取他们的援助。战胜日寇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但外援是不可少的，孤立政策



是有利于敌人的。”<sup>①</sup>这一段话不但提出了自力更生的原则，而且规定了对待日本、苏联和英美三种不同力量的态度和政策。1937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又发表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确定了争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具体道路。十大纲领中除第一项规定坚决抗日政策外，第五项又规定抗日的外交政策：“在不丧失领土主权的范围内，和一切反对日本侵略主义的国家订立反侵略的同盟及抗日的军事互助协定。拥护国际和平阵线，反对德日意侵略阵线。联合朝鲜和日本国内的工农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sup>②</sup>中共的这种抗日外交政策与国民党的外交政策有着很大的不同。正如毛泽东所指出：

我们在外交政策上，是和国民党有区别的。在国民党是所谓‘敌人只有一个，其他皆是朋友’，表面上把日本以外的国家一律平等看待，实际上是亲英亲美。我们则应加以区别，第一是苏联和资本主义各国的区别，第二是英美和德意的区别，第三是英美的人民同英美的帝国主义政府的区别，第四是英美政策在远东慕尼黑时期和在目前时期的区别。在这些区别上建立我们的政策。我们的根本方针和国民党相反，是在坚持独立战争和自力更生的原则下尽可能地利用外援，而不是如同国民党那样放弃独立战争和自力更生去依赖外援，或投靠任何帝国主义的集团。<sup>③</sup>

在抗日的对外政策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抗日的反侵略斗争。1938年2月，太原失陷，日军大举南下。3月，驻汾阳至离石公路线的日军向边区河防（指晋陕间以黄河为界长约千余华里的防线）发动进攻。边区政府率领边区军民积极进行保卫河防的战斗，尽管当时边区的兵力薄弱，但由于适时地采取积极防御方针，即以主动、灵活、机动的游击性运动战配合正面采取“半渡而击”战术手段的阵地战，先后经过大小78次战斗，坚决而巧妙地打退了日军23次进攻，取得了保卫河防战的辉煌胜利。其中神府、宋家川、凉水崖、马头关、碛口河防战最为著名。

中国共产党在贯彻执行抗日的外交政策的同时，始终把反对国内、国外的投降主义放在重要的地位。1939年6月，毛泽东发表了《反对投降活动》一文，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坚持抗战，反对任何投降、妥协的阴谋。他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303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313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740页。

说：

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根本方针是决不会变的。武汉失陷后日本的甜言蜜语……乃是诱鱼上钩取而烹之的阴谋政策……国际投降主义者……纵容日本侵略中国，自己‘坐山观虎斗’，以待时机一到，就策动所谓太平洋调停会议，藉收渔人之利。

他严正指出：“我们坚决地斥责那些认为太平洋会议并非东方慕尼黑的无稽之谈。所谓太平洋会议，就是东方慕尼黑，就是准备把中国变成捷克。”<sup>①</sup>7月7日，中共中央发表纪念抗战二周年的宣言，进一步有力地揭露了日本的诱降政策和英、美的东方慕尼黑活动以及蒋介石的妥协投降活动。宣言提出：

一则日寇政治诱降的恶毒阴谋，二则中国投降妥协分子之投降与分裂的罪恶，三则国际东方慕尼黑的暗中酝酿，三者汇合，便造成今日抗战形势中的两种最大危险，即中途妥协与内部分裂的危险。

宣言分别就日寇诱降政策、英美帝国主义东方慕尼黑活动和蒋介石集团的投降活动作了精辟的论述之后指出：“今日而与日寇言和平，就是屈膝投降，中途妥协，就是亡国灭种。……东方慕尼黑即使与西方慕尼黑有形式之不同，而其实质亦将毫无二致。”为了反对国内妥协投降的阴谋活动，保证抗战的最后胜利，宣言最后提出三大号召：坚持抗战——反对妥协；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sup>②</sup>。

由于中共中央坚持正确的外交政策，加之抗战初期国共两党能较好合作，因而进入陕甘宁边区的中外人士日渐增多。为了适应这一新形势，中共中央分别在西安、武汉、重庆、长沙、桂林等地设立了八路军办事处，以加强陕甘宁边区与国内外的广泛联系。

随着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斗争日益高涨，一批又一批富有正义感的各国朋友，纷纷奔赴延安和各解放区，或考察访问或与抗日军民并肩战斗。1936年6月，美国新闻记者埃德加·斯诺由北平（今北京）出发，经西安转赴陕北采访，成为进入陕北苏区访问的第一位外国记者。此后，外国记者、作家奔赴延安和陕甘宁边区采访者不断，他们真实地报道了革命根据地的情况，使世界各国的人们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有了真正的了解，

<sup>①</sup>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537页

<sup>②</sup> 《新中华报》1939年7月7日。

同时也看到了中国的希望所在，从而纷纷伸出援助之手。

1937年7月29日，美国共产党机关报《工人日报》社论大声疾呼声援中国人民，要求“停止给予日本之一切军械与战争供应品的运载……同时中国人民应该得到美国人民之各种形式的可能帮助。”社论指出：“中国的胜利就是世界自由与和平的胜利”<sup>①</sup>。8月21日，英共中央委员会发表宣言指出：“世界其他国家的和平大有赖于中国人民英勇斗争的胜利，保卫中国就是保卫世界和平。”<sup>②</sup>号召英国工人阶级援助中国保卫远东和平。8月18日，法共机关报《人道报》发表社论，号召援助中国人民<sup>③</sup>。日本共产党也发表反战纲领，要求立即停止对中国的战争<sup>④</sup>。与此同时，欧美各国人民纷纷成立援华团体、协会，举行示威游行，罢工罢运，捐款捐药。美国工人联合会组成“救护中国难民委员会”，募捐了数以万计的美元，开展拒运日货和抵制日货运动。英国伦敦市长发起组织“援华委员会”。意大利、西班牙、印度等国共产党分别以通电、宣言、派遣医疗队等形式，支援中国人民抗日的正义斗争。1938年9月，《共产国际的决定与声明》指出：“中国民族的解放战争，是世界无产阶级及整个先进人类反对野蛮法西斯主义暴力的总斗争中之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号召国际无产阶级和共产国际各支部及一切热诚拥护民主与和平的人士，要用一切方法，加紧进行国际的援华工作，要“加强募捐帮助中国，派遣医药救护队来华”。要以集会、游行、示威、抵制日货等多种形式在各国广泛地开展抗日活动。在共产国际的号召和组织下，掀起了广泛的国际援华运动。1938年10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为此特向各国共产党和人民致电表示感谢，并呼吁各国人民进一步提供援助。通话说：

抗战以来，我们已经得到广大国际人士与各国兄弟党的同情与援助……但是我们的斗争是长期艰苦的事业，日本帝国主义至今尚未遭受国际有力的反对与制裁……因此我们竭诚地向我们兄弟党呼吁：用一切可能的办法督促你们的政府……对日本帝国主义采取一切有效的制裁，要求你们的政府停止一切军火、物资、财富的对日输出……<sup>⑤</sup>

总而言之，中共中央本着抗战到底的原则，把自力更生和争取外援辩证地统一起来，把国内抗日统一战线和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结合起来，创造

①②③ 《解放》周刊，第23期，1937年11月13日。

④ 《解放》周刊，第21期，1937年10月30日。

⑤ 《解放》周刊，第57期，1938年11月25日。

性地开展了抗日的外事活动。

## 二、对外开放

在奉行反对投降、坚持抗日的对外政策的同时，陕甘宁边区政府认真实行对外开放政策。1939年2月1日通过的《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第六条明确规定：

在不损害边区主权的原則下，保护一切同情中国抗战国家的人民、工商业者、教民，在边区生产、经营与文化事业方面的活动。

1941年5月1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公布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该纲领又进一步指出：

在尊重中国主权与遵守政府法令的原则下，允许任何外国人到边区游历、参加抗日工作，或在边区进行实业、文化与宗教活动。其有因革命行动被外国政府压迫而来边区者，不问其是宗主国人民或殖民地人民，边区政府当一律予以恳切的保护。

同时亦“欢迎海外华侨来边区求学，参加抗日工作，或兴办实业。”

在接待来宾方面，边区的具体做法如下：

第一，来去自由。中共中央为延安交际处规定了“来则欢迎，去则欢送，再来再欢迎”<sup>①</sup>的来去自由的政策。为了贯彻这一精神，边区交际处取消以前下发的“来宾证”，根据客人要求，无论什么地方（包括监狱）都可开放供其参观。

第二，实事求是。对待来宾的宣传工作，要实事求是地宣传中共的政策，宣传抗日根据地军民战斗胜利的成绩并解答他们提出的问题。在“组织他们参观考察时，要尽力让他们对我们有全面的了解，要让他们看我们工作中的优点和成绩，也可让他们看看我们实际工作中的某些弱点甚至错误”<sup>②</sup>。

第三，关心尊重。《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指出：“凡来到边区的外国人不仅得到政府的尊重和保护，而且还享有各种工作上的便利。”<sup>③</sup>比如，1941年11月6日，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在延安召开，在193名议员中被选入和聘请的外籍友人，有印度巴苏华、日本森建、朝鲜武亭和华侨梁

① 金城：《延安交际处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年版，第158页。

② 金城：《延安交际处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年版，第6页。

③ 见1941年5月1日《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

金生、李介夫等。

第四，生活优待。在边区的外国朋友和华侨在生活上得到边区政府的特殊照顾。1942年，边区政府把干部职工的生活标准划分为多种类型。第一类即为国际友人和国内少数民族，在延安的日本人、朝鲜人、蒙古人、回民等均列入此类。他们享有特殊的优待，在战时困难的情况下，每人每月供给大米15斤、面粉15斤、肉类30斤、蔬菜30斤及油、盐、炭等。许多专家还有指定的管理员、炊事员、勤务员、翻译和中文教员。对外宾客每人每月供给细粮36斤、猪肉15斤、清油4斤、猪油1斤、粉条2斤、鸡蛋30个、鸡3只、豆腐5斤等，杂支每人每月边币50万元。

由于边区政府切实执行对外开放政策，赢得了国内外朋友的赞赏，要求到延安和边区来参观、采访和工作的国内外朋友越来越多，从1938年至1941年，交际处就接待中外来客7000余人。如1941年10月27日—31日，在延安大礼堂召开的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会，就有来自日本、印度、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缅甸、泰国、越南、朝鲜等国的代表参加。

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武装力量，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1944年6月9日，由国内外各大报刊著名记者组成的中外记者参观团到延安。7月22日和8月7日美国第一个官方代表团——美军观察组分两批到延安。综合这种情况，中共中央于8月18日，特做外交工作指示如下：

(一) 这次外国记者美军人员来我边区及敌后根据地，便是对我新民主中国有初步认识后的实际接触的开始。因此，我们不应把他们的访问和观察当做普通行动，而应把这看做是我们在国际间统一战线的开展，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但须指明，这种外交现在还是半独立性的外交。因为一方面重庆国民政府还是中国人（我们在内）及同盟国所承认的中央政府，许多外交来往还须经过它的承认。但另一方面，国民党是不愿意我们单独进行外交活动的，我们与同盟国家只有冲破国民党种种禁令和约束，才能便于我们外交来往和取得国际直接援助，所以我们的外交，又已经是半独立性的。同时还须指明，外交工作正是我们工作中所最不熟悉的另一方面，我党同志首先是高级领导同志，应该对于这项工作开始予以注意予以学习。如果大家承认八年来国内统战政策，曾经给我们以极大的发展，那么，今后国际统战政策，将可能给我们以更大的发展。而且如果国际统战政策能够做到成功，则中国革命的胜利，将必增加许多便利，这是可断言的。

(二) 国际统一战线的中心内容，是共同抗日与民主合作，这不仅在抗战中有此需要，即在战后也有此可能，就国家言，美苏英与中国关系最大，而在目前美英与中国共同抗日，尤以美为最密，美军人员来我边区及敌后根据地的理由，为有对敌侦察和救护行动之需要，准此可争取其逐渐扩张到对敌作战方面的合作和援助，有了军事合作的基础，随后文化合作，随后政治与经济合作就有可能实现。但目前不应希望过高，目前美英苏外交的重心仍是放在国民党方面，且就英美内部言，也有进步、中间、顽固三种势力存在，即在英政府中亦复如此，而英又较美为差。故我们对其政府及其来往人员不应看成一模一样，而应有所研究和分析，因之在国内统战中的策略原则，一般的也适用于国际统战。不过在目前且因外交原因，凡愿与我们来往的英美人士及其军事人员，顽固保守分子总还占少数，且其顽固又常常是只反对其国内共产党，而不反对我们者，故其情形又与国内顽固分子有别。因之我们外交工作中心，应放在扩大我们影响，争取国际合作上面。即遇顽固分子仍应诚恳说服给以好的影响。这次记者团中有一个天主教神甫本来对我成见颇深，但经我们争取，他即表示好感，拒绝国民党利用他反共的要求。

(三) 国际统战政策，在目前最主要的应是外交政策，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第二十一条是我们党外交政策的总纲。目前实施原则，军事上，是在取得我们同意和遵守政府法令的条件下，同盟国的军事人员及其武装力量，可进入我们地区，执行共同抗敌的一切工作，并取得我们协助，同时我们也欢迎盟国给我军以军火物资药品和技术上的援助。政治上，我们欢迎同盟国在我边区及主要抗日根据地派遣外交使节，或设外交机关。文化宣传上，我们欢迎与盟国文化合作，欢迎盟国通讯社或其政府新闻处在延安设立分社，或派遣特约通讯员及记者来延，并给以至各地访问之便利。通讯的电信，政府在原则上不放弃检查权，但在实际执行时，凡非泄露军机造谣生事破坏政府者，我们概予放行，不予检扣，以示与国民党区别。对敌军民宣传，我们欢迎盟国合作并交换经验。在宗教方面，我们实行政教分离，我们容许外国牧师神甫来边区及敌后根据地进行宗教活动，并发还其应得之教堂房产；同时这些神甫牧师亦须给我们以不反对政府不反对共产党领导之保证。在救济方面，我们欢迎美英加拿大等给我们以医药器材和金钱的救济，同时我们更要求国际善后总署必须算入和承认这拥有八千多万人口，而且遭敌蹂躏最甚的地方的救济。在经济方面，在双方有利原则下，我们欢迎国际投资与技术合作，我们首先要求国际工业合作委员会的继续合作。这一切，就是我们目前

外交政策的具体步骤。

(四) 为使我们的外交政策和活动不犯错误，首先必须站稳我们的民族立场，近百年的中国外交史，中国人在民族立场上曾有过两种错误观念。在义和团事变前，排外的观念占上风，其后惧外的观念占上风。“五四”到大革命，惧外观念虽曾一度被民族高潮冲淡，但国民党当政二十年，即在抗战时期，上层人士的惧外观念仍很浓厚，这不能不影响中国社会，故我们应一方面加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而不是排外，另一方面要学习人家长处，并善于与人家合作，但决不是惧外媚外。这就是正确的民族立场，也就是新民主主义中国的新人典型。这种新人典型，已经在敌后在边区广大军民中不断的成长，而且已为国际朋友所开始认识，我们新民主的中国人应该坚持着这样立场，不致有所偏颇。

(五) 在外交工作本身，我们目前应注意的是：(1) 一切争取主动，切勿陷于被动，更不应有求必应，而应有所取舍，或有所轻重，凡我所能而且愿意使外人知道和参加的事，可由我主动地有计划的加以布置，即使是我们的要求，我们也可使其自动的先向我们提出，例如军火援助，国民党天天向人家噪聒，要这样那样，我们则暂不提起，反而引起他们的尊敬，向我们先提，虽然目前因国民党反对事实上还难办到。各地见到盟国人员，不可一见面就问他要东西。(2) 我们执行政策，进行工作应坚定不移，事前应周知博访深思熟虑，但一经决定和宣布之后，便应力求贯彻主张，这样方易取得外交胜利，尤其是军事外交，更应肯定坚定。当然这是指原则性的问题，若在技术方面，则又应当极其灵活机动，不拘一格。(3) 关于文件材料及谈话内容，可告者应力求真实，不可告者应力求隐蔽，其有关国家机密及党内秘密者应拒绝答复和供给，其不便答复者应避而不谈，或设法推开。(4) 外交态度宜谨慎坦率，一方面勿失去警觉，另一方面勿吞吐支吾。(5) 招待方法要守时守信，朴素热烈，一方面切忌铺张，另一方面也不可冷淡。(6) 各地一切对外交涉和具体协商，统应电报中央批准后方得进行。

上述各项，凡有国际统战关系或外交工作的地方，均应向干部中传达，并进行讨论，以求一致遵守。<sup>①</sup>

<sup>①</sup> 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

### 三、独立自主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共两党由敌对的内战转变为合作抗日。国共关系的这一新变动既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又有利于世界人民对中国抗战的积极支援。共产国际和苏联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但是，共产国际和苏联对当时国共两党的力量作出了错误的估计。他们把拥有 300 万正规军的国民党看做是中国抗日的主力，而不相信中国共产党会成为中国抗日战争的领导者，不相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将发展成为抗日战争的主力，甚至企图限制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作用。在这一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坚持同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共投降倾向作坚决的斗争，另一方面不唯共产国际的旨意是从，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权不放。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远离各国实际斗争的共产国际”，它的指导在过去对中国革命“是适合的，现在就不适合了”<sup>①</sup>。中国共产党主要通过相信和依靠群众，亦即通过坚持争取群众的策略，使自己在共产国际活动中坚持了独立自主原则。周恩来同志在回顾上述情况时指出：“不错，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及其发展，是得到了共产国际不少的指导和帮助，但是中国共产党的靠山却不是共产国际，而是中国人民。”<sup>②</sup>

在与共产国际以外的其他国家或政党的交往中，中国共产党亦坚决奉行独立自主原则。凡是有利于中国抗日、有利于世界各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的言论或行动，中国共产党就表示赞赏与支持；反之，则与其进行毫不留情的斗争。在对待美国对国共两党的政策上就是如此。抗日战争爆发之后，美国政府曾帮助中国抗日，并在中国开展一些有利于反对德、日法西斯的正义行动，对此中国共产党表示真诚的欢迎并尽一切努力予以支持和配合。但对一切侵犯中国主权、破坏中国内部团结、损害中国人民和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的利益的言行则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中国的抗日战争，分为国民党战场和共产党领导的敌后解放区战场。起初美国政府大力支持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然国民党战场一再失利，而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却愈益显示出伟大的力量，两者形成鲜明的对比。客观现实

<sup>①</sup> 《毛泽东同志关于共产国际解散问题的报告》，载 1943 年 5 月 28 日《解放日报》。

<sup>②</sup> 周恩来：《在延安欢迎会上的演说》，《周恩来选集》上卷，第 139 页。



迫使美国政府不得不改变其对华政策。驻华美军司令、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批评国民政府“腐败、失职、混乱”。美国驻华大使高斯亦支持史迪威。罗斯福总统为了美国的利益，没有采取帮助国民党以武力进攻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以致引起蒋介石的极大不满。这样，美国政府与蒋介石的矛盾曾一度激化起来。

1944年9月6日，在蒋介石的要求下，反共的共和党人赫尔利被任命为美国总统私人代表来到中国。赫尔利一到中国，即与梅乐斯、陈纳德等人合伙排挤史迪威，并宣称其主要目标是防止国民政府的垮台并使中国军队继续战争<sup>①</sup>，“维护中国国民政府的巩固，拥护委员长是中国的领袖。”<sup>②</sup>10月赫尔利就任驻华大使，高斯辞职。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又派魏德迈来华，代替史迪威的职务。而“罗斯福这时对中国事务的主要兴趣已改变为缔结一项国共协定……以免损害他的战后计划”<sup>③</sup>，为此，他指使赫尔利促成一个“使这两个敌对集团更接近于达成协议与合作的结果。”<sup>④</sup>赫尔利尽管开始与国共双方接触，但其目的则在于使中国一切力量都“从属于国民党政权”<sup>⑤</sup>。面对这种情况，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对美国的“扶蒋反共”政策进行坚决而适当的斗争；另一方面，尽可能同美国政府改善关系。1944年10月，赫尔利与中共代表林伯渠、董必武进行了三次会谈，表示他正试图解决国共关系，并说，蒋介石如果同意，他便去延安与毛泽东商谈<sup>⑥</sup>。11月7日，赫尔利飞抵延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同他进行了多次会谈。毛泽东提出了国共两党通力合作，打败日本<sup>⑦</sup>，赫尔利表示赞成。11月10日，双方签署了五点协议草案。当天，周恩来偕赫尔利由延安到达重庆，继续同国民党进行谈判。但由于蒋介石对五点协议草案极为不满，赫尔利便撕毁协议。为此，毛泽东先后给新华社写了《赫尔利和蒋介石的双簧已经破产》、《评赫尔利政策的危险》等文章，尖锐地揭露了美国政府“扶蒋反共的阴谋。”

①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604页。

② 廖耀湘、杜建时：《我们所知道的关于美蒋勾结的内幕情况》，载《文史资料选辑》第29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0年版，第23页。

③ 罗伯特·达莱克著、伊伟等译《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711页。

④ 《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第712页。

⑤ 《美国十字军在中国》，郭济祖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90页。

⑥ 南方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编：《南方局党史资料——大记事》，重庆出版社，第250页。

⑦ 《南方局党史资料——大事记》，第253页。

在对待苏联政府对华政策的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也同样坚持既斗争又联合的对外方针。其具体表现是：一方面热烈欢迎苏联政府和人民对中国人民的革命与中国抗日战争的支持与援助，并把它作为国际援助的重要范例加以宣扬。相应，在反对德、日法西斯的总体战略上也给苏联政府和人民以积极的支持；另一方面，坚决反对轻视中国人民革命力量和有损于中国主权的民族利己主义。例如，1945年2月，苏、美、英三国首脑在苏联雅尔塔举行会议，签署了关于苏联对日作战的条件而有损中国主权的秘密协定，中共对此进行了适当的批判。

抗战胜利以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已经解决。然而，中国人民又面临着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继续坚持既斗争又联合的对外政策——联合一切反对国民党统治的进步力量，打击任何支持国民党统治的反动势力，尤其是同美国及其他帝国主义的“扶蒋反共”政策进行了毫不妥协的斗争。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1946年8月6日毛泽东在延安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谈话时提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

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根据当时尖锐复杂的斗争形势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抗日外交政策，从而成功地打破了封锁，扩大了影响，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支援，在对外交往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重大成就，同时也积累了丰富而重要的外交斗争的经验。

## 第二节 涉外机构

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和中国工农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驻西北办事处成立。该处为西北苏区的最高政权机关，内设7部1局，即财政部、粮食部、土地部、国民经济部、教育部、司法内务部、劳动部、工农检查局。为了加强对外联络，1936年1月26日增设外交部，下辖交际处，由西北办事处主席博古兼任外交部长（1937年2月24日，中共中央决定林伯渠主持西北办事处的全面工作，博古调任），秘书长伍修权兼任交际处长。

1937年9月6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驻西北办事处正式改名为陕甘特区政府，9月20日又改称陕甘宁边区政府，直属国民政府行政院。10月12日，国民政府行政院第三十三次会议通过决议（未正式公布），

承认边区政府，并任命行政长官。在这一时期，中共分别在西安、武汉、重庆、长沙、桂林、兰州、洛阳等地设立八路军办事处，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接待过往的八路军人员，也接待中外人士进出陕甘宁边区。后来，国民党对边区实行封锁，边区的对外活动困难，只好通过华北根据地的晋察冀、晋西北和秘密的地下交通以及空中联系。

1938年3月7日，边区政府秘书处撤销该处下的管理科，专设招待科，负责来延安中外来宾的接待工作，胡金魁任科长。4月15日，改招待科为交际科，金城任科长。1939年改交际科为交际处，金城任处长、周志杰任副处长。交际处分为：联络科，石锋任科长；招待科，金耐任科长；总务科，杜维（女）任科长。联络科和招待科“直接与客人接触，有机会陪同客人会见党政军负责同志，参观游览、参加群众大会、文艺晚会和宴会；而总务科干的是后勤”<sup>①</sup>。

边区外事工作在党的领导下，主要是做争取团结教育各方上层人士的工作，广交朋友，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1944年，中外记者参观团和美军观察组来延安，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强调外国记者、美军人员来延安，“是我们在国际间统一战线的开展，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为做好接待，党中央决定周恩来主管这一工作，中央秘书长杨尚昆直接领导交际处的政治、业务工作。

### 第三节 延安与共产国际

#### 一、交通路线和联系方式

1919年3月6日，共产国际在苏联莫斯科正式成立。1920年春，魏金斯基来华，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开始建立了联系。红军长征时联系中断，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又恢复了与共产国际的联系。

延安与共产国际和苏联的交通往来主要有三条路线：一条是从延安出发，沿咸榆公路抵西安，由西安乘火车到兰州，然后转赴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再由迪化前往莫斯科。这条路线路途遥远。邓发、王稼祥等即经由此路前往莫斯科。第二条是由延安出发，经榆林到内蒙古，再北行至乌兰巴

<sup>①</sup> 金城：《延安交际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年版，第314页。

托，然后抵达莫斯科。此路距离较短，但沿途要穿过浩瀚的沙漠，又须闯过层层关卡，很不安全。例如，在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中断联系以后，共产国际为了加紧恢复，“曾经从外蒙古派出一个代表团，装扮成商队，携带无线电设备，试图穿过沙漠进入中国，但在戈壁沙漠以南，被马家骑兵或者流亡的土匪歼灭了。”<sup>①</sup> 还有一条是从延安出发，经东北赴苏的路线，因九一八事变后东北被日军占领而中断。延安与共产国际之间的联系主要通过人员往来、电讯和信函等渠道进行。据《李立三传》记载：“一九三四年秋，在王明左倾错误政策的危害下，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中央红军开始战略大转移。由于在长征途中失落了密码，中断了中共中央同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一九三五年初春，共产国际派李立三、段子俊和一个搞无线电技术工作的波兰人，到我国新疆边境附近（境外）的阿拉木图，任务是建立一个交通站，负责国内方面来往人员的安排，了解新疆的政治情况，特别要设法建立同中共中央的电讯联系。李立三去后，经他安排回国的有吴诚等 20 多人。他还专门派二批人带上密电码经新疆回国寻找长征后的红军，但由于地理和技术的困难，都失败了。最后派刘长胜带上李立三亲自编写的一套新的更难以破译的密码回国。终于在一九三六年初夏，收到了中共中央按照李立三所订密码打来的电报，但是在莫斯科谁也翻译不出来。康生带着密码电报到高加索，找到在那里疗养的李立三，终于由他翻译出来。从此重新建立了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sup>②</sup> 在书信往来方面，如 1942 年 6 月 15 日，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曾就改善国共两党关系写信给毛泽东。<sup>③</sup> 随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共产国际的组织形式已不能适应新形势的要求，于 1943 年 6 月正式宣布解散。

## 二、共产国际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1936 年 12 月 12 日西安事变爆发以后，中共中央立即给共产国际发出“万万火急”的电报，汇报了这一事变的情况、性质和中国共产党和平处理事变的安排及打算。从 12 月 14 日起，苏联《真理报》、《消息报》等报刊和

<sup>①</sup> [美] 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著、过家鼎等译：《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解放军出版社 1986 年 5 月版，第 366 页。

<sup>②</sup> 唐纯良著：《李立三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4 年 10 月版，第 115 页。

<sup>③</sup> 见马贵凡译：《季米特洛夫给毛泽东的信（1942 年 6 月 15 日）》，载《中共党史研究》1988 年第 3 期。

共产国际刊物《国际新闻通讯》连篇累牍地刊出报道和评论文章，对“西安事变”的性质作了完全错误的分析，并对张学良和杨虎城进行无理指责和谩骂。如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的社论指出：“毫无疑问，张学良部队举行兵变的原因，应当从不惜利用一切手段帮助日本帝国主义推行奴役中国的事业的那些亲日分子阴谋活动中去寻找。臭名昭著的日本走狗汪精卫的名字同陕西省发生的张学良兵变紧密相连，这也绝非偶然。”<sup>①</sup>显然，这种把西安事变说成是中国亲日分子的一个阴谋是完全错误的。

12月16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在经过几天沉默之后，给中共中央发来由季米特洛夫签发的电报。但因电码差错无法译出，中共中央只好要求共产国际重发这封电报。12月17日，周恩来一行到达西安与张学良举行会谈，彼此就有关军事方面的问题商定以后，在如何处置蒋介石的问题上，周恩来认为：在蒋介石同意联共抗日的前提下释放他，有利于结束内战、推动抗日。12月18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中央，呼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提出召集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等主张。

12月20日，中共中央终于再次收到并译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曾于16日发出过的电报。电文说：“作为对你们来电的答复，我们建议采取以下立场：（一）张学良的行动，不管出自何种动机，客观上只能有损于中国人民抗日统一战线力量的团结，并鼓励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二）既然这个事变已经发生，中国共产党必须考虑到现实情况并坚决主张在以下基础上和平解决事变：（1）改组政府，吸收抗日运动的若干代表和拥护中国领土完整与独立的人士参加政府；（2）保障中国人民的民主权利；（3）停止消灭红军的政策并在反对日本侵略的斗争中与红军实行合作；（4）和那些支持中国人民从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下获得解放的国家实行合作。最后，我们建议不要提出与苏联联盟的口号。”<sup>②</sup>尽管共产国际的来电在对西安事变的评价方面与中国共产党存在一定的区别，但在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上却与中国共产党基本一致。即就是苏联《真理报》、《消息报》等其他报刊发表的社论和文章，不管其侧重点有何不同，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立场却是相同的。

12月21日，中共中央电复共产国际：“来电于二十日才收到，同意你

<sup>①</sup> 见《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第2辑。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556、557页。

<sup>②</sup> 王进、王学敏译：《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必要性给中共中央的电报》，见《教学与研究》1988年第1期。

们的意见，我们也基本上采取了这种方针。”<sup>①</sup>

### 三、人员交流

#### (一)

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德国人。1932年被共产国际派来中国，在临时中央主要负责人博古的支持下，掌握了中央军事指挥大权，并直接参与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军事指挥，推行一整套错误的战略战术方针，因而对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丧失负有不可推卸的重大责任。1935年1月，在遵义会议上，他的错误受到批判<sup>②</sup>，并被撤销了军事顾问的职务。1935年10月19日，李德随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吴起镇。10月下旬随中央机关进驻瓦窑堡，开始参与红军参谋部的一些工作（主要是在红军学校工作）。12月27日，李德参加在瓦窑堡召开的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对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持反对态度。

1936年1月，李德列席中央军委会议，反对会议经过讨论所作出的东征的战略方针，受到毛泽东等人的批评。1月27日，当红军主力即将东征之时，李德上书中央，企图阻止红军东征抗日。5月初，在东征回师之后，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李德被邀列席。会上，他就阻止东征一事作了自我检讨。此后，李德一直在红军大学工作，并负责协助建立和训练一个红军骑兵团的工作。5月末6月初，他随中央机关从瓦窑堡迁居保安。6月至10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访问陕北期间，曾同李德长谈。李德向斯诺承认，西方的作战方法在中国不一定总是行得通。

1937年1月，李德随中央机关从保安迁到延安居住。但仍在军事学院任教，讲授战术课。后任军事研究委员会委员兼编委会主任。七七事变后，中日战争全面爆发，李德不同意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和在华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方针，而认为有可能也有必要在蒋介石领导下稳定国内战线，接受外国援助以实行抗战。11月，李德参加了在延安举行的一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李德认为毛泽东所强调的“扩大和巩固民族统

<sup>①</sup> 丁雍年：《关于我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问题》，《党史研究资料》第4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23页。

<sup>②</sup> 见《关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若干问题的调查报告》（1983年2月），《中共党史资料》第6辑。

一战线，防止一切可能削弱以致分裂国共两党统一战线的行动，只不过是一种骗局，一种煽动。”<sup>①</sup> 所以不同意这个报告的内容。12月，李德主动同刚从苏联回国的王明接触，李德曾回忆说，和王明“谈话很随便；和张浩以及其他从莫斯科回来的中央委员不同，他们都回避我”。李德向王明提出回苏联的请求，但王明再三劝告李德不要坚持回苏联，并说：在苏联等待你的不是什么好事情，你必须估计到可能被流放，甚至被枪杀。鉴于此，李德不再坚持要回苏联。

1938年10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会议在总结一年多来抗战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并批判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思想。李德没有被邀参加会议，但他在想方设法了解到一点会议内容之后，便根据“零碎细节”攻击毛泽东的报告“完全是一种毫不隐晦的民族主义的调子”，而认为王明的讲话既“符合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本原则”，又与苏联支持中国抗日“原则的精神”相一致<sup>②</sup>。

1939年秋，共产国际下达召回李德的命令。不久，适逢周恩来赴苏联治伤，李德一同乘机返苏。同机去苏联的还有邓颖超、毛泽民等。李德回到苏联后，在卫国战争及战后一段时间，一直在苏联工作。1949年回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60年代中苏论战时，李德曾发表了一系列反华文章，1974年病逝。

李德返苏后1942年5月11日，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兼塔斯社记者彼得·弗拉基米洛夫来到延安。同来的还有奥尔洛夫医生和无线电报务员里马尔。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期间，总是根据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基本战略原则，经常批评中国共产党对蒋介石过分警惕，并片面地强调同国民党团结，不强调同国民党的反动倾向作斗争。

## (二)

1931年1月7日，在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的直接干预下，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六届四中全会。全会以批判三中全会的所谓对于“立三路线”的“调和主义”为宗旨，强行“改造”党的领导机构。原来不是中央委员的王明当了政治局委员，同年2月又升为政治局常委，开始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领导机关内长达四年的统治。

1931年11月7日，王明到达莫斯科，被任命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

<sup>①②</sup> 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1932—1939》，1980年中计本，第301、321页。

团长、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主席团委员、政治书记处书记。王明到达莫斯科后，打着反对立三路线的旗号，宣扬他所推行的比立三路线更“左”的路线和政策，并为其在白区的左倾错误作辩解。1932年9月2日上午，共产国际执委第十二次全会第十次会议召开，王明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sup>①</sup>，主要讲述了国民党的迅速崩溃和苏维埃及红军的巨大胜利，强调中国革命胜利条件已经成熟，并借以夸耀四中全会以后苏区的革命成绩。9月3日晚上，共产国际执委第十二次全会第十三次会议上，王明被破格提拔担任大会执行主席，主持这次会议的召开。这是中共代表在共产国际会议上担任主席的第一次，充分表明共产国际对王明的信任与支持。

1933年初，中共临时中央由上海迁至江西瑞金，康生继续留在上海局工作，但他因惧怕在上海工作的艰危，经中共临时中央同意前往莫斯科任中共代表。康生到达莫斯科以后，紧紧追随王明，加强了王明对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和中共中央的控制。

1935年7月25日，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召开。这是共产国际历史上最后一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有王明、康生、周和生（高自立）、吴玉章、张浩（林育英）、孔原、李光（滕代远）、梁朴、欧阳生、宋一平、赵毅敏等人。其中王明、康生、周和生三人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孔原为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成员。周和生代表中共中央和中国红军向大会致贺词<sup>②</sup>。

1937年11月，王明、康生遵照共产国际指示回国。行前，斯大林接见了王明和康生。当时，王稼祥刚由陕北赴苏医治弹伤，斯大林亦请王稼祥参加接见。当斯大林问及中国共产党的人数和红军情况时，王稼祥说：“到达陕北的只有3万人左右。王明急忙插嘴说：还有30万人。康生亦趁机支持王明。斯大林指出：“重要的是红军每个战士都是真正的战斗员而不是光吃粮食的。”当谈到国共统一战线时，斯大林说：“不要害怕共产党人会淹没在民族解放的汪洋大海中，共产党人应该积极地参加到民族解放斗争中去。”<sup>③</sup>

11月14日，王明、康生离开莫斯科。11月下旬到达迪化（今新疆乌鲁木齐）。11月27日飞抵延安。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十二月会议，王

<sup>①</sup> 见《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会（速记记录）》第1卷，第144—157页。

<sup>②</sup> 载苏联《真理报》1935年7月26日第1版。

<sup>③</sup> 见王稼祥遗作：《回忆毛泽东同志与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载《人民日报》1979年12月27日。



明、康生以国际代表资格出席会议。王明以两个半天的时间作了《如何继续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张闻天、毛泽东也作了发言。王明的报告标志着抗战初期王明新投降主义的出现。

张浩,原名林育英,字祚培。1897年2月25日出生在湖北省黄冈县林家染铺湾一个手工染织工人家庭。1922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二七”惨案以后,与陈潭秋、林育南、李求实等人转战于长沙、安源、上海等地。1930年初,以特派员身份赴东北指导工作。

1933年,张浩化名李复之前往莫斯科担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和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当时,德、意、日法西斯分子相继上台,国际形势日益恶化。1935年7月至8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决定建立世界反法西斯人民阵线。张浩和吴玉章、王明等出席了这次大会,参与了制定这一策略路线的历史性活动。自1934年10月红一方面军开始长征以后,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失去联系。为了传达共产国际“七大”精神,恢复与中共中央的联系,共产国际决定由中共代表团派人回国。经过组织上的慎重考虑,决定派张浩回国执行这一任务。“张浩”这一化名就是在这时取的<sup>①</sup>。经过半个多月的准备,张浩把“七大”主要文件精神 and 共产国际对中共中央的指示铭记心中。然后装扮成商人取道蒙古回国。一路上,他忍饥挨饿、风餐露宿,历尽千难万险,于1935年11月到达陕北定边。接着又前往瓦窑堡,向中共中央原原本本地传达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精神。

张浩回到延安以后,根据党中央的决定,以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的有利条件,出面做张国焘的工作。张国焘在长征途中,曾擅自率部南下,成立伪中央,搞分裂活动。张浩接受任务后,“源源不断地打电报给四方面军,批评张国焘分裂党的错误,要求他接受共产国际的意见,北上和中央会合。”<sup>②</sup>经过张浩坚持不懈的努力和仁至义尽的帮助,张国焘不得不表示接受共产国际的意见,取消伪中央,成立西南局。后又被迫同意北上。

邓发,学名邓元钊,1925年省港大罢工时改名邓发。1906年3月7日出生于广东省云浮县城西石塘村。1922年参加香港海员大罢工。1925年以罢工工人代表身份参加省港大罢工。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邓发任临时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粮食部部长。

<sup>①②</sup> 王鹤寿等:《忠心为国,虽死犹荣——怀念张浩同志》,载《人民日报》1982年3月10日。

1936年6月，邓发受中央委托赴苏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他在西安候车去兰州时，会见了即将去延安访问的美国记者斯诺。随后，邓发化装成国民党官员乘火车到达兰州，转赴新疆。当时，由于新疆省主席盛世才禁止内地与新疆往来，要进入新疆十分困难。为了沿途顺利，邓发有意识地结识了一个将要前往新疆演出的戏班，并取得老板的信任。然后与戏班一起到达新疆迪化。在新疆，他又几经周折，方与苏联领事馆取得联系，转赴莫斯科。邓发在莫斯科不仅参加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的工作，还刻苦学习和研究马、恩、列、斯的革命理论，并到列宁大学讲授《中国工人运动》、《中国现代史》等课程，还时常去工人夜校讲演。

1937年秋冬，邓发奉组织命令，由莫斯科回国，到新疆迪化，化名方林，继陈云之后任中国共产党驻新疆代表，第十八集团军驻新疆办事处主任，主管党在新疆的工作。

1939年冬，邓发接中央指示返回延安，不久任中央党校校长。1945年9月11日，邓发作为中国劳动协会代表团成员，肩负党和解放区80万职工的重托，乘飞机前往重庆转赴巴黎，参加世界职工代表大会。9月25日至10月上旬，世界职工代表大会胜利召开。邓发代表中国劳动协会在会上作了发言。他说：中国人民还没有独立，中国的职工应该促成全国工人阶级团结。他代表中国工人阶级提出了八项主张。在巴黎期间，邓发广泛地宣传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所制定的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新中国的路线和党的“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他在归国途中，又访问了瑞士、意大利、埃及、印度、菲律宾等国。

任弼时，原名二南，学名培国，湖南湘阴县（今汨罗县）人。1921年曾与刘少奇、蒋光赤、曹靖华、萧劲光等前往苏俄学习，并在莫斯科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1924年秋离苏回国。

1938年2月，任弼时从抗日前线回到延安，向党中央汇报工作。不久，受党中央派遣，前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中国共产党的工作情况，以清除王明右倾机会主义在国际所形成的影响。到达莫斯科后，任弼时担任了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负责人。

抗日战争爆发后，王明从莫斯科回到延安，由极左跳到极右，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口号。当时中国共产党已经认识到王明这种机会主义的错误，并能够加以抵制和斗争。但由于共产国际的有些领导人，不甚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还是相信王明的那一套，并把王

明奉为中国革命的领袖。为了改变这种错误的印象，任弼时到莫斯科后，立即写了一个报告，向共产国际介绍中国革命的真实情况。他在报告中强调指出，毛泽东最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只有毛泽东才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他还运用大量事实充分证实这一点。正是由于任弼时的这一有理有据又富有说服力的报告，才使得共产国际的许多同志真实地了解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情况<sup>①</sup>。为了使更多的兄弟党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情况，任弼时除应邀到各国代表团作报告外，还及时把当时在苏联学习的一部分中共干部找来，分别派到各国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去介绍国内情况。

由于任弼时同稍后到苏联治伤的周恩来一起，向共产国际作了大量的说明，从而使共产国际的一些主要负责人转变了对中国党内情况的看法。1940年初，任弼时又请周恩来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上作了一个详细的报告，着重阐述了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任弼时在工作之余，为《共产国际》、《真理报》、《红星报》撰写文章，介绍和宣传中国革命的经验。他常说：“宣传工作，是我们每个同志的光荣任务，这是党的一项重要工作，是革命不可少的工作，我们一定要做好。”<sup>②</sup>在苏联期间，任弼时还十分重视翻译党的重要文献和毛泽东的著作，先后译出《论持久战》和《新民主主义论》，将其印成外文单行本，在莫斯科等地发行。其他如周恩来、朱德、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等人的文章，也均选择向国外推荐。与此同时，任弼时还很重视向国内介绍苏联党和其他兄弟党的经验。他亲自领导了《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一书的翻译工作。他对翻译工作要求很严，凡是参加翻译的同志，首先必须正确领会书的原意；翻译时在文字上要反复推敲，再三修改；翻译后，又将译稿寄给国内和发给在苏联学习的同志征求意见。他自己对全书认真审阅和校订，还亲自重译了第四章关于哲学理论的部分<sup>③</sup>。

1940年3月，任弼时从莫斯科回到延安，参加中央书记处工作。同年七八月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秘书长，负责党中央书记处的常务工作，并主管中央组织部、西北局和工青妇的工作。从此成为中共中央的核心领导成员之一。

1936年底，王稼祥从新疆去苏联治疗弹伤，1937年初到达莫斯科。王

① 1978年11月师哲的回忆。

②③ 1978年1月方志纯的回忆，1978年11月师哲的回忆。

明、康生回国以后，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第一书记季米特洛夫让王稼祥留共产国际工作，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1938年4月14日，到达莫斯科不久的任弼时代表中央向共产国际主席团提出题为《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与任务》的报告大纲。接着，共产国际主席团根据任弼时的报告大纲举行会议，并进行讨论。任弼时和王稼祥均参加了会议。王稼祥在会上作了发言，指出中国第二次统一战线和第一次统一战线的区别。会议同意任弼时的报告和王稼祥的发言。

1938年6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通过关于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案，其主要内容是肯定中国共产党政治路线的正确性。与此同时，共产国际主席团又在组织上作出关于支持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领袖的决策。

此后不久，王稼祥携带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中共代表（即任弼时）报告决议案和共产国际从组织上支持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领袖的重要文件，离开莫斯科经新疆返延安。毛泽东指定王稼祥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传达共产国际文件。这次会议批判了王明新投降主义，基本上结束了抗日战争初期的王明新投降主义错误。

## 第四节 外国记者、作家访延安

### 一、斯诺

美国著名作家、记者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1905年生于美国密苏里州堪萨斯城。1928年毕业于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同年6月到中国上海。曾担任《密勒氏评论报》助理编辑和《芝加哥论坛报》等英、美报纸的驻华记者，在中国的东北和西北旅行采访。尤其是还进行了一些战地采访，比如，1932年1月28日，日军进攻上海，中国第十九路军奋力还击，激烈的战斗在淞沪战场全面展开。斯诺冒着生命危险，穿梭于中、日两军阵地之间进行采访。这次战争结束后，斯诺撰写并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著作——《远东前线》。

1933年3月，斯诺被任命为美国统一新闻协会驻北平（今北京）代表，后又应邀到燕京大学新闻系任教。

在中国，斯诺时常听到各种各样有关红军的传说：来自共产党的消息说，红军为实现土地革命、争取民族解放而斗争，惟有红军和苏维埃才能拯

救中国；而反对派却在极力咒骂：红军是饥饿的土匪、流寇。这些截然对立的言辞，究竟孰是孰非？不明真相的斯诺急想弄个水落石出。为此他决定亲自前往红色中国腹地——陕北苏区做一番实地采访与考察。1936年春天，斯诺专程到上海向宋庆龄提出访问陕北苏区的请求。在上海地下党的筹划下，通过宋庆龄的秘密介绍，很快为斯诺的陕北之行作出了妥善安排。

同年6月3日，斯诺乘火车离开北平（今北京）前往西安。临行之前，他在给美国一出版商的信函中这样写道：明天，我真正地要去红色中国了，我要去会见毛泽东，我要去陕北旅行，要在那里拍照，……如果我能突破封锁，这将是一个世界头号新闻。

关于这次陕北苏区之行，斯诺还说：

我的第一个目的地就是西安府，这个地名有‘西方平安’的意思，是陕西省的省会，要从北平向西南坐两天两夜劳累的火车，才能到达陇海路西端的这个终点站。我的计划是从那里向北走，进入位于大西北中心的苏区。在西安府以北大约一百五十英里的一个市镇——洛川，当时是陕北红区的起点。……大致说来，陕西红军控制的地区南到洛川，北到长城。<sup>①</sup>

第二天列车到达郑州，按照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安排，斯诺在郑州车站和美国医生马海德会合，一同去陕北苏区。列车抵达西安后，他们下榻在西京招待所。在离开北平（今北京）之前，斯诺“得到的指点就是到西安府某家旅馆去，要一个房间住下来，等一个自称姓王的先生来访”。斯诺在西安住下之后，首先拜访了陕西省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将军和陕西省主席邵力子。

过了几天，上海地下党派到西安协助斯诺和马海德进入苏区的董健吾化妆成牧师，来到西京招待所同斯诺取得联系。斯诺记载当时的情形说：

我在旅馆里住下来后过了几天，有一个身材高大，胖得有点圆滚滚的，但是体格结实，仪表堂堂的中国人，身穿一件灰色绸大褂，穿过打开着的房门进来，用一口漂亮的英语向我打招呼。他的外表像个富裕的商人，自称姓王，提到了我在北平的那个朋友的名字，并且还以其它方式证实了他就是我等的那个人。

斯诺在同西安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后，由红军驻西安联络员刘鼎和董健吾安排，于一天凌晨乘坐一辆标有特别通行证的卡车离开西安，沿咸阳

<sup>①</sup> 见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9页。本节以下引文均见该著。

——榆林公路向西北驶去。尽管道路泥泞，颠簸甚烈，但一路畅通无阻。当天晚上在洛川过夜，第二天一早起程北行，午后不久到达延安。斯诺和马海德下车随一名骡夫继续前行，于7月8日至10日终于到达红军东线前沿指挥部所在地——安塞下百家坪。

第二天上午，周恩来副主席在红军指挥部的窑洞里正式会见斯诺与马海德。他对斯诺说：

我接到报告，说你是一个可靠的新闻记者，对中国人民是友好的。并且说可以信任你会如实报道。我们知道这一些就够了。你不是共产主义者，这对于我们是没有关系的。任何一个新闻记者要来苏区访问，我们都欢迎。不许新闻记者到苏区来的，不是我们，是国民党。你见到什么，都可以报道。我们将为你考察苏区提供一切帮助。

周恩来同斯诺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回答了他提出的问题，并亲自为斯诺拟定了一个92天的苏区旅行计划。斯诺在红军战士的护送下首先前往当时苏区的临时首都保安（今志丹县）。当斯诺和马海德到达保安时，受到当地群众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保安的大部分委员和军政领导干部热烈而隆重的欢迎。7月16日，毛泽东主席正式会见斯诺、马海德，同他们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之后，斯诺在保安参观了7天。在此期间，他搜集到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第一手资料。然后于7月下旬经过长途跋涉，到达甘肃、宁夏边区，访问西征前线的红军。随后在宁夏南部的豫旺堡（红一方面军总部）与彭德怀相见。斯诺这次西线采访行程千余里，历时两个月。最后他冒着炮火，于9月22日折回保安。从23日开始，毛泽东主席和斯诺在窑洞里日夜畅谈，由黄华和吴亮平担任翻译。毛泽东向斯诺详细介绍了中国工农红军成长的历程和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经过，并解释了中国国民党在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方面的方针政策。同时应斯诺的请求，毛泽东还第一次披露了自己的身世和经历。

斯诺在保安期间，经常与毛泽东往来。有一次斯诺给毛泽东拍照，请他戴上五角星的军帽，但军帽一时找不到，斯诺便取下自己头上戴的五角星军帽，戴在毛泽东头上。这样，拍出了一个历史性的镜头——毛泽东头戴五角星军帽的照片。同年11月14日，《密勒氏评论报》最先登载了这一照片，从此流传于海内外。

斯诺在陕北苏区采访期间，曾写信让在北平（今北京）的妻子海伦（斯诺与海伦1949年离婚）火速赶到保安，和他一同采访、考察。然由于国民

党对西安严加封锁，海伦抵达西安后，无法前往陕北，只好折回北平（今北京）。

1936年10月，蒋介石已做好了从南方和西方向陕北苏区发动新的围剿的准备。斯诺决定离开苏区回到北平（今北京）。他叙述当时的情况说：“回保安以后，我又在外交部安顿下来，从九月底一直住到十月半。我收集了足够的传记材料可以编一本《红色中国名人录》，每天早上都有一个新的指挥员或苏维埃官员来供我访问。但是我对如何离开问题越来越感不安：南京军队大批开入甘肃和陕西，凡是东北军与红军对垒的地方都逐步代替了东北军，因为蒋介石已作了一切准备要从南方和西方发动一次新的围剿。除非我马上出去，否则就可能走不了：封锁线上的最后一道缝隙可能给堵上了。我焦灼地等待着他们给我做好动身的安排。”

面对国民党对苏区进行围剿的日益逼近，斯诺越发想急切地离开保安，但这并非出于个人安全方面的考虑，而是要安然地告别苏区，向全世界人民报告中国西北升起的这颗辉煌灿烂的希望之星。如果说斯诺在最初仅仅是为了使一些未获解答的问题，诸如中国共产党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中国的苏维埃是怎样的、红军的兵力有多少等等找到正确的答案，而冒着生命危险来到陕北苏区，那么四个月的苏区采访与旅行便“使一个来自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新闻记者，在思想感情上起了极大的变化。他对于中国共产党、它的领导人，革命的战士、农民、牧民、工人、共青团员、少先队员，有了真挚的热烈的感情，从而对于在革命与战争的激浪中的中国，有了深刻的正确的认识。这种认识不久就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和卢沟桥事变以后的全面抗日战争所证实了。”<sup>①</sup> 正因此，当斯诺离开保安时，有一种深深的依恋之情，正如他自己所说：“我最后一次走过保安的大街，越是走近城门，越是感到恋恋不舍。……我心里感到很难过。我觉得我不是在回家，而是离家。”

1936年10月中旬，斯诺在红军中间呆了将近四个月之后，离开苏区回还北平的安排工作终于完成了。在离开保安后的第五天到达苏区南部边界，在此留宿三天，20日安全地经过无人地带，抵达东北军防线的后面，第二天骑马行抵洛川，在那里乘坐一辆卡车前往西安。斯诺的妻子海伦·福斯特·斯诺对斯诺到达西安时的情形作过这样的描述：“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二日，埃德加·斯诺在鼓楼前，从一辆东北军的卡车上跳了下来，结束了他历时四

<sup>①</sup> 见胡愈之为《西行漫记》中文重译本所作的序。

个月、独一无二的保安之行。他像往常一样逍遥自在，压根儿没有想到去检查一下他的提包，一只装满笔记本、胶卷和文件的提包——他的无价之宝。卡车行至咸阳，这只提包被错扔了下去。咸阳还在渭河那边，离西安二十多英里，国民党宪兵在那儿设了岗哨。卡车开了回去，找到了丢失的提包。如果国民党把这只提包烧掉的话，历史有可能被弄得面目全非。”<sup>①</sup>

1936年10月底，斯诺携带采访笔记和胶卷风尘仆仆地回到北平（今北京），当时正是西安事变爆发的前夕。通过这次行程3000里，历时四个月，使他成为第一位进入延安、采访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外国记者。他在北平（今北京）家中蛰居书屋辛勤笔耕，以真诚的感情和朴实的文笔，写下了一篇又一篇新闻报道。为了避免国民党当局的新闻检查，他打算将手稿带到国外发表。不料，西安报纸却编造谎言说斯诺已被红军枪决，美联社又转发了这条消息。为了戳破谣言，揭露事实真相，斯诺于11月初突然出现在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北平）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慷慨激昂地陈述自己的苏区见闻，并一一展示他在苏区拍摄的照片，霎时间成为全世界爆炸性的新闻。11月14日，上海的《密勒氏评论报》首先刊出毛泽东与斯诺的长篇谈话。紧接着，英国《每日先驱报》以专栏的形式在头版连载斯诺的苏区采访记。美国《星期六晚邮报》等报刊也陆续发表斯诺写出的30余篇文章。1937年2月，美国《生活》画报第一次刊登了斯诺在苏区拍摄的75张照片。从而有力地粉碎了国民党对苏区的新闻封锁，也使各种谣言不攻自破。同年7月，斯诺完成了苏区之行的书稿，10月由英国伦敦戈兰茨公司第一次出版，由于该公司一时疏忽，将原书名《红星在中国》印成《红星照耀中国》。到11月在伦敦先后五次印刷，发行数十万册。后经美国兰登出版社翻印，成为美国有关远东“非小说读物”中最为畅销的书。不久又相继被译成法、德、意、俄、西、葡、日等十几种文字出版，一时风靡全球。《红星照耀中国》是斯诺在访问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后向外界介绍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一部名作，它第一次向世界人民报告了中国红军所进行的英勇的长征，刻画了共产党的领袖人物，描述了他们的信念、目标和生活。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斯诺的陕北苏区之行，正值中国和世界局势大转变的开端，那时，“中国正酝酿着由长期的反共内战转变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面抗战，而这也就是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这一切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群众和革命知识

<sup>①</sup> [美] 海伦·福斯特·斯诺：《七十年代西行漫记》，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分子艰苦奋斗所取得的丰硕成果。由于斯诺的惊人的洞察力和敏锐的分析能力，才使他认识了问题的本质，而这是西方的所谓‘中国通’所不能办到的。”<sup>①</sup>

正是由于上述几个方面的原因，有人把《红星照耀中国》看做是报告文学的样板，并认为它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的发现和描述，与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一样，是震撼世界的成就。有些美国官员和学者甚至说，没有埃德加·斯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也许就不会那么顺利地取得成功<sup>②</sup>。斯诺的成就使他一跃成为世界著名的新闻记者和作家，但他却十分谦逊而真诚地说：

这一本书出版之后，居然风行各国，与其说是由于这一本著作的风格和形式，倒不如说是由于这一本书的内容吧。从字面上讲起来，这一本书是我写的、这是真的。可是从最实际主义的意义来讲，这些故事却是中国革命青年们所创造，所写下的。这些革命青年们使本书所描写的故事活着。所以这一本书如果是一种正确的记录和解释，那就因为这是他们的书。<sup>③</sup>

《红星照耀中国》在伦敦出版时，斯诺正在上海。上海救亡协会国际宣传委员会成员胡愈之在斯诺处看到样书，随即征得中共地下党组织同意，请人翻译，由商务印书馆承印。1938年2月，《红星照耀中国》中译本在上海用复社名义出版。为便于躲避国民党与日寇的书报检查，书名改为《西行漫记》，出版后不到几个月，就轰动了国内及国外华侨所在地。

1939年，斯诺作为“中国工业合作社”国际委员会的代表兼记者重访陕甘宁边区时来到延安，再一次和毛泽东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毛泽东把斯诺介绍给大家，而且肯定《西行漫记》正确地报道了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主张。

1941年，斯诺因对皖南事变作了如实的报道，受到国民党的打击，被迫回国。1959年，受麦卡锡主义迫害，侨居瑞士。新中国成立后，斯诺于1960年，1964年和1970年三次到中国访问。1972年2月15日在日内瓦病逝，按其遗愿，将部分骨灰安葬于北京大学（原燕京大学）未名湖畔。

① 见胡愈之为《西行漫记》中文重译本所作序。

② 〔美〕海伦·福斯特·斯诺：《七十年代西行漫记》，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③ 见斯诺1938年为《西行漫记》中译本所作序。

## 二、史沫特莱

美国著名作家、记者艾格妮丝·史沫特莱 (Agnes Smedley), 1890 年生于美国密苏里州北部一个贫苦家庭。先后肄业于亚利桑那州的坦佩师范学校和加利福尼亚大学。1928 年以《法兰克福日报》特派记者的身份前来中国。一踏上中国国土, 她便立即开始调查日本经济侵略和军事占领的情况, 并写成详尽的报告, 从而成为第一位向世界人民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罪行的女记者。

1929 年到 1936 年, 史沫特莱一直在上海参加中国进步文化运动。1936 年 9 月中旬到达西安, 为避免引起南京方面的注意, 几天后, 史沫特莱移居临潼从事写作。11 月下旬又抵达西安。12 月西安事变爆发, 那时史沫特莱任英国《曼彻斯特卫报》驻华记者。她以极其敏感的政治触角向世界人民报道了在西安所发生的一切, 如蒋介石“剿共”阴谋失败、临潼扣蒋、张学良被囚禁、中国共产党发表抗日统一战线主张等等。她还参加了一次游行示威, 曾站在鼓楼上, 和人民群众一起高呼抗日口号。

1937 年 1 月 12 日, 史沫特莱利用西安事变后的混乱, 乘坐红军护送人员提供的卡车, 悄悄地混出封锁线, 经过三个星期的周折, 转辗到达延安。

据史沫特莱在《中国的战歌》一书中回忆说: 她到延安时已是黑夜, 立刻由马海德陪同去见朱德总司令。该书记载这次会见时的情景说:

这时, 一个穿着蓝布棉军服的矮而健壮的人的身影, 从点着蜡烛的桌子后面站了起来。于是, 我看见了多年来我在我的文章中讲过的朱德。的确, 他看起来象红军的父亲。他已经过五十岁, 他的面孔和蔼可亲, 布满着皱纹。他的宽大的嘴带着笑嘻嘻的欢迎的笑容张了开来, 向我伸出双手。我就张开双臂, 抱住他的颈子, 亲了他的两颊。马医生也张开他的双臂, 抱住朱德, 带着响声地亲了他。

我们大家都笑了起来。我对朱德说: “让我仔细看一看你, 多年来, 我就听说你被称为土匪, 你的头值两万五千元, 而且你还是个已经宣告死过十多次的人。”

我又补充说: 我给你带来了上海报纸上宣布你的多次死讯的一些剪报。

我就从我的口袋里拿出这些剪报, 当他看到一张据说是他的相片时, 他尽情地大笑起来, 然后, 我们就谈起我的计划, 和他自己的工作。

与朱德相见之后，当即去见毛泽东。

第二天，史沫特莱在为她举行的正式欢迎集会上发表演说，热情洋溢地赞美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1937年3月，史沫特莱开始着手较长期的写作计划，其中重要的是有关朱德的传记。她经常在晚上对朱德做长时间的采访，由朱德讲述他的生平。他们使用一种中文、德文、英文的混合语，在确定难以沟通时便求助于翻译吴光伟、马海德和黄华等人。平时，史沫特莱细心观察朱德的一言一行，访问老红军，多方搜集资料。其成果便是在1956年出版的《伟大的道路》（英文版）一书。

在延安，史沫特莱并不把自己的工作局限于采访和写作，她还积极投身于中国人民反法西斯的斗争及其他工作之中。比如，她吁请国际社会向延安提供物资和医务人员，著名的加拿大外科医生、共产党员，西班牙内战中的英雄诺尔曼·白求恩之所以会到中国西北部来，应该部分地归功于史沫特莱的呼吁。<sup>①</sup>她努力吸引外国记者来延安采访，鼓动他们突破国民党封锁。史沫特莱在延安还发动了一场灭鼠圣战。起初，许多人都嘲笑她那种西方人对鼠类的“偏见”，但是当毛泽东以他的权威加以支持时，他们也就哑口无言了。

早在1937年2月间，史沫特莱来到延安不久，便将西方风格的交谊舞传授给红军战士。史沫特莱确信，对于坚强的长征幸存者来说，需要学会放松和娱乐。她还认为，舞蹈有助于打破那些领导干部被妻子们强加的严格社会戒律。3月，史沫特莱和翻译吴光伟（莉莉）即在天主教堂里开舞蹈夜课。埃德加·斯诺记述当时的情况说：“起初，很少女士愿跳，常常只有男人在跳。艾格妮丝说，第一场舞跳下来，她觉得她的脚就像被一整个师踩过似的。这时她44岁，头发已开始发灰；但是她有一个孩子般的精力，而且懂得娱乐的愉快，她把这种‘土包子们’的舞会办得比第一流的纽约舞会更加欢快热闹。”<sup>②</sup>史沫特莱是在延安首先倡导跳交谊舞的外国友人。

1938年10月以后，史沫特莱随军转战华北、华中战场。1940年初到过重庆，9月赴香港。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回美国。1949年受麦卡锡主义迫害，流亡英国。1950年5月6日病逝英国牛津，按其遗愿，骨灰葬中国北京

<sup>①</sup> 简·麦金农、斯·麦金农著，江枫等译：《史沫特莱传》，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51页。

<sup>②</sup> 简·麦金农、斯·麦金农著，江枫等译：《史沫特莱传》，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53页。

八宝山公墓。

### 三、王安娜

王安娜于1907年生于德国，原名安娜·利泽（Amna Liese），毕业于柏林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30年代初，因反对法西斯主义受到迫害，逃到英国伦敦。在那里结识中国共产党人王炳南，1935年与他结婚，改名王安娜。1936年2月随王炳南来到中国西安。1937年3月与美国著名摄影师厄尔·列夫等一起到达延安，先后与朱德、周恩来相识。周恩来多次向她介绍红军长征的情况。后经朱德和史沫特莱介绍，王安娜结识了彭德怀、贺龙这些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三位参加过长征的红军女战士——贺子珍、康克清、邓颖超引起王安娜很大的兴趣，先后对她们进行了采访。

王安娜到延安不久，毛泽东来到她和史沫特莱的住所，和她们一起坐在桌子旁边，就陕西的社会状况、德国农民的状况、中国现代文学等问题进行了亲切的交谈。临分手时，毛泽东希望王安娜第二天傍晚去看他，继续他们的谈话。第二天傍晚，王安娜来到毛泽东的窑洞，在烛光下，两人就统一战线政策等问题作了长时间的交谈。王安娜问道：“要是统一战线成功的话，延安会发生什么变化呢？”毛泽东回答说：“党的现行的许多政策，大概会放弃吧。比如，停止没收地主的土地，只是要求减租。对我们来说，蒋介石如果真的抗日，我们甚至准备将红军交给他指挥，边区的领导权也可以协商。我们的目标暂时可以搁下，以对付共同的敌人。为此，必须让国民的各个阶层加入我们的战线。”毛泽东最后说：“请你好好看看延安！如果有时间的话，请你看看我们的边区。我们这个地区的面积和英国本土同样大小，不过可以说是非常贫困的地方。为了提高这个地区人民的生活水平，我们必须不断地艰苦努力。”谈话进行到晚上12点多。

西安事变以后，蒋介石迫使杨虎城“出国考察”。1937年5月的一天，王安娜从延安到西安，同王炳南一同去上海为杨虎城将军送行。在告别延安时，周恩来和众多的朋友为王安娜饯行，大家一边干杯，一边反复地用德语说后会有期。王安娜连声向大家表示谢意。当王安娜在史沫特莱陪同下，再次走过延安的街道时，朱德、周恩来及许多人同她握手告别。王安娜尽管在延安只生活了两个多月，但却对延安产生了深厚的感情。她在回忆录《中国——我的第二故乡》中写道：“我来到中国之后，像延安这样能够令人安居的地方，别处是找不到的；像延安的人那样爽朗的中国人，别的地方是见不

到的。建设新社会的高度热情，延安全体居民的意气风发，使我深为感动，真想在延安这个城市多住一些时候。这里是中国的其他地方所不能比拟的。离开延安的眷恋惜别之情，我过去还不曾体验过。”

王安娜到达上海不久，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她受周恩来委托向在华外国人进行抗日宣传，又深入到战地采访和救援，还参加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在大后方为八路军筹运医疗用品和补给物资。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王安娜由重庆到上海，协助宋庆龄从事民主活动。1955年回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1961年移居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1979年5月，王安娜重访延安时，受到中国人民的热烈欢迎。她站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的故居前，久久不愿离去。1990年在德国病逝。

#### 四、海伦·斯诺

海伦·斯诺（Helen Foster Snow），又名尼姆·韦尔斯（Nym Wales），1907年生于美国犹他州芝加哥城。1931年毕业于犹他州大学，同年8月作为美国驻中国大使馆秘书来到上海。1932年在东京美国驻日大使馆和斯诺结婚，然后去南洋诸岛短期旅行。1933年初，他们夫妇来到中国，在北平（今北京）定居，分别在燕京大学任教，海伦还兼任《密勒氏评论报》驻北平通讯员。

1936年9月，海伦由北平（今北京）到西安，准备赴延安，因受国民政府的阻挠未能成行。10月5日，她采访了西北“剿总”副司令张学良，就时局问题进行了交谈。返回北平（今北京）后，将有关内容写了《宁要共产党，不要日本人，中国将军要团结》一文，在《伦敦先驱日报》发表，立即引起国内外的关注。

1937年4月23日，海伦再次由北平（今北京）抵达西安。4月30日乘车到达三原县红军办事处，然后彭德怀派车接她去云阳前线。在前线，她同彭德怀进行了广泛的交谈。5月初经洛川前往延安。在到达延安的第二天，即5月6日，毛泽东会见了她。她在《一个女记者的传奇》一书写道：“我在延安的第一个早晨，当我的新警卫通知我毛泽东主席和朱德将军已在院子里，将对我作迎接的拜访时，我还是由于乘卡车来延安的艰苦旅行东倒西歪。”见到毛泽东后，她说：“我丈夫一回到北平，就尽快把你的传记打印出来。这将会给每一个读者以深刻的影响。这次我决定不惜任何代价访问你们的地方，希望得到那些在《西行漫记》中未能明确描述的共产党领导人的自

传”。毛泽东一边轻轻地笑着，一边和蔼地点头。

6月8日，海伦偕同翻译，到延安城外的中央党校参观。在参观之余，她与党校校长罗迈进行了交谈。7月4日，毛泽东第二次会见海伦。8月中旬的一个下午毛泽东第三次会见海伦，由抗大二期14队学员余建亭任翻译，地点在毛泽东家里。毛泽东的家坐落在延安城西北角的凤凰山下。谈话在露天进行，内容是谈红军十年的发展史。毛泽东从1927年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谈到井冈山会师，建立中央苏区，粉碎五次“围剿”，直到红军到达陕北。海伦认真敏捷地做笔记。

8月13日，毛泽东与海伦进行第四次谈话。地点在毛泽东住宅的花园中，主要谈论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在谈话中，毛泽东强调指出，必须实行民主，发动群众起来抗战。海伦提出了一些问题，毛泽东作了详细的回答，并希望她把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介绍给中国和全世界各国人民。后来海伦在她的著作《一个女记者的传奇》中对这次谈话作了这样的叙述：

在1937年8月13日，我访问毛时，他告诉我共产党“拯救中国”的十点主张，特别是把中国从日本现在的威胁中拯救出来，主要的推动力量是“给人民以爱国活动的自由和武装他们自己的自由”。

在访问结尾，毛站起来，重重地敲着桌子，他的脸变得红起来，眼里闪烁着光亮，他说，如果能得到南京政府的合作，使这十点得到承认，“我们就可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否则，中国就要灭亡！”他愤怒地重复了最后一句话。

在这次会晤以后不久，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宣告成立。

8月19日，海伦与毛泽东第五次会见。当时，海伦要求到山西前线去随军采访，以便报道战地军民的抗战情况。她曾事先向毛泽东提出这一要求，征得同意。这次会见是海伦到毛泽东住所去取介绍信。毛泽东看见海伦走进室内，知道她的来意，就告诉她说：“我给你写一封证明信，给在前线的邓小平。”9月7日，海伦离开了延安，又到西安、青岛、北平等地。1940年，美国与日本关系紧张，战争一触即发，美国政府要求在美国的美国妇女和儿童回国，海伦才离开了中国。

海伦在延安进行为时四个月的采访中，先后会见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和许多红军战士。作为女性，她还采访了中国革命中的杰出女战士蔡畅、贺子珍、康克清等。她离开延安后，写过很多报道和论著，《续西行漫记》就是介绍中国革命的性质、阶段和中国红军发展的代表

作。翻开这本书，还可感受到她对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满腔热情和必胜的信念。

新中国建立后，1972年和1978年，海伦曾两次重访中国，还特意重游当年中国革命的“红都”保安（今志丹县）。1996年6月12日，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为海伦颁发“人民友好使者”证书和奖章。12日中午，中国驻纽约总领事梅平专程前往美国康涅狄格州福勒养老院，看望海伦，并将“人民友好使者”的证书和奖章送到她的手中。坐在轮椅上的海伦接过证书和奖章后说：“我爱中国，我希望中国会一天比一天好。我希望美国和中国的年轻一代能同我和埃德加·斯诺一样，继续架设友谊的桥梁。”1997年1月11日海伦在美国病逝。

## 五、比森

托马斯·阿瑟·比森，美国人，中国名字叫毕恩来。曾于1924年首次来中国。1937年第二次来中国，其目的在研究中日关系，并要弄清楚“共产党和国民党经过十年苦战之后，是否现在抛弃了他们的分歧，不顾一切地获得和解，而仅仅是为了制止日本的进犯，就能站到一条共同的战线上来？”5月间，他带着这些问题访问了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陈立夫。

比森于6月21日抵达延安，22日和23日访问毛泽东，他提出的问题有：南京对日本的政策有何演变，南京政府有哪些集团或个人反对建立统一战线，中国能不能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国民党在西安事变前后的政策，英国会不会侵犯苏联，学生运动的前途，在向社会主义过渡时资本主义是否可以存在等？毛泽东对上述问题均作了明确的回答。

6月23日，比森访问周恩来，侧重谈当时的国共和谈、统一战线问题；和朱德的谈话，侧重在军事方面；和博古的谈话，侧重在陕甘宁边区的情况。

在访问之余，使比森震惊于中共中央领导人的自信、乐观和见解的明确性及预见性。他说：延安领导人的谈话，考虑的是“民族的事业，最重大的任务是赶走日本侵略者”。谈话的中心思想是：“为了用中国的全部力量对付日本而全民族团结起来。”

比森在延安访问时，将撰写的文稿寄到美国，1937年10月就有一些内容在美国《亚美》杂志上发表。1973年，他写的《1937年的延安——同中共领导人的几次谈话》，发表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的《中国研究专刊》

第11号上。全书分为：背景、去延安、延安道上、延安、边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访问朱德、访问周恩来、访问毛泽东、回到西安—北平（今北京）、回顾战前延安。详细公正地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反映了中共中央领导人为了中华民族解放事业具有的革命胆略、坚定信念和超凡的毅力。

## 六、贝特兰

詹姆斯·贝特兰，1910年8月11日生于新西兰。1932年考入牛津大学，又就读于意大利佩鲁大学。1936年来到中国，在北平（今北京）担任英国工党机关报《每日先驱论坛报》、《曼彻斯特卫报》驻中国特派员，并在燕京大学进修。

西安事变爆发后，贝特兰来到西安进行采访。1937年10月上旬，贝特兰带着抗战后出现的一系列新问题到达延安。10月25日，他同毛泽东在凤凰山麓的一孔窑洞里进行了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谈话。谈话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贝特兰提出了几十个问题，毛泽东一一作了回答。贝特兰将这次访问情况发表在英国《每日先驱论坛报》上，在英国以至欧洲引起巨大反响，增强了世界人民对中国，尤其是对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的了解。毛泽东也极其重视和贝特兰的谈话，1937年11月13日出版的延安《解放》周刊第1卷第23期发表这次谈话时，还亲笔题写了《毛泽东与英国记者贝特兰之谈话》的醒目标题。

1937年11月初，贝特兰离开延安，渡过黄河前往山西前线采访。1938年5月离华赴美。1957年和1982年两次访问中国，著有《回到中国》等。

## 七、希伯

汉斯·希伯，德国人，生于1897年，曾经是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因反对侵略战争受到迫害，离开德国流亡国外。希伯在1925年至1927年中国大革命时期首次到中国，研究中国问题。

1938年春，希伯由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派人陪同到延安，受到毛泽东的亲切接待。希伯将《从广州到上海—1925—1927》一书送给毛泽东，该书介绍了希伯在大革命时期的在华经历。毛泽东向希伯介绍了中共中央对时局的态度和主张，还夸奖了希伯，也夸奖了埃德加·斯诺。希伯表示以后要为中国人民革命的正义事业多写一些有价值的作品，要向斯诺学习。



1939年2月，希伯由上海赴皖南、苏北和山东等地采访。11月30日拂晓，在山东大青山的一次遭遇战中和战士们一道，同敌人展开决死战斗时光荣牺牲，年仅44岁。罗荣桓政委得知后，心情极为悲痛，立即命令报务员发电报给延安，向党中央报告，并亲述电文稿。

## 八、艾金森

1943年秋天，美国著名的评论家艾金森抵达延安。在博古的陪同下登上清凉山，参观了北宋时修建的万佛洞——中央印刷厂印刷车间、新华社电务科、工人俱乐部、《解放日报》社，到新华社职工食堂就餐。晚饭后艾金森顾不上休息，就和博古参观新华社工作室。在参观过程中，每到一地艾金森都关心工作人员，并提出问题，人们都一一进行了回答。回到交际处时，艾金森深有体会地说：“我来到延安发现你们中国青年都是有信心、有崇高理想的人，这就是你们取得胜利的根本。你们有这么好的战士，这么好的同志，胜利一定是属于你们的。”

## 九、西奥多·怀特（白修德）

西奥多·怀特（白修德），1915年生于美国波士顿一个贫困家庭。1938年毕业于哈佛大学历史系。1939年4月9日，白修德被派到中国从事新闻报导，相继在重庆、山西、河南采访。1944年12月抵达延安。

白修德第一次与毛泽东谈话时就提出：“美国是主张中国能够团结各派力量，共同对付日本人的，但是，现在看来，你们和国民党之间的裂痕颇多，甚至互相残杀，三年前发生的皖南事件就是突出的例子。毛先生，请问，你们与国民党的关系是否有希望维持下去？两党之间的疙瘩还能否解开？”毛泽东回答说：“这得看委员长了。合作是两厢情愿的事，我们与蒋介石打交道已非一朝一夕。我们之所以与他合作，目的就是一致抗日。”在谈话中，毛泽东还谈到中国共产党获得革命胜利后，对国家的建设问题。总之，对白修德提出的问题，毛泽东均作了回答。

白修德在延安逗留的几个星期，还会晤过朱德、周恩来、刘少奇、林彪、彭德怀、叶剑英、聂荣臻、彭真、陈云、邓发等负责人。

1946年白修德返回美国后，与另一记者合著了《中国的惊雷》一书，记载了他在中国的见闻，对当时美国政府、国民党和共产党三者之间的关系，作了具有内幕性的报道和较为深刻而中肯的分析。

1983年，白修德再次来中国。1986年在美国病逝。

## 十、斯特朗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是美国的一位进步女记者、作家。1885年11月24日，生于美国内布拉斯加州弗兰德城。1908年在芝加哥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早年就投身儿童福利等社会工作和工人运动。1921年随美国友谊服务队访苏联，在那里留居20多年。

斯特朗曾于1925年、1927年、1937年底至1938年、1940年来华，热情地报道过中国人民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正义斗争。

1946年6月，斯特朗第五次来华，访问了延安和其他解放区。当时全面内战已经爆发，蒋介石在美国的支持下，声言要在三至六个月内消灭中国共产党。当时，国内各界人士对中国的形势颇为担心，共产党内有些思想动摇的人，亦怀疑共产党能否取得这场战争的最后胜利。正是带着这些问题，斯特朗于7月31日由北平乘美军观察组的飞机抵达延安。8月6日，毛泽东在他的住所接见斯特朗。经过一阵寒暄，毛泽东在回答斯特朗提出的问题时，首先揭露了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腐朽的本质，然后提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从理论上回答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打败美蒋反动派的问题。他指出：“一切反动派都是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反动派总有一天要失败，我们总有一天要胜利。这原因不是别的，就在反动派代表反动，而我们代表进步。”谈话从下午一直延续到傍晚。后来斯特朗称毛泽东的这一论断是“一个现时代的伟大真理”<sup>①</sup>。斯特朗在延安期间，不仅采访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又到各机关单位进行调查，她走遍了延安各地，与社会的接触面很广，而且还一度离开延安，赴东北、华北解放区访问，于1946年10月返延安。

1947年1月底，国民党军队开始向延安推进，撤离延安的计划在拟定中。在这种形势下，经过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劝告，斯特朗才于1947年2月14日乘飞机赴北平，又即赴上海，抓紧时间写了《中国的黎明》一书，向

<sup>①</sup> 毛泽东与斯特朗的谈话过程，可参见《斯特朗文集》第3册，新华出版社1988年版，第248—253页。

全世界预报中国革命的胜利即将到来。在她回到美国后，又以采访延安和其他解放区的见闻，写了《中国人征服中国》一书。

1958年斯特朗第六次来华访问，向世界报道了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成就。1970年在北京逝世，骨灰被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 十一、斯蒂尔

斯蒂尔是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的记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到过许多国家进行采访，报道了各国政府和人民反对法西斯侵略的英勇斗争。

1945年7月21日，他为延安《解放日报》撰写过《太平洋评论》的专稿。1946年4月16日，延安《解放日报》刊登了他的电讯专稿。

1946年9月21日，他和美国出版家兼记者泰耳乘美军观察组飞机抵达延安。29日，毛泽东接见了她，回答了她所提出的问题，对美国“调解”的真相作了透彻的分析，对内战的胜利充满了信心。斯蒂尔在延安期间，还采访了许多单位，了解各方面的工作和人们的生活情况。通过这次采访使他体会到共产党人说的为人民服务，在延安是货真价实的，从而深化了他对中国问题的认识。1946年10月1日，斯蒂尔离开延安到北平。

### 十二、中外记者参观团

在意大利法西斯宣布投降以后，美、英等国为了战胜德、日侵略者，特别是为了打败日本，需要充分利用中国的军事力量。由于当时的国民党腐败无能，抗战不力，军心涣散，士气衰落。因此，美、英等国不得不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武装力量。为此，他们于1944年3月向中国共产党提出要求，派英、美、加、澳等国记者，到延安及黄河以东各解放区了解八路军武装力量和敌后斗争情况，并考察陕甘宁边区及敌后根据地的情况。

中国共产党对英、美等国的要求表示欢迎。3月9日，周恩来致电中国共产党驻重庆代表董必武转外国记者团说：“我受毛泽东、朱德两同志及中共中央委托，特电你们表示热烈欢迎。”<sup>①</sup>同时，并请董必武通知驻渝《新华日报》社记者龚澎及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交通科长龙飞虎护送记者团赴

<sup>①</sup> 见《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央文出版社1988年版。

延安。中共中央政治局对这次中外记者参观团来延安考察、采访十分重视，决定由周恩来副主席亲自主管这一工作，军委秘书长杨尚昆直接领导交际处的具体接待。

与共产党的态度截然相反，国民党顽固派对外国记者参观团赴延安设置重重障碍，百般刁难、拖延。因为他们深怕外国记者冲破他们的新闻封锁，揭穿他们对共产党和解放区的种种造谣诬蔑。不过，派出记者团前往延安毕竟是美、英等国提出的要求，并得到各国外交使节的支持，国民党不敢公开拒绝，只得表示同意。为了控制记者团，国民党将外国记者团改名为中外记者团，指派“中央社”和《中央日报》等记者参加，安排国民党官员领队，并规定中外记者的统一行动纪律，最后在重庆组成 21 人的中外记者参观团。其成员包括：

领队 2 人：谢宝樵（国民党外事局副局长）、邓友德（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新闻检查局副局长）；

外国记者 6 人：冈瑟·斯坦因（美联社、《曼彻斯特导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伊斯雷尔·爱泼斯坦（美国《时代》杂志、《纽约时报》、《同盟劳工新闻》）、哈里逊·福尔曼（合众社、伦敦《泰晤士报》、纽约《先驱论坛报》）、莫里斯·武道（路透社、《明星》周刊、《巴尔的摩太阳报》）、科马克·夏南汉（美国天主教《信号》杂志、《中国通讯》）、普金科（塔斯社）；

中国记者 9 人：孔昭恺（《大公报》）、张文伯（《中央日报》）、谢爽秋（《扫荡报》）、周本渊（《国民公报》）、赵炳焯（《时事新报》）、赵超构（《新民报》）、金东平（《商务日报》）、徐兆镛（中央社）、杨嘉勇（中央社）；

另外，还有陪同 4 人：魏景蒙（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宣传处处长）及其助手陶启湘、张湖生、杨西昆。

1944 年 5 月 17 日，中外记者参观团由重庆出发，在西安和山西采访后，于 5 月 31 日西渡黄河进入陕北，当晚宿营于凉水崖。6 月 1 日，十八集团军三五九旅旅长王震自延安前来迎接，翻译陈家康、徐克立夫妇一同前往。记者团跟随王震当日行抵固临。6 月 3 日到达延长，参观延长油田。6 月 4 日将要启程时，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情。原来，《中央日报》社记者张文伯、中央社记者杨嘉勇等个别中国记者，自进入边区后多次单独乱窜，图谋不轨。王震深知他们的用意，当众宣布说：“哪个中央日报记者要想搞什么名堂，就请他留下来。……你们来采访新闻，我们很欢迎，若来干特务破坏，我们不欢迎。”一席话使张文伯等人甚为狼狈。6 月 6 日，记者团到达南泥

湾，受到三五九旅旅部全体指战员的热烈欢迎。第二天，记者团参观南泥湾伤兵医院。当外国记者看到边区医院因被封锁而缺医少药，甚至不知“磺胺”为何物时，内心甚为不平。塔斯社记者普金科和时代杂志记者爱泼斯坦当即提议以记者团名义电请国民党运输药品到边区。部分中外记者表示一定要把这种情况反映给外界。随后，记者团又参观了三五九旅开展大生产运动的成果及缴获的日寇兵器，还参观了干部休养所。

6月9日，记者团抵达延安，下榻于边区政府交际处。当天下午，第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设宴为记者团洗尘，军委秘书长杨尚昆、边区政府民政厅长刘景范也参加了宴会。为了打破谢宝樵和邓友德对记者团的控制，当天晚上交际处处长金城征得杨尚昆秘书长同意，不允许记者团中的国民党成员擅自架设电台。次日早餐前，邓友德因架设电台一事与交际处工作人员发生争吵，工作人员据理以争，电台最终未能架成。

10日下午5时，朱德总司令在王家坪礼堂设宴款待中外记者参观团。叶剑英参谋长代表朱德总司令致欢迎辞说：“这次记者团来延安，对于促进国内团结将有很大意义。”他请各位记者在参观的过程中多加指教，并欢迎大家到敌后抗日根据地去参观。之后，爱泼斯坦代表外国记者讲话，他直截了当地说：

“来到延安是件很不容易的事，因此我们感到很愉快。在同盟国家阵营里，不应该有任何一个地区关闭起来，对于职业新闻记者，也不应该有任何一个地区不让他们看一看，因为他们是全世界人民的眼睛。这个地方（延安）很久以来是被关闭着的，这一次，我们打开了一个缝隙，从今以后要再强制地关闭起来是不可能的了。”

这番话有力地抨击了国民党对边区的封锁政策。他最后说：“只有团结，中国才能成为四大强国之一。”随后，孔昭恺代表中国记者讲话，他表示“我们一定要把见到的一切忠实地报道给全国”。讲话结束之后，延安大学文工团举行盛大的音乐晚会。伴随着雄浑高亢的《同盟国进行曲》，晚会的帷幕徐徐拉开，然后演奏了民歌及《黄河大合唱》。

6月11日，全体中国记者参观新华社、解放日报社和中央印刷厂，并就新闻业务进行座谈。

12日下午4时，毛泽东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休息厅接见中外记者参观团体成员。毛泽东首先致词，对记者团的到来表示欢迎，还回答了记者们提出的一些问题（详见本书“附录一”）。会见后，毛泽东宴请了记者团，晚

上，一起观看京剧《古城会》等节目。周恩来从接见、宴会到晚会一直陪同，秦邦宪参与翻译工作。此后，美国记者斯坦因带头提出单独采访，得到记者们的赞同，遂冲破记者团的统一纪律。

6月22日，叶剑英参谋长在王家坪礼堂向中外记者参观团作了《中共抗战一般情况的介绍》的报告，从敌、伪、友、我四个方面介绍了敌后战场截止1944年3月前抗战七年来的基本情况（详见本书“附录三”），在中外记者中反应十分强烈，一些外国记者饭后立即回到自己的房间打字发稿。叶剑英参谋长的报告通过新闻媒介传播到中国大后方和世界许多国家以后，引起巨大反响，国内外舆论对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给予了新的评价。尤其是美、英、法三盟国开始关注和寄希望于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中外记者参观团访问延安后一个月，美国派观察组进驻延安，以加强联络。

24日，延安文艺界举行招待中外记者的集会。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聚会，人们三三两两畅谈哲学、文学和边区生活等问题。诗人柯仲平介绍了一些有关延安文艺协会的情况。接着，丁玲、吴伯箫、艾青等作家也先后讲话。丁玲讲了一件有趣的事情：“有位先生问我，在延安发表一篇文章需要什么手续？初听这句话，我感到奇怪，因为在我们这里是不需要任何手续的。但是想起重庆的作家们反对出版法，就恍然大悟，原来这位先生是习惯了重庆的不自由了。”吴伯箫讲了有人在西安给他开追悼会的怪事情，使记者们不禁捧腹大笑，但吴伯箫却严肃地说：“这是对我的一种侮辱，希望记者先生们把我的抗议带到西安去。”集会结束后，大家一起到大众剧团观看秧歌。

25日，朱德总司令和叶剑英参谋长应美国记者斯坦因、英报记者福尔曼之请，分别与他们进行了长达4个小时的谈话。28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李鼎铭副主席、罗迈秘书长接见中国记者，并与他们谈话。29日，李鼎铭、罗迈接见外国记者，回答了他们提出的问题。在此期间，朱德总司令与美国记者斯坦因的会谈内容详见本书“附录二”。

从6月11日开始，中外记者参观团正式访问陕甘宁边区政府和自然科学学院、日本工农学校、兵工厂、被服厂、难民工厂、皮革工厂、振华纸厂、光华农场、中央医院、和平医院、洛杉矶托儿所等单位，从而对边区各方面的情况进行了比较全面的了解。在此期间，周恩来副主席每隔一两天即到交际处探望一次，帮助记者们解决工作上的问题，并分别约记者谈话。

7月上旬，中外记者想去八路军前线采访、考察，总领队谢宝樵、邓友

德惟恐扩大共产党的影响，遂竭力阻挠并采取分裂记者团的办法。具体做法是，由中央日报和中央社记者私下活动，强迫持中间态度的大公报记者孔昭恺出面，提出访问团中所有中国记者急回重庆的要求。7月6日，周恩来副主席为其饯行。11日朱德总司令再次在交际处为之饯行。12日，中国记者离延返渝。外国记者除夏南汉随中国记者返渝外，其余均留驻延安。

民心不可违，民口不可防。中国记者返回重庆后，许多人在报上或私下如实地介绍了他们在陕甘宁边区实际考察的所见所闻。例如，新民报记者赵超构即公开出版了他的《延安一月》，比较客观而巧妙地介绍了他在延安参观访问的所得和感受。可以说，这一举动在没有新闻报导自由的重庆，“透露出一线新民主主义新中国一角的曙光”。

经过一番准备之后，留在延安的外国记者于8月31日离开延安赴晋绥抗日根据地参观。行前，毛泽东主席亲自到交际处为他们饯行。在王世英、朱明、王再兴和翻译柯伯华、林青的陪同下，东渡黄河，前抵晋绥军区第八分区防地，沿途考察了中共党政机关的工作情况和人民群众努力生产、支援前线的情况。在晋绥根据地，他们观看了八路军攻拔日寇据点的一次战斗。这些都给他们留下良好印象。

外国记者结束延安之行返回大后方和本国后，对延安和解放区欣欣向荣的面貌及八路军、新四军的辉煌成绩做了翔实的宣传和积极报道。比如，福尔曼1945年在美国出版了《红色中国的报道》，引起美国人民的普遍关注；斯坦因1946年在美国出版了《红色中国的挑战》，并先后写出《中国共产党与解放区》、《八千六百万人民随着他的道路前进》等文章，发表于美、英报刊，影响甚好；武道以比较客观的态度撰写了《我从陕北回来》等文章；爱泼斯坦给《纽约时报》、《时代》杂志写过不少有说服力的文章，并写了《中国未完成的革命》一书，1951年在美国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他又参加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可贵的贡献，并当选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中外记者参观团的延安之行，冲破了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的真实情况，及时地宣传到大后方和世界许多国家，在很大程度上促使大后方人民和世界人民及美、英、法盟国对中国共产党作出重新认识和评价，从而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民在国内外的影响，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的抗日战争。

## 第五节 外国医生及医疗团体在延安

### 一、马海德

乔治·海德姆（后取中国名字马海德），1910年9月26日生于美国纽约州布法罗市，父母为黎巴嫩移民。1927年考入北卡罗林大学。1933年夏在日内瓦获医学博士学位。11月东来上海。马海德一到上海，就结识了路易·艾黎、史沫特莱等进步人士。他在行医的同时，积极参加宋庆龄倡导的马列主义学习小组的活动。

1936年暮春时节，陕北给上海的中共地下组织发出密电，嘱咐邀请一位诚挚的西方记者和一位医生到苏区访问。6月，在宋庆龄的周密安排下，马海德乘车北上，在郑州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会合，一同到达西安。随即在红军驻西安联络员的安排下，和斯诺一起辗转到达红色首都保安。

7月16日，毛泽东主席正式会见了马海德和斯诺，并向他们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对国内外局势的看法。7月下旬，马海德和斯诺前往甘肃、宁夏边区，访问西征前线的红军战士。他们途经十多个县镇，历时两个多月，于9月22日回到保安。在豫旺堡红一方面军总部，红军将领彭德怀接见了他们。马海德对彭德怀极为钦佩，正如他在几十年后回忆当时的深刻印象所说：“彭老总为人豪爽，足智多谋，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他精力充沛，浑身充满了感人至深的献身精神。”<sup>①</sup>在访问、考察途中，马海德每到一地，都深入细致地了解当地企事业和医疗卫生状况。回到保安后，他根据自己的实地调查，写出详尽的调查报告，提出改进苏区医疗卫生办法的建议。毛泽东对他的调查报告和建议十分赞赏，不久便任命马海德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卫生部顾问。

在苏区，马海德身穿军装，裹着绑腿，携带听诊器和手术刀，努力为战士和百姓治病。苏区医疗条件差，他走到哪里，哪里就是诊所。许多垂危的病人在他的精心医治之下恢复了健康。有一次，一位红军战士被毒蛇咬伤，马海德毫不犹豫地用嘴将毒液吸出，然后敷药包扎，使病员很快脱离危险。马海德初到苏区，不会讲中国话，每每需要翻译陪同，诸多不便。为了克服

<sup>①</sup> 转引自何玉林、刘群著：《国际友人在中国革命中》，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84页。



语言上的障碍以便更好地工作，他多方努力向同事和群众学习汉语，不到一年，已能讲一口流利的普通话，甚至能用陕北方言唱一段《信天游》。

1937年1月，马海德随中共中央由保安进驻延安。2月，由吴亮平和张浩介绍，马海德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后来回忆说：

“当时吴亮平同志经常和我谈话，了解我的思想变化和对国内外革命运动的想法，后来党小组和支部正式通过我为中共党员。入党时没有什么宣誓仪式。我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我从小生活在工人家庭，后来又有在上海那一段经历。我要求到江西去的时候，是打算去革命一辈子的，从未想到离开。在漫长的人生历程中，我逐步树立了崭新的世界观。”<sup>①</sup>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马海德经常奔波于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为战士和群众治病。与此同时，他还积极向群众做抗日宣传鼓动工作。陈赓将军在1937年9月28日的日记中写道：“今天召集全团军人大会，由海德同志讲演。”另一篇日记又说：“海德同志的讲话，使我们战斗员有更大的兴奋。”马海德的抗日宣传工作的积极作用于此可见一斑。他的出色工作和模范行动，受到党和边区政府的多次嘉奖。

从1943年底开始，马海德在延安主要从事外事工作。在此之前，他曾作为八路军代表，陪同白求恩赴五台山，共同在抗日前线抢救八路军伤病员。后来，他又作为中共代表，在延安接待过美军观察组成员，陪同他们参观访问，并反复向他们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主张，争取他们的同情和支持。在全国胜利以前，马海德先后担任过中共中央外事组顾问、军调执行部中共代表团医疗顾问等职，均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工作使命。他曾奉周恩来之命，代表中国共产党向全世界揭露蒋介石集团企图炸毁黄河大堤的阴谋，阻止了这一灾难的发生。在整个解放战争时期，马海德以他的对党的事业的忠诚和出色的外交才干，为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这一天，马海德在天安门参加了开国大典。1950年加入中国国籍，长期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顾问，继续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服务。1988年9月病逝北京，中央卫生部表彰马海德为中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做出的贡献，授予他“新中国卫生事业的先驱”荣誉称号。

<sup>①</sup> 转引自何玉林、刘群著：《国际友人在中国革命中》，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86页。

## 二、白求恩与加美医疗队

亨利·诺尔曼·白求恩，1890年3月3日生于加拿大安大略省，1914年毕业于多伦多大学医科。这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遂参加加拿大远征军，开赴法国和比利时战场，任阵地担架队队员。1916年获医学博士学位。1917年在英国皇家海军航空母舰上服役。1922年获爱丁堡皇家外科医学院奖学金。1924年离开英国返回加拿大。以后曾任蒙特利尔皇家维多利亚医院胸外科医师、卡第维城圣心医院胸外科主任。1935年9月加入加拿大共产党。1936年德意法西斯武装干涉西班牙革命，白求恩率领医疗队随加拿大志愿军前往战火纷飞的马德里，为西班牙人民的正义事业服务。

1937年7月7日，日本法西斯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正在加拿大为西班牙人民的反侵略斗争奔走呼吁的白求恩得知这一消息后，在一次大会上，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表示要到中国支援人民的抗日战争。在世界各国人民支援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的形势发展中，加拿大和平民主同盟和美国民主同盟派遣白求恩率加、美医疗队到中国。这支医疗队由白求恩任队长，队员有加拿大女护士琼·尤恩、美国外科医生帕森斯2人。国际援华委员会负责提供和输送医疗队所需的全部物资和经费。

1938年1月2日，白求恩率加、美医疗队离开温哥华，经香港到武汉，同八路军办事处联络员王炳南取得联系。当晚，周恩来副主席会见了白求恩一行，并向他们介绍了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情况。在此期间，国民党军界常给白求恩送上请柬，或千方百计挽留他，白求恩仍表示要去延安，要去抗日前线。在此期间加、美医疗队成员帕森斯提出不愿同赴延安，因而留下了帕森斯。2月22日，白求恩率医疗队离开武汉，冒着敌人的炮火，在3月初到陕西韩城县。3月22日，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派车将白求恩一行接到西安，朱德总司令和八路军办事处党代表林伯渠会见了医疗队，对他们表示了欢迎和期待的心情。

1938年3月—4月间，白求恩率医疗队抵达延安，受到八路军卫生部长姜齐贤和八路军卫生部顾问马海德等人的热情欢迎。第二天晚上，毛泽东主席在凤凰山麓的窑洞里接见了白求恩和尤恩。毛泽东说：“你们来到解放区，说明了加拿大人民、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的团结与战斗友谊，说明了资本主

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和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深厚感情。”<sup>①</sup> 白求恩向毛泽东转达了加、美人民的亲切问候，介绍了加、美人民的革命斗争情况和西班牙人民反抗德意法西斯的英勇斗争精神，又从西班牙谈到中国，谈到战地医疗的需要。白求恩还强调，他最能发挥作用的方式，是组织战地医疗队，抢救重伤员。毛泽东听后十分高兴，就请白求恩立即组织战地医疗队。接着，毛泽东还就国际形势，中国抗日战争的进程和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纲领等问题，同白求恩侃侃交谈。毛泽东对世界事物的广泛了解、精辟见解及其渊博的知识、深邃的思想、敏锐洞察力，给白求恩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谈话之后，白求恩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我现在明白，为什么毛泽东那样感动每一个和他见面的人。这是一个巨人！他是我们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sup>②</sup>

白求恩到延安后，见到从汉口来的一位加拿大医生理查德·布朗。他在汉口公理会医院外科工作，听到边区抗日游击战的消息，很受感动，于是请假三个月，到延安进行考察。布朗与白求恩相见后，谈论投机，成为白求恩的得力助手。

白求恩在延安，一方面参观边区的政府机关、学校，给延安的干部训练团和抗大学员作报告，更关心着延安的医院。在马海德、傅连璋的陪同下，医疗队全体成员参观了陕甘宁边区医院。参观后，白求恩在布朗和尤恩的配合下，做了扁桃腺摘除和膝关节伤等手术示范，受到伤病员和医护人员的感谢和称赞。还给干部们做了身体检查。接着，白求恩一行到拐峁的八路军医院，这是由一个手术队的基础上创办起来的医院，医疗队在这里对伤员进行了检查。

医疗队和延安人民欢度五一节后，白求恩率领医疗队，携带前线急需的药品、器械和衣物离开延安，于5月11日到达神木县贺家川。这里是八路军一二〇师收容伤员的医院驻地，白求恩到达后就急切地探视伤员，并将所带的衣物发给每个伤员。这时，白求恩将巡视过医院的情况写了报告给毛泽东，又给美国纽约援华委员会写信，请求每月拨1000美元到延安，购买药品和医疗器材，希望早日改善这里的医疗条件。

1938年5月底，白求恩在向晋察冀边区的进发途中，在松岩口医院为

<sup>①</sup> 转引自郑生寿主编《国际友人在延安》，陕西旅游出版社1992年10月版。

<sup>②</sup> 《国际友人在中国革命中》第117页。

521名伤员进行了检查，为147名伤员做了手术。这时，布朗的假期已满，不得不离开医疗队。

6月17日，白求恩在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受到聂荣臻司令员的热烈欢迎，接着被任命为晋察冀军区卫生顾问。在聂荣臻的支持下，白求恩首先发动医务人员和当地群众在松岩口建立抗日根据地“模范医院”，并开办附属卫生学校，培养医生和护士，推进了部队的医疗工作。此后，白求恩就带着医疗队，随军转战前线，抢救了数以万计的伤病员。1939年6月，白求恩在河北唐县编写《游击战中师野战医院的组织和技术》一书，还编写了《战地救护须知》等20多种教材。

1939年9月，白求恩为了向世界人民宣传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募集经费和购买药品，计划10月20日启程回加拿大，于1940年5月1日再返军区。但因日寇对北岳山区发动大规模的“冬季扫荡”，白求恩决定推迟原定的启程日期，率医疗队参加摩天岭的“反扫荡”。白求恩在一次给从前线抬下来的伤员做手术时，感染中毒，1939年11月12日在河北完县黄石村不幸逝世，遗体安葬在一个山谷里，晋察冀边区和延安各界相继举行了追悼大会，12月21日，毛泽东写下《纪念白求恩》一文，对白求恩无私的国际主义精神给予高度评价：

“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每一个共产党员，一定要学习白求恩同志的这种真正共产主义者的精神。”

1940年4月，晋察冀边区军民为在河北完县修建的白求恩墓举行落成典礼，同时决定将军区卫生学校和附属医院，命名为白求恩卫生学校和白求恩和平医院。1952年，白求恩灵柩迁到石家庄烈士陵园。

在1938年6月，白求恩从延安赴晋察冀前线时，医疗队的琼·尤恩则赴陕北清涧县卫生局，在医药器材供应站工作了一段时间，调到一二〇师的后方医院，6月底到山西岚县八路军一二〇师所在地，受到贺龙、萧克等八路军将领的热情欢迎和接待。尤恩稍作休息，便投入医治伤病员的紧张工作。9月份，尤恩因病返回延安，临行前贺龙亲自为她送行，对她在一二〇师的工作给予高度评价。尤恩到延安后，即取道西安、武汉，准备返回加拿大。但因战局的影响而辗转异地，又因工作的需要受史沫特莱等朋友之邀，继续为新四军救护伤员培训医护人员，长途运送药品和医疗器械等物资而奔波，直到1939年6月离开上海，回到加拿大。1981年尤恩写的回忆录《在中国

当护士的年月》一书出版，1984年译成中文。1985年5月再次访问中国，1986年逝世，1987年尤恩的女儿梅耶夫人遵其遗愿，将尤恩的骨灰护送到中国，安葬在白求恩墓旁。

### 三、印度援华医疗队

1938年，印度贾瓦哈拉·尼赫鲁提出一项援助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计划，国大党遂决定派遣以爱德华医生为队长的援华医疗队，并成立专门委员会，发表声明，募捐资金，筹集医疗器械。同年8月底组成印度援华医疗队，由以下人员组成：

队长：马登·莫汉拉尔·爱德尔，中国名字初称安德华，后改为爱德华。

副队长：姆·尔·卓克克，中国名字初称卓凯华，后改为卓克华。

队员：比乔埃·库马尔·马苏，中国名字初称巴思华，后改称巴苏华。德贝什·木克吉，中国名字初称慕克华，后改称木克华。德瓦卡纳特·桑塔拉姆·柯榔尼斯，中国名字初称可棣华，后改称柯棣华。

印度援华医疗队，于1938年9月1日从孟买登船启程，于9月17日抵达广州，受到了保卫中国同盟主席宋庆龄和广州各界代表的热烈欢迎。一周后再行北上，途经长沙，于9月29日到武汉。董必武、叶剑英代表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设宴欢迎医疗队一行。凯丰、叶剑英分别代表中共中央、八路军致欢迎词。10月7日，周恩来副主席在开完记者招待会后，会见了印度医疗队全体成员，向他们介绍了国内外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医疗队先后在武汉、宜昌、重庆工作近半年，于1939年1月22日离开重庆奔赴延安。2月12日，医疗队终于到达向往已久的延安，受到当地2000多名群众的夹道欢迎。

3月15日，柯棣华和其他印度医生在延安窑洞里拜会了毛泽东主席。毛泽东在询问了许多关于印度的情况之后指出，中、印两国人民长期遭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有许多共同点，应当团结起来，互相支援，互相学习。毛泽东还希望医疗队在工作中对医生、护士和领导人多提批评与建议。

在延安参观访问之后，柯棣华和爱德华、巴苏华被派往距延安东北约30华里的拐岭八路军医院，从事医疗工作，卓克华和木克华到八路军卫生学校从事教学工作。柯棣华被聘任为拐岭医院外科军医。柯棣华等人一到拐岭医院，立即投入到医院扩建工程之中，他们同医院工作人员一起，手持铁锹，埋头苦干。扩建工程完毕后，柯棣华、爱德华和巴苏华常常上午查病

房，医治伤病员，中午利用充足的光线做外科手术，下午到门诊室为战士和百姓看病。柯棣华等人在工作之余，经常与中国同事促膝谈心，听他们讲抗日战争，并向他们学习汉语和唱抗战歌曲。

印度援华医疗队原定援华时间一年，但在国统区已历半年，到延安后他们就决定延长时间。爱德华为此向印度发电报请示，回电同意他们的请求，但让卓克华和木克华早些回国。因此，5月底卓克华经西安返回，8月初木克华因病回国。

留在边区的爱德华、巴苏华、柯棣华继续工作。《新中华报》在当时就高度赞扬这三位国际友人。这里还应提及的是7月10日，周恩来不幸在延河边从马背上摔下来，右臂受了重伤。柯棣华、爱德华和巴苏华闻讯后，马上拿起药箱和听诊器由拐岭出发，连夜赶到杨家岭周恩来住处进行会诊和治疗。以后，他们每隔两三天就到杨家岭换药包扎。当他们看到周恩来忍着右臂伤痛，坚持用左手写字的情景时，不禁万分敬佩这位中国领袖。

11月3日，爱德华、巴苏华、柯棣华和德国米勒离开延安，于12月15日到达前方八路军总部武乡县。这时，爱德华因患湿疹严重，不得不回印度治疗。1943年7月，巴苏华回印度，准备组织印度援华第二支医疗队，因种种限制，未能实现。

柯棣华在 frontline 工作近三年，于1942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他更加忘我工作，把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当做自己的事业，奋斗不息，到12月9日因病逝世，年仅32岁。

柯棣华逝世后，晋察冀边区军民在河北唐县召开了追悼大会，将他的陵墓建在唐县。1942年12月30日，延安各界也召开追悼大会，毛泽东亲笔写了挽词：“印度友人柯棣华大夫，远道来华，援助抗日，在延安、华北工作五年之久，医治伤员，积劳病逝，全军失一臂助，民族失一友人。柯棣华大夫的国际主义精神，是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的。”

1957年，印度原援华医疗队巴苏华、卓克华、木克华和柯棣华之弟柯棣斯等来中国访问受到朱德的亲切接待。1958年叶剑英率领军事友好代表团到印度时，访问了柯棣华大夫的家庭。1974年，全印柯棣华大夫纪念委员会来我国访问时，在柯棣华大夫陵墓前栽树留念。1976年，为了永远纪念这位国际主义战士，在石家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举办了柯棣华大夫纪念馆。

#### 四、国际公谊救护队

1890年，国际性的宗教慈善组织——公谊服务会成立，总会设在英国伦敦。会员有英国、中国、美国、加拿大、新西兰等国基督教之友。第一、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该会曾组织救护队到战场服务。在华救护队于1941年成立。由六人组成，英国友人任桐年任队长，余金龙任副队长。队员有新西兰籍外科医生休斯、加拿大籍化验技师戴黎恪、英籍爱克斯光技师许岩礼、英籍护士甘贞安。

这支公谊救护队通过缅甸的普鲁德到达中国，都留在西南国际区为抗战服务。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去重庆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时，公谊服务总会移居重庆，经周恩来和王炳南多方联系，国民政府同意公谊救护队前去解放区。

1946年2月13日，公谊救护队在任桐年带领下到达延安，并带来三卡车计有7吨的救济药品及外科器材。任桐年到延安后向我解放区救济委员会提出一些良好的建议，希望各国教友在解放区单独设立医院，并建议救济会迁至中国沿海地区，以使许多国际友人能顺利送物到解放区。2月19日，朱德总司令在王家坪设宴招待公谊救护队六位朋友，并欢迎他们来延安工作。救护队在延安停留一周，对边区的实际情况作了考察。同年12月2日，公谊救护队六位成员由该会主任李为林陪同，从郑州乘飞机到延安，参加和平医院分院工作。救护队在医疗岗位上忘我工作，情愿和延安人民过同样的艰苦生活，并以此为荣<sup>①</sup>。

1947年3月国民党胡宗南进犯延安时，救护队随军转战，走到哪里，就在哪里建起临时医院，抢救伤病员。他们从1941年到1947年，在中国工作长达七年之久，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贡献。新中国成立后，部分队员曾多次来中国，或访延安。

#### 五、方禹镛

方禹镛，生于1893年2月20日，朝鲜京城医学专科学校毕业，后又到日本东京大学进修。1928年来到中国，初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抗战爆发后经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介绍，历经艰辛，于1939年夏到达延安，被安排到

<sup>①</sup> 晋察冀豫《人民日报》1946年12月21日。

当时新建在拐岭的八路军医院任内科主任。1939年12月1日，为了纪念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八路军总卫生部将军医院改名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并从拐岭迁移到柳树店。原址设为分院，方禹镛留任分院内科主任。

方禹镛在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将自己的知识、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医生，全心全意地为伤病员服务，对同志、对病员和蔼可亲，而且工作认真负责，深深地感动了病人和同志们。1943年2月20日，是方禹镛50岁寿辰，早在1月份国际和平医院就作出为他祝寿的决定，并于2月15日在《解放日报》发出通知。通知高度评价方禹镛为“医界先辈、内科专家，来延安已近五年，一向在和平医院工作，工作积极，待人和蔼，在病员及护士中间，素有‘妈妈’之称，他不仅治愈了无数病员，而且培养了很多青年医生。”毛泽东、朱德、贺龙等同志分别写了祝辞。毛泽东的祝辞是：“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当方禹镛接过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题辞时，激动得说不出话来。20日祝寿大会在柳树店医院大礼堂隆重举行，该院及延安医学界同仁纷纷前来为方禹镛祝寿。

方禹镛在和平医院里的工作尽管很繁忙，但在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中，他仍以普通一兵的身份积极参加，他每天按时学习文件写笔记。他深有感触地说：“这次整风力量真大，党中央的英明远见，从这次整风完全看得出来，对我的帮助太大了。”

方禹镛在工作、学习之余，还坚持参加生产劳动。他在住所旁边有一亩菜地，这便是他在大生产运动中，和夫人李德信一起开垦的。1943年，他的农畜业生产就收益15万元。

1945年9月，方禹镛离开延安返回朝鲜，和平医院为他举行了欢送仪式，并与各级领导合影留念。

## 六、米勒

汉斯·米勒，1915年1月13日生于德国斯朵夫一个小商人家庭。1933年8月只身离开德国来到瑞士，进入巴塞尔大学医疗系学医，获内科、外科和妇产科毕业证书。1938年获医学博士学位。因不满希特勒法西斯屠杀犹太人的暴行，1939年4月10日离开瑞士前往法国南部海港城市马赛，并从那里乘船赴香港。在香港通过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见到了廖承志，同中共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在地下党的安排下，米勒从广东绕道南京、桂林、重庆、成都、宝鸡等地，到达西安八路军办事处。



在西安，米勒会见了斯诺。当时斯诺刚从延安返回西安，他将自己在延安使用的日常生活用品留给米勒。1939年9月，米勒乘坐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派出的一辆救护车，离开西安抵达延安，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欢迎和接见。毛泽东同米勒一起吃饭，席间就当时德国侵吞波兰和英、法被迫向德国宣战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等国际形势征询米勒的看法。

米勒在延安，被派到拐岭八路军医院，同印度援华医疗队一起工作。一个月后，他就和印度援华医疗队一道提出，要去前线直接为战地服务。经过几天的准备、工作交接和欢送，即赴晋察冀抗日前线。米勒不仅在前线救死扶伤，而且在情势危机的时刻端起枪和敌人拼杀乃至带病工作，受到人们的赞扬。1943年1月，米勒奉命返回延安，一直工作到抗战胜利。他最初在联防司令部门诊部工作，后调往甘肃边区前线战地医院工作，最后在国际和平医院担任内科主任。在米勒的指导和带领下，在不长的时间里，医院面貌焕然一新，病员的健康恢复很快。

1945年，米勒思念祖国心切，决意回国。他携带朱德总司令的介绍信离开延安，经过张家口等地到达承德，但当时承德附近战火又起，米勒只得暂留此地等待时机回国。后应八路军卫生部门之请，决定继续留在中国。他在解放战争期间，救死扶伤，工作积极，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力量。解放军攻克天津后，米勒随军进城，同1945年参加八路军医院工作的日本护士中村结婚。

新中国建立后，米勒继续从事医务工作，1950年加入中国国籍，195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1949年起就在长春担任第三军医大学第一临床医院院长。

## 七、阿洛夫

安特烈·阿洛夫，1905年生于俄国的一位五金工人家庭。1922年毕业于莫斯科第一医科学院，是一位著名的外科专家。

1942年5月11日，阿洛夫奉命来到延安。为了迎接阿洛夫的到来，中共中央和延安医务界专门召开了欢迎晚会。阿洛夫在中央医院负责外科工作，兼管中央卫生所医疗事宜，为中共中央领导人治病。他还在医院设立了一个教学基地，专门培养外科大夫搞战地救护，先后培养出80多名外科大夫。

据延安《解放日报》记载：阿洛夫几乎每天要工作长达15小时之久，

临睡前还必须遍查病房看视病人。对于重病人他日夜看护。远近急症，只要他得到通知，不论风雨昼夜，他都立即前去救护。据统计，他每天为救护病人要跑 20 里以上的山路。

阿洛夫医术高明，他为了节省药品，免除病人痛苦，在医疗上做出许多发明创造。他利用香蒲制成药棉，吸水性强，效果很好；他用各种新式疗法为劳动英雄赵占魁治好了被熔铁烫伤的脚面；为党校运输员杜成仁治好被大车压伤的脚面；使延安县一位农妇双目复明；……为了表彰阿洛夫高尚的医德，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亲手将毛泽东书写的“模范医生”的奖旗授给他。阿洛夫激动地说：“愿把我一贯的工作精神永远用在治病救人上去。”

由于阿洛夫对工作高度负责的精神，使他所负责的中央医院外科成为该院各科学的目标。他的具体做法是，通过紧缩精简严明的分工以及建立各项制度，使每人均有明确的责任，不仅使工作能固定熟练，而且能很好地配合，形成紧张有序地工作作风。有人在参观他们的手术室后说，好像看到一部完整的机器，在加快动力时顺利而不紊乱地工作着。阿洛夫对外科的每位工作人员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谁在病历上写错了字都要返工，顺序也不许写颠倒。手术室领来的布或被单，他都要一尺尺的量过点清。每人每天的奖惩制度，也都由他按时记录。由于阿洛夫的出色表现，1944 年 7 月被评为陕甘宁边区医务界特等劳动模范。

1944 年 6 月 29 日，《解放日报》以《国际友人阿洛夫同志》为题，专篇发表通讯对阿洛夫的事迹进行报道和评价。该通讯指出：“阿洛夫同志在和平医院第一部（即中央医院）的两年工作中，已给我们的医务界注射了不少的新血液，开辟了医务工作者一个新的方向，无论在思想、技术或工作作风上，都起着转变和革新的先锋作用。”

抗战胜利后，阿洛夫为给延安购置药品返回苏联。1946 年 1 月又回到延安。1947 年随中共中央后方委员会渡过黄河到达山西。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回国。

## 八、傅莱

傅莱，1920 年诞生在维也纳一个裁缝家庭，中学时就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加入奥地利共青团。1938 年，法西斯德国吞并奥地利，傅莱不堪忍受法西斯铁蹄下的蹂躏，1939 年 1 月 15 日流亡到中国上海，又到天津在

奥地利人办的德美医院化验室工作。后经北平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投奔八路军，受到聂荣臻司令员的接见，被安排在白求恩学校，同印度援华医疗队的柯棣华一起工作，曾受到毛泽东、朱德、聂荣臻等领导的赞扬。

1944年秋，傅莱受组织委托向朱德汇报前线的医疗工作时，被分配到延安中国医科大学从事传染病内科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傅莱是边区第一个生产外用青霉素的医生，在当时的临床应用上有较好的疗效。在此期间由聂荣臻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时年24岁。傅莱在紧张的工作外，还经常骑马到延安城开会，先后给刘少奇、贺龙、王稼祥、徐向前、王震、胡耀邦等领导看过病，受到领导和军民的普遍赞扬。1945年抗战胜利后，被调离延安，到晋察冀工作，担任华北卫生部顾问。

新中国建立后，傅莱加入了中国国籍。50年代，在重庆医学院卫生系教授保健组织学。1962年，曾携全家前往奥地利探亲。归来后，调北京中国科学情报研究室工作。1983年光荣地担任了全国政协委员。他作为中国医学科学院顾问和医学情报研究所副所长，坚决表示在有生之年将努力工作，继续贡献。

## 九、罗别愁

罗别愁，1899年生于捷克斯洛伐克的首都布拉格。她的青少年时代都是在故乡度过的，并获得牙科博士学位。1938年法西斯德国吞并捷克斯洛伐克，次年罗别愁带着儿子流亡美洲。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简称“联总”）为中国物色牙科医生时，罗别愁自愿申请前往。经批准，从美国华盛顿乘飞机到上海，又经天津、北平到太原。这时她又向“联总”提出要赴延安，经同意，她兴奋地将这一消息写信告诉她在美国的儿子。

1946年10月21日，罗别愁踏上向往已久的延安，被安排到延安白求恩和平医院工作。对她来说，这里的医疗设备和生活条件虽然很差，但并没有使她感到苦恼。她说：“这里虽然什么都缺，但却有一样宝贵的东西——人的团结和共同奋斗，使生活变得美好起来。”罗别愁怀着愉快和兴奋的心情投入紧张的工作，上午开办口腔疾病讲座，培养学生，下午为病人治病。使罗别愁特别难忘的是1946年12月的一天，她为毛泽东治牙病时的相谈，临别时毛泽东将自己的一张半身照片送给她，在背面写“罗大夫存念，毛泽东”。在延安，罗别愁还结识了朱德、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这年初

冬，国民党军队进攻陕甘宁边区时，边区卫生部长苏井观告诉罗别愁，中共中央决定撤离延安，在陕北开展游击运动战，并描述了路途的艰辛和山区的困难，征求她是乘最后一批飞机离开延安，还是随总部撤往山区？罗别愁表示，我愿意和朋友们在一起，共同度过未来的岁月。从而开始了随军撤离延安的生活，到1947年2月，“联总”要求她回北平时，她和大家都非常难过，忍不住流下泪来。罗别愁到北平后提出再赴延安工作三个月的请示。这时，国民党军队已兵临延安城下，从北平到延安的空中交通已经中断，但罗别愁毫不犹豫，不远万里，转道上海、南京，再次飞往延安和边区军民一起战斗、生活。

在晋绥解放区总部，罗别愁结识了贺龙将军并在他的支持下办起了战地医疗所。当时罗别愁在治病、授课之外，还挤时间写出有关卫生知识文章，在《晋绥日报》上发表。因为罗别愁在解放区工作的时限又到了，她怀着痛苦的心情，告别热爱的土地和人民，于1947年末到上海，次年2月返回捷克斯洛伐克。在此后30年的岁月里，她始终没有忘记中国。1977年在法兰克福逝世，留下遗嘱，将多年一直保存的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物转交中国。1980年2月，中国人民对外友协举行了隆重的、接受罗别愁遗物的仪式。

## 第六节 美国官员和军事观察组在延安

### 一、卡尔逊

埃文斯·福代斯·卡尔逊，1896年生于美国纽约州的西德尼。1912年始在美国海军陆战队服役，后晋升为中尉。1927年、1933年以美国驻华情报官员到中国。1935年奉调回国，任罗斯福总统的卫队副官。1937年8月第三次被派到中国，以美国海军部观察员的身份观察中日战争。卡尔逊到上海时，就目睹了淞沪抗战以及国民党军队的溃败，又听到中国共产党八路军在敌后坚持抗战的讯息，从而决心到敌后抗日战场去看看。12月中旬，卡尔逊辗转武汉、西安、潼关、临汾，到达洪洞县八路军总部，受到朱德总司令的亲切接待，使他了解到八路军的情况。接着赴五台山前线考察，次年2月28日回到汉口。

1938年4月，卡尔逊从汉口再次来到西安，接着到延安，先后拜访了毛泽东、张闻天、萧劲光等中共和八路军领导人，观看了延安军民的军事训

练，访问了一些机关、学校和群众团体。5月5日夜，毛泽东会见卡尔逊时，握着他的手说：“听说你跟我们的部队跑了很多地方，我很高兴能在这里欢迎你。”谈话一直进行到次日凌晨，主要内容是对形势的分析和对未来的预言。在谈到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时，毛泽东指出：“中国像一个能盛一加仑的细颈瓶，而日本灌进了半品脱水（一品脱等于八分之一加仑）。日本兵力不足，无法占领整个中国。只要中国人民决心继续抵抗，日本就无法用政治手段控制中国。”谈到日美关系和欧洲局势时，毛泽东说，日本和美国总有一天会打起来，英国人决不会因德国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而向希特勒宣战。另外，毛泽东还向卡尔逊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政策和战后目标，呼吁国际进步力量援助中国抗战，并希望美国政府制裁日本而不要向其出售军用物资。5月15日，卡尔逊离开延安，继续他的第二次华北之行。毛泽东委派刘白羽、欧阳山尊、金肇野、林山、汪洋等人陪同他一起前去，并由欧阳山尊任翻译。此后，卡尔逊赴内蒙古、山西、河北、山东敌后访问，于8月上旬返回汉口。卡尔逊在汉口遇到了一批美国记者，向他们叙说了在中国的见闻：日本人根本没有控制住他们声称占领的全部地区，在那里有着广大的抗日根据地，中国共产党八路军正与日本侵略者进行艰苦的战斗。这些新闻很快在美国芝加哥《每日新闻》、《纽约时报》和《时代》杂志上相继报道。但却引起美国 and 国民党一些人的不满，到9月，卡尔逊就接到不得在公开场合发表谈话的命令，并要他立即回国。面对这种情况，卡尔逊为了能获得自由发表意见，向海军军部提出辞呈，同年12月回到美国。

在以后的岁月里，卡尔逊继续就他在中国的见闻发表演说、撰写文章。1940年在美国出版了《中国陆军》、《中国的双星》。在其著述中明确地指出：中国共产党是最生气蓬勃最进步的政治组织，中国国家“力量的源泉首先在于中国共产党”，在八路军里，从上到下都感到“友好、自信和民主”，这支军队的力量源泉，就在于思想政治工作，而干部以身作则，官兵一致，这是与国民党军队最根本的不同。这些论述，在海内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卡尔逊在罗斯福总统的支持下建立了一支海军陆战队，在战争中取得胜利，成为英雄人物。1947年卡尔逊在美国逝世。

## 二、赫尔利

赫尔利，1929—1933年美国总统一胡佛时期任陆军部长，1931年曾来华访

问。1944年8月以罗斯福总统私人代表身份再次来华，10月任美国驻华大使。

1944年11月7日，赫尔利到延安。8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与赫尔利会谈达成五点协议，主要内容是：成立各党各派无党派的联合政府和联合统帅部；实行民主改革；承认装备和统一所有的抗日力量；承认所有党派的合法性等。10日，赫尔利在周恩来的陪同下，乘飞机返回重庆。但是，五点协议为国民党所拒绝，而赫尔利也自食其言，力促中国共产党接受蒋介石的无理要求。中国共产党对此给予拒绝和揭露。1945年4月2日，赫尔利在美国国务院的记者招待会上宣称：美国只同蒋介石合作，不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日本投降后，赫尔利执行公开干涉中国内政的政策，引起中美人民的激烈反对。赫尔利于1945年9月返美，11月被迫辞职，1963年逝世。

### 三、美国军事观察组

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加入国际反法西斯战争。12月9日，中共中央即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太平洋战争的宣言》，并向党内下发了《中央关于开展太平洋反日民族统一战线及华侨工作的指示》，明确提出与英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重要意义和真诚合作的态度。此后，中共驻重庆代表周恩来和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在与美国官员的接触中一再表示，欢迎美国派代表访问延安和解放区。加之美国驻华外交官员和军队中的有识之士已对消极抗日和腐败无能的国民党表示不满，因而希望美国政府与中共建立联系。

1943年1月23日，美国驻华使馆二等秘书谢伟思在回国述职之时，向美国国务院提出派代表团访问中共根据地的建议。6月24日，美国驻华使馆又一二等秘书戴维斯在报告中，进一步建议美国政府在中共控制地区，设立总领事馆并派一个军事观察团“进驻那里”。1944年1月15日，戴维斯在给美国总统助理霍普金斯的报告中，再次提请白宫加快与中共建立联系的步伐，并认为应由总统直接出面提出请求。2月9日，美国总统罗斯福致电蒋介石，提出派参观团去延安的要求。但国民党政府深怕解放区的真实情况为国内外了解，致使他们对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歪曲、诬蔑遭到破产，故对美国政府的要求拖延阻挠。6月21日，美国副总统华莱士抵达重庆，当面向蒋介石提出罗斯福总统关于派军事代表团的要求。6月23日，蒋介石被迫同意，但为了降低代表团的规格把名称改为“美军观察组”。

1944年7月22日，第一批美军观察组到延安，有下列人员组成：

戴维·D·包瑞德上校，观察组组长。

约翰·S·谢伟思先生，大使馆二等秘书，中缅印战区司令部政治顾问。

梅尔文·A·卡斯伯格少校，医疗队员。

雷·克罗姆林少校，美军航空兵。

约翰·C·科林上尉，步兵。

查尔斯·G·斯特尔上尉，美军航空兵。

保罗·C·多姆克上尉，信号兵。

亨利·S·惠特尔西中尉，步兵。

安东·H·雷米尼赫，空军参谋军士，信号兵。

1944年8月7日，第二批美军观察组到延安，包括下列人员：

雷蒙德·P·卢登先生，大使馆二等秘书，中缅印战区司令部顾问。

雷金纳德·E·福斯中校，美国航空兵。

威尔伯·J·彼得金少校，步兵。

查尔斯·E·多尔少校，美军航空兵。

布鲁克·多兰上尉，步兵。

西蒙·H·希契上尉，美国海军。

路易斯·M·琼斯中尉，美国航空兵。

沃尔特·格雷斯中士，信号兵。

乔治·I·奈尔莫罗，应征入伍者。

为迎接美军观察组的到来，中共中央做了多方面的具体安排，军委秘书长杨尚昆专门向延安交际处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接待美军人员的方针，要求交际处工作人员积极主动地帮助美军人员做好工作，坦率、正面地解答他们提出的问题，开诚布公地交换意见。在生活上要热情、周到，给予优待和照顾。同时还要提醒他们必须尊重中国民族的尊严和风俗习惯，不得把资本主义的一套带到延安来。总之，既要表现出共产党人的胸怀和气魄，又要不卑不亢，把握好交往分寸。

第一批美军观察组乘飞机抵达延安时，周恩来、叶剑英、杨尚昆等人前往迎接。据美军观察组长包瑞德回忆说：周恩来“向我们介绍了来到现场的另一一些重要的共产党人。然后我们被请上一辆卡车，我相信这东西是他们当时惟一的机动运输工具。我们坐车过了河，向我们的住所——著名的延安窑洞驶去。”此后，交际处用自制的面包、果酱、牛奶、猪排等设宴为观察组

成员洗尘。因为当时交际处在大生产运动中自己动手创造了“足食园”，所以宴席还是比较丰盛的。

当天晚上，观察组即向交际处提出架设电台的请求，金城处长征得杨尚昆秘书长和叶剑英参谋长同意，第二天一早派人帮助观察组架设好电台。上午观察组即同设在重庆的中缅印战区总部通电联系。包瑞德等高兴地说：“你们的办事效率真高，这样的工作速度在重庆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

在以后的几天里，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和其他党、政、军负责同志分别接见或设宴招待观察组成员，并举行欢迎晚会。8月15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题为《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战友们！》的社论（详见本书“附录四”）。

观察组成员到达以后，直接与他们联系的便是交际处。交际处工作人员引导他们参观游览，并请他们参加舞会和文艺晚会等。当时，观察组每月有一趟从重庆飞至延安的班机，时常带来一些美国故事影片和记录片，在观察组驻地或王家坪、杨家岭礼堂放映，他们也常常邀请交际处的人员参加。

观察组在延安期间，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都亲自和他们谈话，详细介绍中国共产党对形势、任务及中美、国共关系的看法。尤其是毛泽东，同谢伟思作了多次长谈。毛泽东强调指出，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完全独立自主的政党，不受任何外力的支配，将一如既往地为实现自己的目标而奋斗。中国共产党坚持团结，反对内战，要求成立联合政府。中国共产党对美国的政策是寻求美国对中国民主事业的支持和抗日方面的合作。毛泽东希望美国政府对国民党施加影响，使其尽快实行民主，放弃消灭共产党的企图，把抗日战争进行到底（谈话内容详见本书“附录五”）。

另外，美军人员还听取了叶剑英、彭德怀、陈毅等人关于敌后战场情况的介绍。

美军观察组除在延安活动外，还到晋绥和晋察冀根据地考察、访问。在此期间，他们发表了很多讲话，写了许多调查报告，比较客观地反映了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抗日根据地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情况及中共的方针、政策，特别是谢伟思，先后写了50多份报告。他在1944年7月28日第一次发回的调查报告中说：“延安民众官兵打成一片，路无乞丐，家鲜赤贫，服装朴素，男女平等，妇女不穿高跟鞋，亦无口红，文化运动极为认真，整个地区如一校园，青春活泼，民主模范，自修、自觉、自评，与重庆另一世界。”戴维斯1944年11月7日的报告便是根据谢伟思向“中缅印战区美军



将级指挥官”的报告而写成的。该报告说：“中共已经强大得可以指望在战后至少能控制华北。中共不仅也可能保持扬子江流域目前中共统治下的若干部分，并且可能保持华中、华南的地区。”“蒋介石的封建的中国是不能同中国北部的充满生气的现代的人民政府长期共存的，共产党一定会在中国扎根。”“共产党的政府和军队，是中国近代史中第一次受到积极的广大人民支持的政府和军队，它们得到这种支持，是因为这个政府和军队真正是属于人民的。”“中国的命运不决定于蒋介石，而决定于他们。”

总之，美军观察组在延安及其他敌后根据地的考察以及他们从延安向美国政府发回的大量报告，既加深了美国政府和人民对中国真实情况的了解，又促使他们对国民党施加压力继续抗日，同时还使中国共产党获得了国内外人民更普遍的同情和支持，有利于继续开展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工作。但遗憾的是，美军观察组成员的正确认识，不能决定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的，观察组主要成员先后被调离。1944年底，包瑞德上校被免去观察组长的职务，由莫里斯·迪巴斯和伊凡·耶顿两位上校相继接任，观察组的地位开始下降。1946年4月20日，观察组组长耶顿和部分成员离开延安，其他人员转为北平军调处领导。并于6月24日，命名为延安联络组，1947年3月11日，全部撤离延安。美军观察组在延安期间，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与谢伟思、包瑞德的主要会谈内容详见本书“附录五”、“附录六”。

美军观察组旧址，位于延安北关云梯山下。这里原是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所在地，一直由延安中学保护使用。现在保留有大门和8孔石窑洞。中外人士很留恋这个富有意义的地方，常有人远道前来参观。1971年9月26日，谢伟思应周恩来之请重返延安时，曾深情地站在那熟悉的窑洞前摄影留念，1978年5月，以原陆军上尉保罗·多姆克为团长的美军观察组成员访华团重访延安，重温了那一段难忘的日子。1986年，国家拨款，对该旧址予以整修，并挂上“美军观察组旧址”的牌子，以供参观。现在这里已成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 第七节 外国其他团体、人士访延安

### 一、洪水、胡志明

洪水，原名武元博，又名鸿秀，1906年生，越南河内人。早年留学法

国，回国后从事学生运动。1925年受越南地下党派遣来到中国。1929年第二次来中国，在广东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4年10月随中国工农红军长征。1936年10月长征结束后来到陕北保安县，进入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第一科学习。该科主要训练红军团以上高级干部，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中共中央和红军领导人常去学校讲课和作报告。师生们共同克服种种困难，以石洞作校舍；石壁当黑板，膝盖当课桌，以顽强的毅力认真学习政治理论和军事战略。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洪水从陕北抵达山西武台山地区从事抗日工作，历任中共晋东北地委宣传部长、晋察冀边区《抗敌报》社社长等职。曾在延安《解放》周刊、《晋察冀日报》、《抗敌报》等报刊上发表了大量宣传抗日的通讯、诗歌和理论文章，对抗战争起了积极作用。1945年回国，参加越南全国起义，先后担任越南第四、五战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为越南的民族解放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1951年第三次来中国，1955年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并荣获三枚一级勋章。1956年洪水又回到越南，10月21日在河内病逝。

胡志明，原名阮必成，曾用阮爱国、李瑞、王山、胡光、宋文初等名，最后改名胡志明，1890年5月19日生于越南义安省。早年求学于顺化中学，曾任小学校长。1911年以海员身份出国，遍历法国及西欧、非洲和美国的重要港口，曾侨居美国，定居法国。1920年在法国加入共产党，1924年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1930年领导建立越南共产党（后更名为印度支那共产党）。

1938年底，胡志明从莫斯科到中国，经西安到达延安，受到毛泽东、王稼祥等中共领导人的欢迎。胡志明此行的目的，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以中国为基地向越南国内开展革命工作。他还化名胡光，在延安参加八路军，和中国人民并肩战斗。1941年，胡志明在越南发起建立“越南独立同盟”，当选为主席，领导人民反对法国殖民者和日本侵略者的游击战争。1945年9月，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任临时政府主席。1946年3月，当选为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1951年2月，印度支那共产党改称越南劳动党，胡志明当选为党中央委员会主席。1969年9月3日，因病在河内逝世。

## 二、世界学联代表团

世界学联，也称国际学联，全称世界学生保障和平自由文化联合会，会址设法国巴黎。根据共产国际、少共国际的指示，世界学联于1938年组成

代表团。团长柯乐满，法国人，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在巴黎大学专攻世界现代史，主持世界学联常务工作。团员有英国人傅路德、加拿大人雷克难、美国人雅德，他们在各国学生中都具有代表性。

1938年6月，代表团到汉口，与八路军驻汉口办事处联系，要求赴延安参观访问。周恩来同志为他们做了周密的安排，并电告党中央及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给予热情接待，同时还安排新加坡《星洲日报》记者黄薇和、《南洋商报》记者胡守愚2人随行采访、报道。

代表团从汉口到达西安，一住进旅店，就被国民党当局暗地派出的特务控制起来。国民党“抗敌后援会”主任冯慕鸽在代表团居住的旅店门口租借一间房屋，凡要会见代表团的人须先经冯的允许，否则不准进去。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伍云甫处长前去与代表团联系，受到冯慕鸽等人的极力阻拦。后宣侠父（十八集团军高级参议）不顾一切闯进去与代表团取得联系。柯乐满等人紧紧握住宣侠父的手说：“我们总算把你们找着了！我们找八路军办事处找了很多天都没找到，真把我们急坏了。”<sup>①</sup>当时，冯文彬在西安负责“西北青救会”的工作，也同柯乐满等人取得联系。冯以延安“青救会”的名义，热忱欢迎他们去延安。

6月29日，代表团风尘仆仆抵达延安，受到延安万余群众的热烈欢迎。人们打起写着英文和中文的“欢迎世界学联代表”的旗帜。当柯乐满一行走进欢迎会场时，群众高呼：“全世界青年团结起来！”“援助中国人民抗战！”“为和平、民主、自由而奋斗！”“欢迎世界学联指导边区青年运动！”中国共产党代表李富春，八路军代表滕代远、萧劲光，边区抗敌后援会主任毛齐华，青救会代表高朗山参加了欢迎会。边区青年高朗山代表边区20万青年致欢迎词说：

今天，我们和我们最亲爱的国际弟兄们见面了，心里的喜悦是不能加以形容的。你们到中国，一定会看到中国千百万群众踊跃走向斗争中来，也一定会看到残暴的日寇正肆意残害无数的中国青年和中国人民。希望能经过你们，把中国的实际情况在全世界面前宣布出来，推动他们来帮助中国青年。

接着，柯乐满讲话。他说：

在抗战前，中国早已有了学生运动；后来听到上海、北平、天津等

<sup>①</sup> 《延安交际处回忆录》第41页。

地反日示威运动，就很希望看看中国青年的伟大精神。今天，希望完全实现了。我们看到中国许多青年都团结起来了，并英勇地参加了为民族解放事业的斗争。全世界青年也团结起来了，募集了几十万几百万现金捐给中国，美、英、印学生领导抵制日货，三十多个国家学生要求国际来制裁日本，援助中国，我们相信中国一定能胜利。

雅德女士代表美国学生讲话说：

我来到中国，很清楚地看到中国人民正在为中国的自由解放而奋斗着，同时也为世界和平、民主奋斗着。抗战后，美国学生就开始抵制日货。有的女学生把自己的丝织衣撕碎，因为是日货。学生还用捐款等方法来援助中国。我们要扩大这一运动，推动政府参加，因为中国人民的胜利，就是美国人民的胜利。最后，我还要向中国妇女致敬。她们参加了各项抗战工作，表现了非常英勇的精神，是全世界妇女们的先锋队。<sup>①</sup>

欢迎会在热烈的掌声和口号声中结束。

第二天，陕甘宁边区各界民众抗敌后援会在延安市政府俱乐部召集座谈会，代表团全体人员 and 边区总工会、文协等 20 多个群众团体出席。抗敌后援会主任毛齐华作报告，介绍了后援会的性质、任务、组织和活动等方面的情况，特别强调了边区民众武装在抗战中的作用。同时回答了客人们提出的问题。会后设宴招待了他们。下午，代表团参观了党校和陕北公学。

7月1日中午，中共中央按照西方习惯，举行鸡尾酒会招待学联访华代表团。为了适合青年的特点，会场安排在西山脚下中央组织部旁边的桃园里。到会代表有四五百人。毛泽东首先致欢迎词说，世界学联对我国的援助，我们表示谢意！“抗战虽然是要自力更生，但也需要国际援助。因为日本有侵略朋友，侵略者结成了统一战线，在世界上造成了灾难。我们也要与世界人民团结，战胜法西斯。”接着，青教会代表冯文彬，边区文协代表柯仲平，代表团团长柯乐满，团员雷克南也先后讲了话。柯乐满在讲话中说：

参观党校和陕公后，看到许多青年抛弃了过去舒适的生活，而来到这里艰苦地学习，这证明了中国青年抗战的热忱。我们这次来中国，沿途民众团体（如香港、新加坡等）还托我们慰问你们。中国的抗战，鼓励了世界人民。我们相信，中国人民的团结，一定能战胜日寇。

<sup>①</sup> 《新中华报》1938年6月30日。

大会结束后，中央设宴招待了他们。晚上，柯乐满等参加延安各界群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7 周年大会。

2 日上午，毛泽东接见了代表团全体成员，和他们进行了重要谈话。毛泽东向他们讲述了中国边区的作用和意义，并指出，边区的性质就是抗日民主的堡垒，而我们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作用就是要竭力坚持扩大统一战线。我们要做好持久战的准备，只有加强和扩大统一战线，争取日本人民的帮助，争取国际上的支援，我们的抗战才有缩短的可能。在回答代表团提出的抗战后的任务时，毛泽东说，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在自由平等的基础上建立一个人民共和国。在谈到青年运动的任务时他又指出，中国青年、学生在抗战中的特殊责任是为了争取本身的权利、受教育的机会和教育改革而斗争。而世界青年和学生在支持中国革命方面的使命，就是要向各国介绍中国的情况，敦促各国政府向中国提供大量援助。代表团的全体成员对毛泽东的亲切接见和重要谈话感到十分满意。

7 月 3 日，代表团参观抗大。抗大举行隆重的仪式授予他们每人“游击博士”称号，并赠送纪念章。团长柯乐满兴奋地说：“我活了二十四岁，今天是最光荣的一天。”雅德按西方人的习惯说：“我愿意把我的手给我们的首长去吻。”他们决定要为抗大募捐，并要抗大提出数目。

八路军送给代表团一面锦旗，并送给每人一套军装，一顶缀有红星的红军八角帽，一根皮带和一双草鞋。他们高兴地当场穿戴起来。

傅路德还对延安交际处金城处长说，他的弟弟在他来中国的时候曾对他说：“你这次到中国，如果能得到一张毛泽东先生的照片，并且能请他亲笔签了字，我可以不要我的全部财产。”

代表团还参观了鲁迅艺术学院、印刷厂、报社、边区高等法院和监狱，对边区各方面的情况有了比较深刻的了解，留下了极好的印象。就连陪同代表团参观的国民党特务宋如海也不得不承认：“代表团这次来中国访问了十三个地方，印象最好的还是延安。”

7 月 4 日，代表团离开延安，抗大、陕公、自卫军及民众团体在南门外举行欢送会。冯文彬同志致欢送词，他代表边区青年和人民对代表团来延安考察表示感谢，并希望他们把我国团结抗战与青年积极为民族解放斗争的精神告诉世界朋友，希望世界青年团结起来援助我国抗战，督促政府采取有效办法援华制日。冯文彬最后代表中国青年宣誓说：我们要为争取民族解放和保卫世界和平而努力奋斗，并在抗战中建立起一个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

国。随后，各团体、各学校向代表团献旗。接着，雷克南、傅路德讲话说：

到中国后，特别在延安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对统一战线的忠实执行，看到延安人民抗战热忱的高涨，真出乎我们的意想。在此把各党派、各阶层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真使我们与世界青年兴奋极了。我们要把在延安看到的一切不隐瞒地向世界人民宣布，使你们的斗争取得比现在还要大几十倍几百倍的援助。

欢送会结束后，代表团在热烈的口号声中乘坐汽车离开延安，后经西安、武汉，赴美国出席第二次世界青年大会。

### 三、陈嘉庚与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

1940年2月，侨居南洋的华侨领袖陈嘉庚，在新加坡发起组织并正式成立了“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此后不久，他亲自率领该团回国访问。

陈嘉庚之所以组织慰问团回国，主要是由于1939年冬，蒋介石在天水行营发出一份关于陕甘宁地区国共发生摩擦经过情况的报告，引起海外华侨的不安。为查明事实真相，他决定成立慰问团回国考察。正好在此之际，重庆方面来电，邀请他参加1940年4月1日在重庆召开的国民参政会议。他于3月初由新加坡乘船到缅甸仰光，26日由仰光乘飞机抵达重庆，一下飞机即向前来迎接的重庆各界人士及新闻记者阐明此次回国的目的：一是向抗战军民致敬慰之意；二是考察战时国内状况，以使海外华侨更好地以外汇财力资助祖国抗战。至于慰劳考察行程，他郑重地表示：“八路军所在地延安，如能到达，余亦拟亲往视察，以明真相，庶不负侨胞之委托。”<sup>①</sup>

国民党当局对陈嘉庚欲往延安一事感到十分不安，遂百般阻挠，但终未能奏效。5月31日，陈嘉庚与筹赈会常委侯西反，“南侨总会”秘书李铁民，在陕西省主席蒋鼎文所派的省府第一科科长寿家骏的监视下，由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统战科长居进陪同，从西安经洛川抵达延安。王明、吴玉章、高自立、萧劲光等人在交际处门口迎接他们。稍事休息后由交际处人员陪同到南门外运动场出席欢迎大会。欢迎会由陕甘宁边区政府代主席高自立主持，他代表边区政府致欢迎词说：

抗战以来，南洋侨胞尽了最大力量帮助祖国抗战，捐款总数在二万元以上。陈先生在二届参政会上还提出反对汪精卫投降妥协的议案，

<sup>①</sup> 《延安交际处回忆录》第139页。

这些都表示了海外侨胞热烈拥护祖国抗战的精神。我们也恳切希望陈先生诸位对边区多多指教批评。

接着，陈嘉庚首先说明这次回国的目的，然后强调指出：“南洋一千一百万侨胞最关心的，就是国内团结问题，今后应当消除一切摩擦，不分党派，共同合作。”侯西反、李铁民、寿家骏也应邀相继讲了话。

6月1日，在交际处人员的陪同下，陈嘉庚、侯西反、李铁民、寿家骏参观了延安女子大学，朱德总司令也到女大陪同参观。下午，陈嘉庚和侯西反按预定计划去杨家岭会见毛泽东。毛泽东与他们谈话时，朱德、王明等作陪，由女大两闽南学生做口头翻译（陈家庚不会普通话，只能讲闽南话）。陈嘉庚对中国共产党进行反摩擦斗争不理解，他认为在国共两党关系上，共产党应多做让步，要以团结求团结。为此，毛泽东耐心地向他解释说：因为国民党中的顽固派企图消灭我们，他们千方百计地要扫除共产党这个障碍，以便毫无顾忌地投降日寇。所以，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我们只有对他们在政治上、军事上的进攻给予适当的还击，才能使他们承认进步势力及各抗日党派、团体的地位，不敢轻易向敌人妥协和发动全面内战。我们的政策是以斗争求团结。若以团结求团结，不但达不到团结的目的，而且进步势力也会横遭摧残，统一战线也必将破裂，全国将重新陷入内战之中，以最终亡党亡国。晚上，由毛泽东、朱德和王明陪同陈先生一行参加文艺晚会。

2日上午，高自立会见陈嘉庚等3人，向他们介绍了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施政纲领和实际状况，并说明准备实行“三三制”组成的政权。翌日中午，女大华侨和闽南学生来看望陈嘉庚，大家正一起吃午饭时，朱德总司令也前来助兴。晚上，朱德请陈嘉庚一同去抗大三分校参加欢迎会并纪念该校成立四周年。会上，第三分校校长许光达说，抗大已为中华民族培养了几万军政干部，今后还要继续发展。许光达并援引抗大总校政治部主任胡耀邦的话说：“抗大、抗大、越抗越大”，我们已办了一个总校，七个分校，将来还要继续发展。陈嘉庚对此忧心忡忡，认为这将引起国民党疑虑，增加两党摩擦。第二天，当八路军留守部队司令萧劲光前来看望他时，他直言不讳地说：“昨天听校长讲话，说还要开办四五个分校。你们这样扩充军队，必使中央疑虑，摩擦怎能停止？”萧劲光向他解释说：

我们扩军都是在中央无法发展的敌后进行的。现在日寇加重了在敌后的力量，不断进行大规模扫荡。我军生活待遇微薄，军备条件更差，不扩军就无法抵抗强大的敌人。而且有一部分国军总从背后袭击我们，

千方百计地要消灭我们，去年十二月到今年三月还搞了一次反共‘围剿’。这次‘围剿’被我们打退后，又不断制造反共摩擦，真是必欲置我于死地而后快。况且中央的扩军比我们要快得多。这都是有目共睹的事实。我们扩军抗战，都在敌后，不是用来搞摩擦、打内战，只是为抵抗敌人，为自卫和破坏敌伪政权。我们不扩军，在这种前后夹击的处境中只能被消灭。

通过这番解释，陈嘉庚表示谅解。

这天，陈嘉庚、寿家骏还与边区政府建设厅长刘景范会见。刘景范详细介绍了边区的工农业建设和人民生活情况，陈嘉庚听后很赞赏。

陈嘉庚作为远居海外的华侨资本家，因受国民党的长期欺骗宣传和重重封锁，对诬蔑共产党是“共产共妻，杀人放火无恶不作的恶魔”，在共产党的地盘上“不但资本家没有生存的余地，而且男女混杂，人伦不讲”等谣言半信半疑。为此，他总是多方向学生尤其是华侨和闽南学生了解边区的具体情况。在女大参观时，他约两位华侨女生到招待所来叙谈，不觉天色已晚，陈嘉庚问她们自己徒步回校是否惧怕，是否需要派人送一程，一位女生说：“陈先生放心吧，我们一个人走夜路都不怕，两个人就更没有问题了。”陈嘉庚听后十分惊奇地说：“真想不到，共产党统治下的地方民风这样好，实在出乎我的意料。”

毛泽东后来又和陈嘉庚进行了多次交谈。6月4日下午，毛泽东到交际处与陈嘉庚一直谈到晚上10时左右。

6月7日，陈嘉庚一行决定离开延安前往山西。晚上，边区政府在中央大礼堂召开了欢送大会，毛泽东、朱德、洛甫、萧劲光等出席了大会。朱德代表党中央致欢送词。他说：

今晚我们欢送我们的侨胞领袖陈先生一行，他们在延安曾给了我们很多指教，这是我们非常感谢的。我们坚持抗战已经三年了，经验证明只要坚持团结，坚持进步，我们就一定能胜利。望陈先生把我们的意思转达给广大侨胞。

陈嘉庚、侯西反、李铁民先后讲了话。他们赞扬延安的艰苦奋斗精神，了解到共产党坚持抗战、坚持团结的决心，了解到延安真相，打破了国民党对边区共产党的造谣诬蔑。6月8日，陈嘉庚一行结束了这次考察访问，怀着惜



别的心情离开延安<sup>①</sup>。

访问延安是陈嘉庚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转折点。后来他在《南侨回忆录》序言中写道：“见其勤劳诚朴，忠勇奉公，务以利民福国为前提，并实行民主化，在收复区诸乡村推广实施，与民众辛苦协作，同仇敌忾，奠胜利维新之基础”，“如拨云雾而见青天”，“从此坚决转向拥护中国共产党”，这对一代华侨产生了历史性的影响。他回新加坡召集第二届南侨大会，宣布国共摩擦真相，指出“中国的希望在延安”。<sup>②</sup>抗战胜利后，陈嘉庚积极投身反蒋反美的民主运动，支持解放战争。1945年11月，毛泽东送他的“华侨旗帜，民族光辉”的祝词，成了历史性评价。

1949年陈嘉庚应邀出席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席，全国人大第一、二届常委，全国政协第二、三届副主席。1955年8月，再次访问延安。1961年8月12日，病逝北京，国家给予国葬，灵柩运回福建厦门，安葬于集美“鳌园”中。

#### 四、南洋华侨司机回国服务团

1938年11月初，马来西亚南部柔佛士乃州华侨司机回国服务团一行11人来到延安。服务团领队是彭士馨，团员有翁亚东、郭嘉、陈全、李玉、郑荀、丘乾水、李荀、黄国光、余林、彭士钦。

该团于1938年9月从柔佛士乃区出发，到达香港后，由廖承志介绍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通过伍云甫处长辗转至延安。除翁亚东和彭士钦来延安学习外，其余9人均为汽车工人。

服务团一行到达延安后，被安排在当年最好的招待所——西北旅社，总政治部还举行晚会和座谈会欢迎他们。服务团到后不久急于上前方参加游击队，并要求八路军写信给柔佛士乃区筹赈会，告知他们已经到达八路军防区，并已参加实际战斗生活。边区政府答应了他们的这一要求。

由于他们言语不通，有些人甚至只能说英语，鉴于此，边区政府建议他们在延安学习一个时期后再分配工作，但他们说：“我们如果不早日到前线

<sup>①</sup> 《新中华报》1940年6月4日、18日。

<sup>②</sup> 《陈嘉庚》，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10月版。

去，华侨的资本家会看不起我们的。”<sup>①</sup>并解释说，抗战开始以来，华侨回国已不少，但国民党统治区各地的做法都是让华侨把带来的捐款留下，让华侨回去，除飞机师外，其他侨胞都不用。许多侨胞在香港请缨无门，很是苦闷。在香港及新加坡有许多专门人才，他们都想回国服务，愿意来边区的人很多。如果八路军能留下他们并且让他们投入战斗，不仅会鼓励更多人回国服务，并且会使侨胞的救国情绪更加昂扬。

后经边区政府决定，让他们先去前方做宣传工作，鼓舞战斗士气，过一段时间再回延安工作。不久，翁亚东经陈云介绍进入抗大，彭士钦进边区中学学习。其余9人于11月20日步行去前方。

## 五、英国援华总会

1946年10月28日，英国援华总会会长克利浦斯夫人及其女儿彼其克利浦斯、总会秘书密勒夫人一行，在中国妇女指导委员会陈纪彝女士的陪同下，由太原乘专机抵达延安访问，朱德总司令，杨尚昆秘书长，陕甘宁边区政府林伯渠主席、李鼎铭副主席，中华解放区保育委员会康克清，中国“工合”解放区办事处熊天荆及中外记者等20多人到机场迎接。

当天晚餐，林伯渠主席、李鼎铭副主席在延安交际处设宴款待克利浦斯夫人一行，延安各界名流20多人出席作陪。

林伯渠对克利浦斯夫人一行访问延安表示热烈欢迎，希望克利浦斯夫人的来访能进一步增强中英两国人民的友谊。克利浦斯夫人感谢边区政府和人民对她们一行的热情款待。还说，她希望从各方面了解中国，如不来延安，一定会觉得来华之行是不圆满的。她希望中国在不久的将来能获得和平，并为取得和平而共同努力。

10月29日，《解放日报》发表题为《欢迎克利浦斯夫人来延》的时评，指出英国人民在援华总会的号召和领导下，对中国人民的抗战不断地给以支持和鼓舞，中国人民将永远不会忘记。时评希望克利浦斯夫人通过对延安的访问，能更清楚更全面地了解中国的真实情况，极大地促进中英友谊的继续发展与巩固。10月30日下午，毛泽东夫妇、朱德夫妇举行私人宴会，欢迎克利浦斯夫人。晚上，中央大礼堂举行盛大的联欢晚会。

克利浦斯夫人在延安期间，参观了西北医专、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洛

<sup>①</sup> 《延安交际处回忆录》第48页。

杉矶托儿所、第一保育院及总政医院门诊部、延安大学、光华农场、完小及附近各工厂。29日下午，中国解放区救济委员会秘书黄剑拓、中国解放区保育委员会康克清及十八集团军总卫生部副部长苏井观，分别与克利浦斯夫人、密勒夫人就解放区医药、保育、妇女工作进行座谈。

30日上午9时，克利浦斯夫人在外事组接受了新华社、《解放日报》、《群众日报》记者的采访。克利浦斯夫人首先介绍了英国援华总会的基本情况，然后逐一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10月31日上午9时，克利浦斯夫人一行乘专机离开延安前往郑州。朱德夫妇和中国解放区救济委员会、解放区保育委员会等各界人士20多人到机场送行<sup>①</sup>。

## 六、路易·艾黎与“工合”延安事务所

1938年春，中国工业合作社（简称“工合”）在汉口成立后，随即在西北、西南、东南三个地区设立办事处。1939年3月间，路易·艾黎由西安到延安，4月向边区政府提出设立“工合”延安事务所，经批准即成立，由曹菊如任主任，路易·艾黎任顾问。正如路易·艾黎所说：

“工合”延安事务所，“既区别国民党地区的‘工合’事务所，也不完全根据‘工合’章程。国民党变‘工合’为追求私利和进行剥削，而‘工合’延安事务所则是在陕甘宁边区政府领导下，遵照边区合作政策，与边区建设厅合作，推行各种合作事业，如生产、运输、农业、医药、消费、信用、供销合作社，直接为人民生活和战争服务。宝鸡办事处只是每月按章发给经常费，无权干预它的社务和业务。因此它有充分从边区实际出发推行合作经营的自由。”

同年12月，“工合”延安事务所在筹办中，艾黎第二次到延安，参观了一些初具规模的工厂。

1940年1月14日，在“工合”延安事务所驻地，路易·艾黎还接受了《新中华报》记者的采访。此后，他还参观了“工合”榆林事务所，在由榆林返宝鸡的途中，第三次到延安。这时，毛泽东、李富春、林伯渠、曹力如和曹菊如等，都热情地会见了。毛泽东对艾黎从事中国工业合作社工作给予高度评价。

<sup>①</sup> 《解放日报》1946年10月29—31日。

到1940年，“工合”延安事务所已建立起17个性质不同的生产合作社，社员386人，股金64087万元，贷款30839万元，每月平均生产总值为34470万元。其行业有纺织、被服、染布、制毡、鞋靴、皮毛、木器、榨油、医药、磨粉、陶瓷等，直接为人民生活和抗战服务。

1941年初，“工合”宝鸡办事处在国民党顽固分子的把持下，无故扣发按“工合”章程规定给延安事务所的经常费1500元。艾黎获悉后，严词怒斥，并毅然从“工合”总会给延安事务所拨款1500元。艾黎除慷慨解囊，捐出自己的全部积蓄外，还经常到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演说，向海外人士募集资金和物资，这些财物由重庆“工合”总会直接送到陕甘宁边区和新四军华中抗日根据地。正因为艾黎积极支援中国共产党的抗日，遂遭到国民党顽固派的仇恨和诽谤。

1942年9月21日，国民党当局解除了艾黎“工合”技术专家的职务。但这并未动摇艾黎对中国革命胜利的信念，他依然作为“工合”国际委员会委员，在以后的年代里，继续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尽心竭力，为世界和平事业不辞辛苦，积极从事国际活动。

1987年12月30日，这位同中国人民一起奋斗60年的新西兰社会活动家、共产党员病逝北京。

## 七、郑律成

郑律成，原名富恩，1918年生于朝鲜全罗南道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幼年时就喜爱音乐。1933年，在不堪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践踏下，随一批爱国青年来到中国南京，即投入在华的朝鲜抗日队伍。

1937年10月，郑律成在李公朴和林伯渠的帮助下抵达延安，进入陕北公学学习，再进入刚成立的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学习，创作了《延安颂》。1938年8月，郑律成从鲁艺毕业后，分配到抗日军政大学政治部担任音乐指挥。不久，他又创作了《延水谣》，还与词作者莫耶共同创作了6支歌曲组成的《八路军大合唱》。

1942年，郑律成离开延安，赴晋东南太行山八路军总部，担任华北朝鲜革命军政学校的教育长，到1944年返回延安。

1945年日本投降后，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郑律成回到阔别已久的祖国朝鲜，从事宣传、音乐工作。此时，他还谱写了不少歌曲，其代表作有《朝鲜人民军进行曲》（朴世永词）。

1950年，经中、朝两国领导人协商同意，郑律成转为中国国籍，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中央乐团专门从事音乐创作，于1976年因病逝世。

郑律成一生谱写了360余首（部）音乐作品，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延安颂》、《延水谣》等歌曲早已脍炙人口，特别是《八路军大合唱》中的《八路军进行曲》，以雄壮的旋律，超凡的气魄，为英勇抗战的八路军建造了一座崇高的丰碑。这首歌曲在解放战争时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1951年定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1953年又改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1988年将它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沿用至今。“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不仅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庆典、阅兵等仪式中的司礼乐曲，而且已跨过国界，飞越海洋，在世界的四面八方飘荡。

## 八、威廉·班德

威廉·班德，英国物理学家。他和夫人克兰尔曾在中国生活了15年。1943年8月10日，班德夫妇离开晋察冀解放区的中心地区，随同一支八路军部队，穿过日军占领区，经晋绥根据地，于10月2日抵达延安，下榻在边区政府交际处。他们初到延安时，用一个星期的时间，寻找早些时候到延安的朋友。

10月10日，班德夫妇拜访了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林伯渠热情地握着班德夫妇的手说：“欢迎你们访问延安。我特别邀请你们为边区政府的上宾。你们愿意在这里呆多久，就呆多久。”林伯渠向他们介绍了陕甘宁边区的历史和他自己的革命经历。

10月11日，班德夫妇到达八路军总司令部，拜访了朱德总司令和叶剑英参谋长。10月24日，朱德向他们介绍了国共两党关系和日本与国民党的关系。为了加深对毛泽东的了解，班德夫妇和毛泽东当年的老师徐特立进行了多次长谈，从而对毛泽东产生了强烈的敬佩之情。

1944年1月4日，毛泽东会见班德夫妇。当天晚餐，班德在日记中写道：毛泽东“有动人的、和蔼的微笑，敏锐的幽默感，谈话时会把坚定而深思的目光盯在别人脸上。他给我们一种绝对诚恳的印象，以他的地位，在此祖国危急时期，他有一种深切的责任感。他没有大言不惭、居之不疑的神气，偏激的革命热狂是完全没有的。”

为了进一步了解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成绩，班德夫妇还参观了延安自然

科学研究院、华侨毛织厂、化学肥皂厂、鲁迅艺术学院、中央印刷厂、《解放日报》社、中央医院、延安托儿所、党制展览会、军制展览会、政制展览会、边区展览会和劳动英雄欢迎会。

1944年1月11日，班德夫妇离开延安前去重庆。途经西安时他们得知假若“带着北边的文件记录，应当立即销毁。”的规定，只得忍痛烧掉搜集起来的资料。只留下一本最宝贵的日记，藏在班德的大衣口袋里。1945年春，他们回到英国，共同著作了《与中共相处两年》（又名《新西行漫记》）一书，真实地记述了他们在中国解放区看到的新世界，也向读者展示出国民党统治区腐朽败落的景象。

## 九、林迈可

迈克尔·弗朗西斯·莫里斯，又名林赛，华名林迈可，英国人，1909年生。1938年来华，任燕京大学经济逻辑学教师。

1944年3月，林迈可夫妇由河北阜平启程，在八路军及当地人民的护送下，于5月17日到达延安。次日，《解放日报》报道说：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军委秘书长杨尚昆、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在陕甘宁边区政府交际处摆宴，为林迈可教授及夫人洗尘。

林迈可教授在延安被任命为八路军通讯部技术顾问。他在受到经济封锁，原有的通讯器材得不到正常维修和更换的条件下，克服种种困难，用自己娴熟的技术为中央电台建造了一台大功率的发射机，可以清楚地同美国旧金山和南亚印度等地取得联系。另外，林迈可还担任了延安新华社英语广播节目的顾问，为向世界各国人民客观地介绍中国共产党、八路军和根据地人民的英勇斗争作出了极大的努力。1945年11月，林迈可夫妇离开延安转道重庆回国。

新中国建立后，林迈可于1951年、1954年两度来华访问。其著作有《关于中国共产党教育问题的笔记》（1941—1947）等书。

## 十、李敦白

西德尼·李敦白，1920年生于美国。1944年来华，支援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1946年，李敦白在张家口遇到斯特朗，二人谈论投机，经斯特朗介绍于1946年9月底到达延安，受到朱德总司令和其他领导人的亲切接待。李敦白迫不及待地请求朱德给他分配任务。不几天，斯特朗辗转回到延安，

李敦白作为斯特朗的助手，一起进行工作。

1946年10月下旬，李敦白被分配到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工作。由于他刻苦钻研，很快就掌握了无线电、服务、广播等技术和操作技能。他在工作上兢兢业业，既要编写新华社的英文广播稿，又要监听从美国发来的电讯，常常是一直工作到深夜两三点钟。他每天向美国发出的电讯稿，被几十家美国报刊、电台录用，为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主张，报道国内外时局的动向，揭露国民党的腐败与黑暗统治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1947年3月中旬，国民党军队进犯延安。延安新华广播电台随党中央撤离延安，并从3月20日起改名为“陕北新华广播电台”。从这时直到1948年5月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李敦白和电台的同志们，历尽艰辛，在战争和转移之中，继续坚持党的宣传工作。

### 十一、阳早、寒春

阳早，原名欧文·恩格斯特，1918年生于美国纽约州的一个农民家庭。1938年进入纽约州立大学学习农业，是美国著名的畜牧专家。寒春，原名琼·辛顿，先在纽约州立大学学习，后又到威斯康星大学学习原子物理。

1946年3月，阳早来到上海，在联合国救济总署上海办事处工作，并设法同中国共产党驻上海办事处取得联系。10月，阳早乘飞机抵达延安，被分配到杜甫川光华农场畜牧组工作。他一边精心工作，一边认真学习汉语。1947年3月，国民党胡宗南部队向陕甘宁边区发动猖狂进攻，光华农场接到上级命令，实行战略转移，向延安城北撤退。阳早和同志们赶着几十头荷兰奶牛，开始了转战陕北的斗争。有一天，在紧张的行军中，他为了保卫奶牛，竟跳进冰冷的河水里，赶着牛游到对岸。

1948年4月，寒春来到北平。1949年2月抵达延安，当时，阳早正在陕北瓦窑堡农具厂工作，闻讯后立即赶回延安同寒春见面。4月，俩人在延安结婚，婚礼在边区政府礼堂举行。两星期后，阳早和寒春一起回到瓦窑堡农具厂工作，他们俩改革了铁铧犁，制造了水车和风车。业余时间和大家看报、学文化、唱歌、演节目。

1949年8月，阳早、寒春和战友们在陕北三边建设三边牧场，场部设在城川镇（现属内蒙古）。1953年6月，阳早和寒春被调到延安奶场工作，随后调西安草滩农场，“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俩人被调到北京做文字工作。

## 第八节 日本人在延安的反战活动

### 一、延安的“日本反战同盟”

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不仅为中国人民坚决反对，也为日本的正义之士所不满。1939年，在八路军前线总司令部举行的新年庆祝会上，被俘的日本士兵杉本一夫、小林武夫和冈田义雄都要求参加八路军。这一行动受到八路军的欢迎，从而他们三人就成为八路军中最早的日本籍士兵。此后，被俘的日本兵不断增加，越来越多地加入到八路军的行列中。同年11月，杉本一夫等人在山西左权县（当时称辽县）麻田村，组织起第一个反战组织“日本士兵觉醒联盟”。



图二十三 “日本反战同盟”延安旧址

1940年4月，日共驻共产国际代表野坂参三从莫斯科经新疆，穿越封锁线，秘密来到延安，受到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热烈欢迎，并留在延安和中共一起，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领导在华日本人的反战活动。根据当时的形势，野坂参三化名林哲。1943年改名冈野进，同年5月31日以日共代表身份才公开露面。



1940年五一节，在延安的日俘士兵森健、高山进、市川春夫等人在八路军总政治部敌军工作部的帮助下，创建了“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延安支部”，刚到延安的野坂参三也积极参与了该组织的创建工作。反战运动迅速开展，相继在冀中、晋察冀、山东、华中等抗日根据地建立了反战同盟支部。这些反战组织利用书信、报刊、广播等形式，沟通日本士兵的民族感情和同胞情谊，并介绍八路军和共产党的情况，以更好地反对法西斯战争。

1942年6月，在延安的部分日本人又在反战同盟的基础上，创办“在华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于同月23日在日本工农学校召开成立大会。推举斯大林、季米特洛夫、市川正一、毛泽东、朱德为大会名誉主席团。冈野进致开幕词，并作了同盟成立经过的报告。他说：“参加本同盟的人都经过严格审查，全体盟员共24人。从出身来看，职员占50%，工人占33%，农民和小商人各占8.3%。本同盟不是共产党，而是接近共产党的组织。参加本同盟的人，必须在各方面都起模范作用。希望全体盟员为将来做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的标准而努力，为推翻日本的天皇制度，建立新日本而努力。”大会号召，誓循中共与日共的道路前进，打倒日本法西斯，建立人民政权。大会通过了《在华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选出冈野进、森健、中小路静男、大山光美、杉本一夫、松井、高山为同盟领导人。大会还给毛泽东发出致敬信。信中说：

我们的大多数，在过去，都曾是日本的士兵，都曾有过反动思想。但是，我们在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的抚育之下，在一年乃至四年中，我们的人生观与世界观，已发生了根本的革命的变化。我们不仅知道了：现在的日本统治阶级对中国所进行的战争，是不正义的侵略战争，而且坚决相信：为要永远消灭这样的战争，为要日本的劳苦大众从野蛮的天皇制度与资本主义的剥削下解放出来，就非踏着中国共产党和日本共产党的道路——即伟大的列宁、斯大林的道路前进不可，并决心为此而贡献自己的一切。

《解放日报》还就该同盟的成立发表社论<sup>①</sup>。

6月25日，毛泽东写信给冈野进以示祝贺。7月4日，共产主义者同盟又成立了延安支部，并在支部下设立一些分会组织。1943年8月25日召开同盟临时会议，将分会组编为三个。1945年3月19日组编了第四分会。不

<sup>①</sup> 《解放日报》1942年6月25日。

久又组编了第五分会。先后成立了太行、山东、苏中、晋西北、晋东南、鲁南、苏北等支部。

1942年8月，在延安召开了华北日本士兵代表大会和反战团体代表大会。会上提出14个方面200多条有关日本士兵向日本军部的要求。大会决定将“日本士兵觉醒联盟”和“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同盟”合并为“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从而使华北地区抗日根据地内的各个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团体，在组织力量、思想认识和行动方式等方面达到空前统一。到1944年，反战同盟的组织已发展到13个支部，一批批反战同盟的朋友奔赴我八路军各个战区，他们和八路军战士一道，对日军喊话、散发传单、写信和做日本侨民工作。

1944年1月5日至8日，在华日人反战同盟扩大执委会在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召开预备会，听取冀鲁豫、冀南、冀中、晋察冀、晋西北、延安各支部工作报告。1月15日在王家坪八路军总部大礼堂举行开幕式，杉本致开幕词。他说，此次大会主要在于检查和总结一年来的工作经验，制定新的工作方针以开展今后工作，并讨论如何组织“日人解放联盟”。朱德、叶剑英、李初黎、冈野进等出席并讲了话。朱德在讲话中着重阐述了反战同盟发展壮大的意义和影响。他说：我们的目的是反战，打倒法西斯，把世界变成民主的世界。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必须争取广大人民群众和我们一道进行斗争。叶剑英在讲话中指出，中日两国人民必须一起进行反对日本法西斯的斗争。冈野进在讲话中说：反战同盟已有四年的历史，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1939年至1942年为第一阶段，1942年至今为第二阶段。他进而分析了国际形势，指出：前途是光明的，但困难不少，要努力工作，争取胜利。开幕式后，大会分别听取了关于“反特”、“教育”、“对新来者的政策”、“宣传”、“组织”等方面的报告。会议期间，李初黎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反特斗争的八点指示。

2月26日会议闭幕时，通过成立“日本人民解放联盟创立准备委员会”及“日本人民解放联盟华北地方协议会”的提案，并通过了《日本人民联盟纲领草案》和《日本人民联盟章程草案》。大会还发出《日本人民解放联盟创立准备委员会告各地日侨书》，号召在重庆、北美、南美等地的日人成立解放联盟。

1944年4月9日，解散了“在华日人反战同盟”，正式成立了“日本人民解放联盟”，标志着日本人民在延安的反战斗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30日，日本人民解放联盟、日本共产

主义者同盟和日本工农学校等单位，在延安举行出发回国纪念大会。会后，相继返回日本。



图二十四 “日本工农学校”延安旧址

## 二、日本工农学校在延安

1940年4月野坂参三到延安时，还建议中共中央设立一所专门学校，把日益增多的日军俘虏组织起来，以便进行反战教育。中共中央接受了这一建议，于同年10月，开办日本工农学校。校址设在延安宝塔山腰。日人冈野进任校长，赵安博任副校长。初有学员11人。

1941年5月15日，日本工农学校在延安八路军大礼堂举行开学典礼，朱德参加典礼大会并讲了话<sup>①</sup>。校内规章制度日趋完善，学员多是被俘的日本士兵和下级军官，也有少数受中国共产党影响而投诚的士兵。学员大多是被压迫被奴役的劳苦人民。小学和高中程度居多。

开设课程有：日本问题、时事问题、政治常识、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哲学、社会发展史、中国问题、联共党史和中国话等。分别由冈野进、赵安博、王学文、李初黎、何思敬等人任教。另有王晓云教日语训练班。

<sup>①</sup> 《新中华报》1941年5月15日。

日本工农学校是日本士兵进行自我教育，揭露日本法西斯暴行，发展反战同盟力量的重要阵地。刚入学的学员，须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入学愿望和入学资格审查，合格者在预科教育两个月，后转入本科学习十个月。1943年秋，鉴于学员在年龄、阅历、文化、政治诸方面的差异，遂将学员分编为A、B、C三个组，以进行针对性的教育。

陕甘宁边区政府对日本工农学校在物质上给予优厚的待遇。尽管当时边区经济十分困难，但对新来的日本学员都给予特殊照顾，第一个月发给津贴费5元（是当时党的高级干部标准），按实际情况补给被褥，发给单衣和衬衣各一套，鞋袜各一双，另外还发给毛巾、肥皂、牙刷、牙粉、烟袋、烟叶等。后来所有学员享受八路军连级干部待遇，每人每月3元钱津贴，增供优等面粉10斤。在政治上，学员和其他单位一样，参加边区参议会的民主选举。在文化娱乐方面，日本工农学校有自己的体育场和宣传队，平时开展各种形式的体育活动，逢年过节组织秧歌队，和周围的机关、群众举办联欢晚会。春节期间还与周围群众互相做客。

随着日本人反战运动的迅速发展，学校的学员由初建时的11人到1944年4月增到400人。学员毕业后，分赴各条战线进行抗日工作，直接奔赴抗日前线。

1945年8月30日，日本工农学校与日本人民解放联盟等单位在延安王家坪礼堂举行回国出发纪念大会，叶剑英参谋长等人出席大会并讲了话<sup>①</sup>。会后，日本工农学校的学员，除体弱有病和不愿回国者外，相继返回日本。

延安日本工农学校的学员们回到自己的祖国以后，绝大多数学员都对中国人民保持着十分友好的感情，以各种方式为发展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进行着积极的努力，还有人再访新中国并专程赴延安。

## 第九节 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会在延安召开

1941年10月27日，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会在延安召开。参加大会的有来自日本、犹太、印度、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缅甸、越南、朝鲜等国家和地区以及中国的蒙、回、藏、彝、苗、满、汉等18个民族的130余名代表。朱德、林伯渠、叶剑英等领导人参加了大会的开幕式。印尼

<sup>①</sup> 《解放日报》1945年9月2日。

代表阿里阿罕在开幕词中说：这次大会就是讨论反法西斯，特别是反对日本法西斯的方法和策略。我们大会的责任在于讨论怎样统一东方各民族、各国家、各党派、各阶级、各宗教团体，成为一支无坚不摧的反日的统一力量。

28日，大会在宣读了日本士兵觉醒联盟、华北朝鲜青年联合会、冀中区回民抗战建国联合会和八路军三纵队回民支队等的贺电后，朱德作了国际形势的报告。29日到30日，由各民族代表分别作本民族的介绍和分析的报告。30日，毛泽东参加大会，向大会致词，号召各民族加强团结，共同打倒法西斯。

31日是大会的最后一天。会上决定成立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同盟，总盟设在延安，各地设分盟，以加强东方各民族的团结，扩大反法西斯运动。大会选举朱德、林伯渠、吴玉章、阿里阿罕、巴苏华、原清志、森健、武亭、蔡前、桑柏格尔德、默罕、马纳、桑吉悦喜、乌兰夫等37人为联盟执行委员，朱德任主席。最后由朝鲜代表武亭致闭幕词<sup>①</sup>。

这次大会不仅体现了东方各民族在反对日本法西斯斗争中的团结，而且为建立巩固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协助中国、苏联及一切被德日意法西斯奴役压迫的民族国家，共同为打倒法西斯强盗而努力，从而将东方民族的反侵略斗争推向一个新阶段。1942年1月1日，莫斯科通讯致电《解放日报》祝贺说：

庆祝新年快乐！这一年是为反对法西斯，为各国的民族自由与独立共同斗争的一年。让我们在报纸上报道这个英勇斗争的工作，鼓舞人民在1942年获得胜利。祝你们取得把全世界爱好自由的人们所进行的英勇斗争，传播于劳动人民中的工作胜利。<sup>②</sup>

1942年1月4日，中国青年反法西斯大会在延安召开，前后方各地代表200余人到会。朱德等出席会议并讲了话。会议通过八大提案，并发表致中国青年书和告世界各国青年书。为加强全国青年的团结，大会决定成立“中国青年反法西斯临时委员会”，选出何克全、冯文彬、胡耀邦等19人为临委会委员。

<sup>①</sup> 《解放日报》1947年10月27日—11月1日。

<sup>②</sup> 中共中央宣传部《党史研究》1955年第3期。

## 第十节 正式成立联合国的旧金山会议

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1945年4月25日联合国国际组织会议在美国旧金山开幕。出席会议的有50个国家282名代表和1726名顾问、专家、代表团秘书以及其他人员。世界各地许多政治、民族、社会团体也派代表到旧金山向大会呼吁和请愿，到会采访新闻的记者有2636名。这是世界外交史上规模空前的一次盛会。

这次大会的中国代表团，有中国共产党的代表董必武参加。当时，蒋介石竭力反对中国共产党、特别是反对中国共产党高层次人士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出席旧金山会议。为了争取这一合法权利，周恩来向国民党多次提出严正交涉。国民党内部的有识之士也反对蒋介石的主张。在僵持之中，蒋介石接到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电报，明确指出中国代表团必需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排斥中共代表实为不明智之举。这样一来，蒋介石只好同意董必武作为中共代表加入中国代表团。

1945年3月27日，国民政府行政院发表中国出席旧金山会议代表团组成名单：首席代表宋子文；代表顾维钧、王宠惠、魏道明、胡适、吴贻芬、李璜、张君勱、董必武、胡霖；顾问施肇基。

4月6日，董必武和秘书章汉夫、陈家康由延安乘飞机抵达重庆。12日，中国代表团一行离开重庆赴美，参加旧金山会议。

6月25日，50个国家的代表，一致通过了联合国宪章。6月26日晨，50个国家的代表签署《联合国宪章》。宪章有中、法、俄、英和西班牙五种文本，50个国家共有代表153人，均在五种文本上签字。中国代表团董必武等代表首先签字，接着是苏联、英国和法国代表团，然后是其他国家代表团依照英文字母顺序签字，美国作为东道主，最后签字<sup>①</sup>。签字仪式历时8小时，6月26日晚，旧金山会议在美国新任总统杜鲁门发表演说后结束。

宪章规定，联合国理事会决定实质性问题时采取“大国一致”原则，即中、法、苏、英、美五个常任理事国拥有“否决权”。51个宪章签字国为创始会员国（波兰因故，初未参加签字，后补签）。

10月24日，在中、苏、美、英、法5大国和其他24个签字国家批准了

<sup>①</sup> 《联合国年鉴》（公元1946—1947年）。

---

联合国宪章并向美国交存其批准书后，联合国宪章正式生效。

董必武参加联合国旧金山会议，并庄严地签署《联合国宪章》，是当时中外人士注目的一件大事，对于树立中国共产党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和影响，具有重要的意义。

## 第三篇 现代外事



## 第一章 外事管理

遵循“外交授权有限”、“外事无小事”的原则，省政府外事办公室（以下简称省外办）受陕西省人民政府（以下简称省政府）和外交部的双重领导，负责中央授权地方管理的外事工作。

省外办结合本省实际制订了一系列外事工作的有关规章制度，初步实现了外事管理的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加强了归口管理。

根据陕西经济、社会发展状况，随着对外交往的不断发展，省、市（地）、县建立了各具特色的外事管理机构，锻炼和培养了一批业务骨干，形成了一支训练有素的外事工作队伍。

### 第一节 机构设置

建国初期，陕西省未设置专门的外事机构，凡涉及外事活动均由交际处兼管。1949年11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决定成立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中共陕西省委（以下简称省委）和中共西安市委（以下简称市委）的主要负责人为委员会成员，在西安的涉外活动由省委和市委接洽处理，接待外宾任务由交际处承担。1954年6月西北大区撤销，1955年5月中共陕西省委暨西安市委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成立（简称指委会）。1958年4月，随着中国对外关系的发展，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外事体制改变的精神，撤销指委会，分别成立中共陕西省委暨西安市委外事工作领导小组、陕西省人民委员会（以下简称省人委）暨西安市人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市人委）外事办公室，统管全省的外事工作。70年代后期，西安市的新城、莲湖、碑林、雁塔和灞桥区，咸阳地区的乾县、礼泉、户县及兴平县，渭南地区的临潼县相继成立外事接待机构。80年代以后，全省多数地、（市）、县陆续建立了外事机构。同时，根据对外开放形势和外事任务发展的需要，省直单位和中央部属在陕单位，也陆续建立起相应的外事、涉外机构。1991年末，全省累计成

立地、(市)、县外事机构 96 个 (不含 10 个地、市级), 省直、部属单位的外事、涉外机构 53 个 (不含 53 所高等院校涉外的处室)。

## 一、省级外事机构

### (一) 交际处 (1949 年 11 月—1964 年 5 月)

西北军政委员会交际处于 1949 年 11 月成立。1953 年更名为西北行政委员会交际处。鉴于西安市既是西北行政委员会所在地, 又是省政府所在地, 交际处也就自然成了省政府交际处, 对外两块牌子一套机构。

1954 年 6 月, 西北行政委员会撤销, 原所属交际处即成为省政府办公厅交际处。1955 年初, 省政府改名为省人委。1955 年 1 月 19 日, 省人委以〔55〕会办秘字第 022 号文, 任命省人委交际处正副处长。

1955 年 5 月 21 日, 省人委以〔55〕会办秘字第 198 号文, 将省人委交际处改为省人委直属机构, 确定编制 37 名。1956 年至 1957 年增至 42 名, 1958 年精简为 20 名, 办公地址设在人民大厦前楼。

交际处是省委和省政府接待内外宾的交际联络接待机构。凡来陕西参观访问的外国官方、半官方和外国民间组织人员, 均由交际处负责接待。规模较大、人数较多的团组和外国文艺团体来访时, 虽由组建的外宾临时接待委员会负责, 交际处仍参与具体工作。援助中国建设的苏联及社会主义国家的技术专家、顾问, 以及各国商务代表除费用之外, 由交际处负责安排食宿、文娱活动以及联系参观游览等事项。

### (二) 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 (1949 年 11 月—1958 年 4 月)

1949 年, 中共中央西北局决定于 11 月设立西北局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 组成人员中含省委暨市委的负责人。其主要任务是: 贯彻执行党中央的对外路线、方针、政策和有关指示; 检查所辖省(市、区)执行外事方针政策和外事纪律的情况。同时明确指出西北局驻地西安, 在西安的涉外活动由省委、市委接洽处理。

主任委员: 习仲勋 (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兼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 任职至 1952 年 10 月)。副主任委员马明方 (中共中央西北局副书记、陕西省委书记、省人民政府主席)、张稼夫 (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宣传部部长)、方仲如 (省委书记处书记、省政府委员、西安市人民政府市长)。

1954 年 6 月西北大区撤销后, 同年西安市并入陕西省建制。1955 年 5 月中共陕西省委暨西安市委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成立。

主任委员：赵守一（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副主任委员：李敷仁（陕西省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时逸之（省委常委、省政府秘书长）、李启明（省委常委、省公安厅厅长）。委员：张汉武（省委统战部部长）、丛一平（西安市委秘书长）、崔一民（西安市委统战部部长）、张锋伯（西安市人民委员会副市长）、吴柏畅（西安市公安局局长）、贺廷俊（省交际处处长）、丁济沧（陕西日报社总编辑）、叶光宇（省委宣传部宣传处副处长）、胡采（西安市文化局局长）、吴沙浪（省工会副主席）、朱子彤（西安市工会副主席）、白纪年（团省委副书记）、刘健（团市委书记）、白凤梧（省妇联主任）、刘蓊（西安市妇联主任）、陈凯（省商业厅厅长）、李一青（西北体育学院副院长）。秘书长：崔哲。指导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贯彻执行党中央的对外路线、方针、政策和有关指示，督促检查本省执行外事方针、政策和外事纪律的情况，审查本省的外事、旅游计划；审核外事、旅游重大建设项目的计划及新开放区和参观点的建设；审批本省范围内接待外国元首、政府首脑等重要外事活动计划；安排外事活动中需要省级党、政、军领导同志出面的领导人；协调各方面的外事活动，参与组织外事接待工作等。

指导委员会从1955至1958年，在机关、工厂、学校、部队、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宗教界等117个单位中，建立了有395名负责人组成的外宾接待队伍，并建立了由专职或兼职人员组成的相应的接待组织，使涉外活动日臻完善，指委会于1958年4月撤销。

### （三）中共陕西省委外事工作领导小组（1958年4月—1990年11月）

1958年4月25日，省委外事小组经调整成员后，在省人委办公楼会议室由省委常委、副省长李启明主持召开第一次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刘庚、曹素人、蒋锡白、李宁（女）、管建勋、朱子彤、惠庶昌、海涛（女）。鱼讯、吴钢因公缺席。会议就中央已确定西安、延安为对外开放区，如何做好五一节期间的外宾接待工作以及长远安排进行讨论。会议确定了12项工作任务，首先决定新增加24个参观单位（工厂5个，学校12个，名胜古迹4个，人民公社3个）。

1971年为进一步适应外事工作发展的形势，加强外事工作的领导，省委以陕革发〔1971〕68号文，于同年11月25日成立陕西省革命委员会（以下简称省革委会）外事工作小组，由谷凤鸣、李广仁、李玉治、鲁曼、项丹、贾士秀、冯秀涛等人组成，谷凤鸣任组长，李广仁、鲁曼任副组长。

1981年省委以陕发〔1981〕54号文件，成立省委外事工作领导小组。

其成员是：吕剑人、李连璧、张世卿、邓国忠、鲁曼、魏明中、黎以宁、江达、聂景德、葛世民、杨文景。吕剑人任组长，李连璧任副组长。主要任务是：1. 贯彻执行党中央的对外路线、方针、政策和有关指示，检查陕西省执行外事方针、政策和外事纪律的情况；2. 审查陕西省的外事、旅游计划；审核外事、旅游重大建设项目的计划及新开放地区参观点和行驶路线的建设；审批在陕西省范围内接待外国国家元首、政府首脑等重要外事活动的计划，安排外事活动中需要省级党政军领导同志出席的人选；3. 审核陕西省组织的出国团（组）及邀请外国人士团（组）来访的计划；审批陕西省相当于地师级干部出国的人选（政治审查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由各级党委组织部门负责进行）；检查重要的出国团（组）考察、访问情况；4. 审查陕西省各级外事、旅游等机构的设置、编制、经费等问题；审批外事、旅游队伍建设方案，加强涉外队伍的政治思想工作；5. 协助平衡各方面的外事活动；6. 审核外事、旅游工作报告，交流外事工作经验，推动全省外事、旅游工作的健康发展。1982年3月，省委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在省外办设立办公室，对外称调研室，主要是以6项任务为中心工作，了解情况，研究涉外工作中的新情况、新问题。

1983年5月30日，省委办公厅以陕办发〔1983〕29号文重新调整了省委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其成员是：李连璧、白纪年、毛生铤、魏明中、陈兴亮、高步林、李应中。李连璧任组长。

1984年11月17日，省委组织部以陕组干任〔1984〕140号文通知，省委决定，省委外事工作领导小组由以下人员组成：组长李庆伟，副组长张斌、李连璧、魏明中；成员毛生铤、陈兴亮、高步林、张世卿、李应中。原任省委外事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成员职务一律免除，不再办理免职手续。

1990年11月20日，省委组织部以陕组干任〔1990〕609号文通知，省委决定，对省委外事工作领导小组组成人员重新调整如下：组长白清才，副组长孙达人；成员：张景文、王巨才、张开臻。办公室主任由张开臻兼任。原任省委外事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副组长、成员职务一律免除，不再办理免职手续。

#### （四）省外事办公室（1958年3月—）

1958年3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中共中央设立外事小组和国务院设立外事办公室》的联合通知下达后，省委根据加强领导，统一安排，分工负责，加强联系的原则，于同年4月24日撤销省、市委国际活动指导

委员会，设立省委暨市委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同年4月29日成立了陕西省外事办公室，办公地址设在原交际处。它既是省人委的外事机构，又是省委外事工作领导小组的办事机构。外办人员于1959年才正式列入省级机关编制序列。

1959年2月22日，国务院任命由副省长李启明兼任省外办首届主任，副主任贺廷俊。1963年6月24日增补了省公安厅副厅长李宁（女）兼任省外办副主任。

1960年9月30日，省委第28次常委会议决定：省外办下设专家工作处，撤销交际处和人民大厦的专家工作科（室）。省外办根据这一决定，在组织机构方面作了如下安排：内设综合组、专家工作处。综合组的任务是，在省外办主任的领导下，负责外宾接待，对外贸易，对外援助，对外科学文化技术往来，华侨、外侨、外国实习生、留学生管理，对外书刊及进口书刊发行，国际旅行，出国事宜等日常涉外工作、以及外办的秘书、行政、人事工作。专家工作处的任务是，在省外办主任领导下，根据国务院外国专家局规定的七项任务、十条要求，负责陕西对外国专家的管理工作。

1965年2月12日，国务院任命省委书记处书记章泽兼省外办主任，副主任李宁（女）。同年3月27日国务院任命曹达（兼省科学技术协会主席）、张明为省外办副主任。外办机关内设接待组和秘书组。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外事工作受到干扰，1967年2月省外办由群众组织掌权，接受省军区党委和驻陕部队支持无产阶级造反派委员会（以下称支左委员会）的领导。1968年9月21日省革委会以陕革发〔1968〕6号文，将省外办改名为“陕西省革委会办事组外事组”，原省外办工作人员大部分参加“斗、批、改”和下放劳动。接待外宾的西安人民大厦和丈八沟招待所，被列为军管单位。

省革委会办事组外事组组长由省革委会办事组副组长吴沙浪兼任，副组长郭秉文（兰空军代表）、李习之（南京军事学院撤销后调陕西作为支左军代表）。1970年6月后，省革委会办事组副组长鲁曼分管外事组工作。1971年2月至11月阎文俊任驻省外事组机关工作组组长，1971年1月—1972年2月郭秉文、李习之、李琼（女）为副组长。

1974年1月21日，省革委会以陕发〔1974〕7号文，成立省革委会外事办公室。任命鲁曼为省外办领导小组组长。1975年3月11日，陕组干〔1975〕40号文，任命李琼（女）、白玉峰为省外办领导小组副组长，黄叔

宽、孙木一、朱大安为领导小组成员。1975年7月15日增加李继忠为领导小组成员，1977年6月27日李继忠任领导小组副组长。

1975年3月，省外办重新调整处室设置：内设秘书组、接待组、宣传组、常驻组和华侨组。华侨组对外称“陕西省中国旅行社”。在省外办成立以前，省人委交际处在接待华侨、外籍华人、港澳同胞等、（以下简称“华侨等四种人”）时，对外曾使用“陕西省华侨旅行服务社”名称，是陕西省中国旅行社与华侨旅行社的前身，对外未挂牌，机构和人员与省人委交际处一套班子、两个名称。1974年1月21日省革委会外事办公室成立后，下设华侨组，对外正式称陕西省中国旅行社和陕西省华侨旅行社，负责全省侨务工作和华侨等四种人的接待工作。

1975年7月4日，省委常委会决定：组建中国国际旅行社西安分社和陕西省中国旅行社。（以下简称省中旅）

1977年3月，省外办新设旅游组，对外用中国国际旅行社西安分社（以下简称国际西安分社）名称。国旅西安分社是1954年开始筹办，1956年6月正式成立。省革委会于1968年6月17日将建国前的西京招待所（时为省政协机关驻地），划归国旅西安分社使用。国旅西安分社编制48名，设接待、行政、后勤三部门。主要业务是接待来西安的自费外宾；组织中国公民出国旅行；进行地区性旅游宣传等。1958年初，国旅西安分社划归省、市人委领导。同年7月3日，省人委发文批准国旅西安分社与西安人民大厦合并，归省交际处主管。国旅西安分社设经理、副经理。涉外业务受省暨市人委外事办公室归口管理。当时的主要任务是接待自费来西安的旅行者，外国使馆人员、记者及零散外宾。国旅西安分社曾于1959年、1960年、1963年和1965年先后四次组织陕西省工农业先进生产者、劳动模范、文教科科技界人士、党政负责人共4批64人，分赴苏联、东欧、蒙古旅游。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作为分社的西安人民大厦“旅行服务科”机构撤销，人员改行，业务陷于停顿。一些来西安的自费旅游外宾，由当时的省外办军管小组指定的人员接待。1968年5月1日省革委会成立后，自费旅游外宾由当时省革委会办事组外事组接待。1974年恢复省外办时，下设旅游组，办理国际旅行社业务，对外启用“中国国际旅行社西安分社”名称。1978年8月29日，省委办公厅以陕办发〔1978〕60号文通知，为适应陕西涉外工作发展的需要，经省委同意将丈八沟招待所改名为“陕西宾馆”。

1978年11月12日，省委以陕组干〔1978〕191号文任命鲁曼为省革委

会外事办公室主任。本届副主任先后有李继忠、白玉峰、黄叔宽、孙铭(女)、魏明中(1979年11月18日)、艾奇玉(1980年8月9日)、高智(1982年5月6日)。

1978年6月23日,省革委会以陕革发〔1978〕95号文,成立陕西省旅行游览事业管理局(以下简称省旅游局),并由省外办副主任李继忠兼省旅游局局长。9月间,将省外办的旅游组(国际旅行社西安分社)、华侨组(省中旅1985年3月8日又归属侨办)及所属友谊汽车公司和西安宾馆筹建处划归省旅游局领导。省外办机关设秘书组(含政工人事)、接待组、宣传组、常驻组(1978年底组改设为处)。1979年省革委会改为省政府,省革委会外事办公室改为省政府外事办公室。

1981年10月,国务院国发〔1981〕7号文件规定:“省、市、自治区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是本地区部委一级的机构,是本地区政府外事工作的职能部门和本地区党委及外事工作领导小组的办事机构,是本地区执行外交政策和处理重要外事工作的归口部门。”其基本任务是在本地区党委和政府以及外交部的双重领导下,贯彻执行中央的对外方针政策,督促检查和协调本地区的外事工作和涉外活动,处理本地区的政治性涉外事项。

1983年9月28日,省委以陕组干〔1983〕279号文,对机构改革后省外办领导班子组成人员通知如下:主任魏明中,副主任孙铭(女)、何克敬、秦元恺。

1984年11月17日,省委以陕组干〔1984〕150号文,将省外办领导班子调整为:主任陈兴亮,副主任何克敬、秦元恺、刘步云(女)。省外办的组织机构由原有的内设6个处室增设为8个处室,即党宾处(1987年8月30日与接待处合并)、秘书行政处、宣传教育处、接待一处、接待二处(领事)、人事处、调研室、友协处,并组建外事车队。

是年,省外办机关办公楼门额首次悬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

1988年7月7日,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一次会议决定,任命张景文为省外办主任,同年12月省政府任命韩国劲为省外办副主任,秦元恺为副厅级调研员,为了便于外事活动,主管外事的副省长孙达人在省外办处级干部会上宣布“秦元恺仍可以副主任名义对外”。

1990年2月16日,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决定,任命张开琰为省外办主任,韩国劲、陈祥林(1990年3月16日)为副主任。内部调整为9个处室:秘书处、接待处、新闻联络处、出国管理处、对口管理处、友

好城市处、政工处、行政处、友协办。

表 3-1-1

省外办历年人员编制一览表

年份	19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编制人数		5	8	8	8	8	8	10	10	5	军管	隶属 革委会办事组					25	25	25	25	25
年份	19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编制人数	70	74	80	80	60	60	61	63	64	65	66	66	66	66	93	80					

备注：1989—1991年省外办实际在册人数分别为93、90、77、85、94、98、116、80（包括事业编制数）。1958年成立，1959年列入省直编制序列。1968—1973年由省支左委员会管理，列入省革委会办事组，1977年隶属省委办公厅。

陕西省外事领导机构及负责人一览表

表 3-1-2

(1949.11—1991.12)

时 间	名 称	职务及姓名	备 注
1949.11—1954.6	西北军政委员会 西北行政委员会 交际处	处 长：蒙定军 副处长：贺廷俊 宋文梅	
1955.1—1964.5	中共陕西省委 陕西省人民委员会交 际处	处 长：贺廷俊 副处长：王知德 刘维世 艾宾卿	
1949.11—1955.5	中共中央西北局国际 活动指导委员会 (以下简称指委会)	主任委员：习仲勋 副主任委员：马明方 张稼夫 方仲如	
1955.5—1958.4	中共陕西省委暨西安 市委国际活动指导委 员会	主任委员：赵守一 副主任委员：李敷仁 时逸之 李启明	



续表一

时 间	名 称	职务及姓名	备 注
1958.4—1971.11	中共陕西省委外事工作领导小组	召集人：李启明 成 员：9人	成员：刘庚、曹素人、蒋锡白、李宁、管建勋、朱子彤、惠庶昌、海涛、鱼讯、吴钢
1971.11—1981	陕西省革命委员会外事工作小组	组 长：谷凤鸣 副组长：李广仁 鲁 曼	成员：李玉治、项丹、贾士彦、冯秀涛
1981—1983.5	中共陕西省委外事领导小组	组 长：吕剑人 副组长：李连璧	成员：张世卿、邓国忠、鲁曼、魏明中、黎以宁、江达、聂景德、葛世民、杨文景
1983.5—1984.11	中共陕西省委外事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李连璧 成 员：7人	成员：白纪年、毛生铤、魏明中、陈兴亮、高步林、李应中
1984.11—1990.11	中共陕西省委外事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李庆伟 副组长：张 斌 李连璧 魏明中	成员：张景文、王巨才、张开琰
1990.11—	中共陕西省委外事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白清才 副组长：孙达人	成员：张景文、王巨才、张开琰

陕西省外事办公室及负责人一览表

表 3-1-3

(1958.4—1997.7月)

时 间	名 称	职务及姓名	备 注
1958.4—1965.2	陕西省暨西安市人委外事办公室	主 任：李启明 副主任：贺廷俊 李 宁（女）	驻地：西安人民大厦
1965.2—1967.2	陕西省人民委员会外事办公室	主 任：章 泽 副主任：李 宁（女） 曹 达	驻地：西安市西一路
1967.2—1967.11	省军区党委暨驻陕部队支持无产阶级造反派委员会支委会外事小组	主 管：邢荣杰 驻外办组长：曹 旭 副 组 长：张 勇	驻地：省总工会 省军区
1967.11—1968.8	陕西省支左委员会办事组兼管外事工作	负责人：来 光	支左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兰空”军代表、办事组组长
1968.9—1970.6	陕西省革命委员会办事组外事组	办事组副组长兼外事组组长：吴沙浪 副组长：郭秉文 李习之	驻地：西安市解放路272号
1970.6—1972.2	陕西省革委会办事组外事组	办事组副组长兼管外事组工作：鲁曼 驻机关组长：阎文俊 副组长：郭秉文、李习之、李 琼（女）	同上
1972.2—1974.1	陕西省革命委员会外事组	组 长：鲁 曼 副组长：李琦涛 白玉峰 李 琼（女）	同上
1974.1—1978.11	陕西省革委会外事办公室	组 长：鲁 曼 副组长：白玉峰 李 琼（女）	同上

续表一

时 间	名 称	职务及姓名	备 注
1978.11—1982.7	省政府外事办公室	主 任：鲁 曼 副主任：白玉峰 李 继 忠（任 至 1979.11）、黄叔宽、孙 铭（女）、魏明中、艾 奇玉（任至 1981.10）	驻地：西安市解放路 272 号
1982.7—1984.11	省政府外事办公室	主 任：魏明中 副主任：黄叔宽 孙 铭 高智（任至 1983.9） 秦元恺、何克敬	同上
1984.11—1988.7	省政府外事办公室	主 任：陈兴亮 副主任：何克敬 秦元恺 刘步云（女） （任至 1988.1）	同上
1988.7—1990.2	省政府外事办公室	主 任：张景文 副主任：韩国劲 陈祥林 秦元恺（任至 1988.11）	同上
1990.2—1997.7	省政府外事办公室	主 任：张开臻 副主任：韩国劲（任至 1993.4） 陈祥林（任至 1993.9） 王步唐、饶笃 钧、裴长菊	同上

## 二、省级对口单位外事机构

省级机关各对口单位外事机构的设置，随着省级机关机构的调整而演变。1950年1月至1956年12月，省政府设有18个工作部门，其中文教和交通部门在办公室配备有经过培训的涉外专干。工业部门凡聘请外国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工厂在厂办公室设有外事科。

1957年1月至1966年4月，省人委设置46个委、办、厅、局，其中设外事处（科）的有省文化局、省高教局、省卫生厅、省体委、西安铁路局、省外贸局和农、林、水利等部门。

1966年“文化大革命”。初期，群众组织纷纷成立，省外办办公秩序陷入混乱状态，日常工作由省支左委员会生产指挥部维护。1968年5月1日，省革委会成立，设立了党政合一的办事机构“四大组”（办事、政工、政法、生产），各大组下又套小组，其中办事组下设立外事组。1969年下半年，原省级机关随着“斗、批、改”的结束而解体，外事干部被下放农村或送“五·七”干校劳动。1971年省委第五届委员会成立，决定设立26个委、办、局隶属于省革委会序列，其中文化、农林部门配备涉外专职干部。1976年省革委会工作部门由26个增设到46个，有12个工作部门设外事科（室），配备外事专干。

1977年1月至1991年，中国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其中1978年至1982年，省政府工作部门由48个增加到60个，设立外事机构的部门也相应增加到30多个。1983年省委、省政府对省级党政群机关机构编制进行了大幅度精简。省政府设立40个部门。保留外事处（科）的有11个单位，即省科委、省高教局、体委、文化文物厅、西电公司、中国科学院西安分院、省卫生厅、农牧厅、民委、建工局、司法厅；还有省军区、团省委、省总工会。高等院校保留外事处（科）室的有5所：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西北大学、西安外国语学院。

另外，在编制中保留外事专职干部的有13个单位：即省三机局、电子工业厅、五机局、冶金局、煤炭局、医药局、计量标准局、省科协、省科学院、省妇联、省广播事业管理局、机械局和陕西师范大学。

1986年以来，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调整和扩大对外开放，机构设置也有所变动，截止1991年12月，省级机关工作部门增到80多个，外事机构也因经济、事业的大发展，出现了多层次的设置，第一种像省冶金厅、有色金属局、文物局、第四军医大学、西安公路学院、陕西师范大学等设立外事处；第二种是外事与业务处室合署办公，如省石化厅、机械厅、农牧厅的外经处，西安飞机制造公司的接待科，省轻工业厅的规划处，地矿局的科技处，水利厅的科教处，省社会科学院的科研处。随着三资企业的出现和科技交流的需要，省工商银行、省农业银行、省科协、省妇联、省总工会等，设立了国际联络部；第三种是有40多个对口单位明确规定，外事工作由部门

办公室兼管，并指定专人与省外办联系涉外活动事宜。

### 三、地（市）、县外事机构

地区行署和市、县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是本地区政府外事工作的职能部门和本地区党委的外事办事机构，受本地区党委、政府和上级外事办公室的双重领导。

根据对外开放涉外活动日趋活跃的实际情况，各地（市）、县（区）的外事机构也不断调整加强。

延安地区外事办公室于1978年10月成立（在此之前1956年11月26日为交际处、1958年3月7日为接待科、1959年又改为交际处，1968年8月18日为外事组，1975年4月9日又改为外事处一直到1978年明确行文），地区所辖的延安市（1978年10月）、黄陵县（1985年3月）、延川县（1989年上半年）先后设立了外事办公室。

西安市城6区较早由于外国专家和参观访问等涉外活动的需要，区政府均配有外事专干，并于1972年在市革委会办事组设立外事组，1974年改称外事处，1978年12月改称西安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西安市辖的户县、临潼县于1973年设立外事接待组，1985年改称县人民政府外事科。临潼县1989年又改为外事旅游局。长安县于1981年3月设立外事科，1983年与新成立的县旅游局合署办公。

咸阳地区外事处于1974年7月设立，所辖的乾县、礼泉县设有外事科，兴平县政府在办公室配备了外事专干。1984年地区改为市建制后，撤销了乾县、礼泉、兴平县的外事科和专干的建制。三原县外事办公室于1990年成立，同年兴平县成立县外事文化旅游综合局。

渭南地区于1976年7月设立外事科，1985年8月成立外事办公室，1986年与新成立的旅游局合署办公，所辖的华阴市（1984年上半年）、蒲城县（1986年上半年）、韩城市（1988年上半年）先后成立外事办公室，均与县（市）政府办公室合署办公。

宝鸡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于1982年1月16日成立，所辖扶风、凤翔、千阳、陇县、眉县、麟游县的外事办公室于1990年成立，均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合署办公。

汉中地区外事办公室于1987年5月20日成立，所辖汉中市、南郑、勉县、宁强等县于下半年相继设置了外事办公室，城固、洋县、略阳等县与县

经委合署办公，留坝、佛坪县与县政府办公室合署办公。

铜川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于1988年9月17日成立，所辖耀县外事办公室于1991年上半年组建。

安康地区外事办公室于1988年7月13日成立，所辖的安康市于1991年上半年成立市外事旅游局，紫阳县于1991年上半年成立了县外协办。

商洛地区外事办公室于1991年3月成立。

榆林地区外事办公室于1984年1月成立，所辖神木、靖边、定边县于1987年设立外事接待室，1990年上半年改称外事办公室。

## 第二节 对外友好组织

### 一、中苏友好协会西安分会

1949年5月20日西安解放。12月21日，中苏友好协会西安市分会成立。该会由中共西安市委领导，下设组织、宣传、文化服务三个部，一个秘书室和一个业余俄语夜校。主要任务是在西安市城区宣传中苏友好，介绍苏联情况，发展友协会员。会长为西安市市长方仲如（兼），秘书长李子健（兼），副秘书长刘继曾、李梓盛、田克恭。

1951年11月，陕西省中苏友好协会成立，它是省委直接领导下的群众团体，下设秘书室、组织部、宣传部、文化服务部以及业余俄语夜校。主要从事中苏友好工作，号召组织各地友协积极参加保卫世界和平及抗美援朝的群众运动；复制介绍苏联图片展览；开展中苏两国工人、妇女、青年及文艺、科学、教育界的通讯联络；选择介绍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建设经验的优秀文化艺术作品、照片和幻灯片赠送苏联各界人士；举办俄语夜校。首任会长马明方（省委书记、省政府主席），副会长景岩徵（省政府文教厅厅长）、甘一飞（省委宣传部部长）、冯一航（省政府文教厅副厅长）、李子健（民盟西北总支部委员、省政府副秘书长）兼任秘书长，副秘书长张云锦。

从1950年下半年到1954年，结合庆祝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庆祝十月革命节等有关中苏两国的重大事件，在各阶层人民群众中广泛进行了介绍苏联和中苏友好的宣传活动。特别是1952年10月，结合庆祝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35周年，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规模空前的“中苏友好月”，广泛深入地开展了一次中苏友好国际主义的宣传活动。参加中苏友好协会的

会员，由1951年的31万多人迅速增加到117万多人。1953年6月，友协组织形式发生变化，由发展个人会员转变为吸收团体会员。中苏友好协会成为陕西各阶层人民增进中苏友好的很有影响的群众性组织。

50年代，中苏友好协会在陕西对外交往中居于首要地位。由于陕西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又是中国革命圣地——延安的所在地，加之，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1953—1957）苏联援建的156个重点建设项目在陕西就有20多项。因此，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来陕西参观、访问、考察的代表团组和专家学者相当多。同时，陕西还从苏联和东欧国家引进了大量的发展工业所需的技术和设备，此外还出版发行了大批苏联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著作和文学艺术作品，这些方面，中苏友协发挥了重要的桥梁作用。

1954年12月，陕西省和西安市中苏友协合并，会长李敷仁，秘书长丛一平（兼）。1958年2月李敷仁逝世后，省中苏友好协会于同年5月10日召开在西安的理事联席会议，选举西安市副市长张锋伯兼任陕西省中苏友好协会会长（任至1963年7月）。

1957年4月14日，省委以陕办字012号文批复，决定取消省中苏友好协会的工作机构，友协名义和会长、理事等名义职务仍保留。其工作分别由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西安分会、西安市中苏友协负责。1959年9月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把中苏分歧公开暴露在全世界人民面前，1960年7月25日，苏联单方面撕毁合同，并从7月28日至9月1日撤走全部在陕的苏联专家。此后，中苏友好协会的活动日渐趋于停滞状态，只保留业余俄语夜校延续至结业。

1963年7月25日，陕西省中苏友好协会，西安市中苏友好协会，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西安分会，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陕西省分会，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西安市分会联合召开委员、理事联席会议，决定5家合署办公，重新调整了领导机构，会长：章泽（省委书记处书记）；副会长：刘庚（西安市委书记处书记、市长）、孙蔚如（副省长、省民革主任委员）、刘文蔚（省总工会主席）、韩望尘（省工商联主任委员、省政协副主席、民建西安市主任委员）、柯仲平（作协西安分会主席）、张锋伯（市人民委员会副市长）、侯宗濂（九三学社西安分会主任委员、省政协副主席、西安医学院院长）、原政庭（省民盟主任委员、陕西师范大学副校长）、惠庶昌（团省委书记）、海涛（女，省妇联主任）、李宁（女，省暨市人委外办副主任）、张西鼎（省军区政治部主任）、冯一航（省教育厅副厅长）、王菊人

(省民革主任委员、省政协副主席)、丛一平(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权秉华(市委统战部部长)、李瘦枝(省民盟副主任委员、西安市政协副主席)、延焕梧(团省委副书记兼团市委书记,省、市青联主席)、刘芳(女,市妇联副主任);秘书长:丛一平(兼),副秘书长:田克恭。

以上5个对外友好组织,一直保留到1966年3月,根据省委精简机构精神,并入省外办。“文化大革命”中自行消失。

## 二、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西安分会

1950年6月25日,以美国为首悍然发动武装入侵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战争。在唇齿相依的危急关头,中国人民志愿军于10月25日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挫败了美军和李承晚集团的嚣张气焰。直到1953年7月27日美国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谈判代表在朝鲜板门店签订了《关于朝鲜军事停战的协定》。为了保卫世界和平,支援朝鲜人民的正义斗争,1950年12月11日,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西北区总分会筹备委员会暨西安分会成立,并以“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西安分会”(简称“和大”)、“西安各界反对美国侵略台湾、朝鲜运动委员会”名义,联合召开扩大会议,商讨了两团体的合并问题。到会者有西安各界、各民主党派、各机关团体代表120余人。最后,大会选举出以杨明轩(西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为首的“和大”西北区总分会筹委会委员80人,以赵伯平(中共西安市委书记)为首的“和大”西安分会委员73人。西北区总分会提出了四项具体任务:(一)开展时事学习、深入时事宣传;(二)广泛开展抗美援朝的爱国运动;(三)教育人民不收听“美国之音”;(四)要求人民站在各自的生产或工作岗位上,加紧工作,支援前线。

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西北区总分会筹委会成员名单:主席:杨明轩;副主席:柯仲平、侯外庐;常委会委员:亢心裁、王振喜、成柏仁、李子健、李象九、杜延庆、林朗、侯外庐、柯仲平、秦川、孙蔚如、张士心、张子芳(女)、张素纯、杨明轩、刘继曾、韩兆鹗、罗毅、严芝圃、严崇师。

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西安分会组成人员名单:主席:赵伯平;副主席:张锋伯、亢心裁、柯华、岳吉恒;秘书长:王宏达;副秘书长:田克恭、惠兆民。分会下设宣传部:刘继曾任部长,王敦英、雷行、江风任副部长。组织联络部:刘尚达任部长,李象九、严崇师、王觉先任副部长。常



委会委员 18 人：亢心裁、王宏达、王觉先、田克恭、江风、柯华、高培文、马平甫、傅庚生、张锋伯、惠兆民、雷行、赵伯平、赵曼青、刘尚达、刘继曾、潘源泉、严崇师。

为了进一步动员人民积极参加抗美援朝，1951 年 12 月 19 日，“和大”西安分会又成立了抗美援朝分会，选出了以张凤翔为首的 53 人组成的“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委员会西安分会”和“陕西省抗美援朝分会”，组成人员如下：

主席由副省长张凤翔兼任（1951 年 12 月至 1957 年 6 月）；副主席：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甘一飞（兼）、副省长韩兆鹗（兼）、省政府副秘书长李子健（兼）。

1954 年 12 月，省“和大”与省、市中苏友好协会合署办公。省委统战部于 1957 年 6 月 7 日、省委宣传部于同年 12 月 13 日分别批文同意省“和大”交省政协管理，会长李敷仁（1954—1958 年 2 月）；秘书长丛一平（兼），副秘书长：田克恭、张云锦、韩钝初。

经过 8 年时间，省分会人事变动较大。其中因工作调离本省的 5 人（王复初、刘继曾、张帆、张潮、张俊德）；长期因病不能工作的 2 人（严崇师、杨醉乡）；职务变动不能代表原单位的 21 人（甘一飞、崔田夫、赵伯经、余达夫、左协中、程文津、刘宪曾、陈雨皋、韩望尘、张如舟、王振彭、李连璧、彭毓泰（女）、赵玉玑、刘玉厚、谢茂泰、张明亮、潘秀英（女）、吕鲜艳（女）、刘文蔚、刘侠僧）；因故不能继续担任这方面领导工作的 5 人（韩兆鹗、李子健、徐雪尘、梁益堂、张云锦）；逝世的 3 人（张凤翔、李象九、熊文涛）等共 36 人。另一方面，由于世界和平力量的日益增长和强大，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要求来中国参观访问的外国人日益增多，接待外宾已成为一项重要工作任务。为了适应形势与任务的需要，1959 年 9 月 19 日经省委同意，“和大”陕西省分会和西安市分会于同年 9 月 28 日在省政协礼堂举行会议，召集省、市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有关单位负责人以及其他方面的代表，孙蔚如副省长主持会议，会上田克恭、岳吉恒代表“和大”省、市分会作了简要的工作报告。并根据几年来的工作经验，为了便于集中领导，统一使用人力，决定省、市“和大”分会设立一套机构、一套人员。将两会名称改为“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陕西省暨西安市分会”。选出主席、副主席 11 人，正副秘书长 4 人，委员 67 人。

主席：常黎夫；副主席：孙蔚如、刘文蔚、韩望尘、柯仲平、张锋伯、

岳吉恒、侯宗濂、原政庭、白纪年、海涛（女）。秘书长：何寓础，副秘书长：叶光宇、方晨、田克恭。

### 三、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陕西省分会（省友协）

#### （一）历届友协组织机构

根据 1973 年 5 月 7 日国务院批转全国友协《关于建立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地方分会的请示报告》精神，1976 年 2 月 20 日，省委常委会议研究同意成立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陕西省分会（以下简称省友协），决定省友协与省外办合署办公，不另设办事机构。同年 4 月 23 日，省友协举行成立大会。省革委会副主任章泽到会讲话。分会设会长 1 人、副会长 11 人、正副秘书长各 1 人、常务理事 26 人、理事 39 人。

会长：鲁曼；副会长：董学源（省委统战部领导小组组长）、安文保（省革委会常委、省国防工办政治部主任）、李洪明（省革委会常委、省电子局领导小组副组长）、刘宪曾（省教育厅顾问）、谢邦定（西安市革委会副主任）、白玉峰（省外办领导小组副组长）、土金璋（中共延安地委副书记、延安地区革委会副主任）、刘振华（女，省妇联副主任）、李继忠（省外办领导小组成员）、黄叔宽（省外办领导小组成员）、孙木一（省外办领导小组成员）；秘书长：孙木一（兼），副秘书长：朱大安（省外办领导小组成员）。

省友协成立后的对外友好活动日趋活跃，随着对外交往的开展，组织机构也逐步得到健全。

1981 年 6 月 23 日，省友协召开理事会，调整了领导人员。决定设会长 1 人、副会长 14 人，秘书长 1 人，理事 50 人。

会长：李连璧（1981 年 6 月 23 日—1984 年 11 月）；副会长：鲁曼、土金璋、白玉峰、田克恭、刘国声、刘振华（女）、孙铭（女）、孙木一、吴庆云、苏贯之、罗士杰、胡采、黄叔宽、魏明中；秘书长：高智。

1984 年 11 月，根据全国对外友协的意见，对外友好协会陕西省分会改称为陕西省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以下简称省友协）

1985 年 3 月 20 日，省友协理事会在西安人民大厦召开。以开创对外友好工作新局面为中心，总结部署了工作。同时调整了领导人员，设会长 1 人、副会长 13 人，秘书长 1 人，理事 52 人。

会长：李连璧；副会长：魏明中、陈兴亮、何克敬、何金铭、霍绍亮、靳毅仁、田克恭、土金璋、杜鹏程、房玲（女）、呼三；秘书长：郝生信

(1984年11月—1989年6月)。

1989年6月13日，省外办以陕外发〔1989〕121号通知，“根据工作需要，经省友协正副会长会议决定：安危任省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代秘书长，在对外活动中可用秘书长名义”。

1990年9月10日，省友协第四届理事会议总结工作，部署任务，改选理事会和领导人员，设正副会长4人，理事71人。

名誉会长：李连璧。会长：张开臻。副会长：韩国劲、陈祥林、秦元恺；秘书长（暂缺）。

理事：毛生铨、史维祥、张岂之、赵久之、霍绍亮、陈全方、张克忍、张学信。

省友协的日常工作由省外办一处承担。

## （二）地（市）友协组织

1990年4月27日，以陕友发〔1990〕007号文批复同意成立“汉中地区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同年7月28日，以陕友发〔1990〕009号文批复同意“延安地区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成立。同年12月12日，以陕友发〔1990〕013号文批复同意“安康地区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成立。

## 四、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西安分会

50年代以来，陕西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民间往来，以文化交流的方式为主，主要进行文化教育、科学、文学艺术、卫生、体育等方面代表的互相访问；举办介绍对方的文化艺术成就展览；放映和演出对方的影片和戏剧；翻译出版对方的书籍等。为了发展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促进文化交流，1956年，由陕西省暨西安市中苏友好协会、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陕西省暨西安市分会、陕西省暨西安市工会联合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陕西省暨西安市委员会、陕西省暨西安市民主妇女联合会、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西安分会、陕西省暨西安市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中华全国体育总会陕西省暨西安市分会等单位联合发起，成立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西安分会，并于2月21日举行成立大会。参加大会的有省委候补书记赵守一，西安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丛一平，省中苏友协副会长杨嘉瑞、景岩徵，陕西省、西安市科学、文化、艺术、体育、卫生、教育、工会、共青团、妇联等单位的负责人。会上，由省委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秘书长崔哲报告了对外文化协会西安分会筹备经过，并选举了分会正副会长、正副秘书

长和理事。

会长：李敷仁；副会长：赵守一、丛一平、柯仲平、李子健、鱼讯、崔哲；秘书长：崔哲（兼）；副秘书长：雷行、田克恭、姜桦；理事：53人。

1958年2月李敷仁逝世，5月10日对外文协西安分会召开在西安的理事联席会议。会上，选举出西安市副市长张锋伯兼任对外文协西安分会会长；（任至1963年7月）副会长：赵守一、丛一平、柯仲平、鱼讯、崔哲；秘书长：崔哲（兼）；副秘书长：雷行、田克恭、姜桦；理事30人。

1963年7月，对外文协西安分会会长、副会长、秘书长、副秘书长、理事人选变动如下：

会长：刘端棻（省委文教办公室副主任）；副会长：柯仲平（作协西安分会主席）、鱼讯（省文化局局长）、武伯伦（省文化局副局长、省博物馆馆长）、丛一平（西安市委常委）；秘书长：丛一平（兼）；副秘书长：雷行（市委文教部副部长）、田克恭；理事：52人。

1966年3月，在省委决定精简机构的精神指导下，经省委宣传部批准，对外文协西安分会与省外办合署办公。同年7月并入省外办。

1966年5月24日，改名为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西安分会。其领导组成人员仍是1963年7月组成的人员，直到1967年2月“文化大革命”中被群众组织夺权。

## 五、中国人民外交学会陕西省分会

根据1985年1月31日外交部〔1985〕部学字第24号文件精神，中共省政府外事办公室党组于3月22日，以陕政外党发〔1985〕9号文，将“中国人民外交学会陕西省分会”组成情况和分会宗旨、任务及其办事机构等呈报省委。4月25日省外办遵照省委指示，在新城黄楼会议室召开了中国人民外交学会陕西分会成立大会，会上宣布分会由会长1人、副会长3人、秘书长1人、理事8人组成，在省委、省政府和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的领导下，开展人民外交活动。

中国人民外交学会陕西省分会组成人员名单如下：

会 长：	李庆伟	陕西省省长
副会长：	周雅光	中共陕西省委副书记
	陈兴亮	陕西省外事办公室主任
	袁正中	西安市市长

秘书长：刘步云 陕西省外事办公室副主任

## 六、中国国际交流协会陕西省分会

1990年9月17日，省外办根据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1988〕87号通知，以陕政外发〔1990〕202号文呈报省委，拟由有关团体以及知名人士、学者和社会知名人士，组成中国国际交流协会陕西省分会，促进国际间的相互了解和维持世界和平，经同有关部门协商由省委副书记牟玲生担任会长；副会长3人（按姓氏笔画为序）：

孙天义 省政协副主席、西安外国语学院院长

何金铭 省委秘书长

陈祥林 省外办副主任

理事9人（按姓氏笔画排列）：

马良骥 原全国理事、省伊斯兰教协会会长

王殿芳 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

王新 省顾问委员会副秘书长

巩启明 原全国理事、省考古研究所所长

陈为雄 省外办接待处处长

吴守贤 天文学家、研究员、中国科学院西安分院院长

苗重安 省国画院院长

张少军 省外办政工处处长

郝直 副研究员、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

办公室主任：孙照华 省外办处级调研员

在省委批复之前，为适应涉外活动，先以交流协会名义与各国有关政党、团体、学者、知名人士和社会活动家进行交流与合作活动。

## 第三节 涉外团体

### 一、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陕西省分会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陕西省分会（以下简称省贸促会）成立于1964年，设在陕西省对外贸易局内，以后随机构的撤并几度变迁。1976年恢复工作时，仍与陕西省对外贸易局合署办公。为了发挥民间贸易组织的作

用，更广泛地开展陕西对外经济贸易和技术合作，1986年1月17日省政府以陕政函〔1986〕9号文批复决定，省贸促会与省对外经济贸易厅分设。省贸促会是开展对外经济贸易活动的民间组织，为省人民政府直属厅局级事业单位。1986年6月中旬，中国贸促会同时使用中国国际商会的名称（英文缩写CCOIC），省贸促会也相应使用“中国国际商会陕西省商会（以下简称省国际商会）”名称。

省贸促会一直实行委员制，其领导成员经正式选举并履行审批手续而产生。1979年产生第一任领导班子，成员是：黎以宁任主任（会长）；刘华、马汝奎、姬忠臣、霍绍业、来应琳、孙明亮任副主任（副会长）；王闻多任秘书长。1986年产生第二任领导班子，成员是：常务副省长张斌任会长；曾宪武任副会长；刘明东任秘书长。1994年产生第三任领导班子，成员是：副省长王双锡任会长；曾宪武、陈淑云任副会长；张水平任秘书长。

省贸促会成立以来，由于“文化大革命”而中断过一段时间的活动。这期间的主要任务是接待来自原外贸部和中国贸促会来陕参观访问的外国友好人士。1985年以来，国家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省贸促会以“四促”（促进以出口创汇为中心的对外贸易；促进技术引进；促进引进外资；促进各种形式的经济技术合作）为宗旨，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和地区的经济友好活动，为沟通陕西同世界各国和地区的经贸联系，推动经贸合作关系的发展发挥了桥梁作用。近10年中，省贸促会接待来自五大洲的客商共计432批2726人次，组织陕西省各级政府及部门负责人、工商企业界人士出访共104个团组1762人次。分赴欧洲的英、法、意大利、奥地利、比利时等20个国家，非洲、南非的苏丹、马里等6个国家，亚洲日本、印度、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巴基斯坦等12个国家，拉美的巴西、阿根廷、加拿大、哥伦比亚等6个国家，澳洲有澳大利亚、新西兰、瓦努阿图等4个国家。至今已同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工商联合会、外贸协会、商社、财团、金融机构和大型企业建立了联系和合作。省贸促会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既同民间机构打交道，又联系各国政府部门；既同建交国家来往，又同未建交国家发生接触；起到了“以民促官”、“官民并举”的作用。省贸促会还通过对外联络，出展入展、法律信息服务、组团出访、招商引资、业务洽谈等多种形式帮助企业拓宽了对外交往渠道，促成一批经济合作项目，帮助引进成套设备和关键技术及零部件，引进外资、出口创汇近10亿美元。

省贸促会、省国际商会为推动全省范围的对外经贸的发展，更好地为

地、市经济的发展服务，从 1988 年 4 月至 1992 年 8 月，经省政府批准，先后在宝鸡、汉中、咸阳、榆林、渭南、延安、铜川、安康、商洛等 8 地市和省机械、医药、汽车等行业设立了贸促支会、国际商会。还在华阴等市县组建了县级国际商会。1985 年以来省贸促分会、省国际商会已发展企业会员 1200 家、团体会员 160 个、个人会员 740 人，经选举审批产生 260 名委员。在全省范围内已形成贸促工作网络，会员企业遍及省内各个行业，成为具有多功能、多方位的全省最大的涉外民间经贸团体，是省政府对外经贸工作的得力助手。

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形势下，省贸促会、省国际商会作为省政府宏观管理与企业自主经营的中介协调机构，在政府和企业之间发挥着联系、协调、服务和监督作用，成为市场经济体系中的不可取代的重要组成部分。

表 3-1-4 省贸促会、省国际商会历届负责人一览表

时 间	名 称	职务及姓名
1979.6—1986.12	中国贸促会陕西省分会	会 长：黎以宁 副会长：刘 华 马汝奎 姬忠臣 霍绍业 来应琳 孙明亮 秘书长：王闻多
1986.12—1994.4	中国贸促会陕西省分会、 国际商会	会 长：张斌（常务副省长） 副会长：曾宪武 秘书长：刘明东
1994.4—	中国贸促会陕西省分会、 国际商会	会 长：王双锡（副省长） 副会长：曾宪武（任至 1998.7） 陈淑云（女） 秘书长：张水平

## 二、陕西省海外联谊会

陕西省海外联谊会（以下简称省海联会）成立于 1986 年 12 月，是陕西各界人士与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外籍华人加强联系合作的民间团体。其主要任务是：交流海内外各种信息，沟通陕西与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外籍华人等人士和社团的联系；举办有关活动，为海外朋友的交往提供服务；配合

有关方面开展经济、科技合作与文化交流；听取并反映海外人士对祖国建设的意见和建议；配合有关部门做好海外人士来陕探亲、观光、旅游和拜谒黄帝陵的接待工作；协同有关单位组织海内外各界人士相互考察、访问等。

省海联会成立以来，先后邀请和组织 2000 多位港澳同胞，以及来自美国、加拿大、英国、荷兰、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泰国等 1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侨胞、华人来陕参加清明节公祭黄帝陵活动及两届中国东西部合作与投资贸易洽谈会。

表 3-1-5 省海外联谊会历届领导成员一览表

时 间	名 称	职务及姓名
1986.12—1987.3	陕西省海外联谊会	会 长：吴庆云（省委统战部部长） 副会长：张优民（省委统战部副部长） 毛文祥（省委统战部副部长） 白海兰（女，省委统战部副部长） 何克敬（省外办副主任）
1987.3—1990.3	陕西省海外联谊会	会 长：暂缺 副会长：张优民（省委统战部副部长） 毛文祥（省委统战部副部长） 白海兰（女，省委统战部副部长）
1990.3—1993.6	陕西省海外联谊会	会 长：梁 琦（女，省委统战部部长） 副会长：张优民（省委统战部副部长） 孔庆森（省旅游局局长） 陈祥林（省外办副主任）
1993.6—1997.7	陕西省海外联谊会	会 长：纪鸿尚（省政协副主席） 副会长：苏 明（省政协副主席） 朱振义（省政协副主席） 刘延珍（省委统战部副部长） 杨才玉（省委统战部副部长） 张志杰（省委统战部副部长） 冯在才（省委副秘书长） 孙武学（省政府副秘书长） 惠世武（省政协秘书长） 孔庆森（省旅游局局长） 李仁义（省民委主任） 萧振德（省侨联主席）
1997.7—	陕西省海外联谊会	会 长：李锦江（省委统战部部长） 副会长：同上



### 三、陕西省归国华侨联合会

50年代初，陕西省的侨务工作由省民政厅归口管理，1979年12月正式成立陕西省归国华侨联合会（以下简称省侨联），是全省归国华侨、侨眷的人民团体，是全国侨联的团体会员，其主要任务是：贯彻执行中共中央的侨务政策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维护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在国内的合法权益，积极参与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创办经济、文化实体，发挥自身优势，引进资金、技术、设备和人才，团结广大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发扬爱国爱乡的光荣传统，为陕西经济的发展和文化事业的繁荣，为“统一祖国，振兴中华”的大业贡献力量。

省侨联自成立以来，立足国内，面向海外，80年代中期以后，每年接待来自世界五大洲约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华侨、华人200多人次。近10年来，侨联加强了与海外华人、华侨社团及高层人士的接触，与泰国、新加坡的华人商会，香港中华总商会、侨友社，华人华侨总会，澳门街坊总会，世界客家联谊总会，世界潮州总会等10多个社团建立了友好关系。1989年7月，在新加坡首次举办了“陕西出口商品展销会”，同年12月在深圳举办了有来自澳大利亚、台湾、香港等地的64位侨胞、港澳同胞参加的“恳谈会”，签订协议、合同13份，成交额400多万元。1992年省侨联受省政府委托，组织“陕西省科技产业合作代表团”出访新加坡和泰国，并为省政府代表团出访新加坡铺路搭桥，在新加坡组织60多家企业主出席代表团举办的招商新闻发布会，发挥了陕西联系归侨、侨眷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表 3-1-6

省侨联历届领导成员一览表

时 间	名 称	职务及姓名
1979.12—1985.5	陕西省归国华侨联合会	主 席：陈 明（兼） 副主席：方福林 陈平波 苏 明 吴庆云 顾 元（任至1981.12） 郭兆瑛

续表

时 间	名 称	职务及姓名
1985.5—1991.9	陕西省归国华侨联合会	主 席：陈 明（兼） 副主席：苏 明 萧振德 林 端（任至 1989.5） 罗美烈（女） 彭士钦 谭 岚
1991.9—	陕西省归国华侨联合会	主 席：萧振德 副主席：苏 明 宣根宝（任至 1995.12） 谭 岚 罗美烈（女） 姚金钟 蒙广体（1996.7 出任）

1966 年以前，全国设有 27 个对口的对外友好协会。陕西省除设立陕西省中苏友好协会、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外，其余均未成立分会组织，只是选派有关方面负责人兼任全国部分对外友好协会理事。80 年代以后，对口的对外友好协会理事名额在陕西大为减少。

表 3-1-7

对外友好协会（西安理事）一览表

组 织 名 称	在西安的理事姓名及职务
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友好协会	张锋伯（西安市人委副市长） 柯仲平（作协西安分会主席） 郑伯奇（作协西安分会副主席）
中国古巴友好协会	吴 钢（省委宣传部副部长） 朱子彤（省总工会副主席） 董学源（西安市委书记处书记）
中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友好协会	彭 康（西安交通大学校长）
中国捷克斯洛伐克友好协会	郑伯奇（作协西安分会副主席）
中国波兰友好协会	柯仲平（作协西安分会主席）
中国非洲人民友好协会	石 鲁（美协西安分会主席）
中国拉丁美洲友好协会	张锋伯（西安市人委副市长）
中国人民外交学会	赵守一（1963 年为省委第二书记） 李启明（1963 年为省人委代省长）

续表

组 织 名 称	在西安的理事姓名及职务
中国印度友好协会	武伯伦（省文化局副局长） 张锋伯（西安市人委副市长）
中国巴基斯坦友好协会	郑伯奇（作协西安分会副主席）
中国尼泊尔友好协会	鱼 讯（省文化局局长）
中国锡兰友好协会	胡 采（作协西安分会副主席）
中国老挝友好协会	彭 康（西安交通大学校长）
中国阿富汗友好协会	丁济沧（陕西日报社总编辑） 武伯伦（省文化局副局长、省博物馆馆长）
中国阿联友好协会	石 鲁（美协西安分会副主席）
中国日本友好协会	杨拯民（省人委副省长） 丛一平（对外文化协会西安分会副会长）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	李连璧（1980年为省政府副省长） 何克敬（省外办副主任）
中国伊斯兰教对外友好协会	会员：马良骥（化觉巷大清真寺阿訇）

#### 第四节 外事会议述要

外事会议主要是指全省性的外事工作或重大外事接待专题会议。自1957年5月召开的首次外宾接待工作会议起至1991年12月，先后召开外事工作会议28次。其主要内容是：传达中共中央、国务院、外交部对国际形势的分析和中国对外工作的方针政策；结合陕西省实际进行总结和交流；研究部署今后的工作任务。通过这些会议，达到上情下达、下情上报，统一认识、统一思想、统一政策、统一步调的目的，以不断提高外事干部的政治、政策、业务水平。

1957年5月6日，省委暨市委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在西安市建国路7号（中苏友协办公院）召开“陕西省暨西安市1957年外宾接待工作会议”。出席会议的代表89人，会议主要议程是：听取时事报告；总结1956年接待外宾工作和部署当年“五一”节后外宾接待工作的任务。

1958年9月23日，省委暨市委外事小组在西安人民大厦东四楼召开“陕西省暨西安市外事工作会议”。出席会议的代表85人，会议主要内容：  
1. 由李启明副省长传达中央在郑州召开的外事工作会议精神、毛泽东主席

对目前国际形势的分析；2. 报告 1958 年上半年外宾接待工作总结；3. 讨论和布置国庆 9 周年外宾接待工作。

1959 年 3 月 30 日至 4 月 1 日，以省人委外事办公室名义在西安人民大厦召开“陕西省外事工作会议”。出席会议的代表 60 人，听取大会报告的 165 人。会议中心内容是传达学习 2 月 27 日至 3 月 11 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外事工作会议精神；总结本省 1958 年外宾接待工作经验，并布置当年外宾接待工作任务。

1960 年 9 月 18 日，中共陕西省委暨西安市委外事小组召开“外事工作会议”。出席会议的代表 150 人，会议中心内容是：传达全国外事工作会议精神；布置在庆祝建国 11 周年期间接待外宾工作任务。

1963 年 4 月 25 日，省委外事领导小组调整成员以后，在省人委办公楼二楼会议室召开第一次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李启明、刘庚、曹素人、蒋锡白、李宁、管建勋、朱子彤、惠庶昌、海涛；吴钢、鱼讯因公缺席。会议就如何执行“中央同意中央外事小组关于 1963 年‘五一’节期间外宾接待工作的请示报告”作了讨论。鉴于中央指示中已确定西安、延安为对外宾开放区，这次会议作出了如下几项决定：1. 增加一批工业、农业、教育、名胜古迹等新的参观单位；2. 编写好陕西省各方面的介绍及座谈材料，准备好介绍人，并作好接待参观单位的接待工，从八个方面按指定的负责人组织力量着手编写讨论稿；3. 健全机构，整顿队伍；4. 各开放点准备好各自的介绍材料；5. 整顿好人民大厦等外宾接待单位，从六个方面抓落实工作；6. 做好旅馆、车站、机场、临潼等地的各类小册子的陈列、赠送工作；7. 继续做好古旧书店、书摊、古玩店的管理工作；8. 研究解决供应外宾购买工艺产品和文物复制品；9. 与商业部门研究彻底解决接待外宾的供应问题，在人民大厦设立小卖部；10. 安排好外宾的文娱活动；11. 继续搞好市容（包括百货公司、商场、书店等）清洁卫生，交通秩序等。12. 继续对居民进行教育。

上述各项工作，从 4 月 26 日起分别抓紧落实。

1963 年 6 月 3 日至 4 日，省暨市人委外事办公室召开“外事工作会议”。出席会议的代表 62 人，会上由省委副秘书长蒋锡白传达了全国外事工作会议精神，省外办副主任李宁作了《陕西省 1963 年以来外事工作情况及今后意见的报告》。

1969 年 9 月 24 日至 25 日，省革委会办事组外事组，在西安人民大厦召

开“国庆外宾宣传接待工作会议”。出席会议的有32个单位的负责人。会议由副组长张明宣读毛泽东主席关于对外宣传工作的批示和中央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0周年宣传工作的通知；省革委会办事组副组长吴沙浪传达外交部会议精神；安排部署了本省庆祝国庆节外宾接待工作；总结交流外宾接待工作经验。

1971年4月26日至30日，省革委会办事组外事组在省革委会第二招待所召开会议，省革委会副主任肖纯主持，出席会议的代表107人。会议中心议题：传达中央关于当前外事工作精神，总结交流外事工作经验和部署接待外宾工作。主要内容：1. 传达旅游工作会议精神；2. 总结交流外事工作经验；3. 布置“五一”节后接待外宾工作，主要准备接待各国驻京记者。省委副书记吴桂贤与会议代表互相座谈。

1971年5月25日，省革委会办事组外事组召开第二次外事工作会议。主持人肖纯，出席会议的代表70人，他们来自延安、渭南地区和宝鸡、咸阳市以及三原、泾阳、高陵、富平、耀县、铜川、宜君、洛川、甘泉、临潼、长安等县革委会主管外事工作的负责人；西安市各区、公社及参观点的负责人等。会议主要内容：学习毛泽东主席“五·二〇”声明，学习周恩来总理在旅游、援外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传达了国际形势等。

1971年7月5日至13日，省革委会办事组、省军区司令部在西安人民大厦为贯彻落实中央外事会议精神，进一步做好对外宣传和外宾接待工作召开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延安、渭南地区，西安、咸阳、宝鸡市以及省直各单位分管外事工作的负责人。会上学习了《毛泽东主席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谈话纪要》和周恩来总理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及中央外事会议有关文件。

1971年12月8日，省革委会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召开第一次会议，主要研究了外事工作领导小组的任务和召开外事工作经验交流会等问题。

1. 任务主要是在省委、省革委会领导下，贯彻执行毛泽东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和政策，确定办事组外事组为外事工作领导小组的办事机构。

2. 为适应外事工作发展的需要，会议认为接待工作需要进一步贯彻群众路线，组织外事队伍，实行对口接待。对口接待的单位有省国防工办、文化、教育、体育、卫生、经济、外贸、新闻单位等。各对口接待单位在与省革委会办事组外事组共同协调下，承担外宾接待任务，做到统一政策、计划、制度。使外事干部减少事务，集中精力做好对外宾的宣传、接待工作；

同时又能方便和满足外宾的生活需要。会议确定人民大厦除做好外宾的衣、食、住、行等工作外，增设和扩大为外宾服务项目，满足外宾生活需要。鉴于革命和生产建设不断发展，原有向外宾介绍的材料，已不能反映省、市发展变化的情况，需请省计委和西安市革委会根据 1971 年的发展情况，在 1972 年 2 月底以前逐个修定出新的省、市情况介绍材料。

3. 侨务工作在“文化大革命”前，由省民政厅管理，目前这项工作未落实管理部门，会议建议由省革委会民政局兼管此项工作。

1971 年 12 月 25 日至 30 日，省革委会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在西安人民大厦召开外事工作经验交流会。参加会议的有 192 个单位 243 名代表，会议主要内容是：进一步学习领会毛泽东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提高执行毛主席外交路线的自觉性；总结交流外事工作经验；部署今后工作任务。

1973 年 2 月 12 日至 17 日，省革委会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在西安人民大厦召开“陕西省外事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 241 个单位 321 名代表及领导小组有关成员李玉沼、项丹、冯季涛。会议内容：传达 1972 年 12 月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精神，结合陕西外事工作实际，讨论了外事工作体制、礼宾接待、归侨工作和侨眷工作，布置了今后工作。为开好这次会议，还成立了会议领导小组：由鲁曼负责，鲍枫、高步林、谢邦定、土金璋、张振邦、李琦涛、白玉峰、李琼、李习之、沈石参加。

1974 年 9 月 23 日至 25 日，省革委会外事办公室召开“陕西省外事工作会议”。出席会议的有 135 个单位 144 名代表（延安地区单独召开会议传达）。会议主要内容：传达 8 月 21 日至 9 月 6 日外交部召开的贯彻国务院国发〔1974〕1 号文件和 中国旅行总社召开的政治接待工作座谈会精神，会上传达和学习了中央有关华侨国籍的政策及形势报告。最后，省外办主任鲁曼作了总结发言。根据这次会议精神，西安市革委会于 9 月 28 日召开西安地区的归侨、侨眷和外籍华人的家属座谈会。省公安局于 10 月 5 日召开有关地、市、县公安干部座谈会，传达落实会议精神。

1975 年 3 月 22 日至 26 日，省革委会外事办公室为贯彻 3 月全国旅游会议精神，交流外事工作经验，在西安人民大厦召开“陕西省外事工作会议”。出席会议的有省、地、市、县各有关部门、各对外开放点及涉外单位分管外事工作的负责人共 182 人。

会议传达了乔冠华、耿飚、罗青长在旅游工作座谈会上关于国际形势、国际共运、调查工作等报告；传达了外交部、对外友协、旅游局负责人关于

旅游工作、对外友协工作的方针与任务的报告；总结了陕西省 1974 年的外事工作，交流了对外宣传工作的经验。省革委会副主任章泽到会讲话。省（市）公安局、延安地区外事组、西安市外事处、西安人民大厦等单位的代表在会上作了发言。鲁曼作了会议总结。

1975 年 7 月 2 日至 4 日，省革委会外事办公室在西安人民大厦召开“陕西省外事工作会议”，出席会议的有省级机关对口接待单位，各对外开放和涉外单位分管外事工作的负责人共 105 人。

会议议题：传达中共中央〔1975〕13 号文件，学习中央负责同志同外宾的谈话纪要，总结上半年外事工作。礼泉县烽火大队、西北国棉四厂、西北大学、延安地区外事组介绍了向外宾宣传学习理论的经验；西安外国语学院、西安公路学院介绍了组织外国专家、留学生参加开门办学进行教育革命的体会；布置了下半年工作。

1977 年 2 月 25 日至 3 月 4 日，在西安人民大厦召开“陕西省外事工作会议”。会议由省外办、省军区、省妇联、省和西安市公安局，以及出席会议的地、市负责人组成会议领导小组，省外办负责具体会务工作。出席会议的代表共 216 个单位 262 名代表，他们是省级有关部、委、办、厅、局和工、青、妇、贫协的负责人；有关地（市）县主管外事工作的负责人和外事处（科）负责人；对外友协省分会负责人；对外开放单位和常驻外宾单位主管外事的负责人；对口单位和其他涉外单位主管外事的负责人。

会议的主要任务是：认真学习毛泽东主席关于批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的重要指示和《论十大关系》，学习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线，学习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传达贯彻中央外事部门及省委的有关指示，总结交流外事工作经验，研究部署当年外事工作。

省委常委、省革委会副主任、省军区政委谷凤鸣在会上致开幕词。省外办主任鲁曼传达了全国旅游工作座谈会有关揭批“四人帮”罪行的材料及关于国际形势的材料；省委常委、省革委会副主任黄传龙就外宾的安全保卫工作作了讲话；省外办副主任李继忠作了 1976 年外事工作情况和 1977 年外事工作意见的发言；省委办公厅周化民、西安市革委会阎明、省公安局张文轩、市公安局辛步亮等在大会上作了发言；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李瑞山出席闭幕式并讲话，省委常委、省革委会副主任章泽作了总结讲话。

1978 年 3 月 4 日至 10 日，省委常委高明月在西安人民大厦主持召开

“陕西省外事工作会议”。出席会议的代表 290 人，分别来自省直有关涉外单位、对口接待单位、常驻外宾单位、各地、市、县和基层开放单位主管外事工作的负责人。

会议议程分为两个阶段进行：以 3 天时间主要学习中共中央〔1978〕3 号文件和五届全国人大、五届全国政协会议主要文件；传达学习李先念副主席、耿飏部长在 1 月 21 日全国旅游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传达学习廖承志同志 1 月 22 日关于国际形势的报告。以 3 天时间传达讨论国家旅游局杨公素的讲话及全国旅游规划；胡成放 1977 年 12 月 30 日在华侨政治接待工作座谈会上的发言；讨论陕西省 1977 年外事工作总结及部署 1978 年的外事工作。

省委书记李尔重在会议闭幕时就旅游工作的重要意义，怎样做好外事、旅游工作等问题作了讲话。

1980 年 4 月 10 日至 12 日，省外办在西安人民大厦召开“全省对口外事工作会议”。出席会议的有省级各有关委、办、厅、局，西安市和咸阳地区外办以及部分高等院校、厂矿、企业、科研单位的有关负责人和外事专干 100 余人。省外办主任鲁曼作了 1979 年全省对口外事工作情况和 1980 年外事工作任务的报告。省冶金局、农牧局、三机局和西北大学、西北工业大学、771 所等单位在会上介绍了对外科技合作交流和引进及技术引进及接待的经验。主管外事工作的省委书记吕剑人到会讲话。

1980 年 6 月 23 日，省外办召开地、市、县外办和部分涉外单位负责人会议，省委书记吕剑人出席了会议，并就陕西外事、旅游工作的任务和当前存在的突出问题及对今后外事、旅游工作的要求作了讲话。

1981 年 11 月 18 日至 27 日，省委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在西安人民大厦召开“全省外事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省委、省政府的有关部、委、办、厅、局，有关地（市）县，部分对外开放单位的领导和外事专干等 120 个单位 170 名代表，另有听取大会报告和典型发言的 80 余人。会议中心议题是：传达贯彻中央、国务院召开的全国地方外事工作会议精神和有关规定；总结检查本省外事工作，讨论解决当前外事工作中的主要问题。

副省长李连璧主持开幕式，省委书记吕剑人致开幕词。大会秘书长、省外办主任鲁曼传达了李先念副主席、姬鹏飞副委员长在全国地方外事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李连璧作了陕西省外事工作报告。省委、省政府领导同志于明涛、章泽、陈元方、白文华也先后出席了会议。省委常委白文华作了讲话，



省长于明涛作了大会总结。吕剑人、李连璧在有关小组作了重点发言，并听取了各组召集人的汇报。

会议根据中央会议精神和有关规定，结合陕西实际，讨论制订了《陕西省对口外事工作管理暂行办法》、《陕西省出国工作管理暂行办法》、《关于行署、市、县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职责范围的暂行规定》、《关于执行国务院批转外交部对地方接待外宾的几项礼宾规定》等文件。同时与会代表还联系实际，学习讨论了中共中央〔1981〕41号文件，检查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省公安厅副厅长辛步亮就有关问题作了专题发言。会后省委批转了于明涛、吕剑人、李连璧三位领导同志的讲话。

1985年5月7日至13日，省外办和省旅游局在西安长庆油田招待所联合召开“全省外事旅游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地、市、县主管外事旅游工作的领导和外事、旅游部门的负责人，以及省级有关部门和涉外单位的负责人共165人。省委、省政府、省政协的负责同志李庆伟、周雅光、牟玲生、李连璧、孙达人、魏明中等出席了会议，并作了讲话。副省长孙达人代表省委、省政府对会议作了总结。

会上，省友协、省高教局、卫生厅、农牧厅、临潼县、西安市二轻局和雁塔区曲江乡政府等10个单位介绍了经验。

会议结束时，省长李庆伟作了讲话，强调指出：省委、省政府决定把发展旅游业作为振兴陕西经济的突破口，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决策。为此，今后要做到三个转变，即要从只抓国际旅游转到国际、国内一起抓；从主要搞旅游接待转变为开放旅游资源，建设旅游点与接待并举；从以国家投资为主建设旅游基础设施转变为国家、地方、部门、集体、个人一起上，自力更生与利用外资一起上，配套抓好吃、穿、住、行、看、玩几个方面的工作。

1986年12月9日至13日，为加强涉外保密工作，正确处理对外开放和搞好保密的关系，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在涉外活动中严格保守党和国家机密的規定，省外办和省委保密委员会、省政府保密局三家联合在陕西宾馆召开涉外保密工作座谈会。会议由省委副秘书长李林森主持，省委副书记兼省委保密委员会主任周雅光到会讲话；省外办主任陈兴亮，省委保密委员会副主任刘力学、省公安厅副厅长艾绳章作了发言，省政府副秘书长刘品三作了总结。通过学习讨论共同制订出《涉外保密工作暂行规定》。省委书记白纪年接见了与会代表。

1986年12月27日，省外办为了使涉外参观点的工作适应对外开放形势

的需要，在省外办机关二楼会议室召开了工厂、农村涉外参观点座谈会。参加座谈的有 20 家工厂、12 个乡镇居民点，4 个省级厅局和西安市、咸阳市外办共 45 人，共同商讨如何更好地对外宣传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济体制改革对陕西省工厂、农村带来的可喜变化，研究了这方面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

1987 年 3 月 31 日至 4 月 4 日，以省委、省政府名义在长安县招待所召开“陕西省外事旅游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代表有各地、市、部分县及所辖外办、旅游局和省级对口单位与涉外部门的负责干部 156 人。会议中心议题是：传达贯彻全国地方外办主任会议、全国旅游局长会议精神。

省政府副秘书长张世卿主持会议，省外办主任陈兴亮传达了同年 2 月 26 日至 3 月 3 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地方外办主任会议精神；省外办副主任何克敬作了外事工作报告；省旅游局副局长王步唐传达了同年 2 月 25 日至 3 月 2 日全国旅游局长会议精神，并作了陕西省旅游工作报告；省外办副主任秦元恺传达了外交部第二次借调工勤人员工作会议精神。

会上，第四军医大学、省文化厅、省卫生厅、省科协、省土木建筑学会、西安外国语学院、西北农学院、西安交大、西工大、省高教局、陕西重型机器厂、西电公司、省农牧厅等单位介绍了技术引进、合作交流、聘请外国专家的先进经验。会议期间省委书记白纪年、副书记周雅光、副省长徐山林等到会作了讲话，副省长孙达人作了书面发言。

1989 年 3 月 27 日至 29 日，省外办在人民大厦召开“陕西省地市外办主任会议”。会议中心议题是传达中共中央办公厅〔1989〕72 号文件，结合文件精神互通情况，研究部署当年工作；省外办副主任秦元恺通报了有关对外表态问题，省外办副主任韩国劲通报了省外办工作设想；省外办主任张景文作了总结讲话。

1990 年 3 月 28 日至 4 月 1 日，省外办在西安止园饭店召开“全省外事工作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各地（市）外办主任；外事活动较多的县（市）外办主任；省级有关委、办、厅、局外事处（室）负责人；各有关高等院校外事处（室）负责人；部分大型企业；“三资”企业外事处（室）负责人；部分二类旅行社经理等，共 140 名代表。会议中心议题：传达贯彻第四次全国地方外办主任会议精神，全国友协理事第二次友好城市工作会议精神，回顾和总结 1987 年陕西省外事工作会议以来的全省外事工作，部署 1990 年工作任务。

省外办主任张开臻主持开幕式，副省长孙达人就当前的国际形势、陕西省外事工作的情况作了报告。外交部刘英仙大使，国务院外办副局长雷荫成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外办主任张开臻作了题为《认清形势，振奋精神，进一步开拓我省外事工作的新局面》的报告。宝鸡市、省科委、农牧厅、文化厅、西安市外办、西安电力机械制造公司、安康地区、秦兵马俑博物馆等单位在会上作了典型发言，省国家安全局副局长张东森作了《如何做好涉外工作中的国家安全工作》的专题发言。

会后省政府办公厅转发了省外办《关于改进外宾接待工作的意见》，省委外事工作领导小组批转了省外办《关于外事接待工作的改革意见》、《关于加强我省外事集中统一领导和归口管理的若干规定》的讨论稿。

会议闭幕时，省委副书记牟玲生讲话，他首先代表省委感谢外交部和国务院外办对陕西外事工作的关心和支持。同时向在外事战线上的工作人员提出了具体要求。省外办主任张开臻作了会议总结。

1991年11月17日至21日，省委、省政府在省军区招待所召开“全省外事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各地（市）分管外事工作的负责人和外办主任；省级各部门主管外事的负责人；部分高等院校；大型企业和科研单位外事部门的负责人；外事活动较多的县（市）外办负责人及部分涉外参观点的负责人。省外办机关的外业务干部列席了会议，共170人。会议中心议题：传达贯彻7月份全国外事工作会议精神，回顾1981年以来陕西省对外开放工作所取得的成就，总结经验教训，明确奋斗目标，使全省的对外开放有一个更大的发展。

省委书记张勃兴、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孙克华、省纪检委副书记张旭、省顾委常委、秘书长刘平西、省军区政委赵焕职、省政协副主席魏明中、省对外友协名誉会长李连璧、省政府副秘书长孙武学出席了开幕式。副省长郑斯林主持，张勃兴作了当前国际形势的报告。

会议期间，郑斯林就外事工作如何为经济工作服务，外事工作面临的主要任务，强化外事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和归口管理，以及外事队伍建设等问题作了讲话。省外办主任张开臻作了《总结经验，努力进取，把我省外事工作提高到一个新水平》的工作报告；孙武学传达了国务院批转《关于各省、市、自治区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职责范围的规定》。与会代表们就如何加强陕西省外事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和归口管理，以及外事队伍建设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在会上作经验交流发言或书面发言的有：省科委、省教委、文化厅、对台办、安全局、文物局、西安交大、咸阳市外办、茂陵博物馆、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西安市外办、省经贸委、汉中地区行署等 13 个单位。

闭幕时，省长白清才针对与会代表提出的有关问题，作了总结讲话。

## 第五节 外事队伍建设

外事干部处在对外交往的第一线，是国家对外政策的具体执行者，也是外国人接触中国和了解中国人民精神面貌、道德风尚、知识水准的前沿“窗口”。省外办自 1958 年 4 月成立以来，遵循周恩来总理 1951 年提出的外交人员“必须站稳立场、掌握政策、熟悉业务、严守纪律”的标准配备和教育干部。进入 80 年代以后，随着陕西对外开放、外事工作的不断发展、从事外事涉外工作的人员越来越多，省外办采取以自己培养为主、以外出培训为辅；以在岗学习为主、以脱产学习为辅；以国内培养为主、以国外培训为辅等多条腿走路措施加强外事队伍的组织建设、思想建设和业务建设，逐步实现外事队伍的革命化、知识化、专业化、年轻化和外语化。

### 一、干部结构

陕西省外事机构配备专职外事干部，最早是 1950 年由西北军政委员会交际处沿袭下来的，编制 9 人。1954 年 6 月西北行政委员会撤销，所属的交际处改为省政府交际处，定员 6 人。1955 年 5 月交际处改为省人委直属机构，编制 37 人。1958 年精简为 20 人，同年 4 月成立了省外事办公室，临时编制 5 人，1959 年列入省级编制序列。自此，外事机构逐步固定起来，干部趋向专业化，随着历史发展干部编制增减变化。1978 年后，陕西省外事活动逐渐增多，范围不断扩大。根据中央和国务院关于地方外事机构设置的有关规定，全省逐步形成了三级外事管理机构的体制，并有了一支训练有素的外事队伍。

1991—1992 年，省外办共有专职干部 70 人，其中男 55 人，女 15 人；年龄在 40 岁以下的 38 人，占在册干部的 54.3%，41—54 岁的 24 人，占 34.3%，55 岁以上的 8 人，仅占 11.4%；大专文化水平以上的 57 人，占 78.6%，其中掌握一门外语的干部有 37 人，占全体干部的 52.9%。全省市（地）外事机构 10 个，专职外事干部 134 人，其中掌握一门外语的干部 44

人，占专兼两项合计人员的 30.5%。

## 二、培训教育

鉴于外事专职和兼职人员多系高校、地方和军转干部所组成，新手多、年龄轻、文化水平较高、政治素质较好，尤其是市（地）、县外办主任，大多是从政府部门的办公室或接待处（科）分配来外事部门，工作热情高，但不足之处是缺乏外事工作的经验，缺少外交、国际关系、国际政治方面的专业知识。即就是“老外事”也有一个知识更新和不断充实提高的任务。为此，省外办对外事干部的思想、业务水平进行坚持不懈的教育培训工作。主要是：

### （一）在职培训

#### 半脱产培训

“文化大革命”以前按照三大系统（外事系统；外宾接待系统；外国专家、留学生、实习生、外国侨民管理及外援部门）分期培训，共计培训省级厅局以上负责干部 48 人，西安市部局以上负责干部 32 人，处科级、专干以及主要接待服务人员 700 多人。

另外，通过现场会、专题座谈、经验交流等形式进行培训。1970 年 2 月 20 日，省革委会办事组外事组，召开外国留学生、实习生所在单位负责人座谈会，就做好留学生、实习生的管理工作等进行了专题讨论。同年 5 月，开展了以“四好”（政治思想好、三八作风好、培训工作好、生活管理好）为主要内容的评比活动，以提高涉外人员的政策水平。1971 年 7 月 5 日至 12 日，省革委会办事组与省军区司令部联合举办了省属 54 个单位、西安市属 81 个单位、军队 47 个单位，共计 248 人参加的学习班，传达落实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精神，学习有关文件，交流外事工作经验。黄陵县以北各有关单位，由延安地区负责举办了外事干部学习班。同年 12 月 24 日至 30 日，省革委会办事组外事组，举办了以总结年度外事工作为主要内容的学习班，围绕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席位，谈工作体会，交流外事工作经验。参加学习的有 192 个单位，共计 243 人。

#### 短期脱产培训

根据国务院〔1981〕154 号文批转的《外交部关于加强地方外事队伍建设的几点意见》，以及全省外事工作会议的要求，采取有效措施，逐步实现外事干部的革命化、知识化、专业化和外语化。对在职的外事干部分期分批

进行短期脱产培训，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按此计划，省外办在省委党校增设了外事干部学习班。1982年11月至1983年1月，举办了外事旅游及涉外单位共50多名负责人参加的学习班。主要是学习党的路线、方针、国际形势、对外政策、涉外基本业务；1983年11月14日至1984年2月间，举办了省、地、市、县外办、旅游部门主要负责人共50多人参加的学习班。主要学习了《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外事工作方针、政策、任务以及《接待外国经济专家工作须知》、《对口技术人员主要职责》、《翻译人员主要职责》、《接待工作人员主要职责》、《外国经济专家招待服务人员工作须知》等规章制度及有关涉外历史知识。

#### 联合举办外事干部学习班

1986年2月17日至4月15日，省外办、中国科学院西安分院、省科学院、省科委干部局联合举办全省各地、市、县和省级各业务系统的涉外部门及接待单位的外事干部、负责人共142人参加的学习班。聘请北京外交学院、外交部礼宾司、中国科学院外事局、西北政法学院、西北大学的专家、学者、教授以及省级有关厅局的负责人，讲授了外交方针政策、外交礼仪礼节、世界经济领域对外交往基本知识、国际法等。1988年1月12日至26日，省外办举办了地、市、县外办科级以上干部、外事专干、部分省级机关、大专院校、厂矿企业外事办（科）负责人共73人参加的学习班。省委、省政府有关厅局负责人、专家、学者讲授了国际形势、中国对外政策的沿革、国际关系、外事务知识。

#### 举办跨省（区）外事干部培训班

1989年12月11日至25日，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和内蒙古联合举办外事干部培训班。陕西省以东道主身份举办第一期。参加学习的各省（区）外事干部89人，陕西额外吸收各地（市）科级以上外事干部、部分省直机关、高等院校、厂矿企业、事业单位外事处（科）长或专干共171人。聘请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外交学院教授等，讲授了国际形势、中国对外政策、外事务、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当代国际关系新格局。结合学习，各省（区）相互交流了外事工作经验。1990年11月2日至17日，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举办第二期外事干部培训班。陕西省外办和省级及地市有关外事干部19人参加。聘请北京有关专家、自治区业务部门负责人讲授了国际形势、中国对外政策、地方外事工作的新情况及面临的任務、西北毗邻各国的基本情况、西北经济区独具特色的开放格局、丝绸

之路考古成果及新发现等，6省（区）交流了外事工作经验。1991年由甘肃省外办在嘉峪关市举办了六省区第三期外事干部培训班。陕西省派14名外事干部前往参加。这次培训班主要以交流外事工作经验为主，同时学习了国际形势和对外政策等。

## （二）外出深造

自1958年省外办成立到1991年的33年间，曾选送3名外事干部到外交学院学习。

1964年至1991年的13年间，省外办系统通过各种渠道先后选送30名掌握一门外国语的翻译人员分赴美、日、英、法和比利时、联邦德国、泰国、越南、古巴、摩洛哥等国进修深造。

另外，还通过友好城市关系，从1983年至1991年全省各专业单位选派人员21名赴日本京都府进修农林园艺、医疗器械、文物、体育、电力、科技以及宾馆饭店管理等。

向中国驻外使（领）馆选派工勤人员。

1964年为驻外使（领）馆储备工勤人员15名。计有5名司机、3名厨师、7名公务员。陕西于1972年开始从省级机关、各地、市80多个涉外对口单位和部门选派工勤人员赴驻外使（领）馆工作锻炼，至1991年，累计选派各工种出国人员218人，其中厨师101人，司机82人，公务员50人，理发员22人，电工、花工、水暖工25人。被派往五大洲的78个国家和地区。他们在国外勤奋努力，任劳任怨，圆满完成了繁重的后勤服务工作，为中国驻外使（领）馆的工作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选送中国驻外使（领）馆政务人员。

1981年到1991年，根据外交部要求经过考核，选送赴中国驻外使（领）馆作外交官和政务人员的3人，分赴日本、毛里塔尼亚、泰国。

## 三、评定翻译职称

1978年会同有关部门对专业翻译人员首先进行了调查汇总工作，1983年9月根据国务院的通知，对这项工作暂停了一段，1986年根据中发〔1986〕3号文件转发《关于改革职称评定、实行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度的报告》的通知精神，按照省职称改革工作领导小组〔1986〕22号文件要求，由省外办牵头，以西安外国语学院的英、日、德语教授为主，聘请省旅游局、西北大学、西安医科大学外语教研室负责人共8位专家组成陕西省高级

翻译职称评审委员会，到 1990 年先后评定了 48 名翻译专业人员的高级职称。1987 年 3 月 25 日陕外发〔1987〕28 号文，决定由省外办承办中级翻译专业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会由 9 人组成。截止 1990 年先后评定中级翻译职称 73 人。

1992—1996 年评定中级职称 103 人，高级职称 39 人。



## 第二章 接待来访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外宾接待工作，先后由西北军（行）政委员会交际处、省政府交际处、省委交际处、省外办负责接待。“文化大革命”期间先后由省革委会办事组外事组、省革委会外办负责，1978年改革开放后恢复由省外办负责。

“文化大革命”以前的15年间，来陕外宾大多为社会主义国家及苏联在陕西的26个援建项目的专家。

“文化大革命”期间，接待来陕外宾大多是来革命圣地延安，参观学习中国革命经验的。

进入80年代以后，来陕旅游和进行经济文化考察的以发达国家外宾为主。

表 3-2-1 陕西省历年接待的外宾、华侨及港澳同胞一览表

年份	小计	邀请 外宾	外 国 旅游者	华侨	港澳 同胞	备 注
1949						
1950	10	10				
1951	11	11				
1952	233	233				
1953	292	292				
1954	533	533				
1955	409	409				
1956	1235	1235				
1957	607	607				
1958	597	545		28	24	
1959	334	221		113		
1960	777	750		27		

续表一

年份	小计	邀请 外宾	外 国 旅游者	华侨	港澳 同胞	备 注
1961	1011	310		701		
1962	238	238				
1963	838	791		47		
1964	1648	1306		250	92	
1965	1584	1368		216		
1966	662	526		136		
小计	11019	9385		1518	116	
1967	596	594		2		
1968	67	13		54		
1969	118	118				
1970	258	231		10	17	
1971	1092	983		40	69	
1972	3028	2680		205	143	
1973	2908	1809		925	174	
1974	2549	1925		476	148	
1975	4523	3278		983	262	
1976	5641	3888		1422	331	
1977	12147	9519		2147	481	
1978	15666	11467		2042	2157	
小计	48593、	36505		8306	3782	1978年前邀请外宾与外国旅游者年统计尚未分开，省旅游局成立后1979年单独统计。
1979	29432	2485	23937	121	2889	
1980	46704	6657	35848	131	4068	
1981	74152	7123	63153	88	3788	
1982	120886	29938	85326	104	5518	
1983	135707	11943	111113	660	11991	
1984	165107	13783	138496	694	12134	
1985	230833	19296	190836	2980	17721	
1986	314058	56226	233412	7417	17003	

续表二

年份	小计	邀请 外宾	外 国 旅游者	华侨	港澳 同胞	备 注
1987	323852	22404	278613	3882	18953	
1988	392199	26414	288920	4797	72068	
1989	222077	10041	137861	1446	72729	
1990	275649	16863	139732	4866	114188	
1991	117348	18100	24582	3344	71322	
小计	2448004	241273	1751829	30530	424372	

## 第一节 国家元首、政府首脑

从1956年至1991年的36年间，接待来自59个国家的93位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含副职）共89起，其中：新加坡6起、越南4起、丹麦4起、卢森堡3起、比利时3起，缅甸、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柬埔寨、匈牙利、朝鲜、日本、意大利、法国、美国、瓦努阿图、联邦德国、挪威、西班牙、芬兰等各2起，其他均为一起。

1985年以前，对国宾大团的接待隆重热烈、亲切友好，其礼仪如同古老传统的逢节过年似的，机场、车站张灯结彩，每逢贵宾走下舷梯或步出车厢时，欢迎场地鼓乐齐鸣，欢迎群众手持花束彩带、载歌载舞、迎宾路彩旗招展、交叉地段巨额横幅光彩熠熠。“文化大革命”前特别是接待外国文艺团体时，从火车站到西安人民大厦，民俗古乐开道、街道两旁燃放花炮等。随着改革开放逐渐扩大，陕西外事接待任务越来越重，1982年根据外交部有关部署，开始结合陕西实际对涉外礼仪，进行调研，1985年6月，省委外事工作领导小组批转省外办《关于外事接待工作的改革意见》，使迎来送往、陪同、宴请、拜会（会见）、对外赠礼、受礼、新闻报道等逐步规范化、制度化。

### 一、总统、总理、首相

#### 1956年

陕西首次接待的国宾是缅甸执政党“自由同盟”主席吴努一行34人。1956年10月24日，由中国驻缅甸大使姚仲明陪同乘专机前往北京，途经西

安时在西安西关机场短暂停留，陕西省代省长赵伯平、西安市市长方仲如和 27 位有关方面负责人到机场迎送，并在民航餐厅共进午餐。

### 1957 年

3 月 12 日，应中国政府邀请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理威廉·西罗基偕夫人和率领的政府代表团一行 34 人，由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中国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曹瑛陪同，从北京乘专机抵达西安。当西罗基总理走下飞机时，欢迎群众 2000 多人热烈鼓掌，高呼口号。代省长赵伯平同西罗基总理亲切握手互致问候。女学生向西罗基总理献花。欢迎贵宾的还有省委书记处书记方仲如和夫人刘青萍，副省长韩兆鹗、成柏仁、李启明、杨玉亭、张毅忱、谢怀德，中共西安市委书记处书记董学源、冯直，西安市市长刘庚、副市长张锋伯、赵全璧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负责人。

贵宾们在赵伯平、方仲如陪同下参观了钟楼、大雁塔和西北国棉四厂。参观大雁塔时，贵宾们受到附近 1000 多名中小学生的热烈欢迎。西罗基总理热情地向学生们讲了话。当参观西北国棉四厂时，受到 1000 多名职工的欢迎。西罗基总理在参观中还给厂先进生产者林秀英赠送了一枚银币做为留念。参观车间后，西罗基总理走上办公大楼的阳台上向聚集在楼前的职工讲了话，并在纪念册上题词：“社会主义工业是改造社会和完成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3 月 14 日上午，西罗基总理一行由习仲勋、曹瑛陪同离开西安。到机场送行的有：赵伯平、方仲如、韩兆鹗、成柏仁、李启明、张毅忱、谢怀德、董学源、吴志渊（市委书记处书记）、刘庚、张锋伯、杨晓初（副市长）和各界代表、群众等 2000 多人。

5 月 6 日，应毛泽东主席邀请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和拉希多夫副主席、叶留金部长、费德林副部长及随行人员一行 34 人，由外交部副部长姬鹏飞、中国驻苏联大使刘晓陪同，前往印度尼西亚共和国访问，途中在阎良机场作短暂停留。西安市和阎良各界群众 2000 多人身着节日盛装，手持花束，黎明时辰当专机降落在机场时，喷呐与锣鼓齐鸣，群众欣喜若狂地挥舞花束，表示欢迎。

伏罗希洛夫主席走下飞机和前来欢迎的省委第一书记张德生、代省长赵伯平、副省长韩兆鹗、成柏仁、时逸之、李启明、杨玉亭、张毅忱、谢怀德，西安市市长刘庚、中共西安市委书记处书记董学源、冯直以及驻陕部队领导一一握手致谢，一群年轻的姑娘向贵宾献花。

在响彻云霄的欢呼声中，贵宾们由张德生、赵伯平等领导人陪同走过欢

迎群众的行列，群众撒出手中的花瓣和纸屑沾满了伏罗希洛夫主席的银色鬓发，在机场会客室伏罗希洛夫主席同张德生、赵伯平等进行了亲切交谈。一个多小时后，贵宾们起程，伏罗希洛夫主席向欢迎群众挥手致意说：“祝同志们好！”全场群众高呼：“伏罗希洛夫主席好！”

10月23日，阿富汗首相达乌德一行12人，途经西安在西关机场停留，省长赵寿山和省、市机关、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陕西省军区负责人20多人，前往机场迎送，并在机场餐厅共进午餐。

### 1958年

4月1日—2日，罗马尼亚政府代表团一行20人，由部长会议主席基伏·斯托伊卡率领，在外交部副部长曾涌泉陪同下来西安访问。省委书记处书记赵伯平、省长赵寿山、副省长李启明、西安市委书记处书记冯直、副市长张锋伯、省军区司令员杨嘉瑞、省政协副主席孙蔚如到机场迎送。少年儿童向代表团献了鲜花。赵寿山、冯直、张锋伯等陪同贵宾参观了名胜古迹、114厂、西北国棉四厂。省长赵寿山设宴欢迎代表团。

8月15日，柬埔寨王国首相西哈努克亲王一行14人，由外交部礼宾司司长俞沛文陪同，途经西安。在机场迎送贵宾的有：省委书记处书记赵伯平、副省长李启明、省政协副主席孙蔚如、西安市市长刘庚、省军区司令员杨嘉瑞、省妇联主任海涛等，并陪同贵宾在西安人民大厦共进午餐。随后，西哈努克亲王一行乘车游览了市容。

### 1959年

8月7日—9日，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一行7人，在外交部礼宾司副司长张世杰陪同，从兰州乘专列来西安。到车站欢迎的有：省委书记处书记方仲如、王林，候补书记赵守一、严克伦，省长赵寿山，副省长李启明、谢怀德、黄静波、杨拯民、任谦，兰州军区空军政治部主任刘镇，参谋长刘光汉，省委书记处书记兼西安市委第一书记张策，市委书记处书记董学源、冯直，西安市市长刘庚、副市长张锋伯等。胡志明主席由方仲如、李启明、冯直等陪同参观钟楼、陕西历史博物馆，并游览了市容。午后，参观西北光学仪器厂、半坡博物馆。到了大雁塔胡志明主席笑吟着“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唐诗，健步登上大雁塔顶，意味深长地说：“胡志明登上了唐代的大雁塔顶！”胡志明主席参观西安搪瓷厂时，受到了全厂职工的热烈欢迎，工人们把精心制作的喷着毛泽东主席词作《沁园春·雪》全文和绘有胡志明主席肖像的搪瓷脸盆赠送给胡志明主席。胡志明主席还在留言簿上题

词。在游览华清池、秦始皇陵、兴教寺、杜公祠时和夹道欢迎的少年儿童照了像，并给孩子们散发了糖果。

在胡志明主席下榻的丈八沟招待所丈八湖畔，省、市党政军负责人举行了联欢晚会。由西安市实验小学少先队员、西安市人民歌舞团、陕西省戏曲剧院、西安易俗社等表演了精彩节目，少先队员向胡志明献了红领巾。胡志明主席热情地给少先队员和演员们散发糖果。胡志明主席还出席省委和省人委为他举行的欢迎宴会，并观看了陕西省戏曲剧院演出的地方戏。

胡志明主席8月8日用中文撰稿经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向正在庐山开会的毛泽东主席发出密码电报（见409页《电报稿》）。8月9日上午乘专机离开西安。到机场送行的有：方仲如、王林、赵守一、严克伦、赵寿山、李启明、谢怀德、孙蔚如、黄静波、杨拯民、任谦、杨嘉瑞、牛书申、刘镇、刘光汉、张策、冯直、刘庚、张锋伯等。

10月15日—18日，应国家主席刘少奇邀请的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主席道比·伊斯特万率领党政代表团一行8人，在农垦部部长王震陪同下，乘专机由昆明来西安访问。前往机场迎送的有省委书记处书记、省长赵伯平，省委书记处书记方仲如，候补书记赵守一、严克伦，副省长时逸之、李启明、孙蔚如、黄静波、杨拯民、任谦，省军区司令员杨嘉瑞，省政协副主席杨玉亭、杨伯伦，西安市委第一书记张策，书记处书记董学源、冯直，市长刘庚，副市长张锋伯，以及有关方面负责人共百余人，以及在西安的匈牙利专家组长波斯特卡依等。

当晚赵伯平省长举行宴会，欢迎匈牙利党政代表团。

贵宾专访了长安县韦曲人民公社，参观了公社农具厂、抽水站、食堂、幼儿园、菜地和谷子地，还走访了社员家庭。并游览了市容，参观了半坡博物馆。

### 1960年

9月28日，缅甸联邦政府代表团一行42人，由总理吴努率领，中国驻缅甸大使李一氓从北京专程前往昆明迎接。代表团分乘三架专机从昆明赴北京途经西安作短暂停留。省委书记处书记、省长赵伯平，副省长李启明，西安市委书记、市长刘庚，陕西省军区副司令员闵洪友等省、市党政军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负责人，以及各界群众1000多人迎送贵宾，少年儿童向贵宾们献了鲜花，并在西安人民大厦共进午餐。

### 1961年

中央辦公廳機要室轉陳毅同志：  
我自蘇聯回國路過中國新疆、甘肅、陝西，  
一路身體很好。現在我決定從西安直赴廬山。  
謝謝你的關懷，並請你替我問候張茜同志  
和小孩們好。

胡志明

一九五九年八月八日於西安

胡志明主席亲笔书写的《电报稿》

8月16日—17日，由范文同总理率领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友好访问代表团一行6人，在中国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方毅陪同下，由北京赴昆明途经西安，因飞行气候原故，在西安停留过夜。范文同总理一行抵达西安时，省

委第一书记张德生，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杨拯民，西安市副市长张锋伯等省、市党、政负责人以及越南在西安的留学生、实习生前往机场热烈迎送。晚上，省委和省人委举行欢迎宴会。会后，贵宾们观看了省戏曲剧院演出的精彩节目。

越南贵宾在西安期间，杨拯民、张锋伯等陪同游览了西安市市容，参观了半坡博物馆、省博物馆和大雁塔等。

10月6日—7日，应刘少奇主席和周恩来总理邀请的尼泊尔国王马亨德拉·比尔·比克拉姆·沙阿·德瓦陛下和王后一行17人，由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和夫人张茜陪同，乘专机由北京到达西安参观访问。

随同马亨德拉国王和王后的还有香蒂·拉吉雅·拉克西米·沙阿公主殿下，外交大臣图尔西·吉里博士和夫人，凯萨乐·沙姆谢尔·拉纳元帅以及尼泊尔驻中国大使凯谢尔·巴哈杜尔和其他尼泊尔贵宾等。

当马亨德拉国王乘坐的专机降落在西安西关机场时，机场上发出一片欢呼声，省长赵伯平、副省长李启明和夫人、谢怀德和夫人、杨拯民和夫人、孙蔚如、陕西军区司令员杨嘉瑞、西安市市长时逸之，同贵宾们一一握手，一群女青年上前向国王和王后及全体尼泊尔贵宾献花。

在洋溢着中国、尼泊尔两国人民友谊的热烈气氛中，国王和王后一行在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和夫人、赵伯平、李启明和夫人、杨嘉瑞、时逸之等陪同下前往丈八沟宾馆，沿途受到数以万计的群众热烈欢迎。

午后，国王和王后在周总理、陈副总理和夫人、省长赵伯平、副省长李启明和夫人、市长时逸之陪同下参观了省博物馆和钟楼。

当晚，省长赵伯平举行欢迎宴会，赵伯平在讲话时祝中尼两国人民友好关系万古常青！马亨德拉国王举杯祝酒，为陕西人民干杯。宴会后，尼泊尔国王和王后及全体尼泊尔贵宾观看了专场文艺晚会。

10月7日，尼泊尔国王和王后，在周总理、陈副总理和夫人、省长赵伯平等陪同下，参观了半坡博物馆、西北第一印染厂、西安人民搪瓷厂，游览了华清池，贵宾们所到之处都受到数以万计的群众热烈欢迎。周总理、陈副总理和夫人还在临潼华清池飞霜殿设便宴，招待尼泊尔国王和王后一行。马亨德拉国王和王后，在周总理、陈副总理和夫人陪同下，于晚上乘专列离西安去三门峡访问。省、市领导、省、市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负责人及上千名群众到车站欢送尼泊尔贵宾。

1964年



10月3日—7日，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委员、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崔庸健率领的朝鲜党政代表团一行18人，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5周年庆典后，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董必武、外交部副部长刘晓等陪同，10月3日由北京来西安参观访问。

贵宾们乘坐的专机在各界3000多人载歌载舞的欢呼声中徐徐降落，受到省委第二书记赵守一、省长李启明、省委书记处书记冯基平，副省长刘邦显、驻陕部队首长胡炳云少将、王明坤少将、关盛志少将，省政协副主席杨玉亭，中共西安市委第一书记彭天琦、书记处书记薛焰以及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省市机关有关各部门37位负责人的热烈欢迎。

在通往宾馆的大街上空红旗飘扬。当贵宾们乘坐的汽车经过市区时，数万群众向贵宾们欢呼、鼓掌，热烈欢迎朝鲜贵宾。

当天下午，贵宾们在刘晓、赵守一、李启明等陪同下参观了省博物馆。晚上，省委、省政府举行欢迎宴会。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应邀出席。10月4日，代表团在董必武、刘晓、赵守一、李启明等陪同下，游览了华清池、大雁塔、参观了半坡博物馆。在华清池崔庸健题词：“我们在具有自古至今的丰富历史内容的华清池，观尽骊山胜迹，得到了深刻的印象。中华人民共和国今胜昔比，今天还在建设社会主义，向世界放出新的光芒，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晚上，贵宾们观看了歌舞晚会，欣赏了陕西地方歌舞。

10月5日—6日去延安参观访问，代表团在延安参观了延安革命纪念馆后，崔庸健以朝鲜党政代表团的名义题词：“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越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深山峻岭，在延安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引导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从胜利走向胜利。中国革命的胜利，对中国人民的历史开辟了新的纪元，并对世界革命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我们从参观这个纪念馆中，得到了深刻的印象。我们祝愿继承革命传统的中国人民，在建设富强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取得更大的成就。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在代表团访问西安即将结束前夕，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会见了代表团，并为他们举行了饯行宴会。

在“中朝两国人民的兄弟友谊万岁”的欢呼声中，朝鲜党政代表团离开西安返回北京，赵守一、李启明、彭天琦等省市党政负责人和西安各界群众到机场欢送。

## 1970年

11月16日—21日，柬埔寨国家元首、民族统一阵线主席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一行16人，在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和中国驻柬大使康矛召陪同下，乘专机由北京来西安访问。前往机场欢迎的有：省革委会、省军区、驻陕部队的负责人李瑞山、胡炜、黄经耀、肖纯，以及西安市革委会的负责人孙长兴等。西哈努克亲王在欢呼声、锣鼓声和载歌载舞的热烈气氛中，绕场与3000多欢迎群众见面。然后由省革委会主任李瑞山陪同乘敞篷车驶入市区，受到了约30多万群众的夹道欢迎。省革委会举行宴会欢迎西哈努克亲王一行。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在李瑞山、胡炜、黄经耀、孙长兴等省、市领导人陪同下参观了西北第一印染厂、长安县小新村生产大队，并亲自采摘品尝了当地特产火晶柿子。游览了半坡博物馆，观看了舞剧《白毛女》和木偶戏《沙家浜》。11月19日李瑞山陪同西哈努克亲王赴延安参观访问，11月21日上午李瑞山代表省革委会到西哈努克住处话别，并赠送他了一米长镶嵌延安园景图一幅和贵宾在陕西活动相册。西哈努克亲王回赠了一个银杯和柬埔寨画册。

西哈努克亲王一行结束参观访问离开西安时，陕西省及西安市党政军负责人和5000多名群众到机场热烈欢送。

## 1973年

6月8日—11日

应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的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黎笋和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总理范文同率领的越南党政代表团，结束对中国首都北京访问之后，于6月8日由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耿飏、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中国驻越南大使王幼平等陪同来西安访问。

前往机场欢迎的有：省委第一书记、陕西省革委会主任李瑞山，省委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胡炜，省委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省军区司令员黄经耀，省委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霍士廉、肖纯，中共西安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委会主任孙长兴，以及西安各界群众3000多人。

12时30分，黎笋、范文同等越南贵宾在一片欢呼声中走下飞机。李瑞山主任等迎上前去，同贵宾们亲切握手，表示热烈欢迎。黎笋、范文同等越南贵宾在周恩来、李瑞山等陪同下绕场一周，与敲锣打鼓，载歌载舞，挥动花束彩带的欢迎群众见面。前往机场欢迎的还有省委、省革委会，市委、市

革委会，省军区和驻陕部队等有关方面的负责人：方升普、颜金生、黄传龙、章泽、张培信、马希圣、杨梦云、张廷桂、苏锦章、彭天琦、李琦涛、石锋、傅子和、马俊成、鄢祥丕、谢邦定、杨晓平、李琼等。当晚，省委、省革委会举行宴会热烈欢迎越南贵宾黎笋、范文同、黎清毅（副总理）及代表团的其他成员黄文进（外交部副部长）、李班（外贸部副部长）、吴船（越南驻中国大使）、陈参（国防部副部长）和越南南方驻中国大使阮文广，应邀出席了宴会。

当晚，省委、省革委会举行欢迎宴会，李瑞山致祝酒词，周恩来总理、耿飏部长、韩念龙副部长、王幼平大使等出席了宴会。出席作陪的省市领导有：胡炜、黄经耀、霍士廉、肖纯、方升普、颜金生、黄传龙、章泽、张培信、马希圣、杨梦云、孙长兴等。

越南党政代表团在西安期间，由周恩来总理和李瑞山主任等陪同，沿着1959年8月和1966年6月胡志明主席参观过的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纪念馆、省博物馆、半坡遗址和支援越南抗美救国做出贡献的几个工厂进行参观。黎笋、范文同和其他成员在李瑞山、胡炜、孙长兴、韩念龙、王幼平等陪同下参观西安人民搪瓷厂时，受到热情欢迎。在工厂车间里，范文同总理代表越南党政代表团向工人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14年前，我们胡志明主席曾经到工厂来看望你们，今天我们就是来鉴定你们的建设成果的。厂领导向代表团赠送了绘有胡志明主席当年给工厂题词的搪瓷品和题词时的搪瓷像。工厂还将胡志明主席的题词和少年儿童在一起的情景谱写成歌曲，编成舞蹈，汇集了胡志明主席在西安、延安活动的影集，以表达中国人民对胡志明主席的热爱。黎笋说：“延安、西安人民热爱胡志明主席的感情就像热爱毛主席一样，使我们非常感动，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周恩来、李瑞山等陪同越南党政代表团赴延安参观访问，在延安机场受到3000多名群众热烈欢迎。中共延安地委书记、延安地区革委会主任许效民设宴招待越南贵宾，并陪同参观了革命旧址。越南党政代表团离开延安前，黎笋给延安人民题词：“延安——中国革命的根据地，就在这里，毛主席提出了领导中国革命的路线。在这条路线的光辉照耀下，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访问延安，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中国人民的艰苦卓绝和英勇无比的斗争史。谨祝富有坚强革命传统的延安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辉煌的成就。”

6月10日晚，省委、省革委会举行欢送宴会。李瑞山、黎笋、周恩来

先后在宴会上祝酒。宴会后文艺工作者为越南贵宾演出了歌舞节目。6月11日上午越南党政代表团，圆满结束中我国的正式友好访问，满载着中国人民对英雄的越南人民的战斗情谊，乘专机离开西安回国。

周恩来总理、耿飏部长、韩念龙副部长、王幼平大使，以及越南驻中国大使吴船，越南南方驻中国大使阮文广，省、市委，省、市革委会主要负责人李瑞山、孙长兴等及3000多群众到机场热烈欢送越南贵宾。当贵宾驱车前往机场的途中，聚集在道路两旁的数十万群众，向越南贵宾鼓掌、招手，表示热情欢送。

### 1974年

10月22日11时，丹麦王国首相保罗·哈特林和夫人一行24人，在中国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李水清陪同下，由北京乘专机到达延安，省革委会副主任章泽专程去延安迎接并陪同贵宾参观访问。

下午5时，丹麦贵宾抵达西安，受到省革委会主任李瑞山，副主任萧纯、王凤琴，西安市革委会副主任彭天琦和2000多名群众的热烈欢迎。丹麦贵宾在李瑞山等陪同下，绕场一周同欢迎群众见面。机场上鼓乐齐鸣，一片欢腾，穿着节日盛装的青少年跳起欢乐的舞蹈，人们挥动花束和彩带，高呼欢迎口号。哈特林首相和夫人向欢迎群众挥手致意。

丹麦贵宾游览了大雁塔。当晚，李瑞山主任举行欢迎宴会，出席作陪的有省革委会常委鱼得江、刘国声、李琦涛、王洁政、安文保，市革委会常委花杰、章谦和新闻单位负责人。宴会上，西安市文艺工作者演唱了中国革命歌曲。

晚11时，哈特林和夫人等丹麦贵宾乘专列离开西安前往洛阳访问。李瑞山、萧纯、章泽、王凤琴、彭天琦以及有关方面负责人前往车站送行。

### 1976年

5月15日—17日，新加坡共和国总理李光耀一行27人，由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仲曦东陪同乘专列到达西安参观访问。省革委会主任李瑞山、副主任谷凤鸣、章泽、张培信、马希圣、杨梦云，西安市革委会主任王林、省外办主任鲁曼，以及西安群众1000多人到车站热烈欢迎新加坡贵宾。西安车站广场上迎风飘扬着中国和新加坡两国国旗，当李光耀总理和夫人等贵宾走出车厢时，李瑞山等迎上前去，同他握手。然后李光耀总理和夫人与迎候在广场的群众见面，穿着鲜艳服装的青少年挥动花束和彩带翩翩起舞，高呼口号，表达了西安人民对新加坡人民的友好情谊。

代表团成员有：李光耀夫人柯玉芝、女儿李玮玲、外交部长拉贾拉南、财政部长韩瑞生等。在去丈八沟宾馆的沿途，新加坡贵宾受到成千上万群众的热烈鼓掌欢迎，李光耀总理等频频向路旁群众招手致意。

李光耀一行在西安参观了省博物馆、大雁塔、华清池、秦始皇陵及尚在发掘中的秦俑坑。晚上省革委会举行宴会，招待新加坡贵宾。

李光耀对西安之行比较满意。他在宴会上说：“到西安受到如此热情友好的欢迎，感到特别高兴。西安有几千年的历史，主要特点有她的连续性得到了新生，有着远大的前途。”他建议改善临潼和西安间的道路，把临潼建成一个旅游区。李光耀在参观中对陪同的谷凤鸣说：“中国这么多人口，解放后不长时间，就解决了吃饭问题，这是伟大的成就。”参观秦始皇陵时，李光耀对秦代陶俑兴趣很浓，他表示两千多年前就有这么高的艺术水平，真是难以想象。当谈到秦始皇筑长城、修陵墓使用了很多徭役，人民不满意时，李说：“修长城还是必要的，防御外来入侵，正如中国当代花了很多钱用于发展武器一样。如果不花钱制造原子弹、导弹，防止外来入侵，那将是危险的。”

李光耀总理一行，由省革委会副主任章泽陪同去延安访问，5月17日途经西安乘飞机去上海，李瑞山等省、市领导到机场欢送。

### 1977年

6月13日，苏丹总统尼迈里一行70人，其中随同记者15人，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乌兰夫、外交部副部长何英等陪同，从长沙乘两架三叉机去乌鲁木齐途经西安，在西安西关机场作短暂停留，有关方面负责人前往迎送。

### 1979年

9月16日—17日，丹麦王国玛格丽特二世女王陛下和亨里克亲王殿下—行74人，由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和夫人牟锋、外交部部长助理宋之光、中国驻丹麦大使秦加林和夫人陪同来西安访问。西安主要街道挂起了各色彩旗和巨幅标语，热烈欢迎北欧国家第一个访问中国的国家元首玛格丽特女王前来西安参观访问。

丹麦贵宾乘专机抵达西安时，受到省革委会代主任姜一和夫人陈尚德，西安市革委会主任陈元方和夫人赵南等热烈欢迎。当女王陛下和亲王殿下乘坐的车队途经市内街道时，成千上万的群众自动聚集在马路两旁，向女王招手致意，欢迎丹麦贵宾来访。

玛格丽特女王爱好考古，曾在意大利、苏丹等地亲自参加过考古发掘工作。早在来中国之前，女王就知道秦始皇陵兵马俑陪葬坑已出土很多陶俑。在抵达西安两个半小时以后，女王就驱车前往秦始皇兵马俑陪葬坑参观。一到兵马俑陪葬坑，女王和亲王就下到19号坑底，穿梭于数百个已修复的兵马俑之间，欣赏兵马俑栩栩如生的各种形态，参观了在地下埋藏了2100多年的青铜兵器。女王和亲王还饶有兴趣地在半坡博物馆参观了出土的各式陶器和已经发掘的有1万平方米的一部分先民居住区。女王说：“这里的一切给我们留下了永恒的记忆”。

晚上，省革委会举行宴会，姜一和玛格丽特女王先后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谷牧副总理和夫人、陈元方和夫人出席了宴会。出席宴会作陪的还有到机场迎接贵宾的省革委会副主任何承华、省外办主任鲁曼、省财贸办主任刘邦显、省外办副主任黄叔宽、孙铭以及工业、农业、商业、政法、文化、教育部门和新闻、妇女界等方面的负责人。

丹麦贵宾访问了省博物馆。在休息室里，女王和亲王欣赏了省博物馆收藏的中国古代珍贵名画、字帖和出土的唐三彩原件，会见了著名史学家、省博物馆馆长武伯伦并进行了谈话。丹麦贵宾还游览了大雁塔。

丹麦女王在参观西安文物古迹之后高兴地说：“这里发现了远自新石器时代的遗迹，秦朝第一代皇帝的墓地，向全世界提供了高度发达文化的绝无仅有的证据。这种明显的古代与现代之间的融会贯通，将给我们对中国的访问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丹麦女王一行圆满结束在西安的参观访问，由谷牧副总理和夫人等陪同，乘专机离开西安时，姜一和夫人、陈元方和夫人等到机场送行。

9月29日—10月1日，卢森堡大公国大公让殿下—行50人，由国务院副总理康世恩陪同，从北京乘专机来西安参观访问。随同来访的有大公夫人、副首相兼外交大臣、国务秘书等。

为迎接卢森堡大公让一行，西安市主要街道悬挂彩旗和巨幅横额。当贵宾乘专机抵达西安时，受到省革委会代主任姜一和夫人陈尚德、西安市革委会主任陈元方和夫人赵南、省革委会副主任谢怀德、省外办主任鲁曼、副主任孙铭、省外贸局副局长刘华等欢迎。晚上，省革委会在陕西宾馆举行欢迎宴会。

贵宾们在西安期间，参观了省博物馆、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半坡博物馆，游览了大雁塔和华清池。省文化局还为大公让一行在人民大厦礼堂举行

具有陕西特点的音乐、歌舞文艺晚会。10月1日上午，大公让一行结束了在西安参观访问，乘专机赴南京。姜一、陈元方等到机场欢送。

12月8日—9日，应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的日本首相大平正芳和夫人，由中国外交部部长黄华和夫人、中国驻日本大使符浩和夫人陪同，从北京乘专机11时40分抵达西安访问。随同来访的有日本政府顾问二阶堂进、内阁官房副长官加藤统一、日本驻华大使，以及大平首相的儿子、儿媳和女婿等一行57人，随行记者及通讯人员70余人。大平首相这次来访是他再次当选总理大臣后的首次出访，也是日本政府首脑第一次来西安访问。市内主要街道上空挂起了一面面彩旗、一幅幅欢迎日本贵宾的巨幅横标。

省革委会主任于明涛和夫人，西安市革委会主任陈元方和夫人，省革委会副主任何承华、省外办主任鲁曼、市革委会副主任丁志明、省外办副主任魏明中、孙铭等到机场热烈欢迎日本贵宾。大平首相和夫人乘坐的专机在西安机场着陆。于明涛、陈元方同大平首相热情握手，对日本贵宾来西安访问表示热烈欢迎。

大平首相和夫人在机场稍事休息后，驱车前往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参观，结束时在留言簿上写到：“秦俑坑真是世界奇迹。百闻不如一见，真是名不虚传。”大平一行还游览了临潼华清池。

当晚，省革委会和市革委会在陕西宾馆举行宴会，外交部部长黄华和夫人，中国驻日大使符浩和夫人以及迎送人出席宴会作陪。

于明涛主任和大平首相先后在宴会上讲话。大平说：访问与日本因缘非浅的古都西安，是我和我夫人长久的理想，这次长年盼望的理想得到实现，不胜感激。这次访问西安，使我有机会再次认识到日中2000年的交流历史的分量。

宴会上，大平首相向陕西省图书馆赠送了介绍日本美术、文化、书法、佛学等方面的书籍953册，并亲手把图书目录单交给于明涛。于明涛主任代表省革委会，把唐代著名书法家怀素的草书《千字文》拓片和一件刻有日本空海和尚诗句的微型象牙雕刻，赠送给大平首相。

大平首相和夫人一行，由于明涛、陈元方等陪同，参观了省博物馆，游览了兴庆公园和大雁塔。所到之处，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在省博物馆，负责人对大平首相说：我们知道首相是一位有名的书法家，请您题词留念。大平首相欣然点头答应，挥毫写了“温故知新”四个大字。

大平首相和夫人一行来到兴庆公园，会见了市革委会副主任阎明和西安

京都友好人民公社主任刘生德、西安奈良友好人民公社主任贾永福，300多名身穿艳丽服装的青少年，手持花束、彩带，翩翩起舞，向日本贵宾表示热烈欢迎。两名少先队员向大平首相和夫人献了鲜花。大平首相和夫人来到位于公园东南隅的“阿倍仲麻吕纪念碑”前，虔诚鞠躬默念，向这位为中日友好和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的先驱者表示敬佩，并仔细地观看了刻在纪念碑上的阿倍仲麻吕的《望乡诗》和唐代著名诗人李白为怀念阿倍仲麻吕写的《哭晁卿衡》诗。随后，步入“长庆轩”暂短休息，陈元方主任代表市革委会向大平首相和夫人赠送了礼品。接着又驱车前往大雁塔，观赏了这座唐代的雄伟建筑，并站在大雄宝殿前的台阶上和陪同参观的中国主人合影留念。

大平首相和夫人一行于12月9日下午2时离西安赴上海，于明涛和夫人、陈元方和夫人以及有关部门负责人到机场送行。

#### 1980年

9月21日—23日，意大利共和国总统桑德罗·佩尔蒂尼和夫人一行107人，其中随行记者73人，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冲，中国驻意大利大使张越和夫人等40人陪同，9月21日从北京乘专机来西安。这是意大利国家元首第一位来西安参观访问。副省长白纪年、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毅忱、西安市市长王真、省外办主任鲁曼、西安市副市长土金璋等前往机场欢迎。随同佩尔蒂尼总统来访的有：众议院议员赞贝莱蒂、总统府秘书长马卡尼科博士和夫人，以及意驻中国大使塔马尼尼和其他高级官员。在车队经过市区主要街道上空，面面彩旗迎风招展，街道两旁的群众热情鼓掌、招手，向来自欧洲南部的意大利贵宾表示欢迎。

当晚7时30分，省政府在陕西宾馆举行欢迎宴会。彭冲、白纪年、张毅忱、王真等出席。

佩尔蒂尼总统在祝酒时说：“在这短促的参观中，我已经观察到西安拥有如此多的名胜古迹和证明它的伟大过去的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物。七世纪以前，马可·波罗旅行到了西安，并在他的游记中向西方传扬了这个伟大城市的艺术财富和商业繁荣的盛况。今天，西安人民可以为这个光辉的过去而感到自豪。但是，除了回忆西安的光辉传统以外，我极感兴趣地看到西安如何生机勃勃地投入了标志中国现阶段特征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去。”

佩尔蒂尼总统在西安期间，访问了工厂，游览了名胜古迹，还在东大街漫步，观看街头的景况。9月22日晚，以省文化局名义在陕西宾馆举行了专场文艺晚会，演出结束，总统和夫人等上台会见演员，并赠送花篮，合影



留念。

佩尔蒂尼总统和夫人一行9月23日上午离开西安时，省、市及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到机场送行。

10月18日—19日，法兰西共和国总统瓦莱西·吉斯卡尔·德斯坦一行96人（含新闻记者74人），由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黄华陪同，于10月18日13时乘专机由北京到达西安参观访问。省长于明涛、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孙作宾、副省长谢怀德、省政协副主席吴生秀、西安市市长王真以及有关方面负责人鲁曼、魏明中、刘振华等到机场欢迎。

随同德斯坦总统和夫人来西安访问的有：总统的女儿，外交部长让·弗朗索瓦—蓬塞和夫人，司法、掌玺部长阿兰·佩雷菲特，总理府负责行政改革的部长级代表让—弗朗索瓦·德尼奥，参议院外交、国防和武装力量委员会主席让·勒卡尼埃，总统府秘书长雅克·瓦尔，法国驻中国大使克洛德·沙耶等官员。

当晚，省政府在陕西宾馆举行欢迎宴会。黄华副总理和夫人、中国驻法国大使姚广以及在西安工作的一些法国专家出席了宴会。

于明涛和德斯坦在宴会上先后祝酒，德斯坦说：通过这次访问，将鼓励我们发展两国人民特别是陕西省与法国之间的友谊，发展两国在经济与文化领域里的合作。席间，西安文艺工作者演奏了中、法两国歌曲。

德斯坦总统和夫人一行，由省长于明涛等陪同，参观了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秦始皇陵和省博物馆。在秦俑馆参观时，德斯坦还下到俑坑内，仔细观看了神态各异、造型逼真的兵马俑。他说，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博物馆，它一定会在世界上享有盛名。

德斯坦总统一行10月19日上午乘专机离开西安赴西藏拉萨时，孙作宾等到机场欢送。

10月31日—11月2日，荷兰王国首相安德亚斯·范阿赫特和夫人一行33人（含随团记者16人），由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韩克华和夫人，中国驻荷兰大使丁雪松等陪同，自北京乘专机来西安参观访问。省长于明涛、副省长何承华、西安市市长王真和有关方面负责人鲁曼、白玉峰、刘振华等到机场欢迎。

范阿赫特是荷兰第一位来西安访问的首相。随同来访的有：外交大臣范德克劳和夫人，荷兰驻中国大使柯南荷和夫人，以及其他官员和新闻界人士。

当晚，省政府为荷兰贵宾在陕西宾馆举行了欢迎宴会。于明涛省长和范阿赫特首相先后在宴会上致祝酒词。范阿赫特在祝词中说：我们很钦佩贵国在经济方面所作的努力，在北京的会谈中我们感觉到，我们两国的合作会对贵国的经济发展有所贡献。他祝愿中荷两国人民的友谊和友好合作不断发展。

于明涛省长、何承华副省长等陪同首相参观了名胜古迹。晚上，荷兰贵宾观看了专场文艺晚会。

范阿赫特和夫人一行2日上午乘专机离开西安前往无锡时，于明涛省长等到机场送行。

### 1981年

5月29日—30日，应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邀请的比利时国王博杜安一世和王后陛下一行61人，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冲、外交部部长助理宋之光、中国驻比利时大使郑为之和夫人等陪同，从北京乘专机来西安参观访问。这是自1951年博杜安一世国王登基以来首次访华。

省长于明涛和夫人王荣英、副省长李连璧和夫人高一明、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毅忱、西安市市长王真、省外办副主任魏明中、黄叔宽和省科委副主任苏贯之前往机场迎接。

随同国王和王后来访的有比利时外交大臣夏尔—费迪南·诺车和夫人、比利时驻中国大使罗杰·德诺睦，以及其他官员等36人，随行外国记者75人，北京陪同32人。

西安西关机场上飘扬着中比两国国旗。当博杜安一世和王后走下铺着红地毯的舷梯时，于明涛和夫人等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欢迎。少年儿童向国王和王后献了花束。

因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逝世，原定举行欢迎宴会改为在陕西宾馆共进午餐。国王说：“获悉宋庆龄名誉主席逝世，昨天晚上，我已以比利时人民的名义向叶剑英委员长发了唁电。今天，我和我率领的比利时代表团同你们一起分担悲痛。”

在去秦兵马俑博物馆的路上，当谈到国家建设时，国王说：“欧洲国家工业高度发达，人民生活水平很高，也舒适，每星期只工作五天，大部分人经济条件富裕，可以去国外度假。但生活水平越高，越舒适，思想越松懈，人与人关系越淡薄，社会的弊病越多，凶杀、遗弃父母和长者的现象比比皆是。社会道德很差，自杀现象越来越多。环境污染严重，人们心情受压抑愈

深。虽然建了不少高楼大厦，但家庭无法放心让孩子下楼玩耍，各家各户之间越来越疏远。人们不断追求新的东西，总是有不满足的感觉，由于条件优越，就丧失了上进心，不再努力工作。能源危机日益严重，人口增长率下降，人口的组成老化。尽管西欧有优越的物质条件，但精神生活空虚贫乏，没有理想。希望中国领导人在发展经济时，一定要注意精神、物质上都进行提高，要加强对青年人的教育，不要机械地仿效西方的发展道路。要保持自己的民族特色，借鉴外国的好东西，摒弃西方的坏东西。”

国王和王后对在西安“看这么多的中国悠久的历史非常感激”，“对允其参观秦铜车马”感到十分荣幸。在省博物馆，国王和王后欣赏了几件馆藏历史珍品，看到2400多年前战国时代的一个乌盖酒壶后，王后说：“这么珍重的东西，我摸摸也是荣幸的”。国王和王后于5月30日下午乘专机前往苏州时，省长于明涛等前往机场欢送。

9月18日—19日，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邀请的瑞典国王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陛下和王后一行63人，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习仲勋、外交部部长助理宋之光和夫人，及中国驻瑞典大使曹克强和夫人陪同，乘专机从北京到达西安参观访问。随同国王和王后来访的有：劳工、能源大臣英厄马尔·埃利亚松、国王军事参谋长斯蒂格·辛内格伦将军、瑞典驻中国大使斯滕·松德费尔特和夫人等。

省长于明涛和夫人，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毅忱、副省长李连璧，西安市市长王真，省外办主任鲁曼等前往机场迎接。

当晚7时许，省政府在陕西宾馆举行欢迎宴会，于明涛主持宴会，习仲勋、张毅忱、李连璧、省政协副主席傅道伸和外交部部长助理宋之光、中国驻瑞典大使曹克强，及省、市有关方面负责人出席作陪。于明涛和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先后祝酒讲话。国王在讲话中说：“西安不仅拥有不少珍贵的文物古迹，又有许多新的工业和文化教育设施，从而使它的面貌更加绚丽。”习仲勋在于明涛和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讲话后举杯祝酒。他说：“我作为一个陕西人，今天陪同瑞典贵宾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款待国王和王后陛下，感到十分高兴。我相信，西安市和陕西省人民，都会以喜悦的心情，欢迎国王和王后陛下来这里参观访问。希望国王和王后以及瑞典其他贵宾在西安逗留期间过得愉快。”

宴会在友好热烈的气氛中进行，席间，西安文艺工作者演唱、演奏了中瑞两国歌曲和乐曲。

国王和王后一行，在于明涛等陪同下，参观了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馆内排列成大型战阵的陶兵马俑和展出的古代兵器，使一度热爱考古并参与古代建筑发掘工作的国王陛下极感兴趣。他在参观后对博物馆负责人说：“我很高兴看到这里展出的文物，今天的参观使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国王和王后陛下还参观了秦始皇陵、华清池和半坡博物馆。

瑞典国王和王后一行于下午4时许乘专机赴成都，于明涛和夫人等到机场送行。

10月23日—25日，应中国政府邀请的丹麦王国首相安高·约恩森和夫人一行19人，由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文晋等陪同，乘专机从北京抵达西安。省长于明涛和夫人，副省长李连璧、西安市市长王真、省外办副主任黄叔宽到机场迎接。随同约恩森首相和夫人来西安访问的有：首相府秘书长彼特·维瑟和夫人、丹麦王国驻中国大使托宁—彼德森和夫人，首相府顾问索恩—奥勒·澳尔森等。贵宾们到达西安后即由于明涛省长陪同去临潼参观游览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秦始皇陵和华清池。约恩森首相和夫人还到临潼县城关镇西街大队西窑生产队进行家访，了解社员王同民家的生活情况。还参观了省博物馆。

当晚，省政府在陕西宾馆举行宴会，热烈欢迎丹麦贵宾。陪同丹麦贵宾的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文晋和夫人、外交部部长助理宋之光和夫人，中国驻丹麦大使秦加林和夫人出席了宴会。

在洋溢着友好气氛的宴会上，于明涛省长和约恩森首相先后发表了简短讲话。

于明涛省长说，新中国成立后，丹麦1950年5月11日同我国建交，建交以来两国的友好关系不断发展。

约恩森首相说，我们怀着极大的兴趣，期待着对中国的千年古都、世界闻名的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西安的访问。去年夏天，在丹麦举行了中国大型出土文物展览，许多珍贵的陈列品来自西安，那次展出成了近年来丹麦的一个最重要的文化交流。今天我们在西安所看到的東西，可以说是世界上无与伦比的古化文化珍宝。他在讲话结束时，提议在座各位一起高呼：“丹中友谊万岁！”

约恩森首相和夫人一行由省副省长李连璧、外交部长助理宋之光和夫人陪同到延安参观，当天返回西安。晚上，丹麦贵宾由于明涛省长陪同观看了陕西省京剧团演出的《三岔口》和《白水滩》。

10月25日上午11时许，丹麦贵宾乘飞机赴上海，于明涛省长等为他们送行。

10月28日—30日，应中国政府邀请的委内瑞拉共和国总统路易斯·埃雷拉·坎平斯和夫人一行62人，由国务院副总理姬鹏飞和夫人许寒冰、中国驻委大使卫永清和夫人等27人陪同，从上海乘专机到达西安。陕西省省长于明涛和夫人王荣英，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孙作宾、副省长李连璧、西安市市长王真、省外办主任鲁曼到机场迎接。机场上飘扬着中委两国国旗。当埃雷拉总统和夫人走下铺着红地毯的舷梯时，于明涛、王荣英等同他们热情握手，对贵宾们前来西安访问表示热烈欢迎。少先队员向埃雷拉总统和夫人献花。

随同埃雷拉总统访问西安的有：总统的儿子、女儿，外交部长何塞·阿尔贝托·桑布诺·贝拉斯科、国防部长贝尔纳多·莱亚尔·普奇中将和夫人、最高法院法官伊格纳西奥·路易斯·里瓦斯和夫人、委内瑞拉驻华大使雷古洛·布雷利·里瓦斯和夫人等。

埃雷拉总统由于明涛省长和夫人陪同，参观了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秦始皇陵，游览了华清池和大雁塔。发表过许多文学作品的埃雷拉总统，对中国千年古都的文物古迹十分赞赏，给予很高评价。他在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参观后说：“我们感到非常幸运，在这里看到了如此珍贵的文物，它不仅是中国宝贵财富，也是全人类的宝贵财富。”

10月29日晚，省政府在陕西宾馆设宴款待了委内瑞拉贵宾。国务院副总理姬鹏飞和夫人、中国驻委大使卫永清和夫人出席作陪。于明涛省长和埃雷拉总统在宴会上先后讲话。出席宴会的还有：孙作宾、李连璧、省军区司令员孙洪道、西安市市长王真、省外办主任鲁曼等。

埃雷拉总统和夫人一行于10月30日上午乘专机前往北京时，于明涛省长等到机场欢送。

### 1982年

2月26日—27日，摩洛哥王国首相布马蒂·布阿比德阿比德一行28人，由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何英等23人陪同来西安访问（随行记者17人）。首相抵离西安时，省长于明涛、副省长李连璧、西安市代市长张铁民、省外办主任鲁曼到机场迎送。并陪同参观游览了名胜古迹。省长于明涛在陕西宾馆设宴欢迎。2月27日上午飞赴上海。

5月2日—3日，卢森堡大公国首相皮埃尔·维尔纳一行8人，由中国外

交部副部长张焰明，中国驻卢大使郑为之陪同来西安访问。抵离西安时，省长于明涛、副省长李连璧、西安市代市长张铁民、省外办主任鲁曼等到机场迎送。省长于明涛在陕西宾馆设宴欢迎首相一行。李连璧副省长、张铁民代市长等陪同参观了名胜古迹，5月3日下午乘专机赴上海。

9月22日—23日，应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邀请，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主席金日成，由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联部部长乔石、外交部顾问韩念龙、中国驻朝鲜大使宋克文等陪同，乘专列由成都抵达西安。

随金日成主席访问西安的有：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人民武装力量部部长吴振宇，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金永南，中央政治局委员、平壤市党委第一书记徐允锡，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许镔以及朝鲜驻中国大使全明洙等92人。

先期由邓小平同志陪同朝鲜贵宾在成都进行了两天访问。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专程从北京到成都陪同金日成主席从成都乘专列抵达陕西。古城西安披上节日盛装，车站广场和市区主要街道艳丽的彩旗迎风飘扬。金日成主席在胡耀邦陪同下，步出专列，受到省委第一书记马文瑞，省委书记、省长于明涛，省委常务书记章泽，省委书记、副省长姜一，省政协主席吕剑人，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常黎夫，省委书记、西安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元方，省军区司令员孙洪道，副省长李连璧，西安市委第一书记何承华，西安市代市长张铁民，西安警备区司令员樊培山，省外办主任魏明中，以及2000多名群众的欢迎，少先队向金日成主席献了鲜花。车站广场一片欢腾，40面大型彩旗迎风招展，欢迎的人群挥舞花束、彩带，跳起欢乐的舞蹈。金日成主席在胡耀邦、马文瑞等陪同下驱车前往宾馆途中，10多万群众怀着喜悦的心情，聚集在街道两旁，向朝鲜贵宾热情鼓掌，表示欢迎。

当晚，省委、省政府在陕西宾馆举行盛大宴会，欢迎金日成主席一行。出席宴会作陪的还有：省委宣传部、统战部、省科委、省农委、计委、经委、国防工办、公安厅、外经办、外贸局、卫生局、商业局、邮电局、广播事业局、文化局、体委、西北民航局、西安铁路局、省旅游局、省友协，西安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供电局，新华社陕西分社、陕西日报、西安晚报等有关部门负责人及前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斗英雄代表出席。

马文瑞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人民武装力量部部长吴振宇代表

金日成主席先后在宴会上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吴振宇在祝词中还指出，以兄弟情谊和革命道义牢固地建立起来的朝中两国人民之间的战斗友好关系，是不可分割的唇齿相依的关系，是在任何风浪里都永不动摇的血肉关系。他说，朝鲜人民将永远珍视同兄弟的中国人民的传统友好关系，为不断地巩固和发展这一关系作出一切努力。

金日成主席一行由胡耀邦、马文瑞、于明涛、章泽等陪同，参观游览了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和华清池。金日成主席和胡耀邦总书记在参观台上观看了兵马俑一号坑的全貌，还兴致勃勃地参观了一年前的出土的大型秦铜车马，以及展出的古代兵器。他称这是一个“伟大的发现”。在参观结束时，金日成主席在纪念簿上留言：“这是一个伟大的古迹，中国的考古工作者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他们的工作做得很好。讲解员把兵马俑讲活了，很感动人。”金日成主席和胡耀邦总书记在华清池的“九龙汤”旁合影留念。金日成主席还游览了西安市容，沿途受到几十万群众热烈欢迎。

金日成主席一行结束参观访问后，由胡耀邦、乔石、韩念龙、宋克文等陪同于9月23日晚乘专列前往北京。于明涛、章泽、姜一、吕剑人、常黎夫、陈元方、孙洪道、李连璧、何承华、张铁民、樊培山、魏明中，以及西安群众2000多人，热烈欢送朝鲜贵宾。金日成主席的车队经过的街道两旁，20多万群众夹道向朝鲜贵宾热情鼓掌致意。

10月14日，应全国人大常委会和中国政府的邀请，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统卡尔·卡斯滕斯，由外交部副部长章文晋和夫人陪同，10时30分乘专机从北京抵西安参观访问。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马文瑞和夫人孙铭、副省长白纪年、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力贞、西安市代市长张铁民、省外办主任魏明中前往机场迎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贵宾。随同卡斯滕斯总统和夫人来访的有：外交部国务部长阿洛伊斯·默特斯和夫人，国务秘书、总统府办公厅主任汉斯·诺伊泽尔，外交部国务秘书汉斯·维尔纳·劳滕施拉格，驻中国大使修德和夫人，以及其他官员42人、随行记者48人。

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中午1时在西安人民大厦举行宴会，欢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统卡斯滕斯和夫人等贵宾一行。

马文瑞主持宴会并致祝酒词。卡斯滕斯在祝酒时说：“去年，我国接待了来自西安的有关秦始皇陵墓出土文物的展览会。这个展览会在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都引起了非常大的轰动和重视。我在德国已经看到部分展品，所以我特别高兴今天能去参观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

外交部副部长章文晋和夫人出席了宴会。出席宴会作陪的除迎送人外，还有省公安厅、省科委、省文物局、省文化局、省旅游局、省民航局、省邮电局、省友协、省外办、人民大厦等单位负责人。

白纪年、刘力贞、魏明中等陪同德国贵宾参观游览了省博物馆、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华清池和大雁塔。卡斯滕斯在参观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时，观看了出土不久的秦铜车马。他在贵宾留言簿上题词：“非常有意思，这里的文物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

晚6时30分，卡斯滕斯总统和夫人一行由章文晋和夫人陪同，乘专机离开西安去上海访问。马文瑞和夫人以及白纪年、刘力贞、张铁民、魏明中、省外办副主任高智等到机场送行。

10月20日—21日，应中国政府邀请的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总统穆罕默德·齐亚·哈克上将和夫人一行70人，由外交部副部长吴学谦、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王传斌和夫人陪同乘专机从北京抵达西安，机场上飘扬着中巴两国国旗，代省长白纪年在飞机舷梯旁同哈克总统热情握手，对贵宾们来访表示热烈欢迎。少先队员向总统和夫人献了鲜花。到机场迎接巴基斯坦贵宾的还有：副省长陈明、西安市代市长张铁民、省外办主任魏明中、副主任黄叔宽、省妇联副主任王荣英。

哈克总统的主要随行人员有：巴基斯坦联邦顾问委员会主席赫瓦贾·穆罕默德·萨夫达尔，外交部长萨哈布扎达·雅各布·汗，财政部长吴拉姆·伊沙克·汗和夫人，内政部长马哈茂德·哈龙和夫人，总统旅游顾问维卡伦·尼萨·努恩夫人，总统首席参谋官哈立德·马哈茂德·阿里夫中将和夫人，驻中国大使巴蒂夫人等，随行新闻界人士30人。

当日晚，省政府在陕西宾馆举行欢迎宴会，由白纪年代省长主持。外交部副部长吴学谦、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王传斌和夫人、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汉武、副省长陈明、省政协副主席范明、省军区副司令员李修英、西安市代市长张铁民以及省公安厅、文物局、文化厅、邮电局、卫生厅、商业厅、旅游局、财政厅、机械局、西北民航局、省对外友协、省民委、伊斯兰教协会及新闻、广播、陕西宾馆等有关方面负责人出席作陪。白纪年和齐亚·哈克先后发表了热情的讲话。哈克在讲话中祝愿西安这座古老的城市繁荣昌盛和继续发展。他说：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关系是理想的。我深信，这种关系今后会不断得到发展和加强。

哈克总统和夫人一行，参观游览了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华清池和大雁



塔。齐亚·哈克是一名虔诚的伊斯兰教徒。他特地访问了化觉巷清真寺，在清真寺大殿同阿訇马良骥以及300多名穆斯林一起做礼拜。哈克总统对马良骥说：“今天是我一生中一次难忘的经历。中国穆斯林同巴基斯坦穆斯林是亲密的兄弟。”同时向阿訇许诺向大厅赠送一批毛毯以表对真主虔诚之心（注：1988年8月通过中国兵器工业部运送毛地毯1000多平方米，并经省外办安排举行了隆重的捐赠仪式。）

哈克总统和夫人一行，10月21日上午乘专机离开西安去桂林访问，白纪年等到机场送行。

### 1983年

5月6日，应中国政府邀请的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由石油工业部部长唐克、中国驻法国大使曹克强和外交部部长助理周南等陪同，从北京乘专机抵达西安参观访问。

省长李庆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连璧、副省长白纪年、西安市市长张铁民和省外办主任魏明中、副主任高智等前往机场迎送。

随同密特朗总统来访的有：法国对外关系部长克洛德·谢松，运输部长夏尔·菲泰尔曼，外贸和旅游部长埃迪特·克勒松夫人，负责文化事务部长级代表雅克·兰，总统特别顾问雅克·阿塔利，法国驻中国大使夏尔·马乐，以及其他官员70人，新闻界人士80人。

密特朗总统在西安的访问仅6个小时，活动十分紧促。抵西安后，立即驱车前往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参观。展厅里那威武雄壮、排列成大型战阵的兵马俑，使法国贵宾赞叹不已。密特朗总统又来到大厅北侧的一个展室，兴致勃勃地参观1980年12月出土的大型铜车、铜马、铜人。他好奇地拉开车上的活动车牖又把它关上，又俯身对着车轮仔细地端详了好一会，说道：“两千多年前，青铜器铸造技术达到这样的水平，真不简单，这是个奇迹。”

省政府在西安人民大厦举行欢迎午宴。李庆伟省长主持宴会并致词祝酒。密特朗总统在祝酒时说：“西安是一个有历史价值的古都，我们今天参观了出土文物秦兵马俑，它表明中国人民在才能方面，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之一。”他祝愿陕西的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在午宴上，密特朗总统称赞中国的烹调技艺，对“驼蹄羹”这道菜很赞赏。他称赞西安的稠酒度数低、口感好。他感谢中国主人的盛情款待举杯祝酒：“我要按照中国的传统方式向大家敬一杯，这样可以表明我们两国人民的友谊。”

下午4时30分，法国贵宾乘专机前往南京，李庆伟等到机场送行。

9月5日—6日，应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李先念邀请的约旦哈希姆王国侯赛因·伊本·塔拉勒国王和王后一行45人，由中方陪同团团长、轻工业部部长杨波和夫人、外交部副部长温业湛、中国驻约旦大使黄世燮和夫人等陪同，从北京乘专机于上午11时抵达西安参观访问。

省长李庆伟和夫人，前往机场欢迎约旦贵宾。少年儿童向国王和王后陛下献了花束。到机场欢迎约旦贵宾的还有副省长孙克华、省军区司令员冀廷璧、西安市市长张铁民、省外办主任魏明中、副主任孙铭等。

随同来访的有：宫廷总管艾哈迈德·芒育、武装部队总司令沙克尔中将、约旦驻华大使卡迈勒·哈穆德、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哈纳·乌达博士等。

下午，侯赛因国王一行在李庆伟、孙克华等陪同下，参观了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他说：“这是整个人类的财富”，还说：“两千多年前中国就有了这样好的兵器，真了不起。”“这些文物是我一生中最钦佩的，说明中国很早就达到了人类文明的高峰。”他们还仔细地鉴赏了新出土、修复好的珍贵文物——秦代铜车马。临别时，国王和王后在贵宾留言簿上签了名。侯赛因国王对馆长说：“我没有想到能看到这样珍贵的文物，这证明中国人民有悠久的文明和历史。假如允许的话，我还要再到这里来参观；即便不能来，我也将关心着这里的消息。”随后约旦贵宾还兴致勃勃地游览了大雁塔，参观了陕西省博物馆。

当晚，省政府在陕西宾馆举行欢迎宴会。李庆伟省长主持宴会并致词祝酒。侯赛因国王在祝酒时说：“我们非常高兴有机会访问西安这座著名的城市，它有光辉的过去和灿烂的今天。我将带着最美好的印象和记忆回到约旦，我将永远记住在中国看到的一切。”侯赛因国王还对李庆伟省长说：“我们两国在科技、文化领域已经有一些合作。考古也是一个领域，希望加强两国考古工作人员的交流与合作，从而增进我们两国的往来与友谊。”出席作陪的还有：省军区、省计委、经委、经贸厅、旅游局、轻工厅、文化文物厅、卫生厅、高教局、体委、公安厅、省广播电视厅、省邮电局、西北民航局、省友协，中国伊斯兰教协会陕西分会，陕西日报等单位负责人。

在洋溢着亲切友好气氛的宴会上，省歌舞团表演了精彩节目，乐队演奏了几首约旦乐曲，王后也伴随着乐曲高兴地跳起舞来。

约旦贵宾离开西安前往桂林，李庆伟省长和夫人等前往机场送行。

#### 1984年

2月24日美国总统里根先遣组一行45人抵西安进行各项联络工作。

4月29日13时35分，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和夫人，由中国陪同团团长、文化部部长朱穆之和夫人、中国驻美大使章文晋和夫人、外交部副部长韩叙和夫人等陪同，乘美国总统座机从北京到达阎良机场。

随同总统来访的有国务卿乔治·舒尔茨和夫人、总统助理兼白宫办公厅主任詹姆斯·贝克、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罗伯特·麦克法兰，美国驻中国大使恒安石和夫人等高级官员17人，随行27人，美方新闻记者180人，先遣人员123人，共计347人。北京陪同人员78人。

当专机在阎良机场降落时，里根总统一行受到省长李庆伟和夫人、副省长白纪年、西安市市长张铁民、省外办主任魏明中和前不久曾到美国从事学术研究的西安交通大学副教授姚熹等的热烈欢迎。两名少年向总统和夫人献了鲜花。

里根总统和夫人由李庆伟省长和夫人陪同驱车前往临潼，副省长孙达人、省文化文物厅厅长李若冰在秦俑馆迎候美国客人。

里根总统和夫人先到兵马俑一号坑大厅，在参观台上纵览了全貌。他们兴致勃勃地下到秦俑坑内，当里根听到秦俑馆建成后，他是被特许下坑的第一位外国元首时，十分高兴，而且在坑里停留了很长时间，激动地向大家招手，让记者摄影留念。里根指着跃跃欲驰的陶质兵马俑，风趣地对讲解员说：“真像活的一样，我可以摸摸马的头吗？它不会踢我的。”接着，里根和夫人参观了1980年12月出土的大型彩绘铜车马，详细地观看这辆稀世珍宝，里根围绕铜车马看了一圈，并逐一观看有关铜车马的照片，当讲解员介绍在车轴里还有润滑油时，里根很惊讶！他说：“用现在的技术，也未必能达到这样高的水平！”参观结束时，里根总统和夫人在留言簿上签名。

里根和夫人还参观了设在秦俑馆大门外的贸易集市，里根观赏了西安穿罗绣和陕西布贴绣品，里根夫人高兴地买了5个绣有动物、昆虫的绣花针线荷包。

下午6时零5分，里根总统和夫人一行结束了在西安的参观访问，由朱穆之部长和夫人等陪同乘专机离开西安返回北京。李庆伟省长等到机场送行。

10月11日9时30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理科尔和夫人一行248人，其中经济界人士24人，各方代表人士80人，随员74人，新闻记者70人，由中国陪同团团长、教育部部长何东昌和夫人，外交部副部长周南和夫人，中国驻联邦德国大使安致远和夫人陪同，分乘三架专机从北京抵达西安参观

访问。代省长张斌、省外办主任魏明中、西安市副市长靳毅仁、省经委主任李嘉猷、省妇联主任张凤英等前往机场迎接。

在张斌等省、市领导陪同下，科尔总理和夫人一行直接从机场驱车前往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参观。科尔总理在留言簿上写道：“这次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古老文化和伟大的传统，我感到十分惊异，这是一次有意义的经历。”科尔夫人也对记者发表观感说：“今天能来这里参观庞大的陶俑军队，我感到非常高兴，使我惊奇的是中国人民竟有如此悠久的历史传统。”

当日下午2时，省政府在人民大厦举行宴会，欢迎科尔总理和夫人一行。代省长张斌在宴会上代表省政府致欢迎词。科尔总理即席说：“西安在中国历史上曾起到很重要的作用。今天我们在秦始皇兵马俑看到的奇迹，不仅在考古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而且表明这里曾是世界早期历史的一个中心，证明中国古代在文化方面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令人赞叹！”

宴会上，宾主互相进行了轻松、愉快的交谈，国务秘书、联邦德国政府新闻和情报局局长彼得·伯恩施先生向张斌代省长表示：“回国后要进一步联系，希望我们的一个州将来同贵省建立省州友好关系。”

下午4时30分，科尔总理和夫人一行结束了对西安的访问，乘专机前往武汉。

## 1985年

4月20日上午8时，比利时王国首相维尔弗里德·马尔腾斯和夫人，由中国陪同团团长、邮电部部长杨泰芳和夫人、中国驻比利时大使章曙和夫人陪同，从洛阳乘专列抵达西安临潼车站，受到省长李庆伟和夫人、副省长张斌、西安市代市长袁正中、省外办主任陈兴亮、省邮电局局长张作瑛的热烈欢迎。随同来访的有首相夫人、比利时驻华大使夫妇等12人，新闻界人士10人，中方陪同人员20人。马尔腾斯首相和夫人一行由李庆伟省长和夫人等陪同，赴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参观。马尔腾斯首相和夫人怀着十分惊喜的心情，仔细听取了讲解，在留言簿上写道：“我们十分感谢你们的热烈欢迎，感谢你们安排我们到中国古老文明的中心来参观，这里的确是中国古文化的中心。”

中午，马尔腾斯首相和夫人、李庆伟省长和夫人等在西安人民大厦会见了西安——杨森制药公司的中、比方负责人。会见后，李庆伟省长举行了宴会，款待比利时贵宾。李庆伟省长和马尔腾斯首相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首相说：“这次来西安访问满足了我和夫人的双重愿望。首先，我们来到贵

省访问，因为这里是中国统一后的第一个首都，游览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满足了我们的第一个愿望；其次，陕西省医药工业公司同比利时杨森公司刚刚签订了一项重要的合同，将兴办一个合资企业，这是中比友好合作的重要成果。这些合作成果体现了中国领导人执行着正确的政策，这就是对外开放的政策。比利时是最先响应中国合作政策的国家，我们将继续在平等互利的精神下，发展同中国的友好合作。”

首相和夫人对陕西同比利时安特卫普省结为友好城市感到很高兴，宴会中，马尔腾斯热诚欢迎张斌将率团访问比利时安特卫普省，并祝愿陕西与安特卫普省建立友好关系取得圆满成功。首相夫人说：“我很高兴，你们陕西选了安特卫普省作为友好省，因为那里是我的故乡，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祝贺。”

下午2时，马尔腾斯首相和夫人一行结束了在西安的访问，乘专机离开西安去上海。李庆伟省长和夫人等到机场送行。

4月29日—5月1日，挪威王国王储哈拉尔殿下，由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周南等陪同从杭州乘专机于下午3时30分到达西安参观访问。5月1日上午10时，离开西安前往桂林。随同访问的哈拉尔王储的夫人宋雅公主殿下，挪威驻华大使阿内森和夫人，王室随员及随行记者等32人；外交部陪同12人。

副省长孙达人、省外办主任陈兴亮、西安市副市长赵毓华等前往机场迎送贵宾。

晚上，省长李庆伟在人民大厦会见并宴请了王储哈拉尔和宋雅公主一行。哈拉尔王储在宴会上讲话，盛赞挪中两国结下的友谊。他说：“我们两国交往的主要内容是经济合作，我们作为一个小国，能参与中国的四化建设感到高兴。”席间，省文艺工作者演唱和演奏了中挪两国的歌曲、乐曲。贵宾们在西安期间，参观了大雁塔、省博物馆、秦俑馆、华清池、钟楼和特种工艺厂。4月30日晚，贵宾们还出席了五一晚会，观看了舞剧《秦俑魂》。

宋雅公主参观省博物馆的珍宝展后，感慨地说：“我原先没有料到西安除兵马俑外，还有这么多珍贵的文物，真使我眼花缭乱，它们太好了！”她还向我陪同人员提出两条建议：“西安是一座闻名古城，应根据她的特点，建一些有特色的能够反映这一风貌的建筑，应该力图保护西安古老的传统建筑风格，不要一味追求西方那样的高层建筑，这样多少年后，古城西安的价值就更高了。参观秦俑后，再来看《秦俑魂》就特别有意义。你们在国外展

出秦俑的时候，如果再能带上这台舞剧到那里，使人们能进一步认识秦代和秦兵马俑，效果会更好。”

5月21日，斐济总理卡米塞塞·马拉和夫人与内阁秘书长科托巴拉武、斐济驻华大使吉布森和夫人以及其他官员一行12人，由中国陪同团团长、林业部部长杨钟等陪同，于上午11时从北京乘专机抵西安参观访问。

省长李庆伟、省外办主任陈兴亮、西安市副市长马振华、省妇联副主任肖华和省林业厅副厅长邹年根等前往机场迎接。

中午，李庆伟省长在人民大厦举行宴会。李庆伟省长和马拉总理在宴会上祝酒。

宴会结束后，马拉总理和夫人由李庆伟陪同前往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参观。斐济贵宾参观了兵马俑一号坑大厅、大型彩绘铜车马，在留言簿上写道：“这些兵马俑非常清楚地表明了当时文明所能达到的先进程度。尽管当今科学技术已把我们带到能够登上月球的时代，但在某些方面并没有比我们今天所看到的2000年前的制俑技术先进很多。”下午5时许，贵宾乘专机去杭州。李庆伟省长和有关方面负责人陈兴亮、马振华、肖华、邹年根到机场送行。

7月6日—7日，应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李先念邀请的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统侯赛因·穆罕默德·艾尔沙德中将一行，由中国陪同团团长、交通部长钱永昌和夫人、中国驻孟大使萧向前和夫人等26人陪同，于7月6日下午1时从北京乘专机抵达西安。省长李庆伟和夫人、副省长张斌、西安市市长袁正中、省外办主任陈兴亮、省交通厅厅长熊秋水，前往机场迎接。儿童向总统和夫人献花。

随同来访的有：法律和司法部长伊斯拉姆法官、外交部长乔杜里、驻华大使伊纳耶杜拉·汗，以及其他政府官员和经济、新闻界人士47人。

当晚，李庆伟省长在人民大厦举行欢迎宴会。宴会结束后，观看了专场文艺演出。

孟加拉国贵宾在西安期间，由张斌副省长等陪同参观了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艾尔沙德在贵宾留言簿上题词：“世界最古老的文化使我们都为之惊叹。”

信奉伊斯兰教的孟加拉国贵宾，还参观了清真寺。艾尔沙德总统对清真寺阿訇马良骥说：“我给西安地区的穆斯林带来了孟加拉穆斯林的良好祝愿。”

艾尔沙德总统和夫人一行结束在西安的参观访问后，于7月7日下午2时乘专机去杭州，李庆伟省长和夫人等到机场欢送。

7月16日，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共和国总理乔治·迈克尔·钱伯斯一行32人，由中国政府陪同团团长、纺织工业部部长吴文英、中国驻特多大使崔明堂等陪同，于上午10时30分从北京乘专机抵西安。省长李庆伟、副省长孙达人，西安市市长袁正中，省外办主任陈兴亮、省纺织工业公司经理郭立志到机场迎接。

钱伯斯总理一行下飞机后，即驱车前往秦兵马俑博物馆。贵宾对栩栩如生的兵马俑表现出十分浓厚的兴趣。

中午，李庆伟省长在人民大厦举行欢迎宴会。宴会结束后，钱伯斯总理一行还参观了西安交通大学的强度研究所和电子计算中心，受到热烈欢迎。

钱伯斯总理一行4时30分离开西安去桂林，李庆伟、孙达人等送行。

8月27日—28日，马耳他共和国总统巴巴拉一行10人，由中国水电部部长钱正英、中国驻马大使华人琴和夫人陪同，于27日中午12时乘专机抵西安。8月28日下午3时离西安赴上海。抵离西安时，代省长张斌、省外办主任陈兴亮、省水利水保厅厅长曹廷甫等到机场迎送，并陪同参观了名胜古迹。张斌代省长举行宴会欢迎马耳他贵宾。

9月8日，应国务院总理赵紫阳邀请的西班牙首相费利佩·冈萨雷斯·马克斯和夫人一行，由中国政府陪同团团长、石油部部长王涛和夫人及中国驻西班牙大使曹元欣和夫人等31人陪同，于上午抵达西安。代省长张斌和夫人及有关方面负责人陈兴亮、赵久长、赵毓华、何克敬等前往机场迎接。

随同来访的有：外交大臣奥多涅斯，文化大臣、政府发言人索拉纳，西班牙驻中国大使德蒙特罗，以及其他政府官员、企业家和新闻界人士，共127人。

中午，代省长张斌在人民大厦举行欢迎宴会。王涛和夫人、曹元欣大使和夫人以及省委办公厅，省顾委办公厅、省纪委办公厅、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省政协办公厅、省公安厅、省文化文物厅、省财政厅、西北民航局、陕西日报、省广播电台、电视台、新华社陕西分社、西安晚报等单位负责人出席作陪。

冈萨雷斯首相和夫人一行参观秦俑博物馆后，在留言簿上题词：“这个发现是很了不起的”。贵宾们还游览了大雁塔，下午4时30分乘专机去上海。张斌代省长和夫人及有关方面负责人到机场送行。

9月15日，应李先念主席邀请的奥地利共和国总统鲁道夫·基希斯莱格和夫人一行61人，由中国政府陪同团团长、航天工业部部长李绪鄂、外交部副部长周南和夫人等33人陪同，于11时由北京乘专机抵达西安进行访问。

省长李庆伟和夫人、西安市市长袁正中、省外办主任陈兴亮、省航天局副局长刘德新、省经贸厅副厅长来庆琳等到机场迎接。随同来访的有奥地利副总理兼工商部长诺·施特格，外交部长利·格拉茨，教育、艺术与体育部长赫·莫里茨和夫人，奥地利驻华大使魏德和夫人，以及经济和新闻界人士等。

下午，省长李庆伟等陪同，参观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在一号坑遗址，总统还特别询问了在维也纳展出的兵马俑出土位置。参观结束总统在留言簿上写道：“我在这里看到了伟大的文化奇观，给我们留下了令人难忘的印象。”

当晚，李庆伟省长在陕西宾馆会见并宴请了奥地利总统一行。副省长张斌，中国驻奥地利大使王殊和夫人出席了宴会。在充满友好气氛的宴会中李庆伟省长和基希施莱格总统先后致词。总统说，兵马俑在奥地利展出时，就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无法与今天看到的壮观场面相比，他并说：“今天看到了贵省拥有这么巨大的文化财富并得到了保护和继承，使世界各国人民都得以分享，在这方面你们是值得骄傲的。”基希施莱格总统还一再表示愿意在文化和经济工作中进行多方面的合作，进一步发展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

访问中，总统还介绍了奥地利的旅游业。他说，奥地利人口只有750万，但每年旅游业收入达到40亿美元，这还不包括国内的旅游业。当时，奥地利旅游事务局执行主任措勒斯博士还同省外办主任兼省旅游局局长陈兴亮就双方旅游方面的合作进行了探讨，并邀请陕西派团去奥学习饭店管理。

9月16日上午，贵宾离开西安赴成都。李庆伟省长和夫人等到机场送行。

9月17日，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偕夫人、女儿一行40人，由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刘述卿和夫人陪同，从济南乘专机抵西安访问。9月18日下午3时30分乘专机离西安赴北京。抵离时，代省长张斌和夫人，省外办主任陈兴亮和副主任何克敬，西安市市长袁正中等到机场迎送。当晚代省长张斌在陕西宾馆为李光耀总理的来访举行了欢迎宴会。

李光耀总理一行参观了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省博物馆、半坡博物馆和



大清真寺等名胜古迹。新加坡贵宾们参观后发表以下观感：

赞赏中国实行的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政策以及取得的成绩。

李光耀说：“我曾于1976年访问西安，今年我又重访故地，发现了很多新的变化。”

称赞中国目前推行的干部中青年化。

李光耀说：“中国领导人让年富力强、精力充沛的中年人担负领导工作，这一做法是正确和明智的。在美国政府机构里执行政策的几乎都是中年人；日本虽然是那些经验丰富的幕僚制定政策，但前台都是年轻人。中国的建设需要这些有知识、有抱负的年轻一代。”

欣赏中国实行的宗教政策。

参观清真寺时，李光耀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他详细地询问了伊斯兰教徒的宗教生活、礼拜情况、信仰自由以及教徒们的婚姻问题。参观结束后，李光耀在留言簿上写道：“与汉族世界共同存在的一片小洲。”

赞叹中国伟大的文明历史。

参观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时，李光耀夫妇和女儿仔细观察了讲解员为她们介绍的每一件文物，并不时提问，对2000多年前工艺和技术达到如此高的水平表示惊叹。他在留言簿上写道：“过去的伟大文明为更伟大的未来奠定了基础。”

9月28日—10月1日，卢森堡首相兼国务、财政大臣雅克·桑特尔和夫人一行7人，由中国外交部西欧司副司长蔡方柏陪同，在西安进行非正式访问。抵离时，张斌代省长和夫人、省外办主任陈兴亮等到机场迎送。

张斌代省长会见并设宴招待卢森堡贵宾。省外办主任陈兴亮、副主任刘步云会见时在座作陪。

11月26日，应中国政府邀请的马来西亚总理达图·斯里·马哈蒂尔·穆罕默德阁下和夫人一行222人，由中国煤炭工业部部长于洪恩和夫人陪同，于上午10时从杭州乘专机抵西安访问。

马来西亚贵宾抵离西安时，省长李庆伟、副省长张斌、西安市市长袁正中、省外办主任陈兴亮、省妇联主任张秀绒、省煤炭厅厅长刘揆楚前往机场

迎送。随同来访的有：工程及公用事业部长萨米·维卢、外交部长里陶丁等政府官员和工商、新闻界人士等。

中午 12 时，省长李庆伟在人民大厦碧翠厅举行欢迎宴会。于洪恩夫妇和省计委、经委、经贸厅、交通厅、机械厅、财政厅、一轻厅、二轻厅、电子工业厅、纺织工业公司、华秦公司、民航局、邮电局、旅游局、伊斯兰教协会等单位负责人出席作陪。席间省文艺工作者演奏音乐和文艺节目。省长李庆伟陪同马来西亚贵宾参观了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马哈蒂尔在留言簿上题词：“这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博物馆，它生动地介绍了两千年前的中国文明。”他还参观了化觉巷清真寺。

下午 4 时 50 分马哈蒂尔总理和夫人一行乘专机离开西安赴广州。

### 1986 年

3 月 26 日，应国务院总理赵紫阳邀请，丹麦王国首相施吕道和夫人一行 33 人，在中国民政部副部长崔乃夫和夫人的陪同下，于上午 11 时 10 分乘专机来西安访问。到机场迎送丹麦首相一行的有代省长张斌，西安市市长袁正中，省外办主任陈兴亮，省妇联主任张秀绒和省民政厅厅长艾奇玉。中午，张斌代省长在西安人民大厦设午宴欢迎施吕道首相一行。尔后，首相一行游览了西安市容，参观了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并在留言簿上写道：“谢谢你们安排了这一出色有趣的下午，我很高兴参观这些古迹。”下午 5 时乘专机离西安赴安徽合肥。丹麦首相一行在西安逗留期间，主要反映了以下两点愿望：

### 热切希望和陕西开展经济合作。

施吕道首相在祝酒时说：“西安已成为重要的工业中心，我了解到陕西能够生产动力设备、飞机、卡车、化工、纺织和其他许多产品。我还了解到旅游业也使西安闻名于世。但是旅游业只是你们迅速发展工农业收入的一部分。我想在此强调，丹麦非常有兴趣与你们进行新的合作，在那些飞速发展的新兴工业领域进行合作……”宴会上，施吕道首相品尝了西安啤酒厂生产的啤酒，感到口味很好，当他得悉将进一步扩大年产 10 万吨啤酒生产能力时，便离席到宝隆洋行总经理斯巴绥先生和其他几位企业家的桌前，向他们告诉了这一信息，并向张斌代省长表示希望在这方面能够和陕西合作，也希望能在奶制品、制糖、水泥制品等方面进行合作。如陕西有兴趣，丹麦可派专家到西安来进行专题考察洽谈。丹麦驻华大使阿纳·贝林先生即席向袁正

中市长详细询问了啤酒厂扩大规模的具体计划，他回去后，将有关技术资料寄给袁市长供参考，如有什么要求，可向他们提出。

再次邀请陕西农业发展研究中心派团到丹麦考察畜牧业。

随团来访的丹麦农业理事会总经理凯尔·艾洛先生再次转达了丹麦方面的邀请，还表示希望陕西省一位副省长能在今年的五六月份率团赴丹麦访问。

4月5日，应国家主席李先念邀请，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主席拉多万·弗拉伊科维奇和夫人一行21人，由国务委员张劲夫和夫人等陪同，于上午11时30分由北京乘专机抵西安参观访问。当日下午6时离西安赴广州。到机场迎送贵宾的有：省委书记白纪年、副省长张斌、西安市市长袁正中、省外办主任陈兴亮等。少年儿童向贵宾们献花。随同来访的有外交、主管对华经济合作的联邦执行委员。白纪年在西安人民大厦设宴欢迎拉多万·弗拉伊科维奇一行。贵宾们由白纪年、张斌、袁正中、陈兴亮等陪同驱车前往临潼，参观了秦始皇兵马俑，游览了市容，专访了西安西城门楼展室，并在留言簿上写道：“我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印象非常深刻。这次参观使我了解到了中国人民具有很大的创造精神。我们深信你们的后代还会创造令全世界佩服的事业。”

9月17日，应国务院总理赵紫阳邀请的芬兰总理索尔萨和夫人一行，由中国陪同团团长、司法部部长邹瑜夫妇陪同于11时30分乘专机来西安参观访问，下午5时30分乘专机离西安赴广州。贵宾抵离西安时，省长李庆伟、副省长张斌、西安市市长袁正中、省外办主任陈兴亮、省经委副主任赵久长、省司法厅副厅长刘俊等到机场迎送。少年儿童向贵宾献花。随同索尔萨总理来访的除政界13人外，还有经济界人士21人。贵宾逗留期间参观了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游览了市容，李庆伟省长在唐城宾馆设宴欢迎贵宾。

10月16日，应国家主席李先念邀请的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陛下偕丈夫爱丁堡公爵菲利普亲王殿下，由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吴学谦和夫人毕玲、唐龙彬部长助理，驻英大使胡定一和夫人谢恒等陪同，于上午12时许从上海乘专机抵西安。受到陕西各界人士和1000多名群众的热烈欢迎。当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和丈夫菲利普亲王走下舷梯时，省长李庆伟和夫人、副省长张斌、西安市市长袁正中、省外办主任陈兴亮、省政府副秘书长张世卿等迎向前去亲切握手表示欢迎。少年儿童向贵宾们献花。欢

迎群众挥舞着彩旗、花束，全场唢呐、鼓锣声响彻云霄，扇子舞、艺术体操、秧歌、狮子嬉绣球和白天鹅等舞蹈在欢迎队伍中此起彼伏。

随同来访的有外交和联邦事务大臣杰弗里·豪和夫人以及王室人员和随行人员共46人，随行新闻界人士250人，其中港澳记者50人。

西安主要街道装点一新，车队途经市区时，钟楼上四周悬挂欢迎横幅，100多名青少年向女王挥舞彩带并放飞数百只和平鸽和千余只彩色气球，腾空翱翔，以显示友谊和平气象。

在女王一行驱车前往临潼途中，根据女王意愿拉开所乘汽车透明的玻璃窗纱，遇有欢迎群众时，让减慢车速，不断向群众招手致意。并对李庆伟省长说：“这么多市民欢迎我，我心里很激动。请把车速再减慢些，让我跟西安市民多见见面。”

下午1时30分，女王一行来到秦俑博物馆，受到500多人的热烈欢迎，当女王走到兵马俑一号坑大门前，化妆成秦御林军的80名俑士军阵吸引了她的视线，她好奇地走近武俑，发现武士随着秦歌弦律舞动，惊讶了一下，立即停住了脚步！那些武士俑朝着女王笑了，一瞬间，女王给愣住了搞不清是怎么回事。李庆伟省长拍拍武士俑笑着给女王解释：“这些武士是西安市歌舞团《秦俑魂》剧组的演员化妆的活秦俑，他们是专程来欢迎您的。”女王会心地笑了。女王和亲王沿着大红地毯的活动木梯下到坑中，仔细地欣赏着面目表情各异的武士。看看这个的发式，看看那个的胡须，反复地作了对比。说：“过去我听说过兵马俑，也看过照片，这次亲眼一看，真是惊人。”女王对陶马也十分感兴趣，她说：“这马虽然不高大，但是很精神，是匹骏马。”又问为何没有挽具了，讲解员黄雪英说：“由于两千年前的一场大火，挽具和木质战车全被焚毁了！”女王点头表示明白了。接着女王及贵宾们又参观了铜车马，对这些结构最复杂，形体最大的青铜珍品表示赞赏，她在铜车马周围转了一圈，仔细观看，并询问了这辆车的用途。听了讲解之后，她和亲王交流着敬佩的眼神。女王向馆长和讲解员表示谢意。最后，伊丽莎白女王和菲利普亲王在留言簿上签名，并盖上了陕西省政府馈赠给她的印章。

3时25分女王一行乘专机离西安前往昆明，李庆伟等到机场欢送。

10月26日，冰岛总理赫尔曼松和夫人一行30人，上午10时30分由中国陪同团团团长、地质矿产部部长朱训和夫人陪同抵达西安，省长李庆伟、副省长张斌、省外办主任陈兴亮、西安市副市长赵毓华、省地质局局长王西京

等前往机场迎接，少年儿童向贵宾献花。

当晚，李庆伟省长在陕西宾馆宴请了冰岛贵宾。宴会上，赫尔曼松总理说：“冰中两国远隔千山万水。但现在世界变得越来越小，我们之间的距离也越来越近。陕西的艺术家们去年在冰岛进行了成功的演出，引起了冰岛人的极大兴趣，对此我们感到十分高兴。”当谈到中国的开放政策时，他说：“在深圳我们看到了开放政策的实施，我们对你们为此作出的努力表示钦佩。”

冰岛总理一行在西安访问期间，参观了大雁塔、半坡遗址博物馆和秦兵马俑博物馆。赫尔曼松总理在参观游览时，不断提出各种问题，并兴致勃勃地进行摄像、录音。在参观秦兵马俑一号坑大厅和铜车马馆后，他在留言簿上写道：“这些都是全人类的珍奇的瑰宝。”

10月27日上午9时30分，冰岛总理赫尔曼松一行离开西安，前往广州访问。李庆伟等到机场送行。

11月2日，意大利总理贝蒂诺·克拉克西和夫人一行在结束了北京的访问之后，由中国陪同团团团长、石油工业部部长王涛和夫人陪同，于上午11时乘专机抵达西安参观访问。省长李庆伟、副省长张斌、省外办主任陈兴亮、西安市副市长赵毓华、省石化厅副厅长叶树森等到机场迎接，少年儿童向贵宾献花。随同克拉克西总理来访的有意大利外交部部长安德雷奥蒂和夫人，以及随行人员11人，新闻界人士46人。

克拉克西总理一行下飞机后即驱车去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参观。当他来到秦俑馆一号遗址大厅，看到一排排、一行行雄伟的武士俑和浩大的军阵时，高兴地对李庆伟省长说：“真是听景不如看景，非常有意义。”当李庆伟邀请克拉克西和夫人、外交部长安德雷奥蒂夫妇一起下坑观赏，克拉克西总理高兴地说：“能让我下到坑里看看，我感到非常荣幸。”和秦俑站在一起照像，并在土俑中间走来走去，不时地摸摸秦俑的头、胸和胳膊，还风趣地和秦俑比个子，说：“古代人的个子好像比现在的人高，他们都在一米八以上。”他来到铜车马展室和兵器展室，仔细地看了每一件珍贵文物。最后，克拉克西总理用诗一般的语言，在留言簿上写道：“几千年古老的艺术，人类非凡的奇迹，如同中国的振兴，对此深表爱慕之情。”上车时，他还对秦俑博物馆馆长说：“等你们挖掘和修复工作全部完成之后，我还要来参观。”

在去机场途中，当李庆伟省长征求他的意见时，克拉克西总理说：“这个大展厅盖得像个工厂的厂房，应该建成古建筑样式，中国的古建筑是很漂

亮的。”

12月7日，墨西哥合众国总统米格尔·德拉马德里·乌尔塔多和夫人一行116人，由中国陪同团团团长、冶金工业部部长戚元靖和外交部副部长朱启祯陪同，乘专机来陕西参观访问。省长李庆伟和夫人、副省长张斌、西安市市长袁正中、省外办主任陈兴亮和省冶金厅厅长张成江等到机场迎送，少年儿童向德拉马德里总统和夫人献花。李庆伟省长等陪同贵宾参观了秦兵马俑博物馆和省博物馆。当晚省长李庆伟在西安人民大厦举行欢迎宴会，款待墨西哥贵宾。12月8日上午10时代表团一行乘专机离开西安前往上海。

德拉马德里总统在陕访问期间表示：对中国“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政策表示赞赏。他向陪同参观的李庆伟省长详细询问了陕西的农村情况和土地政策。他说：“土地归国家所有，而土地的使用权归农民，这样很好，既可以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也可避免许多问题。”在车队路过灞桥镇时，总统对那里的农贸市场很感兴趣。他问市场是否定期举办，如何进行交易等等。总统说：“农民能在农贸市场出售自己的农副产品，这样可以促进城乡物资交流和经济发展。这是一个好办法。”李庆伟省长还向总统介绍了当前的对外开放，对内搞活政策的贯彻执行情况，以及所进行的各项改革。德拉马德里总统对此表示理解，他还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家与国家之间在经济技术领域的交流将会进一步相互联系的。”德拉马德里总统表示钦佩中国在四化建设中所做出的努力。总统在宴会讲话时说：“我们不仅钦佩你们悠久的古代文明，同时也钦佩你们的人民和政府为四化建设，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赶上世界当前发展水平所进行的努力。”并说：“今天我不但看到了秦代的兵俑军阵，同时也看到了由中国的男男女女们组成的大军正在为中国的繁荣昌盛而努力。”席间陕西的艺术家们演唱了中墨两国民间歌曲，受到了墨西哥贵宾们的热烈赞扬，在座的墨西哥朋友和演员们同声高唱友谊的歌曲。德拉马德里总统表示愿为促进墨中两国的考古工作的相互交流而努力。总统和夫人参观秦俑博物馆时说：“以前我曾看到过有关介绍秦兵马俑的照片和文章，从那时起我就产生了要亲眼看一看的愿望。”总统夫人也一再表示在这里的参观十分有意义，在中国有这么多值得看的东西，但遗憾的是时间太短。德拉马德里总统在留言簿上写道：“向中国考古专家这一奇迹般的发掘和修复表示祝贺”。他指出：“墨中文化历史悠久、古老，有许多相似之处，中国的古老文化同美洲大陆的古文化有很多联系，也有不少未解之谜，我希望我们两国的考古工作者为此做进一步的考证。”他说：“等我回国

之后，一定要促进墨中两国考古工作的相互交流。”

在德拉马德里总统一行离开西安时，李庆伟省长赠给总统和夫人一本他们在西安访问活动的影集，总统夫妇对此表示感谢，他说：“我们对西安之行感到十分满意，非常愉快。”

### 1987年

3月19日至20日，应国家主席李先念邀请来访的加拿大总督让娜·索维夫人一行27人，由中国政府陪同团团长、民政部副部长崔乃夫和夫人、中国驻加拿大大使张文朴夫妇等陪同，抵达西安参观访问。受到省长张勃兴、副省长张斌、西安市市长袁正中、省外办主任陈兴亮和民政厅厅长艾奇玉等热情欢迎，少年儿童向贵宾们献花。

随同让娜·索维总督来访的还有：总督丈夫莫里斯·索维先生、对外关系部部长莫尼克·朗德里及其丈夫朗德里先生、加驻华大使里查德·葛汉夫妇、总督府秘书长利奥波德·H阿米欧夫妇等，另有新闻记者13人。

当晚7时30分，张勃兴省长在西安人民大厦溢香楼举行宴会欢迎加拿大总督一行，宾主互相祝酒。崔乃夫部长、张斌副省长等出席宴会作陪，作陪的还有袁正中、陈兴亮、艾奇玉等有关方面负责人。

3月20日上午，总督一行在张勃兴省长等陪同下，参观了化觉巷清真寺和西安市文物商店鼓楼营业场。索维夫人对文物商店出售的清代陶瓷爱不释手，同丈夫一起仔细挑选，最后买了彩盖缸、银镶瓷片盒、彩花山水冬瓜缸瓷器16件。在离开鼓楼时，索维夫人说：“这是我见过的最好的文物商店。”

下午2时50分，前往秦俑馆参观。索维夫人一行进入兵马俑一号坑展厅，索维夫人站在平台栏杆前俯瞰了兵马俑群的全貌。接着她走下坑底，兴致勃勃地仔细观看，她说：“这些兵马俑造型生动，太逼真了，我真不想离开这里。”4时40分，索维夫人一行结束了在西安的访问，乘专机飞赴桂林。张勃兴、张斌、袁正中等到机场送行。

4月7日，应国务院总理赵紫阳邀请的瑞典王国首相英尔瓦·卡尔松和夫人一行，由中国政府陪同团团长、交通部副部长钱永昌和夫人、中国驻瑞典王国大使吴家淦和夫人等27人陪同，于上午11时10分由北京乘专机抵达西安参观访问。受到省长张勃兴、副省长曾慎达、西安市市长袁正中、省外办主任陈兴亮、省交通厅厅长李文光、省妇联副主任房玲的欢迎。少年儿童向贵宾献花。

随同卡尔松首相来访的有社会大臣耶特律德·西格德森夫人，瑞典驻华大使拉斯贤里奎斯特先生和夫人等随员 24 人，新闻界人士 19 人。

卡尔松首相下飞机后，驱车前往省博物馆参观。中午 1 时张勃兴在西安人民大厦溢香楼举行欢迎宴会。钱永昌、吴家淦和省、市迎送人出席，作陪的还有省计委、省财政厅、省广播电视厅主要负责人，宾主举杯相互敬酒。下午 2 时 30 分贵宾们在张勃兴省长陪同下前去临潼秦兵马俑博物馆参观。卡尔松首相参观后在留言簿上写道：“终身难忘”。贵宾们还游览了华清池，5 时 30 分乘专机离开西安赴上海。省长张勃兴等到机场欢送。

4 月 15 日，应国务院总理赵紫阳邀请来访的葡萄牙总理席尔瓦及夫人一行 51 人，由中国政府陪同团团团长、对外经贸部部长郑拓彬及外交部副部长周南陪同，于上午 10 时 40 分从北京乘专机抵达西安参观访问，受到陕西省省长张勃兴、副省长徐山林、西安市市长袁正中和有关方面负责人陈兴亮、张秀绒、孙仲乾等到机场欢迎。少年儿童向贵宾献花。

随同席尔瓦总理来访的有：外交部长皮雷斯·德·米立达和参加中葡澳门问题会谈的葡萄牙政府代表团团长鲁伊·梅迪纳大使等。随行新闻记者 19 人。

席尔瓦总理由张勃兴省长等陪同从机场乘车到省博物馆参观，当看到刻有精美花纹的西周时期的各种酒器时，席尔瓦总理称赞道：“这些酒器制作精美，确实是中国古老文化的遗产。”

中午，张勃兴省长在西安人民大厦溢香楼举行欢迎宴会。郑拓彬、周南、徐山林参加宴会作陪，作陪的还有袁正中、陈兴亮、张秀绒、孙仲乾。下午 2 时，席尔瓦总理赴临潼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参观。看到一排排、一行行庞大的秦俑军阵，他惊叹万分，站在威武高大的俑土中间，总理仔细地端详着周围每一个俑土的发式、衣着和多姿的表情。总理还和俑土比个子。他说：“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文化是中国古代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最后在留言簿上写道：“我不能不对这个世界上伟大的发现留下深刻的印象”。

参观过程中，席尔瓦总理还向张勃兴省长介绍了葡萄牙的情况，如汽车发动机生产、水果生产等，表示愿意在软木生产方面进行合作，同时还表示愿把一些钢材生产设备转手与陕西，过些日子将派一个代表团来具体商谈双方贸易和有关事宜。下午 5 时 30 分，席尔瓦总理和夫人一行乘专机离开西安赴上海，张勃兴等到机场送行。

12 月 20 日—22 日，应国家主席李先念邀请的瓦努阿图共和国总统阿蒂



·乔治·索科马努一行，首次正式访华，在中国政府陪同团团长、广播电视电影部部长艾知生和夫人陪同下，由北京乘专机抵西安参观访问。随同来访的有总统夫人、总统私人秘书等6人。索科马努总统抵达西安时，代省长侯宗宾、副省长徐山林、西安市市长袁正中、省外办主任陈兴亮等前往机场欢迎，并分别陪同参观游览。下午2时30分赴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参观并在留言簿上签名留念。

当晚7时，侯宗宾代省长在唐城宾馆举行欢迎宴会。侯宗宾和索科马努先后祝酒。索科马努总统在祝酒时说：“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我们一直钦佩你们国家的发展。中国今天的事业向全世界人民说明了中国人民是勤劳的人民。”陪同的艾知生部长和夫人，出席了宴会。

12月21日，副省长徐山林等陪同贵宾还参观了西北国棉四厂、西北第一印染厂和省博物馆、大雁塔。

12月22日上午9时30分，索科马努总统一行结束对西安的参观访问，乘专机赴上海，侯宗宾、徐山林等到机场送行。

### 1988年

1月20日—21日，应中国政府邀请的挪威王国首相格罗·哈莱姆·布伦特兰夫人偕丈夫一行，由中国政府陪同团团长、纺织工业部部长吴文英等15人陪同，从北京乘专机抵达西安参观访问。代省长侯宗宾、副省长张斌、省外办主任陈兴亮、西安市副市长赵毓华等到机场欢迎。少年儿童向贵宾们献花。

随同首相来访的有首相府国务秘书埃德丽德·诺尔布女士、挪威驻华大使扬·图·霍尔维克阁下、外交部政治司司长达格芬·斯坦赛特、首相府特别顾问阿尔内·瓦尔特等23人（含记者8人，中国雇员4人）。

侯宗宾代省长陪同首相一行参观了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当布伦特兰夫人进入秦俑馆大厅，看到壮观的秦俑军阵时，感叹地说：“真是令人难以置信！”首相和丈夫走下一号坑时，中外记者拍摄了活动照片和电视摄像片。参观过程中，她详细询问了秦俑的发掘、整理和保护情况。参观结束时，布伦特兰首相在留言簿上写道：“中国古老的文化遗产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贵宾们还参观了距今6000年前的母系氏族村落半坡遗址。

当晚7时，代省长侯宗宾在西安唐城宾馆举行欢迎宴会。布伦特兰首相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她说：“我记忆很深的是你们1985年在挪威举办的展览，我感谢你们将如此珍贵的秦俑送到我国展出，它给我国的人民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纺织工业部吴文英部长、张斌副省长出席作陪。作陪的还有陈兴亮、赵毓华等。

21日上午9时，贵宾们在张斌副省长等陪同下，抵西安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参观，曾为医生的布伦特兰首相怀着浓厚的兴趣参观了心脏换膜手术，中西医治疗急腹症，以及中医的针灸、推拿术。她询问了中国的医疗卫生、公费医疗和收费情况。首相在结束参观时说：“参观与西方不同的中国医疗方法，对我们来说是十分有趣的。在手术室里观看心脏手术同样有趣。祝你们取得新的成就。”首相11时抵省博物馆参观。

下午3时，首相乘专机离开西安前往桂林，侯宗宾、张斌等到机场送行。

2月11日，应国家主席李先念邀请，澳大利亚联邦总督尼尼安·斯蒂芬爵士偕夫人一行22人，由中国政府陪同团团团长、劳动人事部部长赵东宛和夫人等16人陪同，于上午11时由北京乘专机抵达西安参观访问。受到省长侯宗宾、副省长张斌、西安市市长袁正中、省外办主任陈兴亮、省妇联副主任李怡霞等的热烈欢迎。少年儿童向贵宾献花。

侯宗宾省长于中午12时在西安宾馆举行欢迎宴会。

下午，侯宗宾等陪同参观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总督夫妇下一号坑内仔细观看兵马俑造型，并同中外人员在一号坑大厅内拍摄了活动照片和电视片。5时总督一行乘专机前往杭州，侯宗宾等到机场送行。

2月26日—27日，应国家主席李先念邀请的圣马力诺共和国国家元首、执政官吉安·弗朗哥·泰伦齐和罗萨诺·扎弗拉尼一行，由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周南和夫人等12人陪同，从北京乘专机抵达西安参观访问。受到省长侯宗宾、副省长张斌、省外办陈兴亮、西安市副市长赵毓华、省妇联副主任肖华等的热烈欢迎。并陪同参观了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游览了华清池。

随同圣马力诺国家元首泰伦齐来访的有两位执政官的夫人（泰伦齐夫人、扎弗拉尼夫人）、内政和劳动部长阿尔瓦罗·塞尔瓦、彼耶罗·纳塔利诺·穆拉罗尼等10人。

当晚7时，侯宗宾省长在西安人民大厦溢香楼举行欢迎宴会，周南夫妇、张斌等出席作陪。

2月27日9时贵宾们乘专机离开西安前往上海，侯宗宾等到机场送行。

3月2日，应国家主席李先念邀请的非洲统一组织执行主席、非洲前线国家主席、赞比亚共和国总统肯尼思·戴维·卡翁达和夫人一行，由中国政府陪同团团

长、交通部部长钱永昌等 25 人陪同，从北京乘专机抵西安参观访问。

随同卡翁达总统来访的有：北方省中央委员、大酋长奇塔潘夸二世、外交部长卢克·吉·姆瓦南希库、西方省中央委员、大酋长伊卢特·耶塔、总统政治事务特别助理哈·斯·梅贝洛博士、经济事务特别助理杰·西·马波马、驻华大使提·西扬奎博士等 35 人，随行新闻界人士 7 人。受到省长侯宗宾、副省长张斌、西安市市长袁正中、省外办副主任何克敬、省妇联副主任房玲的欢迎。少年儿童向贵宾献花。

侯宗宾省长于中午 12 时在西安宾馆百花厅举行欢迎宴会。

下午，在侯宗宾等陪同下，卡翁达总统一行参观了省博物馆、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卡翁达夫妇下到一号坑观看军阵兵马俑造型，在大厅参观时，同随行中外记者拍摄了活动照片和电影、电视。参观后在贵宾留言簿上写着：“这是一处神奇的历史记载，历史跟人类的生存史一样悠久，展品的技艺令人惊叹。”

当日下午 6 时 15 分卡翁达总统一行，乘专机赴广州，侯宗宾等到机场送行。

4 月 21 日—22 日，应国家主席杨尚昆邀请的希腊共和国总统赫里斯托斯·安·萨采塔基斯偕夫人一行 77 人，由中国政府陪同团团团长、文化部部长王蒙和夫人等 32 人陪同，从北京乘专机抵西安参观访问。

随总统萨采塔基斯来访的有：希腊国民经济部部长帕纳约尔蒂斯·罗迈利奥蒂斯及夫人、教育部部长安东尼斯·特里齐斯、外交部候补部长亚尼斯·卡普西斯和夫人、总统府秘书长利奥尼达斯·帕帕卡里亚斯和夫人、希腊驻华大使埃·迈戈洛科诺莫斯和夫人等，随行记者 39 人。受到省长侯宗宾、副省长张斌、西安市市长袁正中、省外办主任陈兴亮、省妇联副主任萧华等热烈欢迎。少年儿童向贵宾献花。

当晚 7 时 30 时，侯宗宾省长在西安人民大厦举行欢迎宴会。文化部部长王蒙及夫人、张斌副省长参加作陪，作陪的还有陈兴亮、袁正中、肖华等。宾主互相祝酒，萨采塔基斯总统祝酒时说：“我很高兴来到你们美丽的省份，接受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邀请正式访问贵国不可能不到贵省，也不可能不光临像省长先生指出的，曾经为中国 10 多个朝代历经 1000 多年的首都城市——西安。我来此地并不仅仅因为曾在那么多朝代里，此地是中国的政治首都，而是此地为人类的文明作出过重大的贡献。”

22 日上午 8 时，在省长侯宗宾等陪同下，萨采塔基斯总统一行抵秦始

皇兵马俑博物馆参观，总统夫妇步入一号坑时说：“能在兵马俑挖掘的地方欣赏兵马俑更显得美，为此感到骄傲。”他不停地向侯宗宾省长询问文物发掘和保护的情况。双方记者在一号坑大厅内拍摄了活动照片和电视片。参观结束时，总统在留言簿上写道：“你们的展览给我留下了极其愉快的印象，对你们为此付出的艰巨工作和所作的良好的组织工作表示祝贺。”下午3时抵省博物馆参观。在参观途中总统对我省的旅游事业表示关心，不但询问了与此有关的西安悠久历史和接待能力，而且仔细了解西安一些宾馆的情况，宾馆的隶属关系、管理情况、经营方式、招工形式、工资福利待遇等。

总统结束了西安的访问，于下午4时30分乘专机前往上海，侯宗宾等前往机场欢送。

7月6日—7日，应国家主席杨尚昆邀请，巴西联邦共和国总统若泽·萨尔内和夫人一行53人，由中国政府陪同团团团长、冶金工业部部长戚元靖和夫人等30人陪同，由北京乘专机抵西安参观访问。

随同总统来访的有：外交部长阿布雷乌·索德雷、空军部长奥塔维奥·儒利奥·莫雷拉·利马上将、巴西驻华大使保罗·达科斯塔·佛兰科等。

贵宾们受到省长侯宗宾、副省长孙达人、省外办副主任何克敬、省妇联副主任步春林等的热烈欢迎。少年儿童向贵宾们献花。

当晚8时，侯宗宾省长在西安宾馆宴请巴西总统一行，出席作陪的有西安市市长袁正中以及省政府有关方面负责人。宾主相继祝酒，畅叙中巴两国的友谊。萨尔内总统强调指出，人类通过自身的探险活动，创造出了灿烂的历史文化，这些都被记载下来，人类又继续了这些活动。我作为巴西总统来到这里就是为了加强中巴间互相合作的纽带，为两国人民造福。

7月7日上午9时30分，在副省长孙达人等陪同下，总统一行参观了秦兵马俑馆，总统和夫人步入一号坑参观，并拍摄活动电视、照片。贵宾们对兵马俑的宏大气势，对铜车马的精湛工艺，赞叹不已。参观结束时，萨尔内总统在留言簿上写道：“这是人类在地球上所创造的业绩，不仅是中国的，而且是整个人类的共同财富。”随后游览了华清池九龙汤。总统夫妇高兴地与身着唐代服装的讲解员合影留念。此后巴西贵宾又兴致勃勃地参观了省博物馆。

萨尔内总统对孙达人副省长说：“时间虽然短暂，但参观的内容丰富，令人愉快。这不仅是个休息游览的活动，而且是一次极好的学习机会。”

当日下午3时30分，巴西总统萨尔内一行，乘专机离开西安赴上海。

侯宗宾、孙达人等到机场送行。

8月28日—30日，应中国政府邀请的日本国内阁总理大臣竹下登偕夫人一行136人，在访问北京之后，由中国政府陪同团团团长、文化部部长王蒙和夫人、中国驻日本大使杨振亚和夫人等30余人陪同，由甘肃敦煌乘专机来陕西参观访问。随同竹下登来访的有：日本驻华大使中岛敏次朗和夫人、内阁官房副长官小泽一郎、众议院议员江藤隆美、爱野兴一郎、玉泽德一郎、熊谷弘；参议院议员金丸三郎、藤井孝男以及日驻华使馆人员，随团新闻记者60余人。

当首相和夫人步出机舱门时，欢迎群众热烈鼓掌、挥舞花束，在陪同团团团长、文化部部长王蒙引导下，竹下登首相同前来迎接的省长侯宗宾、副省长孙达人、西安市市长袁正中、省政府秘书长昌志宏、省外办主任张景文、省妇联副主任房玲等一一握手。竹下登对侯宗宾说：“这次来陕西访问，给您添麻烦了，请多多关照。”侯宗宾对首相说：“我能在古城西安接待首相阁下和夫人，感到十分高兴。”少先队员向首相和夫人献花。

竹下登首相一行离开机场，驱车前往兴庆宫公园，瞻仰阿倍仲麻吕纪念碑。路过市区时，首相笑容满面，不断向沿途群众招手致意。他对侯宗宾省长说：“我四次访华，到过北京、上海，就是没有到西安，西安是一座古老而又美丽的城市。”在阿倍仲麻吕纪念碑前，竹下登首相一行向这位中日友好的先驱者深深地鞠躬，表示敬意，并绕碑一周，细细观看了碑文。

当晚7时30分，侯宗宾省长在西安宾馆百花厅举行宴会，欢迎竹下登和夫人一行来西安访问。在洋溢着热情友好气氛的宴会上，侯宗宾首先致词祝酒。他说：“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10周年之际，竹下登总理大臣阁下光临陕西参观访问，我们感到十分高兴……”竹下登在祝酒时说：“今年正值两国间奠定和平友好关系的重要基础的10周年，是颇有意义的一年。在这个时期能够对贵国进行访问，令人感到无比高兴，极为光荣。”竹下登还说：“就中日关系而言，现在是应该将整个世界放在心上加以考虑的时候了。就是说，当我们考虑到日中两国在今后的国际社会上所占的比重时，两国的责任就相当重要；日中两国关系，不仅对两国，而且对亚洲、太平洋地区以及世界的稳定与繁荣，是极为重要的。”

竹下登说：这次访华，不仅访问贵国首都北京，而且还能访问西安和敦煌。这两个地方，在我国同贵国两千年来的交流史上占着格外重要的地位。西安即古都长安，是过去我国许多知识分子探求学问和文化，千里迢迢来到

的地方，今天我国不少有识之士希望访问此地，1979年已故大平总理大臣访问了此地。称西安是日中文化交流及两国国民友谊交流的发源地，也并非言过其实。在交通及通信手段发达的今天，西安与日本各地的友好往来今后将会愈加发展。

中国陪同团团长王蒙和夫人，省、市负责人孙达人、刘力贞、魏明中、袁正中、昌志宏、张景文、房玲及省经贸委、省计委、省科委、省文化厅、省教育厅、省财政厅、省对外友协、省贸促会、市外办负责人等出席了宴会。

应日方要求，竹下登首相于29日上午在人民大厦礼堂就日中关系的展望发表了演讲，礼堂前台悬挂会标“日本国内阁总理大臣竹下登阁下演讲会”，楼厅悬挂“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下去”巨幅标语。这是历年来外国国家元首、政府首脑第一次向陕西各界人士所作的演讲。竹下登的演讲题为《寻求新的飞跃》。演讲会由西安市市长袁正中主持，省长侯宗宾致欢迎词。陕西省电视台向全省作了实况转播。

竹下登首相演讲结束后，袁正中市长致词，感谢竹下登向陕西省各界人士发表了很好的演讲。中国政府陪同团团长王蒙、副省长孙达人和省、市有关方面负责人，出席了演讲会，演讲会气氛热烈，1000多名听众不时爆发出阵阵掌声。

竹下登一行在王蒙、侯宗宾、孙达人等陪同下参观了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步入一号坑大厅，顿时被眼前雄伟的军阵所吸引，连连点头，赞叹不已。在讲解员的引导下，他下到坑底，仔细地观赏兵马俑的眼睛、嘴巴，并与陶俑比身高。十分喜爱文物考古的竹下登，喜形于色。首相一行来到铜车马展室，竹下登对精湛的铜车马工艺，赞不绝口。参观后首相在贵宾留言簿上用中文签名：“日本国内阁总理大臣竹下登”。竹下登一行还游览了华清池，观看了当年唐明皇专为杨贵妃修建的浴池遗址，并和同行的国会议员在九龙汤边合影留念。

竹下登一行傍晚7时还游览了大雁塔。竹下登兴致勃勃，不断询问有关历史文物等方面的问题。随后，竹下登赴唐华宾馆与日方记者共进晚餐。晚上8时30分，侯宗宾省长约见日本外务省和大藏省主管对外贷款的两位局长，就日本第三次对华贷款中有关陕西的项目，双方进行了详细协商，日方表示竹下登特别对陕西的项目感兴趣。涉及陕西省的7个项目全部列入计划。

8月30日上午，竹下登一行离开西安经上海回国。

9月22日—24日，应国务院总理李鹏邀请的斯里兰卡民主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理拉纳辛哈·普雷马达萨偕夫人一行26人，由中国政府陪同团团团长、物资部部长柳随年和夫人等7人陪同，由北京乘专机抵达西安参观访问。

随同普雷马达萨总理来访的还有斯里兰卡驻华大使及夫人等。受到副省长徐山林、孙达人、省政府秘书长昌志宏、省妇联主任张秀绒、省外办副主任秦元恺等欢迎。少年儿童向贵宾们献花。

下午2时普雷马达萨总理一行，由徐山林副省长陪同，参观了秦兵马俑博物馆，普雷马达萨兴致勃勃地观赏规模宏大的兵马俑军阵，连连称赞。参观结束时，他签名留言“展览显示了我们前辈的能力。”参观半坡博物馆后在留言簿上写道：“这里陈列的人类所表现出的智慧，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当晚7时，省政府在西安宾馆百花厅举行欢迎宴会。徐山林副省长代表省长侯宗宾对斯里兰卡总理一行来访表示热烈的欢迎。宾主举杯互相祝酒。普雷马达萨总理在祝酒时对中国政府为其安排来陕西进行富有意义的访问表示感谢。他说：“我们这次访问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最美好的祝愿。斯中两国有着共同的文化遗产，两国人民的友谊源远流长。”

23日上午，由副省长孙达人陪同，斯里兰卡贵宾们向大慈恩寺赠送佛像，佛家弟子齐颂波罗新经，普雷马达萨郑重地将一尊金光闪闪的佛像赠予寺院。主持迎接佛像仪式的省佛教协会会长许立功向普雷马达萨总理表示感谢，并回赠一套玄奘传。许立功说：“一千多年前唐玄奘赴印度取经，途经斯里兰卡，从此两国人民和宗教界始终保持着友好关系。这次总理阁下来访并赠佛像，必将进一步加深中斯两国人民和佛教界的友谊。”仪式结束后，普雷马达萨一行游览了大雁塔。

中午，贵宾们前往西安飞机制造公司参观。总理一行对西飞公司生产的“运七—100型”飞机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听取介绍后，登上“运七”飞机，并详细询问了机舱内的各种仪表和设施。客人们还饶有兴趣地观看了该型飞机的试飞表演。

晚上贵宾们在西安人民大厦礼堂观看《唐·长安乐舞》，演出结束后，总理登台向演员赠送了花篮并合影留念。

9月24日上午，普雷马达萨总理一行圆满结束访问，乘专机赴广州。副省长徐山林、孙达人等到机场送行。

10月13日—14日，应国家主席杨尚昆邀请的芬兰共和国总统毛诺·科伊维斯托与夫人一行84人，由中国政府陪同团团团长、卫生部部长陈敏章和夫人等陪同，从北京乘专机抵西安参观访问。

随同总统来访的有芬兰外交部长卡莱维·索尔萨、外贸部长佩尔蒂·萨洛莱宁和芬兰驻中国大使里斯托·于瓦里宁和夫人等，随行记者34人。

受到省长侯宗宾、副省长孙达人、西安市市长袁正中、省外办主任张景文、省妇联副主任萧华等的热烈欢迎。少年儿童向贵宾献花。

当晚7时，侯宗宾省长在西安唐城宾馆举行宴会，欢迎科伊维斯托总统一行。卫生部部长陈敏章和夫人、副省长孙达人等出席作陪。出席作陪的还有袁正中、张景文、肖华等。宾主互相热情祝酒。科伊维斯托总统说：“我期待访问西安已很久了。我怀着极大的兴趣和激动的心情，希望亲眼看看秦始皇兵马俑，因为它是世界上最有兴趣的、独一无二的历史文物。”

10月14日上午，省长侯宗宾、副省长孙达人陪同贵宾赴大雁塔参观。途经雁塔路地方风味小吃食品街时，总统科伊维斯托饶有兴致地到“香山别庄”胡麻饼店和“马家羊肉泡馍馆”作客，他和夫人一起品尝了胡麻饼，边吃边称赞“味道很好”；在“马家羊肉泡馍馆”经理的热情邀请下，欣然与夫人、女儿坐在店堂里，同群众一起品尝了羊肉泡馍，并观看了羊肉泡馍的制作。当经理问及味道如何时，总统连声答道：“味道很鲜美，不淡也不咸”，并说：“今天品尝了我亲眼看见怎么煮出来的羊肉泡馍，食品很卫生，吃后很舒服。”在大雁塔，总统一行认真听取情况介绍，询问了僧侣的生活和宗教活动等情况。

10时50分，驱车赴临潼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参观，总统夫妇步入一号坑参观，并在一号坑大厅内拍摄了活动照片和电视片。总统在参观时详细询问了秦俑的发掘、修复过程及将军俑、武士俑等各类俑的衣着区别等情况。他感慨地说：“真是难以置信，在那么久远的时候，中国就有了这么高的技术。”他参观后在留言簿上写道：“我们对能有机会参观世界一大奇迹表示感谢，希望中国今后取得更大成绩，使中国灿烂的历史更加发扬光大。”

在参观途中，总统同侯宗宾省长热情交谈，并询问了陕西工农业发展情况。离开西安之前，总统再次对侯宗宾省长说：“我们很希望与中国政府和各地发展友好关系，在经济、科学技术等方面更广泛地合作和交流。”并表示“今后可考虑派代表常驻西安。”

10月14日下午3时30分，贵宾一行乘专机离开西安前往广州。侯宗宾



等到机场送行。

11月7日—8日，应国家主席杨尚昆邀请的乌拉圭东岸共和国总统胡利奥·玛丽亚·桑吉内蒂偕夫人一行42人，由中国政府陪同团团长、民政部副部长崔乃夫和夫人等26人陪同，由北京乘专机抵达西安参观访问。

随同来访的有乌拉圭最高法院院长拉斐尔·阿迭戈、外交部长路易斯·巴里奥斯·塔萨诺、经济财政部长里卡多·塞尔维诺、驻华使馆临时代办吉列尔莫·巴列斯·加尔梅斯夫妇等，其中随行记者16人。

在机场受到省长侯宗宾、副省长孙达人、省外办主任张景文、省妇联副主任房玲等的欢迎。少年儿童向贵宾献花。

侯宗宾省长于当晚8时在西安宾馆百花厅举行欢迎宴会，迎送人和西安市副市长郝树茂以及省政府有关厅局负责人出席作陪，宾主相互祝酒，畅叙中乌两国的友谊。

11月8日上午9时在侯宗宾省长等陪同下，总统一行参观了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总统和夫人不时地向讲解员提问，随行的乌最高法院院长、外交部长、经济部长等在栩栩如生的俑土旁合影留念。总统夫妇下一号坑参观，并在大厅内拍摄了活动照片和电视片。总统夫人还向秦俑馆袁仲一馆长索要了有关秦俑的详细材料。离开秦俑馆时总统在留言簿上写道：“今天我们到这里来进行了一生中最有趣的参观，这是一支举世无双的军队。”下午到省博物馆参观，在参观时，总统向孙达人副省长询问陕西文化、经济等方面的情况。同时又介绍了乌拉圭的教育情况等。在谈及经济发展的问题时，总统说：“乌拉圭与中国相比地大人少，有利有弊。利是吃饭的人少，但购买力小，要使工业产品有销路，使商品有好的市场，我们寻求到一条出路——出口。例如，乌每人平均10头羊、6条牛，我们就有大量的羊毛，中国是我们很好的顾主。”在谈到旅游业时，桑吉内蒂说：“旅游事业的发展可以给国家带来实惠。客人住饭店，乘车辆，购物都要付外汇。旅游业还能为大量的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

11月8日下午4时，乌拉圭总统桑吉内蒂一行，乘专机离开西安赴广州。侯宗宾、孙达人等到机场送行。

12月22日—23日，应国务院总理李鹏邀请的印度共和国总理拉吉夫·甘地一行132人，由中国政府陪同团团长、冶金部部长戚元靖夫妇等36人陪同，从北京乘专机来西安参观访问。

随团来访的有总理夫人索尼亚·甘地女士、外交部长P·V·纳拉西姆哈·

拉奥、商业部长迪内希·辛格、司法兼水利资源部长 B·尚卡阿南德博士、外交国务部长纳特瓦·辛格、印驻华大使 C·V 任嘉德及夫人等，其中随团记者 73 人。

拉吉夫·甘地总理一行受到省长侯宗宾和夫人、副省长孙达人、西安市市长袁正中、省外办主任张景文等热情友好的欢迎。少年儿童向贵宾献花。

12 时 40 分在侯宗宾省长等陪同下由机场驱车前往大雁塔、省博物馆和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参观。在秦俑馆参观时总理和夫人下一号坑并拍摄了活动电视和照片。总理一行对文物表现了极大的兴趣，详细询问了秦俑的修复、发掘和展览情况，最后在留言簿上挥笔写下：“我站在文明历史面前完全被这一切感动了。在西安此地，中国和印度开始了交往。向伟大文明致敬，向友好的中国人民致敬。”

侯宗宾省长于当晚 8 时，在西安宾馆百花厅举行欢迎宴会，副省长孙达人等作陪。宾主相继祝酒，畅叙中印两国的友谊。拉吉夫·甘地总理说：“我来到了西安这个伟大、古老的文明中心被深深的感动了，西安是中国和印度交往的交汇处。我下午参观的几个地方，在那里我看到了历史，特别是亲眼看到了玄奘在印度逗留 19 年从印度带回来的佛教经典文献。你们保护这些遗产实际是与印度之间的联系。”

12 月 23 日 8 时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一行，乘专机离开西安前往上海。侯宗宾和夫人、孙达人等到机场送行。

### 1990 年

10 月 21 日—23 日，应国家主席杨尚昆邀请的瓦努阿图共和国总统弗雷德里克·卡罗穆阿纳·蒂马卡塔一行 5 人，由外交部副部长刘华秋等 6 人陪同来西安参观访问。随团来访的有总统夫人基西·蒂马卡塔、总统首席私人秘书迈克尔·里柳。抵离西安时，副省长徐山林、省政府秘书长昌志宏、省外办主任张开琛等到机场迎送。

当晚 7 时，徐山林副省长在西安宾馆举行欢迎宴会，蒂马卡塔总统在欢迎宴会上说：“西安是一座美丽的城市，秦始皇兵马俑闻名于世，我一直期待着对西安和秦俑馆的访问。”

贵宾在西安期间，参观了省博物馆、西安蝴蝶手表厂，总统听了手表厂厂长的介绍后高兴地说：“我在北京曾和中国政府谈过中国在瓦努阿图投资和经济的合作问题，我希望你们能到瓦努阿图去投资。”

参观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后，在留言簿上写道：“今天，我非常高兴地

参观了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我特别赞赏你们将珍贵的历史文物保护得这样好，这对于子孙后代是非常有益的，我对此十分钦佩。”晚上观看了《唐·长安乐舞》。

蒂马卡塔总统在参观时多次表示加强中瓦两国人民的友谊和合作。他对徐山林副省长说：“我在来西安访问前曾与贵国的主席见了面，我对杨主席讲过，要求中国水稻专家到瓦努阿图去，为瓦努阿图培育水稻。”蒂马卡塔总统对省外办主任张开琰说：“瓦努阿图从建国时就立下了一条原则，即多交朋友。中国应是瓦努阿图交的第一个朋友。瓦努阿图有不少中国人，他们在那里发挥着自己的作用，特别是在科技方面。”

在参观途中，总统看到行驶的三轮车，他即向徐山林表示，希望能送他一辆三轮车。徐山林副省长代表陕西省政府向总统赠送了一辆陕西生产的三轮车。

10月22日，应国务院总理李鹏邀请的新加坡共和国总理李光耀一行38人，由航空航天部部长林宗棠和夫人等18人陪同，从敦煌乘专机飞往厦门，午后1时途经西安作短暂停留。抵离时，副省长徐山林、西安市代市长崔林涛、省外办主任张开琰等前往西安西关机场迎送，少年儿童向李光耀夫妇献花。省电视台、陕西日报、省电台、西安晚报派员赴机场作了新闻采访，并在古都大酒店陪同贵宾共进午餐。2时20分李光耀总理一行离开西安。

11月17日—18日，应国家主席杨尚昆和国务院总理李鹏邀请，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总统苏哈托，由中国政府陪同团团团长、外经贸部部长郑拓彬与夫人陪同，从北京乘专机来陕西参观访问。随同来访的有苏哈托总统夫人和女儿，经济、财政、工业统筹部长夫妇，外交部长夫妇、国务部长夫妇等一行90人，其中新闻界人士35人。省长白清才、副省长孙达人、省外办主任张开琰等到机场欢迎苏哈托总统一行，并陪同贵宾们参观游览。

正在陕西考察工作的国务院总理李鹏和夫人一起陪同印尼贵宾参观游览了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华清池。苏哈托总统兴致勃勃地走到秦俑修复工地旁，看到几名考古工作人员正在修复一个将军俑，便停步询问。当他听说全是自力更生进行修复时，连声说：“了不起。”总统夫人看到修复的工作人员中有妇女时说：“中国的妇女真能干。”参观三号俑坑时，苏哈托总统对李鹏总理说：“看来当时亚洲民族科学技术发展水平已远远超过了西欧的民族，至少不低于他们。这不仅是中华民族的自豪，也是世界人民的骄傲，因为这些已经充分体现了当时世界文明发展的程度。”参观后，总统在留言簿上写

道：“这些考古的发现令人惊叹不已。这表明中华民族具有多么高度的文明，不愧是亚洲文明的代表。对这一发现，我感到自豪。”

晚上，省政府在唐乐宫为苏哈托总统一行举行《仿唐乐舞》专场文艺晚会。

11月18日上午9时，苏哈托一行乘专机赴广州，白清才、孙达人等到机场送行。

### 1991年

5月30日—6月1日，应国家主席杨尚昆邀请的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总督赛雷·艾里一行98人，由外交部副部长刘华秋和夫人陪同，从北京乘专机来陕西参观访问。副省长孙达人、省政府副秘书长孙武学和省外办副主任陈祥林等到机场迎送，并陪同参观。随同总督来访的有总督府秘书长汤姆·利夫莱斯、巴新驻我国大使胡洛和夫人等。当晚，副省长孙达人以省政府名义宴请了巴新总督和夫人一行。

总督一行在西安逗留期间，参观了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华清池、西安人民搪瓷厂和西安锦江刺绣厂。总督一行在参观活动中对中国古代和当代文明十分赞叹。艾里总督在与副省长孙达人交谈时说：“这次我不但能有机会参观贵国北京，会见了贵国领导人，还到具有悠久历史的西安访问，我认为只有了解一个国家的过去，才能更好地了解这个国家和人民的今天。贵国两千多年前，就是一个世界强国，科学技术达到了那样的高水平。”他在秦俑馆留言簿上写道：“我感谢贵国领导人和博物馆对我本人和夫人，以及我的随行人员的热情接待。通过参观，我对贵国的文化遗产和人民的生活方式有了更深的了解。”总督对孙达人副省长表示希望与我有关单位合作、合资建厂。艾里总督颇有兴趣地参观了西安人民搪瓷厂和锦江刺绣厂，询问了工厂的生产和有关技术情况。艾里总督对孙达人说：“中国建设取得了巨大成绩，值得借鉴的地方太多了。目前巴新青年劳动力过剩，且未受过良好教育。巴新政府要考虑从中国引进劳动力密集型的低技术，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北京参观了一个鞋厂，到西安又参观两个轻工厂的原因所在。”当得知巴新商人曾订购过西安人民搪瓷厂的产品，而且销售情况很好时，他高兴地说：“回国后，我要亲自了解一下。”参观这两个工厂后，总督对孙达人还说：“这两个工厂的技术很适合巴新情况，巴新地处南太平洋中部，如搞一个中巴合资企业，产品不仅可以满足当地的需要，也可以销往澳大利亚等临近四国，我本

人对中巴合资企业很有信心。回国后，我要与巴新外交部和经济部专家、商人讨论建厂的可能性。我要尽力督促他们对贵省的搪瓷生产和刺绣发生兴趣。”在与孙达人话别时又说：“一旦有建厂的可能，我会尽快与你们联系。”

6月5日，应国务院总理李鹏邀请的牙买加总理迈克尔·曼利一行8人，由中国政府陪同团团长、广播电视部部长艾知生陪同，上午11时许，由北京乘专机来陕西参观访问。下午4时30分乘专机离陕返回北京。随同曼利总理来访的有总理办公室代常秘安东尼·希尔等。贵宾抵离时，副省长孙达人、省政府副秘书长孙武学和省外办副主任陈祥林到机场迎送并陪同参观活动。中午12时30分副省长孙达人以省政府名义在西安古都大酒店宴请曼利一行。出席作陪的有省广播电视厅厅长同向荣和省经贸委副主任来应林。宴会后，曼利总理一行随即驱车前往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在宴会席间和参观中，曼利总理向孙达人说：“了解了陕西省和西安市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和旅游业的情况。中国在过去10年所取得的成就太惊人了。就此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昨天，贵国主席杨尚昆会见了我们，他告诉我中国的可耕地占世界可耕地的6%，却养活了世界上23%的人口，多么令人难以置信和强烈对比的数字啊！”接着他又说：“所以布什最近决定延长中国的最惠国待遇是明智、正确和具有远见的。”当孙达人问到牙买加的旅游资源和旅游的发展时，曼利总理说：“与中国不同，我们没有你们那样悠久的历史，没有闻名世界的故宫、万里长城和兵马俑，我们也没有你们所拥有的丰富的自然资源，如石油、天然气和煤的蕴藏，但我们有世界堪称一流的能与夏威夷海滩媲美的海滩和秀丽的山脉。我们每年接待的外国游客100多万人，去年国外游客达115万人，是我国人口的1/2，旅游业已发展为我国的第二大产业。”“旅游业是赚取外汇的一个很好途径，对牙买加来说，更是如此。然而仅仅有旅游资源还不够，必须创造一切条件吸引游客，使他们乐意到这些地方去度假和旅游。中国旅游资源格外丰富，只要宣传得当，设施完善，形式多样，一定能够吸引千千万万的游客到中国来。”

9月10日—12日，应国家主席杨尚昆邀请的马来西亚最高元首苏丹·阿兹兰·沙阿陛下，由中国政府陪同团团长、航空航天部长林宗棠及夫人陪同，从乌鲁木齐乘中国民航专机，下午6时45分抵达陕西访问。12日上午9时30分离开西安前往上海。

随同最高元首来访的有元首后瑞姑·拜农（即元首夫人）、元首的儿子、

女儿、女婿及人力资源部部长、外交部秘书长和马来西亚驻华大使夫妇等一行 64 人，其中新闻记者 9 人。

到机场迎送马来西亚最高元首一行的有省长白清才、副省长孙达人、省外办主任张开琰、省政府副秘书长孙武学和省妇联副主任肖华等。在从机场驱车赴西安凯悦宾馆的路上，沙阿陛下向白清才省长详细询问了陕西的人口、面积、工农业生产、经济、文化和教育情况以及人民的生活水平等。

9 月 11 日，苏丹·阿兹兰·沙阿陛下一行分别在白清才省长和孙达人副省长陪同下，参观了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化觉巷清真寺和陕西历史博物馆。在秦俑馆，沙阿陛下应邀步入一号坑底，仔细观赏了造型逼真、形态各异、雄伟壮观的兵马俑军阵，并详细询问兵马俑的烧制、彩绘、兵器和兵种情况，以及兵马俑保护情况。参观结束后，阿兹兰陛下对白清才省长和袁仲一馆长说：“这座博物馆反映了贵国辉煌的文明史”。沙阿陛下参观化觉巷清真寺时，对具有中国建筑特点的清真寺和其悠久的历史产生了极大兴趣，对清真寺的修复和保护工作表示赞赏。他称：“古兰经的雕刻是一项浩大的工作。”并向该寺赠款 23400 元人民币。晚 7 时，省长白清才设宴款待马来西亚贵宾一行。席间，阿兹兰陛下着重向白清才省长和航空航天部部长林宗棠了解中国和陕西的飞机制造业，详细询问了运七、运八、运十二各型飞机性能，飞行距离和载客量等。还特地询问了运七飞机的价格后说：“马来西亚方面考虑购买以上几种机型的飞机。这些飞机起飞时要求的跑道短，很适合马来西亚的情况。”宴会后，阿兹兰陛下一行观赏了陕西省古典艺术团演出的《仿唐乐舞》。

9 月 12 日，应国家主席杨尚昆邀请，新加坡共和国总统黄金辉阁下，在中国政府陪同团团长、广播电影电视部部长艾知生和夫人的陪同下，由北京乘中国民航专机来陕西参观访问。9 月 13 日下午 4 时离开西安赴桂林。随同来访的有总统夫人、劳工部部长及夫人等 23 人，新闻界人士 6 人。到机场迎送新加坡总统一行的有省长白清才、副省长孙达人、省外办主任张开琰、省政府副秘书长孙武学和省妇联副主任萧华等。

当晚，白清才省长在西安凯悦宾馆设宴款待新加坡总统黄金辉一行。宴会后，白清才省长和西安市市长崔林涛陪同黄金辉总统一行赴西安市体育场观看西安市古文化艺术节的宫廷焰火晚会。

新加坡总统在西安参观游览期间所谈观感：

盛赞中国悠久的文明历史和丰富的文化遗产。

贵宾们怀着浓厚的兴趣参观了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化觉巷清真寺、陕西历史博物馆和华清池。在参观省博物馆和秦俑馆时，黄金辉总统常常是在展柜前驻足良久，详细了解具体文物的年代、来源和工艺水平等。在秦俑馆一号坑坑底，总统询问了兵马俑的挖掘、修复和保护等情况。并在留言簿上写道：“代表团和我本人参观了这一中国古代帝国壮观的历史遗迹。”在陕西历史博物馆，黄金辉留言：“我们有机会浏览这一壮观的博物馆，感到非常高兴和荣幸，并向贵国已故周恩来总理表示敬意，因为是他提出修建陕西历史博物馆这一绝妙的主意。”当了解到秦兵马俑发掘和修建缺乏足够的资金时，黄金辉对陪同孙达人副省长讲：“应该考虑争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帮助。”总统在参观中曾几次提到，贵省文物古迹之丰富，在世界上没有几个地方可以比拟。在观赏大型宫廷焰火晚会后，向省长白清才说：“这是我有生以来观看的时间最长、最丰富多彩的一次焰火晚会。焰火品种繁多，色彩斑斓，令人赏心悦目。”

建议陕西省加强旅游促销活动，以提高知名度。

在谈及新加坡发展旅游业的经验和对发展陕西旅游业的看法时，黄金辉对孙达人说：“这两天我参观贵省9处著名的文物古迹，了解到你们还有更多的东西可以给外国游客提供，贵省也已经修建了一个设施先进的大型机场和众多的旅游宾馆，吸引游客的一切必要条件已具备，发展旅游有很大潜力和广阔前景。听说贵省一年接待30多万国外游客，这与贵省在中国历史上所处的地位不相称，每年接待量应该更多一点，而且每年的增长速度应在5%~10%左右。我认为目前贵省应采取主动积极的旅游促销活动。新加坡旅游成功的经验之一就是成功的促销工作。只有这样，才能吸引更多的国外游客，提高知名度。”

希望加强新加坡与陕西的交流与合作。

在参观陕西历史博物馆时，黄金辉被其雄伟的气势所感染，连连说：“太壮观了！”休息时，黄金辉说：“陕西历史博物馆设计得非常好。”当得知主要设计师是西北建筑设计院女高级设计师张锦秋时，他非常高兴地说：

“我们正在考虑新加坡国立博物馆的扩建事宜。不久博物馆的女馆长要来中国访问，她一定会来西安。届时，希望白省长能安排她与张锦秋女士见面。我们盼望在这方面能得到中国方面的合作和支持。”

当听说陕西搞了很多合资企业，并且在改善外商投资环境方面做了不少工作时，黄金辉说：“我回去后要向新加坡总商会了解一下是否有更多的新加坡投资商准备来西安投资。我促进他们来，陕西有劳力，有丰富的煤炭、石油和天然气，发展前景十分可观。”

11月13日—14日，摩洛哥王储西迪·穆罕默德殿下，在中国政府陪同团团团长、外交部副部长杨福昌陪同下，由北京乘专机于下午1时30分抵达陕西参观访问。随王储来访的有摩文化大臣，公共工程大臣、驻华大使、王储密友等32人。王储一行抵离时，副省长郑斯林、省外办主任张开臻、省政府副秘书长孙武学等前往机场迎送。

王储一行抵达下榻的西安宾馆后，即驱车前往陕西历史博物馆，在参观中他认真听取讲解，并不时提出一些问题。王储对副省长郑斯林说：“陕西历史博物馆是我见到过的最美的博物馆。”

当晚7时，副省长郑斯林在西安宾馆为王储举行欢迎宴会。

11月14日上午，由副省长郑斯林陪同参观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王储在旅途中向郑斯林介绍了摩洛哥的国土、人种、宗教等情况。并说：“摩洛哥的古城非斯市在历史上曾几次成为摩洛哥的都城，它的历史、文化同贵省省会西安市一样悠久。我希望将来非斯市能同西安市建立姐妹城。”郑斯林表示欢迎。王储还说：“为了促进了解和友谊，希望能在摩洛哥举办中国文化展。”并提出同陕西省合作生产中国古青铜器的复制品等。是日下午1时贵宾们乘专机前往桂林访问。

## 二、副总统、副总理、副首相

表3-2-2

副总统、副总理、副首相一览表

日期	国家名称	团长姓名及其职务	人数	陪同人员	地方出面负责人		活动内容
					迎 送	宴 请	
1960 4.30	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代表团	副总理克里姆·贝勒卡塞姆	10	外交部副部长姬鹏飞	李启明、西安市市长刘庚、军区司令员杨嘉瑞	副省长李启明等共进午餐	途经西安作短暂停留



续表

日期	国家名称	团长姓名及其职务	人数	陪同人员	地方出面负责人		活动内容
					迎 送	宴 请	
1961 12.22	阿尔巴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部长会议代表团	副主席凯莱齐	47	外交部东欧司副司长陈伯清	赵伯平、时逸之、李启明、张锋伯	省委书记处书记、省长赵伯平等共进午餐	由昆明赴京途经西安作短暂停留
1962 9.27—28	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军事代表团	副总理、国防部长武元甲大将	15	国防部副总参谋长张宗逊上将	章泽、谢怀德、杨拯民、时逸之、刘庚、杨嘉瑞、牛书申、王明坤	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谢怀德	参观省博物馆,游览了市容、华清池
1977 10.29—31	新西兰政府代表团	副总理托尔博伊斯	12		张毅忱、省外办主任鲁曼	省革委会副主任张毅忱	参观省博物馆、大雁塔等名胜古迹
1979 4.6—7	新加坡共和国政府代表团	副总理兼教育部长吴庆瑞	9	外交部亚洲司司长沈平	章泽、阎明、鲁曼、冯世光	省革委会副主任章泽	参观西北国棉四厂、第一印染厂、秦陵、大雁塔
1979 8.29—30	美国政府代表团	副总统蒙代尔	37	外交部副部长黄镇	于明涛、省外办主任鲁曼	省委书记、省长于明涛	参观秦始皇兵马俑馆等名胜古迹
1979 11.24—25	比利时王国政府代表团	副首相唯利·克拉斯	40	外贸部一副部长	姜一、鲁曼、张铁民、刘振华、黎以宁	省委书记、副省长姜一	参观秦俑馆、省博物馆等名胜古迹
1985 4.11—13	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代表团	第一副总理格·奥普雷亚	10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殷子俊	何承华、省外办主任陈兴亮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何承华	参观西北国棉四厂、第一印染厂、省博物馆等
1990 6.10—12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政府代表团	副总理穆罕默德·祖海尔·莫沙拉克	10	全国政协常委韩克华等10人	徐山林、省外办主任魏明中	省长白清才	参观西安飞机制造公司、西安黄河机器厂,游览了名胜古迹

注：此表不含身兼数职不以政府代表团、组身份的副职领导人，他们由民间友好组织或对口单位接待。

## 第二节 议会团组

从1957年到1991年的35年间,应邀来访的议会议长、副议长,来自42个国家和4个区域性议会组织的代表团(组)共103起。其中:泰国11起、日本8起、哥伦比亚、意大利、法国各6起,澳大利亚5起、美国4起、玻利维亚、西班牙、芬兰、伊朗各3起,新西兰、英国、厄瓜多尔、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波兰、挪威、墨西哥、加拿大各2起,其他均为一次性的来访。详见下表。

(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陕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如下文字或表格中均简称为全国人大常委会、省人大常委会。)

### 一、议长、副议长

表3-2-3 议长、副议长一览表

日期	团、组名称	团长姓名及其职务	人数	陪同人员	地方出面负责人		活动内容
					迎 送	宴 请	
1957年							
5.4—16	缅甸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民族院代表团	议长萧恢塔	15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刘贯一	赵伯平、韩兆鹗、成柏仁、李启明、孙蔚如、杨子廉、刘庚、张锋伯、陈式玉、李敷仁、亢心裁、韩望尘	代省长赵伯平	参观钟楼、大雁塔、兴教寺、游览了华清池等
6.15—16	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议会代表团偕布拉格市人委代表团	团长费林格·斯沃波达市长	24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陈叔通	赵寿山、副省长李启明、市长刘庚、副市长张锋伯	省长赵寿山、省委书记处书记赵伯平、方仲如等作陪	参观名胜古迹和603厂,同工程技术人员进行座谈
1964年							
4.27—28	布隆迪共和国国民议会代表团	议长西里乌尤蒙西	3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连贯	李启明、刘邦显、市长刘庚等	省长李启明	参观搪瓷厂、第一印染厂、开关厂、马旗寨公社、半坡博物馆

续表一

日期	团、组名称	团长姓名及其职务	人数	陪同人员	地方出面负责人		活动内容
					迎 送	宴 请	
1980年							
1.10—11	日本国参议院代表团	副议长秋山长造	9	全国人大常委会朱学范	常黎夫等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常黎夫	参观省博物馆、大雁塔等名胜古迹
10.9—10	马来西亚议会代表	上议院议长奥尔马·翁毓麟	11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邢亦民	张毅忱、李世臣、鲁曼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马文瑞	参观秦俑馆、省博物馆、专访清真寺并做礼拜
11.13—15	泰国国众议院议会代表团	议长汶廷·通沙瓦	16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张加洛	时逸之、鲁曼、孙铭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马文瑞	参观秦俑馆等,在西安市委礼堂观看演出
1981年							
1.12—14	日本参议院代表团	议长德永正利	5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罗青云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毅忱、外办主任鲁曼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马文瑞	参观秦俑馆、省博、观看文娱节目
4.6—7	新西兰众议院代表团	议长约翰·理查德·哈里森	10	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孔原	林茵如、李骥德、孙铭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马文瑞	参观秦俑馆、省博物馆,游览了华清池
5.27	哥伦比亚共和国参议院代表团	第一副议长埃米利亚诺·依萨萨埃纳奥	18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张加洛、徐宗	常黎夫、林茵如、鲁曼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常黎夫	参观西安、临潼的名胜古迹
6.20—22	日本众议院友好访华团	议长福田一	13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邢亦民	孙作宾、李骥德、魏明中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孙作宾代表马文瑞主任设宴欢迎	参观秦俑馆、省博、兴教寺,瞻仰“阿倍仲麻吕纪念碑”
7.20	欧洲议会代表团	议长韦伊夫人等	5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曾涛	省外办副主任孙铭等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马文瑞	参观秦俑馆等名胜古迹
10.2—4	意大利共和国众议院代表团	议长利奥妮尔德·纳蒂	9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区棠亮	林茵如、董淑芬、李骥德、孙铭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马文瑞	专访西安交通大学,参观秦俑馆等名胜古迹、观看文艺节目
1982年							
2.2	法兰西共和国国民议会执行局代表团	议长梅尔马滋	10		省外办副主任孙铭等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马文瑞	参观名胜古迹

续表二

日期	团、组名称	团长姓名及其职务	人数	陪同人员	地方出面负责人		活动内容
					迎 送	宴 请	
4.7—9	澳大利亚联邦参议院代表团	议长哈罗德·扬	3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张加诺	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董英、省外办主任魏明中	省长于明涛	议长本人因国内事务紧急回国,由夫人按计划来西安访问
4.24—26	玻利维亚共和国议会代表团	参众两院议长胡利奥·加雷特、艾永·爪尔维托、克劳雷·奥图尼奥	4		省外办副主任孙铭等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马文瑞	参观秦俑馆、省博物馆等名胜古迹
6.6	美利坚合众国国会参议院代表团	多数党领袖贝克	15		省外办副主任孙铭等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常黎夫	参观秦俑馆等名胜古迹
9.1—3	法国国民议会代表团	议长路易·梅尔马兹	42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邢亦民	张毅忱、林茵如、李骥德、孙铭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毅忱受主任马文瑞委托设宴欢迎	参观秦俑馆等名胜古迹
10.4—5	欧洲议会会议员访华团	保尔·德·凯尔斯马克	10	郭友昌	艾奇玉		参观西安的名胜古迹

## 1983年

1.18	法国参议院法中友好小组代表团	副议长罗贝尔·洛库尔	7		林茵如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林茵如	参观秦俑馆等名胜古迹
3.30—4.1	美国国会众议院代表团	议长小托马斯·奥尼尔	50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曾涛	常黎夫、李骥德、魏明中、孙铭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马文瑞	参观游览秦俑馆等,观看文艺晚会
5.11	英国上议院访问小组	议员肖罗斯勋爵	2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连璧	参观秦俑馆等名胜古迹
7.7—8	哥伦比亚议会代表团	第二副议长马里奥·希拉尔多·埃纳奥	16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曾涛	李连璧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连璧	参观秦俑馆、省博物馆、大雁塔等
8.31—9.2	泰国国会代表团	国会主席、上议院议长乍鲁布·奎素万	19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外交部顾问符浩	李连璧、李骥德、魏明中、土金璋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严克伦	参观秦俑馆、省博物馆、大雁塔等
4.14—17	比利时王国议会代表团	参众两院让·德佛莱涅、议长爱德华·利曼斯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曾涛	李连璧、李骥德、陈明、魏明中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严克伦	参观秦俑馆、省博物馆、大雁塔等

续表三

日期	团、组名称	团长姓名及其职务	人数	陪同人员	地方出面负责人		活动内容
					迎 送	宴 请	
1984 年							
4.24—26	玻利维亚众参两院代表团	众议长厄瓜贝尔托·克劳利、参议长胡里奥·加雷特·艾永	5	全国人大常委员会委员张士明	省外办主任魏明中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严克伦	参观游览秦俑馆、华清池等名胜古迹
6.5—6	哥伦比亚国会代表团	参议长奥尔金、众议长加维亚多	17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曾涛	李连璧、李骥德、魏明中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严克伦	参观秦俑馆、省博物馆等
7.3—4	厄瓜多尔共和国国民议会代表团	议长加里·埃斯帕萨·法维亚尼	16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明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严克伦	参观秦俑馆、议长登上大雁塔最高层俯瞰全景
7.13—15	西班牙众议院代表团	副议长莱奥波尔多托雷斯	15	全国人大常委员会委员何英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连璧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严克伦	参观游览西安名胜景点
8.30	泰国国会代表团	国会主席上院议长乍鲁布·銮素万	15	全国人大常委员会委员符浩	李连璧、李骥德、魏明中、土金璋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严克伦委托副主任李连璧宴请	参观游览名胜古迹
9.9—11	意大利议会代表团	参议院议长弗朗斯科·科西加	14	全国人大常委员会委员郝德青	邓国忠、霍世仁、阎明、省外办副主任何克敬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连璧	参观游览秦俑馆等名胜古迹
9.12—14	苏丹民主共和国全国人民议会代表团	议长伊兹丁·赛议德	8	全国人大常委会财经委员会牛荫冠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谈维煦、霍世仁、雷行、省外办副主任秦元恺	省人大常委会举行欢迎宴会、李连璧致祝酒词	参观秦俑馆、大雁塔等名胜古迹
10.10	瑞士联邦议会代表团	国民院议长安德列·高梯埃	10	全国人大常委员会委员钱敏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连璧等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严克伦	参观游览秦俑馆等名胜古迹
1985 年							
1.16—18	芬兰共和国议院代表团	议长埃尔基·毕斯蒂宁	12		陈明、省外办主任陈兴亮等	李连璧会见并设宴招待	就人大工作、引进外资等进行专题座谈

续表四

日期	团、组名称	团长姓名及其职务	人数	陪同人员	地方出面负责人		活动内容
					迎 送	宴 请	
5.12—14	阿根廷共和国议会代表团	众议长胡安·卡洛斯·普列塞	4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宋劭文	余明、张玉书、刘步云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连璧	参观游览了市容和名胜古迹
6.30—7.1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议会代表团	议长霍贾托伊斯兰·阿里·阿克巴尔·哈希米·拉夫桑贾尼	10	陪同团团长、卫生部长崔月犁等30人	副省长张斌、市长袁正中、外办陈兴亮、卫生厅长卢希谦等	省长李庆伟设宴欢迎	张斌陪同冒雨参观秦俑馆、省博物馆、清真寺
7.6—7	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代表团	参议院议长道格拉斯·麦克莱兰	19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刘大年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明等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连璧	参观秦俑馆、华清池等名胜古迹
7.10—11	阿拉伯埃及共和国人民议会代表团	议长里法特·马哈古卜	14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何英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何承华、外办主任陈兴亮	李连璧主持宴会、何承华、陈兴亮作陪	由迎送人陪同贵宾参观秦俑馆、清真寺
7.23—24	日本参议员代表团	议长木村睦男	12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符浩	李连璧、邓国忠、陈兴亮、张玉书	李连璧设宴欢迎	参观省博物馆等名胜古迹
8.1—2	泰国议会代表团	上议院议长乌吉·蒙宣维那	17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段苏权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余明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连璧	参观游览秦俑馆等名胜古迹
8.6	泰国议会代表团	下议院议长比亚拉·瓦拉差敦	15		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郭志鼎	李连璧宴请	参观游览秦俑馆、华清池
8.24—25	西班牙参议院代表团	议长何塞·费德里科·德卡瓦哈尔	20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章瑞英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余明、郭志鼎	李连璧会见并宴请	参观秦俑馆、华清池等名胜古迹
9.12—14	哥斯达黎加共和国执政党民族解放党议会党团代表团	副主席阿尔法罗	17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余明、郭志鼎		参观秦俑馆、钟楼、西城门楼、天主教堂、西安交通大学等
9.15—17	意大利众议院卫生代表团	主席	14	董安华、雷川	李经纶、秦元恺等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连璧会见并宴请	参观秦兵马俑馆,考察陕西省人民医院医疗设施等
10.9	荷兰王国议会代表团	议会二院议长丁克·多尔曼	8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张珍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余明、张玉书、刘步云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严克伦	参观游览秦俑馆等名胜古迹

续表五

日期	团、组名称	团长姓名及其职务	人数	陪同人员	地方出面负责人		活动内容
					迎 送	宴 请	
10.9	意大利众议院工、商、手工业、对外贸易委员会代表团	工委主席塞韦里诺·奇塔里斯蒂	15		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郭志鼎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何承华	参观游览秦俑馆、华清池等名胜古迹
10.10	西欧联盟议会代表团	议长让·马利·卡罗	10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和郭志鼎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连璧	参观游览市容、秦俑馆、华清池等名胜古迹
11.10—11	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国民议会代表团	主席斯·托多罗夫	10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李琦、副秘书长阎明复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邓国忠、陈兴亮、张玉书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严克伦	参观秦俑馆, 陕西彩色显像管总厂等
12.17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议院代表团	主席霍斯特·辛德曼	26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曾涛	李连璧、陈兴亮、张玉书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严克伦	参观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
1986年							
6.9	波兰人民共和国议会代表团	团长罗曼·马利诺夫斯基	15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潘焱	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郭志鼎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明	参观秦俑馆等名胜古迹
8.26	罗马尼亚大国民议会代表团	团长尼古拉·乔桑	15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张珍	郭志鼎	陈明	参观游览秦俑馆、华清池等名胜古迹
9.18—10	挪威王国议会宗教、教育、文化委员会代表团	团长哈根·布兰肯波格	5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王子野	郭志鼎	省人大常委会委员赵长河	参观秦俑馆、大雁塔、西安交大, 观看《唐长安乐舞》
11.21	美国参议院代表团	团长欧内斯特·霍林斯	10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区棠亮	郭志鼎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孙克华	参观秦俑馆、华清池
1987年							
1.23	日本议会代表团	团长大石正光	15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蔡子民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连璧	李连璧	参观游览秦俑馆等名胜古迹
4.9—11	古巴共和国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访华团	主席弗拉维奥·布拉沃	7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张致祥等	李连璧、秦元恺、郭志鼎	省人大常委会设宴欢迎, 李连璧致词	参观国棉四厂、大雁塔、秦俑馆
4.14—15	墨西哥合众国众议院外委会代表团	主席胡安·何塞·布雷默	10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黄玉昆	陈明、郭志鼎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明	参观游览秦俑馆等名胜古迹, 访问鱼化寨

续表六

日期	团、组名称	团长姓名及其职务	人数	陪同人员	地方出面负责人		活动内容
					迎 送	宴 请	
4.19—22	墨西哥参议员夫人代表团	团长马卡里亚·里瓦·帕拉西奥夫人	14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章瑞英	刘力贞、郭志鼎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力贞	参观省博、秦俑馆、大雁塔、西安仪表厂、幼儿园
4.22—23	加拿大议会代表团	参、众议长居·夏博诺约翰·弗里泽	22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符浩等 13 人	李连璧、陈明、陈兴亮、郭志鼎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严克伦	参观秦俑馆、省博物馆并拍摄了电视新闻
5.22—24	新西兰议会访华团	议长杰拉尔德·阿洛伊修斯·沃尔	11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宋一平	李连璧、秦元恺、郭志鼎	省人大常委会设宴,李连璧祝酒欢迎	参观飞机制造厂、外院、省博、秦俑馆,天主教堂作礼拜。
6.9—10	哥伦比亚议会代表团	众议院议长罗曼·戈麦斯·奥瓦列	22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裘维藩	李连璧、陈兴亮、刘万兴等	省人大常委会设宴欢迎,李连璧致祝词	参观秦俑馆等名胜古迹
6.12—14	塞浦路斯共和国议会团	议长瓦索斯里萨利迪斯博士	8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彭清源等 7 人	陈明、何克敬、滕云等	省人大常委会设宴欢迎,陈明致祝酒词	参观省博物馆、大雁塔、秦俑馆、拍新闻电视
7.2—3	哥伦比亚议会代表团	参议院议长温贝托·佩莱斯·古铁雷斯	20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黄玉昆、石国宝	李连璧、陈兴亮、西安市委冯元硕	省人大常委会设宴欢迎,李连璧致祝酒词	参观秦俑馆、大雁塔等名胜古迹
7.22	法国议会外委会访华团	副主席克洛德—热拉尔·马库斯	7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刘伟	陈明、郭志鼎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明	参观秦俑馆、清真寺等名胜古迹
8.14—15	联邦德国议院内政事务委员会访华团	主席汉斯·考·林纳特	17	全国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委员会王子野	刘力贞、郭志鼎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力贞	参观秦俑馆、钟楼,观看文艺演出。
9.14—15	伊拉克共和国国民议会代表团	议长萨教·哈马迪	10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何英、尹作金	韦明海、郭志鼎、秦元恺	韦明海受主任严克伦委托主持欢迎宴会	参观秦俑馆、清真寺等名胜古迹
9.30	民主德国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代表团	主席魏歇尔特	7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宋汝芬	邓国忠、郭志鼎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邓国忠	参观秦俑馆等名胜古迹,访问法律工作者座谈会



续表七

日期	团、组名称	团长姓名及其职务	人数	陪同人员	地方出面负责人		活动内容
					迎 送	宴 请	
11.7—10	法国议员代表团	国民议会议员路易·穆里内	4	全国人大常委会华侨委员会委员徐大同	陈明、秦元恺等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明	参观清真寺、乾陵、秦俑馆、省博、特种工艺厂等
1988年							
3.6	澳大利亚议会澳中友好小组	团长科林·霍利斯	9	全国人大常委会外事局副局长王进仁	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郭志鼎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连璧	参观秦俑馆、省博物馆
3.18	挪威议会代表团	团长尤·班柯夫	16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叶林	郭志鼎等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连璧	参观秦俑馆等名胜古迹
5.12	芬兰议会外委会代表团	团长阿尔托宁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贺进恒	李连璧	李连璧	参观秦俑馆、省博物馆等
6.12—14	日本众议院访华团	议长原迩三郎	9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符浩	孙克华、陈兴亮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李溪溥	参观青龙寺、大雁塔等
6.25	哥伦比亚议会代表团	团长马丁·莱耶斯	18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莫文祥	余明等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余明	参观秦俑馆等名胜古迹
7.9	泰国国会官员代表团	团长巴塞·端威差	10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王厚德	孙克华等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孙克华	参观游览市容、秦俑馆、大雁塔
7.11	欧洲议会代表团	议长亨利·普卢姆	4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曾涛	李连璧、何克敬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李溪溥	参观秦俑馆、省博、大明宫乡、大雁塔
8.21	美国参议院农委会代表团	团长帕特里克·莱希	9	全国人大常委会财经委员会委员王润生	孙克华等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孙克华	参观秦俑馆、专题座谈
8.25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人民议会代表团	阿卜杜·卡迪尔·卡杜拉	5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宋承志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余明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李溪溥	参观秦俑馆等名胜古迹
8.27	卢森堡大公国议会代表团	团长雷奥·博伦多夫	8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孙敬文	刘力贞等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力贞	参观秦俑馆、黄河机器制造厂等

续表八

日期	团、组名称	团长姓名及其职务	人数	陪同人员	地方出面负责人		活动内容
					迎 送	宴 请	
10.13	意大利参议院外委会代表团	团长米歇尔·阿基利	15	全国人大常 委会委员宋 一平	毛生铤等	省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毛 生铤	参观秦俑馆、 省博物馆等
1989年							
4.4—5	芬兰议会经济委员会代表团	团长雷·林德 鲁斯	20		省人大常委 会副秘书长 郭志鼎	省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刘 力贞	参观工厂、农 村等
4.7—8	泰国国会代表团	下议院议长 班乍·盖索恩	20	全国人大常 委会委员钱 敏	李溪溥、孙克 华、秦元恺、 郭志鼎等	省人大常委 会主任李溪 溥	参观秦俑馆 等名胜古迹
7.3	玻利维亚国会代表团	团长西罗·洪 堡	5	全国人大常 委会委员莫 文祥	省人大常委 会副秘书长 郭志鼎等	省人大常委 会主任李溪 溥	参观西飞公 司、秦俑馆、 大雁塔等
11.12—14	泰国国会代表团	上议院第一 副议长披实· 赫马布	17	全国人大常 委会副秘书 长曹志	孙克华、郭志 鼎等	省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孙 克华	参观乾陵、秦 俑馆等名胜 古迹
1990年							
3.14—16	法国议员助理协会代表团	路易斯·卡特 林娜	12	中国人民外 交学会刘惠 杰	省外办孙照 华处长	省外办副主 任陈祥林	参观省博、秦 俑馆、清真寺 等
4.20—22	秘鲁共和国议会代表团	团长阿尔贝 托·弗朗哥· 巴列斯特	9		孙克华、韩国 劲、郭志鼎	省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孙 克华	郭志鼎陪同 参观秦俑馆、 大雁塔等
4.24—25	泰国下议院科技能源委员会	团长隆那·蓬 恰	22	全国人大常 委会教科文 委员会顾问 黄坤玉	雷行、郭志鼎 等	省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刘 力贞	参观游览秦 俑馆、大雁塔 等
7.8—10	厄瓜多尔议会代表团	团长维尔弗 里多·卢塞罗	4	全国人大常 委会委员李 学智	李溪溥、孙克 华、张开球、 郭志鼎	省人大常委 会主任李溪 溥	参观秦俑馆、 省博物馆、大 雁塔等
7.23—25	美国第四次议员助手团		11	中国人民外 交学会王德 仁等6人	省外办处长 陈为雄	副省长徐山 林会见,韩国 劲陪同	参观西飞厂、 秦俑馆、大雁 塔等
8.4—6	泰国议院教育委员会代表团	第一副主席 卡莫·几拉蓬 瓦尼	14	全国人大常 委会委员杨 海波	杨鸿章、郭志 鼎、陈祥林	省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陶 钟	参观秦俑馆、 省博物馆等

续表九

日期	团、组名称	团长姓名及其职务	人数	陪同人员	地方出面负责人		活动内容
					迎 送	宴 请	
9.7—8	意大利众议院天民党代表团(执政党)	主席斯科蒂	21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曾涛等9人	孙克华、郭志鼎、陈祥林	省人大副主任孙克华	参观秦俑馆、省博物馆、凤凰刺绣厂
12.18	伊朗伊斯兰议会伊中友好小组代表团	团长穆罕默德·易卜拉希姆·阿斯加尔扎	15		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郭志鼎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孙克华	参观游览秦俑馆、清真寺等名胜古迹
1991年							
1.6—8	泰国上议院外委会代表团	主席塞永·哥蓬上将	12	全国人大常委会外委会姚广	李志汉、秦元恺、郭志鼎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孙克华	参观秦俑馆、西城门等
1.20—21	日本国会众参两院法制局	第三部部长松本进	4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乔晓阳	谢权武等	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副主任谢权武	参观秦俑馆等名胜古迹
4.20—22	澳大利亚议会代表团	联邦议员克莱德·霍尔丁	8	全国人大委员邢亦民等4人	郭志鼎、翟志锋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孙克华	参观秦俑馆、西安保育院、西城门楼等
5.7—9	马来西亚上院议员访华团	议长陈松德	22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符浩	李溪溥、孙克华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李溪溥	参观秦俑馆、茂陵、交大、陕博、大雁塔
5.19—21	日本东京都议会代表团	副议长四谷信子	17	北京市人大常委会白平、王永昌	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郭志鼎	李溪溥	参观秦俑馆、拜谒阿倍仲麻吕纪念碑
7.12—14	土耳其共和国议会艺术出版委员会访华团	副议长哈利姆·阿拉斯	12	全国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委员会刘冰	刘力贞、秦元恺、郭志鼎	李溪溥设宴、毛文祥作陪	刘力贞陪同参观秦俑馆、陕西历史博物馆、大清真寺
8.23—25	智利共和国众议院代表团	议长何塞·比埃拉一加略	13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副主任焦善民等8人	李溪溥、陶钟、郭志鼎、李志汉	主任李溪溥宴请、副主任陶钟作陪	参观秦俑馆、西飞制造公司等
9.22—23	波兰议会外委会代表团	主席勃朗尼斯瓦夫·盖莱梅克	9	全国人大常委会外委会委员马齐彬等4人	余明, 副秘书长郭志鼎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余明宴请、秦元恺作陪	参观秦俑馆、大雁塔等

续表十

日期	团、组名称	团长姓名及其职务	人数	陪同人员	地方出面负责人		活动内容
					迎 送	宴 请	
10.15—16	加拿大议会加中友好小组	众议员小组主席罗伯特·温曼	17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张挺等6人	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杨志文	孙克华宴请,曹廷甫、张开琛作陪	参观秦俑馆等名胜古迹。
10.26—27	澳大利亚议会澳中友好小组	参议员小组主席布赖恩特·伯恩斯	12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董辅初等6人	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杨志文	孙克华宴请、程新文、陈祥林作陪	参观陕西历史博物馆、专访西安电影制片厂
11.6—8	西班牙众议院代表团	议长费利克斯·庞斯	16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宋汝芬	陶钟、杨志文、秦元恺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李溪溥	参观法门寺、秦俑馆、景泰蓝厂等

本表和续表中的外国国名全称只出现一次,重复者均为简称。

## 二、议员团组 (1964 - 1991)

表 3-2-4

议员团组一览表

日期	团组名称及负责人	人数	陪同人员	地方出面负责人		活动内容
				迎 送	宴 请	
1964年						
9.21—26	印尼合作国会议员萧玉灿夫妇	2		西安市副市长张言博		参观名胜古迹
1979年						
2.19—20	罗贝尔安德烈维维安率领法国国民议会访华团	8	全国人大常委会洪容生	省外办副主任李继忠		陪同参观游览
8.18—19	美国众议院对外商业委员会主席哈斯塔格斯	23		省外办副主任白玉峰		陪同参观游览
1981年						
4.6—7	新西兰议会代表团约翰·理查德·哈里森爵士	7	全国人大常委会石国宝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林茵如、孔原		省外办副主任孙铭陪同参观
5.27—28	哥伦比亚参议院代表团埃米利亚诺·依萨萨埃纳奥	18	全国人大常委会张加洛、徐宗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常黎夫、林茵如		省外办主任鲁曼陪同参观游览

续表

日期	团组名称及负责人	人数	陪同人员	地方出面负责人		活动内容
				迎 送	宴 请	
1982年						
7.5—7	澳大利亚议会代表团 戴维·约翰海默(自由民主党参议员)	9	全国人大常委会侯联德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孙作宾、李骥德		省外办副主任白玉峰陪同参观游览
1983年						
11.19—22	西德下萨克森州议会代表团布鲁诺·布德兰斯	5		省外办副主任秦元恺		陪同参观游览
1984年						
4.30—5.1	意大利众议院国防委员会主席鲁菲尼	4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张致祥	省外办副主任秦元恺		陪同参观游览
10.31—11.2	意大利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代表团乔·拉·马尔德	12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符浩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连璧	李连璧	参观名胜景点
1985年						
7.20—22	圭亚那人大代表团比什韦沃·拉姆萨罗普	6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杨白冰	省委副书记周雅光	周雅光	参观游览文物景点
11.27—28	美国参议员克里斯托弗·多德	3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于德全	省外办副主任秦元恺		陪同参观游览
1987年						
4.19—20	墨西哥参议员夫人代表团马卡里亚·里瓦·帕拉西奥夫人	14		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郭志鼎		陪同参观游览
1989年						
4.9—11	西德联邦议院科技委员会代表团	11		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郭志鼎	省人大副主任毛生铤	郭志鼎陪同参观游览
1991年						
11.1—4	意大利华人胡绍洪、夏式清	2	全国人大常委会侨务委员会王佳德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孙克华	孙克华宴请,省侨联苏明作陪	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杨志文陪同参观游览

### 第三节 党派组织

一、1961—1986年的25年中，陕西省党、政、军和有关方面负责人接待来访的情况：

1961年1月至4月接待3国4批12人，其中由省“和大”副会长、西安市副市长张锋伯等迎送并陪同参观的有日本社会党国民运动委员会委员田中稔男一行3人；委内瑞拉左派革命运动主席德尔加多洛萨诺一行2人。

同年6月22日—25日，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总书记艾地一行6人，由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省委第一书记张德生迎送，西北局书记高克林、候补书记王甫、省委书记处书记赵守一等陪同参观游览。

同年10月13日—16日，日本社会党顾问、众议院成员黑田寿南一行，由西安市委书记处书记、市长时逸之迎送并陪同参观。

1962年10月28日—11月7日，马来西亚共产党副书记文凯一行4人，由省委书记处书记李启明、西安市委书记处书记董学源迎送并陪同参观。

1963年5月6日—12日，新西兰共产党代表团一行4人，由省委书记处书记章泽迎送并陪同参观游览。

同年9月10日—13日，锡兰共产党（马列）学习代表团一行6人，由省委书记处书记章泽、西安市委书记处书记刘庚迎送并陪同参观。

同年10月11日—13日，日本工展顾问佐多忠隆（社会党议员）一行3人，由省“和大”副会长、西安市副市长张锋伯迎送并陪同参观。

同年12月17日—18日，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听涛克己一行2人，由省委书记处书记章泽、西安市委书记处书记刘庚迎送作陪。

1964年7月14日—18日，日本社会党代表团一行11人，由省“和大”副会长、西安市副市长张锋伯迎送作陪。

同年10月4日—6日，古巴党政代表团一行4人，由省委书记处书记严克伦迎送并陪同参观。

同年10月6日—9日，日本浅沼夫人及社会党“安保会”议员团一行3人，由省“和大”副会长、西安市副市长张锋伯迎送并陪同参观。

同年10月6日—9日，新西兰共产党代表团一行4人，由省委书记处书记严克伦迎送并陪同参观。

同年10月7日—10日，几内亚和佛得角非洲独立党政治局委员、副书

记贝利拉一行，由省“和大”副会长、西安市副市长张锋伯迎送并陪同参观。

1965年3月5日—9日，南非泛非主义者大会代主席勒巴洛一行，由西安市副市长张雪涛迎送并陪同游览。

同年6月5日—9日，玻利维亚共产党学习团团员阿劳利一行，由西安市委书记处书记薛焰迎送并陪同游览。

同年8月6日—10日，莫桑比克革命委员会总书记古曼一行，由副省长林茵如迎送并陪同游览。

1966年5月3日—7日，澳大利亚澳共（马列）罗素一行，由省委书记处书记严克伦迎送并陪同参观。

同年5月28日—6月1日，日本社会党活动家代表团一行16人，由西安市副市长张雪涛迎送并陪同参观。

同年10月4日—6日，日本自由民主党国会议员访华团一行5人，由西安市副市长张雪涛迎送并陪同参观。

1967年7月2日—6日，日本自由民主党议员宇都宫德马一行，由省军区副司令员邢荣杰迎送并陪同参观。

1972年5月18日—20日，日本社会党活动家代表团一行12人，由西安市革委会副主任李广仁迎送并陪同参观。

1974年5月29日—30日，英国前首相，现保守党领袖爱德华·希思一行8人，随行记者14人，在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陪同下由上海来西安访问，抵离时省、市革委会主要负责人李瑞山、孙长兴及有关方面负责人共9人迎送，孙长兴等陪同参观西安人民搪瓷厂、省博物馆、大雁塔，李瑞山在丈八沟宾馆宴请了希思一行。

1975年2月4日—8日，应中共中央邀请的波兰共产党总书记米雅尔和秘书科奇一行，由中联部张全忠等5人陪同，从洛阳乘公务车来西安，参观访问了西安高压电瓷厂、八路军办事处纪念馆，游览了名胜古迹。2月8日中联部副部长张香山专程来西安，陪同波兰代表团乘专机去桂林。省委第一书记李瑞山设宴招待波兰代表团。

1978年4月14日—16日，葡萄牙共产党总书记维拉尔一行，由省外办主任鲁曼迎送并陪同参观。

同年11月21日—22日，秘鲁共产党代表团埃尔南·罗哈斯一行3人，由省委和省外办有关负责人迎送并陪同参观。

1979年4月至9月，由省委和省外办有关负责人接待的有：印度前进同盟西孟加拉邦副主席曼德尔一行；印度共产党（马列）拉马拉奥一行；以米斯拉为首的印度共产党（马列）杜特派代表团一行3人；美国民主党参议员亨利·杰克逊一行；苏里南共产党（马列）主席汉弗莱·基尔菲尔德一行3人。

1980年10月2日—3日，赞比亚联合民族独立党总书记迈因扎·乔纳及夫人等一行26人，省委书记章泽迎送并陪同参观。

1982年3月13日—17日，荷兰共产党政治局委员尤普·沃尔夫一行2人，由中联部苏子南全陪省外办主任鲁曼迎送并陪同参观。

同年4月11日—13日，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员朱·巴叶塔夫妇一行2人，由中联部部长李一氓全陪，省外办副主任孙铭迎送陪同。

同年5月30日—6月2日，联邦德国社会民主党司库哈尔斯腾贝格一行2人，由中联部王务安全陪，省外办主任鲁曼迎送并陪同参观。

同年6月8日—10日，荷兰共产党主席胡克斯特拉一行2人，由中联部副部长钱李仁全陪，省外办主任鲁曼迎送并陪同参观。

同年7月13日—15日，意共中央委员、国际政策研究中心书记罗马诺莱达率意大利共产党访华团一行4人，由中联部张治宇全陪，省外办主任鲁曼迎送并陪同参观。

同年9月1日—3日，联邦德国社会民主党埃贡·巴尔主席一行3人，由中联部曹俊杰全陪，省外办主任魏明中迎送并陪同参观。

同年9月23日—26日，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报告员、罗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阿·萨博一行2人，由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聂景德、省外办宣传处处长王廉元迎送并陪同参观座谈。

同年10月3日—6日，意大利共产党休假团保罗·布法利尼一行4人，由中联部顾问冯铨全陪，省外办副主任孙铭迎送并陪同参观。

同年10月10日—13日，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一行7人，由中联部萧棣华全陪，省外办副主任黄叔宽迎送并陪同参观和专访活动。

同年10月17日—19日，法国共产党总书记乔治·马歇一行10人，随行记者13人，由中联部副部长钱李仁等全陪乘专机抵达西安，省委书记谢怀德、西安市委第一书记何承华迎送。省委第一书记马文瑞在陕西宾馆招待该团共进晚餐。

同年11月26日—27日，朝鲜劳动党代表团团长金永南（政治局委员、



党中央书记)一行12人,由中联部部长乔石全陪,省委书记张方海、省委常委朱平、省外办副主任白玉峰迎送并陪同参观。

1983年2月18日—21日,圣马力诺共产党中央代表团圣共主席吉尔多·加斯塔罗尼一行3人,由中联部曹俊杰全陪,省委书记周雅光迎送作陪。

同年4月9日—11日,瑞典左翼党(共产党)中央代表团主席拉尔斯·韦尔纳一行3人,由中联部朱良全陪,省委书记周雅光迎送作陪。

同年5月8日—11日,厄瓜多尔民主党代表团党主席弗朗西斯科·韦尔塔一行6人,由中联部刘培根全陪,省外办副主任孙铭迎送作陪。

同年6月24日—26日,罗马尼亚“斯·乔治乌学院”代表团,罗共中央执委委员杜米鲁特·波佩斯库一行4人来访,由中联部韩树英全陪,省委党校副校长阮迪民接待。

同年7月2日—5日,法国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共产党书记处书记勒内·罗德里格兹一行6人,由中联部李眉全陪,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方杰迎送作陪。

同年7月9日—11日,意共积极分子代表团瓦斯科·贾诺蒂一行11人,由中联部苏子南全陪,省外办主任魏明中迎送作陪。

同年8月5日—6日,孟加拉国共产党联盟访华团比马尔·比斯瓦斯一行4人,由中联部赵粟陪同,省外办副主任高智迎送并陪同参观。

同年8月6日—9日,西班牙共产党前总书记圣地亚哥·卡里略一行8人,由中联部何英健全陪,省外办主任魏明中迎送并陪同参观。

同年8月11日—14日,法共马列干部团中央委员阿兰·费路一行8人,由省外办调研室副主任王克致迎送作陪。

同年8月17日—18日,意共总书记恩里科·贝林格一行9人,由中联部顾问冯铨全陪,省委书记周雅光迎送并陪同参观。

同年10月10日—12日,圣马力诺社会党主席贾克米尼一行3人,由中联部王庆忠全陪,省外办主任魏明中迎送并陪同参观。

同年12月4日,秘鲁人民行动党代表团人民党副总书记、众议员梅亚西亚一行2人,由中联部李北海全陪,省委常委李森桂迎送。

同年12月19日—31日,上沃尔特共产党全国执委伯纳德·塔夫特率访华团一行4人来访,由中联部李宗英全陪,省外办副主任何克敬陪同。

1984年7月26日—29日,墨西哥统一社会党代表团希尔维托·林孔·加里亚多一行5人,由中联部宋文全陪,省外办副主任孙铭迎送并陪同参观。

同年8月23日—26日，欧洲自由民主党联盟代表团德克莱克（比利时副首相、财政大臣）一行18人，由中联部吴晓达陪同，副省长张斌迎送并陪同游览。

同年8月29日—31日，日本社会党青年访华团以书记长田边诚为团长一行181人，由中联部贾棣镠全陪，省委研究室岳松华迎送并陪同游览。

同年9月8日—11日，哥伦比亚自由党领导人巴尔科一行3人，由省外办副主任何克敬迎送。

1985年5月3日—5日，日本自民党干事长中曾根康弘一行10人，由中联部李福德全陪，省委副书记、省长李庆伟迎送。

同年5月10日—12日，斯里兰卡新兰卡共产党书记处书记卡里亚南达，由中联部张志彬全陪，省外办副主任孙铭迎送。

同年5月23日—24日，突尼斯社会主义宪政党代表团哈迪巴库什一行10人，由中联部沈昌纯全陪，省委副书记周雅光、省委常委梁琦、省外办主任陈兴亮迎送并陪同参观。

同年6月10日—12日，瑞士劳动党中央代表团阿尔芒·马尼安一行5人，由中联部王麟进全陪，省委副书记牟玲生迎送。

同年7月5日—7日，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国际部副部长雅克·德尼率领法共领导人休假团一行6人，由中联部王麟进全陪，省外办副主任秦元恺迎送并陪同参观。

同年7月16日—20日，比利时共产党政治局委员雅克·莫安斯一行2人，由中联部唐伯新陪同，省外办副主任秦元恺迎送。

同年7月25日—27日，意共积极分子代表团马尔科·博西奥一行11人，由中联部苏子南全陪，省委副书记张勃兴迎送。

同年7月26日—29日，墨西哥统一社会党代表团希尔维托·林孔加里亚多一行5人，由中联部宋文全陪，省外办副主任孙铭迎送。

同年8月4日—7日，泰国各党派代表团坡亚纳一行26人，由中联部申建、沙里全陪，省外办主任魏明中、副主任秦元恺迎送作陪。

同年8月10日—13日，墨西哥统一社会党政治局委员马丁内斯·贝尔杜戈一行2人，由中联部张致祥、张丙蒙全陪，省外办副主任秦元恺陪同参观。

同年8月12日—15日，圣马力诺共产党政治局委员格洛利亚娜·拉诺基尼一行4人，由中联部夏方林全陪，省外办副主任刘步云迎送。

同年9月10日—12日，黎巴嫩工人解放阵线代表团总书记、社会进步党劳工局长阿里·贾比尔一行2人，由全国总工会罗毅陪同来陕参观。

同年9月21日—23日，巴西民社党代表团奥梅罗·桑托斯总书记一行23人，由中联部朱善卿全陪，省委常委陶钟迎送。

同年10月24日—26日，法国社会党干部团吉·阿鲁什一行12人来访，由省外办副主任秦元恺迎送并陪同参观。

同年10月30日—31日，民主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副主席京特·克莱伯一行22人，由中联部赵民生全陪，副省长张斌、省外办主任陈兴亮迎送。

同年10月30日—11月1日，土耳其祖国党副主席哈利尔·史夫根一行6人，由中联部张致祥陪同，副省长张斌迎送。

1986年5月至12月，接待来自9国12批党派组织的代表团，其中有：比利时劳动党主席吕多·马顿斯一行；朝鲜劳动党中央书记黄长焯一行；墨西哥工人联合会总书记菲德尔·贝拉斯一行；哥伦比亚新自由运动领导人、参议员路易斯·卡洛斯一行；法国共产党中央书记、政治局委员保尔·洛朗一行；意大利共产党中央书记朱·安·基亚兰特一行；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恩里克·库列尔一行；圣马力诺共产党中央监委主席朱赛佩·伦茨一行；委内瑞拉民主行动党总书记一行；法共中央书记、政治局委员加斯东·普利桑尼埃一行；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阿尔弗雷多·雷克林一行；法国社会党第一书记利奥内尔·若斯潘一行等党宾来陕参观游览，访问座谈。

二、1987—1991年按照党宾接待工作礼仪改革的要求，共接待来自68个国家71批459人，其中分别为：

1987年1月至12月，接待来自13国18批98人，他们是：日本国会自民党众议员访华团大石正光一行9人；意共《团结报》负责人维托利奥·坎皮奥内和意共波伦亚省委书记乌戈·马扎一行；比利时社会党代表团主席居伊·斯皮塔尔斯一行3人；马提尼克共产党总书记阿芒·尼古拉一行4人；澳大利亚工党执委克利斯朵夫·沙赫特夫妇；意共干部团中委卢奇亚诺·佩蒂内里一行12人；荷兰工党杨·普龙克副主席一行4人；墨西哥统一社会党豪尔赫·莱戈雷塔夫妇；法共领导人安德烈·拉汝瓦尼一行3人；西班牙共产党领导人阿尔卡拉斯夫妇一行；印度共产党女干部代表团阿希莉·兰格奈卡尔一行4人；意共领导人雷纳托·赞盖里一行2人；刚果劳动党中央书记达尼埃尔·阿比比一行6人；罗马尼亚社会主义民主团结阵线副主席约瑟夫·乌拉尔

一行7人；比利时劳动党工人干部访华团高尔·若里斯一行9人在西安访问后并赴延安参观；日本社会党活动家第三次访华团粕谷照美一行8人；日本社会党委员长土井多贺子一行21人；委内瑞拉基督教社会党代表团莱昂纳多·费雷尔一行。

1988年1月至12月，接待来自20个国家和地区的党派团组22批115人，他们是：瑞典保守党主席卡尔·比尔特一行5人，由外交学会陕西分会出面接待；希腊左翼党代表团中央书记基尔科斯一行4人；联邦德国联盟议会党团第一副主席、基社盟联邦议员小组主席魏格尔一行3人；黎巴嫩自由国民党主席夏蒙一行4人由省友协接待；挪威保守党代表团一行6人由外交学会陕西分会接待；洪都拉斯基民党代表团一行4人；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团成员埃贡·巴尔一行8人；意大利共产党干部团一行10人；民主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联络部副部长布鲁诺·马洛一行2人；英国工党议员代表团一行7人；芬兰共产党机关报《人民新闻》主编高尔霍宁一行2人；美国共和党、民主党两党高级代表团一行25人；新西兰反对党领袖博尔格一行4人由外交学会陕西分会接待；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斯蒂芬·尼诺夫率领的休假团一行6人；卢森堡共产党代表团一行3人；欧共体委员会副主席安德森一行4人；圣马力诺共产党代表团一行4人；意大利共产党党校代表团一行5人；朝鲜劳动党国际部代表团一行5人；法国社会党市长议员代表团一行11人；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报告员格·斯普林采洛尤等一行2人；秘鲁左派联盟主席巴兰特斯一行。

1989年2月至12月，接待来自11个国家的14批92人，他们是：巴西共产党主席萨洛芒·马利纳一行3人；澳大利亚工党党员代表团一行11人；澳大利亚民主党领袖一行4人；以色列统一工人党政治书记扎邦夫妇；保加利亚共产党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外委会主席米尔科·巴列夫为团长的代表团一行11人；土耳其社会民主人民党主席伊诺努一行11人；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中央总务部长普洛丹·斯托扬诺夫率领的休假团一行7人；墨西哥社会党参观团一行13人；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休假团一行12人；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亚太研究中心主任梅尔瓦一行3人；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主席团委员什捷潘为首的休假团一行6人；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党校代表团一行5人；美共代表团一行3人；匈牙利社会党中国问题专家叶桐。

1990年4月至11月，接待9个国家的10批58人，他们是：塞舌尔人民进步阵线代表团一行3人；黎巴嫩社会进步党副主席亚杰一行2人；秘鲁人

民行动党总书记德尔阿吉拉一行6人；瑞士劳动党总书记斯皮尔曼一行3人；比利时劳动党工人干部团一行8人；印度共产党书记处书记P·拉玛钱德兰一行4人；波兰社会民主党最高委员会委员斯·加勒列尔斯基一行4人；意大利众议院天民党党团主席斯科蒂一行21人；日本社会党北海道本部访华团一行5人；黎巴嫩社会进步党主席琼布拉特一行2人。

1991年3月至11月间来访的15个国家党派组织17批96人，他们是：法国保卫共和联盟总书记阿兰·朱佩一行5人；秘鲁基督教人民党领袖贝多亚一行5人；智利基民党代表团一行4人；日本社会党国会议员代表团一行8人；巴西民族复兴党代表团一行9人；哥伦比亚自由党议员代表团一行2人；乌拉圭白党代表团一行2人；新西兰工党代表团一行8人；巴西民主工党代表团一行6人；西班牙共产党代表团一行4人；苏共党的农业工作者代表团一行6人；意大利社会党代表团一行7人；荷兰共产党政治局委员兼国际书记德波夫妇，专程参观了张学良与杨虎城公馆旧址、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新西兰国民党代表团一行10人；乍得爱国拯救运动执行书记穆喀塔尔·巴萨尔一行4人；阿根廷激进党代表团一行6人；印度国大党（英）代表团一行8人。

综合各团组来陕游览和访问的范围，多数系名胜古迹，少数参观了工厂、专访了农村，以及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张学良与杨虎城公馆旧址，有的还进行了专题座谈等。

#### 第四节 部长级团组

1960—1991年，各国和地区部长级官员来访，省、市党政军负责人出面接待情况如下：

1960年10月11日—14日，英国蒙哥马利元帅一行15人，由中国国防部副部长李达上将陪同来西安、延安参观访问，抵离时，省委候补书记赵守一、西安市委第一书记张策、副省长李启明、时逸之迎送并宴请。

1961年3月6日—8日，以苏联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第一副主席阿希波夫为团长一行8人，副省长李启明迎送并宴请。

1964年2月25日—29日，朝鲜劳动党军委副委员长李永镐大将来访，省委第一书记张德生、省军区司令员胡炳云迎送并宴请。

同年4月10日，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地质总局局长郑福来一行5人，

由中国地质部部长何长工陪同来西安访问，主要考察了西安石油仪器厂。

同年11月8日，阿尔巴尼亚矿产地质部第一部长泽内尔·哈尔提一行5人，由中国石油工业部副司长沈晨陪同，考察西安石油仪器厂。

1965年9月20日—25日，马里发展部长库亚特及夫人一行5人来访，副省长惠世恭迎送并宴请。

同年11月28日—30日，巴基斯坦空军司令努尔汉中将一行11人来访，省军区司令员胡炳云、副司令员王明坤、徐立树、副省长林茵如、西安市市长徐步迎送并宴请。

1974年1月12日，阿尔巴尼亚工矿部副部长紫尼里哈密蒂一行11人，在中国冶金工业部副部长叶志强陪同下，来陕西考察宝鸡石油钢管厂。

1979年4月6日—8日，新加坡吴庆瑞部长夫妇等一行9人来访，由省委书记章泽、西安市委秘书长阎明迎送。

同年4月30日—5月1日，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一行11人来访，抵离时省革委会副主任章泽、省外办主任鲁曼迎送并宴请。（基辛格博士和夫人以后曾于1985年11月11日—14日、1987年9月4日—5日再度访问过西安。）

同年6月至7月省外办还接待了以日本法务大臣古井喜实为团长一行21人来访和以斯里兰卡外长哈密德为团长一行8人来访。

1981年4月至10月共接待了4国55人来访，他们是：阿塔努部长率领尼日利亚访华团一行3人，在西安、临潼、乾县等地参观考察旱原地区地下水资源与开发利用。英国外交大臣卡林顿勋爵一行12人来访，省、市有关部门负责人陈明、魏明中、李国富、柯华、林颖宴请并迎送。加拿大外长马克·麦圭根博士及夫人一行35人，由中国外交部朱启祯、杨经生陪同来访、省外办主任鲁曼宴请并迎送。刚果文化艺术科研部部长让·巴蒂斯特·塔蒂卢塔一行5人，由中国对外文委王仲方陪同来西安参观访问，副省长李连璧迎送。

1982年2月至10月接待来访的5国47人，其中：以罗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委员、部长科尔内尔·布尔蒂卡为团长的罗马尼亚政府贸易代表团一行10人，由中国外交部陈洁陪同来访，省、市负责人王真、魏明中等迎送并设宴招待。以欧拉伍尔·约翰内松为团长的冰岛共和国外长访华团一行6人，由中国外交部张颖陪同来访，省外办主任鲁曼宴请并迎送。巴巴多斯外长塔尔一行3人，由中国外交部陶大剑陪同来访，省外办副主任高智宴请并迎送。

哥伦比亚外长卡洛斯·莱莫斯·西蒙兹一行 16 人，由中国外交部赵中一、陶大台、杨增业陪同来访，鲁曼、马保奉宴请并迎送。苏联副外长伊利切夫一行 12 人，由中国外交部长钱其琛陪同来访，省外办主任魏明中宴请并迎送。

1983 年 7 月至 12 月有 3 国 20 人来访，他们来自：尼日尔发展社会全国委员会代表团主席穆穆尼·杰尔马科耶·阿达穆少校一行 6 人，由邓秀梅全陪，省外办副主任白玉峰迎送并陪同参观。阿尔及利亚文化部长阿卜杜勒·马吉德·梅齐亚纳一行 7 人，由中国文化部外联局耿自力陪同，来西安访问，副省长孙达人会见。英国大主教伦西博士一行 7 人来访，王建镐、魏明中宴请并迎送。

1984 年 2 月至 12 月接待了来自 25 国 34 批 314 人，其中泰王国 3 批 79 人、丹麦王国 3 批 21 人、日本国 4 批 43 人、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 2 批 12 人、澳大利亚 2 批 11 人、英国 2 批 19 人，主要团组是：泰国外长西扎西提·沙卫西拉空军上将一行 33 人，由中国外交部沈平陪同来访，省外办主任魏明中宴请并迎送。中美联合经济委员会第四次会议美方代表里甘（美财政部长）一行 5 人来访，由副省长张斌宴请并迎送。丹麦王国文化大臣米末·雅可布森一行 9 人，由中国文化部外联局处长王效平和关殿君、王效宁陪同来西安访问，省文化文物厅厅长李若冰、省外办副主任孙铭、省文化文物厅副厅长陈全方迎送，副省长孙达人会见并宴请。澳大利亚内务和环境部长巴里·科恩一行 5 人来访，省文化文物厅厅长李若冰和省外办副主任孙铭迎送，副省长孙达人会见并宴请。奥地利科研部长海因茨·菲舍尔博士一行 7 人来访，省科委和省外办迎送并宴请。意大利教育部长弗郎卡·法尔库奇（女）一行 6 人来访，省高教局和省外办迎送并宴请。挪威国防司令斯文·豪格上将一行 4 人来访，傅加平、冀廷璧迎送并宴请。巴基斯坦海军参谋长塔立克·卡迈勒·汗上将一行 5 人来访，马新春、冀廷璧迎送并宴请。马来西亚外长坦·斯里·加扎利·沙菲一行 23 人，由中国外交部张德维陪同来访，省外办主任魏明中迎送并宴请。尼泊尔首席法官纳因·巴哈杜尔·卡特里来访，宋光、焦朗亭宴请并迎送。丹麦王国税收大臣伊希·福格一行 4 人来访，省财政厅和省外办迎送并宴请。英国国防情报总局副局长阿米塔奇空军中将一行 3 人来访，张中如、高本宗迎送并宴请。英国对外经济事业部部长伯纳为团长的英国政府经济代表团一行 16 人来访，郑松南迎送并宴请。秘鲁共和国空军总司令恩里科中将一行 7 人来访，刘振盛迎送并宴请。澳大利亚司法部部长埃文斯一行 6 人来访，徐景峰、刘颖迎送并宴请。日本前外相宫泽喜一一行

21人，由中国外交部杨振亚陪同来访，省外办主任魏明中迎送并宴请。以罗共中央委员、邮电部长瓦西里·布鲁卡为团长的罗马尼亚运输邮电部代表团一行9人来访，李森茂迎送并宴请。比利时弗拉芒地区内政大臣加尔一行4人来访，王庆忠、魏明中迎送并宴请。巴基斯坦外长雅各布·汉及夫人一行7人，由中国外交部王传斌陪同来访，魏明中迎送并宴请。摩洛哥王国文化大臣萨伊德·贝勒巴希尔一行3人，由中国文化部外联局张连荣、王中炎陪同来西安访问，省文化文物厅厅长李若冰迎送，副省长孙达人宴请。泰国外长西提·沙卫西拉一行40人来陕西访问。斐济教育部长阿里夫妇由文化部外联局梁明陪同来访，省文化文物厅副厅长陈全方迎送，副省长孙达人宴请。美国海军部长约翰·莱曼一行11人来访，张中如、侯锐迎送并宴请。丹麦王国内政大臣布列塔·霍尔一行8人来访，省卫生厅厅长张铝重迎送并宴请。日本文化大臣森喜朗夫妇一行6人来访，李滔、陆建平迎送并宴请。冰岛文化教育部长拉格恩希尔杜尔·海尔加多蒂尔一行6人，由中国文化部外联局崔华唐陪同来西安访问，省文化文物厅副厅长陈全方迎送，厅长李若冰宴请。日本运输大臣细田吉藏一行12人来访，孙毓贤、酆长春迎送并宴请。约旦城乡环境事务大臣纳布希一行5人来访，孙肇卿宴请并迎送。委内瑞拉陆军司令何塞·安东尼奥·奥拉瓦利亚一行5人来访，冀廷璧迎送并宴请。智利外长海梅·德尔瓦列·阿达德一行15人，由中国外交部俞成仁陪同来访，省外办副主任何克敬迎送并宴请。日本文化厅长官铃木勋一行4人来访，由中国文化部外联局吴熙华陪同，省文化文物厅厅长李若冰迎送，副省长孙达人会见并宴请。墨西哥外长贝尔纳多·赛普尔维达·阿莫多硕一行6人，由中国外交部沈允熬陪同来访，省外办副主任何克敬迎送并宴请。土耳其外长瓦希特·哈莱夫奥芦一行7人，由中国外交部詹世亮陪同来访，省外办副主任孙铭迎送并宴请。联邦德国土地规划建设与城建部国务秘书（副部长级）弗里德里希·阿道夫·扬博士一行3人来访，省外办副主任孙铭迎送并宴请。以泰国教育部长川·里·沛为团长的教育代表团一行6人来访，张克忍迎送并宴请。

1985年2月至12月，共接待26国44批323人来访，其中美国6批45人；斯里兰卡民主社会主义共和国3批14人；民主德国4批36人。主要团组有：厄瓜多尔财政部长弗朗西科·斯维特一行6人来访，省财政厅和省外办接待。埃及电力能源部部长阿巴扎一行6人来访，由乐耀曾陪同参观。斯里兰卡文化部长胡鲁拉率文化代表团及驻中国大使夫妇一行7人，来西安参



观访问，省文化文物厅厅长李若冰、省外办副主任孙铭迎送。联邦德国审计法院院长卡尔·维特洛克一行3人，由国家审计署王承祜陪同来西安访问，省审计局副局长孟宪迎送并陪同参观，副省长曾慎达会见并宴请。意大利国防部部长斯帕多利尼一行7人来访，张立明、魏明中宴请并迎送。丹麦王国外交大臣乌弗·艾勒曼彦森一行29人，由中国外交部姜恩柱陪同来访，省外办主任陈兴亮宴请并迎送。丹麦中央合作委员会马丁·尼尔森（副部长级）一行7人来访，刘文科迎送并宴请。美国移民总局局长纳尔逊一行3人来访，曹履和陪同、艾绳章迎送并宴请。圣马力诺外长焦尔达诺·布鲁诺·雷菲一行6人，由中国外交部穆钦舞陪同来访，省外办主任陈兴亮迎送并宴请。厄瓜多尔外长埃德加·特兹一行9人，由中国外交部黄土康陪同来访，陈兴亮迎送并宴请。澳大利亚审计长莫纳汉一行3人来访，省审计局副局长孟宪迎送并陪同参观游览、副省长孙克华在人民大厦会见并宴请。英国海军参谋长菲德尔豪斯一行5人来访，冀廷璧等迎送并在人民大厦设宴招待。智利文化部长奥拉西奥·阿朗吉斯·多诺索一行5人来访，由中国文化部外联局吴涤陪同来西安参观游览。斯里兰卡总监察长西瓦·帕苏帕蒂一行2人来访，何侠迎送并宴请。民主德国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家计委主席许雷尔罗斯特一行21人来访，陈光、张勃兴、陈兴亮迎送并宴请。民主也门建设部长萨姆兰一行2人来访，谢权武迎送并宴请。斯里兰卡联合作战司令维拉道加中将一行5人来访，省军区高本宗迎送并宴请。巴基斯坦少将阿里（副部长级）一行6人来访，李鸿厚迎送并宴请。以泰国政府国务部长甲蒙·通探玛察率泰国青年代表团一行11人来访，团省委副书记姚毅迎送并宴请。马达加斯加工程部长唯克托·拉马阿塔一行4人来访，李文光迎送并设宴招待。法国外长罗朗·迪马一行18人来访，梅兆荣、陈兴亮迎送并宴请。美国前国务卿埃登业·马斯基一行12人来访，省外办副主任何克敬迎送并宴请。英国审计长戈登·道尼爵士一行4人，由国家审计署局级审计员张培宏陪同来访，省审计局副局长孟宪迎送，副省长孙克华在人民大厦会见并宴请。马里农业部长伊萨·翁戈伊巴一行5人来访，省农牧厅负责人迎送并宴请。匈牙利中央统计局局长维拉·尼特拉伊一行3人来访，铁大章迎送并宴请。美国商务部副部长立德尼·琼斯一行3人来访，省经贸厅迎送并宴请。民主德国教育部长伯梅一行4人来访，李健、陆建平、张克忍迎送并宴请。澳大利亚国防军司令菲利浦·贝内特上将一行4人来访，王志斌、王志成迎送并宴请。意大利国防总参谋长尤厉奇中将为团长的军事代表团一行5人来访，厉万里迎送并

宴请。加拿大卫生社会福利部长杰克·埃普一行 10 人来访，刘益民、艾奇玉迎送并宴请。南斯拉夫内务部长多布罗斯拉夫·丘拉菲奇一行 7 人来访，惠平、徐山林迎送并宴请。美国空军参谋长加布里埃尔上将一行 17 人来访，马占民、王希斌、厉万里宴请并迎送。民主德国文化代表团库尔特·勒夫勒（副部长级）一行 4 人来访，省文化文物厅负责人迎送并宴请。民主德国地质部部长博赫曼一行 7 人来访，毛建华迎送并宴请。泰国陆军少将吉特一行 12 人来访，刘自忠迎送并宴请。约旦哈希姆王国首都安曼市市长阿卜杜·拉乌夫·拉瓦代一行 6 人来访，徐劲国迎送并宴请。以朝鲜民主女性同盟副委员长康宽善为团长的朝鲜女盟代表团一行 15 人来访，白海兰、张秀绒迎送并宴请。联邦德国农林粮食部部长伊·基希勒一行 14 人来访，省农牧厅负责人迎送并宴请。西班牙国防部两位将军爱德华·穆尼、利亚戈麦巴·拉奥纳·加里多一行 3 人来访，许怀民、魏明中迎送并宴请。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一行 8 人来访，李宝成、陈兴亮迎送并宴请。以李秀贤少将为团长的朝鲜人民军总装备代表团一行 10 人来访，厉万里迎送并宴请。波兰物资部副部长赫伯达一行 2 人来访，省物资局负责人迎送并宴请。瑞典王国外贸大臣马茨·海尔斯特罗姆来访，省经贸厅负责人迎送并宴请。

1986 年 2 月至 12 月，接待来自 16 国 22 批 95 人，其中挪威王国 2 批 20 人，民主德国 2 批 8 人，泰王国 2 批 5 人。主要团组有：南斯拉夫副外长隆查尔一行 2 人来访。苏联高等和中等专业教育部副部长马卡罗夫来访，参观了西安交大、西工大等高校。挪威王国外交大臣斯文·斯特雷一行 7 人来访。美国能源部部长赫林顿夫妇一行 3 人来访。爱尔兰文化部长尼伦一行 3 人来访，参观了西安电影制片厂。智利第一副外长科瓦鲁维亚斯一行 5 人来访。马来西亚财政部长达伊姆·扎伊努丁一行 5 人来访。匈牙利文教部副部长拉特考伊率领政府文化代表团一行 4 人，由文化部外联局马玉琪等陪同来西安参观访问，副省长孙达人会见。民主德国文化部长汉斯·约西姆·霍夫曼率领政府文化代表团一行 5 人來西安参观访问，副省长孙达人会见。民主德国国民教育部部长玛格特·昂纳克夫人一行 3 人来访。巴西科技部长雷纳扎·阿谢尔一行 5 人来访。泰国司法部次长差瓦·朱帕尼一行 4 人来访。尼泊尔外交大臣乌帕德亚雅一行 4 人来访，参观了西北国棉四厂等。联邦德国经济部长马丁·班格曼一行 5 人来访。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教育文化部长莉·达科斯一行 5 人来访，副省长孙达人会见。应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邀请的国际友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顾问——荷兰著名电影导演伊文斯，专程

来陕西拍摄他本人创作的反映中国当代风貌及历史艺术纪录片《风》，省委书记白纪年会见，副省长林季周等迎送。新加坡总检察长陈文德一行来访。泰国内务部次长披讪·蒙沙达拉沙吞来访，参观了大明宫乡。西萨摩亚经济发展部长唐加洛夫夫妇来访，参观了名胜古迹。挪威王国外交大臣斯特雷一行13人，来西安参观访问。几内亚新闻文化部长扎因·萨努西来访，参观了咸阳彩色显像管厂等。捷克斯洛伐克外交部长赫努佩克一行15人来访，参观了西安炭市街副食商场等。

1987年2月至11月，接待来访的共6国6批26人，其中：乍得全国独立和革命联盟代表团执行局委员、矿业和动力部长阿杜姆·穆萨·赛义夫一行4人来访，参观了名胜古迹，访问了农贸市场、咸阳彩色显像管厂、礼泉县烟霞乡袁家村。尼日尔共和国矿业能源部部长萨尼·库图比一行3人，由省煤炭厅厅长刘揆楚迎送，副省长曾慎达会见并宴请。客人专访了西安市民用煤加工厂，游览了名胜古迹。贝宁人民共和国文化、青年、体育部长乌斯曼·巴托科一行2人，由国家文化部外联局殷建国、田薇陪同，来西安访问，副省长林季周会见并宴请。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和夫人等一行8人来访，参观了秦俑馆、省博物馆。约旦哈希姆王国外交大臣塔西阿·马里斯一行3人来访。日本外务省官员访华团一行9人，参观了名胜景点。菲律宾教育、文化、体育部部长兼总统文化艺术委员会主席基松兵一行5人，驻中国使馆文化参赞林东民，由国家文化部外联局吴崢陪同来西安访问，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力贞会见并宴请。

随着对外开放形势的发展和礼仪改革进一步拓宽，各厅局、地市业务活动范围，除省级有关领导出面迎送、会见和宴请来访者之外，一般来访团组按计划向省外办涉外管理处备案，则自行安排接待、交流业务。从1988年起本志仅辑录其团组所涉简况。

1988年1月至11月，共接待17国21批241人来访，其中有：意大利司法部部长朱亚诺·瓦萨利一行7人来访。美国卫生和人类服务部部长一行12人来访。巴基斯坦文化旅游部部长穆罕默德·汗一行10人来访。巴西外长罗贝托·德·阿布雷乌·索德雷一行13人来访。摩洛哥王国政府文化大臣穆罕默德·本·伊萨一行19人，由国家文化部外联局处长王贵发、张崇华陪同来西安访问，省文化厅厅长霍绍亮迎送，省长侯宗宾会见并宴请。巴西陆军部长一行5人来访。秘鲁陆军总司令一行5人来访，参观了西安803厂。土耳其空军司令楚哈上将一行4人来访，参观了西安空军工程学院。马里计划部长

一行5人来访，参观了西北国棉四厂等。意大利最高法院第一院长一行59人来访，参观了西安美术陶瓷厂等。美国国防部长卡卢奇一行40人来访，参观了部分文物景点。波兰文化艺术部长克拉夫楚克一行7人，由国家文化部外联局欧洲处处长马玉琪、梁全炳陪同来西安访问，副省长徐山林会见并宴请。马耳他共和国基础发展部部长一行3人来访。哥伦比亚教育部长贝赛拉一行2人，由国家文化部外联局钱兆利、张毅陪同来西安参观，副省长孙达人宴请。卢森堡文化大臣（兼司法、环境大臣）克里普斯一行3人，由国家文化部外联局李国庆、邹启山陪同，副省长孙达人宴请。冰岛交通部长马蒂耶森一行4人来访，参观了名胜古迹。委内瑞拉国防部长一行6人来访。哥伦比亚公共工程部部长一行5人来访，参观了西安、临潼的名胜。马来西亚文化旅游部长沙巴鲁丁·吉一行20人，由国家文化部外联局郭宝颖、李士君、翟德玉陪同，副省长孙达人会见并设宴招待。厄瓜多尔第一副外长马里奥·阿莱曼夫妇一行4人来访，参观了秦俑馆、华清池、省博物馆、城墙、大雁塔。匈牙利外长瓦尔科尼·彼得一行6人来陕参观游览。

1989年3月至10月，来自7国7批62人来访，其中有：新西兰外长马歇尔一行7人来西安访问。埃塞俄比亚劳动和社会事务部部长一行7人来访，参观了省博物馆、清真寺等。芬兰共和国贸易工业部部长苏奥米宁一行17人来陕。访问了西安造纸机械厂、省微生物所，由省科委主任周延海、副主任李云祥迎送并宴请。法国国防部长舍韦内芒及夫人一行12人来访。苏联文化部副部长尤·米·希利切夫斯基一行8人，由国家文化部外联局袁学、张有琛陪同，副省长孙达人会见并设宴招待。民主德国矿山冶金钾盐部部长一行7人来访。塞内加尔共和国文化部长姆斯塔德·卡一行4人，由国家文化部外联局徐希忠、苏旭陪同，副省长孙达人会见并宴请。

1990年4月至10月，共接待4国4批12人来访，其中：印度总检察长一行4人来西安，访问了陕西省女监，并游览了名胜古迹。塞舌尔共和国外长丹尼埃尔圣·热尔一行2人来西安访问。马里共和国体育、艺术和文化部部长巴卡里·特拉奥雷一行3人，由国家文化部外联局张启常、苏旭陪同前来西安参观访问，副省长孙达人会见并宴请。乌拉圭共和国外长格罗斯比尔一行3人来西安访问。

1991年2月至12月，接待来自14国家和地区的14批103人，其中：印度外长舒克拉一行5人来访。罗马尼亚文化部长安德列·普雷舒一行5人来访，参观了陕西历史博物馆等。孟加拉国陆军参谋长努鲁丁·汗一行14人来

访。比利时王国发展援助部大臣安朱·金斯来访，出席西安杨森制药公司开工典礼。土耳其旅游部长一行5人来访。泰国最高司令部情报厅长查兰一行11人来访。泰国最高司令部保安司令一行24人来访。印度尼西亚矿业能源部部长吉南查尔一行15人来访。委内瑞拉共和国外长阿曼多·杜兰一行9人来访。法国对外安全总局局长一行6人来访。保加利亚国防部长穆塔夫奇耶夫一行8人来访，参观了西安飞机制造公司、西安卫星测控中心。西班牙最高法院院长萨拉一行3人来访。罗马尼亚军队总参谋长杜未特鲁·乔佛利纳一行6人来访，参观了西安卫星测控中心。朝鲜次帅吴振宇一行9人来访。英国外交国务大臣凯思纳斯一行6人来访。

### 第五节 国际组织

1964—1991年的27年间，国际或区域性组织代表29批296人来访，省、市党政军负责人出面接待情况如下：

1964年5月26日—6月5日，日本、印尼、美国、加拿大、比利时、瑞典、尼泊尔等七国应聘专家一行17人，由北京来陕西参观，西安市副市长张锋伯迎送。

1979年7月14日—19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秘书处文化研究处负责亚洲文化专员河野靖（日本人），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秘书处李嘉昭和国家文物局吕济民陪同来西安访问。

1980年7月2日—5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记者一行20人，由中国教科文委员会孙敏、雷云陪同来西安参观访问，省文物局副局长马克逊等迎送。

1981年4月28日—29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交流处处长扎埃尔夫人，由国家文化部对外司孙琪璋、孙童林陪同来陕西访问。

同年6月12日，联合国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一行9人，由北京抵陕西参观，凌青青、魏明中、孙铭迎送。

1982年5月11日—13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机会均等科科长扎朗（巴勒斯坦人），由国家文化部对外司肖陆陪同来西安访问。

同年11月2日—4日，欧洲议员人口和发展会议米达尔（议员团团长）一行22人，由何理良、杜祥金、董英、孙铭、鞠秀珍迎送。

1983年4月11日—13日，西欧联盟议会总务委员会代表团弗雷德里克·贝内特爵士一行17人，由王楚良、高智迎送。

同年4月13日—15日，美国世界事务组联合国理事会访华团埃蒙德·哈达德一行17人，由余德强陪同来西安访问，省外办副主任高智迎送。

1984年3月31日—4月4日，联合国粮食理事会青少年之翼访华团威廉斯一行3人，由省农牧厅接待迎送。

同年4月3日—4日，欧洲议会对华关系代表团玛莉·雅克琳·德舒什一行49人，由李连璧、张瑞英接待迎送。

同年5月14日—16日，国际通讯卫星组织总干事理查德·柯林诺一行3人，由孙东山、崔岩迎送。

同年6月13日—15日，联合国副秘书长维兹纳夫妇一行，由姚英、魏明中迎送。

同年7月7日—9日，联合国行政预算咨委会姆塞尔主席一行2人，由马隆德、何克敬迎送。

同年10月2日—5日，欧洲共同体委员会副主席威廉·哈弗尔坎普一行9人，由国家经贸部三局、省经贸厅迎送。

同年10月17日—19日，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斯里瓦斯塔瓦夫妇一行，由钱永昌、李文光迎送。

1985年4月25日，联合国人民基金会主任萨拉斯一行，由省经贸厅迎送。

同年7月21日—23日，国际标准化组织秘书长斯特伦夫妇一行来访，由省标准局局长孔庆生迎送。

同年8月5日—6日，国际足联主席阿维兰热夫妇一行，由省体委主任雷志敏迎送。

同年8月5日—7日，联合国副秘书长鲁埃达斯一行2人，由省外办副主任刘步云迎送。

同年10月15日—18日，八国档案局（馆）长和外国学者一行17人，由国家档案局局长韩毓虎陪同来访，省档案局副局长苏盈迎送并陪同参观。

同年11月22日—24日，国际特殊奥运会会长史维法一行4人，由于景云、吕鼎章迎送。

1986年4月16日—18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莫尔斯夫妇一行，参观了秦俑馆、华清池、乾陵，专访了西安外国语学院。

同年6月13日—15日，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总干事夏松一行，参观了秦俑馆、华清池、西北国棉五厂、省博物馆。

同年9月8日—10日，欧洲共同体副主席阿瑟·考菲尔德勋爵一行3人，来西安访问。

同年10月14日—16日，世界穆斯林大会主席马鲁夫·达瓦利比博士一行，参观了秦俑馆、清真寺。

1987年5月11日—12日，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一行12人来访，参观了秦俑馆、西安外国语学院、省博物馆。

同年6月12日—14日，联合国考试团一行2人，参观了省博物馆、大雁塔、秦俑馆、城墙、清真寺。

同年9月2日—7日，亚洲议员人口和发展论坛第二次大会部分与会者一行13人，参观了西北国棉四厂、秦俑馆。

同年10月25日—27日，联合国纳米比亚事务专员伯恩特·卡尔逊一行，参观了秦俑馆、华清池、半坡遗址、省博物馆、大雁塔。

1988年3月22日—24日，联合国第42届大会主席民主德国副外长彼德·弗洛林一行4人，参观了秦俑馆、省博物馆、大雁塔、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

1989年4月12日—14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米歇尔·康德苏一行6人，参观了秦俑馆、秦陵、半坡遗址、省博物馆、大雁塔，观赏了书画表演。

1990年7月20日—26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丝绸之路综合研究”沙漠路线考察团一行17个国家代表68人（其中中国38人），随团来西安的有国家教委、外交部、文化部、广播电视部、社会科学院、文物局和甘肃、新疆等部门与省区的负责人，省、市党政负责人张勃兴、白清才、牟玲生、孙达人、袁正中等迎送。参加活动的有省政府办公厅、省委宣传部、省外办、省公安厅、省文物局、省教委、省文化厅、省广播电视厅、省财政厅、省社会科学院、省考古研究所、西安市。

考察团在西安期间考察了省博物馆、大雁塔、秦俑馆、半坡博物馆，汉、唐长安城文物景点、茂陵、乾陵、法门寺、周原博物馆、宝鸡博物馆等。

7月22日下午4时30分，在西安唐城宾馆举行开幕式，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丝绸之路项目协调员迪安主持、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夏尔玛专程来西安参加开幕式并发表讲演，国家教委副主任、教科文全会主席滕滕、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物局、外交部、文化部的代表，以及甘肃、新疆等省（区）的负责人和代表、省长白清才、副省长孙达人、西安市市长袁正中与陕西各

界人士共 300 余人出席。

7 月 25 日上午 8 时 30 分，在丝绸之路的起点，位于西安市西郊劳动路丝绸之路群雕像前，举行考察队启程式。由省外办主任张开臻主持，副省长孙达人授旗，赠送了“启信”（象征性的古代通行证），西安市市长袁正中致欢送词，至此，考察队在锣鼓、唢呐声中载歌载舞的欢送行列中踏上了丝绸之路的征途，7 月 26 日由宝鸡抵达甘肃天水市。

1991 年 3 月 11 日—13 日，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托尔维兹一行 5 人，参观了陕西历史博物馆、秦俑馆。

同年 4 月 21 日—23 日，联合国国际和平学院院长奥图努一行，参观了秦俑馆、华清池等。

同年 5 月 13 日—15 日，联合国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总干事布兰卡一行 3 人，参观了大雁塔、陕西历史博物馆、秦俑馆。

同年 6 月 15 日—16 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马约尔一行 4 人，参观了西安景泰蓝工厂、陕西历史博物馆、秦俑馆等。

同年 9 月 5 日—6 日，国际档案理事会主席法维埃夫妇参观了秦俑馆、大雁塔等。

同年 9 月 10 日—12 日，联合国副秘书长亚达尔夫妇一行，参观了秦俑馆、南城墙、大雁塔等。

## 第六节 使（领）馆

陕西省接待常驻中国的各国使（领）馆的外交官和公务人员（以下简称外国使领馆人员），始于 1952 年下半年。其主要团组是：

一、1952—1966 年的 14 年间，累计接待来自 94 国 47 批 229 人，其中：

1952 年 8 月 21 日—28 日，印度驻华大使潘尼伽夫妇及女儿和秘书一行 4 人来西安访问，参观了西北大学、西北大华纱厂、长安县寺坡村和省博物馆，游览了大雁塔、华清池；后去延安访问，主要是从各方面了解西北等地基本情况，特别注意民族和宗教问题。

1955 年 11 月 12 日，中国外交部第一次组织 18 国的外交使节团 37 人，由姬鹏飞副部长陪同（外交部工作人员 16 人）从北京乘火车到达西安。省人委时逸之秘书长、西安市人委张锋伯副市长、省交际处贺廷俊处长等到车站迎送，市人委何寓础秘书长向使节们介绍了市政建设。参观了西北国棉三



厂、西安第二发电厂，游览了华清池，印度大使夫妇专访了兴教寺。当晚副省长赵伯平以省人委名义，在西安人民大厦设宴招待使节团，出席作陪的有副省长张凤翔、韩兆鹗、成柏仁，省人委秘书长时逸之，西安市市长方仲如，副市长张锋伯、吴志渊、陈式玉，省妇联主任白凤梧，副主任李晋昭，交际处贺廷俊处长，宴会后使节们观看专场文艺晚会。使节团有苏联大使尤金夫妇、二秘罗曼宁，波兰大使基里洛克夫妇、随员瓦拉斯楼特，印度大使尼赫鲁夫妇、随员日春晖，蒙古大使奥基尔己持，朝鲜大使崔一，保加利亚大使迪英夫夫妇，阿尔巴尼亚大使赛纳尔夫妇，匈牙利大使其克拉丹夫妇，南斯拉夫大使波波维奇，罗马尼亚大使郭佐文、随员鲁明，瑞士公使贝努义夫妇，英国代办欧念儒夫妇，荷兰代办司曼，挪威临时代办季茂登夫妇，巴基斯坦参赞凯瑟，缅甸临时代办吴茂铎，印度尼西亚代办罗约尔多约，民主德国临时代办葛鲁特纳。使节团于11月13日晚11时乘车去宝鸡。

1956年接待来自4国驻京使馆人员5批9人。其中：3月6日—9日，印度共和国大使赖嘉文夫妇及参赞高伯登之夫人、一秘查理4人，由中国外交部崔烈副科长陪同，从北京乘民航飞机抵达西安。省人委时逸之秘书长，西安市方仲如市长，交际处贺廷俊处长到机场迎送。当天下午4时，大使一行赴新城黄楼拜会赵寿山省长及方仲如市长，时逸之、贺廷俊拜会时作陪。接着游览了市容，参观了钟、鼓楼和南郊文化区。晚7时，赵寿山省长在人民大厦设宴招待大使一行，方仲如、时逸之、贺廷俊、省文化局武伯纶副局长等作陪。大使一行在西安参观了西北国棉三厂，访问了堡子村“五一”农业合作社，专访了大雁塔、兴教寺并与诸法师座谈，了解宗教政策。3月9日下午2时乘班机去兰州。

6月22日，印度尼西亚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萨尼同其随员阿俾一行2人，由郑州乘火车到达西安。省交际处贺廷俊处长前往车站迎接。他们在西安游览了市容，参观了大雁塔、钟楼、鼓楼、新西北印染厂、西北国棉四厂、专访了化觉巷清真寺并作礼拜，还参观了洒金桥回民小学，拜会了西安市副市长张锋伯。重点了解工业建设情况，特别是156项苏联援建项目在陕西的重工业生产项目的布局情况。应邀出席了周末舞会。7月24日上午客人乘航班回北京。

8月18日，荷兰驻北京代办处一等秘书梅耶，乘火车由天水抵达西安。在西安参观了省博物馆、西北大学、西北艺术学院、新西北印染厂，游览了茂陵等名胜古迹。专访了兴教寺、八仙庵，在参观中他说：“西安并不是一个

最有古老文化的城市，而我是研究中国历史的人，问题在于古的不突出，现代的不明显。”8月21日晚10时乘火车去洛阳。

英国代办处2批2人，他们是：三等秘书费德威于9月13日凌晨1时从宝鸡乘火车到达西安。9月16日晚10时去洛阳。费德威懂汉语，在西安除参观工厂、农业合作社需陪同引导外，其他时间均为个人自由活动。访问了西大街日杂品及生产工具供销合作社、省图书馆、文管会、广仁寺，游览了革命公园等名胜古迹。在参观访问中很注意了解农民和工人的生活是否真有提高，政府与工厂、合作社之间的关系，工厂与合作社的收入和利润分红，农贸市场有无进行产品交流的场所等。秘书包土敦于11月2日由天水来西安，自称私人游览（懂汉语），多系自行活动，11月5日上午游华山后去太原。包土敦在西安期间，看到西安各界人士举行声援埃及反抗英、法侵略盛大集会，街上到处有大幅标语和游行队伍，在此情况下，他提出不在城市活动，去长安兴教寺和郊外农业社参观，就农业社组织机构、领导关系、劳动分配、社员生活情况，提问多、记的细。最后说：“今天我作了个新闻记者”。游览了大雁塔等名胜古迹。

1958年接待来自20国5批59人。其中：

5月14日—16日，中国国防部组织的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民主德国、南斯拉夫、缅甸、印度尼西亚和阿联酋等10国驻中国使馆的武官及夫人共19人访问西安，参观了西北国棉四厂、西安人民搪瓷厂、省博物馆和半坡遗址博物馆；游览了大雁塔、华清池及南郊文教区。5月15日下午陕西省驻军领导会见外宾，并设便宴招待。5月16日晨赴成都。使节团在两天的活动中，对西安工业生产大跃进，有了比较概括的了解。苏联武官朱道夫少将，对市政介绍和工厂参观提问较多，并说：“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提出的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在陕西贯彻的怎样？”还建议应改进个别车间的通风设备。罗马尼亚武官科奈斯少校说：“中国共产党真是句句话不落空。”

5月16日—17日，各国驻京使馆商务人员一行33人，在中国外贸部副部长江明陪同下抵西安参观。他们来自苏联、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波兰、民主德国、蒙古、越南、匈牙利、南斯拉夫、印度、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锡兰、瑞士、挪威、芬兰、荷兰、英国等18国驻华商务人员。在两天的活动中，参观了西安人民搪瓷厂、西安黄河棉织厂，游览了市容、大雁塔、半坡博物馆、省博物馆、华清池；听取了西安情况介绍。社会主义

国家的代表认为搪瓷产品质量怎样超过了英国、瑞典，要求讲细些，资本主义国家的代表则看得细、提问多，虽然国籍不同，但兴趣都很大。

5月16日—20日，英国代办处职员姚曼女士，由北京来西安，参观游览了名胜古迹，主要是了解市场商情。

6月10日—15日，苏联驻华使馆参赞苏达利柯夫访问西安，随同他的秘书6月12日由北京专程来西安，6月15日去洛阳。苏达利柯夫来西安主要是视察在陕西地区帮助我国建设的苏联专家工作。副省长李启明、西安市委书记处书记冯直接见了苏达利柯夫，苏达利柯夫与苏联专家工作的部门负责人进行座谈，征询意见，同时向专家们转达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精神。参观访问了113厂、782厂、212厂和西北工业大学，专访了省、市中苏友协，了解友协成立的经过、人员编制及近年来的工作情况，游览了名胜古迹。

12月6日—12日，民主德国驻京商务处专家莱因德·派尔莱特及费尔德、开勒尔3人，在西安参观了半坡博物馆、省博物馆、西安交通大学，游览了革命公园、华清池，专访了国家测绘局西安分局的航测作业室，并在该局作了两次报告，举行了两次座谈会，了解该国蔡斯厂产品测量仪器的情况，并对有故障的进行了修理。莱因德于12月12日返回北京，其他2人乘车赴武汉。

1959年接待5个国家的使节10批20人。其中：

捷克斯洛伐克驻京使馆人员3批4人。商务处专家伏尔维斯基于1月12日由成都乘航班来西安，1月15日上午乘班机回北京。伏尔维斯基来西安，主要是了解各地对所购捷机器安装的准备工作和已经运到的机器情况。参观了西安电力电容器厂，游览了大雁塔等名胜古迹。专访省统计局，了解该局对所购捷克计算机安装有关情况并进行了座谈；商务专员莫里斯2月1日由北京来西安，主要是了解捷克专家工作和捷克机器的使用情况，专访了省外贸易局副局长姬忠臣和603厂厂长。参观了省博物馆等名胜古迹，2月3日晚去成都。使馆商务处职员哈娄普卡（无线电及电子工程师），3月11日由洛阳来西安，参观了603厂，省广播电台、雷达厂、西安交通大学无线电系和物理系，专访了省外贸易局局长马师冉，并和副局长高馥宇进行了座谈。3月17日晚乘车赴成都。使馆职员范特尔12月2日由兰州乘飞机来西安，12月4日晨乘车赴北京。在西安停留期间，参观了工厂、人民公社、游览了名胜古迹，专访了省农业厅、省经委办公室负责人，了解工农业发展情况。

民主德国驻京使馆人员5批13人。他们是：使馆文化教师及记者布里

夫人一行6人，于3月23日—25日来西安，参观了西安仪表厂、西安人民搪瓷厂、东风人民公社、半坡博物馆、大雁塔、华清池；成套设备出口公司总经理布朗歇和驻华商务处人员格鲁纳瓦特于4月11日—12日，由北京来西安主要参观由民主德国帮助建设的西安仪表厂，了解该厂建厂及生产情况并与赵迪之厂长及专家组长窝尔姆等人座谈。二秘约敛·诺曼夫妇于4月19日乘机抵西安，4月20日晚乘车去成都。他在参观中拍了不少照片，多半是名胜古迹，也有些破窑洞等，并解释说：“我和资本主义国家的记者照这些东西的目的不一样，我们是用它来作为新旧中国的对比，这些旧东西即就是建国40多年的苏联也同样有这些东西。”使馆一秘布利和随员哈什（中文名贾爱玲，懂汉语）2人，于5月12日来西安，5月19日返京。主要是了解陕西省教育工作情况。为给即将来中国的民主德国教育代表团准备参考材料，并了解在西安的德国专家的工作情况。了解陕西省科学研究工作进展的概况，并参观了西安市第38中学、第10中学和西北国棉四厂，游览了名胜古迹；使馆中德科技委员会主席斯密·特曼和秘书布特洛、记者朗格3人。于10月6日由北京来西安。主要是主持民主德国建国10周年庆祝招待会，并参加有关各种庆祝活动。在西安期间，参观了西安仪表厂并与该厂民主德国专家进行了座谈。记者朗格向全体专家作了《关于西藏问题》的报告（朗曾去过西藏），朗在农村参观公社时，提出了人民公社是不是搞的过早、大炼钢铁情况如何，怎样战胜旱灾、大办食堂，是自愿还是强迫的，大家是否一起吃饭，有哪些定量规定，每人一年能分多少粮、钱。使馆二秘施特劳斯于12月15日下午抵达西安，市文化局谭平局长等迎送，19日早返回北京。民主德国10年成就展览会于10月16日—29日在西安举行。他是为陪同省、市领导人参观展览会而专程来西安的，16日他接待了省委书记处书记、西安市委第一书记张策，市长刘庚、副省长孙蔚如、副市长张锋伯及省、市文化局的负责人。施特劳斯在西安期间还参观了西安仪表厂、红旗公社水库工地、游览了名胜古迹。

匈牙利驻华大使馆随员卡迈尔·伊斯脱万偕译员2人，7月4日由北京乘飞机到达西安。卡是研究经济的，这次旅行主要是到四川参观人民公社，进行经济考察，在西安只参观了钟楼、鼓楼、大雁塔和半坡遗址。7月5日中午乘车去成都。

蒙古人民共和国驻华使馆二等秘书奥尔梭于10月29日由北京乘火车来西安，10月30日晚乘火车返京。奥尔梭主要是解决蒙古留学生在西安交大

的生活、学习条件等问题，同校方领导座谈了有关教学情况。

1960年接待2国2批2人驻华使馆人员。其中：

苏联大使馆党委书记兹拉杜科夫，1月14日由北京来西安，1月19日乘车赴三门峡。在西安期间，兹拉杜科夫去兴平县检查专家工作，并和驻西安的专家负责人进行了交谈，向在西安的全体专家作了报告，参观了西安名胜古迹，与省人委副秘书长贺廷俊、西安市委工业部部长张方海进行了座谈。临走时他建议希望地方多向专家们介绍中国情况。

越南驻华使馆干部阮春良11月4日从北京来西安。主要是向在西安的越南留学生传达越南劳动党三大决议，了解留学生情况。在西安期间，他分别在通讯兵学院和西安公路学院召集留学生开会，并放映了他带来的越南影片。11月10日去石家庄。

1961年接待4个国家驻华使馆人员4批8人。其中：

民主德国驻华使馆二等秘书石滕察尔1月26日来西安，抵离时省人委专家工作处高平科长和西安仪表厂办公室吴耀金主任迎送。他这次来主要是传达了他们党内工作情况与指示，同专家组负责人进行了座谈。在他下榻的西安人民大厦召开了德国公民秘密会议。参观了西安仪表厂各车间、省博物馆、城隍庙商场等，1月29日上午返京。

捷克斯洛伐克驻华使馆参赞石杰基那，3月8日由北京乘飞机到达西安。当日乘车去宝鸡，在宝鸡分别向捷专家及夫人传达了捷共中央会议精神，并和聘请专家的单位负责人进行座谈，拜会了市政府，参观了宝成铁路秦岭隧道和电厂工地。在西安拜会了省人委副秘书长李骥德，会见了省交际处长贺廷俊，听取了陕西省工农业发展情况的介绍和远景规划。参观了西北第一印染厂，专访了603厂，了解所提供设备的性能。观赏了地方戏曲秦腔，游览了名胜古迹。3月11日晚返京。

越南驻华使馆武官处阮维生少校，8月20日由北京乘车到达西安。逗留期间，检查了在西安第四军医大学、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学习的越南留学生工作，会见了留学生所在学校的负责人，并与他们交谈了有关留学生的学习、思想、生活等方面的情况。8月23日晚乘车去成都。

捷克斯洛伐克驻华使馆商务专员西麦克一行3人，10月24日在西安参观了印染、纺织、搪瓷等工厂，游览了商店。省委书记处书记章泽会见并宴请。

苏驻华使馆参赞亚里加卫青和二等秘书雅金，11月24日由北京乘飞机

赴乌鲁木齐途中因气候原因在西安过夜。在停留期间，参观了省博物馆、大雁塔，游览了百货公司、新华书店，购买了两本《人民公社基本工资加奖励问答》和两本俄文版《不怕鬼的故事》，晚上与西安人民大厦工作人员交谈，从中了解物资供应、灾情、收成以及有关数字等。雅金于11月25日离开西安。

1962年接待2国驻华使馆人员3批3人，其中：

越南驻华使馆人员2批2人，武官陈玉坚上校，1月9日由北京乘火车到达西安，1月14日乘火车赴成都。他这次主要是了解留学生的学习情况和传达越南劳动党六中全会决议。在西安期间，先到有越南留学生的第四军医大学、通讯兵学院、装甲兵学院、工程兵学院、西安公路学院和留学生见面，并和各学院负责人进行座谈。另外，还参观了名胜古迹，观看了话剧《黑奴恨》。4月16日—19日越使馆职员黎公司，来西安主要了解在西安公路学院学习的留学生情况，同学院教务处长进行了座谈，希望院方对留学生管理严一点，多做些思想政治方面的具体工作。4月19日返京。

捷克斯洛伐克驻华使馆商务处技术人员迪伯利克，1月23日由北京乘飞机到达西安。在省电业局一总工程师陪同下赴宝鸡，检查处理由捷提供宝鸡发电厂汽轮机叶片损坏事故。在西安期间，参观游览了名胜古迹，1月26日晚乘火车返回北京。

1963年接待25国驻华使馆人员2批60人。其中：

各国驻华使节和部分外交官员以及他们的随员一行68人，在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韩念龙和夫人、礼宾司副司长葛步海陪同下，于4月9日上午8时，由太原乘专列来西安参观。经过5天的参观游览，于4月13日晚离开西安。客人抵离时省人委副秘书长郭力道、西安市副市长张锋伯、省外办副主任李宁等有关方面负责人迎送并陪同参观游览。客人在西安期间分组交叉参观了西北第一印染厂、西北国棉四厂、西安人民搪瓷厂、未央区马旗寨人民公社（包括家访20户）、西安交通大学、省博物馆、乾陵、半坡遗址，并游览了西安市容和大雁塔、华清池等名胜古迹。在西安农械厂、西安仪表厂就新产品、销路、设备来源等分别进行专题座谈。同时还分批乘飞机赴延安参观。副省长兼西安市市长时逸之在客人到达西安的当晚，在人民大厦设宴招待，并应邀观看了地方戏曲和歌舞。外交部部长助理韩念龙、副司长葛步海、程子平、陈伯清、高建坤，专员王永清、褚启元、刘英仙、沈韦良以及翻译、医生等30人出席作陪。

使节团有苏联契尔沃年科大使及夫人、一等秘书谢尔吉日夫、职员特里福诺夫等 4 人；波兰耶日·克诺泰大使夫妇、职员布尔斯基 3 人；匈牙利马尔丁·费伦茨大使及一秘倪特莱、二秘卡尔沙伊 3 人；捷克斯洛伐克赛迪维大使及夫人、二秘梅尔尼察克及随员杜勒梅克 4 人；古巴波诺·桑托斯大使和二秘哥尼尔夫妇及随员托雷斯 4 人；德国黑根大使及夫人和佛利德曼商务参赞与二秘阿伯曼 4 人；锡兰佩雷拉大使及夫人和一秘沈里维勒拉夫人、三秘那波 4 人；罗马尼亚乔治乌·杜米特鲁大使及夫人和三秘道洛班楚 3 人；芬兰托依伏拉大使夫妇及一秘巴斯蒂宁与夫人 4 人；阿富汗米斯凯尼亚大使及夫人；朝鲜韩益洙大使及随员李德润、职员白享福 3 人；摩洛哥兹尼贝尔大使及公子；丹麦斯怀特大使及夫人；保加利亚斯托伊切夫大使夫妇及随员帕帕列佐夫 3 人；瑞典佩特里大使及随员 4 人；巴基斯坦罗查大使和夫人及一秘尤纳斯、阿斯拉姆 4 人；印度尼西亚尤叔夫临时代办及夫人和助理专员苏干达尔 3 人；荷兰魏立恒临时代办及夫人；印度一秘劳及新闻专员斯里尼瓦森 2 人；尼泊尔一秘巴斯尼亚；英国一秘伊文思夫妇、参赞莫干夫人与三秘柯杰儒 4 人；南斯拉夫二秘格里西奇；缅甸三秘吴昂千达；阿联法赫里随员；瑞士档案秘书高珊白（女）。

朝鲜驻华武官金龙俊大校，8 月 7 日—9 日，由南京乘火车来西安，抵离时省军区有关负责人迎送，并陪同去 792 厂了解朝鲜实习生的情况。客人在西安时还参观了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和大雁塔。

1964 年接待来自 3 国和地区驻华使馆人员 3 批 8 人。其中：

1 月 16 日—19 日，瑞士驻华大使汉斯·凯罗乘火车由北京来西安自费旅行，1 月 19 日乘飞机赴昆明。凯罗在西安期间，参观了西安仪表厂、省博物馆等名胜古迹，游览了新安、解放两个商场和一个工艺品商店。观看了地方戏曲。

法国驻香港地区总领事摩勒一行 6 人，10 月 18 日来西安、延安参观。主要了解黄土高原地形地貌。在西安参观了西北第一印染厂、马旗寨公社和半坡遗址等名胜古迹。10 月 21 日返京。

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馆代表阿里·杜米，11 月 30 日由北京来西安参加庆祝阿尔巴尼亚解放 20 周年各项活动。杜米在西安期间，出席了陕西省及西安市各界 1500 多人隆重举行集会，热烈庆祝阿尔巴尼亚解放 20 周年大会，阿里·杜米在大会上讲话。出席大会的有中共陕西省委第二书记赵守一、书记处书记严克伦、副省长林茵如、省军区副政委萧潮，省委常委、西安市

委第一书记彭天琦、副市长张雪涛，以及省政协和人民团体负责人接见了杜米。杜米还参加了陕西师范大学庆祝晚会。12月1日，杜米应邀参加了“西安各界人民坚决支持刚果（利）人民反对美国、比利时帝国主义武装侵略斗争大会”，同时参观了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纪念馆、搪瓷厂、开关整流器厂和毛纺厂，12月2日去洛阳。

1965年接待来自3国驻华使节3批8人。其中：

法国外交部长代表肖维尔及法驻华使馆商务参赞夫人里沙尔、二秘雷布朗一行3人，在中国外交部西欧司唐海光副司长陪同下，11月25日由北京乘机抵达西安。当日下午去延安参观，11月26日返回西安，参观游览了市容，大雁塔、半坡遗址和华清池。在活动中一再表示谈共同点，避免分歧，谈旧不谈新等，11月28日离开西安。

罗马尼亚驻华使馆一秘贝舍里安及三秘吉蒂克，11月30日—12月4日，在西安、延安自费旅行。在西安参观了西北国棉四厂、西北第一印染厂、马旗寨公社、西北大学、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省博物馆，游览了华清池等名胜古迹，省外办副主任曹达与其进行了友好交谈。

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常驻中国代表团黄万里、阮顺和、黎梅一行3人，11月21日由北京乘航班来西安，参加西安各界庆祝解放阵线成立5周年活动。11月23日乘火车去武汉，客人抵离时，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陕西分会副会长丛一平、李宁及省各人民团体负责人与工人、学生代表等260人赴机场、车站迎送。在西安的越南留学生约200人也前往迎送。女青年向客人献了鲜花。省委书记处书记、省长李启明，省委书记处书记、“和大”分会主席章泽，西安市委书记处书记、市长徐步等党政负责人接见并宴请。黄万里在庆祝大会上讲了话，并向大会赠送了解放阵线的旗帜和纪念品。客人在西安期间，还参观了西北第一印染厂、西安人民搪瓷厂、西安高压电瓷厂、西安交通大学、省博物馆和大雁塔等。

1966年接待来自7国驻华使馆人员8批15人。其中：

越南驻华使馆一等秘书冯玉林3月10日由北京来西安，主要是看望越南留学生，了解他们的学习和生活情况，根据冯的要求，会见了省高教局李绵局长。18日去武汉前李绵局长设宴招待。冯玉林在西安曾去陕西师大、西安交大、西安公路学院看望了越南留学生，会见了各校负责人，向留学生作了3场报告，并到两个医院探望了有病的留学生。冯还向西北大学等有关院校干部200多人介绍了越南反美斗争的情况。并向西大、师大、后字212



部队中留学生及干部放映了他们带来的越南纪录影片，3月18日离西安回北京。

日本国高岐县办事处驻京首席代表相马常敏、代表田中聪介3月14日来西安、延安自费旅行，3月19日赴洛阳。在西安期间，参观了西北国棉四厂、西安实验小学、省博物馆等名胜古迹，游览了市容和商店。

法国驻华大使馆人员2批3人来西安。他们是：使馆随员马腾（懂汉语）于3月28日由北京来西安自费旅行，3月30日去洛阳。马腾在西安参观了工厂和8处名胜古迹，观看了歌剧《向阳川》。曾几次去西安外国语学院会见法籍教师法朗索瓦等3人，并由他们陪同游街串巷，到东关八仙庵，临别时在西安饭庄会餐。使馆武官纪业马斯夫妇于4月24日由北京乘火车来西安自费旅行。纪业马斯夫妇在西安期间，婉拒国际旅行社提供参观项目，自行参观了大雁塔、半坡遗址、兴教寺、杜公祠、清真寺、广仁寺、八仙庵、城隍庙，三次去省博物馆拍照历史文物和碑林石刻艺术，五次去古旧书店购买《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史》、《秦始皇》、《青铜时代》等历史资料。游览了华清池、秦始皇陵。并要求参观了一个外国人从未去过的郊区公社。在韦曲人民公社，对公社的机械化、自留地、口粮分配、宣传教育、民兵组织、社员思想情况均作了详细笔录。

肯尼亚驻华大使科斯克夫妇及一等秘书奥代罗夫妇一行4人4月1日—8日，在西安、延安旅行。在西安参观了西北国棉四厂、西北印染厂、西安交大、马旗寨公社，游览了华清池等名胜古迹。观看了电影《地道战》。应大使要求，西安市市长徐步4月4日接见了客人。

苏联驻华使馆二等秘书茹拉夫列夫及随员别列金斯基一行2人（均懂汉语）4月19日—25日，在西安、延安自费旅行。根据要求，他们在西安游览了名胜古迹，参观了西安交大、马旗寨公社、西北国棉四厂、西安人民搪瓷厂、西安黄河棉纺厂，观看了秦腔《向阳川》。

英国驻华代办处一等秘书唐纳德及英外交部研究助理博沃2人，5月10日—15日由郑州来西安、延安自费旅行，在西安参观了西安仪表厂、西北印染厂、西安交大、马旗寨公社、省博物馆，游览了华清池等名胜古迹。在参观中很注意周围环境，介绍什么记什么，说他对仪表是外行，但参观时对每个车间名称、机器产地、每件产品的用途、能量都做了笔记。

丹麦驻华大使馆秘书培林，6月18日由北京来西安，21日去洛阳。在西安参观了马旗寨公社、车马坑，游览了华清池等名胜古迹。在活动中，不

要陪同，喜欢一人独往。他此行主要了解农业收成的实况，并剥开树皮，刨开土壤探测含水量，观察小麦粒子饱满状况。

二、1967—1978年的12年间驻北京的使馆人员来西安的寥寥无几。其中1967—1972年接待了5国使馆人员5批12人。他们是：

1967年4月23日—29日，阿尔巴尼亚驻华使馆武官哈图及夫人、随员迪工亚（翻译）由北京乘飞机来西安、延安参观访问，在西安期间，参观了省新华印刷厂、西北国棉四厂、8138部队的一个连，西安交通大学和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客人离陕前，省军区副司令员邢荣杰会见并设宴招待。同年7月9日—13日，日本科仪展及驻京友好商社代表团一行6人，在团长井神秀和率领下来西安、延安参观访问。他们在西安参观了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西安高压电瓷厂、西安交通大学和省博物馆等名胜古迹。

1968年9月21日—27日，越南驻华使馆武官助理阮祥百由北京到西安。主要活动：一是组织正在工程兵学院学习的5名留学生集训3天；二是会见院领导交谈留学生工作意见；三是研究这批越南留学生的结业工作。

1971年3月11日—13日，朝鲜驻华使馆三等秘书，在西安期间拜会省外办，并专程看望了李文青。

1972年11月24日—28日，巴基斯坦驻华使馆新任武官，在西安参观了5702厂和八路军办事处纪念馆等名胜古迹。客人离开西安前，省军区参谋长李玉治会见并宴请。

三、从1979年改革开放后，来陕西的各国驻华使馆人员逐渐有所回升，到1991年的12年间，来自13国和地区的人员共13批33人。其中：

1984年8月15日—18日，科威特驻华大使阿不都拉·哈迪·买哈穆德一行3人来西安访问。主要是商谈给我贷款2500万美元筹建“伊斯兰宾馆”。他们在西安参观了秦俑馆、华清池、半坡博物馆、钟楼，并在清真寺做礼拜。西安市副市长靳毅仁、省外办副主任、省民委负责人及市民委主任等前往迎送。李庆伟省长设宴款待大使一行，白纪年副省长迎送并作陪。

1985年4月2日—3日，日本驻华大使中江要介一行6人抵西安访问。中江大使的随行人员有大使夫人中江靖子及二秘小原雅博等。此次主要是拜访省主要负责人，了解陕西经济状况。在西安参观了省博物馆、青龙寺、秦俑馆等名胜古迹。省外办副主任刘步云前往机场迎送，副省长白纪年宴请了大使一行。同年4月3日—7日，芬兰驻华大使于瓦里宁一行5人来西安访问。大使主要随行人员有大使夫人、商务参赞凯琼·卡奇等。大使访陕期间

拜会了西安市市长和省对外经贸委、省经委、省计委、省信托投资公司、省外贸公司负责人，探讨经贸合作的可行性。孙克华副省长设宴款待大使一行，西安市负责人作陪。大使一行在陕期间还参观了省博物馆、秦俑馆、乾陵等名胜古迹。同年4月14日—15日，印度驻华大使卡特斯瓦兰一行3人来陕。张斌副省长会见了大使一行。同年4月26日—28日，爱尔兰驻华大使澳尔德伦偕夫人抵我省访问。大使在陕期间，省长李庆伟、副省长张斌会见后并宴请了大使夫妇。他们还参观游览了名胜古迹。同年11月5日—6日，日本驻华公使林暘率与二秘小原雅博来我省访问。公使一行参观了秦俑馆和华清池，并游览了市容。

1988年5月20日—22日，美国驻华使馆农业参赞史大卫及助理兼翻译李循访问了西安。史大卫参赞就陕西的农业产量和粮食与牲畜市场情况，与我省有关方面的负责人交换了意见，着重谈了1987年的执行结果和1988年的前景预测。史大卫介绍了美国的农业形势。同时与省农牧厅座谈了小麦、玉米、油菜、花生以及其他谷物和油料作物的产量，以及牲畜和生猪的存栏数。并与省林业厅和省商业厅、省粮食局的主要领导会晤，了解核桃的产量和销售情况，粮食和油料市场的销售问题，探讨了发展复合饲料工业的前景。同年8月2日—8日，日本驻华使馆公使汤下博文偕夫人来西安访问，抵离时省外办有关负责人前往机场迎送。公使此行主要是为陪同日本外务省事务次官林田先生访华事宜做先遣工作，在西安期间公使及夫人参观了青龙寺、兴庆宫、省博物馆、秦俑馆等名胜古迹。省外办主任张景文在西安宾馆宴请了汤下博文及夫人。

1989年3月5日—6日，苏联驻华使馆参赞朱维奇和二秘库力克来西安访问，同省计委、省体改委、省社科院主要负责人座谈我省的改革和经济等情况，了解实现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方针的情况。省外办副主任秦元恺设宴招待。同年5月16日—20日，加拿大驻华使馆可纳缔公使及夫人、商务二秘贝大年和中文秘书邓德英女士等来陕访问。他们在西安与省电管局、地矿局进行洽谈。省政府特邀顾问张斌在西安人民大厦会见并宴请了公使一行。同年10月9日—12日，苏联驻华使馆参赞库季诺夫访问了陕西。他主要是与省经贸委商谈中苏两国贸易问题。省外办主任张景文设宴招待。同年10月3日—11月3日，美国驻华使馆二秘季·Y·奥当纳来西安访问。他主要是与省体改委交谈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与市委负责人座谈市政建设和反腐败问题；与西北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座谈下一学年的计划

情况；与地方报社座谈新闻出版、扫黄及图书发行问题；与省旅游局座谈旅游现状和前景；与省计委综合处座谈经济紧缩问题。还专访了西安电影制片厂。同年11月29日—12月3日，美国驻华使馆农业处官员海兰在西安访问。海兰此行主要是了解我省农业生产、贷款和农业银行支持农业发展所采取的措施；农田基本建设和乡镇企业的前景等方面的情况；还询问了陕西的粮油购销情况。同年12月6日—10日，澳大利亚驻华使馆政务三秘苏珊狄叔贤访问了陕西。他此行主要拜访省、市党政负责人，陕西日报社和省农办等部门的领导，了解省内的政治、经济、政策执行等情况。

## 第七节 新闻团组

建国之初，毛泽东主席提出了举世瞩目的外交方针：“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废除国民党政府同外国建立的外交关系，不承认过去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在国际事务中奉行独立自主的政策，坚持原则，求同存异，不畏强暴，平等待人。敏锐的外国新闻界人士，对当时被称为内陆三线建设重点地区的陕西有一种新鲜感，经由民间、官方等渠道陆续来陕，参观了解的内容有文物古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延安及革命斗争历史、省会西安的建设及远景规划。从1956至1991年，除随国宾团来的新闻记者以外，国（境）外来访的新闻记者、通讯社、广播电台、电视台、报社的代表、记者等共计411批1698人，累计来自256个国家和地区。

1956年，有14个国家的团队来访，计33批共58人。其中：

日本5批12人，成员有共同通讯社记者依岗健一郎，《中部日本新闻》驻香港记者古谷丰，电影代表团一行7人，《朝日新闻》记者大久保泰、博多野宏一、岛津国臣。在西安期间，他们向省、市主要负责人了解解放前后的工业、农业、造林、文化教育、卫生等各方面的建设发展情况，以及少数民族生活情况。

苏联4批10人，成员有《新时代》杂志副主编别列什柯夫，《真理报》记者杜慕嘉、欧富钦（去延安），新闻工作者代表团一行7人。在西安，主要是向省、市负责人了解政治、经济、国防工业、历史考古进展情况；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对外贸易，中日关系等问题。

英国4批5人，成员有《路透社》常驻北京记者齐普，他在参观中强调

新闻采访的自由性和时间性，要求看新的项目。《每日先驱报》记者台维逊，1952年曾来中国，回国后写了一本《中国的黎明》。这次来西安的《格拉斯哥先驱报》记者米奇逊（7月21日—23日），《每日快报》记者斯伯（8月16日—18日），《东方世界》主编陶希格（9月16日—21日）。他们主要是了解工农业和城市变化情况。活动特点：不愿听系统介绍，要由他们提出问题，通过问答提供所需要的“资料”。米奇逊到每个地方参观时都问：“你们这里有无劳动改造的反革命分子？”“有无沿海调来的工人？”“评定工资等级的标准是什么？生活中哪些地方使你们高兴？”在访问农村时提出“对地主的劳动改造如何进行？”并在红旗农业社的田地上拍摄了农民劳动的情况，还要求农民把耕畜牵到饲养室门口，表演入社时查验耕畜、进行登记估价时的情景，拍摄电影。

瑞士《联邦报》记者阿贝格女士5月24日—28日在西安进行采访。她1936年至1943年曾在上海担任过《法兰克福公众报》驻远东记者。1938年在武汉，1955年来远东，曾写过一些诬蔑中国的文章。1956年初，她通过很多途径联系要来西安采访，一到西安就提出采访四个重点问题：第一、想找人谈谈关于工业建设的情况；第二、想看看棉农社和棉纺厂；第三、要了解陕西地区水利灌溉和造林情况；第四、参观文物古迹和博物馆。她参观博物馆时，对每件古物的年代、作用等都问得细、记得多。在和市人委工业局郝伯雄局长座谈时，询问了解放前后西安棉花生产情况及增产的原因；人口增加的原因；医院有多少；高等学校有多少，在校学生多少，教授多少，国外留学的多少等等。在西北国棉二厂参观时，询问了厂房面积及设备情况；工人来源；工人平均工资，最低和最高各占多少；有多少人参加工会；食堂、洗澡房、俱乐部设备如何；有哪些文化娱乐活动项目。在堡子村农业社参观时，不让社主任介绍而直接提问：什么时候建社，何时为高级社；农民是否有自己的土地；有哪些副业；地主富农占多少，他们的政治待遇、生活状况如何；农民耕作使用什么工具。她在与省林业厅厅长座谈时，询问了许多解放前后对比数据；水坝的作用，灌溉面积，平均产量，山区和平原如何开展植树造林；陕西境内河流含沙量；以上各项是否得到过苏联专家帮助。

联邦德国3批3人。作家兼记者显克，他在《亚洲的年代》中，比较客观地谈到中国近百年来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情况。《法兰克福观察报》编辑波尔希等五一节后来西安，只作一般性的参观。

印度全印新闻摄影协会创办人沙尔玛，5月25日—28日来到西安，主

要是摄影。参观了端履门和解放路百货大楼、第一保育院、大雁塔、体育场、西北大学、西安市中心医院、西北国棉四厂职工福利区、田家湾农业社等，多系拍摄人民生活。

澳大利亚《悉尼先驱报》编辑史派特5月25日—26日访问西安。抗日战争时，史是负责远东报道的记者，曾到重庆采访。这次来西安主要是了解工厂、农村的情况。

民主德国新闻工作者代表团一行4人，12月7日—11日访问西安，团长系《新德意志报》编委。该团主要是了解工人及农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以及西安事变的情况。他们参观了市自动电话局。在西北国棉四厂，与厂领导和工人座谈生活变化、如何提高工人文化技术等，同工人共进午餐。在西安工艺厂与雕刻皮影的老艺人座谈了有关解放前后艺人的生活及皮影事业变化情况等。在农村座谈了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优越性。

巴基斯坦新闻工作者访华代表团一行13人，6月11日—12日访问西安，主要是参观工业区。看了西安交大施工工地、西北国棉三厂、西北国棉四厂，并同市人委秘书长何寓础座谈了西安的变化情况和伊斯兰教徒的生活状况，并询问清真寺何时建立，有多少教徒，有多少专为回族教徒建立的小学。

捷克斯洛伐克美术协会摄影艺术家得利希富门、韦纳富门一行2人，7月1日—6日访问西安。在西安逗留的4天中，参观了名胜古迹，拍摄照片100多张，在文管会整整拍照了一天。韦纳富门一再表示：“我参观了欧洲许多博物馆，没有见过像中国文物这样丰富而有价值。”

南斯拉夫2批2人。《战斗报》记者德斯里苑奇7月20日—22日访问西安。主要是了解西安的历史及解放前后工业、农业、文化教育和公用事业方面的建设情况。对于工人来源、文化技术学习、工资待遇等提问较多。南广播电台驻京记者鲍蒙在参观三门峡后于11月6日—9日来西安采访，提出了七点要求：1. 与省上负责同志座谈陕西省概况；2. 与西安市负责人谈市政建设概况和发展远景；3. 访问西安交通大学校长；4. 访问一位参加过长征的干部；5. 访问一个由外地到西安的工人；6. 访问一个常住西安的老居民，以了解西安从晚清到解放后的变化；7. 访问报社。了解的目的是要写一本介绍中国的书籍。西安市长方仲如从古代、近代、现代三个历史时期，特别是建国后工业、农业、文化事业的变化，全面详细地回答了他的提问。在参观西安交大时，副校长苏庄陪同参观并与部分学生座谈。鲍蒙认为，中国学

生很用功，但知识面不广泛，学自然科学的人怎么不看中国著名文学作品呢？应该看到历史是启发一个人奋发向上的动力之一，知识丰富了，就有前进的力量。

新西兰自由撰稿人赫金斯，是新西兰第一个来华的记者，7月20日—22日在西安访问。他听取了市人委秘书长何寓础的介绍。赫此行目的是要出一本画册。他除了拍摄名胜古迹外，对落后的事物很感兴趣。在大雁塔花了很长时间，拍摄小摊贩及寺院内老牛拉水车的照片。在临潼华清池，给赶庙会的人群，特别是光着上身躺在地上纳凉的老百姓拍了不少镜头。在工厂，从外景到车间、福利区，甚至家庭都拍了照。

波兰工人通讯社农业部记者山松诺夫斯卡于10月7日—10日访问西安。除参观名胜古迹外，主要是了解农业合作化运动和农民生活；党在农村中的作用以及新兴城市的发展。在和省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刘国声座谈时提出：“为什么在1956年农业合作化运动发展特别快？”“目前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存在什么困难？”“‘八大’以后，在农村采取什么步骤来贯彻大会的决议？”她说：“在波兰虽然看了很多关于中国农业合作化的文章，但对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还是不太了解。”通过这次参观了解了很多东西。在西北国棉三厂参观座谈达9个小时。对于工厂发展的基本情况、品种、产量、质量、工资和工人生活都问得仔细。她采访了厂团委书记、工会主席、先进工作者、青年工人及家属委员。她对工会主席说：“赖若愚在‘八大’发言时提到，有些工会只顾生产不顾工人生活福利，你们的工会是否也有这种倾向？”她要买印有西安名胜古迹的名信片，因未找到，临走时说：“你们西安的宣传工

作做的不很好。”

波兰《人民论坛报》驻京记者罗步曼于10月14日—17日在西安参观采访，参观西北国棉四厂时提出：“对工人进行政治工作中碰到那些困难？”“工会工作的中心点是哪些？”“党委与厂长的关系怎么摆？”拜访了西安市人委城建局局长何家成和市手工业管理局局长孟岐山，了解“西安发展远景规划”、“手工业合作社的发展状况”，专访了《陕西日报》总编辑丁济沧。

意大利共产党《战斗报》记者卡拉曼德潘，由北京赴兰州途中在西安逗留一天。他游览了市容，参观了省博物馆、钟楼、鼓楼、大雁塔和南郊文教区。

1957年共接待来自6个国家的9批17人，其中：

苏联2批2人。《新时代》杂志副总编辑别列柯夫4月15日—19日访问

西安。在西安期间，除游览名胜古迹外，主要是通过座谈了解市政建设情况；大、中学生思想上存在的主要问题，尤其是“鸣放”方针宣布以来的思想情况。中共西安市委文教部、宣传部负责人还介绍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典故的来历及这个政策宣布后在西安引起的争论。他们还与新闻工作者联谊会西安分会举行了20余人参加的座谈会。10月24日—26日，苏联《文化报》特派记者克里文科，除参观游览名胜古迹外，主要想了解文化艺术界的动向。他访问了西安美术学院和陕西省戏曲研究院，还专访了《陕西日报》总编辑丁济沧。

挪威国家广播电台记者修迪夫人，5月8日—10日到西安，参观了秦始皇陵、半坡遗址、省博物馆、茂陵、古汉城及未央宫遗址、大雁塔和新发现的西周时代的车马坑。她在参观时，用手提式录音机作了口头报道并摄影。沿途她不时打开录音机录下马车的铃声、汽车声、拖拉机声，拍了农民耕作、毛驴拉车、农村破旧瓦房、集镇摊贩、群众衣着等镜头。

保加利亚《农业旗帜报》主编特拉伊科夫5月12日—18日访问西安。他除参观游览名胜古迹外，主要是了解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在与省农业厅副厅长苏资琛座谈时，他认为，中国人口多，耕地面积少，物质条件不足，农业社领导干部不强，要想提高农民生活水平，是很难理解的。他说，要使农民富起来，必须搞多种经营。得知苏资琛是民盟西安地区负责人，又谈了民主党派与执政党的关系问题。

日本2批6人。共同社记者今村俊行、朝日新闻社记者松野谷夫6月7日由北京乘飞机抵西安，6月8日晨乘火车去洛阳。市人委办公厅主任孔广升向他们介绍了西安市政建设情况，他们插问了各种问题，如“西安是西北建设发展的重点，有哪些工厂，重工业占多少？”参观西北国棉三厂时提出“目前工厂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在返回途中要求拍照公路两旁的民居区和耕田工具等。日本民间广播访华代表团一行4人，于8月7日—8日在西安参观。除一般游览名胜古迹外，重点参观了建华市场、解放市场、百货大楼、临潼有线广播站、西安农具厂。着重访问了省广播电台、了解了人员编制、稿件来源、播音时间、新闻节目次数、农民占有收音机的台数、农民是否喜欢听广播站的播出、政府是怎样要求的等。

波兰2批6人。波兰记者代表团一行4人，6月14日—17日到西安，除游览名胜古迹外，对西安事变很感兴趣，做了详细笔记。在咸阳市参观时，同该市负责同志座谈达3小时，重点是了解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组织



手工业合作社的全过程；共产党员在企业中的比例；蔬菜价格情况；市人民委员会怎样产生等等。《克拉克大报》编辑克维亚特夫斯基、《直言报》编辑库钦斯基，由北京乘火车7月11日—14日抵西安访问，在游览名胜古迹后，访问了西安电力电容器厂、西北大学和西安市工商联。重点了解陕西人民过去的生活情况及现在的变化；高等学校哲学课程，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方法有无争论，争论的焦点是什么？中国对日丹诺夫的看法是否有争论；解放前信仰宗教的人占全省人口百分比，当前宗教有何活动。

法国自由撰稿人米果，8月9日—11日在西安参观，主要是参观名胜古迹。米果愿独自雇乘三轮车东转西逛，不愿看工厂、农村，并说：“我不是给你们做宣传工作的。”沿途表示，要通过自然实物来探讨人为的变化。

1958年共接待8国9批14名新闻工作者来西安采访。其中：

奥地利共产党机关报《人民之声》报记者布鲁诺佛来及其夫人，5月12日—17日由成都来西安。在4天的参观活动中，除游览名胜古迹外，主要是为了写一本介绍中国经过整风，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等方面的书。重点参观访问了西安电力电容器厂、西安人民搪瓷厂，专访了第一航空技术学校校长，了解大跃进中的思想矛盾和一些具体生动的事例。还专访了《陕西日报》总编丁济沧。通过实际参观，他提出探讨赶美超英的新课题。

意大利共产党中央机关报《团结报》驻北京记者萨尔奇6月29日—7月3日来西安参观。重点看了第一航空技校、西安电力电容器厂、临潼炼铁厂、陕西省地方工业产品展览和西安城市规划展览。专访了省工业厅副厅长董实丰、省农业厅副厅长苏资琛、省文化局局长鱼讯。在参观中拍摄了不少工人生产情况和炼铁炉外景。

法国摄影记者路易斯·韦斯7月2日—4日访问了西安。她除参观一些名胜古迹外，主要是拜会市人委秘书长何寓础，了解了西安市政建设远景规划和道路绿化情况。

英国《观察报》记者卜拉德渥斯8月5日—6日在西安，参观了省博物馆、省地方工业展览馆、西安电力电容器厂，拜会了省工业厅综合计划处负责人，了解了陕西轻、重工业发展概况。

瑞士记者福里兹斯台克10月18日—20日在西安参观游览了市容和名胜古迹。在西北国棉四厂参观时，了解机器设备是进口的还是自制的，产品产量和销路；工人来源、文化程度、技术水平、管理制度等，并作了详细记录。

民主德国 2 批 3 人。10 月 21 日—31 日，民主德国通讯社驻京记者艾立里本及夫人来西安参观，后乘火车回京。此次访问，有三天赴延安参观。他们除游览名胜古迹外，拜会了副省长李启明，专访了西安市计划委员会主任张书云。主要参观了西北国棉五厂、临潼土炼铁炉、灞桥红旗公社、韦曲人民公社、全国摄影展览、城市规划展览、西安人民搪瓷厂、西安钢厂。在西安仪表厂，与帮助西安搞建设的民主德国专家进行了长时间交谈，并于当晚发出一篇消息。专访了新华社陕西分社社长朱波、人民大厦经理刘维世。利用业余时间看了大炼钢铁的现场。观看了地方戏《三滴血》、《金碗钗》。10 月 19 日，《造型艺术》杂志总编辑、德国艺术院展览部主任波·李特克在西安参观。除参观名胜古迹外，重点访问了长安美术出版社、美协西安分会、省群众艺术馆、西安美术学院，观看了壁画、秦腔和皮影戏。对不同风格的画品、雕塑等拍了很多照片。

印度电影制片厂摄影师巴夫纳尼夫妇等一行 4 人，10 月 26 日来西安，主要是了解历史上中印文化交流方面的文物和资料，并拍摄这方面的纪录片。在大雁塔了解到玄奘的事迹后，巴夫纳尼说：“玄奘对中印文化交流有很大贡献，但中国还有些人不了解玄奘。”在大雁塔时还问道：“有哪些印度和尚到过这里？”参观体育场时，为了拍照体育学院学生炼钢的镜头等了 20 多分钟，还向学生问了有关炼钢的许多细节以及学生拿不拿报酬等问题。

波兰《青年旗帜报》国际部副主任拉伊萨海尔，11 月 23 日—26 日在西安，参观了西安人民搪瓷厂、西安交通大学、省博物馆及半坡遗址，游览了大雁塔、钟楼、鼓楼等名胜古迹。看了交大后说：“这里的条件很优越，教学、科研居全国第几位？学生学术论文在全国著名刊物上发表的有多少篇？获奖的科研成果有多少？”参观中，对中国大跃进中的许多事物不理解。在搪瓷厂问道：“你们如何使工人发挥积极性提高生产率？除了政治工作，还采取了哪些得力措施使它持久？经济是基础在这方面是怎样体现的？”

1959 年有 8 个国家 10 批 22 名新闻工作者来西安参观采访。他们是：

波兰人民共和国 2 批 4 人。《华沙生活报》记者雅茨科夫斯基 1 月 27 日晚由北京抵达西安，30 日晚乘火车赴成都。他主要参观了西安人民搪瓷厂、西北国棉五厂、西安黄河棉织厂、礼泉县烽火人民公社。是日晚住烽火公社。就公社的组织形式、生产管理、基本建设（水利、交通、社办工业）、生产增长速度、如何进行分配、社员收入比例、公社财产的范围、劳逸如何结合、儿童教育等问题，与干部及社员分别进行了座谈和家访。

巴西《新闻报》记者维尼泽3月18日-21日在西安采访。除游览名胜古迹，多半时间独自一人在大街小巷拍照小摊贩、理发担、披头散发的老太婆、挑担子的行路人等。除向翻译打听西安有多少苏联专家，还两次到大街上看专家活动情况。在街上碰到外国人，就问是否苏联的工程技术人员。还问及苏联专家帮助陕西搞了哪些重工业建设。要求陪同人员代他在书店找有关海南岛咖啡、橡胶种植面积及产量等方面的资料。很注意中国人民对匈牙利事件的反映。

法共《观察画报》社社长塞戎及《人道报》摄影记者巴太雷米7月15日-16日来西安参观采访。在钟楼、鼓楼，拍摄了小孩打架、妇女缝被子、赤身小孩吃饭、赤背仰卧乘凉的人、架子车工人。到东大街买鞋时，在街道拍摄了卖瓜果的摊贩、三轮车工人、邮局门口代写书信摊、交通警察指挥行驶车辆等镜头。在省博物馆拍摄了甘肃师范学院历史系应届毕业生实习讲课、复课等情况。根据巴太雷米的要求，安排访问了西安肉食加工厂，了解了设备来源；工人的来源、人数、成份、生产方针和任务；生猪来源和生产收入情况；产品是否出口，出口给什么性质的国家等问题。在加工车间拍摄了不少镜头。

民主德国新闻代表团一行5人，由团长、《柏林日报》总编辑室主任卡尔·海因茨布率领，8月4日-6日访问西安。该团在西安重点参观访问了民主德国援建西安仪表厂的人员。以一天的时间了解了西安仪表厂的兴建时间和计划建成时间，是什么原因推迟了建成时间；培训技工的步骤、经验；每期培训多少人，需要多少时间。

日本新闻社编辑局局长横井雄一，8月9日-12日来西安参观采访。横井系日中文化交流协会、日中友好协会访华代表团成员。对外文协为了使其进一步了解中国建设情况，请其到西安、成都、武汉等地参观。在西安期间参观了西北国棉五厂、西北第一印染厂、西安人民搪瓷厂、西安交通大学及名胜古迹。在工厂重点了解了“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实际情况。

中德合拍的大型宽银幕彩色纪录片摄制组15人（中方11、德方4），8月30日和31日先后到达西安，9月3日赴成都。该组所拍摄的主题是反映中德两国人民的友谊。在西安拍摄了民主德国援助建设西安仪表厂的德国专家们的工作和生活，以及中德两国同志间的友谊。

苏联驻华大使馆新闻处编辑萨斯洛夫，9月6日-9日来西安专访座谈。在西安游览了名胜古迹，参观了西安电影制片厂，专访了省、市中苏友协，

并与四家报社、两家杂志社、一家广播电台的负责人进行了座谈，主要是征求对苏使馆新闻处编印的《苏联资料汇编》的批评意见、要求、希望，并了解了该资料使用情况。表示希望各新闻单位与苏联各地的报社、电台等建立直接联系的愿望。参观半坡博物馆后，在留言簿上写道：“这是世界上少有的，也可说是惟一的新石器时代的博物馆。它对研究古代历史有非常宝贵的价值。”希望能译成俄文，让更多的苏联人知道它。

意共《团结报》驻京记者萨尔奇及意共《新道路》周刊摄影记者鲁巴，10月14日—16日在西安和延安采访。在西安除游览名胜古迹外，主要是了解临潼县铁厂从土到洋的发展过程、规模、提高炼铁炉利用系数的具体措施。

波兰广播电台记者奥托尔斯卡雅（女）和其夫雷柏契基，11月30日—12月3日在西安访问期间，会见了省广播电台台长周惇、副台长武英，听取了关于陕西省大跃进和广播事业发展情况的介绍。参观了陕西省少数民族的文化馆及清真寺。访问了中国医学科学院陕西分院针灸研究所、西安音乐学院。录制了城隍庙古乐社的一些音乐节目。游览了名胜古迹。

1960年有5个国家4批6人新闻界人士来西安采访。他们是：

波兰《华沙生活报》记者雅鲁尔斯基5月8日—9日来西安。游览了名胜古迹，参观了西安人民搪瓷厂、西北国棉四厂、西安黄河棉织厂。他看得细，问得细，记得多。主要是了解产量提高的原因；技术革新是靠工人还是靠工程师；原材料是国产还是进口的；厂长和工人月薪是多少；职工子弟入学情况及补助办法等。

美国作家、《西行漫记》作者埃德加·斯诺和先后三次来过西安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联络委员会成员新西兰的艾黎，9月15日由北京来西安。斯诺先生在商谈活动日程时提出五点要求：参观半坡遗址；参观社办工厂；在钟楼上拍摄四条大街景色；拍摄他曾经住过的西京招待所和人民大厦；拜会省、市领导。艾黎提出要会见在西安草滩农场工作的美国人阳早、寒春夫妇。9月18日去三门峡。

日本《赤旗报》摄影记者田村茂10月6日由北京来西安，10月7日晨乘汽车赴延安，拍照片1600余张，10月12日返回。当晚去郑州。

英国自由投稿记者吉尔德及夫人10月28日由北京抵达西安，10月29日下午乘火车去成都。通过参观名胜古迹了解中国的宗教政策。在参观大雁塔时问寺庙附近有多少和尚、多少信徒，和尚的生活问题怎样解决，政府和

群众如何看待信教者等。

1961年有2个国家2批12人来西安参观访问。其中：

保加利亚《工人事业报》总编辑鲍科夫率新闻工作者一行5人，9月20日—23日在西安参观了大雁塔、钟楼、半坡博物馆、临潼华清池、西北第一印染厂、西北国棉四厂、西安黄河棉织厂、西安交通大学、西安音专、西安市第一保育院、礼泉县烽火人民公社。对参观工厂、学校，特别是人民公社兴趣很大，提问涉及面宽，如工厂规模、生产品种、销路、职工待遇、文化生活、子弟教育；学校教授出国留学、著书立说情况等。

日共《赤旗报》访华代表团一行7人，在团长、日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赤旗报》总编辑土帧强率领下，由中国《人民日报》总编辑王真陪同，11月15日乘专机自延安来西安访问，11月17日晚乘火车去三门峡。省委书记处书记章泽、《陕西日报》总编辑丁济沧、《人民日报》驻陕记者站站长、新华社陕西分社社长朱波、陕西广播电台副台长武英、《西安晚报》总编辑袁烙等前往机场迎接。代表团在西安参观了西安人民搪瓷厂、西北国棉五厂、西安交通大学、省博物馆、半坡博物馆，游览了华清池、大雁塔，观看了电影《古都青春》、《暴风骤雨》，碗碗腔《金碗钗》，并出席了章泽举行的便宴。代表团在两天的活动中表现严肃、认真、谨慎、热情，在参观中看得细，提问多。在交大提出20多个问题，在西北国棉五厂和两名先进生产者交谈了1个多小时。每人都作了详细笔记。有人还抄录了车间公约、职工宿舍的作息时间表，拍了不少厂景、车间、工人操作的照片。

1962年有2个国家2批3人来西安参观访问。他们是：

捷克斯洛伐克艺术考古摄影家得利希富门兄弟2人，6月22日—26日第二次来西安作文物考古摄影采访拍照。

波兰《人民论坛报》记者10月14日—17日来西安，除一般性参观游览文物古迹外，主要是座谈，先后与西安市城建局局长何家成谈城市发展远景规划；与西安市手工业管理局局长孟岐山谈手工业合作社情况；专访了西安第二纺织生产合作社、西安第二黑白铁皮生产合作社、陕西日报社、西北国棉四厂。

1963年是中国国民经济开始全面好转的一年。在这一形势下，外国新闻界人士来陕西省会西安，比新闻界人士来访最多的1959年增加近一倍。这些记者，大多是比较有影响有地位的，与官方关系比较密切。有部分记者是再次来西安，他们对陕西情况比较熟悉。本年来访者有一个新特点：电

视、电台记者比较多。他们活动的特点是：介绍材料要求具体、生动、问得多、谈得深，要求见物见人。对时间抓得紧，希望多看。拍照多。个别人寻找落后面拍照。有些记者要求单独活动，逛大街、转市场、串小巷。有的想摸中苏分歧在基层的影响，或获得中国国民经济的真实情况及发展方向的第一手材料。

全年有 23 个国家 20 批 180 位新闻工作者来西安参观采访。他们是：

奥地利共产党《人民之声报》驻京记者杨尼、瑞典共产党《新日报》驻京记者切尔拜及夫人一行 3 人，于 4 月 19 日从北京抵西安，4 月 26 日返京，杨尼赴咸阳访问。在西安期间，除去延安的 3 天外，均由《陕西日报》总编辑丁济沧迎送陪同，参观了名胜古迹，访问了西安人民搪瓷厂，省委书记处书记章泽接见并宴请了他们。

以《人民日报》名义组织的各兄弟国家、兄弟党驻京记者团一行 144 人 8 月 20 日来陕西参观访问，成员有苏联《真理报》记者丘查江、塔斯社记者雅科夫列夫、《消息报》记者卡秀可夫、《共青真理报》记者李高粱；波兰通讯社记者巴尔泰赤科；捷克斯洛伐克《红色权利报》记者米哈雷克、捷克通讯社记者蒂尔；德意志通讯社记者艾立本；保加利亚通讯社记者扎哈利耶夫；匈牙利《人民自由报》记者多德；罗马尼亚《火花报》记者索朗；古巴《世界报》记者哥登伯格；英国《工人日报》记者白瑞克；加拿大《论坛报》记者华特。他们在西安参观了西北国棉四厂、西北第一印染厂、西安人民搪瓷厂、西安农械厂、西安交大、西北农学院、马旗寨公社、省博物馆、半坡博物馆、华清池、大雁塔、乾陵。在延安参观了革命博物馆、革命旧址、柳林公社。参观访问中提问最多的是苏、匈、罗和加拿大记者。当西安晚报总编辑袁烙介绍西安情况时，问了以下问题：近两年来新建了些什么企业；工农业生产增长绝对数；市政建设及公用事业方面新旧对比数字。在交大询问了教师、职工的工资待遇、生活福利、政治课的内容、劳动时间、师生年龄结构、党团员人数、校长本人的出身经历等。在西安人民搪瓷厂问了产值、成本、生产计划。在华清池，当陪同何寓础（西安市人委秘书长）介绍“西安事变”情况时，古巴记者再三询问中共代表团成员及其活动情况。加拿大记者作了详细记录。《共青真理报》记者会后说，我们曾研究过“西安事变”的全过程及历史背景。在武功访问了西北农学院、农业科学院陕西分院、西北水土试验所。当农学院院长康迪介绍情况时，苏记者问：“近年来有些什么新的研究成就？”罗记者问：“在研究工作中是否和外国有联系？”捷记者

问：“学院是否有研究人员训练班？在校生有多少？各科系学生分别是多少？”保记者问：“中共中央八届十中全会宣布用20到25年实现农业技术改革，学院为此做了些什么？”参观了畜牧、小麦试验站、植物保护、昆虫、土壤、果木、遗传育种等系。专访了赵洪璋教授。苏记者问赵洪璋在培育出小麦良种后受到什么奖励。8月28日晚，记者团从武功普集乘火车前往洛阳。

巴基斯坦新闻工作者代表团一行4人，在出席了亚非新闻工作者会议以后，由团长、《巴基斯坦时报》驻拉瓦尔品第特派记者阿默率领，5月24日乘飞机从延安到达西安。代表团记者有卡拉奇记者协会主席伊纳姆、东巴记协秘书希拉茹、《自由》报编辑马克力。在西安期间，参观了大雁塔、西安交通大学。在交大座谈中提出：统一招生与个人志愿有无矛盾；有无外国留学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在科研、教学中如何体现等。客人离开西安前夕，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西安分会宴请了客人。5月25日上午，代表团乘飞机返回北京。

肯尼亚记者卡姆维梯·穆尼、约旦记者易卜拉欣·克雷希在出席了亚非新闻会议之后，6月1日由昆明赴北京途中在西安稍事逗留。他们专访了《陕西日报》总编辑丁济沧。

奥地利《人民之声报》记者杨尼，6月19日由昆明赴北京途中在西安过夜。他同《陕西日报》总编辑丁济沧进行了长谈。

南非记者摩利逊，6月28日—7月5日在西安参观了名胜古迹，主要是赴延安采访。

瑞士《新苏黎世报》记者许尔士，8月11日—13日在西安，参观了名胜古迹，访问了西北第一印染厂、西安人民搪瓷厂、西安仪表厂、西安交通大学、马旗寨公社等。在西安的活动以摄影为主。

应《人民日报》邀请来中国访问的越南《人民报》代表团一行3人，在劳动党候补中央委员、《人民报》总编辑黄松率领下，由《人民日报》副总编辑陈凌陪同，10月2日从北京乘班机前来西安访问。省委宣传部部长刘端菜、《陕西日报》总编辑丁济沧、陕西人民广播电台副台长武英、《西安晚报》总编辑袁烙、新华社陕西分社社长兼《人民日报》驻陕记者站站长朱波等到机场迎送。代表团在西安期间，省委书记处书记章泽会见并宴请。在会见时，着重交谈了陕西革命斗争史；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农村社教等问题。在丁济沧陪同下参观了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纪念馆、西北国棉四厂、西安开

关整流器厂、西安人民搪瓷厂、马旗寨公社，游览了名胜古迹。参观访问中热情友好，提问坦率，记得多，特别注意人民公社制度、农业生产情况、思想政治工作经验等。

阿尔巴尼亚通讯社社长阿耶特·西米季乌为团长的代表团一行4人，朝鲜中央通讯社社长裴基浚为团长的代表团一行5人，越南通讯社黄俊为团长的代表团一行2人，10月7日同机到达西安。三个代表团主要是前往延安参观访问。在西安停留期间，参观了名胜古迹。

瑞典电台新闻部主任魏克伯姆10月25日—30日在西安参观访问。主要是参观名胜古迹，访问工厂、学校和农村。

日本工业展览会记者团一行10人自费旅行，11月10日—14日来西安采访。他们是亚通社篠厚则省，共同社松尼好治，每日新闻社崎博太郎，朝日新闻社竹正田，日本广播电台栗原贡、网代守男，经济新闻社细金正人，读卖新闻社大久保户（团长），产经新闻社石川基，中部新闻社浅井陆男。他们参观了西安仪表厂、马旗寨公社、西北农学院、西安交通大学、省博物馆、大雁塔、华清池，观看了地方戏。新闻工作者协会陕西分会会长丁济沧设宴招待。在参观中很注意我国进口的东西并作了记录。通过多方提问了解中国经济情况。其中，浅井、石川基拍照落后面和猎奇镜头较多。此外，石川基专访了基督教牧师王道生。松尾专访了小业主杨春祥（西安帆布厂副厂长）。石川基、网代在临行前会见了日侨矢口久夫妇，矢口久夫妇均到车站为代表团送行。

1964年接待来自18个国家和地区的新闻界29批85人。其中：

日本新闻界人士9批31人。3月14日—28日，日本电波新闻社《日共领导》编辑樱井功三、摄影记者藤井良孝，由洛阳到陕西为拍摄电视进行采访。在陕期间，除西安市人委秘书长何寓础介绍西安市政建设情况外，主要在八路军办事处纪念馆、华清池、西北国棉四厂、西安交大、郭家滩俱乐部、大雁塔、钟楼、半坡博物馆、西北农学院、礼泉县烽火大队参观点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拍摄。临行前省广播电台副台长武英设便宴招待。4月1日—8日，《赤旗报》驻京记者高野好久，在陕期间参观了西安人民搪瓷厂、西北国棉四厂、马旗寨公社、礼泉县烽火大队，游览了名胜古迹，专访了作家柳青，观看了地方戏，陕西日报总编辑丁济沧设宴招待。在延安访问了老赤卫队员白玉德和著名盲艺人韩起祥，主要是了解毛泽东主席在延安13年的活动情况。4月20日—23日，《每日新闻》记者高田富佐雄、《日广播协会》



记者石井克己、《朝日新闻》记者桑田弘一郎、《读卖新闻》记者中村建五、《西日本新闻社》记者工藤尚比古、《经济新闻》记者新井明、《共同社》记者斋藤忠夫一行7人，随日本松村谦三来西安和延安进行参观访问。5月9日—11日，东京广播报导局局长桥本博和新闻部副部长宿谷里一，由北京电台副台长戴临风陪同，从北京乘班机来西安，11日去上海。在西安主要是游览名胜古迹，参观了西北国棉四厂，为电视节目拍照了很多资料。西安市广播电台设便宴招待。5月12日—14日，《新闻社》记者本田良介等2人，在西安参观了名胜古迹，即去延安参观。7月3日—9日，《电波新闻社》记者大小岛嘉一，随同亚洲八国和地区的佛教代表团由北京来西安，主要是拍电视新闻，除拍摄了“玄奘逝世1300周年纪念法会”等活动外，还到各名胜古迹点以及八路军办事处、东大街、西安人民搪瓷厂参观采访，在礼泉县烽火大队专访了党支部书记王保京。10月29日—11月2日，《南日本新闻》记者久保户一、《河北新报》记者武藤守、《北海道新闻》记者林茂保等一行，在西安参观了西北国棉四厂、西安人民搪瓷厂、马旗寨公社、省博物馆、半坡博物馆、大雁塔、华清池，主要是拍摄新闻资料。10月29日—11月15日，日本广播协会报导局政经部副部长家城启一郎、编导依田实、摄影师岸本胜等一行3人，在西安、延安参观采访了工厂、农村公社，游览了名胜古迹。11月28日—12月3日，日本《北京广播听众之会》访华代表团一行10人，由日本记者会议副议长浅海一男率领，从北京抵西安、延安参观访问，在西安期间主要参观游览了名胜古迹，省电台副台长胡旭设宴招待了代表团。

丹麦《贝林氏时报》驻伦敦首席记者沙里3月23日由北京乘班机抵西安，在西安参观了西北国棉四厂、西北第一印染厂、省博物馆、半坡博物馆，游览了大雁塔、华清池、兴庆公园，观看了成都魔术杂技表演。3月26日乘班机返京。

朝鲜《劳动报》驻京记者洪铨钟4月1日—8日在西安参观了西安人民搪瓷厂、西北国棉四厂、礼泉县烽火大队、省博物馆、半坡遗址。看得细、记得勤、问得深，游览了大雁塔、华清池，他还在延安访问了老赤卫队员白玉德和艺人韩起祥。《陕西日报》总编辑丁济沧设便宴招待。

越南新闻界人士3批9人。越南《人民报》驻京记者黎思荣和日本驻京记者高野好久4月1日—8日到西安和延安参观采访。《陕西日报》总编辑丁济沧设宴招待了他们。

越南《学习》杂志代表团团长武莲、团员阮春容、黎中越等一行4人，10月6日—10日由中共中央《红旗》杂志副总编范若愚陪同抵西安参观了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半坡博物馆、省博物馆、车马坑遗址，游览了名胜古迹，观看了地方戏曲。去延安参观了两天。省长李启明会见并宴请。

越南通讯社副社长黄思斋带领的摄影代表团一行4人，10月23日—11月2日在西安、延安访问。在西安拍摄了西安高压电瓷厂、西安仪表厂、西安人民西安人民搪瓷厂、陕西第一毛纺厂、八路军办事处纪念馆、省博物馆、半坡博物馆、大雁塔，游览了华清池。省委书记处书记冯基平接见并宴请。

意大利电视记者西法利埃罗，5月29日—6月1日在西安参观了工厂、农村，游览了名胜古迹，主要是为下一步采访了解情况，熟悉线路。

瑞士新闻界人士2批3人，即：瑞士记者施徒基，于6月4日由北京乘火车抵西安。在西安主要参观工厂、农村，参观西安人民搪瓷厂时拍了接待室及展览室悬挂搪瓷制作的列宁、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头像；参观省博物馆时拍了“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等标语；在游览市容时拟拍杂货摊、破旧房屋，被群众阻止；在参观农村时，拍摄了农民耕作中用的农具和牲畜等。在参观中还对干部、学生每年下放到农村或工厂劳动一个月的规定提出异议，并向农民了解其反映等。此外，还游览了名胜古迹。10月23日—27日，自由撰稿人许多斯泰来西安采访，主要是拍照文物古迹，在西安仪表厂重点拍了精密仪器。

在新华社总社工作的印度专家萨尔码、比利时专家阿莱特（女），7月3日—12日在西安、延安参观访问。他们在西安参观了名胜古迹，专访了礼泉县烽火大队、西安人民搪瓷厂、西北国棉四厂、西北第一印染厂和西北农学院，并访问了曾参加过1947年延安保卫战的解放军大校徐立林，观看了秦腔《三滴血》、碗碗腔《江姐》等节目。新华社陕西分社设便宴招待。

法国“世界新闻公司”电视记者奥伯格等3人，8月19日—22日来西安采访。在西安拍摄了西北第一印染厂、西北国棉四厂生活区、郭家滩工人俱乐部职工业余文化活动、跳伞运动俱乐部、武术表演、杂技、京剧现代戏《延安军民》、以及马旗寨公社民兵演习等活动照片。专访了西安交通大学，游览了名胜古迹，还赴延安进行采访。

中国广播事业局泰国专家素集和广播学院巴基斯坦孟加拉语教师赫奎，8月18日—27日在西安、延安参观访问，在西安重点参观了西安人民搪瓷

厂、西安仪表厂、西北国棉四厂、西北第一印染厂、西安中兴电机厂、马旗寨公社，游览了名胜古迹，观看了电影《三滴血》等，西安广播电台副台长于成宴请了客人。

联邦德国自由撰稿人汉勒，10月9日—12日由太原来西安采访，主要通过游览市容参观工厂和专题座谈，了解各地怎样克服三年困难的，今后的展望以及对国内外生活的影响等。

由老挝爱国战线党中央宣传文教部委员坎马·富贡、寮国战斗部队指挥部政治宣传科长通化、电台编辑马哈波班、《爱国报》编辑真堤等4人组成的老挝爱国战线党新闻工作者代表团，在团长坎马·富贡的率领下，10月12日—18日由太原来西安和延安参观访问。在西安参观了西北第一印染厂、西安人民搪瓷厂、西安热水瓶厂、西安高压电瓷厂、西安交大，游览了名胜古迹。坎马团长还向西安新闻界400多人作了关于老挝革命斗争形势的报告。

挪威国家广播电台记者蒙德·柯斯，10月16日—21日来西安采访，参观了工厂、农村和西安交大，游览了名胜古迹，并和中国新闻工作者协会陕西分会会长丁济沧座谈了陕西概况，主要是了解国防工业情况。

英国《每日快报》记者斯马特，11月7日—11日来西安，参观了工厂、农村，游览了名胜古迹，主要了解宗教信仰情况、社会秩序状况，从穿着看人们的生活水平，并赴延安参观。《每日快报》文学编辑济曼及夫人11月22日—25日在西安参观了工厂、学校，中国科学院西北分院院长时逸之接见了他们。

加拿大《环球邮报》驻京记者泰勒11月22日—12月3日来西安采访。曾去延安、洛阳作短暂停留。在西安通过参观工厂、农村，主要了解发展工农业生产的基础情况，国家、集体、个人之间关系，特别是重工业，尤其是苏联专家在西安的情况，以及撤走后所造成的损失等等，并专访了省人委副秘书长郭力道。

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宣传广告部经理古莱希及摄影师伯力（瑞士人），12月5日—8日来西安、延安参观，在西安参观了工厂、农村和学校。主要了解工农业建设，特别是重工业情况。

新华社新西兰报道员罗娜吧依莱和她的女儿12月25日—30日在西安和延安参观。在西安参观了工厂，游览了名胜古迹，观看了地方戏曲，副省长刘邦显接见并设宴招待。

1965年共接待来自21个国家25批108人。其中：

日本6批17人，即：2月4日—8日日本经济新闻驻京记者鲛岛敬治、西日本驻京记者宫田弘司，在西安参观了马旗寨公社、西北国棉四厂、西北第一印染厂、西安人民搪瓷厂、西安农械厂，游览了名胜古迹，座谈了西安城建远景规划，一天拍照了11卷胶卷。拍摄有人民群众欢度春节景象、工厂车间、城市建筑，也拍照了拉架子车和卖茶水的小摊等。

日本新闻社编辑部长山田昭、总务部长田岛淳和社长佐藤重雄的夫人佐藤福，4月10日—15日自北京来西安、延安参观访问。在西安参观了工厂，游览了名胜古迹。省委宣传部部长刘端棻会见了客人。

日本电影代表团一行7人5月8日—21日由团长岩崎昶率领，在西安参观了工厂、游览了名胜古迹，专访了西安电影制片厂，省委宣传部设宴招待。

日本广播电台驻京电视记者大越幸夫于6月8日—12日来西安，拍摄了西安仪表厂、西北第一印染厂、西安交大、阿房宫公社及名胜古迹等许多镜头，在途中要求停车抢拍拉架子车、蹬三轮车的工人，已被烧毁了的小茅屋以及破窑洞、躺在林阴下休息的人们。

日本共同社记者山田礼三8月17日—19日来西安采访。游览了名胜古迹，主要是通过参观工厂、学校，了解西安所处的战略地位和作用，专访了城建方面的主要负责人。

日本广播协会教育局教养部导演香川宏（团长）、导演田川纯三和广播业务局电影部摄影员清水幸浩3人组成的“中国文明的传统”采访团，11月7日—21日来西安采访拍摄电视片。该协会是日本半官方机构，拥有322个地方电视台和电视转播台的全国电视网。在陕西采访拍摄共计28个项目，分别有咸阳附近的渭河、黄土埧地、窑洞、市容、西安车站和名胜古迹及纺织城福利设施等。

新华社、建设杂志社和北京周报社共同组织9个国家的专家、报道员等13人3日—11月来西安参观访问，计有阿根廷报道员胡安·海尔曼，智利卡雷拉，古巴德雪沙夫妇，英国邱茉莉，陈天声，意大利报道员本萨逊，法国西昂达尔，日本冢河龟重光夫妇，印尼艾尔曼夫妇，委内瑞拉报道员罗哈斯。客人分别参观了工厂、农村、学校，游览了名胜古迹，进行了专题座谈，观看了地方戏曲。

意大利《人民报》记者利吉·内比奥洛，3月11日—14日来西安参观了

工厂、学校、农村，游览了名胜古迹，市人委副秘书长王岱云介绍了西安概况，并和几位农民代表进行座谈。

印度尼西亚3月—10月有3批20人来西安参观访问：印尼记协秘书长、《火炬报》副总编辑格拉哈，3月27日—4月3日在西安参观了工厂、学校、农村，游览了名胜古迹后乘机返回北京。印尼新闻工作者代表团团长尤素福一行16人，于10月5日下午由延安乘机抵达西安，8日中午乘机回北京。在西安参观了工厂，游览了名胜古迹，出席了西安新闻界庆祝建国15周年联欢晚会，专访了咸阳机器制造学校半工半读的教学法，西安音乐学院教学与实践相结合的办学经验。印尼安塔拉通讯社代表团3人，10月19日从上海来西安和延安参观访问，25日赴北京。在西安参观了工厂，游览了名胜古迹，专访了西安医学院、西安音乐学院、新华社陕西分社。该团率先提出应在各参观点陈列品上配注英语译文，以便外宾加深印象，提高宣传效果。

土耳其《自由报》记者锡帕西奥格鲁及《共和国报》外交经济报道员阿加尔，4月10日—11日。在西安参观了工厂、农村，专访了城隍庙商场，游览了市容和名胜古迹。观看了全国篮球队在西安的比赛。

罗马尼亚通讯社社长安德列·维拉带领的新闻代表团一行5人，4月13日—16日来西安，参观了工厂，游览了名胜古迹，和西安音乐学院附中的学生举行了音乐联欢晚会。省委书记处书记严克伦会见并设宴招待。

法国4—10月有2批22人来西安参观采访：法国《新观察家》杂志记者卡奥尔、巴黎大图片社摄影师里布，4月17日—24日来西安和延安采访。在西安参观了工厂、学校、农村，游览了名胜古迹，专访了西安外国语学院和全国劳模植棉能手张秋香，拍照了建筑工地、考古发掘现场。很注意了解工农业建设及人民生活情况。法国艺术知识杂志社旅行团一行21人，10月20日—23日来西安自费旅行。

加拿大4—11月有3批4人在西安参观采访：加拿大肯尼迪旅行社组织的《多伦多星报》记者马克·盖恩，于4月19日—24日来西安采访。在西安参观了工厂，游览了名胜古迹，游逛了城隍庙商场、郭家滩商场、东大街商店，专访了作协西安分会副主席胡采，交谈了近代文艺思潮问题，还专程赴草滩农场和美国友人阳早、寒春夫妇共进晚餐。盖恩十分注意市场供应情况。《索桑新闻社》社长林奇5月4日—24日来西安采访，参观了工厂、农村、学校，游览了名胜古迹。在参观中与工人和教授进行了社会主义社会特点的专题座谈。加拿大自由撰稿人哈灵顿和夫人（作家）于11月4日—9

日，在西安参观了工厂、农村，游览了省博物馆、半坡博物馆。重点了解工厂的发展过程，农民解放前后的生活对比，并进行了家访。在延安重点了解毛泽东主席在陕北的活动，拍摄了大量素材。

坦桑尼亚5月份来西安参观访问的有2批10人：坦桑尼亚新闻工作者代表团一行4人，于5月9日—12日在西安、延安进行参观访问。专访了西安交通大学、临潼县广播站，游览了名胜古迹。由坦桑尼亚政府新闻部副部长、坦盟中央委员、全国执行委员姆旺吉西率领的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代表团一行6人，5月17日—20日在西安参观了工厂、农村，游览了名胜古迹，观看了舞剧《红色娘子军》和电影《李双双》，副省长林茵如会见并宴请。

世界著名电影编导伊文思（荷兰）和他的学生玛瑟琳（法国），5月20日—29日由北京来陕西访问。伊文思说1938年去延安曾路过西安。在西安期间参观了工厂、学校，游览了名胜古迹，专访了西安电影制片厂，省文化局林理明副局长设宴招待了老朋友，伊文思说从对比中看新旧变化，才有天地之别的感受。

几内亚电影代表团在团长鲍布·肖率领下一行3人，9月20日—24日来西安，参观了工厂，游览了名胜古迹，专访了西安电影制片厂，在座谈中强调主要是表现人物、表现新的人物、有活力的人物。

阿尔巴尼亚新闻工作者代表团一行5人，在阿《战士报》总编辑瓦西尔·居拉麦蒂率领下，10月6日—10日来西安、延安参观访问。在西安参观了西安人民搪瓷厂，西北国棉一厂，重点访问了赵梦桃小组，游览了名胜古迹，看得细、问得深、记得多，陕西省新闻工作者协会设便宴招待。

苏联新闻工作者代表团团长布拉金一行3人，成员有《共产党人》杂志观察家彼得连科、苏联新闻通讯社工作人员卡雷莫夫（懂汉语），10月31日—11月5日由北京来西安、延安参观访问。在西安参观游览了名胜古迹，重点访问了西安人民搪瓷厂、西北第一印染厂、西安交通大学，同《陕西日报》的编辑和记者进行专题座谈。他们所到之处记物价数字，摘抄标语、口号、黑板报、墙报，走街串巷到晚11时许。多次询问地方党组织与工会、共青团、各级政治部的关系、工作任务、人员数字等。

波兰《人民论坛报》驻京记者留林斯基，11月20日由长沙乘车来西安自费采访，11月24日返回北京。在西安参观了西安人民搪瓷厂、西北国棉四厂、马旗寨公社及省博物馆等名胜古迹，专访了西安交通大学半工半读办

学方法。

1966年接待来自24个国家17批73人。其中：

联邦德国新闻社驻京记者巴格曼2月1日—4日。在西安期间参观了工厂和学校，游览了名胜古迹。通过参观主要是观察询问经济建设情况，第三个五年计划扩大多少？在商店摘录商品价格等。

阿根廷新闻代表团一行2人，阿报刊工作者联合会总书记埃米略·豪雷吉和助理书记爱德华多·阿萨米，3月10日—14日在西安、延安进行参观访问。3月15日上午乘机回北京。在西安参观了西安高压电瓷厂等。对于工厂发展变化，产品销售，设备自造还是进口，工厂组织机构以及工会、共青团与党委和行政等关系进行了座谈。观看了电影《地道战》，省新闻工作者协会举行便宴招待。

匈牙利《人民自由报》兼通讯社驻北京记者郭记诗偕匈驻华使馆随员叶华3月16日—19日在西安参观了工厂、农村，游览了名胜古迹，专访了西安美术学院副院长刘蒙天、西安晚报总编辑袁烙。

出席亚非记协书记处第四次全体会议（扩大）的七国代表12人（朝鲜2、日本2、津巴布韦3、莫桑比克2、印尼1、几内亚1、坦桑尼亚1），在新华社副社长邓岗陪同下，于4月29日—5月3日访问了西安、延安。代表们在西安访问期间，参观了西安庆祝五一节的联欢晚会及游园活动，参观了工厂，游览了名胜古迹，专访了咸阳机器制造学校，采访半工半读办学经验。副省长傅子和、西安市市长徐步接见并宴请。

日本5—12月有4个团21人来西安参观和采访。即：以野间省一为首的日本出版代表团一行6人，5月6日—9日西安访问，参观了农村、工厂，游览了名胜古迹，在农村提出了人口增长、收入分配、公社组织机构、干部来源、社员业余文化生活及日常生活等问题，并家访了几户贫农家庭，看得细，问得多。日本教育电视妇女摄影队一行3人，团长获原幸子、编辑渡边惠子、摄影师水口启子，7月19日由北京乘飞机到西安，25日乘机返回北京。主要拍摄活动在延安进行。日本驻北京记者高田富佐雄等一行11人，8月14日由北京来西安、延安自费旅行并采访，18日去洛阳。在西安参观了农村、工厂，游览了名胜古迹，在参观活动中很注意“文化大革命”初期机关、学校门前的大字报，一有机会就拍照。或用录音机录入群众的辩论实况。日本《读卖新闻》论说委员高木健夫作为孙中山史迹参观团团长，于12月2日—6日由太原来西安、延安旅行。在西安参观了西安高压电瓷厂、

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等，观看了电影《红色娘子军》。

老挝爱国力量新闻代表团一行2人，在团长、老挝之声电台台长扎伦·翁桑昂率领下，5月6日—11日在西安参观了工厂、农村，并向陕西省和西安市的新闻工作者介绍了老挝人民反美救国斗争的英雄事迹。

北欧丹麦、芬兰、挪威、瑞典四国新闻工作者一行8人，5月9日—11日在西安专访了西安高压电瓷厂和马旗寨公社等，和下乡的知识青年进行座谈。参观游览了省博物馆等名胜古迹。挪威的斯莱顺、瑞典的勃让台尔对文物古迹感兴趣，参观访问中抓住一个问题追问到底，拍照多，对矮房子、衣着破烂的群众以及工厂里有关反美墙报和漫画等不放过。

乌拉圭《前进周报》编辑、记者卡洛斯·马利亚·古蒂雷斯5月26日—29日在西安、延安参观访问。在西安主要参观了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等文物古迹。

秘鲁新闻工作者代表团一行4人，在团长阿尔塞率领下5月27日—6月3日访问了西安外国语学院、西安音乐学院，观看了地方戏曲，省新闻工作者协会理事长包小白等设宴招待。

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的外国专家来西安、延安参观访问。他们是：美国的李毅白（1945年曾到过延安，毛泽东接见过他，通汉语）、越南的范询、锡兰的康德萨末、智利的巴拉西奥斯及夫人，由三名翻译陪同，5月31日—6月12日在西安参观了工厂、农村和高等院校，与新闻工作者进行了专题座谈。省人民广播电台设宴招待了四国专家。

参加第二期亚非记者进修班的坦桑尼亚新闻工作者一行4人，7月12日—17日由新华社记者史立成陪同来西安、延安参观访问。客人在西安期间，应邀参加了西安各界人民援越抗美大会。参观了西安人民搪瓷厂和半坡博物馆等名胜古迹，观看了地方戏曲，省新闻工作者协会设宴招待。

阿富汗新闻代表团一行3人，在团长齐亚·考里查达率领下，于7月27日—31日由新华社记者冯健伟陪同来西安、延安参观访问。客人在西安参观了西安高压电瓷厂，并在福利区进行家访，和幼儿园孩子一起唱歌跳舞。还游览了名胜古迹。在延安专访了著名民间艺人韩起祥。省新闻工作者协会设宴招待。

巴基斯坦新闻代表团吉拉尼、阿里汉等一行4人，10月9日—14日在西安参观了工厂，游览了名胜古迹，观看了地方戏曲。在延安专访了农村梯田建设。



新华社玻利维亚报道员豪尔杰·埃恰斯，11月19日—25日在西安、延安参观访问，参观了西安电力电容器厂和名胜古迹，专访了“西安事变”旧址。

1967年接待来自11个国家7批28人，其中：

参加亚非记协书记处第三期训练学习的印尼（2人）、莫桑比克（2人）、西南非（2人）、南非（1人）学员一行7人，2月20日—26日抵陕，主要是去延安参观访问，在西安参观了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等文物古迹，同西安歌舞剧院等单位文艺工作者进行了联欢。莫桑比克宗齐和印尼《东星报》编委拉斯基德作致谢讲话和演唱等。在延安专访了老红军戴义才、老乡长杨成富等。

中央广播事业局马来西亚专家马丁及夫人蔡真5月5日—16日来西安、延安参观。在西安参观了西安交通大学、西安实验小学、西安汽车配件厂、西安高压电瓷厂、西安人民搪瓷厂、跃进公社，并和红卫兵、职工、社员座谈了“文化大革命”。

日本记者同盟代表团一行5人，在团长小林雄一率领下，5月12日—15日在西安、延安访问，在西安参观了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西安交通大学、省东方红展览馆，游览了华清池。

北京广播学院尼日尔专家哈密杜·依德里萨，6月6日—8日在西安参观了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西安高压电瓷厂，游览了华清池。

加拿大《环球邮报》记者肯蒙得，6月14日由太原乘车来西安，6月22日乘机去重庆，在西安逗留期间曾于6月17日乘机去兰州，6月21日返回。在西安只游览了华清池，重点参观“西安事变”时蒋介石跳窗爬山的现场，并说“我不久将去台湾拜会蒋介石，不知蒋介石作何答复？”

在中央广播事业局工作的锡兰专家达姆比，7月5日—17日在西安、延安参观访问了工厂、农村、学校，与红卫兵及工人座谈了“文化大革命”。

亚非记协主办的亚非记者进修班学员9人（刚果〈布〉4人、刚果〈金〉2人、几内亚2人、西南非1人），7月10日抵西安、延安参观，7月15日返回北京，客人在西安参观游览了名胜古迹，专访了西安交通大学。

1968年11月24日—30日，中共中央编译局哥伦比亚专家恩利和夫人埃尔维亚（在北京国际关系学院任教）由上海来西安、延安参观。在西安逗留期间参观了陕西第一针织厂等，重点了解“西安事变”发生地——临潼华清池，通过参观主要了解“文化大革命”情况。

1969年上半年路过西安前往延安参观的新闻界人士先后有：印尼苏一佩诺·乌玛富义德；日本杉山士平及夫人；坦桑尼亚萨里姆及夫人；亚非新闻协会总书记查禾多及夫人等。他们在延安主要是参观革命旧址和纪念馆。

1970年共接待了2个国家2批7人来访。其中：

9月10日—17日，美国新闻界知名人士斯诺及夫人洛依斯·斯诺，由外交部黄华同志（以对外友协理事名义）陪同来西安、延安访问。在西安参观了西安人民搪瓷厂、西北国棉一厂、西安市十九粮店、半坡博物馆、钟楼、鼓楼、大雁塔、华清池；并赴渭南县双王公社双王大队进行采访。在西安还观看了舞剧《白毛女》和秦腔《智取威虎山》。省革委会常委谷凤鸣设宴招待客人。斯诺夫妇在西北国棉一厂颇有兴趣地听取了中共中央委员吴桂贤关于该厂学习毛泽东思想的介绍，观看了职工业余演出，并与吴桂贤共进午餐。在参观西安人民搪瓷厂时，对该厂向他们赠送的两个毛主席搪瓷像（其中一个1936年斯诺在陕北保安县〈今志丹〉拍照的）很激动，并了解了该厂的生产、工人生活等情况。

10月18日—22日，由阿尔巴尼亚《人民之声报》编委会秘书长哈姆迪·索拉库率领的阿尔巴尼亚新闻工作者代表团一行5人，乘飞机抵西安、延安参观访问。抵离西安时，省革委会常委谷凤鸣，省革委会、西安市革委会政法组负责人，以及陕西日报社、陕西广播电台、新华社陕西分社等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前往机场迎送。代表团在西安期间参观了西北国棉四厂、小新村生产队，游览了华清池、大雁塔，观看了舞剧《白毛女》。省革委会副主任胡炜会见并设宴招待。

1971年抵陕访问的有：外国驻京记者和临时访华记者一行29人，由中国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袁鲁林等陪同，于6月12日—22日由省革委会办事组副组长鲁曼等陪同在西安参观访问。同年8月26日—29日，法国杂志社社长麦克斯一行2人来西安。参观了“八一”人民公社、八路军办事处纪念馆，游览了大雁塔、华清池，专访了西北大学。省革委会办事组副组长鲁曼宴请了客人。

1972年4月5日—7日，应人民日报邀请，由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劳动新闻》总编辑李用孟率领的劳动新闻代表团一行7人（包括驻京记者1名），来西安访问。代表团抵离西安时，省委书记萧纯、省委宣传部领导小组副组长章坚、陕西日报社何微、新华社陕西分社何奇、陕西人民广播电台周惇等迎送。章坚陪同参观了名胜古迹。在西安焊接工具厂还举行了专题座

谈。萧纯书记设宴招待。同年6月26日—28日，日本名古屋广播电视台拍摄小组一行5人来西安。主要是采访拍照，参观名胜古迹点，专访了西安特种工艺厂和省博物馆石刻馆，省广播电台负责人胡旭设宴招待。

1976年6月19日—21日，马达加斯加新闻代表团一行5人，由新华社陕西分社、陕西日报、省广播电台负责人陪同，在西安访问，抵离时新华社陕西分社、陕西日报、省广播电台负责人等到机场迎送，省革委会为客人举行了欢迎宴会。同年12月20日—24日，塞浦路斯记协副主席卡赞巴斯夫妇一行，在延安参观访问后来西安，由新华社陕西分社负责人陪同访问，抵离时新华社陕西分社负责人到机场迎送。

1977年3月15日—17日，南斯拉夫记协代表团一行17人，由省外办主任鲁曼，新华社陕西分社、陕西日报社负责人和省广播事业局局长何奇等迎送并陪同在西安参观访问，省革委会副主任章泽会见并宴请。同年6月2日—5日，老挝新闻代表团一行2人来西安，省外办主任鲁曼迎送并陪同在西安参观访问。省革委会副主任章泽会见并宴请。后去延安参观。同年10月20日—21日，朝鲜中央通讯社代表团一行6人来陕访问。由省外办主任鲁曼等到机场迎送并陪同在西安参观访问，省革委会副主任章泽会见并宴请。

1978年4月24日，英国记者韦德夫妇来西安访问。

同年5月22日，瑞中友好联合会名誉主席杨·米尔达尔等一行5人，由北京来陕拍摄电视片。杨·米尔达尔是瑞典著名进步作家，反修反霸立场鲜明，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曾多次访华。他长期从事瑞中友联工作，对宣传中国和促进中瑞两国人民相互了解作出了积极贡献。

他这次来陕，计划拍摄长度为45分钟的电视片两部，主题为：拍摄西安文物古迹，介绍中国历史；拍摄延安柳林大队，介绍中国农业。5月22日—6月8日，在西安活动。根据全国对外友协通知要求并商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局，拟同意他拍摄半坡博物馆、车马坑、秦始皇陵、华清池、大雁塔、小雁塔、乾陵、茂陵、昭陵、兴教寺、钟楼、鼓楼、八路军办事处纪念馆、省博物馆、咸阳古渡遗址、西城门楼、顺陵、大明宫麟德殿、大清真寺、兴善寺、阿房宫遗址、华严寺、草堂寺等26处文物古迹，以及户县农民画展览馆及一二个生产队业余美术活动，并同意他拍摄秦俑坑新馆外景和已公开报道的兵马俑。

6月8日杨·米尔达尔乘车去延安，拍摄柳林大队和黄帝陵。他先后于1964年、1969年、1975年三次访陕，在延安市柳林大队采访了月余时日，

写了《来自中国农村的报道》和《中国革命在继续》两本书，客观地介绍了柳林大队的变化及各方面的状况，在欧洲影响很大。这次来还赠送给柳林大队一辆手扶拖拉机。此行拍摄了该队生产劳动、政治活动方面的场面。

抵离西安时，对外友协陕西分会副会长李志忠迎送，省革委会宴请，对外友协陕西分会会长鲁曼参加。

同年10月16日—17日，联邦德国新闻代表团一行17人，由省外办副主任白玉峰迎送并陪同在西安访问。省革委会副主任章泽会见并宴请。

1979年接待各国记者团组23批306人，其中主要有：

日本《读卖新闻》访华团。该团在北京、西安、郑州、合肥、南京、上海、广州等地参观采访后回国前夕，秘书长釜井卓三和团员田川五郎（田川诚一之弟，两人均系对中国友好的老朋友），对这次来访，先后向中方谈了一些感想和意见，他们说，3月23日来访，达到了预期目的，看到了中国的大好形势，回国后将撰写长篇连载，进行系统报道。通过访问，得到的基本认识是：政治思想比预料的活跃一些；经济发展比预料的迟缓一些；社会秩序比预料的混乱一些；实现四个现代化比预料的困难一些。釜井表示他在京常驻多年，了解哪些该报道，哪些不该报道，有些看法只是提供参考。

同年8月10日—15日，中国电视台和日本广播协会（NHK）联合拍摄电视纪录片《丝绸之路》空中拍摄组一行4人（日方2、中方2）。租用西北民航局云雀式直升机一架在西安、兴平、乾县上空超低飞行，拍摄西安市容、钟楼、大雁塔、茂陵和乾陵。

1980年接待来自8个国家和地区新闻记者32批199人，其中日本10批40人，美国9批42人，意大利2批74人（随总统团72人），亚非记协常驻代表查禾多一行6人，9月24日—26日由对外友协陕西分会副会长孙木一迎送并陪同在西安参观访问。副省长刘庚会见并宴请。

1981年接待来自16个国家和地区新闻记者51批267人，其中美国18批111人，日本13批80人，英国霍士海影业公司及香港龙影业公司合拍电视纪录片《中国人》（暂定名），采访选点先行组一行8人，10月29日—31日在国务院侨办和中国新闻社与中央广播事业局所属中国电视服务公司工作人员张树人等6人陪同下，由北京乘飞机到达西安选点采访，主要是以古代陈列文物、地面陵墓（含周围旧舍山庄景色）、寺庙、古战场和典故传奇等遗址。

1982年5月17日—20日，日本新闻代表团一行17人，在西安参观采

访，抵离时省外办副主任魏明中到机场迎送。副省长李连璧会见并宴请。

1983年接待来自4国5批34人，其中：

4月18日—20日，美国记者怀特夫妇来西安采访，并参观秦俑馆、八路军办事处纪念馆、大雁塔等。

同年7月22日—24日，匈牙利联新社BARACS DEVES来陕采访，专程前往清真寺、陕西省歌舞剧院、西北国棉四厂，进行专题座谈。

同年10月5日—7日，日本新闻机构编辑、报道局长自费访华团一行13人，在外交部新闻司邬木兰、李文亮陪同下抵达西安，主要人员有：读卖新闻编辑局长水上健也为团长、日本电视网报道局长藤川魏也为秘书长、团员有朝日新闻编辑局副局长、每日新闻大阪总社编辑局长、日本经济新闻编辑局副局长、中部日本新闻总社编辑局副局长、共同社编辑局长、时事社编辑局长、日本放送协会报道局副局长、东京放送报道局长、朝日放送外报部长、北道新闻东京分社编辑局长、西日本新闻社编辑局长。省外办主任魏明中在陕西宾馆设宴招待。客人在西安参观游览了大雁塔、省博物馆、秦俑馆等名胜古迹，走访了西安东大街的商店。

同年10月20日，美国新闻工作者代表团一行16人来陕参观访问。

同年11月8日—9日，新西兰《奥克兰星报》记者帕特·布思和克赖斯特彻奇市《新闻报》记者肯·科茨到西安采访。他们此次访华系新中友协主席杰克·尤恩推荐，主要是了解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执行新经济政策后所取得的成就，精神文明建设开展的情况，以及人口政策，司法制度，中新两国在农业方面的贸易和技术合作的前景等问题。参观了秦俑馆、省博物馆、清真寺等名胜古迹。观看了《唐·长安乐舞》。

1984年接待来自美国的新闻界2批20人，其中：

4月6日—9日，美国新闻记者团一行17人，在外交部新闻司路器土等3人陪同下来西安采访。记者团由ABC广播公司、哥伦比亚CBC广播公司、全国NBC广播公司、有线电视CNN新闻网、公共PBS广播公司、美《新闻周刊》、《时代周刊》等组成。记者团来西安主要为在里根总统访华前向美国人民做些关于中国情况的介绍，停留期间拜会了省政府、省军区有关方面负责人，参观了人民公社，阎良、高陵等地的农贸市场和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省博物馆，大雁塔等名胜古迹，观看了地方文艺节目，并拍摄了里根总统行驶路线的沿途景色和参观点部分镜头。《新闻周刊》记者还专访了副省长白纪年，同陕西日报社有关人员进行了座谈，赴耿镇、阎良进行了专题采

访。

6月5日—12日，美国著名记者和作家《纽约时报》前副总编辑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偕夫人及其好友谢伟思等3人，在北京军事博物馆副馆长秦兴汉、外交部三等秘书张援远（兼翻译）陪同下，从兰州乘火车到达西安。他们是为编写《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沿中国工农红军当年长征的部分路线5个省（区）前来陕西采访。在陕西期间，专访了刘志丹烈士夫人同桂荣，以及她的女儿刘力贞与女婿张光。并同西北大学、省党校几位教授、学者进行了专题座谈。还专程赴延安、志丹、吴旗等地采访；又和几位落户吴旗县城附近的长征老红军进行了长时间的具体交谈。离开西安前，省外办主任魏明中设宴欢送。

1985年来访的有3个国家和地区新闻记者共6批32人。他们是：

美国新闻界老朋友“重访中国代表团”一行17人，3月29日—31日在西安参观访问，省委副书记周雅光会见并宴请。

日本奈良《日日新闻》总编辑服部明行率新闻大厦建设技术代表团一行11人，4月10日—20日来西安洽谈合作事宜，省长李庆伟会见，副省长张斌设宴招待。

美国《中报》董事长傅朝柜先生于6月9日来西安参观。省委副书记周雅光会见并宴请。

美国得克萨斯州《达拉斯晨报》记者弗莱海文女士，7月2日—3日在西安参观期间，并以“美国新闻界的现状和报纸、广播、电视的特点”为题，在陕西日报社作了学术交流讲座。

美国华尔街杂志（wallstreet Journal）记者 Barry Kya mer 8月24日—26日来陕采访。

美国华盛顿邮报记者 Soutberland 12月20日—23日来陕采访。

1986年接待外国记者36批57人。

1987年接待来自5国的新闻记者11批42人。他们是：

美国驻华记者时天佐2月20日来陕，要求采访政治、经济改革方面的情况，并于2月23日去宝鸡进行专题采访。

美国ABC、USA柯达德，3月18日—20日采访了西安电影制片厂厂长吴天明，私自去锦江饭店了解爆炸事件，又去西安交通大学进行了专题采访。

瑞典电视二台施登豪尔姆，3月30日—4月2日采访米脂黄土高原治理

研究所，访问了研究员朱象三和农民高志升。在延安除参观革命旧址外，又专访了枣园村雷治富。在西安参观了名胜古迹。

美国华尔街报驻香港记者朱丽塞尔，4月26日—5月3日采访了省第一监狱、省高级人民法院、西安市计划生育委员会、西北国棉五厂、西安晚报社、自选婚姻介绍所，同时参观了名胜古迹。

美国驻华记者乔治·李莫尔5月28日—30日采访了省委宣传部新闻处、西北大学、西北国棉五厂、鱼化寨、陕西日报。还参观了天主教堂。

日本新闻界政治部长松崎稔一行17人，8月24日—26日参观了秦俑馆、华清池、兴庆公园、大雁塔。省外办副主任何克敬宴请了客人。

联邦德国《明镜》周刊记者许成勃格，9月4日—9日在西安参观游览了名胜古迹。

日本时报记者铃木纯一郎一行4人，9月20日—23日在西安参观了秦俑馆、华清池、西安仪表厂，在参观该厂中就生产管理等问题进行专题座谈。还参观了清真寺、省博物馆、西城门楼博物馆，拜谒了兴庆宫公园内的阿倍仲麻吕纪念碑。

联邦德国电视一台柯赫，10月12日—15日在西安参观游览了名胜古迹。

美国由得时报记者葛钢、法国法新社记者庄尾尾，11月17日—21日赴勉县专访了留旗营村农民殷永成，还和西安电影制片厂厂长吴天明进行了座谈。

1988年接待来自12个国家和地区的新闻记者24批48人。他们是：

美国VOA贺朴勤，1月24日—2月3日采访了省政府体制改革委员会、秦俑馆、省考古研究所、省农牧厅、乡镇企业局、计划生育委员会、妇幼保健院、陕西日报、省电视台等单位的负责人以及西影厂厂长吴天明、大清真寺阿訇马良骥。

瑞士《每日导报》阿鹤腾，2月1日—6日专访了省政府副秘书长夏宇，就陕西改革开放、工农业生产等问题进行了交谈，同时还参观了秦俑馆等名胜古迹。

美联社AP魏梦欣、尤聂耳，2月1日—8日在西安、延安进行采访，专访了草滩农场、西影厂厂长吴天明。还参观了秦俑馆等名胜古迹。

赞比亚记者卡帕亚，3月2日参观了省博物馆、秦俑馆。省长侯宗宾设宴款待客人。

日本读卖新闻驻京记者山田道明，3月4日—6日在西安采访《当代青年》杂志编辑常扬、半坡饭店总经理张金柏、西安红星实业公司总经理李全科。

古巴拉美通讯社记者罗瓦依那，3月6日—12日参观了延安和西安的革命历史文物、名胜古迹。专访了西安飞机制造公司。并拜会副省长张斌，出面作陪的有省经委副主任郭邀生、西安市副市长赵毓华、延安市副市长谢煜。

科威特《阿拉伯人》杂志记者马兹哈尔，3月10日—14日在西安拜会了副省长张斌，参观了西安黄河机器制造厂、西安交通大学、西安化觉巷清真寺和秦俑馆、大雁塔等。

美国记者靳羽西一行7人，4月10日—11日来西安主要拍摄兵马俑及古城墙。

美国《假日》杂志社 BONNIE Engd. Richard Cramer 记者2人，4月21日—22日采访秦兵马俑博物馆研究所副主任陈仲之。并专访了户县农民画家李凤兰等。

美国《新闻周刊》记者艾鼎德，5月29日—6月1日采访了西安飞机制造公司，礼泉县烟霞乡袁家村劳模郭裕禄。

波兰记者沃夫斯基等2人，6月11日—14日参观了秦俑馆、半坡遗址、清真寺、大雁塔、小雁塔和省博物馆、南城墙等。

日本记者圆田矢等2人，6月26日—30日采访西影厂《川岛芳子》摄制组及导演何平、演员张晓敏等。

美国《华尔街日报》记者殷阿笛，7月21日—23日来西安采访西北国棉四厂厂长林志鹏。

美国退休记者靳永年，8月9日—11日来西安参观了秦俑馆、省博物馆等名胜古迹。

联邦德国电视一台驻京记者格林斯基为“宋氏三姐妹”拍电视片，8月17日—20日拍摄了华清池五间厅、兵谏亭等背景，并参观了秦俑馆、兴庆宫公园、西安凤凰刺绣厂、唐城宾馆、大雁塔、西门城楼等名胜古迹。

日本电视联合小组德久勋等3人，8月18日—20日为首相竹下登访陕安排电视传送及新闻中心设置等，预先做好准备工作。

加拿大在北京大学讲学的新闻界人士朱列娜，9月1日—4日在西安参观游览，了解陕西风情。



日本《朝日放送》摄影记者高田准一，9月14日—17日拍摄日本中央交通株式会社横跨欧亚大陆两万公里旅行情况。

美国记者费娜小姐和意大利摄影记者罗斯波里一行2人，9月25日—28日由中国电影公司王定一陪同，来西安采访西安电影制片厂，同该厂导演滕文骥、颜学恕，演员程森林、穆牧进行专题座谈。

法国《世界报》记者德龙，11月8日—12日采访了法门寺开放典礼和省工会主席，座谈工人劳动时间、劳保福利、文化生活、社会活动等。

苏联维塔利·伊格纳坚科等一行5人，12月5日—7日采访西安电影制片厂吴天明厂长，参观了西安黄河机器制造厂、秦俑馆、大雁塔等名胜古迹。副省长孙达人会见了代表团，向他们介绍了农村生产关系变革的曲折过程，并设宴招待。

美国《华尔街日报》记者殷阿笛，12月28日—30日再次来西安采访西安百货大厦总经理及两个最差的售货员，在西安仪表厂专题座谈放慢发展速度将对企业发生何种影响等。

1989年接待来自8个国家和地区的新闻记者9批28人。他们是：

英国路透社记者耿必儒，4月下旬在西安期间走街串巷，了解居民生活和市场物价等。

法国法新社记者麦法诚，8月19日—22日在西安采访了穆斯林文化进修大学、西安交大外事处、校办公室主任及学生处处长，并赴延安采访。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驻京记者凯斯·米勒一行4人，9月6日—10日赴延安拍摄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时期居住的旧址；专访了老红军。JOPER（新西兰人）单独在西安参观了秦俑馆等名胜古迹。

美国美联社驻京记者魏梦欣，9月8日—10日专访了西安电影制片厂导演颜学恕、周小之及摄制组活动，座谈了电影市场等情况。

加拿大《环球邮报》驻京记者黄明珍，10月9日—16日专访了西北大学、省旅游局、西安电影制片厂、大明宫乡和秦俑馆等名胜古迹和单位。

美国驻华使馆新闻官李庆坤，10月22日来西安参观游览名胜古迹。

联邦德国广播协会淡有为及夫人，10月26日—30日参观游览了钟楼等名胜古迹，主要是了解几个大商店商品品种和价格情况。

联邦德国驻京记者Ludwig Thamm夫妇，10月30日—31日来西安参观访问。

日本新闻团一行15人，12月8日—10日在西安专访了西安仪表厂技改

和对外开放情况。

1990年接待来自8国和地区的新闻记者14批17人。他们是：

联邦德国电台驻京记者淡有为，3月9日—12日专访陕西皮影戏。

法国记者多米尼克，4月5日—10日采访文物及文物馆员。

美国《纽约时报》记者伍洁芳，4月19日—22日专访西安飞机制造公司。

美国《洛杉矶时报》驻京记者何大卫，5月5日—9日采访了礼泉县烽火村，了解粮食生产；又与省农牧厅政策研究室刘新文交谈粮食生产问题。

哥伦比亚《外交》杂志社记者多丽丝·拉米雷斯，5月19日—21日采访陕西省改革开放的成就，游览了名胜古迹。

联邦德国德新社驻京记者鲍德佳，6月28日—7月5日采访了户县农民画展览馆和延安革命老区。

美国《纽约时报》记者基姆斯·斯特格德，7月28日—31日采访了西安卡丹模特培训学校及省旅游局。

日本共同社驻京记者松濑学，8月13日—16日采访了省、市准备参加亚运会的情况和考古研究所王学理，并游览了名胜古迹。

日本共同社驻京记者松裕文，9月8日—10日来西安参观游览名胜古迹。

民主德国二台驻京记者3人，9月16日—20日采访毛泽东主席当年在延安和转战陕北时先后工作、生活过的地方，延安附近的贫困地区，当地政府的扶贫政策以及扫盲措施等。

《美国之音》驻京记者马凡雅，10月8日—10日来西安参观游览名胜古迹。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驻京记者华瑟琳，10月8日—10日来西安参观游览名胜古迹。

香港《大公报》驻京记者张少威，10月8日—10日来西安参观游览名胜古迹。

联邦德国《明镜周刊》南德译制报记者康友耿、罗安等2人，10月11日—24日专访了西安考古研究所、省扶贫办、延安地区外办、榆林地区外办。

1991年接待来自8国的新闻记者9批30人。他们是：

美国《新闻周刊》记者黎明，3月6日—9日采访了长安县特种钢铸件

厂，西安远东机械制造公司。

日本驻京记者竹田纯一，3月30日—4月1日来西安采访赛马活动，专访了西安市第20中学许韧老师，参观了秦俑馆等名胜古迹。

联邦德国法兰克福译制报记者周劲恒，6月20日—27日采访了省计委综合处赵元元、省纪检委书记李焕政、省委党史办王少民。

法国记者沙博龙，6月24日—26日采访了秦俑馆袁仲一、赵康民。

马来西亚记者张德晔等11人，9月10日—12日采访了秦俑馆、陕西历史博物馆、化觉巷清真寺等的负责人。

新加坡记者曾王月丽等7人，9月12日—13日采访了秦俑馆、陕西历史博物馆、化觉巷清真寺等的负责人。在西安市体育场观看了宫廷焰火表演。

美国新闻界在上海复旦大学讲学人员 JOKNJ RIESKO，10月26日—28日来陕参观旅行。

南非摄制组6人，11月21日—24日采访了秦俑馆、小雁塔、古城墙、华清池、农贸市场、西安玉雕厂，省旅游局副局长王克坚设宴招待。

加拿大CBC公司记者白龙，12月3日—6日在西安专访了西安黄河机器制造厂、西北国棉七厂、陕西第一毛纺厂厂长和职工。

## 第八节 前总统、前总理、前首相

表 3-2-5

前总统、前总理、前首相一览表

日期	国家名称	来访者姓名及职务	人数	陪同人员	地方出面负责人		活动内容
					迎 送	宴 请	
1959年							
10.5—8	日本国	前首相片山哲	12	全国政协庄涛、杨青松	刘庚、杨玉亭、李瘦枝、孙蔚如、张锋伯、原政庭	西安市市长刘庚，省政协副主席杨玉亭	参观省博物馆、大雁塔等名胜古迹
1979年							
9.5—7	荷兰	前首相约普·登尼伊尔	9		孙铭等	省外办副主任孙铭	参观游览名胜古迹等
11.1—3	法国	前总理埃加·富尔	7		李继忠等	省外办副主任李继忠	参观游览名胜古迹等
1980年							

续表一

日期	国家名称	来访者姓名及职务	人数	陪同人员	地方出面负责人		活动内容
					迎 送	宴 请	
5.14—16	英国	前首相詹姆斯·卡拉汉	10	外交部宋之光	白玉峰等	省外办副主任白玉峰	参观游览名胜古迹等
1981年							
5.1—3	联邦德国	前总统瓦尔特·谢尔奥托·沃尔夫·冯·阿梅龙根	9	外交部朱汉民	李连璧、白玉峰	副省长李连璧	参观游览大雁塔等名胜古迹
8.28—30	美国	前总统吉米·卡特	21	外交部副部长韩叙	鲁曼等	省外办主任鲁曼	赴礼泉县烽火大队并在全国劳模王保京家做客
10.29—31	日本国	前首相福田赳夫	26	外交部萧向前	何承华、土金璋、孙铭	副省长何承华	参观游览名胜古迹等
1983年							
7.11—13	葡萄牙共和国	前总理平塔西尔格	7	外交部郭又昌	孙铭等	省外办副主任孙铭	参观游览名胜古迹等
9.7—9	英国	前首相希思	3	外交部郝德青	魏明中等	省外办主任魏明中	参观游览名胜古迹等
1984年							
9.7—9	孟加拉人民共和国	前副总理毛杜德·艾哈迈德	2	外交部黄智玫	秦元恺等	省外办副主任秦元恺	赴大清真寺作礼拜
9.28—30	联邦德国	前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	10	外交部程瑞声	孙达人等	副省长孙达人	参观农村、工厂和学校
10.4—6	哥伦比亚共和国	前总统洛佩斯·米切尔森	6	外交部许寒冰	魏明中等	省外办主任魏明中	参观工厂和学校
10.19—21	泰国	前总理他纳·科曼	8	外交部黄智玫	秦元恺等	省外办副主任秦元恺	参观大雁塔等名胜古迹
1985年							
5.26—27	委内瑞拉共和国	前总统卡洛斯·安优列斯·佩雷斯	13	外交部朱良	李溪溥、陈兴亮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溪溥等	参观名胜古迹
8.8—9	法国	前总理芙蓉瓦	4	外交部吴甲选	张世卿等	省政府副秘书长张世卿	参观名胜古迹

续表二

日期	国家名称	来访者姓名及职务	人数	陪同人员	地方出面负责人		活动内容
					迎 送	宴 请	
9.6—7	美国	前总统尼克松	3	外交部张文朴	张斌等	副省长张斌	参观名胜古迹
9.23—25	哥斯达黎加共和国	前总统菲格雷斯	4	外交部李北海	刘步云等	省外办副主任刘步云	参观名胜古迹
1990年							
5.8—10	秘鲁共和国	前总理哈林	2	中拉友协秘书长李维毅	秦元恺等	省友协副会长秦元恺	参观秦俑馆、大雁塔等
7.7—9	法国	前总理雷蒙·巴尔	2	外交学会全淑章	省外办副主任韩国劲	省长白清才	参观秦俑馆等名胜古迹
10.6—8	泰王国	前总理克立·巴莫	13	外交学会李德明、郑铃玲等	省外办主任张开臻、省文物局副局长陈全方	副省长孙达人	参观大雁塔、法门寺、秦俑馆、华清池等
1991年							
9.7—10	波兰人民共和国	前总理米奇斯瓦夫·弗朗齐舍克·拉科夫斯基	2	外交学会马叙生	省外办副主任陈祥林	副省长孙达人	参观省历史博物馆、秦俑馆、南城墙等
10.28—29	新加坡共和国	前第一副总理吴庆瑞	2	国家旅游局局长刘毅	省旅游局局长孔庆生	副省长孙达人	参观省历史博物馆、秦俑馆,拜会省政府负责人
11.4—5	法国	前总理雅克·希拉克	12	外交学会刘述卿	省外办主任张开臻	省长白清才	参观秦俑馆、汉阳陵
12.10—13	比利时王国	前副首相乔斯·德斯马赫特	2	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邀请	省政府副秘书长梁枫	副省长姜信真宴请,省政协副主席魏明中作陪	参观秦俑馆、历史博物馆、玉石雕刻厂

注:此表不含省级其他单位接待的团组中曾任前国家元首、政府首脑身份的来访者

### 第九节 前部长级外宾

1965—1991年的26年间,省外办接待来自14国的前部长共16批69人。他们是:

1965年8月18—24日，越南前外长春水来访，副省长傅子和迎送并宴请。

1979年10月21—24日，马来西亚前财政部长陈修倍一行8人来访，省外办孙木一宴请并迎送。

1982年10—11月，省外办主任鲁曼、副主任白玉峰出面迎送宴请了荷兰前外长斯梅尔策一行21人。哥伦比亚前部长伊斯特曼一行2人由外交部廖启平陪同来访。

1983年9月12日—14日，日本前外相伊东正义一行7人来访，外交部李福德陪同，省外办主任魏明中宴请并迎送。

1985年8—10月，由省外办副主任秦元恺、何克敬分别出面接待的有：澳大利亚前空军参谋长埃文斯一行3人来访；厄瓜多尔前外长帕雷登一行2人来访；加拿大前外长米切尔·夏普来访，外交部林谷全陪。

1986年11月1日—13日，哥斯达黎加前文化部长埃尔南·冈萨雷斯夫妇来访，参观了省博物馆、大雁塔、秦俑馆、兴教寺。

1988年4—9月，省外办负责人出面迎送和宴请的有：挪威前国防司令布尔·汉森一行2人来陕参观。日本国前文部大臣、众议院议员盐川正十郎夫妇一行5人来访。泰国前议长、盘谷银行董事长许敦茂一行2人来访。瑞士联邦委员会前主席、前外长奥贝尔及夫人一行2人来访参观。

1989年9月18日—20日，玻利维亚前内政部长胡安·杜兰一行6人来访。

1991年8月21日—24日，乌拉圭前外长塔萨诺夫妇一行2人来访。9月29日—30日，日本国前外务大臣伊东正义一行3人来访。

注：上述所列不含省级其他单位接待的部长级来访者

## 第十节 民间团体

1961—1988年27年中，共接待来自30个国家46批526人。他们是：

1961年11月23日—26日，日本民主青年同盟代表团一行10人来访，由省委书记处书记处书记章泽陪同。

1962年7月25日—30日，日本民主青年同盟代表团一行6人来访，由省委书记处书记章泽陪同。

1963年6月3日—12日，日本民主青年同盟前总书记前田稔一行来访，

由省委书记处书记章泽陪同。

同年10月7日—11日，日本民主青年同盟代表团一行8人来访，由省委书记处书记章泽陪同。

1964年4月26日，桑给巴尔奔巴非设拉子青年联盟代表团一行5人来访，由西安市市长刘庚陪同。

同年5—9月，由省委书记处书记章泽出面接待来访的7批，计有：日本妇女活动家代表团一行7人。越南南方妇女代表团一行5人。越南劳动青年团一行4人。阿尔巴尼亚劳动青年团代表团一行3人。哥伦比亚共产主义青年联盟中央书记阿方索·奎利亚尔一行4人。越南妇女代表团一行6人。阿尔巴尼亚劳动青年联盟代表团一行6人。

同年10月12日—17日，印度尼西亚西南非洲妇女代表团一行4人来访，由省委书记严克伦陪同。

同年10月18日—23日，达荷美学生代表奥古马一行5人来访，由西安市委书记薛焰陪同。

同年10月19日—25日，哥伦比亚乌拉克青年代表团一行10人来访，由副省长刘邦显陪同。

同年11月13日—18日，日本各界青年代表团一行11人来访，由西安市副市长张雪涛陪同。

同年12月20日—25日，阿根廷运动员佩德罗来访，由西安市副市长张雪涛陪同。

1965年5—9月接待来自6个国家7批44人，其中：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代表团一行6人，由副省长林茵如会见并宴请。刚果（布）革命妇女联盟代表团一行3人来访，由副省长林茵如陪同。日本民主青年同盟代表团一行10人来访，由省委书记处书记章泽陪同。越南工会代表团一行5人来访，由省委书记处书记严克伦陪同。老挝青年代表团一行7人来访，由西安市委书记处书记薛焰陪同。日本民主青年同盟中央委员、日共党员唐泽敬一行3人来访，由西安市委书记处书记薛焰陪同。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学习团一行10人，由西安市市长徐步会见并宴请。

1966年1月13日—18日，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青年组织代表团一行5人来访，由西安市市长徐步陪同。

同年4月15日—19日，日本社会主义青年同盟代表团一行9人来访，由西安市市长徐步陪同。

1972年8月10日—14日，越南南方民族民主与和平力量联盟释厚法师一行2人，由省革委会副主任李建平会见并宴请。

1977年1月8日—10日，肯尼思率领的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一行46人来访，由省革委会办事组副组长吴沙浪、外事组李习之陪同。

1979年7月9日—10日，菲律宾总统夫人伊梅达尔·马科斯一行130人来访，由林佳楣、韩念龙全陪，省革委会主任于明涛、西安市革委会主任陈元方迎送并宴请。

1984年9月27日—28日，爱尔兰妇女代表团纽爱纳·芬内尔一行5人来访，由省妇联副主任张凤英陪同。

同年10月10日—12日，法国妇女权利部代表团依韦特·鲁蒂一行3人来访，由省妇联副主任张凤英陪同。

同年11月12日—13日，法国总统夫人达尼埃尔·密特朗一行8人来访，由省外办副主任刘步云等迎送。

1985年1—11月接待12个国家和地区来访者12批149人。其中：挪威妇女代表团消费与行政管理大臣耶特森一行6人来访，由全国妇联钟芝明陪同、张凤英迎送。法国共产主义共青运动代表团若西亚娜·瓦扬一行4人来访，由团中央冀冬宁、团省委李炳武陪同。日本总理府妇女问题计划推进会议主席滕田多喜一行3人来访，由韩秋芳迎送。泰国国王姐姐甘拉耶·侂瓦他拉一行16人来访，由全国政协副主席杨拯民全陪，省外办主任陈兴亮迎送。港澳中华总商会妇女会主任董曾华一行16人来访，由省委统战部白海兰、省妇联张凤英陪同。厄瓜多尔妇女代表团拉斯特尼亚·阿服洛·蒂诺柯一行4人来访，由龚梁陪同。联邦德国妇女联合会主席伊尔玛·布赖特尔为团长的代表团一行4人来访，林尚贞、张秀绒迎送并宴请。马里人民民主联盟代表团巴依·阿格·默哈迈德一行6人，由朱俊发陪同、李森桂迎送并设宴招待。丹麦总工会主席、丹社民党执委克里斯登森为团长的代表团一行3人来访，柳春发迎送并宴请。意大利工业委员会代表团主席塞夷里诺·奇塔里斯蒂一行17人来访，由范康、王希侠陪同。巴基斯坦工会联合会主席巴夏尔·艾哈曼德·巴格梯尔一行3人来访，由甄国顺陪同。土耳其教育青体部顾问弗塞尔·德鲁兹一行5人来访，由翟利俊、姚毅陪同。新西兰青年学生代表团李察·诺西（新西兰工党议员）一行65人来访，由于问陶全陪，团省委副书记姚毅陪同迎送并专题座谈。

1986年9月1日—3日，奥地利工会联合会主席安东·贝尼亚来访。同



年10月5日—6日，美国妇女全国委员会主席佩吉·芬纳来访。

1987年6日—9月，接待来自3国3批29人，其中：玻利维亚革命先锋代表团卡洛斯·塞拉特·赖奇主席一行3人，参观秦俑馆等名胜景点。马里人民民主联盟农业考察团阿尔莫扎·麦贾一行10人，参观访问鱼化寨、大清真寺等。丹麦王太后英格丽德一行10人，参观乾陵、秦俑馆等名胜古迹。

1988年12月16日—18日，泰国公主朱拉蓬哇莱拉和丈夫一行29人，参观了省博物馆、大雁塔、秦俑馆。

### 第十一节 文化团体

本节所录主要是1961—1991年间，省、市党政军负责人出面接待的来访者，他们是来自30个国家49批373人的科技、文化界代表团组和知名人士。内有少数团组经省外办涉外处统一安排，由有关厅局出面接待。凡各厅局自主接待的团组不在此列。

1961年5月14日—16日，日本书法代表团西川宁团长一行9人来访，由省委书记处书记章泽陪同。

1962年7月27日—8月2日，马来西亚英籍作家周光瑚来访，西安市副市长张锋伯迎送并宴请。

1963年1—12月，接待了9国15批79人，其中：日本研究中国美术史代表团一行5人来访，西安市副市长张锋伯陪同。朝鲜科学院代表团一行9人来访，省委第一书记张德生会见并宴请，代省长李启明迎送并陪同参观。朝鲜历史考古代表团一行17人来访，省委书记处书记章泽陪同。越南文化代表团一行4人来访，省委书记处书记舒同陪同。挪威广播电视代表团耶尔德一行3人来访，由马庆雄、郭成方全陪，代省长李启明迎送并陪同参观。朝鲜民族保卫省技术代表团一行3人来访，省委书记处书记萧纯陪同。越南文学院副院长怀青一行3人来访，省委书记处书记舒同陪同。危地马拉剧作家加利奇及夫人一行来访，西安市副市长张锋伯陪同。越南代表团团长陈辉燎一行4人来访，副省长刘邦显陪同。瑞士体育界知名人士列昂·布法尔夫妇来陕参观，副省长刘邦显会见并宴请。越南《学习》杂志代表团一行4人来访，省委书记处书记、省长李启明陪同。古巴文化代表团一行5人来访，省委书记处书记冯基平陪同。越南诗人依国振来访，副省长刘邦显陪同。日本学术代表团一行7人来访，副省长刘邦显陪同。刚果（布）迪亚布瓦歌舞

团一行 12 人来访，副省长林茵如陪同。新西兰报道员罗娜·巴依莱来访，副省长刘邦显陪同。

1965 年 3—11 月，接待了 5 国 6 批 39 人，其中：阿根廷报道员胡安·海尔漫来访，省委书记处书记章泽陪同。阿尔巴尼亚文化代表团一行 4 人来访，省委书记处书记章泽陪同。美国黑人学者韩项夫妇来访，省委书记处书记舒同接见并宴请。日本青年文化代表团一行 16 人来访，西安市市长徐步陪同。罗马尼亚文化代表团一行 5 人来访，西安市市长徐步陪同。日本京都学术代表团一行 11 人来访，副省长林茵如陪同。

1966 年 5—10 月，接待了 4 国 4 批 22 人，其中：老挝文化代表团一行 5 人来访，副省长惠世恭陪同。新西兰拉勃医师夫妇来访，副省长惠世恭陪同。菲律宾文化代表团团长索得罗·劳雷尔夫妇一行 10 人来访，西安市副市长魏明中陪同。几内亚卫生代表团一行 3 人来访，副省长惠世恭陪同。

1971 年 8 月 17 日—22 日，英籍女作家韩素音和丈夫张文星来西安、延安参观。抵离时省革委会副主任、省军区政委谷凤鸣迎送并陪同参观了小新村、八路军办事处纪念馆、大雁塔、省博物馆、半坡遗址等名胜古迹，并设宴款待。

1981 年 5 月 15 日—16 日，泰国玛哈扎克里·诗琳通公主一行 23 人，由外交部韩念龙及夫人全陪，王真、魏明中、张凤英迎送并陪同参观。

1984 年 3—10 月，来自 6 国 6 批 40 人抵陕访问，其中：泰国国会教育委员会代表团郎西里·乔斯里一行 12 人来访，由吴福生陪同，雷行迎送。美籍华人著名科学家李政道夫妇，由中科院朱永行陪同来西安，中科院西安分院党委书记杨文景迎送并陪同参观，副省长孙达人宴请。朝鲜金策工业大学朴英哲校长（劳动党候补中委、议员）一行 3 人来访，省高教局局长张克忍陪同。摩洛哥文化大臣萨伊德·贝勒巴希尔夫妇等 3 人来访，省文化厅接待。日本著名法学家团藤重光（国家妇女事务部部长）一行 10 人来访，省司法厅厅长刘颖、省外办副主任孙铭陪同。美籍华人学者吴健雄、袁家骝教授一行，由中科院彭卫平、西安分院杨文景迎送并陪同参观和宴请。瑞典文化代表团安德斯·克拉松一行 10 人来访，冯志丹、何克敬陪同。

1985 年 3—12 月，接待来自 3 国 4 批 27 人参观访问，其中：澳大利亚默多克新闻公司基思·鲁珀特·默多克一行 10 人来访，王枫、郭成方陪同。苏联电影代表团一行 6 人来访，省电影公司接待。苏联盲人代表团盲人协会主席杰明一行 4 人来访，黄乃陪同，任应斌迎送。以杰拉尔德·威纳为团长

的加拿大政府文化代表团一行7人来访，省文化文物厅接待。

1986年7月12日—14日，埃塞俄比亚体委主任泽高来访，参观了名胜古迹。同年11月30日—12月2日，朝鲜对外文委副委员长吴文汉一行3人来访，参观了秦俑馆、省博物馆、大雁塔等。

1988年4—10月，接待来访的有4国4批107人，其中：南斯拉夫教科文委员会主席一行5人来访，参观了秦俑馆、华清池等。波兰政府文化代表团一行70人来访，进行了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参观了省博物馆等名胜景点。摩洛哥王国政府文化团一行12人来访，参观了秦俑馆、华清池。马来西亚文化代表团一行20人来访，参观了秦俑馆、省博物馆、大雁塔。

1989年4—11月，接待来访的有4国4批17人，其中：联邦德国体育联合会代表团一行4人，参观了秦俑馆、省博物馆。坦桑尼亚政府文化代表团一行8人，参观了秦俑馆、华清池，并观看了文艺演出。塞内加尔政府文化代表团一行3人，参观了秦俑馆、省博物馆。乍得政府文化代表团一行2人，参观了秦俑馆、华清池、大雁塔、省博物馆。

1991年4月16日—19日，西班牙科教国务秘书胡安·曼努埃尔·罗霍一行3人，参观了秦俑馆、西安交通大学、中科院陕西分院、西安光机所。同年6月6日—8日，葡萄牙文化国务秘书一行8人，参观了碑林、清真寺、秦俑馆。

## 第十二节 军事、司法团组

1963年6月17日—20日，印度尼西亚农民阵线中央检查委员会主席阿·拉赫曼一行5人来访，西安市委书记处书记刘庚会见并宴请。

同年9月4日，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一行3人来访，省委书记处书记章泽会见并宴请，西安市副市长张锋伯迎送并陪同参观。

同年9月25日—27日，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一行9人来访，副省长兼西安市市长时逸之陪同。

1965年10月12日—16日，印度尼西亚科协法律工作代表团一行5人来访，西安市副市长张雪涛陪同。

1972年12月6日—9日，巴基斯坦空军学员一行58人来访，省军区李玉治陪同。

1983年7月10日—12日，尼日尔发展社会全国委员会代表团主席穆穆

尼·杰尔马科耶·阿达穆少校一行6人来访，邓秀梅、白玉峰陪同。

1984年4—11月，接待了7国7批48人抵陕访问，他们是：瑞典民政部政治顾问哥斯塔·法盖贝格一行5人来访，艾绳章会见并宴请。尼日利亚国际事务研究所代表团哈鲁纳退休少将一行4人来访，李德明陪同、省外办副主任孙铭迎送。扎伊尔全国立法委员会主席访华团卡松戈·穆孔吉公民一行10人来访，司法部张立功、副省长邓国忠迎送宴请并陪同参观。法国国民议会法律委员会代表团雷蒙·福尔尼一行8人来访，邢亦民、李骥德陪同。日本国会会计检查院代表团镰田英夫一行4人来访，省审计局副局长孟宪迎送。巴基斯坦军事代表团拉希姆·汗一行9人来访，傅加平、吕声毅陪同。泰国警察总监纳隆·玛哈暖一行8人来访，王文同陪同。

1985年1—10月，接待了8国8批39人来访，其中：孟加拉国军法管制副首席执行官（空军参谋长）苏尔坦·马·哈茂德一行7人来访，王定烈、冀廷璧陪同。瑞典警察总署霍尔格·罗曼德一行3人来访，由省公安厅外事处接待。联邦德国审计法院代表团卡尔·威特洛克一行3人来访，王承福、孟宪陪同。新西兰上诉法院院长顾文·任德豪斯一行2人来访，省高级人民法院迎送并宴请。泰国警察厅副总监沙内·西提攀一行5人来访，艾绳章陪同。委内瑞拉最高法院院长何赛·S·努涅斯·阿里斯蒂穆尼奥博士一行10人，北京彭树桦全陪，焦朗亭迎送并宴请。科威特司法与宗教基金部访华团瓦哈布·德西尔助理次官一行3人来访，王一彬、宛耀彬陪同，李书田迎送。西班牙审计法院院长何塞·玛利亚·弗尔南德斯·波尔拉博士一行6人来访，张培宏陪同。

1988年3—11月，接待了9国9批38人抵陕访问，他们是：巴基斯坦陆军代表团一行6人，参观了803厂、203厂。奥地利法院院长路·阿达莫维奇一行5人来访，参观了秦俑馆、大雁塔。国际社会防护协会主席、法国最高法院第一院长罗赛斯夫人一行4人来访，参观了秦俑馆、华清池、大雁塔、省博物馆。英国首席法官莱恩勋爵一行2人来访，参观了陕西重型机器厂、秦俑馆、大雁塔。新加坡最高法院首席法官黄宗仁一行4人来访，游览了名胜古迹。约旦备件和坦克改造代表团一行4人，参观访问了201研究所、617厂、803厂、627厂。联邦德国审计法院代表团一行3人，参观了秦俑馆、乾陵、大雁塔，游览了华清池。印度前首席大法官巴格瓦蒂一行4人来访，参观了陕西女监、大雁塔、省博物馆、秦俑馆。叙利亚国防部代表团一行6人，专访了051靶场8806工程、203所、803厂。

1989年4—5月，接待了4国4批32人来陕访问，其中：叙利亚国防工业高级代表团一行10人，参观国防工厂和研究所。5月21日—23日，美国国际法部前首席亚瑟·诺万率律师团一行8人来访，参观了华清池、秦俑馆、大雁塔，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韦明海会见并宴请。朝鲜中央检察所一行4人来访，参观了秦俑馆、华清池、大雁塔、礼泉县袁家村。泰国司法代表团一行10人来访，参观了秦俑馆、华清池、省博物馆。

1991年5月4日—6日，朝鲜中央检察所代表团一行6人来访，参观了秦俑馆、华清池等。7月3日—5日，苏联检察院代表团一行8人来访，参观了秦俑馆、华清池等。

### 第十三节 外国地区团组

本节主要辑录1965—1991年期间，由省外办接待的国外地区性团组6国7批34人。

1965年4月4日—10日，肯尼亚纳库鲁市市长卡茂来访，西安市副市长张雪涛迎送并宴请。

1985年5—10月，接待了3国3批17人，其中联邦德国巴登州代表团洛塔尔·斯佩特一行7人来访，由张仁风全陪，张勃兴、何克敬迎送并陪同参观游览。美国纽约市警察总局副局长英虎一行7人来访。英国香港小组主席布莱克爵士一行3人来访，由省外办副主任何克敬陪同。

1986年9月6日—8日，联邦德国萨尔州州长奥斯卡·拉冯泰一行4人来访，参观了省博物馆、半坡遗址、秦俑馆、华清池、大雁塔。

1988年8月27日—30日，奥地利伏拉尔堡州州长普彻尔一行2人来访，参观了秦俑馆、华清池、大雁塔、西门城楼、省博物馆。

1989年3月17日—19日，瑞典斯德哥尔摩省省长一行8人来访，参观了秦俑馆、骊山电子公司、大雁塔、省博物馆、西安南城墙、清真寺、半坡遗址、西安仪表厂、西电公司。

### 第十四节 其他团组

本节辑录的来访团组，省、市党政军及有关单位负责人出面接待的团组和多次来华访问的老朋友。从1962—1991年期间，先后有35个国家和地区

的外宾 507 人。其中：日本 17 批 113 人，美国 7 批 32 人，苏联 4 批 63 人，泰国 4 批 57 人，朝鲜 4 批 41 人，意大利 4 批 31 人；2 批的计 7 国 71 人；1 批的计 21 个国家和地区团组 99 人。其主要是：

1962 年 9 月 7 日—14 日，日本工人学习积极分子代表团一行 8 人来访，由省委书记章泽陪同。10 月 25 日—27 日，英国出席日内瓦会议代表团团长麦克唐纳一行 2 人来访，由副省长时逸之陪同。

1963 年 3—10 月，由省“和大”副会长、西安市副市长张锋伯出面接待了日本亚非团结委员会常任理事田中寿美子一行 5 人来访。古巴全国保卫革命委员会主席何塞·马塔一行 3 人来访。比利时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主席阿拉男爵夫妇一行来访。朝鲜政府经济代表团一行 17 人来访。

同年 5 月 12 日—19 日，英国共产党中央执委的儿子罗耳夫·柏奇一行 3 人来访，由市委书记刘庚陪同。

同年 6 月 14 日—16 日，苏联科学技术合作代表团一行 7 人来访，由副省长谢怀德陪同。

同年 9 月 13 日—17 日，日本平民学联代表团一行 5 人来访，由省委书记处书记章泽陪同。

1964 年 4 月 10 日—13 日，朝鲜地质代表团一行 5 人来访，由副省长刘邦显陪同。

同年 5—10 月，由省“和大”副会长、西安市副市长张锋伯接待来自日本前松川事件被告访华团一行 8 人来访。多米尼亚人民运动财务书记伊兰德尔·塞利格和青年与学生事务书记卡耶塔诺·罗德里格斯一行 2 人来访。日本国民救援会第四次访华团一行 7 人来访。

同年 8—9 月，由副省长傅子和接待的 3 国 3 批 11 人是：加纳贵宾一行 2 人来访。柬埔寨蒲烈察一行 3 人来访。日本生活协同组合联合代表团一行 6 人来访。

同年 10 月 5 日—9 日，日本工人学习积极分子第三次访华团一行 18 人来访，由省委书记处书记冯基平陪同。

同年 11 月 3 日—9 日，日本经济学家桑野仁夫妇一行来访，由副省长林茵如陪同。

同年 11 月中下旬，由西安市副市长张雪涛陪同接待的两国 4 人是：多米尼加人民运动委员会主席莫利纳一行 3 人和日本纺织株式会社总经理原吉平来访。

1965年4月13日—17日，莫桑比克解放阵线代表团一行3人来访，由副省长林茵如陪同。

同年7—10月，由西安市副市长张锋伯接待的有：坦桑尼亚桑给巴尔留德学生会负责人赛义德和日本社会主义研究所代表团一行7人来访。

同年9月27日—29日，印尼经济代表团一行7人来访，由副省长惠世恭陪同。

同年10月8日—12日，北加里曼丹统一邦政府代表团一行11人来访，由副省长林茵如陪同。

同年10月16日—20日，老挝公务员联合会代表团一行3人来访，由副省长林茵如陪同。

1966年6月5日—12日，老挝公务员联合会代表团一行3人来访，由副省长傅子和陪同。11月23日—26日，朝鲜农业代表团一行9人来访，由省委书记处书记章泽、西安市委第一书记彭天琦陪同。

1971年8月28日—9月2日，美国约翰逊和克拉克夫妇一行4人来访，由省革委会副主任谢邦定陪同。10月7日—14日，美国塞维斯夫妇一行来访，由省军区政委谷凤鸣陪同。

1979年9月26—29日，以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克内尔奥内斯库为团长的罗马尼亚党的工作者代表团一行22人来访，由省委书记处书记章泽迎送并宴请。11月11日—14日，联邦德国阿登纳基金会主席布鲁诺·里克一行6人来访，陈明仙全陪，省外办副主任何克敬迎送并设宴招待。

1983年11月26日—29日，葡萄牙国务委员安图内斯一行3人来访，由省外办副主任秦元恺陪同。

1984年1—10月，先后接待了6国12批97人来访，其中日本5批31人，意大利2批24人，美国2批16人。他们是：日本自治劳委员长丸山康雄一行7人来访，王文清陪同。意大利农业代表团菲利波·马里亚潘多尔菲一行7人来访，由农业部朱丕、省农业厅陈文奎陪同。日本通产省代表团杉山和男一行10人来访，省外办副主任何克敬迎送。奥地利信贷联合银行行长安德罗施博士一行12人来访，由商思聪陪同。日本企划厅事务次官谷村一行8人来访，由程新文迎送。美国富商特拉梅尔·克罗一行14人来访，由和志耕陪同。日中经协理事长井上猛一行2人来访，由省外办副主任秦元恺迎送。日本公正交易委员会委员长高桥元一行4人来访，由李文渊迎送并宴请。美国人口学会会长福诺斯一行2人来访，由省卫生厅厅长李经纶陪同。

罗马尼亚外贸银行维尼古拉·埃列米阿一行5人来访，由史正信陪同。意大利合作社联合会代表团达里奥·门戈一行17人来访，由陈文奎陪同。阿根廷政府农牧代表团卢西奥·雷卡一行7人来访，由省农牧厅副厅长殷世杰陪同。

1985年4—10月，接待了7国8批40人来访，他们是：法国合作社代表团阿尔贝莱·杜夏莱一行6人来访，由赵桂林、吴光华陪同。日本新产业代表团池田明和一行6人来访，由省外办秦元恺接待。朝鲜商业代表团韩章根一行10人来访，由省科技干部局局长陈祥林陪同。联邦德国内政部议会国务秘书施普朗格一行2人来访，由艾绳章陪同。苏联邮电代表团巴达洛夫一行4人来访，由张作瑛陪同。美国常任联合国代表沃尔特斯一行4人来访，由徐兆寿全陪，省外办何克敬迎送。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里约万诺维奇一行7人来访，由黑龙江外办张瑛全陪，省外办秦元恺迎送。南斯拉夫前驻华大使夫人来访，由张月陪同。

1986年5—8月，接待来自4国4批14人的访问，计有：越南友人黄文欢来访。美国世界市场学家、教授K·一行4人来西安考察市场情况。匈牙利经济代表团一行4人来访，同省政府有关单位进行了座谈。比利时菲利普王子一行5人来访，参观了秦俑馆、华清池、西北国棉四厂、大明宫乡、西安杨森制药公司基建工地。

1987年2—10月，接待来访的4国4批46人。其中：美国斯坦福国际咨询研究院院长米勒博士和美籍华人顾问米传黎一行，由国家科委副主席吴明瑞陪同来访，省委常委、省科委主任梁琦迎送陪同参观，并设宴欢迎在国际上享有盛名的斯坦福国际咨询研究院院长一行。日本外务省官员访华团一行9人，参观了秦俑馆、华清池、大雁塔。苏联政府特使一行17人，参观了西安仪表厂、秦俑馆、华清池、小寨农贸市场、西安友谊商店。泰国外交部官员访华团一行18人，参观了秦俑馆、华清池。

1988年3—6月，接待来访的3国4批65人。计有：瑞典外交部国务秘书本格·苏德伯格一行7人，参观了秦俑馆、华清池、米脂县水土保持局。冰岛工业部代表团一行9人，参观了秦俑馆、华清池。泰国枢密院团一行14人，参观了秦俑馆、华清池、省博物馆、城墙、大雁塔、炭市街副食品市场。瑞典工业代表团一行35人，参观了秦俑馆、省博物馆。

1989年5—10月，接待了亚洲开发银行行长藤冈一行3人，参观了秦俑馆、华清池、大雁塔、省博物馆。民主德国物价代表团一行5人，参观了秦俑馆、省博物馆。泰国政府代表团一行16人，参观了西电公司、西安仪表



厂、秦俑馆。

1990年4月9日—11日，应中国政府邀请的泰王国公主玛哈扎克里·诗琳通一行9人、驻华使馆7人、随行记者3人，由外交部亚洲司参赞邵烟初等9人陪同，从北京乘航班来西安参观访问，抵离时副省长孙达人、省外办主任张开琛、副主任韩国劲、省博物馆馆长王任波等迎送。当晚孙达人在西安唐城宾馆代表省长白清才举行欢迎宴会。韩国劲副主任陪同诗琳通一行参观乾陵并考察了永泰公主墓、章怀太子墓，并参观了茂陵博物馆。诗琳通公主在唐乐宫观看了《唐·长安乐舞》。孙达人陪同客人参观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和小雁塔，在参观中诗琳通公主拍照多，询问多，记录多，一再表示她要撰写《踏访龙的国土》一书。

同年5月26日，应外交学会邀请的著名美籍华人陈香梅率美国国际合作委员会经济贸易考察团一行3人来西安访问，抵离时副省长孙达人、省外办副主任陈祥林迎送并陪同参观，省长白清才会见并设宴款待陈女士，席间，陈女士说她曾于1948年来过西安，为表达她再次来西安的心情，即席吟《西安有感》诗一首：“大华民族大华魂，千年汉业日日新。秦朝明月照伟业，花暖时节又长安。”陈香梅还与副省长郑斯林就经贸问题进行了工作会谈。省政府届时聘请陈女士为陕西省经济技术高级顾问并颁发了聘书，西安飞机制造公司总经理聘请陈女士的好友郝福满先生为该公司高级顾问。省委书记张勃兴会见并设宴欢迎陈香梅。

同年7月17日—19日，苏联政府代表团一行35人，参观了咸阳彩色显像管厂、西安航空发动机公司，游览了名胜古迹。

1991年4—10月，接待来访的有6国7批25人。其中：意大利总理外交顾问瓦塔尼一行2人，参观了秦俑馆、华清池等。埃塞俄比亚救灾委员会主任伊尔马一行3人，主要是考察榆林地区防灾救灾工作，参观了秦俑馆。印度尼西亚总统经济顾问维佐约夫妇一行，参观了秦俑馆、华清池、省博物馆。西班牙公共管理部国务秘书桑布拉纳夫妇一行，参观了秦俑馆、华清池、省博物馆、大雁塔。加拿大公务员委员会主席罗伯特·杰罗克斯一行2人，参观了秦俑馆、华清池、法门寺、大雁塔。波兰议会外交委员会代表团一行9人，参观了大雁塔、陕西历史博物馆、华清池、秦俑馆。意大利中央银行行长强皮一行5人，参观了秦俑馆、陕西历史博物馆。

## 第三章 出国（境）访问

1951年陕西省首批出国人员是参加中央“和大”组团赴朝鲜进行的慰问演出。1980年以前，陕西省因公出国都是由中央组团的。1980年以后，陕西因公出国（境）访问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局面。出访人员不断增加，出访范围不断扩大，出访涉及到各行各业。

80年代以前，陕西省没有直接审批因公出国（境）人员的权限。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1982年6月开始除重要出国团组外、一般出国（境）人员均由省政府审批。1986年1月省委、省政府又授权省外办、省经贸委、省科委、省教委归口审批因公出国人员。由省外办颁发护照、办理签证。同时授权西安市政府审批本市干部管理权限内的因公出国人员。

### 第一节 出国（境）审批

1979年以前，陕西省的外事工作主要是接待中央各部门安排访问陕西的各类外国人，没有直接派遣因公出国（境）人员和邀请国外人员来华的审批权。1979年以后，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为适应我国改革开放、扩大对外交往的需要，对因公出国（境）人员和邀请国外人员来华的审批权限相继作过多次调整。

1980年根据国务院有关规定，凡省内已同外商建立有加工装配业务关系或由地方直接经营进出口业务的公司、工厂，需要派员到国（境）外或邀请外商来洽谈业务、检验质量、交流技术的，经省政府批准，均可办理出国（境）和邀请来华事宜。

1981年3月，国务院授权省政府审批派出一般性的经贸团组、人员和引进技术、设备项目中的出国事项；实施业经批准的文化、科技等交流项目以及履行与国外签订的协议、合同的有关人员出国（境）事项；实施业经批准的友好省州、友好城市等活动的出国团组和派遣留学讲学、访问学者等出国

(境) 事项。同时, 省政府有权审批邀请与上述相关的国外人员来华事宜。

1982年6月, 根据国务院的有关规定, 省政府审批出国(境)人员和邀请国外人员来华的权限进一步扩大。除重要出国(境)和来华事项外, 一般均由省政府审批。

1986年1月24日, 省委以陕发〔1986〕7号文颁发省委、省政府《关于派遣临时出国(境)人员以及邀请国外人员来陕审批权限和归口管理的规定》。

1992年7月, 为进一步加快改革开放步伐, 促进陕西对外交往和经济建设的发展, 省政府根据中央和国务院有关规定的精神, 按照归口管理、分级审批、相对集中、适当简化的原则, 决定对全省派遣因公出国(境)人员和邀请国外人员来华事宜作出调整和改进。授权西安市政府审批本市范围内部分商务人员来访事宜或科技人员来华考察、讲学、学术交流等。省经贸委、科委、省外办审批或受省政府授权审批有关因公出国(境)和邀请来华的事宜。

## 第二节 出国(境) 团组

1951年由友协首次派出1名放映员, 参加中央“和大”组团赴朝鲜进行慰问的电影放映队。

1953年, 陕西省参与西北五省一市组织的各民族、各阶层、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陕西为第二总分团, 由省政府主席赵寿山任团长。慰问团有代表230人, 文工团团员285人, 工作人员28人, 共543人。其中有易俗社、三意社、尚友社、西安狮吼剧团和陕西省歌舞团, 以及东北配属的一个话剧团。慰问团于10月16日至12月21日, 在两月零5天中, 全团分作5个分团, 同时开展慰问活动。慰问了朝鲜黄海道26个郡、2个市; 朝鲜人民军一军团及所属各师团及配属的旅团并西海岸地方警备部队和建设旅; 中国人民志愿军〇三部队和所属各军及后勤部门; 此外, 还访问了一些工厂、学校及遭敌破坏的严重地区, 祭奠了烈士陵园, 慰问了朝鲜人民军烈士家属。共召开慰问大会153次、座谈会176次, 慰问演出350场。

陕西省除赵寿山为第二总分团团长外, 在10位副团长中还有省政协副主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西北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孙蔚如, 西安市人

民政府副市长陈式玉，宝鸡军分区副司令员董策成。代表中属陕西代表 65 人，其中工人劳模代表 10 人、农民代表 12 人（互助组长和农业劳模），学生代表 2 人（城固师范李金明、三原中学卢春林），新闻界赵潭冰，文艺界安全、张宇，工商界田润芝，妇女界吴翠玲，省总工会文教部部长贺光直，团省委军体部副部长王明朗，省妇联主任白锋悟，省抗美援朝分会副秘书长张云锦，民盟西北总支部副秘书长马文彦，省政府委员兼参事黄锡九，宝鸡地委宣传部宣传科长陈策贤，绥德地委宣传部干教科科长常君毅，省邮电管理局乡邮视察指导员徐东鲁，延安四郎庙石油钻探队工会主席丁立，省委宣传部宣传处处长张增旺，省党校副校长卫新，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省政府委员陈雨皋和其他方面代表 17 人。

1959 年，应苏联对外友好文化联系协会和苏中友好协会的邀请，中苏友好协会全国总会组成由 12 个省、市、自治区中苏友协驻会负责工作人员共 15 人，陕西省中苏友好协会副秘书长田克恭参加了这次组团。代表团是以总会理事、北京市中苏友好协会副会长曹靖华为首的中苏友好协会访苏代表团。于 6 月 9 日至 15 日访问了莫斯科、列宁格勒、斯大林格勒和格鲁吉亚共和国。代表团在苏期间，受到苏联党政领导和苏联人民的热情而隆重的接待，代表团到达莫斯科机场时，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委员、苏中友好协会理事会主席安德列耶夫亲临机场欢迎，当天下午又在克里姆林宫接见了全体团员。最后，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接见了代表团的全体成员。苏联《真理报》还发表了公报，登了照片和全体团员的名单。

陕西省第一批公民出国旅行团，是 1959 年以国际旅行社名义由省总工会从全省各主要产业中选拔先进生产者和劳动模范组成。西安市总工会副主席刘宗文为团长一行 20 人，成员有：苏金和（潼关机务段司机长）、赵兢全（汉中运输公司组长）、林秀英（西北国棉四厂工人）、张德生（灞桥热电厂班长）、刘少卿（汽车配件厂技术员）、杨渭川（省建四公司工人）、吴厚森（市建二公司工人）、曹秀兰（新城区营业员）、冯天赦（碑林区商业门市部主任）、王月成（西安人民搪瓷厂车间主任）、毕传元（省地质局钻机副机长）、李斌夫（西安铁路局工会副主席）、高朗山（804 厂党委书记）、赵富鑫（西安交大教授）、常茂生（宝鸡石油机械厂工程师）、崔山雯（省邮电局机务员）、许冷梅（市二中副校长）、党增寿（铜川矿务局工程师）、赵梦桃（西北国棉一厂工人），旅行社副科长潘宗秀随团工作，于 9 月 19 日乘班机赴莫斯科，在苏联参观游览了列宁格勒、基辅等 5 个城市，10 月 14 日乘国

际列车回国。

1959年中央主管部委给陕西宣传教育系统下达出国名额72人，其中参加国际会议4人、出国讲学2人、教师进修11人、留学生55人。分赴苏联68人、越南2人、匈牙利、奥地利各1人。72人中来自西安交通大学的14人，西北工业大学的12人、省教育厅12人、西安医学院8人、西北农学院7人、西安师范学院5人、陕西师范学院3人、农业科学院陕西分院、西安外国语学院各2人，西安矿业学院、团省委、省防疫站、西北大学、土壤研究所、工厂和其他单位各1人。

1960年6月15日，经国际旅行总社安排，由陕西甘肃两省共同组织赴社会主义国家一行20人的旅行团。陕西则由省外办牵头以国旅西安分社名义，在农业战线和科技领域选拔10名代表，他们是陕西师范学院教授赵恒元、延安县蟠龙公社党委书记李瑞德、兴平县普集公社养猪场场长胡凤莲、榆林牛家梁农场场长杨增占、汉中湘水寺农科所副所长张朝林、大荔县羌白公社党委书记姚韦川、西北大学化学系讲师陈运生、安康县文武公社副社长屈良和、西安市第二医院院长叶瑞禾。甘肃省由交际处长张士业牵头，国旅西安分社经理杨治国为旅行社代表，协助张士业负责旅行团工作。于6月29日由北京乘班机赴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3国旅行参观。

1960年11月26日，魏明中（省委文教办公室副主任）作为中华医学学会代表团团长一行2人，赴巴基斯坦参加医学年会。

1960年6月，省外办组织公民赴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旅行团一行20人出访。

1963年，由陕西省暨西安市人民委员会外事办公室负责，以国旅名义组织14人的陕西省公民赴苏联、波兰、民主德国旅行团，副省长时逸之为团长，于6月12日—7月17日出访。团员有陕西省暨西安市外办副主任李宁（女），市妇联副主任刘芳（女），渭南地委副书记师谦，113厂党委书记李登丰，陕西日报副总编辑章彬，西安晚报总编辑袁烙，市工业局副局长赵光远，西安交通大学党委副书记伊里，咸阳地委副书记张景文，宝鸡地委副书记郇光瑞，西北建筑设计院技术员徐永基（女），兴平县西吴镇北马大队支书韩志刚和德语翻译李萍（女），俄语翻译李志忠。旅行团在苏联停留13天，波兰6天，民主德国7天。

同年4月7日，魏明中（西安医学院副院长）作为中央卫生部代表团团长一行5人，出访阿尔及利亚，顺访了摩洛哥，主要商谈中国派出医疗队事

宜。这是中国第一个对外派出的医疗队。

1965年8月13日—9月22日，以西安市委书记处书记薛焰为团长，省监委副书记邓国忠为副团长一行15人，访问苏联、保加利亚、罗马尼亚、蒙古。团员有：蒋锡白（省委副秘书长），白锋悟（女，省贫协副主席），高步林（省公安厅副厅长），王国楨（省检察院副检察长），刘明（女，西安市妇联副主任），赵子平（石泉县委书记），魏艾（商洛地区贫协副主席），罗士杰（延安专署外事处副处长），刘维世（国际西安分社经理），马学堂（西安人民搪瓷厂党委副书记），王同经（西北第一印染厂副厂长），孙木一（省外办接待组组长），李志忠（省外办干部）等。

1974年8月9日—30日，以省革委会副主任孙福林为团长，省外办副主任李琼（女）、团省委副书记卜克义为副团长等一行20人，对朝鲜进行了友好访问，参观了平壤等8个市和地区以及工厂、农场、学校、医院等19个单位，访问了板门店，拜谒了开城朝鲜人民军烈士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墓。朝鲜政务院副总理郑浚基接见了全体团员，进行了近两个小时亲切友好的谈话。

1976年，省革委会为增进与日本友好城市之间的体育交往，由西安市组织女子排球友好代表团一行18人，由市革委会副主任鄢祥丕任团长赴日本奈良、京都市进行友好访问。

1980年，经省外办办理护照出国（境）的15批80人，其中：副省长白纪年率农业考察团一行6人，于5月20日—6月15日访问日本。

1981年，经省外办办理护照出国的26批120人，其中省外办副主任、魏明中一行，于8月19日赴罗马尼亚进行为期15天的参观访问。

1982年，全省派遣出国（境）团组共79批281人，分赴17个国家和香港地区。其中：省级党政领导人：副省长惠世恭一行于4月3日赴香港地区进行贸易洽谈；省长于明涛和副省长李连璧于10月16日率陕西省友好代表团赴美国明尼苏达州进行友好访问。省市级机关：旅游局、物资局、卫生厅、总工会、科委、水保局、统计局、计委、外事办、纺织工业公司负责人和西安市市长张铁民、市委副书记延焕悟率团分赴美国、日本、澳大利亚、菲律宾和香港地区进行友好访问、考察、商谈贸易、业务交流。

1983年，全省派遣出国（境）团组共130批385人，分赴29个国家和地区。其中：省级党政领导人：省委书记姜一于3月31日赴朝鲜进行为期15天的友好访问。省委第一书记马文瑞于6月24日率陕西省友好代表团赴

日本进行为期 12 天的友好访问。副省长孙克华一行 6 人于 10 月 18 日至 11 月 10 日赴比利时进行考察访问。省市级机关：省委办公厅、省高教局、交通厅、卫生厅、煤炭厅、经委、纺织工业公司、医药局、档案局、经贸厅负责人组团出访日本、比利时、朝鲜、英国、美国、阿尔及利亚、联邦德国和香港地区进行友好访问、考察、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商贸洽谈。西安市副市长王淑芳（女）参加全国友协代表团赴法国进行友好访问。

1984 年，全省派遣出国（境）团组 341 批 1310 人，分赴 12 个国家和香港地区。其中：省级党政领导人：副省长张斌 6 月 14 日率团访问日本为期 14 天。副省长孙达人 8 月 3 日率陕西省歌舞团赴日本进行访问演出。副省长徐山林 8 月 26 日率团访问美国。副省长白纪年于 9 月 6 日随全国友协组团访问意大利。省长李庆伟于 10 月 5 日—15 日率友好代表团一行 7 人访问日本。在日本期间拜会了日本首相中曾根。会见了日本国际贸易促进会会长樱内义雄、日本联谊会会长伊东正义等知名人士；访问了为陕西培养医务、农业等方面人才的有关部门。省市级机关：省政府办公厅、省重工业厅、二轻厅、卫生厅、医药局、商业厅、邮电局、旅游局、电子工业厅、建工局、高教局、省计委、石化厅、煤炭厅、标准局、陕西日报社、省经贸委、粮食局、经委、省外办、社会科学院西安分院、省地震局、物资局和西安市、宝鸡市以及部分高等学校负责人率团，分赴日本、美国、加拿大、英国、意大利、瑞士、瑞典、法国、朝鲜、菲律宾、奥地利和香港地区等进行访问、考察和业务交流，其中赴日本的 18 批，赴美国的 10 批。另外，电子学专家吴祖恺受电子部派遣于 4—5 月赴荷兰科浦公司及比利时、奥地利等国进行彩色显像管制造技术考察。

1985 年，全省派遣出国（境）团组 570 批 3167 人，分赴 59 个国家和香港、澳门地区。其中：省级党政领导和部委办厅局以及地市级率团 59 批分赴 19 个国家与地区。副省长张斌 5 月 7 日率友好代表团一行 8 人，赴比利时进行访问，并签署了两省友好关系协议。顺访了法国、瑞士，历时 23 天。以省委书记白纪年为团长，副书记牟玲生为副团长率陕西省委友好代表团一行 7 人，于 11 月 11 日—22 日参加日本社会党建党 40 周年京都府本部纪念大会。代表团在日本期间拜会了京都府知事林田悠伟夫，参观访问了工厂、农村、商店，游览了风景名胜。省级机关、人民团体和西安市负责人率领 89 个团组，分赴日本、美国、比利时、意大利、匈牙利、朝鲜、法国、捷克斯洛伐克、新加坡、丹麦、喀麦隆、奥地利以及香港地区进行友好访问、

专业考察、科技文化交流、洽谈贸易，其中赴日本的 33 批，赴比利时的 12 批，赴意大利的 6 批。

1986 年，全省派遣出国（境）团组 696 批 2445 人，分赴 25 个国家和地区。友好访问的有 193 人，技术考察的有 557 人，科技交流的有 20 人，外贸出口的有 140 人，劳务、经援的有 677 人，讲学留学的有 106 人，参加国际会议的有 58 人，其他（含技术培训）694 人。其中：省级党政领导出访。副省长张勃兴应奥地利多瑙欧洲国际经济关系研究所的邀请，率陕西省经济代表团一行 20 人（内有中央部委有关专家 5 人）于 6 月 9 日—18 日对奥地利进行了友好访问。奥地利副总理诺贝特施得格尔接见了代表团，就双方今后的合作等问题进行了亲切的交谈。在多瑙欧洲国际经济关系研究所举行的投资洽谈会上，代表团与 65 家奥地利及其他外国公司进行了洽谈，并签订了机械、电子、轻工、医药等方面的经济技术合作 27 项意向书。在奥期间，代表团还考察了部分大型企业。副省长张斌率经济技术代表团一行 4 人于 12 月 29 日—1987 年 1 月 11 日赴香港地区进行工作访问。省级机关、西安市、咸阳市负责人组成 61 个团组（内有 6 个团组是随中央有关部委组团的），分赴日本、美国、比利时、苏联、奥地利、朝鲜、西班牙、泰国、瑞典、意大利、新加坡、联邦德国、匈牙利、突尼斯、伊拉克、印度、毛里求斯、菲律宾和澳门地区进行友好访问、业务考察、讲学、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和商谈经济合作、文化科技交流。其中赴日本 20 批，美国 10 批，比利时 3 批，香港地区 5 批。

1987 年，全省派遣出国（境）团组 881 批 2739 人，分赴 56 个国家和地区，其中省级党政领导人和省级各部门及地市负责人组团出访 15 个国家和地区。

### 省级党政领导出访

省长张勃兴应日本东京电力公司董事长平岩外四的邀请，率领陕西省友好代表团于 5 月 25 日—6 月 4 日访问了东京、福岛、京都、奈良、濑户内海地区。出访期间会见了京都府、奈良县知事，京都府、奈良市市长及奈良前市长键田忠三郎。代表团除进行友好活动外，还与对方探讨了电力系统方面的技术交流和扩大煤炭贸易等事宜。省委副书记周雅光一行 7 人，应瑞士“沃州—陕西协会”的邀请，于 7 月 16 日—26 日访问考察了设在沃州的工厂、农牧场、学校以及欧洲研究中心、国际奥林匹克中心等，会见沃州州长，并初步交换了双方在经济、文化方面进行合作与交流的意向。省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省对外友协会长李连璧一行5人，应比利时安特卫普比中协会的邀请，于9月9日—17日访问比利时。代表团在此与安特卫普比中协会领导人，安特卫普省省长、副省长等进行了多次会晤和洽谈，并参观考察了该省的主要工业企业杨森制药公司、贝尔电话公司、范霍乐汽车公司和安特卫普大学等。代表团还应荷兰荷中友协、卢森堡卢中友协的邀请，顺访了荷兰和卢森堡。

### 省级机关及地市负责人出访

省级委办厅局和西安市、宝鸡市、汉中行署负责人组团67批，其中随各业务上级组团11批，分赴日本21批，美国11批，联邦德国9批，英国4批，比利时5批，法国3批，意大利、新加坡、加拿大、瑞士、捷克斯洛伐克各2批，瑞典、希腊各1批，进行友好访问、考察、经济技术洽谈、文化艺术交流，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出口商品展销会。

1988年，全年共派遣出国（境）团组993批3502人。其中：

### 省级党政领导出访

应比利时安特卫普省的邀请，以副省长孙达人为团长的陕西省政府代表团，于9月1日—8日对比利时安特卫普省进行了友好访问。

应意大利雷维索省政府和省长诺·英诺森蒂的邀请，以省长侯宗宾为团长的陕西省友好代表团一行6人，于9月19日—30日对意大利特雷维索省进行了友好访问。访意期间，代表团还顺访了圣马力诺。圣马力诺内务部长、外交部长、旅游、体育及运输部长等有关方面负责人与代表团着重就扩大双方在经济、文化及旅游方面的合作问题，进行了友好会谈和有益的探索。圣马力诺向陕西省赠款1000万里拉，代表团向圣马力诺赠送秦兵马俑原大复制品各1件。7月26日，圣马力诺国家元首罗索利诺·马尔德利和翁贝托·巴鲁利接见了代表团全体成员。

### 省级机关和地市负责人出访

省级委办厅局和西安市、咸阳市、宝鸡市、汉中、安康行署负责人，以及科研、经贸单位、高等院校等，其中参加业务上级的组团87批，出访日本18批、香港地区15批、美国11批、联邦德国10批、比利时5批，新加坡、法国各4批，加拿大、意大利各3批，澳大利亚、澳门地区各2批，马来西亚、朝鲜、土耳其、泰国、卢森堡、荷兰、阿联酋、苏联、新西兰、厄瓜多尔各1批，进行业务考察、友好访问、洽谈贸易、讲学、留学和科技文化交流、推销产品等。

1989年，全省共派遣出国（境）团组796批2349人。其中：

### 省级党政领导人出访

原副省长陈明率领陕西省暨西安市出口产品展销会团组一行48人，于7月26日—8月12日赴新加坡展销。省委副书记董继昌于9月访问罗马尼亚和民主德国。省政府特邀顾问曾慎达率领渭河化肥厂建设领导小组和省计委副主任刘陶生一行10人于10月28日—12月7日赴日本、美国、联邦德国对30万吨合成氨及52万吨尿素的生产装置技术及设备制造等进行考察。为陕西渭河化肥厂的技术引进和竞争指标工作打下了基础。

### 省级机关和地市负责人出访

省级委办厅局和安康、汉中行署、宝鸡市、咸阳市负责人以及科研单位、高等院校组团或参加业务上级组团59批。分赴日本20批、美国8批、联邦德国5批、香港地区5批、比利时3批，菲律宾、泰国、奥地利、挪威、民主德国、加拿大、马达加斯加、孟加拉国、法国、西班牙、肯尼亚、新加坡、罗马尼亚、朝鲜、苏丹、巴西、阿尔及利亚、苏联等各1批。进行友好访问、业务考察、科技文化交流、留学、进修、洽谈贸易、商购设备、推销产品、签订协议与合同。

1990年，全省派遣出国（境）团组1001批3603人（不含西安市审批办理的）。其中：

### 省级党政领导人出访

以副省长徐山林为团长的陕西省友好代表团，于3月14日—22日对日本京都府进行了友好访问。徐山林拜会了日本绿化地球保护组织会长大石武一先生。大石武一拟在1991年7月派员来陕考察，制定有关帮助渭南地区开展绿化的具体内容和措施。

省委书记张勃兴随中共中央代表团于9月17日—27日访问了苏联。

以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余明为团长的陕西省友好访问团，于10月29日—11月8日访问了泰国佛统府。在曼谷叻丕府、北碧村、佛丕府等地参观了农场、养殖场、兰花培植场、玩具厂、水上市场、农业大学等，还参观了佛统府在六世皇行宫举办的“水灯盛会”，考察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旅游、风土民情等情况，为今后合作交流创造了条件。

以中国国际交流协会陕西分会会长、省委副书记牟玲生为团长的陕西省代表团，于11月14日—22日访问了日本的京都、奈良。考察了松山县与西村建筑工业株式会社，签订了与京都艺术大学建立“西安国际交流会馆”的

协议书。前者是陕西向日方输出劳务和在国外承揽建筑工程的合资公司，后者是西安联合大学与日方共建的一所以文化教育为主的交流基地。

### 省级机关和地市负责人组团出访

省级部委办厅局和西安市、咸阳市、宝鸡市、榆林行署负责人以及科研单位、高等院校专家学者等 88 批。其中：出访日本 25 批，美国 11 批，泰国 8 批，香港地区 8 批，苏联 5 批，联邦德国，加拿大各 4 批，比利时 3 批，新西兰，荷兰各 2 批，喀麦隆，法国，匈牙利，民主德国，孟加拉国，墨西哥，英国，澳大利亚，南斯拉夫，埃及，巴基斯坦，意大利，瑞士，加蓬共和国，西班牙和澳门地区等各 1 批，进行友好访问，业务考察，科技文化交流、讲学、出席国际学术会议，产品推销、展览、洽谈贸易、签订合作协议等。

1991 年，全省派遣出国（境）团组 1165 批，3321 人。其中：

### 省级党政领导人出访

以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李溪溥为团长的陕西省友好代表团一行 6 人，5 月 24 日—31 日访问了日本京都、奈良、东京。先后拜会了京都府议会和府厅，交流了在地方立法和监督工作方面的经验以及加强今后两省府的友好往来等意向。参加了日本全国 42 届植树节的活动。考察了高科技精密器械制作所、生产新型轿车的日产京都工场、金阁寺、东映太秦映画村，瞻仰了京都岚山周恩来总理诗碑。在奈良参观了中国文化村建筑场地及唐招提寺等。在东京参观了全日电视播放中心及迪士尼乐园。在日本期间，还会见了经济界、文化界一些知名人士，并就经济文化的合作，交换了加强友好交流合作的意向书。

以省政府特邀顾问张斌为团长的陕西省商会代表团一行 5 人，于 5 月赴奥地利进行访问。省政府特邀技术顾问吴祖恺，于 5 月前往日本就彩色显像管生产合作事宜进行实质会谈。

以省长白清才为团长的陕西省政府代表团一行 6 人，于 6 月 6 日—9 日顺访瑞士沃特州，6 月 9 日—14 日主访了比利时安特卫普省。在瑞士访问期间，拜会了沃特州和洛桑市政府。还考察了奴肯亚电缆机械制造公司、劳基代克计算机元件公司、保贝斯特机床设备厂。

以王双锡副省长为团长的陕西省经济贸易代表团一行 69 人（含参展人员），于 7 月 1 日—12 日在日本京都市传统产业会馆举办了“中国陕西省出口商品展销会”。这是陕西省首次在京都市举办规模较大的展销会。展出丝

绸、纺织品、五金矿产品、轻工产品和代表长安画派的书画作品。7月3日，王双锡拜会了京都府、市及有关各界人士，举行记者招待会。7月5日展销会举行了隆重开幕式，京都府、市领导及各界人士出席开幕式。

以刘春茂副省长为团长的陕西经济贸易代表团一行5人，于12月4日—13日访问美国明尼苏达州，顺访了伊利诺州。代表团于12月7日在明州长办公室由刘春茂副省长与明州副州长杰勒尔·达艾斯特德签订了为加强两省州在经济贸易、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等合作为内容的友好协议书。参观了明尼苏达州12处工厂、企业，与几十家工贸人士探讨交流与合作的途径。明州政府贸易局同意向陕西无偿提供办公室和通讯设施作为发展经济联系窗口。并与15家企业达成了转让智能变送器、轴承和机械零件生产、医用灭菌用水，生产心脏导管、人工肺引进、光缆生产、水银血压计等合作生产的协议，以及美国西北银行与我省银行建立业务关系等15项意向。

#### **省级机关和地市负责人及科研单位、高等院校专家学者出访**

省级部委办厅局和西安市、宝鸡市、咸阳市，榆林、渭南、安康行署负责人，以及科研单位、高等院校专家学者等出访日本32批、泰国11批、德国、俄罗斯各9批、新加坡6批，瑞士、法国、加拿大和香港地区各5批，英国、印尼各4批，比利时、瑞典各3批，意大利、菲律宾、荷兰各2批，西班牙、罗马尼亚、奥地利、马来西亚、摩洛哥、委内瑞拉、古巴、坦桑尼亚、莫桑比克、苏丹、纳米比亚、津巴布韦等各1批。进行友好访问，文化科技交流、洽谈贸易、签订合作协议、业务考察、讲学，出席国际专题探讨会议，拓宽与外国高等院校、工厂之间的交往渠道。

## 第四章 友好城市关系

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陕西省与国外建立友好城市关系起步较早。1972年9月中日邦交正常化，1974年2月，陕西省省会城市西安首先与日本的奈良、京都分别建立了友好城市关系，此后，陆续开展了交往。

1982年至1991年，陕西省的友好城市关系取得了较快的发展，9年间陕西省与外国结为友好省、府、州、县关系4对；市（地）建立友好城市关系7对；建立友好交流与合作关系12对。

这些友好城市关系的建立和发展，增进了陕西省与国外友好城市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扩大了各个领域多层次、多渠道的交往，促进了陕西省与各国在经济、社会等多方面的实质性交流与合作，提高了陕西省的知名度，取得了积极成果。

### 第一节 友好省州（省府）

#### 一、美国明尼苏达州

根据中美建交联合公报的基本原则，为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经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美国明尼苏达州美中人民友好协会的推荐和协助，陕西省与明尼苏达州两省州之间建立友好关系。1982年10月16日—28日，应明尼苏达州州长阿尔伯特·奎的邀请，以省长于明涛为团长，副省长兼对外友好协会陕西分会会长李连璧为副团长的陕西省友好代表团一行5人，对美国明尼苏达州进行了友好访问。双方经友好协商达成以下协议：

（一）陕西省和明尼苏达州建立友好省州关系后，双方领导人可在认为适当的时机会晤。

（二）陕西省和明尼苏达州将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经过友好协商，采取各种形式，在可能的范围内和条件下进行经济、文化、教育、科学技术和

其他方面的交流与合作，以促进两省州的繁荣和发展。

双方于10月19日在明尼苏达州首府圣保罗城举行了签字仪式，陕西省省长于明涛和明尼苏达州州长阿尔伯特·奎分别在协议书上签字。明尼苏达州，别名北极星洲，位于美国中北部，面积84000平方英里，人口400多万（其中白人占98%，黑人、西班牙族人占2%），在美国50个州中人口居第12位。主要种族来源于德国、瑞典和挪威。全州共分为87个县，10万以上的大城市有3个。该州是美国对中国贸易的第三大州。代表团在访问期间，通过参观、考察和广泛地接触，广交了朋友，探讨了两省州间在经济、科技、文化、教育等方面开展友好交流的项目。

1983年10月22日—24日，美国美中友好协会明尼苏达州分会主席、明尼苏达州——陕西省友好委员会主席弗莱德·普塔什尼率“中国之行83团”一行18人抵陕西参观访问。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对外友协陕西分会会长李连璧设宴款待，省长李庆伟等出席。该团在陕西期间参观游览了名胜古迹，观看了陕西省歌舞剧院演出的《唐·长安乐舞》，并与有关方面交谈了未来的两省州间在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项目和设想。同年11月12日—15日，应中国国际贸促会的邀请，以明尼苏达州众议院议长亨利·赛本为团长的贸易代表团一行14人抵陕西参观访问。省长李庆伟、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严克伦分别会见并宴请了代表团成员。该代表团在陕期间签署了在陕西设厂合作生产心脏起搏器的意向书。

根据1983年同明尼苏达州签署合作生产心脏起搏器的意向书，1984年我省派团赴明州进行了考察，在明州政府及友好人士的积极协助下，我省秦岭晶体管厂与明州CPM公司就引进心脏起搏器设备和技术达成了协议，双方共投资150万美元（中方占51%，美方占49%），前三年由美方提供关键部件组装，后三年逐步国产化，这是我国引进第一个生产心脏起搏器的项目。

1984年明尼苏达州州长鲁迪·波佩奇和议长西本应邀来我省访问时，表示要在明州大力宣传陕西。回国后，鲁迪·波佩奇州长向全州发布公告，宣布1985年9月为“陕西月”，要求“所有人民为双方更紧密的合作而共同努力”。

1985年8月24日—9月6日，李庆伟省长率陕西省友好代表团一行6人，应邀赴美国参加在明尼苏达州举行的“陕西月”开幕活动。在“陕西月”期间举办了“中国秦始皇兵马俑展览”、“陕西省工业图片展览”、“陕西

省手工工艺品展览”。陕西省的4位国画、微雕、剪纸、泥塑艺术家也应邀访问了明州。同时还发布了陕西的珍稀动物金丝猴将在明州动物园展出的消息。

陕西举办的秦兵马俑展在明州影响很大，当地几十家报纸作了详细报道，并以巨照、广播、电视等各种形式做了宣传，每天有数千人参观，从早到晚络绎不绝。

陕西的4位艺术家先后在明州的九个城市进行了表演，所到之处，受到热烈欢迎。在奥斯汀市表演时，该市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欧洲艺术中心的创始人之一洛伊德·哈苏多尔老先生从千里以外赶来会见中国艺术家。当他看了著名画家罗国士表演作画后，惊愕不止地抱住画家说：“我在电视上看过你的表演，但没想到你运笔这样快、这样精妙，你是艺术大师，我一定要把你的作品介绍到世界艺术界，因为你的作品是属于全世界的。”

李庆伟省长一行在明州受到了热烈欢迎。他们参加了美中友协年会，广交了朋友，加深了友好省州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通过工业图片展、陕西手工工艺品展，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陕西的影响。此外，通过“陕西月”活动陕西还收入外汇9万多美元。

在友好城市之间的交流活动中，陕西省还利用各种机会为经济交流与合作牵线搭桥。1986年，邀请了明州一自费来访的贸易代表团，通过参观产品介绍，他们一次购买了我省混凝土机械设备达30万美元。1986年8月28日，秦明医学仪器有限公司建成投产，成为中国第一家生产心脏起搏器的中外合资企业。

1990年9月18日—10月4日，省外办派出以副主任秦元恺为团长一行4人的赴美工作访问团。在访问明尼苏达州的同时，顺访了美国夏威夷波里尼西亚文化中心、怀俄明州、堪萨斯市和洛杉矶市。访问明州期间，工作团拜会了明州政府和明州参、众两院，就促进两省州之间的进一步交流与合作交换了意见。与明州经济贸易发展部就进一步发展两省州间的友好关系进行了比较深入的会谈。因州长忙于竞选，受州长委托，州长办公室主任伯恩会见了代表团。双方进行了友好的交谈，他代表州长先生授予代表团全体成员“明州荣誉市民”证书。同年11月以美国明尼苏达州贸易与经济发展部部长、高级专员大卫·斯彼尔为团长的明州经贸代表团一行3人，在访问上海、北京后于12月16日抵陕西参观访问。这次斯彼尔部长率团特意来访，亦是1989年“六四”政治风波之后美国50个州中第一个派出的高层次代表

团。因此，美方称“这是一次勇敢的行动”。副省长孙达人会见并宴请斯彼尔先生及其一行。代表团还与省外办、省经贸委进行了工作会谈和经贸业务交流，与省经贸委及有关企业界负责人进行了座谈。为了进一步加强两省州间的友好合作与交流，经双方磋商又以《备忘录》的形式，于1990年11月14日明确重申了以下事宜。

（一）陕西省政府指定省外办为负责与明州政府联系的对外窗口。明州政府指定明尼苏达州国际经济贸易与发展部为负责与陕西省政府联系的窗口。省外办、明州国贸部将分别负责两省州建立友好关系协议书在本省州的实施和协调。

（二）双方忠实地执行两省州建立友好关系协议书规定，在经济贸易、科技、文化、旅游、教育、体育等领域进行友好合作与交流，各自为对方提供方便，创造优惠条件。

（三）双方在两省州建立友好关系协议范围内，每年应就两省州下年度的交流计划进行具体磋商和签署交流计划协议书。

（四）如遇到特殊情况，双方需进行会晤或商谈，临时协商确定。

（五）在双方协商同意的情况下，不定期地派出省州政府一级的代表团进行互访、考察，以加强了解，增进友谊，并协商两省州合作交流中的重大事宜。

（六）在交流协议范围内互派的代表团（组），交换专家、留学生及其他有关人员，其在华经费由陕西省承担，在美费用由明州方面负担，国际旅费各自承担。

1991年9月12日，美中友协明州分会团一行5人来陕访问，团长是刚刚当选为美中友好协会全国委员会主席的哈里森夫人，双方就陕西友协和美中友协明州分会、陕西省与明州政府今后的合作与交流进行了友好的会谈，进一步确认了陕西友协来年派团访美事项，并就咸阳市与明州罗彻斯特市缔结友好市事宜进行了探讨。

1991年底，副省长刘春茂率领陕西省经济贸易代表团访问美国明尼苏达州。代表团在访问期间，经双方友好协商，签署了《重申两省州友好关系协议书》，实现了10个交流项目和15项意向性交流协议，疏通和拓宽了陕西省与明尼苏达州政府以及企业、经贸界今后合作与交流的渠道。



## 二、日本国京都府

随着中日两国睦邻友好关系的发展，从官方到民间，从政治到经济、科技、文化、体育等领域的交流更加丰富多彩和富有实质内容。

1982年11月14日—21日，日本京都府日中友好协会会长依田义贤率京都府日中友好代表团一行5人来陕西访问，副省长、对外友协陕西分会会长李连璧会见并设宴款待这位曾16次来华访问的老朋友。依田会长向李连璧副省长转交了京都府林田悠纪夫知事给于明涛省长的信和京都府日中友协13个分会会长签名盖章，希望早日建立陕西省与京都府友好关系的愿望书。李连璧副省长向依田会长转交了于明涛省长给林田悠纪夫知事的信和由我方起草的建立两省府友好关系的协议书草案。依照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基本原则，经过协商，1983年以省委第一书记马文瑞为团长，副省长、友协陕西分会会长李连璧为副团长的陕西省友好代表团一行8人，于7月15日抵达日本，7月16日即与京都府签署了建立陕西省与京都府友好省府关系协议书，并就两省府今后在经济、科技、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友好交流交换了意见。代表团访日期间，参观了工厂、学校、科研单位、儿童活动中心、海港、农户等，游览了名胜古迹。代表团还访问了与陕西省西安市缔结为友好城市的京都市、奈良市以及其他城市。马文瑞同日本各界人士进行了广泛的接触。代表团离开京都府时，林田悠纪夫知事、高山宽议长等到车站送行；离开东京时，京都府副知事植田穗积专程到东京送行。

从1983年7月两省府结为友好城市到1991年的8年间，双方交往日益频繁。1983年10月25日—29日以京都府企画管理部长吉冈勉为团长、京都府府立植物园园长木幡欣一为副团长的京都府、陕西省交流协议代表团一行3人访问了陕西省。代表团抵达西安时受到省委第一书记马文瑞、省长李庆伟、副省长白纪年的接见，白纪年设宴款待了代表团。白纪年和省政府副秘书长张世卿、省外办主任魏明中、省计委副主任程新文、省卫生厅厅长张铅重、省高教局局长陆建平、省文化厅厅长李若冰、省旅游局长陈兴亮、省农牧厅副厅长殷世杰、省重工业厅副厅长邵遇堂、省经贸厅顾问王浩、省电子厅副厅长张福增、省林业厅副厅长王宪武、省纺织公司经理宋玉润、西安市文物园林局局长王一平、西安植物园副主任杨玉文等，就1984年交流项目与代表团进行了会谈。10月29日省外办主任魏明中和京都府企画部部长吉冈勉在1984年交流项目会谈纪要上签字。代表团观看了来年将赴日本京都

演出的陕西省歌舞剧院民族歌舞团的《唐·长安乐舞》，并会见了演职人员；还察看了作为来年暑期京都府儿童合唱团来西安演出的场地——人民剧院和栽植日方赠送樱花树苗的地点——大雁塔盆景园。

1984年，按照双方达成的交流协议，认真地组织实施。3月26日，日本京都府赠送樱花树苗100株，分别栽植在长安盆景园和周至楼观台林场。3月底，陕西赠送京都府石榴、柿子树苗各50株，铁杉10株，栽植在京都府立植物园。4月，京都府接受陕西农业研修员3名、日语进修生1名。7月6日—26日副省长张斌率工业考察团赴京都府等地访问。8月19日—24日京都府儿童合唱团一行28人来陕西省，在西安友好演出三场。8月30日—9月19日，为庆祝陕西省、京都府友好关系一周年，副省长孙达人率《唐·长安乐舞》剧组一行50人，赴京都等地进行友好访问，演出18场，观众达3万多人次。10月17日，京都府林田悠夫知事、高山宽议长率京都府友好访问团来陕西访问，庆祝陕西省与京都府建立友好关系一周年。京都府友协向陕西省体委推荐摔跤、柔道教练2名，为陕西省培训运动员。陕西省体委向京都府推荐2名太极拳教练，赴京都府教授太极拳。京都府邀请陕西省卫生厅厅长张铝重一行4人访问京都府，陕西省邀请京都府立大学校长四千井纲英一行4人回访陕西。

是年，通过友城渠道聘请日本京都大学教授历苍晨六郎，协助西安光华制药厂成功地解决了生产“胞二磷胆碱”的技术工艺难题，使该药品顺利投产，取得了很高的经济效益和使用价值。

1985年，两省、府交流在经济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在1984年通过友城渠道，由陕西派往日本的工业考察团进行调查研究。在1985年陕西省召开的经济技术洽谈会上，日本京都府商贸、经济界与陕西签订了电子、机械、纺织、印染和轻工业等50个项目，总投资2081万美元。周至县园艺站的田彦峰在京都经过一年的学习，回国时带回40株草莓苗，经过培育繁殖，亩产达2000公斤，比一般产量提高了两倍。赴京都府府立医科大学进修的省中医药研究所于立坚医师，刻苦钻研，先后在日本、美国医学杂志上发表了《鼠的干扰素对鼠的腹腔巨噬细胞吞噬和伸展的影响》和《钙调蛋白对肿瘤细胞生长的影响》两篇论文，在控制和治疗癌肿瘤方面有了新的突破。京都府府立医科大学校长签署并授予他两份科研成果证书。

是年，还通过友城渠道进行人才交流和培训，西安市市政道路工程处赴

日本培训的技术人员回国后研制成 LC—100 型沥青混合热储仓和“阳离子乳化沥青”技术，大幅度提高道路铺设的效率和质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西安市中心医院、市第四医院的牙科医师赴日进修后，研制成“氟离子透入防龋仪”，其配套装置与自控程度均属国内首创；西安市中心医院三位医师赴日进修后，与日本京都府立医科大学的教授，共同研究，使膀胱结石爆破技术有了较大突破，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是年三四月份，先后在西安和京都举行了隆重的“中国陕西、日本京都书画联合展览”。同时中国陕西画院与日本京都书画院正式缔结为友好画院。双方商定不定期举办书画展览和交流活动，互派和交流书画家作短期进修或研究创作。应日本社会党京都本部书记竹村幸雄邀请，11月11日中共陕西省委书记白纪年一行访问日本京都府，双方签署了社会党京都本部与中共陕西省委建立友好交流的协议书，同时与竹村幸雄商定，在西安市大雁塔曲江风景区建造一座日本式庭园的意向书。

1986年开始，陕西省注意扩大同日本地方友好组织加强联系。除与日本京都府社会党本部建立友好交流关系外，省总工会也与日本京都府劳福协会建立友好关系。同时还注意在迎送、演出或比赛、联欢游园等活动中尽可能安排一些青少年参加，培养友谊。

是年4月26日—5月5日，陕西省与日本京都府为纪念两省府建立友好关系三周年，联合举行攀登太白山的活动。鉴于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同友好国家联合攀登我国青藏高原以东著名的秦岭主峰、海拔3767米的太白山，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同意组建了京都府陕西省联合登太白山组委会。日方由京都府知事荒卷禎一、京都府山岳联盟名誉会长角仓太郎分别为正、副会长，京都府山岳联盟会长庄野小谷隆一、国体局局长庄野勇夫等4人任正、副委员长，另有6名委员和2名工作人员。陕西省组委会由省长李庆伟任主任，副省长孙达人任副主任，委员有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张世卿、省体委主任姚福利、宝鸡市副市长宋安华、省体委副主任马贤达、省外办副任何克敬，顾问有中国登山协会主席史占春、副主席许竞和5名办公室正、副主任组成。组委会下设总队，分设A、B、C三个登山队，队下分设三个班，列入必登山峰的队员。另外，还编了一个综合班，即量力而行不作必登主峰的要求，组成了60人的登山大军（日方45人，女队员4人；中方15人，女队员2人）。出发前在西安人民大厦东四楼南大厅举行了

入队式，省政府举行了欢迎和庆贺宴会。当登山队员登上太白山最高点——八仙台，往返 150 多公里胜利归来时，宝鸡市在眉县招待所为中日两省府首次联合攀登太白山举行庆功会。离开眉县时以联合登山队名义在县政府办公楼东西院种植了纪念树，这次双方登山队员的费用由日方承担。

是年 5 月 12 日，京都府、陕西省、西安市友好交流协会代表团一行 56 人来陕西举行中日友好庭园（清流园）落成剪彩仪式。省委书记白纪年、西安市副市长赵毓华等 100 多人出席剪彩仪式。日方代表团团长竹村幸雄和西安市副市长赵毓华分别讲话。日方在下榻的唐城宾馆宴会厅举行庆祝宴会。代表团在西安期间还参观了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省博物馆、乾陵和咸阳博物馆等名胜古迹。

是年 9 月 9 日—13 日，以京都府知事荒卷禎一为团长、京都府议会议长西田吉宏为副团长的日本京都府友好代表团一行 19 人，应邀来陕西参观访问。代表团到达时张斌副省长和有关方面负责人前往机场迎接。张勃兴省长与荒卷禎一知事进行了会谈，双方对两省府建立友好关系以来，在各个领域所取得的进展与合作表示满意，并就今后的交流与合作项目交换了意见。省政府为荒卷禎一知事率团访问陕西举行了欢迎宴会。9 月 11 日上午，在艺术家画廊举办了“京都百景版画展”，张勃兴、荒卷禎一在开幕式上剪彩并先后讲话。代表团还参观访问了咸阳彩色显像管厂、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省博物馆，游览了华清池、大雁塔、乾陵等名胜古迹。

是年 12 月 23 日，陕西省、京都府双方就 1987 年度两省府的交流项目进行了协商。中方代表省外办主任陈兴亮、日方代表京都府企画管理部知事公室长草木庆治在协议书上签字，双方达成的协议是：京都府接受陕西省派遣的日语和医学进修生 2 人，陕西接受京都府汉语进修生 1 人，日方邀请陕西省教育考察团一行 7 人，在京都府考察访问 10 天。陕西省科学技术考察团一行 7 人，在京都府考察先进电子技术现状 10 天。陕西省参加京都府举办的世界历史古城博览会。陕西邀请京都府妇女友好代表团一行 13 人来陕访问 10 天，双方商定在陕西和京都相互举办 30 幅少年儿童绘画作品跨年度交换展出等。

1988 年陕西省与京都府达成的友好交流项目有：京都府接受陕西省进修生 5 名。陕西省接受京都府汉语进修生 1 名；日方制造研磨机的技术人员 1 名，在陕西重型机器厂担任提高设计制造研磨机的指导；陕西省派交通设

施考察团在京都府进行为期 10 天的考察与交流；京都府派教育考察团在陕西进行为期 10 天的对初级教育的考察与交流；陕西派代表团考察在京都举行的国体大会（全运会），并进行经济交流。双方还商定继续进行跨年度的儿童绘画互换 30 幅作品展览。

1989 年，陕西省与京都府友好交流事项由京都府企画管理部知事公室长中田行雄和省外办主任张景文签字。交流项目有：京都府接受陕西语言和农业研修生 2 人，陕西省接受日方汉语进修生 1 人；陕西省派出友好访问代表团和文物保护考察技术交流代表团。继续进行跨年度两省府间 30 幅儿童绘画作品交换展等。

1990 年，陕西省和京都府协商达成本年度两省府友好交流协议。外办主任张景文与京都府企画管理部长清水南分别代表双方政府在协议书上签字。京都府接受陕西省日语、农业、医学研修生 3 人，陕西省接受京都府汉语研修生 1 人；京都府邀请陕西省妇女友好代表团一行 6 人访问京都府 12 天。

是年 3 月 14 日—22 日，应京都府的邀请，副省长徐山林率陕西省友好代表团访问京都、奈良、神户、大阪、东京等地，拜会了京都府知事荒卷禎一，向京都府赠送四分之一原大的铜车马。并与京都府商讨进一步在经贸科技领域开展交流合作的问题。在东京以老朋友身份会见了前农业水产相、日本绿色地球保护基金会会长大石武一，并就渭南地区韩城市植树造林的合作项目作了有益的探讨。

是年，通过友城渠道为韩城市引进了日本绿色地球保护基金会每年提供 10 万元人民币，为期 10 年的无偿绿化资金。

1991 年，两省府的交流项目是：陕西省派往京都府日语、医学、农业、文物保护进修生 4 人，京都府派往陕西汉语进修生 1 人；日方接受陕西医学专家进修讲座 2 人；双方继续选送中小學生绘画作品 30 幅互换展览。互访中，陕西省政府工作访问团一行 4 人访问京都府 15 天，陕西省中小工商业考察团一行 16 人在京都府考察 12 天，陕西省友好代表团一行 6 人赴京都府参加植树节活动；京都府友好代表团一行 23 人和妇女代表团一行 6 人访问陕西。

### 三、比利时王国安特卫普省

陕西省与安特卫普省建立友好关系，首先是通过比中协会主席、安特卫

普大学副校长、比利时知名友好人士傅满德牵线搭桥的。傅满德先生最早向全国友协转达安特卫普省政府与陕西结为友好的愿望。全国友协致函省外办征求陕西意见并转来通过傅满德主席带来安特卫普省省长金斯贝根给省长李庆伟的信。省政府经过认真研究后，通过省外办请示了全国对外友协，于是1985年1月，省政府决定派出以省政府办公厅副主任韩国劲带队先遣组访问了该省，协商并草拟了建立两省友好关系的有关文件和程序。同年5月4日，应比利时安特卫普省政府的邀请，以副省长张斌为团长的陕西省友好代表团到达安特卫普省，双方正式签署了建立友好省关系协议书。签字仪式于5月7日下午在安省议会大厅举行，张斌代表李庆伟省长与安特卫普省省长A·金贝斯根分别在协议书上签字。协议书确定为增进双方相互间的了解与合作，发展中比两国人民的友谊，将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采取各种形式，发展两省在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出席签字仪式的有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比利时王国大使章曙和陕西省友协全体成员，安特卫普省议会议长佩登斯和省政府理事会全体成员、省议会议员以及各界友好人士150多人。签字仪式结束后，安特卫普省政府举行盛大宴会和音乐会，在十分热烈友好的气氛中，宾主双方共同祝贺两省友好关系的正式建立。

安特卫普省是比利时王国9个省市中最北部的一个省，面积3000平方公里，人口1578000，是欧洲经济共同体核心地区之一，安特卫普省港口是比利时的重要门户，为欧洲第二大港。

根据陕西省和安特卫普省的合作协议，以T·洪博茨先生、A·伊德女士及G·彼特先生组成的安特卫普省代表团先遣组于1986年4月17日—23日访问陕西，同有关方面就两省合作协议书的具体实施及1987年5月由A·金贝斯根省长率领的安特卫普省代表团正式来访作准备工作，洽谈了具体事宜。

1987年，两省充分利用友好关系，努力进行经济、技术等多方面的合作。

1988年，陕西省与比利时安特卫普省友好交往活动是：应比利时安特卫普省政府的邀请，以副省长孙达人为团长的陕西省政府友好代表团一行6人，于9月1日—8日访问该省，受到A·金贝斯根省长及其政府和议会的热情招待。此次代表团访问的主要任务是为履行陕西省与安特卫普省的友好协议，加深相互之间的了解，发展与扩大彼此之间在经济、技术、教育、文

化、旅游等方面的合作与交流。代表团在比利时期间，主要从两方面开展工作：

(一) 广泛接触安特卫普省政府领导和各界人士，出席了安特卫普市庆祝解放纪念活动，参观访问了工厂、学校和一些研究中心。拜会了比中友好协会、华侨协会，广泛接触了企业、商业、金融、旅游服务等方面人士，同时还参加了安特卫普省和阿维维公司的两次记者招待会。

(二) 签署了两省合作备忘录，为进一步扩大两省间的合作与交流，经两省领导人充分协商，于9月7日由孙达人副省长与A·金贝斯根省长分别签署了《比利时安特卫普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陕西省合作备忘录》。在签字仪式上，A·金贝斯根省长和孙达人副省长向新闻记者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双方一致表示，要继续巩固和发展两省间的友谊与合作。《备忘录》除确定继续巩固与扩大安特卫普大学与西安交大、陕西师大、西北大学、西安医科大学的交流与合作外，还着重确定了以下几项：

1. 双方同意在1991年前后，安省在陕西历史博物馆举办安特卫普省风情展览。

2. 1993年陕西省在安特卫普省举办秦始皇兵马俑展览。

3. 为增进两省间的友谊，陕西省政府将给安特卫普省政府赠送二分之一原大的铜车马。A·金贝斯根省长和安省政府对此给予高度评价，并准备将这一珍贵赠品陈放在安省政府办公大楼内。同时安省政府为表达对陕西省人民的友好情谊，将给陕西省政府赠送一件陶瓷工艺品。

1991年4月30日—5月9日，比利时安特卫普省政府代表团一行3人来访，出席了西安杨森制药公司开工典礼，还前往汉中市参观，并与省政府进行了工作会谈。

1991年6月13日，以白清才省长为团长的陕西省政府代表团访问比利时安特卫普省期间，在安省议会大厅举行了陕西省政府赠给安省政府的1/2原大的仿秦铜车马赠送仪式。白清才省长还同安特卫普省省长A·金贝斯根就今后在经济、技术、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城建保护、珍贵动物研究以及人才引进和培训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达成协议，并签署了两省合作备忘录，计有15项交流项目列入1992年的交流计划。在访比期间，代表团还拜会了安省比中友协、安省商会、旅比华侨联合会及其他各界人士。重点考察了杨森制药公司、贝尔电话公司，并与佛莱芒大区工商贸易界人士达成来陕

考察、洽谈的意向。

1992年11月，安特卫普省在陕西历史博物馆举办“安特卫普省风情展”，安省省长A·金贝斯根率代表团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 四、意大利共和国特拉维索省

早在1986年，陕西省和意大利特拉维索省就已开始了交往。除经济、贸易和文化使团互访外，1987年4月，陕西省派出以省经委主任刘建堂为团长的工业经济考察团，对特省进行了考察访问。同年10月7日—12日，特拉维索省省长利诺·英诺森蒂率代表团一行20人，来陕西进行友好访问。主要是与省政府领导会商正式建立友好省际关系，以及今后两省在经济、贸易、文化、教育、旅游等方面的交流合作问题。代表团中有13名政府委员和7名经济界代表。代表团抵离西安时，副省长张斌及省外办主任陈兴亮和省计委、省经委、省经贸委、省人民银行、省旅游局等部门的负责人前往机场迎送，省外办副主任何克敬陪同参观。8日上午，省长侯宗宾与副省长张斌同意方代表团进行了会谈。11日下午，代表团又与副省长张斌、省外办主任陈兴亮，就双方会商的有关问题进行了确认。

1988年7月19日—30日，应特拉维索省省长利诺·英诺森蒂的邀请，省长侯宗宾率陕西省友好代表团一行6人，赴特拉维索省进行友好访问，在访问期间，又顺访圣马力诺。

7月21日晚，侯宗宾省长和利诺·英诺森蒂省长分别代表陕西省政府和特拉维索省政府在友好省协议书上签字，并交换了文本，在签字仪式上，侯宗宾省长和利诺·英诺森蒂省长分别发表讲话，双方一致表示，陕西省和特拉维索省两个友好省份的建立，不仅将对两省的繁荣发展起到积极作用，而且还将推动中意两国人民的友好事业，对维护世界和平起到积极的作用。7月23日侯宗宾省长和利诺·英诺森蒂省长联合举行记者招待会，两人在招待会上强调，不断地加深友谊和互利合作，是陕西省和特拉维索省建立友好省的根本宗旨。两位省长一致认为，在友好省协议书签署后，两省最急需做的事是尽快将协议中的原则性条文逐项具体地加以落实。7月25日，双方又签订了两省经济协议。协议书共16项，主要有：陕西省渭南市和意大利特拉维索市建立友好城市，在适当的时候我省派农业考察团对特省进行考察访



问；意烟草公司给陕西城固烟厂提供烟梗膨化设备和技术；陕西引进大理石开采技术和釉面砖技术；引进箭杆织机易损件技术。特省要求陕西提供兔肉；意提供渭北旱塬改造、广播电视中心、咸阳国际机场的政府贷款；互设餐馆酒家；意威尼托大区组织七省旅游团和陕西省直接联系，开展国际旅游活动；特省邀请陕西长安乐舞赴意演出；陕西工艺品展览；意为我培训 10 名专业人员（其中国际市场学 2 人、意语 3 人、公共关系学 5 人），陕西为意培训汉语 2 人，进一步落实意援助陕西建立高级职业培训中心的有关问题；特省邀请陕西兵马俑运意展出等。代表团在意大利访问期间，考察了工厂、学校、农户，广泛地接触企业、工商、金融、服务等各界朋友，同时还通过召开座谈会，举行记者招待会，宣传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和介绍陕西经济情况，双方进一步加深了解，都认为合作的前途是广阔的。

1989 年双方正在落实友好协议项目时，北京发生“六四”政治风波，意方单方面宣布中止与陕西省友好关系。省外办就此及时向省政府报告，并请示了全国对外友协和外交部，就意方不顾中意两国人民友好大局，违背两省互结友好协议，伤害两省人民友好感情，单方面中止友好关系的错误做法传真复函，进行了严肃的批驳。1993 年后，该省时任省长奇特龙通过多种渠道向中方道歉，并向省外办发来传真称：“想起过去那个错误的做法就对不起友好的陕西省人民”，表示希望与陕西恢复友好省关系。经请示全国对外友协和外交部后，陕西省复函意方表示同意恢复关系。后来由于特拉维索省方面议会内部又出现了分歧意见，恢复关系的动议迟迟没有付诸实施。

表 3-4-1 陕西省与外国州、府、省建立友好关系一览表

时 间	外 国 州、府、省 名 称	双 方 签 字 人	
		陕 西 省	外 国 州、府、省
1982 年 10 月 19 日	美 国 明尼苏达州	省 长 于明涛	州 长 阿尔伯特·奎
1983 年 7 月 16 日	日 本 京都府	省委第一书记 马文瑞	知 事 林田悠纪夫
1985 年 5 月 7 日	比利时 安特卫普省	副省长 张 斌	省 长 A·金贝斯根
1988 年 7 月 21 日	意大利 特拉维索省	省 长 侯宗宾	省 长 利诺·英诺森蒂

## 第二节 地（市）级友好城市

本节鉴于各地在各自的志书中，对于同外国城市建立的友好关系，均有详细纪实，故在此仅列表简述如下：

表 3-4-2 西安市友好城市一览表

时间	外国城市名称	双方签字人	
		西安市	外国城市
1974年 2月1日	日本 奈良市	市革委会主任 孙长兴	市长 键田忠三郎
1974年 5月10日	日本 京都市	市革委会主任 孙长兴	市长 船桥求己
1985年 4月16日	英国 爱丁堡市	市长 袁正中	市长 艾恩斯
1986年 9月15日	法国 波城市	市长 袁正中	市长 安德烈·拉巴雷尔
1989年 4月29日	美国 堪萨斯城	市长 袁正中	市长 理查德·伯克利
1989年 5月6日	伊朗 斯法罕市	市长 袁正中	市长 马丹尼
1991年 5月27日	联邦德国 多特蒙德市	市长 崔林涛	市长 萨姆勃雷

表 3-4-3 咸阳市友好城市一览表

时间	外国城市名称	双方签字人	
		咸阳市	外国城市
1986年 7月24日	日本京都府 宇治市	市长祝新民	市长池本正夫
1988年 9月15日	日本千叶县 成田市	市长张宏勋	市长长谷川录太郎

### 第三节 友好交流合作关系

鉴于对外友好交流合作关系，是在正式缔结友好城市关系以外的一种友好交流形式，故列表如下：

表 3-4-4 陕西省暨各市、地、县对外友好交流合作关系一览表

省、市、地、县	外国市、州、县、町、会	建立年月
陕西省	日本香川县	1984.4
	日本奈良县	1984.5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	1990.9
咸阳市	美国明尼苏达州罗切斯特市	1991.10
宝鸡市	日本岐阜市	1987.5
	日本喜多方市	1986.5
	俄罗斯车里雅宾斯克	1991.7
汉中地区	日本出云市	1990.11
安康地区	日本井手町	1991.11
渭南地区	日本福冈市	1991.9
华阴县	日本大江町	1991.11
韩城市	日本绿色地球保护基金会	1989.10

## 第五章 民间友好关系

陕西省民间友好组织先后有：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西安分会（1950.12—1966.3）、陕西省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简称省友协）、陕西省人民对外文化协会（1956.2—1967.2）、中国人民外交学会陕西省分会（1985.4成立）、中国国际交流协会陕西省分会（1990.9.17成立）等，其中规模最大、历史最长、交流最广泛的是陕西省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于1952年11月5日成立，它的前身是成立于1949年12月21日的陕西省中苏友好协会西安分会，其组织机构当时发展到陇海铁路陕西段沿线的地（市）城市。1976年4月23日改为省友协，其机构设置除西安市之外，其他地（市）均由当地外办兼管友协的涉外活动。省友协的宗旨是发展中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促进相互间经济、文化、科技和社会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维护世界和平。随着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大致可以划分如下三个历史阶段。

### 第一节 建国初期

从建国初到“文化大革命”前，经历着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和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时期，在这18年里对外民间友好关系的组织状况和涉外活动情况也随之发生着发展变化的过程，其主要涉外情况是：

#### 一、中苏友好协会西安分会

1949年5月20日西安解放。同年9月西安各界发起成立中苏友好协会，随即号召全市工厂、学校、机关、团体开展中苏友好、学习苏联的宣传活动，大量地吸收会员，建立基层组织，于同年12月21日召开代表大会，正式成立分会。主要工作是：

### （一）发展友好组织

除在西安的工厂、学校、机关和人民团体普遍建立支会和支分会外，潼关至宝鸡的陇海铁路沿线各县也相继成立支会，高等院校的西北农学院和西北工学院也成立支分会。西安市12个区也成立支会，街道成立支分会，并在市民和郊区农民中开始发展会员。不到一年时间就组建支会86个，支分会320个。共有会员31970人。其中工人会员3375人，教员、学生9693人，机关干部9385人，农民271人，市民5704人，其他3542人。

### （二）开展各种友好活动

举行列宁、米丘林逝世纪念会，苏联红军建军节庆祝活动，苏联教授、学者谢列夫一行5人前来西安参观并作学术报告，使纪念活动更显得有声有色。此外，又组织中、小学生给苏联青年学生书写交往信件。促进中苏两国青少年间的亲密联系。

### （三）宣传苏联活动

举办“苏联建设、工人、儿童生活”、“苏联农业”、“苏联卫国战争与世界民主青年”图片展览；放映“苏联十月革命”、“列宁生平”、“苏联妇女、儿童”等影片。各支会先后放映86场，观众达277023人，开放阅览室，陈列社科、传记、文艺、儿童读物等类书刊608种715册。

1950年6月25日，美国武装入侵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10月25日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赴朝作战。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委员会西北区总分会筹委会暨西安分会于12月11日成立（简称和大），并以“和大西安分会”和“西安各界反对美国侵略台湾、朝鲜运动委员会”名义，联合召开扩大会议，大会选出了以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杨明轩为首的西北区总分会筹委会委员80人，和以西安市委书记赵伯平为首的西安分会委员73人，并向全省人民提出四项具体任务。同时要求友协除做好日常的宣传工作，侧重点放在开展和平签名运动，大力推动保卫和平的宣传工作。陕西各地在斯德哥尔摩和平宣言上签名的有920多万人，参加保卫和平，反对美国侵略签名和投票的790多万人。

### （四）接待来访

1951年首先接待朝鲜外宾6批11人，是陕西同外国民间交往的伊始年。

## 二、陕西省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省友协）

经过一年多的筹备，1952年11月5日召开全省友协首届代表会议，中

苏友好协会总会发来贺电：“希在大会中将这次总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所通过的决议贯彻下去，着重讨论如何加强友协工作的思想性、政治性，并密切结合国家当前中心任务，特别是抗美援朝运动和国防与经济建设，使友协工作能迅速地从一般号召的阶段转入深入具体并具有丰富生活内容的阶段。希按此精神确定今后工作开展的方针与计划。”会后到1964年期间主要活动是：

### （一）发展友协组织

由于有了统一的领导和明确的目标，逐渐由城市向农村发展，各专区和县、市相继成立友协支会或分支会，友协会员由1951年的31万多人到1953年猛增到316911人（不含省级机关、部队和大专院校）。

1953年6月各地基层友协组织与当地宣传部门合署办公之后，发展会员由个人转变为吸收团体会员。1955年省、市友协合并，由省、市委宣传部直接领导。

### （二）开展宣传活动

各地友协组织，通过纪念列宁、斯大林诞辰，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纪念十月革命节等各种活动，运用苏联电影周、幻灯、图片、刊物、黑板报等宣传工具，采取开纪念晚会、座谈会、联欢会、报告会等进行广泛地宣传。其主要形式和方法是：

1. 结合各种运动和各项中心工作，特别是结合抗美援朝运动。友协会员首先响应全国各民主党派的宣言。宝鸡市会员下到农村利用集市、庙会进行宣传，控诉美、日帝国主义的罪行，这些工作有力地推动了人们为抗美援朝而进行的捐献活动。两个半月捐献18亿元，其中会员捐献即达5亿元。“爱国艺人”常香玉和她领导的豫剧社，经过半年巡回演出，捐献了一架飞机。

2. 编写印发各种图书刊物宣传资料。到1958年的四年间，编写书籍14种，印发23万册，为各地友协提供了宣传材料32种，35.7万份，编制和购发挂图画册320种，发行27.6万套（份），制幻灯片5种，550套（份），编制图片3446套，各级友协举办图片展览6430余次，观众达964万余人次。西安市的街头、公园、文化馆、工人俱乐部、电影院等31处都设有友协宣传图片橱窗展览或画廊。四年多来，省会所在地西安市友协组织各种报告会和讲座250多次，听众达31.71万余人次；组织苏联音乐欣赏和诗歌朗诵28次，听众达1.43万余人次。同时利用苏联对外文化协会赠送陕西省中苏友

协的宣传车，配合各个时期的中心工作与政治运动，在城市街头、工厂、学校和农村进行宣传和文化活动共 558 次，观众达 83.41 万余人次。西安市友协从 1950 年创办的两年制业余俄语夜校（普通、进修两个班次），到 1958 年累计毕业人员 313 名（普通班 257 人、进修班 56 人）。

### 3. 举行纪念革命领袖和世界文化名人大会

西安各界 16 万人民于 1953 年 3 月 9 日下午 4 时许在革命公园人民体育场隆重举行追悼伟大革命导师斯大林同志逝世大会。在西安的苏联友人亦参加追悼会。大会由中共西安市委第二书记、西安市市长方仲如主持，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三书记马明方、副书记马文瑞，西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张治中、杨明轩，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潘自力，省人民政府主席赵寿山，中共西安市委书记赵伯平、市人民政府市长方仲如分别向斯大林同志遗像敬献花圈。在大会上致悼词的有：马明方、张治中、杨明轩和西北总工会副主席杜延庆、西北妇联副主任曹冠群、青年团西北工委副书记韩夏存，苏联友人代表米洛什维克。同时西北、陕西、西安人民广播电台转播了追悼大会实况。西安市设立 118 处收音站，收听追悼大会实况转播的听众 14 万人以上。

陕西宝鸡、渭南、铜川、延安、汉中、咸阳地区等地人民也以不同形式进行沉痛哀悼。

从 1959 年 5 月以来新开设了放映苏联电影的放映室，观众达 93399 人次。举办“俄罗斯—苏联文学讲座”，介绍了普希金、果戈里、奥斯特洛夫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托尔斯泰、马雅柯夫斯基等著名文学家的作品和创作道路。还和西安美术家协会举办“北京—莫斯科版画展览”。举办了纪念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诞辰 90 周年图片展览。

1962 年 4 月 19 日，西安各界 1000 多人在人民剧院举行世界文化名人、我国伟大诗人杜甫诞辰 1250 周年纪念大会。大会由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西安分会、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西安市分会、西安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联合主办。作协副主席胡采主持并致开幕词。西北大学教授傅庚生作了题为《杜甫写下了世界诗歌史上光辉的一页》的学术报告。

### 4. 声援各国人民正义斗争，维护世界和平的活动

1959 年 1 月 27 日，西安各界代表 1500 多人在人民剧院集会，表示全力支持古巴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和刚果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5 月间，西安地区青年和各界群众 2 万多人举行盛大集会，支持土耳其人民的爱国正义斗

争，反对美帝国主义走狗奴役和屠杀土耳其爱国人民的血腥罪行。5月12日为了支持日本人民反对日美军事同盟条约，西安各界25万人民冒雨举行了声势浩大的集会和示威游行，全省各地参加集会游行的群众共有108万多人。

· 1961年4月22日—24日，为祝贺古巴人民革命斗争的胜利，支持古巴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以西安市体育场为中心会场举行了约5万多人参加的“西安各界人民支持古巴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武装侵略大会”。全市各机关、工厂、学校、部队和城区人民公社及咸阳、宝鸡、铜川、渭南、延安、榆林、汉中、安康、商洛等地委和行署所在地组织职工群众约近百万人收听了大会实况广播。省委书记处书记兼西安市委第一书记张策、省委书记处书记严克伦、李启明，西安市委书记处书记刘庚、市长时逸之等省市领导、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政府各部门负责人出席了大会。大会由时逸之主持，张策作了重要讲话。各民主党派代表、省总工会、团省委、省妇联负责人及中国拉丁美洲友好协会理事，以及工人、农村人民公社、部队、民兵代表等先后讲话。

1962年11月1日，西安各界2000多人，在人民大厦礼堂隆重集会，声援古巴人民坚决反对美帝战争挑衅，保卫古巴革命。省委书记处书记、省长赵伯平，西安市委书记处书记、市长时逸之，副省长孙蔚如、省军区司令员杨嘉瑞、省政协副主席杨子廉、杨玉亭，以及省、市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政府各部门负责人出席了大会。在西安的越南留学生也参加了大会。大会由中国拉丁美洲友协理事张锋伯主持，时逸之和各方代表作了讲话，一致谴责美帝国主义悍然对古巴实行军事封锁的海盗罪行。11月6日西安各界又举行20多万人的集会，参加示威游行。

1963年5月6日，西安市总工会组织1000余名职工参加支持越南南方人民反美爱国正义斗争大会。正在西安访问的越南南方劳动解放协会代表阮明芳应邀出席，并作了揭露美帝国主义在南方的罪行发言。

7月27日，省友协、总工会、妇联、青联、科协等联合在西安人民大厦礼堂举行庆祝朝鲜解放战争胜利10周年集会。省委书记处书记、代省长李启明，省委书记处书记章泽，西安市委书记处书记刘庚，驻陕部队方升普、江波少将，省政协副主席杨子廉、杨玉亭出席了大会，出席大会的还有省市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和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彭康、丁济沧、韩望尘、侯宗濂、原政庭、李瘦枝等，“和大”陕西分会副主席张锋伯主持大会，主



席章泽发表了讲话。

1964年1月15日，西安各界人民冒着风雪在市体育场举行盛大集会，热烈拥护毛泽东主席关于坚决支持巴拿马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爱国正义斗争的谈话。参加大会的有各界群众和解放军官兵、民兵等6000多人。在西安的越南留学生也参加了大会。大会由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陕西分会、省总工会、省青联会、省妇联、省科协、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陕西分会和西安市学生联合会举办。省委书记处书记、省长李启明，副省长孙蔚如，省军区副司令员张开基，西安市委书记处书记、省“和大”分会副主席刘庚，省政协副主席杨子廉，以及省市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负责人参加了大会。大会由省总工会副主席朱子彤主持，刘庚发表讲话，四天来全省已扩展到各专区城乡，西安市已扩展到郊区，40多万人参加集会和示威游行。

同年8月8日—12日，省市“和大”、工会、妇联、科协和省青联、省工商联等联合于10日在市体育场召开了万人大会，掀起了一个声势浩大的支持越南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武装侵略的群众示威运动。连日参加游行示威的群众近70多万人。省委书记处书记、省长李启明，副省长傅子和、刘邦显，省军区司令员胡炳云、政委高维嵩，空军驻陕部队首长袁学凯，省政协副主席杨玉亭，西安市委第一书记彭天琦，市委书记处书记、市长刘庚，以及省市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负责人等出席了大会。正在西安访问的以邓日珠为团长的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科技代表团，以科西·加普逊团长为首的参加第二次亚洲经济讨论会的加纳代表团也应邀出席了大会。省委书记处书记、“和大”分会主席章泽和邓日珠团长先后讲话。大会由“和大”分会副主席张锋伯主持。

#### 5. 组织介绍各国情况和重大节日庆祝活动

1959年4月，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陕西省暨西安市分会，中国美术家协会西安分会和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西安分会联合，从9月起以两周时间在新城展览室举办了“古巴必胜图片和版画展览”。

1960年2月以中苏友协名义，举行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10周年纪念活动。并与省政协联合举行庆祝酒会，省市党政军负责人，各界人士以及驻西安地区的苏联、民主德国、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等国的专家负责人500多人出席。同时举办了图片展览，观众达16900多人次；编印宣传参考材料45000多份，介绍苏联科技成就，苏联文学等报告会共71场，听众87500多人次。同年4月3日，在人民大厦礼堂举行西安各界1000多人参加

的庆祝匈牙利人民解放 15 周年大会，在西安地区的匈牙利、苏联、民主德国专家负责人也参加了庆祝会。同年 9 月 1 日，在人民大厦礼堂举行了 1000 多人参加的庆祝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 15 周年大会，在西安的越南留学生和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专家组负责人应邀出席了大会。

1961 年 7 月 6 日—15 日，在西安举办了“中蒙友好旬”。7 月 10 日晚在人民大厦礼堂举行了“西安各界人民庆祝蒙古人民革命 40 周年大会”，出席大会的有省市党政军领导，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负责人，以及工人、农民、部队、学生、文艺界共 800 多人，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西安分会会长张锋伯在大会上讲话。会后放映了蒙古影片《星火》。西安公路学院、西安黄河棉纺厂还在本单位举行了庆祝报告会，听众 1000 余人。市文化局在市中苏友协阅览室举办了“蒙古人民革命 40 周年图片展览”，观众达 3656 人次。

1962 年 2 月 15 日—3 月 3 日，举办了阿尔及利亚劳动党领导人民解放祖国和建设社会主义图片展览。展出期间受到西安市人民的热烈欢迎，参观展览的有 7 万多人。3 月 6 日—19 日，在西安市民主剧院举办了反映古巴人民推翻巴蒂斯塔统治和反对美帝国主义的英雄气概与古巴人民在建设祖国方面取得的伟大成就，以及中国人民和古巴人民深厚友谊活动等图片、版画展览。展出期间参观者累计达 2 万多人。

1962 年 7 月 11 日，西安各界 800 多人在人民大厦礼堂集会，庆祝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一周年，省委书记处书记、省长赵伯平，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李启明，西安市市长时逸之，省军区司令员杨嘉瑞等党政军负责人出席大会，大会由省政协副主席杨子廉主持、副主席杨玉亭讲话。同年 7 月 27 日，西安各界 2000 多人，在人民大厦礼堂举行纪念朝鲜人民解放战争胜利 10 周年大会，省市党政军负责人及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负责人出席大会，由“和大”副主席张锋伯主持，“和大”主席章泽讲话。大会通过了致朝鲜人民支持电，举办了朝鲜电影周。同年 9 月 15 日，西安各界 1800 多人庆祝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 15 周年的集会，省委书记处书记严克伦、李启明、章泽，西安市市长时逸之、市委书记刘庚，驻陕部队首长杨嘉瑞、省政协副主席王菊人、市政协副主席李瘦枝等党政军负责人以及省市各人民团体负责人和志愿军战斗英雄陈德清出席了大会。正在西安访问的朝中友协代表团团长韩秀东和代表团成员崔安国、金斗星等应邀参加了大会。章泽、韩秀东先后在会上发表讲话。

1963年4月，省友协与美协西安分会联合举办了“古巴必胜图片和版画展览”，两周内观众达54451人次。展出期间，在西安访问的古巴驻中国大使波诺·柴托明观看了展出。

1964年1月18日—30日，根据中朝文化合作计划举办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15周年图片展览，在西安民主剧院展出，副省长惠世恭，省委宣传部部长、对外文协西安分会会长刘端棻，西安市副市长张锋伯及省、市各部门负责人出席了开幕式。展出期间有56000余人参观了展览。西安市还举办了越南民主共和国电影周，放映了越南影片《同一条江》。同年1月19日，由省中苏友好协会、对外文协西安分会、省政协、省总工会、团省委、省妇联、省科协、省青年联合会、市中苏友好协会共同举办陕西省暨西安市各界1500多人隆重集会，庆祝阿尔巴尼亚解放20周年。省委书记处书记赵守一、严克伦，副省长林茵如，省军区副政委萧潮，西安市委第一书记彭天琦，副市长张雪涛以及省政协和人民团体负责人出席了大会。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馆代表阿里·杜米也出席了大会。严克伦和阿里·杜米在大会上发表了讲话

### （三）拓展民间交往

友协组织主要是从民间角度为各行各业牵线搭桥，共同积极参与接待来自世界各地的友好访问、专业考察团组，并协助组织出访团组。

陕西同国外的民间交往始于1951年。首先接待来访的有朝鲜外宾6批11人，陕西赴朝人员8批690余人，其中铁路助勤人员461人，机械技术人员23人，卫生手术队10人。

1952年来访的有苏联、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印度、民主德国、匈牙利、英国、锡兰、瑞典、日本11国共14批228人。

1953年来访的有朝鲜、波兰、巴西等3批292人。

1954年来访的有16批533人，来自苏联、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德国、匈牙利、印度、英国、锡兰、瑞典、日本9国，其中朝鲜人民访华团和两个艺术团共251人，于10月17日—20日在西安进行访问演出。同年10月16日—12月21日，陕西省参加由西北地区组织的五省一市各民族、各阶层、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赴朝慰问团对朝鲜人民、朝鲜人民军与中国人民志愿军进行慰问。陕西代表65人，代表中有人民团体、新闻、文艺、工商、妇女、学生、民主党派、工人、农民和水利建设中的劳动模范、军人中的战斗英雄。

1955年接待来自苏联、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民主德国、蒙古、越南、印度、日本、缅甸、联邦德国、比利时、西班牙、瑞典、法国、意大利、墨西哥、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苏丹、约旦、芬兰22国的团组和友好团体、友好人士以及各界朋友22批257人。

1956年接待来自捷克斯洛伐克的艺术考古专家，芬兰的艺术评论家，波兰的畜牧专家，埃及的历史学家，蒙古的历史考古专家，墨西哥的造型艺术学者，尼泊尔的文化工作者，英国的世界和平著名人士坎特伯雷、教长约翰逊，日本的日中贸易联盟和青年、妇女、文化访华团，巴基斯坦伊斯兰教代表团，印度尼西亚劳动代表团，苏联作家代表团，法国社会活动家访华团；印度印中友协代表团14国24批152人。

1957年接待对外文协、“和大”等邀请外宾和各种民间友好团体、友好人士及各界朋友共18批139人。他们是分别来自英国的首次来华文化和英中友协代表团，法国的作家和友好人士访华团，印度抗日战争时期援华医疗部分队员回访团，罗马尼亚作家协会访问团，东南亚青年代表团，比利时友好团，意大利友好访华团，埃及青年代表团，南非联邦友好团，联邦德国作家协会访华团，奥地利友好访华团以及法、奥、英、以色列、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国青年学生组成的中国名胜古迹学习旅行团。

1958年4月，省暨西安市人民委员会外事办公室成立，其职能扩大，统一协调、指导和管理全省的外事工作。接待外宾计划、简报等均以外办名义上报下达。为进一步发挥各方面在涉外活动中的作用，省友协继续贯彻1957年中央批准的友协工作方针，即：“一个‘一定’，两个‘一般’”，即友协不但不应该而且也不可能包办代替一切，主要把所担负的宣传中苏友好，介绍苏联情况和文化交流活动的工作做好。同年10月底，苏联成立了苏中友好协会，接着在各加盟共和国和许多大城市、工矿企业、机关、学校成立了分会。积极开展宣传苏中友好活动，曾两次派遣代表团来我国访问，并接待了我国中苏友好访苏代表团，陕西省友协副秘书长田克恭参加了这次中央组团。还举行庆祝我国国庆和中苏友好重大节日的活动。此外，专为我国记者创办了《苏中友好》周刊，向我国人民介绍苏联和宣传苏中友谊。

是年接待29批99人。他们是分别来自苏联的农牧业科学家、青年先进生产者、科技工作者；日本的高知、三重县和平代表团，应邀的美术家、手工艺评论家、艺琳纪念展览代表团，恢复日中邦交代表团；英国英中友好协会；泰国民间经济联络代表团；印度尼西亚教联代表团；越南军营建房参观

组；保加利亚对外友好与文化联络团；阿富汗文化代表团；哥伦比亚作家；法国摄影师；世界和平组织友人；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联络组织友人等。

1959年在省、市外办的统一部署下，参与接待来陕外宾21批221人。他们来自苏联、民主德国、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印度尼西亚、缅甸、伊拉克、西班牙、日本、英国、美国、意大利、荷兰等；接待华侨及港澳同胞观光团2批27人。另外，友协协同文化局还接待了意、德、缅、荷四国的文化友好和艺术团体116人，他们在活动中同省、市友好人士和文化艺术界朋友进行了广泛接触。此外，以友协名义接待了来自苏联、日本、英国、巴西、蒙古、美国、印度、朝鲜、波兰、印度尼西亚、伊拉克（学生代表团）、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德国和香港、澳门工商界等15个国家和地区的20批107名外宾与友人。

同年6月应苏联对外友好文化联系协会联合会和苏中友好协会的邀请，陕西友协驻会代表田克恭参与中央中苏友好协会访苏代表团，对苏联进行了友好访问。陕西省第一批赴苏联旅行团一行26人，于9月19日启程，在苏联26天中参观了47个项目。和苏联人民直接接触，增进中苏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好关系。同年6—11月，邀请来陕的文化交流团体有波兰文化代表团一行5人；泰国促进文化交流团一行5人；意大利文化代表团一行4人。进行访问演出的有澳大利亚音乐、舞蹈艺术家代表团一行9人，民主德国德累斯顿交响乐团一行104人。同时还接待了苏联自费旅行者一行30人（内有工程师、教授、医生、工人、记者、家庭妇女等，另有苏籍中国人3名）。

1960年友协接待了来自捷克斯洛伐克、英国、印度尼西亚、民主德国、缅甸等国的16位医学、烟草、冶金、妇女、作家、地质等专家、学者考察交流。

1961年主要接待了来自日本的友好访问和专业考察团组6批66人，有国际贸易促进协会、文学家、书法家、禁止原子弹氢弹协会、社会党顾问团、日中友协团、佛教代表团、民主青年联盟访华代表团等。

1962年接待了来自马来西亚、瑞典、喀麦隆、桑给巴尔、日本、印度尼西亚、英国的作家、工会、交通、社会学等专家学者考察交流的7个代表团（组）共10人。其中瑞典作家杨·米尔达及夫人（版画家）于8月3日—9月14日在延安柳林生产队进行了专题采访。

1963年接待外宾21批87人，其中以对外文协名义接待16批72人，以

省“和大”名义接待5批15人。他们分别来自日本、印度尼西亚、阿尔巴尼亚、朝鲜、越南、比利时、喀麦隆、芬兰、美国。其中来自日本的友人占2/3。他们来陕访问，大多是为了学习延安精神和游览名胜古迹。

1964年接待外宾31批177人，其中以省“和大”名义接待7批19人，“对外文协”名义接待23批147人，其中英中友协会长李约瑟博士，由副省长傅子和会见并宴请。“中苏友好协会”接待1批11人，苏中友协代表团，由省委书记冯基平会见并宴请。他们分别来自日本、印度尼西亚、土耳其、比利时、刚果、新西兰、危地马拉、古巴、多米尼加、委内瑞拉、阿根廷等14个国家。其中日本外宾最多（11批71人），拉美和欧洲的外宾较1963年稍多。从外宾的愿望上看，想学革命经验，要求到革命圣地延安去的多，要看历史文物的多；一部分想通过参观座谈和专访，了解陕西的工农业生产、市场供应、文化生活等情况。

1965年接待外宾工作，以省、市外办为主，各协会主要是根据外宾来陕的要求和地方的具体情况，组织接待的人力安排、活动节目，协助各有关单位做好接待和宣传工作等，并以友协名义接待了来自民间友好团体的32批164人，其中友好代表团12批66人，其中智中友协财政负责人阿瓦尔卡，副市长张锋伯会见宴请；印尼、印中友协总主席苏罗托一行，副市长张雪涛会见宴请；文化代表团12批48人；和平代表团5批33人；留学生3批17人。这些外宾来自亚、非、拉美、欧洲的21个国家，大部分来陕主要是访问延安，一部分在西安着重参观名胜古迹、历史文物，并了解陕西省新的建设成就。

1966年由于组织机构的变动，省友协工作人员精简，接待仅限同各国人民已建立的友好合作关系的交往。这样以来共接待了来自15个国家28个团组272人。其中坦桑尼亚友好代表团一行8人，副省长惠世恭、西安市副市长魏明中会见宴请；日本11个团组159人，以日中友协组织的青年工人、农民、学生、妇女就有137人，内有地方自治友好代表团一行5人，西安市市长徐步会见并宴请。同年还参与省、市外办接待了全国各地高等学校组织的外国留学生、实习生和外籍教师31批525人，他们来自33个国家，其中越南305名。

## 第二节 “文化大革命”中

自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至1968年5月1日省革委会成立，友协组织受到名目繁多的“造反”组织的冲击，无法正常工作，特别是1967年1月在上海“造反派”夺权的“一月风暴”影响下，被“造反派”非法夺权，省友协处于瘫痪状态，同年3月后，省军区和驻陕部队支左、支工、支农和军管、军训（简称“三支两军”）代表进驻机关。在迎来送往中有关民间团组仍以友协等组织名义出面。其中：

1967年涉外接待活动计划仍沿用省暨市外办名义行文上报外交部、对外文委、外交学会、贸促会、对外友协并报省市人委办公厅，以及延安军分区、延安外事处。留机关的原外办、友协工作人员参与接待了来西安、延安访问的外宾62批594人，他们来自32个国家。在这些外宾中有法中友协全国委员会执行主席夏尔·贝特海姆夫妇，由省军区副司令员邢荣杰会见并宴请。日本来宾16批168人。此外还有亚、非、拉、美各国的民族主义政党、贸易、新闻、文化、卫生等方面的朋友，以及越南留学生和驻华使馆的外交人员。还有港澳同胞2批44人。

1969年共接待外宾12批118人，他们来自日本、新（西兰）中友协、泰国、瑞（典）中友协、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坦桑尼亚、挪威、丹麦、阿尔巴尼亚等国。对接待来访者又恢复到以前的礼仪规格，经中央批准的日本第五次学生友好参观团第一分团一行63人，抵离西安时国旅西安分社负责人和群众200多人到车站，打着横幅，敲锣打鼓表示迎送，省革委会副主任萧纯、西安市革委会副主任魏明中接见并陪同观看地方戏。参观团在西北大学与150多名学生和教师分作8个小组座谈交流“文化大革命”中学生所起的作用，以及日本青年学生爱国运动情况。

1970年接待外宾31批229人，他们来自智利、阿尔巴尼亚、法国、朝鲜、印度、叙利亚、印度尼西亚、坦桑尼亚、刚果、柬埔寨10个国家。华侨回国观光团7批27人。

1971年1月28日，省革委会办事组通知，遵照毛泽东主席对当年旅游工作计划“人数可略增加”的重要批示，省外事工作统一由省革委会办事组外事组负责办理。同年5月30日陕革办发〔1971〕25号文件指出：为适应全国“外事活动要重新开展”的新形势，大力开展对外友好活动。接待外宾

人员由原有的 15 人（其中军代表 3 人）增加到 25 人（包括对外友协编制人员在内）。参与接待来自 18 个国家的外宾 29 批（内有党宾 11 批）355 人（党宾 68 人）。其中有锡中友协主席阿拉季·亚万纳夫妇，由西安市市长徐步会见宴请；法国友人佐村夫人，由省革委会副主任谷凤鸣会见宴请；法国友人米契尔·露阿和梁佩贞，由省革委会办事组副组长阎文俊会见宴请；美国友好人士贝尔登，由省革委会副主任谷凤鸣会见宴请；日本友好访问团 6 批 98 人，澳中、英中友好协会团组 3 批 25 人。另外接待华侨十多人。

1972 年，参与接待来陕外宾共有 76 个国家 302 批 2680 人，同 1970 年相比，国家数增加 2 倍多，批数增加 9 倍，人数增加 10 倍；同 1971 年相比，批数增加 1 倍多，人数增加近 1 倍。其中有日中友好旧军人会远藤三郎一行 5 人，由省革委会副主任李建平、会见宴请；日本友协（正统）代表团一行 9 人，由西安市革委会副主任彭天琦会见并宴请。

1973 年省革委会办事组以陕办发〔1973〕1 号行文。成立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陕西省分会，分会成立后可对外挂牌，实际仍是省外办内设的一个处，在涉外活动中全力以赴协助接待了党中央和国务院邀请、由周恩来总理作陪来延安、西安参观的越南国宾。

1974 年友协组织恢复后，首先协调陕西省省会西安市同日本奈良市、京都市建立友好城市关系；其次，开展同各国人民的友好合作交流关系，协同组织赴朝鲜友好参观团；第三，参与接待了英国、丹麦等国宾大团活动；第四，参与调研有关外籍人和华侨回国观光的分工接待工作。

1975 年参与组织中国西安友好代表团访问日本京都和奈良市，为庆祝互结友好城市一周年赠送日方金丝猴各 1 对，锦鸡各 10 只；应日本奈良市长要求，赠送奈良市柳树苗，进行“西安之林”植树活动。同时接待了斯里兰卡友好代表团。

1976 年参与接待来自 26 个国家的外宾 58 批 786 人中，以友协名义接待来自 4 个国家友好合作关系的 15 批 493 人。日本来宾居首位，共计 12 批 446 人，内有以日中友协京都府副会长依田义贤为团长的京都府各界 128 名代表组成的日本京都府府民友好之翼访华团，由全日本书道联盟、日中文化交流协会、日本关系国际旅行联合主办的全国 29 个都、道、府、县的专业书法家或业余书法爱好者，以及少数教职员，以赞成中日两国联合声明，发展两国友好为宗旨的日本书法家友好之翼访华团一行 134 人，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京都总局主办的三府县经济界 26 个团体推荐，以赞成日中联



合声明，为发展日中友好和贸易作出努力的经济界人士组成的京都、滋贺、奈良、三府县经济界友好之翼访华团第一分团 80 人，以及日本海沿岸自治体首长友好团，全国都道府议长会友好团，日本文化界代表团，日中友好佛教协会代表团，日本北海道文化界代表团等，在参观访问中，客人着重了解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特别是政治、经济、技术、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同年 10 月 20 日—11 月 5 日，以西安市为主，由市委书记、市革委会副主任鄢祥丕为团长一行 19 人，访问了日本奈良、京都市，并派出女子排球队一行 15 人随团出访。

另一方面，1976 年来陕参观旅行、探亲访友的华侨、外籍华人计 138 批 1513 人，比 1975 年增长 64%。他们当中由东南亚和美国来的较多，而且多是组团旅行，零散客人比往年减少。从美国来访的学者、教授等知识分子较多。

### 第三节 1977 年至改革开放后

1977 年接待了来自 64 个国家和地区的外宾、外国专家、留学生、实习生、华侨、外籍人 825 批（内有党宾 6 批），9519 人（党宾 148 人），比 1976 年增长 60.1%（包括延安接待的 116 批 1169 人）。其中以友协名义接待民间团组 33 批 406 人，计有日本国关西文化界、宗教界恳谈会、青少年交流协会、学术界、律师、体育界等 17 批 195 人。

1978 年 12 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新形势下，省友协贯彻执行中央的“以民促官、以官带民、官民并举”、“文贸结合，文经相济”的方针，拓展对外交往。所做的主要工作：一是遵照中共中央〔1978〕8 号文件批准的全国旅游工作规划，确定陕西省当年旅游接待任务为 2 万人（其中延安 1000 人），占全国第 8 位，加上华侨、外籍华人等 5000 人（其中延安 1000 多人）及邀请外宾、零星委托等将达 2 万人。二是国家有 21 个部门，向陕西有关部、委、办、厅、局下达了商洽贸易业务、加工装配、讲学、考察、科技交流的涉外接待任务。全年共接待了来自 7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外宾、华侨等 1200 多批 14400 余人，其中旅游外宾占 60% 以上，比 1977 年增加 1.3 倍。省外办和省友协接待了 25 个国家的外宾 54 批 714 人，内有民间友好来访团组和专业考察 22 批 260 人。其中瑞典的瑞中友协主席扬·米尔达，由副省长

惠世恭会见并宴请。日本的日中友好净土宗协会为加深日中亲善，加强同中国佛教文化的交流和准备举办中国唐代高僧善导大师逝世 1300 周年纪念，组织净土宗代表访华团一行 22 人，第一次在长安香积寺、兴教寺、西安大雁塔等处参观，并作佛事活动。同年 4 月 4 日—18 日，由市革委会主任王林为团长以西安市为主组团访问了日本奈良、京都等市。

1979 年接待邀请外宾和国外旅游者 26900 多人，其中外办和友协接待来自 19 个国家和地区 34 批 833 人。他们中人数较多的有日本 13 批 275 人，美国 2 批 141 人，英中了解协会主席班依安、丹麦友好人士代表团友协主席凯尔拉森；奥地利奥中协会代表团；芬兰芬中友协主席克赫宁；罗共中央检查委员会主席瓦西里·沃尔库为团长的罗中友协代表团；缅甸党宾 3 批 51 人；挪中友协主席克郎内为团长的挪威文化人士代表团等。

1980 年省友协仍与省外办合署办公，参与接待了罗马尼亚第一副总理乔治·霍英什迪安、英国前首相卡拉汉、法国文化通讯部长莱卡、美国纽约市长科奇、日本自民党委员长中曾根康弘、泰国上议院副议长、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执行主任凯恩、日本都道府县议长会访华团、英国皇室格列斯特公爵和尼泊尔、印共（马列）、新西兰共马列主义组织负责人。还有日本净土宗访华团一行 139 人，在西安举行纪念善导大师逝世 1300 周年法会等重要活动。

1981 年除参与省外办正常接待工作外，协助西安市修订了开展友好城市活动的规划，同时强调要在开展友好活动的同时注重开展科技、文化、经济交流，使其为中国“四化”建设服务。根据日本京都府和美国明尼苏达州要求同陕西省建立友好府州关系，做好建立友好关系前期的准备工作。遵照国务院指示精神，与日本京都府、长野县初步开展学术交流项目，为发展友好关系创造条件。同年 4 月 22 日—24 日，接待了澳大利亚以弗雷德·西诺瓦茨博士为团长的澳中友协代表团一行 17 人，由谢邦定、白玉峰陪同参观并设宴招待。

1982 年先后接待了通过省友协邀请来陕访问的有 40 多个国家的外宾 132 批 1047 人。同年 12 月 29 日省召开友协理事会，传达了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关于开创外事工作新局面的重要讲话。在接待宣传中，注意“不忘老朋友、广交新朋友”，“以民促官”，扩大中国对外影响，增进同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为中国“四化”建设服务。

海伦·斯诺（斯诺夫人）、美国明尼苏达州美中友协主席普塔什尼、日本

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卢森堡人民中国友好协会主席弗朗克、瑞典瑞中友联名誉主席扬·米尔达尔等是陕西人民的老朋友，多年从事国际友好事业，为中国做了不少有益工作。以瑞典的马利安·赫德林小组为团长的瑞中友联团一行4人，由孙忠恕陪同来西安参观访问；墨西哥人民中国之友主席比西尼亚·查帕夫人一行16人，由刘庚宇陪同来西安参观访问。卢森堡人民中国友好协会主席阿道尔夫·弗克朗先后率团40次访华，年已九秩高龄，仍精神矍铄，与陕西保持着密切友好的往来。陕西省1982年10月与美国明尼苏达州建立友好省州关系，是在美明州美中协会主席普塔什尼的倡议下促成的。斯诺夫人的秘书雪莲随斯诺夫人访华后，写了关于西安市卫校集体闺女的事迹报道，宣传中国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年轻一代的精神文明，引起了强烈反响。法中友协创始人德雷什是著名的地理学家，曾任世界地理协会主席，他对陕西治理黄土高原表示关注，于是友协组织省水保、林业、西北大学等单位的专业人员同他进行了学术交流。荷兰知名人士德乌列斯是荷兰电视剧的创始人，被称为“电视之父”，他来陕期间，不顾70高龄和身体有病，坚持要去户县看农民画展，并说他“来中国就是为了来户县”。省友协安排他参观户县农民画展，进行家访，参观了户县东关小学课堂教学，观看农民业余演出队演出的计划生育节目。

根据中央关于“统筹安排，稳步前进”、“以我为主、细水长流、适当照顾为主”的方针，积极稳步地开展友好城市工作。继西安市与日本奈良、京都市结为友好城市后，同年10月19日，陕西省与美国明尼苏达州建立了友好省州关系。以于明涛省长为团长的代表团出访明州，并商定了一些交流项目。另外，陕西省与日本京都府，经过几年的酝酿与交往，双方商定于1983年7月15日在京都府签订友好省府协议书。1982年通过友好城市渠道来陕访问的美国、日本朋友共10批428人，其中以日本依田义贤会长为团长的京都府日中友好协会代表团一行5人，由西安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林颖陪同，在西安参观访问。协同组织出访6批25人，派遣留学生、进修生、专业人员3批7人，接待日本进修生1批35人；进行文体卫展览的1批4人。

1983—1984年10月，友协参与接待了来自全国对外友协及友好城市渠道的外宾344批3165人，其中1983年134批1059人，1984年210批2106人。同时，还组织派遣友好团和专业团8批78人，邀请来陕的友好团和专业团13批253人。其中主要有以民主德国友协副主席保尔·汪威尔为团长的

友好访华团，泰中友协访华团，朝中友协代表团，以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后补委员、罗科学院历史分院主席斯太凡·巴库为团长的罗中友协代表团，意大利经济文化交流协会代表团等。另外还接待了兄弟省、市友好顺访团组 71 批 769 人。

1985—1991 年的 7 年间，省友协工作和民间外交从规模、数量、深度等方面都取得很大进展。接待工作不仅人数猛增，而且接待质量也不断提高；民间外交出现了多层次、多方位、多形式并举的新局面；友好城市间的相互交往不断向深层发展；外事为经济建设服务正在越来越引起重视，促成了一批合资合作项目的建立。尤其是 1989 年“六四”政治风波后，官方外交遇到困难，省友协发挥民间外交的优势，主动联系，千方百计开展工作，取得良好效果。其主要是：

### 一、开展对外民间友好交流

接待来访和派出团组，是对外友好工作的重要形式。从 1984 年 11 月到 1991 年，省友协共接待了来自 35 个国家和地区的外宾 896 批 9835 人次，其中相当于副部长级以上外宾 97 批 781 人次。他们当中，既有一些国家的前首相、总理、议长、部长等上层政治领导人，又有全国性或地方友好组织的领导人和其他社会知名人士。如美中交流协会主席林建宁和第二次来西安的友好人士贝尔登；波兰国家问题研究所友协主席西蒙尼戴斯；日中友好学术交流协会执委长腊山道雄；苏联对外友好文化联系协会、联合国主席捷列什科娃；几内亚友好代表团等。也有一些普通工人、农民、职员、教师和青年学生。在来访中 1985 年 9 月—11 月间，接待了三个宗教团体，计有以穆夫蒂·穆赫塔尔·萨拉米为团长的突尼斯宗教代表团一行 4 人，以新加坡新佛教总会会长、古典佛教联谊会副主席宏船法师为首的代表团一行 17 人；以匈牙利部长会议宗教局局长米克罗什·赤耐伊姆雷为团长的代表团一行 4 人。与此同时，还先后向日本、美国、比利时、瑞士、意大利、法国、苏联等国派出访问团组 33 批 194 人次。

对于来陕访问的各国朋友，省友协本着“广交新朋友，深交老朋友”的精神，区别不同对象，精心安排，热情接待，尽量满足其合理要求。既安排旅游观光，又安排参观工厂、农村和学校，寓宣传于参观访问之中，使外宾多方面、多层次地接触群众，加深了他们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了解和友情。曾多次来陕的卢森堡友协主席阿道夫·弗朗克说：“每次都看到贵国各方面的

新发展，我作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深感自豪。”约旦前首相塔勒霍尼参观清真寺后说：“西方宣传中国没有宗教自由，事实证明中国保护宗教的政策到处可见……”

无论接待来访或派员出访，友协特别注意贯彻中国的对外方针政策，为中国的外交总目标服务。对1985年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偕内阁僚参拜靖国神社、修改教科书及“光华寮事件”，友协即通过友好组织和友好人士，表明我们的立场和观点。1986年，陕西省一位负责人率团出席京都府社会党建党40周年大会时，对上述问题表明了我们的严肃态度，该党委员长未本彻夫在讲话中也表示反对参拜靖国神社和修改侵华历史。同年，中曾根康弘的秘书筑比地康夫等来陕，提出要在青龙寺建立“中曾根俳句诗碑”，省友协根据当时外交斗争的形势，予以婉拒。1987年6月，日本京都府岚山的纪念周恩来总理诗碑被污损，省友协当即与日本友好组织一起提出抗议，结果由京都府友人村濑武士主持进行了修复。

在同国外友好组织和友好人士的交往中，省友协还特别注意和一些长期对中国友好，中方工作基础较好的组织和人士保持和发展持续、稳定的合作关系。近年来友协同美中友协明尼苏达州分会、堪萨斯城分会，日本京都府日中友协、奈良县日中友协、长野县日中友协、四国四县日中友协、日中体育友好交流协会，比利时比中友协安特卫普分会，瑞士沃州—陕西协会，西德多特蒙德市德中友协；加拿大蒙特利尔加中友协等14个组织往来密切；另外还同十多个友好组织和单位保持着一定的联系，美国美中友协前主席普塔什尼，斯诺前妻海伦·斯诺，堪萨斯城—西安姐妹城市委员会主席雪伦·估莲；日本奈良日日新闻社的东海林洋子、京都府友好人士赖成为住；瑞士瑞中友协主席莱勒施，沃州—陕西协会主席尚比埃；比利时比中友协安特卫普主席傅满德等。许多老朋友不仅自己多次访华，还不断为我们介绍新朋友。雪伦·估莲女士不仅来陕任教，还几乎每年带一个自费团访华，不断扩大对华友好队伍。

为扩大对外友好工作的群众基础。省友协十分注意牵线搭桥，使其基层组织同国外的相应单位建立较为稳定的关系。陕西已有17所大学同14个国家的145所大学建立了友好校际关系。其中西北工业大学跨出校门，步子迈得较大，他们与美国的田纳西大学、芝加哥伊利诺大学、蒙大拿州立大学、堪萨斯约翰逊社区学院、南卡罗来那大学；英国的牛津大学、伦敦大学、兰卡斯特大学；西德的柏林工业大学、阿亨工业大学，以及宇航研究院和研究

所；苏联的国立莫斯科鲍曼技术大学、远东古比雷夫工业学院、莫斯科航空学院、国立列宁格勒技术大学、罗斯托夫大学、萨玛拉航空学院、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国立大学和航天工程学院、圣彼得堡机械学院，以及国际高等院校科学院、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国际青少年宇航中心和电化学厂、俄罗斯理论与应用力学研究所、西伯利亚恰普雷航空科学研究所；乌克兰的基辅民航工业学院、奥德萨工程学院、第聂伯罗彼得洛夫斯克国立大学；比利时布鲁塞尔大学、安特卫特大学等建立互派讲学、进修、互访和参加国际性学术会议，人员 4046 人次，校际、厂际、科研单位领导人互访 40 余次。交流科技资料数百种，签订合作科研协议书、备忘录 30 余份。有 3 所中学与美、日两国的中学建立了校际关系；省国画院与日本京都府画院建立了友好画院关系；西安民生百货商店与京都大丸商店建立了店际关系；省总工会与京都的劳动福利协会建立了会际关系。随着这些关系的建立，双方互派专业人员考察，交换资料，开展技术交流，交换教师和进修生，开展联展联销，不仅加强了友好联系的纽带，而且对各单位的业务工作起到了促进作用。

为做友好友好传代工作，促进青少年之间的友谊，日本京都府儿童合唱团第二次访陕时，即组织 1500 名儿童观看演出；京都府青少年体育团来访时，组织 12000 名青少年观看比赛。这两个团从迎送、游览到宴会，都安排青少年代表一块活动，彼此建立了友谊，临别时难舍难分，此后一直坚持着书信来往。1986 年省友协同京都府共同组织 160 多对中日青年的通信交友活动。1988 年与奈良日中友协举办中日儿童书画互展。京都府日中友协与西安师范专科学校合办了 5 期“汉语短训班”，有 175 名日本学生参加。他们说：“来西安不仅学了汉语，还结交了许多中国朋友。”1987 年接待美国四星将军史迪威的后裔时，陪同人与他们共叙了抗日战争时期史迪威与中国军队并肩作战的事迹，他们说：“想不到祖父这样受中国人民尊敬。我们要继承祖父遗愿，为中美人民世代友好多作些事情。”1990 年 6 月美国布莱克学校学生及家长近 30 人访华，每人身穿印有“美中友好”字样的体恤衫登上西安城墙，一时蔚为壮观。

## 二、利用友好渠道，积极促成各种实质性交流

8 年中经省友协渠道先后派出文艺演出团（组）6 批 407 人，派出书画家出国举办书画展览 7 批 34 人，派出微雕家 3 批 3 人，派出民间剪纸艺人 3 批 5 人；接待来陕的外国演出团（队）7 批 267 人，书画家办展览 5 批 48

人；为纪念海伦·斯诺访问西安和延安 50 周年并祝贺她 80 寿辰，1987 年 9 月友协与“八办”联合举办了《海伦·斯诺在中国图片实物展》，并举行专题报告会和庆祝会。1989 年 4 月与丹麦使馆合办了《安徒生生平图片展》。

来西安演出的瑞典民间舞蹈团、美国墨舞团、意大利斯卡拉歌剧院弦乐队、美国钢琴家、美明州圣奥拉夫大学生合唱团、日本盲人音乐家中谷惠子等艺术家的演出，使中外情谊融会一堂。陕西派出的“仿唐乐舞”及“唐·长安乐舞”在欧洲演出盛况空前。1986 年派出洛川皮影戏在法国 11 个城市演出 35 场，轰动了巴黎。凤翔的剪纸艺人先后在美国、尼泊尔、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和孟加拉等国献艺，载誉而归。户县农民画在美国俄亥俄州鲍灵格大学美术馆展出。观众称：“看到了中国农村的繁荣景象，进一步了解了中国。”微雕家曲儒在美国和加拿大的表演，被几十家报刊赞誉为“中国民族传统文化和绝妙的手工艺艺术。”诸上这些交往活动促进了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广交了朋友，传播了友谊。

在科技和经贸等交流中，经友协联系派出 11 个专业考察团（组），学习美、日、比、意等国的机床工艺、印染纺织、医疗器材生产和公路维修及企业管理等方面的经验。1987 年陕西省举办第二届国际经济技术洽谈会时，省友协联系十多个厂商来陕，达成了十多项协议。美国明州贸易旅游团购买了陕西混凝土机械设备，价值 30 万美元。日本冈山县前议长一行，1988 年向陕西某厂出售了电子尖端技术。比利时安特卫普贝尔公司与宝鸡无线电厂和 794 厂签订了生产投币电话机和交换机的协议。美国明州 CPM 公司与秦岭晶体管厂联合成立秦明公司，投资 150 万美元，联合生产心脏起搏器，四年来一直产销两旺。

农业交流中陕西派往日本长野县、京都府的农业研修生 16 批 124 人，回国后大都成为各级农科所的领导或技术骨干。周至县园艺所的田彦峰运用日本的草莓栽培技术在周至试种 20 亩后推广，亩产 2000 多公斤，比原来增产两倍。

为人才培养牵线搭桥，派出学习饭店管理的 2 批 8 人，理化进修教师 3 人，原子能研究员 2 人，培训西餐厨师 3 人，语言进修生 5 人。

### 三、扩大民间友好交流与合作

陕西省同国外建立友好城市关系已有 12 对，省上 4 对，西安市 6 对，咸阳市 2 对。友城工作在 1984 年至 1988 年期间由省友协分管，1989 年 3 月

移交省外办友好城市处管理。在分管友城工作的四年中，省友协协助派出党政友好团出访美、日、比、意、瑞 5 国 9 批 49 人，其中省级领导率团出访的 5 批 31 人；接待友好省、州、府领导人率团来访的 7 批 54 人。1985 年李庆伟省长率团访美，在明州举办了“陕西月活动”，陕西在该州还举办了“秦始皇兵马俑展”、“陕西工业图片展”和“陕西手工艺品展销”，明州十几家新闻单位作了大量宣传，既扩大了我省在美国的影响，同时又取得了十多万美元的收益。1987 年作为友城交流项目，陕西又在明州举办“金丝猴动物展”，观众逾百万，收入 9 万美元。同年在比利时安特卫普展出“大熊猫”，观众 130 万，收入 10 万美元。同日本京都联合举办“唐十八陵文物展”，收入约 20 万美元。

在科技交流中所派出的工业、农业、医疗、文物、经贸考察团（组），学习了城市规划、环保、太阳能利用、电子化工等技术。省医药局与安特卫普杨森公司合资的西安杨森制药公司，总投资 1.2 亿美元，1989 年投产，年销售额约 1.6 亿元人民币。通过友城渠道，西安交大与比利时“原子能研究中心”，进行了人员交流和科技往来。美明州瑞德森饭店为陕西培训了五名管理人才，回国后在西安三家宾馆担任经理。日本京都府立医科大学为陕西培训了三名医生，他们学到的心脏搭桥手术已临床运用。省旅游学校与安特卫普彼瓦学校，陕西师大与安特卫普大学还建立了校际合作关系，他们互派教师，交换留学生。陕西同日本京都府互派留学生，每年一名，已进行了五年。作为交流项目，陕西还向比利时、意大利派出五名外语进修生。诸多项目交流为陕西扩大对外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产生了积极的效果。

#### 四、发挥民间外交优势

1989 年北京发生“六四”政治风波后，外事工作遇到了暂时的严重困难。经分析民间外交的优势和特点，积极主动地开展人民外交，增进国外朋友对中方的理解和友好合作，争取以民促官，来打破西方国家政府对中国的僵冷状态。

“六四”后不久，省友协动员每个工作人员向国外友人主动发信、发传真、打电话，总计 300 多件次。在信件中说明“六四”政治风波真相，介绍我国安定平稳的局势，重申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不变。在信函的内容和形式上，针对不同对象，不同接受能力，尽量用自己的体验和感受多带点人情味表达。在掌握原则的前提下，努力寻求共同点，使对方容易理解和接受解



释。

同时又利用陕西承办全国“世界旅游日”（1990年9月27日）纪念活动和国庆40周年之际，邀请了美中友协、日本京都府日中友协、北海道新闻社、美国友好人士和俄罗斯列宁格勒文化友好代表团前来访问；还邀请瑞士沃陕协会、日本长岗京市友协等自费访华，让他们用亲眼看到的事实，了解“六四”风波实情和风波平息后的中国。

省友协对所邀请的团组以及兄弟省市赴陕访问的团组，都予以重点接待。除游览外，还有针对性地安排他们参观工厂、农村、学校、市场、人民生活；安排他们广泛接触各地政府领导人和各界群众，让他们多看、多听、多想，自己分析问题，自己下结论，用事实印证中国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美中友协代表团在宝鸡之行的途中，看到了农民拉运的一车车红辣椒，观看了岐山县一个乡的中小学歌咏比赛，参加了一对农民青年的婚礼及热闹的宴席等。美籍华人朱绵发说：“日程上的活动很好，日程外的活动更精彩。大家都看到中国人很愉快，市场供应很丰富。中国的改革是成功的。”美中友协明州分会理事沃尔特·格拉夫律师在访陕期间突患肠梗阻，病情十分严重，病人接受了动手术的精神准备。由于各级领导的关怀，省医院医护人员夜以继日地精心综合治疗和特别护理，避免了一次手术，病愈出院，赶上代表团按时回国。格拉夫深受感动，表示要把他首次访华中的这一难忘经历，写文章告诉美国人民。在格拉夫夫妇的建议下，代表团离陕时带走了《北京风波》和西安平息风波的录像带，要让更多的美国人了解风波真相。格拉夫回国后，主动向他在国会的议员朋友写信，呼吁不要对中国进行制裁。他的夫人王昭华女士多方奔走，组织了一个为数近30人的美国中学生和家长团自费访华。

除此之外，友协还特别注意联系曾同我们长期患难与共的老朋友，同他们保持经常的联系，给他们及时提供宣传材料，向他们了解国外事态的发展。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海伦·斯诺在美撰文，竭力说明中国政府平息“六四”政治风波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她写道：“资本主义制度在中国行不通，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学生不应反对以邓小平、王震、杨尚昆为首的老一代革命家，他们参与了新中国的创立，比其他人更关心中国的命运；中国是11亿人口的大国，方向对头，政策正确，才能向前发展。政府牺牲了少数人利益，保证了中国的安定和继续发展，这是值得的。”针对西方国家的制裁政策，海伦·斯诺于1989年7月发起成立“支援中国工业合作社国际委员

会美国分会”，并联合写信给布什总统；呼吁通过这一组织，给中国贷款5000万美元。

1991年省友协接待来自世界各地的友好访问团（组）和专业考察团组121批1489人。批数比上年增长15.2%，人数比上年增长17.9%。其中部长级外宾7批41人；从国外直接联系和向国内非友协系统的宾客16批289人。

经省友协渠道派出或参加全国友协以及陕西其他单位组团出国人员共8批28人。他们是：赴瑞士农业实习生2人；赴欧洲6国（瑞士、荷兰、比利时、法国、德国、西班牙）长安古乐演出团一行17人，在国外停留28天，演出18场，观众近万人；赴日本佛教代表团4人；参加全国友协的中日友好活动家代表团赴日本1人，对日中友协的活动方式、范围、优势和困难等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参加全国友协的中苏友协企业家代表团访问苏联1人；赴日本进行气功表演2人；参加外交部组织的中国杰出青年访日团1人。

同年以公费邀请外宾2批9人，部分客人公费、部分客人自费的团组1批13人；以工作会谈为主的自费客人2批9人。他们是：美中友协明尼苏达州分会以刚当选的美中友协全国委员会主席哈里森夫人为团长一行5人，双方就陕西省友协和美中友协明州分会，陕西省政府与明州政府今后的合作与交流进行了全面洽谈，进一步确认了拟于1992年陕西友协派团访美的项目。此外还就咸阳与英国曼彻斯特市结为友好城市事宜与英方进行了探讨；日本京都府日中友协团一行13人，重点考察了华阴市的工农业、旅游设施，同时就华阴市和京都府大江町的合作交流以及结为友好的可能性进行了探讨；同年10月京都府友协团对华阴市进行专访；日本国际协力技术研修财团访华团一行5人，经省友协安排与陕西省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洽谈了对日建筑劳务输出问题；同省经贸委、省粮油食品进出口公司洽谈了牛肉出口日本等贸易问题；还与省文物局洽谈了文物修复问题；和西安市歌舞团商谈赴日演出问题；以及省企业家协会交谈了建立企业合作关系问题。日本体育交流协会团一行4人，促成该团与省友协、西安外国语学院夜大学讨论了在陕西开办日语学校问题；另一批体育交流协会团一行4人就日中之间文化交流问题进行了具体讨论。

自改革开放至1991年的13年间，除上述拓展交往渠道，发展广泛交流活动内容之外，在此还值得记述的是友好纪念碑石和堂园的建立，其景点主要有：

## 一、阿倍仲麻吕纪念碑

阿倍仲麻吕，生于日本奈良。公元716年，年仅19岁被选为遣唐留学生，在中国唐都长安学习期间，由于学识渊博，勇于任事，深得唐玄宗李隆基赏识，赐名“晁衡”，留朝供职，753年随遣唐使归国，不幸在海上遇到恶风大浪，辗转返回长安。在唐肃宗李亨、代宗李豫期间任左散骑常侍和安南都护等职。770年（代宗大历五年）逝世于长安，终年70岁，代宗追封其为潞州大都督。

这位中日文化交流的使者，留唐51载，他和唐代著名诗人李白、王维、赵骅、包结等交谊甚深，传为古今佳话。

西安和奈良1974年结为友好城市。在奈良市市长键田忠三郎倡议下，为继承和发扬中日文化交流的先驱者阿倍仲麻吕献身于中日友好的精神，两市决定在西安和奈良分别建立阿倍仲麻吕纪念碑。1978年秋，日本的阿倍仲麻吕纪念碑落成。1979年7月11日，值西安、奈良结为友好城市五周年之际，在阿倍仲麻吕活动过的西安兴庆宫公园湖畔举行隆重的阿倍仲麻吕纪念碑揭幕仪式。西安市革委主任陈元方和奈良市市长键田忠三郎共同剪彩，省友协会长鲁曼、西安市革委会副主任魏明中、阎明，奈良市友好代表团全体成员出席了揭幕式。在800多人参加的揭幕式上，还宣读了中国驻日本大使符浩和陈元方的诗词。

## 二、空海法师纪念堂

空海，号弘法大师，公元774年生于日本赞歧园（今香川县）。804年夏，随日本遣唐使藤原葛野麿入唐求法，在青龙寺拜惠果为师学习密宗。惠果为其做了阿闍梨佛法灌顶，赠法号“遍照金刚”，成为真言密宗第六代坐主。于806年回国带回216部共461卷经论和王羲之真迹，并在高野山建造金刚寺，创立真言宗。在唐求法时学习真、草、行、隶、篆五体书法，被誉为“五笔和尚”，又被邀补写皇宫墙壁上王羲之的字，所著《篆隶万象名义》是日本第一部汉语词书；《执笔法》、《使笔法》是日本研究中国书法的最早著作。他参照汉字草书，创造了日语字母“平假名”，沿用至今。他还把中国的灌溉技术、毛笔制作方法等传到日本。

青龙寺与日本的佛教文化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日本当代知名作家司马辽太郎写的长篇小说《空海的环境》，就是以空海入唐求法的事迹讴歌中日

人民友好情谊的。故吸引大批日本友好人士前来凭吊。

1980年春，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访华后，向中国驻日本大使符浩表示，愿意推动有关方面协助重建西安青龙寺。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即致电中国外交部、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全国对外友协、陕西省政府请予研究。同年10月，陕西省和西安市人民政府同意在青龙寺遗址修建“惠果·空海纪念堂”，并报呈国务院宗教事务局。从1980年10月至1984年7月，日本真言宗总大本山会，曾5次派遣以阿部野龙正为团长的代表团30多人次前来商谈修建事宜。1983年3月31日“惠果·空海纪念堂”正式破土动工，1984年3月15日竣工。

1982年5月17日—22日，日本香川等四县庆祝空海纪念堂院内的纪念碑落成友好访华团一行271人（随行新闻记者21人），由四县的知事、议长率领，分两批从北京和上海乘飞机到达西安。西安市代市长张铁民等到机场迎接。代表团在西安活动期间，以德岛县知事三木申三、议长泽本义夫，德岛县日中友协会长小岛悦吉；香川县知事前川忠夫、议长大西末广，香川县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会长前田敬二，议员、日中友协会长藤井贤；爱媛县副知事伊贺员雪、议长井上务、爱媛县日中友协会长石水伴清；高知县知事内力、议长山冈谦藏，高知县日中友协会长西内春生等主要成员共30人，拜访了西安市人民政府。中日双方为庆祝空海纪念碑落成，联合举行庆祝宴会。

5月19日上午，中日双方在青龙寺遗址隆重举行大会，庆祝空海纪念堂院内的纪念碑落成典礼。日本香川等四县庆祝空海纪念碑落成友好访华团一行和西安市庆祝空海纪念碑落成委员会全体成员出席了庆祝会。

西安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元方、市政协主席邵武轩、省外办主任鲁曼等有关方面负责人出席。

庆祝会由西安市庆祝空海纪念碑落成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西安市副市长土金璋主持。庆祝空海纪念碑落成委员会主任委员、西安市代市长张铁民，日本国空海纪念碑建立实行委员会本部会长、香川县知事前川忠夫讲话。

会长宣读了日本国内阁总理大臣铃木善幸、外务大臣樱内义雄，中国驻日本大使宋子光，日中友好协会会长宇都宫德马和已故日本首相大平正芳的夫人大平志华子等发来的贺电。张铁民代市长、前川忠夫知事一起为纪念碑揭幕，双方主要领导还共同挥锹在纪念碑四周栽植了四棵松树。

当日中午，日本香川等四县知事在西安饭庄举行答谢宴会。下午日本香

川、德岛、爱媛、高知四县庆祝空海纪念碑落成友好访华团的主要成员，拜访省政府，于明涛省长同他们进行了亲切的交谈。副省长、省友协会长李连璧、省外办主任鲁曼、陪同访华团前来拜访的西安市副市长土金璋等会见时在座。晚上西安市政府在人民大厦为友好访华团举行了文艺晚会。

代表团一行，还参观游览了省博物馆、大雁塔、钟楼、秦俑馆、华清池和咸阳博物馆等。

### 三、吉备真备纪念碑园

1983年下半年，日本奈良县日中友好协会会长阪本寿治、冈山县日中友协理事长犬饲勤和冈山县吉备郡真备町长田渊哲夫等，分别给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友协会长李连璧致信，为纪念吉备真备在中日文化交流和两国人民友好交往史上的业绩，提出在西安修建吉备真备纪念碑园的请求。吉备真备（695—775），本姓下道，原名下道吉备真备，属吉备地区（今冈山县）人，唐玄宗开元五年（717）随第8次遣唐使团来中国，在长安拜学者赵玄默为师，学通六艺，历经19年而归。752年又以第10次遣唐副使身份与藤原清河（正使）等来中国，754年返日。累进至右大臣，是日本历史上有名的遣唐留学生和遣唐使之一。他在日本致力于传播唐代文化，为改革日本文字和促进文化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一位重要人物。1984年3月26日，日本吉备真备友好访华团来西安访问时，再次提出修建纪念碑的恳求。1984年8月，日本经济会常任顾问冈崎嘉平太在北京拜会国家副主席王震时，正式提出在西安修建吉备真备纪念碑的请求，王震表示同意。访华团在西安访问期间，冈崎先生转交冈山县知事长野七郎给中共陕西省委领导人的信，并受其委托提出树碑的请求，省委书记白纪年同意共同修建吉备真备纪念碑，并由西安市人民政府负责办理。同年8月26日，西安市副市长靳毅仁同冈崎先生就建碑之事进行具体商谈后，开始了选址筹备工作。1985年1月21日，冈山县修建吉备真备纪念碑代表团来访，就树碑地址、费用、设计、施工、建成时间等进行商谈。4月20日，西安市吉备真备纪念碑园商谈组赴日访问，签订了修建吉备真备纪念碑园协议。同年7月在今西安市大南门外东侧环城公园破土动工。1986年5月8日，举行吉备真备纪念碑园落成仪式，日中友好协会顾问冈嘉平太和冈山县知事长野七郎率领代表团一行200余人，省、市各界人士400余人参加了落成仪式，西安市市长袁正中和冈山县知事长野七郎分别讲话表示祝贺，中日双方在园区

栽植松林和樱花树，供游人观赏。

#### 四、中日友好庭园（清流园）

1986年5月26日，日本京都府友好交流协会代表团一行56人来陕，与陕西省、西安市举行中日友好庭园（清流园）落成剪彩仪式，省委书记白纪年、西安市副市长赵毓华等100多人出席祝贺。

中日友好庭园（清流园）位于西安市南郊大雁塔西侧。

#### 五、纪念物

巴基斯坦总统齐亚·哈克上将，1982年10月21日在西安化觉巷清真寺参观访问做礼拜时对马良骥阿訇许诺，给该寺1300平方米的礼拜殿赠送可容千人的礼拜地毯，以表对真主的虔诚之心。1988年8月间通过中国兵器工业部运送巴基斯坦生产的毛质地毯1000多平方米到西安，由省外办出面举行隆重的交接仪式。

## 第六章 对外开放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陕西省不断加快对外开放步伐，不断改善交通状况，先后两次改造、扩建西安机场，1984年又将咸阳航校军用机场扩建为民航机场，同时还把户县、阎良两个军用机场作为外事备用机场。1982年8月开通了西安至香港的直航包机；1984年5月1日西安海关成立；1991年9月1日国家一级民用西安·咸阳国际机场投入营运。对外国人开放地区由最初的西安、延安扩大到全省104个县（市）区中的96个市（县）。增加了对外开放单位，从50年代初的31个增至1991年的310个单位。

建立了对外经济开发区，到1991年全省已建立5个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其中国家级的2个，省级的3个。

### 第一节 开放口岸

#### 一、机场

##### （一）西安西关机场

1924年4月3日，北洋政府航空署中央航空支队的一驾“大维梅号”飞机从洛阳飞抵西安，降落在西安安定门西郭门外的大营盘。1930年，在这里建成了长800米、宽100米的土质草皮结构的跑道，始称西安机场。1932年，由欧亚航空公司组建了西安航空站，1937年10月，跑道扩建成长1200米，宽150米泥结石道面，机场占地3000亩。1943年胡宗南下令再度扩建，跑道延长至1800米，占地3664.7亩。到1949年国民党政府溃逃时，西安西关机场设备大部分被运走，一些设备被炸毁，遗留下的只是一条跑道，泥结石的停机场，3座机库，3间砖瓦房。5月20日西安解放，当即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接管。同年西安西关机场经修整恢复通航。1957年，中国民航局机场鉴定小组鉴定：西安西关机场“处于市区范围，西端净空不

佳，不能作永久机场使用。”因此，在1958年，对西安西关机场按三级机场使用要求进行改造，修建了候机大楼，增设了夜航灯光。1966年机场再度扩建，使机场可接受伊尔—18型和三叉戟型飞机的起降，解决了当时航空运输业务的需要。随着中国经济和旅游事业的不断发展，西安西关机场不能接受更大的机型，机场面临着难以发展的困难。1979年，省委会向国务院、中央军委报请迁建机场；1982年，省委第一书记马文瑞致函邓小平，要求迁场咸阳。在邓小平亲自过问下，1984年，国务院、中央军委确定，将空军咸阳航校军用机场扩建为民航机场。

西安西关机场历史上曾通航40多个城市，还有飞往香港的定期包机。1988年，西安西关机场旅客年吞吐量为116.89万人次，首次超过100万人次大关，仅次于广州、北京、上海、桂林，居全国民航机场第5位。

## （二）西安·咸阳国际机场

西安·咸阳国际机场位于西安西北、咸阳东北的黄土塬上，距西安市26公里，距咸阳市15公里。该机场属国家一级民用机场。1987年动工兴建，1991年9月1日投入营运。这座被誉为“空中丝路第一港”的现代化机场，是中国西北腹地规模最大、等级最高、设施最好、最为繁忙的航空枢纽站，场区占地500公顷，地势平坦，净空条件良好。

机场一期工程建成一条长3000米、宽60米的混凝土跑道，跑道中段和终端装有从美国进口的仪表着陆系统，从法国进口的全向信标仪和先进的助航灯光系统，可以保证波音747等大型飞机安全起降。机场航管楼面积7200平方米，规模居全国第二。楼内配备了从国外引进的航行管制、通讯导航、气象雷达等先进设备，并建有1200门程控总机，120条有线电话直达西安。机场油库总储量为2.8万立方米，供油和储油全部管道化、自动化，可同时为16架飞机自动加油。

候机楼面积21000平方米，为旅客办理登机手续，提供餐饮、购物、休息的服务设施一应俱全；自动扶梯、行李转盘以及6座登机桥使旅客上下飞机十分便利。候机楼内的供水、供电、供暖、供冷设施均为整套独立系统，并设有先进的安全检查系统、监控系统、自动消防系统、背景音乐等设施。国际候机厅面积3800平方米，内设有免税商店，方便出境旅客购物。

机场通航以来，已与国外20多家航空公司建立了航空往来，西北航空公司、长安航空公司以此为基地，开辟了通往全国近50个大中城市的60多条航线，并有通往日本、新加坡、香港、澳门的定期航班或包机。1995年，



旅客吞吐量达 242 万人次，飞机起降 35232 架次，货邮吞吐量为 39612.6 吨。

## 二、西安海关

为了适应对外开放的需要，1981 年 9 月经国家批准，同意开辟西安至香港的往返航线，设立西安海关。1982 年 8 月 15 日，西安至香港直航包机首航。香港首航代表团一行 30 人，游客 70 多人，于下午 1 时许抵达西安。机场上锣鼓喧天，鞭炮齐鸣，西安市代市长张铁民、省政府副秘书长张世卿，以及有关方面负责人和数百名手持花束的少年儿童，热烈欢迎客人们来西安参观游览，少年儿童向首航代表团献花。

应陕西省中国旅行社等 6 个单位邀请参加首航团的有：香港中航旅行社、香港国际旅行社、香港中航公司、香港商界、香港旅游协会、6 家包机的旅行分社、新华社香港分社、香港无线电视台、《大公报》、《文汇报》、《明报》、《成报》、《澳门日报》、《南华早报》、《田丰日报》、《晶报》、《商报》、《华侨日报》、《中国旅游画报》等代表。当晚，西安市人民政府和省属有关部门在西安人民大厦举行欢迎宴会。代市长张铁民在宴会上讲话，热烈祝贺西安至香港定期直航包机首航成功。副省长兼省经委主任孙克华、民航陕西省管理局负责人任光伟、参谋长张长发、省政府副秘书长张世卿、省计委副主任程新文、省建委副主任白毅、西安市副市长李廷弼、省外办副主任孙铭、省外经办副主任李平山、省公安厅副厅长艾蕴约、省卫生厅副厅长王月明、省农业局副局长曾星伍、省外贸局副局长高崇山、省旅游局副局长王华山、省财政厅副厅长葛涛等应邀出席宴会。首航团在西安等地参观游览了 8 天。

西安海关筹建初期，海关总署从二连、满洲里、乌鲁木齐等海关调来业务干部，承担起了对西安地区进出境运输工具、货物、行李物品实施监管的任务。

经过三年的筹建准备，1984 年 5 月 1 日西安海关正式成立。业务范围扩大到除邮检外的所有海关业务。1985 年 8 月到 1989 年 9 月期间，西安海关的监管区域为陕、甘、宁、青四省（区）。

1988 年 9 月经海关总署批准，西安海关机构作了相应调整，标志着西安海关在业务建设、科学管理方面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1989 年 9 月，西安海关办公楼建成，并投入使用。

随着陕西对外经济贸易和科技文化交往的日益发展，西安海关的业务量

逐年递增。据统计,1985年至1993年期间,西安海关征收关税和代征税每年以19.4%的速度递增,累计达23.6亿元;监管进出口货物总值每年以13.6%速度增长,累计达到306131万美元。

西安海关根据改革开放形势发展的需要及内陆海关业务特点,不断改革、完善监管制度,积极向规范化、科学化、现代化的管理模式靠拢。为了保证进出口货物转关运输渠道畅通,方便企业办理进出口报关手续,西安海关与各口岸海关建立了转关运输货物监管办法,在火车站、飞机场设立了监管组。

西安海关针对不同的加工贸易形式,采取保税工厂、保税仓库、登记手册等监管办法,支持企业开展关税进料加工业务,发展外向型经济。据统计,1985年至1991年7年间,西安海关共办理保税料件合同备案登记4303份;批准保税工厂5个,保税仓库16个。

为了扩大开放,加速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国家相继制定了一系列关税优惠政策,对一定地区和某些行业海关实施特殊的监管办法。西安海关坚持认真调查研究,广泛宣传政策,依率计征,依法减免,积极支持国有大中型企业技术改造和科研、文教事业的发展,以及贫困山区、革命老区的脱贫致富。从1985年至1991年,西安海关审批减免税金额累计达37.2亿元。

西安航空港咸阳机场已于1993年开通国际航班,是陕西通往世界的门户,每年约有近10万人次的旅客从这里进出境。除开设西安至香港航线外,还将开通西安至日本名古屋航线,每周进出境航班20架次。为了创造规范、协调的通关环境,西安海关实行红绿通道制度,采取口头询问、现场调研、重点抽查的办法,降低过机开箱检查率,加快通关速度。

随着中国海关与国际海关组织、外国海关的接触、交流不断扩大,积极参与外事接待工作,通过业务交流和安排参观访问,增进双方的了解和友谊,宣传中国对外开放的政策,树立中国海关良好形象。自1986年起,先后接待了来自泰国、荷兰、欧共体、海关合作理事会等国际海关组织及外国海关代表团18批59人次。

## 第二节 开放地区

开放地区,指允许外国人前往旅行的地区,包括城镇、行政区、风景区、水域、交通线路等。80年代以前,陕西因地处国家“三线”建设重点、

其开放地区仅限于少数城市或风景区。1982年10月国家将开放地区划分为甲乙两类，实行分类管理，开放地区逐步扩大。1985年12月，国家调整开放地区管理办法，不再分甲乙类，统称为开放地区，截至1992年，全省107个县（区）市中的96个县（区）市对外开放，占总数的92.5%。

### 一、地市

1959年8月2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外宾参观地区、单位、项目、保密范围和批准权限的规定》中将西安市、临潼县、延安县列为对外开放地区。

1962年12月8日，省常委会第25次会议在听取了蒋锡白汇报第六次全国外事工作会议精神后，决定同意1963年始延安县对外宾全部开放，西安市对外宾半开放。为适应外事工作发展的需要，从1963年开始，每逢“五一”节期间，部分地区对外国人按规定路线、活动范围参观游览。

1967年4月24日，国务院外事办公室以〔1967〕文字6号文通知，“五一”节期间，西安市列为公开接待外国人活动的城市，具体事项由省外办安排。

经公安部批准，从1983年2月16日起，陕西省的延安市作为甲类开放地区，宝鸡市、韩城市作为乙类开放地区对外国人开放。

1986年1月30日，随着形势的发展，中国政府决定调整对外国人开放的地区，陕西省对外国人全开放的有西安市、咸阳市、延安市、宝鸡市、韩城市。决定中指出，从2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实行之日起，外国人只要持有效签证或者居留证件即可前往。

同年3月6日，省公安厅、省外办、省军区联合以陕公境发〔1986〕号文规定：西安市及所辖区县的碑林、莲湖、新城、雁塔、灞桥、未央、阎良区，长安、临潼、高陵、蓝田、周至、户县为对外开放地区（不含西安市区南环公路以南的秦岭山区及蓝田辋川以南地区）；宝鸡市及所辖区县的金台、渭滨区，宝鸡、陇县、千阳、凤翔、麟游、岐山、扶风、眉县（不含渭滨区南环公路以南的秦岭山区、宝鸡县峡石乡以西地区和以南的凤县、太白县）；咸阳市及所辖区县的秦都、渭城、杨陵区，兴平、礼泉、乾县、永寿、彬县、长武、旬邑、淳化、泾阳、三原、武功等县（不含乾县临平至永寿县仪井两县范围的以西地区）；延安地区所辖的延安市和黄陵县；铜川市所辖的城区、郊区和耀县、宜君县。

同年11月30日，公安部新闻发言人宣布：“为了适应对外开放的需要，中国政府决定再增加192个市、县为对外国人开放地区”，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第四章第20条规定，外国人持有效签证或者居留证件，即可前往这些地区旅行。陕西省这次新增加的有铜川、汉中、华阴、蒲城、黄陵、南郑、勉县、留坝、略阳等市县。

1989年8月19日，经国务院批准，陕西省25个县市对外开放，它们是：榆林、定边、靖边、横山、安康、石泉、汉阴、宁陕、紫阳、旬阳、平利、白河、镇坪、岚皋、商州、丹凤、柞水、宁强、渭南、华县、甘泉、安塞、志丹、子长、延长等市县。（详见表3-6-1）

## 二、历史文化名城

1982年2月8日，国务院《批转国家建委等部门关于保护我国历史文化名城的请示的通知》，公布了第一批24个历史文化名城，其中包括保存文物特别丰富，具有重大历史价值和革命意义的西安、延安。

1986年12月19日，国务院批准公布的国家第二批38个历史文化名城，其中包括陕西省的韩城、榆林。

## 三、风景名胜

1990年4月6日，省政府以陕政发〔1990〕65号文，公布了黄帝陵、宝鸡天台山、磻溪钓鱼台、韩城黄河龙门、司马迁祠墓、耀县药王山、凤翔东湖、安康香溪洞、柞水溶洞、铜川市唐玉华宫10处为第一批省级风景名胜区分。

## 第三节 开放单位

开放单位，指可供外国人参观、考察的企事业单位，又称参观点，它包括工厂、企业、学校、街道、村镇、农场、寺庙以及文化、卫生和科研单位等。对外开放单位接待外国人和海外侨胞的参观访问，是宣传中国建设成就和改革开放政策的重要阵地，是宣传陕西的重要窗口。

### 一、开放单位的建立

1958年3月省外办成立后，对原有可供外宾参观的31个单位进行调查了解，工业方面有：西北国棉一厂、西北国棉二厂、西北国棉三厂、西北国

陕西省对外开放地区一览表

表 3-6-1

1993 年 11 月统计

地(市)名称	对 外 开 放 地 区	控制开放地区	非 开 放 地 区
西 安 市	区:碑林、莲湖、新城、雁塔、灞桥、未央、阎良 县:长安、临潼、高陵、蓝田、户县、周至		西安至宝鸡、蓝田、长安、户县、周至、眉县、岐山、宝鸡县、宝鸡市渭滨区的南环公路以南的秦岭山区
宝 鸡 市	区:金台、渭滨 县:宝鸡、陇县、千阳、眉县、凤翔、麟游、岐山、扶风		1. 凤县、太白 2. 宝鸡县峡石乡以西地区
咸 阳 市	区:秦都、渭城、杨陵 县:礼泉、乾县、永寿、彬县、长武、旬邑、淳化、泾阳、三原、武功、兴平		乾县经临平至永寿仪井两县范围内的以西地区
铜 川 市	区:城区、郊区 县:耀县、宜君		
延安地区	市:延安 县:黄陵、志丹、吴旗、安塞、子长、延长、延川、甘泉、富县、洛川		宜川、黄龙
榆林地区	市:榆林 县:府谷、定边、靖边、横山、神木、佳县、吴堡、清涧、子洲		绥德、米脂
渭南地区	市:韩城、渭南、华阴 县:蒲城、华县、大荔、合阳、澄城、白水	潼关、富平	
汉中地区	市:汉中 县:南郑、勉县、留坝、略阳、宁强、佛坪、镇巴	城固	洋县、西乡
安康地区	市:安康 县:紫阳、旬阳、白河、平利、镇平、岚皋、石泉、汉阴、宁陕		
商洛地区	市:商州 县:丹凤、柞水、洛南、商南、山阳、镇安		

注:全省共 107 个县(市、区),目前已对外开放 96 个县(市、区),控制开放 3 个县,占全省总县(市、区)数的 92.5%,尚有 3 个县(区)未对外开放。

棉四厂、西北国棉五厂，西北第一印染厂、西安黄河棉织厂、西安人民搪瓷厂、西安电力电容器厂、西安高压开关厂、西安仪表厂、西安热水瓶厂、西安农械厂、西安高压电瓷厂、西安绝缘材料厂、西安六〇三厂、西北金属结构厂、西安三桥车辆厂。教育方面有：西安交通大学。名胜古迹有：大雁塔、半坡博物馆、省博物馆、兴教寺、杜公祠、临潼华清池、秦始皇陵、延安行署所在地的革命旧址、革命博物馆。人民公社有：王莽公社、马旗寨公社。

1963年4月25日，省委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对供外宾参观的单位进行了调整。新增加24个单位，工业方面有：西安针织厂、西安红旗皮鞋厂、西安妇女电池厂、西安美术供应社、西安电影制片厂等。教育方面有：西北大学、西安音乐学院、西安美术学院、省戏剧学校、西安第十中学、第二十中学、陕西师大附中、西安市青年路小学、实验小学、报恩寺小学、第一保育院、敬业幼儿园。名胜古迹方面有：华山、草堂寺、车马坑、钟楼。人民公社有、红旗公社、丈八沟公社、长安县皇甫村生产队。

在这次会上，除增加西安附近的新参观单位以外，对于较远地区拟增辟新参观单位，提出如下配套要求：

临潼华清池、秦始皇陵、新秦公社及小工厂；咸阳毛纺厂、帝王抽水站、一个公社；礼泉烽火公社、昭陵；乾县乾陵、永泰公主墓、一个公社；武功杨陵西北农学院、一个公社及附近科研机构；周至楼观台及附近一个公社；延安增加枣园后沟及枣园生产队、桥儿沟及桥儿沟生产队、万佛洞等。

随着涉外活动日趋增加，1966年“五一”节前，省暨市外办把对外开放单位作了调整。分别有：

工业方面有：西北第一印染厂、西北国棉三厂、西北国棉四厂、西北国棉五厂、西安仪表厂、西安高压电瓷厂、西安电缆厂、西安人民搪瓷厂、西安农业机械厂、西安电力电容器厂、西安公私合营秦岭热水瓶厂、陕西第一毛纺厂（咸阳）、陕西公私合营黄河棉织厂、西安制药厂、西安玻璃总厂，西安绝缘材料厂、西安针织厂、公私合营西安中兴电机厂、西安高压开关厂。

教育方面有：西安交通大学、陕西师范学院、西北大学、西安冶金建筑学院、西安医学院、西安音乐和美术学院、西安体育学院、一机部咸阳机器制造学校、西安市十中、西安市实验小学、西安市第二保育院、西北农学院。

人民公社有：马旗寨、红旗、阿房、长安韦曲人民公社，咸阳帝王抽水站。

名胜古迹有：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纪念馆、省博物馆、半坡遗址博物馆、钟楼、大雁塔、华清池。

1980年6月，省外办根据国务院、中央军委〔1980〕123号文件精神，除对对外开放单位进行调整以外，并与省公安厅、省军区等单位协商，对安排外宾去西安以外非开放地区参观、专业考察等车辆行驶路线作出新的规定（详见附图）。同时对外国人开放和半开放单位亦作了新的规定。

### （一）对外开放单位

文博：秦俑馆、华清池（临潼县）、昭陵博物馆（礼泉县）、乾陵博物馆（乾县）、茂陵博物馆（兴平县）、钟楼管理所、大雁塔文管所、小雁塔文管所、清真寺、兴教寺（长安县）、香积寺（长安县）、咸阳博物馆、草堂寺、农民画展馆（户县）、兴庆宫公园、革命公园、西安动物园。

工业：西北国棉一厂、陕西第一毛纺厂、西北国棉三厂、西北国棉四厂、西北国棉五厂、西北第一印染厂、西安仪表厂、西安高压电瓷厂、西安人民搪瓷厂、西安红旗手表厂（长安县）、陕西缝纫机厂（临潼县）、西安黄河棉织厂、西安第一针织厂、西安重型机器厂、西安特种工艺美术厂、西安玉雕厂、西安金属工艺厂、锦江刺绣厂、西安丝绸厂、乾县工艺美术厂。

农业：大明宫公社、西安市北郊红色大队、鱼化寨公社、草滩农场、烽火大队（礼泉县）

学校：西北大学、西安交大、陕西师大、西安体育学院，西安市六中、市二十二中、市三十中、市八十三中、长安韦曲一中，尚德路、青年路、劳武巷、大雁塔等四个小学，第一保育院。

影剧院：人民剧院、五四剧院、解放剧场、朝阳剧场、西一路剧院、实验剧场、杂技团排练场、木偶剧团排练场、光明影院、儿童影剧院、小寨影剧院、长安影剧院、长乐影剧院、群众影剧院。

医院：西安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市中心医院、市第四医院、长安县医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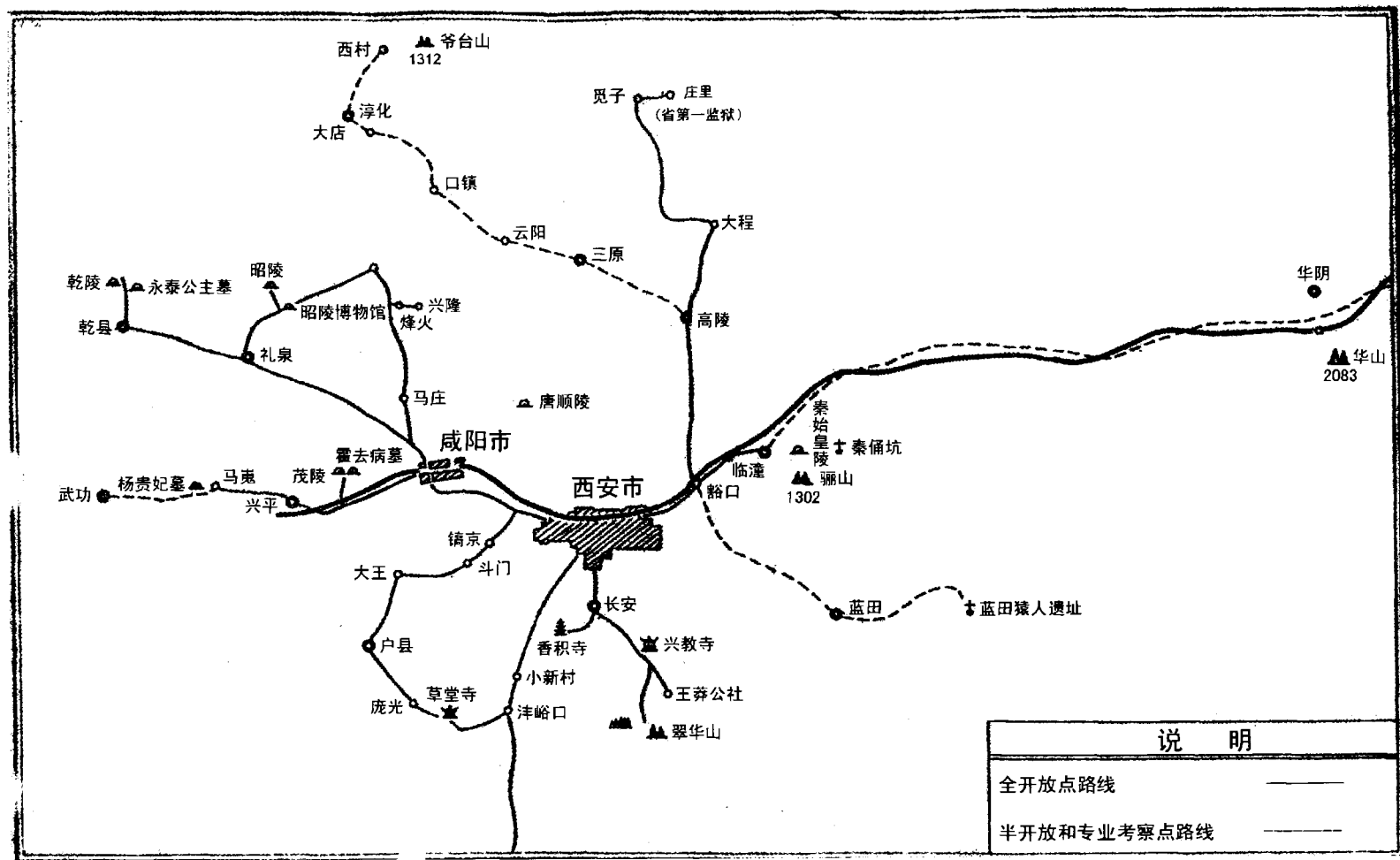
饭店：西安饭庄、五一饭店、东亚饭店、清雅斋食堂、西安烤鸭店。

其他：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纪念馆、陕西省第一监狱（富平县）、青年路街道居委会。

### （二）对外半开放单位

文博：西周车马坑（户县）、大兴善寺、青龙寺、大明宫遗址、阿房宫遗址、华严寺遗址、杜公祠（长安县）、临潼县文化馆、西安市西城门楼、汉长安城遗址。

### 西安以外各开放、专业考察点交通路线图





工业：陕西鼓风机厂（临潼县）、西安制药厂、西安保温瓶厂、西安三桥车辆厂、西安电机厂、西安煤矿机械厂。

农业：西韩大队、秦三大队（户县）、兴隆果园（礼泉县）、长安新村大队。

学校：西安艺术学院（长安县）、西北农学院（武功县）。

1985年5月31日，省外办会同省公安厅、省军区和西安市外办及有关部门商议，又一次调整增补供外宾吃住和参观单位8个，即西安金花饭店、西安解放饭店后楼、庆华宾馆、曲江春餐馆、华秦民间艺术公司、怡珍轩工艺品商店、省外语师范专科学校、美协陕西分会的美术家画廊（含美术家沙龙），省京剧团演出的《三岔口》、《拾玉镯》和《大闹天宫》为对外演出节目。

同年10月23日，省和西安市外办、省公安厅、省军区再次商议，又增设对外开放参观和住宿单位9个，即长安盆景园、西北工业大学宾馆、西安双龙饭店、西安小寨饭店（只限南翼客房）、临潼县斜口乡柳树村（计划生育点）、乾县城关镇安家寺村（计划生育点）、乾县乾陵乡张家堡与韩家堡（计划生育点）、西安东方工艺美术馆（金花路）、西安阅古堂工艺美术商店（金花饭店西侧）。

1988年7月14日，省外办与省公安厅、省军区暨西安市外办、西安市公安局等对于陕西省暨西安地区涉外参观及服务单位又进行了一次全面审查和调整，其序列为：

工业类：保留原对外开放的单位：西安第一针织厂、西安高压电瓷厂、西北第一印染厂、西北国棉三厂、西北国棉四厂、西北国棉五厂、陕西鼓风机厂、陕西重型机器厂、西安制药厂、西安玉石雕刻厂、西安凤凰刺绣厂、西安美术陶瓷厂、西安金属工艺厂、西安搪瓷厂、陕西标准缝纫机公司、西安仪表厂、西北国棉一厂、西安煤矿机械厂、西安丝绸厂、西安艺术雕刻厂、西安锦江刺绣厂、西安特种工艺厂、乾县工艺美术厂。新增加的对外开放单位有：西安红旗机械厂、西安昆仑机械厂、西安石油仪器总厂二分厂、咸阳彩色显像管厂。待定单位有：西安化学工业公司、西安造纸网厂、西安内燃机配件厂、西安无线电一厂、西安沔河毛织厂、西安自行车一厂、陕西黄河机器厂、西安国药厂。

农业类：保留原对外开放的单位：西安大明宫乡、鱼化寨乡、长安县王莽乡、滦村乡小新村、礼泉县烽火乡烽火村、乾县城关镇安家寺村。新增加

的对外开放单位有：临潼县斜口乡柳树村、西安市谭家乡、长安县纪杨乡大古村、礼泉县烟霞乡袁家村、户县光明乡六老庵村。待定单位有：西安市碑林区旅馆村、西安市何家村北方乐园、西安市莲湖区五一村。

教育类：保留原对外开放的单位：西北大学、陕西师范大学、西安体育学院、西安交通大学、西安音乐学院、西北农学院、西安第三十中学、西安第六中学、西安第八十五中学、西安第二十二中学、西安第八十三中学、长安韦曲一中、西安青年路小学、大雁塔小学、文艺路小学、西安实验小学、西安第一保育院。新增加的对外开放单位有：陕西中医学院（咸阳）、西安外国语学院、省教育学院、西安中学、西安第六十中学、临潼华清中学、莲湖路西安小学。待定单位有：西安外语专科学校、西安幼儿园、西安红色托儿所。

医疗类：保留原对外开放的单位有：省人民医院、西安市中心医院、西安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西安市第四医院。新增加的对外开放单位有：第四军医大学、外宾侨胞医疗中心、西安市中医医院、省妇幼保健医院。待定单位有：西安中医药研究院、四十七军临潼医院、三十三医院。

政法类：对外半开放的是省第一监狱（对外挂牌省监狱）。待定：省女监。

文物名胜类：保留原对外开放单位有：省博物馆、秦俑馆、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纪念馆、大雁塔、小雁塔、化觉巷大清真寺、西安钟楼、兴善寺、香积寺、青龙寺、兴教寺、秦始皇陵、西周车马坑、茂陵博物馆、霍去病墓、昭陵博物馆、杨贵妃墓、汉长安城遗址、未央宫遗址、华严寺、五丈原、草堂寺、咸阳博物馆、乾陵博物馆、永泰公主墓、章怀太子墓、懿德太子墓、秦阿房宫遗址、半坡博物馆、大明宫遗址、楼观台、钓鱼台、周公庙、杜公祠、汉中市博物馆、饮马池（汉中市）、南湖（南郑县）、灵岩寺（略阳县）、圣水寺（南郑县）、定军山（勉县）、武侯祠（勉县）、拜将坛（汉中市）、东塔（汉中市）、古栈道（汉中市）、张良庙（留坝县）、龙岗寺（南郑县）、武侯墓（勉县）、延安革命纪念馆、王家坪、南泥湾、延安宝塔山、凤凰山麓、骊山、西岳华山、五台山、终南山、翠华山、华清池、灞桥、寒窑、兴庆宫公园、莲湖公园、革命公园、西安动物园、鲁迅文学艺术学院。新开辟的对外开放单位有：西安城墙、西安鼓楼、蓝田猿人遗址、丰镐遗址、黄帝陵、建章宫遗址、西岳庙、金台观、桥陵、法门寺、药王山药王庙、韩城司马迁祠、耀州窑遗址、延安清凉山。待定单位有：枣园、杨家

岭、水陆庵、魏长城遗址、古阳平关。

宾馆类：保留的对外开放单位有：西安宾馆、陕西宾馆、唐城宾馆、西安人民大厦、西北大学宾馆、西工大宾馆、彩虹宾馆、秦都宾馆、宝鸡宾馆、宝石宾馆、汉中宾馆、汉中行署招待所、张良庙宾馆、华清宾馆、华山宾馆、西府宾馆、长安宾馆、宝鸡石油钢管厂招待所、秦都饭店。新增加的对外开放单位有：协和大酒店、夏威夷酒店、万年饭店、神州宾馆、东方大酒店、金安酒店、止园饭店、双龙饭店、唐华宾馆、新世界酒店、古都艺术大厦、民航宾馆。待定单位有：朱雀饭店、珠穆朗玛宾馆、延安宾馆、金花饭店、阿房宫宾馆、体育宾馆、西北饭店、钟楼饭店、榆兰酒店、西都大厦、实验宾馆、小寨饭店、五一饭店宾馆、半坡饭店、庆华厂宾馆、东方厂宾馆、陕西教育学院宾馆、石油部西安环宇宾馆、榆林宾馆、解放饭店、骊山宾馆、红旗机械厂宾馆、长庆油田西安招待所、省委老干局招待所、新疆军区西安招待所、渭滨宾馆、神木宾馆。

餐厅类：保留对外开放单位：解放路饺子馆、德发长饺子馆、五一饭店、和平饭店、聚丰园、桃李春、东亚饭店、清雅斋、西安饭庄、曲江春、花萼相辉楼、南熏阁、骊山购物中心餐厅、骊宫餐厅、瑶光楼餐厅、秦俑馆餐厅、东花园餐厅、华清池餐厅、陆疗餐厅、昭陵餐厅、乾陵餐厅、乾县工艺厂餐厅、茂陵餐厅、省科技馆餐厅。

商店类：保留对外开放单位：西安文物商店、西安华侨商店、文宝斋、西安书画社、西安友谊商店、中侨商店。待开放单位有：半坡友谊商店、西安豪华商场、秦俑馆友谊商店。

其他：省科技馆、西安青少年宫、西安美术家画廊、炭市街农贸市场、小寨农贸市场、大差市夜市。

## 二、开放单位的管理

对外开放单位的管理，主要是指组织机构的建设、调整，涉外人员的审查、培训、奖惩和对外宣传工作的经验交流等，这是外事部门的一项重要工作。

1956年9月11—12日，省人委办公厅召开了聘有外国专家和招待单位负责人座谈会，会议在传达全国第一次外国专家招待工作座谈会精神的同时，西北电力基建局32工程处专家招待所和西北建筑工程管理局的代表结合实际介绍交流了工作经验。

1957年11月8日，省委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对于三个方面的涉外人员进行了审查、登记、造册，并指出各接待单位和参观访问单位选择陪同人，出面接待人员和作具体接待工作人员，应在本名册所定范围内确定。如超出范围，需另选其他人员时，应当得到各有关单位的党组织和指委办公室的同意，以保证国际活动工作队伍的纯洁性。

**(一) 接待单位 26 个，出面接待人员和具体人员（以下简称专干）分布状况是：**

交际处副科长以上 11 人（出面接待 2、翻译 3、专干 6）；省、市团委 5 人（出面接待 2、工作人员 3）；省友协 4 人（出面接待 2、专干 2）；省文化局 9 人（出面接待 5、文物说明 2、专干 2）；省、西安市工会 6 人（出面接待 5、专干 1）；西安市城建局 7 人（出面接待 3、专干 4）；西安市教育局 4 人（出面接待 2、专干 2）；科学院办事处 5 人（出面接待 1、专干 4）；西安市宗教事务处 3 人（出面接待 1、专干 2）；西安市政协 4 人（出面接待 2、专干 2）；西安市委统战部专干 2 人；美协西安分会 6 人（出面接待 4、专干 2）；省体委 5 人（出面接待 2、专干 3）；省妇联 2 人（出面接待 1、专干 1）；西安市妇联 5 人（出面接待 3、专干 2）；省、西安市记者协会 7 人（出面接待 6、专干 1）；省政协 4 人（出面接待 2、专干 2）；省农业厅专干 2 人；作协西安分会 8 人（出面接待 5、专干 3）；市人委 4 人（出面接待 1、专干 3）；省卫生厅 3 人（出面接待 1、专干 2）；西安市卫生局 2 人（出面接待 1、专干 1）；西安市建委 2 人（出面接待 1、专干 1）；国旅西安分社专干 2 人；省邮电局 13 人（出面接待 2、专干 11）。

## **(二) 参观访问单位**

1. 工厂 15 个单位，涉外人员 74 人（出面接待 51、专干 23），其分布：

西北国棉一厂 5 人（出面接待 3、专干 2）；西北国棉二厂 7 人（出面接待 5、专干 2）；西北国棉三厂 7 人（出面接待 5、专干 2）；西北国棉四厂 3 人（出面接待 2、专干 1）；西北国棉五厂 7 人（出面接待 5、专干 2）；西北第一印染厂 5 人（出面接待 3、专干 2）；新西北印染厂 4 人（出面接待 3、专干 1）；西安电力电容器厂 6 人（出面接待 4、专干 2）；西安高压电瓷厂 4 人；西安绝缘材料厂 5 人（出面接待 4、专干 1）；六〇三厂 5 人（出面接待 4、专干 1）；西北金属结构厂专干 1 人；西安天祥仪器厂专干 3 人；西安农械厂 5 人（出面接待 4、专干 1）；三桥车辆厂 7 人（出面接待 5、专干 2）。

2. 文教卫生 18 个单位，涉外人员 68 人（出面接待 51、专干 17），其分

布：

西北大学 8 人（出面接待 6、专干 2）；西安交通大学 6 人（出面接待 4、专干 2）；西北农学院 3 人（出面接待 2、专干 1）；西安师院 10 人（出面接待 8、专干 2）；西安医学院 5 人；省戏曲剧院 3 人；西安石油学院 4 人；西安地质学院 5 人（出面接待 4、专干 1）；西安西关机场 2 人（出面接待 1、专干 1）；咸阳纺校出面接待 2 人；西安市三中出面接待 2 人；西安市十中出面接待 2 人；西安市实验小学出面接待 1 人；洒金桥小学 1 人；西安市第一保育院出面接待 1 人；西安市红十字会医院出面接待 3 人；西安市中心医院 4 人（出面接待 2、专干 2）；西安市第四人民医院 6 人（出面接待 3、专干 3）。

3. 农村和其他 28 个单位，涉外人员 55 人（出面接待 30、专干 25），其分布：

西安市委农工部专干 1 人；咸阳市委 6 人（出面接待 4、专干 2）；咸阳县委 3 人（出面接待 2、专干 1）；咸阳县“五一”农业社 2 人（出面接待 1、专干 1）；长安县委 5 人（出面接待 4、专干 1）；长安县王莽村“七一”社出面接待 2 人；黄甫庄农业社出面接待 1 人；祝村“五四”农业社出面接待 1 人；河池北村社出面接待 1 人；灞桥区专干 1 人，红旗农业社专干 2 人，农业会专干 1 人；未央区 3 人（出面接待 1、专干 2），区辖五星农业社出面接待 3 人，帽珥冢社出面接待 2 人，蒋武殿社出面接待 3 人，蒋家村社出面接待 4 人；阿房区所辖“五一”、五星农业社，“五一”蔬菜社各 1 名接待人员；华清池管理处、广仁寺、卧龙寺、兴善寺、八仙庵、基督教青年会、天主教南堂、兴教寺等各指定 1 人参加接待，大清真寺 2 人。

### （三）相关陪同人员

来自省市人委、省市人大、省市政协、中苏友协、省市青联、作家协会、省农业厅、省水电厅、省教育厅、省卫生厅、省体委、省市文化局、省市妇联、市农业局、民革、民盟、民建、九三、民进等单位共 33 人。

来自其他 30 人，其中省市工商联 4 人，文化界 4 人，学术界 9 人，宗教界 4 人，佛教 3 人，道教 1 人，基督教 3 人，天主教 2 人。

1959 年 12 月 7—10 日，省外办召开了外国专家所在单位的专家工作经验交流座谈会，会上以发挥专家作用，做好专家的政治思想工作，做好与专家的友谊交往、生活招待工作等三个专题为中心，交流了工作经验，西安市委书记处书记、外事工作领导小组负责人冯直到会讲话。

1960年3月28—31日，省人委交际处在兴平召开聘有外国专家招待工作现场经验交流座谈会，西安、延安、宝鸡、户县、阎良等地专家招待部门的负责人及部分涉外专职人员总结交流了招待工作经验。

1963年4月27日，省暨西安市外办以〔1963〕陕外字第031号文，转发了省委外事工作领导小组4月25日召开的会议纪要（出席会议的有李启明、刘庚、曹素人、蒋锡白、李宁、管建勋、朱子彤、惠庶昌、海涛、延安专署副专员曹志谦，会议由李启明主持）。会议除讨论新增参观单位外，主要议题有：

对于写好陕西各方面的介绍及座谈材料，准备好介绍人，并作好各接待、参观、招待单位的工作作了具体部署。以外事小组成员为主，决定成立以下几个小组：1. 关于中共陕西党组织的地下斗争情况介绍，其中包括工运、农运、兵运、学运、两面政权、反特斗争等，由刘庚（西安市委书记处书记、市长）负责，吸收董学源（西安市委书记处书记）、罗文治（省委组织部长）、朱子彤（省总工会主席）等参加。2. 关于工业问题，由西安市委书记处书记曹素人负责。3. 关于农业问题，由王礼（省委农工部副部长）、许福才（市委农工部长）负责。4. 关于文化古迹方面，由鱼讯（省文化局局长）、吴钢（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负责。5. 关于教育方面，由海涛（省妇联主任）、惠庶昌（团省委副书记）负责。6. 关于各接待单位、参观单位的介绍材料，整顿外事工作队伍等工作，由李宁（省外办副主任）、蒋锡白（省委副秘书长）负责。7. 人民大厦招待单位的整顿工作，由管建勋（省人委秘书长）负责。8. 科学技术方面，由彭康（省科协主席、西安交大校长）、余铮（省科协副主席）负责。

健全机构，整顿队伍。延安地区外事处要尽快调配水平较高的干部组建，并整顿好外事队伍。

省级机关健全各部门的外事机构，并提出陪同外宾的工作人员名单；各接待单位，要配备好陪同、接待外宾的工作人员等。由海涛（省妇联主任）负责提供一个陪同外宾的女干部的名单。省外办会同省委组织部对外事队伍进行一次审查培训。

整顿好人民大厦等外宾接待单位。人民大厦在招待工作中应急速解决如下问题：1. 房间环境卫生；2. 服务质量；3. 饭菜质量；4. 注意节约，克服浪费；5. 整顿内部秩序；6. 增设一些特等房间；7. 与商业部门联系解决接待外宾的供应问题，以及人民大厦设立小卖部问题。

做好旅馆、车站、机场、临潼等地书刊宣传品的陈列、赠送，以及书店、书摊、古玩店的管理工作。

研究解决外宾购买西安手工艺品供应、文物复制品等问题。西安人民搪瓷厂可生产一些有纪念意义的具有地方特色的小礼品；省博物馆可扩大生产文物复制品；留坝的石刻品、陕北的炭精雕刻均可生产一些。

安排好外宾的文娱活动。根据外宾的兴趣，可安排观看地方戏以及外宾感兴趣的其他节目。

继续抓好居民教育，进一步搞好市容、清洁卫生、交通秩序等工作。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开放单位工作受到严重干扰，一度中断。1969年5月，涉外活动由省革委会办事组统一安排，省外办参与接待主要以来访者的愿望和邀请部门的要求而安排活动。当时外宾参观较集中的开放点是：乾陵、茂陵、大雁塔、小雁塔、钟楼、省博物馆、半坡遗址博物馆，以及礼泉县烽火大队、西安市北郊的红色大队和大明宫生产队。

1978年4月17日，省委办公厅以陕办发〔1978〕30号文，转发李尔重（省委书记）、高明月（省委常委兼秘书长）、鲁曼（省委副秘书长兼省外办主任）4月5日向省委报送的《关于加强骊山风景区管理工作会议纪要》。

1979年8月4日，省委批转省外办《关于当前我省外事、旅游工作几个问题的报告》，指出加强游览点的建设，加强对口接待工作，积极开展科技交流，认真改进服务质量等。

同年8月中旬，省外办与省文化局在半坡遗址博物馆联合召开了文物单位现场会。会上，半坡遗址博物馆、乾陵博物馆、昭陵博物馆分别介绍了加强对外接待队伍的思想建设，业务知识学习，不断提高讲解水平，以及加快建设的基本经验；半坡遗址博物馆首先推出增设外文说明牌的经验，在展室或现场实物的中文说明牌下书写外文说明，这一措施大大提高了文物本身的潜在力，使宣传工作由被动转为主动，活跃了参观气氛。昭陵博物馆为宣传古老灿烂的文化艺术，提高参观效果，给陵园建筑群等加配辅助挂图。就挂图边讲、边听、边看，使观众一目了然，增强直观效果。乾陵博物馆介绍了为保护文物安全、整洁，收集合葬墓的历史知识的经验。同年春，经乾县县委同意开放点的建设方案，并动员乾陵周边两个公社4000多名社员上陵整修道路，移苗植树，7天时间，修复长650米、宽20米的司马道路面，移栽小柏树27000多棵，修通了上陵公路1.7公里三合土路面。为加快解决参观点就餐困难，省委有关负责人在该县检查工作时指出，建议涉外开放点也要

“学会两条腿走路”。县委根据这个精神，即动员商业、饮食以及公社、生产队等各方筹资，组织劳力，在 28 天内修建起 15 间供外宾就餐、购物的平房，省外办投资 1000 元，乾陵周边群众也得到了益处。

同年 8 月 21 日，省委以陕发〔1979〕152 号文印发《关于外事宣传教育提纲》。

1980 年春季，省外办在礼泉县烽火大队召开农村开放点建设经验现场会，交流向外宾宣传科学种田、多种经营、勤俭办学，以及居民点建设等的基本经验。

同年 3 月，省外办要求各对外开放的文物单位和部分工厂、学校，基本上都有一份印制的图文并茂的简介，主要供外国新闻界人士和陪同翻译参考。从那时直到 1988 年，凡外宾常去的参观、游览单位，下榻的主要宾馆、饭店，都有一份彩印简介馈赠外宾。省外办在这期间，每年均以约 10 万元补助，给各类开放单位给予补助，帮助更新景点简介和改善接待环境；向对外宾开放的文化艺术单位投资 7 万元，推出以古长安为背景、体现盛唐文化艺术的《仿唐乐舞》、《唐·长安乐舞》这两台具有浓郁古典风格和民族特色的大型歌舞。

1980 年 4 月 10 日，经省军区、省外办、省国防工办、西安市公安局研究，由省公安厅牵头，以陕公卫〔1980〕12 号文报呈省政府，将 1965 年 9 月划定以钟楼为中心直径 10 公里的外国人自由活动区域和所设立的“外国人未经许可不准超越”的标志牌，一并取消。

同年 4 月 16 日，省政府以陕政发〔1980〕90 号文《关于外事工作几个问题的通知》，发至各对外开放单位和部门。

同年 8 月 11 日，国务院办公厅以国办发〔1980〕11 号文转发“中共陕西省委批转省外办党组《关于加强外事政策纪律教育进一步做好我省外事工作的报告》的通知。”

1981 年 9 月，首次向外宾推出陕西古代宫廷菜肴品尝试点，9 月 16 日至 19 日，日本东京银座寿多大酒楼自费旅游者，由富士贸易株式会社总经理日籍华人高翔翮带队，以亚寿多大酒楼经理谷田部一郎为团长的访问团一行 10 人（团员均为酒楼股东和管理人员），要在西安学习品尝一桌唐菜（即宫廷菜肴），经省外办宣传处同意由省中旅社与西安市饮食公司商定，在四家饭店进行试办，和平饭店取名为“关中八景宴”、民生餐厅取名为“龙凤宴”、东亚饭店取名为“沉香宴”（意用唐兴庆宫沉香亭）、西安饭庄取名为



“烧尾宴”（用意鲤鱼跃龙门），东亚饭店还试以吃唐菜穿唐服饰的接待方式吸引客人。因穿着古装接待外宾一事曾引起一场风波，省外办为此写了检讨，省委主管外事工作的吕剑人书记承担了领导责任，这些均经省委常委会讨论后，报呈国务院办公厅。

1981年5月，经省委工作外事领导小组审核，由省委、省政府转发了省外办党组《关于在对外活动中赠送和接受礼品的几项内部规定》，省政府批转了省外办《关于近年来外国人在西安的一些值得注意的活动情况的报告》，同年上半年省外办还制定了《接待外宾工作人员守则》、《对口管理工作条例》、《陕西省地、市、县外办的职责范围的规定》等条例。

同年3月30日—4月3日，省外办在西安召开了聘有外国经济专家的工厂、研究所、大专院校等单位负责人座谈会，中心议题是解决统一归口、分级管理和在对外开放单位中开展“五讲四美”活动，对外事队伍进行外事方针、政策、纪律和爱国主义、国际主义教育，以及进一步搞好公安、邮电、铁路、民航、商业、粮食、银行、文化、卫生、旅游等部门的协作配合问题。同年9月11日，省政府以陕政发〔1981〕218号文，批转了省外办《关于外国经济专家工作座谈会情况的报告》。

1983年9月1日，省政府以陕政发〔1983〕157号文批转省外办《关于努力开创我省外事工作新局面的报告》。

1984年6月20日，省委以陕办字〔1984〕34号文，决定对省委对外宣传工作领导小组及其工作机构调整如下：组长周雅光（省委副书记）、副组长李连璧（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委外事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吴庆云（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长）、魏明中（省外办主任）、霍绍亮（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成员：李若冰（省文化文物厅厅长）、郭成方（省广播电视厅厅长）、张光（陕西日报社总编辑）、陈兴亮（省旅游局局长）、彭士钦（省侨办副主任）、李应中（省外贸厅厅长）、王毅（省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省委宣传部对外宣传处作为省委对外宣传工作领导小组的办事机构。

同年9月，省外办、省委政策研究室、省建设厅、省文化文物厅、省旅游局等组成小组，以40多天的时间，对开发、建设和管理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区开放点进行了调查，并形成开创陕西外事旅游新局面的调查报告。

同年12月11日，省外办以陕政外发〔1984〕262号文转发了外交部《关于改进对外宴请工作的几点意见》。

1985年6月21日，省委外事工作领导小组以陕外发〔1985〕1号文，批

转《省外办关于外事接待工作的改革意见》，发至省直单位和各地（市）委。

同年11月25—27日，省外办召开了全省第一次音像对外宣传工作会议，省委副书记周雅光到会讲话。省外办主任魏明中做工作报告，指出近几年音像对外宣传工作，虽然起步迟，但步伐迈得比较大，从1980年以来涉外部门共拍摄制作了对外宣传的电影、电视、录像40多部，其中《轩辕黄帝陵》、《西安》、《欢送当代遣唐史》等，有的已向来西安的外国游客播放，有的作为陕西省对外交流节目随陕西省领导人出访赠送，受到欢迎和好评。《西安事变》向国外发行后引起很大反响。西安宾馆等6家宾馆、饭店又安装了用于对外宣传的闭路电视系统。

1986年2月8日，省委宣传部、省外办以陕政外发〔1986〕19号文，通报了李剑平等严重违反外事纪律的处理决定。

同年下半年，省外办开始将全省范围内开放单位（参观点）的开辟、调整和外事业务的建设工作，按地区和系统分级归口管理的原则逐步下放到各地（市）外办和各系统外事处（科）。

1986年9月22—23日，由省公安厅、省外办和省文物局联合在西安召开全省涉外单位治安工作座谈会。西安、咸阳、宝鸡、渭南等地市和部分区、县公安、外事旅游、文物、民航、铁路、工商以及一些主要涉外单位宾馆、饭店的领导参加了会议。省外办主任陈兴亮、省公安厅副厅长张永辉、省文物局副局长张廷皓就涉外单位的治安现状和今后工作讲了意见，最后副省长张斌到会讲话。

同年12月9—13日，省委保密委员会办公室、省外办和省公安厅三家联合在陕西宾馆召开涉外保密工作座谈会。会议中心议题是学习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涉外保密工作文件，讨论修改省保密办和省外办拟定的《关于涉外活动保密工作暂行规定》。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各地（市）保密办、外办和公安部门的负责人、涉外保密工作较多的临潼、乾县、华阴县有关方面负责人，省军区和省级机关有关委、办、厅、局负责外事保密工作的负责人，对外开放涉外活动较多的大学、科研和文博单位的工作人员共88人。会议期间省委书记白纪年接见了全体与会人员，省委副书记周雅光到会讲话。省外办主任陈兴亮、省保密办副主任刘力学、省公安厅副厅长艾绳章等作了专题发言。

同年12月27日，省外办召开工厂农村参观点负责人座谈会，中心议题研究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以来经济体制改革对陕西省工厂、农村带来的变

化,以及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38个单位和部门负责人参加了探讨会,与会单位有省重工厅、轻工厅、农牧厅、旅游局,西安、咸阳市外办;西北国棉五厂、西安高压电瓷厂、西安红旗机械厂、西安制药厂等20个工厂;礼泉县烽火村委会、袁家村接待站、乾县张家堡等10个农村开放点,鱼化寨、大明宫和长安县王莽京都友好等三个乡政府。

1987年11月,省委在长安县西北饭店召开全省对外宣传工作会议。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李沙铃在总结报告中强调,各涉外部门要坚持“对外业务与对外宣传并举”的方针,纠正和克服那种“只管对内,不管对外”,“只管业务、不管宣传”的现象,同时提出各对外开放参观单位,旅游、游览的地方以及宾馆、涉外商店等,是对外宣传的前沿阵地,又是对外宣传的“窗口”,要努力开创对外宣传工作的新局面。报告提出,在一年内配合文物、外事、旅游等部门先抓好秦俑馆、省博物馆等10个参观单位的建设与整顿,使之达到经得起看、问、拍摄和有一套班子、一条线路、一套宣传品、一套解说词、一套保密制度、一个文明环境的先进标准。在机场、火车站、主要涉外宾馆、饭店等外国人常去的场所,继续做好对外书刊的陈列赠送和销售工作。

同年12月10日,省广播电视厅、省外办联合以陕广厅办字〔1987〕5号文,向省级有关单位、各地市外办、广播电视局、各旅行社下发了《关于邀请国外广播电视机构来访、拍片事项承办程序的通知》。

1989年6月21日,省委以陕发〔1989〕21号文通知,省委决定恢复对外宣传工作领导小组,加强对外宣传工作。

1990年9月,省外办发出《关于加强我省外事工作集中统一领导和归口管理的实施办法》。

1991年2月23日,省政府办公厅以陕政办发〔1990〕35号文转发省外办《关于加强外国记者管理工作的意见的通知》,发至西安、宝鸡、咸阳、铜川市政府,各地区行政公署、省政府各工作部门,各直属机构。

同年7月6日,省委对外宣传工作领导小组召开省级主要涉外单位处以上干部大会,省委副书记兼省委对外宣传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牟玲生作了关于加强对外宣传工作的报告。强调指出对外宣传工作是党的一项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战略意义的工作,是中国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

#### 第四节 对外经济开发区域

对外经济开发区域，指对划出一定范围的投资环境较好的地方，享受优惠的投资政策，包括开放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济开放区、投资区、保护区、旅游度假区、农业专项开发区、重点工业卫生区等。

陕西地处内陆，相比沿海经济特区和以港口为枢纽的交通集疏网络，设施条件与环境较为单一，也比较封闭，对外交往合作较少，利用外资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50年代，在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援助下，建设了黄河、东方、庆安、红旗、华山、西安仪表厂等一批骨干企业。1960年由于中苏关系恶化，利用外资、接受外国经济援助中断了十多年。就是外贸出口，亦无自营权，主要通过外贸收购方式。1984年陕西、青海首届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洽谈会开始扭转被动局面。1988年第二届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洽谈会是一次推动。据当年年底统计，陕西外贸出口创汇已达3.81亿美元，10年增长了46.5倍。至1988年底陕西已累计签订各种利用外资项目233项，总投资16.9亿美元，外商投资企业56家，已成为经济发展崛起的力量。

到1991年，陕西已与天津、上海、连云港诸多东部口岸建立了稳定的涉外经济关系，在香港的销售网点也已形成。同时，陕西对外经济将通过集二线同俄罗斯的西伯利亚连接，通过中哈铁路阿拉山口段接轨后的欧亚大陆桥开辟西口岸。

省级对外经济开发区域，系指由省政府批准建立的各类经济开发区域，包括投资区、开放城市、经济开发区、农业专项开发区和重点工业卫星镇等5大类。

宝鸡（金台区、渭滨区）、咸阳（渭城区）、汉中（汉台区）、西安（阎良区）为推动“火炬”计划的实施，扶植高技术、新技术（以下简称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促进高新技术及其产品进入国际市场，省政府于1990年5月31日以陕政办发〔1990〕135号文，转发省科委《关于简化我省高技术、高新技术企业部分人员多次出国审批手续的意见》，为扭转1989年“六四”政治风波以来派遣出国团组急骤下降的局面，打破西方制裁，恢复扩大友好往来。1990年12月14—15日，由省政府办公厅主持，在西安召开了全省出国审批管理工作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省外办、省经贸委、省科委、省教委、省机电办五个外事归口管理部门，省委组织部等出国人员政审部门、批汇部

---

门、国家安全部门和部分超前试点企业具体负责办理出境审批的工作人员。中心是在实行计划管理的同时，不断扩大对外交往的广度和深度。

## 第七章 领 事

本章记述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根据中国政府与外国政府签署的领事协定，陕西与外国领事方面的情况。在此仅记载与领事有关的颁发护照、申办签证和对外国专家、留学生、实习生的管理以及在陕西省内发生的重要涉外事件。

### 第一节 护照、签证

#### 一、护照颁发与管理

护照从现代意义上来说，是一个主权国家发给本国公民的一种证明文书，本国公民用以出入国（境）或在国外旅行居住时，证明自己的身份和国籍。持有本国护照的公民享有本国的保护。

1956年11月4日，外交部通知，原由外交部颁发的公务护照及因公普通护照，自1957年1月起改由各省外事处颁发。

1956年11月14日国务院通知，从1957年1月1日起，外交部和各地外事处管理的中国公民因公出国工作和有关护照签发业务移交公安部和各地公安部门。根据外交部、公安部1957年11月26日关于交接中国公民因私事出国管理工作的通知要求，省人委指定有关部门筹办此项交接手续。

从1958年4月1日起，在陕西省的中国公民因私事申请出国，由市、县、公安部门受理审查后，报省公安厅审批颁发护照。由于陕西处于内陆，往来者多系社会主义国家的专家、留学生、实习生、和民间友好团体或个人，省上不经办签证之类的手续。出访团组自1951年至1965年，陕西派遣的10批300人次出国团组，除随中央组团出访的以外，由地方组团的均按干部管理权限经省人民政府（1955年1月改称省人委）、省委组织部审查，由主办单位报外交部签发公务护照。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正常工作秩序被打乱，地方上因公出国审查从严，限制繁多，加之地方对外活动减少，出国任务几乎停止，在一个时期内，因公出国护照的颁发权由外交部收回。

“文化大革命”后期，1975年国务院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条例》。按条例规定，省级地方外事办公室有权代外交部颁发因公普通护照。1976年6月，外交部曾对护照、签证签署人员作了若干规定，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外事办公室由主任或副主任签署护照和签证；由革委会办公室（办事组）签发护照的省、市则由处长、副处长签署签证。

1979年10月8日，外交部下达了《外交部关于授权各省、市、自治区外办颁发因公普通护照的通知》，规定各省、市、自治区外事办公室有权对各自派出的受雇于外国公司的工人、海员、对外承包工程的土建人员、留学生、研究生和进修生发给因公普通护照。陕西省自通知下达之日起，开始筹办这方面的准备工作。

1979年12月19日，外交部又决定扩大《申请出国护照签证事项表》的签署范围，各省自行决定授权省政府正、副秘书长或办公厅正、副主任签署申请表。

根据外交部1979年通知的签署范围，1980年，经省外办办理上报的护照签发人由1人（鲁曼）增加到6人（鲁曼、李继忠、白玉峰、黄叔宽、孙铭、魏明中）。共办理护照80人。

同年1月起，因公出国人员无论持外交、公务或因公普通护照，均免办出境签证，凭有效护照出入中国国境。持因私普通护照人员仍需按规定办理出入境签证，198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出入境管理法》颁发后，则不再办理入境签证。

同年4月16日，省政府发出通知，为了加强陕西省外事工作的统一管理，各地区、各部门组织或应友好国家邀请的出国访问、考察、讲学、留学计划，以及邀请外国人来陕西访问、参观、讲学、留学、进修的计划，实行归口管理，严格审批手续，各单位凡拟出国或邀请计划属于科技交流方面的，由各主管部门审查，送省科委综合平衡后，由省外办汇总报省政府和国家科委审批；其他出国和邀请计划，由各主管部门审查后，经省外办审核会签，报省政府审批。需经国务院审批的，由省人民政府申报。中央各部委下达的外事任务，由各主管部门与省外办，统一安排接待或派遣。

同年5月13日，国务院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签证条例》，废止了

1975年护照签证条例。省外事办公室按新条例规定，经外交部同意，省级政府负责人可以持外交护照。外交部授权省级外办颁发公务护照和因公普通护照。本省公民因私出国的护照，仍由公安部门办理发照。7月11日，省委办公厅关于出国人员审批权限问题又作了新的规定。

1982年，随着地方外事日趋活跃，陕西省派遣出国的各种代表团（组）共260人，颁发给出国人员护照226本。其中公务护照168本，因公普通护照58本。出访17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去日本162人，美国25人，比利时11人，香港地区9人，澳大利亚5人，英国5人，菲律宾4人，加拿大、巴基斯坦、伊拉克、南斯拉夫各3人，瑞士、联邦德国、法国、苏联、尼日利亚、欧洲共同体各1人。

1983年，外交部以领三字发〔83〕152号文，规定省属各单位参加中央各部委、直属机构统一组团人员的护照，均由地方外事办公室负责办理。同年4月8日，省委、省政府以陕发〔1983〕23号文件，批转颁发《陕西省对口外事工作管理暂行规定》、《陕西省因公出国管理暂行规定》、《陕西省地区行署和市、县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职责范围暂行规定》。进一步明确省外办是省人民政府外事工作的职能部门和省委的外事办事机构，是全省外事工作的归口管理部门。其基本任务是在省委、省政府和外交部的双重领导下，贯彻执行中央的外交路线和对外方针政策，督促、检查和协调全省的外事工作和涉外活动，处理本省的政治性涉外事件，并直接管理除对外经济贸易和对外科技交流合作之外的其他外事工作，从而使护照签证的工作量迅速增加。全年办理出国团组及人员共378人，颁发各类护照339本。在出国的团组中，持公务护照的276人，因公普通护照的63人，再次出国的39人。前往的国家和地区共26个，其中20人以上的有去日本155人，美国65人，香港地区27人，比利时22人。10人以上的有去联邦德国15人，英、法各13人，意大利12人。其他人数不等的还有朝鲜、喀麦隆、瑞士、澳大利亚、加拿大、菲律宾、泰国、瑞典、印度、巴基斯坦、苏联、罗马尼亚和孟加拉国。

1984年，陕西出国人员猛增，省外办全年为出国人员颁发各类护照1157本，出国团组总数为1310人，其中持公务护照的906人，因公普通护照的251人，再次出国的153人。前往的国家和地区共43个，其中人数比较多的有去日本464人，香港地区148人，伊拉克135人，美国130人，联邦德国59人，喀麦隆48人，菲律宾、泰国各44人，英国42人，阿尔及利



亚 25 人，孟加拉国 22 人。

同年 9 月 21 日，省委办公厅以陕办发〔1984〕40 号文《关于办理我省出国人员审查工作的补充通知》规定。凡未列入新修订的《中共陕西省委管理的干部职务名称表》的县处级正职和出国担任团组长的干部出国审查，按业务归口，由省经委、省科委、省高教局、省外办党组分别负责审批。

同年 11 月，向外交部备案的陕西省持有外交护照签发人员由原来的省外办魏明中、孙铭、何克敬、秦元恺，调整为陈兴亮、何克敬、秦元恺、刘步云，随后扩大到主管处的正副处长。

1985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以中发〔1985〕10 号文件颁发《关于派遣临时出国人员和邀请国外人员来华审批权限的规定》，1986 年省外办采取了“三宽一严”的办法，即对直接为国家创汇的劳务出国、推销外贸产品和培养人才的讲学、留学、进修的等出国项目，凡符合政策和规定的，尽力提供方便，给予优先安排，否则从严掌握，所以同 1985 年相比，1986 年减少 698 人次，下降率为 22%。出国用汇 225 万美元，比 1985 年的 280 万美元减少 75 万美元，下降率为 26%。全年出国团组总数为 1716 人，其中持公务护照 1378 人，因公普通护照 113 人，再次出国 225 人。前往的国家和地区共 32 个，其中超过百人的，有去日本 704 人，美国 218 人，香港地区 187 人，联邦德国 156 人。还有意大利、喀麦隆、英国、法国、丹麦、比利时，加拿大、匈牙利、奥地利、瑞典、伊拉克、苏丹、泰国、芬兰、孟加拉国、瑞士、民主德国、澳大利亚、新加坡、巴基斯坦、南斯拉夫、罗马尼亚、马里、菲律宾、朝鲜、斯里兰卡、苏联、新西兰。

1986 年，省委、省政府于 1 月 24 日以陕发〔1986〕7 号文件颁发《关于派遣临时出国人员以及邀请国外人员来陕审批权限和归口管理的规定》，在审批权限方面，陕西派遣临时出国和赴港澳地区人员以及邀请国外人员和港澳地区人员来陕事项（以下简称出国和邀请事项），都必须按归口管理程序，分别报请省委、省政府审批。其中重大的项目，经省委或省政府同意后再分别报请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国务院或中央有关部门审批。在归口管理方面，陕西的出国和邀请事项，按其业务内容和性质，分别由省外办、省外经贸厅和省科委归口管理，经综合平衡、统筹安排后报批。而对出国人员不断增加的新情况，省外办采取了“分散归口审查，集中签发”的原则，将填审报告的工作，分别交由出国人员较集中的省经贸委、省高教局（高教工委）、省科委和省外办等 4 个口。1988 年 7 月又将西安市所辖因公出国人员填照颁

发工作交由市外办办理。

1987年7月18日，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以陕办发〔1987〕25号文印发“关于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严格控制党政机关干部出国问题的若干规定》的紧急通知”。

1988年6月18日，省政府办公厅，以陕政办发〔1988〕119号文转发省高教局、省外办、省科委《关于加强单位公派出国留学人员工作的意见》。随着中国对外开放方针的贯彻执行和陕西省各项事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各部门、各高等院校通过自筹资金、利用国外的奖学金、贷学金和非亲友资助等方式，公派了不少出国留学人员。由于这种趋势还在继续发展，为加强这方面的管理工作，进一步提出单位公派出国留学“是指按部门、地区、单位（含院校，下同）人才培养计划，面向本部门、本地区、本单位招生、选拔、派出，执行部门、地区、单位经费开支规定的出国留学人员，包括个人事先征得本单位同意和支持，通过校（所）际、友好城市等各种渠道和形式取得各种奖学金、贷学金和非亲友资助等并纳入派出计划的留学人员，改为单位公派出国留学人员。”

1989年4月17日，由省政府副秘书长宋海源主持，省外办副主任韩国劲、省经贸委副主任孙仲乾、省科委副主任李云祥以及省高教局和省机电产品出口办公室、省政府办公厅机要处的有关人员参加，就简化外事出国审批手续，减少中转环节等有关问题，根据陕政发〔1988〕188号、陕发〔1986〕7号文件精神，进行了具体研究，并提出了出国团组应本着“少、小、精”的原则，同时要从环节上、时间上加快办理，为陕西改革开放服好务，最后形成了会议纪要。省政府办公厅于6月6日以陕政办发〔1989〕135号文印发了《关于简化我省外事出国人员审批手续的会议纪要》。

1990年12月14—15日，由省政府办公厅主持，在西安召开了全省出国审批管理工作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省外办、省经贸委、省科委、省教委、省机电办等五个外事归口管理部门，以及省委组织部出国人员政审处、省外汇管理局、省安全厅和超前试点企业，具体负责办理出国人员审批的工作人员。会议总结了我省出国审批管理工作的情况，就1989年“六四”政治风波以来派遣出国团组急剧下降和1990年恢复增长势头以及打破西方制裁，积极派遣政府代表团、友好访问团和经济、文化、科技、旅游等各种团组出访，恢复与日本、比利时、意大利、美国等国的友好往来等交流了经验，明确了存在的问题，研究了进一步加强这项工作的意见和措施。

表 3-7-1

1986—1991 年护照发放情况统计表

项目 & 人数	年 度					
	1986 年	1987 年	1988 年	1989 年	1990 年	1991 年
访问	193	248	438	67	67	252
科技	20	33	2	42	133	216
考察	557	689	918		218	
贸易	140	207	575	1149	1356	1167
劳务	677	498	396	298	679	310
学者讲学	106		135			
会议	58	140	196	81	184	241
留学进修		362		606	647	664
文化体育				186	377	209
其他	697	575	842	776	420	1580
合计	2448	2752	3879	3205	4101	4639

## 二、申办外国签证

自 1957 年起，外交部正式授权各省、直辖市外事部门，负责签发地方临时因公出国人员护照。1958 年 4 月，省人委外办成立后，设有领事侨务组。该组除负责管理外侨外，指定专人往返外交部办理护照签证。由于出国人员少，经办护照不多，护照管理归省外办秘书组保管。出国人员归国后，将所用护照交还省外办统一保管。作废护照的销毁、空白护照的定期上缴等，均按外交部规定执行，从未出现任何差错。这项工作一直持续到 1966 年，因“文化大革命”外事机构瘫痪为止。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由省革委会办事组外事组承担办理护照和保管事宜。

1979 年以后，随着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陕西省出国人员逐渐增多，护照管理工作也显得越来越重要。自 1979 年起，恢复仍由省外办颁发并保管地方出国人员护照。同年 3 月，陕西省依照外交部指示，规定因公出国的护照在回国后均交省外办保管。外交护照则通过机要渠道交外交部领事司护照处。

省外办为了加强对护照的管理，向出国任务较多的省直各单位印发了《省外事办公室办理护照签证工作程序》和《办理护照、签证须知》，通知有关单位，持照人回国后须将护照交省外办统一管理，以备再次出国使用，避免因分散保管不当而遗失。在省外办内部则设置专柜并指定专人保管护照。

对于不再出国人员的护照或签证页已用完的护照，也由持照人交省外办保管。从1983年起按外交部规定由地方外办保管的护照自行造册销毁。

在此后的几年中，为了加强护照管理，省外事办公室又陆续采取了一系列措施：1980年10月印发了《填写护照手册》；1983年省政府决定实行各业务归口部门出国审查权限办法；1984年省属各单位参加国家各部、委直属机构统一组团人员的护照，除少数由组团部门统办之外，大部分也由地方负责办理，使省外办的护照、签证工作量大增。为缩短办照时间，减少差错，省外办要求省级业务归口部门，指定专人办理这方面的工作。

从1983年起，省外办二处开始建立护照制照、审核、签发层层把关的一整套制度。1984年11月，按照外交部〔84〕部领三字第252号通知，对所保管的外交护照进行了清理，并报送外交部领事司注销。1985年省外办二处建立了护照签证岗位责任制及工作程序，使护照管理工作逐步走向正规。

1986年4月7日，外交部以领三函〔1986〕31号文“关于颁发护照范围的若干问题的通知”和同年9月11日，外交部以领大处函〔1986〕107号文通知，陕西省外事办公室被授权为“有权发通知签证函电和邀请函电”的单位。

## 第二节 专家与留学生、实习生工作

### 一、外国专家

新中国建国初期，陕西是重点建设地区之一。苏联援建中国的156个项目，在陕西就达26个。因此，当时来陕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专家较多。1950年到1959年，陕西共有41个单位聘请过苏联、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德国、匈牙利和波兰等5国的专家及工程技术人员978人。其中常驻专家404人，三个月至半年以上的短期专家574人。大部分分布在工厂，少数在高等院校工作。专家的聘用大多是按建设项目进度的需要进行的。在建厂初期聘请的多系顾问性专家，他们一般年龄大，人数少，职位和学位比较高，其中绝大部分是厂长、总工程师、总机械师、教授等，常常一个专家负责几个厂的基建工作。1953年进入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基建、安装、产品试制方面的专家较多，一般年龄较轻，多系工程技术人员和操作人员。

陕西地区聘用外国专家，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1951年至1955年为第一阶段。外国专家数量不多，苏联56人、捷克斯洛伐克26人、民主德国1人，他们时来时去，不甚固定。当时为使专家工程技术人员有一个较好的工作、生活、文化娱乐活动环境，还专门成立了西安专家招待委员会：主任：张锋伯，副主任：贺廷俊、郭一民（西安市委基建部），委员：郭羽才（西安市委办公厅）、罗明（二机部）、屈计君（一机部）、原斌（电管局）、樊子章（西北建筑工程局）、阎明（西安市公安局）、袁学凯（兰州军区空司），办事机构由交际处管理。1956年至1959年为第二阶段。随着援建项目的全面展开和建设事业的发展，专家逐渐增多，共有843人（苏联738人、民主德国88人、捷克斯洛伐克12人、匈牙利5人）。1956年全国专家招待工作会议后，交际处设立了专家工作科。1957年在省人委主持下，召开了专家招待工作会议，1958年上半年，省委成立了专家工作小组，并在7月召开省专家工作会议。随后，专家生活招待工作交由西安人民大厦负责。1959年，遵照中央关于在对外关系中切实纠正骄傲现象的指示，以及全国专家工作会议精神，召开了省专家工作会议。会议明确了对专家工作的10项要求及专家工作机构的7项任务。7月间，省委批转了省、市委外事小组《关于加强专家工作意见的报告》。根据省委决定，专家小组并入省、市委外事小组。此后，专家工作由外事小组具体领导。12月，根据中央“关于团结一切在我国的外国专家为党的总路线、大跃进服务”的指示，进一步开展和改进专家管理工作，在省、市委外事工作领导小组主持下，是年12月7—10日召开了陕西省外国专家工作经验交流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各聘用外国专家的工厂、学校、科研单位负责专家工作的科室领导和专干、部分主管专家工作的厂长。省、市委外事工作领导小组负责人冯直到会讲话。

应聘的专家、学者们以高度的国际主义精神，积极热情地参与指导陕西的工业建设和科教事业。在生产实践中，培养了新中国建立后在陕西的首批现代工厂管理人员和技术人才。据25个单位不完全统计：试制新产品364种，提建议25269条，培养技术干部2024人。248厂由工人中提拔的9名工程师，8名就是外国专家亲手培养的；172厂仅1959年就请外国专家讲课81次，听众达2575人次。

为了联络感情，增进友谊，各有关单位都努力安排好外国专家的业余生活，充分利用“元旦”、“五一”、国庆等节假日组织专家参加各种庆祝活动，同时还经常组织专家们观看电影、戏剧或参加舞会，尤其是利用中华民族传

统的元宵节给专家的孩子送灯笼，请专家吃元宵；端午节给专家送香包，请专家吃粽子；中秋节请专家到友协做客，吃月饼、赏月亮等。通过这些活动，既活跃和丰富了专家们的业余生活，又使他们了解中国的风土人情，加深彼此间的感情。另外还在“三八”妇女节，由妇联会、共青团出面举办座谈会、茶话会，给专家夫人赠纪念品，请她们作报告。“六一”国际儿童节时，则组织一些适合儿童特点的活动，或参观儿童福利事业，或与中国儿童联欢。在西安市辖区以外的各聘请专家单位与专家的友谊交往活动，主要是利用假日，组织野游、打猎、球赛、参观游览。交际处曾在1959年春节期间，组织在陕西帮助建设的苏联、民主德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的专家及其眷属95人，去宝鸡参观依山就势秦岭山脉的宝成铁路隧道工程，并在那里组织了爬山和打猎活动，受到专家的欢迎。每逢专家的生日或婚庆25年、50年之日，单位负责人去登门访问，表示祝贺，甚至请专家到家做客。尤其是各聘请专家单位特别注意在各自的国庆或解放日时给专家放假，部门负责人进行专访，赠送鲜花或糖果之类的礼品，表示祝贺或纪念。

1958年春节前夕，周恩来总理给在中国工作的外国专家寄发了贺年信。贺信全文是：“敬爱的朋友们：在1958年到来前夕，我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你们致以热烈的祝贺。我愿意借这个机会感谢你们一年来为中国人民所付出的辛勤劳动和中国建设事业所做出的有益贡献。祝你们新年快乐，身体健康，工作顺利！”1958年10月6日，省长赵寿山在民主德国成立9周年庆祝日，给34名在陕西工作的专家发送了祝贺信。

1960年3月，在兴平县召开了全省外国专家生活接待工作经验交流会。以西安仪表厂为重点，全面推动了吸引外国专家参加以“四化”为中心的技术革新、技术革命运动的工作。同年9月30日省委决定，在省外办设立专家工作处。1953年11月开业的西安人民大厦设专家工作科。

1960—1962年，在陕的外国专家共207人（其中：苏联130人、民主德国44人、捷克斯洛伐克19人、匈牙利11人、波兰3人）连同他们的家属共453人。

进入60年代初，中苏关系恶化，最后发展到苏方撤走专家、撕毁有关经济技术合作协议，使陕西辖区的一些建设项目停工、设计项目中止，苏联签约援建的26个项目几乎都面临重大困难。1960年6月，苏方突然通知原已同意继续应聘的国务院第一、第二机械工业部所属在陕西的118位苏联专家不再继续受聘，命令他们限期回国，并要他们将来华时所携带的资料全部

烧毁。7月底，陕西有关单位及苏联专家都接到了撤走的通知。当时在陕西工作的苏联专家共130人，连同家属共276人，分散在48个单位。突然接到撤走通知时，他们都不知所措，议论不一，情绪波动很大。出于对友谊的珍惜，各聘请专家单位还举行饯行、欢送会，赠送纪念品或组织短途旅行参观等活动为其送行。1960年8月下旬，最后一批苏联专家启程离开西安，在车站告别时，许多专家和家属与中方人员紧紧握手拥抱，热泪盈眶，依依惜别。

苏联在西安帮助工作的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撤走后，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的专家分别于1961年和1962年撤离陕西。

此后，中国通过民间渠道，开始聘用西欧、南美等国的专家。西安外国语学院从法、英、智利、联邦德国等国聘请了4位文教专家，一些工厂也开始聘请别的国家的经济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导致了全国性的大动乱，使陕西聘请外国专家工作又遭受严重的干扰和破坏。

进入70年代，中国对外交往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1970—1980年中国对外建交的国家由55个增加到124个。经济合作和文化交流取得了很大进展。陕西常驻外国专家、工程技术人员逐渐恢复并有所增加。1977年从澳大利亚、瑞士、法国、英国聘请来10名专家。1978年又从6个国家聘请了54批151人，其中文教专家21名。1979年经济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猛增到70批293人，文教专家30人（含家属10人）。1980年文教专家42人（含家属10人），经济专家229人。1981年文教专家25人，经济专家来自10个国家，人数增加到315人。同年3月30日—4月3日，在西安人民大厦召开外国经济专家工作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聘请外国专家的各个工厂、研究所、大专院校，以及省、地（市）、县有关部门的领导和负责外事工作的人员共77人。省外办副主任黄叔宽传达了全国外国经济专家工作座谈会精神，结合陕西外国经济专家工作实际作了题为《坚决贯彻国民经济调整方针，努力做好外国经济专家工作》的报告。会上明确指出，由省外办归口管理，主要任务是：督促检查有关方针、政策和规章制度的贯彻执行，负责协调有关部门解决外国专家工作和生活中的问题，组织专家工作经验交流；强调省级业务主管局，加强对所属企业、事业单位外国专家工作的领导，负责解决有关业务和工程技术方面的问题；进一步做好接待工作，加强对现场专家工作的管理，搞好合作共事关系，重合同，守信用，虚心向外国专家学习，努力

培养自己的建设人才。省政府以陕政发〔1981〕218号文，批转了省外办《关于外国经济专家工作座谈会情况的报告》。

1982年广泛开展对外科技、经济、文化交流，外国文教专家人数增加到115人；各类经济专家猛增到439批1226人（其中安装技师336人），分布在陕西省9所大专院校、44个工厂和科研单位。由于注意加强对外国专家工作的管理与指导，较好地发挥了他们的作用，咸阳彩色显像管厂偏转线圈车间在与日本专家川上合作中，尊重专家指导，关心他的生活，坚持友好合作，使川上深受感动，他带病坚持上班，并利用休息时间免费为工人上技术课160多小时，还主动为中方提供专利资料。在他的带动和影响下，其他专家也送给厂方大量设备、工具和辅材，价值3000多美元。在西安红旗机械厂工作的英国专家艾普里怀特对我友好，热心工作，艾普里怀患心肌梗塞病，经省人民医院和各大医院专家们的通力协作坚持抢救55分钟，终于使心脏恢复跳动，在专家中引起了震动，他们纷纷表示，愿为中英两国人民的友谊贡献力量。同年8月省外办在长安县召开了“外国专家工作座谈会”，参加这次座谈会的有32个单位50多位主管外国专家工作的负责人。会议中心内容：传达学习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对天津石油化纤厂《关于做好外国专家工作的总结报告》的按语和天津石油化纤厂的工作经验，结合陕西的外国专家工作实际交流了经验。

1983年来自17个国家的经济专家184人，在高等院校的文教专家175人。

1984年来自20个国家的经济专家156人，在校文教专家93人（其中教员29人、家属19人）。

1985年在陕的经济专家450人次，文教专家297人。他们分布在西安、咸阳、铜川、汉中、榆林等地的60多个企业、科研单位，24所院校，为陕西省的人才培养、提高教学质量、科研、企业技术和管理水平，加快引进项目的建设进度和科研步伐发挥了良好的作用。

1986年应邀来陕的各类外国专家、工程技术人员共1364人，其中文教专家754人，经济专家610人。在外国专家和留学生逐渐增加的情况下，其管理工作：一是加强政策指导；二是实行统一归口和分级管理；三是及时总结经验，交流情况，制订规划；四是发挥中心城市的辐射作用，注意加强横向联系；五是开展评选活动，调动专家、留学生的积极性，在生活上为专家、留学生提供方便，利用节假日组织专家参观游览等，丰富了专家的业余



活动。同年4至6月间，上海、北京一些留学生曾上街游行闹事，西安各个部门相互配合，重视思想疏导工作，未发生留学生闹事的情况。同年11月10日以陕西省为东道主在西安成立了西北五省区外国文教专家、留学生工作协作区。其宗旨是：促进西北地区外国专家和留学生工作的横向联系和协作。协作区每年举行一次工作联席会议，首届联席会议从新疆开始，然后由青海、宁夏、甘肃和陕西轮流主办。协作基本内容：总结交流聘请外国文教专家和接收外国留学生的工作经验；互通外国文教专家、留学生工作情况和人才信息；协助优先安排本协作区文教专家、学者、留学生讲学、实习、参观旅游事宜，并给予优惠。

1987年应聘经济专家890人，省属在校文教专家34人（其中专业教师8人），三资企业外方人员427人。以提高聘用专家效益为中心，转变观念，坚持两个放手，实行宏观管理。3月21日省外办协同省高教局在西安召开了“全省文教专家工作会议”，由省高教局局长张克忍传达了全国文教专家工作会议精神。接着省外办又在宝鸡召开了重点院校外专干部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有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西北农学院、西北大学、陕西师范大学、西安公路学院、西安外国语学院等，以及主管外事工作的主要负责人。为改进工作，提高效率，对聘用专家的审批权限简化了手续，将原来要经院校报文，省高教局与省外办会签上报省政府审批等繁琐层次，改为聘用单位直接报省高教局批准后，由省外办办理对国外发邀请函电。同时为活跃专家、留学生的生活，增进了解与友谊，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外国人唱中国歌曲”的活动，并于6月17—20日，组织100多名文教、经济专家赴汉中地区参观游览。同年又根据国务院办公厅批转《关于外专局、公安部对外国专家安全工作的报告的通知》（国办发〔1987〕67号），由省公安厅牵头，省外办、省高教局等部门参加，对全省外国专家的安全工作进行了全面检查。省公安厅和省外办还联合决定，对在外国专家安全工作中做出优异成绩的宝鸡稀有金属加工研究所等17个先进集体和苗林甫等45名先进个人予以表彰奖励。

1988年应聘经济专家783人，来自16个国家的文教专家112人，其中在省属高校的专家28人（专业教师8人），在陕三资企业外方人员328人。在坚持以提高专家聘用效益为中心，对全省重点引进项目（技术、设备、奖金等）和三资企业中专家的基本情况进行调查了解工作，并协助专家所在单位试行“目标管理”、“效益评估”工作。对外国留学生坚持了教育和疏导相

结合的原则。同年11月22—24日，省外办与省高教局共同召开了西北地区外国专家、留学生协作区第三届年会，省高教局局长张克忍作中心发言。

1989年“五一”节以前照常举行一年一度组织专家欢度国际性节日和中国节令性的习俗活动。3月8日省外办与省妇联在唐城宾馆联合举行中外妇女联欢会，驻陕外国专家妇女代表18人，她们来自美、英、法、日、西德、意大利、苏联、澳大利亚、新西兰、斯里兰卡和马达加斯加11个国家。

为扩大陕西对外影响，丰富专家的业余生活，省外办于4月30日组织在陕工作的美国、日本、比利时、加拿大、苏联、联邦德国、英国、挪威、苏丹、新加坡等11个国家、分布在18个企事业单位的外国文教、经济、技术工程专家68人，赴耀县参观唐代著名医学家孙思邈庙宇和药王山、宋代耀州瓷窑遗址。西北政法学院外国专家海迪说：“通过参观，使我对中国古老的文化、历史以及古建筑有了进一步的了解。”王林达说：“耀州之行让我了解了西北地区的风土人情，熟悉了省外办的工作人员，结识了新的朋友。”

同年五六月间，由于北京、西安等地部分学校的学生持续罢课、游行请愿事态的发生，在陕外国专家、留学生的工作和学习不同程度地受到影响。由于春夏之交这场政治风波的事态骤然变化，加之国外新闻媒体对华情况的种种报道，有关国驻华使馆、驻华办事机构及其国外亲属也纷纷来电话、发电传，询问在华安全情况，有的还建议他们取出银行存款，准备好食品等等。引起一些人的思想波动。陕西与比利时合资兴建的西安杨森公司，正在进行设备安装、调试，26名比方人员于5月21日撤离西安去香港。在宝鸡医药玻璃厂扩建项目正值高炉点火投料试车之际，24名美国康宁公司专家（其中包括联邦德国2人、英国1人和7名家属），按美方通知于6月初全部撤离。

省外办于6月6日召开部分聘有外国专家的企业和大专院校负责人情况通报会，据反映大部分外国人都能遵守中国的规定，没有介入动乱，并能坚持上班、上课，有的专家以师生关系给学生做工作不要绝食、游行等。同时也反映出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主要是：

据7个单位反映，已有72名专家提出离陕回国或去香港的要求。6月9日日本驻北京使馆来电话说：“在西安外国语学院学习的20名日本留学生要求回国”，经学院负责人出面作了对事态情况介绍之后，留学生表示放心，未离校回国。在西北大学留学的美、日、英、朝鲜等40多人中，除英国爱丁堡大学已撤离13名留学生以外，其他留学生未动。

由于部分学生的绝食，西北大学和西安外国语学院的外聘专家于6月5日开始自行聚会，还准备召集在西安各院校的专家开会。主要是以此来分析中国当前形势，研究他们下一步怎么办等问题。当我方转达有关规定，要求他们不要介入中方内部事务时，美国专家说：“已经是国际上的重大事件，已不是你们的内政了，美国总统布什都发表讲话，要求联合国进行干预。”也有的专家认为，这是人道主义问题，不是介入不介入的问题。省旅游学校聘请的意大利外语教师2人，5月18日参加了该校师生游行，中方虽向他们申明其校方规定，但他俩仍然坚持其活动。

在10个中外合资兴建的旅游饭店、宾馆的201名外方人员，已有13人撤离，47人即将撤走。钟楼饭店、神州假日酒店、唐华宾馆、金花饭店的外方人员保持平静态度。省外办主任张景文就动乱期间应注意事项强调指出：“应反复向外国专家和留学生以及‘三资’企业中的外方人员说明，只要他们遵守中国的法令，不介入或参与中方的内部事务，不上街拍照、摄像、不围观，他们的人身安全是有保障的。同时还通报了有关政策界限，对要求提前离华的经济技术专家要报主管部门批准，提前离华的文教专家，如聘期在7月结束的，可按正常离华对待，其他均按合同办理。坚持过细做好宣传工作稳定其情绪，不一定坚持挽留，要撤离的不勉强。”

学潮、动乱平息之后，省外办从活跃外国专家的文化生活，增进相互了解加深友谊出发，开展了如下活动：

6月13日晚由省外办副主任秦元恺主持举行6所院校17位文教专家招待宴会。专家们纷纷谈看法，叙友情。西安外国语学院日本教师关根谦说：“我的爸爸从日本打电话告诉我，让我一定不要回日本，他说这次的情况和‘文革’不一样，动乱是暂时的，很快就会过去。我们绝不能在朋友困难的时候离开朋友。”几位日本专家和年近七旬的美国专家纳特夫妇一起唱起了美国歌曲《我们绝不动摇》，苏联专家阿拉·尤里耶夫娜代表大家发了言。

6月15日，省外办邀请省经贸委、省贸促会等单位，为在陕西6个厂矿及合资企业工作的23位外国专家举行招待会，副主任秦元恺给专家们介绍了西安平稳的局势，一位加拿大朋友说：“这次发生在11亿人口中国的事件，如果让美国总统布什来处理，不一定会比邓小平做的好。”常驻430厂的专家罗伯特提出通往西安航空发动机厂的道路长期坎坷不平，望能尽快修复。

6月17日，省外办以陕外发〔1989〕112号文件《关于切实做好外国专

家和对口外事接待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区行署、市人民政府、省级各厅、局，各聘请单位，一要积极主动地做好离陕专家的思想工作。二对留陕的专家可安排相应领导去慰问、看望，解决好专家工作和生活中所遇到的困难。三对重新回到工作岗位的外国专家，予以热情接待，积极支持他们做好工作。同时对临时来访的外国专家代表团或个人，使他们高兴而来，满意而去。四要大力宣传中国局势和对外开放的政策。五要加强对专家、留学生的安全保卫工作。六要加强同各方面的工作联系。

6月20日，日本东芝公司部长高屋光吾、日棉公司铃木毅二位负责人到咸阳彩色显像管总厂，了解秩序恢复情况和确定日本曾于当月8日撤走的30名专家和技术人员返回工厂的事宜。在此期间客人提出要求拜会陕西省人民政府，并希望省政府能就日本专家来华后的安全问题出具书面保证，以便回日本后好动员专家和技术人员来华。21日下午副省长刘春茂会见了日本先遣组一行4人。省外办主任张景文、省政府副秘书长宋海源、省电子工业厅副厅长朱保马和咸阳彩管总厂厂长张文义、副厂长武英忠参加会见，高屋表示：“听了刘副省长的介绍，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中国对外开放的政策不会改变，中国现在的形势是稳定的，我们来华后看到的情况正像刘副省长讲的那样秩序正常。我们将很快回日本去，派专家来华，把彩管厂的项目建设好！”会见结束后，刘副省长设宴招待高屋先生一行。

7月11日，省政府在人民大厦碧翠厅举行三资企业外方人员座谈会。邀请了外国专家及三资企业外方负责人46人，其中加拿大3人，苏联6人，日本11人，瑞士3人，美国3人，英国2人，联邦德国、奥地利、新加坡各1人，香港地区15人；部分三资企业的中方总经理70余人。座谈会由副省长孙达人主持，首先听取外方人员的意见和建议，并由分管的副省长回答了有关问题。侯宗宾省长发表了重要讲话。参加座谈会的还有副省长徐山林、王双锡、刘春茂、潘蓓蕾，特邀顾问张斌，西安市市长袁正中、副市长赵毓华，还有省计委副主任刘陶生、省经委副主任郭教生、省外经贸委主任朱振义、省外办主任张景文、省公安厅副厅长张永辉、省侨办副主任方坚、省旅游局副局长王步唐、中国银行西安分行副行长史正信、省邮电局副局长刘法忍、省国外智力引进办主任陈祥林。同时新华社陕西分社、人民日报驻陕记者站、中央广播电台驻陕记者站、中国新闻社西安记者站、陕西日报、省广播电台、省电视台、西安晚报等均派记者进行采访。

9月26—27日，省外办邀请31个单位的外国文教、经济专家和三资、

合作企业外方代表 135 人，出席在西安电影制片厂举行的世界旅游日开幕式，观看“仿秦始皇登基大典”演出，还参加了西安艺术节的活动。

9 月 29 日省外办邀请在西安、咸阳的外国专家，合资、合作企业的外方技术、管理人员及合资饭店外方代表 135 人，出席省政府在人民大厦举行的国庆招待会。并选派在与中方合作共事中能认真传授技术和经验，出色完成科研项目的西安外国语学院任教的新西兰专家司棣华和在西安杨森制药有限公司工作的比利时专家豪斯顿，代表在陕工作的近 200 名外国专家的优秀人员，应邀赴北京参加国庆 40 周年观礼。

1990 年应聘在陕西工作的外国专家 1107 人，分布在西安、宝鸡、延安和汉中地区，其中经济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 1082 人，文教专家 25 人。

省外办为消除 1989 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的影响，增进友谊，请省级领导出面，重点鼓励投资者的积极性和组织专家参观活动。中芬合资企业西安维德造纸机械有限公司的芬兰总经理爱丝哥·高阔宁，在春节期间要求拜访侯宗宾省长，1 月 26 日（农历腊月三十）下午 5 时，侯宗宾省长邀请高阔宁先生到他家里做客，侯宗宾省长感谢他对中国人民节日的祝贺，高阔宁对陕西省提供良好的投资环境表示感谢。省外办于 4 月 30 日—5 月 2 日，组织驻陕外国专家赴革命圣地延安和铜川市参观访问。参加这次参观访问的 18 所大专院校、5 个厂矿企业的 55 名外国专家，他们来自美、英、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联邦德国、日本等 8 个国家。专家们不顾风雪，饶有兴趣地参观了黄帝陵、延安革命旧址，观看了安塞腰鼓表演和延安歌舞团的演出，游览了万花山风景区，考察了铜川耀州窑遗址。

1991 年应聘外国专家 1272 人，其中经济专家 1107 人，文教专家 165 人。在围绕总结“七五”期间聘用外国文教专家的成果与经验，和对文教专家实行“目标管理，效益评估”工作的经验，组织力量进行调查研究。同时为配合榆林地区对外开放的需要，于 6 月 25—28 日组织部分驻陕的美、日、英、德、苏、澳大利亚等国的 25 名专家乘飞机赴榆林参观游览。他们在距西安 680 多公里以外黄土高原地区的榆林、米脂等县参观，沿途观看了治沙防护林带，治理黄土高原水土流失试点工程，走家串户访问居民生活情景和所居住的四合院建筑，以及建在高山脊梁上宏伟壮观的古庙宇、李自成行宫、天然书法宝库红石峡及古长城沙漠遗址、观看地方文艺演出等。专家们普遍反映对城市以外边远地区的风土民情、地方工业、农田建设、文化生活等方面有了较广泛的了解。

9月30日，省外办在西安古都大酒店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2周年茶话会。茶话会由省外办主任张开琰主持，副省长郑斯林代表省政府向远道而来为陕西的经济、文化建设做出贡献的各位外国专家，表示衷心地感谢。并对不少外国专家为中国南方部分省市遭受特大洪涝灾害的理解、同情和支持，主动捐赠钱物深表谢意。出席茶话会的外宾有：来自西安地区26所大专院校114位外国文教专家，16个厂矿和宾馆的45位外国经济专家和中方总经理。出席茶话会的还有：省政府副秘书长孙武学、省外经委主任朱振义、省教委副主任戴居仁、省旅游局副局长张慎行、西安市外办主任邓友民，以及省市公安、民航、铁路、省智力引进办等部门的负责人。

12月18—20日，省外办在西安首次举办了“陕西省外国经济专家工作管理干部培训班”，参加单位42个，人员53名，成员来自四个方面：一是即将展开的“八五”重点引进项目，以及正在执行和部分已经执行完毕的大型引进项目；二是重点引进项目的业务主管厅局；三是部分重点三资企业；四是有关的地市外办。培训班传达了国家外专局10月份召开的北方片研讨会精神，结合陕西外国经济专家管理工作情况，作了《就进一步加强经济专家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和归口管理，提高科技管理水平》的工作报告。

另外，利用元旦佳节，活跃在陕外国专家、外方人员和留学生的文化生活。12月28日晚，省外办在人民大厦中餐厅举办了迎新年游艺晚会，出席晚会的外国专家和留学生400多人，省外办主任张开琰致词后，进行钓鱼、投篮、打锣、套圈、吹蜡烛、顶气球等友谊赛，中外人士普遍反映这是一次欢歌笑语迎新年的热闹会。

## 二、外国留学生、实习生

60年代以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空前高涨，许多国家摆脱殖民统治，取得了独立。为了支持亚、非、拉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中国政府决定大批接收这些国家的留学生、实习生，陕西省接待外国留学生的工作是1959年开始的，当年来自蒙古人民共和国4名女留学生在西安交大纺织系学习。1960年来陕外国留学生37人，均来自越南民主共和国，主要是学习医疗、公路、装甲和工程兵种，全部集中在西安地区。1963年到1967年，越南、朝鲜、马里、阿尔及利亚、巴基斯坦等国在陕的实习生、研究生、进修生共402名，分布在17个工厂和9所大专院校。

1967年5月11日，为做好外国实习生、研究生和进修生的生活待遇工

作，省支左委员会召开了由接收留学生的30个单位负责人参加的工作会议，讨论确定解决办法。

1968年根据协议，陕西省为越南培养技术人员41名（男37，女4）、实习生209名。他们到达西安车站时，受到省委会办事组外事组和有关工厂负责人及职工的欢迎。

1969年，在西北金属结构厂和西安铁路信号厂的越南实习生57名，厂里除派专人作指导之外，省外事组经常去人了解他们的生产实习和生活情况，并安排他们参加陕西省暨西安市举行的国庆20周年观礼和焰火晚会。实习生也常常在节假日拜访厂革委会负责人，去老师傅家访问，彼此联谊活动频繁。

1971年，越南65名实习生（技术副厂长1人、技术副科长1人、技术人员24人、工人32人、翻译7人）来陕西408厂实习。在实习生来到前，厂方派专干、医生、翻译前去郑州迎接。实习生到达西安车站，受到省国防工办、省外办、厂革委会和职工代表的欢迎，当进驻实习工厂时，除千余职工夹道欢迎外，还召开了欢迎大会。实习生在实习期间，省、市革委会负责人会见并设宴招待，同时还陪同观看文艺晚会，并组织他们去农村参观等。越南朋友激动地称这是“友谊的花朵”。1974年至1976年，在陕西的越南留学生和实习生人数有所减少。

1977年以来，陕西接待外国留学生、实习生的工作较前有了很大的进展。一方面，向陕西选派留学生和实习生的国家越来越多，不仅来自亚、非、拉等第三世界国家，还有来自美、日、英、联邦德国等数十个国家。1977—1991年的15年间共计接纳4436名，其中留学生2348名，自费生1265名，短期培训生823名。

鉴于留学生、实习生的工作主要由省高教局分管，在此仅就1977年至1991年的15年间在陕各国留学生、实习生列表如下：

### 第三节 涉外事件

#### 一、日本学生垦美穗子坠楼死亡

日中学生友好会第二次访华团团员垦美穗子（女，22岁，日本兵库县西官市人，京都府立大学文学三年级学生），1971年8月23日晚10时随访

表 3-7-2

1977—1991 年在陕外国留学生人数统计表

项目 \ 年代	1977	1978	1979	1980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长期	留学生 24		留学生 27					留学生 177	留学生 305	留学生 338	留学生 324	留学生 477	留学生 276	留学生 220
中期	实习生 133	实习生 30	自费生 50	实习生 109	实习生 174	实习生 132	实习生 164	自费生 50	自费生 19	自费生 39	自费生 31	自费生 37	自费生 45	自费生 77	自费生 125
短期					30	96	105	130	308	154					

华团抵西安，住人民大厦后楼 219 房间。8 月 24 日上午 8 时，访华团乘飞机去延安参观访问，垦美穗子因病由访华团确定留西安。从上午 8 时半至晚 8 时半，医生、陪同、翻译、服务员先后 8 次去房间探望、送饭和请她去医院诊治，并邀请看杂技等。垦美穗子自感身体好些了，要求次日安排参观，晚上早点休息。25 日凌晨 2 时 15 分，大厦后楼地下室工作人员出来上厕所时，发现垦美穗子尸体俯卧在后楼地下室东门外南侧散水面上。事发后，省、市领导李建平、黄传龙等立即赶到现场，组织勘察，并向外宾和她接触过的中方有关人员详细调查，没有发现任何暴力致死的迹象。通过验血，也没有发现中毒现象。据此断定垦美穗子系由四楼顶部平台上自行坠落身亡。25 日早晨，中方即电告正在延安访问的日方访华团负责人速回西安处理。访华团团长大原照久、副团长手岛尤一、日中和平观光公司职员三俣和忠司，在旅游局全陪邹荣锦、翻译林洪滨、医生吴浪洪陪同下，于当天上午 11 时返回西安。经向日方介绍垦美穗子死亡情况，勘察现场，清点遗物，他们一致认为垦美确系由四楼平台自行坠落死亡，并同意将遗体送医院冷藏。对处理后事他们提出：1. 向全团介绍真相，做好思想工作，正确对待；2. 尽快通知家属，让其父亲来华处理后事。省外办及时向外交部、公安部和国家旅游局作了汇报。2 月 25 日晚，正在北京开会的省革委会副主任谷凤鸣奉周恩来总理指示，由北京乘专机回到西安对此案进行处理。2 月 26 日，公安部于桑副部长来西安检查指导工作，调查了死亡原因。2 月 26 日，访华团全部



返回西安，听了介绍，勘察了现场。2月27日上午，全团又去医院察看了遗体，开了追悼会。下午全团座谈，一致认为中方介绍的情况与勘察一致，垦美穗子确系自行坠落死亡，对中方的妥善处理表示感谢。当晚全团乘火车离西安去北京。2月30日上午，垦美穗子的父亲垦信行及日中学生友好会长池田诚由广州乘专机到达西安。下午省外办向垦信行等介绍了垦美穗子死亡情况，看了爱克斯光片、照片和事发现场，检查并领走了遗物，然后去医院瞻仰了遗体。在现场观察时，垦信行曾对其女儿死亡前的思想表现进行了询问，经过我中方有关人员和访华团负责人介绍，最后表示相信中国方面对他女儿自行坠落死亡的结论。2月31日上午，按死者家属要求，向遗体告别后，对遗体进行火化，带走了骨灰，下午乘专机离西安去北京。在中央直接领导下，经过全体工作人员一周的努力工作，妥善处理了后事，死者家属对中方的处理表示满意，垦信行一再表示歉意，并感谢说：“女儿死了是小事，是个人的人事，日中友好是大事，决不因此而影响日中友好。”并表示如果有人利用这件事进行挑衅，他将挺身而出说明真相。

## 二、澳籍专家苏珊·戴伊遇刺

澳大利亚女文教专家苏珊·戴伊 1973 年来西安外国语学院执教英语。1977 年 2 月 18 日下午 6 时 45 分，苏珊正在校北门外和英语系二年级一女学生王某边用英语会话边散步时，被身后来的姚建朴（该院职工子弟）用斧头砍伤。王、苏两人头部遭受重伤，晕倒在地，姚犯乘机逃窜。路遇学院职工发现，及时送往院卫生所包扎，然后送省医院进行抢救手术。在抢救过程中，省外办主任鲁曼等一直守候在手术台旁。经过抢救，苏、王二人脱险。当晚，省、市公安部门负责人张之轩、辛步亮亲自指挥破案，国务院外专局局长糜镛等三人专程来西安指导工作。2月21日此案侦破，依法判处凶手姚建朴死刑。

## 三、日本东海旅行社团组遭遇车祸

1984 年 6 月 5 日，日本东海旅行社 30 团一行 15 人，乘省旅游汽车公司大轿车去乾陵参观，在返回途中，当车辆行至礼泉县城东路段时，与一货车迎面碰撞，发生车祸，司机当场死亡，外宾多人受伤，随身携带物品被烧毁。事故发生后，省公安厅、省外办、省旅游局和咸阳市政府、市公安局、市外办负责人立即赶到现场，及时送受伤客人到医院检查治疗，有关方面负

责人还到医院对受伤者进行慰问，损失物品由省旅游汽车公司进行了赔偿。伤愈后，客人愉快地返回日本。

#### 四、“马尾巴事故”

1985年9月中旬，日本友好议员联盟干事长林义郎一行在西安文宝斋购买了一匹唐三彩马（复制工艺品），准备送给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当时文宝斋答应在一两个月内将货物发运到日本，但拖延至12月间才运到，开箱后发现竟然没有马尾巴。几经联系直至收到马尾巴并修理安装好，时过半年有余，林义郎对此提出了直言批评。

1986年4月22日下午，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王兆国给陕西省省长李庆伟打电话，就西安文宝斋出售唐三彩马漏装马尾巴一事（以下简称“马尾巴事故”），传达了总书记胡耀邦对整顿行业作风的重要指示。李庆伟接电话后，随即批示：首先给林义郎写信表示歉意，并赠送一匹唐三彩马；然后召集全省所有涉外单位进行一次检查，有类似问题的都要立即纠正；有关单位还应该写出检查，以挽回影响。副省长白纪年看了电话记录稿后，又补充批示：首先弄清全部情况；然后可以省政府办公厅的名义，召开一次涉外服务单位的会议，讨论制订一些改进工作的办法，在报纸上公开发表。省委常委作了专题讨论。省委、省政府决定从行业整顿入手，坚决纠正行业不正之风。使全省的涉外服务工作在年内有较大改进。

4月25日《陕西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摘发了日本友人林义郎的批评意见，全文刊登了西安文宝斋的检讨，并就“马尾巴事故”，配发了评论文章。

4月26日，以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陕西分会的名义，给林义郎致电，接受并感谢他对西安服务行业直言不讳的批评。

4月26—28日，省政府办公厅根据省委、省政府负责同志的意见，会同省外办、省旅游局召开了全省整顿改进涉外服务工作会议。按照省委、省政府对全省整顿改进涉外服务工作的部署，会后省外办、省旅游局会同省级有关部门，对全省涉外服务单位的工作进行了全面检查，并决定在5月份开展全省旅游涉外服务系统优质服务月活动。

#### 五、美国纽约时报驻京记者进入非开放地区

1986年6月29日—7月4日，英国籍美国纽约时报驻京记者伯恩斯、美

国籍以访问学者身份来华的麦克纳利，通过清华大学外聘美国教师达西的引见，认识了1981至1985年10月曾在美国自费留学的张某，于是请张某做翻译，外出旅行，同时商定从北京出发在太原会面后骑摩托车旅行。6月23日麦克纳利骑摩托车从北京到太原，6月29日3人会面后即同乘这辆三轮摩托车进入陕西非开放地区的吴堡县，6月30日到延安，7月1日抵黄陵，7月2日到达西安，7月3日下午6时离开西安进入秦岭山区，当晚在宁陕县一山顶上露宿。7月4日下午途经石泉县时被县公安人员在城关附近的公路上发现，即派车追查，尚未发现踪影，便用电话同西乡、镇巴县公安人员联系共同堵截，终于7月5日凌晨3时在镇巴县邮局门前发现伯恩斯等3人，即行阻留。

经查，伯恩斯和麦克纳利除持护照以外未携带外国人旅行证，从陕北到陕南穿越12个非开放县、市，并在沿途拍摄11个胶卷363张，经我有关部门鉴定，其中有58张照片反映陕北、陕南地形地貌，有军事参考价值。

伯恩斯和麦克纳利未经批准进入中国非开放地区，严重地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第17条和第21条。省公安厅外管部门责令麦克纳利和伯恩斯写了旅行经过和违法旅行检查，留下途中拍摄的胶卷，根据中国外交部的指示，责令伯恩斯等3人于7月7日凌晨从汉中乘火车到西安，当日下午乘班机返回北京听候处理。经对其所拍照片进行鉴定，伯恩斯和麦克纳利等人此行纯属情报活动，伯恩斯被中国国家安全部门于7月21日驱逐出境，麦克纳利被列为不准入境人员。

## 六、比利时籍杜山·弗朗索瓦违反签证规定

1988年2月14日，杜山·弗朗索瓦持当年2月8日中国驻比利时大使馆领事部签发的第1060号入境签证，乘香港至西安航班到达西安后，未持任何接待单位函件，通过私人关系（女留学生）住进西北大学留学生宿舍，并对该校外事处谎称，他是应公安机关邀请来给西安警察讲授散打课程的，但外事处从未见过公安机关来学校联系，故对其身份发生怀疑，于3月3日将其逐出西北大学留学生宿舍，但杜山又住进西北工业大学宾馆309号房间。3月22日，杜山向西工大谎报当日下午他出去参观时，放在309号房间约900美元被盗，市公安局外管处同校外事处会同公安碑林分局抽调20名干警昼夜侦破，通过勘验现场和调查取证，证实杜山所称丢失美元案纯系谎报。3月24日，杜山承认了他报案的错误。3月25日又搬至陕西体育馆招待所，

在此期间，杜山经常出入西安钟楼饭店和西安外国语学院等单位。

1988年6月7日，杜山签证到期，本人不但不到市公安局外管部门申办签证延期手续，当市公安局外管部门6月11日传唤他时，杜山态度蛮横，拒绝交验证件，西安市公安局外管部门依法对其进行罚款，并令其10日内离境，杜山于6月18日下午6时不但不交罚金，反而无理取闹，还指着外管警官说：“你小心着。”

杜山在西安期间，违反住宿登记规定，违法居留175天；违反中国签证规定，拒不主动办理延期手续，拒不接受处罚；谎报假案，严重地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第5条和第17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19条第6款。鉴于杜山一直表现不好，又拒不交纳罚金，西安市公安局故依法对其行政拘留7天，于9月5日将其遣送出境。

### 七、美国技工凯普海末在住地悬挂美国国旗违反中国规定

美国康宁公司技工凯普海末，于1988年4月22日来陕西咸阳彩色显像管厂安装调试设备，住彩虹宾馆605室，7月4日在住室窗外用木杆悬挂起美国国旗（旗长3市尺，宽2市尺），时达50天，每逢下雨时收回，雨停后挂出。8月23日该厂公安处就凯普海末在住室窗外悬挂美国国旗一事向市公安局作了汇报，市局即派干警到现场拍照取证，并和市外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特权与豁免条例》第3条的规定同凯普海末进行谈话，指出在住室窗外悬挂美国国旗是违反中国有关规定，损害中国主权的行为，令其摘下旗帜，并写出检查，具结悔过，保证以后不再重犯。凯普海末当即摘下旗，承认错误并写了检查，表示今后一定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规定。

### 八、日本SCT—0314“三国之旅”团组车祸

中国陕西民间国际旅行社组织接待的日本SCT—0314“三国之旅”旅游团一行17人（均系日本圣经女子大学学生），于1989年3月16日乘坐一辆丰田牌中型轿车由成都来陕西途中，于当日18时20分在川陕公路298公里处翻入15米深的崖下，15位日本客人受伤。其中3人重伤，11人轻伤，1人在抢救中不幸死亡。

事故发生后，省政府立即派省政府秘书长昌志宏带领省外办、省公安厅、省旅游局的有关人员和医疗专家小组赶赴现场组织抢救，并用直升飞机

将伤员运抵西安送省人民医院治疗。日本驻华使馆闻讯后亦先后派参赞等多人和死伤者亲属先后来到西安。副省长孙达人亲自组织有关部门进行抢救和善后事宜的处理工作，并专门到医院看望了伤员，进行慰问。抢救伤员的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为了及时让中外记者了解事故真相，省外办在人民大厦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了情况，回答了记者的提问。对此，日本驻华使馆和死者亲属一再向省政府和有关方面表示感谢。

### 九、日本本田昭四教授死亡

陕西省土木建筑学会和西安冶金建筑学院，为了对陕西的传统民居的现状和利用改造途径，以及城市与农村交叉地带的规划建设等问题，进行深入实际考察并开展学术交流与研究，于1989年4月26日联合邀请以日本九州产业大学教授、日本建筑学会农村计划委员会委员长青木正夫为团长的7所大学、3个研究所的15位专家教授，同陕西省土木建筑学会、西安冶金建筑学院以及西安、渭南、韩城市建设局的有关专家、学者15人，中日双方组成30人调查团，对西安市城郊民居及关中东部韩城一带进行第二次联合调查。5月1日同赴韩城市周围农村进行调查，5月5日晚7时联合调查团的日方团长长青木正夫教授为了对渭南地区、韩城市人民政府的领导和有关部门就1987年10月间的专题考察与这次联合调查的支持帮助表示感谢，在韩城市宾馆举行答谢宴会。席间彼此激情满怀，既喝酒、又唱歌，表达了对这次调查的满意。调查团日方团员本田昭四教授（西日本工业大学）和大家一样的高歌畅饮，9时许同桌见本田已有醉意，就送他回房间休息，翌日清晨7时15分同室的河野泰治教授（久留米工业大学）一起床发现本田昭四教授情况异常，当即报告双方团长和市上有关领导。经韩城市人民医院内科主治医师徐养民、卜忍党和副主任医师史志华等大夫到现场接诊检查，诊断：尸僵已形成。5月7日经省公安厅、渭南地区公安处、韩城市公安局现场检查，对本田昭四教授（男，生于1943年12月25日）的尸体检验作出如下结论：一是根据现场情况，穿着完好无破损，尸体外表无任何创伤痕迹，未发现骨折征象，可以排除外力所致机械性损伤死亡。二是根据尸体现象并参考市医院、韩城矿务局中心医院医师检查时的尸斑改变情况，分析其死亡时间约在1989年5月5日23时至5月6日2时。

双方分别进行善后处理工作。省外办派人赴韩城和有关单位联合处理此事。而后，西安冶金建筑学院院长赵鸿佐和省外办一起向省政府分管外事的

副省长孙达人报告善后处理情况。

本田正代于5月8日下午15时乘飞机抵达西安。应日方的要求成立了本田昭四治丧委员会。丧事委员会由日方代表团团长青木正夫、菊池重照教授（西日本工业大学建筑学科主任）、佐藤正彦（日方代表团副团长）和岩野副所长，中方陕西省土木建筑学会理事长王继善、李峰荫、张光（西安冶金建筑学院外事处处长）、李林涛（西安冶金建筑学院建筑系主任）组成。5月于9日上午11时本田正代（高中教师）和本田阳彦母子去三兆火葬场向本田昭四遗体告别。12时30分，举行追悼大会。中日联合调查团的全体人员、省外办对口管理处、高教局外事处、省科协国际部、西安市城建协会、韩城市城建局的有关人员约40人参加了追悼会。

应本田昭四家属的要求，他们于5月10日去韩城市看了本田昭四住过的地方。5月12日早6时30分青木正夫团长和本田正代一行离开西安乘航班经北京回国。

## 第八章 经济、社会领域的对外交往

从新中国成立到 1978 年改革开放,陕西省对外交往主要围绕接待中央各有关部门的邀请外宾进行的,多数集中在政治、文化等领域。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深入发展,陕西与国外合作的领域不断扩大,渠道不断增多,交往范围不断拓展,特别是通过友好城市和民间友好组织,使陕西省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对外交往,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

### 第一节 经济交往

#### 一、工业

##### (一) 地质矿产

陕西省地质系统涉外交往始于清同治九年(1870),德国李希霍芬调查秦岭地质,此后在清光绪十九年(1893),俄国奥勃鲁契夫调查陕北和秦岭地质。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美国维理士等调查秦岭巴山地质。民国时期未查到有涉外交往。

1951年1月18日,中国地质学会西安分会成立,1959年更名为陕西省地质学会。

1953年1月,地质部西北地质局成立,此后民间与政府间的交往有所开展。

##### 1. 业务考察与技术交流

1978年5月29日,加拿大铁矿地质考察组来陕考察。

1981年4月4日,尼日利亚阿塔努部长率领的访华团在西安、临潼、乾县参观考察早原地区地下水勘探与开发利用情况。

1983年5月16日,美国地质调查局局长佩克率美国地质代表团来陕西地矿局考察访问,双方就技术合作项目进行了洽谈。

## 2. 技术合作与开发

1956年3月18日，中苏地质技术合作队之一——中南地质局437队，后更名为秦岭区域地质测量队（陕西省地矿局区域地质调查队前身）在河南郑州成立，按国际地形图分幅系统开展秦岭地区1:20万区域地质调查。7月13日，437队在河南卢氏杜关执行航空地质测量中飞机失事，工程师钱仲美、苏联专家切尔明基诺夫及机组人员以身殉职。

1958年1—5月，根据中苏技术合作协定，地质部专家组贝卜奇金、斯拉斯杜辛斯基、H·赫鲁晓夫、马丁诺夫等苏联专家，先后在陕西华县金堆城、黄龙铺钼矿区、山阳银花钒矿区及澄城、宁强等地指导地质勘察工作。

1983年4月1日，根据地矿部与日本国石油公司签订的《关于在中国鄂尔多斯盆地北部合作勘探石油、天然气协议书》的规定，中日石油合作队开始野外地震、地质勘查，至1984年10月完成地震剖面2500公里。

1983年9月30日，由中国地质科学院、陕西省地矿局与法国国际研究中心承担的中法技术合作项目“中国东秦岭山脉带变形特征构造演化及对比研究”野外考察研究组一行21人，前往商洛地区工作，10月4日下午一时许突遭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洪水的袭击，整个工作地段笼罩在一片雨幕之中，不多时山洪暴发，公路塌方，河水猛涨，中法专家乘坐的几辆汽车行驶商县、山阳县境内，前进不得，后退无路，在这危急之中，由商县县长周林华和副县长李松杉带领营救组分两路营救人员与洪水搏斗七八个小时，才使考察组全部脱离危险地带。10月10日山阳县政府设宴招待考察组，法国考察团团长——在国际上久负盛名的马托耶教授感慨地说：“我们能死里逃生，是山阳人民救了我们，我们将永远感谢你们。从前，我只是从报刊杂志上了解中国，这次我们真正亲身感到中国人民的勤劳、勇敢、伟大。我到过许多国家和地区，而像中国人民这样，在自己受到严重灾害的情况下，却冒着生命危险来营救别人并不多见，你们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回国后，我要向我的学生和同事，向法国人民讲中国人民的伟大。”1984年4月，省政府与地矿部联合召开表彰大会，对营救考察组的有功单位和人员进行了表彰奖励。

1985年4月1日，陕西省地矿局与省乡镇企业局联合举办“陕西省地质矿产开发咨询服务展览洽谈会”，国内6省（区）170多个单位及港商、外商共320人出席，成交、签订矿产开发、矿产品加工合同70多项，吸收社会资金450万元。

1986年4月15日，由地矿部第三石油普查大队6011井队实施钻探，并



深 3510 米，于下二叠统获日产 20 万立方天然气和 0.379 万凝析油，1988 年 12 月中日双方举行了最终勘查成果交换仪式。

### 3. 援外

1974 年 2 月，陕西省地质局援助赞比亚打井供水专家组开始执行援赞协定，至 1975 年 5 月为赞方打井 31 眼，总出水量每秒为 104 公升。

### (二) 冶金

陕西冶金系统的涉外活动，在 70 年代以前开展很少。1978 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开始了较多的涉外工作。1978 年 9 月，省冶金局成立外事接待领导小组，由 7 人组成，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胡林任组长，党组成员刘健任副组长，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工作人员 7 名。1980 年 5 月成立了外事外贸处。经中国冶金进出口公司商请陕西省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同意，1987 年 11 月中国冶金进出口公司陕西分公司成立，同年 12 月，省冶金厅颁发了《陕西省冶金系统外事工作管理暂行规定》和《陕西省冶金系统出国工作暂行管理规定》。

应冶金部等国内单位邀请来华访问、工作的外国客人，多数都要专程到西安参观游览，有的还多次来陕。

1979—1988 年的 10 年间，主要交往活动是：

#### 1. 接待来访

21 个国家和地区的 264 批 813 人次，其中：美国共 77 批 259 人，内有科技交流 17 批 97 人，经济贸易 20 批 46 人，安装调试设备 11 批 19 人，参观旅游 29 批 97 人；联邦德国共 71 批 161 人，内有科技交流 14 批 24 人，经济贸易 23 批 53 人，安装调试设备 18 批 24 人，参观旅游 16 批 60 人；日本共 61 批 249 人，内有科技交流 23 批 80 人，经济贸易 12 批 53 人，安装调试设备 9 批 11 人，参观游览 17 批 105 人；瑞典共 9 批 18 人，内有科技交流 1 人，经济贸易 2 批 3 人，参观旅游 6 批 14 人；法国共 8 批 32 人，内有科技交流 3 批 11 人，经济贸易 2 批 10 人，参观游览 3 批 11 人；澳大利亚共 6 批 18 人，内有科技交流 1 批 6 人，经济贸易 1 批 2 人、参观游览 4 批 10 人；英国共 6 批 11 人，内有科技交流 2 人，安装调试设备 2 批 5 人，参观游览 3 批 4 人；奥地利共 4 批 9 人，内有科技交流 2 批 3 人，经济贸易 2 批 6 人；加拿大共 3 批 9 人，内有科技交流 5 人，参观游览 2 批 4 人；匈牙利共 3 批 3 人，主要是参观游览；波兰共 2 批 6 人，主要是科技交流；卢森堡 2 批 5 人，主要是经济贸易；朝鲜 2 批 5 人，主要是科技交流；荷兰共 2 批 4 人，

内有科技交流 3 人，安装调试设备 1 人；香港地区共 2 批 2 人，安装调试设备 1 人，参观游览 1 人；马来西亚 1 批 9 人、印度 1 批 4 人，主要都是参观游览；意大利 3 人，比利时、新加坡、捷克斯洛伐克各 2 人，均为参观游览。

## 2. 对外贸易

70 年代，陕西冶金系统仅有西安冶金机械厂、陕西精密合金厂以对外经济援助的方式承担过少量产品出口任务，其产品出口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和越南等国家。

1980 年下半年，国民经济进入调整时期，陕西根据本省冶金工业的具体情况，先后派员分赴北京、广州洽谈出口事宜，并签订了一些出口合同。

1981 年，西北耐火材料厂通过中国冶金进出口公司向日本、美国和联邦德国出口高铝矾土熟料 1.63 万吨，总值 202 万美元，按内部汇率折算为人民币 566 万元，占该厂当年销售收入的 80%。在此后的三年时间里，该厂又陆续出口近 3 万吨，总值 315 万美元，折合人民币 882 万元。

西安冶金机械厂自 1981 年起向菲律宾国家钢铁公司出口炉卷轧机炉内卷取机耐热钢卷筒 6 组，还向新加坡出口 3 吨可熔炼锡矿石，向日本出口了炉算条，向美国出口了法兰盘等产品。

从 1981—1988 年，省冶金系统拥有出口产品的企业由 4 个增至 18 个，品种也由 4 种扩大为 17 种；年出口额从 248 万美元增至 627 万美元，翻了一番多。特别是 1986 年以来，由于各级领导部门十分重视发展外贸，冶金产品出口稳步上升且增长幅度较大，1986 年比 1985 年增长 409%，1987 年比 1986 年增长 157%，1988 年比 1987 年增长 128%，连续三年增长、翻番。

为配合国内冶金企业技术改造与技术进步，陕西冶金系统从 80 年代以来，开展了较大规模的技术与设备的引进，重点在陕西精密合金厂、陕西钢厂和西安冶金机械厂。上述企业分别从联邦德国、美国、英国、日本引进可逆四辊冷轧机、二十辊冷轧机、带钢连续光亮退火炉、合金钢小方坯连铸机、小型棒线材轧机、高速连续拉丝机、高速水箱拉丝机、纵剪机、滚铣机以及镗铣床等设备和仪器共 26 台（套），价值约 2070 万美元，折合人民币 6350 万元。

为扩大陕西冶金企业在国外的知名度及其产品在国际市场的影响，自 1982 年以来，西北耐火材料厂、西安冶金机械厂、华山冶金车辆厂、陕西钢厂、陕西精密合金厂和第九冶金建设公司等企业相继印制了宣传广告册，

以中英两种文字并附大量图片对外介绍企业概况：省冶金厅还组织专题稿件，在新华通讯社主办的对外刊物《中国经济新闻》上介绍企业及产品。1984年，为配合“陕西省第一届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洽谈会”的召开，陕西冶金8个企业推出80种冶金产品参加了在西安举办的大型展览，向国内外展示了陕西冶金工业水平。1985年有5个企业参加了在美国明尼苏达州举办的“中国陕西省工业图片展”，7个企业的30种产品参加了在香港举办的“陕西省出口商品展销会”。1987年，陕西冶金系统与《中国贸促报》合作主办了《中国贸促报》陕西冶金专刊，较全面地介绍了陕西冶金工业现状及未来展望，重点介绍了10个企业及其产品，在第26届广州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上散发；陕西钢厂和陕西精密合金厂参加了在比利时举办的中国陕西工业品展览。

### 3. 合作与交流

利用外资。1984年12月，省政府举办了“陕西省第一次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洽谈会”，冶金系统8个企业共提出6个合作项目，派遣16人组成代表团参加。经与外商洽谈，陕西钢厂通过华秦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与联邦德国ROCH公司和HERBORN公司签订了引进高速连续拉丝机和高速水箱拉丝机合同，成交额110万美元，还就该厂引进合金钢丝生产技术及设备与外商达成意向性协议。1988年12月举办的“陕西省第二次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洽谈会”上，陕西冶金系统有9个企业共提出11个项目，与来自日本、美国、意大利、澳大利亚、联邦德国、新加坡、荷兰、澳门和台湾等14个国家和地区的近40个客商洽谈，取得较好成果。其中汉江钢铁厂300米高炉等6个项目与外商共签订意向性协议书9份，全部成交后可引进外资5000多万美元。

引进技术合作制造。1981年以来，配合国内冶金重点基本建设和重大技术改造项目，西安冶金机械厂先后同日本的日立造船株式会社、手冢兴产株式会社、神户制钢所和联邦德国DDS公司合作，为宝山钢铁总厂1900板坯连铸机生产了精整辊道及过跨台车；为武汉钢铁公司制造了一台1250吨废钢剪切机；承担了鞍山钢铁公司大板坯连铸机辅助装置制造和11号高炉全液压泥炮制造等多项任务。

国际工程承包和劳务出口。陕西冶金系统国际工程承包和劳务出口于1983年底开始，以冶金部第九冶金建设公司为主，赴美国关岛考察当地建筑市场。次年6月以中国冶金建设公司名义在当地注册，参加工程投标。

1985年首批派遣44人承包32套高级住宅，完成营业额148万美元，获利9万美元，成为中国冶金建设公司在该岛第一支承担工程项目的建筑队伍。1986年派出人员增至110人，承包50套住宅和33户度假村两项工程，完成营业额487万美元，获利75万美元，人均6800美元。1987年派出145人，签订承包合同额达2000万美元。在竞争激烈的关岛建筑市场打开了局面，赢得了信誉，站稳了脚跟，成为众多外国承包公司中的佼佼者，当地报纸曾两次报道，赞扬第九冶金建设公司的建筑质量和速度。该公司已在关岛购置4000平方米房舍、19处场地，15台车辆（包括吊车、卡车等）及部分大型工程设备，初步形成基地。

此外，陕西钢厂在引进二手冷轧线材设备中，应外商雇请，派出18名劳务人员赴联邦德国拆卸设备，为设备运回厂内的顺利安装调试获得了第一手资料和经验。

对外经济技术援助。根据中国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签订的关于精密合金熔炼加工厂的《会谈纪要》，1983年8月朝方派79名实习生来华，对“三·七”项目有关生产车间及生产检验室的工艺操作、设备仪器的保养维修以及轧辊热处理等进行实习培训。

科技交流。1986年以前陕西冶金系统仅有陕西钢铁研究所、西安冶金机械厂、陕西钢厂分别派员参加冶金部组织的冶金新材料考察团、连铸热轧热送技术考察团、废钢剪切机技术考察团和中国特钢考察团，赴美国、瑞士、日本、联邦德国、法国考察，大量的技术交流还限于国内，即或请国外专家来华，或通过信函、资料进行交流。1986年以后，陕西冶金系统结合承担的国家和本省科研攻关项目，在精密合金、特殊耐火材料、菱铁矿选矿及金属化球团电炉连铸和捣固炼焦等方面开展直接对外交流。

为改变宝山钢铁总厂高炉铁水槽所需耐火材料和咸阳彩色显像管厂显像管玻璃使用耐火材料依赖进口的局面，根据省科委安排，西北耐火材料厂厂长吴万安率陕西省特殊耐火材料考察团一行4人，于1986年10月13—27日访问考察了法国有关学院、工厂和研究机构。为解决彩电材料国产化问题，陕西冶金系统派遣彩色显像管用金属材料考察组，于1987年9月赴美国莱姆逊机器公司等企业，对金属材料的生产工艺、冶炼方式、热（冷）轧方法进行系统考察。

1979—1986年的8年间，以陕西钢铁研究所为主曾有3位学者、厂长分赴匈牙利、联邦德国和南斯拉夫出席国际非晶材料磁学会议、第四届国际软

磁材料年会、中南经济贸易讨论会。

陕西冶金系统在引进国外智力方面，主要采取派遣进修生出国和派遣技术售货员赴国外对口企业进行培训等形式。1978—1988年的11年间，共派出工程技术人员45名，分赴联邦德国、日本、美国留学进修和专业技术培训。

### （三）煤炭

建国前，陕西煤炭资源基本上没有进行过地质勘探。民国16年（1927）陕西省建设厅设立采矿处。民国25年（1936）以后，仅在关中同官地区进行了勘探施工（因“同官”与“潼关”同音，故于1946年11月将同官县改名铜川县，但同官煤矿名称依旧），由于勘探工程量过少，因此，对陕西煤炭资源的分布、煤田地质构造特征、煤炭储量都缺乏一个全面地认识。

国外同行对陕西煤矿早有考察，远在唐代（618—907）日本留学僧园仁在唐都长安青龙寺学佛教，在华定居几十年，回国后所著《入唐求法巡礼记》中，把中国的石炭开采介绍到日本。随后在元代（1206—1368）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中国游历和任职达17年之久，他到过晋、冀、陕等省。游《马克·波罗游记》记载“整个契丹到处都发现有一种黑石头。它挖至矿山……，经点燃效力和木炭一样，而它的火力比木炭更大更旺。”摩洛哥旅行家伊本·拔都在其游记中记述：“中国及契丹之居民，不用木炭，而用一种黑土作燃料，此土乃天然之产，在地下时其形如块……”

民国32年（1943）6月15日，日本《新修支那省别全志》出版，其中详细记载了同官市政、人口、交通、产业及煤矿概况，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搜集了大量经济情报。

建国后，从1955年开始，陕西在开发煤炭资源方面，涉外交往逐渐增多：

#### 1. 接待来访

1955—1969年的14年间，接待外国参观访问、专业考察、学术交流的有两个国家16人次。1955年2月苏联专家柯罗布柯夫（任燃料工业部专家组组长）和罗马尼亚专家一行6人赴铜川矿区，搜集王石凹矿井初步设计资料，并核对了铁路专用线的地形。5月苏联专家克兰依聂夫第二次赴铜川煤矿继续考察矿区地质情况，5月28日苏联专家季里连柯夫赴铜川煤矿处理三里洞、王家河建井中的有关技术问题。12月6—9日苏联专家葛拉左夫等到铜川矿务局，分别对一矿、三矿、铜川电厂、机电修配厂和矿山救护队的

建设工作进行视察指导。1956年2月29日，苏联专家依万诺夫、高尔基延柯、马洛夫连柯、库兹涅洛夫、穆中柯等到铜川视察矿区建设情况。8月26日，苏联测量专家季托夫钦柯对铜川矿务局、铜川工程处等单位的测量工作进行检查指导。

1970—1990年的20年间，接待参观访问、业务考察、学术交流9批140人。其中：1980年5月5—24日，美国联邦地质调查所煤炭资源分室以梅德林主任为团长，率领煤田地质代表团一行4人来陕考察。访问期间美方代表考察了黄陵煤田侏罗系含煤地层剖面。5月18—20日，在北京参加世界采矿会议国际组织委员会第48次会议的15国（波兰、东德、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苏联、奥地利、英国、联邦德国、意大利、印度、美国、委内瑞拉、墨西哥和中国）的委员及夫人一行35人，由煤炭部副部长贺炳章陪同，来西安参观访问。在西安期间，参观了煤炭部地质勘探研究所、西安煤矿机械厂和西安市的名胜古迹。副省长李连璧设宴招待。

1982年11月10—12日，以北美煤矿公司勘探副总裁为团长的美国煤矿代表团一行33人来陕访问。在陕期间与省煤炭系统的工程技术人员，就航测、物探、管道运输、企业经济和微机使用诸方面，进行了学术交流。省煤炭学会理事长庞正华、副理事长邓以纯、常务理事袁耀庭、孙传勃等会见了部分团员。

1985年6月22日，美国伯利恒钢铁公司采矿总工程师汉尼根一行3人，在煤炭工业部外事局副局长贾蕴真陪同下来陕，就黄陵矿区一号井开发项目进行了考察座谈。

1987年4月27日，以美国盖茨公司董事长盖茨为团长的煤炭技术代表团一行39人到达西安。先后参观了中国煤炭科学院西安分院、煤炭工业部航测遥感公司和西安矿业学院。

6月22日，尼日尔矿业和能源部长萨尼·库图比一行3人到达西安，当晚受到副省长曾慎达会见和宴请。外宾在煤炭厅厅长刘揆楚陪同下，参观了西安市民用煤加工厂，游览了西安的名胜古迹。9月21—24日，澳大利亚厚煤层开采技术及设备考察团，在西安进行考察。参观了西安煤矿机械厂，就采煤机械设备制造工艺，进行了技术交流。

10月15日，波兰采矿工程技术协会副会长、采矿动力部副部长塔·纳别拉奇率领的5人代表团，由北京来西安访问。省煤炭学会理事长李德纯宴请了客人。访问期间，波方介绍了厚煤层开采技术，并与西安矿业学院、西

安煤矿设计院、省煤炭科学研究所的领导、教授、专业技术人员进行了座谈。

1988年3月3—6日，美国、澳大利亚等8个国家的18位外宾，在参加第三届太平洋煤炭会议后，来西安参观访问。

#### 2. 派人员出访

1959年至1990年的32年间，出国参观访问参加国际学术会议3人，分赴苏联、日本等国。

#### 3. 煤炭出口

神府、黄陵矿区的优质动力煤1980年首次出口国外2.1万吨。铜川矿务局陈家山煤矿1988年至1990年向日本、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出口12.7万吨。

#### 4. 合作开发

1982年2月25日，陕西省煤田地质勘探公司成立“中美合作办公室”，全面研究黄陵侏罗纪煤盆地地层剖面。是年10月24—26日，根据中波两国科技合作协定，波兰采矿、灭火技术考察组B·包格旦和T·木洛斯来铜川矿务局陈家山煤矿，参观座谈交流防火灭火经验。

1983年9月12日—11月12日，美国地质学家和地球物理学家一行4人，来陕商谈中美合作项目。

1984年5月25日，美国宇宙油轮公司副总裁布兰德·肯尼迪和罗纳德孙先生，由煤炭部计划司副司长吴雅兴、中煤公司张国健陪同来陕，就开发神府煤田交换意见。26日省委书记白纪年、副省长张斌在省政府黄楼会见美国客人。8月7日—9月10日，加拿大世纪地质物理公司派出副总裁安德鲁·西格里奥、工程师琼斯·斯梯夫，来陕西省煤田地质公司进行轻便式数字测井仪检测及技术培训工作。

1990年5月25日—6月5日，日中经济协会组织的日中贸易委员会煤炭贸易商社和用户一行13人，赴神府东胜煤田考察，就合作开发煤田、第三次能源贷款和煤炭销往日本等事宜进行研讨。

### (四) 石油

远在清光绪21年(1895)德国人德立金就到陕北作石油地质调查，光绪29年(1903)德国驻天津领事馆会同德商世昌洋行委派陕西大荔人于彦彪到陕北，同当地绅士企图开采延长石油，遭到当地人民的极大反对。民国3年(1914)北洋政府与美国美孚石油公司签订《中美合办油矿条约》，成

立“中美油矿事务所”。由于产量低，不能获利，于民国5年（1916）解约。

### 1. 接待来访

1954—1984年的31年间，有4个国家24位专家、学者来陕西进行访问考察和帮助工作，其中：

1954年8月，苏联专家组到延长油矿帮助工作，10月苏联专家格里戈里耶夫到宝鸡石油机械厂帮助工作。1964年4月10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地质总局局长郑福来率地质代表团一行5人，由地质部何长工部长陪同来陕西专访西安石油仪器厂。11月8日阿尔巴尼亚矿产地质部第一副部长泽内尔·哈尔提率领地质代表团一行5人，由石油工业部沈晨副司长陪同参观西安石油仪器厂。1974年1月12日，阿尔巴尼亚工矿部副部长柴尼里哈密蒂一行11人，在冶金工业部副部长叶志强陪同下参观考察宝鸡石油钢管厂。1983年12月—1984年5月，美国格雷工具公司副总裁奥迪和约得尔公司主席兼总工程师詹姆斯松岗及销售副总裁威尔特等先后到宝鸡石油钢管厂考察，并座谈关于引进中直缝焊管成套设备问题。

### 2. 技术设备引进和步入国际市场

1969年6月，西北橡胶厂引进英国卡特公司6条钢丝胶管生产线于10月份投产。1982年9月，宝鸡石油机械厂宝石牌吊环获国家金质奖，同时美国石油学会准予宝鸡石油机械厂吊环使用API会标，这是中国石油机械制造业产品首次获得准予使用API会标的产品。1984年11月14日，美国石油学会委派美国国际公司远东技术部部长约翰·理查德布朗到宝鸡石油钢管厂进行API标准检查鉴定。次年2月美国石油学会正式颁发API会标使用证书。1985年7月5日，西安石油勘探仪器总厂引进美国德克萨斯仪器公司120道数字地震仪生产线，在地震仪分厂举行投产典礼。副省长张斌、曾慎达、石油工业部顾问焦力人、美国德克萨斯仪器公司副总裁道夫和阿蒙特等参加了剪彩仪式。焦力人代表石油工业部向西安石油勘探仪器总厂颁发了生产线合格证书。1987年4月—1988年8月，咸阳石油钢管绳厂从日本引进钢丝绳生产线建成投产，年新增钢丝生产能力5000吨。宝鸡石油钢管厂从联邦德国引进最大的16英寸直缝焊管机组生产线，正式验收投产。

### 3. 合作开发

1985年5月初，日本三菱重工业株式会社堤忠义、山参四郎、藤章夫一行3人，到宝鸡石油机械厂考察，商议签订铸钢车间技术改造咨询合同事宜。5月15日该厂在北京与日本三菱签订“宝鸡石油机械厂铸钢车间技术



改造咨询服务合同”。5月29日石油工业部批准合同生效。1988年9月，新建延安炼油厂竣工。从加拿大购置“二手”设备，合同价150万美元，国内配套投资1.1亿元。年产油量50万吨。10月，宝鸡石油机械厂中标承揽巴基斯坦铁塔制作生产，创汇600多万美元。

#### 4. 对外贸易

陕西省石油化工产品出口历来量小，80年代以后，每年约有400至600万美元。从1978—1987年，外贸出口产品已增加到34种。

#### (五) 建工建材

陕西省建设厅的对外交往是以社团组织“土木建筑学会”名义，于1979年开始进行国际间学术交流活动，直到1991年这13年间，主要交往是：

##### 1. 接待来访

来自日、美、英、法、朝鲜、印度、加拿大、丹麦、联邦德国、比利时、马来西亚、巴基斯坦、瑞士、瑞典、罗马尼亚、荷兰、香港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学术代表团、考察团75批819人次。

1979年，接待国外土木建筑界人士来陕西访问和进行学术交流5起。计有美国建筑学会主席鲍尔为首的建筑教育代表团一行10人，在西安期间就古建筑保护、利用、地下与高层建筑、老年及残疾人住宅设计等进行了专题讲座，听讲专业人员960多人次；国际桥梁与工程协会副主席美国延比教授，交流“从经济观点评价大型桥梁工程”和“从技术观点评价高层建筑物的学术报告”；美籍华人公路专家张秋4次应邀来西安，就美国、墨西哥公路建设和交流方面的专题作过4次学术报告；香港建筑师钟华楠一行，围绕四个现代化建设中建筑业的作用，以及从西方技术发展过程中应借鉴的问题等举行学术座谈会；日本上下水道技术代表团就给水、排水技术举行座谈会。

1980年，接待外国专家、学者3起：日本稻田大学教授尾岛俊雄一行在西安参观期间，就城市规划中的科学、经济和精神评价问题进行了学术座谈；美国盖尔教授和应邀的海里大学方晓阳教授等交流“地震工程”和“几种基地改良的新方法”学术报告。

1981年，接待外国专家、学者3起：日本京都大学青木志郎和东京工业大学茶谷正洋教授为团长的日本窑洞及生土建筑考察团几次来西安，和陕西专家学者进行合作，对窑洞建设进行考察，于1982年考察结束并编写成书。

10月由伊斯兰国际组织主席阿卡汗（伊朗人，组织机构设在法国巴黎）率领的阿卡汗建筑奖金会来陕西举办“变化中的乡村居住建筑”学术讨论会。代表团由巴基斯坦、印度、埃及、英、法、美、加拿大和中国等20多个国家的75位建筑师、规划师、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组成的规格较高、规模较大的一次活动。在研讨中认为随着工业的发展，城市恶性膨胀，人口过分集中所带来的弊病。因此乡村居住建筑是一个新课题，代表团在陕西期间专访了乾县张家堡村地窑群、礼泉县烽火大队南坡窑洞小学，并对西安化觉巷大清真寺的古建形式很感兴趣，和阿訇马良骥作了较长时间的谈话，离开西安时由马良骥陪送到新疆乌鲁木齐。代表团在西安期间，副省长李连璧接见并设宴招待。10月，北美工程地质协会主席怀特博士为团长的加拿大工程地质及岩土工程师代表团应邀到西安进行学术交流。

1982年，接待外国专家、学者5起：4月上旬日本教育设施访华团一行12人，在西安作了“学校建筑”学术报告；中旬香港建筑师代表团一行22人，交流了“城市科学的教育”、“高层建筑的优缺点及在使用方面所牵涉的问题”等；下旬英国前皇家规划学会主席艾渥特·帕金森一行访问西安，并带来了4篇学术演讲材料，主题是随着城市化的继续发展，如何控制和管理城市的变化，真正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7月由美籍华人孙鹏程率领的美国建筑代表团一行21人，在参观访问期间，重点考察了生土建筑；8月应邀的罗马尼亚格赫凯尔教授来西安作了“关于结构安全概念”的学术报告。

1984年，以何克所为团长的国际建筑师代表团在西安期间，同省有关技术人员就城市规划与建筑设计以及文物保护等学术问题进行了广泛座谈交流。9月英国伦敦大学发展规划部5位教授来西安讲学，主要讲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下的城市发展、规划传统、交通运输、生态学环境和能源、城市管理等问题。

1985—1986年，接待了日、美、英、法、加拿大、瑞典、马来西亚等国家和地区21起国际民间学术参观考察团112人次。其中瑞典皇家工学院、日本名古屋大学、标准化访华代表团、日本大学、英国爱丁堡市、加拿大等代表团中的专家、教授、学者在不同场合进行了学术交流和专题讲座。

1987年，接待来访3起：4月应陕西省土木建筑学会和西安冶金建筑学院邀请的日本7所大学3个研究所的15位专家、教授同中方专家、学者30多人，赴韩城以党家村为主，对传统居民房舍建筑进行了联合调查，就这个专题经过3次联合考察之后，双方于1991年编印《党家村》一书。10月陕

西省土木建筑学会同甘肃省泥石流防治学会联合邀请了日本 19 位滑坡方面的专家和中国 57 位同行考察了地段地貌，并在兰州、西安举行了滑坡防治现场学术讨论会，交流 36 篇学术论文和对滑坡防治方面的经验。8 月日本空气调节和卫生工学会副会长后藤滋教授一行 3 人来西安参观访问，并作了关于“室内环境”等学术报告。

1988 年，接待来访和邀请外宾 4 起。在接待中同保加利亚的城市规划专家，就旧城改造、文物古迹与现代建筑的协调进行了探讨；同美国西亚图污水处理专家代表团，就污水处理的规划、设计等课题进行了交流；应邀的丹麦方格尔教授作了“关于舒适感”的学术报告。瑞典皇家学院皮德森教授作了“关于防尘技术”的学术报告。

1989 年 12 月，利用国际建协主席哈克尼来西安访问的机会，邀请他作了“社区住宅建筑”的学术报告。

1991 年，接待了日本窑洞建筑第 7 次考察团 18 人。

1992 年 4 月，日本大分县建筑士会以会长井上成船为首的代表团共 139 人，来陕考察访问期间，双方签订了建立友好合作关系的协议书。

2. 派员考察出访起步较迟，出访人员相应较少。1983 年 9 月至 1991 年 12 月出访美国和日本的共 4 起 15 人（含 2 名进修生）。另外学会科研制作的唐代“含元殿”等 17 件古建筑模型于 1983 年 9 月赴美国纽约展出。

## 二、农牧、林业

### （一）农牧

#### 1. 外事往来

1952—1965 年的 14 年间，陕西农牧业外事往来主要是和苏联、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以及印度、丹麦等少数国家的专家学者应邀来陕考察访问 14 起，同时 1953—1962 年的 10 年间，农科院陕西分院和西北农学院派出 6 位农业专家、学者、科技、教学人员到苏联、保加利亚、丹麦、阿尔巴尼亚、朝鲜等国考察访问。其中：1955 年 7 月，苏联果树专家华西列夫教授应邀来陕考察了秦岭北麓果树林带。1956 年，苏联玉米专家萧洛柯娃、茹可夫和棉花专家阿列克山罗夫等人，到陕南、关中考察了玉米和棉花生产情况。1957 年 10 月，陕西派出农业劳动模范王保京、许敬章、刘述贤赴罗马尼亚参加了世界青年联欢节，并到苏联参观学习。1958 年 10 月，苏联农业科学院化肥专家纳伊金和棉花专家河洛夫、棉虫专家米哈伊来陕考察。1963

年，朝鲜农业科学院院长金启铉来陕考察并专访了中国农科院陕西分院。

“文化大革命”期间，农牧业外事往来减少。1972—1975年共计7起，其中：1972年，意大利国际农业遗传学会副主席马利亚尼到西北农学院参观访问，并与赵洪璋教授交换了小麦种子。1973年，阿尔巴尼亚果树考察组到西北农学院考察了果树研究情况。同年，陕西省农林科学院派刘智民赴埃及考察棉花。1974年，由美国农业科学家组成的植物研究代表团，以洛克菲勒为团长来陕考察，专访了陕西省农林科学院。同年8月，农林科学院著名棉花专家俞启葆赴美国考察农业。1975年，英国皇家学会农业代表团和美国昆虫防治组，到武功杨陵参观访问了农业院校和科研单位。

1979年到1985年的7年间，往来日益增多。来陕考察访问的有美国、日本、澳大利亚、联邦德国、英国、法国、加拿大、比利时、意大利、丹麦、新西兰、民主德国、土耳其、瑞典、荷兰、芬兰、瑞士、印度、阿根廷、匈牙利、泰国、墨西哥、罗马尼亚、埃及和香港、联合国粮农组织、开发计划署等28个国家和地区以及联合国组织。他们共派代表团、组或专家学者到陕考察农业的有285次887人。其中来访考察次数最多的是1985年，达105次；来访人数最多的是1983年，达226人。通过国外友好人士及联合国有关组织的考察访问，达成了一些较大的合作研究及无偿援助项目。其中主要有陕西省农业科学院从1980年起，在农牧渔业部及对外经济贸易部的支持下，开始对外合作研究开发项目。1980年中国政府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粮农组织签订《中国西北黄土高原土地资源合理利用项目》，从1980—1985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投入80万美元，分两期进行。在项目执行过程中，联合国提供40万美元的仪器设备，联合国专家还直接举办了3期有关土地利用技术培训班。陕西省在黄土丘陵沟壑区有代表性的米脂县成立黄土高原综合治理试验站，并组织选派有关人员出国考察。1984年中国政府、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粮农组织，召开了三方评审会。主要表现在确定了土地合理利用模式；对米脂县土地资源进行了考察与评价；为农作物少种高产，提高经济效益，提供了新技术；引进畜禽优良品种等。

1982年10月，中国政府和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就米脂县改造黄土高原土地利用提供无偿援助达成《基本协议》。1983年10月，省政府向农牧渔业部报送《为米脂县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综合治理工程向世界粮食计划署提出援助正常开发项目申请书》。1984年3月28日—4月12日，世界粮食计划署顾问阿诺达为组长的评估组到米脂县对这一项目进行考察评

估。项目规定由世界粮食计划署向中国提供 4.56 万吨小麦（包括运费等 887 万美元），连同其他费用共无偿援助价值 1127.62 万美元。项目由 1985 年 10 月开始，期限为 4 年，由陕西省人民政府执行。

1979 年以后，陕西农牧业系统根据国家的统一安排部署，多次派遣有关人员出国考察访问。其中 1979 年 9 月至 1981 年，省农业科学院副院长朱象三和科技人员 10 余人分赴日本、美国，对农业、畜牧业、土地资源利用情况进行考察。西北农学院教授许萱、吴守仁、路进生分赴美国、印度考察旱作农业。

1982—1985 年，省农业科学院院长吕金殿和高级农艺师孙经文等 16 人分赴日本、意大利、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美国、英国等对蚕桑业、畜牧业、土地利用、水土保持、农产品加工、果树生产、蔬菜育种等技术进行了考察。

## 2. 学术交流

学术报告会。1952—1985 年，陕西省农业科学院和西北农学院等单位，组织外国专家、学者举行农业学术报告会 30 次，有苏联、日本、美国、丹麦、联邦德国、瑞典、荷兰、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民主德国等十多个国家的专家、学者 94 人参加。联合国粮农组织比尔布拉夫等到米脂县黄土高原治理研究所作了短期讲学。

学术座谈会。1981—1985 年，陕西省农业科学院和西北农学院与 10 个国家的专家、学者举行过 9 次学术座谈会。他们来自美国、日本、澳大利亚、联邦德国、加拿大、法国、意大利、英国、瑞士、丹麦。其中美国 4 次，日本 2 次，加拿大 2 次，联合国粮农组织麦克来蒙特就黄土高原治理问题与省农科院专家进行了学术座谈。

国际学术会议。1979—1985 年，陕西应邀参加在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美国和中国（南京）召开的国际农业学术会议，主要有西北农学院和有关农业科研单位的专家、教授万建中、周尧、钮溥、贾文林、杨春峰教授和西北植物研究所李振声研究员等。

## 3. 进修、研修

进修。从 50 年代初期开始选送农业科研干部出国进修，其中西北农业科学研究所，1955—1960 年选送苏联进修的有：李保林、林季周、王学贵、吕殿青；陕西省棉花研究所选送何文骥、张秉金赴朝鲜进修；西北农学院从 1953—1963 年选送 11 名教学人员赴苏联进修植物病理、农业化学、作物育

种、作物栽培、农业经济等专业，他们是李建义、李昌纬、朱庆麟、耿志训、袁秀林、宋玉墀、许萱、吴守仁、刘均爱、李振岐、王和民。

70年代，特别是1979年改革开放后，陕西农牧系统派遣出国进修人数不断增加。1982—1985年全系统出国进修的农业科技人员达150多人次。省农科院先后派出研究人员张伯祥、霍绍棠、孙保胜、谢贤元、刘汉文、赵根石、吕殿青等分别赴美国、意大利等国进修家畜支气管病、生物防治、复合肥料、棉虫生态、土壤肥料等学科。在此期间，西北农学院与一些国家建立了校际合作及合作研究关系，选送出国攻读学位者31人，有80多人出国短期进修，培养了一批学术带头人和业务骨干。

研修。陕西农牧业系统从1979年开始选送出国研修生，到1985年先后赴日本、美国、联邦德国研修农业、畜牧以及水稻、果树、蔬菜、桑蚕、花卉、奶牛、养鸡等专业技术共146人，其中有85人回国后从事第一线农业技术推广工作，占派出研修总人数的58.2%。在出国研修人员中，从事农牧业行政管理工作占总人数的26.7%。

## （二）林业

陕西省林业系统的外事往来始于1958年，随着林业事业的发展，同国外往来逐渐增多，特别是1978年以来显著增加，省内或省外林业系统邀请的外国人，按照省外事办公室对口接待的规定，均由省林业厅接待。从1985年起，每年接待都在10批以上，1988年最多达46批256人。所接待的外国人，多系林业部和部属林业兄弟单位或有关单位邀请的外国人或海外侨胞，其活动内容：

### 1. 交流与合作

交换林木种苗与珍禽异兽。1974—1984年，主要是和日本、朝鲜交流较多。中日建交，日本首相田中角荣送给中国的一批日本落叶松苗木，其中赠给陕西的苗木，分植在西安兴庆宫公园和长安南五台塔寺沟。此后日本国相继由香川等4县赠给西安的有垂樱和重樱（各50株）；京都市赠给西安动物园黑颈天鹅（2对），山鹅（1对），火烈鸡（5对），黑叶猴（1对）；京都府赠送陕西省金松（10株），各种樱花（100株），并于1984年3月中日两国代表在西安市大雁塔和周至县楼观台举行了栽植仪式。陕西省赠给日本国京都府火晶柿苗木（50株），石榴树苗（50株），铁杉（10株）。1982年9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日成在陕访问期间，对延川县张家河乡的狗头枣倍加赞赏。林业部根据中朝两国政府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有关协议，由陕西省向朝鲜提

供延川张家河乡的枣树苗 300 株，于 1983 年 3 月经北京送往朝鲜。

## 2. 珍贵动物出展

1987 年 1 月 9—14 日，应省外事办公室和省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的邀请，由美国明尼苏达州动物园和威斯康星州米尔沃基动物园联合组成的代表团来陕访问，商定由陕西省提供两只金丝猴于当年的 5—9 月在这两个公园轮流展出。5 月初以省林业厅厅长、省野生动物保护协会会长任国义为团长一行 10 人赴美国出席展出开幕式。同年 5 月，应新加坡动物园的邀请，由省野生动物协会提供的 1 对金丝猴“周周”与“茜茜”，经上海运往新加坡展出，省林业厅副厅长文正钦于 5 月 30 日出席展出开幕式。同年 5 月，经国务院批准，由省野生动物保护协会提供 1 对大熊猫“弯弯”和“希希”，于 5 月 31 日—6 月 7 日，赴比利时安特卫普省皇家动物园展出。以省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副会长王荣庆为团长的代表团一行 8 人，赵安省出席展出开幕式。

## 3. 专家来陕工作

1958 年 2 月，应林业部第五森林经理大队聘请的苏联专家莫拉诺夫，到秦岭宁陕林区森林经理大队指导工作。3 月，苏联专家捷潘诺夫应邀来陕西为农林牧工作大队林业调查队讲授业务课程，并在长安县内苑、临潼县骊山等地指导现场实习。

## 4. 使用国外贷款

1984—1985 年，世界银行曾两次派员对陕西林业科技设施进行考察。1985 年 11 月 1 日国务院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国际开发协会开发信贷协定》（信贷号 160SCHA），省林业科学研究所使用世界银行 151.8 万 SDR（特别提款权），建立林业综合与几个专门实验室、增置生物实验、常规实验以及有关设备共 92 套，并于 1986—1990 年完成。

## 5. 中外合作

1987 年 5 月 14—18 日，联邦德国布来姆基金会查尔斯·卢森对洋县朱鹮保护区进行了考察。根据林业部同联邦德国布伦姆国际鸟类保护基金会关于建立朱鹮训养繁殖中心的协议，这个基金会于 1988 年向洋县朱鹮保护观察站提供了一套无线电跟踪设备和一辆摩托车。8 月 28 日—9 月 11 日，应中国林业科学院邀请的由国际林作物学会澳大利亚办事处组派的农用林业考察团一行 10 人，赴榆林了解林业多层次结构及其开发利用，探讨双方在林牧领域内合作的可能性。

9 月 17—27 日，省林业厅派陕西省国营林场管理站长钱国禧参加林业部

组团，赴新加坡签订汉中地区国营林场木材加工厂补偿贸易合同。

1988年3月6日，与日本国环境厅以鸟兽保护课长佐野弘为团长的日本国际协力事业团朱鹮栖息地考察团签署了《中日共同保护研究朱鹮栖息地计划确认书》。4月，林业部与日本国环境厅商讨共同对陕西洋县朱鹮的野外保护和科学研究等问题，进行技术合作。中方承担总投资人民币324.5万元，日本承担总投资约3300万日元的捐款。同时商定，三年内中方每年接待日方2—3名专家的专访（每次一个月），中方每年派2—3名专业人员赴日本进修（每次一个月）。

10月22—24日，应林业部邀请的，世界野生生物基金会一行5人来陕商定大熊猫保护管理实施方案。

## 6. 林业考察

科技考察。1977—1989年期间，由西班牙、美国、意大利、英国、日本、瑞典、肯尼亚、埃塞俄比亚、坦桑尼亚、赞比亚、加拿大、联邦德国等国的专家学者14批111人，来陕西对淳化县的水土保持、黄土高原造林，城固和汉中县的油橄榄场，西安市的丈八沟苗圃、城市绿化，韩城市的杨树，西北林学院苗圃，榆林地区治沙研究所，宁陕林业局，武功杨陵的毛白杨树，省林业科学院研究所，渭河试验站，周至楼观台实验林场等进行了专题考察与探讨发展规划。在专题考察的同时还举行学术报告会和学术交流表演。其中1985年7月25日日本国京都大学岸根卓郎教授在西安为林业系统的技术干部作了“日本国土治理与规划”的学术报告；1987年7月以罗纳德·斯古格为团长的美国民间交往野生生物管理代表团一行12人，部分团员与省林学会、省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科技人员进行了学术交流；1989年5月27日—6月11日，应林业部外事司邀请的美国缅因大学纽彼教授及夫人来西安在森林景观学讲习班讲学，来自全国13个省区林业院校研究所、调查设计单位、森林公园的林业科技人员45人参加听课。课后，中美双方还就合作研究森林景观学签订了意向书。

营林考察。1977—1988年期间，前来考察的有联合国粮农组织、日本、澳大利亚、瑞士、奥地利、联邦德国、索马里等国的专家学者团组21批134人。其中联合国粮农组织3批40余人，日本10批47人。他们主要是赴淳化县考察黑松林水库、水土保持、植树造林等。其他也有去长安县小新村的植树造林和“四旁”绿化；渭南县的农桐间作；西安市的行道树种；眉县的汤峪林场等专题考察，美国农业部林务局东北林业试验站昆虫学家奥戴尔、麻



理省大学昆虫系研究生桑德一行3人，于1987年5月17日—6月7日，对周至县的午毒蛾天敌进行了考察和采集。

森工考察。1980—1987年期间，来陕作森工专业考察的团组有8批48人，他们来自民主德国、美国、联邦德国、日本、芬兰、瑞典和香港地区。主要考察造林技术、油锯生产技术和林业机械加工工业。

旅游观光。1983—1989年期间，国家林业部属林业单位邀请的外国客人64批252人，他们来自日本（17批37人），英国（2批4人），美国（28批161人），联邦德国（7批12人），加拿大（7批27人），新加坡（1批3人），丹麦（1批4人），法国（1批4人）以及联合国的一些客人。

### 7. 出国考察

1984—1989年组团出国考察访问7批38人，就树木改良、木材加工、林场建设、学校教育、技术推广、经营管理、经济贸易等项目，分赴美国的3批18人；加拿大的1批6人；日本国的2批13人；香港地区的1批1人等，进行了考察访问。

受林业部派遣，由陕西组团出国考察访问。根据林业部的要求，该团组都负有调查研究、撰写专题材料的任务。共有5批22人，分赴美国的2批10人；日本的1批6人；突尼斯的1批3人；摩洛哥的1批3人。其中，写有森林保护、森林经营、油橄榄栽培等数万字的考察报告。

随林业部组团出国考察的8批38人，分赴日本（16人）；南斯拉夫（2人）；摩洛哥（1人）；澳大利亚（7人）；意大利（10人）；尼泊尔（1人）。

应邀出访。1987年5月2日—6月9日，省林科所副所长王修齐及罗伟祥应瑞典农业科学大学生态环境研究系能源林研究中心的邀请，赴瑞典考察，并写有《瑞典林业见闻》一文。1989年8月22—29日，省长青林业局副局长高郑生赴意大利参加国际兽类学会举行的第五届国际兽类学术讨论会。

### （三）水利、水保

陕西水利、水保涉外交往始于20世纪30年代，先后有多批外国专家、学者、政府官员来陕访问考察。建国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水利水保方面的外事活动有了更大的发展。

#### 建国前（1913—1949）

##### 来访

1930年12月7日，陕西举行引泾工程典礼，北平华洋义赈救灾总会挪

威籍工程师安立森来陕参加典礼活动。

1932年11月5日，美国华灾协会会长白树仁博士与黄河视察专员王应榆一行来陕，观看泾惠渠工程，视察以工代赈的成就。

1934年4月，全国经济委员会西北办事处主任刘景山偕同水利顾问荷兰籍工程师卜德利及技师朱光彩等到洛惠渠工地视察。

1935年1月13日，国际联盟所派水利专家沃摩度、高德、尼霍夫及助手萨道立、赫志摩等一行6人，由经济委员会水利处顾问卜德利，技士章骏骑等陪同，视察汴梁（今开封市）黄河水性及埽垛工程后，来陕征集水利工程各项资料，并视察泾惠、洛惠、渭惠三渠工程、眉县引渭工程以及拟建的宝鸡峡渭河水库坝址。国际联盟交通组长法籍水利专家哈斯氏又专程视察洛惠渠工地。

1940年3月28日，著名华侨陈嘉庚率南洋华人归国参观团一行15人，参观渭惠渠灌溉工程。

1943年5月，英、美、苏等国记者6人、中国记者9人，以及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陕西省军政领导共29人，于5月22日前往大荔县洛惠渠隧洞施工现场进行参观采访；6月初行政院顾问、美籍水土保持专家罗德氏博士率团，赴大荔考察洛惠渠壮头大坝淤积及其以上地段冲刷严重之处。9月赴黄龙山垦区继续考察。10月美国水利专家巴里德氏等来陕考察了黄河中游、渭河下游和嘉陵江航道治理等，还考察了泾河水库坝址选定，洛惠渠五号隧洞施工和泾、渭、汉、褒、湑五渠的灌溉情况。

1945年8月，以赫济生为团长的美中农业技术合作团一行12人抵陕考察农田水利，合作团认为陕西农田水利特别是渭北经李仪祉及水利工程人士的热心努力，获得大发展，为北方之冠。并建议将武功列为全国九大农业指导区之一，12月全国经济委员会治黄顾问、美国水利专家雷巴德中将、萨凡奇博士、葛罗冈工程师来陕，分赴韩城禹门口、洛惠渠、彬县亭口、宝鸡峡、渭惠渠等处勘察蓄水库库址。

#### 出访

1913年陕西省水利分局局长郭希仁偕同李仪祉先生前往德、法、荷兰、比利时等国考察水利，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

1944年6月，陕西省水利局局长刘钟瑞赴美参加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会议，考察研究水利事宜。

#### 科技合作交流

1930年12月，陕西引泾工程成立渭北水利工程委员会，聘任美籍水利专家塔德为委员兼副总工程师。

1945年8月，以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校长赫济生为团长、中国农业实研所所长沈宗翰为副团长的中美农业技术合作团一行12人来陕考察农田水利。同年12月，全国经济委员会治黄顾问、美籍水利专家雷巴德中将、萨凡奇博士、葛罗岗工程师一行来陕，分赴洛惠渠、泾惠渠、渭惠渠及黄河禹门口、彬县亭口、渭河宝鸡峡等考察，勘选拟建水库坝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49年10月—1991年12月）

来访

1953年1月上旬，政务院农业部、水利部邀请苏联专家安东洛夫，并请河北、山西、河南省农业、水利部门参加，会同陕西当地有关部门共40余人，分农业、水利、土壤三组，深入泾惠渠灌区考察，着重调查研究棉花减产的主要原因及治理措施。同年三四月间，林业部长梁希陪同苏联专家聂纳洛阔莫夫考察了洛河、延河、无定河等流域水土流失状况和营造水源林和水土保持林的方案。

1956年7月，苏联水利考察团灌溉组参观泾惠渠灌溉工程等。

1959年1月，苏联专家沙金·契波佐夫在中央和省上有关部门领导的陪同下，共50多人到韩城视察龙门水库库区与坝址地质结构。

1960年春，苏联水利专家考尔涅夫、布热津斯基等，由水利部副部长张含英陪同，来陕考察了宝鸡峡引渭渠道总干渠沱水倒虹和库渠结合工程——信邑沟水库大坝。

1978年3月，中国水利专家张光斗陪同外国专家乾宁前来视察黄河龙门水库坝址。

1980年4月，日本水利专家到韩城舌头岭勘查拟建的黄河水电站。

1981年5月11日，日本水利考察团一行10人考察了宝鸡峡引渭灌溉工程。同年6月3日，美国夏威夷大学喷灌教授吴伯仪，参观宝鸡峡引渭灌溉工程。

1986年12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技术考察团一行5人，在水电部高级工程师朱思哲陪同下，参观眉县石头河水库大坝工程。

1988年5月，苏联水利设计院副院长阿里都宁为团长的水利考察团一行4人来陕考察，先后参观了省水科所及宝鸡峡、泾惠渠、交口抽渭灌溉工程，以及西安市未央区六村堡田间渠道工程等。

### 出访

1973年4月,水电部安排由陕西组成以崔玉亭、毛光启为正副组长的考察组一行9人,赴阿拉伯也门共和国进行水利考察,于1975年完成各项考察任务回国。

1984年10月,应日本长野县日中友协的邀请,以省水电局局长胡棣和省林业厅副厅长杨正昌为正副团长的水利、林业考察团一行7人,赴日本考察水利、林业建设与管理。

1986年9月1—14日,应日本农业土木综合研究所的邀请,以省水利水土保持厅厅长曹廷甫为团长的陕西水利技术考察团一行5人,赴日本考察本州和北海道的渠道防渗技术。

1987年10月23日—11月6日,应日本日中友协副会长京都府日中协会会长依田义贤的邀请,以省水利水土保持厅技术顾问刘璞为团长的陕西水产考察团一行5人,赴日本京都府等地考察淡水养鱼技术。

1988年9月4—20日,省水利水保厅副厅长兼总工程师于澄世为组长一行4人,赴美国考察大型灌区管理经验和灌溉新技术。

### 参加国际专业会议

1956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苏、越三国农业科学技术交流会,陕西派出省水利局副局长张寿荫和灌溉处处长傅健、省水电设计院副总工程师王旭瀛、省泾惠局总工程师叶遇春等4人参加。

1990年9月11—15日,中国水利学会水利史研究会在泾惠管理局召开“近代水利史学术讨论会”。全国25个省、市、自治区的60多个单位100余名专家、学者,以及日本“中国水利史研究会”的代表参加了会议。

### 援外

从1963年8月至1990年4月的27年间,共有8次援外任务,其中经农业部、水电部各安排过两次,其余由陕西自己联系,承担的援外有阿尔巴尼亚、阿拉伯也门共和国(2次)、伊拉克(2次)、科威特和突尼斯(2次),派出工程师和技术骨干16人,劳工909人。

另外,1968年6月陕西援助阿富汗王国60万尾家鱼、红鲤鱼、夏花鱼等鱼种运抵喀布尔,成活率达95.5%,受到阿富汗国王穆汗默德的高度赞扬。

### 外援

1983年10月,世界粮食计划署(简称WFP)评估组派专家奥兹比伦、布朗、弗洛林、哈斯等4人来陕考察东雷抽黄、南乌牛灌区平整土地等援

助项目，这是该署援助陕西水利工程的第一个项目（代称 2698 工程）。1984 年 5 月罗马会议正式批准，9 月 28 日计划项目合同与中国政府正式签约。在施工期间，“WFP”官员曾五次来现场检查指导。1987 年 6 月完成项目合同任务。1988 年 5 月召开了竣工验收会议。

1987 年 5 月，由世界银行高级卫生工程师、中国农村改水项目负责人黄唯雄（加拿大籍华人）、顾问毛里斯·阿尔博森、卫生工程师哲哈德·山内尔与世界粮食计划署项目官员梅米特·加法尔、联邦德国技术合作署官员韩里克·哈克等 5 人组成的中国农村供水项目中期评估团，在中央爱委会办公室主任张明昭、国家计委费彬等陪同下，重点考察了彬县项目执行情况和已成水厂、施工现场、逐户用水情况等。该项目利用世界银行贷款和小麦、牛肉干等无偿物资援助共折合 2410 余万美元，于 1986 年立项实施，1992 年竣工验收，并解决了定边、靖边、黄陵、蒲城、大荔、澄城、岐山等 7 县农村 149 万人的饮水困难。

1989 年 1 月，由省计委专职委员张淦然、省财政厅郭治钧、省水利水保厅杨虬等组成代表团，赴美国华盛顿与世界银行草签陕西农业发展项目（主要用于东雷抽黄续建工程）贷款协定。同年 9 月 14 日，中国驻美大使馆赵锡欣代表中国政府与世界银行正式签署协定，共计贷款 5570 万美元。东雷抽黄续建工程于 1990 年 7 月 22 日开工，计划 5 至 7 年完成。1992 年 10 月，世界银行代表古纳一行来陕考察，对东雷抽黄续建工程进展情况表示满意。

1957 年，苏联科学院阿尔曼德教授等一行 6 人与中国科学院科技人员共同组成中苏联合考察队来陕考察水土保持，至 1958 年底，先后完成了绥德高舍窝沟水土保持与土地合理利用规划、榆林 4 处重点风沙区规划和洛川县安民沟、红塔公社水土保持规划等，重点到府谷、吴旗、富县、黄龙、武功、潼关等县走访查看了水土流失情况，并就三门峡库区泥沙问题和开展群众性的水土保持工作等提出考察建议。

1989 年 10 月，由中国水土保持学会沙棘专业委员会、黄河水利委员会、陕西省科委和省沙棘开发利用办公室联合主办，在西安召开了首届国际沙棘学术交流会，参加会议的有中国、俄罗斯、芬兰、匈牙利等四国的 90 多名沙棘学者、专家和工作。会议收到美国、联邦德国等 91 个国家的论文、文摘和题录 152 篇（条）。全国政协副主席钱正英和水利部部长杨振怀，分别为会议题写：“愿沙棘为人类造福”和“开发沙棘，保持水土，有利环境，造福人民”的题词。

### 三、经贸

#### (一) 进出口贸易

建国后，陕西陆续组建了国营外贸机构。按国家计划收购、调拨出口商品和间接进行少量进出口业务。从1980年开始，随着国家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和外贸经营体制改革的深化，陕西对外贸易逐步形成了一个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的直接对外交流与合作的格局。

##### 进出口贸易额

1980年前，陕西基本上不直接经营进出口业务，主要任务是为国家提供出口货源。1981年开始自营部分进出口商品工作，当年出口2400万美元，进口283万美元。1984年全面自营进出口，当年出口9600多万美元，进口3300多万美元。对外贸易连年保持大幅度地增长，1991年进出口贸易总额达到8.13亿美元，比上年增长40.17%。其中出口6.13亿美元，比上年增长31.34%；进口2.0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73.33%。

##### 进出口商品结构

陕西省出口商品结构，在50年代初期只有十几种纯原料性的土畜产品，到1991年发展成门类齐全、品种繁多的1000多种。主要大宗传统出口商品有纺织、粮油食品、丝绸、土畜等产品。随着经济的发展，机械、电子、成套设备、五金矿产、轻工、化工、煤炭已成为后起之秀，是出口创汇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出口商品中，农副土畜产品比重由1950年的100%降至1991年的11%。工矿产品比重则由零上升到89%。1991年机械电子产品出口创汇上亿美元，占全部出口比重的21.2%。进口商品结构变化不大，主要以生产资料为主，有钢材、化肥、机电、仪表、成套设备、纸张和化工原料等。

##### 开拓国际市场

1950年至1975年，由于国家实行对外贸易垄断，陕西对外贸易的主要任务是收购、调拨、按计划向口岸提供货源，同时直接办理向苏联、东欧、朝鲜、越南等9个国家的部分陆运出口商品的发运结汇工作。1976年开始向香港、澳门地区自营出口。1981年以后，陕西在“平等互利、互通有无”的原则下，积极发展与各国的贸易往来，在巩固原有市场的基础上，发展新市场新客户，推行全方位、多元化的拓展方式，除不断组织贸易团组派往各国推销、考察外，先后在香港、日本、新加坡、美国、欧洲等国家和地区举

办陕西出口商品展销会、洽谈会。多次参加国际博览会。除每年参加两次对外经贸部举办的广州交易会 and 地区举办的国际交易会外，还多次举办陕西国际经贸洽谈会，邀请有关国外客商来陕西交易。到 1991 年，陕西已在美国、加拿大、巴拉圭和香港地区等设立贸易机构 8 家，设立办事处、代表机构 20 个。

## （二）利用外资和技术

陕西自 1980 年起开始利用外资。随着投资环境的改善，利用外资逐年增加。主要有向国外政府和国际金融组织贷款，外商直接投资举办合资、合营、独资企业。

### 外商投资企业。

1980—1991 年，全省批准外商投资项目 233 个，合同外资金额 10.2 亿美元，外商实际投入 4.97 亿美元。举办三资企业 223 家（其他项目 10 个），其中合资、合作企业 209 家，独资企业 14 家。已开业 76 家，年产值 8.4 亿元，销售 5.5 亿元，出口创汇累计 7447 万美元。西安杨森制药有限公司 1989 年投产，到 1991 年销售额 7.85 亿元，纳税 3251 万元。1991 年销售 5.54 亿元，实现利润 1.5 亿元，出口创汇 1884 万美元。被列入全国中外合资十佳企业之一。

投资客商主要来自美国、日本、比利时、新加坡等国家和香港地区。在三资企业中，生产型企业 143 家，有机械、电子、纺织、轻工、食品、制药等。非生产型 80 家，有宾馆、饭店、餐饮、照像等。

### 外国政府和金融组织贷款

陕西 1984 年开始向外国政府、银行和世界银行借款。到 1991 年签订借款合同 26 项，金额 8934 万美元和 358 亿日元。其中：政府借款 4302 万美元和 309 亿日元。给陕西省借款的国家有联邦德国、日本、瑞士、瑞典、澳大利亚、比利时等 11 个国家；向世界银行借款 4632 万美元；向日本住友、三合银行借款约 48.6 亿日元。实际到位金额 1.45 亿美元。借款主要用于交通、通讯、化工、机械、电力、纺织、制药、教育、食品等项目。其中大的项目有西安至三原一级公路、渭河化肥厂等。

### 引进技术和技术出口

50 年代，中央利用苏联贷款，引进成套技术和设备，建设 156 项重要工程项目。其中安排在陕西有热电厂、电力制造、机械制造、煤炭开采、电子、通讯、军工生产等项目。到 1960 年，建成或基本建成 20 项。1960 年 7

月，苏联突然单方面撕毁合同，撤走专家，带走图纸，迫使其它在建项目停建或报废，给中国造成巨大经济损失。中央还安排从东欧一些国家引进生产设备和技術，用于耀县水泥厂、西安仪表厂、宝鸡热电厂等。这些重点项目奠定了陕西的工业基础。60年代初，国家从法国引进电力机车，用于中国第一条电气化铁路——宝成线电气化铁路，大大提高了该线的运输能力。

陕西省技术引进从1979年开始，到1991年，共签订技术引进合同516项，合同金额42255万美元，实际用汇21717万美元，履约300多项。引进项目有机械、电子、仪表、电力制造、纺织机械、轻工、化工、能源、烟草等类。引进技术来自日本、美国、联邦德国、意大利、奥地利、比利时、荷兰、英国、法国、加拿大、瑞士、瑞典等国家和香港地区。技术引进推动了陕西省工业产品升级换代。先后使300多个企业进行了技术改造。引进日本的压缩机生产技术、德国的风冷柴油机技术、美国的500Kv并联抗电器、氧化锌避雷器、电阻应变计。从日本引进的彩管、彩电生产线，从意大利引进的冰箱生产线都有很大的生产和竞争力。引进的新型纺织机生产的无毛绒布、气流纱等产品深受外商青睐，出口创汇千万美元。彩管生产技术填补了国内空白，且成为出口创汇大户。西安仪表厂利用引进技术，开发出15类近7000个规格的多档次的系列化新产品可供国内外客户选用。技术引进提高了机电产品出口配套能力，向机电仪一体化发展，从过去的大型机电设备配套供应，发展为技术成套和工程成套供应。

在技术引进的同时，积极开发技术出口，自1988—1991年，共签订技术出口合同44项，出口金额3640万美元。出口技术有机械、电子、输变电设备、轻工、医保。出口国家有新加坡等。

### （三）国际经济技术合作

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包括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对外承包工程及劳务合作，兴办海外企业和接受国际多边、双边援助等。

#### 对外经济技术援助

1967年开始，陕西省承担国家分配的对外经济技术援助项目。至1991年底，先后完成了在十几个国家援建工程及其他项目39项，完成援建投资4亿多元人民币。共派出各类专家、工程技术、医疗人员2000多人次，为46个国家的80多个工厂提供各种设备约14万台（套、件）。主要有喀麦隆议会大厦、也门阿哈公路、斯里兰卡普格达印染厂、中非友谊医院工程、莫桑比克鞋厂以及成套设备5项。派出技术管理、电力勘察和服务咨询及农田



水利考察设计人员等。尤其是援建的喀麦隆议会大厦被誉为“明珠”、“非洲地区质量最好的建筑”。在援助尼日尔的撒哈拉大沙漠打井过程中，专家技术人员挥汗如雨，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条件，为当地人民建成了50眼汲之不尽的甘泉井。每当一口井水喷出时，当地居民就宰一只羊，抬一担菜，送到专家住地，微笑着举起双手高喊：“中国人！朋友！”一位官员说：“你们建的井，口径大，水量多，质量好。你们为尼日尔人民造了福。”

#### 接受多边双边援助

1971年10月，联合国恢复中国的合法席位。1972年中国开始向联合国发展机构提供捐款并建立合作关系。1978年起中国每年从该组织得到一定数量的无偿援助。陕西从1980—1991年共执行多边和双边受援项目53个，总金额10814万美元。主要用于水利灌溉、黄土高原治理改造、改善人畜饮水、养鱼、果品、牛奶、制药、教育、卫生、计划生育、妇幼保健、专业培训等。利用这些受援资金，取得了综合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米脂县黄土高原治理项目，治理土地51万亩，被国内外专家誉为“陕北山区建设的新样板”。许多国外专家考察时，把泉家沟的经验制成录像、幻灯片广为宣传。关中东部抽黄灌溉工程中的南乌牛灌区，经过3年努力，平整土地36万亩，植树造林2103公顷，改善了当地生态环境，实现了土地平整，林路成行渠成网的高标准田园化灌区。使合阳、澄城、大荔3县的10个乡近13万人受益。粮食亩产、人均收入提高。改善了人畜饮水条件，地方病得到有效防治。由欧共体援助的陕西苹果气调贮藏研究中心，于1988年11月竣工验收使用。研究开发的贮藏技术使苹果、猕猴桃等各种水果保鲜期延长数月仍新鲜如初。省妇幼保健医院建成使用以来，为妇幼保健事业增添了力量。援助机构有：世界粮食计划署；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人口活动基金、儿童基金；瑞典计划署、欧洲共同体；意大利、加拿大、比利时、澳大利亚政府等。

#### 承包对外工程和劳务合作

陕西土木建筑力量雄厚，为开拓国际市场，1979年开始开展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到1991年底，共签订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合同800余个，合同金额约2.5亿美元。完成营业额2.3亿美元。派出劳务人员15500多人次。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综合效益。承包和劳务项目有居民住宅、工业厂房、学校、医院、军营、公路、牧场、防洪渠排水、电力等。主要在伊拉克、阿尔及利亚、喀麦隆、圣多美和普林西比、也门、利比亚、日本、美国关岛、突尼斯等国家。

### 创办海外企业

在外商来陕投资企业的同时，陕西也在海外投资创办企业。1983—1991年，在海外共创办企业 28 家，投资约 500 万美元。其中贸易型 10 家，生产型 18 家，有纺织、服装、医保、旅游、饮食和工程承包及劳务合作、技术开发等。由于诸多因素，除少数企业外，多数企业经济效益不够理想。

## 第二节 科技交往

科技对外交流活动是中国外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科技交往密切配合中国的外交工作，采取“文贸科技结合，文经相济”的做法，对于促进陕西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交往，促进陕西的经济建设事业的发展 and 科技、文化事业的繁荣，起了良好作用，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广交了朋友，为陕西与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起了架桥铺路的作用。

### 一、官方

陕西的国际科技交流始于 80 年代初期。

#### (一) 国际科技交流

1980—1991 年共派出科技团组 614 批 1412 人次。其中 1980 年派出 8 批 20 人，1981 年 8 批 31 人，1982 年 60 批 158 人，1983 年 73 批 203 人，1984 年 68 批 162 人，1985 年 113 批 276 人，1986 年派出 39 批 75 人（注：1986 年以后的数字中不含西安市科技口的人数），1987 年 71 批 137 人，1988 年 107 批 235 人，基本上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1989 年尽管受到“六四”政治风波的影响，派出仍达到 67 批 116 人。1990 年 85 批 200 人，1991 年 101 批 232 人。每年有这么多的科技人员走向世界各地进行专业科技的考察访问与外国科技界的朋友交流科技信息，这不仅增进了陕西省同外国科技界朋友的相互了解和友谊，同时也促进了陕西省的经济振兴和科技事业的发展。

1980—1991 年应邀来陕进行访问和进行专业技术考察的科技团组共 456 批，2400 多名外宾。其中 1980 年 25 批 160 人，1981 年 25 批 123 人，1982 年 20 批 50 人，1983 年 40 批 170 人，1984 年 57 批 301 人，1985 年 66 批 352 人，1986 年 78 批 414 人，1987 年 65 批 274 人，1988 年 75 批 483 人，1989 年 16 批 73 人，1990 年 24 批 73 人，1991 年 20 批 42 人。通过有计划地安排专业座谈会，技术讲座，技术咨询和报告等交流活动，共 340 多场次，参加各类技

术人员达 2530 多人。

在各类团组中，属于部长级的科技考察团共 12 个。其中有美国总统科学顾问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基沃斯博士（1983 年 5 月 11—13 日），希腊研究技术部部长乔治·梁尼斯（1983 年 12 月 24—27 日），联邦德国研究技术部、议会国务秘书朴罗布斯特（1984 年 7 月 5—8 日），澳大利亚科学技术部秘书长蒂加特博士（1984 年 8 月 3—5 日），美国上院科技特别委员会成员、前科技国家大臣贝斯巴拉伯爵（1984 年 9 月 21—23 日），日本科技厅长官竹内黎（1985 年 9 月 6—8 日），巴西科技部长雷拉托·阿尔谢·达希尔瓦博士（1986 年 7 月 20—21 日），联邦德国研技部长里森胡贝尔博士（1986 年 8 月 28—29 日），日本科技大臣三林弥太郎（1987 年 6 月 29—7 月 1 日），美国核会主席兰托·蔡克（1987 年 8 月 21—26 日），芬兰贸工部部长奥米尔（1989 年 5 月 13—16 日），应邀来陕考察访问和科技交流。从而使世界各国科技界了解到陕西不仅历史文化古老，而且是一个新兴的工业科技省。

截至 1991 年，陕西已同美、日、英、法、德、苏等 37 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交流关系。同时在一些有影响的世界科技组织中取得了席位，使世界大舞台听到了中国陕西科技界的声音。

## （二）国际科技合作

1986 年 9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芬兰共和国在中国北京签订了《经济、工业和科技合作协定》。同年 11 月召开的全国第四次科技外事工作会议决定：“今后国家科委要将一些政府协定中的项目直接引向地方。”

1987 年 5 月，省科委曹蔚果应邀参加中国政府科技代表团赴希腊、芬兰考察，参加了在希腊首都雅典召开的“中希科技合作第三次混委会”和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召开的中芬第一次科技合作会议”。中芬双方商定的合作项目 63 项，其中包括陕西推荐的“硒酵母应用研究”和“鲜奶生产的质量控制”两个项目。这是陕西第一次列入国家科委的政府间科技合作项目。截至 1989 年列入政府间科技合作项目共 4 个。

中芬硒酵母应用研究项目。西安医科大学承担了这项合作研究工作，并获 1982 年卫生部部级科技成果奖。

中芬奶制品检测技术（质量控制）项目。陕西以跃居全国乳制品的生产基地之一（约占全国的 1/4）。该项目 1987 年列入政府间科技合作项目后，中方由西安奶业研究所承担，芬方由 KONE 公司承担，并派专家于 1988 年曾来西安奶业研究所进行专业考察。根据协议，芬方向西安奶业研究所提供

红外分析仪。

中德文物保护合作项目。1987年中国与联邦德国把加强文物保护的科技合作项目，列入双方政府的合作协议，从而正式打开了中国文物保护界与国际同行间的大门。1988年底，联邦德国研究技术部专家来陕进行业务考察，双方签订了《会谈纪要》。1989年2月，省文物代表团访问联邦德国，双方签订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和美茵兹罗马—日尔曼中央博物馆在西安建立实验室或文物保护修复车间的协议》、《巴伐利亚保护局与国家科委合作协定书》。由德方提供20万马克的物资，帮助建立西安文物保护实验室。

中奥（奥地利）政府间林业合作项目。1988—1989年，奥方先后派三批专家来陕进行业务考察，双方已制订合作项目方案，初步确定，经过10年努力，建成山地森林集约经营的示范样板，奥方计划投资3500万美元。

### （三）国际会议、展览

1980—1991年陕西专家、学者、教授、科技人员出国参加各类重要的国际科技会议的共126人次。其中，1980年2人；1982年1人；1984年3人；1985年36人；1986年8人；1987年43人；1988年4人；1989年29人；1990年35人；1991年37人。涉及的科技学术领域有精密机械制造、超导电性、地震、航空以及血液病、大脊椎动物学等40多个。

1985年以来，经国家科委批准，在陕西举办的国际科技学术会议6次：

1985年6月14—28日，“国际电介质材料性能与应用会议”在西安召开。由西安交通大学、美国电气及电子工程师协会电气绝缘学会、中国电工技术学会工程电介质专业委员会联合举办，有23个国家的600名代表（中方代表209名），交流学术论文203篇。10月10—14日，“国际黄土学术讨论会”在西安召开。出席会议的有11个国家的102名代表（中方代表25人），交流学术论文100多篇。

1986年10月20—25日，“第一届国际植物染色体工程学术讨论会”在西安召开，由中国科学院西安分院、国际水稻研究所、陕西省科委联合主办，陕西省对外科技交流中心、西北植物研究所共同承办。参加会议的有15个国家的118名代表（中方代表48名）。这次会议鉴定了中国在植物染色体工程方面的科研成果，确认陕西省著名小麦育种专家、中科院西安分院院长李振声在小麦远缘杂交新品种“小偃六号”的研究中，发明的蓝色胚乳基因鉴定方法居世界领先地位。

1987年3月20—27日，“中国陕西技术转让窗口”随同安徽省对外经济

贸易洽谈会在联邦德国汉堡中德发公司对外展出。主办单位为陕西省对外科技交流中心。共组织参展项目 32 个，其中技术成果 18 项，科技新产品 13 项，资源介绍 1 项。

5 月 21—27 日，由西北大学主办的“单复变函数国际学术讨论会”在西安召开。参加会议的有 4 个国家的 40 名代表（中方代表 10 人）。这次会议反映了现代和古典复变分析领域的最新成果，展示出我国学坛在这方面的新成就，同时扩大了西北大学在国内外交往中的影响。9 月 17—22 日，“国际旱地学术讨论会”在陕西省杨陵召开。由西北农业大学干旱、半干旱研究中心与耕作制度研究所主办，有 6 个国家的 97 名代表参加（其中外国代表 17 人），会议交流学术论文 82 篇。

1989 年，省科委组织参加了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在新加坡举办的“中国科技成果展览会”，参展 47 项科技成果，对外签订协议 8 份、意向书 7 份。10 月 19—23 日，“国际沙棘学术交流会”在西安召开。这次会议是在国家科委、水利电力部和省科委的大力支持下，由武功农业科研协调中心、陕西省对外科技交流中心、陕西省沙棘办公室联合举办的。来自苏联、匈牙利、芬兰等 4 个国家的 70 名代表如期参加了会议，其中外国代表 10 名，会议交流学术论文 100 篇。这次会议对促进全国与陕西的沙棘研究、开发利用具有重要意义。

#### （四）出国培训、进修

50 年代至 60 年代陕西派遣人员出国留学、培训、进修，主要是到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进入 80 年代派遣出国各类留学人员、访问学者、培训、进修、研修人员共计 250 多人。主要是派往日本、美国、英国、瑞典、荷兰、加拿大等国家和地区。其中：

1980 年，省农牧厅与日本长野县建立科技友好关系以来，向该县派有农学、果树、畜牧、蔬菜、桑蚕专业的农业技术研修生 9 批 105 人。

1982 年，省科委与加拿大魁北克省农业部建立科技交流关系。1986—1989 年加方已接收培训陕西奶业人员 8 名。同时促进了加拿大拉瓦尔大学与西北农业大学的校际合作关系的建立。

1984—1991 年，通过国家科委渠道派往日本的 JICA 研修生 19 人，进修学习了植物遗传资源、微生物遗传学、科技管理、政府会计检查、钢铁材料试验、环境保护监测技术等专业。

## 二、民间

陕西省国际民间科技交流早在建国初期就已开始，省科协曾和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科协组织建立了友好交流关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际民间科技交流工作有了很大的发展，已形成了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的国际民间科技交流局面。

### （一）国际科技学术会议

1986年10月23—25日，由中国医科院肿瘤研究所、第四军医大学、西安医科大学及省科协联合举办的第二届中日双边放射线增敏会议在西安召开。出席会议的中日专家、学者100余人（日方25人）。大会交流了53篇论文。

1987年12月27—30日，由省水土保持学会滑坡专业委员会主办的中日滑坡现场讨论会在西安召开。参加讨论会的两国专家、学者共78人（日方25人）。会议就滑坡、泥石流的地貌景观、稳定性评价、防治工程技术、预测预报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并去滑坡现场进行了实地考察。

1988年6月26—30日，由省数学学会承办的国际生物数学会议在西安召开。220多位国内外数学界的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来自13个国家的专家、学者40人。论文280篇（其中外宾的论文60篇）。

8月28日—9月2日，由中国光学会高速摄影及光子学专业委员会及省科协联合主办的18届国际高速摄影和光子学会议在西安召开。参加会议的代表共276人（中方代表182人）。外方代表来自23个国家和地区。会上宣读论文139篇（中方60篇、外方79篇），张贴论文63篇。大会名誉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严济慈到会致开幕词。中国科协副主席、中国光学学会理事长、大会主席王大珩主持了会议。陕西省副省长王双锡、西安市市长袁正中、副市长姜信真出席了开幕式。会议就国际高速摄影技术的新发展及其广泛应用进行了交流。会议期间举办了高速摄影新技术、新产品展览会。西安光机所与英国DELLI DELTI公司就共同生产同步扫描相机一事正式签订了协议；与苏联科学院就关于共同研制生产飞秒相机一事达成了协议。

10月21—24日，由西安近代化学研究所及省科协承办的国际功能和精细高分子讨论会在西安召开。参加会议的代表共232人（外国代表45人）。大会入选论文224篇。此次会议是在中国举行的规模最大、论文最多的一次国际高分子学术会议。

1989年9月18—21日，由西安交通大学及陕西省科协等单位主办的第二届多相流及传热国际学术讨论会在西安召开。会议由省科协副主席、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陈学俊主持。与会代表140人（外国学者14人）。副省长潘蓓蕾出席会议并讲话。大会收到论文161篇。

### （二）邀请国外著名科学家进行学术交流

1979年以来，陕西省科技界和美国人民友好协会及其他国家的科技组织派来的592个专业团体8200多名科学家，就医疗卫生、妇幼保健、城市交通、教育、建筑、计算机、农业经济、工业管理等领域进行了学术和科技交流。

1985年以来，省科协及其所属学会派出了36批团组，109人分赴美国、英国、日本、法国、澳大利亚等国参加了国际科技学术会议，科技展览及进行专业考察，与国外同行进行交流，并引进了国外的先进技术。

### （三）选派中青年科技人员出国进修

1986年以来，省科协通过中国科协向日本中小企业派遣进修生267名。派往联邦德国的21名，派往其它国家的3名。进修生主要选自陕西省内的工矿企业、科研单位。

### （四）中国古代科技成就展览

1988年9月至1989年1月，由省科协主办的“中国古代科技成就对人类社会的贡献展览”，在比利时皇家历史艺术博物馆展出。展览内容有：中国古代天文学、四大发明、金属冶炼、瓷器、纺织、古制机械和中欧科技交流等七个部分。并设有织锦、造纸、木版水印、微雕等现场表演项目。展出轰动了布鲁塞尔，先后有6个国家的25万观众参观了展览。比利时评论“今天对所有的人都很清楚，中国的传统还在以自己的方式走向下一个世纪的全球文明”。

1985年以来，省科协及其所属学会先后邀请国外专家、学者35批166人，来陕西参观、访问、讲学，进行学术交流活动。其中有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英国皇家学会会长乔治·波特爵士，匈牙利前总理、校科联主席福克，民主德国科普协会主席海尔曼，捷克斯洛伐克科协中央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塞德拉克，全美华人协会主席潘毓刚，美国著名管理学家《成功之路》作者托马斯·彼的斯等。

### 第三节 教育交往

#### 一、接待来访（1979—1995）

接待来自美国、日本、德国、澳大利亚、也门、泰国、巴西、英国、比利时、朝鲜、蒙古、韩国等 4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教育考察、专业访问交流团（组）和个人共计 12446 批，75831 人次。内有政府高级官员教育部部长、副部长、大学校（院）长、世界知名专家和教授达 8045 人次。美国美中教育交流协会、美中师范教育联合会、大学校（院）长、中学校长等教育界团（组）3518 批，18186 人次；日本文部大臣森喜郎、日本国会议员前文部大臣盟川正十郎、文部省指导教育官员内藤喜之、神奈川县教委指导部部长二见修次西起、日中教育交流恳谈会、日本全国学士会等团（组）2638 批，12458 人次；德国巴伐利亚州原教育部总司长（相当于常务副部长）伯克博士和赛德尔基金干事长魏兰厄，美国茵兹市市长赫尔曼·魏耶尔、茵兹市国民教育大学校长沃尔夫冈·维登罗特、茵兹市外办主任舒具尔、储蓄银行行长、董事长博克，布伦瑞克工业大学、柏林工业大学、李必希大学、斯图加特大学、斯图加特印刷技术学院等团（组）160 批，12161 人次；泰国教育部长川·里沛，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秘书长林白，外联部情报文件科科长潘巴·林白凡，国际教育局理事会主席于梅尔及夫人，朱拉隆宫大学教育学院院长沛旺·佩顿博士，泰国总理的法律顾问威查博士，教师与家长联合会会长炎中将（泰国六大司令之一）等团（组）50 批，565 人次。同时，还接待了孟加拉国教育部部长爱·马吉德·汗博士；意大利教育部部长弗朗卜·法尔库奇；丹麦教育大臣督德·本妮森；也门教育部副部长舍利姆·艾卜·白克尔博士；巴西教育部长莫利奥·英盖尔博士偕其国际事务顾问罗伯托·罗德里格斯·克劳斯；澳洲昆士兰州教育部部长保尔·布等迪；澳大利亚就业教育与培训部秘书长（副部长级）德理克·沃尔克；波兰科技高教部副部长斯塔尼斯瓦夫·诺瓦茨基；新西兰教育部总局长任威克及夫人；朝鲜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秘书长 LiJin·gu 司长；塞舌尔共和国教育新闻青年部首席秘书普拉格·辛；阿尔及利亚高教秘书长岗马尔；比利时弗莱芒语区政府审批海外合作发展项目委员会副主席 VLASSAK；英国教育与就业部国际交流司司长 ROGER MORGAN、英国教育标准局督办主任 MIKRTOMLINSON、英国海外志



愿服务社总裁格林；奥地利学术交流中心主席普拉茨古默尔。

另外，还接待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和世界银行贷款评估团。

## 二、出国访问（1979—1995）

应国（境）外教育机构、民间组织、大学、中学的邀请，陕西组团赴国外友好访问，进行专业考察学术交流团组 148 批，740 人次。计有省委科教部副部长刘舒昌，省高教局历任局长张树人、陆建平、张克忍，省教育厅厅长张克俭、副厅长左嘉猷、田钧瑞、权剑琴，省委教工委书记兼教委主任周延海、教委主任张克俭、戴居仁，省委教工委副书记余清华，省教委副主任刘炳琦、陈敏钰、陈瑞瑜、贺桂梅、张力等，先后率团分赴美国、加拿大、日本、联邦德国、澳大利亚、泰国、罗马尼亚、比利时、苏联、朝鲜、英国等国家进行高等教育、成人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基础教育的专题考察或友好访问，并签订了交流协议。

## 三、聘请外国文教专家

陕西省引进国外智力、聘请外国文教专家始于 50 年代初期。1953 年 12 月，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原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首次聘请苏联专家 6 名，即卡拉乌洛夫少将、战术通讯专家赫拉莫夫、无线电工程专家达玛尔楚克、有线电专家特洛依洛夫，雷达工程专家普赞科夫，训练专家杜克。第一批返苏后，第二批 6 名专家于 1956 年来陕，直到 1960 年专家全部回国。之后，西北工业大学聘请苏联列宁格勒造船学院海洋工程副教授索罗列夫来校执教。西安外国语学院等院校也相继聘请苏联、东欧等国的文教专家和科技专家多名。

从 1979 年以来，聘请外国文教专家和外籍教师的学校逐年增多，所聘专家的学术水平、层次也不断提高。到 1995 年底，陕西高等院校和中等专业学校取得聘请外国文教专家资格的有 44 所，先后从美国、日本、英国、德国、澳大利亚、俄罗斯等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聘请长期语言专家、教师和专业专家及短期科技、金融、管理专家（含顺访讲学专家、学者）累计达 6048 人。其中有 472 位对我友好、贡献较大的专家、学者，被高校聘请为名誉、客座、兼职教授或专业顾问；有 120 余名由学校推荐、被省教委（含原省高教局）评为“优秀外国文教专家”或“优秀外籍教师”，给予表彰并颁发了荣誉证书；有 8 名由省教委推荐，被国务院外国专家局评为国家级“优

秀外国专家”，并应邀赴北京参加国庆观礼，受到了国务院总理李鹏等国家领导人的会见。

“六五”期间（1981—1985），各院校所聘专家多为语言专家和外籍教师。1982—1986年，陕西省有24所院校先后从美国、日本、法国、联邦德国、英国、加拿大等15个国家聘请了176名外国语言专家和141名外籍工作人员；有28所院校从20多个国家和地区直接邀请了509名科技专家、学者、教授作短期讲学、合作科研、联合培养研究生；还有12所院校从讲学的专家、学者中选聘了名誉、客座教授和专业顾问共125名。其中，美国加州海华市交通局长、美籍华人张秋从1979年至1986年先后五次来西安公路学院讲学，系统地讲授了“交通管理控制”、“交通安全”、“交通环境污染”和“交通调查”等交通工程的应用课题，从此该校设置了“交通工程”专业，相继招收了专科生、本科生和硕士研究生。经交通部批准，该校聘请张秋先生为“交通工程学科”名誉学术顾问。

“七五”期间（1986—1990），陕西高校坚持外国专家工作为教育事业的改革、发展服务的方向，面向世界，广开渠道，在“六五”基础上又迈上一个新台阶。从1986年到1990年，各院校根据各类人才的需求，开始调整聘请外国文教专家的专业结构，逐步扩大理、工、农、医、商贸、金融等领域的专家。同时所聘专家和教师的学术层次和质量也有相应提高。“七五”期间全省有27所院校聘请长期语言专家256人、外籍教师206人；聘请短期科技专家、学者1148人次。其中被聘为高校名誉、客座教授和专业顾问的155人。

“八五”期间（1991—1995），省教委在总结聘请工作的基础上，贯彻了“计划聘请、突出重点、急需优先、结构合理、保证质量、注重效益”的方针，坚持以聘请科技专家为主、以合作科研为主、以重点学科和重点实验室建设为主的聘请原则，以提高聘用效益为中心，进一步拓宽聘请渠道，改进聘请方式，引进国外人才，加强目标管理，开展效益评估，最大限度地发挥外国专家的积极作用。为陕西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科研水平的提高、高层次人才的培养和经济建设，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1991—1995年，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大学、西北工业大学、西安外国语学院、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西北轻工学院、西北农业大学等44所院校、单位，先后从美国、日本、澳大利亚、俄罗斯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聘请长期语言专家、教师和短期科技、金融、管理专家（含顺访讲学）3612人。其中有192位被高等院校聘为

名誉、客座、兼职教授或专业顾问；有 120 名被省教委和省外办评为“优秀外国文教专家”或“优秀外籍教师”；西北建筑工程学院美国专家朱迪丝等 5 人被国家外专局评为国家级“优秀外国专家”，并应邀赴北京参加国庆观礼，受到了国务院总理李鹏的会见。主要成就是：

（一）聘请外国专家参与教学工作，为陕西培养中青年教师 3588 人，专业人才 3422 人，研究生 1080 人，本专科生 16649 人。还利用外国专家的专长举办了中青年教师和研究生培训班 280 期，学员 12320 人次。其中，西安医科大学和美国爱默生大学联合多次举办中美医学影像技术培训班，学员 40 人。西北大学利用国外资金和专家，举办专业研讨班、进修班和培训班 35 期，培训学员 2757 人，合作培养各层次人才 1560 人。西安交大教授、教师与外国专家合作举办了硕士生、博士生及各层次管理人员、大学教师等培训班 8 期，培养硕士、博士 77 人，接受培训的管理人才及教师达 252 人。

（二）高校在外国专家、学者的热情帮助下，建立新专业 42 个，开设新课程 136 门，加强重点学科建设 92 个。其中西北轻工业学院，充分结合该院轻工机械、无机非金属材料 and 皮革工程三个重点学科建设的需要，有计划地引进国外人才，做到了年年请专家，每年不断线，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西安外国语学院美国专家彼得斯教授为该院引进新兴学科“行为语言学”，广大教师反映很好，收效甚佳。

（三）高校通过引进资金、设备、人才，在外国专家的帮助下，新建实验室 17 个，加强重点实验室建设 56 个。同时外国专家还向有关院校赠送仪器设备、重要资料、实验试剂等，价值约达 2250 万元。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在中外专家的共同努力下，把“综合业务网”等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成为具有国际水平的面向国内外的开放型实验室，年年出成果。如 1993 年研制成功的“无线局域网”属国内首创，并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1994 年又研制成功“高速无线网扩频解扩芯片”，从此不再引进外国该芯片。在西北农业大学的日本专家野泽谦教授，不仅带来了实验技术，还给学校实验室提供仪器设备和实验试剂。他荣获 1995 年农业部及外国专家局“外国专家工作成果奖”。

（四）高校聘请高质量、高水平的外国专家合作进行科学研究，取得了丰硕理论和实践成果。1991—1995 年，通过外国专家讲学、提供重要信息、积极参与等形式，完成了合作科研项目共 677 项，其中获得国家级合作项目 62 个，省部级合作项目 301 个，一般教学、科研成果 315 个。同时，外国专家还

帮助解决科研难题 36 项和教学难题 68 项。例如，西安交大研究人员在外国专家、学者的指导和合作下，获得了国家奖 7 项，部级奖 12 项，其中部分成果已取得明显经济效益。学校的电气工程学院在加拿大 K.C.Kao 教授的“注入电荷能量转移理论”的基础上，经过大量试验研究，中外专家共同提出了“聚乙烯树脂化新模型”和“聚合物电老化陷阱理论”。1993 年经国家有关部门专家组鉴定，该理论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近期，这个学院在聚合物电老化陷阱理论研究的基础上获得了最佳方案，与上海化工厂合作，研制成国产 35KW 以下交联聚乙烯电缆，填补了国内的空白，经济效益达 4000 万元。此项成果获得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一等奖。西北轻工学院格鲁吉亚功勋科学家格·伏·博古恰教授在讲学期间，指导设计了《数控镗孔车端架》，该产品属新一代高新科技的机床刀具设备，填补了中国在该领域的空白。

(五) 高校聘请外国著名专家，引进国外高新技术，加速了科学技术的步伐。西安交大聘请外国专家与国内科技攻关相结合，提高了学校科学研究的起点和自主开发能力。与美国专家合作研制高分辨率显像管，将科研成果在四四零零厂进行试验开发，大大缩短了高科技开发转向生产的时间，研究水平居世界领先水平。西安医科大学和美国华盛顿心脏手术队密切合作，组成中美心连心手术队，成功地为心脏病患者实施了瓣膜成形、置换及冠状动脉搭桥等手术逾百例。为表彰心脏手术队的功绩，1995 年 9 月 30 日，西安医科大学为此举行了纪念仪式，省政府特授予美国华盛顿爱德华医院院长马克恩和卡西亚博士“陕西卫生贡献奖”。国家外专局鉴于马克恩院长多年来全力支持和促进西医大心脏外科的发展，为中国人民健康和中国医疗卫生所作的贡献，特授予马克恩教授“友谊奖”称号，并受到国务院总理李鹏的会见。

“八五”期间，西北大学、西北轻工学院、咸阳师范专科学校利用国外资金和外专的专长为社会培养了一批人才，做到了一家聘请、多家受益，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益。

#### 四、接受外国留学生

建国后，50 年代末至 1966 年，陕西师范大学、西安公路学院、西北大学相继接受越南留学生和进修生学习汉语。1966 年，因“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接受外国留学生工作处于中断状态。1974 年西安公路学院经国家教委批准又开始接受北也门留学生 4 名，到 1995 年已有也门、巴勒斯坦等 18

个国家的留学生近百名相继从这所学校毕业。他们都享受中国政府提供的奖学金，既有本科生，又有研究生，学科主要是公路桥梁专业。特别是1991—1995年陕西接受、招收外国留学生的学校逐年增多，留学生人数也不断上升。西安外国语学院、西北大学、西安公路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西安医科大学、陕西师范大学、陕西中医学院、西安音乐学院、西安美术学院、西北工业大学、西安联合大学师范学院、西北政法学院、陕西教育学院等，接收来自阿拉伯国家和美国、日本、巴基斯坦、英国、俄罗斯、朝鲜、韩国等30多个国家的长、短期外国留学生共2925人。其中一年以上长期留学生1072人，短期留学生1853人。他们有进修生、大专生、本科生、硕士、博士研究生，还有高级访问学者。西安外国语学院和西北大学，1995年接受留学生数比1994年增加了35%，均为学校创收120到150万元人民币。西安医科大学1995年首次就接受巴基斯坦留学生18名，据有关院校对外国留学生学成回国后的跟踪调查，有的已成为政府官员，外交、外事的高级人才，各行各业的业务骨干或部门负责人。

为管理好国（境）外留学生，1994年8月6日成立了陕西省高等院校国（境）外留学生教育管理研究会。由研究会推荐，经省教委评选出在来华留学生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和成绩的先进集体4个，即西大、外院、公路交大、陕西师大，先进个人33名。

## 五、留学回国人员

1949年以前，万建中博士（西北农业大学教授）、邵循道（西安医科大学教授）、胡征（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教授）、庄秉全（西北林学院教授）和陈国瑞（西北工业大学教授）分别从美国和英国学成回陕服务，为高等教育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1949—1965年，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西安医科大学、西北农业大学、西北大学、西安建筑科技大学、陕西师范大学、西安石油学院、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西安地质学院等院校，相继向苏联、捷克斯洛伐克、波兰、民主德国、美国等国共选派159名教师出国留学深造。他们学成回陕报效祖国，都为高教事业的发展、学科建设、高层次人才的培养，献计献策，立下了汗马功劳。

1979—1986年，根据陕西高教发展、经济建设和人才培养的需要，全省高校通过国家公派和校际交流渠道，向国（境）外选派1526人。1987—1995

年，陕西积极贯彻“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留学工作方针，坚持“按需派遣”、“突出重点”、“精选精派”的原则，不断地提高派出效益。据统计，全省教育系统向美国、日本、加拿大、德国、英国、澳大利亚、俄罗斯等 40 多个国家和地区选派公费访问学者、进修深造、攻读学位人员 2460 余人。还派出自费出国留学人员 2093 人。截至 1986 年已有 2500 多人学成回国为陕西高校教学科研水平的提高，做出了突出贡献。他们中许多人成为教学科研的领导者、博士生导师、青年科学家、青年企业家、高水平管理专家。

1990 年 10 月，西北大学、西安交大、陕西师大、西安外院、西北农大、西安医科大、西安石油学院、西北轻院、西安电子科大、西安地质学院等院校的 80 多名教师参加了全国首届留学回国人员科技成果展览项目。1995 年 7 月 28 日，省教委、省人事厅联合召开大会，表彰了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梁昌洪等 69 位有突出贡献的回国留学人员。其中高等学校的就有 52 位。他们之中有不少人谢绝了国外的高薪聘请，放弃了在海外继续深造的机会毅然回国，有的在科研中填补了国内外空白，受到了海内外赞誉，为国争了光。还有的人积极促进陕西省同海外的经济、教育、文化交流，为引进智力、技术、信息和资金牵线搭桥做出了重要贡献。为了进一步弘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搞好对外科技文化教育的交流工作，省教委将陕西省高校受表彰者先进事迹编辑成书，取名为《三秦归国学人》（第一辑），由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 六、校际关系

根据相互尊重、友好、平等、互利的原则，陕西省高等院校与国（境）外院校建立友好校际交流与合作关系。1979 年 7 月西安交大与美国匹兹堡大学建立首对友好校际关系。同年 9 月 29 日西安交大又和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签订了校际交流协议，到 1995 年，全省 40 所高校、职校、中学，先后同 28 个国家和地区的院校及科研机构、民间组织共建有 275 对，其中建立 33 对的有西安医科大学，32 对的有西北大学，26 对的有西安交通大学，23 对的有西北工业大学，14 对的有西安外国语学院、西北农业大学，11 对的有陕西工商学院，10 对的有西安地质学院，8 对的有陕西师范大学，7 对的有西北政法学院，6 对的有西北轻工学院、西安矿业学院、陕西财经学院、西安统计学院，5 对的有西安理工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西北纺织学院，4

对的有西安公路交通大学、西安石油学院，3对的有西北林学院、西北建筑工程学院、陕西教育学院、西安工业学院、咸阳机器制造学校，2对的有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西安联合大学、西安体育学院、陕西中医学院、西北工业大学附中，1对的有延安大学、西安美术学院、西安音乐学院、西安邮电学院、汉中培华女子中学、陕西工学院、宝鸡文理学院、汉中师范学院、渭南师范专科学校、西安教育学院、省农校等。

按照国家和地区，其中美国 75 对，日本 50 对，俄罗斯 32 对，德国 20 对，英国 14 对，澳大利亚 11 对，加拿大 10 对，乌克兰 7 对，比利时、意大利、韩国各 4 对，泰国、白俄罗斯、法国、波兰、瑞士、荷兰各 3 对，新加坡、乌兹别克各 2 对，瑞典、罗马尼亚、捷克、南斯拉夫、奥地利、马来西亚、坦桑尼亚、以色列、芬兰、苏丹、苏格兰各 1 对，其它地区 11 对。

校际关系，交流范围日益扩大，交流内容不断深化，已涉及到校际间的友好访问、专业考察、学术交流、合作研究，合作开发新产品，共同举办公学术会议，相互交换学者和教师，联合培养硕士生、博士生，交换教学图书资料等多种领域，已成为各高校、职校、中学对外开放的重要渠道和窗口。

## 七、引进外资

根据陕西教育事业发展的需要，省教委自 1984 年起，通过国家教委利用世界银行贷款及国际交往的各种渠道，至 1995 年先后引进外资项目总额达 3302.4 万美元。其中，1984—1989 年，电大、基大世行项目：陕西广播电视大学 212.4 万美元（含电视台 96 万美元）；陕西工商学院（原西安基础大学）130 万美元。1986—1991 年，地方大学世行项目：西北大学 263 万美元；1989—1994 年，教材世行项目：西安新华印刷厂 105 万美元；职教世行项目：1990—1995 年，咸阳机校 80 万美元，陕西省交通学校 40 万美元；贫省世行项目：1992—1997 年，20 个县 2172 万美元，宝鸡文理学院 100 万美元，西安外院 120 万美元，西安联合大学 80 万美元。香港知名人士邵逸夫捐赠援建西安交大科技馆 1000 万港币，西北大学图书馆 1000 万港币，西工大图书馆 500 万港币，陕西师大 200 万港币。争取国（境）外民间机构和个人合作援助。援助款 1500 多万美元。

通过引进外资项目，在改善办学条件，增添教学科研设备、图书资料、聘请外国文教专家、选派教师出国学习深造，提高教学质量和科研水平及培养高层次人才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980—1989年，陕西高校对外交流与合作不但学术上有了提高，还使各校在设备、图书资料等方面受益较大。各校共接受外国及其他地区大学、基金会、专家、学者无偿援助 6813250 美元，297000 马克，1018.5 万港币，16500 元人民币，赠送仪器设备 22 台，价值 311900 美元，40 万日元，7 万马克。其中，世界卫生组织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美国霍甫基金会向西医大赠送教学、科研仪器设备价值约达 50 万美元；陕西师大也先后接受国（境）外资助达 40 万美元；西北大学同期接受联邦德国阿登纳基金会，日本、台湾等民间组织、学校捐赠图书、仪器、设备等价值 60 多万美元。

1990—1995年，陕西省部分高校接受国（境）外组织和个人无偿捐资、赠送教学、科研设备、汽车及图书资料价值达 4000 万人民币。如西安医科大学 1994—1995 年，争取外援资金，加强新学科建设，投入 330 万元；利用外资支持重点科研项目，投入 223 万元；为加强重点学科建设筹集外资 100 万元，该校还同美国华盛顿爱德华医院合作开展心脏外科手术的研究，争取外资 240 万美元。西安交通大学 1994 年接受日本东京经营系统研究所所长岛要市赠送的一辆公爵王牌小轿车，价值约 380 万日元。

## 第四节 文化交往

### 一、文化艺术

1959 年以前，陕西省文化艺术界主要是接待苏联、东欧各国和周边国家的文化艺术团组及文化界人士来访。1960 年初，由于苏联政府撕毁了中苏有关经济技术合作协议、中苏两国关系恶化后，主要是接待与中国团结、友好、合作的社会主义国家和亚、非、拉美国家、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团体、友好人士。“文化大革命”初期，中国外交工作受到严重干扰，陕西对外文化艺术交流几乎处于中断状态。1978 年前，陕西对外文化交流，主要是通过中央文化部门和有关团体组织安排各国文化艺术团组来陕西参观访问、考察、讲学、举办展览、进行文艺演出、审查挑选节目、拍摄电影、电视、举办电影周、实地写生、新闻采访等。陕西派赴国外访问考察和进行文化艺术交流团组或个人均是参加中央有关部门组团，陕西省没有单独组织赴国外交流合作。1978 年后，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陕西省对外文化艺术交流日趋活跃，从过去单一接待来访，发展到组织出访双向交流，并利用



陕西古文化艺术优势，逐渐向国际双边、多边文化艺术交流拓展。交流的国家和地区日益扩大，交流领域不断拓宽，也有单独组团出访活动。

### (一) 来访

#### 1950—1966年

1950年4—11月，苏联历史学博士吉谢列夫和马列主义哲学家尤金博士应邀来访和讲学。

1954年9—11月，接待9起：匈牙利的博物馆专家、音乐家、文化工作者和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民主德国、日本、锡兰、瑞典、英国等画家、学术代表团。

1955年5—12月，接待10起：民主德国作家、考古学家，保加利亚诗人，画家、西班牙作家，瑞典考古学家，罗马尼亚和联邦法国作家，意大利文化代表团，墨西哥戏剧家等来访。

1956年1—12月，接待15起来访：波兰文化代表团、捷克斯洛伐克钢琴艺术家，罗马尼亚民间艺术博物馆馆长，新西兰、比利时文化界代表团，法国与远东文化交流中心代表团，蒙古历史、考古学家，墨西哥美术家，日本艺术家和文化界人士访华团4起24人，芬兰艺术家，意大利作家马拉帕戴、罗马尼亚木偶剧工作者及考古学家，埃及历史学家，尼泊尔和阿富汗文化代表团。

1957年2—12月，接待了16个国家和地区共23起62人：苏联文学理论家、美术家、绘画展览专家等3起；英国首次文化访华代表团、法学家乔策·勋爵，教育学家、作家格林，壁画家等3起7人；日本考古访华团、女作家等3起17人；加拿大进步诗人乔埃·华莱斯；罗马尼亚作协第一书记贝纽克夫妇；捷克斯洛伐克壁画家、博物馆长、科学东方研究所、考古工作者等3起7人；联邦法国皮影戏专家别尔曼、文学家丰克博士、著名作家保罗·迪斯特尔巴特、人种学教授沙勒等4起8人；锡兰考古艺术专家、作家西尔瓦夫人；波兰考古学家、博物馆专家两起；匈牙利民间音乐家和造型理论家；法国汉学家代表团一行5人，其中有4人在1949年以前曾任过法国驻中国使馆文化专员。

1958年2—11月接待了来自12个国家16起26人：捷克斯洛伐克民俗学博士，东方研究院副院长、汉学家白利德博士（第四次访陕）；日本书法家代表团和画家、演出家、美术评论家、教授组成光琳纪念展览代表团；法国摄影师普勒松；民主德国展览造型艺术专家里特克；英国作家乌拉斯顿；哥

伦比亚作家萨拉米亚夫妇；泰国促进文化交流代表团；意大利文化代表团；印度电影制片人、作家；保加利亚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主席阿芙拉英娃；阿富汗文化代表团；波兰教育代表团。

1959年，接待来自12个国家14起34人：保加利亚诗人、博物馆长；冰岛“语言与文化出版社”社长；民主德国的艺术学家和国家博物馆馆长；苏联考古学家；美国作家丹尼斯；泰国促进文化交流团；荷兰文化代表团；意大利文化代表团；缅甸文化友好代表团；巴西文化友好代表团；朝鲜美术家郑钟汝。

1960年2—10月，接待来自5个国家5起13人：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约夫楚克和教育科学院通讯院士凯德洛夫；意大利文化代表团；印中友好代表团；南斯拉夫文化代表团；美国作家斯诺；新西兰作家艾黎。

1963年，接待来自3个国家5起17人：日本美术史学会委员长米泽嘉圃和现代现实主义绘画展代表团，以及日本国际艺术交流协会理事长等3起13人；苏联作家谢·谢·斯米尔诺夫和列·扎；芬兰女作家赫文维·海罗来宁和诗人杜尔蒂艾宁。

1965年，接待来自11个国家17起67人：柬埔寨作家代表团；日本工艺美术和美术活动家代表团、书法家代表团、关西文化界代表团、京都学术代表团以及女作家吉佐，共6起39人；阿尔巴尼亚教育和文化部副部长所率文化代表团；法国雕塑师；美国黑人学者威廉·艾菲斯·韩顿夫妇；智利文化代表团；苏联作家代表团；印度尼西亚作家代表团；美国作家格林夫妇；罗马尼亚文化代表团；波兰木偶工作者代表小组。

1966年，接待来自8个国家文化艺术团组来访15起47人：瑞典的研究中国明瓷专家；墨西哥“粮仓剧院”院长哈维尔·罗哈斯；越南考古代表团；日本美术家代表团、出版代表团、研究中国美术史学者代表团、舞蹈工作者代表团共4起20人；丹麦考古学家、国家博物馆东方部主任2起3人；老挝（察方）文化代表团一行5人；哥伦比亚文化代表团一行4人；荷兰汉学家阿四维夫妇。

1967—1980年

1970年10月，中日文化交流协会代表团。

1971年，法国前国民教育部长、国民议会文化家庭和社会事务委员会主席佩雷菲特一行26人；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代表团一行20人。

1974年，越南南方文化代表团一行9人。

1976年4—7月，有4个国家的文化团体来西安参观访问：美国旧金山亚洲美术博物馆院长达祥西一行；奥地利文化代表团；英国图书馆咨询部主任里奇内尔为首的代表团；以吴昂道为首的缅甸考古代表团。

1977年4—10月，有7个国家和地区9起31人来访：越南考古研究考察团；罗马尼亚民主革命运动博物馆副馆长一行和民族文化遗产局艺术历史学家以及新石器时代考古学家一行；澳大利亚莫比尔石油公司董事长兼经理莱斯利夫妇；瑞士伯尔尼大学教授邦迪；美国加州大学中国古代绘画代表团；加拿大国家电影代表团等。

1978年5—12月，接待来自4个国家7起24人来访：澳大利亚电影公司制片工作者及教育、文化代表团一行6人；加拿大中国展览委员会主席托诺夫妇；英国维尔霍电影公司负责人罗斯曼夫妇；日本东北文化界和大阪商工会议所负责人佐伯勇为首的访华团一行5人。

1979年，接待来自17个国家和地区26起102人来访：美国8起43人，挪威16人，日本3起8人，加拿大2起5人，南斯拉夫、丹麦、伊拉克各5人，英国3人，澳大利亚、罗马尼亚、法国、比利时各2人，联邦德国、墨西哥、巴西各1人，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亚洲文化专员1人。

1980年，接待来自16个国家39起152人：美国9起65人，其中有好莱坞电视电影工作者代表团28人，美中关系委员会艺术考察团18人；日本国7起16人，其中有ABC电视台“鉴真和尚像回国展览”摄制组5人，外务省情报局文化官员代表团3人；法国4起17人，其中有文化通讯部长一行10人；英国5起6人，其中有英中了解协会主席一行3人；芬兰6人；挪威2起7人；伊朗2人；哥伦比亚1人；朝鲜10人；丹麦2起13人，其中有新任文化大臣一行7人，大使一行6人；南斯拉夫2起3人；意大利、瑞典各2人；智利1人；澳大利亚、加拿大各1人。

#### 1981—1990年

共接待来自五大洲的81个国家和地区的444个团组2297人，其中：10个团组以上的国家和地区是：

日本88个团组626人，其中有研究《红楼梦》的专家，大学教授、著名摄影艺术家、电视广播网株式会社、电影工作者代表团、写真协会、大阪21世纪协会、电影技术协会、政府文化代表团、新闻协会、第一次日中友协汉诗访华团等各界友好访华团组。

美国79个团组409人，其中有旧金山艺术博物馆、摄影杂志协会、著

名女高音歌唱家、著名声乐家、著名小提琴演奏家、电影导演访华团、南部地区文化官员代表团、版画家、著名演员、电影协会等文化艺术界人士。

意大利 13 个团组 238 人，其中有声像工业公司、著名男中音歌唱家、文化代表团、芭蕾舞专家、国家电影代表团等。

法国 26 个团组 105 人，其中有里尔大学访华团、电视台节目部画家、文化代表团、凡尔赛博物馆、“法国 250 年绘画展”随展人员、著名指挥家、小提琴演奏家、友协民间艺术与传统考察代表团等。

英国 19 个团组 56 人，其中有著名舞蹈家、雕塑家、美术家，艺术大臣卢斯率领的政府文化代表团，电视导演代表团，外交和联络事务部文化关系司等。

加拿大 10 个团组 49 人，其中有政府电影代表团、环保部国家园林局、作家、国家图书馆、梁漱华舞蹈团等。

其他来陕参观访问、讲学、专业考察和学术交流的有 7 个国家和地区的团组，按来访时间为序有：澳大利亚、毛里求斯、新加坡、泰国、刚果、尼日利亚、新西兰、巴基斯坦、联邦德国、缅甸、索马里、印度、马达加斯加、塞内加尔、秘鲁、菲律宾、瑞典、巴布新几内亚、朝鲜、希腊、墨西哥、比利时、埃及、阿尔及利亚、厄瓜多尔、民主德国、几内亚、摩洛哥、丹麦、孟加拉国、爱尔兰、斐济、冰岛、葡萄牙、斯里兰卡、约旦、智利、布隆迪、牙买加、奥地利、扎伊尔、蒙古、荷兰、罗马尼亚、马里、苏联、匈牙利、阿根廷、圣多美和普比西、卢森堡、西班牙、苏丹、南斯拉夫、挪威、波兰、贝宁、西萨摩亚、伊朗、巴西、芬兰、委内瑞拉、瑞士、塞浦路斯、哥伦比亚、马来西亚、突尼斯、叙利亚、捷克斯洛伐克、也门、乍得、土耳其、古巴、塞登巴尔、多哥。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 5 个团组 20 人，其中有亚洲文化中心、国际交流处、文化交流部官员率亚洲 15 个国家和地区（朝鲜、柬埔寨、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印度、斯里兰卡、约旦、土耳其、日本、阿曼、塞内加尔）的舞蹈家。

留学生 3 个团组 16 名，其中在中央美术学院学习的美国、法国、联邦德国、瑞典、丹麦、挪威、日本，在浙江美术学院学习的法国、联邦德国、加拿大、日本、巴基斯坦等留学生前来陕西参观学习、观摩。

演出、展览、拍摄影片

从 1962 年到 1990 年，共接待各国文化艺术团体和专家、学者来陕西进

行访问演出、讲学、创办各类展览和艺术观摩交流的有 49 个国家和地区 257 个团组 3574 人。其中在 5 个团组以上的国家有 10 个：日本 55 个团组 900 人，美国 57 个团组 718 人，苏联 11 个团组 268 人，瑞士 5 个团组 167 人，波兰 5 个团组 118 人，澳大利亚 13 个团组 101 人，法国 9 个团组 64 人，瑞典 6 个团组 51 人，奥地利 5 个团组 45 人，英国 8 个团组 26 人，加拿大 5 个团组 18 人，在交往活动中的大型访问演出团组，来访人员过百的有朝鲜 230 人，保加利亚 205 人，罗马尼亚 152 人。

来陕西进行访问演出、展览和拍摄影片的国家和地区各类团组还有：捷克斯洛伐克、印度、匈牙利、民主德国、刚果、巴基斯坦、新爱尔兰、丹麦、新西兰、泰国、比利时、马里、塞内加尔、索马里、伊拉克、意大利、坦桑尼亚、土耳其、新加坡、哥伦比亚、芬兰、荷兰、希腊、爱尔兰、约旦、柬埔寨、缅甸、泰国、南斯拉夫、菲律宾、扎伊尔、委内瑞拉、西班牙、巴西、斯里兰卡。

另外，《联合国教科文巡回展览——拉丁美洲艺术》在西安展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员纳格维来西安进行考察。

在中国学习的加拿大、美国、南斯拉夫、日本、赞比亚、孟加拉国、英国、联邦德国、比利时、丹麦、法国、墨西哥、瑞典、新加坡、瑞士、荷兰等国留学生 39 人，来西安进行实习观摩并参与排练。

#### 举办纪念、庆祝、展览等宣传活动

从新中国建国初期到“文化大革命”，举办各种纪念、庆祝会和电影周、图片展览等宣传活动共计 53 场（次），涉及到 20 多个国家。

1949 年 11 月间，举办庆祝苏联十月革命音乐演奏会和放映苏联彩色神话艺术纪录片《宝石花》。

1951 年 4 月，西北军政委员会在西安举办朝鲜、越南、蒙古、波兰等 9 国的图片展览；11 月陕西省和西安市举办苏联影片展。

1952 年 11 月 7 日—12 月 6 日，“中苏友好月”举办苏联电影展，音乐演奏会。

1953 年 4—12 月，举办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苏联、保加利亚等国电影周。

1954 年 3—12 月，举办苏联音乐欣赏会，西安各界纪念契诃夫逝世 50 周年，举办波兰、朝鲜、民主德国、苏联、罗马尼亚电影周。

1955 年 10—12 月，举办苏联版画展，印度电影周，日本木刻展，苏联

电影周，12月7日举办苏联苏里柯夫艺术学院中学部作品观摩展。

1956年5—12月，举办捷克斯洛伐克、日本、法国、苏联、南斯拉夫、保加利亚电影周，墨西哥版画展，纪念莫扎特音乐会。还举办了陕西著名画家出访归来写生展。

1957年4—12月，举办意大利、苏联电影周，英国版画展，苏联电影艺术和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图片展，日本画家雷舟筹扬逝世450周年纪念展。

1958年1—11月，举办朝鲜、苏联电影周，法国现代绘画观摩展，日本木版水印、木刻、石版观摩展，意大利访华美术家作品展。

1959年4—12月，举办中、匈、保、日、苏版画观摩展和苏联美术画复制画展，还举办了苏联、民主德国电影周，陕西8种图书参加莱比锡国际博览会，世界文化名人杜米埃诞辰150周年纪念展。

1960年1—11月，举办匈、捷、朝、越和庆祝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43周年电影周，罗工柳留苏油画习作展，列宁诞辰90周年图片展，北京——莫斯科版画家作品联展。

1965年4月29日—5月12日，举办“美国侵略者从越南滚出去”图片展。

1976年10月25日，加纳共和国派出10名杂技艺术学员来西安杂技团接受培训。1978年10月这批学员结业，杂技团派出两名教练随学员赴加纳协助组团演出。

对外开放以后，直接对外交流活动逐渐增多，举办各种纪念、庆祝、电影周、图片展之类的活动大大减少。

## (二) 出访

1951—1991年，陕西出访146个团组（随中央有关部门组团出访28次，应邀直访20次，其余均为由组团单位提出经省政府征得国家文化主管部门同意出访）。出访人员共1799人（次），其中有文艺界演员1495人（次），在146个出访团组中访问或商业演出团组45个。146个出访团组分赴53个国家和地区进行演出、展览、讲学或学习、考察、进修、观摩，接受技术培训以及参加节日庆典等友好活动。其中赴日本32次，香港地区19次，法国17次，美国16次，联邦德国、苏联各7次，新加坡6次，西班牙5次，曾派出3—4次的有民主德国、荷兰、瑞士、英国、保加利亚、瑞典，2次的有朝鲜、捷克斯洛伐克、波兰、越南、南斯拉夫、肯尼亚、泰国、挪威、摩洛哥、比利时，派出1次的有罗马尼亚、阿尔及利亚、葡萄牙、丹麦、冰岛、尼泊尔、斯里兰卡、尼日利亚、菲律宾、约旦、利比亚、叙利亚、伊拉

克、突尼斯和澳门地区。

### (三) 援外

1973—1988年的16年间，按照国家对外经济联络部、文化部援助非洲三个国家——扎伊尔、喀麦隆、圣多美和普林西比进行文化设施建设工程。其援外项目主要是承担文化设施的设计、设备选型、定货、安装、调试、非标加工、咨询和技术培训等任务。其中：

1. 援建喀麦隆联合共和国文化宫，1973年初接受援建任务。1982年5月20日，在雅温得举行了文化宫建筑工程竣工仪式。历时5年半，先后派员考察、施工共计8人次。

2. 1976年8月，接受援建扎伊尔共和国人民宫的任务。1979年5月20日中扎两国政府举行了人民宫建筑工程落成典礼。

3. 援建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人民宫。1984年援外工作开始实行承建部制，故派技术人员赴北京、上海、天津等地进行调研。1988年7月11日，在圣多美市隆重举行圣多美和普林西比人民宫落成典礼。

## 二、文物展览

陕西文物出国展览，从新中国建立到80年代，主要是参加中央主管部门统一组织的综合性出土文物展、古代珍宝展、丝绸之路文物展、专题性的西安碑林拓本展、汉唐壁画摹本展、青铜时代展和秦代兵马俑展等24个展览，曾在日本、美国、瑞士、联邦德国、比利时、丹麦、澳大利亚、瑞典、挪威、奥地利、英国、爱尔兰等国家和地区展出。

从80年代中期开始，陕西除有部分文物仍参加国家统一组织出国展览外，为发挥本地区文物精品多且自成系列的优势，以陕西省为主在国外举办多类多形式的出土文物展览。

1985—1991年，陕西单独在国外举办文物展览共33次，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中国秦始皇兵马俑展，陕西省出土文物展，唐十八陵文物展，长安古桥文物展，宝鸡市周原出土文物展，中国古代长安文物展，中国唐代临摹壁画展，中国的黄金时代——唐王朝和丝绸之路文化遗产展等。在日本、美国、新西兰、民主德国、匈牙利、英国、希腊、加拿大、挪威、奥地利、爱尔兰、新加坡、联邦德国15个国家和香港、澳门地区的38个城市展出。

陕西文物参展或单独出国组展，截至1991年共计52起，在19个国家和地区展出，吸引海外观众2592万人，展出地辐射到日本的东京、匈牙利

的布达佩斯、挪威的奥斯陆、加拿大的蒙特利尔、美国的洛杉矶、瑞士的伯尔尼、联邦德国的科隆、英国的伦敦、澳大利亚的堪培拉、民主德国的柏林、比利时的布鲁塞尔、丹麦的哥本哈根、奥地利的维也纳、法国的巴黎、希腊的雅典、新西兰的惠灵顿等 77 个国家的首都或著名城市。在展出时，所在国为文物展览举行隆重的开幕式和招待会，常有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或皇族要员出席，应邀到会的各界代表、各国使节、友好人士，少者 300 至 500 人，多则数千人。特别是在日本展出次数最多，日本政府的田中角荣、三木武夫、大平正芳、中曾根康弘等历届首相和政府要员等，都曾多次出席过展览开幕式。在展出期间，当地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广为报道，竞相评介。陕西文物在海外这么多城市展出，有 2500 多万人次参观，对于扩大陕西同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对弘扬中华民族辉煌灿烂而悠久的历史文文化，增进相互间的了解和友谊，促进陕西的对外开放和经济的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随着文物出国展览，陕西参加国家派出和陕西省组成的展览团组 60 多个，派员 180 多人次，有 30 多位专家、学者在国外参加了学术交流活动。

## 第五节 体育交往

### 一、来访

陕西体育同国外交往始于 1956 年上半年，首次来西安的外国体育队是苏联体操队一行 22 人。他们在西安进行了两场精湛的表演，并同陕西体操队进行了技术交流。同年上半年，波兰“格尔巴尼亚”足球队来西安访问，并在西北体育场进行了首次足球友谊赛。

陕西的国际体育交往帷幕拉开以后，来访的外国体育代表团（队）逐年增多。除苏联、波兰、匈牙利、蒙古等社会主义国家外，还有阿富汗、印度尼西亚等国家的体育代表队。

“文化大革命”期间，陕西国际体育交往有所减少，来访的多为亚非拉的刚果、马里、巴基斯坦、古巴等国家的体育代表队。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改革开放政策不断扩大，陕西的国际体育交往活动出现了高潮。1977—1989 年，先后接待了 50 多起来访和参赛的外国体育团（队）。他们分别来自美国、加拿大、巴西、古巴、意大利、新



西兰、民主德国、日本、挪威、澳大利亚、朝鲜、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奥地利、赞比亚、突尼斯、墨西哥等 30 多个国家。竞赛项目包括足球、篮球、排球、乒乓球、棒球、垒球、田径、射击、摔跤、武术、跳伞、航模等。

80 年代中期，陕西的国际体育交往处于最活跃时期，在西安连续举办了两次国际体育盛会：1984 年 10 月的国际女子足球邀请赛，澳大利亚队 37 人、美国队 44 人、日本队 22 人、意大利队 20 人。1985 年 8 月的第一届国际武术邀请赛，规模最大，人数最多，影响最好，前来参赛和观摩的有日本、法国、澳大利亚、美国、意大利、波兰、马来西亚、摩洛哥、英国和香港、澳门地区的武术运动员 130 人，武术爱好者 130 人，国内各地知名的武术界人士 10 多人。除了台上竞技外，中外运动员还对武术理论进行了广泛交流。在此期间，还成立了把中国武术推向世界的国际组织，成为陕西武坛一大盛举。1987 年国际地掷球联合会主席巴焦（瑞士籍）率国际地掷球联合代表团一行 15 人，于 5 月 9—12 日访问了陕西，并与西安体育学院进行了友谊比赛和技术交流。同年 6 月在西安举行“海燕杯”国际男篮和“西飞杯”国际女篮邀请赛，苏联等国家派篮球队 25 人参赛。

1988—1991 年体委接待来访者共 1500 余人。

## 二、出访

陕西派运动员出国进行体育交往，最早是 1956 年陕西首次派出航模运动员两次赴匈牙利参加第六届国际航模赛和访问赛。此后直到 1989 年，几乎每年都有运动员代表队出国参加比赛和访问。比赛项目不断扩大，人数不断增多，主要是通过两个途径：一是随国家各专项运动队、体育代表团出访，二是以陕西为主组团（队）出国访问和参加国际竞赛。在此期间随全国出赛的田径、体操、艺术体操、篮球、排球、乒乓球、垒球、举重、摔跤、射击、跳伞、航模、武术等团（队）135 次，各专项运动员 180 人次，以陕西为主组团（队）出国访问和国际竞赛 12 次，运动员 156 人次。通过这两个渠道出访过 53 个国家和地区。其中赴日本 24 次，意大利 11 次，美国 10 次，联邦德国 8 次，罗马尼亚 7 次，赴瑞士、苏联、法国、匈牙利和香港地区各 5 次，赴朝鲜、泰国、印度、韩国、英国、保加利亚、墨西哥各 4 次，赴伊拉克、奥地利、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各 3 次，赴加拿大、马耳他、澳大利亚、马来西亚、突尼斯、土耳其、波兰、希腊各 2 次，赴菲律宾、新西兰、阿根廷、巴西、蒙古、埃及、比利时、印度尼西亚、阿尔及利亚、阿

尔巴尼亚、摩洛哥、丹麦各 1 次，足迹遍及五大洲。

### 三、援外与外援

(一) 援外：陕西派教练员出国任教始于 70 年代末。最早是受国家体委派遣，排球教练李如柏和体操教练徐婉吟（女）赴北也门任教练。从 1977 年下半年至 1989 年底，陕西应聘到国外任教和讲学的排球、体操、篮球、乒乓球、武术教练有 19 人次分赴苏丹、埃及、也门、尼日利亚、泰国、科威特、阿拉伯也门共和国等国。6 人次承担了出国讲授武术学的任务，先后赴英国、法国、意大利、瑞典、丹麦、新加坡、日本、尼泊尔和澳门地区；1989 年受国际武术联合委员会的委托还赴澳门承担了“第二届国际武术教练员训练班”的讲学任务。

(二) 外援：陕西在发展体育事业上也有一个请进来的过程。聘请外国教练来陕西担任专项运动教练始于 80 年代，1982 年由国际篮球联委会派遣美国篮球教练韦斯利·谢博德博士和布鲁斯·赛德尔来陕西担任男子篮球队教练。

1983—1991 年，聘请日本柔道、摔跤教练 2 名。

1990—1991 年，出访 55 批 81 人次，其中：1990 年 27 批 31 人次（外援 2 批 3 人）参加项目有体操、男女足球、摔跤、柔道、链球、篮球、棒球、自行车、残疾人运动会等。分赴新西兰、朝鲜、蒙古、意大利、联邦德国、日本、加拿大、美国、俄罗斯、泰国、瑞典、印尼、保加利亚、埃及和香港、澳门地区。1991 年 28 批 50 人次（援外 1 人），参加乒乓球、体操、皮艇、赛艇、武术、地掷球、男女足球、射击、排球、竞走、柔道、跳伞、少年软式棒球、自行车、无线电测向等项目。分赴科威特、法国、日本、意大利、联邦德国、匈牙利、美国、韩国、俄罗斯、朝鲜、瑞士、马来西亚、也门、比利时、希腊和香港地区。

## 第六节 医药、卫生交往

### 一、医药

1979 年陕西省医药管理局成立后，围绕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和资金为主要内容积极开展国际间的交往活动，1980—1989 年，共接待来自 26 个国

家和地区的团组 486 批 1205 人，共派出 94 个团组 421 人次，分赴 14 个国家和地区进行访问考察、洽谈合作贸易，进行技术培训等。

### （一）接待来访

比利时 167 批 455 人；日本 47 批 153 人；美国 84 批 211 人；英国 10 批 22 人；法国 5 批 9 人；联邦德国 35 批 65 人；民主德国 2 批 7 人；荷兰 11 批 27 人；澳大利亚 6 批 14 人；瑞士 5 批 10 人；西班牙 1 人；意大利 18 批 51 人；瑞典 10 批 33 人；加拿大 7 批 11 人；印度 2 批 3 人；新加坡 3 批 6 人；爱尔兰 3 批 4 人；奥地利 5 批 8 人；匈牙利 3 批 9 人；泰国 1 批 9 人；新西兰 1 批 2 人；香港地区 56 批 88 人；其他 4 批 7 人。接待中属于技术服务工作 206 批 460 人；技术交流 37 次 155 人；参加会议 11 次 49 人，访问考察 27 次 90 人；洽谈贸易合作 172 次 357 人；游览 33 次 94 人；举行报告座谈 47 次，出席 2004 人次。

### （二）组团出访

1980—1989 年派遣出国团组 94 个 421 人次，分赴 14 个国家和地区进行访问考察 33 批 101 人；参加会议、技术交流 7 批 35 人；洽谈贸易、探讨合作 12 批 39 人；培训进修 23 批 178 人；进行工作的 19 批 68 人。其中：赴比利时 49 批 280 人；日本 13 批 43 人；美国 5 批 31 人；联邦德国 9 批 23 人；意大利 5 批 13 人；爱尔兰 1 批 4 人；英国 2 批 6 人；奥地利 3 批 11 人；加拿大 1 批 2 人；捷克 1 人；朝鲜 1 批 2 人；厄瓜多尔 1 人；菲律宾 1 人；香港地区 2 批 3 人。

### （三）技术交流

从 1980 年开始，根据引进技术、设备、研制新产品的需要，通过多种渠道，利用访问考察，参加国际博览会等机会，广泛联系，在西安组织学术报告会、技术交流座谈会、讲座等 47 次，陕西参加的技术人员 2004 人次；派往国外考察团组 33 批，参加成员 101 人次，获得了国际医药技术发展信息，国际市场动态和科学研究的新趋势，加速了陕西医药行业的技术改造和产品的升级换代。

汉江制药厂通过与比利时杨森制药公司技术交流获得药物疗效信息，于 1981 年 7 月 7 日，即引进 C 型甲苯咪唑生产技术、工艺、资料、质检、质控、生产指标、规格、废水处理技术、车间设计与生产管理及关键设备等项目，与比利时杨森制药公司，以补偿贸易方式合作生产，签订年产 60 吨合同，总投资 1978.3 万元人民币，其中含外汇 202 万美元。1984 年 5 月 24 日

完成所订项目。1985年4月19日，陕西省医药工业公司又与西安杨森制药有限公司签订引进广谱抗真菌、抗过敏、止泻、健胃、治疗脑血管疾病、精神病及麻醉等8类药物的专有技术关键设备及生产工艺536台套，总投资1.52亿元人民币，其中含外汇2176.3万美元。1990年4月完成所订项目。陕西省医疗仪器厂1984年11月29日至1985年12月7日从日本日哨株式会社引进玻管缩喉机械，总投资人民币45万元，含外汇12万美元。

西北医疗器械一厂1985年1月至1986年12月从意大利欧洲齿科公司引进牙科综合治疗机械、散件及组装技术115台套，总投资人民币122.71万元，含外汇45.45万美元。1985年又从瑞士克爱尔公司引进牙科综合治疗手机115套散件，总投资人民币16.74万元，含外汇6.2万美元。1987年9月至1989年12月还从奥地利W·H公司引进牙科四种规格手机1600套，总投资人民币872万，含外汇127万美元。

宝鸡医药玻璃厂1985年12月23日至1989年12月18日从美国康宁公司、西德库宁丁贺公司引进曲颈易折安瓿89台套，总投资16562万元，含外汇795.807万美元。

西安制药厂1984—1989年从意大利、日本、联邦德国、美国、瑞典、瑞士引进单台设备；宝鸡医药玻璃厂、宝鸡制药机械厂从日本、意大利、瑞典、联邦德国引进单台设备；汉江制药厂从日本引进单台设备。以上四家共引进单台设备34台件，总投资人民币744.8万元，含外汇211.2万美元。

## 二、卫生

陕西卫生界对外交往始于1953年，主要是请进来与派出去开展国际合作项目，建立校际院际之间的合作关系，引进医疗技术设备和培训人员。

### (一) 邀请来访

1979—1989年，陕西卫生系统接待国外来访人数不断增加，业务交往范围逐渐扩大，据不完全统计共接待外国专家学者2515批8543人，分别来自美国、英国、日本、法国、联邦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3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有些是由中央邀请来西安参观访问；有些是来同陕西签订协议合同或执行协议合同的；还有少数外宾是为他们自己的学习或专题访问而来的。其主要活动：一是作学术报告，举行专题座谈会。在这11年间，共组织大中型学术报告、专题讲座91场，听众达22000多人次。二是举行手术表演和各种先进检查手段的示范活动，促进相互交流。1984年9月美国腹腔

镜协会主席、世界著名妇科专家菲利普斯教授，在省妇幼保健院主刀，中方当助手，成功地做了七例手术。该院将这一技术应用于临床，已经作过 500 余例。1987—1988 年间，以美国犹他大学心血管主任文森教授、美国人工晶体基金会盖特兰格博士为首的 5 人手术队来陕西访问，在西安医科大学、省医院作过 15 例手术，对于医疗科研起了推动作用。三是举办国际性学术会议，扩大学术交流的受益面。1988 年 2 月至 1989 年 3 月，在西安召开了三次国际性学术会议，以陕西省卫生厅为主承办了国家中医管理局与日本津村顺天堂商定的“第三届中国传统医学讲演会”，卫生部副部长、国家中医管理局局长胡熙明出席大会并讲话，中日双方有 420 名学者（日方医学界著名人士 110 名）参加了会议，日本各大报派记者随同采访。卫生部与法国默沙·史布列特制药公司在西安共同举办了两次“中法心血管病学术交流会”，有 450 名中法学者与会。省政府、省外办、省科委和省卫生厅领导出席了每次会议的开幕式，并设宴招待了与会代表。

举办国际针灸学习班。自 1985 年开办以来到 1989 年，共办 9 期，结业学员 55 名，他们来自日本、瑞典、联邦德国、新加坡、英国、挪威等国。

## （二）派遣出国

1953—1979 年，出国的医疗专业人员共计 242 人，分赴朝鲜、日本、美国、菲律宾等 7 个国家和地区，参加国际学术会议、专业考察、学术交流和业务进修。其中：1953 年赴朝鲜业务考察的 1 人；1959 年赴苏联业务进修的 1 人；1974 年随西安市赴日本友好访问团进行学术交流的 1 人；1979 年随中央组团赴美国进行医学专业考察的 1 人；同年 11 月以针灸学为主赴日本友好讲学组一行 4 人，讲学 22 天；同年 12 月西安医学院副院长方亮赴菲律宾参加国际医学院院长会议。

1980—1989 年，陕西医药卫生界在同国（境）外的专业交往活动趋于日益活跃。10 年间共派出 77 起 180 人，分赴 12 个国家和地区。其中：

以医药卫生厅（局）党政负责人组团出访的 6 起 24 人，分赴日本的 5 起 21 人、比利时的 1 起 3 人。

以高校、医院和红十字会等单位负责人组团出访的 10 起 32 人，分赴日本、美国、英国、加拿大、联邦德国和香港地区进行专业考察、学术交流，发展合作关系。

以专家、学者出国考察、学术交流的 52 起 106 人，其中：分赴日本的 23 起 62 人，美国 12 起 14 人，香港地区 4 起 7 人，同时还分赴瑞典、丹麦、

法国、意大利等国进行学术交流。

以中医药为主，应邀出国讲学的 9 起 18 人，主要分赴日本的东京、长野、群马等地，以其独有的特点和显著疗效的中医中药，受到外国医学界的重视，尤其是日本，研究中医药已成为他们医学研究领域的一项热门课题。有些国家的政府或民间组织，曾多次要求陕西派中医去他们国家讲学。在此期间，陕西还向联邦德国、波兰、比利时等国派出了中医、针灸、中药、营养等方面的专家、教授进行讲学和学术交流活动。

### （三）合作开发

1980—1989 年，在卫生保健、妇幼卫生示范县等项目建设上，陕西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人口基金会合作，其范围由西安扩展到省内的临潼、大荔、兴平、户县、商县、石泉、勉县、延安、绥德等 9 县、市，受援 132 万美元。据省妇幼保健院、兴平、临潼、大荔、户县、商县、勉县、延安市 8 个项目单位统计，在项目工作进行期间，共选送 14 人出国学习，在国内举办各类培训班 337 期，培训人员 9626 人。

与世界卫生组织商定，为配合旅游重点地方建立防病示范县，将扶风和黄陵县列为防病示范县，已给第一期每个县提供 5 万美元的医疗仪器设备。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开发署，为中国援建 6 个初级卫生保健示范县，卫生部决定把蒲城县医院作为受援医院。WHO 短期顾问 Krister 医生偕夫人，于 1983 年 8 月进行考察，并进行了技术咨询。

中日合作开发中草药。1986—1989 年同日本三菱化成公司合作，首先对草药羊红膻、中药沙苑子进行卓有成效的共同研究。在合作过程中，陕西接待该公司 12 批 33 人的来访，举行各种洽谈会 8 次，省中医药研究院派出 24 人赴日本专题考察。在合作研究期间，日方除每年向该院提供 750 万日元（含 5 万多美元）的资助费外，还提供了 4 台科研设备，价值 35.40 万美元，同时赠送日产巴宁车一辆（约合 0.66 万美元）。

中意合作项目。中国政府和意大利政府于 1985 年 10 月 5 日于北京签订在陕西省人民医院建立陕西省老年病研究中心的议定书，意方无偿赠款 150 万美元，主要用于购置医疗仪器设备和人员培训。1989 年 10 月以前，首批 9 名高、中、初级医师已学习回国，进入研究岗位。27 件（套）设备运回安装完毕，投入使用。

### （四）校、院际关系

西安医科大学为了开展对外学术交流、建立国际间的友好关系，引进先

进的教学、医疗设备，通过考察、访问，商谈等，与美国的阿拉巴马大学、爱默瑞大学、华盛顿安息会医院、盐湖城 L.D.S 医院、新英格兰地康尼斯医院、英国圣玛利医学院等 10 多所医学院和医院建立了校院际友好关系，争取到近百万美元的仪器赠品，派出近百名教师在这些单位进修和攻读学位，同时也邀请外国数 10 名专家、学者来校讲学和建立科研协作关系。

省人民医院和日本群馬县桐生市厚生综合病院建立了院际友好合作关系。两院的院长互聘为名誉顾问，日方接受省医院进修人员，并派专家来省医院帮助工作。陕西省肿瘤防治研究所、省妇幼保健院也和群馬县癌中心东毛病院、县立小儿中心建立了院际友好合作关系。

### (五) 培训进修

通过对外交流渠道引进设备的同时，培训使用设备的人员。引进哪一国的设备，就派人去该国的有关厂家学习安装、使用和维修技术，基本做到安装完工，开机使用，有人把关，运转正常。

1983 年 5 月—1989 年 9 月，省人民医院于 1983 年 5 月从联邦德国西门子公司进口计算机控制 X 光断层扫描装置（简称 CT）1 台。根据订购合同，该公司免费为医院培训医师及技术员各 2 名；1988 年 11 月到 1989 年 9 月，又派药械科技术员、泌尿科医师、内分泌科医师等赴日本学习。卫生部 1985 年 9 月，派西安医学院陈恒元副主任技师赴日本光电工业株式会社，学习电脑心电等仪器的原理、操作和检修技术；1987 年 11 月卫生部世界银行贷款办应美国贝克曼仪器公司香港分公司之邀，派西安医科大学设备处负责人赴香港考察；1988 年西医大一附院从美国 Dasonics 公司进口 0.57 的超导磁共振成像设备，一附院即派出 4 名专家、学者和技术员赴美国旧金山学习；1986 年 8 月由卫生部派出西医大副教授王泽忠一行 6 人赴瑞典斯德哥尔摩及芬兰赫尔辛基考察低磁场磁共振仪；1988 年 6 月，西医大一附院又派两名医师去美国华盛顿参观学习 CTX 线诊断，了解常见病 CT 影像的特征。在此期间，西医大还接受了外国友好组织和外国朋友赠送的仪器、图书资料等，价值约 200 余万美元。学校还利用世界银行贷款设备费 290 万美元，采购机械仪器 114 个品目 371 台件，同时还选派 8 名医师分赴日本、美国、澳大利亚和香港地区培训学习；陕西省肿瘤防治研究所，1984 年 8 月购进英国 MEI 公司电子直线加速器 1 台，按合同英方为该所培训了技术员 3 名。

### (六) 医疗援外

援苏丹医疗队。从 1971 年 4 月至 1989 年，陕西连续选派了 19 批医疗

队，共计 431 人。医疗队先后在苏丹的布鲁克、阿布欧舍等 7 个医院工作，赢得了苏丹政府、各阶层人士的信任和尊重。

援建中非共和国友谊医院。根据中国政府和中非政府关于中国在中非共和国首都班吉市援建一座综合性医院的换文合同，陕西省人民医院从 1985 年 7 月开始至 1987 年 11 月 30 日完成了一座医疗设备齐全、拥有 7 个临床科室、9 个医疗科室、200 张病床，日门诊量可达 400 人次以上的综合性医院。

## 第七节 新闻交往

1987 年以前，陕西新闻界涉外交往主要以省新闻工作者协会名义出面迎来送往和专业交流较多，此后，陕西各新闻单位逐渐开展与外国新闻界来访团组不同情况进行交往活动。

### 一、省新闻工作者协会

1949 年 9 月 1 日陕西省就以新闻工作者协会名义与国外新闻界建立联系。新中国建立之初，接待苏联及东欧一些国家的新闻团组。时任省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陕西日报总编辑丁济沧参加中国组团访问过苏联、民主德国。

1982 年，省新闻工作者协会恢复活动，特别重视对外交流。在中苏关系还未改善的情况下，接待了民主德国新闻团，随后有意大利共产党《团结报》代表团，日本漫画家来访。当时的《陕西日报》代总编郎可访问了日本。1983—1989 年，共有 70 多个国家 450 多人次的外国新闻代表团来访，以日本、美国为最多，其他有泰国、菲律宾、新加坡、朝鲜、英国、苏联、法国、德国、瑞典、芬兰、埃及、津巴布韦、几内亚、澳大利亚、巴西等。还接待了一些国家驻华使馆的新闻官员。

1983—1988 年，省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陕西日报总编辑张光先后访问了日本、联邦德国、瑞典等国，副总编程万里访问了奥地利，副总编陈明访问了美国。省新闻工作者协会秘书长袁良访问了泰国，新任秘书长杨安民访问了日本，副秘书长恒群访问了澳大利亚。省新闻工作者协会和陕西日报的部门负责人和记者多次访问了日本、罗马尼亚及香港、澳门地区。在接待外国新闻团来访中，主动介绍他们去阎良西安飞机制造公司、西安卫星测控中心、咸阳彩色显像管厂、杨陵农科城，以及革命圣地延安等地访问。请省上



有关领导、有关部门介绍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就，尽量满足来访代表团的要求。不少外国记者说，陕西不仅有很古老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成就。不少外国记者回去写了整版或者连载有关陕西的报道，均配有照片，有的还出了摄影专版，放映了他们在陕西拍的电视片，有些还组织他们的亲属来陕西参观。

1983年张光访问日本时，看到日本的报纸采用电脑编辑、用树脂印刷，回国后即筹资引进技术。到1987年，陕西日报实现了树脂版、胶印、彩印等技术，开始用电脑编辑。张光又和日本奈良“日日新闻社”社长服部明行商谈，决定合建西安新闻大厦（后改名皇城宾馆），日方投资2000万美元，与陕西日报社合作于1990年建成开业。1989年，张光又率代表团去日本东京举行“1949—1989中国摄影大展”，宣传新中国以来的变化，日本10多家报刊作了报道，并出版了精美的摄影集。

## 二、陕西日报社

陕西日报社从1978年开始，承担《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日报》、《北京日报》、中国记者协会等中央新闻单位安排来陕访问外宾的接待工作。随着陕西和西安的对外开放，中央各新闻单位安排来陕的外国新闻代表团、记者、报社社长、高级评论员等日益增多。

### （一）接待来访

1979—1991年的12年间，接待来自35个国家和地区的55家新闻单位16个代表团（组），其中有法共《人道报》、《欧洲时报》和法新社记者，以及“北加莱海峡大区新闻代表团”、泰国的《泰叻报》、《新中原报》、泰国新闻记者代表团以及泰国自由报撰稿人等，美国的《橡树岭人报》、《西雅图邮报》、《威纳奇世界报》、《国际先驱论坛报》、《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底特律新闻》、《奥克兰论坛报》、《亚特兰大日报》和地方新闻团、记者团，肯特州大学、斯坦福大学新闻系师生代表团等，罗马尼亚共产党《火花报》、《自由罗马尼亚报》等，朝鲜的《劳动新闻》、《民主朝鲜报》、《平壤新闻》等，苏联的《真理报》、《红旗报》以及真理报政治观察家等，日本的《韩日新闻》、《时代周刊》、《静冈新闻》、《经济新闻》、《京都新闻》、《中日新闻社》、《共同通讯社》和神户新闻代表团，爱原心理研究所代表团等，联邦德国的《法克兰汇报》，民主德国的《每周邮报》、《新德意报》，南斯拉夫的《政治报》，瑞士的《新苏黎世报》和国际数学设备公司，澳大利亚的出版公

司代表团, 约旦的新闻代表团, 瑞典的新闻代表团, 挪威的《世界之路报》, 新西兰的《晚邮报》, 厄瓜多尔的《号外报》, 委内瑞拉的全国记协代表团, 希腊的新闻代表团, 土耳其的新闻代表团, 英国的《金融时报》、《每日电讯报》和汤普森基金会董事长, 记者贝尔夫妇一行等, 埃及的《金字塔报》、《共和国报》、《今日消息出版社》、《埃及进步报》以及《卡塔尔通讯社》记者, 西班牙的《西班牙国家报》, 印度的《印度时报》和漫画家莱克斯曼, 匈牙利的《人民自由报》, 奥地利的新闻代表团, 意大利的《信使报》, 意共《团结报》以及《共和国报》记者, 沙特阿拉伯的《穆斯林周报》, 几内亚的新闻代表团, 丹麦的《家庭杂志》和新闻代表团, 韩国的《韩国日报》代表团, 新加坡的《海峡时报》, 科特迪瓦的《博爱晨报》, 澳门地区的《澳门日报》, 英文《中国日报》、《工商时报》负责人大陆观光团等。

## (二) 组团出访

1963—1995年, 陕西日报社历任社长、总编辑、副总编辑随中央各新闻部门组团出访过美国、日本、联邦德国、奥地利、民主德国、前苏联、波兰、新加坡、泰国、瑞典、香港和澳门地区。1991—1995年, 陕西日报社因公出国人员共34人, 其中厅局级2人、副厅局级5人, 处级21人、副处级6人, 其他8人。分赴21个国家和地区进行新闻考察、业务交流、建立网络关系。1991年与罗马尼亚锡比乌县的《论坛报》, (相当于中国省报) 建立了两报社互访关系。1994年, 陕西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尹维祖率团对罗马尼亚锡比乌县进行了回访。

## 三、陕西广播、电视

陕西的广播电视与外国的最早联系, 可以追溯到1936年12月“西安事变”时的西安广播电台。当时, 在中共代表团周恩来的指示下, 负责电台工作的人员, 曾聘请当时住在西安西京招待所的美国作家史沫特莱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等协助, 举办英语广播, 宣传“西安事变”真相, 扩大国际影响。

新中国成立初期, 苏联、波兰、罗马尼亚、匈牙利、朝鲜等国的艺术团体来西安访问演出时, 西安人民广播电台对此都一一作了报道, 并转播了演出实况。1952年11月苏联文化代表团抵西安参加“中苏友好月”活动时, 西北人民广播电台曾举行广播大会, 在西安组织30万人收听, 并通知西北各地的转播站、收音站, 广泛组织群众收听。

1973年6月, 周恩来总理陪同越南党政领导人一行在延安、西安参观访

问时，陕西、西安人民广播电台和西安电视台派记者随团进行采访报道。同年9月，接待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团一行7人，到礼泉县考察农村有线广播建设情况。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外联络日趋活跃，陕西广播电台记者除经常报道国际友好人士在陕西、西安的活动外，同国外的广播电视机构的人员交往和工作联系也日益增多，其主要涉外活动是：

### （一）接待来访

1979—1982年，共接待了来自美国、英国、日本、法国等15个国家和地区来陕西的团、队、组共33个，154人次。

1983—1991年，共接待24个国家和地区来陕的团、队、组265个，1575人次。其中部长级代表团16个，参观交流团（组）145个，广播电视采访拍片队（组）104个，年平均接待量为29批左右。后5年比前4年的年平均接待量递增3.6倍，并呈现出来访层次越来越高，批量和人次越来越多。

### （二）合作交流

1985年7月，陕西电视台与日本读卖电视台签署两件业务交流协议书和备忘录。1986年双方又进一步达成协议，由陕西电视台每月向读卖电视台提供一期新闻节目，每期包括文化、体育、民俗等内容的新闻5—10条，约20分钟，由读卖电视台在日本播出；1991年，陕西人民广播电台与日本FM京都电台达成协议，由陕西人民广播电台每周向FM京都台提供陕西地方新闻（文化、民俗、城市生活等）8—10条，由FM京都台在日本播出。这些合作，为对外宣传陕西、宣传中国建立了比较固定的“窗口”。

1985年以后，省广播电视厅协助国（境）外的电视摄制队（组），拍摄了一批对外影响较大的电视专题片。如协助日本广播协会拍摄的《黄河》、《汉诗纪行》，协助日本TBS拍摄的《长城》（以上均为陕西部分），协助英国BBC拍摄的《中国童年》等等。增进了国（境）外对陕西历史、文化、风俗、民情和建设成就的了解。1991年9月，省广播电视厅还组织陕西电视台与日本广播协会合作摄制卫星直播《你早！西安》电视专题节目，在日本播出后引起了较好的反响。

改革开放以来，省广播电视厅通过组织参加国内外举办的电视节目展播，或以沿海兄弟省（市）广播电视机构为中介，直接或间接地把一批具有陕西地方特色的文化历史片、风光片、音乐片及电视剧输出到了国（境）外。截至1991年，共有33部157集专题片和电视剧，先后输出到美国、日

本、加拿大、法国、菲律宾等 15 个国家和地区的一些电视台播放。此外，陕西音像出版单位自 1988 年以来，还对外发行了一批音像制品。截止 1991 年共向国（境）外输出音像制品 70 多个品种，其中录像带《世界第八大奇迹》、《法门寺佛骨传奇》，盒式音乐带《唐长安古乐》、《中国古典乐曲精选》、《法门寺佛曲》等颇受欢迎。

### （三）派团出访

1954 年 7—9 月，西北人民广播电台台长毛岚随中央广播事业局组团访问苏联。

1979 年 3 月以后，陕西广播文工团团员负恩凤、张廷武、诸向和、王成一等曾先后随中国人民友好代表团和一些艺术团体赴泰国、菲律宾、美国、日本、法国、西班牙、葡萄牙等国访问或演出。同年 11 月，省广播事业局副局长胡旭参加中国广播电视代表团访问日本。

1984 年，省广播电视厅组织了第一批人员出国考察，到 1991 年共组织了 32 批 71 人次，赴联邦德国、日本、英国、菲律宾、罗马尼亚、加拿大、美国等进行访问、考察和技术培训，其中大部分是在 1988—1991 年间出访的。

1979 年 1 月至 1981 年 1 月，首次派出陈茂根赴马里共和国为其培训广播播音技术人员。从那时起到 1991 年，先后共组织 21 人 27 次分赴伊拉克、索马里、突尼斯、喀麦隆、吉布提、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加蓬、瓦努阿图等 8 个国家执行广播电视工程考察、设计、施工、技术合作、劳务等任务，共完成 8 个大型项目。参加援外的人员，均得到了受援国政府、中国驻外使（领）馆、联合国有关机构的赞扬和好评，其中有 4 人 6 次受到表彰。

## 第八节 宗教交往

西安是中国著名古都之一。佛教传入中国后再由中国传入朝鲜、日本和东南亚诸国，因此，西安在东南亚 12 个佛教国家有较大影响，尤其在日本影响深远。西安又是闻名世界的“丝绸之路”的起点，通过这条纽带，把中华民族文化同阿拉伯民族文化连接了起来，西安化觉巷清真大寺，就是这条纽带的结晶之一。

50—60 年代初期，陕西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的国际交往活动逐年增多，佛教与日本、缅甸、泰国、马来西亚、柬埔寨等国的

佛教界关系十分融洽。同时还接待了许多伊斯兰教国家首脑或宗教界领袖的访问。省、市宗教界知名人士郎明、乔清心、马良骥、田景福、许力工、慧雨、宽宗、常明、续洞等先后赴朝鲜、印度、伊朗、巴基斯坦、日本、缅甸等国家访问。

1. 1956—1979 年来访者自 12 个国家和地区 14 批 45 人。

1956 年 5 月 11—14 日，以自蒂党成员阿巴斯为团长、马斯友美党成员阿里·阿克巴尔为副团长的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教代表团一行 13 人，由广州乘飞机来西安参观访问。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委员马平甫和回教知名人士、阿訇等 30 余人到机场欢迎。据阿巴斯团长介绍他曾来过中国，回国后谈到观感时好多人都不相信，这次特请马斯友美党派人士前来西安参观。代表团在下榻的西安人民大厦前楼七层楼顶平台上观看了西安市容，在清真寺做了主麻。参观了西北国棉二厂、省博物馆、“根治黄河展览”、洒金桥西寺和北寺、大皮院寺和洒金桥回民小学。在参观中以青年联盟总书记渣里·隆兰（马斯友美党）、沙列苏埃迪（马斯友美党）、泉夫沙马（回教联盟）等人提问较多，主要是：西安人民大厦建筑设计是否有外国帮助？清真寺墙壁上的经典来源？所有回民是否会念经？回族是否还有多妻制？回族女工工资是多少？是否同工同酬？回族妇女无工资靠什么生活？中国人穿的衣服大都清一色是规定还是家贫？在不同场合询问路过寺院附近的居民、儿童以及工厂女工，让他们念一段经文，以此来看回民是否有真正的信仰自由。同年 5 月 20—21 日，巴基斯坦伊斯兰教代表团一行 10 人来访，着重是了解中国宗教政策、宗教信仰和经济生活状况，专访了化觉巷大清真寺，顺访洒金桥小学。

1957 年 9 月 21—23 日，日本佛教访华亲善使节团一行 16 人，在团长高阶珑仙率领下，由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周叔迦陪同，从太原乘航班抵达西安。参观游览市容、钟楼、博物馆、八仙庵，访问了慈恩寺、兴教寺、大兴善寺、广仁寺、卧龙寺。省宗教处处长王徐明向客人介绍了对寺庙的管理政策。

1959 年 7 月 6—8 日，锡兰和尚梯拉那加玛·拉达那沙拉乘火车来西安。参观了大雁塔、大兴善寺、八仙庵，访问了西北大学、西安交通大学，游览了名胜古迹。同年 7 月 24 日尼泊尔佛教代表团一行 6 人，由昆明抵京途经西安作短暂停留，乘车游览市容和大雁塔。

1963 年 10 月，日本佛教代表团一行 5 人在团长金刚秀一率领下，来西

安参观访问了兴善寺、大慈恩寺，还和这两个寺院的负责人永昶、慧雨就僧人的政治地位、宗教信仰和经济生活情况进行了座谈，提出如下若干疑问：宗教处和佛协是什么关系，宗教处做些什么工作；寺庙由谁管理，谁维修，谁出钱；寺庙房产交不交税款；两寺有多少和尚，和尚是儿童出家，还是成年出家，和尚每天作些什么事，早晚念什么经，生活来源靠什么；寺庙主持人要经谁批准；大兴善寺是不是密宗的根本道场，密宗现在哪些地方盛行；宗教信徒对保卫世界和平问题怎么看，怎样行动；到了共产主义社会，还能不能信仰宗教。省宗教处处长王徐明参加了座谈。经过提问和解答，团长和几位参与提问的团员，认为从现场参观访问，证明中国各级政府都很重视宗教活动。10月5—7日，日本佛教代表团一行8人，参观了兴善寺、大慈恩寺、省博物馆和农业社，省政府副秘书长郭力道和西安市副市长张锋伯接见并设宴招待。10月9—12日，应邀来中国参加鉴真和尚逝世1200周年纪念活动的日本文化界（大学教授、宗教评论家、作家、美术评论家、中学教员）代表团一行6人，参观了大雁塔、乾陵、兴善寺、大明宫遗址和省博物馆，在参观中拿出自己绘制的“唐代长安名城坊图”和古迹位置对照修改注释并说：“作为日本人，访问长安是梦寐以求的事。”对外文协西安分会副会长武伯纶设宴招待。

1964年6月，来自柬埔寨、斯里兰卡、印度、老挝、尼泊尔、巴基斯坦、越南和越南南方等国家和地区的佛教界代表，出席中国文化界、佛教界举办的玄奘法师逝世1300周年纪念会。同年7月，中国佛教代表团出席了日本文化界、佛教界举办的玄奘三藏圆寂1300周年纪念会。

1966年5月3—6日，日本宗教学会评议员佐木秋夫，由国务院宗教事务局陈仲瑶陪同，前来西安参观访问了青龙寺遗址、大雁塔、兴善寺、兴教寺、天主教南堂等，并就帝国主义如何利用天主教问题进行了专题座谈。西安市天主教爱国会主任高宗才应邀参加。省宗教处设宴招待。同年8月5日，日本真言宗丰山派访华代表团一行6人，来西安参观了工厂和人民公社，游览了名胜古迹，专访了青龙寺遗址和与密宗有关的寺庙，观看了陕西地方戏曲，省和大副主席张汉武接见代表团，西安佛协设宴招待。

1976年5月23—26日，日中友好佛教协会代表团一行18人，来西安参观访问，抵离时省友协会长鲁曼、副会长董学源、理事权秉华等到机场迎送，并陪同参观佛教寺庙，游览名胜古迹。省革委会副主任章泽会见并宴请。

1977年9月，日本净土宗在京都成立“日中友好净土宗协会”。一个佛教宗派成立中日友好组织这在日本还是第一个。10月16—17日，日中友好佛教协会第二次访华团一行15人来访，抵离西安时，省友协会长鲁曼、副会长董学源等赴机场迎送，并陪同参观佛教寺庙，省革委会副主任章泽会见并设宴招待。

1978年10月13—14日，应中国佛教协会邀请，以塚本善隆（日中友好佛教协会会长、日中友好净土宗协会理事长、原京都府国立博物院院长、著名佛教学者）为顾问，稻冈觉顺（净土宗宗务总长、日中友好净土宗协会会长）为团长的日中友好净土宗协会第一次净土宗代表友好访华团一行22人来西安参观访问。抵离时，省友协会长鲁曼、副会长刘钢民、友协理事刘守忠、全国佛协理事常明等15人迎送，参观了省博物馆、大雁塔，朝拜了香积寺，与全国佛协理事永昶居士交谈了宗教政策。省革委会副主任章泽会见并设宴招待。

2.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陕西宗教界的对外交往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1979—1991年的23年间，来自31个国家和地区205批3114人抵西安参观访问。特点是团组大、人数多、法会频繁，其中日本佛教界来访居首位。

1980年5月14日，为纪念善导大师圆寂1300年，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副会长正果法师，陕西佛协会会长许力工暨西安市佛协百余人，同日中友好净土宗协会副总裁稻冈觉顺和会长武田彦率领141人的“友好之翼”和雅乐团（中国唐代的一种宫廷音乐）在长安香积寺举行隆重的纪念法会。在寺院塔前礼佛膜拜、诵经。还举办了“日中友好净土宗书法展览”以及书法表演，日本书法家挥笔写下了“日中友好、源远流长”等大字。日中友好净土宗副总裁稻冈觉顺激动得热泪盈眶说：“中国是日本净土宗的灵魂故乡，是日本人的父母之国。日中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就像香积寺旁的镐河和泾河两条河流会合一样的源远流长。日中两国人民要世代子子孙孙友好下去。”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前首相福田赳夫，自民党总务会长宫泽喜一、文部大臣松永光等，从日本发来电报，对日中法会的圆满成功表示祝贺。

1982年4月12—16日，日本日莲宗访华团一行54人，在大导师日莲宗管长金子日威，副导师、访华团团团长松井大周率领下，于4月13日在户县草堂寺同中国佛教协会、陕西佛教协会联合举行了“鸠摩罗什三藏法师尊像奉安开光法会”，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陕西佛教协会会长许力工出席

了法会。法会充分尊重双方各自的仪式习惯，诵经时，日方坐诵，中方站诵。名誉团长日本佛教协会会长，日莲宗管长金子日威说：“我们共同举行了一次非常成功的、难忘的法会，能在鸠摩罗什三藏法师翻译《妙法莲花经》的草堂寺举行这样成功的法会，完成了我终生夙愿。”并表示“今后愿为日中友好和发展两国佛教界友谊贡献力量。”

11月15日，是日本净土宗宗祖法然上人诞辰850周年纪念日。值此，中国佛教与日本“净土宗奉献善寺、法然二祖对面彩像访华团”一行百余人，在香积寺举行了二祖对面像开光法会。日本朋友还给香积寺赠送了经卷、二位宗祖遗照和其他佛门用物器等。

1984年9月7—10日，日本真言宗访华团一行222人来西安参观访问，主要是参加“惠果·空海纪念堂”落成庆祝大会和所举行的法会。西安市市长张铁民，访华团团长安部野龙正和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分别在大会上讲话，国务院发来贺电，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发来祝辞，省、市有关方面代表百余人参加大会。

1985年5月13日，陕西省佛教代表团一行6人在许力工居士率领下访问日本。10月4—11日，西安市佛协副会长、慈恩寺监院王龙义等一行3人，赴日本奈良市参加阿倍仲麻吕纪念碑落成仪式。10月25日，在兴善寺唐转法轮殿遗址前的草坪上，举行地藏菩萨铜像（日本真言宗空海大师同志会祖庭所赠送）开眼法会，由会长中尾宽澄、副会长佐藤弘念率领169位佛门弟子参加。同年12月世界佛教联谊会副主席、新加坡佛教总会会长、李光耀私人顾问宏船法师来西安访问，副省长孙达人会见并设宴款待。

1986年4月13日，为纪念小野妹子入华1380年，日本“现代遣隋使”访华团访问了兴善寺，并演出了唐代的雅乐。11月1—10日，西安市兴善寺法师刘永明等一行3人出访日本，参加日本辩天宗供养塔落成5周年纪念法会。

1988年11月9日，举世瞩目的释迦如来真身舍利瞻礼法会和真身宝塔落成典礼在扶风县法门寺举行。出席法会的有省政协主席周雅光、副省长孙达人等。应邀参加法会的国内外来宾有：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周绍良、刁述仁、圆拙；新加坡宏船法师、广洽法师及随行善信居士；日本净土宗水谷幸正、福田泰道等，日本法隆寺木井田秀山、高田良信等，日本临黄协会福岛庆道、有马濑底等；澳大利亚、香港地区的善行居士。还有国内各地的僧众共200余人。附近善男信女



数千人也参加了法会活动。

1991年4月30日—5月4日，应日本冈山县和气町町长藤本道的邀请，以省佛协副会长常明法师为首的代表一行4人，对日本冈山县和气町进行访问，并参加了在那里举行的紫藤节（此乃当地传统节日，其历史源远流长。每当5月紫藤花盛开时节，当地民众就像迎接盛大节日似的举行各种活动，以示庆祝）。

### 第九节 旅游交往

陕西的国际旅游业起步于50年代中期。1956年6月中国国际旅行社西安分社成立，当时主要接待来自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旅游者。1960年后，西欧和北美等国家的旅游者逐渐增多。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旅游工作机构瘫痪。1972年随着中美关系解冻和中日邦交正常化，来陕西的外国旅游者逐年增多。1974年在省外办内设旅游组，恢复了旅游业务，当年接待国外旅游者2000多人。1976年后，旅游人数持续增长。旅游事业出现了新的发展势头。

1978年6月23日，省革委会以陕革发〔1978〕95号文，决定成立陕西省旅行游览事业管理局（以下简称省旅游局）。在贯彻“积极发展、量力而行、稳步前进”和“友谊为上，经济受益”的方针中，省旅游局会同有关部门在共同开发旅游资源，加强网络建设，发展旅游项目，开拓海外市场，以及改善旅游环境、加强基础设施和培训旅游队伍等诸多方面作出了积极努力，并把逐步发展陕西国际旅游业，形成新兴的经济产业，纳入全省国民经济发展计划。

表3-8-1 1978—1985年陕西省接待国外旅游者人数和外汇收入情况一览表

项目 年代	国外旅游者人数(人)	比上年增长(%)	旅游外汇收入(人民币万元)	比上年增长(%)
1978	13714		305	
1979	26947	96.5	775	154.1
1980	40047	48.6	1757	126.7
1981	67029	67.4	2481	41.2
1982	90948	35.7	3172	27.9

续表

年代 \ 项目	国外旅游者人数 (人)	比上年增长 (%)	旅游外汇收入 (人民币万元)	比上年增长 (%)
1983	123764	36.1	3849	21.3
1984	151324	22.3	4712	22.4
1985	211537	39.8	7099	50.7
合计	726089		24150	

1985年5月7—13日，省外事旅游工作会议结束时，省长李庆伟在讲话中指出：“省委、省政府决定把发展旅游事业作为振兴陕西经济的突破口，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决策。”并强调要做到三个转变：要从只抓国际旅游转到国际、国内一起抓；从主要搞旅游接待转变为开发旅游资源、建设旅游点与接待并举；从以国家投资为主建设旅游基础设施转变为国家、地方、部门、集体、个人一起上，自力更生与利用外资一起上，配套抓好吃、住、行、玩几方面的工作。明确提出把发展旅游业作为振兴陕西经济的突破口，第一次确定了旅游业在陕西经济发展中的战略地位。

1986年，全省共接待国际游客257832人，完成计划的103%，比上年增长21.2%。其中旅游部门接待201626人，完成年计划的96%，比上年增长17.5%，全省旅游外汇收入12133万元，完成年计划的134.9%，分别比上年增长70.9%和73.9%，占全省旅游外汇收入的25.8%。同年8月26日—10月8日，陕西旅游部门在法国巴黎举办了“中国展望月旅游展览”；同年11月，在西安举办了“首届长安国际书法年会”，美、日、法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旅行社负责人及书法家出席了这次盛会，开拓了旅游客源市场。

1987年，主要筹办了龙年国际旅游年活动。根据国家旅游局的部署，省政府以陕政办发〔1987〕247号文，成立了龙年国际旅游年活动组织委员会。名誉主任：章泽（省顾委会主任）侯宗宾（代省长）、张斌（副省长），主任：孙达人（副省长），副主任：陈兴亮（省旅游局局长）、张世卿（省政府副秘书长）、张富春（西安市副市长）、李沙铃（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委员14人，由省旅游局、省外办、省文化厅、省经贸委、省商业厅、西北民航局、省侨办、省财政厅，西安市外办、市旅游局、市园林局、市公安局、市商业局，以及临潼县、咸阳市等组成。同年12月12日，组委会在西安宾馆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向海内外作了报道。12月31日晚，在西安宾馆举行了以“龙”为主体的、富有浓厚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的旅游活动开幕式，副

省长张斌、孙达人等出席并会见外国游客。

省旅游局结合文物展览、外贸展销等，先后在日本大阪、加拿大多伦多、美国迈阿密、英国和香港地区举办了国际展览。同时对国际客源市场进行了调研，推出陕西的旅游线路，使陕西旅游宣传开始走向国际市场。外联工作有了新的发展，全省通过各种渠道，自主外联国外旅游者 2.4 万人，比上年增长 34.4%。

全年接待来陕西的国外旅游者 30.1 万人，其中旅游部门接待 24.1 万人，分别比上年增长 16.9% 和 19.6%。华侨 3882 人，比上年减少 48.6%，港澳同胞 1.9 万人，比上年增长 37.4%。全省旅游创汇收入合人民币 1.67 亿元（折合 4478.8 万美元），比上年增长 17.5%。

1988 年沿着上年筹办的“龙”年活动内容开展了旅游宣传、外联工作，主要是：2 月 27 日省政府常务会议，对祭祀人文始祖仪式作出公祭和民祭分开举行的新规定。3 月 4 日下午在省政府黄楼举行陕西省“龙年祭祖旅游活动”新闻发布会，通过新闻发布会向海内外作了详实报道。同时在全省各方面的大力配合下，1—12 月，推出了龙年古城灯会、公祭与民祭黄帝陵、登华山苍龙岭、龙年文物展、国际书法交流活动、法门寺珍宝展、龙年旅游商品交易会、地方风味自助餐、龙年民间艺术等 15 个富有陕西地方特色的旅游活动项目，改变了过去旅游内容单调的现象。

全省旅游部门先后在法国的里昂、巴黎，联邦德国的西柏林，以及日本举办了国际旅游展览。通过这些活动，使西欧客源稳定增长，联邦德国旅游者比上年增长 59.5%，在来陕的外国游客中居第三位。同年德、英、法、意 4 国来陕旅游人数占国外游客总数的 30%，市场份额明显增加。

全年共接待近百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旅游者 365735 人，比上年增长 21.3%。其中旅游部门接待 319780 人，比上年增长 32.6%。在接待总人数中，外国人 288920 人，华侨 4797 人，港澳 72068 人，分别占 78.99%、1.31% 和 19.7%，平均每一海外旅游者在陕停留 1.99 天，比上年略有减少。旅游收入 21179 万元外汇人民币（折合 5693 万美元），比上年增长 26.8%。

1989 年 1—5 月，旅游业保持稳步发展势头，接待海外旅游者和旅游外汇收入分别比上年同期增长 76.7%、34.1%。由于“六四”政治风波的影响，旅游业受到严重冲击，出现滑坡，经各方面的努力，下半年开始逐步回升。

为开拓旅游市场，以省旅游局副局长王步唐、张慎行、王克坚等为主组

团和派员 14 起 58 人，分赴英、美、德、法、比等 7 个国家与香港地区，参加国际旅游博览、业务考察和推销招徕。同年 6 月 1—30 日，由香港荔园游乐场（宋城）邀请，与陕西省旅游局合作举办“西安月”活动，向香港各界表演了《唐·长安乐舞》、巨笔书法、仿唐清真宴、剪纸、民间面塑艺术表演等 8 个项目，同时，国旅西安分社、省中旅还举办了两次香港旅游界招待会。同年 9 月 26—28 日，受国家旅游局委托，以省旅游局为主会同省外办、省文化厅、省公安厅、省图书馆、省艺术研究所、省群众艺术馆、西安电影制片厂、西安市旅游局等，在西安电影制片厂的影城秦王宫大殿举办了旅游日庆祝活动，应邀来陕的 1470 多名内外宾，其中来自美、英、法、意、日、比、马来西亚、南斯拉夫、联邦德国、朝鲜、匈牙利、西班牙、新西兰、捷克、韩国、荷兰、新加坡、菲律宾、泰国、芬兰、苏联、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尼、墨西哥、瑞士、加纳和联合国开发总署等 33 个国家以及香港、澳门地区的代表团组 565 人。内有驻华使节 12 人、国外记者 26 人、国外旅游商 54 人、世界旅游组织负责人 3 人、驻京旅游机构代表 8 人、外航 5 人。同时还有 215 家海外旅行社的负责人。

在各方面的努力下，全省共接待海外旅游者 212036 人，比上年下降 42%，其中外国人 137861 人，华侨 1446 人，分别比上年下降 52.3% 和 69.9%；港澳同胞 72729 人，比上年增长 0.9%。平均每一旅游者在陕西停留 1.94 天，比上年减少 0.05 天。旅游收入 1421 元人民币，比上年下降 33.2%。

1990 年旅游工作主要是深入贯彻治理整顿、深化改革的方针，开拓旅游市场、争取客源尽快回升，以省旅游局局长孔庆森、副局长王克坚、张慎行等为主组团和派员 60 起 123 人次，分赴德、俄、日、意、比、美、英、加拿大、马来西亚等 17 个国家和香港地区参加与举办旅游博览会、旅游商品交易会、业务洽谈、参展等外联宣传推销活动。全省接待海外旅游者 25.88 万人，比上年增长 22%，恢复到 1988 年历史最高水平的 70.7%。其中旅游部门接待 22.42 万人，占接待总人数的 86.7%，比上年增长 21.4%。在接待总人数中，外国人 13.97 万人，华侨 4866 人，港澳 11.41 万人，分别比上年增长 1.3%、240%。全年旅游收入合人民币 19778 万元（折合 4172 万美元），比上年增长 39.2%，恢复到 1988 年的 93%。平均每个海外旅游者在陕停留 2.03 天，比上年增长 0.09 天。

1991 年陕西旅游工作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实施国际旅游与国内旅

游并举，坚持一手抓宣传促销，招徕旅游客源，一手抓行业管理，提高服务质量和经营水平，使创汇上台阶。主要工作是：开拓客源市场，组织近百人到国外开展外联宣传活动，并重点参观了法国的巴黎、日本的大阪、英国的伦敦和香港等城市举办的国际旅游博览会，同时还派各旅行社经理分赴美国、泰国和新加坡等国的主要城市进行旅游市场考察。

同年10月2日，由国家旅游局主办的1992年中国友好观光年丝绸之路首游式在西安举行。参加这次活动的有中国光大旅行总公司、国旅总社、青旅总社、康辉旅行社、民间国际旅游公司、华运旅行社、金桥旅行公司、天鹅国际旅游公司和体育旅游总公司9家中央一类社。陕西省旅游局承办14条专线中第一条线路的首游式。国家旅游局副局长程文栋、副省长郑斯林出席首游式并致词。美国、日本、法国、意大利、西班牙、泰国、马来西亚、澳大利亚、新加坡、菲律宾、埃及、土耳其等24个国家和地区的1750名旅游者，西北五省（区）旅游局和中央一类旅行社的负责人冒雨参加了首游式。西安作为“丝绸之路”的起点，首游式会场设在西安古城西门瓮城内，城墙四周悬挂着彩旗，中国古代武士和宫女载歌载舞喜迎嘉宾，乐师在骆驼上演奏，旅游者持仿汉代度牒登上城楼，加盖古长安关防印和地方长官签名章，并与陕西省著名书法家和少年儿童书画者一起参加百米长卷签名仪式。陕西省歌舞团、杂技团等演出了“唐·长安乐舞”、古典杂技和长安古乐等。各旅游涉外饭店推出各具特色的风味食品，西安市邮票公司发行了“丝绸之路”首游式纪念封和有关“丝绸之路”的集邮品，同时还开创了西安古文化艺术节，临潼石榴节、安康龙舟节，汉中市举办了“三国旅游”知识全国竞赛，商洛地区举办了丹江漂流等旅游活动。

同年10月28日，应国家旅游总局邀请的新加坡前第一副总理、中国政府旅游顾问吴庆瑞博士及助手潘瑞莲，由国家旅游总局局长刘毅陪同抵达西安参观访问，副省长郑斯林会见了吴庆瑞博士一行，10月30日吴庆瑞一行乘航班赴兰州，继续参观访问“丝绸之路”。

全年接待海外旅游者3101万人，比上年增长19.8%，为1988年历史最高水平的84.8%，其中旅游部门接待28.85万人，占接待总人数的93%。接待总人数中，外国人23.78万人，华侨、港、澳同胞等7.23万人，平均每—海外旅游者在陕停留2.42天，比上年增加0.29天。省旅游局本身接待了来自美国、日本、法国、意大利、西班牙、泰国、马来西亚、澳大利亚、新加坡、菲律宾、埃及、土耳其和罗马尼亚的旅游界官员、知名人士11批、

记者 15 批；接待国内新闻单位记者 26 批，各省市旅游局考察团 39 批，通过他们采访考察和专题交流，在国内外报刊上撰写文章，在政界、民间起到了为陕西义务推销和宣传的效应。

全省旅游收入 2.93 亿元人民币（折合 5482 万美元），比上年增长 47.9%（美元增长 31.4%），比 1988 年历史最高水平增长 37.5%（美元下降 4.196%）。

## 第九章 现代人物

### 第一节 涉外人物传略

张奚若（1889—1973），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原名张白、字熙若，又名志民。陕西朝邑县（今属大荔县）人。早年参加同盟会，积极推动辛亥革命，并在美国留学深造。归国后与胡适创办《现代评论》杂志社，历任中央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抗日战争时期是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积极拥护共产党的主张，对国民党的内外政策持不同政见，抗战后期拒绝出席参政会，一贯鼎力支持并参加国民党统治区的学生民主运动。

1949年9月代表无党派民主人士，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华北人民政府高等教育委员会副主任，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务委员；政务院政法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教育部部长、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是第一、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二、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20多年来，努力从事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和人民外交活动，不辞劳苦，鞠躬尽瘁，作出了诸多有益的贡献。1973年7月18日在北京逝世，终年84岁。

张仲实（1903—1987）又名安人，陕西陇县人。著名马列主义著作翻译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1926至1928年受中国共产党的派遣去苏联学习，并在张闻天领导的翻译班从事马列主义教材的翻译工作。1930年回国。翌年去上海，主要从事进步文化活动和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理论的传播工作。他参加了邹韬奋主编的《大众生活》的编辑工作，1935年起担任生活书店总编辑，后兼任理事会主席。为传播革命思想、团结广大进步作家和读者，动员全民抗战作出了重大贡献。

30年代他先后翻译了恩格斯的《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斯大林的《论民族问题》、普列汉诺夫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等著作。这些著作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教育了一代革命青年，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在

中国的传播起了重大作用。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先后在中共中央宣传部、马列学院和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担任马列学院编译部主任等职，他参加了《列宁选集》20卷本译稿的校审工作，后来又参与了毛泽东主席亲自负责编辑的《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一书的编选工作。1947年初他率领延安中央慰劳团赴山西前线慰问，发现了刘胡兰烈士的英雄事迹，立即上报中央，并建议中央大张旗鼓地宣传她的事迹。中央同意了 this 建议，毛泽东主席亲自为刘胡兰烈士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1947年为配合中央研究土地问题编辑了《马恩列斯毛论农民土地问题》。全国解放前夕，中央为了提高全党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决定编一套《干部必读》，共12种，他负责编辑了其中三种：《列宁斯大林论中国》、《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简史》。他为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编译出版和干部理论教育做了大量工作，为党的理论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在中宣部先后担任出版处处长、国际宣传处处长，并兼任中苏友协总会副总干事。1953年6月调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宣传部副部长，1954年10月西北局撤销后，又调任中共中央马恩列斯编译局副局长。30多年来，他为完成党中央决定翻译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和《斯大林全集》的任务，日夜操劳。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打击迫害。粉碎“四人帮”后，精神振奋，仍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精神，继续为宣传马列主义发挥余热，抱病写成了通俗简要的《马克思恩格斯传略》和《列宁传略》。曾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全国政协第四、五届委员和第六届常委。他还担任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会、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统战理论研究会的顾问。1987年2月13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4岁。

**潘自力**（1904—1972），原名定九（鼎九），化名志励、自励、田树荣。陕西华县人。1923年在北京加入“共进社”，同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11月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6年1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同年冬由苏联回国。1927年5月任长安县委农协宣传部长，共青团陕甘区委书记兼区委宣传部长。同年9月当选为中共陕西省委候补委员，任中共陕西省委东路特派员兼中共渭南县委书记，后任中共西安市委书记，中共陕西省委常委。1928年1月代理省委书记。同年5月在任省委书记期间，组织领导了渭华起义。同年11月被国民党当局逮捕。1930年杨虎城在陕西主政时获释。



1931年至1933年获得杨虎城资助赴欧洲留学。1933年由苏联回国，在川陕边红四方面军工作，曾任中共川陕省委宣传委员会副主任。1934年至1936年在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高级指挥科任政治教官，参加红军长征。1936年在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领导下负责群众工作，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作出了贡献。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先后任陕西省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组织部长，中共西安市委书记，中共陕西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晋察冀野战军政治部主任，十九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建国后，任中共宁夏省委书记、省政府主席，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陕西省委书记、省人民政府副主席。1955年1月至1956年2月任驻朝鲜大使，1956年4月至1962年7月任驻印度大使，1956年4月至1960年8月兼任驻尼泊尔王国大使，1962年8月任驻苏联大使。在复杂的国际关系中，他坚定地贯彻执行党的外交路线，认真地按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办事，在重要的外交斗争中正确地判断形势，灵活地运用策略，在朝鲜、印度、尼泊尔和苏联期间，工作都是卓有成效的。他是中共第八届候补中央委员，第一、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文化大革命”中他遭到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精神和肉体都受到严重摧残，他患有心脏病，但仍被下放干校劳动，后来又被强迫“退休”，送往山西的一个偏僻乡村。1972年5月22日在山西霍县含冤去世，终年68岁。1979年2月26日，中共中央对潘自力的冤案予以昭雪。

**王炳南**（1908—1988），又名达尼。陕西乾县人。1925年在三原读书时加入共青团，1926年转为中共党员。后在乾县、淳化等地从事党建工作。任中共乾县特支书记，组织农民开展抗粮抗捐斗争。1928年在杨虎城部队做党的地下工作。1929年由杨虎城资助赴日本、德国留学，在德国期间任德共中国语言组书记、国际反帝大同盟东方部主任、旅欧华侨反帝同盟主席。1936年春奉党的指派从德国回国，做争取杨虎城和十七路军的工作，以推动团结抗日促进国共第二次合作。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过程中，协助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做了许多重要工作。由于在西安事变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受到毛泽东主席表扬。西安事变后，任西北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1937年后在上海、武汉、重庆等地做党的统一战线国际宣传和外事工作，历任上海文化界国际宣传委员会常务委员，全国各界救国会中央常委，中共与民主革命同盟的联系人，中共中央南方局国际宣传组负责人、外事组组长、中共中央南方局候补委员。1946年国共重庆谈判期间，任毛泽东主席的秘书，协助处理谈判的一切工作。重庆谈判结束后，随周恩来来

南京，任中共驻南京代表团外事委员会第二副书记兼发言人。1947年国共谈判破裂后，相继在延安、晋绥和西柏坡工作，担任中共中央外事组副主任。

建国初期协助周恩来总理筹组外交部做了大量工作，并任外交部办公厅主任、部长助理。1955年3月至1964年4月任驻波兰大使兼中美大使级会谈中方第一任首席代表。1988年2月24日，他在病床上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中美大使级会谈始于1955年8月1日至1970年中断，长达15年，会谈136次。谈判时间之长、次数之多、交锋之激烈，在现代国际关系史上实属罕见。”这一时期还是美国当局极端敌视中国，中美两国处在隔阂和互相对立的年代。他在谈判中坚定地执行中国的外交政策，始终不渝地维护中国的利益和尊严。1964年奉召回国，同年4月至1975年任外交部副部长。“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受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身心健康受到摧残，亲属受到迫害。1975年恢复工作，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党组书记。他以顽强的革命意志和充沛的精力，积极开拓工作局面，广泛开展对外民间友好活动，为增进中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做出了重要贡献。1987年11月荣获“波兰人民共和国功勋勋章”。是中共十二大代表，第一、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会委员和外事委员会委员。1988年12月22日在北京逝世，终年80岁。

**张光天**（1912—1980），原名张希浩，曾用名古田。陕西周至县人。1932年加入共青团，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12月在陕北公学学习。学习结束后，在延安中直机关和西北局先后任秘书、干事、股长等职。1946年在周至、眉县一带从事地下工作。1949年6月周至解放，任周至县长。1950年至1953年在中共中央西北局工作，先后任处长、副局长等职。1954年至1958年任中央劳动干部学校副校长、劳动经济学院副院长。1960年5月任中国驻蒙古大使馆参赞。1962年8月奉调回国，调任陕西省劳动局副局长。1980年6月18日逝世。终年68岁。

**安致远**（1921—1987），陕西绥德县人。1980年任中国驻日内瓦的联合国代表，1983年3月至1984年3月，任驻联邦德国大使。1987年12月逝世，终年66岁。

## 第二节 陕西籍外交官名录

表 3-9-1

驻外大使一览表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籍贯	驻在国或国内工作部门	备注
符浩	男	1916	礼泉	1972年5月至1974年9月任外交部副部长 1974.9—1977.4任驻越南大使 1977.8—1982.2任驻日本大使	
史梓铭	男	1917	子长	50年代曾任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副会长, 后任驻芬兰、布隆迪大使	
李强奋	男	1917	西乡	1955年调外交部工作, 1969.7—1972.6任驻也门民主共和国大使、1972.9—1977.9任驻赞比亚大使、1982.6—1984.6任驻民主德国大使。	
李连璧	男	1917.12	华阴	1961—1980.6从事外交工作, 1972.5—1976.2首任驻比利时王国特命全权大使, 1973.2—1976.2兼首任卢森堡大公国特命全权大使、驻欧洲经济共同体代表团团长, 1976.8—1980.6任驻刚果特命全权大使。	回陕后曾担任副省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委外事领导小组副组长、组长, 省对外友好协会会长。
鲁明	男	1917	临潼	建国后长期从事涉外工作, 1981.4—1983年任驻科威特大使等职。	
贾怀济	男	1919	神木	1976.2—1979年任驻几内亚(比绍)共和国大使, 兼任佛得角共和国大使, 1980.3—1985.7任加纳大使。	
杨克明	男	1920	富平	1959.12—1974.5在外交部任司长, 1974.9—1979.4任驻加纳、肯尼亚特命全权大使兼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常驻代表。	1957.5—1959.11任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大使馆政务参赞。

续表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籍贯	驻在国或国内工作部门	备注
雷阳	男	1920	淳化	1975.5—1979.11 任驻冈比亚第一任大使, 1980.4—1985.2 任驻尼日利亚特命全权大使。	
田丁	男	1928	渭南	1983.3—1985.3 任驻塞拉利昂大使, 1986 年任驻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大使。	从 1951 年起从事涉外工作

表 3-9-2

驻外参赞一览表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籍贯	驻在国或国内工作部门	备注
王仪	女	1917	清河	从 1956 年起任文化部涉外文化联络工作, 后任驻缅甸大使馆文化参赞, 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等职。	
土金璋	男	1921.10	淳化	1954 年至 1990 年一直参预涉外活动。其中 1954.10—1956.9 任驻朝鲜大使馆一秘, 后任驻罗马尼亚大使馆政务参赞。	1964 年回国后, 先后任延安行署专员时兼管外事工作, 任西安市副市长时兼外办主任, 省对外友协副会长, 西安市海外联谊会名誉会长等职。
杨修	男	1933.3	礼泉	1954.9—1994.6 从事外事工作, 曾任驻缅甸、阿根廷、英国、丹麦等大使馆一秘或二秘工作, 1987.3 回国后先后任外交部香港、澳门事务办公室参赞和领导成员。	在多年的工作中, 曾翻译出版《外交官生涯》、《英国外交官生涯》、《丹麦城乡合作组织》以及美国前总统卡特回忆录; 在《中国少年百科全书》、《出国知识概览》等书中撰写有部分章节。

# 第四篇 陕西侨务

(1949—1996)

## 第一章 组织机构

1940年9月5日，“延安华侨救国联合会”在延安正式成立。参加成立大会的有归国侨胞170余人。王明、洛甫、吴玉章出席成立大会并讲话。当时会员约326人，在边区工作的大约有282人。“延安华侨救国联合会”先后易名为：“中国延安华侨救国联合会”、“中国解放区归国华侨联合会”。

新中国成立后，陕西省侨务工作由省民政厅民政处管理。省民政厅民政处管理的职责是：管理在校的归侨留学生；安置归国华侨，解决省内归侨的生活困难、就业、调动等问题；负责侨汇创收和管理。主要是内侨工作。当时，省民政厅暂时没有负责华侨华人的来陕接待工作，这项工作先后由西北军政委员会交际处、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交际处、陕西省人民委员会交际处来具体负责，省民政厅只是参与。所以，这一时期的侨务工作机构呈交叉形，省民政厅管内侨，交际处管外侨，一直延续到1959年。1959年10月19日省人委（1959）会办贺字第293号文给省民政厅的接待工作批复中决定：“关于今年国庆节回国华侨的接待工作，仍由交际处负责办理，你厅参加必要人员协助，不必再成立接待机构，今后有关归国华侨的接待工作，应由你厅办理。”此后，华侨华人及港澳同胞的接待工作交给了省民政厅，才完全承担了全省的侨务工作，直到1966年。

### 第一节 省外办华侨组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侨务工作仍由省民政厅负责。以后群众组织夺权，“文化大革命”后期省民政厅又变为生产组，侨务工作基本中断，也没有相应机构，只是有些接待活动由省外办兼管。1974年，根据全国外事会议精神，侨务工作划归省外办。1974年7月21日，以陕发〔1974〕7号文，成立了陕西省革命委员会外事办公室，下设华侨组，对外正式称陕西省中国旅行社和陕西省华侨旅行社，负责全省侨务工作和华侨等（华侨、华

人、港澳同胞)的接待工作。鲁曼任省革委会外事办公室领导小组组长,省外办任命王华山为华侨组组长。

## 第二节 省侨务办公室

### 一、侨务处

1977年至1978年8月,省外办华侨组仍负责全省的侨务工作,主要是落实侨务政策和负责接待工作。1978年7月20日,根据中共中央3号文件精神,省革委会下发了陕革办发〔1978〕5号文,决定成立陕西省革命委员会侨务处,行政编制5人,仍由省革委会民政局代管。1978年8月21日陕革计党发〔78〕29号文任命顾元为陕西省革命委员会侨务处处长,这是陕西省第一个专司侨务的机构。1979年11月6日,省革委会办公厅下发陕革办〔1979〕37号文《关于省侨办、侨联机构和人员编制的通知》中决定:“省革委会同意将陕西省革命委员会侨务处改为陕西省革命委员会侨务办公室,仍由省民政局代管,同时成立陕西省归国华侨联合会,省侨联不设专门办事机构,日常工作由侨务办公室办理。省侨务办公室编制10人,使用行政编制”。这时,侨办虽属处级单位,仍由民政局代管,但侨务工作相对独立。

1979年12月,召开陕西省第一次归国华侨大会,成立了陕西省归国华侨联合会,选举产生了陈明为陕西省侨联主席,方福林、陈平波、苏明、吴庆云、郭兆英、顾元为陕西省侨联副主席、顾元为秘书长(兼)。省侨联成立后,没有专职人员,日常工作由省侨办承担。

### 二、省侨务办公室

1981年10月27日,省委常委会第80次会议决定:省侨务办公室改为陕西省人民政府直属局级单位,陕西省归国华侨联合会是省委领导下的人民团体,等同省工、青、妇、科人民团体。同年12月14日,省委组织部陕组干(1981)267号文决定:彭士钦任省侨办副主任、省侨联副主席兼秘书长。省侨办主任(缺)。

1984年7月21日,省委常委会决定,省侨办和省侨联合署办公,归省委统战部领导,编制20人,成立一个党组。同年10月24日,省政府办公厅以陕政办发〔1984〕164号文《关于加强侨务工作的通知》中规定:(一)、

省侨办属陕西省人民政府序列，由一名副省长分管；（二）、各地市侨务机构由地市根据加强侨务工作的精神，按实际需要确定；（三）、陕西省中国旅行社归省侨务办公室管理，实行中国旅行社和省侨办双重领导，11月底以前省旅游局和省侨办完成交接。此时，陕西省侨务工作已经进入发展时期，机构设置相对合理，但省侨办和省侨联仍然是合署办公。翌年，省编委以陕编发〔1985〕033号文规定：省侨办、省侨联设秘书处、侨政处、联络经济处。陕编发〔1985〕041号文给省侨办侨联增加编制为20名。1985年3月13日，省委以陕组干任字〔1985〕52号文任命苏明为陕西省侨务办公室主任，杨明为陕西省侨务办公室副主任；省委以陕组干任字〔1985〕43号文任命杨明为陕西省侨务办公室党组副书记；同时，任命方坚、林端为党组成员；当时，没有任命党组书记，杨明主持党组工作至1987年。1990年9月8日，省委以陕组干任字〔1990〕400号文任命王步唐为陕西省侨务办公室党组书记，1990年11月6日陕政任字〔1990〕3号文任命王步唐为省侨办副主任。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陕西省侨务工作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省侨办和省侨联的工作不断加大，工作的侧重点以及工作方式有了明显的变化，为了使省侨办与省侨联更好地发挥其各自的职能，为陕西的经济建设服务。经省委省政府同意，由省编委〔1991〕034号文决定：省侨办与省侨联合署办公的体制改为各自独立对外办公。省侨办编制为23人。

1994年，省直机关进行机构改革，省委、省政府决定，省外办和省侨办合并为一套机构，两块牌子。陕政办发〔1994〕119号“三定方案”，决定陕西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省侨务办公室）为省人民政府的直属行政机构。行政编制80名，其中：主任1名，副主任4名，正副处长职数24名。财政拨款的事业编制为32名。1995年，陕政任字〔1995〕7号文，任命张开琰为陕西省侨务办公室主任，王步唐、饶笃钧、裴长菊为副主任。

90年代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侨务工作为经济建设服务的份量加重。其主要职责是：认真贯彻执行党和国家侨务工作法令、方针和政策，执行省委、省政府关于侨务工作的指示，协助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制定侨务工作地方性法律、法规。督促各地各部门贯彻执行侨务工作方针、政策和法令，检查贯彻执行情况，为陕西经济建设服务，为祖国统一大业服务。

（一）调查研究全省侨务工作情况，了解掌握我省海外侨情，特别是华侨、港澳同胞、外籍华人重点人的情况；向省委、省政府提供侨务信息。



(二) 负责全省贯彻执行侨务法令、方针、政策和地方性法规情况的监督、检查；保护华侨的正当权益，保护归侨、侨眷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开展侨务政策的宣传工作。

(三) 根据国家与我省总体发展规划，研究制定我省侨务事业的中短期规划。

(四) 开展海外侨胞、外籍华人及其社团的友好联谊工作。通过陕西省中国旅行社，做好对华侨、港澳同胞、台湾同胞、外籍华人的接待服务工作，并做好对其中重点团队、重点人的直接接待工作；开拓外向型侨务工作，根据需要组团出访，进行科技、文化、侨务、旅游等友好交流；引进海外侨胞、外籍华人资金、技术和人才，为我省经济建设服务。

(五) 归口协调，管理全省侨务经济工作。根据企业管理条例，对本办直属企业实行宏观指导、调控、监督和检查；指导扶持和协助侨资、侨属企业的发展，审理海外侨胞公益捐赠工作；会同有关部门保护侨汇，研究改进侨汇商品供应；负责侨资和侨字号企业的认证工作。

(六) 负责华侨、港澳同胞、外籍华人、归侨和侨眷的来信来访工作，调查了解和处理并反映他们的意见和要求；配合有关部门研究处理华侨、归侨、侨眷出入境的有关政策。

(七) 配合有关部门做好归侨、侨眷代表人物的人事安排；办理“三侨考生”的高考登记工作和归侨、侨眷自费留学人员的身份审核工作。

(八) 负责华侨、港澳同胞来陕定居安置的审理工作；协助县（市）政府做好归侨、侨眷的扶贫救济工作和港澳同胞在陕眷属的工作。

(九) 指导陕西省海外交流协会的工作；配合有关部门通过侨务工作渠道开展对台工作。

(十) 有计划地开办专业培训班，开展侨务理论研究，培养侨务干部，加强侨务系统职工思想、组织和业务建设，指导和管理全省侨务工作。

### 三、地（市）侨务机构

#### （一）西安市

西安市的侨务工作自1954年开始至文化大革命开始前，由市民政局民政科主管，配有侨务干部。文化大革命中，市民政局被撤销，干部下放，西安市侨务工作中断。

1971年西安市革命委员会恢复了市民政局。1973年4月，中共西安市

委召开了西安地区侨务工作会议，并将侨务工作交市民政局承办。1978年3月，为了加强侨务工作，在市民政局设立了侨务科。随着形势的发展和侨务工作量的增大，1979年11月23日，西安市革委会批准将市民政局侨务科改名为西安市革命委员会侨务办公室，由市民政局代管。1987年2月18日中共西安市委常委会研究决定，将西安市侨务办公室按二级局对待，与市侨联合署办公。1996年5月15日，中共西安市委常委会决定，西安市侨办（西安市侨联）为一级局，下设秘书侨政处、经济联络处、侨联处。

### （二）宝鸡市侨务机构

1956年经宝鸡市人民委员会指示，全市有关华侨管理事务工作均由市民政局代管，1983年9月，宝鸡市侨务办公室成立。1984年11月，同市民政局脱离建制，与市归国华侨联合会合署办公，一套班子，两块牌子。1988年4月按照机构改革的需要，宝鸡市政府任命了一名专职市侨办主任。

### （三）渭南市

1996年6月前，渭南市侨办与民政局合署办公。1996年6月，机构改革后，渭南市侨办与市外办、市旅游局合署办公，三块牌子一套人马。

### （四）汉中市

汉中市侨办1975年5月设立，与民政局合署办公，副局长兼侨办主任。

### （五）榆林地区

榆林地区1987年成立了侨办，与地区民政局合署办公，两块牌子一套人马。

### （六）延安市

延安市侨办1993年7月设立，与市民政局合署办公。

### （七）商洛地区

商洛地区侨务办公室成立于1991年10月，与民政局合署办公。

### （八）安康地区

安康地区侨办1987年5月设立，与地区民政局合署办公。1996年3月与地区外办、旅游局、合署办公。

### （九）咸阳市

咸阳市侨办成立于1986年，与民政局合署办公。

### （十）铜川市

铜川市侨办1981年5月设立与民政局合署办公。1995年与市外办合署办公。

### 第三节 协会组织

根据国务院侨办指示精神，为了便于做好东南亚地区的华侨、华人工作，1992年10月23日，陕西省海外交流协会成立，第一届理事会选举苏明为会长，王步唐为副会长兼秘书长，编制5人。陕西省海外交流协会的主要职责是：负责与海外华侨、华人之间的文化、科技、经济等方面的交流，与省侨办的部分职责基本相同。

## 第二章 工作概况

### 第一节 解放初期至“文化大革命”前夕

解放以来，随着陕西省各项建设事业的飞速发展，各地前来支援建设和就学的归侨侨眷和归国华侨学生日益增多。据不完全统计：至1959年底，全省有归侨107人、侨眷210人、归国华侨学生126人，共443人，分布在西安、宝鸡、铜川、咸阳、兴平、汉中、洛南等七个县市。其中西安市431人，占总数的91.4%。这些归侨的侨居地有：印尼139人，马来西亚75人，泰国52人，新加坡50人，越南36人，菲律宾20人。在各地党政机关的领导下，有关部门都给他们安排了工作和学习机会。在大专院校和中等技术学校就读的学生236人，占总数的53.3%；工作的67人，占15.1%；行政干部71人，占16%；工程技术人员7人，占1.6%；文教卫生工作者62人，占14%。至1965年12月，人数有所增加，全省共有归侨、侨眷700余人，其中西安市559人。

这一时期的主要工作是：

根据党的政策，积极引导归侨、侨眷和归侨学生积极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各地侨务部门贯彻党的“一视同仁，适当照顾”的方针，采取“一起发动、结合特点”的方法，在讲清政策，提高认识的基础上，引导广大归侨、侨眷、归侨学生，不断提高政治觉悟，积极在不同的岗位上做出成绩，获得了“积极分子”、“五好学生”、“模范团员”的光荣称号，受到了各种嘉奖。印尼归侨王文虎，在工作中一贯能刻苦钻研，不断地改良工具，如用汽车绞盘和变速箱装成了电动钢筋直拉器，不仅大大减轻了工人的劳动强度，而且为国家节约了钢材和资金，一台机器就节约2000余元。王文虎1958年出席了全国侨代会。西安医科大学附属一院外科副教授苏鸿熙，1957年从美国回国，1958年一年中经过75次动物实验，把一项尖端科学——体外循环技术研究成功，获得了国务院的奖励。郑玉冰侨居缅甸，1953年6月回国，在工作中表现突出。丘燕昌是印尼归侨，在大炼钢铁中成绩突

出。三人均出席了1959年全国侨联一届四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余锡珍是泰国归侨，为了迎接1960年的开门红，大搞技术革新，提出合理化建议150条，在技术表演赛中，提出皮带运输机设计的先进工作方法，以40分钟设计一条皮带运输机，突破了北京设计院创造的纪录。曾多次评为红旗手，并出席了1963年全国侨联二届会员代表大会。1965年10月国庆节，陕西省根据中侨委812号文“关于邀请归侨和归侨学生中先进模范人物来京参加国庆观礼的通知”精神，经严格挑选，确定西安石油仪器仪表厂技术员、印尼归侨苏明参加国庆观礼。

以争取侨汇为中心的侨务工作，是国家规定的一项政治任务，争取侨汇在当时是侨务工作的重中之重。1959年至1964年期间，陕西省侨务部门作了很大的努力，每年都能够完成国家下达的6万美元的任务。1959年完成了折合人民币9万元；1960年16.74万元；1961年12.03万元；1962年12万元；1963年13.3万多元；1964年14万元。在争取侨汇的过程中，侨务部门做了大量的工作。一方面是动员归侨、侨眷和在校归侨学生寄外汇来；一方面与供销社、粮食部门等单位联系，设供应点，开展多种活动，吸引外汇。使陕西省的侨汇工作连年受到上级好评。但在当时，一些单位工作有偏差，给侨务创汇工作也带来了不便。从省民政厅党组（65）17号文和省民政厅1965《关于侨汇问题的情况报告》中得知：几年来，陕西省侨汇工作在中央侨汇工作小组和省委领导下，侨汇（包括港澳同胞寄回的外汇）收入逐渐上升，但至1965年有所下降，下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还是一些单位的基层干部由于对党的侨务政策缺乏正确的认识和理解，对侨汇和将侨汇款正当用于生活上的合理现象与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混为一谈，不加分析地认为华侨都是资产阶级，认为华侨的钱都是剥削来的。并提出谁接受侨汇就是“与资产阶级家庭没有划清界线”，扣上“四不清”或者“关系复杂”的帽子，并滥加怀疑。西安高压电瓷厂一位干部，表现一贯很好，只因其父在香港寄来汇款，在社教中被列为重点，要其卸掉“海外关系”的包袱。西安顺风车具厂领导在答复一侨眷职工如何对待侨汇时询问说：“不要侨汇总比要侨汇好。”西安地质学院团委负责同志，因一归侨子女教师的房子布置得好一些，收音机大，在团委的总结材料中就认为：“该人是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

还有一些单位不适当地限制一些归侨、侨眷职工的政治活动。西安市委机要室在一次通知中提出不得给四类分子和归侨发“二十三”条（以后被纠

正)；西安高压电瓷厂在看内部电影“战地炊烟”时，不给归侨、侨眷职工发票，已发了的也一律收回，致使一些归侨、侨眷职工抱头痛哭，认为自己被列为四类分子了。这些片面的认识和做法，引起了部分归侨、侨眷的思想混乱，顾虑重重，心情紧张。他们反映，对侨汇有五怕：即怕组织不信任，人不了党团组织；怕影响子女上学就业；怕提高阶级成份，戴资产阶级的帽子；怕社教运动中追海外关系，过不了关；怕群众歧视，精神上受到无形的压力。因此，不少侨汇户写信给国外，不要再寄汇回来。

针对这些情况，省民政厅对此问题认识较为明确，提出：“这种问题若不重视和扭转，不仅直接影响国家的外汇收入，而且也会影响广大归侨、侨眷和港澳同胞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同时，对团结、争取海外华侨和港澳同胞也是不利的。”

组织侨眷及归侨学生开展联谊活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1956年至1966年间，每年在春节和国庆节，都举行一次座谈、参观、访问活动。对归侨、侨眷进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团结教育他们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暑假期间，省级和西安市的有关单位联合组织西安地区的大专院校和中等技术学校的归侨学生，分别在革命圣地延安和名胜古迹华山，半坡遗址及铜川煤矿等地进行参观游览，并举行专题座谈交流观感。对于这些活动的费用原则上一律自理，但对某些福利费用，如看电影、看戏或对个别归侨学生自负交通费有困难者，可在侨务费内开支。

热情关照归侨生活，妥善解决困难。特别是1950年至1959年间，陕西省的归侨、侨眷和归侨学生，大都回国时间短，有些人对当地的生活还不习惯，少数归侨学生的生活比较困难。民政侨务部门以及商业、粮食部门对这些人生活上的实际问题都给予了解决。如在大米紧缺的时候，要首先保证供应归侨，给他们供应每天一顿饭的大米。在三年自然灾害困难时期的1962年11月10日，省民政厅根据大多数归侨久居热带，回国后耐寒性不够，许多人棉被破烂不堪的情况，给归侨、侨眷解决了救济棉布4000市尺，平均每人5市尺，发给救济棉300市斤，同时给归侨发发特种供应票。

## 第二节 “文化大革命”时期

“文化大革命”时期，十年内乱，原代管侨务工作的省民政厅，被群众组织夺了权，后又成为省革委会生产组，侨务工作中断。而许多归侨、侨眷

被打成特务、叛徒、反革命，蒙受不白之冤，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 1978 年。这期间，华侨华人来陕接待工作主要在省外办华侨组。1977 年—1979 年，华侨华人、港澳同胞来陕人数逐渐增多，华侨组共接待 3000 余人。

### 第三节 对外开放时期

1979 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百废待兴，陕西省侨务工作也不例外，侨务工作日趋活跃。1979 年至 1984 年间，主要大事：1979 年 12 月，在西安止园饭店召开了陕西省归国华侨第一次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代表 78 人，正式选举成立了陕西省归国华侨联合会，陈明当选为省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席。1982 年 5 月 3 日，省纪委决定撤销顾元的省侨联副主席职务。1984 年 3 月 27 日，省侨办在西安召开了安置旅蒙归侨座谈会；12 月 25 日，在西安召开全省侨务工作会议。

1984 年下半年，省侨办正式独立对外办公。

1985 年是省侨办工作比较活跃的一年，主要是：2 月 5 日中国旅游侨汇总公司批准陕西省成立了中国华侨旅游侨汇服务总公司陕西分公司。其业务是负责全省侨汇商品的供应工作。5 月 4 日在西安止园饭店召开省侨联第二次代表大会，审议第一届归侨联合委员会工作报告，选举省第二届联合委员会成员，陈明连选为联合会主席，苏明、谭岚、彭士钦连选为副主席，林端、肖振德、罗美烈当选为副主席。侨务接待工作增多。6 月 3 日，接待了泰国华侨周鉴梅一家四人观览了西安名胜古迹，晚 7 时，副省长林季周会见宴请了客人。6 月 23 日，省侨办负责接待了美国银行家陆关琪和执行副会长温惠迳率领的美国夏威夷中华商会组织的水仙花皇后旅行团一行 90 人，苏明等陪同游览了西安名胜古迹。当晚，全国侨联副主席、省侨联主席、省人大副主任陈明在人民大厦凤凰厅会见并宴请了客人。7 月 21 日，香港（美国）珍明财团，由省侨办牵线，与陕西黄金公司，有色金属工业公司就开发太白金矿和商洛有色金属冶炼问题签署了合作意向书；8 月 15 日，省中国旅行社组织香港——西安直航旅游包机正式通航。10 月 3 日，泰国华人中青年企业家代表团在泰国华人企业家陈卓豪带领下来西安观光，苏明主任到机场迎接。代表团在西安逗留了 3 天，参观了秦俑馆、碑林等名胜，副省长林季周在人民大厦宴请该代表团。这一年，省侨办和中旅社共接待华侨、华人和港澳同胞 400 人。

榆林籍香港同胞胡星元 1982 年 10 月回到故乡榆林，参观了工厂、农村、学校、与亲友促膝谈心。家乡巨变，使他激动万分，回到香港后，决定捐赠 50 万元人民币为榆林修建一座图书楼。后又为故乡捐赠了“星元小学”、“星元医院”，共折合人民币 1000 多万元。星元图书馆于 1985 年在榆林落成。

1986 年主要工作：省侨办于 1 月 5 日成立了“落实侨务政策办公室”。中心工作是对全省归侨侨眷中长期形成的冤假错案进行纠正，平反“文化大革命”前和“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 247 件；经政法部门处理的，复查了 8 件，平反了 4 件，维持原判 2 件；清理了归侨、侨眷档案 2239 人次 4000 页；妥善处理 60 年代初精简下放的归侨职工，收回 42 人；退回被挤占的华侨私房 7 户 41 间；清退“文化大革命”中查抄归侨、侨眷的物资 1377 件。

全年省侨办与省中旅社、侨联共接待应邀来访的华侨、华人、港澳同胞 1000 人。6 月 22 日，接待了美国夏威夷水仙花皇后旅行团，苏明、杨明作陪，当晚，副省长、省侨联主席陈明在人民大厦凤凰厅会见宴请了客人。8 月 31 日，在西安宾馆接待了泰国工商访华团，当晚，副省长林季周宴请了客人。

9 月 26 日，中国旅行社批复，经国家计委批准，兴建西安中旅大厦（今西安皇后大酒店）。

9 月 28 日，接待了美国加州黄道义率领的访华团，苏明陪同，在西安宾馆副省长林季周宴请了客人。

10 月 9 日—10 日，接待了美国旧金山华人国庆观光团，在省政府黄楼副省长陈明会见并进行座谈。

12 月 19 日，省侨办在深圳召开了在港归侨和侨胞恳谈会，共商祖国统一大业和为陕西经济建设服务等议题。

1987 年的主要工作：继续落实侨务政策。经调查研究，多方反复核实、协商，为 8 名被精简的归侨落实了政策，历史遗留问题已基本解决。

根据国务院侨办和劳动人事部的计划，1987 年分配给陕西安置的归侨 30 人。经多方面协商最后安置在宝鸡 14 人，咸阳 16 人。

邀请港澳和海外侨胞参加清明节祭黄陵活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副主席湛兆霖和世界国际发展集团董事总经理、亚洲篮球联合会主席程万琦参加祭陵活动后，提出捐款 8 万元修建黄帝像。经省侨办与有关部门联系施工，当年在轩辕庙内建成黄帝巨幅浮雕石像，供海内外炎黄子孙瞻仰。



3月18日，省侨办副主任杨明应美国南加州中原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黄道义邀请赴美考察。

6月25日，接待了由欧锦洪率领的美国夏威夷中华总商会第38届“水仙花皇后”旅行团一行114人，苏明作陪，当晚省人大副主任陈明在唐城宾馆会见并设宴招待了客人。

11月18日—23日，接待荷兰华侨总会会长胡志光，常务理事朱良杰来西安游览参观，杨明作陪，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连璧在唐城宾馆会见并宴请了客人。

本年度共接待国务院侨办、全国侨联和其他省市邀请的来自16个国家的重点社团65批758人次。其中公费邀请的46批469人，自费来华观光旅游探亲的19批289人次。

1988年的主要工作是：进一步落实侨务政策，切实保护华侨、归侨、侨眷的正当合法权益。全年共受理来信来访300人次，平反4件历史错案。

1月17日，接待了应国务院侨办邀请的美国苹果电视台编导袁若光来陕参观访问，由省侨办副主任杨明陪同，参观西安电影制片厂并座谈。

3月31日—4月1日，国务院侨办邀请的澳籍华人杨锦华一行5人到西安参观访问，副省长孙达人和省侨联主席陈明在西安人民大厦会见了客人。

4月5日，省侨办批准成立陕西省华侨旅游工商贸易公司。

4月18日，应澳门归侨联合会邀请，苏明、陈礼启赴澳参加该会成立二十周年庆祝活动。

4月19日，省侨办申报在联邦德国法兰克福成立欧华旅游分公司；4月22日，省侨办批准中侨陕西公司在常州市设立长江华侨工贸商行；5月11日，省侨办批准成立陕西华侨实业公司。

5月23日，接待加拿大前国会议员郑天华律师，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明在西安唐城宾馆会见并宴请。

6月1日，接待全美美华协会创始人王恭立先生一行五人，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陶钟会见并宴请。

6月18日，接待美国夏威夷中华总商会第39届水仙花皇后旅行团一行90人，当晚，全国侨联副主席、副省长陈明在钟楼饭店会见并宴请了该团团长等。

本年度省侨办和中旅共接待68427名华侨、华人和港澳同胞。

1989年的主要工作：继续落实侨务政策，维护归侨侨眷的合法权益。

全年受理来信 82 件，接待来访 198 人，所反映的问题基本都得以解决。

副省长王双锡和省政府特邀顾问张斌 1 月 6 日会见、宴请了美籍华人赵浩生，在会见中探讨了合作生产程控电话交换机事宜。

省政协副主席胡景通 5 月 18 日在西安唐乐宫会见宴请了美国圣地亚华侨协会负责人张丹尼和张格拉丝迪。

6 月 24 日，省侨办向香港达高（西安）有限公司投资的古都大酒店颁发《享受华侨投资优惠待遇企业认可证》，副省长孙达人出席颁证仪式并会见了董事代表曾务成。

本年度共接待 1787 批来自 16 个国家和地区的 43239 名华侨华人及港澳同胞。

1 月 26 日，在省科技馆召开 1989 年度归侨、侨眷春节联欢会，出席会议的有副省长、省侨联主席陈明、西安市市长袁正中和省侨办主任苏明等 300 人。

3 月 17 日，省侨务办公室和省归国华侨联合会转发国务院侨办全国侨联《关于表彰优秀归侨、侨眷知识分子和企业家的通知》。

4 月 4 日，省侨办、省司法厅、省建设厅转发司法部《关于办理华侨、港澳同胞、台湾同胞以及外国人房屋产权事宜如何确认公证文书效力的通知》。

省侨办查处省中旅派驻比利时欧华旅游联合公司工作人员崔永健擅自去以色列联系旅游一事，召令其回国述职。

1990 年的主要工作：

国务院侨办 3 月 5 日在西安召开电视片《古代中国侨乡系列片》的开拍工作会议。

6 月 15 日，由省侨办承办在西安召开了第二届西北五省区侨务工作协作会议。出席会议的有西北各省、区侨办主任、处长、中旅社总经理、中侨公司经理。各省、区侨办就如何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有机地发挥各自的优势，为侨服务，为改革开放服务广泛交流了经验，并对今后侨务工作如何为经济建设服务形成了共识。

9 月，全国人大颁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陕西省组织归侨侨眷进行认真的学习和宣传。10 月召开大会，对 31 名优秀侨务工作者进行了表彰。

做好华侨华人港澳同胞的捐赠工作。全省接受捐赠现款 200 万元外汇人

民币和传真机、医疗器械、电教用具等一批物资。

做好侨务接待工作。7月13日，省政府特邀顾问张斌会见并宴请美籍华人赵浩生的夫人赵今泉等4人，10月10日，美国首都银行总裁张哲三夫妇来西安，苏明陪同，张斌宴请。11月17日，荷兰宝荷华人社团联合会主席林德华一行11人，王步唐陪同，张斌宴请。11月18日，张斌在人民大厦会见并宴请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常务会董王平忠、郑俊英一行11人。王步唐作陪。

本年度，省侨办和中旅社接待应邀和来陕西旅游观光、洽谈商务的华人、华侨和港澳台同胞5.3万人次。

1991年主要工作：

9月28日—11月18日，省侨办在加拿大多伦多举办了“中国古代科技成就和工艺品展览”。

接受办理海外捐赠19起，折合人民币408万元。

全国各类院校在陕西省录取三侨考生7名。

接待来访59批870人，其中主要有：5月31日，接待了法国知名律师贝纳尔及《欧洲时报》社长杨咏桔。6月18日，美国夏威夷水仙花皇后旅行团来西安。代表团参观了素俑馆、省历史博物馆等，在喜来登大酒店进行了舞蹈表演。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明、副省长姜信真、省政府秘书长巩德顺在喜来登大酒店宴请该代表团。9月21日，香港金融界人士旅行团来陕。省侨办副主任王步唐迎送，副省长徐山林在秦都酒店宴请了客人。9月24日，美籍华人、著名侨领余保贤夫妇来陕。省侨办副主任王步唐迎送、作陪。余保贤与侨务工作者进行了座谈，参观了西安地区的文物古迹。副省长郑斯林在钟楼饭店宴请。9月28日，马来西亚财政部副部长陆垠佑一行来陕。省侨办副主任王步唐到机场迎接，代表团与陕西省金融、财政界人士进行了交流，副省长郑斯林、省政府副秘书长孙武学、省经贸委副主任王景民、省财政厅副厅长丁全德在建国饭店会见并宴请了客人。10月10日，泰华妇女联合会访华团来陕。名誉团长、泰国皇室成员、前总理社尼巴莫亲王的夫人邬萨娜一行在西安逗留了两天，副主任王步唐陪同。省侨办主任苏明在唐乐宫宴请，王步唐出席作陪。10月20日，美国心理学家、宾州美华事务委员会、美亚裔心理学会常务理事兼会长陈训夫妇来陕，省侨办副主任王步唐迎送。副省长刘春茂在唐城宾馆宴请了客人。

1992年的主要工作：

做好为侨服务的工作。全年接待归侨、侨眷来信来访 1000 人次，受理国内外来信 53 件，其中国外 27 件，落实侨房 2 件，房屋纠纷 2 件，经济纠纷 6 件，调动工作 10 件，要求就业 4 件，重信 8 件，其他 4 件。本年度共出据各类证明 150 份。出具高考证明 26 份，归侨侨眷身份证明 5 份，帮助外出探亲 6 份，落实知识产权 1 份。录取三侨考生 7 名。

2 月，省侨办进行全省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的宣传教育工作，并在省上有关单位的支持下，经过反复讨论修改，制订了《陕西省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实施办法》，交省法制局审改。

3 月 29 日，省侨办接待加拿大陕西籍华人、加拿大联邦交通部航空电子工程主任韩子云夫妇参加祭黄陵活动，王步唐迎送并宴请。4 月 1 日，香港中国广告公司总经理胡文善来陕祭黄陵，省侨办副主任王步唐迎送，并在秦都酒店宴请了客人。6 月 17 日，美国夏威夷第 43 届水仙花皇后旅行团来陕，王步唐到机场迎送，副省长郑斯林在古都大酒店宴请，苏明作陪。

10 月 28 日，美国芝加哥台美商会投资考察团尚摩西一行 14 人来陕，省侨办苏明主任、副主任王步唐到机场迎送。考察团在西安考察了 3 天，与省石化厅洽谈防冻液生产合作问题。代表团成员赵靖中，与西北航空公司洽谈修建航空大厦投资 3000 万—4000 万美元，初步达成协议。副省长徐山林在东方大酒店宴请了客人。

10 月 30 日，巴西华侨工商协会代表斯子林一行 32 人来陕考察，郑斯林副省长在功德林酒楼宴请，苏明、王步唐作陪。

'92 年华埠小姐代表团来西安观光。省政府副秘书长蔡肇发在钟楼饺子馆宴请，王步唐作陪。

11 月 11 日，美国国际策略联盟公司总裁顾屏山访问陕西，副省长姜信真、范肖梅在古都大酒店宴请，苏明主任、王步唐副主任迎送并作陪。代表团在西安期间，同海协会全体会员进行了座谈，围绕“中国企业如何在美国寻找合作伙伴”进行了探讨。

本年度省侨办和中旅共重点接待华侨、华人、港澳同胞 69 批 747 人。

陕西省海外交流协会于 10 月 23 日在西安唐城宾馆召开成立大会。大会选举苏明为会长、王步唐为副会长兼秘书长，聘请原副省长陈明、张斌为顾问。

1993 年的主要工作：

2 月 14 日，美国旧金山国际策略联盟主席顾屏山先生再次访陕。省侨办副主任王步唐到机场迎送。顾屏山在访问期间，与省高新技术开发区进行

了洽谈，针对陕西省高新技术企业访美和凯特人人电脑公司产品外销事宜达成了协议。郑斯林副省长在西安皇后大酒店宴请了顾屏山。

5月1日，美国驼峰飞行协会团103人来访，王步唐到机场迎送。美国驼峰团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驼峰飞行航线的美国退休军人和原中国航空公司飞行人员组成。副省长王双锡在德发长宴请了客人。

5月5日，以全欧华侨、华人社团联合会会长林德华先生为团长的荷兰电讯报经济、文化、政治友好考察团来陕西省访问，省侨办副主任王步唐到机场迎送。林德华系欧洲著名侨领，一贯关心中国建设事业，对在中国投资颇感兴趣。5月6日下午，代表团参观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并由省经贸委的有关人员介绍了陕西的投资环境及优惠政策。副省长王双锡宴请了该团全体成员。

6月22日，法国侨领北京申办2000年奥运会法国促进会主席陈克光来陕西访问，省侨办副主任王步唐到机场迎送。副省长王双锡在西安人民大厦宴请了客人。

6月22日，美国夏威夷第44届水仙花皇后旅行团陈惠昌一行66人来陕，省侨办苏明主任到机场迎送。代表团在陕期间，观览了大雁塔、华清池、兵马俑等旅游点。当晚6时，副省长郑斯林在喜来登酒店会见团长及主要团员，并宴请了全团，省外办、省侨办、省旅游局、省侨联有关领导出席作陪。

本年度共接待来自美国、日本、德国等13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华侨华人27批、313人。

做好侨务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工作。10月下旬，省侨办会同有关部门组织陕西省大中型企业参加了国务院侨办和中央有关部门在深圳举办的“中国大中型企业对外经济技术洽谈会。”全省11个企业的23个项目，有4个同外商签订了合同，3个签订了协议，1个签订了意向。投资额达7.8亿元。

本年度省侨办共接受捐赠90起，其中物资7起，价值529.72万元，车辆33起97辆，价值1824.74万元。香港同胞，长安县人董健，投资18万元在商州市罗家村建成一座希望小学，名曰：“建秦小学”，后于1994年9月16日，投资20万元在长安县建成“涵英小学”，1996年9月10日，在凤县投资20万元建成“长建小学”。

11月17日，陕西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了《陕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办法》，并予以颁布。为了更好地

地贯彻、宣传《实施办法》，省侨办于12月中旬举办了侨务骨干培训班。各地市侨办领导及业务干部共30人参加。

做好为侨服务工作。高考录取三侨6名考生。

1994年的主要工作：

做好侨务为经济建设服务工作。本年度审查办理捐赠23起，其中汽车25辆，物资8批，人民币98万元，总价值为1200多万元人民币。

4月间，经省侨办牵线搭桥，西安金顺实业有限公司与日本三元竹波株式会社合资，建立了总投资为30万美金的西安富顺豆制品厂，当年投入生产。

4月2日，远东商业投资考察团、美国纽约华商总会会长翁晋君一行来陕考察，王步唐迎送。副省长王双锡在西安宾馆宴请。

11月5日，省侨办接待郭氏宗亲寻根团。来自新加坡、泰国等8个国家和地区的郭氏宗亲、寻根祭祖一行75人到郭子仪故里华县和陵墓所在地礼泉县进行寻根祭祖活动，省侨办副主任王步唐迎送并陪同。11月6日，在华县召开了欢迎大会。会上，代表团团长郭明星在讲话中说：“我们一行来华县寻根祭祖，乡亲们热情隆重接待，给团员留下了深刻印象，我们将永生难忘。我们一定要把郭令公故里乡亲的盛情，向海外郭氏后裔转达，让更多的海外郭氏后裔回故里拜谒令公，为振兴郭公故里贡献力量”。许多团员感动的热泪盈眶，当即捐赠了30万元。郭明星团长、郭振副团长又介绍了他们企业集团的情况并表示愿在陕西投资办企业。副省长姜信真等省上有关部门的领导在西安皇后大酒店设宴招待。

本年度共接待海外华人、华侨、港澳同胞33批450人，组织各种洽谈21次，举办学术讨论会3场。

1995年的主要工作：

4月13日，全省侨务工作会议在西安召开。程安东、刘荣惠、贾治邦等省上领导出席了会议。程安东省长到会作了重要讲话。

9月24日，省侨办接待了“'95国庆海外企业家科技专家考察交流团”。省政府对这次接待非常重视。整个活动在国务院侨办副主任李海峰和副省长贾治邦的直接领导下，由陈嘉祯副秘书长牵头，熊伟君、朱振义、王步唐、齐焕印、王瑜彦、刘炳奇、党耀武、潘学正为接待成员，下设三个办事组，组长为孙向东、刘阿津、杨鹏林。

代表团一行在西安停留5天。9月26日抵西安高新技术开发区参观。当

日，又在古都大酒店二楼宴会厅举行陕西省省情介绍会，各界人士 200 余人参加。又参观了西安杨森制药公司，西安卫星测控中心。省政府在古都大酒店举行了欢迎宴会，副省长徐山林代表程安东省长致词。9 月 28—29 日又与省上有关企业进行了洽谈，共签订了 12 个意向书和协议书。美国宏亚通信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宏与西安万成磁电有限公司签订了由美方提供母盘，万成公司用自产软件拷贝供货的合作协议书，每年拷贝 120 万—600 万张软盘。陈宏还与西安交大计算机系签订了长期合作开发计算机软件的协议，由美方提供资金、设备和软件等。

本年度共接待华侨、华人和港澳同胞 38 批 517 人，组织商贸洽谈 9 次。

开展全省侨情普查工作。省政府确定由一名副省长兼侨情普查领导小组组长，王步唐为办公室主任。目的是摸清侨务工作底子、为省上的经济建设牵线搭桥。各地市成立了相应机构。编写印刷侨情普查宣传提纲 4000 册，普查登记表 8500 份，各种统计表 8400 份，侨情普查工作，计划于 1996 年 6 月结束。

10 月中旬，应泰国郭氏宗亲总会的邀请，由王步唐带队参加了泰国曼谷召开的“泰国郭氏宗亲总会成立三十周年”和“世界郭氏宗亲总会第二届年会”。

11 月上旬，陕西省海外交流协会在美国旧金山湾区举办了《陕西古文化展》。

1996 年的主要工作：

5 月 19 日，应国务院侨办邀请的以周荣濯为团长的美国旧金山中华总会馆访华团一行 8 人来陕参观访问，省侨办副主任裴长菊迎送，副省长姜信真在台湾酒店会见并宴请了客人。

6 月 14 日，“中美贸易促进总会”会长尚摩西一行 4 人来陕西考察，省侨办副主任王步唐迎送并作陪参观游览。尚摩西在陕考察了 3 天，与西北民航局洽谈开展海外货运业务等事宜。并与西北民航局计划合资组建“中国空中急救中心”（缩写 CEARC）。同时，引荐了美国最大的洗发水公司 HELENE CURTIS 国际部负责人郝岚生（台湾商会成员）来陕考察投资环境；又与省文物局就秦兵马俑赴芝加哥展出进行了磋商。6 月 15 日，省长程安东在凯悦宾馆会见并宴请了尚摩西一行。

11 月 27 日，应程安东省长邀请，印尼哈拉班集团陈子兴偕夫人一行 12 人来我省考察访问。（陈子兴是印尼十大首富之一）在西安逗留期间，参观

了陕西历史博物馆、秦兵马俑馆、华清池、大雁塔，参观了秦川厂奥拓生产线，并洽谈了合作意向。当日晚6时，程安东省长会见并宴请了客人。

本年度共接待华侨、华人、港澳同胞48批315人次。

本年度共受理群众来信32封，来访300人。各大专院校在陕西省录取三侨考生29人。

6月份，接国务院侨办通知，由国务院侨办、国家计委、经贸委、外经贸部和河南省人民政府联合举办的“中国中西部地区对外经济技术合作洽谈会”，将于10月25—28日在郑州召开。

6月28日，副省长姜信真召集省上有关部门，确定组建陕西参加中西部地区对外经济技术合作洽谈会筹备领导小组，其分工是：

组 长：姜信真 副省长

副组长：李 谔 省长助理

刘玉浦 省长助理、省计委主任

张海南 省长助理、省经贸委主任

朱振义 省外经贸厅厅长

成 员：王步唐 省侨办副主任

秦天行 省委宣传部副部长

王树汉 省财政厅副厅长

领导小组办公室：

主 任：王步唐

副主任：齐焕印、李松山、张志民、张锋锐、马安荣

办公室设项目、宣传、综合三个工作小组。

省政府决定由省侨办牵头组织这次洽谈会。在省经贸委、省计委、省外经贸厅支持下，筛选出66个项目参加洽谈，其中亿美元以上的项目5个，千万美元以上的项目10个。以副省长巩德顺为团长的200多人的代表团于10月25—28日赴郑州参加了洽谈。共签约39个，签约总额5.85亿美元，其中外资额为4.29亿美元。签订正式合同29份，投资总额2.58亿美元，合同外资1.89亿美元。名列参加洽谈会17个的省市之第二。

洽谈会后，美国麦格利斯电梯责任有限公司总裁一行来陕西，签订了合作生产电梯合同。香港长江中国基建有限公司总经理朱其雄两次来陕西，签订了秦岭电厂（80万千瓦）股权转让协议；同时还签订了黄陵电厂（180万千瓦）合资意向。



### 第三章 华侨、华人、归侨、 侨眷分布情况

表 4-3-1 一、归侨原居地及华侨华人、港澳同胞、留学生现居地分布表

类别 内容 身份	总计	出国时间					原居住国或地区														
		建国前	1950年 / 1965年	1966年 / 1977年	1978年 / 1988年	1989年 / 1997年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香港	澳门	日本	朝鲜	韩国	新加坡	马来西亚	菲律宾	印度尼西亚	泰国	缅甸	越南	柬埔寨	印度	蒙古				
归侨	615	222	185	16	153	7	528	2	20	43	5	37	53	8	79	25	16	18	1	2	156
华侨、华人	6049	1584	744	521	1290	1910	100	48	481	35	25	238	171	40	308	203	28	27	1	8	59
港澳同胞	1594	398	407	193	403	202	1108	144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留学生	1892	27	33	19	536	1277	23	3	367	0	6	88	0	0	0	2	0	0	0	0	1

续表

类别 内容 身份	原居住国及现居地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德国	英国	法国	瑞士	美国	加拿大	巴西	秘鲁	智利	埃及	澳大利亚	毛里求斯	俄罗斯	吉尔吉斯	意大利	新西兰	哈萨克斯坦	乌克兰	牙买加
归侨	1	2	3	0	79	2	0	0	1	2	2	2	13	0	0	0	1	2	1
华侨、华人	81	132	86	59	3423	529	37	13	5	4	260	20	38	3	17	29	6	4	65
港澳同胞	0	0	1	0	1	1	0	0	0	0	0	0	2	0	0	0	0	0	0
留学生	130	160	35	11	797	137	0	0	0	1	71	2	23	0	8	9	0	0	23

表 4-3-2

二、归侨、侨眷、外籍华人眷属、港澳同胞眷属及亲友统计表

内 容 身 份	类 别	总 计	户 数	一、性别		二、年龄				三、民族					四、政治面貌			五、文化				六、职 业								
				男	女	18 岁 以 下	19 — 40 岁	41 — 61 岁	61 岁 以 上	汉 族	满 族	回 族	蒙 古 族	朝 鲜 派	其 他	中 共 党 员	民 主 党 派	其 他	研 究 生 及 以 上	大 学 本 科 及 专 科	高 中 、 含 中 专 中 技	初 中 以 下	工 人	农 民	商 业 工 作 者	金 融 工 作 者	文 教 卫 体 工 作 者	科 技 人 员	党 政 企 事 业 干 部	其 他
甲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合 计		28877	7128	14699	14047	1969	9602	10047	7128	28218	50	126	19	36	297	2588	655	2553	847	11934	7497	8468	5449	1343	690	646	7634	4431	4478	4066
归 侨		615	396	359	239	45	152	188	213	583	2	0	2	7	4	117	72	368	10	211	109	268	235	5	19	9	125	95	76	34
侨 眷		9992	2248	4962	4916	622	3523	3467	2266	9704	5	28	6	13	122	951	193	8061	263	4590	2463	2589	1717	564	144	120	2928	1508	1655	1242
外籍华人眷属		8058	2004	4103	3955	451	2583	2996	2028	7835	25	56	5	9	128	747	198	6528	235	2981	2439	2413	1502	267	175	126	2009	1357	1315	1307
港澳同胞眷属		2364	655	1257	1107	184	849	836	495	2301	15	15	1	3	29	223	41	1917	12	694	658	1000	714	180	106	60	305	199	378	422
侨属或朋友		7848	1827	4018	3830	667	2493	2560	2128	7795	3	27	5	4	14	550	151	8629	337	3458	1855	2198	1281	327	246	331	2267	1272	1063	1061

注:1. 顶栏“一”至“六”项里的细项之和分别等于“总计”数。

2. “甲”栏的细项(五项)之和等于“合计”数。

## 第五篇 大事记

## 古、近代

### 周秦时期

周武王十一年(前 1066) 克殷之后,封箕子于朝鲜。

周穆王十七年(前 960) 周穆王西巡到中亚锡尔河一带,受到西王母的隆重接待。

秦始皇二十八年(前 219) 命徐市(福)率童男童女东渡日本,求长生药。

### 两汉时期

汉高祖十一年(前 196) 遣陆贾使南越,册封赵陀为南越王。

汉武帝建元三年(前 138)、元狩四年(前 119)张骞应汉武帝之命先后两次出使西域,历时十余年。

汉武帝元鼎六年(前 111) 遣使者出使东南亚各国。

汉武帝元封二年(前 109) 遣使者出使朝鲜。

汉武帝元封三年(前 108) 大秦国(罗马)遣使长安,此为陕西与罗马的最早交往。汉武帝在长安平乐观召集外国来宾,举行空前盛大的宴会和赏赐典礼。

汉武帝元封五年(前 106) 汉王朝在酒泉至玉门关一带设置亭障,作为供应粮草的驿站和防守的哨所,以便利各国使节和商旅交通往来。安息(伊朗)王遣使长安献鸵鸟及魔术师。

汉武帝太初元年(前 104) 汉武帝命贰师将军李广利发兵伐大宛。

汉武帝太初二年(前 103) 大月氏遣使长安献双头鸟、猛兽等。

汉武帝天汉元年(前 100) 汉武帝派兵灭卫氏朝鲜,在其地设乐浪、玄菟、真番、临屯四郡。苏武出使匈奴被扣,羁留 19 年,仗汉节不为屈服。

汉武帝征和三年(前 90) 大月氏遣使长安奉献方物。

汉宣帝地节二年(前 68) 印度千涂国遣使长安奉献珍异鸟兽。

汉宣帝五凤三年(前 55) 印度罽宾王乌头劳贪图使者财物,多次剽杀汉使。

汉成帝时(前 32—前 7) 罽宾遣使长安要求言好。

汉哀帝元寿元年(前 2) 大月氏使臣尹存向博士弟子景卢讲授《浮屠经》。

汉平帝元始元年(1) 汉中人锡光任交趾(今越南中南部)太守,教当地人种植庄稼。

汉光武帝建武十八年(42) 马援平定南越。

汉明帝永平十六年(73) 班超出使西域。

汉和帝永元九年(97) 班超遣甘英出使大秦(罗马)。

### 魏晋南北朝时期

魏元帝景元元年(260) 朱士行从雍州(今陕西长安县西北)出发西行求法。

晋武帝太康七年(286) 佛门高僧竺法护(世居敦煌的月氏侨民)在长安青门外立寺修行。

晋孝武帝宁康元年(373) 前秦苻坚遣使送浮屠、佛像、经文至高句丽。

晋孝武帝宁康二年(374) 僧人阿道由长安出发前往高句丽弘扬佛法。

晋武帝太元三年(378) 高句丽遣使长安朝贡。

晋武帝太元六年(381) 中天竺笈多王朝超日王遣使长安访问,并向苻坚奉献火浣布。

晋武帝太元九年(384) 北天竺罽宾僧人僧伽提婆(华言众天)来长安。

晋安帝隆安三年(399) 法显等人从长安出发前往天竺取经。

晋安帝隆安五年(401) 鸠摩罗什东抵长安。

晋安帝大亨三年(404) 智猛等人从长安出发前往天竺求法。

晋安帝义熙元年(405) 西域沙门昙摩流支东来长安。

晋安帝义熙二年(406) 北天竺僧人卑摩罗叉(华言无垢眼)到达长安。

晋安帝义熙四年(408) 北天竺僧人佛驮跋陀罗(华言觉贤)到达长安。

晋安帝义熙十一年(415) 北天竺僧人弗若多罗(华言功德法)东抵长安。

西魏大统十二年(546) 中亚吠哒国遣使长安奉献方物。

西魏废帝二年(553) 吠哒国遣使长安。

北周明帝二年(558) 波斯王库思老阿奴细尔遣使长安。吠哒国遣使长安。

北周明帝武成元年(559) 北天竺译经师闍那崛多来长安。

北周武帝天和二年(567) 波斯王库思老阿奴细尔遣使长安,联周抗击突厥。

### 隋唐五代时期

隋文帝开皇元年(581) 百济遣使长安赠送方物。

隋文帝开皇二年(582) 北天竺译经师那连提黎耶舍东来长安。

隋文帝开皇十四年(594) 新罗国王派遣使节来长安赠送方物。

隋文帝开皇二十年(600) 日本圣德太子遣使至长安与隋王朝进行外交联系。

隋炀帝大业元年(605) 隋炀帝遣使占婆罗(今越南中南部)

隋炀帝大业三年(607) 日本圣德太子派遣大礼小野妹子 and 通事鞍作福利携带倭王国书前来长安。炀帝遣屯田主事常骏、虞部主事王君政等人出使赤土国(今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南部)。

隋炀帝大业四年(608) 隋炀帝派遣文林郎裴世清随日使小野妹子一同赴倭回访。同年圣德太子以小野妹子为正使护送裴世清回抵长安。隋炀帝派遣侍御使韦节和司隶从事杜行满出使中亚各国,并遣云骑尉李显出使波斯。

隋炀帝大业五年(609) 中亚康国、安国、石国、米国、史国、曹国、何国、拔汗那、乌拉喝、吐火罗等国遣使长安通好。

隋炀帝大业九年(613) 隋炀帝下诏进兵高句丽。

隋炀帝大业十年(614) 隋炀帝第二次进兵高句丽。日本遣使长安。

隋炀帝大业十二年(616) 婆利(今印度尼西亚巴岛)、丹丹(今马来西亚半岛吉兰丹)、盘盘(今马来西亚加里曼丹岛北部)等国先后遣使长安通好。

隋炀帝大业十三年(617) 真腊国(柬埔寨)遣使长安通好。

唐高祖武德四年(621) 新罗遣使长安<sup>①</sup>。唐王朝遣使新罗<sup>②</sup>。

唐高祖武德六年(623) 林邑王梵志遣使长安。

① 此后,至唐昭宗乾宁四年(897),新罗先后一百二十六次遣使长安。

② 此后,至唐哀帝天祐三年(960),唐三十四次遣使新罗。

唐高祖武德七年(624) 真腊遣使长安。唐高祖遣使携天尊像及道士至高句丽讲《老子》。中亚西曹国遣使长安<sup>①</sup>。

唐高祖武德八年(625) 唐高祖李渊在长安举行盛宴,设九部乐欢迎林邑使节。

唐高祖武德九年(626) 唐以朱子奢为使,劝说新罗与高句丽联合结好。真腊遣使长安。中亚康国遣使长安赠送方物<sup>②</sup>。

唐太宗贞观元年(627) 玄奘西行求法。新罗学问僧圆测来长安求学。

唐太宗贞观二年(628) 真腊遣使来唐以贡方物。

唐太宗贞观三年(629) 索马里遣使长安。

唐太宗贞观四年(630) 日本遣使长安<sup>③</sup>。

唐太宗贞观六年(632) 唐王朝遣使日本<sup>④</sup>。

唐太宗贞观八年(634) 中亚石国遣使长安<sup>⑤</sup>。

唐太宗贞观九年(635) 真腊遣使长安,以贡方物。中亚吐火罗遣使长安<sup>⑥</sup>。

唐太宗贞观十二年(638) 景教(基督教的一支)由叙利亚人(当时称大秦人)阿罗本传布长安。

唐太宗贞观十三年(639) 中亚安国遣使来唐访问<sup>⑦</sup>。

唐太宗贞观十四年(640) 波斯(今伊朗)遣使长安通好<sup>⑧</sup>。新罗首次将王族子弟派往长安,入太学学习唐文化。

唐太宗贞观十五年(641) 天竺遣使长安<sup>⑨</sup>。

唐太宗贞观十七年(643) 拂菻(罗马)遣使长安奉献方物<sup>⑩</sup>。唐太宗以朝散大夫卫尉丞上护军李仪表为正使,融丹黄水县令王玄策为副使出使天竺各国。高句丽遣使至长安探求道教之法。

① 此后,至唐玄宗天宝三载(744),西曹国先后七次遣使长安。

② 此后,至唐代宗大历七年(722),康国先后二十七次遣使长安。

③ 此后,至唐昭宗乾宁元年(894),日本先后十八次遣使长安。

④ 此后,至唐代宗大历十三年(788),唐王朝先后八次遣使日本。

⑤ 此后,至肃宗宝应元年(762),石国先后二十一次遣使长安。

⑥ 此后,至唐肃宗乾元元年(758),吐火罗先后二十九次遣使长安。

⑦ 此后,至唐肃宗乾元二年(759),安国先后十五次遣使长安。

⑧ 此后,至唐代宗大历六年(771),波斯先后三十三次遣使长安。

⑨ 此后,至唐肃宗乾元元年(758),天竺各国先后十七次遣使长安。

⑩ 此后,至唐玄宗天宝元年(742),拂菻先后六次遣使长安。

唐太宗贞观十九年(645) 唐太宗亲率十万大军进攻高句丽。玄奘西行求法回抵长安。

唐太宗贞观二十一年(647) 王玄策出使天竺。

唐高宗永徽元年(650) 真腊遣使来唐聘问。

唐高宗永徽二年(651) 大食(阿拉伯)遣使长安通好<sup>①</sup>。

唐高宗永徽六年(655) 真腊遣使来唐聘问。

唐高宗显庆二年(657) 王玄策第三次出使天竺各国。

唐高宗显庆三年(658) 唐高宗派果毅都尉董寄生前往中亚阿姆河、锡尔河之间的河中地区设置都督府、州,隶属于安西都护府。

唐高宗显庆五年(660) 唐高宗应新罗请求,派左卫大将军苏定方率军渡海攻打百济。唐王朝命左屯卫大将丘阿罗臧出使拂菻。

唐高宗龙朔元年(661) 唐王朝在波斯边境疾陵城(今伊朗锡斯坦省东北)置波斯都督府,以波斯王伊嗣侯之子卑路斯为都督。

唐高宗龙朔三年(663) 唐、日在朝鲜半岛进行战争(即白江口唐倭军海战)。

唐高宗乾封二年(667) 唐高宗派大将军徐世勣督率郭待封、薛仁贵等部二万兵力进击高句丽。

唐高宗咸亨元年(670) 义净由长安出发前往天竺各国求法。师子国(今斯里兰卡)遣使长安。

唐高宗上元元年(674) 卑路斯来长安访问,唐高宗拜其为右威卫将军,后病逝长安。

唐高宗调露元年(679) 唐高宗命吏部侍郎裴行俭率军册送卑路斯子泥涅斯为波斯王,裴行俭因路途遥远,行军困难,行至安西碎叶而还,泥涅斯独返。

武则天垂拱元年(685) 南亚大勃律国遣使长安<sup>②</sup>。

武则天延载元年(694) 摩尼教传入长安。

唐中宗景龙二年(708) 泥涅斯来长安访问,唐中宗拜其为左威卫将军,不久病逝长安。

唐玄宗开元四年(716) 中天竺戍婆揭罗僧诃(华言善无畏)东抵长安。

<sup>①</sup> 此后,至唐德宗贞元七年(791),大食先后三十八次遣使长安。

<sup>②</sup> 此后,至唐玄宗天宝七年(748),大勃律国先后八次遣使长安。



唐玄宗开元五年(717) 文单(陆真腊)遣使长安赠送方物。日本留学生吉备真备、阿倍仲麻吕来长安学习经史。

唐玄宗开元七年(719) 大食侵扰中亚各国,康国王鸟勒伽上表请唐王朝派兵帮助康国反击大食,安国王笃萨波提上表请唐王朝命原属西突厥的突骑施国救助,俱密国王那罗延上表希望唐王朝让大食免征赋税。

唐玄宗开元十五年(727) 吐火罗叶护上表请求唐王朝命突骑施发兵灭大食。

唐玄宗开元二十七年(739) 突骑施吐火仙举兵反唐,唐军在石国、史国、拔汗那等国援助下平定叛乱。

唐玄宗天宝元年(742) 师子国遣使长安。

唐玄宗天宝三年(744) 唐王朝通过封王形式重申唐对中亚诸国的宗主权,拔汗那、石国、西曹国、康国、米国、安国、怛没等国先后被授予王号。

唐玄宗天宝四年(745) 南亚小勃律国遣使长安<sup>①</sup>。

唐玄宗天宝五年(746) 师子国遣使长安。

唐玄宗天宝八年(749) 林邑王遣使长安赠送方物。

唐玄宗天宝九年(750) 师子国遣使长安奉献方物。

唐玄宗天宝十年(751) 唐军与大食在怛逻斯城(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城)展开激战,唐军战败。

唐玄宗天宝十二年(753) 文单遣使来唐访问。

唐玄宗天宝十三年(754) 宁远(即拔汗那)王忠节派王子窆薛裕东来长安,请留宿卫。

唐肃宗至德二年(757) 唐肃宗借回纥、安西、北庭、大食兵力收复长安,平定安史之乱。

唐肃宗乾元元年(758) 肃宗在长安召见回纥和大食两国使臣。

唐代宗大历六年(771) 文单王婆弥率同随从贵臣二十五人来唐访问,唐代宗设宴于三殿,由宰相出席款待。

唐德宗贞元四年(788) 新罗采用隋唐科举制选拔官吏。

唐德宗贞元十四年(798) 文单遣使长安赠送方物。

唐德宗贞元十八年(802) 骠国(今缅甸)王雍羌派遣悉利移、舒难陀率乐工三十五人来长安与唐通好,并献骠国乐二十二曲。

<sup>①</sup> 此后,至唐肃宗乾元元年(758),小勃律国先后六次遣使长安。

唐德宗贞元二年(804) 日本僧人空海入唐在长安学习密教。

唐文宗开成五年(840) 在唐留学的一百零五名新罗留学生离开长安回国。

唐宣宗大中元年(847) 唐商张友信等四十七人驾船抵达日本大宰府。

周世宗显德五年(958) 占城王因德漫派遣使臣甫阿散等人来长安赠送方物。

## 宋元明清时期

元世祖至元十二年(1275) 威尼斯人马可·波罗至中国,在元廷任职十七年,曾游历陕西。

明成祖永乐十年(1412) 郑和奉命七次下西洋的第四次,派人到西安大学习巷清真寺,聘请掌教哈三担任通译并协办教务。

明成祖永乐十三年(1415) 撒马尔罕使节到达西安府,明成祖命陕西布政司宴请。

明世宗嘉靖元年(1522) 撒马尔罕使节再次抵达西安府,陕西行都指挥郑恺等伴送进京。

明世宗嘉庆四年(1525) 阿拉伯天方国使节到达西安府,陕西行都司命陈钦等伴送进京。

明熹宗天启五年(1625)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在西安西郊金胜寺(唐大秦寺)出土,现存陕西历史博物馆。

明熹宗天启六年(1626) 德国神甫金尼阁等来西安,在糖坊街建立天主教堂。

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 南郑县八角山教案爆发。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 宁强县燕子砭教案爆发。三边教案爆发。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后,慈禧太后和光绪帝一行逃亡西安,以陕西巡抚部院为行宫,在此期间多次催促李鸿章尽快与帝国主义列强议和。次年,《辛丑条约》签订后返北京。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 德国人汉纳根借旅行之名到陕北进行侦察间谍活动。平利洛河教案爆发。

清光绪三十年(1904) 武备学堂经陆军部派张凤翔、张益廉入日本士官学校学习。

清光绪三十年(1906) 井勿幕、赵其襄在日本东京发起成立同盟会陕西分会。

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 英国盗窃《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陕籍留日学生在日本东京创刊《秦陇》杂志。

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 同盟会陕西分会在日本创办《夏声》杂志。

清宣统三年(1911) 西安南关教案爆发。

## 中华民国时期

民国元年(1912) 井勿幕奉孙中山之命由日本回陕,将同盟会陕西支部改组为国民党陕西支部。

民国2年(1913) 张奚若、严庄等人赴美留学。

民国3年(1914) 陕西地方当局向美国盗卖“昭陵六骏”。

民国4年(1915) 美国技师、工人七十余人开始在延安、宜君一带开采石油。

民国10年(1921) 西安各校代表千余人举行抗议帝国主义侵略行径的示威游行。

民国16年(1927) 英商亚细亚火油公司在西安大湘子庙街成立代理商店。

民国20年(1931) 九一八事变后,中共陕西省委先后两次发表《告陕西民众书》。

民国22年(1933) 德国劳兹尔博士来陕西。

民国24年(1935) 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成员张浩由莫斯科返回瓦窑堡,传达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精神。

民国25年(1936) 4月德国牙医海伯特来西安开设牙科诊所,掩护中共地下交通联络站。6月,邓发受中共中央委托经西安前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德国医学博士马海德到西安,后又北上延安。7月,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来延安采访。12月,澳大利亚籍英国人端纳(蒋介石的外籍顾问)来西安为蒋介石被扣一事斡旋。

民国26年(1937) 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到延安采访。李德随中央机关从保安迁至延安。4月,美国记者、作家海伦·福斯特·斯诺由北平来到西安,后北上延安采访。6月杨虎城被迫前往欧美各国考察。王明、康生奉共产国际

之命由莫斯科回到延安。

民国 27 年(1938) 新西兰著名诗人和作家路易·艾黎来宝鸡领导“工合”西北办事处的实际工作。白求恩抵达西安,后又前往延安。国际青联访华代表团到延安参观访问。马来西亚南部柔佛士乃州华侨司机回国服务团来延安。

民国 28 年(1939) 美国合众社战地记者乔治·何克来宝鸡。印度医疗队由重庆来延安。德国医学博士米勒来延安。陈嘉庚率领的“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来到西安、延安。任弼时从莫斯科回到延安。

民国 29 年(1940) 陕甘宁边区的日本反战士兵发起成立“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同盟”。八路军总政治部在延安创办日本工农学校。

民国 30 年(1941) 东方各民族反对法西斯代表大会在延安隆重举行,来自日本、印度、印尼、菲律宾等 18 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参加了大会。

民国 31 年(1942) 在延安的部分日本人成立“在华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华北日本士兵代表大会和反战团体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

民国 33 年(1944) 在华日人反战同盟扩大执委会在延安召开预备会。中外记者参观团到延安参观、访问。由包瑞德率领的美军观察组第一批成员乘飞机抵达延安。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私人代表赫尔利到达延安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会谈。

民国 34 年(1945) 董必武、章汉夫、陈家康从延安赴美国,代表中国参加正式成立联合国的旧金山会议。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国民党代表张治中由重庆赴延安。日本工农学校、日本人民解放联盟等在延安举行归国出发大会。

民国 35 年(1946) 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由北平到延安,毛泽东会见她时提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

## 现 代

### 1949年

11月 中共中央西北局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成立，习仲勋兼主任委员。

11月 西北军政委员会交际处成立。

11月7日 中苏友好协会西安分会成立。

### 1950年

12月11日 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西北区总分会筹备委员会暨西安分会成立。

### 1951年

4月 西北军政委员会在西安举办朝鲜、越南、蒙古、波兰等9国图片展览。

8月20日 陕西省对外友协筹委会成立，同年11月5日召开全省友协首届代表会议。

11月5日 陕西省中苏友好协会成立。

11月 陕西省和西安市举办苏联影片展。

12月19日 陕西省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西安分会又成立了抗美援朝分会。

### 1952年

10月14—20日 罗马尼亚部队歌舞团来西安演出。

11月7日—12月6日 举办苏联影片展。

11月 “爱国艺人”常香玉和她领导的豫剧社，经过半年巡回演出，为抗美援朝捐献飞机一架。

### 1953年

3月9日下午 西安各界16万人在革命公园举行追悼伟大革命导师斯大林逝世大会。

4月8—12日 朝鲜铁道访华艺术团一行30人来西安访问演出。

4—12月 省友协在西安先后举办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苏联、保加

利亚等国电影周。

10月16日 陕西省参加西北五省（区）、西安市组织的各民族、各阶层、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一行250人。陕西为第二总分团，由省人民政府主席赵寿山任团长，前往朝鲜慰问。

#### 1954年

3—12月 分别举办波兰、朝鲜、民主德国、苏联、罗马尼亚电影周。

10月12—18日 捷克斯洛伐克音乐代表团来西安演出。

10月17—22日 保加利亚人民军歌舞团来西安访问演出。

#### 1955年

5月 中共陕西省委暨西安市委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成立，省委常委赵守一兼任主任委员。

10—12月 省友协在西安分别举办苏联版画展、印度电影周、日本木刻展、苏联电影周。

#### 1956年

2月21日 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西安分会成立。

3月18日 中苏地质技术合作队秦岭区域地质测量队来陕测绘，同年7月13日，该队在河南卢氏杜关山区执行航测中飞机失事，损失严重。

4月 波兰“格尔巴尼亚”足球队来西安进行足球友谊比赛。

5月 苏联俄罗斯体操队一行22人在西安访问表演。

5—12月 省友协在西安分别举办捷克斯洛伐克、日本、法国、苏联、南斯拉夫、保加利亚电影周，墨西哥版画展。

6月 中国国际旅行社西安分社成立。

7月20—25日 匈牙利民间乐队在西安访问演出。

8月12—15日 罗马尼亚“云雀民间舞蹈音乐团”来西安访问演出。

8月17—25日 乌克兰国家舞蹈团，在西安访问演出。

10月24日 缅甸执政党“自由同盟”主席吴努，路经西安作短暂停留，代省长赵伯平等到机场迎送。

#### 1957年

3月12日 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理威廉·西罗基率政府代表团，由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陪同来西安参观访问。

4—12月 省友协在西安先后举办意大利、苏联电影周、英国版画展、苏联电影艺术和十月革命40周年图片展、日本画家雷舟筹扬逝世450周年

纪念展。

5月4—16日 缅甸民族院议长萧恢塔（曾任缅甸首任总统）一行，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刘贯一陪同来西安访问。

5月6日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一行路过陕西阎良机场作短暂停留。

5月6日 中共陕西省委暨西安市委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召开“陕西省暨西安市1957年外宾接待工作会议”。

10月23日 阿富汗首相达乌德一行，途经西安作短暂停留。

10月 陕西派出农业劳动模范王保京、许敬章、刘述贤赴罗马尼亚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

12月9日 缅甸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吴巴瑞率友好代表团访问西安。

#### 1958年

1月15日 波兰杂技团来西安访问演出。

1—11月 省友协举办朝鲜、苏联电影周；法国现代绘画展；日本木版水印、木刻、石版观摩展；意大利访华美术家作品展。

4月1—2日 罗马尼亚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基伏·斯托伊卡率政府代表团，由外交部副部长曾涌泉陪同来西安访问。

4月25日 中共陕西省委暨西安市委决定设立陕西省暨西安市外事小组。

4月29日 陕西省外事办公室成立。此后省委又决定设立专家工作小组。

8月15日 柬埔寨王国首相西哈努克亲王一行，由外交部礼宾司司长俞沛文陪同，途经西安停留参观。

9月23日 中共陕西省委暨西安市委外事小组召开“陕西省暨西安市外事工作会议”。

10月23—29日 苏联阿塞拜疆歌舞团在西安作访问演出。

#### 1959年

1959年新年前夕，周恩来总理给在陕西工作的外国专家寄来贺年信表示慰问。

1月27日 西安各界代表1500多人集会，表示全力支持古巴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和刚果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

2月22日 国务院任命副省长李启明兼省外事办公室主任。

3月30日—4月1日 召开“陕西省外事工作会议”。

4—12月 省友协举办了中、匈、保、日、苏版画观摩展；举办了苏联、民主德国电影周；陕西省出版的8种图书参加了莱比锡国际博览会。

5月4日 西安地区青年和各界群众2万多人，举行盛大集会，支持土耳其人民的爱国正义斗争，反对美帝国主义奴役和屠杀土耳其爱国人民的血腥罪行。

5月12日 为了支持日本人民反对日美军事同盟条约，西安各界群众25万人冒雨举行了声势浩大的集会和示威游行。

8月7—9日 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在外交部礼宾司副司长张世杰陪同下由兰州乘专列到达西安。

8月21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将西安市、临潼县、延安县列为对外开放地区。

9月 西北国棉一厂先进生产者赵梦桃参加陕西第一批公民旅行团访问苏联。

10月5日 民主德国副总理马克斯·塞弗林来西安访问。

10月15—18日 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主席团道比·伊斯特万率党政代表团一行，在农垦部部长王震陪同下来西安参观访问。

10月16—20日 民主德国罗斯顿交响乐团在西安演出。

12月7—10日 省外办在西安召开了陕西省外国专家工作经验交流座谈会。

1959年春节期间，省外办组织在陕西帮助建设的苏联、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的专家及其眷属95人去宝鸡参观。

### 1960年

1—11月 省外办在西安先后举办了匈、捷、朝、越和苏联十月革命43周年电影周。

2月 省中苏友好协会，开展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10周年纪念活动。

2月29日—3月5日 日本前进座剧团在西安访问演出。

3月 省外办在兴平县召开了全省外国专家生活接待工作经验交流会。

4月3日 西安各界1000多人在人民大厦礼堂庆祝匈牙利人民解放15周年大会。

9月1日 西安各界1000多人在人民大厦礼堂庆祝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



15周年大会。

9月15日 美国作家、《西行漫记》作者埃德加·斯诺和新西兰艾黎，由北京来西安、延安参观访问。

9月18日 中共陕西省委暨西安市委外事小组召开“外事工作会议”。

9月28日 缅甸联邦政府总理吴努一行途经西安作短暂停留。

9月30日 省委决定，省外事办公室设立专家工作处。

1961年

4月7—8日 委内瑞拉左派革命运动主席德尔加多洛萨诺一行，来西安参观访问。

4月22—24日 西安各界5万多群众集会，声援古巴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武装侵略大会。

6月22—25日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总书记艾地一行6人在西安、延安参观访问。

7月6—15日 全国对外友协在西安举办“中蒙友好旬”活动。

8月16—17日 越南民主共和国总理范文同率友好访问代表团，由北京赴昆明途经西安停留参观游览。

9月13—14日 英国蒙哥马利元帅来西安参观访问。

10月6—7日 尼泊尔国王马亨德拉·比尔·比克拉姆·沙阿·德瓦陛下和王后一行，来西安参观访问。

11月23—25日 阿尔巴尼亚部长议会副主席凯莱齐来西安参观访问。

1962年

4月19日 省对外文协等单位联合在人民剧院举行世界文化名人、中国唐代伟大诗人杜甫诞辰1250周年纪念大会。

7月11日 西安各界800多人在人民大厦礼堂集会，庆祝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一周年。

7月27日 西安各界2000多人，集会纪念朝鲜人民解放战争胜利10周年大会。

9月15日 西安各界1800多人，庆祝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15周年大会。

9月27—28日 越南副总理、国防部长武元甲大将率越南军事代表团一行来西安访问。

11月1日 西安各界2000多人在人民大厦礼堂隆重集会，声援古巴人

民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战争挑衅，保卫古巴革命，会后对美帝国主义的挑衅罪行进行了示威游行。

### 1963年

3—11月 北京新华总社、建设杂志社和北京周报社联合组织9个国家的新闻专家、报道员共10批来西安参观访问。

4月25日 中共陕西省委外事领导小组调整成员后，召开第一次会议。

4月27日 陕西省暨西安市人委外事办公室转发了中共陕西省委外事领导小组4月25日会议纪要。

5月6日 西安市1000多名职工集会，支持越南南方人民反美爱国斗争大会。

6月3—4日 陕西省暨西安市人民委员会外事办公室召开“外事工作会议”。

6月12日—7月17日 由陕西省暨西安市人民委员会外事办公室负责，以国际旅行社名义组织了陕西省公民赴苏联、波兰、民主德国旅行团，时逸之为团长率团出访。

8月 陕西省宝鸡峡引渭工程局副总工程师荣嗣弘以水利灌溉排水专家的身份赴阿尔巴尼亚进行技术援助。

12月8日 中共陕西省委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1959年8月21日的决定，从1963年延安县对外宾全部开放，西安市对外宾半开放。

### 1964年

1月15日 西安各界6000多人冒着寒风大雪，在市体育场举行盛大集会，热烈拥护毛泽东主席关于坚决支持巴拿马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爱国正义斗争的谈话。

1月19日 中苏友协、对外文化协会，省政协、省总工会、团省委、省妇联、省科协等各界1500多人隆重集会，庆祝阿尔巴尼亚解放20周年。

4月28日 布隆迪王国人民议会代表团，由议长塔德·西里乌龙蒙西率领访问西安。

8月8—12日 省市“和大”、工会、妇联会、科协、青联、工商联等联合在市体育场召开了万人大会，支持越南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武装侵略的示威活动。

10月3—7日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崔庸健率领的朝鲜党政代表团，来西安参观

访问。

同年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陕西省分会成立。

1965 年

2 月 12 日 国务院任命省委书记处书记章泽兼省外办主任。

4 月 29 日—5 月 12 日 省对外友协举办了“美国侵略者从越南滚出去图片展”。

8 月 6—10 日 莫桑比克革命委员会总书记古曼一行来西安参观访问。

10 月 8—12 日 北加里曼丹统一邦政府总理阿里德·马哈茂率领的政府代表团来西安、延安参观游览。

1966 年

3 月 对外文化协会西安分会与省外办合署办公，同年 7 月并入省外办。

1967 年

2 月 “文化大革命”中产生的群众组织在省外办夺权。

1968 年

9 月 21 日 省革委会确定将省外办改名为“陕西省革命委员会办事组外事组”。

1969 年

9 月 24—25 日 省革委会办事组外事组召开“国庆外宾宣传接待工作会议”。

1970 年

9 月 10—17 日 美国新闻界知名人士斯诺及夫人洛依斯·斯诺，在西安、延安访问。

11 月 16—21 日 柬埔寨国家元首、民族统一阵线主席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来西安访问。

1971 年

4 月 26—30 日 省革委会办事组外事组召开外事工作会议。

5 月 25 日 省革委会办事组外事组召开第二次外事工作会议。

6 月 12 日 外国驻京记者和临时访华记者一行 29 人，来西安参观访问。

8 月 23 日 日中学生友好会第二次访华团团员垦美穗子抵住西安人民大厦期间坠楼身亡。

10 月 15—16 日 日本松山芭蕾舞团在西安访问演出。

11月25日 省委以陕革发〔1968〕号文，批准成立陕西省革命委员会外事工作领导小组。

12月8日 省革委会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召开首次会议。

#### 1972年

省外办开始向外交部推荐选派中国驻外使（领）馆工勤人员。

#### 1973年

2月12—17日 省革委会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召开“陕西省外事工作会议”。

省文化局接受援建喀麦隆联合共和国文化宫、电影放映室等整体工程。

6月8—11日 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黎笋和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总理范文同率领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党政代表团，由国务院总理周恩来陪同，到延安、西安参观访问。

9月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7人，到陕西礼泉县考察农村有线广播建设情况。

12月 陕西户县农民画家李凤兰（女）随中共代表团出访越南，受到越南民主共和国总理范文同的亲切接见。

#### 1974年

1月21日 陕西省革命委员会外事办公室成立。

2月1日 西安市与日本奈良市建立友好关系。

2月6日 波兰共产党总书记米雅尔访问西安。

5月10日 西安市与日本京都市建立友好关系。

5月29日 英国前首相爱德华·希思来西安访问。

6月15日 大荔县石槽公社植棉能手郑拉香，随中国农业代表团访问伊朗。

7月5日 中共咸阳地委第365次常委会议决定，成立咸阳专署外事组。1977年12月改名为“咸阳地区外事处”。

8月9—30日 省革委会副主任孙福林为团长一行前往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进行友好访问。

9月23—25日 省革委会外事办公室召开“陕西省外事工作会议”。

10月22日 丹麦王国首相保罗·哈特林和夫人前来西安、延安访问。

#### 1975年

3月22—26日 省革委会外事办公室召开“陕西省外事工作会议”。

7月2—4日 省革委会外事办公室，召开“陕西省外事工作会议”。

7月4日 中共陕西省常委会决定：组建国际旅行社西安分社和陕西省中国旅行社。

#### 1976年

4月23日 对外友协陕西省分会成立。

5月15—17日 新加坡共和国总理李光耀来西安参观访问。

8月1日 丹麦共产党联盟全国主席斯科科萨抵西安访问。

#### 1977年

2月25日—3月4日 省外办召开“陕西省外事工作会议”。

4月 日本新制作座艺术团在西安访问演出。

10月29—31日 新西兰副总理托尔博伊斯一行来西安参观访问。

#### 1978年

3月4—10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陕西省外事工作会议”。

4月17日 为适应外宾在临潼县著名景点参观需求，中共陕西省委办公厅转发《关于加强骊山风景区管理工作会议纪要》。

5月9日 缅甸共产党中央军事部长何多一行来西安参观访问。

6月23日 省革委会以陕革发〔1978〕95号文成立“陕西省旅行游览事业管理局”。

10月 延安地区外事办公室成立。

10月15—24日 日本松山芭蕾舞团在西安访问演出。

11月12日 中共陕西省委决定鲁曼任省革委会外事办公室主任。

12月 西安市革委会外事组改名为西安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

#### 1979年

1月 省外办在西安举办《墨西哥波萨达版画、民间工艺美术展》。

4月30日—5月1日 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来西安参观访问。

8月9—10日 印度共产党（马列）总书记维诺德·米斯拉一行来西安参观访问。

8月29—30日 美国副总统沃尔特·弗·蒙代尔和夫人一行在西安访问。

9月2—4日 苏里南共产党（马列）主席汉弗莱·基尔菲尔德一行，来西安参观访问。

9月16—17日 丹麦王国玛格丽特二世女王陛下和亨里克亲王殿下，在西安访问。

9月29日 卢森堡大公国大公让殿下一行来西安参观访问。

11月24日 比利时王国副首相维利·克拉斯一行来西安参观访问。

12月1—15日 省外办、省文化局主办的《南斯拉夫文化艺术展》，在省展览馆展出。

12月8—9日 日本国首相大平正芳和夫人一行来西安访问。

12月 省革委会外事办公室改名为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

#### 1980年

1月10—11日 日本参议院秋山长造副议长率团来西安参观访问。

3月26—30日 巴基斯坦普卡舞蹈团一行在西安进行访问演出。

4月10—12日 省外办召开“全省对口外事工作会议”。

4月11日 罗马尼亚第一副总理格·奥普雷亚为团长的经济代表团访问西安。

5月14日 为纪念善导大师圆寂1300年，中国佛教协会、陕西省佛协、日中友好净土宗协会在长安县香积寺举行纪念法会。

5月20日—6月15日 副省长白纪年率农业考察团一行访问日本。

8月7—12日 新爱尔兰管弦乐团一行在西安访问演出。

8月8日—11月8日 陕西省杂技团一行32人赴扎伊尔等7国进行友好访问演出。

9月21—23日 意大利共和国总统山德曼·佩尔蒂尼和夫人一行来西安参观访问。

9月24—26日 亚非记协常驻北京首席记者查禾多一行在西安参观访问。

10月2—3日 赞比亚联合民族独立党书记一行来西安访问。

10月18—19日 法兰西共和国总统瓦莱西·吉斯卡尔·德斯坦一行来西安参观访问。

10月31日—11月2日 荷兰王国首相安德亚斯·范阿赫特和夫人一行来西安参观访问。

陕西首次举办新型针灸培训班，美国、法国、日本、澳大利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和香港地区共计11人参加。

#### 1981年

3月30日—4月3日 省外办召开外国文教、经济专家工作座谈会。

4月4—5日 英国外交大臣卡林顿勋爵一行来西安访问。

5月 中共陕西省委、省人民政府转发省外办党组《关于在对外活动中赠送和接受礼品的几项内部规定》；省政府批转了省外办《关于近年来外宾在西安的一些值得注意的活动情况的报告》。

5月27日 哥伦比亚参议院代表团由埃米利亚诺第一副议长率团来西安参观访问。

5月29—30日 比利时国王博杜安一世陛下和王后法比奥拉·德莫拉—阿拉贡来西安参观访问。

6月12日 联合国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一行来西安参观访问。

6月28日—7月2日 丹麦特丽多努斯合唱团一行在西安访问演出。

9月 首次向日本东京银座寿多大酒楼等10家股东和经理，推出陕西古代宫廷菜肴品尝试点。

9月11日 省政府批转省外办《关于外国经济专家工作座谈会情况的报告》。

9月18—19日 瑞典国王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陛下和王后一行来西安参观访问。

10月23—25日 丹麦王国首相安高·约恩森和夫人一行在西安参观访问。

10月28—30日 委内瑞拉共和国总统路易斯·埃雷拉·坎平斯和夫人一行来西安参观访问。

11月18—27日 中共陕西省委陕发〔1981〕54号文批准成立省委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吕剑人任组长、李连璧任副组长。领导小组召开外事工作会议。

## 1982年

1月16日 宝鸡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成立。

2月8日 国务院公布西安、延安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

2月21日 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政治执行委员会委员、政府副总理科尔内尔·布尔蒂卡为团长的政府贸易代表团来西安访问。

2月26—27日 摩洛哥王国首相布阿比德一行来西安访问。

4月9—12日 日本《现代书法展览》随展团一行，在西安参观游览。

4月13日 中国佛教协会、陕西省佛协在户县草堂寺联合举行“鸠摩罗什三藏法师尊像奉安开光法会”。

4月24日—5月24日 延安地区群众艺术馆靳至林和安塞县剪纸艺人

李秀芳赴法国巴黎参加国际博览会。

4月24—26日 玻利维亚议会代表团一行访问西安。

4月27—29日 以欧拉伍尔·约翰内松为团长的冰岛共和国外长访华团一行来西安访问。

5月2—3日 卢森堡首相维尔纳一行来西安访问。

5月17—20日 日本新闻代表团一行在西安参观、采访。

8月8—13日 泰国文化艺术代表团一行在西安进行访问演出。

8月15日 西安至香港地区定期直航旅游包机首航。

8月21—22日 加拿大外长马克·麦圭根博士阁下及夫人一行来西安参观访问。

8月31日—9月2日 巴巴多斯外长塔尔一行来西安访问。

9月1—3日 联邦德国社会民主党埃贡·巴尔主席一行来西安参观访问。

9月1—14日 联合国“教科文艺术巡回展”在省展览馆展出。

9月22—23日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主席金日成一行，由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主陪来西安参观访问。

10月1—2日 哥伦比亚外长卡洛斯·莱莫斯·西蒙兹一行来西安参观访问。

10月10—13日 日本国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委员长一行来西安参观访问。

10月14日 联邦德国总统卡尔·卡斯滕斯和夫人一行来西安参观访问。

10月16—31日 省长于明涛和副省长李连璧率陕西省友好代表团，赴美国明尼苏达州进行友好访问。

10月17—19日 法国共产党总书记乔治·马歇一行来西安参观访问。

10月19日 陕西省与美国明尼苏达州建立友好省州关系。

10月20—21日 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总统穆罕默德·齐亚·哈克上将和夫人一行来西安参观访问。

10月20日—11月9日 日本长野县书画展览会代表团一行来西安参加“日本长野县书法展览”开幕式。

10月24—26日 中国与波兰采矿、灭火技术合作组，在铜川市举行防火喷洒工艺技术交流。

10月 中国政府和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就米脂县改造



黄土高原土地利用提供无偿援助达成《基本协议》。

11月1日—翌年1月下旬 举办全省外事旅游及涉外单位负责人第一期学习班。

11月15—21日 日本净土宗代表团一行100人，来西安参加“日中友好净土宗书法展览”开幕式。

11月15—21日 瑞典民间歌舞团一行35人在西安参观演出。

11月26—27日 朝鲜劳动党代表团金永南一行来西安参观访问。

### 1983年

2月16日 国务院确定将陕西省的延安市作为甲类开放地区，宝鸡市、韩城市作为乙类开放地区。

2月18—21日 圣马力诺共产党主席吉尔多·加斯培罗尼一行来西安参观访问。

3月31日 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姜一赴朝鲜进行友好访问。

4月9—11日 瑞典左翼党（共产党人）主席拉尔斯·韦尔纳一行来西安参观访问。

5月6日 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一行来西安参观访问。

5月8—11日 厄瓜多尔民主党主席弗朗西斯科·韦尔塔一行来西安参观访问。

6月18—20日 美国东方旅行社一行48人在西安举行音乐会。

6月18—20日 美国世纪学院合唱团一行80人在西安作友好演出。

6月24日 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马文瑞率省友好代表团赴日本京都府进行访问。

7月2—7日 索马里“瓦贝里”国家艺术团一行34人在西安进行访问演出。

7月16日 陕西省与日本京都府建立友好省府关系。

8月17—18日 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金恩里科·贝林格一行来西安参观访问。

8月30日—9月1日 泰国国会主席乍鲁布·銮素万及上议员访华团一行来西安参观访问。

8月30日—9月3日 奥地利民间乐队一行31人来西安访问演出。

9月5—6日 约旦国王侯赛因·伊本·塔拉勒和努尔·侯赛因王后一行来西安访问。

9月 省文化文物厅制作的唐代“含元殿”等17件古建筑模型赴美国纽约展出。

9月28日 省委任命魏明中为省外事办公室主任。

10月10—12日 圣马力诺社会党主席贾克米尼一行来西安参观访问。

10月18日—11月10日 省政府副省长孙克华一行6人赴比利时进行考察访问。

11月11—15日 朝鲜万寿台艺术团一行111人来西安作访问演出。

11月一次年2月 省外办举办第二期全省、地、市、县外办、旅游局主要负责人学习班。

### 1984年

1月20日 国务院公布咸阳、汉中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

1月下旬 榆林地区外事办公室成立。

2月7—8日 泰国外长西扎西提·沙卫西拉空军上将一行33人，来西安参观访问。

4月3—4日 欧洲议会对华关系代表团玛莉·雅克琳·德舒什一行49人来西安参观访问。

4月29日 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和夫人等一行访问陕西，从北京抵达阎良机场，参观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

5月1日 西安海关正式成立。

5月4—5日 挪威国防司令斯文·豪格上将一行来西安参观访问。

6月1—2日 马来西亚外长坦·斯里·加扎利·沙菲一行33人来西安参观访问。

6月5日 日本东海旅行社30人一行赴乾陵参观，返回途中在礼泉县境内发生车祸，日方一人脑部受伤，被家属接回治疗。

6月5—12日 美国著名记者、作家《纽约时报》前副总编辑哈里森·索尔兹伯里一行，为编写《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途经陕西专程赴延安、志丹、吴旗等地采访并收集资料。

6月13—15日 联合国副秘书长维兹纳夫妇一行，来西安参观访问。

6月14日 副省长张斌率团出访日本。

6月20日 省委对外宣传工作领导小组及工作机构进行了重新调整。

7月5—21日 土耳其著名音乐家、总统府交响乐团首席指挥希克梅特·西姆谢克与陕西乐团在西安唐乐宫合作演出。

7月13—15日 西班牙众议院代表团莱奥波多尔·托雷斯（第一副议长）一行来西安访问。

7月25—26日 巴基斯坦外长雅各布·汗一行来西安参观访问。

7月27—30日 香港青年合唱团一行54人，在西安访问演出。

8月3日 副省长孙达人率陕西省歌舞团赴日本进行访问演出。

8月7—11日 法国玛莉罗舞蹈团一行31人在西安作访问演出。

8月17—26日 日本京都府儿童合唱团一行32人来西安进行友好演出。

8月24日—9月24日 陕西木偶剧团一行35人赴泰国进行义演。

8月26日 副省长徐山林率团访问美国。

8月30日—9月19日 陕西省友好访问演出团一行50人赴日本京都府作友好访问演出。

9月6日 副省长白纪年参加全国友协代表团出访意大利。

9月7—10日 日本国佛教友好代表团一行来西安在青龙寺举行“惠果·空海纪念堂”落成庆祝法会。

10月上旬 陕西省与西安市首次举办国际女子足球友谊赛。

10月5—15日 省长李庆伟率友好代表团访问日本。

10月8—25日 陕西省杂技团一行36人随西安市友好代表团赴日本参加京都、西安结为友好城市10周年纪念活动。

10月9—11日 民主德国电影代表团来西安庆祝中德双方建国35周年国庆互办电影周。

10月11日 联邦德国总理科尔和夫人一行来西安参观访问。

10月14—16日 哥伦比亚政府文化代表团民间音乐小组在西安进行友好演出。

10月20—21日 智利外长海梅·德尔瓦列·阿达德一行来西安参观访问。

10月26—28日 墨西哥外长贝尔纳多·塞普尔维达·阿莫多硕一行来西安参观访问。

10月28—29日 土耳其外长瓦希特·哈莱夫奥芦一行来西安访问。

10月30日—11月3日 省文化文物厅举办的《伊拉克艺术展览》在西安展出。

10月30日—11月18日 陕西省歌舞团一行55人赴香港地区参加第九届亚洲艺术节。

11月中旬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陕西省分会改称陕西省人民对外友

好协会。

11月17日 省委调整了省委外事工作领导小组部分成员。

11月17日 省委任命陈兴亮为省外办主任。

11月20日—12月7日 《苏联现代绘画展》在西安美术家画廊举行。

12月 省政府在西安举办“陕西省第一次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洽谈会”。

### 1985年

1月10—19日 《意大利电影回顾展》在西安举行。

3月 陕西首次在国外举办文物展览。

3月2—4日 日本京都访华团一行61人，前来西安参加的《中国陕西、日本京都书画联展》开幕式。

3月15日—4月16日 陕西省古典艺术团一行55人赴日本进行商业演出。

3月29—31日 美国新闻界老朋友“重访中国代表团”一行在西安参观访问。

4月1日 省政府在西安举办“陕西省地质矿产开发咨询服务展览洽谈会”，外商320人参加。

4月11—13日 罗马尼亚政府第一副总理格奥普雷亚一行来西安参观访问。

4月15日 意大利国防部部长斯帕多利尼一行来西安参观访问。

4月16日 西安市与英国爱丁堡市建立友好关系。

4月20日 比利时王国首相维尔弗里德·马尔腾斯陛下和夫人一行来西安参观。

4月25日 中国人民外交学会陕西省分会成立。

4月27日—5月3日 丹麦王国外交大臣乌弗·艾勒曼彦森阁下一行29人来西安参观访问。

4月29日—5月1日 挪威王国王储哈拉尔殿下—一行来西安参观访问。

4—5月 凤翔县剪纸艺人张斌杰赴法国参加尼奥尔市国际博览会，并作了现场剪纸表演。

5月7日 陕西省与比利时王国安特卫普省建立友好省际关系。

5月7日 副省长张斌率友好代表团赴比利时进行访问，顺访法国、瑞士。

5月7—13日 省外办暨省旅游局联合召开“全省外事旅游工作会议”。

5月15日 宝鸡石油机械厂与日本三菱重工业株式会社就铸钢车间技术改造咨询服务合同在北京签字。

5月21日 斐济总理卡米塞塞·马拉利偕夫人一行来西安参观访问。

5月23—24日 突尼斯社会主义党政代表团哈迪巴库什一行来西安参观访问。

5月26—27日 委内瑞拉民主行动党领导人、前总统、社会党国际副主席卡洛斯·佩雷斯一行来西安参观访问。

6月1—22日 陕西省木偶剧团一行36人赴联邦德国参加西柏林艺术节。

6月1日—9月3日 陕西省古典艺术团一行20人，赴法国、葡萄牙、西班牙参加国际民间艺术节演出。

6月9日 美国《中报》董事长傅朝柜来西安参观。

6月上旬 洛川民间皮影艺术团一行9人应法中友协邀请在法国29个中小城市巡回演出。

6月21日 中共陕西省委外事工作领导小组批转省外办《关于外事接待工作的改革意见》。

7月6—7日 孟加拉国总统侯赛因·穆罕默德·艾沙德中将一行来西安参观访问。

7月中旬 宝鸡市民间美术爱好者李继友，应法国国际艺术家展览中心邀请赴巴黎以《陕西社火脸谱》独特艺术参展。

7月16日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共和国总理乔治·迈克尔·钱伯斯一行来西安参观访问。

7月26日—8月5日 泰国《传统和现代艺术展览》在西安展出。

8月4—7日 泰国各党派代表团坡亚纳一行来西安参观访问。

8月5—7日 联合国副秘书长鲁埃达斯一行来西安参观访问。

8月中旬 省体委在西安举办陕西第一届国际武术友谊赛。

8月27—28日 马耳他共和国总统巴巴拉（女）一行来西安参观访问。

8月下旬 渭南地区外事办公室成立。

9月3—5日 省外办与省文化文物厅在西安举办法国《现代艺术展览》。

9月8日 西班牙首相费利佩·冈萨雷斯·马克斯和夫人一行来西安参观访问。

9月8—11日 爱尔兰女中音歌唱家伯纳多特·格列行一行4人在西安访问演出。

9月12—14日 哥斯达黎加执政党民族解放党议会党团副主席阿尔法罗为团长的议员团一行来西安参观访问。

9月15—16日 奥地利共和国总统鲁道夫·基希施莱格和夫人一行来西安参观访问。

9月17—18日 新加坡总理李光耀一行来西安参观访问。

9月19—21日 省外办与省文化文物厅联合举办约旦《造型艺术展览》。

9月21—23日 巴西民社党代表团奥梅罗·桑托斯总书记一行来西安参观访问。

9月28日—10月1日 卢森堡首相兼国务、财政大臣雅克·桑特和夫人一行在西安进行非正式参观访问。

10月10—14日 “国际黄土学术讨论会”在西安召开。

10月15—22日 陕西古典艺术团一行40人赴丹麦、挪威、瑞典、冰岛、保加利亚进行访问演出。

10月30—31日 民主德国社会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副主席京特·克莱伯一行22人来西安参观访问。

11月11—13日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一行来西安参观访问。

11月11—22日 以省委书记白纪年为团长、副书记牟玲生为副团长的中共陕西省委友好代表团赴日本访问。

11月25—27日 省外事办公室召开全省第一次音像对外宣传工作会议。

11月26日 马来西亚总理达图·斯里·马哈蒂尔·穆罕默德和夫人一行来西安参观访问。

12月8日 美国亚利桑那州《与民同乐》青年歌舞团一行50人（该团由世界上50多个国家的青年组成）在西安演出。

同月，陕西首次举办国际针灸学习班。

### 1986年

1月13—29日 省外办举办波兰“现代绘画展”。

1月13—29日 美国世界民族舞蹈团一行11人在西安访问演出。

1月24日 中共陕西省委、陕西省人民政府颁布《关于派遣临时出国人员以及邀请国外人员来陕审批权限和归口管理的规定》。

2月11—25日 省文化文物厅举办瑞典《现代艺术展览》。

2月17日—4月15日 省外办、中国科学院西安分院、省科学院、省科委干部局联合举办各地、市、县和省级各业务系统的涉外部门及接待单位的外事干部学习班。

2月25—27日 挪威王国外交大臣斯文·斯特雷来西安参观访问。

3月26日 丹麦王国首相施吕道和夫人一行来西安访问。

4月5日 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主席拉多万·弗拉伊科维奇和夫人一行抵西安参观访问。

4月26日至5月5日 日本京都府为纪念与陕西省建立省府友好关系3周年，联合举办攀登太白山活动。

5月14—18日 比利时劳动党主席吕多·马顿斯一行来西安参观访问。

5月28日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书记黄长烨访问西安。

6月9—18日 副省长张勃兴率陕西省经济代表团出访奥地利。

7月15—20日 柬埔寨《迪娃》舞蹈小组一行13人来西安演出。

7月24日 咸阳市与日本国京都府宇治市建立友好关系。

8月 国务院发文公布将韩城、榆林列为历史名城。

8月3—5日 尼泊尔外交大臣乌帕德亚雅来西安参观访问。

8月6—13日 日本文化若叶会舞蹈访华团一行55人在西安访问演出。

9月15日 西安市与法国波城建立友好城市关系。

9月17日 芬兰总理索尔萨偕夫人一行来西安参观访问。

9月22—23日 由省公安厅、省外办和省文化文物厅联合召开全省涉外单位治安工作座谈会。

10月16日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陛下偕丈夫爱丁堡公爵菲利普亲王殿下来西安参观访问。

10月18—20日 委内瑞拉民主行动党总书记一行来西安参观访问。

10月19日—11月18日 陕西省民间艺术木偶团一行34人赴法国参加巴黎秋季艺术节。

10月23—25日 中国医科院肿瘤研究所、第四军医大学、西安医科大学及陕西省科协联合举办“第二届中日双边放射线增敏会议”。

10月26日 冰岛总理赫尔曼森和夫人一行抵达西安参观访问。

11月2日 意大利总理贝蒂诺·克拉克西和夫人一行来西安参观访问。

11月10日 在西安成立了西北五省（区）外国文教专家、留学生工作协作区。

11月30日—12月4日 省美术家画廊举办苏联《造型艺术中的现代人形象展览》。

12月7日 墨西哥合众国总统米格尔·德拉马德里·乌尔塔多和夫人一行来西安参观访问。

12月14—16日 捷克斯洛伐克外交部长赫努佩克来西安参观访问。

12月18—22日 省文化厅举办南斯拉夫《儿童书画艺术装帧展览》。

12月29日—1987年1月11日 副省长张斌率陕西经济技术代表团在香港进行工作访问。

12月30日 法国社会党第一书记利奥内尔·若斯潘一行来西安参观访问。

### 1987年

2月21—23日 密克罗尼西亚总统托西沃纳卡西马一行来西安参观访问。

3月19—20日 加拿大总督让娜·索维夫人一行来西安参观访问。

3月23—25日 澳大利亚澳中理事会主席（前总理）爱德华·高夫·惠特拉姆一行来西安参观访问。

3月31日—4月4日 省委、省政府在长安县西北饭店召开“陕西省外事旅游工作会议”。

4月7日 瑞典王国首相英尔瓦·卡尔松和夫人一行来西安参观访问。

4月9—11日 古巴共和国人民政权主席弗拉维奥·布拉沃率领的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访华团一行在西安参观访问。

4月15日 葡萄牙总理席尔瓦及夫人一行来西安参观访问。

4月20—22日 马提尼共产党总书记阿芒·尼古拉一行来西安参观访问。

4月21—25日 瑞士日内瓦大剧院芭蕾舞团一行40人来西安访问演出。

4月下旬 应陕西省土木建筑学会和西安冶金建筑学院邀请的日本7所大学3个研究所15位专家、教授，同中方专家、学者30多人，赴韩城党家村对传统民居房舍建筑进行联合调查。

5月1日 西班牙副首相阿方索·格拉一行15人来西安参观访问。

5月25日—6月4日 省长张勃兴率团访问日本东京、奈良等。

5月30—31日 新加坡第一副总理吴作栋一行来西安参观访问。

5月31日—6月7日 陕西省两只大熊猫在比利时安特卫普省皇家动物园展出。



5月20日 汉中地区外事办公室成立。

5—9月 陕西省两只金丝猴在美国明尼苏达州动物园和威斯康星州米尔沃基动物园轮流展出。

7月6日—10月上旬 陕西省杂技团一行14人赴约旦等6国28个城市访问演出。

7月15—17日 日本京都书画院访华团一行80人来西安参加“陕西省与京都府缔结友好省府3周年”纪念活动。

7月16—26日 中共陕西省委副书记周雅光率团出访瑞士。

7月31日—8月3日 匈牙利部长会议副主席毛罗蒂·拉斯洛一行来西安参观访问。

8月13—15日 法国共产党领导人安德烈·拉汝瓦尼一行来西安参观访问。

8月20—25日 西班牙共产党领导人阿尔卡拉斯夫妇来西安参观访问。

8月29—31日 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雷纳托·赞里一行来西安参观访问。

9月上旬 省友协与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博物馆联合举办《海伦·斯诺在中国的图片实物展》。

9月4—5日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和夫人等一行来西安参观访问。

9月6—8日 约旦外交大臣塔西阿·马里斯一行来西安访问。

9月9—17日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友协会长李连璧一行赴比利时访问。

9月17—22日 “国际旱地学术讨论会”在陕西省杨陵召开。

10月1—2日 罗马尼亚社会主义民主团结阵线副主席约瑟夫·乌拉尔一行来西安参观访问。

10月中下旬 渭南地区农民焰火艺人李宏林等一行7人赴法国巴黎为拉维特公园开园盛典燃放焰火。

11月16—17日 日本社会党委员长土井多贺子一行来西安参观访问。

12月上旬 陕西省举办龙年国际旅游活动。

12月20—22日 瓦努阿图共和国总统阿蒂·乔治·索科马努一行来西安参观访问。

12月下旬 中共陕西省委在长安县西北饭店召开全省对外宣传工作会议。

1988年

1月12—26日 省外办举办第三期外事干部学习班。

1月20—21日 挪威王国首相格罗·哈莱姆·布伦特兰夫人偕丈夫一行来西安参观访问。

2月11日 澳大利亚联邦总督尼尼安·斯蒂芬爵士偕夫人一行来西安参观访问。

2月26—27日 圣马力诺共和国国家元首吉安·佛朗哥·泰伦齐和罗萨诺·扎弗拉尼一行来西安访问。

3月1日—5月24日 陕西省艺术团（京剧）一行17人赴美国旧金山、洛杉矶等9城市进行交流演出。

3月2日 赞比亚共和国总统、非洲统一组织主席、非洲前线国家主席肯尼思·戴维·卡翁达博士和夫人一行来西安参观访问。

3月29日—6月11日 陕西省杂技团一行20人赴民主德国进行商业演出。

4月16—18日 黎巴嫩自由国民党主席夏蒙一行来西安参观访问。

4月21—22日 希腊共和国总统赫里斯托斯·安·萨采塔基斯偕夫人一行来西安参观访问。

4月21—25日 瑞士日内瓦大剧院芭蕾舞团一行40人在西安访问演出。

4月29日 美国宾斯里中学铜鼓乐团一行235人在西安访问演出。

7月6—7日 巴西联邦共和国总统若泽·萨尔内和夫人一行来西安参观访问。

7月7日 陕西省人大常委会任命张景文为省外事办公室主任。

7月上旬 省外办将西安市所辖系统因公出国人员护照颁发工作，交由西安市外事办公室办理。

7月8—10日 泰国前议长、盘谷银行董事长许敦茂一行来西安访问。

7月13日 安康地区外事办公室成立。

7月13日—8月26日 榆林地区民间艺术团一行30人参加法国卡娜第十五届、瑞士马蒂尼第九届和苏联莫斯科首届等国际民间艺术节演出活动。

7月21日 陕西省与意大利共和国的特拉维索省建立友好省际关系。

8月25—27日 美国共和、民主两党高级代表团一行25人来西安参观访问。

8月28—30日 日本国内阁总理大臣竹下登偕夫人一行由甘肃敦煌来陕西参观访问。

9月1—8日 以副省长孙达人为团长的陕西省政府代表团赴比利时安特卫普省进行友好访问。

9月8—9日 美国国防部长卡卢奇一行40人来西安参观访问。

9月15日 咸阳市与日本国千叶县成田市建立友好关系。

9月17日 铜川市外事办公室成立。

9月19—30日 以省长侯宗宾为团长的陕西省友好代表团对意大利特雷维索省进行友好访问。

9月19日—1989年1月 由陕西省科协主办的“中国古代科技成就对人类社会的贡献展览”，在比利时皇家历史艺术博物馆展出。

9月22—24日 斯里兰卡民主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理拉纳辛哈·普雷马达萨偕夫人一行来西安参观访问。

10月12—13日 委内瑞拉国防部长一行来西安参观访问。

10月13—14日 芬兰共和国总统毛诺·科伊维斯托偕夫人一行来西安参观访问。

11月7—8日 乌拉圭东岸共和国总统胡利奥·玛丽亚·桑吉内蒂偕夫人一行来西安参观访问。

11月7—11日 苏联国家库班哥萨克歌舞团一行70人，来西安访问演出。

11月9日 举世瞩目的释迦如来真身舍利瞻礼法会和重修真身宝塔落成典礼在扶风县法门寺隆重举行。

11月22—24日 省外办协同省高教局联合召开西北地区外国专家、留学生协作区第三届年会。

12月6—7日 匈牙利外长瓦尔科尼·彼得一行来西安访问。

12月6—8日 秘鲁左派联盟主席巴兰特斯来西安参观访问。

12月22—23日 印度共和国总理拉吉夫·甘地访华团一行来西安参观访问。

### 1989年

2月21—24日 巴西共产党主席萨洛芒·马利纳一行来西安参观访问。

3月16日 日本SCT—0314“三国之旅”旅行团一行17人（圣经女子大学学生），由四川来陕途中在川陕公路298公里处发生车祸。

3月27—29日 省外办召开“陕西省地市外办主任会议”。

3月27日—4月1日 日本书画院访华团一行52人来西安参加“1989

年中国陕西、日本京都书画联展”活动。

4月19—23日 澳大利亚民主党领袖一行来西安参观访问。

4月29日 西安市与美国堪萨斯城建立友好关系。

5月6日 西安市与伊朗伊斯法罕市建立友好城市关系。

5月25—29日 法国国防部长舍韦内芒及夫人来西安参观访问。

6月21日 中共陕西省委决定恢复省委对外宣传工作领导小组。

7月14—18日 陕西音乐艺术团一行14人前往加拿大参加第十二届温哥华民间艺术节交流演出。

7月15—17日 瑞士劳动党总书记斯波尔漫一行来西安参观访问。

7月26日—8月12日 副省长陈明率领陕西省暨西安市出口产品展销工作组赴新加坡展销会展销。

8月19日 国务院批准陕西省25个县市对外开放。

9月下旬 省委副书记董继昌率团出访罗马尼亚和民主德国。

10月14—27日 日本电影代表团一行19人来西安参加中影公司举办的《日本电影周》开幕式。

10月上旬 省水电、水土保持系统在西安召开首届国际沙棘学术交流会。

11月6—8日 黎巴嫩社会进步党主席琼布拉特一行2人来西安参观访问。

11月12—14日 泰国上议院第一副议长一行来西安参观访问。

12月11—25日 西北五省（区）联合轮流举办外事干部培训班，由陕西省外办承办第一期培训。

### 1990年

1月18—20日 波兰共和国副总理杨·雅诺夫斯基一行来西安参观。

2月16日 省人大常委会任命张开臻为省外事办公室主任。

3月14—22日 副省长徐山林率团出访日本京都府。

3月28日—4月1日 省外办召开“全省外事工作会议”。

4月6日 省政府公布黄帝陵，宝鸡天台山、钓鱼台，韩城黄河龙门、司马迁祠，耀县药王山，安康香溪洞，柞水溶洞，麟游唐玉华宫等为省级第一批风景名胜区。

4月16—25日 陕西省歌舞剧院古典艺术团一行19人前往日本进行友好联合演出。

5月8—10日 秘鲁前总理哈林一行来西安参观访问。

5月30日—6月30日 陕西省歌舞剧院《仿唐乐舞》剧组一行45人前往苏联、民主德国进行访问演出。

6月4—5日 国际政府财政管理联合会北美分会主任、美国佛罗里达州国际大学教授默特·迪坦霍弗博士来西安讲学。

6月10—12日 叙利亚副总统莫沙拉克一行来西安参观访问。

6月19—21日 秘鲁人民行动党总书记德尔阿古拉一行来西安参观访问。

7月7—9日 法国前总理雷蒙·巴尔一行来西安参观访问。

9月17—27日 省委书记张勃兴参加中共中央代表团前往苏联访问。

9月23—27日 日中友好汉诗访华团一行59人前来西安同陕西省艺术研究所联合举办“中日汉诗吟唱联合演出”。

10月6—8日 泰国前总理克立·巴莫一行来西安参观访问。

10月18—24日 新加坡著名画家林祥雄作品展在西安美术家画廊展出。

10月21—23日 瓦努阿图共和国总统蒂马卡一行来西安参观访问。

10月22日 新加坡总理李光耀由航空航天部长林宗棠等18人陪同由敦煌飞厦门，途经西安作短暂停留。

10月29日—11月8日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余明率陕西省友好代表团赴泰国访问。

11月14—22日 中国国际交流协会陕西分会会长、中共陕西省委副书记牟玲生率团访问日本。

11月17—18日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总统苏哈托来西安参观访问。

11月20日 中共陕西省委重新调整了外事工作领导小组成员。

11月27—29日 捷克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副总理瓦列什一行20人来西安访问。

12月14—15日 省政府办公厅在西安召开全省出国审批管理工作座谈会。

### 1991年

2月3—5日 印度外长舒克拉一行来西安访问。

3月6—8日 法国保卫共和联盟总书记阿兰·朱佩一行来西安参观访问。

3月12—14日 秘鲁基督教人民党领袖贝多亚一行来西安参观访问。

3月中旬 商洛地区外事办公室成立。

5月24—31日 陕西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李溪溥率团出访日本。

5月27日 西安市与联邦德国的多特蒙德市建立友好城市关系。

5月30日—6月1日 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总督赛雷·艾里一行，来西安参观访问。

5月30日—6月27日 由省对外友协组织的“中国长安古乐访问演出团”一行17人赴西班牙等6国13个城市进行访问演出。

6月5日 牙买加总理迈克尔·曼利一行来西安参观访问。

6月6—14日 省人民政府省长白清才率团访问比利时安特卫普省。

7月5—12日 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王双锡率团赴日本京都市出席传统产业会馆举办的“陕西省出口商品展销会”。

7月6日 中共陕西省委对外宣传工作领导小组召开省级主要涉外单位处以上干部会议。

7月12—14日 土耳其议会副议长阿拉斯一行来西安参观访问。

9月1日 西安·咸阳国际机场投入运营。

9月7—10日 波兰前总理拉科夫斯基夫妇一行来西安参观访问。

9月10—12日 马来西亚最高元首苏丹·阿兹兰·沙阿陛下由乌鲁木齐来陕西访问。

9月10—12日 联合国副秘书长亚达尔夫妇一行来西安参观访问。

9月12—13日 新加坡共和国总统黄金辉来陕西参观访问。

9月中旬 陕西电视台与日本广播协会合作摄制卫星直播《你早！西安》电视专题节目。

10月2日 由国家旅游局主办的1992年中国友好观光年丝绸之路首游式在西安举行。

10月27—28日 保加利亚国防部长穆塔夫奇耶夫一行来西安参观访问。

10月28—29日 新加坡前第一副总理吴庆瑞一行来西安参观访问。

11月13—14日 摩洛哥王储西迪·穆罕默德殿下来陕西参观访问。

11月17—21日 中共陕西省委、陕西省人民政府召开“全省外事工作会议”。

11月27—29日 朝鲜次帅吴振宇一行来西安参观访问。

12月1—2日 英国外交国务大臣凯思纳斯一行来西安访问。

12月4—13日 副省长刘春茂率团赴美国明尼苏达州参观考察。

12月18—20日 省外办在西安首次举办“陕西省外国经济专家工作管

理干部培训班”。

12月中旬 中国唐代文明展在新加坡展出，观众达40万人次。

陕西省先后同美、日、英、法、德、俄等37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交流关系。

---

## 附 录

---

### 一、毛泽东接见中外记者西北参观 团的致辞、问题与答复<sup>①</sup> (1944年6月12日)

#### (一) 致辞

我十分欢迎各位记者来到延安。我们的目的是共同的，就是打倒日本军阀与打倒一切法西斯，全中国，全世界，都在这个共同基础上团结起来。

各位到延安时，正遇着欧洲开辟了第二战场，我们表示极大的庆祝。第二战场的开辟，其影响不仅在欧洲，而且将及于太平洋与中国。中国要前进，世界要前进，我们必须取得最后胜利。

第二战场的开辟，是经过长期发展的结果，是经过莫斯科、德黑兰会议发展而来的，在这些会议上决定了从东、西、南三面打击敌人。第二战场现在是实现了，三面打击希特勒的计划是实现了，我们谨祝罗斯福总统、邱吉尔首相、斯大林元帅的健康！

全中国所有抗战的人们，应该集中目标，努力工作，配合欧洲的决战，打倒日本军阀。现在时机是很好的。

关于中国国内情况，诸位先生是十分关心的，我在这里必须讲几句。关于国共关系，中国共产党对此问题的态度，早已见于中共中央历次文告及其

---

<sup>①</sup> 见《解放日报》1944年6月13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出版。



报纸。今乘诸先生来延之便，特再申述如下：拥护蒋委员长，坚持国共与全国人民的合作，为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立独立民主的中国而奋斗，中国共产党此种政策始终不变，抗战前期是如此，抗战中期是如此，今天还是如此，因为这是全中国人民所希望的。

但是中国是有缺点的，而且是很大的缺点，这种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中国人民非常需要民主，因为只有民主，抗战才有力量，中国内部关系与对外关系，才能走上轨道，才能取得抗战的胜利，才能建设一个好的国家，亦只有民主才能使中国在战后继续团结。中国缺乏民主，是在座诸位所深知的。只有加上民主，中国才能前进一步。

## (二) 问题与答复

### 问 题

斯坦因先生问：毛主席能否谈一谈，林伯渠先生在重庆谈判的情形？

夏南汗神甫问：上述问题为大家所关心，可否尽先答复？

斯坦因先生问：为使问题明了起见，我请毛主席将 1936 年国共谈判情形与今日谈判情形作一比较。

爱泼斯坦先生问：第二战场的开辟是否引起了一个新阶段？中共中央对此是否准备发表宣言，以阐明中共中央之政策？

谢爽秋先生问：为着加强团结，中国共产党希望于各方面的是什么？

赵炳焱先生问：为使问题明了起见，我增加问，中国共产党希望国民政府、国民党及其他各党派做些什么？中国共产党本身又准备做什么？

### 答 复

诸位的问题可综合为三个：

第一个问题，关于国共谈判。谈判已进行了许久，但是今天还在谈判中。我们希望谈判有进步，并能获得结果。其他今天还无可奉告。

第二个问题，关于第二战场，日前《解放日报》社论已说明是一个新阶段，我们不准再发表宣言。第二战场的开辟是同盟国战争合作的发展，其总的性质，现在与过去比较，是没有变化的。但是第二战场开辟有与斯大林格勒反攻某种相同的意义。1942 年 11 月以前，是法西斯凶焰高涨，反法西斯力量被打与退却的时期，赖有苏联的进攻结束了过去的阶段，开辟了新的

阶段。接着，北非与太平洋相继有了进攻。这是同盟国从防御到进攻的一个大转变。第二战场开辟，在进攻中又前进了一大步，如果没有它，就不能打倒希特勒。现在欧洲已进到了决战阶段了，在这个意义上说，它是一个新阶段，特别在军事方面。我已说过，第二战场开辟的影响会是很广泛的，直接影响欧洲，将来亦会影响到太平洋与中国。但就目前来说，对中国的影响似乎不会很大，你们可以看见，外面情况虽然甚好，但是中国的问题还要靠中国人自己努力，单有国外情况的好转，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第三个问题，关于中共的希望和它自己的工作。为了打倒共同敌人以及为了建立一个很好的和平的国内关系，及一个很好的和平的国际关系，我们所希望于国民政府、国民党及一切党派的，就是从各方面实行民主。全世界都在抗战中，欧洲已进入决战阶段，远东决战亦快要到来了，但是中国缺乏一个为推进战争所必需的民主制度。只有民主，抗战才能够有力量，这是苏联、美国、英国的经验都证明了的，中国几十年以来以及抗战7年以来的经验，也证明这一点。民主必须是各方面的，是政治上的，军事上的，经济上的，文化上的，党务上的以及国际关系上的，一切这些，都需要民主。毫无疑问，无论什么都需要统一，都必须统一。但是，这个统一，应该建筑在民主基础上。政治需要统一，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统一在军事上尤为需要，但是军事的统一，亦应建筑在民主基础上，在军官与士兵之间，军队与人民之间，各部分军队互相之间，如果没有一种民主生活、民主关系，这种军队是不能统一作战的。经济民主，就是经济制度要不是妨碍广大人民的生产、交换与消费的发展，而是促进其发展的。文化民主，例如教育、学术思想、报纸与艺术等，也只有民主才能促进其发展。党务民主，就是在政党的内部关系上与各党的相互关系上，都应该是一种民主的关系。在国际关系上，各国都应该是民主的国家，并发生民主的相互关系，我们希望外国及外国朋友以民主态度对待我们，我们也应该以民主态度对待外国及外国朋友。我重复说一句，我们很需要统一，但是只有建筑在民主基础上的统一，才是真统一。国内如此，新的国际联盟亦将是如此。只有民主的统一，才能打倒法西斯，才能建设新中国与新世界。我们赞成大西洋宪章及莫斯科、开罗、德黑兰会议的决议，就是基于这个观点的。我们希望于国民政府、国民党及各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主要的就是这些。中国共产党所已做和所要做的，也就是这些。先生们来到边区已有十几天，今后还将有若干时日留在边区。你们可以

看到，我们共产党为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而做的一切工作，都贯彻着一个民主统一或民主集中的精神。其有不足的，必须继续做。如果有缺点，必须克服这种缺点。我们认为全中国只有民主制度、民主作风，目前才能胜敌，将来才能建立一个很好的和平的国内关系与国际关系。对于德意日等法西斯国家，在法西斯被打倒以后，我们所希望于他们的，也是如此，持此观点来看许多问题，没有不可以说通与做通的。今天时间已晚，今后还可互相交换意见。我要说的，就是如此。

## 二、朱德和外国记者斯坦因的会谈<sup>①</sup>

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将军接见过我几次，谈论八路军跟盟军军事合作的实际可能性。我们坐在一座一间屋子的建筑物里，我们一连气坐谈几个钟头。这个建筑物便是他的司令部参谋人员开会的地方。我们一面谈，一面看地图、报告和军事方面的统计。

朱德穿着普通士兵的蓝棉军装，没有臂章符号，他在社交场所中也是如此。然而这个人似乎跟从前不同了。他的宽阔的农民的脸上不是著名的那种显明的笑纹，却是坚定和专注的神情。这个愉快的慈祥如父的极有人缘儿的人的风姿变成了冷静而有力的军队司令的风姿。我已经知道他在集会和宴会中从不絮絮叨叨地讲话，他也完全不注重无味的习俗。但是他显示了令我惊讶的军事思考的精确。现在我第一次明白了，为什么国民党军队在内战时期和日本军队在目前的战争中，把这个善祥的随随便便的朱德，看作一个危险的对手和极有能力的战略家了。

他跟我具体地谈军事问题，他俨然把我当作一个军人似的。他叫我在发表这些谈话时候把敌人可以利用的东西斟酌删除。他告诉了我许多有趣的事物，可惜删除的正是这许多有趣事物的大部分。

他会见我是他第一次得到机会让盟国人士知道，中共军队倘若不单独对日作战而跟盟军配合作战能够做出更多的成绩。当然我没法核对朱德将军告诉我的资料；然而他的一切建议和主张，都使我深深记住那是诚恳而且合乎实际的。他的一切建议和主张使我甚至比从前更明了，因为未跟中共军队适

<sup>①</sup> 见斯坦因著《红色中国的挑战》，李凤鸣译，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

时合作，已经遭受的损失如何之大，而在抗日战争的最后阶段中若跟中共军队合作仍能得到的收获如何之多。

朱德说：“在敌后的我们军队和抗战根据地只要能够对盟军有所助益，盟军可以随便利用。我们欢迎任何盟国代表到那些地方搜集他们所想要的关于我们兵力、根据地和我们能给盟军比我们7年来对日斗争期间中更多的援助的证明。”

“只要给我们一个机会，我们有许多方法可以立刻使我们对于盟国的目的发挥更大的作用。”

朱德首先谈到跟盟国空军实行地面合作的可能性。他说：“我们对于盟军轰炸任务的成功能贡献重要的协助。因为在敌后我们的抗战根据地差不多包围了华北、华中每个可以想象的目标，日寇盘踞的大城市、工业工厂和交通线。而且在一切日寇的占领中心都有我们的地下工作者。”

“盟国飞机从中国根据地起飞到满洲、朝鲜和日本，所经之地有许多是我们的地区。有些你们的被迫降落的机员已经由我们军队送到安全地方。这样他们也许能够把他们所亲眼见到的我们的作战根据地和帮助他们越过敌人封锁线的我们部队的情形报告给美国陆军部。倘有密切的合作，援救工作就能系统化而且改善起来。”

中共还有一件可以给予盟国的轻而易举的协助——就是供给关于敌人的情报。朱德足可以说，关于敌人的动态，他有最好的情报。因为中共必须凭借这种情报；情报迅速是7年来中共军队深入敌后且能对于装备与交通都占很大优势的敌人制胜的主要原因之一。

许多前线上的军官说，朱德也肯定中共因为预先知道日寇及其军队的布置和移动，所以在攻守方面总是占很大的便宜。朱德说：“因为到处的中国人民都跟我们站在一起。我们也教会了他们实际合作的技术。”

从我在各种不同的场合听到的，我发现延安的司令部关于日寇形势是特别消息灵通的。我在延安最初2个月里，朱德和他的军官们无意中说出的一些具体的情报，倘若延安与盟国之间有如延安取得这些情报的那样迅速的传递情报的联系，我相信这些具体的情报对于盟国是有相当大的实用价值的。我不怀疑，中共只供给情报就能给盟国以伟大的协助。朱德向我保证说他情愿把八路军和新四军得到的一切情报供给英美军队，他并且愿意和英美军队充分合作去获取对于英美军队特别重要、对于延安没有什么兴趣的情报。

中国共产党人相信不论盟国海军和空军向日本本土推进得如何越来越

近，中国在盟国对日之战中一定占着重要的地位。因为盟国在太平洋胜利之后，在中国本部和“满洲”的日本陆军的主力还要挣扎下去，为了保证完整而坚固的胜利，日本这个陆军的主力必须予以摧毁。

中国共产党人力言中国国民政府抵抗日本新攻势的削弱不能认为是盟国放弃以中国为重要战场的希望的理由。相反地，这种削弱甚至使盟国在中国攻击日寇更加重要。

朱德说：“我们有正规军 47.5 万人，民兵 213 万人，还有敌后到处散布的坚固的作战根据地。我们能够利用这些武力和根据地大大帮助盟军在中国的进攻。我们在敌后的根据地的战略价值是不可忽视的。

“我们还能在中国各地使盟军登陆易于进行。我们控制着相当长的海岸线，特别是在河北、山东、江苏和浙江。日寇在这 4 省沿海占领的区域大部分至少跟我们已经巩固的一个内陆根据地毗邻，而且已经成了我们游击队的活动地方。

“我们甚而在沿海水上和盟军进行一些合作。因为前几年我们的军队到了海上许多地方，他们征服了海盗，用政治教育把他们变成了优秀的抗日战士。这些在沿海滋扰数百年的、人所不齿的分子负起了海上游击队的新的任务，而且知道怎样和我们陆上游击队与正规军配合来实践他们这项任务。已经有些盟国友人是他们救下的。

“还有更重要的是我们能够随地帮助盟国远征军在全国领土上推进。我们能够有效地保护盟军的两翼。对于这个任务，我们有特别好的准备。我们的士兵对于内战时期被国民党夺去、后来陷于日寇的华中战略地带的从前苏维埃区域的地形了如指掌。我们所以没有进入从前苏维埃区域就是因为重庆军队介于我们与敌人之间。日寇宁肯让重庆军队在那些区域扩大活动，而反对我们扩大活动。

“在最有效地困扰敌人和阻止敌人迅速集中援军方面，我们的士兵是专家。他有很多的经验把民众组织起来跟一切解放势力从事巨大的协同的努力，这个特点的重要性是出乎你的想象的。因为盟军必须经过公路又少又坏的地方，那儿他们不能倚赖摩托化的运输，那儿的当地人民不但对于盟军要热烈，而且要好好的组织起来，学习得到良好的经验，这样才能使当地人民为盟军搬武器，运供应品，送给养，帮助搜集关于敌人的情报。

“新近国民政府的军队在河南、湖南、江西各省的失败，大部分由他们和民众之间没有一点儿合作；同时这几年里我们能够在敌后创造并且扩大我

们的作战根据地主要的原因是我们唤醒和动员人民的民主方式确实使人民和我们的作战部队合为一体。你也许觉得这只在理论上是健全的，然而任何见过国民党军队防线的盟国军官来到我们区域时候，他们会很快地看到跟人民密切合作给了我们何等力量，而对于盟军意味着多么大的帮助。”

但是，对于盟军这种帮助不如直接利用中共伟大的抗日军事力量。延安的将领们确信或者像他们战了7年似的用他们自己的兵力单独作战，或者把他们的正规军直接配属到盟军里，都能对打击敌人的任务给予很多的贡献。

朱德说：“我们有经验的正规军和民兵，我们巩固起来的抗战根据地及其周围的游击区，和游击区里组织良好的居民的抗日斗争在我们与外界隔绝的那些年里对盟军已经帮助了很多。虽然重庆政府想掩盖并否认这个确凿的事实，这个事实被人认识的一天仍然要来的。”

“我们还能做更多的事情，倘若我们自己的作战努力最后和你们的作战努力配合起来的时候，我们能够用一种新的姿态战斗。”

“为了使你看出来我们能在什么地方帮助和不能在什么地方帮助起见，我要说清楚在中国的最后战役中，盟国的战略需要三种武力：第一种是专门化机械化的武力如重炮、坦克、飞机等；第二种是陆上正规军如主要战线上所用的步兵、骑兵等；第三种是数目众多的组织良好富有经验的游击队，在中国目前情况之下，游击队必须担任一个重要的战略任务。”

“在游击方面，我们一定能够做得很好。但是比目前我们所有的更好的轻装备和更大量的弹药及现代爆炸物的供应对于增强我们的攻击力是有很大的用处的。再者，盟国若把步枪和巴组卡平射炮这类特别的武器给我们，对于盟国是有好处的。巴组卡这类武器重量轻，便于携带，同时它的力量足可对付保护日本一切重要交通线的砖房和堡垒及敌人占领的大城市周围的内线防御。”

“倘若把这种简单的供应品给我们一些，同时在特殊的任务上给我们一些偶然的空中支援，我们的游击队和正规军就能给敌人更多的损害。倘有这种空中支援，我们就能收复某些重要的城市，我们能使整个华北的和华中一部分的日军重要交通线陷于麻痹；因为我们已经包围着敌人的交通，而且当我们的战略要求切断他们的交通线时候，我们就切断它。我们能够完全剥夺敌人在所谓‘占领区’里所有的经济基地，我们还能彻底地消耗他，至少在整个华北是如此。那么这些行动的最后的对于盟国的整个战斗将有很重要的影响。”

“所以从战略上说，我们在反攻中的作用将是用我们自己的方式在敌人广大的后方打击敌人。但是从战术上说，我们绝对能够在主要的攻击战场上帮助盟军地面部队。我们的军队有一大部分能够跟盟军大部分在正面攻击上协同作战，最低限度能和盟军专门化及机械化的部分协同作战。因为我们的军队除去具有必要的体格之外，而且已经有了充分的经验和军事教育，他们已经成了优秀的正规军，他们能够用我们通常利用的更大的单位来作战。为了这种作战，他们所需要的只是用英美步兵师所使用的武器重新装备我们若干师，给它们比较短时的使用新武器的训练。

“纵然如此，他们所需求的仍不过是步枪轻自动武器和步兵用的炮而已，并不要更精细和巨大的武器。这些武器就能给盟军以一支强大的跟盟军自己的重装备部队合作的第一线武力。

“这并不能减小我们在敌后游击战的规模。因为我们不缺少有训练的人。我们为数已经 200 多万而正在扩大的民兵就是精神充沛的有经验的战士的伟大蓄水池。他们能够立刻补充我们用来在正规战场和盟军协同作战的正规军。除此而外，民兵还能更加增强他们自己的活动，以致他们的游击战更易于得到弹药。

“在这种条件之下，我们的正规军——八路军在它的广泛的游击战支援之下，不久就能成为华北盟军一个完全的侧翼，那时它就能收复某些大城市。

“华中新四军的战斗力和华北八路军是一样的。新四军及其民兵只要能够得到盟国同样的供应——起初由于更大的运输困难，也许供应比较困难——它在中国那个地区里帮助专门化的盟军的战略重要性也跟八路军是一样的。”

我问朱德，中共是否想向盟国要求坦克和重装备给自己的军队使用，他微笑了：“当然不，我们知道我们的限度，而且还有两种武器我们不要。因为这两种武器差不多在敌后到处我们都能自己做：就是手榴弹和地雷——我们的主要武器。这两种武器是最成功的。”不过他自己改正说：“事实上我们将向盟国要求更猛烈的炸药用来制造我们的手榴弹和地雷。这种炸药可以使我们的手榴弹和地雷大为改观。这一个例证可以使你看出我们用比较少量的供应品能够做何等多的事情。”

最后朱德谈到指挥权这个重要的问题。他着重地说：“指挥中国一切部队的一个盟国最高统帅是必要的。只有一个盟军总司令能够保证中国一切部

队的平等待遇——国民政府的部队；重庆政府不信任和看不起的地方部队；重庆政府想给饿死和尽力妨害的我们的正规军与民兵。惟有一个盟军总司令能够保证充分利用抗敌的一切武力和克服统一指挥的一切妨害，这一切妨害在过去曾大大阻碍了我们的抗敌方式。除此而外，中国军队和盟军没有别的配合的方法。”

“这样，你不觉得是‘丢脸’么？”

“不，一个美国的总司令指挥中国的一切部队，在中国人民和我们自己的官长与士兵心里，不会引起‘丢脸’的问题。老百姓跟我们一样很欢迎有个盟国最高统帅。因为他们已经知道蒋介石的指挥在军事和政治上都破产了。再说，英国军队和人民不是曾甘心服从一个美国统帅的指挥进攻德国么？”

“中共领导的一切军队愿意忠恳地服从盟国统帅，因为他们所关心的惟一的事情就是尽速得到完全的胜利。胜利最好的保证是由一个盟军统帅指挥中国一切军队。”

“除此而外，有个盟军统帅团结中国一切军队从事可能的最大的作战努力，同时间接可以奠定战后中国真正团结的基础。而且以民主为基础的举国团结对于胜利的中国是最主要的。”

他总结他协助盟国的建议：“我能向你确切地说，那种合作能够顺利发展起来，因为我们的战士都沾染了盟国间无限的团结情绪，而且我们惟一目的是打败日本军阀。”

我见到许多别的中共军政领袖，各级军官和八路军许多单纯的兵士所表现的跟盟军充分合作的热情。他们为了早日获得战争胜利和帮助盟军减少生命损失，需要他们什么样的牺牲，他们都甘心拿出来，他们这种甘心使我感动，他们的甘心是纯真而可靠的。因为我觉得在战时和战后跟盟国合作就是中共拟议的对中国的现实计划的基础。

中共和跟中共合作的无党派者并不希望最后决定性的那场对日之战单由盟国为中国取得胜利。他们觉得他们自己的力量之大足够对于胜利从事重要贡献的。他们还确信甚至国民政府控制下的地区，倘若早该实行的必要的政治与军事的改革能够实行，伟大的作战努力的再生依然能够做到。

他们相信：只有在战争的最后阶段充分利用中国全部的剩余力量，击败日本之后的中国真正的团结与进步才能实现。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担负起在中国一切政治阵营中的爱国志士渴望多年的国际角色。



延安人士不像重庆许多人士关于盟国战后的对华态度怀着幻想。延安人士希望盟国在战争结束之后用两种标准来判断中国：一是看中国对胜利真正的贡献；一是中国在战时表现的参加新的民主进步的世界秩序的政治准备如何。

中共预料，到那时候，最动人哀怜的关于中国八年或九年战争中的困难的描述和最雄辩的关于中国的最后阶段中的失败的解释——纵然中国抗辩着说盟国无权批评中国内政——在清醒的世界的判断面前是没有什么用处的。我觉得这就是延安提议在各方面尽力协助盟国的基本动机，这不是虚伪的利他主义。

但是倘若盟国和中共合作对日时候，中共要希望盟国给予什么帮助呢？中共能不希望加强他们的战后兵力来对付国民党么？美国刚一提议中共应该放在盟国集团里的时候，重庆政府就用这个论据反对起来。

我问朱德，朱德笑了，他引用中国的一句谚语：“住在玻璃房子里的人不可抛石头”。他还说：“国民党在什么条件之下取得美国的武器和物资，我们当然也肯在同样条件之下取得美国的武器和物资。”

盟国没有得到朱德将军给我的情报。重庆的新闻检查官把我会见朱德的谈话的精华却扣掉了。

但是史迪威将军很知道中共军队和延安在盟国对日战争中能够担负的角色的重要。他早就努力要求蒋委员长许可美国陆军军官访问中共军队总司令部。我知道他还在努力。

现在我们新闻记者总算打开了到延安的门户，那么还能继续不让美国陆军的代表进来么？

### 三、叶剑英与中外记者参观团的谈话<sup>①</sup>

(1944年6月22日)

中外记者参观团各位先生：

为应各位要求，并使各位便于研究目前中国共产党抗战的具体情形起

---

<sup>①</sup> 见《解放日报》1944年8月10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

见，我向各位做一个关于敌后战场军事情况的一般介绍。

中国抗战，一开始就分为正面和敌后两大战场；而自1938年10月武汉失守以后，敌后战场就在实际上成了中国的主要战场。这种情况，因为中国政府采取压制言论的政策，不但外国人不明白，就连中国人也有很多不明白。我今天要说的，就是关于敌后战场的情形。

我们八路军、新四军在这个敌后战场上，坚持了7年之久，7年抗战的过程，是极其残酷、紧张，并且极其复杂、曲折的。假使某些先生们要求更深入的来了解敌后抗战的实际，我可以在另外的机会再和各位作一个共同研究，现在只做一个极其简单的介绍。我的介绍的范围是：多说现状，少说历史；多说军情，少涉及其他方面。

我的介绍分为4项，即：

- (一) 敌后战场的敌情；
- (二) 敌后战场的伪情；
- (三) 敌后战场的友情；
- (四) 敌后战场的我情。

现在来说敌后战场的敌情。

我们关于敌情的知识，还不很令人满意；一则敌军变动频繁，二则我们的侦察工作还不是很强的，对于敌军的番号、编制、装备、移动的时日和方向等，不免有某些地方不能做肯定的说法，要先向各位声明一下。

我想把今年3月份的敌情材料，即敌人以一部军队进攻豫湘以前的敌情材料，把那个时候的敌军态势，作为基本态势，加以说明，然后说到尔后的敌情变化。

敌后战场有3个，即华北、华中、华南三大敌后战场。在华北敌后战场抗战者为八路军，在华中敌后战场抗战者为新四军，在华南敌后战场抗战者为中共领导的游击部队。每一个战场，又分为几个抗日根据地。这三大敌后战场的敌情是和友军担任的正面战场的敌情互相联系的，故须从整个敌情中分析我军与友军分担抗击的情形。

根据我们今年3月份的材料，日寇在华兵力共有34.5个师团，约56万人。

华北敌后战场的敌军，计有9个师团，8个独立旅团，2个独立骑兵旅团，合计为14个师团，约22万人。八路军抗击了11.75个师团，占华北敌军兵力84%强；友军仅抗击了2.25个师团，占16%弱。其分布区如下：计

第二十六师团（师团长柴山），分布于大同、归绥、灵邱、朔县地区；第五十五师团（师团长待查），河北徐水、定县段平汉沿线及冀中地区；第五十九师团（师团长柳川悌），山东济南、新泰、泰安、寿张、邱县、平原、德州、惠民地区；第六十二师团（师团长石井，又讯清水天），山西榆次、孟县、阳泉、沁县、长治、晋城地区；第六十三师团（师团长野付昌德），北平、天津、古北口、定兴、易县地区；第一百一十师团（师团长林方太郎），河北新乐、邢台段平汉沿线及德石路西段；独立第一旅团（旅团长小松淇志雄），河北河南交界之沙河、淇县、大名地区；独立第二旅团（旅团长松甫丰一），察哈尔万全、阳泉、赤城、怀来及河北涿源地区；独立第三旅团（旅团长小垣），山西忻县、五台、繁峙、宁武地区；独立第七旅团（旅团长吉川），胶济路西段两侧及清河地区；独立第八旅团（旅团长吉本峰太郎），冀东地区；独立第九旅团（旅团长池上贤吉），天津、德州段津浦沿线；官上旅团（番号待查），山东济宁、滕县、临沂、莒县地区。

以上共6个师团，7个独立旅团，全部为八路军所抗击。

此外，第三十五师团（师团长坂西利八郎），开封、滑县、新乡、博爱地区，八路军与友军各抗击50%；第三十七师团（师团长长野义雄），晋南三角地带，八路军抗击30%，友军抗击70%；第六十九师团（师团长三蒲），山西临汾、沁源、离石、岚县地区，八路军抗击70%，友军抗击30%。独立第五旅团（旅团长吉田银），胶东半岛，八路军抗击90%，友军抗击10%；独立骑兵第一旅团（旅团长洼田武二郎），绥远包头、固阳地区，八路军抗击20%，友军抗击80%；独立骑兵第四旅团（旅团长小原一郎），河南山东交界永城、太康、民权、城武地区，八路军抗击40%，友军抗击60%。

如果要问：你们抗击的百分数怎样得出来的呢？这是根据敌军联队分布态势及其活动范围来计算的。例如第三十七师团共有7个联队（3个步兵联队，4个特种联队），其中有70%兵力，在风陵渡、运城、垣曲一带与友军隔河对峙；有30%的兵力在浮山、翼城地区，对付我八路军。但是当着敌人对我太岳区进行季候“扫荡”的时候，那敌人（第三十七师团）所使用的兵力就比30%的数目还要大。

以上是华北敌寇在今年3月以前的基本态势。

在华中敌军。计16个师团约26万人，新四军抗击59.5%（9.5个师团），友军抗击40.5%（6.5个师团）。计第六师团（师团长神田正中），在

武汉地区；第六十师团（师团长小林述七），上海、武进间京沪路沿线，及浙江嘉兴、长兴地区；第六十四师团（师团长船引正三），江苏溧水、溧阳、如皋、阜宁、宝应地区。以上3个师团，全部为新四军所抗击。

第三十四师团（师团长大贺茂），南昌、九江、瑞昌、安义地区，全部为友军所抗击。

以下12个师团为新四军及友军所共同抗击，计：第三师团（师团长山本三男），豫南信阳，湖北孝感、随县、礼山地区，新四军及友军各抗击50%；第十三师团（师团长内山英太郎），鄂西沙市、沙洋地区，新四军抗击30%，友军抗击70%；第二十一师团（师团长田中之一），南京及安徽合肥、蚌埠地区，新四军抗击80%，友军抗击20%；第二十二师团（师团长太田），浙江金华、蓝溪、东阳地区，新四军抗击10%，友军抗击90%；第三十九师团（师团长澄田沫四郎），宜昌、当阳、江陵地区，新四军抗击30%，友军抗击70%；第四十师团（师团长未详），鄂南咸宁、通山进区，新四军抗击60%，友军抗击40%；第五十八师团（师团长下野一霍），鄂中钟祥、云梦、沔阳、潜江地区，新四军抗击90%，友军抗击10%；第六十一师团（师团长不详），皖南芜湖、宣城、广德线及芜湖至湖口沿江，新四军抗击60%，友军抗击40%；第六十五师团（师团长川岛），徐州、东海、淮安、砀山地区，新四军抗击80%，友军抗击20%；第六十八师团（师团长中山崑），湘北岳阳、鄂南蒲圻及沿江地区，新四军抗击30%，友军抗击70%；第七十师团（师团长西胁充吉），杭甬铁路沿线，新四军抗击40%，友军抗击60%；第一百一十六师团（师团长和尔吉隆），武昌鄂城间沿江两岸，新四军抗击90%，友军抗击10%。

华南敌军约有3.5个师团，两个独立旅团，合计4.5个师团（8万人）。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约抗击了一个师团，占22%；友军抗击3.5个师团，占78%。计第十八师团（师团长牟田口廉地）之一个旅团及第五十六师团（师团长渡边正夫），在滇西腾冲地区；独立第十九旅团（旅团长松井贯一），在奥东潮汕地区；独立第二十二旅团（旅团长宋山），在雷州半岛；以上2.5个师团，全部为友军抗击。以下两个师团，为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与友军共同抗击，计：五十七师团（师团长中野莫光），广九沿线，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抗击70%，友军抗击30%。第一百〇四师团（师团长菰田彦一），广州、从化、三水地区，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抗击30%，友军抗击70%。此外尚有海南岛的全部敌人，均为共产党所抗击，未计算在内，因为电讯中

断，目前敌军数目不明，估计有一个旅团。

以上是1944年3月以前国共两党军队抗敌的具体情形。我们抗击了敌人64.5%，友军抗击了敌人35.5%。

可是在1944年4月以来，敌人增加了一部分兵力，向中国正面战场进攻。依现有材料来看，敌寇新增侵华兵力，已知番号者有10个师团，或者尚有一部分今天还不知番号的，总之至多不过十几个师团。同时，原来在华作战总兵力34.5个师团中，3月后调往南洋一个师团（三十五师团）。因之，目前在华总兵力为43.5个师团（滇西1.5个师团在内），或者略多一些。

实际情况是：此次在中国新增加的已知番号的10个师团中，有4.5个师团参加正面作战，即是：第二师团，第十四师团，第十九师团，坦克师团，坦克旅团；有五个半师团在敌后填防，即是：第四师团，第十三旅团，第十五旅团，新编第十师团，特务旅团（旅团长福冰），申板旅团，在石家庄的某师团，铃木旅团，山本源旅团。

在这一期间，华北敌后战场敌军，同时有调动：如第一一〇师团，第三十七师团，独立第七旅团，骑兵第四旅团共抽3个师团，移到正面战场。

但是，敌寇在华北所抽出的3个师团的兵力中，其第一一〇师团原在石家庄地区，现在已为新编师团所接替；独立第七旅团原在胶济路西端，现为中板旅团所接替；第三十七旅团原在晋南三角地区，现为第六十九师团由晋中南移接替；其原第六十九师团临汾、汾阳等地防区，现由第十三旅团及特务旅团所接替；此外，第三十五师团他调后（似已调南洋），新乡、开封及道清西段地区防务已由铃木旅团及第四旅团所接替。这一地带的机动兵力并未减少，而仍保有一个机动旅团（第十五旅团——驻阳泉地区）。骑兵第四旅团原在陇海线开封、碭山地区，现为伪军张岚峰所接替。

由此可见，敌寇在华北敌后战场，虽然抽走了一批兵力，但其防务同时又为新的兵团所接替。这决不是如外间某些人士所揣测的说是华北敌军抽调以后，已成一空地似的。那里担负在共产党八路军背上的兵力，仍和原来的情况相同。

应该指出：1938年10月武汉失守以前，日寇的主力是向着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但在武汉失守以后，日寇改变了政策，对国民党以政治诱降为主，以军事进攻为辅，而移其主力于敌后战场，残酷的进攻共产党。1938年10月至1944年3月，整整5年半时间，日寇对国民党只有几次战役性的进攻，并无战略性的进攻，大体都是早出晚归。在此时间内，国民党的政策则是招

架与观战的政策，敌人来了，招架一下，敌人走了，袖手旁观。这个政策，就是今天河南湖南战局所以失败的原因。此种情况，我们希望今后能有所改变，使正面战场能够配合敌后战场的作战。而结束过去的那种完全不相配合的局面。

关于敌情的介绍，大致就是如此。

现在说一说敌后战场的伪情。

这里，我先要感到惭愧，因为中国7年抗战，一面是全国绝大多数军民在庄严神圣的抗战与牺牲，一面又有一部分人，而且是不小的一部分人，卑鄙无耻的投降与作伪，这是我们民族的极大耻辱，必须予以洗雪。可是今天的伪军在敌后战场已有78万之多（伪警察、伪民团还不在于内），成为中国抗战不可忽视的一个大敌。所以值得介绍一下。

中国伪军在1933年冬长城抗战的时候，就有所谓李守信、王英两部伪军（李守信是国民党骑兵第九旅的团长，王英是绥西地方武装），这是抗战以前的老伪军，现约2万人。

抗战初期，平津沦陷，齐燮元起来组织靖安自治军，当时仅4个连，到1938年发展到5个团，直到现在，有12个集团军，辖36个步兵团，共约6万余人。

自汪精卫投降以后，华中伪军开始大发展，如李长江、杨仲华两部4万国民党军队，改变旗帜，整个投降。但是伪军的猛烈发展是从1942年春开始，也可以说是从孙良诚投敌开始的。从那个时候起，在抗战营垒中投敌将领共有将级军官67人之多。

中国有这样多的伪军，各位也许会惊讶起来，可是这完全是事实。如果有人问为什么在1942年以后会有这样多的军队投降？原因当然是可以找到的。在找原因时，或者有人要说：1942年那时候的形势，有：

(1) 日本在南洋正在得势；

(2) 苏德战场的红军还未转入进攻；

(3) 日本对华采用所谓“新政策”，因为日本正有事于南洋，感觉兵力不足，乃强化汪政权代管敌后，又提倡南北合流及渝宁合流等口号。

是的，这些确是那时的情形，但是这些并不能作为大批中国军队投降的真正原因。究竟什么是真正的原因呢？

我们认为完全是因为中国国内政治不团结、不民主与赏罚颠倒，对全国军民投下一个巨大的暗影，动摇了颇大一部分军民的胜利信心。如果不指出

这一点，就不能解释为什么同在敌后，同样困难，共产党能够支持，绝无叛军，国民党则不能支持，产生了如此众多的叛军。

关于我们政府与我们统帅部赏罚颠倒一事，只要指出一件事就明白了：山西的决死队和华中的新四军。自始至终是英勇抗战的，但是这两部分军队，却曾被我们的统帅部在派遣大军袭击，并杀死与俘去成万的官兵，又下令通缉与审判其首长，以后便宣布他们为“叛军”；但是，国民党军队真正叛变了几十万，将级军官达 67 名之多，其中最著名者如庞炳勋、孙殿英、孙良诚、夏楚中、公秉藩、陈孝强、吴化文、李长江、王劲哉等是上将与中将级人物，我们的政府及统帅部却不审判，不讨伐，不宣布为叛军，反而和他们勾结，给予任务，要他们去进攻八路军、新四军与华南游击队。请你们看看，这是怎样一种颠倒过来的赏罚呵！抗日者有罪，叛国者无罚，请问怎能振奋士气，又怎能叫人心服呢？

1943 年，汪逆宣布南北伪军统一指挥。将全国伪军重新编制，并加以整练。经过此次编整以后，全国伪军有了比较完整的系统。

总的说来，全国伪军可分为伪正规军及伪地方军。伪正规军的数量约有 38 万多，伪地方军约有 40 万，共计全国伪军有 78 万人，其中有 62% 是由国民党军队投敌的，有 38% 是敌伪强拉壮丁，收编土匪、流氓编成的。此外尚有许多伪民团、警察，没有计算在内，如果一并计入，当达 90 万以上。

这许多伪军在敌后起了什么作用，换句话说，伪军为敌人负担了什么任务呢？大概说来是：

- (1) 配合“扫荡”；
- (2) 守备据点；
- (3) 进行清乡；
- (4) 补充缺额。

前 3 项是众所周知的。最后一项，例如敌第三十七师团自 1943 年春季以来，补充三批伪军：第一批 300 余人；第二批由石家庄补充来 1500 人；第三批由介休补充 3000 人。而所有这些任务，都是对付共产党的。

你们看，昔日的“友军”，现在倒转枪头打自己的同胞了。

根据我们对敌伪斗争的经验，证明由国民党投降的伪军反对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战是特别坚决的。例如孙良诚在冀鲁豫，庞炳勋在豫北，吴化文在山东，都是明证。伪军中有许多人是继续受了我们统帅部的命令，加紧进攻共产党的。例如庞炳勋、孙殿英就有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及军委会调查统计

局的人员经常联络，授与反共命令。而庞炳勋在投降敌人发表叛国宣言，并被日本同盟社公布于世以后，我们的参谋总长何应钦先生，还向中央社发表谈话，称赞庞为“谋国忠诚”的人物。因此敌后伪军的大量增加，对我们坚持敌后战场及准备反攻的事业，是一个严重的威胁，所以今天特别需要的把敌后伪军情形，作一个简单介绍，唤起大家注意。

国民党之所以让这些伪军投敌，投敌之后不加讨伐，并反而暗地和他们联络，其目的，不但为着在现时反对共产党，而且含有深远计划，而准备在日寇失败退出大城市与交通要道时，好让这些伪军藏起敌旗，打起国旗宣布“反正”，占领这些大城市与交通要道，配合正面国民党军队，进行全国的反共战争。几年来在伪军中流行的所谓“曲线救国论”就是为着这种叛变民族的目的，全体人民是应该现在就起来注意这种阴谋的。

所有伪军，几乎全部都压在共产党身上，国民党是不打伪军的，只有极少数伪军，因为那里没有共产党的军队，例如在南昌附近及杭州附近之伪军，不应算入中共抗击的范围之内，但是也不能算入国民党抗击的范围之内，因为国民党是不打伪军的。

如果把全部敌军及全部伪军合计起来，则在1944年3月以前，共产党担负抗击的，占敌伪军总数134万人中之110余万，即84%，或5/6以上，国民党担负抗击的仅占16%，即不足1/6。3月以后，敌人增加了一部分军队来华，向河南、湖南、广东的正面战场进攻，两党分担的比重起了一个变化。但增至这3省举行进攻的部队，最多不过十几个师团，这个变化，也不算很大。

至若敌后战场以及一部分正面战场的友军和我军的关系，抗战初期还能配合作战，但是在1939年以后即集中力量对中共磨擦。曾在1940年、1941年、1943年有过3次大规模的反共高潮：其中只有1943年7月间的一次（胡宗南将军调动河防大军，准备进攻边区），因为中外舆论干涉，未爆发战争；其余两次，均爆发了大规模的战争，使用的兵力均近10万。第一次是1939年12月至1940年4月，在山西进攻决死队（阎锡山长官所属的部队，亦称新军）与在太行山进攻八路军。第二次，是1941年，在安徽进攻新四军。此外，小的或中等规模的军事磨擦，则从未间断过。即如目前山西的中条山（阎锡山长官所部），湖北的鄂东、鄂西、鄂南，安徽的皖中、皖东、皖南，浙江的东面，广东的广九沿线（以上均国民党所部），我们的友军无日不在剿共战争中。这种抗日战争中的国内战争，在中国已经存在了4年半



(从1939年12月第一次反共高潮算起)。我们曾在自卫斗争中,获得了我们各级统帅部及国民党的成千件的反共或剿共的命令训令。我们之所以至今还没有把这些文件公布于世,是因为我们始终抱着期待我们的友党友军自动地改变态度,停止国内战争,改善国共关系的心理。尽人皆知,不停止一切国内战争(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中国要配合盟国反攻日寇,是异常困难的,或者是不可能的。

至于正面战场友军之所以大部分丧失战斗力与在敌人进攻面前表示束手无策,例如蒋鼎文将军、汤恩伯将军与胡宗南将军数10万军队,在河南不超过7万敌人的进攻面前,不战而溃,或一触即溃,其原因,完全在于政治上反对人民,反对民主,反对共产党,外交上依赖友邦作战与依赖友邦接济,而全不振奋精神,自己动手之故。我们的友党——国民党的方针,拿几句话来概括,就是厉行专制,压迫民主,抗日依赖别人(国际依赖英美,国内依赖共产党),自己保存实力,准备铲除异己。假如这种方针不变,中国不但不能反攻,就连保存现状也是不可能的。

总计开到华北、华中敌后战场的国民党军队,原来不下100万(1941年中条山战役时期的统计,华北约有80万,华中约有20万),由于政策错误和受不了艰苦磨炼,绝大部分被敌人消灭或投降了敌人,留在原地的及撤回后方的为数甚少。到今天还在敌后的,只有3部分地方性的军队,他们用各种方法,不择手段地求得自己的存在:这就是山东的赵保元、张里元及山西阎锡山长官在3个月前才由晋西南派到晋东南去进攻决死队与八路军的第六十一军,这3部分总共不过2万至3万人。

最后,要介绍八路军、新四军的情形。

八路军的前身,是中国红军。1935年至1936年在陕北会合时,计有官兵8万人。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红军乃奉统帅部命令,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但只承认4.5万人,发表了3个师的番号(一一五师、一二〇师、一二九师),即开赴华北参加抗战。

新四军的前身,也是国内战争时的红军游击队,于1937年12月10日奉统帅部命令,集中于皖南、江北两地,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辖4个支队,计有1.2万人,在华中参加抗战。

华南的中共部队,一部分是内战时期的红军改编的(海南岛),一部分是抗战以后共产党领导人民组成的(广州附近)。

中共领导的一切部队,都执行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执行孙中山

三民主义及中共 1937 年 9 月间宣布的共赴国难宣言，他们在华北、华中、华南三大敌后战场上团结各界人民，创立民主抗日根据地，每一由敌人手中解放出来的国土，都由人民选举抗日地方政府（在中国境内，只有这一种政府是真正合法的，因为它们是由人民选举不是由党派委任的）、执行三三制、减租减息、发展自卫军民兵游击队、发展生产、肃清汉奸等项政策，其特点就是密切的依靠人民，军队与人民痛痒相关，党政军民结合一体，向着敌伪展开进攻与防御的猛烈战斗。因为这个原故，所以他们能够战胜敌伪无数次的进攻，在毫无接济困难万分的条件下，能够克服困难，坚持敌后战场至 7 年之久。

大体说来，1937 年至 1938 年 10 月武汉失守期间，日本人重视国民党，轻视共产党，故以其主力向正面进攻，而以第二等力量在敌后打击共产党。但自从 1938 年 10 月武汉失守以后由于中共在敌后战场展开了猛烈的战斗，日本人就改变了他的战争政策，轻视国民党，重视共产党，对国民党改为以政治诱降为主，以军事打击为辅，而移其主力于敌后战场进攻共产党。

1941 年及 1942 两年，这种进攻达到非常残酷的程度，敌人的“扫荡”政策，“蚕食”政策，“三光”政策，“治安强化”政策都是这个期间达到最高峰。其结果，我们的军队缩小了，根据地缩小了，人口由 1 亿降到 5000 万。

1943 年以来，敌人进攻的残酷虽仍是有加无已，但是我党、我军及敌后人民，却从这种艰苦斗争中锻炼出来了；由于执行了中共中央的各项正确政策（三三制、土地政策、精兵简政、统一领导、整顿三风、拥政爱民、发展生产、肃清特务、发展民兵等），终于打退了敌人的一切进攻。

因此，1943 年到现在，情况又好转了，军队又有 47 万，民兵有了 200 余万，根据地又扩大了，人口又上升到 8600 万，并且经验丰富了，质量提高了。我们曾经担负抗击敌伪兵力 5/6 以上，经过了外间所不能想象的困苦艰难，然而什么敌人、什么困难也不曾压倒我们。

中共 7 年来的抗战史，几个钟头是说不完的。现在把 7 年来我军作战的几种重要统计分别的说一说。

以下是八路军各周年的战绩统计：

数 目 项 别	周 年	第一周年 1937.9 至 1938.5	第二周年 1938.6 至 1939.5	第三周年 1939.6 至 1940.5	第四周年 1940.6 至 1941.5	第五周年 1941.6 至 1942.5	第六周年 1942.6 至 1943.5	第七周年 1943.6 至 1944.5	总 计
	大小战斗(次)		638	2051	6936	6152	12221	22735	23327
毙 伤	毙伤敌军	34007	31083	64355	50257	50306	55673	65432	351113
	毙伤伪军	3704	15430	23475	21581	33526	62406	79831	239952
俘 敌	俘日军	124	385	689	326	284	296	303	2407
	俘伪军	2094	7521	15338	15355	17914	31161	59343	148726
伪 军	日军投诚			19	12	16	23	45	115
	伪军反正	1366	17935	9180	5178	4306	4728	6948	49641
缴 要	长短枪	6699	14569	37666	24017	16858	38542	50677	189028
获 武	轻重机枪	192	291	651	519	362	479	626	3120
主 器	各种炮	25	61	119	104	29	46	105	489
我 伤	负伤指战员	8107	31031	32175	38384	40813	18107	17976	186593
	阵亡指战员	4432	15048	17012	21348	23034	11378	10934	103186
敌伪与我伤亡比较		3:1	1:1	1.8:1	1.2:1	1.3:1	4:1	5:1	2:1

注：我阵亡指战员总数中，阵亡团以上干部 409 名。

从这一统计表看来，八路军在华北敌后的抗战，其战斗次数是一年比一年增加的，这是第一。

第二，是对敌军作战，毙伤数字较大，而俘虏数字较小；对伪军作战，则俘虏较多，毙伤较少。

第三，可以看出日军投诚的事，在抗战最初两年是没有的，第三周年以后，则逐渐增加，可见我们对敌军的政治工作是收到了效果的。

第四，就敌伪与我伤亡比较的变迁来看，中间虽有波动，但自 1942 年以后，我军经过精简整训，战斗力比战争初期是大大提高了，由 3:1 进至 5:1 了。

第五，从缴获敌军的武器数字来看，可以看到我军在第 5 周年度（即 1941 年下半年至 1942 年上半年），战斗是非常艰苦的，就是说，战斗次数很多，而缴获率则比第 4 周年减少了。

在华中方面的新四军，他们 7 年抗战的经过情形，大体上与八路军差不多。

下面就是新四军 7 年来各周年的战绩表：

数 目 项 别	周 年	第一周年至 第四周年 1938.5 至 1941.5	第五周年 1941.6 至 1942.5	第六周年 1942.6 至 1943.5	第七周年 1943.6 至 1944.5	总 计
	大小战斗		4967	2427	4822	5318
毙 伤 俘 敌 伪	毙伤敌伪	124252	24512	39879	53107	241750
	俘虏敌伪	5392	5458	9923	13642	34415
	敌伪投诚反正		4825	7921	11320	24066
缴 要 获 武 主 器	长短枪	48048	13870	28574	53967	124459
	轻重机枪	1644	301	330	376	2651
	各种炮	60	8	12	20	100
我 伤 军 亡	负伤指战员	36637	10856	8412	9015	64920
	阵亡指战员	22448	6745	7617	8058	44868
敌伪与我伤亡比较		2.1:1	1.4:1	2.5:1	3.1:1	2.2:1

注：我军阵亡指战员总数中，阵亡团以上干部 146 名。

在毙伤敌人的项下应当特别指出：中共抗战 7 年来击毙日军之将校，根据极不完全的统计材料，计有 55 名，其中有日军中将 1 名，少将 8 名，大佐 19 名，中佐 20 名，少佐 7 名。

关于缴获武器方面，也应当指出：若将八路军、新四军所缴获的长短枪总计起来，则我军 7 年抗战的结果，缴获了长短枪 32 万枝以上（其中一部分是日军的，大部分是伪军的）。若按照我军人与枪的比例为 5:3 计算起来，光是长短枪就可武装 54 万多人，缴获轻重机关枪及大小炮，还不算在内。但是这些武器有一部分是残破不全不能再用的。现在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游击队的武器来源有三：一是原有的；二是缴获敌伪的；三是民间武装，由人民自动组成游击队或参加八路军、新四军的。但是我军武器弹药依然非常不够，国民政府从抗战开始即不给以必需的接济，1941 年以后，更无只枪颗弹文钱粒米之接济，希望同盟国设法给以援助，以利配合作战。我们军队因缺乏优良武器，缺乏子弹，缺乏医药设备，而无辜死亡的人数是非常之多的。

敌后 7 年抗战的经验还证明，如果不组织民兵，武装民兵，训练民兵，以配合正规军作战，则敌后的长期坚持是不能设想的。

我军在华北、华中、华南三大敌后战场的各根据地上，对民兵的建设，曾用了很大的力量，到今天止，我们敌后的民兵，已有 200 多万。除华南尚无统计外，华北、华中的民兵分布如下表：

华 北		华 中	
晋察冀	630000	苏中	130000
晋冀豫	320000	淮南	55000
冀鲁豫	80000	苏北	85000
山 东	500000	淮北	70000
晋 绥	50000	鄂豫皖	150000
		苏南	25000
		皖中	25000
		浙东	10000
合 计	1580000	合 计	550000
总 计	2130000		

民兵以外，八路军新四军的正规部队及游击部队，是逐年增加的。广大敌后战场，受日寇压迫的人民，不得不武装起来进行残酷的战争，他们开始组成游击队，后来编入八路军及新四军，又复组成新的游击队。所以敌后战场的军制：是正规军、游击队与民兵三者的互相配合。有了这三者的互相配合，如何强大的敌人也无法摧毁我们。我们的友党，不愿发动民众组织民兵及游击队，单靠正规军作战，纪律又很坏，如鱼失水，如鸟失气，所以不能胜敌。兹将八路军新四军历史发展情形列表如下：

年代	八路军	新四军	合计
1937 年	80000	12000	92000
1938 年	156700	25000	181700
1939 年	270000	50000	320000
1940 年	400000	100000	500000
1941 年	305000	135000	440000
1942 年	340000	110960	450960
1943 年	339000	125892	464892
1944 年	320800	153676	474476

(正规军游击队均在內)

从这个表上可以看出，我军在 1940 年曾达到 50 万，但在 1941 年及 1942 年减少了，从 1942 年下半年起又向上涨，至今保持 47 万多，特别是战斗经验丰富了，质量提高了。要把民族敌人打出去，并配合同盟国反攻日寇，八路军新四军还应该壮大。一部分国民党朋友把我们这种壮大抗战军队，诬称为“破坏抗战，危害国家”，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他们讲这种话，实在是缺乏民族思想的表现。现在应该不是削弱八路军新四军，也不是设起种种方法去阻止它发展，而是极力扶植它，接济它，壮大它，使它更能担负配合盟军作战，驱逐日寇出中国的历史使命。尤其是当着正面战场发生严重危机的今天，每一个具有充分爱国心的中国人，都是应该有这种要求的。

我们的战绩表上，已指出 7 年抗战中俘虏日军与日军投诚的数目。八路军 2522 名（这中间包括 1939 年 4 月 26 日我冀东游击部队——包森支队在遵化地区所俘的敌寇天皇表弟赤本大佐及其随员 6 人），新四军 500 多名，关于这些俘虏的处置，我们的政策是：（一）送回日军去，起瓦解作用；（二）送交统帅部处置；（三）留在我军训练成为敌军工作的战士。

关于送回日军去的政策，有些人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其实这是有重大作用的。我们的政策是不杀害俘虏，给予他们以兄弟般的待遇，听其自愿的去留，同时，又对他们进行不疲倦的反法西斯的政治教育，大胆地放他们回去，愿留下的则留下，这对于削弱敌军的战斗意志，有极大作用。

在这个政策下，我军俘虏日军的数目，年有增加，日军投诚的数目，亦年有增加。日军中反战厌战运动的生长，决不是偶然的事。这一件工作，即所谓敌军工作，我们的日本战友，首先是日本人民领袖冈野进同志，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

日军俘虏除大部分送回日军者外，由延安送去西安的俘虏数目：

1939 年	14 人
1940 年	2 人
1941 年	3 人
1942 年	0
1943 年 第一次	13 人
第二次	10 人
合 计	42 人

又由太行送往大后方去的数目，自 1938 年至 1942 年共 28 人。此外，新四军在抗战头 3 年亦送往大后方若干人，尚未计算在内。

现在留在华北、华中我军内的俘虏数目（其中大部分现在是日人解放联盟盟员）如下表：

地 区	日人总数	其中盟员数	
延 安	76 人	75 人	
晋西北	7 人	7 人	
晋察冀	晋察冀	20 人	16 人
	冀 中	9 人	7 人
冀鲁豫	冀 南	17 人	15 人
	冀鲁豫	15 人	13 人
晋冀豫	太 行	36 人	29 人
	太 岳	14 人	11 人
山 东	滨 海	19 人	15 人
	鲁 中	11 人	9 人
	鲁 南	8 人	7 人
	清 河	8 人	6 人
	胶 东	16 人	13 人
以上华北合计：	256 人	223 人	
华中（新四军）			
四 处	66 人	66 人	
以上华北、华中总计：	322 人	289 人	

应当特别指出：在这些盟员中，有原在日军的军医中尉山田一郎，现在晋东南我军中做医务工作；原在日军的步兵少尉山光美，现在我军中任步兵炮教员；另有中岛透江荣甫，在我军中任技术教员。他们均积极负责，热心工作。

我们很惭愧，由于我军的装备低劣，接济毫无，未能更多的俘虏敌人。但是我们拥有 300 万大军，又得到盟邦大量金钱武器接济的友党，在整个抗战期间，他们俘虏敌人的数目，不管我们的统帅部如何夸大其词，实际上是我们比他们要少的，这可以将现存的俘虏一个一个去点验。他们没有敌军工作，更没有将俘虏送回去的事。他们缴获敌军枪炮的数目少于我们，俘虏敌军的数目也少于我们，教育俘虏变成反对敌人的斗士，则实际上完全没有。即如此次河南作战，以 40 万大军（蒋鼎文、汤恩伯、胡宗南三部分军队在河南

境内者，再加五战区派至豫南增援的一部军队）对付7万日军，作战2个月（自4月17日算起），据我们所知，不但一个俘虏兵、一枝枪、一门炮也没有缴获，反而丧地40余县，丧军近30万（其中大部分溃散，一部分被俘），大部分枪械被丢弃（据传仅是步枪就有15万枝以上，其中有许多是友邦援助的），全部第一战区的粮、弹、枪、炮存储丢光。但是有些国民党人却说共产党不打日本人，专作所谓“破坏抗战、危害国家”的事。请你们看看，究竟谁人不打日本人，谁人破坏了抗战，危害了国家呢？

抗战以来，我军死伤数目，八路军近29万，新四军近11万，两军合计，死和伤将近40万人。其中阵亡团级以上干部，据不完全的材料统计八路军409名，新四军146名。

我军在抗战中光荣牺牲的烈士，不仅有中国人，还有国际的朋友。下面就是八路军、新四军中的国际友人牺牲于战争中者：

职 别	姓 名	籍 贯
医生	诺尔曼·白求恩	加拿大
医生	柯棣华	印度
太平洋学会	希伯	德国
在华日人反战同盟盟员	寺泽吉藏	日本
在华日人反战同盟盟员	令野(名不详)	日本
在华日人反战同盟盟员	安藤清	日本秋蒲县
在华日人反战同盟盟员	浅野清	形山县
在华日人反战同盟盟员	黑田嗣	埼玉县
在华日人反战同盟盟员	铃木(名不详)	兵库县
在华日人反战同盟盟员	松野觉	广岛县
在华日人反战同盟盟员	大野静夫	长野县
朝鲜义勇军队员(独立盟员)	孙一峰	朝鲜平安道
朝鲜义勇军队员(独立盟员)	王贤淳	朝鲜平安道
朝鲜义勇军队员(独立盟员)	韩清道	忠清道
朝鲜义勇军队员(独立盟员)	朴吉东	京畿道
朝鲜义勇军队员(独立盟员)	石 正	广尚道
朝鲜义勇军队员(独立盟员)	陈光华	平安道
朝鲜义勇军队员(独立盟员)	胡维伯	广尚道
朝鲜义勇军队员(独立盟员)	金学武	咸镜道



朝鲜义勇军队员(独立盟员)	金巴伦	平安道
朝鲜义勇军队员(独立盟员)	文明哲	全罗道
朝鲜义勇军队员(独立盟员)	韩乐山	忠清道
朝鲜义勇军队员(独立盟员)	崔指南	平安道
朝鲜义勇军队员(独立盟员)	李镛寅	平安道
朝鲜义勇军队员(独立盟员)	金永信	平安道
朝鲜义勇军队员(独立盟员)	吴均	江原道
朝鲜义勇军队员(独立盟员)	林平	忠清道
朝鲜义勇军队员(独立盟员)	韩震	金畿道
朝鲜义勇军队员(独立盟员)	金明华	平安道

说到这里，我联想到历年来盟国朋友，对我国许多援助，我全体军民是感奋不尽的。

在武器方面：我盟国帮助我们国家的东西，我们并不清楚，只是在抗战初期，统帅部曾经发给过我们 120 挺轻机枪，6 门反坦克小炮，据说是苏联的军火，可是除此以外，我们未曾得到统帅部的任何武器接济，弹药接济也自 1940 年停止了。

在医药及器材方面：我们前后得到不少盟国团体及友人捐来的医药器材，可是还有 101 箱药品被国民党扣在三原，至今没有收到。这两年幸有中国保卫大同盟捐来一些药品器材（其数目分配另有清单），虽然距我们需要很远，但我们很感谢盟邦朋友的援助和孙夫人领导的“中保”的热心和关切。

在运输方面：八路军前后收到摩托卡车 1 辆，救护车 4 辆，载重车 4 辆。新四军因原来军部在皖南，于 1941 年 1 月被统帅部派兵围攻，军长叶挺被俘，文件被劫，该军所得国际援助数目，已不明白。

在人力方面：我军得到加拿大的白求恩大夫，印度医疗队的柯棣华大夫等 6 人，美国的马海德大夫，奥国的夫赖大夫、罗生特大夫，苏联的阿洛夫大夫，英国的林迈可教授、班威廉教授，德国的记者希伯及米勒大夫等人，他们对我军的帮助是很多的。至于日本友人冈野进同志及其统率下的大批日本干部，则对于我军进行瓦解敌军及号召日本侨民反对日本军阀的侵略战争，其成绩非常之大。华北朝鲜独立同盟自武亭同志以下的大批人员，在这方面，也做了艰苦勇敢的工作。

关于陕甘宁边区的部队情形，当抗战初期，为了保卫黄河北段数百里的河防，巩固西北后方，曾经统帅部批准留下一部分部队在边区，成立八路军后方留守处，指挥这些部队。到抗战中期，敌后根据地逐渐被分割，大兵团集中作战，已极困难，为适应战争形势与减轻人民负担，我军曾进行了一次精简简政。许多精简出来的人员，大部分在敌后转入生产，一部分调来边区学习，或参加部队，或参加生产。尔后国内政治情况一天一天更坏，边区被包围封锁更厉害，内战危机经过3次的大紧张，陕甘宁边区为八路军新四军的总后方，我们是必须保卫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调了一部分军队（如王震旅）来边区。陕甘宁边区留守部队的作用，就是保卫河防与保卫被胡宗南将军50万大军包围的八路军新四军的总后方。然至今天为止，边区军队的数目不超过5万人。拿胡宗南将军和我们比较，是10个与1个的比例。现在敌军进攻河南，迫近陕西，我们的这点留守部队，除河防守兵及治安保卫外，很愿意和胡宗南将军的部队一同开赴豫陕前线去打敌人。我们可以断言，只要我们的统帅部允许边区的几万军队，开上豫陕前线，并给我们以充分发动民众配合作战的权力，而无友军友党从旁牵制、反对、袭击或截断后路的事情发生，是有把握停止敌人进攻，并把失地收复回来的。

现在说一说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问题。这是敌后坚持抗战的基本问题。没有民主的抗日根据地的建立，这样残酷、严重与广大的敌后战场是不可能坚持的。

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一面和敌人作浴血的战斗，一面又和根据地的人民一道实行新民主主义的亦即孙中山革命三民主义的建设。

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设，包含着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艰苦工作。在这一方面，我不多说，我只说一说敌后各根据地的轮廓。

华北敌后战场，我们建立了几大块抗日民主根据地，东至青岛与胶东半岛、黄海与渤海沿岸、山海关和锦州，北至热河之宁城，察哈尔之多伦、商都，绥远之百灵庙，西至黄河，南至陇海线，包括华北7省（晋、冀、察、鲁、绥、热、辽），东西长2200华里，南北长1800华里。有政令所及的人民5000多万，占全华北1亿人口51%，其中有组织的群众1600多万，占我根据地人口30%以上；有不脱离生产的民兵150万，占我根据地人口3%。在这个区域内，共有5个大军区，即晋绥军区，晋察冀军区，晋冀豫军区，冀鲁豫军区，山东军区。每一个大军区内，又有几个至十几个小军区，我们名曰军分区。

华中敌后战场，我们的新四军建立了8个抗日民主根据地，包括江、浙、皖、鄂、豫、湘6省地区。包含政令所及的人口3000万，占华中沦陷区人口50%；有组织的民众900万，占我根据地人口30%；不脱离生产的民兵50多万，占我根据地人口1.7%。在这个区域内，共有8个军区，即苏中军区，苏北军区，淮北军区，淮南军区，皖中军区，鄂豫皖军区，苏南军区，浙东军区，每一个大军区又各有几个小军区，同华北一样的。

华南敌后战场有两处，一在海南岛，该处是内战时期的红军根据地，抗战后改为该地抗日军，领导者为冯白驹同志，国民党部队早已撤退，该岛完全是我军与敌军斗争着。近年因电讯中断，详情不明，然从敌军消息方面，得知该岛大部为我军收复，敌人无可奈何。一在广九路沿线及广州四周，领导者曾生同志。该部现已迫近九龙，并在香港进行秘密活动，敌人很感头痛。

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就在华北、华中、华南这3个敌后战场与15个以上抗日根据地上，进行异常残酷的非未曾目击者所能想象的抗日战争，至7年之久。赖有这些敌后战场，才挽救了中国免于被日寇灭亡。如果没有这些敌后战场的英勇斗争，中国的情形是不能设想的。日寇欲以华北为所谓大东亚战争的兵站基地，欲在华中、华南搜刮人力与资财，这一目的是被中共7年来坚决的、广泛的斗争基本上打塌了，在人力、棉花、煤铁与粮食的搜刮上，敌人受到我军的很大打击。这件工作，不但对于中国有利，对于我们共同作战的盟邦，也是有利的。但是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及其抗日根据地，却被国民党统治人士诬之为“奸党”、“奸军”、“奸区”，诬之为“破坏抗战，危害国家”，派遣军队进行攻击、包围与封锁，派遣成千的特务进行破坏工作，断绝一切接济，并遮断国际朋友对我们的援助，封锁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抗战与民主建设的消息，不使国内人民与国际友人明白真相。所有这一切，实在是不利于抗战与不利于团结的。我们希望尽可能迅速地结束这种状况，改善国共关系，而开辟一个真正团结抗战的新环境出来。

关于中共抗战情况的一般介绍，今天就很简略地说到这里为止。至于八路军新四军及敌后人民所以战胜日寇的政治方针，政治工作，战略战术，军队训练，经济工作，后方勤务工作，文化教育工作，内容丰富，有许多适合情况出奇制胜的创造，连日本人都说“达到神奇的境地”，但不是短时所能尽述，只好待之另外的机会。

#### 四、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战友们！

——1944年8月15日《解放日报》社论

美国驻中缅印军总司令部（即史迪威将军总部）所派遣的美军观察组，现在到达了延安。这是中国抗战以来最令人兴奋的一件大事。我们谨向远道来此的观察组全体人员，致热烈欢迎之忱！

我们欢迎美军观察组诸位战友，不能不想到美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光辉成绩，和美国人民见义勇为、不怕牺牲的伟大精神。不论在欧洲、非洲和亚洲，现在都有英勇的美军将士效命疆场，为解放法西斯铁蹄下的人民而流血战斗。在我们中国的抗日战场上，美国亦直接和我国人民并肩作战，成为最亲密的战友。在这个欢迎美军观察组朋友们的时候，我们向美国政府、人民、海陆空军将士及其英明领导者罗斯福总统，表示衷心的感谢。

美军观察组战友们的来到延安，对于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实有重大的意义。7年以来，近50万的八路军、新四军和8000余万被解放了的人民，在华北、华中、华南3大敌后战场奋勇作战。很久以来，事实上敌后战场成了中国抗战的最重要战场。在这里，抗击了在华敌伪全部兵力的5/6；在这里，几乎一切中国的大城市均被八路军、新四军所围困；在这里，大部分的敌占海岸线均被我们控制了。这种情形，一向为盟国朋友们所不明了。

在过去，在盟国政府与盟国人民方面，他们所了解的中国抗战情形，完全与上述相反。他们所得的印象是：中国抗战的主力军是国民党，国民党在抗战中所做的工作是最多的，大多数敌伪军由国民党所抗击，将来反攻日寇自然也是主要地依靠国民党。这些印象，直到现在还是统治着盟国朝野大多数人的思想的。

所以出现了这种完全违反事实的现象的原因，主要的在于国民党统治人士的欺骗政策与封锁政策。他们欺骗外国人，说国民党如何的努力在打日本人；实际则从1938年10月以后整整5年半时间，他们所取的政策，基本上不过是坐山观虎斗的政策；直至现在，除湖南与缅甸外，大多数战区依然还是如此。他们欺骗外国人，说共产党不但“不打日本人”，而且总是“破坏抗战、危害国家”的，实际则抗击敌伪军5/6的，正是这个所谓“不打日本人”而又“破坏抗战、危害国家”的共产党；至于那个天天高叫“民族至

上”的国民党，他总共不过抗击了 1/6 的敌人而已。共产党既然一“不打日本人”，二又“破坏抗战”，三又“危害国家”，那国民党早就应该号召外国人中国人大批的前往共产党区域去视察，好去证实一下国民党先生们所说的并非撒谎。但是决不，反而封锁得铁桶似的。5 年多的时间，一不许共产党发表战报，二不许边区报纸对外销行，三不许中外记者参观，四不许边区内外人民自由来往。总之，只许国民党的丑诋、恶骂、造谣、诬蔑，向世界横飞乱喷，决不许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的真相稍许透露于世。只要看此次记者团访问边区，是经过怎样的艰苦奋斗才达到成行目的，就知道国民党统治人士一面尽情丑诋，一面却不许人来看，是什么一种挖空心思而又自相矛盾的想法了。

但是事实胜于雄辩，真理高于一切，外国人中国人的眼睛，总有一天会亮起来的。现在，果然慢慢地亮起来了，中外记者团与美军观察组，均先后冲破国民党的封锁线，来到延安了。这是关系 4.5 亿中国人民反抗日寇解放中国的问题，这是关系中国两种主张两条路线谁是谁非的问题，这是关系同盟各国战胜共同敌人建立永久和平的问题。国民党人说：“国共争论问题是中国的私事”，这不过是国民党人在抗日战争中所犯罪过的一块遮羞布。这块脏布之应该扔到茅坑里去，现在已是中国人外国人的公论了。

关于国民党的抗战不力，腐败无能这一方面，大半年以来的外国舆论与中国舆论，已经成了定论了。关于共产党的真相究竟如何这一方面，大多数的外国人与大后方的中国人，还是不明白的，这是因为国民党的反动宣传与封锁政策为时太久的原故。但是情况已经有开始改变。大半年以来的外国舆论中，已经可以看见这种改变是在开始。这次记者团与观察组的来延，将为这种改变开一新阶段。

由于来延外籍记者的报导，中国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和各抗日根据地的真象及其对于协助盟国抗战事业的重要地位，将逐渐为外国人所明了。下面的例子可以证明这一点。

7 月 1 日的《纽约时报》，在其《中共领导下的军队是强大的》一文中说：“无疑地，5 年以来，对于外界大部分人是神秘的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在对日战争中，是我们有价值的盟友。正当地利用他们，一定会加速胜利。”这篇文章是根据外国记者的报导而写的。

早在 1 月 7 日《美亚杂志》，在其《作为反攻基地的中国游击区》一文中说：“许多军事当局的意见，认为如果边区的部队能得到充分的援助，这

些区域可以成为缩短对日战争的有力的反攻基地。”

6月10日的美国《星期六晚报》杂志，登载了美国名记者斯诺的一篇文章题为《六千万被忘掉的同盟者》的文章中，对于中国各个敌后抗日根据地和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略意义，有很精辟的见解。他说：“2月间，尼来兹上将宣布美海军拟在中国海岸上建立基地，以便从那里攻击台湾和日本。香港或广州或将首先为美军攻取。但是轰炸机由这些城市起飞到日本去，仍是遥远的距离。只是在更北面的地方，中国才是最接近日本。因此在那里的中国游击队，对我们有很大的潜在重要性。”

这些是从国民党遮天手掌的指缝中间透露出去的关于中共情况的反映。

现在不但外国记者团到了延安，而且美军观察组也到了延安。我们相信，该组的战友们一定会对此间情况，作周密的和深刻的观察，并对于双方如何亲密合作以战胜日寇，必能多所擘划。国民党想要永远一手遮天，已经困难了。

我们预祝美军观察组的工作的成功。我们希望这一成功，会使美军统帅部对于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团结抗战、实行民主的政策，和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抗战力量，获得真实的了解，并据以决定正确的政策。我们希望这一成功，会增进中美两大盟邦的团结，并加速最后战胜日寇的过程。

## 五、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 与谢伟思的六次谈话<sup>①</sup> ——谢伟思的报告

### 驻华使馆二等秘书（谢伟思）的报告

第2号

（延安）1944年7月28日

题目：中共中央主席希望不断有美国的外交性代表驻在延安。

呈送：中缅印战区美军将级指挥官，转指挥阶层，军邮879号。

1. 送上1944年7月26日晚与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的谈话备忘录一份。

<sup>①</sup> 原载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党史通讯》1983年第20、21期。

2. 毛主席表示希望，即使美国军事观察人员可能撤出，美国国务院代表也可以经常驻在延安。他说，之所以有这种愿望，是因为抗战一结束，国民党进攻共产党的最危险时刻就将来临。

3. 毛主席在表达这种愿望的时候，含蓄地表示，同意驻重庆的中共代表的声明，他们认为在中共地区内的美国观察员在防止国共两党公开冲突上，将被证明是一个重要因素。

4. 请将此报告的副本送交美国驻重庆大使，并送新德里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部，供戴维斯先生参考。

约翰·S·谢伟思

同意转送。

总参谋部戴维·D·包瑞德上校

(附件)

### 驻华使馆二等秘书（谢伟思）所作谈话备忘录

（延安）1944年7月27日

昨晚在欢迎我们观察组的宴会上，我坐在毛泽东主席的身边。饭前饭后都没有找到私下交谈的机会，只是在吃饭的时候毛主席亲自对我谈了许多。

他重复说了早先说过的欢迎我们到来的一般的话，然后非常友好地对我参加美军观察组表示高兴，说他已从周恩来将军和董必武先生那里得知我对中国政治的关心，并了解到我已成了共产党驻重庆代表团的一位朋友。

他说他知道我虽然已是史迪威将军参谋部里的一名顾问，但仍保持与大使馆的某些联系。我肯定了这一点并补充说，由于他可以理解的一些原因，虽然我所写的任何有关政治问题的报告都要经大使过目，但我在名义上，只是以军人的身份呆在这里。

他问我是否将在此久留。我答道，由于我所隶属的小组主要是为了在这里从事调查研究，所以我不能确切回答能呆多久，但我们希望我们司令部的代表驻在延安是值得的，这些代表中很可能包括一些文职顾问。

他问美国国务院是否有可能在延安建立一个领事馆。我认为有许多实际

困难——主要是这个地区的美国人少。他表示同意，但又说，他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抗日战争一结束，美军观察组将立即撤离延安，这正是国民党发动进攻和内战爆发的最危险时刻。

他说他知道华莱士副总统曾促使委员长批准派遣我们小组，他还问是否以前有过什么其他打算要得到这种批准。我说，有许多话题我愿在他闲暇时和他交谈，虽然其中没有一件可能谈得上是公事的。他很自然地笑了笑说，等我安顿完以后，我们会有机会“交换意见”的。

随后，我问起国民党与共产党在重庆谈判的进展情况。他说没有什么进展，国民党目前还不让林祖涵回来。

约翰·S·谢伟思

### 驻华使馆二等秘书（谢伟思）的报告

第 15 号

（延安）1944 年 8 月 27 日

题目：会见毛泽东。

呈送：中缅印战区美军将级指挥官，转指挥阶层，军邮 879 号

1. 送上 1944 年 8 月 23 日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的谈话备忘录一份。由于这次谈话长达 6 个小时，这个备忘录只能是一个摘要，但这是根据会见时的记录整理出来的。

2. 毛主席认为，美国如果现在对中国施加影响，那么这种影响是会起决定作用的，所以，美国的政策同中国人民关系极大。因此，他想知道美国的政策是什么，或大概是什么。关于美国的政策，他提出下列问题：美国对中国民主问题的政策，对共产党的政策，以及对中国内战的政策。在他看来，如果在这次战争期间不能实现民主，那么内战就是不可避免的。

3. 毛主席尤其希望得到美国对下述这一建议的支持，即召开一次中国所有主要政治集团的会议，来建立一个新的国民政府。

4. 这次会见是由毛主席提议的，谈话是由他主持的。他的态度友好，不拘礼节，我认为他的谈话是坦率的。的确，他的讲话直截了当而又开诚布公。我认为，这些讲话是迄今为止我们获得的关于共产党希望他们在不久的将来参与中国国家大事的想法和计划的最明确的表示。



5. 许多迹象表明，共产党认为不久的将来他们对未来的行动方针将作出重大决定。现在大多数重要领导人正聚集在延安，其中不仅有党中央和军队组织的领导人，而且有基层和野战部队的领导人。这些人包括：

管辖晋东南野战部队总部的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

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

新四军代理军长陈毅。

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长林彪。

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主席杨秀峰。

八路军野战部队总部政治部主任罗瑞卿。

共产党山东省委书记朱瑞。

这一名单并不完全，只包括比较知名的人士。当然，名单中没有包括大多数共产党高级领导人，像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王明、刘少奇、朱德和叶剑英，他们现在一般是在延安。

6. 这些人来这里显然不是为了与观察组取得联系，他们中的一些人是在1944年3月就启程了，当时还不知道我们会来延安。当问到有影响的领导人为什么这样空前集中时，共产党人只是说他们在这儿是为了召开准备反攻的会议。

7. 共产党人虽然不愿详细谈论这些会议的性质，但显然他们正在考虑下列有关问题：

(a) 国民党的日趋衰败和国民党统治区情况的恶化；

(b) 中国的战争可能向结束阶段发展；

(c) 在最后阶段及以后国民党对共产党人可能采取的策略。

8. 与这些问题有关的是现在打算与国民党举行和谈。共产党人对这些问题的圆满解决实际上不抱希望（如果有过希望的话），除非对国民党施加强大的外部压力。看来，日本的军事压力是不足以克服国民党的反共的。

9. 还有，与这些问题有关的是如果国民党走向崩溃，或在战争结束时处于积极反共的地位，那就要作好准备以增强中共的地位。这对于同共产党协力作战可能会发生效果。共产党是不会停止战斗的，但他们更感兴趣的是直接扩大其所控制的范围，而不太愿意为整个同盟国的战略牺牲自己的力量和利益。例如，现在可以看出，共产党打算把他们的活动扩大到已经摆脱了国民党直接控制的平汉路以东地区（见1944年8月4日我的第7号报告的第一段），还打算利用日本人沿粤汉路作战之机，重建中国东南部的老根据地

(这将在8月31日我的第19号急件中作出比较详尽的论述)。这两种发展都可能证明对于抗日有一定的帮助。但在目前情况下这两种发展都将意味着与国民党发生更多的磨擦，并日趋接近事实上的内战状态。因此，对于这个问题必须考虑到：这样做是否合乎需要，美国是否希望并将支持共产党这样猛烈的行动。

10. 共产党认为，美国的政策和行动是所有这些问题的基础。我们有能力支持国民党并维持其统治地位；我们将决定中国战场上战争的进展情况；如果我们愿意，我们能够制止内战，并迫使国民党走向民主。美国的这些政策将决定中共是必须单枪匹马、自顾自地干，还是能够得到保证，可以继续存在下去并参加建设民主的中国，以及在战争中进行真心诚意的合作。共产党需要得到我们的了解和支持；他们极为避免疏远我们或做有损于那种支持的事情。

11. 因此，对共产党来说，最重要的问题（又是目前最不清楚的问题）是美国的政策。这种针对美国的倾向性是好理解的。基于事实上的原因，共产党并不想要苏联在中国发挥很大作用。他们认为，为了在民主的基础上统一中国，苏联的参与比起美国来说应该是第二位的。

12. 请把这份报告的副本转送美国驻重庆大使，并送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部，供戴维斯先生参考。

约翰·S·谢伟思

同意转送。

总参谋部戴维·D·包瑞德上校

(附件)

## 驻华使馆二等秘书（谢伟思）与毛泽东会谈的备忘录

（延安）1944年8月23日

（在简短的一般性谈话之后，毛泽东说，他要谈谈关于国共关系问题。以下是他谈话的要点。）

国共两党的关系问题，是中国问题的关键所在。1922年至1927年为第

一阶段，双方是合作的。这使北伐的成功和国民党的当权成为可能。但是，一俟国民党获得政权，就进行垄断，转而反对我们，并试图消灭我们。其结果是进入1927年至1937年十年内战的第二个阶段。迫于日本侵略的燃眉之急，第三阶段又重新合作。但是这种合作是不稳定的，一直持续到了今天。

国民党并不是那么高高兴兴、心甘情愿地参加第三阶段的合作的，它从来没有诚心诚意地接受过合作。迫使国民党接受这种合作的有五个因素：

1. 日本的进攻。
2. 外国舆论的压力。
3. 共产党人在西安事变中表现的克制。
4. 中国人民抗日的意志。
5. 国民党内部的弱点，这使它无法打败我们。

战争结束时（甚至在战争临近结束时），这些力量将发生变化。

日本战败，上述那些因素中最强有力和最积极的因素也将随之消除。

共产党是比过去强大了，因此可以这么说，他们争取团结、反对内战的影响也更大了。但只要国民党的领导还是目前这个样子，共产党力量的强大，只会使国民党更加坚决地想要消灭共产党。不过，这种做法也只能达到一定限度，如果共产党很强大，国民党就不敢攻打他们了。可是，国民党的领袖们是如此地迷恋权力，他们总是要伺机以逞的。

中国人民一直不敢说话，政治上受压迫，这是国民党造成的。自由主义者、学生、知识分子、政治家、新闻界、少数党、地方集团和现代实业家（他们对国民党官僚主义的工业化感到幻灭，看不到自己的前途），这些人为数众多。然而他们没有组织，不统一，也没有权力。蒋介石使用武力和特务来对付他们。

国民党是一个没有明确特征或纲领的无定形团体。其中的自由主义集团缺乏有力的领袖，缺乏共同奋斗的目标，也缺乏积极的纲领。在目前的状况下，即使他们有了这些，他们也没有办法和人民接近。国民党中占据支配地位的领袖们，虽然分裂为互相猜忌的集团，但都是反共和反民主的。他们为自私自利的目的纠集在一起，以便永远保持自己的权力。

仅就这些因素而言，这个国家如果再徘徊于目前这种领导之下，由国民党挑起的内战看来是不可避免的。

我们共产党人从惨痛的经验中对内战深有感触。我们知道它将意味着中国长年累月的破坏和混乱。中国的统一，她在远东保持稳定的影响，她的经

济发展，都要被耽搁。不但中国人受影响，而且所有在远东拥有利益的国家都会蒙受影响。中国将成为一个主要的国际问题。这对美国来说也是关系重大的。

有件事非常明显，我们共产党人担心内战，我们厌恶它，我们是不会先动手的。在目前的情况下，即使我们懂得国民党如果没有外国的帮助，我们最终将赢得胜利，然而我们还是尽最大努力避免它。因为，共产党是属于人民的，人民的利益就是我们的利益。人民不甘长期忍受专横的法西斯主义，这种法西斯主义目前在重庆和西安是显而易见的，在蒋介石《中国之命运》一类书中，更进一步预示了这种法西斯主义的威胁性。如果人民要战斗，共产党人一定同他们一起战斗。

因此，中国防止内战的希望在很大程度上（比早先大得多）依靠外国的影响。其中，尤为重要的是美国。美国在中国和远东的力量日益增长，它是能够起决定作用的。国民党处在今天的地位，它必须重视美国。

所以美国在中国的政策，不单是美国人自己关心的事情，同样也是民主的中国人民所最关心的问题。中国人民一般关心三个问题。

第一，美国是否有可能回到孤立主义去，从而对中国缺乏兴趣？美国人对于外国的问题，真要闭眼不管，让中国“自作自受”吗？我们共产党人认为，如果罗斯福再度当选，恐怕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和关于美国的其他问题是直接向我谈的。因此我以最明确的措词声明，我没有公职上的权力，我的回答纯系出自私人 and 完全非正式的意见。

关于上述诸点，我提到美国在中国的长期和特殊的利益；事实上，我们并不存在由战争破坏所引起的国内重建问题；恰恰相反，我们巨大发展的经济和我们愈加广阔的国际视野，将迫使我们超越国界去寻求贸易和投资；所以，我们将不致于变成孤立主义者，或者不关心中国；无论共和党人或民主党人掌管国家，我不相信他们会从根本上影响我们的对华政策。）

第二，美国政府是否真正关心民主和世界上民主的前途？例如，它是否认为民主在占世界 1/4 人口的中国是重要的？它是否要使中国政府真正代表中国人民？它是否担心它所承认的、没有经过任何法律确认其合法地位的中国现政府并不能真正地代表中国人民？蒋介石是被单一的政党即国民党的仅仅 90 个人选为主席的，而且他们本身甚至还不能确有根据地宣称自己能代表这个党的有限成员！连希特勒也夸耀自己是民主政权，说他是被人民选举

的，他还有一个众议院！美国是否领会这个明摆着的事实，即国民党现在已经失去了中国民众的信任和支持。虽然，重要的问题还不在于美国政府是否领会这一事实，而在于它是否愿意设法帮助中国实现民主来改善这种局面。

（我提到了美国的许多官方声明，其中谈到中国的统一问题和我们对所有国家发展民主的总的愿望。我说至少有一部分重要的美国舆论，它的明显倾向已见之于近来美国报刊的评论。）

显而易见，国民党必须改造它自己和改组它的政府。在现有的基础上，不能指望它有效地进行战争。即使美国为它赢得了战争，随之而来的也必然是混乱。

政府必须扩大它的基础，吸收所有重要的人民团体。我们并不要求完全和直接的代议制民主，它是不切合实际的。并且，在国民党发起和控制之下，它将是一种无益的骗局。然而，马上就能够做的和应当做的，是召集一个临时性的（或过渡性的）全国代表大会，邀请所有团体派出代表。这些代表一定不要像过去那样由国民党选拔和指定，他们必须是真正的代表——最有资格的领袖。他们应当包括共产党、所有少数党、知识分子团体、新闻界、学生、职业团体、合作团体的中央机构、工人和其他群众组织。

分配代表名额切实可行的折衷方案是国民党占半数，其他的合在一起占半数。考虑到实际的政党关系，应在事先取得一致的情况下，认可委员长为临时主席。

这个临时代表大会，必须拥有充分权力改组政府和制订新的法律，新法律的有效实施保留到通过宪法为止。政府应当直接向代表大会负责，它的作用和权力类似英国的众议院。

临时代表大会应同时对完全民主政体和立宪制度的准备工作负有全责。它应监督选举和召开国民大会，然后转交它的权力并宣告结束。

美国政府愿意发挥它的影响以迫使国民党实行这种建议吗？美国政府愿意提出这种建议并加以积极支持吗？

（毛主席提议，这件事情既然如此重要，就值得我跑一趟重庆，把它提交大使。我说，我会全部报告大使的。我还提到，我早已从重庆的其他方面听到这个建议的要点。

后来，我在8月26日同周恩来的一次谈话中获悉，共产党政治局正在考虑把这一建议提交国民党。或许他们是根据最近谈判中国国民党拒绝讨论共产党关于民主的要求而提出的，国民党曾以“过于抽象”为理由拒绝讨论共

产党关于民主的要求。)

第三,美国政府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和政策是什么?它是否承认共产党是抗日的一种积极的战斗力量?它是否承认共产党对于中国的民主政治是一种有影响的力量?是否存在美国支持中国共产党的任何可能性?如果在中国发生内战,美国对国民党和共产党抱什么态度?美国为了保证国民党不使用它的新式美制武器来打内战,又在做些什么?

(这些问题,特别是第二和第三所提各点,确定了我们进一步交谈的范围,我对其中的若干要点作了回答,以便进一步详谈和讨论。

关于“支持”共产党的问题,我指出,因为共产党本身是公开支持中央政府和蒋介石的,所以这个问题使人费解,而且无论如何时机也未成熟。)

因为外来的日本侵略威胁着国家,我们共产党人在1936至1937年接受了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条件。首先由于我们都是中国人,为了对日本作战,为期10年毫无结果和互相毁灭的内战被制止了。虽然内战不是我们先动手的,然而我们带头制止了内战。还有,外国承认了国民党和蒋介石,他们却不支持我们。但是统一战线全然不是单方面的。国民党还答应过政治改革,却未实行。

我们支持蒋介石并不意味着支持专制制度,我们支持他打日本。

过去我们不可能提出这个承认问题,从合法的意义来看,它仍为时过早。现在我们只要求美国的政策说服国民党进行自我改造。这是第一阶段。这大概是不可缺少的一步,如果此事大功告成,就不存在内战的危险了。

但是,假定国民党不愿改革的话,美国的政策就应当有其第二阶段,那时美国对共产党的政策问题就应当提出来了。我们是不会冒同美国冲突的危险的。

我们现在可以先不过问美国武器的供应问题,这些美国供应的武器是可以被国民党用于未来的内战的。但难道我们还期望过去的历史重演吗?在民国初期,列强只承认北京。过了很长一段时间,虽然只有广东政府才可以自称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南京在它完成北伐和取得成功之前是未被承认的。现在中国内部的形势正在发生变化,方向尚不明朗,但某些类似的情况可能产生。美国是否继续承认和支持一个缺乏效率的、得不到群众拥护的、同旧北京政府差不多的政府呢?

(我提出,在外交上撤销对一个未犯有直接不友好行为的政府的承认是不可能的,更不便于在所承认政府的背后支持一个反对党。最后,整个问题

的困难之处在于干涉另一个国家的事务。)

美国已经干涉了有它的军队和物资运入的每一个国家。这种干涉不一定是有意，也不一定是直接的。但是只要有美国的影响存在，干涉仍然是客观存在的。假如美国坚持把那些武器给予包括共产党在内的所有抗日军队，那就不是干涉。如果美国只把武器给国民党，实际上就是干涉，因为它使国民党有可能继续反对中国人民的意志。“干涉”，(毛泽东指出，他对这个词是有异议的，因为这个词用在下面这种情况下已失去它的原意。)以增进中国人民的真正利益，就不是干涉，它将为中国人民广大群众所欢迎。因为他们需要民主，只有国民党才反对它。

我们并不要求停止对国民党军队的所有援助，其结果对战争不利，国民党将会垮台，美国在中国的登陆也会增加困难。

(周恩来在随后的一次谈话中，循着上述各节，把下列话题展开了：1. 美国武器只给国民党必然意味着内战；2. 我们不应忽视日本想要“投降”蒋介石以结束战争的可能性。这对其他盟国是一种诡计，实际上这是一种妥协，而这种妥协的基本原因是日本希望在中国维持一个软弱的国民党，而不希望在中国有一个强大的、统一的和民主的政府；3. 在中国，要保证决定性地赢得战争和避免内战的惟一方法，就是要把武器给予国共双方。

我提到美国的影响怎样才能有效的发挥作用的问题，对于能否“支配”蒋介石表示怀疑。毛泽东激烈地反对我的看法。)

蒋介石是处在他必须听命于美国的地位。看一看河南发生的事情和湖南目前正在发生的事情，再看一看广西表现出来的每一种迹象吧！或许下一步就轮到云南了。看一看经济形势吧！蒋介石已经走投无路了。

蒋介石是顽固的，但他基本上是一个坏蛋。要跟他打交道，必须懂得这个事实。我们不得不从经验中学会这一点。对付他的惟一办法就是要毫不留情。你们不要对他的威胁和恐吓让步，不要让他觉得你们害怕了，否则他就会敲诈勒索。过去美国对付蒋介石的办法非常笨拙，让他用讹诈手段取得了成功。例如：他说什么现在无法维持抗战哪，什么不得不讲和哪，而他的策略在于获得5亿借款。现在孔祥熙出使美国，还要求提供布匹。布匹！我们是不是在同日本打仗呢？难道布匹比子弹更重要吗？我们边区这儿没有棉花，国民党的封锁使我们无法从中国其他有棉花的地方搞到任何棉花。但是我们努了一把力，我们很快地就做到自给自足了。对国民党来说，解决布匹问题要容易百倍。如果他们这个政府有它自己的经济政策，他们早就可以自

已动手解决了。

你们只能根据你们自己的要求同蒋介石讲友好，必须把他置于经常的、有力的和一致的压力之下。决不要放松你们的目标，要经常敲打敲打他。

美国现在的地位完全不同于珍珠港事变刚发生的时候，不再有任何需要或任何理由去栽培、哺育或抚慰蒋介石。美国可以告诉蒋介石，为战争计，他应当做些什么。美国只能在蒋介石服从美国要求的条件下帮助他。美国人发挥美国影响的其他方法是多谈论美国的理想。在中国或在美国，每一个美国官员和任何中国官员谈话时，可以谈论民主。类似华莱士的访问就提供了良好的机会，这种机会应当更多一些。不要错过孔祥熙在美国的机会。

每一个在中国的美国士兵都应当成为民主的活广告。他应当对他遇到的每一个中国人谈论民主。美国官员应当对中国官员谈论民主。总之，中国人尊重你们美国人民主的理想。

（我提出，把我们军队当作一支政治宣传部队来使用是不允许的，我们没有像共产党政治部那样一类教育军队和指导这类工作的机构。）

即使你们的美国士兵不作积极宣传，但只要他们出现并同中国人接触，就会产生好的影响。正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欢迎他们在中国。国民党却不是这样，它需要把他们加以隔离，不让他们知道事情的真相。现在你们究竟有多少美国观察员在前线？我们乐于让你们的人到处走走。国民党却担心大量美国人在中国的影响，他们害怕美国人登陆仅次于他们害怕苏联参战。

从相反的另一方面来看，有美国人在场也是好的。如果美国人分布得很广泛，他们对国民党就会产生一种约束作用，国民党要制造麻烦就更加困难了。昆明是一个例子，那个地方已经变成自由主义思想和学生自由活动的中心了，因为在这么多美国人的眼皮底下，国民党是不敢逮捕学生投入集中营的。拿这一点同西安相比，西安的美国人非常少，特务就横行无阻。

美国刊物对国民党提出批评是很好的，它的效果不可能马上就看得出来。甚至看来常常会暂时地产生不良反应。但只要它是光明正大的（如果它是光明正大的话，国民党就会辨别出来），就会引起国民党的犹豫考虑，因为国民党需要美国的支持。

最后，你们美国人同我们共产党人的任何接触都是好事。观察组到这儿来，我们自然是高兴的。因为它有助于打日本。但是把你们到这儿来的主要意义说成是对国民党施加政治影响（至少目前为止是这么说的），这是不需要的。



(我注意到他强调的是美国在中国登陆，我暗示战争可能采取其他方法打赢，登陆并不是非登不可的。)

我们认为美国人必须在中国登陆，当然，它取决于日本人的力量和战事的发展。但是，日本人的主力是在长江流域和华北——且不说满洲。

如果美军不在中国登陆，那对中国来说是十分不幸的。国民党会继续当政，但它是一个腐败无能的政府。

如果要进行一次登陆，就必须有美军同国共双方军队合作。现在，我们的军队包围了汉口、上海、南京和其他大城市。我们处于内圈，而国民党则靠后一点。

如果需要同国共双方军队进行这种合作的话，重要的事情是允许我们在独立的一些防区内进行工作。国民党太害怕同我们一道工作了，他们惟一关心的是要把我们置之死地。当我们处在独立的防区进行工作时，美国军队就可以看到我们同国民党不同之处：我们拥有群众的支持，我们能打仗。

(我问，正如他们所提示的，如果国民党不受约束，或不诱导它进行改革的话，公开内战是否不可避免。)

我们可以说内战“不可避免，但也不是确定无疑的”。主观上，现在国民党领袖下定决心要消灭共产党，他们害怕我们，正如他们害怕人民一样。其原因也是一样的。客观上，有许多因素（谈话开头时所谈到的五种因素）限制了国民党。这些因素中，最有力的日本人的因素将不存在了。另外一个因素是外国舆论，这个因素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它是外国的，独立于国民党之外。但是，这种因素现在还无法预料，因为国民党仍然希望外国的势力可能会站在它那一边。

国民党已经在为内战忙于寻找借口了。你们了解我们和我们地区的情况越多，那么那些借口的价值就越小。

因此，国民党也可能采取间接的方法来攻击，对于它的挑畔很难确定范围或建立一道防线的。

但是，如果国民党想阻止在我们地区已经取得的进步，如果他们企图夺走人民新的民主权利，人民就要反抗并要求我们的援助。

国民党的另一条行动方针是通过伪军。伪军将转回到国民党内——宣称他们一向是“爱国的”，然后国民党就利用伪军来占据城市和日本人撤出的地方。他们将煽动伪军攻击我们和制造磨擦。

(周恩来对国民党的这一方针作了进一步的阐发，提出这是可能出现的、

带有欺骗性的日本投降蒋介石的一个组成部分：即日本人在扑灭共产党人的条件下，把他们的武器转交给伪军或国民党。这一点乍看起来似乎有点牵强附会，惟一的解释只能是，卷入这一局势的这些势力是如此的错综复杂，他们之间的怨恨是如此的强烈，因此几乎任何事情都是可能的)

即使对国民党来说，事实也很清楚，中国的政治潮流是倾向于我们的。我们坚持了国民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这是一个真正伟大而又民主的文献。孙中山不是共产党人，宣言仍然是有效的，它不会很快过时。即使国民党崩溃，我们也会坚持这个宣言，因为它的总政策是好的和适用于中国的。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我们纲领的每一项条款，都可以从这个文献中找到。

当然，我们并不假装自己是完美无缺的。我们也面临着官僚主义和腐败的问题。但是，我们正视它们，我们正在克服它们。我们欢迎美国人、国民党或者任何其他人的监督和批评。我们经常自我批评和修订政策，朝着更有效的方向发展。

我们的经验证明，中国人民是了解民主和需要民主的，并不需要什么长期的体验、教育或“训政”。中国农民不是傻瓜，他们是聪明的，像别人一样关心自己的权力和利益。你们可以在我们的地区里看到这种不同之处——人民是生气勃勃、富有兴趣和十分友好的。他们具有人类抒发情感和精力的机会，他们已经从沉重的压迫底下解放出来了。

(我对他强调美国的重要性而忽视苏联，提出了疑问)

苏联参加远东战争或中国战后的建设，这将完全取决于苏联的情况。苏联人在战争中已经遭受巨大的牺牲，将忙于他们自己的重建工作。我们并不期望苏联的帮助。

再进一步说，国民党由于患有反共的恐惧病，所以它也是反苏的。因而国民党同苏联的合作是不可能的。至于我们去寻求同苏联的合作，那只会造成中国局势的进一步恶化，因为中国已经是够不统一的了！在任何情况下，即使国民党需要苏联的帮助，这也是不大可能的。

然而，苏联却不会反对美国人对中国的关心，如果这种关心是建设性的和民主的。这样就不会有什么冲突的地方。苏联只需要一个友好的和民主的中国。美国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对有关各方面都将是有益的和符合要求的。

(我开玩笑地说，“共产主义者”的名称可能使某些美国实业家不放心。毛泽东笑起来，他说他们考虑过换一换名称，但是如果人们了解他们，就不

会感到害怕。)

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全然是没有偏见的。我们的减租是从过去的 80%、70%、60%降到法定的(根据未付实施的一项国民党法律) 37.5%。即使这样,我们也不过想要逐步地加以完成;因为我们不需要赶走地主。我们对利息的限定是年利 10%,考虑到这比流行的利息低得多,所以它并不是绝对的。

即使是最保守的美国实业家也不能从我们的纲领中找到可反对的东西。

中国必须工业化。在中国,工业化只能通过自由企业和在外国资本帮助之下才能做到。中国和美国的利益是相同和互相关联的。他们可以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互相配合。我们可以而且必须合作。

美国会发现我们比国民党更加容易合作。我们并不害怕民主的美国影响,我们欢迎它。我们既没有只吸收西方机械技术的天真想法,也不对垄断的官僚资本主义感兴趣。这种垄断的官僚资本主义窒息了国家的经济发展,仅仅使官僚们发财致富。我们所关心的是在建设的和生产的方针上,使国家有可能获得最迅速的发展。首先是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请看我们这儿以有限的资源已经做了些什么)。其次,我们才能谈到“国防工业”,像蒋介石在他的《中国之命运》中所谈论的。我们将关心中国人民的福利事业。

美国不必担心我们会不合作。我们应该合作。我们必须得到美国的帮助。所以我们共产党人认为十分重要的是需要了解你们美国人的想法和打算。我们不能贸然反对你们——不能贸然和你们发生任何冲突。

## 驻华使馆二等秘书(谢伟思)的报告

第 43 号

(延安) 1944 年 10 月 12 日

题目: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将军评中国国内形势。

呈送:中缅印战区美军将级指挥官,转指挥阶层,军邮 879 号

1. 送上 1944 年 10 月 9 日和 12 日与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将军非正式的谈话备忘录。

2. 摘要:两人都表现出信心和愿望,期待着事情会像他们所想象的那样,不可避免地朝着有利于共产党的方向转变。他们认为,美国使中国局势明朗化而施加任何决定性的压力,必须有待于总统选举的结果。目前,委员

长态度强硬，没有马上和解或组成国民政府的希望。共产党在尾追日本人之后，将进入新的地区，并已抵达河南东部。毛泽东和周恩来似乎不同意在不彻底改组的基础上，有限地加入国民党政府（摘要完）。

3. 请将此报告的副本转送美国驻重庆大使，并送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部，供戴维斯先生参考。

约翰·S·谢伟思

同意转送。

总参谋部戴维·D·包瑞德上校

### (附件 1)

## 驻华使馆二等秘书（谢伟思）所作谈话备忘录

（延安）1944 年 10 月 10 日

毛泽东及其夫人昨晚出席了在司令部举行的小型即兴舞会。两人都兴致勃勃，不断地一起跳舞，并与在场的大多数人跳了舞。想起毛泽东平日安详而沉默的样子，这种举止简直堪称浪漫。

黄昏，在舞会的间歇，毛泽东走过来坐在我身旁，谈了约 20 分钟。

他的话头从开玩笑似地向我表示祝贺开始，说是美国答复了中国人批评美援数量少的问题。正当我感到困惑不解时，他解释说，晚报上的文章引用了“国务院发布”的消息（见我 10 月 10 日第 41 号报告）。我坚持认为这一定是弄错了，国务院不可能发表上述的声明，而且没有其他迹象表明我们对国民党正在采取这样一条强硬的路线。

他将话题转到国共关系上，承认国民党还不准备妥协，因此眼下没有希望召集非常时期国民大会和改组政府。

当我问到共产党要做些什么的时候，他回答说“我们要等待。我们的忍耐力是经过长期锻炼的。”然后他说，假如美国要对国民党施加任何直接的影响，那也得推迟到总统改选之后。因为总统已经把蒋扶了起来，所以他不会做使蒋丧失信誉的任何事情（这样做也许会使“中国的朋友”激动起来，并使美国的对华政策成为一只政治足球），直至选举顺利结束以后。他笑着问了问总统的运气如何。

他变得严肃起来，重申他以前说过的话，即共产党不会冒同美国发生磨

擦的危险，因此要与美国的政策“保持一致”。他又笑了笑，问美国对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政策是什么。

我提出，决定共产党政策和前途的确实就是日本人，日本人占领的地方越多，他们就把国民党逼得越困难，而共产党就变得越强大。他承认这话有部分的真实性，并说共产党要“收复被国民党丧失的任何领土”，他们的部队已从北方和南方开进河南东部。他明确指出，如果国民党对中国东南部失去控制，那么共产党也将进入这一地区。但他坚持说，共产党不会同国民党争夺他们仍然控制的地区，而且他们即使承认日本人打垮国民党可能意味着对他们会有好处，但他们也认识到这对于同盟国的对日作战有直接的损害，而后者比前者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因此共产党想要在民主团结基础上联合，认为这是胜利地进行战争的关键，也是解决中国内政问题的关键。

随后，毛问起卡斯伯格少将在他最近（在解放区）旅行中所得到的印象。我指出他已注意到军队与农民之间的友好关系和实际上的合作。他回答道：“当然。如果我们得不到老百姓的支持，我们就不会在这里；也不可能生存至今日。”就此，他把这一重要话题引伸到盟军在人民群众支持下在法国所取得的胜利，他们传递情报、秘密侦察，甚至进行破击和军事行动，这正是美国军队在国民党统治区进行登陆或作战时所缺乏的，而这在共产党地区必能得到动员起来的人民群众的支援。

我把话题转回到国共关系上来，并提出一种假设的可能性，即国民党最终也许愿意邀请几位共产党领袖担任国民党政府的职务，或许是内阁的一些部长。他毫不犹豫地说，这没有用，CC系和其他国民党保守集团仍将完全控制政府的下属机构，共产党在此基础上参加政府只会帮助国民党欺骗中国人民和世界舆论。共产党必须是在彻底改革和政府改组的条件下才可参加。

他又回过头来说共产党愿意等待一个时期的那种想法。随后他提到南斯拉夫，指出时间最终已证明米哈伊洛维奇自称反对德国人的主张是虚伪的。铁托不得不帮助公众认识米哈伊洛维奇的动机和行动。共产党也有大量确凿证据证明国民党与日本人及其傀儡保持着同谋关系，但迄今为止他们扣压着没有公布，以期国民党愿意同他们和解和合作，如果最后肯定国民党没有这种打算，他们就会把材料公布出来。当我问共产党怎么知道何时对国民党的和解不再抱有希望，他未作解释，只是说：“时间未到，尚有一线希望。”

约翰·S·谢伟思

## (附件 2)

## 驻华使馆二等秘书（谢伟思）所作谈话备忘录

（延安）1944年10月12日

周将军非正式来访，一直呆到吃午饭，随后谈了一阵子。谈话大部分是一般性问题。但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他分析委员长10月10日的讲话，是蒋长期以来所作的最反动、最不妥协的讲话。第一点（“不能用通常地标准来判断中国，因为她是一个革命的国家”），主要是针对国内的评论家。第二和第三点（“没有中国，不能赢得战争胜利”，“我们自己仍具有足够的力量”），是指向外国评论家的。第四点（“谈论分裂和内战，是敌人和卖国贼想要阻止我们获得胜利的企图”），是针对共产党的。他指出，这里没有承认外援，没有涉及内政问题（除了把共产党明显地包括在卖国贼之中以外），没有提及民主政治或改组政府。

他认为，讲话又一次表明委员长的态度新近变得强硬了。他举出四种迹象作为论据：（1）目前关于不久将来要召集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全体会议的报道（大概是讨论与共产党和解和政府改组问题），现在已经销声匿迹了。（2）据说委员长已作了一次尝试，通过吴铁城去封住孙科的嘴。（3）虽然10月2日宣布国民参政会视察团将在一周内来延安，但他们自重庆启程的日子尚未决定。（4）最近发生了几起关于严酷的国内检查制度的事例。

他认为国共谈判不会马上有希望取得结果，或进行任何令人满意的政府改组。

他说，共产党要“等一两个月”以后再决定他们下一步的行动。到那时，总统选举已有眉目，会定出一项更明确的美国政策，而日本人对桂林和柳州的进攻不是已经成功就是已经失败。如果那些城市失守，而日本人又继续向前推进，那么全国上下要求国民党改组的压力就会大大增强。

他指出，委员长的政策常常立足于近期打算，现在他把希望寄托于德国人在一两个月内会被打败，到那时美国将要进攻菲律宾，而日本人的进攻，以及中国人民的严重关切，就会被即将发生于中国沿海的大事所牵制。他认为，《大公报》关于开辟“第二条战线”（在沿海登陆）的社论显然是在官方授意下写的。

对于共产党可能在极其有限的基础上参加现政府这样一个假设的问题，

他重申了10月10日谈话的观点，即必须彻底改组政府，而新政府必须有权改组和控制最高军事指挥部。随后，他回顾了自己和其他反对派人物在国民党政府任职的经历，那是既无权又似乎被捆住了手脚，不过，他接着说，共产党应当仔细考虑任何一种建议，并非一定要拒绝它，即使分到的名额不多。他举出国民参政会来比较，共产党明知这个会是用来作为装饰品的，也没有实权，而且分给他们的席位同他们的实力是不相称的。但他们还是接受了这些席位。因为这给他们发表自己观点的机会，以便使公众了解，而且这是他们所希望的开始走向共同管理国家事务的一个小小的楔子。（周将军的态度与毛泽东似乎有点僵硬的声明大不相同，毛泽东主张彻底改组，否则共产党人决不参加）

约翰·S·谢伟思

### 驻华使馆二等秘书（谢伟思）的报告

第10号

（延安）1945年3月13日

题目：毛泽东的看法：美国与中国。

送上与毛泽东谈话的备忘录一份。在中国国内形势处于目前这种危急关头，我认为毛主席谈话中涉及的广泛内容具有重大意义。

摘要：从毛泽东的谈话中得出的最重要的新观点是，蒋介石坚持打算召开一次国民党一党垄断的国民大会，这个不以国家统一和承认其他党派为前提的大会的召开，将关闭和平合作的大门。蒋介石决定冒天下之大不韪。其结果将导致国家的公开分裂。（摘要完）

我像去年与毛泽东谈话时一样确信，美国的政策是影响中国共产党行动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同样也是影响国民党行动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共产党人致力于建立一个真正的联合政府，他们是会合作的。但一心支持中央政府和蒋介石，排斥共产党人，这种政策将造成分裂，而结局是可悲的。

约翰·S·谢伟思

(附件)

### 驻华使馆二等秘书（谢伟思）所作谈话备忘录

（延安）1945年3月13日

毛泽东一开始就对我最近的美国之行提出一系列问题。他对美国朝野上下对于远东战争，对于整个中国，特别是对于中国共产党人的看法甚为关注。

随后他温和地谈到，美国对于在中国引起争端的问题还没有明确的见解，对共产党人也没有充分了解。虽然，美国最近在中国所显示的政策仍是一个谜，但他不相信它是一成不变的。美国最终会明白，单纯地支持中央政府并不是进行战争的最好办法，也不是加速中国向民主前进、保持战后远东局势稳定的最好办法。他说：“几个月以前，有人告诉我们国共之间的距离只有这么远。”（他用拇指和食指比划出一英寸的距离。）“而现在我们这段距离肯定有这么大了。”（他把拇指和食指尽量张开，成了一个V字形。）

从这个话题出发，毛泽东长篇大论地讲了起来，内容简述如下。

中美两国人民之间存在着相互同情、彼此了解和利害相关的紧密联系。双方从根本上来说都是主张民主、尊重个人的；本质上是热爱和平、不搞侵略和不当帝国主义的。

中国战后的最大需要是发展经济。但中国缺乏独立完成这一任务的必要的资本主义的基础。中国的生活水平这么低，不能采用进一步降低生活水平的办法来筹措所需要的资金。

美中两国在经济上可以互相取长补短，双方将不会发生竞争。中国不具备建设大规模重工业的必要条件，她不希望高级的特制产品上与美国竞争。而美国为了它的重工业和这一类产品，需要出口市场，它同时还需要为投资寻找出路。

中国必须建立轻工业以满足本国市场的需要，并提高本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中国最终可以向远东其他国家提供这类产品。中国所拥有的原料和农产品，可以作为外贸和外国投资的补偿。

美国不但是援助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合宜的国家，而且也是完全有能力合作的惟一国家。



由于上述原因，中美两国人民之间不应该也不可能产生任何冲突、隔阂或误解。

但是中国人民实际上是农村人口，是农民。4.5亿中国人当中，农民至少3.6亿，知识分子、高级职员、商人和资本家只占上面薄薄的一层。农民就是中国。

像中国这么幅员辽阔而又落后的国家，不可能迅速得到改造，中国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必然是农业占优势。

因此，中国的农民问题是中国将来的基本问题。中国除非把解决土地问题作为基础，否则是不能成功地实现工业化的，因为农民必须要为这种工业化的产品提供真正的市场。

我们以日本为例，由于它是在封建社会的基础上去谋求工业化的，所以不得不追随帝国主义和向外侵略。它没有从解决本国的土地问题入手。

华莱士和其他一些美国政治家、作家（例如最近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中国农民》这篇文章的布鲁克斯·阿特金）对中国的这一基本事实表示出一种清楚的认识。

中国农民的基本要求是从封建的租佃关系中解放出来，不再依赖地主资本家贷款和收购他们的产品。这就要进行土地改革，还要实行民主。农民必须独立自主，有权维护他们自身的利益。

从总体上看，农民和全中国人民都不准备实现社会主义，在未来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也不会准备实现社会主义。还需要经历一个长期的民主管理私人企业的阶段。谈论立即实现社会主义就是“反对革命”，因为这是不切实际的，试图付之实行，就会自取灭亡。

国民党与中国人口中的广大农民群众没有任何联系，它是一个由军人和地主集团组成的政党，这些集团通过一种保守而又毫无创见的官僚主义实行统治。国民党对于根本改善农民的状况，实行真正的土地改革和清除至今依然存在的封建残余这样一些事情，过去无所作为，将来也不会有所作为。它之所以不能做，是因为这样做了就会侵犯国民党主要支持者的权力基础。

国民党由于惧怕真正的民主，不得不法西斯化。这样，它就成了一个稀奇古怪的封建法西斯的混合体。这就是国民党不能从中自拔的背景和特征。

国民党不愿解决土地问题，借以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来作为工业化的基础，它就转而采取硬性规定的、国家支配和控制工业发展的原则。因此，它在国内的政权方面，或在国外同俄国和其他邻国的合作和友好关系方面，都

不能建立起一个牢固的基础，它就倾其全力发展“国防工业”，并迷恋于权力政治的危险游戏。

可以预料，在这些政策当中埋伏着未来的国内和国外的冲突。如果它坚持这种政策，那么这种预料一定会成为现实。在这些政策指导下，国民党不能解决中国国内的基本问题，不能引导国家走向完全民主化，不能成为远东的一种稳定力量。而这些政策如果没有国民党内部的一场革命，没有一个全新的领导集团，是不可能改变的。

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则是一个代表中国农民利益的政党。它制定的纲领是要使农民问题得到民主的解决：减租减息，实行累进税，扶助生产，促进合作化，从根本上实行民主政治。在这一基础上，随着各阶层人民在团结的而不是互相冲突的基础上建立必要的自由资本主义企业，中国共产党就成为给中国带来民主和健全的工业化的促进力量。这些就是实现和平和稳定的惟一可行的保证。

正如在中国的前途上不能忽视农民一样，也不能忽视中国共产党。国民党想要忽视它，但是它的枪炮不能给它带来胜利。总之，绝大多数战士像中国人民一样都是农民。因为我们是为了人民，而且来自人民，所以我们是代表中国人民说话的。人民从我们的经历中认识了这一点。

可以预料，蒋介石会不择手段地破坏和解，因为在和解中他和支持他的集团必将被迫削弱权力，放弃他们的独裁统治。但是他现在所选择的道路正直接导致内战和国民党的最后自取灭亡。

蒋介石拒不承认任何真正的联合政府，他还宣布打算在1945年11月召开国民大会，这都表现出他日益增长的绝望情绪。这种大会完全是国民党的一种工具。无论邀请哪几个非国民党的代表参加会议，都没有什么意义，只不过是装点门面而已。参加会议的代表还是在1936年由国民党组织挑选出来的，当时（1936年）在国共之间处于公开内战的时期，那是一次最虚伪的普选的骗局。那些代表不能代表在过去7年中同日本人进行战斗、并在解放区掌握了自己命运的人民。他们甚至不能代表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

由这伙傀儡选举蒋介石为总统，并使他的政府成为合法的中国民主政府，那将成为一出丑剧。不能设想和期待这样一个政府会有任何作为。但直接的危险还在于这个国民大会将被蒋介石利用为要求中共承认其权威并交出自己的武装的一种手段。毋须赘言，在没有把敌人从中国的国土上赶出之前，中国共产党的敌占区人民是决不会接受这些无理要求的。于是他们就会

被蒋介石宣布为反叛，公开内战的帷幕就要拉开了。

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和中国最重要的朋友美国必须认识清楚蒋介石最近这个策略所具有的内在危险（决定在国民党一党基础上马上成立“立宪政府”），这就是我们目前对蒋介石开展强大宣传运动的原因。这场斗争关系重大，我们不得不竭尽全力大声疾呼。

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不管在国民党内还是在国民党外，为数众多而且日益增加。他们之中包括民主党派和国民党的派系集团、小党派、大多数知识分子以及许多近代资本家。

但是他们不可能推翻国民党组织或改变国民党现在的反动领导，他们也无力控制蒋介石集团策划的新的“立宪政体”。如果美国不施加影响，要赢得真正的统一和民主还得经历长期而艰苦的斗争。

联合政府是和平过渡到立宪政体的惟一希望，它将在民主的基础上容纳和代表全国各派力量。建立这样一个联合政府刻不容缓，因为这是目前统一全国各派力量，有效地进行抗日战争的惟一途径。

为什么在国家尚未从日本人那里收复失地，解放区人民尚无机会表达自己的意愿之前，蒋介石现在就要决定推行“宪政”了呢？因为他知道人民是不会同意的。在欧洲，对于被占领各国已有规定，只有等全国解放，人民能决定选择自己的政治领袖之后，才能确定政府的形式。这项政策是公平合理的，我们向同盟国的领导人推荐采用它。为什么中国是个例外呢？上海比雅典大，中国的敌占区相当于比希腊大得多的一个国家！

美国没有觉察到它对中国的影晌及左右中国事态发展的能力。蒋介石依赖美国援助。如果没有美国支持，他可能早就垮台了，或者为了国家的统一和得到民众的支持，不得不改变他的政策。美国不干涉中国内政？没有那么回事！你们在这儿，作为中国最大的盟国，你们的参预这一事实就事关重大。

美国的用意曾经是良好的。当赫尔利大使来到延安并签署了五项基本协议的时候，我们是表示赞赏的。要不是他了解罗斯福总统具有同样想法，他是不会签字的。

我们不理解为什么美国的政策在有了一个良好开端之后，现在似乎摇摆起来。毫无疑问，蒋介石的动机和伎俩是十分明显的。他提出“战时内阁”和“党派会议”的建议不解决任何根本分歧，因为它是毫无权力的，它们在各方面都远不及联合政府。蒋介石提议“改编共产党军队”，并“将它们置于美国指挥之下”，这都是企图挑拨我们和美国人之间的关系，以引起误解。

像英国人在欧洲那样，我们是乐于接受美国的指挥的，但所有的中国军队都必须做到这一点。

蒋介石一直企图把谈判失败的责任推到中共身上。为了取得外国消费物资，他布置了一个非常狡猾的宣传骗局，这就是答应在今年通过召开一个伪国大，立即实现“民主”。我们不相信美国人会轻易上当。

召集国民大会，这是蒋介石的最后一张王牌，美国认清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它将关闭和平的大门。一旦召开国民大会，则木已成舟，和解就不可能了。如果迫不得已，我们将进行战斗，因为我们不仅为目前解放区1亿人民的民主权利而战斗，而且为全中国人民的民主权利而战斗。

当祖国的一半土地遭到分割或被敌人占领的时候，当国民党以外的一切政党都被视为非法的时候，不能召开国民大会。形势所要求的是组成一个联合政府，只有联合政府才能挽救目前的时局。我们希望美国能发挥自己的影响促其实现。做不到这一点，美国所做的一切努力都将化为乌有。

约翰·S·谢伟思

### 驻华使馆二等秘书（谢伟思）的报告

第26号

（延安）1945年4月1日

送上今天与几位中共领导人的谈话备忘录一份。他们是：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担任“外交部长”职务的党内第二号政治领袖周恩来，共产党军队的总司令朱德。在谈话快结束时，中国参加旧金山会议代表团的中共成员董必武也加入了谈话。

前一天晚上，周恩来将军已经知道我接到了返回重庆的命令。这次谈话持续了半个下午，还加上吃晚饭的时间，其目的显然是要告诉我有关中共立场和路线的最新情况，这种立场和路线在即将召开的共产党代表大会上将获得通过。

摘要：不管美国采取什么行动，共产党对美国的政策现在和将来都是继续扩大合作。之所以必须采取这一政策是由于：（1）共产党所能做的任何援助美军的工作，都将有利于赢得战争；（2）战后，中国需要美国的援助。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政策将继续是：（1）一方面，提出批评性意见以敦促国民党采取较为进步的政策；（2）以共产党的五点建议为基础，提出和解方案，导

向实现真正的联合政府和名副其实的民主政治。已经决定要建立一个“中国人民解放联合委员会”，但实际上还不能在几个月内组成。这个联合会不是一个“政府”，而是一个咨询机构，它代表着各个解放区（目前尚未得到中央政府的承认）的人民，讨论他们共同的问题，制定联合作战部署，组织沦陷区人民的抗日运动，鼓舞中国其他地区更加努力工作。共产党拒绝承认在战争结束之前召开的国民大会，他们也拒绝接受这种大会的代表名额，他们坚持代表必须全民自由选举产生。（摘要完）

有三点新的和值得重视之处：

1. 同意极少数共产党代表出席旧金山会议，并不能改变他们建立“联合委员会”的决定，他们要继续为此努力。

2. 以“中国人民解放联合委员会”命名的这个机构，可能具有国民党和中国人民所不能忽视的意义。它不是解放区各个政府的联合会，而似乎可以解释成为中国人民解放的联合会。其中暗含的威胁是明显的。

3. 关于打算什么时候建立这个联合委员会，毛泽东没有明确的态度。但后来周的秘书私下对我说，如果国民党坚持召开它的国民大会，那么就同时召开会议建立解放联合委员会。

约翰·S·谢伟思

（附件）

### 驻华使馆二等秘书（谢伟思）所作谈话备忘录

（延安）1945年4月1日

下午4点，我应邀来毛泽东的住所，周恩来和朱德已经在那里。大约有半小时是进行一般性谈话。

他们对于我返回重庆的原因都表示关心，尤其关心这是否会成为我返回美国的原因——推测起来，这可能表示要商谈有关的中国问题。（关于我回去的原因我没有收到什么指示。）

毛泽东重申早先表示过的愿望，即美国在政治上的观察以及它同延安的联系将保持下去。他指出，在未来的几个月中，中国局势的发展至关重要。共产党期望在实际接触中取得美国的了解。

周恩来两次坦率地提到，大意是说，令人遗憾的是我不能在延安多逗留10天；我会觉得这次逗留值得并饶有兴味。（我认为这暗示着党的代表大会将在这段时间内召开。）

我谈到了军事形势。周并不认为目前存在日军企图夺取西安或汉中的明显迹象，但又认为，他们最终将夺取这两个城市，以便打击美国的空军力量，保护自己的侧翼和重要的交通运输线，使日本人可以在中国进行正在策划的长期作战（共产党认为这是确定无疑的）。

我回想起来说，去年日军发动的河南战役似乎构成了对西安的威胁，当时共产党人曾经提出派部队去参加保卫西安的战斗。这时我们彼此默然相视了一会儿。最后朱德说，去年共产党的建议遭到了拒绝，但是，这一次共产党要等到别人有所要求时再说。他似乎不想再去纠缠这一问题。

随后，毛泽东控制了谈话。他显得格外精神焕发，时而离开他的座位以引人注目的手势加强谈话的气氛，时而离开话题提到过去一些可笑的轶事。周恩来偶尔对毛泽东的观点加以解释或引伸。朱德则坐在后面，默默地微笑着。

毛泽东简略地回顾了一下最近与国民党举行的毫无结果的谈判的历史背景。他觉得，一般来说外国人并不了解国共争端远非两个普通政党之间的一般口角和尔虞我诈所能比拟。这里的一些争执对于中国的前途带有根本性质，是极为重要的。

他接着用一些时间谈论了最近在《经济学家》和《纽约先驱论坛报》上发表的一些文章，怀疑这些文章是否就是外国舆论界对于中国事务缺乏了解的典型。

《经济学家》杂志认为，蒋介石宣布在11月间召开国民大会，这是一种巧妙的手段，因为它是对共产党采取“先发制人”的办法，如果共产党人拒不参加，他们就会铸成大错。毛泽东指出，共产党即使有这种愿望，也不能去参加；这纯粹是一党的大会，大会代表是在9年前国民党进行公开的反共内战的情况下，通过虚伪的选举产生出来的（从那时起他们中间的许多人已成了汉奸）；他们不能代表几乎占全国2/3（敌占区和共产党解放区）的人民；在这种情况下，真正的民主不能寄希望于这样一个政党，这个党自从蒋介石于1927年反革命以来，已经变成镇压人民和反对民主的党。他坚持认为，对共产党来说，同意召开这样一个伪国大，就是放弃了他们所有的原则和背叛了解放区的人民。因此这将铸成大错（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所讲的基本上是重复他在1945年3月13日所谈的内容，那次谈话见

我当日发出的第 10 号报告)。

《纽约先驱论坛报》曾说，由于苏联的胜利和美国的重视，例如对驻延安的观察组发回的电报的重视，使得共产党“增加了他们的要求”和变得“更加不讲道理了”。对此，毛泽东极其详尽地阐明了共产党政策的前后一致和始终不变的性质；甚至在内战期间，共产党是如何号召在全民抗日、承认民主权利、实行全民动员的基础上团结起来的；当国民党对这些要求作出承诺的时候，统一战线是如何在 1936 年至 1937 年期间最终建立起来的；在战争期间，共产党又如何一再要求遵守这些原则，认为这是国家统一和进行胜利抗战必不可少的重要因素。（参阅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一书，可以看到他耐人寻味地确认了这一论点的正确性。斯诺在书中记录了他与毛泽东在 1936 年的谈话。共产党过去和现在的目标的相同之处是极为明显的。）

谈到苏联的胜利和美国的重视所带来的影响时，毛泽东幽默地回忆道，在国共内战期间，当时的口号是“消灭蒋介石”；1941 年 1 月蒋介石对新四军事事件凶恶地反咬一口之后，共产党不得不对中央政府实行公开的抵抗；在 1943 年夏季，中央政府以武力威胁边区时，产生了交战状态。他指出，所有这些例子都说明共产党对蒋介石的态度比现在更加强硬，而这些例子都发生在苏联的胜利和美国的重视之前。

毛泽东在重申共产党的目标始终不变的时候，强调指出，当共产党还处于弱小而又势单力薄的时候，就为此目标而奋斗；现在，不管外部的影响如何，不论赞同与否，他们仍将为此而继续努力。

毛泽东承认，在某种意义上国民党的埋怨是有道理的。他说：“我们的目标并没有改变，但随着中国局势的日益险恶和危急，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我们是正确的，我们的发言权就更大了。国民党的这种埋怨表明他们感到了压力。不管怎样，拖延对他们无济于事。”

接着，毛泽东提议，中共对美国 and 国民党发表一个简单的政策声明，从中可以看到，像共产党的主要目标一样，他们对美国 and 国民党的政策也是一贯的，始终不变的。

共产党对美国的政策，现在是而且将继续是寻求美国对中国民主政治的友好支持和合作抗日。但不管美国采取什么行动，不管能否得到美国的一枪一弹，共产党都将尽其所能采取一切方式向美方提供和实行合作。凡是他们能做到的一切，诸如提供情报、气象报告和营救空军人员，中共都视为自己的义务和职责，因为这有助于盟军作战和加速打败日本。要是美军登陆或进

入共产党辖区，他们就会发现组织严密和热心抗敌的一支军队和人民群众。

中共将继续寻求美国的友谊和了解，因为这一点对中国战后复兴是十分重要的。（这个论点的详细内容见我第 10 号急件中关于 3 月 13 日我与毛泽东谈话的报告）

当然，美国是否与中共实行合作，这个问题只能由美国来决定。但是，中共认为这种合作对美国是有利无害的——可以尽快赢得战争；帮助中国的统一和民主事业；使中国的经济在解决土地问题的基础上，通过工业化而得到健康的发展；博得绝大多数中国人民即农民和自由主义人士的永恒友谊。

中共对于国民党的政策一方面是要对它进行批评，设法促其进步和改革；另一方面愿意同它和解，在和解的基础上实现真正的团结和民主，并使全国所有军队同心协力去争取战争的胜利。这种和解的要旨已经包括在中共提出的并经赫尔利签字同意的五点建议之中。这种和解应当意味着国民党与蒋介石独裁统治的结束。如果蒋介石继续担任主席，他和所有武装部队应当向包括全国各党派的联合政府负责。这种和解应当包括承认共产党军队是全国武装力量的一部分，承认各解放区是合法的地方政府。

这种和解和作为其必然结果的联合政府，当然是临时的。因为中国大部分国土仍处在敌人的防线后面或处在敌人的占领之下，联合政府不可能具有完全的代表性，所以也不可能是彻底民主的。（毛泽东把人口划分为：国民党统治区 1.9 亿，日占区 1.6 亿，共产党解放区 1 亿。）在当时情况下，这就是最合理的政府，直到全国光复之后，它就可以向完全的民主政体过渡。

共产党并不坚持要蒋介石毫无保留地立即同意成立联合政府，他们愿意商谈这个问题，并在党派会议上制定详细步骤。但是，这样一个党派会议必须具有权威，并能作出管理政府和准备向立宪政体过渡的决议。

必须毫不妥协地反对在战争结束之前，在所有其他党派尚未获得合法地位之前，以及新的代表未经全民选举之前，召开国民大会。

共产党将以拒绝承认国民大会或拒不接受其各项规程来进行抵制，因为解放区没有代表名额，所以这是合乎逻辑的行动。当然，今后的行动将取决于蒋介石。“我们不会先动手，我们不会先打第一枪。”

“但是，目前所策划的国民大会必将导致内战。蒋介石的借口就是把反对行为宣布是叛乱。如果他继续进行恫吓，他就将诉诸武力（因为这是他所知道和精通的惟一手段）。如果我们遭到袭击，我们将予以反击。我们不怕这种后果，因为人民同我们站在一起。日本没有能力彻底消灭解放区，蒋介石



石强征入伍而又未经训练的农民所组成的军队，又怎能办得到呢？在内战期间，我们的力量要弱小百倍，当时蒋介石没有能够消灭我们，那么今天他又有什么希望呢？我们并不担心蒋军的美式装备，因为招募来的农民军队不会有效地利用这些武装向他们的兄弟般的士兵队伍开火的，后者是为了他们的家乡，为了经济民主和政治民主而进行战斗的。我们担心中国要付出的代价是：受苦受难和牺牲生命，财产被毁，国家重建被延误。中国需要和平，更需要民主，因为民主是和平的基础。而中国的首要任务是必须把日本人赶出去。我们认为美国也应该关心这个问题，因为它涉及到美国的切身利益。”

我问，如果国民党分配给中共若干席位，要求其参加国民大会的话，共产党又将怎么办呢？周恩来立即断然回答说，他们将予以拒绝。毛泽东表示同意，朱德也点头赞成。周作了以下详细说明：中共参加旧金山会议代表团一事不能被援引为先例。既不能作为共产党关于联合政府的建议的先例，也不能作为关于党派会议的建设的先例。旧金山会议代表是由各党派商定的，因为要由人民来选举他们的代表是不切合实际的。但是，与此全然不同的是，国民大会要通过一部永久性的宪法和建立一个固定体制的立宪政府，国民大会的代表必须由人民自由选举产生，而不能由各政党进行讨价还价或指定产生。

毛接着说，现在各解放区尚未得到重庆政府的承认，尽管中共在敌占区同日寇进行艰苦战斗，可是他们得不到指导、支援或军需品。“他们是没娘的孩子”。他们面临着许多共同的问题，他们应当在一起工作与部署，以便进行最有效的作战。因此共产党提议，各根据地派代表共同组成一个“中国人民解放联合委员会”。这个组织的目标是：统一各解放区人民的战斗力量；讨论共同关心的问题；制定联合作战的部署，以便最有效地打败敌人；鼓励和组织沦陷区人民的抗日运动；鼓励中国其他地区的人民和政府尽最大努力积极作战。

毛强调说，这个联合委员会不是一个“政府”，“认为它是一个政府的看法是错误的”。它不具备一个政府的权力或职能，而仅仅是个咨询机构。

具体涉及到委员会的组织形式问题，毛泽东避而不谈，只是说这些细目以后会定出来的。他还慎重地提到，不论是关于成立联合委员会的明确决定，还是它的确切名称，都还没有经共产党正式通过。“但是”，他面带笑容地说：“这大概都会得到通过的。”（实际情况并不令人觉得“不民主”，所有参加党代会的代表在延安已经集中了一段时间了，重要的会议与协商始终在

进行着。在所有重大问题上无疑已达成一致协议。因此，党的正式代表大会可能只剩下一些报告的正式提出和通过，新的委员会的选举，以及通过一些已经取得一致意见的决议了。)

我问道，组成联合委员会需要多长时间？毛泽东答称，那不是几个月能办到的事，因为边远地区的代表要花很长时间才能到达延安。

我问，组成联合委员会的代表将怎样选举产生？毛泽东不十分明确地回答说，各个解放区的人民参议会将派出自己的代表。他指出，这些参议会是通过普遍投票的办法民主地选举出来的，它代表各个阶级和团体。

我问，解放区以及可能还有沦陷区以外的团体是否包括在内？毛泽东回答说，联合委员会的大门对所有愿意参加的团体都是敞开着。自然，这个委员会将包括蒋管区的所有团体。但他没有考虑到，在目前情况下，国民党既不赞成，那些团体怎么能够直接参加呢？对此，毛泽东说：“我们会给他们留下席位”。

毛泽东强调说，解放区的所有团体，如有可能也包括沦陷区的团体，都要选出代表，联合委员会将完全具有统一战线的性质。

我问，如果国民党同意组织一个联合政府，是否会放弃联合委员会的计划。对此，毛泽东未作正面回答，他说：“有各种各样的联合政府。”如果有一个理想的联合政府的话，可以设想，联合委员会就没有必要了，因为这样一个联合政府将把解放区置于其管辖之下，并尽一切可能去帮助中国人民赢得自身的解放。

约翰·S·谢伟思

## 六、毛泽东同包瑞德的会谈<sup>①</sup>

——包瑞德的报告

1944年12月10日

题目：同毛泽东主席的会谈

1. 1944年12月8日，我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

<sup>①</sup> 见包瑞德著《美军观察组在延安》第七章，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12月版。

周恩来举行了长时间的会谈。会谈开始时，我首先发言。我说，我已得知周恩来将军不打算返回重庆。毛主席回答说，周将军在那里无事可做。然后，我们就目前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谈判进行了充分而坦率的讨论。毛主席和周副主任谈话的要点概述如下：

“由委员长向我们提出的三点建议的首要之点是，共产党的军队必须服从全国军事委员会的改编。这就意味着把我们的军队完全置于委员长的控制之下，其结果将是，他们可能随心所欲地裁减我们的武装力量。那时，我们将任凭其摆布。

“与这种相当于完全投降的交换条件相应的是，总共才给我们一个全国军事委员会的席位，而这个名额是没有任何实际作用的。当年的重要将领冯玉祥、李济深二位将军也是全国军事委员会的成员，但是他们对军事委员会的决定毫无影响。事实上，整个全国军事委员会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开会了。

“赫尔利将军说，如果我们接受全国军事委员会的这个席位，那么我们将得到所有的军事报告，从而我们将知道政府的行动，并且我们将处在影响政府决策的地位上。我们难于接受赫尔利将军的意见。我们明确地告诉他，虽然有一位共产党人参与全国军事委员会，但是他对该会工作的了解绝不会比局外人多，而且他在该会也不会比局外人有更多的发言权，我们是清楚我们说的那种情况的。

“赫尔利将军还说，接受了全国军事委员会的代表席位，将使我们的‘一只脚踏进大门’，并以此作为能够扩大我们地位重要性的起点，从而逐渐使我们的影响增加到这样一个程度，即最后我们将控制政府。我们相信，这是一个带有根本性错误的概念，但是我们已不能使赫尔利将军确信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错误。我们所能说的一切乃是，如果双手被反绑着，即使一只脚踏进了大门也是没任何意义的。

“赫尔利将军、魏德迈将军以及麦克卢尔将军曾对周恩来将军说，美国愿意和我们进行军事合作，但是在给予这一我们非常乐于接受的合作之前，我们必须接受委员长的条件。然而，在这种条件下，美国却完全没有向我们提供有关我们安全的保证。我们感到，我们不能适当地向美国要求任何这种保证。事实上，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相信美国能够对我们的安全提供保证，即使他或许真诚地愿意这样做。我们也不能相信委员长的美好诚意。凡是不带偏见地研究过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关系史的人，都能通情达理地想到我们不会寄任何希望于他。

“我们发现，美国的态度有些让人迷惑不解。赫尔利将军来延安，问及我们和国民党合作的条件，我们提出了五点建议，其中的基本点是建立联合政府。赫尔利将军也同意这些显然是公平的条件，而且事实上，五点建议的大部分内容，是在他的建议之下提出来的。委员长已经拒绝了这些建议。现在美国又来认真地要求我们接受需要牺牲我们自己的反建议，这是我们难以理解的。

“我们被告之，要我们牺牲自己以拯救局势是高尚的事情。我们看不出，把我们置于任蒋介石摆布的境地，能有助于解决当前的危机。赫尔利将军说，如果我们让步，我们将获得世界的赞许。但是，如果我们让委员长绑住手脚，世界的赞许对我们没有一点用处。

“魏德迈将军说，如果我们同委员长达成协议，他就能给我们武器，并能派出美军军官训练我们，和我们一起工作。我们衷心地欢迎这种帮助，但是不能指望我们付出这样的代价，即我们在接受这种帮助时，要由委员长批准。我们认为，美国应该充分认识到这种事实，即如果我们屈从于委员长所能强加给我们的种种限制，如果放弃我们仅有的自卫手段（这种自卫手段就是我们的军队），那么，我们不会，或根本不会有什么合作的手段了。毫无疑问，在目前的形势下，我们愿意参加政府。而事实上，向我们提出的条件却使我们没有机会参加政府。我们再重复一遍，如果双手被反绑着，那么一只脚踏进大门也是没有意义的。

“要求我们作出如此巨大的牺牲，面对目前危机负有重大责任的委员长却可以不作出什么牺牲，这对我们是太不公平了。承认我们党的合法性没有牺牲可言。我们不认为，给我们一个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全国军事委员会的席位，是一种牺牲。

“也许魏德迈将军真诚地渴望帮助我们，但如果我们接受了委员长的条件，他就不能帮助我们了。我们希望对日战争中同美国合作，在当前的危机形势下，我们也希望有所帮助，这全部的事情却被委员长阻碍了。我们已经提出了一项解决问题的方案，根据这个方案，我们得到美国的帮助是没有问题的，但我们的建议却被委员长直截了当地拒绝了，并且他还企图把责任推到我们身上。

“美国认为，蒋介石一定会不惜一切代价保持他的执政地位。我们不反对这一政策，只要他同日本作战，我们就完全愿意委员长继续执政，然而，我们并不准备放弃在全国军事委员会取得一个席位这一自我维护的权力。

“如果鉴于蒋介石的历史，美国希望继续支撑这一腐朽架子——蒋介石，那是美国的权力。然而，我们相信，尽管美国能够做他所要做的一切，但蒋介石注定要失败。难道魏德迈将军认为，在实现他的各项建议中，蒋介石会给予全心全意的合作吗？当然他办不到。史迪威将军已经十分了解，在军事行动中对蒋介石的依靠程度应有多大。让美国继续支持蒋介石，直到他把昆明、贵阳、重庆、西安、成都等都失掉，那时，也许美国将会明白，支持蒋介石是如此的无用。

“我们不像蒋介石，我们并非必须要别的支持。我们能够挺立着，像自由的人们一样自由地行走。

“我们承认，委员长虽有着如此之多的短处，但他总还没有和日本人讲和，为此我们非常感谢他。而另一方面，只有王八蛋才拒绝对日作战。

“根据五点建议，我们相信，有美国的帮助，我们能够挽救目前的局势作出一定的贡献。我们愿意在对日作战中流尽我们的最后一滴血。我们相信魏德迈将军知道，如果我们得到允许的话，我们能提供怎样的帮助，但是，我们不能被反绑着双手去战斗。我们完全愿意服从以蒋介石为领导的政府的指挥，如果我们在这个政府中有一定的发言权。但是，全国军事委员会的一个席位根本不会有我们的发言权。

“如果美国放弃我们，我们将万分的遗憾，但是这不会损害我们对你们的友好情谊。任何时候，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我们都将怀着感谢的心情，接受你们的帮助，我们将不附带任何条件，在美国将军指挥下尽心履行自己的义务，这就是我们对你们的友好情谊。如果你们在中国海岸登陆，我们将在那里同你们会合，并且将听从你们的指挥。

“我们已经迎来了美国陆军观察组，而且我们已经尽力同它合作。如果这个组继续留在延安的话，我们将感到高兴；如果它撤离，我们将感到遗憾。如果它撤离以后又回来，我们将再度表示欢迎。如果美国不给我们一支枪或一发子弹，我们仍将继续和日本人战斗，而且，我们还是美国的朋友。

“没有任何外部的帮助，我们已经同日本人打了7年，不论发生什么情况，我们将继续战斗下去。如果美国不帮助我们，还有英国和苏联（包瑞德注：我说，依我个人意见，他们不可能指望从英国得到多少帮助。对此，他们没有回答。关于苏联，我没有说什么）。

“包瑞德上校说，我们使赫尔利将军明白了，那‘五点建议’是我们的最后答复。他说，他相信赫尔利将军把那‘五点建议’看成是我们的‘讨

价’了。而那‘五点建议’是我们的最后条件，在‘五点建议’中，我们已经作了我们将要作的全部让步。我们在同意委员长作为领导上作了让步，在同意我们的军队接受全国军事委员会的统一指挥上作了让步，在美援物资方面我们也作了让步（除去我们应该得到的公平的一份外，我们毫无所求）。我们将不再作出任何进一步的让步了。

“我们完全理解，赫尔利将军不能保证委员长接受‘五点建议’。我们知道他仅仅能说，这些条款是公平的，他将尽力使委员长接受这些条款。但是，在蒋介石拒绝这些公平的条款之后，我们不希望赫尔利将军反过来强迫我们同意需要我们牺牲自己的反建议。

“如果美国不能理解，假如我们接受了蒋介石的绝对控制，我们将使自己处于我们所指出的那种境地，那么我们今天所说的一切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在重庆时，周恩来将军尽了最大努力向赫尔利将军阐明了这一点。如果赫尔利将军现在还不理解这一点，那么他将永远不会理解，即使周恩来将军再去重庆，把所有的事情对赫尔利将军重说一遍，他还是不会理解的。

“由于蒋介石已拒绝成立联合政府，我们决心不再让步，我们已决心采取一个决定性的步骤。我们正向我们控制的各地区的国民参政会建议，组成代表所有这些地区的‘联合委员会’。我们将寻求国民政府承认这个团体，但是我们并不指望得到这种承认。这个委员会的组成，将是组成一个独立政府的初步的步骤。

“周恩来将军在重庆时，没有把组成联合委员会的打算告诉赫尔利将军。这一点步骤是经过长期考虑的，但是直到周恩来将军返回延安，他才得知这一步骤被最后确定下来了。

“包瑞德上校说，我们现在的立场是把谈判的大门关住了。我们已经关住了大门，但是窗户还敞开着。那‘五点建议’就是窗户。我们愿意在今天、明天、甚至后天回到联合政府中去。但是，到了大后天，等到重庆、昆明、贵阳、成都、西安都失守以后，我们就不会按照我们早先提出的条件去参加了。”

2. 在整个会谈中，毛主席的态度极其强硬。他未对我失礼，但是有几次他大发雷霆，他不断高喊：“我们将不再让步！”“蒋介石那个王八蛋！”“如果蒋介石在这里，我要当面痛骂他一顿。”我说，我认为依委员长的看法，“五点建议”是逼他下台的手段。这句话特别激怒了毛主席，他“呼”地一下站起来，大声说道：“他早就应该下台了！”周将军从不动怒，他异常

冷静，以平静的话语支持毛主席所说的每一个问题，会谈结束时，我感到，对于两位聪明、无情、坚定的领袖，我所谈的都是白费唇舌，他们绝对相信他们的地位所具有的力量。

在会谈过程中，我努力提出一些我个人的意见，去影响共产党领袖们的不妥协的立场，兹将我的意见与他们的回答综述如下：

(1) 意见：组成一个联合委员会进而建立一个独立政府的做法，将给蒋介石一个绝好的机会。借此，他会宣称，他历来的关于共产党人是叛乱分子的说法，已被毋庸置疑地证实了。

回答：他一直叫嚷我们是叛乱分子，叫嚷的时间太长，以致我们已经习以为常了。他高兴怎么说，就让他去怎么说吧。

(2) 意见：你们将给委员长一个说你们已经同日本人相勾结的机会。

回答：他早就这样多次诬蔑我们了。我们继续抗击日本将证实我们并非同日本人相勾结。

(3) 意见：谈判已经失败及你们将同国民政府破裂的消息会使日本人高兴。

回答：无论我们做什么，日本人总是歪曲事实以达到他自己的目的。我们所能做的这些，即使他们高兴也无关系。

(4) 意见：如果你们和国民党破裂，不仅蒋介石，而且美国的大部分舆论或许都要认为你们是叛乱分子。

回答：对于美国人民，时间将证实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

(5) 意见：在这次危机中，你们未能进入政府，或许会在美国引起非常不利的反应。

回答：等真相为人所知（真相终将为人所知）时，美国人民将会赞同我们的行动。

(6) 意见：如果日本人在昆明和贵阳被国民党和美国军队击退，你们将十分难堪。

回答：如果真是这样，我们将比任何人都要高兴地欢呼。

(7) 意见：如果委员长被打败，而你们又不在他需要帮助的时候去帮助他，那么美国或许要从中国撤走他们的全部军队。

回答：美国不可能放弃中国。

## 后 记

按照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的统一部署，陕西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于1990年12月决定，由韩国劲（省外办副主任）负责筹备《陕西省志·外事志》（以下简称《外事志》）的编纂工作。后设立了以韩国劲任主编，王克致（省外办副厅级离休干部）、柏明（西北大学教授）为副主编的编纂办公室。1991年初，《外事志》的编纂方案业经外交部政策研究室同意，并呈当时分管外事工作的孙达人副省长审定后，于1991年4月全面展开编纂工作。

1994年4月韩国劲虽调任浙江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副主任，为保证此项工作的连续性，仍主持本志书的编纂工作。1997年省外办领导班子调整后成立了《外事志》编纂委员会，由郝延政任主任，韩国劲、饶笃钧、裴长菊、曹先觉、朱大安、左锋任副主任。嗣后鉴于本志书编纂出版工作的实际情况，决定韩国劲、饶笃钧（省外办副主任）并列主编。

《外事志》“古代篇”1995年初完成初稿，“近代篇”、“现代篇”则于1996年5月形成初稿。1997年下半年本志书初稿分别报送外交部、中联部、省志办审阅并请省内外有关专家、学者和省外办各处室及离退休老同志提出修改意见。根据外交部和中联部的审查批复，省外办于1998年3月邀请外交部政策研究室张光佑、西北大学文博学院院长周伟洲、历史系李云峰教授和省级有关部门等16位同志对《外事志》初稿进行了评议。根据评议意见，编纂人员各负其责，又对本志书再一次进行了全面修改。

2000年9月8日，陕西省地方志办公室主持召开了《外事志》送审稿终审会。省志办主任周伯光，原主任滕云，副主任董健桥、张芳斌、省煤炭局原局长郭甲寅及省志办郭承富、冯鹰、吴玉莲、李川等出席会议。《外事志》编委会主任郝延政、副主任韩国劲、饶笃钧、左锋，副主编柏明、杨庚泉及志书编委会部分委员出席了会议。会议对送审稿给予了充分肯定，决定通过终审。同时对送审稿的不足之处也提出了具体修改意见或建议，要求抓紧修



改和完善，争取早日出版发行。

1994年省级机构改革中省侨务办公室与省外办合并。鉴于陕西省“侨务志”篇幅有限，难以独立成志，为此在《外事志》中单列一“侨务篇”。在省政协副主席苏明、省外办（侨办）主任郝延政、副主任王步唐的关心和重视下，“侨务篇”得以顺利完成。

本志书在编纂过程中，得到了省贸促会曾宪武、省科委曹蔚果、省水利厅郭文儒、西北民航管理局王金平、省教委王广印、省文化厅李自敏、省对外科技交流中心韩增林、省国际科技交流中心邱晓真、省海外联谊会方大卫、省归国华侨联合会雷雨、省侨办高立满、高士洁、汪斌、省志办杨文学、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侯丹等的大力支持和帮助。省外办杨玉民、夏秀梅、王爱珍先后查阅现代外事档案三百余份，承担了“现代篇”大量的资料搜集工作。先后在省外办秘书处任职的王治孝、陈为雄、张志道为本志书的编纂承担了大量而繁杂的具体工作。省政府办公厅、省财政厅、省外办财务室的有关同志为本志书的经费筹措给予了积极有效的支持。值此《外事志》成书之际，谨对所有关心、支持本志书编纂工作的部门、单位和个人表示衷心的感谢。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欣然为本志书题签和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李建国、陕西省省长程安东的题词更为本志书增光添彩。

为本志书提供图片的有陕西日报社邵宗武、王天育、陕西历史博物馆邱子渝、西安碑林博物馆罗忠民、新华社陕西分社安克仁、陕西旅游出版社马忠义以及延安革命纪念馆、西安大雁塔文管所等；其中1982年以后的外事图片均为陕西省外事服务中心韩晓安提供。根据省外办的决定，陕西省外事服务中心具体承担了本志书后期的出版、印刷等事务。

《陕西省志·外事志》是一部贯通古今的重要涉外专业志书，内容涉及对外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方面面，由于编者经验不足，并受资料、学识所限，虽历时十年编纂，仍难免有不少疏漏讹误或不当之处，敬请外事、侨务、方志等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不吝赐教，以便再版时修改完善。

《陕西省志·外事志》编纂办公室

2001年6月

责任编辑 贺治博  
封面设计 周国宁  
版式设计 陈 涛



ISBN 7-224-05804-1



9 787224 058048 >

ISBN 7-224-05804-1/K·962  
定价：150.00元